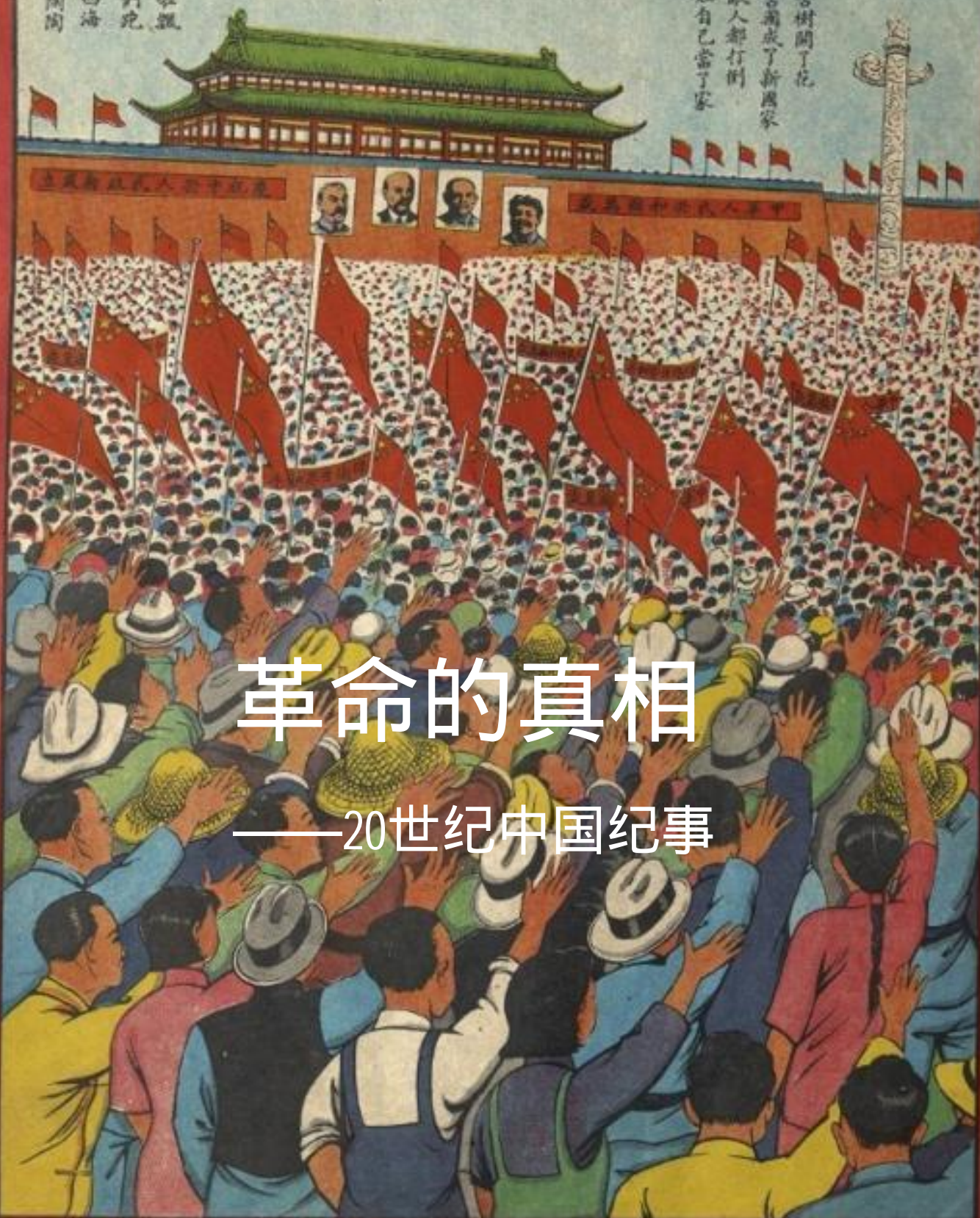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千年古樹開了花
千年古廟成了新國家
三大敵人被打倒
老百姓自己當了家

五星紅旗呼啦啦
毛主席帶着我們跑
跑過了五湖跟四海
一統江山樂陶陶



革命的真相

——20世纪中国纪事

革命的真相

——20 世纪中国纪事

陈宪辉 著

Table of Contents

- [第 1 章 庚子国难](#)
- [第 2 章 变法革新](#)
- [第 3 章 预备立宪](#)
- [第 4 章 日本输入革命](#)
- [第 5 章 载沣当国](#)
- [第 6 章 辛亥革命](#)
- [第 7 章 孙黄卖国](#)
- [第 8 章 袁世凯当国](#)
- [第 9 章 日本推翻袁世凯](#)
- [第 10 章 孙中山破坏法统](#)
- [第 11 章 苏俄输入共产革命](#)
- [第 12 章 联省自治运动](#)
- [第 13 章 从对华宣言到北伐战争](#)
- [第 14 章 国民党对苏决裂](#)
- [第 15 章 工农运动](#)
- [第 16 章 中共暴动与红色割据](#)
- [第 17 章 北洋政府时代终结](#)
- [第 18 章 党国时代开始](#)
- [第 19 章 新军阀混战](#)
- [第 20 章 “武装保卫苏联”](#)
- [第 21 章 苏区肃反](#)
- [第 22 章 斯大林促中日开战](#)

- [第 23 章 中华苏维埃国](#)
- [第 24 章 围剿与长征](#)
- [第 25 章 建设与备战](#)
- [第 26 章 华北事变](#)
- [第 27 章 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
- [第 28 章 国军抗战](#)
- [第 29 章 中共避战与扩张](#)
- [第 30 章 和平运动](#)
- [第 31 章 抗战中的延安](#)
- [第 32 章 中美摩擦](#)
- [第 33 章 斯大林布署推翻国民政府](#)
- [第 34 章 第二条战线作战](#)
- [第 35 章 解放区土改](#)
- [第 36 章 国民政府时代终结](#)
- [第 37 章 中共建国](#)
- [第 38 章 “抗美援朝”](#)
- [第 39 章 镇反运动](#)
- [第 40 章 土改运动](#)
- [第 41 章 整肃运动](#)
- [第 42 章 农业合作化](#)
- [第 43 章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 [第 44 章 反右运动](#)
- [第 45 章 从冒进到饥荒](#)
- [第 46 章 继续祸国殃民](#)
- [第 47 章 中苏分裂](#)
- [第 48 章 崇毛运动](#)
- [第 49 章 越战与三线建设](#)

[第 50 章 初期文革](#)

[第 51 章 中期文革](#)

[第 52 章 文革外交与输出革命](#)

[第 53 章 毛泽东时代终结](#)

[第 54 章 拒绝道歉的“改正”](#)

[第 55 章 洋跃进](#)

[第 56 章 中越边境战争](#)

[第 57 章 坚持专制的“改革”](#)

[第 58 章 三峡建坝](#)

[第 59 章 从学潮到六四](#)

[第 60 章 相反的选择](#)

[第 61 章 共产革命遗害](#)

[结语](#)

第 1 章 庚子国难

义和团暴乱

明朝开始，中国实行海禁，闭关锁国，限制贸易发展，与飞速进步西方文明拉开了差距。1792 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The Earl George Macartney）使团访华，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使团带来了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君主号”战舰模型，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等数百件礼品，相信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高兴。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英国使团只是来进贡和祝寿的，要求使节行跪拜礼，双方发生了“礼仪之争”。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信这样写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由于清王朝自满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平等交往，无意发展贸易，英使团外交失败而归。1816 年，英国政府再派阿美士德勋爵（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率团访华，再次尝试与清廷商讨开拓贸易，打开中国门户。清廷同样天朝心态，坚持要求英使三跪九叩。结果阿美士德勋爵因礼节分歧未能面见嘉庆帝，英国外交努力再次失败。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只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窗口，实行洋行（公行）制度，规定由广州十三洋行经管，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

英国需要大量购买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而中国不开放贸易，很少购买英国工业品，导致英国贸易赤字，黄金、白银流向中国。于是英国

以印度种植的鸦片输入中国作为支付手段（吸食鸦片和鸦片贸易在当时世界上合法）。鸦片之害报到朝廷，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不光将英商的鸦片销毁，还下令封港，对广州外国商馆断水断粮，对所有英船实行淡水封锁，并默许属下向淡水源投毒。于是英国出兵，以很少的军队击败清军，是为中国所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和英国所称淡水战争。战败的清王朝被迫于 1842 年签定了南京条约，开放了门户。鸦片战争冲击了国人的天朝心态，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战后发起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师夷之长技以求富”的洋务运动。

引入先进机器、技术的洋务运动带来了农村自然经济解体，这种历史的进步对国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航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大批失业。洋货进口造成中国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1] “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故利入益微。”[2] “因洋油进口，原有榨油作坊多已歇业”。[3] 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在山东，德国人修建铁路，“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迂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4] 在东北，“铁路之经过民田也，正当成熟之时，俄人不给谷值，遽强占之。”[5] 列强的瓜分，洋人的涌入，甲午战败的屈辱接踵而至，破产失业的中国贫民的仇洋排外情绪日益强烈，纷纷投身秘密会党。

在山东，无业游民在嘉庆年间兴起练义和拳，以练拳为名设坛口敛财，没有出路的失业农民大批加入，拳民队伍迅速壮大。义和拳民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愚昧地认为杀洋人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称接受外国传教的中国教民为“二毛子”，将教民也列入灭洋之列。

拳民的口号包括：“保护中原，驱逐洋寇”[6] “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7] 等等。拳民揭帖中充斥愚昧文字，诸如，“洋人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8] 等等。

受排外浪潮影响，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仇洋活动一味纵容。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义和拳民在李秉衡纵容下制造了毁教堂，杀害德国传教士的“曹州教案”。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指出：“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国之迷信过深，我国人始终未能明了教会中人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以致一般民众都会相信教会中人领去收养孩子是骗了去挖眼珠以供药用和宗教礼节之用的诬陷之词。[9] 1899年，毓贤赏拳民银两，支持义和拳设厂练拳，将“义和拳”改编为隶属官方团练的“义和团”。在官方支持下，义和团肆意杀害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对于杀洋人暴行，在华各外国公使纷纷照会清政府要求制止拳匪滥杀，撤换山东巡抚毓贤。

在列强的压力下，戊戌变法后重新训政的慈禧太后将毓调任山西巡抚，派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发上谕嘱袁惩办拳民，安定山东。袁世凯是朝臣中最清楚认识世界潮流者，深知拳匪的破坏性，上任后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惯受官方纵容的拳民对新巡抚的章程置若罔闻，在肥城又杀害了英国传教士卜鲁克斯。袁世凯严厉镇压拳匪，为卜鲁克斯竖立纪念碑，向教堂赔银，赔地，并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致信英使表示遗憾。对于继续妖言惑众，吹嘘刀枪不入的拳匪首领，袁世凯让他们签下生死状后当众枪毙，有效拆穿了拳匪骗术，使山东治安改观。拳匪逃离山东后在华北其它省继续滥杀洋人。各国公使继续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取缔义和团。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开始安排废黜光绪皇帝，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按照荣禄、崇绮、启秀等人的建议，决定立端王载漪子溥儀为大阿哥（储君，太子），光绪皇帝于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行让位礼，溥儀登

基，改元“保庆”。“己亥立储”消息传出，上海绅商和维新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各地响应，各国公使宣布只承认光绪帝的君主地位。在列强不承认的干预下，慈禧太后被迫搁置废立计划。正在此时，她收到了各国公使要求取缔义和团的联合照会。她并非不知道义和团的破坏性，但出于废立私心和对列强支持光绪帝的不满，她对列强照会不予理睬。在清廷的纵容下，拳匪在华北肆无忌惮地杀害洋人和制止破坏铁路的清政府官员。照会无效，各国公使警告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将联合出兵清剿义和团。5月，各国公使传阅了法国主教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告急信。信中说：北京的教堂和教士已被拳民包围，处在与当年天津教案时一样的险境，呼吁各国派兵到北京保护。西班牙公使葛络干代表公使团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各国联合通牒，要求清廷五日内惩办拳匪，制止暴行。6月初，列强八国派兵来华。

6月9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对待义和团抚。太常寺卿袁昶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等人力主剿灭义和团，制止杀洋人暴行；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主抚，主张招抚，实际是想利用义和团去杀洋人和中国教民，借向列强宣战解决废立问题。“主剿派”与“主抚派”激烈交锋，最有影响力的军机大臣荣禄、礼亲王世铎等人采取骑墙立场。慈禧太后举棋不定，派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涿州察看义和团实情。刚毅回京向慈禧太后奏报，称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一带人数甚众，民气可用，宜抚不宜剿，建议收编义和团对付洋人。6月11日，甘军杀害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使局面不可收拾。6月13日，慈禧接受主抚派意见，决定准许拳匪进入京城。

得朝廷许可，华北各地的十万拳匪涌入北京，在京城掀起了杀洋人、杀中国教民、烧教堂、烧教会医院，烧民房，攻打教堂的狂潮。[10] 6月16日，拳匪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蔓延至珠宝市、前门大街，将正阳门楼烧毁，再持续三日。拳匪趁火打劫，洗劫了前门大街一带4000多家店铺和24家铸银炉厂。尝到趁火打劫甜头后，拳匪在西单再放火，趁火

劫掠了吏部、礼部、户部衙署，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同文馆，大学堂，肃亲王府，吏部尚书孙家鼐、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军机大臣王文韶、工部尚书陈学芬、军机大臣荣禄府第等一大批王公府第，[11] 趁火劫掠了户部的数百万两存银（一说数千万两）。

清廷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集百余“王大臣六部九卿”的连续会议，继续辩论对义和团剿抚问题。袁昶上《急救目前危局折》，痛陈：“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事将不可收拾。”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痛陈：“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事一直都有，但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况甲午一战，中国的对手为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国，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总理各国事务部行走兼礼部侍郎联元支持袁、许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主和五大臣不计个人安危，当廷参劾“主战派”众臣误国殃民，信崇邪术，再请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会议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致电朝廷反对宣战，力促镇压义和团；载漪通过荣禄向慈禧太后呈上了一份伪造的“列强促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照会。伪造的照会起到了作用。慈禧太后惧怕“归政”，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列强各国宣战。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使馆，限使馆人员二十四小时离京。光绪帝、许景澄等人知道国家大难将至，当廷共泣。联元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再谏，谓绝无同时向十几国列强宣战之理，同时致书唯一有能力让慈禧太后改变主意的荣禄，质问荣为何在朝廷铸成大错时沉默。同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的战报到京。6月20日，清兵枪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内阁学士那桐继

续扩大事态，请端王将克林德戮尸。袁昶冒死阻止了戮尸，主持盛棺埋葬了克林德。

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谕诏和招抚义和团谕诏。宣战诏书没有说明向谁宣战和宣战理由，也未向任何国家的驻华机构递交，只是下令向在京洋人和教民开战。根据朝廷的宣战诏书，荣禄率武卫军，董福祥率甘军，伙同义和团进攻与围困东交民巷使馆区，焚烧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国等国公使馆。各国公使及其眷属和中国教民纷纷逃入与翰林院毗邻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然而，清军不顾毗邻的翰林院，纵火焚烧英国公使馆，[12]结果将翰林院辉煌建筑，连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万卷珍贵古籍焚毁。“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的古籍被焚毁，有些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公使馆内所有人，尤其外国学者对中国人践踏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他们认为，翰林院所藏珍贵典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13]“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不禁落泪。”[14]英国记者莫里循（George Ernesr Morrison）写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15]庚子国难多年后，革命党的史书隐瞒国人的暴行，如同将焚毁圆明园说成英法联军所为，将劫掠户部存银说成八国联军所为一样，将焚毁翰林院、《永乐大典》说成是八国联军所为。

清廷在招抚义和团诏书中将义和团暴民称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令直隶各州县释放被捕团民，向义和团发放钱粮。在清廷鼓励下，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各地到处焚毁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及其眷属，破坏铁路、电线、

机器、轮船，甚至并纸烟，眼镜，洋伞、洋袜，铅笔，洋纸，甚至火柴等他们认为是“洋物”销毁。[16] 可叹中国追随世界进步潮流而引入的铁路、桥梁、机器、电线等第一批国有现代化工业设施惨遭义和团摧毁。

7 月中，军机大臣荣禄上奏慈禧太后，揭露“归政照会”并非出自洋人，而是端王载漪伪造。袁昶再上《为祸乱亟迅谋维持大局事》折，促清廷改变政策，驳斥载漪“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之言。他在折中写道：“攻打使馆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拳团骸骼狼籍遍于东交民巷口，其刀枪不入之术安在？……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薄心意，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太后皇上圣鉴。”袁昶再与许景澄联名上《请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疏，冒死再谏：“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袁等没有参端王载漪，因为他们知道慈禧不会追究端王。端王载漪知道袁、许明参刚毅等人矛头实指自己，说服慈禧同意后，下令将袁、许处斩，随后再指派拳匪杀害了反对宣战的徐用仪、立山、联元。被杀害的五位大臣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计个人安危，冒死为国、为民请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谴责朝廷政策和祸国权臣，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忠良的代表。对比多年后一致举手拥护毛泽东祸国政策的中共高层，对比毛泽东统治时代无一高层敢于冒死为民请命的史实，国人倍感“庚子五大臣”的高风亮节，倍感有敢言忠臣的晚清比革命党政府进步。

东南互保

拳乱蔓延北方时，南方大员们纷纷奏请朝廷“坚决剿灭拳乱，以绝后患”。张之洞接受商绅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等人“保一方平安”的建议，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互保”想法。朝廷对外宣战前，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威胁外国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回复：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将实行互保政策，保护洋商教士，维护长江流域的秩序，有能力防止北方暴乱蔓延南方。

6月21日，大理寺卿、电报局督办盛宣怀在上海冒死扣押了朝廷谕旨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对各国宣战”的电报，致电李鸿章：“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明确复电：“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岷香二帅（刘坤一、张之洞）”。刘、张与李达成一致意见：联手抵制清廷“召集义和团借御外侮”的谕旨，约定凡对宣战后的上谕概不奉行，李鸿章电复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17]张之洞电请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力陈“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李、张、刘一面向朝廷表达反对意见，一面领衔拟成了互保约款，通过盛宣怀与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达成了《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由督抚切实保护。早就动手镇压义和团，维护了一方秩序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通电支持“东南互保”，苏、赣、皖、鄂、湘、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督抚跟随通电，加入“互保”。各省督抚们虽未正式签订互保条约，但为国家利益一致拒绝朝廷“乱命”，坚决镇压拳匪暴乱。7月中，刘坤一、张之洞会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两广总督德寿、陕甘总督魏光燾、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浙江、安徽、江苏、陕西等省巡抚联名电奏朝廷，含糊其词地向清廷报告了与各国“订定章程”维持秩序之事，但明确要求授李鸿章以全权，与列强议和。

7月31日，李鸿章在上海同刘坤一联名上奏，要求朝廷立即下令各省督抚保护各国商人、教士，剿灭拳匪。

华北拳乱之前，日本已开始了扶植中国会党颠覆清政府的行动，安排两位接受资助的中国会党领袖，唐才常与孙中山在日本密谋“湘鄂及长江起兵”推翻满清的计划。1899年底，唐才常、吴禄贞等人回国，在长江流域的会党中发展“自立会”组织，开立了“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发展了张之洞手下的一些官吏和军人加入了自立会。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唐才常到汉口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国”。策反失败，唐决定将自立会编为自立军，定于8月23日在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时暴动。张得知唐才常的暴动计划，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配合下派兵进入英租界将唐一伙逮捕，并迅速处决了唐才常等二十多个会党骨干，维护了南方秩序，挫败了日本人乘乱肢解中国南方的计划。根据东南互保约定，南方联手行动，镇压了南方会党乘北方拳乱之机暴乱的图谋，维护了南方的秩序，防止了拳乱蔓延全国。

八国联军入京

8月初，16000多人的八国联军（近半为俄军）由天津沿运河逼近北京，相继攻克杨村、张家湾，率清军抵抗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勤王军”统帅李秉衡自杀。8月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其中，俄军率先攻入东便门、建国门，日军攻入朝阳门、东直门，英军攻入广渠门，通过水洞爬进东交民巷使馆区，救出了被围困于西什库教堂两个月的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负责北京防卫的统帅荣禄及所率数万清兵溃逃。部分清军、拳匪筑垒抵抗，在巷战中不敌洋枪洋炮溃散。慈禧

随后，联军中的俄、法、德军在所到之处展开了对义和团民的报复屠杀，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处决拳匪1700余人。

8月17日，慈禧一行逃到怀来县榆林堡，知县吴永带着溃兵抢劫后仅剩的一锅小米菜粥迎驾。慈禧仓皇逃难数日，首遇有朝廷命官前来见驾，拉

着吴永大哭说：“余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风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吴永献上那一锅粥算是接驾第一餐，第二餐是从空院中寻得的五个鸡蛋。[21] 18 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两千余威远军前来护驾。吴、岑二人救驾于危难得于日后飞黄腾达。

随后几天，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了一连串纠错文告：一是“罪己诏”，承认政策错误，向列强政府赔礼道歉，承认自己“负罪实甚”；二是颁诏承认东南互保章程说：“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三是诏令授李鸿章：“准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四是根据李鸿章等督抚的奏请下令剿灭义和团拳匪，要求各地官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8 月 28 日，八国联军在皇宫阅兵，各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9 月，瓦德西（Count Waldersee）率德国远征军到华，继续实施报复屠杀。八国联军中的美军、日军不参与德、英、法军的暴行。

联军中的美军根据美国政府的训令，声明：“美兵之在中华者，不再兴闻战事，虽德国爵臣华尔德西（瓦德西）氏总统联军，美亦当置身事外也。”[18] 美军北京指挥部收到联军在通州实施暴行的报告后，担心美军行为出轨，派员往通州调查，确认暴行系法军所为。[19] 八国联军随军记者的记录和美军指挥官威尔逊回忆录证明，美军纪律良好，行为规范，严禁并开枪制止抢劫。当时外电报导：“美军以合理的价钱收购牲畜，严令以其他手段获得牛羊肉。”[20]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柔克义）在给

国务卿约翰·海电报中说：“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的军队在这里纪律良好，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美军进京驻扎的先农坛后一带着手清理被焚毁的商铺废墟和街道，恢复治安。北京市民十分惊讶地从门缝中看到美国大兵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处的财物，随后看到了美军司令张贴在各公共场所的安民告示。美军司令部不仅禁止自己军人抢劫，而且严格维护治安，严禁任何烧杀抢掠，使美军占领区秩序迅速恢复，市场重新开张。八国联军中的日军也纪律良好，不参加抢劫。日军效仿美军的作法，在占领区内张贴中文的安民告示，维护秩序，与美军共同设岗守卫了紫禁城。通过派兵加入八国联军，日本的国际地位提高。而日军在北京的良好表现，经北京市民的口碑和外国记者的报导，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这成为不久后中国掀起留学日本高潮的动因之一。

9月，慈禧一行逃到太原。山西巡抚毓贤率文武官吏出城北二十里之黄土寨跪迎。慈禧原打算落脚太原，但山西大旱，供给困难，且有德、法联军西进的传闻，于是决定西逃到西安。到西安后，慈禧太后应列强要求，颁布了《惩处肇祸诸王大臣》上谕，分别给予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翹等人革爵等不同处分。列强拒绝接受惩处谕旨，认为处分人员太少，处分太轻，要求对拳乱祸首处以死刑，对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等因谏而被杀的主和与大臣予以平反昭雪。慈禧再颁惩处肇祸诸王大臣谕诏，令载勋自尽；载漪、载澜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毓贤着即正法；董福祥着即革职；英年、赵舒翹定斩监候，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徐桐之子）正法；追夺已故刚毅（故于西逃途中的山西闻喜）、徐桐、李秉衡等祸首原官职，并撤消卹典；“复冤陷诸臣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原职，重新厚葬料理（清廷后于宣统元年赐谥：立山追谥忠贞，徐用仪追谥忠愍、许景澄追谥文肃、联元追谥文直、袁昶追谥忠节）”，允浙江绅士在西湖为故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建立“三忠祠”，另外下令惩处百余名纵容义和团暴乱的地方军政官员。根据清廷

的纠错上谕，华北各地清军义和团转抚为剿，大批处决拳匪。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日记中记载镇压义和团的情况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的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拳匪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经过各地政府的严剿，各地拳匪在庚子年底被剿灭。

沙俄侵华与“门户开放”

沙俄的历史不长，1237年蒙古大军入侵时，莫斯科还只是一个小要塞，随后罗斯人臣服金帐汗国，开始了五百年的“鞑鞑枷锁”年代。十六世纪，大公伊凡（伊凡雷帝）四世按拜占庭王朝仪式加冕，称沙皇，改国号为俄罗斯，随后开始向西扩张，在十七世纪征服西伯利亚全境。清王朝的建立使中国的领土空前扩大，包括了整个蒙古。顺治年间，俄国人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萨城与尼布楚城。1686年，满清对沙俄让步，与俄签定了《尼布楚条约》。通过此约，沙俄取得了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的25万平方公里。1690年，沙俄支持天山以北的蒙古噶尔丹部发动了反叛。康熙平定了噶尔丹反叛，但无力对背后的俄国用强。1727年（雍正五年），清王朝与沙俄签定了《恰克图界约》，承认沙俄扩张到贝加尔湖一线。随后百年，沙俄向中国不断扩张，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占得库叶岛；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侵占了清属邦哈萨克和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清属邦布鲁特；于1858年（咸丰八年）迫清朝签订《中俄璦琿条约》，侵占了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46万平方公里土地；于1860年（咸丰十年）迫清朝签定了《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于1864年（同治三年）迫清朝订立《塔城界约》，侵占了自沙渍达巴哈至葱岭约43万平方公里土地；于1868年（同治七年）侵占了清属邦布哈尔汗国；于1876年（光绪二年）侵占了面积35万平方公里的清属邦浩罕国；于1881年（光绪七年）迫清廷签定了《中俄伊犁条约》，侵占了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约2万平方公里；于1883年（光绪九年）迫清廷订立了《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侵占了

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 2 万平方公里；于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侵占了新疆省极西地区帕米尔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俄国计划像吞并乌克兰为“小俄罗斯”，吞并波兰一部为“白俄罗斯”那样，吞并中国东北为“黄俄罗斯”，要求将与中国的边界向南推进到中国长城，以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的直线为两国边界，将此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划归俄国。林则徐在新疆考察后指出：“亡我中华者，终为俄罗斯！”他的判断正确。俄国对中国领土怀有最大野心，是中国的最大威胁。

1891 年，沙俄开始修建贯通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6 年，沙俄乘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有意“联俄制日”，欺骗加胁迫地与清廷签订了《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中俄密约》），取得了穿越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特权。随着大铁路（中东铁路，东清铁路）在中国境内修建，俄国东正教会的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在旅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和牡丹江等地先后修建了 130 多处教堂和祈祷所。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沙俄强租了旅顺大连两港口及周围 3800 方公里。

沙俄在东北的扩张引激起了民族矛盾。拳乱中，东北拳匪以杀教士，焚教堂的暴行发泄对沙俄侵略的仇恨。对此，俄国的库罗伯特金大将坦言：“这将给予我们以一个夺取满洲的借口”。[22] 1900 年 6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特全任参谋长的沙俄 17 万大军乘中国华北拳乱兵分五路全面侵入东北。其用意不是镇压义和团暴乱和保护中东铁路，而是要吞并满洲，“将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Bukhara，十九世纪中叶被沙俄吞并的中亚汗国）。7 至 10 月，俄军相继占领瑷珲、齐齐哈尔、宁古塔、长春、营口、牛庄、安东、锦州、奉天等主要城市，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屠杀了二十多万中国民众。最能反映沙俄残暴的是海兰泡惨案。

海兰泡又名黄河屯，位于精奇里江（结雅河）与黑龙江交汇处，本为中国领土。1859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吞并了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后，将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沙俄

在条约中承诺中国居民得在海兰泡安居乐业，实际准备清洗所占地区的中国人。大军侵入东北后，沙俄下令对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原驻中国人展开屠杀。比利时记者维克托·科林（Victor Collin）在拳乱中沿著中俄边境实地采访，经过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等地，见证了俄国人在瑗辉、海兰泡对华人的大屠杀。他写道：“俄军奉格里比斯基（Gribski）将军的命令，在 M·巴塔里维奇（M·Batarevitch）的指挥下，把全体海兰泡居民带到距黑龙江七俄里的地方，用受难者的长发辫互相捆绑，将中国人抛入河中，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人幸免于难，一个现称做玛丽亚-玛德琳堡垒（Fort Marie-Madeleine）的艾根（Aigun）的小镇被毁灭，没有任何居民幸存；所有黑龙江边的中国村庄都被夷为平地，许多人是手无寸铁被屠杀的。”在江东六十四屯，俄国人屠杀了两千多中国人。[23] 在占领东北后，沙俄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以侵略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命名了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地名，如尼古拉耶夫卡（沙俄侵华头子）、波雅尔科沃（最早侵入黑龙江，活吃索伦人的俄国探险家）、穆拉维约夫卡（逼迫中国签定《爱辉条约》的俄国政客）、格罗杰科沃（率军屠杀中国人的滨海州总督）、沃尔科夫（制造“海兰泡惨案”的俄阿穆尔州四区警察局局长）、库罗巴基诺、格里布斯基（制造屠杀华人的“海兰泡惨案”的俄阿穆尔州军政长官）等等。与沙俄在东北动手的同时，另一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强邻日本在中国东南动手，企图肢解广东、福建。

这时的中国无力抗拒俄、日的肢解。对俄、日的制约来自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针对列强各国为瓜分中国而准备开战的前景，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于 1899 年训令美国驻英、法、德、俄、日、意六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照会（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各列强在弱国面前相互钳制，承认中国主权，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平等的条件下与中国贸易往来，没有例外地要遵守中国规定的税率，不得单独向弱国攫取利益，申明美国不承认任一系列强在中国划定的势力范围。照会实际禁止俄国、日本瓜分

中国领土，及帮助中国收回在《南京条约》中部分地出让给英国的中国进出口税率的决定权。美国发出“门户开放第一次照会”后，被照会的列强六国不予理睬，俄、日继续部署瓜分中国。1900年初，约翰·海通知六国：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生效。在八国联军准备进攻京、津之际，约翰·海针对俄、日等国瓜分中国的强烈冲动向“第一次照会”的六国及荷、葡、奥、西等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申明美国出兵的目的仅在于解救被围困的美国公民，帮助中国政府制止暴乱，美国不同意通过出兵瓜分中国，不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反对日本制造借口出兵福建。

俄国对中国的野心最大，出兵最多，不仅出兵占领了满州，还召集联军中的各国首领开会，准备在天津成立中国临时政府，命俄军抢先占领了天津海河东岸地区，将该地区划为了俄国租界。同样怀有乘拳乱瓜分中国的打算的英、德反对俄、日的吞并行动，以响应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办法扼制俄、日。10月，英、德签订了响应美国倡议的协定，要求其它列强签署，同时派军舰开往厦门海域，声明不容日本占领福建。美、英、德的行动强烈警告俄、日，单独吞并中国领土意味着列强间的战争。在美、英、德的联合警告下，俄、日被迫表示遵守“门户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国承诺在拳乱平息后将满洲交还中国；日皇接受维新重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青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宣布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日本转变政策后，主张领土扩张的山县有朋内阁辞职，主张与列强协调的伊藤博文上台组阁，下令停止执行出兵占领福建的计划，命令台湾总督儿玉停止操纵兴中会暴动，命令已经开赴厦门海域的日舰返回台湾。

庚子拳乱中，若无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将被肢解瓜分。从1823年的门罗宣言，到1899年的约翰·海的门户开放照会，到后来1918年的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美国的外交政策贯穿着反对以强凌弱、侵犯别国主权、维护人权的基督教精神。美国政府发出的多次对华门户开放照会或外交公文，都是发给各列强而不是发给中国政府的，其内容都是要求列强尊重中

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不是要求中国对列强门户开放。强调各国机会均等，贸易自由，维护和平的多边贸易局面的门户开放原则在庚子年帮助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在一百年之后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

庚子赔款

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之际，支撑清廷的封疆大吏们一致主张尽快求和，上奏朝廷指出唯有李鸿章出面才能收拾乱局，与洋人取得和解。接受重臣们的主张，慈禧太后下诏，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速进京主持局面。鉴于朝廷仍被主战派把持，李鸿章拖延进京，在上海开始列强各国公使联系，询问和解条件。八国联军从天津进向北京之时，慈禧清廷委任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

10月2日，李鸿章抵达北京，开始向列强各国乞和。12月，列强十一国（出兵八国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其中要求对德谢罪，对日谢罪，惩办祸首，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禁止军火运入，赔款，使馆驻军，削平大沽炮台，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兵，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修浚白河、黄浦江，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等。李鸿章将《议和大纲》转达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惧怕各国将她列为首祸追究，“及得约，未见追究之辞，如获免罪赦书，大喜过望，谕诏奕劻、李鸿章：‘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会，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发布上谕：“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声明清廷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根据上谕，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公使，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公法，同意赔款，在和约大纲文本上签字画押，接受了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项条件。按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在谕诏上加盖御玺，照会副本分送各使馆，正式生效。

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后，列强开始商议中国“庚子赔款”总额。作为战败国，中国对赔款额没有发言权，只能听候列强发落。这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再次出面维护中国的利益，多次电令美国驻华公使和谈判代表向列强各国通告中国的财政困境，防止任何一国单方面向中国漫天要价，防止商议赔款的结果演化为分割中国的领土，说服各国减少索款额，允许 30 到 40 年分期付款，指示，如果各国不能将索赔总数限制在 4000 万英镑以内，则提请海牙要求仲裁。

已经对美国的两度门户开放照会作出了重大让步的七国列强决定不再向美国让步，公使团通知中国政府，索赔总额为 6750 万英镑。约翰·海向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建议，美国单独减少对华索赔额。麦金利总统冒着被在华遇难美国公民家属和美国国会责难的风险，决定将美国对华的索赔额减半，以行动推动各国效法。约翰·海向列强各国表示，美国将接受中国分期赔偿，不收定金，只收取 3% 的利息，建议各国将索赔总额限制在两亿两内，接受中国没有担保的债券赔偿。列强们不接受美国的建议，坚持索赔 4 亿两，年利息 4%。根据约翰·海的指示，美国谈判代表提请海牙法院仲裁。海牙法院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众列强决定向中国索赔总额为 4.5 亿两。其中，俄国以出兵最多为由索赔 1.3 亿两，占赔款总数约 30%；德国占 20%，法国 15%，英国 11%，美国占 7%，日本 7%，其他国家 10%。虽然没能将索款总数压下来，约翰·海还是为中国争取到了将赔款期限延长至三十九年和按证券票面原值支付等两项好处，为挽救中国财政，稳定中国社会以及让列强尽快从中国撤军起到了积极作用。

1901 年 9 月，清政府代表奕匡、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银 4.5 亿两（庚子赔款，带有 4.5 亿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暴乱赔银一两的惩戒之意），分 39 年（1902 - 1940）还清，年息 4 厘，本息折合白银 9.8 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

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东交民巷划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居住；拆除大沽及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中国不得驻军，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和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十二个重要地区；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各国道歉，惩处有关责任官员，派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在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处建立牌坊。

《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政府命黑龙江将军綽哈布和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在东北与俄军统帅交涉接收东三省事宜。1900年11月，增祺在俄国压迫下签订屈辱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暂约共9条。其主要内容为俄国在奉天设总管，盛京将军辖区内的清军一律解散，盛京将军的任何命令须经俄国总管的同意等等，实际规定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消息传出，国人强烈反对。1901年1月，流亡在西安的清廷派户部左侍郎、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赴彼得堡，向俄提出收回东三省，俄军撤出东三省的要求。俄方八次拒绝杨儒提出的东三省主权要求，提出了夺取东三省主权的十二条款。其主要内容为：东三省由俄国“设兵保路”；禁止清军驻扎东三省，只准设“马步巡捕”，名额须与俄国商定；东北三将军之委任，由俄国支配；俄国购买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处矿产、铁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予他国；不准中国在上述各处自行造路”等。杨儒拒绝俄方所拟的侵华条款和最后通牒威胁，在艰难而屈辱的交涉中殉职。陪同杨儒赴俄的翻译陆征祥在《随节俄馆》一文中回忆说：“俄财长维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

其它列强不容俄国独吞中国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在列强各国武力干涉的威胁下，俄国被迫承诺交还东北予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陆续从北京撤走，中俄重新开议交收东三省事宜。由于原先主持人李鸿章与杨儒逝去，清政府再派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与俄国交涉。交涉中，俄国

一再以各种借口拒绝从东北撤兵，直至美、英、日等国出面干涉，才不得不作出撤军姿态。

庚子赔款对中国是灾难性的，其数额超过中国以前所有赔款的总和，使中国政府财政破产，须靠对外举债维持。中央政府财政破产的局面注定了清末的宪政改革的失败命运，成为中国走向长期动乱和战祸绵延的重要原因。对俄国和日本来说，庚子巨额赔款帮助两国国力、军力快速提升。其中，日本以相继获得的《马关条约》赔款和庚子赔款大力发展军备，迅速具备了向沙俄叫板的实力。

在阻止了俄、日瓜分中国和列强各国漫天要价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继续为中国尽力，推动美国减免赔款。1904年，白银对黄金跌价，列强要求中国每年支付庚子赔款以黄金计价。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请求约翰·海说：“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唯美国假定答应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如果一律用金，以后就更难翻案了。敝政府所争者即此，并非歧视贵国。现今为赔款而作的筹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表示：“庚子赔案实属过多”。梁诚闻此，放弃争取白银计价谈判，转而向美国请求减少赔款数额。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见说：“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梁诚致函外务部后回复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1905年5月，上海商界借北美华商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和国内民众的排外情绪发动了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公使柔克义多次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警告若继续纵容，义和团排外事件可能重演，要求制止抵制运动。清政府于8月底发布上谕：“著再责成该督抚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总期安居乐业，毋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弥隐患。”[24] 11月，广东连州发生了五位美国传教士

被杀害事件。袁世凯与几年前严厉镇压义和团一样，推动政府采取严厉取缔措施，于次年平息了抵制美货运动。

在抵制美货运动席卷中国之时，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力陈美国有推动中国进步的责任，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是当务之急。史密斯的建议得到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斯的响应。1906年初，詹姆斯校长致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目前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去了日本，美国应在推动中国进步方面有更多作为，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中国，用来培养中国留学生。罗斯福总统请史密斯与詹姆斯到白宫商谈后向国会提出了以庚子赔款赞助中国教育的谕文。1908年5月，美国会通过议案，授权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之半数，计美金1160万。罗斯福总统决定从1909年起预算分年退还赔款余款以资助中国派学生赴美国留学。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1911年，肄业馆建成，改名清华学堂。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由于当时中国处分裂状态，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管理退款。

受美国的感召，英、法、荷、比等国跟进，也将所获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教育、水利建设等用途。然而，西方列强资助中国教育的影响远不如日本百所速成学校对中国的影响。日俄两邻为向中国扩张，肯花血本，主导了中国的走向。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国政军两界的风云人物基本都出自日本士官学校、速成学校，苏俄的黄埔军校、中山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中虽有胡适带回了自由主义、人权、宽容异己的思想，但留美毕业生对中国的走向影响微弱。

由于后来革命党的反帝仇美宣传，国人很少人知道约翰·海对中国的贡献。2011年4月，北京清华与台湾新竹国立清华两所大学同时举行了清华

百年校庆。北京清华校庆不提美国退还庚款贡献，没有纪念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等清华之水的“挖井人”，而是专注展示清华的官场辉煌。台湾清华的百年校庆没有忘记“挖井人”。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在校庆时强调，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世纪时仍在受惠于庚子赔款基金，新竹清华大学每年仍然收到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支票。

第 2 章 变法革新

预约变法

太平天国之乱过后，李鸿章在给恭亲王、文祥的折子中提出变法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1] 他看出，中国和日本孰强孰弱取决于谁变得快。慈禧太后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改革的必要，掌权后召见提拔李鸿章，支持李求变。甲午战后，慈禧太后支持戊戌维新，也希望革新。然而，康有为的变法计划走向偏激，最后发展到要“围园杀后”，慈禧被迫反击，发动了政变。重新训政后，慈禧没有放弃改革，准备缓进地推行改革。但是，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党促她“归政”，让她感到权力地位不稳。于是，她决定废光绪另立新君。她的废立计划因列强的反对而受阻。正在这时，拳乱爆发。废立的私心和仇洋情绪让慈禧一时丧失了精明，作出了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荒唐决定，酿成了庚子国难。逃出北京后，慈禧太后迅速反省，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罪己诏，向列强赔礼道歉，承认中国积弱之“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自责“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国家者在一例字”。在颠沛流离，饱尝磨难的逃难中，她痛下决心变法强国，追赶世界进步的潮流。

1901 年 1 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预约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提出改革建议。她在变法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查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至近之人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

也。……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议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她检讨洋务运动变法是“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要求进行体制变革。与日本明治天皇宣誓维新的《五条誓文》一样，慈禧的预约变法上谕也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变法图强，融入世界进步潮流的宣言书。

2月，慈禧太后再颁“自责”诏书，在其中再要求“内外臣工妥速奏议”，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办事机关，负责接受各级官员提出的变法的意见，研究有关建议后向朝廷推荐，任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昆冈、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任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派袁世凯）遥为参预，政务处下设提调二人，章京若干。

《预约变法上谕》在群臣中引起强烈反响，湖广总督张之洞率先响应，请张謇、汤寿潜、沈增植、郑孝胥等绅商将改革意见拟成奏折，致电西安行营军机处响应上谕说：“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益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洋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敢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道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党、国会之逆党乱民始能绝其煽惑之说，化其思乱之心……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

3月，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连续呈上三份会奏（新政中影响巨大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会奏第一折为《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设文武学堂兴学育才，改文科，停武科，分科递减科举名额，以学堂逐

步取代科举，奖游学等举措；第二折论改变中国成法，列举致治、致富、致强之三原则及办法十二端；第三折论采行西法，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建议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译书等凡十三端。会奏三折主张循序渐进地全面改革，暂时回避宪政、议院等涉及政体的变革。慈禧太后阅会奏三折后立即批复：“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由此，慈禧太后启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改革运动，将教育、整顿吏治、振兴实业、废除八股文，革新考试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快速付诸实施。在古稀之年，她努力学习，追赶世界潮流，史载“及辛丑回銮，则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诸书展诵不缀，意谓可藉窥外人情事也。”尽管清廷没有提出“新政”说法，也未对改革的目标作具体说明，但在推行中，新政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经过短短几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法制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范围之广，步伐之快，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时康有为呼吁的变法目标。

教育改革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迅速富强的一大原因在于新式教育，中国落后的一大原因在于扼杀创新精神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内容在唐代是诗歌。由于难于评审，经过长期演变，在明代确立了八股文形式。八股题目局限于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局限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为表达思想设置了重重障碍，扼杀了学子的创造力。严复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2] 戊戌变法前，张之洞联名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呼吁废除科举和八股，改革考试内容，请求“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之”，并派幕僚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筹划

废除科举。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等主张，但主张因维新迅速失败而未得实施。

1901年9月，清廷根据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人的江楚会奏三折中的建议，诏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诏令一出，山东巡抚袁世凯立即奏请在山东创办大学堂，并奏上了《山东大学堂章程》，获朝廷立即批准。11月，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的第一个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成立，袁世凯推荐周学熙为首任校长。12月，清廷任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着制定学堂章程。随后，各地大学堂纷纷成立。

办学堂之议迅速得到实施，但《会奏三折》中的废除科举制度之议遭到以军机大臣王文韶为首保守派强烈反对。慈禧太后感到反对者众，决定缓废科举，先废除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八股，颁布上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废科举之议受阻，张之洞再派罗振玉率教育家赴日本考察，以为废科举作准备。考察团会见了日本文部相、外务相等政要，听取了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安排的关于日本教育及行政管理的系列演讲，收集了整套的日本教育法规和教科书带回国内。1902年8月，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了参考日本教育制度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和《蒙学章程》。清廷立即批准了张百熙的奏请，将六章程一同颁行为《钦定学堂章程》。这些章程为各级各类学堂制定了新的学制、考试方式和教学内容，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体系的框架。

1903年3月，张之洞再与袁世凯（刘坤一已卒）联名上《请递减科举奏折》，在其中指出：“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同年底，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再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在其中拟定了具体递减的办法，奏请改科举考试为学堂考试，建议在全国实施新学制（癸卯学制），效仿日本模式，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奏议再遭王文韶反对，慈禧再度决定暂缓实施。

日俄战争结束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第三次奏请废科举。奏折强调：“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出，舍学堂再无良法；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慈禧太后接到联衔奏折当日即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至此，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走入历史。

慈禧太后将废科举之议搁置了四年才决定实施并不是因为保守，相反是体现了把握改革进程的大局观。带头反对废科举的王文韶是唯一跟随她由北京逃难到西安的军机大臣。慈禧两度决定缓废科举，主要原因不是念王护驾之功，而是因为深知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废除千年科举制度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像光绪和康有为那样要求一蹴而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科举不仅是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更是选官制度。科举时代，读经考取功名作官是正途，花钱捐官职被视为异途。科举一废，读经仕进之途跟随废除，儒家和权力的联系被切断，所以王文韶捍卫科举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因此，慈禧决定先废八股，经过几年的适应再废科举。如此改革节奏既不保守，也不缓慢。几年的适应过程，让读书人作好过渡准备非常必要。经过四年过渡，士绅阶层崛起，废科举时机成熟。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举国要求变革时，慈禧

果断决策废除千年科举，水到渠成，全国拥护。诏令一出，各地士绅立即掀起了创办私立新学堂，捐资办学，送子弟入新学堂的热潮。随着科举仕途被废，改从学堂选拔培养人才，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发生质变，由专注四书五经转向对社会进步有用的知识，是为千年未有的思想大解放。

在慈禧和袁世凯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办新学堂的热潮，新式学堂总数从 1904 年的 4000 多所猛增加到了 1908 年的 5 万多所，就读学生从 9 万多人增加到了 156 万人。其中，袁世凯主政的直隶省成为全国的榜样。在推动废除科举的同时，袁世凯向清廷提出将留学生纳入选才的范围和举办留日归国学生考试的奏议。慈禧太后迅速批准实施。1908 年，清廷举行了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根据考试成绩与能力评估委以实职。不少民初精英就出自那几批回国参加考试的留学生。

清廷的教育制度变革影响深远。虽然清廷在几年后覆亡，但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巨大成功不可磨灭。可以说，新政教育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可比废奴对沙俄，废藩对日本，意味社会、国家的重大变革。废八股、科举不仅是教育改革，更是思想解放运动，是十几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军事改革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曾国藩、李鸿章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认识到了军制改革的迫切性。李鸿章于 1881 年奏请设立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再于 1885 年奏请设立了天津武备学堂。甲午战败后，荣禄提出了废除武举考试，建立新军的建议。传统的武举考试由兵部主持，考试项目主要为骑射斗力，没有军事理论。与科举一样，在县、府举行童试，在省城举行乡试和在京城举行会试，再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考中者分别为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和武状元。在斗力的唐朝，武举制度不算落后，但在十九世纪就极为原始了。接受荣禄的建议，慈禧太后决定建立新军，命胡炳棻督练“定武军”，改聂士成一部为“武毅军”，在天津小站开始了新军建设。

较之旧式湘淮勇营，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废戈矛土炮，代之以从西洋购得的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参照德、日两国军制建立操法营规和兵种分类（其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提拔国外学习归来的军事学校毕业生和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担任军官；淘汰老、弱、兵痞，代之以较高文化素质的青年。

清廷颁布《预约变法上谕》后，袁世凯立即奏请实行军事改革，提交了在建立新军过程中拟定的军事改革方案。慈禧太后在庚子逃难中痛感数十万清兵在万余列强军队面前不堪一击，也决心推行军事改革，立即批准袁的改革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废除武举制，建立武备学堂，令各省仿照北洋军裁汰旧军，任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主持全国的新军建设。

随后，袁世凯采取了一连串练兵举措：在保定设立了自兼督办的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由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北洋军）；从北洋军和练兵处派出 180 人赴日本军校学习；开办了陆军速成学堂；拟定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奏请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奏请开办陆军大学等等。慈禧太后到保定视察了武备学堂，支持袁世凯的各项练兵举措。

1903 年 12 月，清廷设立了负责练编新军的专门机构——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奕以年迈多病奏请由袁负责。袁世凯受命后聘请了大批日本教官，在练兵中兼收西洋、东洋的兵制所长和军事思想。北洋军不仅编制效法列强，兵器也主要购自列强。相比绿营兵和湘、淮军，北洋军的招募条件更加严格，要求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同时待遇也更好。袁世凯将六万余人的北洋军编成六镇（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各镇统领均是他主持小站新建陆军时的老部下），创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

医学堂”等培训机构。随着六镇北洋新军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主持练兵的袁世凯权势日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又相继兼任了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身兼练兵、筹饷、参预政务、督办关内铁路等要政，成为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的左右朝政的重臣。

编练新军需要巨额款项，慈禧批准了袁世凯的奏请，每年向全国各省摊派练兵费 900 万两，将清廷新政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了编练新军。1904 年 9 月，清廷批准了袁世凯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庞大计划，颁布了根据《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程》制定的《陆军学堂办法》和《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将编练北洋军的方法推行全国。

修律

法律建设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2 年 3 月，慈禧太后颁诏推动法律改革说：“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请旨审定颁行。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3] 由此，清廷启动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重要举措——修律。

接受袁、刘、张举荐，清廷派刑部侍郎沈家本和曾出洋研习西方法律的驻美国公使伍廷芳负责修律，开始筹办修律的专门机构——“修订法律馆”。4 月，慈禧太后发布了著名的《修律上谕》。上谕说：“现行通商交涉事宜频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通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悉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1904 年 5 月，“修订法律馆”正式开馆，开始参照西方法律修订《大清律例》。英、美、日等列强积极支持中国的法律建设，表示将在中国参照西方律例改革刑律后放弃领事

裁判权。虽然英、美均在商约中承诺协助中国整顿律例，但因经费和人才等原因，修律主要在日本专家指导下进行，移植经日本改造的西方法律体系。沈家本率一群主要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先从翻译外国的法律着手，翻译法、德、俄、意大利、日本等国各种法律共 26 种，比较借鉴各国法律，并聘日本法学专家来华任教。

中国旧有的法律体系“诸法合体”，“政刑不分”，刑事民事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法就是刑。颁行于乾隆初年的《大清律例》早已不合世界潮流，修律绕不开修改《大清律例》。沈家本上书朝廷，建议“刑法改重为轻，为今日仁政之要务”，将死刑仅限于斩决、绞决，废除《大清律例》中规定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刑；把充军、流刑、徒刑改为服劳役；把笞、杖改为处罚金，轻罪禁用刑讯。深知改律艰难的沈家本甚至准备了一个垫子，要以长跪的办法推动废除恶法。如沈家本所料，大刀阔斧修改《大清刑律》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西方法律体系体现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儒家的“三纲五常”存在着根本冲突。积极推动变法的张之洞意识到，修律可能颠覆儒家的秩序体系，也表示反对说：“盖法律之设，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而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其最著者为亲亲之义，男女之别，天经地义，万古不刊。”沈家本的修律意见因得到了重臣袁世凯的支持而得免半途而废。慈禧太后改革态度坚决，支持了袁世凯的意见，批准了沈氏对《大清律例》的重大修改。

1905 年，清廷宣布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野蛮律例，死刑至斩决止，颁布了“恤刑狱”条例，“禁止刑讯、拖累、变笞杖”。1906 年，清廷将行政与司法分离，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建立了由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四级三审的审判制度，设立总检察厅，作为全国最高检察机关。

1907 年，沈家本主持完成了《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引起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推动变法新政的张之洞带头反对修律，在《复议

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中抨击草案背弃了中国的礼教。在强大的反对面前，清廷暂时搁置了《大清新刑律》。沈家本奏请仿照日本的作法，在新刑法颁布以前将草案以《大清现行刑律》之名作为过渡性的刑法，以回应西方列强对中国刑法落后的抨击。清廷批准了沈的奏议，领导修律馆在短短数年内出台了一系列废弃苛法滥刑，将礼教与法律相分离，采用西方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的新法典和草案。其中包括：《大清新刑律》、《钦定大清商律》、《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监狱律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大清报律》、《保险规则草案》、《国籍法》等一系列以及修订法律馆与商部联手制定的《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商法和条例。1911年1月，清廷正式公布了现代新法典——《大清新刑律》。该刑律在编纂形式、刑法原则、刑罚体系、法学用语等方面都参照了现代西方法典体系，引入了大量中国没有的西方法律观念与用语，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缓刑、假释、正当防卫、加减刑条件、诉讼时效等等。随着修律成果的陆续出台，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私有财产权原则，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应原则，诉讼法中的公开审判原则、法庭辩论原则、证据原则以及近代法治国家的律师制度、独立审判制度等等开始在中国确立。

新政中的法律建设顺应世界进步的潮流，以现代世界通行的法律原则取代了千年旧法体系，从行政司法不分迈向了司法独立。由于西方的法律体系基于宪政的政治体制，在立宪之前，修律成果也只能是局部的和过渡性的。尽管如此，新政中法律建设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成就之大，范围之广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罕见，是中国千年旧法体系向西方的新法体系脱胎换骨的巨大进步。

尽管《大清新刑律》公布不久清王朝被推翻，但以《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为代表的清末新政法律建设成果为后来历届民国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深远。民初司法总长梁启超评价民国政府的政策措施说，司法制度差不多是惟一的成功的领域。国人想象不到的是，清末的司法建设成就在中国不仅空前，更是绝后的。梁启超所言的成功只在民初几年昙花一现。在慈禧太后、袁世凯之后，中国开始了在法律建设方面的漫长的倒退进程。国民党建立政权后推行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实行“党化”立法、司法，清末新政中法律建设成果被革命摧毁。在国民党之后，共产党的新中国更加倒退，将立法、司法完全党化，设立政法委这样的党管司法的机构，清末法律建设的成就在满清覆亡后的百年反倒成了国人的梦想。

扶植工商

新政中，清廷改变千年来“重农抑商”传统，取消了洋务运动以来实业只准官营的限制，制定了工商立国，奖励实业、扶植工商，鼓励民营的国策。

1903年9月，清廷根据政务处督办大臣奕劻奏请，在七部之外增设了推动“振兴商务”的商部，任赴英、法、美、日考察归来的奕劻之子载振为尚书，实业家张謇为顾问。上任后，载振聘请日本专家迅速拟出了一系列扶植奖励工商业，保护工商业者权益的经济法规。清廷迅速批准颁布了商部拟定的《钦定大清商法》、《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扶植工商业的法规、章程和高律，极大地改善了营商的环境。颁布法规之外，商部的振兴举措还包括，设立路矿、农务、工艺等公司，设立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推动工矿业、铁路建设、清查地亩，兴修水利，发展畜牧；制定奖励工商实业的办法，奖励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卓有成效者；劝办商会，在《商会简明章程》范本中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系

城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推动成立了京师商务总会及各地商务分会和一大批各地行业商会；组织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等等。

政府扶植工商业的举措受到绅商的热烈欢迎。侨商张振勋称赞说：“商部设立以来，纲举目张，以保商为己任。”随着商部的设立，晚清的工商业迅猛发展，市民社会迅速形成，为预备立宪营造了条件。不久，清廷覆亡，商务部代表的清政府扶植工商，保护产权的进步举措逐渐不为人知。当后来革命党政府肆无忌惮地搜刮工商业者，以“社会主义改造”名义无偿剥夺工商业者时，人们才感到晚清新政中扶植工商举措之开明进步。

袁世凯引领地方建设

清廷宣布预约变法后，各地掀起了地方建设的热潮。其中，袁世凯领导的直隶是地方建设的典范。

袁世凯的贡献之一是警察司法建设。由于《辛丑条约》规定“距天津二十里之内，清国不得驻屯军队”，直隶总督衙门暂于保定办公。为准备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回天津管辖权，袁世凯派候补道赵秉钧创办了警务学堂，培养巡警，以警察系统取代了旧的保甲制，开创了现代警政。同时，他派天津知府兼保定知府凌福彭率团赴日考察了东京、大阪等地监狱，决定效法日本，对犯人进行生活技能的培训，批示由凌主持狱制改革和试行审判改革，在天津设立发审公所（后改名为法政研究所，随后又改名为审判研究所），培养审判人才。至 1907 年，天津率先设立了高等审判分厅和天津地方审判厅。1909 年，袁世凯将天津试点成功的审判、检察两厅的三级制度（初级、地方和高等）推向了全国。

袁世凯的贡献之二是在他的拿手领域——经济建设。按在山东设商务局的成例，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商务局，任命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根据袁的指示，天津商务局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和“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在商务局和工

艺总局推动下，天津民办企业数量成倍增长，水泥、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业执全国牛耳，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

袁世凯的贡献之三在农业方面。他率先成立了直隶农务局。农务局再联合官绅成立了劝办农会，创办了《农话报》，编辑并出版《栽桑捷法》、《育蚕捷法》等书籍，创办了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派员赴城乡调查农情。农务局和劝办农会宣传农田、树艺、蚕桑、纺织、森林、水利等农业科技知识，劝农民保护森林、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组合农业、整理耕田及农具之公同购入，农产物之公同贩卖、办理荒政等等。[4] 1907年6月，以“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为宗旨的直隶农务总会在保定府成立，“官绅、农民入会者百余人，会费捐款千余金”。随后，总会在直隶各州县成立了分支机构。例如，南宫县“清末维新诸会林立，而农会亦兴。会址设城内之兴福寺，会长一，会计兼文牒一，夫役一，划寺之周围田地农事试验场”。[5]

袁世凯的贡献之四是办教育。他以创办新式学堂为“新政大端”，积极在直隶城镇乡推行兴新学事业，聘请日本东京音乐学校校长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在保定府设立直隶学校司，作为督办全省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饬令各州县自筹资金，选送“品学兼优”、“乡望夙孚”的士绅分期分批赴日本考察学务，每批考察四个月，参观、考察学校教育，听日本教育专家讲授教育学、管理法、学校制度等课程。新政中，全国聘请的数十位日本外教中有半数任教直隶。直隶的“新学”之才回国后多被派回本州县充任学董。袁世凯把发展师范教育列为首要任务，创办了一大批不同形式、期限和等级的师范学堂，以解决直隶师资匮乏的问题。在筹措教育经费方面，袁世凯带头捐银带动群僚，指示设立为捐款人奏报请奖的机制，亲自奏请慈禧和光绪书匾额各一方表彰张之洞为原籍南皮县捐学资 2.7 万两；奏请为翰林院编修严修捐办天津学堂 11 所赏五品卿衔；批准为捐银 1000 两办学昌黎县孀妇张李氏建牌坊一座，批准给予 23 个州县、41 人次捐资办教育的

各种奖励。在奖励机制的推动下，直隶各界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出现了“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的可喜局面。[6] 几年间，直隶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从 1902 年的 13 所，学生千余人猛增至 1904 年的 2632 所，学生人数达近 5 万人，学堂数连年名列全国之冠。[7]

袁世凯的贡献之五是推动地方自治。1905 年，袁世凯奏请在直隶试办地自治，获准后派省内官绅出洋考察，是为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发端和十几年的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的先声。地方自治道路后来被证明是最适合中国国情。若非外强扼杀，中国早已走上地方自治，联邦建国的道路。

袁的贡献之六是率先创办特区，引进外资、侨资。其代表作是第一条中国人主持建设的京张铁路。

这段铁路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艰难。袁世凯引进外资筹得铁路建设资金，申请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获准免税，任命学成归来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于 1905 年建成了京张铁路。随后，他再举荐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为粤汉、新易、芦汉铁路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袁世凯领导下，直隶的新政和地方建设成效显著，成为当时全国的“模范省”。张謇参观天津后盛赞说：“至天津观各马路、工厂、罪犯游民工厂、图书馆毕。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外，无抗颜行者。”[8] 新政建设中的另一模范省是广东。在总督岑春煊的领导下，两广的地方建设也成效显著，兴办新学堂和提倡实业等各项新政风起云涌。

其中，广州的地方建设最为瞩目，河南士敏土厂、长堤、农林试验场、劝工陈列所、电话总局、邮局、航政局，兴办了法政学堂、群益学堂、教忠学堂、圣心中学、弁将学堂、岭南学堂、军医学堂、蚕业学堂等新政项目如雨后春笋。岑春煊的办学热情可由他在朝廷裁撤巡抚建制后将巡抚衙门改为广东工业高等学堂看出。当时的国人不会了解袁、岑推动地方建设的全部意

义，直到经历了毛泽东时代斗地主，杀乡绅，逼死工商业主、教授、校长，取缔私营经济，人为制造大饥荒和连绵整肃运动后，国人才深切体会到袁世凯代表的晚清新政之善。

出版自由

准许民间办报是光绪帝戊戌变法《定国是诏》中的十条新政之一。维新夭折后，准许民间办报的新政未被取缔，报刊业反而蓬勃发展。宣布预备立宪后，清廷积极推动民间办报作为开启民智、准备立宪的重要步骤，相继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6年）、《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大清报律》（1908），以法律保障办报自由。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大清报律》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中规定：“凡欲以记载物件出版发行者，可向出版发行所在之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其呈请注册预备两份，并各详细叙明记载物件之名称，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出版发行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发行所，有股可分利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及经理人之姓名、住址”，对于违反者的处罚从轻、从缓，民事化，只“科罚银不得超过一百元，监禁不得超过三个月”。《大清报律》由清商部、民政部、巡警部和法部共同起草，经宪政编查馆议复后，奉旨颁行。它规定办报人资格为：凡年满二十岁以上，无精神病，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均有资格创办报纸；创办报纸程序为：须于发行二十日以前将报刊的名称，体例，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的姓名、履历与住址，发行所、印刷所的名称、地址等项“呈由该管地方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限制性的规定为：创办报纸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损人名誉、涉及阴私的言论，违者禁止发行；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

在自由办报政策鼓励下，民间报刊发展迅猛。《大公报》在创刊号中申明办报宗旨为：“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京话日报》宣言“替天下人说话，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也要说”。当时的报纸杂志上，鼓吹改良者有之，宣扬革命者有之，主张保皇者有之，各种观点在报纸杂志上自由论争，知识分子可以不依附党派，发表独立政见，独立报刊可以自由指陈时政，抨击政府，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多元的繁荣景象。

反清革命党宣传推翻满清即可达到中国的进步。可是革命后，舆论空间越来越小，最后报刊被完全党化，服务一党。在二十一世纪，人们重读百余年前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大清报律》才明白，革命带来的是倒退。迄今，清末新政期间仍是国人表达思想、议论时政、创办报纸和新闻报导最自由的时期，《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大清报律》仍是中国最自由和最进步的新闻出版法。

废除满人特殊待遇

入关后，顺治帝实行“恩养”政策，宣布永远免征八旗兵丁的差徭、粮草、布匹，让他们享有特权，圈占京畿二十万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规定“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随着控制区域扩大，清廷实行了八旗兵在各地的常驻制，规定旗民不能从驻扎地调回，不得与汉民混居，不得经营工业，不得擅自离城十里，离开驻防地要提前请假，不得与外族通婚，将八旗子弟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作，同时建立了“粮饷制度”（俸饷制度），使旗人有“铁杆儿庄稼”收入，衣食无忧，腐败日甚。

康熙年间，国家财政日益恶化，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政府派发下来的粮饷和旗地没有相应增加，八旗官兵生活水平一路下降，旗地变卖租赁情况严重，甚至发生了旗人隐瞒身份卖身为奴的事件。雍正帝采取了试行井田（朝廷圈地为井田，让旗民去耕种）、增设养育兵、清理开户人（汉人另开户）

及出旗为民（允许汉人奴仆、旗人养子、旗人后代出旗为民）等项措施解决旗人生活问题，但这些举措多不可行。乾隆时，对旗人的恩养已经成为财政上的一大负担，清廷只好继续推行允许汉军和八旗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政策。

八旗兵在各地的常驻制和“粮饷制度”推行两百年后，满清八旗子弟世代为兵，领取钱粮，无所事事，多有斗蟋蟀、玩雀鸟的习惯，给人不务正业、纨绔子弟的形象。洪杨之乱时，八旗特殊待遇的弊端充分暴露。长期享受钱粮，受到禁锢的八旗，包括绿营没有战斗力，一触即溃。清廷不得不依靠汉族将领平定暴乱。随着清廷日益依赖汉族督抚支撑，满人特权日益成为满汉矛盾的焦点。咸丰年间，肃顺向咸丰帝指出：“满人承平日久，世受恩典，多纨绔，少伟男，八旗营兵不战自溃。”咸丰坦承：“朕又何曾不知其敝。当年世宗（雍正）也曾经改制让满人自食其力，但最终收效甚微。如今内忧外患，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9]

新政中，清廷财政破产，无法继续维持对旗人的粮饷待遇，慈禧太后决定结束被革命党宣传为排满理由的旗人特殊待遇，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问题。1907年，清廷颁布诏书，宣布废除对旗人的“钱粮制度”特殊待遇，及对他们谋业，迁移，居住的各种限制，命旗人“另筹生计、各自食力”。至此，八旗子弟特权不再，只得自谋生计，甚至脱离旗籍。清政府废除满人的特殊待遇决策有中央政府财政困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不在财政，而是顺应潮流，为立宪作准备的决心。清廷这一进步举措证明了康有为、梁启超与革命党论争中关于满汉冲突不是中国主要问题论断的正确。

第3章 预备立宪

日俄战争与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

十九世纪以来，日、俄都处心积虑吞并满洲、朝鲜。甲午战后，沙俄不容日本占了辽东半岛，联合法、德施压，迫日本同意收取 3000 万两“赎辽费”后交出辽东半岛。被迫“还辽”后，日本认识到，要向大陆扩张，同沙俄必有一战，将签定《马关条约》所获的两亿两白银主要用于扩充军备。经过十年备战，日本军事实力大增，在美英的支持下决心将俄国逐出满洲。

1904 年 2 月 6 日，日本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俄国立即从中国东北撤军。俄国拒绝了通牒。2 月 8 日夜，由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向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动突袭，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无力约束日、俄，被迫宣布中立及划定交战区域。日、俄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战一年多，经过旅顺争夺战、辽阳会战、沙河会战、黑沟台会战、奉天会战，俄军遭到惨败。沙皇不甘失败，从欧洲东调舰队与日本海军决战。日本虽胜，但所动员的百万兵力损失了五分之一，花费了 20 亿元军费，欠下了英、法、德等国的巨债，无力再战。1905 年中，日俄双方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停，在美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开始了和谈。日本向沙俄提出赔偿战费 15 亿元，割让库页岛、放弃满洲利益、限期撤军等条件。俄国称其并非战败国，拒绝赔款与割地。双方一边谈判，一边等待海军决战的结果。清政府得知日俄议和及议和有关条款后声明：“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日、俄两国对清政府的声明不予理睬。9 月 5 日，俄国海军主力波罗的海舰队在対马海峡大海战中被日本海军歼灭。沙俄在战场上挽回败局的希望破灭，只好在谈判中退让。日本无力再战，也只能见好就收。

10月5日，日本全权代表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与俄国全权代表维特签定了瓜分中国东北的《朴资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俄国承认朝鲜、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旅大租借地、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铁路）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让予日本，将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让予日本。

12月，日本根据《朴资茅斯条约》中“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支线权利转让给日本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条款与清政府展开了谈判。清政府虽然尽力维护主权，拒绝全盘承认日俄朴茨茅斯条约附约有关驻军的条款，坚持加附约规定后与日本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中日北京条约》），但在无力收回东北主权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日俄关于中国东三省的交易。至此，日俄以长春为界，划中国东北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辽阳设立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都督府内设陆军部，称关东殖民地为“关东州”，建立了关东军驻扎南满，模仿英国以“东印度公司”经营印度的方式，成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市镇及旅大租借。1907年7月，日、俄为划分势力范围签定了《朴资茅斯条约》的追加条款（第一次《日俄密约》）。其内容为：俄国承认日本吞并朝鲜，日本承认俄国吞并外蒙。此后，日俄再于1910、1912、1916年签定了瓜分满、蒙、朝鲜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密约。

日俄战争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巨大。美国历史学者罗斯洛夫评论说：持续四百年的胜利，使白人的狂妄不断膨胀。在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放弃这种骄傲情绪的白人一千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旅顺港的炮声震惊了全世界，从此，白人开始走下坡路了。[1] 对中国而言，虽然日、俄战争给东北带来摧残，给中国人带来屈辱，但战争的结果有益中国。因为，如果日本不开战或战败，中国东北被俄国吞并在所难免。事实上，俄国后来长期将夺回在这次战争中失去的权益作为其远东政策的目标。沙俄政府被推翻后，苏俄继承

了沙俄这一远东政策目标。因此说，不了解俄、日向满蒙扩张的野心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史。

五大臣出洋考察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强烈震动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张謇在战后赴日本考察政治、实业、教育归来后写出《变法平议》一文，向清廷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效法日本，走立宪与议会制之路，设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同时他还提出了设置议院的办法。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外报纸评论战争是立宪与专制政体之战，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燾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云贵总督丁振铎、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云南巡抚林绍年、军机大臣铁良、湖南巡抚端方、盛京将军赵尔巽、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等朝臣纷纷奏请立宪，加快政体变革。张之洞指出，只有直隶总督袁世凯能推动朝廷立宪，嘱张謇与袁世凯联络。张謇致函袁世凯，请袁领衔推动清廷立宪，并出资刻印了《日本宪法》、《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资料分送朝廷内宫和和张之洞、袁世凯、瞿鸿禨、铁良，促重臣们出面推动朝廷效法日本立宪。慈禧太后阅张謇所印的《日本宪法》后认同日本维护君权的宪法，表态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慈禧表态传出，立宪派倍受鼓舞。1905年初，李盛铎，盛宣怀、赵炳麟、孙宝琦等出使大臣再上书，要求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江浙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张鹤龄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人提出遣使分赴各国考察，张謇再致函袁世凯：“立宪之首要，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

6月，日本战胜沙俄的消息传来，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是立宪战胜专制的证明。《大公报》社论说：“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舆论一致鼓吹立宪胜专制，称“二十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一时，“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

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袁世凯感到时机成熟，领衔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重臣促朝廷实行立宪，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接受袁世凯领衔的奏请，慈禧太后颁布上谕：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决定设立考察政治馆作为将来实行宪政的筹备机构。上谕下达后，袁世凯再与盛京将军赵尔巽联名上奏《试办地方自治局折》，请派民间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推行地方自治预作准备。慈禧立即批准，谕令奉天和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派两省官绅出洋考察。这两道上谕显示，清廷下决心由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向变革，由“中体西用”转向“变法西体”，由皇权专制向宪政过渡。

清廷改革的一大阻碍是破产的财政无力支持改革。庚子赔款使中央政府依赖向地方摊派应付开支，朝廷居然拨不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袁世凯并非呼吁立宪落后他人，而是对朝廷的困境了解更多。其他官员可以只呼吁派员考察立宪，不管朝廷的财政困难，但实际当家的袁世凯奏请则须附有解决财政之策。在奏请派员考察立宪的同时，他提出直隶拨银十万两作为考察费用，承诺随后每年筹款十万两用于立宪改革。在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认缴经费的带动下，清廷筹到经费 80 余万两，考察团得以成行。行前，端方等考察大臣多次赴天津，与考察实际主持人袁世凯商谈各项事宜。对清廷派大员出洋考察，西方舆论普遍给予了正面报导，相信中国会在考察后走上立宪、富强之路。

清廷立宪计划的最大阻碍还不是财政破产，而是日本朝野资助的反清革命。在日本人扶植下，在日本的革命党势力迅速壮大，决心阻止清廷立宪改革。当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位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率大批参赞随员从正阳门火车站乘车离京赴沪时，革命党刺客吴樾身藏炸弹，乔装成皂隶尾随跟上专车，引爆行刺，自己当场死亡，将载泽、绍英炸伤。对此事

件，立宪派和主流报刊舆论和一致谴责恐怖主义。《时报》社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袁世凯指出，只有果断推进立宪才可以化解革命。而同盟会将吴樾歌颂为英雄，印发吴鼓吹恐怖主义的《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等十三篇遗著以鼓动青年效仿。

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延缓了五大臣的出行，但未能动摇五大臣考察立宪的决心。考察大臣中受伤最重的绍英回应关于他借口养伤逃避出洋的传言说：“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端方声明考察团不能因一颗炸弹而退缩，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不可缓也。”[2]在考察团再准备启程时，传来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消息。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参政等权利，俄政府召开了国家杜马。清廷降旨考察不得延误，派新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接替徐世昌、绍英出洋考察。为防范革命党人的进一步恐怖活动，袁世凯作了周密保安布置。然恐怖威胁防不胜防，五大臣和主持考察的袁世凯必须面对暗杀的风险。

五大臣及随员分成两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考察日、英、法、比等国，其中重点考察君主立宪的日、英；端方、戴鸿慈考察美、德、俄、意、奥等国。考察中，大臣们参观了议院、行政机关、学校、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乃至博物馆、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拜会政治家、学者，听讲宪政原理介绍，调查政治制度，搜集各类图书和参考资料等，眼界大开，思想转变。载泽一行在日本特别聆听了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日本政治家关于天皇大权、日本宪政、日本宪法等方面的演讲，以为效仿立宪作准备。

立宪时间表

维新失败亡命日本后，梁启超开始研究日本立宪的经验。他了解到，明治天皇即位后颁布了“广开言路，万机决于公论”等五条誓文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议会两院和内阁制度，选派大批留学生去西方学习，改藩邦为郡县，于 1875 年发布诏书，承诺建立民选议院和立宪政体，于 1890 年宣告宪法（明治宪法）生效，议会开议。清廷宣布“预约变法”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在其中指出：“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有无宪法是西方先进国体与中国落后国体的根本区别。”他提出“预备立宪”主张说：“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问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论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后，则定之当在十年以前。”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接受随员熊希龄的建议，请在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代笔草拟立宪文件供回国向朝廷汇报。应五大臣之请，杨度拟就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实施宪政程序》两文，梁启超拟就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二十万言的报告和奏章，为清廷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计划和时间表。在《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中，梁启超建议以日本宪法为典范，循西方宪政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确立皇帝是凌驾于三权机构之上的君主立宪的框架，皇帝为国家元首，国会为两院制，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选、蒙藏议员组成，下院（右院）由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以日本为榜样，梁启超为中国设计了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宪政为期二十年的进程。他解释说：“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

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1906年中，四大臣（李盛铎留比利时任大使）结束历时半年的十四国考察，带着梁启超代为起草的预备立宪文件、杨度代为起草的《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等文件回国。慈禧太后立即分别召见，计端方三次，载泽、戴鸿慈各两次，尚其亨一次，“垂问周详”。四大臣皆陈立宪之利，不立宪之害。针对清廷担心立宪之后皇位与君权问题，端方、戴鸿慈奏称，日本立宪模式可以解决立宪与君权的问题，建议模仿日本宪政模式，先预定立宪之年，使官员和人民预为准备，颁布国是诏。他们所言正是明治宪法的似是而非之处。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明治宪法是专制与宪政的混合，既强调皇权又强调民主、自由。

8月，慈禧太后召集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瞿鸿禨、荣庆、鹿传霖、铁良、徐世昌、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鼐、王文韶、世续、那桐、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等高层举行了一连串御前会议，阅看、讨论考察大臣的奏折、文件和立宪建议。会上，铁良、荣庆、孙家鼐等人反对立宪，认为中国情势与外国不同，实行立宪，必至执政者无权，坏人得栖息其间，为祸非小；人民不知要求立宪，授之以权，不仅不以为幸，反而以分担义务为苦；实行自治，坏人便会掌握地方命脉，非常危险。袁世凯坚决主张立宪说：“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有敢阻止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表示为立宪要“以死相争”；庆亲王奕劻表态支持立宪说：立宪有利无弊，符合民意，应从改革官制入手，从速宣布预备立宪。庆亲王带动了多数大臣表态赞成改行立宪政体。

针对反对派的责难，几位考察大臣向朝廷提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东西洋各国强盛的原因在于采用了立宪政体，中国欲富国强兵，

“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3] 其中，载泽在会议期间单独上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陈述“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利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针对反对派说人民程度不足，不宜行宪，载泽道：“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针对“立宪利汉不利于满”，载泽反驳：“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于计较满汉之差缺，竞争权力之多寡，则所见甚卑，不知大体者也”，“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人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他向朝廷进言立宪“三大利”为“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4]

反复考虑众臣的意见后，慈禧太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其中包括：1、自今日以后，十年或十五年为期，施行立宪政治；2、其大体效法日本，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3、财政及兵马之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4、中央政府之组织与日本现制相等；5、再派达寿率政体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宪法，深入研究日本宪政体制以及经济运作模式；6、设立政治考察馆作为立宪的领导机构，由奕匡、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官制（后加入留日归来青年配合），研究各国宪政，向朝廷提供宪政改革的建议；7、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袁世凯等十四人负责拟定改革方案；8、设立官制编制馆，负责制定官制改革方案，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袁世凯等人共同编纂官制。

9月1日，清廷在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和《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瞿鸿禨起草），宣布：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百年有道之基；因目前百废待兴，民智未开，故须改革官制

以除积弊，广兴教育以启民知，厘财备武，以资立宪之基；待预备工作初具规模，再为妥议立宪之期，期限长短俟机而定；立宪前先要作好行政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三方面的准备，“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两道上谕标志，清廷接受代议制、民众权利、地方自治等西方经验与观念，接受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等宪政要素，以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准备放弃皇权专制，向民主政治过渡。慈禧太后在考察大臣回国后两个月内即完成了讨论决策程序，宣布预备立宪，显示清廷的变革决心与空前绝后的决策效率。

两上谕公布后，立宪派和绅商学子们“奔走相告，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以五千年相沿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环球各未有之美矣”，[5] 各地方召开立宪庆贺会，敲锣打鼓，高悬国旗庆贺。在农历十月十日的慈禧太后寿诞日，北京各学堂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再举行了庆贺预备立宪典礼。[6]

官制改革

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考察大臣戴鸿慈、端方建议：仿日本责任内阁、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调整中央机构。他们指出：“日本之实施宪法在明治二十三年，而先于明治七年，明治十八年两次大改官制，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诚以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7] 袁世凯支持戴、端的建议，在讨论立宪的会议中面奏从改革官制入手，建立日本式的责任内阁，以为立宪基础。接受袁世凯、戴鸿慈、端方的建议，慈禧太后决定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官制，指定由，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军机负责官制改革。

在颁布预备立宪上谕当天，慈禧太后召集重臣在恭王府朗润园举行了专门讨论官制改革的会议。会上，奕劻、袁世凯主张从速改革官制，荣庆、孙家鼐主张缓行，会议达成了妥协方案，暂搁置立宪政体中最关键的“议院”不议，决定改革行政和司法架构，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设立官制改革的专门机构办事机构——编制馆，由载泽主持制订官制改革方案。次日，慈禧太后发布了厘定官制上谕。几天后，清廷成立了官制编制馆，在朗润园设立了编制馆办事机构。得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的支持，袁世凯成为官制编订事务的真正主持者。一个月后，编制馆推出了仿效日本责任内阁制的《新官制改革案》，其主要内容为：裁撤军机处、吏部、都察院，设立责任内阁，增设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西方架构中的行政、监督机构，责任内阁代皇帝行使行政权，资政院行使监督权。

如载泽在奏折中所言“实行立宪利于国，利于民，唯不利于官”，立宪意味着政体转变和皇族内部分人失去权力。按照袁世凯的方案，成立责任内阁后宗室不得干政，官员不得兼职，皇族失去相当权力，荣庆专任学部尚书，地位降低，身兼户部尚书与练兵处会办等要职的铁良专任内阁副总理，失去财政权和兵权。王公、贝子、宗室们强烈反官制改革方案，以改官制后所有官监将被驱除，内务府将裁撤的消息煽动太监们对官制改革，去找慈禧太后泣诉。出于权争考虑，军机大臣瞿鸿禨向慈禧进言，谓袁世凯要通过设立责任内阁揽权，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抨击奕劻、袁世凯不设议院，独设内阁是要造成由二人任内阁正、副总理专权的局面。面对反对官制改革的强大浪潮，慈禧太后被干扰得寝食俱废，向身边人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8] 为了避免政局动荡，她决定“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据此决定，编制馆修改了官制改革方案。

11月，清廷发布官制改革上谕：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财政处并入度支部，太常、光禄、鸿臚三寺并入礼部，改兵部为陆军部，练

兵处、太仆寺并入陆军部，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掌审判，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设邮传部管轮船、铁路、电线、邮政，改理藩院为理藩部，设立资政院，审计院，其余衙门毋庸更改。改革后，行政、司法开始分立，军机大臣职数减少，各部尚书均充参与政务大臣，责权加大，中央各部只设专职尚书一人，侍郎两人，不分满汉，都察院改设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两人，有利加强行政责任心和效率。上述官制改革虽比袁世凯的方案保守了许多，但仍体现了向三权分立、责任内阁方向的重大进步。

官制改革没有使袁世凯增加权力，反而使他军权被削。洪杨之乱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方督抚崛起，开始了汉族督抚支撑满清王朝的局面。伴随新政的实施，满清权贵力图改变军权、财权集中于汉族地方督抚之手的局面。推动官制改革过程中，袁世凯因其改革方案触动满人权贵既得利益的而成为众矢之的。慈禧应满人贵胄削汉人兵权的要求，裁抑袁党，重用满人，削去袁世凯的八项兼职和北洋四镇兵权，任满人铁良掌陆军部。在反对官制改革势力结成反袁联盟的形势下，袁世凯的亲信们纷纷向他进言，劝他引退，以防大祸。袁拒绝言退说：“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9]

反势力推慈禧倚重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瞿鸿禨出面倒袁。二人趁慈禧太后有意削袁权力之机，借朝臣普遍对官制改革方案不满向袁世凯和支持袁的首辅军机庆亲王奕劻发难。1907年4月，岑春煊进京，向慈禧太后面劾奕劻、袁世凯狼狈为奸，贪污纳贿，扰乱朝纲，将权力之争比作清浊之争，掀起了“丁未政潮”。应对岑、瞿的发难，奕劻和袁世凯以所掌握的瞿密保康、梁的三份奏折及岑通过张謇等立宪派与海外的康、梁联系等证据反击，派翰林学士恽毓鼎具名参劾瞿、岑为戊戌变法翻案，促慈禧太后归政。

慈禧太后虽对岑、瞿信任有加，忧袁世凯在朝中势力过大，不满奕劻贪污及纵子枉法，但她清楚，袁世凯代表着变法、立宪，岑、瞿代表着抵制改革的势力。派铁良、孙家鼐调查证实岑、瞿与康、梁的关系后，她决定以改革大局为重，驳回瞿、岑的发难，将瞿开缺回籍，将岑排斥出京。奕劻、袁世凯也不是政潮的赢家。两个月后，慈禧将袁世凯、张之洞调入军机处，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军权，安排载沣入军机牵制他们的权力，同时命度支部收回地方督抚手中的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

地方自治

明治维新后，大久保利通内阁实行了大、小区制，颁布了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令规则、地方税规则等地方自治法规，赋予代表町村的户长（相当于后来的町村长）在基层完成户籍、收税、征兵等职能；山县有朋内阁制定了《市制》与《町村制》，将全国七万多个町村合并为一万多个，建立了町村自治组织，由此确立了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完善的基层行政组织保证了日本中央政府能够实行按照地价征收地税，有足够财政收入推行立宪改革。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在东三省设立了“不妨外交，不碍国权，惟于保卫范围内一切权利，务期完全无缺”的自治机构——奉天保卫公所，在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区域行使管治权。保卫公所意在自治，而非独立，与日本占领台湾前台人宣布独立同理。梁启超评价说：“东三省者，实天然自治之试验场也。此保卫公所若能实行，一以使吾人自知吾种族非劣于欧美日本，可以由秩序而得自由，而国民自信力因以加强；一以使政府知人民自任民事以自保自卫，实为分政府之劳、助政府之治，而丝毫不侵损政府之权，而政府猜忌心可以尽息。若办理得宜，二三年后化之可也，天下事有作始简而将毕巨者，此类是也。”

袁世凯虽未亲身考察日本地方自治，但通过顾问幕僚了解了日本地方自治的经验和地方自治对国家富强的推动作用。在主张效法日本推行地方自治

方面，袁世凯与梁启超不谋而合。清廷宣布变法后，袁世凯开始在直隶进行地方自治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州县选派“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毕业生，家道殷实、勤于公益之绅商”到天津参加自治培训，学习地方自治制度、选举法、户籍法、地方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经济学、法学、财政学、政治学等管理近代国家所必需的法政知识，从各州县速成学习四个月毕业的士绅中选拔一批人赴日本学习、考察，以为地方自治培养骨干。1905年，在提出的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同时，袁世凯奏请在奉天、直隶试办地方自治。奏议获批准后，袁世凯指示天津府设立了“天津府自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地方自治领导机关。在天津府知府凌福彭领导下，天津府自治局推动所属州县成立了“自治学社”、“地方自治研究所”、“天津县期成自治会”等团体，草拟地方自治章程，编印《法政官话报》、《自治讲义》，分发所属州县，广为张贴，启迪民智，普及自治教育。同时，袁世凯再派出一批地方官员和绅士赴日本学习地方自治。

考察回国后，出洋考察大臣们一致推崇英、日等国的地方自治体制，建议报朝廷效仿，先立府州县议会，再立省议会。考察大臣们的自治建议这时已在直隶实施得卓有成效，天津府各州县以天津县为榜样，已在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先前到天津接受自治教育培训回来的毕业学员成为各州县设立自治学社和自治研究所为中心，传播地方自治法理和精神，培养乡村地方自治骨干的教员。

1906年11月，天津官、绅、商、学界代表成立了自治促成会，仿照日本自治法规，制定了中国首部地方自治法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该章程指出：“县自治之监督官，初级为本府知府，最高级为本省总督，其属于各司道主管之事务，各该司道亦得监督之”；“本省总督得解散县议事会”；“董事会”会长以本县知县兼任之”，并规定以教养、财产和声望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条件。袁世凯在《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上批示：“此次试办地方自治，为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务必和衷共济，

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模范。”[10] 1907年4月，天津开始划分选区宣传选举，继而进行了初选和复选。清廷支持了直隶的试办选举，发布上谕强调在推行自治时采取官绅合治的形式，要求“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11]

7月，天津举行了中国首次议员投票选举。由于对候选人有教育、财产方面的资格限制，只有2572人有资格参选。经过初选、复选两轮投票，天津县选举出30位议员组成了“县议事会”，是为中国民选与地方自治的发端。袁世凯在贺词中说：“自治为立宪基础一语已尽人言之矣，其所以为立宪之基础者何在乎？在乎养成议员之资格。盖立宪之重要问题在立议院，……下议院之议员必由地方公选。……今以办理自治为练习地步，则将来开设议院不患乏才矣，故自治议会亦即为议院之先声也。……今日为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可为我中国前途贺。”[12]

8月，袁世凯饬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榜样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各州县议会（议事会或参事会）作为地方自治的预备机构，组织绅士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经验。他特别强调商人在地方自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非合有学识有经验之本地绅商公同协议，不足以昭慎重。”据此指示，天津自治期成会规定“会员除自治局公举绅士六人及自治局局员外，由天津劝学所、商会各就本籍学界商界公正通达之人，分行公举。”[13] 在直隶地方自治运动中，受过新式教育的绅商被推举为学董、警董、区董，自治预备会会长，省议会议员，或出任县长，走上各级政治舞台，成为城乡社会的领导者。

促开国会与九年立宪清单

随着革命党的暴动和暗杀蔓延，朝野立宪派人士感到了革命对立宪的威胁，湖南绅士熊范舆、雷光宇率先上书请速开国会，各地绅士纷纷效法，促清廷缩短立宪预备期。在岑春煊支持下，郑孝胥、张謇为首的江、浙、闽官、绅、商、学各界代表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汤化龙在武汉创建了

湖北宪政筹备会，杨度、谭延闿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立宪组织领袖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人认为，从速立宪能够避免革命，召开国会，颁行宪法不需要预备期。预备立宪公会两度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在两年内召开国会，同时发出函电，吁请各省的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代表齐集北京，促清廷从速召开国会。一时，各省组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派代表进京递交请愿书，或联合上书宪政编查馆。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清驻德公使孙宝琦等官员先后响应请愿运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或速定开国会期限。

理论家杨度的观点代表着促朝速召开国会运动的主张。他认为，立宪政治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行政体制，不需要耗时预备试用，而应当机立断，达到药到病除，否则就是讳疾忌医，延误病情，他号召：“有强压国民必败之政府，而无要求政府不胜之国民……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14] 应当说，清廷宣布的立宪时间表和准备步骤并无不妥。因为，预备立宪上谕说得明白：“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预备立宪上谕中宣布的行政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项准备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如果中国能像日本那样，二十年完成向宪政的转变绝对不慢。但是，日本扶植的同盟会迅速壮大，革命日益迫近。清廷和发动促开国会运动的立宪派们均清楚，如果按照立宪时间表执行恐怕“日不暇给矣”。[15] 于是，预备立宪公会呼吁加快立宪步伐，清廷明知缩短预备期不可行，也只得迁就。

1907年7月，清廷根据奕劻、袁世凯奏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作为直属军机处的政治体制改革专门机构，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领导，要求加快制宪，派学部右侍郎达寿、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外务部右侍郎汪大

夔分再赴日本、英国和德国专门考察宪法。9月，清廷任溥伦及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划该院章程及其有关事宜。10月，清廷命各省督抚均在省会从速设立咨议局，其各府州县议事会亦一并为筹划。1908年，清廷相继颁布了《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章程》的总纲及选举两章、《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预备立宪的纲领文件。立宪派接受了地方自治选举这一立宪的准备步骤，暂停促开国会请愿运动，投入各地的咨议局议员选举。

在《各省咨议局章程》中，清廷以当时各省的教育水平为依据（按科举学额的5%），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的人数为：直隶140人，江苏125人，浙江省114人，四川省105人，山东省100人，最少的吉林、黑龙江、新疆3省，各30人。《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中规定，议员当选资格有四：“一曰资本家，一曰咨议局，一曰宗室，一曰中央政界”。这一资格规定显示，清政府改变了千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明确把资本家列为发展经济和推动立宪的依靠力量。相当于国会章程的《资政院院章》规定，资政院由钦选和（各省地方）民选的议员各100名组成，资政院的职责是：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法律等等。

《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是清廷筹备立宪的总体规划，其中规定了负责机构，进度要求和责任目标。在清单中，清廷宣布立宪时间表为：各省将各级地方自治作为筹备重点，在1909年内完成咨议局的选举，成立各省的咨议局；1910年全国资政院开院；至1915年，全国城镇乡及厅州县一律成立地方自治机构，乡镇以上一律设立审判厅，人民识字率达到1%；1916年人民识字率达到2%；1917年颁布钦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人民识字率达到5%。清单还规定实行地方自治和户籍调查，融合满旗畛域，制定国税、地税，颁布会计法，确定皇室经费，设立审计院，建立预算决算体系，以及法律、司法、官制的方面建设的一系列具体目标，

要求在预备立宪期内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将九年要做之事分门别类详细造册，敕令中央各部及地方官员切实执行，预定于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颁布宪法。

在如同政治遗嘱的《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诏书中，慈禧太后表达推进立宪的急迫心情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她要求中央各部堂和地方衙门将谕旨清单悬挂正堂之上，照清单依次举办，每六个月奏报一次筹办实绩，在督抚交接之时，前后任应会同将前任办理情形奏明，以免推诿；要求部与省同办之事，由部纠察各省，令宪政馆设立专门机构，切实考核；都察院负责察访，指名纠参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者。[16]

清廷“九年预备立宪”的总体方案和时间表并非请愿促开国会的立宪派们所说的“拖延敷衍”。日本从明治维新到 1890 年召开国会，预备了二十二年，清政府制定的九年完成民选国会，颁布宪法，从皇权专制向宪政变革的方案已属激进。《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规定的全国资政院开院，全国城镇乡成立地方自治机构，提高人民识字率等目标都是实行宪政所必须，而这些目标的达到需要时间。有鉴于此，梁启超在《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中批评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过于仓促，所设目标是达不到的。他指出：“虽以德国、日本教育之盛，而发达之程度，且经十年犹未能增进一倍，今我乃欲两年而一倍，三年而五倍，天下有如此容易之业耶？”他不会想到，中国由专制向宪政的变革不仅九年没有达不到，二十年没有达到，一百年后仍遥遥无期。

《钦定宪法大纲》

分析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汇报后，清廷认为法国、美国没有皇室的共和民主政体难以仿效；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宪政制度对于君权严格限制，也难以仿效，于是再派达寿、于式枚、汪大燮三大臣重点考察有皇室又有成文宪法的日、德两国。清廷根据三大臣二次考察的汇报决定，仿照维护皇权的日本宪法起草宪法大纲。1908年8月，清廷在朝野促从速立宪的浪潮中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迈出了从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过渡的重要一步。

《钦定宪法大纲》的二十三条条文中，有十七条抄自日本宪法。大纲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十四条，第二部分为附录，内容为“臣民的权利义务”九条。《钦定宪法大纲》中保留君主专制的内容可以理解，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的王室都是万世一系，这与专制或民主政体无必然联系。大纲的进步体现在对皇权的限制。它确定了国家政体“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皇帝须受议院、政府和法院制约，必须遵守宪法条文的规定，不再有废止议院通过的法律之权。关于司法权，大纲规定：“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这一规定取消了皇帝的最高审判权，实际推翻了“朕即法律”的皇权专制。

关于臣民权利，《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虽不如《日本帝国宪法》广泛，但其臣民财产“无故不加侵扰”的条文大体表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宪政基石；其“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的条文体现了从专制向宪政过渡的重大进步。在《钦定宪法大纲》附属的《选举法要领》中，清廷规定：“选举用投票之法，得票多者当选，凡合乎选举资格的臣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清廷加入了在经济方面限制皇权的内容，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协赞”。上述规定体现清王朝迎合世界潮流，放弃权力垄

断，接受臣民权利不受侵犯等诸多对皇权的限制，体现了清廷放弃专制极权，迈向宪政的进步。

宪法大纲公布后受到立宪派的欢迎，北京等地的立宪人士“欢声雷动，大表贺忱，认为名诏宣示钦定宪法及召集议员的年限，实在是我大清帝国雄飞宇宙的第一大纪念日期，凡我国各地方及全国国民，全当悬灯结彩，开会庆贺才是。”^[17] 反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声音主要来自革命党。同盟会拒绝妥协与改良，抓住“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条款，否定《钦定宪法大纲》的进步性，号召推翻清政府。其实，革命党所抨击的君权条款在君主立宪国宪法中普遍存在。清廷《钦定宪法大纲》主旨不是维护皇权，而是瓦解皇权，其序言写得明白：“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军机大臣奕劻进一步指出：“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

部分维护特权和既得利益的满族亲贵反对《钦定宪法大纲》，认为“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18] 王文韶、孙家鼐，鹿传霖等守旧的汉族大臣也反对《钦定宪法大纲》，因为他们的权力地位来自旧的皇权体制，担心按制度变革危及权力地位。上述反对势力反对的理由正好显示出《钦定宪法大纲》的进步性。从预约变法到宪法大纲公布，清廷自愿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民间的言论、结社极为自由，社团，政治党派，利益团体，成千上万的民间商会、教育会、农学会组织遍布全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光绪慈禧逝世

1908年11月初，光绪皇帝病危，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醇亲王载沣商议立嗣，否决了皇室近支溥字辈中被认为最合适继承皇位的恭亲王溥伟（恭亲王奕訢之孙）和溥伦两人选，决定溥仪继嗣，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张、世担心出现光绪皇后垂帘听政局面，主张径立载沣。慈

慈禧太后认为同治、光绪已是兄弟相继，载沣再继，三代兄弟传承不妥，决定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溥仪入宫读书。对慈禧的这一决定，载涛后来写道：“慈禧太后自认为身体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新皇时代继续垂帘听政，所以侧重于册立幼君。”[19]

11月14日，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丧失自由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逝世，慈禧太后颁懿旨以溥仪为嗣皇帝。次日，慈禧太后去世。三十七岁的光绪死在七十四岁的慈禧之前仅一天，留下了被毒杀的传言：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老太监说光绪死前一天还好好的，服了袁世凯派人送来的药后突然恶化；恽毓鼎在其《崇陵传信录》中记载：“时太后病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有太监李莲英、崔玉贵担心慈禧死后遭光绪清算而下毒之说；有奕劻派人下毒说等等。百年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对光绪帝头发、遗物检测，证实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不过，凶手是永远的谜。

慈禧太后当国四十余年，作出最昏庸的决策是庚子年纵容义和团暴乱，向列强各国宣战，派义和团和军队攻打外国使馆和教堂，造成此后几十年政府破产，靠借洋款维持。但是，她在西逃路上发出“罪己诏”，真切自责，深刻反省，决心变革补救，到西安后发布了《预约变法上谕》。在随后几年，她领导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变法革新。新政的变革包括：在行政与官制方面改革了传统的六部体制，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裁撤冗衙，在新建或改组的部门中废除了“数人共一职”的低效架构，废除了鼓励腐败的捐纳制度，简化各官署的公文形式，取消书吏；在经济方面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在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巡警；在教育方面，先废八股，再废科举，打破一千多年旧教育制度的桎梏，大力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设置中央学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在新闻出版方面，鼓励民间办报，使报业迅

猛发展；在法制方面，废除酷刑，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独立。新政变法不仅将戊戌维新提出的各项改革付诸实施，而且在改革深度与广度方面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的目标，使古老帝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各国评论家纷纷盛赞中国新政带来的巨大变化，《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预言，中国按此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进程，完全可能超过日本。

1906年，慈禧太后决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布了《预备立宪上谕》，领导国家突破千年祖制，迈向立宪国行列。在预备立宪的两年，也是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她与时间赛跑，古稀之年发愤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以广见闻。张謇后来回忆，慈禧太后在1907年四次召见时多次“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听到官制混乱和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陷入困境，改革困难重重等世情时痛哭失声。[20] 在迫近的革命威胁下，她全力推进立宪进程：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加紧制宪；派达寿等大员分英、日、德考察宪法；派溥伦及孙家鼐制定资政院章程，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章程》的总纲及选举两章、《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预备立宪的重要文件。在她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地普遍设立了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和府、厅、州、县自治事务所等两级办事机构，还设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机构与培训机构。她在最后一道上谕——《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中严令各级官员在限期内完成立宪时间表中规定的各项目标。

作为改革派和立宪派的最高领袖，慈禧太后善于调动群臣智慧。她在新政和预备立宪改革过程中的决策效率之高，领导改革魄力之大，推动全国走向立宪和实行地方自治贡献之大，在此后一个世纪中国领导人中鲜有比肩者。她的猝然逝世是中国立宪大业的重大损失。不过，清廷立宪成败的决定因

素不是慈禧太后的领导能力，而是日本策动的中国种族革命。日本有能力推翻清政府。日本的颠覆计划注定了中国立宪的失败和清廷的覆亡，慈禧太后的去世只是加速了清廷覆亡的进程。

第4章 日本输入革命

“大陆经略”

隋朝开始，日本派使团到中国交流，对遣隋、遣唐使带回的文明顶礼膜拜，对大唐的建筑、茶道、禅宗、相扑、蹴鞠、服饰等文化全面模仿。唐朝之后，中日的正式交流停止。1279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将最后的南宋军歼灭，蒙元占领中国，日本“举国茹素”（全国戴孝），向西哭拜哀悼宋亡。元灭宋过程中，日本因得台风（日本人称为神风）相助顶住了元世祖忽必烈数万大军，数千战舰的两次进攻（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得保天皇“万世一系”。与此同时，越南三次重创蒙古大军，也免于被蒙元征服。日本、朝鲜、越南不再仰慕游牧民族统治的中国。相比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长期进贡的朝鲜、越南，日本始终保持独立，与中国平等交往，未受外族入主，日本人从元朝开始“神国”观念日益强烈，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夏，传于秦汉，兴于隋唐，亡于南宋，“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正宗传承已经移到日本，开始自称中华，鄙视亡于人数很少外族的中国。清灭明后，日本、朝鲜、越南都认为汉人剃发易服臣服少数夷蛮是中华的耻辱，李氏朝鲜，阮氏越南长期着汉服，禁止满清服装、发型，李氏朝鲜长期保持崇祯年号，自称小中华，越南自称南朝，日本开始称中国为“支那”，称朝鲜为近藩，称清国为远藩，称自己代表“中华”、“中国”。

十九世纪初，受日本幕府派遣到“东鞑”（黑龙江流域）侦查的国事探间官林藏在其《东鞑纪行》一书中指出，与其与俄国人争夺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的库页岛，不如把视线投向富庶的“东鞑”。明治维新前，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奠基人吉田松阴提出：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

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北海道），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覲；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称中国是“极不廉耻”的“恶邻”，与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明治时期，天皇参议江藤新平提出：日本“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平，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各界形成了“不甘处岛国之境”的共识，向中国扩张的欲望日益强烈，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日修好条规》（18条）和《通商章程》（33条）时，日本反对清国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要求称大清国，后接受了李鸿章的妥协建议，“汉文约书中国、日本，和文约书大日本、大清”。这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认为，“鞑虏”满清可以入主中国，日本也可以入主中国，准备向中国扩张。日本政府接受江藤新平《对外政策意见书》中为向中国扩张作准备的建议，开始派情报人员到中国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其中，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人奉命到满洲活动后向政府提交了绘制出的地图，实地调查报告和《满洲视察复命书》，书中建议向满洲扩张；陆军少佐福岛九成提交了中国南方的调查报告；军事间谍岛弘毅提交了两卷本的《满洲纪行》调查报告。1879年，新设立的直属天皇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始派遣大批军官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其中的桂太朗中佐和小山又次少佐侦察后向参谋本部提交了《对清战争方略》，呼吁扩军备战。

1881年，鼓吹“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的玄洋社在日本九州福冈成立，并立即行动，派大批浪人和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1884年，玄洋社在上海开办了东洋学馆，派佐佐友房和宗方小太郎步行考察中国东北、华北，搜集情报。[1] 1886年，被日本人誉为“大陆浪人先觉者”的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东方斋，1859—1896）奉命潜入中国搜集情报，在上海日商岸田吟香（1833—1905）的资助下在汉口创办了情报兼贸易机构乐善

堂。乐善堂各地支部对外是杂货铺。间谍们模仿清人蓄起长发，扮作商人或乞丐，冒着生命危险赴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搜集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情报。宗方小太郎加入乐善堂，继续在中国各地考察。他注意到了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在呈送日本政府的《经略长江水域要旨》报告中指出：“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他建议“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接受宗方的建议，荒尾精在长沙设立了乐善堂支部，派宗方坐镇北京支部，负责对清廷中央、华北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宗方派出间谍以学生名义赴东北搜集情报（他们中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回来。战后日军方将被中国处决的间谍的遗骸棺木送回家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葬礼，在靖国神社为他们设立灵位），赴华南各省联络各省的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等会党。[2]

1887年，日本对华情报首脑，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再派山本清坚中佐和滕井茂太到中国东北侦察渤海湾登陆地点。同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与清国斗争方案》和《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乘彼尚幼稚”，以武力分割中国，“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并提出了向中国扩张的时间表，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这两个官方文件标志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大陆经略”成熟。1888年，荒尾精在乐善堂年会决议中表达扩张决心说：“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十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同年，俄国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到日本，玄洋社为俄国向东扩张态势忧虑，要求加快向满蒙扩张的步伐。1889年，荒尾精向日本陆军参谋

本部提交了根据乐善堂三年来搜集的大量情报整理出的数万言的《复命书》。在报告中，乐善堂将六类中国人定为侦察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其中“豪杰”被定义为：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华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报告提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为这一目标，日本须以商战养谍战，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根据间谍们搜集到的大量情报，乐善堂汉口总堂整理编辑成了 2300 多页，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清国通商总览》。日本朝野将此书视为向中国扩张的指导文件（后来也成为研究晚清中国国情的权威文献）。大阪富商冈崎荣次郎读了该书后决定资助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间谍学校。

选定孙文

甲午战争期间，宗方小太郎提出了利用中国会党推翻清政府服务的建议指出：“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指哥老会、三合会、白莲教等秘密会党）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3] 接受宗方的建议，玄洋社决定扶植中国会党瓦解满清，并开始物色中国会党革命的领袖。不久，他们找到了满意的扶植对象——孙文。

1879 年，少年孙文离开家乡，随兄长孙眉到了檀香山，在教会学校学习。1883 年回国后，孙文先后在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雅丽氏纪念医院）学习。1892 年，孙文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香港西医书院是个未经注册、不受港英政府承认的非正规学校，首届毕业班只有孙文和江英华两位学生。因毕业文凭不获香港、澳

门当局承认，孙文无法获得行医资格，转去广州开办“中西药局”仍难以生存。
[4] 诊所办不成，生计成了问题，孙文决定弃医另谋发展。当时，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花钱捐官之外的重要进身途径是上书高官，在幕府中谋差事。孙文决定一试，与陈少白合作撰写了一篇鼓吹发展农、工、商、学的建议书，请王韬帮助修改，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罗丰禄（李鸿章幕僚）等人写了介绍条子，与好友陆皓到天津上书，求李鸿章“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的。孙文上书中所提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等富强治国四纲领是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主张的抄袭，李鸿章的幕僚们十年前就提出同样内容，甚至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议院、立宪。正忙于出兵镇压朝鲜东学党暴动及应付日本共管朝鲜要求的李鸿章没有理会孙文的投书，失望的孙文将建议书以《上李鸿章书》的题目发表于《万国公报》（1894年10月）。由于英文报纸上登出“Dr·Sun Yat-sen”，孙逸仙博士之名开始流传。孙文接受了这样的称呼，不予澄清，此后自称博士。

行医及投书失败后，孙文与黄巢、洪秀全落第后的心情一样，决心造反。他少年时深受会党熏陶，崇拜洪秀称帝，早有谋反之志，曾发誓作“洪秀全第二”，干一番“天王”那样的大事业。在广州南华学堂期间，他结识了陈少白、尤列（尤少纨）、杨鹤龄等洪门中人（孙与三人被称为“四大寇”），先后加入了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等多个秘密会党组织。他曾向陈少白表心迹说“将来有机会时预备造反”。1894年底，孙文到了檀香山，经三合会首领邓荫南、郑士良介绍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并提议成立兴中会。檀香山致公党接受了成立兴中会的建议，但不接受初到檀香山的青年孙文为领袖。会众们推选有名望，有财力侨领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孙文失望地离开檀香山转赴香港。在香港，他加入了杨衢云领导的香港洪门，再提议成立兴中会，发动反清暴动。香港洪门也接受孙的建议成立了兴中会，但与檀香山洪门一样，没有推举初来乍到的孙文为领袖，而推举了香港洪门中地位最高的杨衢云为会长。孙文向杨提出了出售 10 元革命债券，承诺待革命成功后按 100 元兑换等等筹集暴动资金的办法。杨接受了建议，以新成立的兴

中会名义发债券筹得了 18000 港元，决定乘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新败之机在广州暴动。在推举事成后的“伯理玺天德”（合众政府大总统）时，孙文与杨衢云闹翻了脸。由于缺乏会众支持，孙文只得妥协。[5]

孙文知道以兴中会的人力财力难以成事，决定寻求日本人的金钱军火支持。经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ei）介绍，孙文向日商梅屋庄吉推销暴动推翻满清的计划。梅屋乐于见到交战敌国政府垮台，承诺资助孙的暴动计划。[6] 经梅屋引见，孙文面见了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向中川要求军火支持。中川承诺接济，但在给外务省通商局长的报告说：“本月 1 日，经朋友介绍，清国人孙文（西医）来馆。该人如前日所报，正是欲倾覆现政府，需要步枪 25000 枝，手枪 1000 枝，欲求为之筹措。称其党称为兴中会，其中有哥老会员，党员人数难以明言。……孙文说已制定由码头附近运入武器的计划，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行事。……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建独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7]

1895 年春，香港兴中会在广州发动了暴动。弱小的暴动会众无力军事进攻，只是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抢劫，施放炸弹。[8] 这样的暴动为广州百姓痛恨，被政府军迅速镇压。参与暴动的兴中会骨干陆皓东等人被官兵正法。遥控暴动的孙文在暴动被镇压后与陈少白，郑士良得日本人接应乘日轮东渡日本，转赴美国。由于孙文事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络，因此暴动后日本报纸上出现了“中国革命党人孙文”之名。这引起了正想物色中国会党领袖的玄洋社的注意。

在美一年中，孙文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他认定，造反须得列强支持才有希望，默默无闻的青年是不会被理会的，报纸上的“中国革命党人孙文”也不行，需要有中国革领袖的名声，于是决定到英国去，因为他知道在英国从事反清活动是安全的，可以利用英国舆论造就革命领袖之名。1896 年 9 月，孙文抵达伦敦，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去宣传革命。陈少白披露孙文投馆情况道：“孙先生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

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暴动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9]

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拘押孙文之事被报界披露后引起英国各界的关注。英国舆论反对清政府在英国以言论逮捕人。在英国政府和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释放了孙文。获释后，孙文请老师康德黎代写《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被难记》）一书以自己名义在英国出版，在书中称自己是中国革命领袖，是被清政府公使馆诱捕进去的，另外请密友陈少白撰文刊登于《中国邮报》（*The China Mail*，《德臣西报》）吹捧自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中国革命领袖”。[10] 随着媒体对扣留事件的广泛报导，《伦敦被难记》被译成俄、日、中文出版，及陈少白的吹捧文章被报刊转载，孙文缔造自己为革命领袖的策划大获成功。法国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写道：“国父伦敦蒙难获释后在伦敦召开多次记者会，透过媒体在西方世界树立起了‘可敬爱国者’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接着传回中国，帮他完成了向革命军精神领袖和国父的飞跃”。对于陈少白吹捧孙文的文章，香港兴中会的共同创立者谢纘泰致函《中国邮报》编辑部说：“为消除因最近中国驻伦敦公使馆逮捕拘禁孙逸仙造成的错误印象，请允许我通知您：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11] 多年后，孙文在私下谈话中多次承认“伦敦被难”是自己主动走进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宣传革命”的，从而自己否定了《伦敦被难记》中“清政府诱捕”编造。他的追随者胡汉民、戴季陶后来都承认，孙文在伦敦是主动求捕的。

孙文在英国缔造名声时，玄洋社领袖头山满派宫崎寅藏（又名宫崎虎藏，宫崎滔天）、可儿长铗（可儿长一）、平山周三人到中国联络中国会党，为“大陆经略”物色中国会党的全国领袖。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拨出专款资助宫崎等人的中国之行。宫崎等人受命，一时不知如何执行。这时，回国述职

的日本驻伦敦武官宇都宫太郎告诉他们，根据英国出版的《伦敦被难记》一书，中国革命领袖是孙文。于是，宫崎、平山赴香港、澳门和华南各地寻访孙文，于 1897 年 9 月在横滨找到了孙文。大陆扩张派议员犬养毅接到关于孙文报告后说：“这是份大礼物”，指示将孙文接到东京。为不公开孙文的身份，平山周在途中以“中山樵”之名为孙文登记住宿，孙文此后即以中山之名在日本活动，孙中山成了广为人知的名字。

接孙中山到东京后，玄洋社的代表内田良平对孙进行了一番考察。他向孙表示，如果中国革命能够在日俄关系上对日本有利，日本将支持孙革命。孙承诺：“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内田良平对孙的答复感到满意，向玄洋社建议扶植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会党的领袖，[12] 并解释用意说：“吾人赌生命以援助孙革命之所以，以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孙以大义名分、兴汉灭满为革命旗帜，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以故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后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经营大陆之基础。”[13]

听取内田的报告后，犬养毅和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决定为孙中山提供一套住房和一大笔津贴，将孙中山养起来，作为颠覆满清政府的人才储备。犬养指示陆实（陆羯南，时任《日本新闻》主编，东亚同文会骨干）向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提供活动经费。他在给陆的信中写道：“拜启：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指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书不尽意。”[14] 随后，犬养毅将孙中山介绍给了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等日本政界要人。孙中山以同样承诺通过了头山的测试。于是，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改造中国”派将孙中山作为未来中

国政府的首脑来培养，准备利用中国会党推翻清政府，实现向中国扩张的计划。

接受内田、头山的资助之外，孙中山依靠兜售满蒙向日本各界筹集资金。例如，下田歌子被要求提供革命经费时问：“革命成功之日，是否有意将满洲予以日本？”孙中山答：“可也。”下田答：“如此，当不惜尽力”。[15] 有了日本人的经费扶持，孙中山在日本站稳脚跟，得到越来越多的会党来投。他自己生活舒适，娶了日本少女大月薰为秘密革命夫人，大月为孙生下女儿宫川富美子。[16]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日本的革命经历时写道：“结识日本友人，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画也。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自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大石正己）、尾崎（尾崎行雄）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头山满）、平冈（平冈浩太郎）、秋山（秋山定辅）、中野（中野德次郎）、铃木（铃木久五郎）等，后又识安川（安川敬一郎）、犬冢（犬冢信太郎）、久原（久原房之助）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犬冢、久原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菊池良一）、萱野（萱野长知）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副岛义一）、寺尾（寺尾亨）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它间接为中国革命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17]

1898 年，日本秘密策动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玄洋社派孙中山运送军火给菲律宾独立军。孙出师不利，向菲贩运军火的“布引丸”号轮船在浙江马鞍岛外触礁沉没，参与菲律宾革命的活动被迫结束。1899 年初，宫崎寅藏奉玄洋社之命召集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的代表在香港成立了“忠和堂兴汉会”，指定未到会的孙中山为“统领”，成为兴汉会的实际领袖。当年夏，

孙中山在日本与同样接受日本资助的中国会党领袖唐才常讨论了“湘鄂及长江起兵”推翻满清的计划。唐等于年底回国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拳乱中，张之洞捕杀了唐等，维护了南方秩序，挫败了日本人支持的乘乱肢解中国的计划。

日本趁拳乱肢解中国的计划不光在长江流域实施，更在东南沿海大举实施。首相山县有朋、陆军大臣桂太郎制定了乘拳乱出兵厦门，吞并福建的计划，[18] 获明治天皇敕许后向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下达密令，调动军队待命，准备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出兵占领厦门。作为计划行动的一部分，宫崎寅藏、孙中山率领福本成、远藤隆夫等日本军官及兴中会会众由日本来到香港。关于如何实施肢解，内田良平等人主张暗杀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19] 孙中山则主张策动李鸿章在南方宣布独立。日本方面批准了孙的策反计划，孙派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联络，策动李宣布“两广独立”。策动被李鸿章拒绝后，宫崎、孙中山召集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制定了惠州暴动的计划，约定由杨衢云、陈少白等在惠州发动暴动，孙中山负责寻求台北日本当局的军火粮饷接济。根据惠州暴动计划，宫崎寅藏赴新加坡联络康有为共同行动。康有为不耻孙中山投日充当分裂中国的工具，拒绝在北方暴乱时加入日本人肢解南方的计划，向新加坡警察署报警，称来新拉拢他加入暴动的宫崎是刺客。根据康的举报，新加坡警方拘押了宫崎。

9月初，孙中山来到台湾，向儿玉总督寻求军火支持，与儿玉订立了密约。孙以将来革命成功后新的中国政府名义，承诺委托日本管理厦门，儿玉总督承诺支持孙在惠州发动的会党暴动。[20] 双方约定中国会党先暴动，然后进抵厦门，日军随即出兵占领厦门，向暴动军提供武器和金钱，双方共同攻占福建全境，然后进军广东，日本扶植孙中山建立广东、福建独立政府。[21]孙再向后藤新平寻求金钱资助。后藤答复说，厦门有台湾银行支店，地下室存有二、三百万银币，革命军到厦门夺取银币，我可以假装不知。[22]

随后，孙中山在台北设立指挥中心，与兴中会的郑士良、日本大陆浪人日南、平山周（南万里）、山田良政等人组织暴动，以金钱、军火收买洪门首领黄福及嘉应州一带洪门三合会党同意在惠州三洲田发动暴动，约定暴动后进向闽南，等待日本从海上运来枪械。10月6日，黄福率会党依约定在三洲田发动了暴动。随后，河源县的朱罗顷、和平县的曾金养、海丰的洪亚重等洪门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在各自县起事响应。根据计划，日本方面派人在厦门东本愿寺纵火，再以火灾为由，向清政府当局发最后通牒，要求镇压纵火的暴民，为出兵厦门制造借口。这时，有报纸披露出，火灾前寺内日本住持曾搬运私人物品，直指事件系预谋制造出兵借口。

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各国不承认日本分裂中国的计划，向日本发出警告。明治天皇接受伊藤博文等重臣的建议，宣布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山县内阁因政策变化总辞，伊藤博文上台组阁，采取与美、英协调一致的政策，下令停止肢解中国南方的行动。台湾总督奉命停止对广东暴动的支持，并将孙中山在台北的指挥中心撤销。孙中山只得通知指挥暴动的郑士良：“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23]集结在三多祝营地的会党暴动军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军，得知孙中山承诺的日本金钱、军火及出兵泡汤后顿时四散。暴动首领中的日本浪人山田良政在逃跑中迷路，被清军抓获处决，郑士良、黄福等暴动首领逃往香港。

三洲田暴动是日本利用中国拳乱之机肢解中国、吞并粤闽计划的一部分。清政府出手镇压分裂国家的叛乱无疑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多年后，随着革命党当政，作为日本人肢解中国东南计划一部分的“三洲田暴动”竟被颂扬为了“庚子首义”，在庚子年被国人斥为“二毛子”的兴中会暴动会众们被宣传成了首义义士。民国八年，孙中山在广东自封大元帅时，特意为山田良政撰写纪念碑文，称山田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其人道之牺牲，亚洲之先觉，身虽殒灭而其志不朽矣”。这里，孙的说法其实是日本的“大陆经略”、“大亚洲主义”的口吻。

1901年，头山满、内田良平在玄洋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内田良平任“主干”（会长），头山满任顾问的黑龙会，作为向中国大陆扩张计划的执行机关。内田良平曾经访问并致力研究俄国。他认为，日本必须向亚洲大陆扩张，而第一目标是中国满洲，扩张的主要障碍是俄国，日本须立足于黑龙江流域才能与俄国对抗。根据这一构想，他以黑龙江之“黑龙”为会名和会刊刊名，确定宗旨为：“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成立后，日本商界，财界纷纷捐款，支持黑龙会夺取黑龙江地区新领土的事业，政客、理想主义者、激进份子，幕府瓦解后失业的浪人武士们纷纷来投，加入日本的“大陆经略”。从此，日本对中国会党的扶植主要通过内田良平领导的黑龙会执行。

同年，兴中会领袖杨衢云在香港遇刺身亡。对此刺案，后来国民党史家解释为是清政府派刺客所为，但更为可信的说法是孙中山，或黑龙会为了取杨而代之所为。黑龙会决定的革命领袖是孙中山，洪门中声望与资历在孙之上的杨不合黑龙会的要求，必须让位于孙。去杨后，黑龙会采取措为孙中山施塑造革命领袖形象。1902年，宫崎寅藏出版了《三十三年之梦》（《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其中将孙中山吹捧为亚洲英雄、“支那革命大豪杰”、“世界伟人”。不久，该书以《大革命家孙逸仙》之名在日本出版了中文版。同样接受玄洋社和黑龙会资助的章太炎、黄兴、秦力山、柳亚子等中国会党只得服从黑龙会，承认孙中山为革命领袖。秦力山表示不服说：“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24] 他奇怪孙中山是如何在几年间一跃成了中国革命领袖。章太炎的不服在几年后以发动倒孙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二十年后宫崎去世时，孙中山作了《发起宫崎寅藏追悼大会启》，盛赞宫崎是“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绩”。他所言的“伟大之功绩”其实不是宫崎的，而是玄洋社和黑龙会的，宫崎只是按照玄洋社和黑龙会的计划行事，造就他为中国革命领袖。

留日热潮

甲午战败使中国朝野看到了日本维新富国强兵的成效，形成了应当向日本学习的共识。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生13人赴日留学。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出100名官费生赴日留学。拳乱过后，清廷宣布变法，张之洞建议奖励出洋留学说：“非育才不能图治，非兴党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接受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的建议，清廷批准了外务部制定了留学生章程。该章程中规定：凡学成归国者，分别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按等录用；自费留学考试合格即可由政府出具公文保送，费用困难者还可酌情补贴，毕业归国，与官费生同等对待。[25] 清廷还批准了张百熙等人奏请的派“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包括宗室、京堂、翰林以及侯补道府各级内外职官以官费出国游学的具体奖励条款。在清廷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学子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留洋运动。

拳乱中，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军纪良好，不参与烧杀抢掠，在占领区内维护秩序，派兵守卫故宫，经报纸报导，使国人对日本充满憧憬。新政中，清政府以日为师，大量聘请日本顾问，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幅减少，新兴的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加上地理接近和费用较低等原因，留学日本成了潮流。1901年当年，赴日留学生增至500多人。1903年，张之洞制定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继续推动赴日留学运动，赴日留学生增至1300多人。1904年，学务大臣张百熙上奏了《奏请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赴日留学生增至2400多人。

到日本后，有留日学生感叹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26] 当时日本学校派发的《留学生自治要训》让很多留学生颇不习惯，但这些规矩至今仍然适用。例如：不可随地吐痰；不可随地小便；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扬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夏天也不要赤身露体；

进入陈列所时不可随便打听价钱；不可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同住者写信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在室内应坐下、不要徘徊打转；出入房之时应行礼；出入房时要记得关上门户；食物掉落在席上时应拾起放在厨房一角，不能再放回口里；室内要打扫干净；夜间不要大声呼叫；对下女（女佣人）要庄重等等。[27]

因应中国的留日热潮，日本学校设立了专门适应快速拿到文凭需要的“速成科”，即贩卖文凭的学店。速成科通常课堂上配翻译，学制最短能够一个月就拿到毕业证。超过九成五的赴日留学生进了速成科。例如，招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弘文学院有近两千中国留学生，只有 129 人进入了学制的三年正规“普通科”，杨度等人在弘文学院一个月就拿到了速成师范文凭。弘文学院的速成学生鲁迅承认，速成科的留日学生主要忙于“往集会，听讲演”。[28] 留日学生中众多的集会、演讲和汉民族主义刊物的背后是得日本民间慷慨资助的排满运动。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赴日留学生猛增至万余人。1905 年 9 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派了两名教育家来华，与张百熙、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讨论中国留学生教育状况。清政府对拨出宝贵经费推动的赴日留学运动变成了排满革命运动强烈不满。日本教育家则指出：“我国过去派遣学生到西方学习的经验表明，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危险思想，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者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29] 针对留学生现状，张之洞派人拟定了《约束游学学生章程》十条，要求驻日机构约束规范留日学生，要求留日生不论官费私费，无论入日本官立学堂还是私立学堂，均须由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非有病不准请假外出；学生应以学业为本分，不准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对留学生中品行不端者，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即知会该学堂请为斥退，同时还拟定了对归国服务的奖励办法和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授予实职的计划，以鼓励留学生专心学业。

11月，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约束）清国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加以限制，提高了学生注册及入读的条件。规则颁布后，同盟会策动八千多留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当局对留学生的排满革命活动的限制。这八千多速成班学生本来就专注于革命活动，也并不上什么课，罢课只是一种扩大影响的说法。罢课运动中，宋教仁、秋瑾等会党领袖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开展革命。恐怖主义者秋瑾在浙江同乡会集会上以刀插桌，称谁回国后再投降满清就给他一刀。出面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的留学生组织干事长杨度反对同盟会拉留学生入会党阵营的作法，主张抗议活动局限于要求取消《规则》中的第九条（各公私立学校要管束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第十条（各公私立学校不得允许被他校以行为不良命退学的清国人），而接受其它约束规则，反对罢课运动，更反对罢学回国革命的主张。

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抗议行动持续月余，受到日本舆论的谴责。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留学生不务正业，不承认自身的缺点，反而聚众闹事。陈天华对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感到悲哀，反对同盟会组织罢课、罢学的闹事活动。一年前，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回国，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暴动事泄后逃亡日本。黑龙会召集成立同盟会后，他对革命越来越怀疑，对大多数留日学生投身会党从事革命活动失望，决心以自杀惊醒留学生们。当晚，他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次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陈天华蹈海引起日本当局震惊。日本政府对约束规则作了新的解释以平息留日学生的不满。而同盟会则以陈的自杀作为煽动革命的题材，推动罢课退学回国革命运动。其实，陈天华的《绝命书》没有抨击日本政府，认同报纸指责的中国留学生“东奔西走，逞无所之”，“一些留学生出入于酒楼妓馆，恣意游荡，乐而忘返，多有荒废学业，相率而堕落者不可胜计，先来者既作俑于前，而后到者更尤而效之”，他疾呼：“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

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他对学生们投靠外国势力悲愤而死，而革命党们“不见省”，以安排陈的灵柩回乡隆重安葬的方式推动更多国人投身革命。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将陈宣传为革命烈士，只将他鼓吹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文广为宣传，而将他痛心革命党人“放纵卑劣”的《绝命书》隐瞒。

1906年，清政府学部两次颁布条例，收紧出国留学的条件，规定不再公派留学生进日本速成科学学校，日本学部因应清政府的要求和日本教育界的抨击，取缔贩卖文凭的速成科“学店”，宏文等著名学院也大量取消速成课程，至此中国留学青年的“速成科时代”结束。1907年8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十五年协议和《五校特约》，规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等五所最好的正规高等学校每年招收165名中国公费学生。事实证明，张之洞和清政府要求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政府出台《约束规则》正确而及时，张与日本文部省联手结束“速成科时代”对中国留学生有益，也对中国有益。对清廷来说，推动赴日留学运动极其失败。留学生们没有带回专业知识和宪政思想，而是带回了种族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 and 恐怖暗杀、武装暴动计划，成了立宪的大敌。

与留学日本相比，同期留学欧洲的学生只有数百名，多数集中在巴黎。其原因是法国政府补贴使费用相对低廉，以及法国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中心。赴欧洲的学生受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同样偏激。至1906年，巴黎和东京两地留学生中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由于国情差异大，晚清的留学热潮主要流向日本和法国，而很少人赴英美，这是中国的遗憾。中国留学生的流向引起了美国的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认为美国有责任推动中国走向自由、宪政之路，游说政府发起了退还庚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并影响了庚子赔款的其它列强效法美国退庚款。但是，英

美为代表的宪政国家离中国遥远，美国对中国没有野心，不像日本人那样为“大陆经略”投入血本，因此自由、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微弱。

汉民族主义运动

甲午战争期间，宗方小太郎为日军起草了大量中文文告，在其中提出利用满汉矛盾和汉族会党推翻清政府的建议。他写道说：“（满清）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恢复明朝’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征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30]“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31]“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能止于徒手旁观乎？”他建议日本“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指哥老会、三合会、白莲教等秘密会党）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32]宗方因上述分析与建议得明治天皇接见，被日本朝野“誉为中国通之第一人”。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统帅第一军在东北发布了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其中号召：“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33]

按照宗方小太郎的建议，日本朝野支持汉民族主义以推动排满。在日本人资助下，留日学生和在日本中国会党掀起了汉民族主义热潮。1902年，日本的大陆扩张派召集章太炎为首的中国会党和一大批留日学生在横滨举行了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反清复明。随后，《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一大批鼓吹恢复汉族统治的刊物涌现出来。留学生们在日本的图书馆里寻找汉族征服异族、统治异族的历史资料，掀起了再造中国历史的运动。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一是宣扬黄帝为汉族始祖。春秋前文献记载的最古帝王是禹，战国文人创造出了比禹更早的尧、舜；战国后的文人再创造出了比尧、舜更早黄帝。胡适指出：“老子的年代太近，无论怎样把他的年岁拉长，《史记》里有百六十余岁及二百余岁等说法，总还不够老，于是齐学有另寻一位古人的必要。这时候，各家学派都不嫌托古改制，抬出一位更渺茫无稽的黄帝出来，医卜星相，阴阳五行，都可以依托于黄帝……共计黄帝一人名下有书十二类，452篇，此等书的出于六国晚期人的依托，是汉朝学者所承认的。”[34] 战国后的文人创造出黄帝后，华夏各族，如魏、辽、夏、金、元、清等非汉族的王朝也称自己为炎黄后裔。但日本兴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宣布只有汉族才是“炎黄子孙”。1903年，《江苏》杂志率先改光绪二十九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并刊登《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随后，黄帝迅速成为排满的标志，日本人资助的“军国民教育会”设计徽章正面为黄帝像，背面小字为“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刘师培发表了《黄帝纪年论》，提倡以黄帝纪年取代光绪纪年和公元，声称“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革命党人的《黄帝魂》、留学生办的《江苏》等期刊立即以黄帝纪年；《黄帝魂》、《黄帝书》、《猛回头》、《警世钟》等歌颂黄帝“始祖公公”的小册子在日本大量出版；广东留学生领袖欧榘甲撰文称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35] 湖南留学生陈天华在其小册子中呼唤黄帝“始祖公公”“给汉种速降下英雄”，以匡国难，还有刊物干脆宣布汉族为“世界民族第一之黄帝胄裔”。[36] 上述宣传通过反清刊物传播到国内，各地会党开始了将黄帝汉族始祖观念与驱除鞑虏相联系。例如，

陕西的会党开始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活动，在黄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复汉族之业”。

汉民族主义热潮中，康有为批判种族主义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排满论不过宋、明来据夷之旧论而已”；[37] 严复指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排满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38] 最早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指出，煽动排满并不利于中国的进步，鼓吹大汉族主义的“驱除鞑虏”口号与立宪共和的方向背道而驰，在汉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时抛弃曾经鼓吹过的汉民族主义，转向宣传改良。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二是贬斥少数民族。革命党人在日本图书馆史籍中寻找汉族辉煌的证明材料，鼓吹汉族统治少数民族天经地义，其它民族入主中原天理不容。宋教仁在其《汉族侵略史》中歌颂汉族对外侵略扩张说：“集合四百五十余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里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陶成章在其《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一文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则我祖先创拓之丰功，不敢不颂言也”。他吹嘘说：“汉民族既有政治上的帝王豪杰、科技文化上的巨匠鸿儒、也有热心爱国的大义之士……皆世界莫能及。”

汉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三是宣传汉族英雄。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出版了鼓吹大汉族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书。史学家吕思勉指出：南宋立国之初，军事实力没有办法跟金国抗衡，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部队都是群盗纠合，“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平定盗寇尚可，遇到金兵，则非败即遁。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大将们把持军区内财政、人事大权，架空中央。金宋如果交战，中央只能继续容忍大将割据，金宋议

和中央才能收回兵权。议和在当时不可避免，高宗皇帝杀岳飞收国兵权才能勉强立国。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抗金）战绩都是莫须有的，岳的战功长期被夸大，最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39] 宋孝宗继位后为岳飞翻案收买人心，但宋后百年史书鲜有歌颂岳飞之词。明朝，在异族侵略威胁下，汉族文人推出了托岳飞之名的《满江红》词和“还我河山”手书以振奋民族精神，使岳飞成了家喻户晓的汉族英雄。从南宋孝宗开始，历代君王不断加封岳飞，用意不在鼓吹汉族主义，而在为本朝统治作政治宣传。乾隆多次造访杭州岳庙，亲撰《岳武穆论》，道光帝重修岳墓，慈禧太后为岳飞题匾“忠灵未泯”，用意在希望消除民族隔阂。而《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书鼓吹汉族主义。该书在《湖北学生界》刊载后，一场宣扬汉族英雄的热潮在日本兴起，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等汉族英雄传记、小说大批涌现。《江苏》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画像一帧，后录词一阕，推崇史可法“义析春秋、防严夷夏”，第六期载《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称史可法为文天祥第二；《扬子江》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史可法殉难记》；《中国白话报》发表了白话文《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郑的生母是日本人，日本人也称郑为民族英雄）。宣传汉族英雄热潮传到国内，种族主义会党组织大量涌现，陈独秀在安徽搞起了岳王会，陶成章等人在江浙组织了龙华会，在会章规定：“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会党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仪式与各国的民粹组织，黑手党，恐怖组织大致相同。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四是宣扬仇杀满人。运动中，留学生刊物中最具煽动性的是宣传清军屠城的“扬州十日”故事。事实上，明末人口大量减少是“闯、献”造反的祸害。在闯、献和明朝两败俱伤后，清兵入关迅速夺取政权，是历史上流血最少的改朝换代之一。从明末到清末，两百多年来没有“扬州十日”屠城的记载。日本人、中国会党和留日学生们为煽动种族仇恨合

作造假，编出了托名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声称这篇披露清兵在扬州屠城的文字在国内遗失，被留日学生从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发现。《扬州十日记》所讲的清军屠杀八十万汉人（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扬州的人口）的故事在清军火炮与城墙的关系、史可法行军路线、当时扬州城的人口数字、清军的军纪、书中人物的民族语言等方面漏洞百出，将江阴，嘉定降清汉将的屠杀也宣传为满人屠城，完全经不起学者的推敲。[40] 鲁迅记录当时的情况说：“在东京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它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41]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五是骂汉奸：章士钊在其《汉奸辨》一文称：“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满人所谓的汉奸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刊于《民报》的《虎伥遗恨》一文将清初的吴三桂、施琅父子、李光地等人列为汉奸；刊于《汉帜》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一文将与非汉族人交往者皆骂为汉奸，从“召戎伐周”的申侯鄙人一直骂到岳钟琪、纪昀、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骆秉章、沈葆楨、彭玉麟、罗泽南、刘铭传、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鼓吹“谓之杀汉奸也可，谓之杀满人亦可也。”[42] 照革命党人的逻辑，全体国人基本都是汉奸，连他们自己也逃不掉汉奸骂名。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六是宣扬汉族族粹，通过发掘汉族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来宣扬汉族优越。章太炎主持的《民报》、陶成章在东南亚创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均连篇累牍地刊出论述国粹的文章，宣称：“环球诸邦，兴灭无常，其能屹立数千载而永存者，必有特异之学术，足以发扬其种性，拥护其民德者在焉”，[43] 山西留学生办的《晋乘》则将宣传国粹列为“六大主义”之首。

由于人多势众，大汉族主义成了日本留日学生与会党中不容争辩的思潮。最能说明汉民族主义运动之偏狭的是革命党大力宣传的三本排满小册子：

《革命军》、《猛回头》和《警世钟》。在清政府全面革新，推动立宪，国家快速进步之时，三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鼓吹“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休”。小册子出自不久后自杀的陈天华之手并不奇怪，但是否真的出自十八岁的邹容之手颇有疑问。《革命军》曾经革命党理论家章太炎修改，邹容后在上海法庭上说自己书稿被窃，不记得小册子的内容，也不知市上所售之《革命军》为何人所刷印，[44] 让人怀疑是小册子是留日会党煽动仇杀的作品，或是出自日本人之手，托病弱青年邹容之名是为了增加蛊惑性。在黑龙会的支持下，兴中会，光复会等会党将这样的小册子以及《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宣传排满革命的书刊印刷上百万册，运到国内和海外派发给各地的会党。小册子中血腥，混乱的文字对中国的会匪有着强烈的煽动力。清廷军机处向各地方当局发出查禁从日本流入革命书报的电令说：“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潭》、《浏阳二杰论》……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市，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国公法所不许。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形查禁。”[45] 清政府电文所言是事实。这些小册子确实“骇人听闻，丧心病狂”。

日本兴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和排满运动通过在华日租界的排满报刊迅速传播全中国。这时上海的日租界是日本在华推动排满运动的据点。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证明了这一点。《苏报》为 1896 年日本驻沪领事馆创办，转由湖南人陈范接办后仍是日本人在中国扶植排满革命的宣传平台。在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时，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接受日本人资助充当写手，在《苏报》上大量发表鼓吹种族主义、排满兴汉的文章，咒骂清廷肆无忌惮。1903 年 5 月，《苏报》刊出鼓吹杀满人的《革命军》和章太炎鼓吹排满革

命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在文中鼓吹暴力排满，骂光绪帝为“未辨菽麦小丑”，在《革命军》序、《客帝篇》等文中称《革命军》小册子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为动员推翻专制政府的号角”，“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章文和《革命军》小册子“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正在推行各项改革的清廷在舆论管制方面已经极为宽松，但对公开鼓吹杀满人，推翻政府及辱骂皇帝的报纸不得不采取行动，谕令两江总督魏光燾查办。魏光燾命上海道袁树勋查禁《苏报》。躲在租界从事排满宣传的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邹容等人从容逃走。章太炎知道在日租界庇护下清廷奈何他不得，坚持不逃，要在租借地接受洋人审判以扩大影响，并写信给躲在日租界的邹容让其投案自首，相约共赴大义。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上海道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清政府只好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经过交涉，租界当局同意中西巡捕联合搜捕，但坚持此案为“租界之案”，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只好作为原告，在中外联合组成的法庭上对子民提出起诉。经过清政府与外国领事团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后，合议法庭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清政府未达到弹压排满革命的目的，案件审判反而帮助革命党人作了一番宣传，使革命党人更加有恃无恐。章太炎在租界受审的策划成功，一举奠定了革命理论家第一人的地位，成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而邹容在关押期间病死狱中。

1903年春，在《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时，俄国不仅违约拒不撤军，反而增派军队进驻满洲，并照会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任命阿列克塞也夫为远东总督，将东三省划入其统治区域等进一步侵略东北的七条要求。推动对俄开战的黑龙会派人召集汉族十八省商学各界人士在张园举行了谴责俄国侵略东北的“拒俄”大会，顺便煽动反清革命。会后，革命党派人在北京、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召集学生集会，成立了以拒俄为名的反清革命组织。日本政府尚未决心对俄用强，

要求停止操纵中国留学生和会党组织“拒俄义勇队”。根据日本方面的转变，革命党改“拒俄义勇队”之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专门从事策划革命排满，“起义、暗杀”。[46]

清政府所言的“名为拒俄，实为革命”是事实。全国各地的拒俄组织拒俄是假，借拒俄之名组织排满革命党是真。拒俄运动中，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日会党首领以拒俄义勇队名义回国组织排满会党，于 1904 年 2 月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排满会党“华兴会”。作为哥老会的“龙头”，黄兴自任会长。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办矿名义发行华兴公司矿业股票筹集革命经费，承诺革命成功后给予回报，迅速发展了 500 多会众。在穷困的国人中，发行什么革命股票也不可能筹集到收买哥老会骨干和新军官兵的足够金钱。黄兴等人能成立新会党，设立机关，成立教日文的“东文讲习所”以发展学界会众，成立“黄汉会”以发展军界会众，成立“同仇会”以发展洪门会众等等，是因为手中有日本人扶植中国会党的金钱。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刘揆一等密谋在次年的慈禧太后寿辰日发动以湖南哥老会等反清会党为主力的武装暴动，但由于暴动计划泄露，黄兴等人又逃回了日本。同年，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浙江会党也以拒俄名义回国，在浙江等地组织排满会党，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的宗旨与早在日本兴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内容一致，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词。

日本人发起，中国留学生与会党跟风的汉民族主义运动是日本向中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几年中，革命党活动的背后都是日本金钱在推动。在清廷迎合世界进步潮流时，会党代表着专制、倒退的方向。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倒退性质可以从它与会党合流看出。会党的组织、帮规和仪式显示它们与几百年来反清复明的会党相比并无进步。洪门为明末发端于东南沿海的反清复明秘密会党，在清代扩展至全国各地。据说名称中的“洪”来自朱洪武的年号，以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洪门别名、支派众多，著名者有天地会、三点会、三合

会、江湖会、哥老会、致公堂、洪帮、红帮等。洪门各地成员都可以山、堂、香、水命名“开山”，各建名号，彼此不相统属。新入会者须仿照洪门三十六誓：“第一誓诚心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第二誓入会以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烧；第三誓会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第四誓祭旗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五殇；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光复会成立后立即联络浙江、安徽和上海一带的各路会党，组织暗杀满族官员的恐怖活动，陶成章联络了台州宁海伏虎会残余（伏虎山，因制造了焚毁宁海天主教总堂，处死神父和教民的宁海教案而被政府军剿灭）、严州白布会、双龙会、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头目内，洪帮，青帮等会党，徐锡麟则前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缙云等地联络龙华会、白布会、双龙会、洪帮会党。[47]

1904年，孙中山受黑龙会委派，到檀香山去联络洪门。美洲的天地会会党的主要组织是美洲致公堂，其组织庞大，会众数以万计。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拜盟加入了檀香山洪门致公堂，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誓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然后被洪门大佬黄三德封为“洪棍”（洪门军职分洪棍、纸扇、草鞋几等，洪棍相当于元帅）。他向致公堂建议，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并代拟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在其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汉族”口号。当时北美洪门堂口多接受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支持下，孙中山打出“排满革命，重整洪门”的旗号，对各地致公堂会员进行重新登记，争取到了多数北美洪门堂口的支持。

清代，洪门发动了多次反清暴动，都不能成事。其中著名的有朱一贵暴动、林爽文暴动，太平天国时期的陈开、黄德美、刘丽川、朱洪美、朱九涛等暴动。华兴会、孙中山的洪门、光复会与南明以来的反清复明会党的不同之处是，二十世纪会党们得日本朝野扶植，的主要文件来自日本，接受日本的金钱。与中国民间、军中一样，留日学生中也是遍布秘密会党。孙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持有黑龙会提供的革命经费，对留学生和来日本混的中国会党有

不可抗拒的号召力。留学生和会党们纷纷投身革命党，即投身到黑龙会门下。黑龙会以孙中山的名义开办了青山军事学校，从来投的中国会党中选出部分送去军校培养，作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同盟会成立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朝野有识之士一致要求效法日本，实行立宪。日本不希望中国立宪强国成为对手。在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黑龙会加紧扶植中国革命党的步伐，决定将中国各路会党召集在一起，成立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统一的革命党。7月30日，黑龙会召集来自中国十省的七十五位会党领袖和留学生在东京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开会。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人主导着会议，宣布中国同盟会成立，指定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宣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委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48] 8月中，黑龙会再召集1300余中国留学生举行大会，向留日学生代表们宣布孙中山是“中国革命英雄”，“四万万人之代表”。^[49] 8月下旬，黑龙会再召集百余排满团体代表举行大会（同盟会第二次成立会），宣布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宣读了黄兴等人起草同盟会章程（三十条），宣布同盟会总部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为东（设上海）、西（设重庆）、南（设香港）、北（设烟台）、中（设汉口）五个；国外为南洋（设新加坡）、欧洲（设布鲁塞尔）、美洲（设旧金山）、檀香山四个。

作为日本朝野扶植中国会党推翻满清计划的产物，同盟会的基本纲领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来自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期间修改朱元璋《北伐檄文》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之句。^[50] 加入同盟会的中国会党主要是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并不代表多数。孙之成为同盟会总理并非受会众推选，而是因为他迎合了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的计划，被黑龙会指定为革命领

袖。冯自由记录写道：“逸仙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51]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场地，人员经费，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经费均来自黑龙会。不久，黑龙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更名为《民报》，在中国各大城市租界发行，作为宣传排满暴力革命的平台。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推出了“三民主义”理论。他的民族主义重复洪门的“反清复明”宗旨，其诉求是“驱除鞑虏”即驱除满蒙，恢复汉族统治。他讲得明白：“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52] 这样的种族主义理论不给其它民族空间，意味着国家分裂。他的民权主义要点为革命党代表民权。在清廷申明立宪之后接受宪法制约的进步面前，革命党权不受制约的纲领意味倒退。他的民生主义要点为，革命党将会强收私人土地归国有，再由革命党按“平均”原则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53]

1906年，在清廷走向立宪时，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与黑龙会共同制定了武力推翻满清的《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划》、《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八个文件，提出了组织国民军，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独裁军政府的基本方略。《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清朝兵勇条件》和《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基本照搬了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内容。

《革命方略》要求革命党一党独裁，不给其它政党留下任何活动空间。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根据这一思想，西方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益，防止独裁。三权分立是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宣布预备立宪后，清廷决定效仿西方

宪政，即按照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和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准备放弃专制集权，接受国会对皇权的制约和监督。与清廷自愿接受对皇权限制的进步相反，孙中山制定《革命方略》要求革命党权力不受制约，代表着专制对立宪的抗拒，也代表着日本大陆扩张势力策动中国革命，趁乱向中国扩张的“大陆经略”。

在清政府实行变法新政，领导中国深刻变革的几年间，日本人扶植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将它们再联合成同盟会，启动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快速走向共和进程中，同盟会在各省大力发展组织，开山堂接受会众，在各地新军中发展势力，准备会党暴动。得到日本朝野资助，从日本回国的会党领袖们能量巨大，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的光复会，刘静庵在武汉的日知会，焦达峰在两湖的共进会，吴春阳、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井勿幕在陕西的同盟堂，胡瑛、曹亚伯在湖北的科学讲习所均迅速壮大，刘道一等人还趁湖南水灾，米价飞涨之机发动了“萍浏醴”暴动。

日本扶植中国会党搞颠覆的行径违反了它与诸列强共同签署的“不支持殖民地革命的协议”。1907年2月，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停止颠覆活动，将同盟会首领孙中山引渡中国，或驱逐出境。在列强压力下，日本政府嘱黑龙会将公开支持颠覆转为暗中扶植，送孙中山离开日本。根据政府的政策，黑龙会和东京富商重金礼送孙中山离日。孙中山对同盟会组织隐瞒了接受巨款的情况，将大部分礼金带走。孙离日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同盟会成员们得知孙中山带来了日本政府和富商赠款强烈不满，认为日商和日本政府的赠款是扶植反清革命的，而非赠给孙中山个人的，动议撤消孙中山总理职。黑龙会命黄兴出面劝说章、张等放弃罢孙，平息了倒孙（第一次倒孙）风波。章太炎不满黑龙会包办同盟会，宣布退出同盟会以抗议继续以孙中山为总理。

倒孙风波后，孙中山不再参与日本同盟会的活动，转到了越南，仍以在日本弄钱的套路，以出让云南领土主权相承诺，换取了法国当局通过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的资助。有了钱，孙中山在越南设立指挥部，派人到国内收买会党，派黄兴回国指挥，接连在南方沿海策动了“饶平黄冈暴动”、“惠州七女湖暴动”、“钦州廉州防城暴动”、“镇南关暴动”、“钦州马笃山暴动”和“云南河口暴动”等六次反清暴动。黄兴率会党进攻钦州时，法军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以协助暴动军。这些暴动均因策划草率，承诺国内会党的经费、军火没有如数到位而迅速失败。

在清廷推动地方自治，提出立宪时间表，准备民选国会期间之时，革命党们在鼓吹洪门几百年来的反清复明诉求。同盟会将邹容的《革命军》、日本人的《大革命家孙逸仙》等册子大量印刷运入国内散发给各地会党。陶成章拟定的《龙华会章程》代表着光复会、哥老会、天地会、洪门，以及同盟会的诉求。这一章程这样鼓动反清复明：“苦苦到万分，穷的穷到万分。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千分”，“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赶走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如果外国人不帮满洲以礼相待，如果帮满洲，杀他尽绝”，“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不准富豪霸占”，“我们兄弟家所做赶走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众位兄弟同心协力呢？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大都督又有功劳，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新朝廷成立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食禄做官呢，并且还要铸了他一个铜像，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呢，另外若超度等时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到那时候，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在根据《龙华会章程》改定的《革命

协会章程》中，陶成章解释说：“革命就是造反”，“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大唐的，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统制使呢，就是以前的当家”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再规平实》等文中所言代表了反清会党们反对清廷推动立宪的普遍思想。他写道：“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立宪二字，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中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立宪’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害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满人讲立宪，不过以之骗汉人，欲开国会，亦将为敛财计”，“康有为、梁启超之讲立宪，与保皇之宗旨同，乞怜虏廷，以求为赐环计，外则以之炫惑华侨，内亦思以假借为利用，而又兼以欺骗为利用者也”。他号召“行团体暗杀”，“计一举而覆满洲之巢穴也”。可见，革命会党的号召不外是改朝换代，升官发财，仇杀异族，且更加专注于恐怖活动。比较革命党人的纲领与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谁进步谁倒退不言自明。

同盟会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日本人提供的经费对他们有不可抗拒的号召力。这些革命者后来在回忆录中都称为国为民投身革命，而讳谈接受外国资助的实情。不仅同盟会员如此，后来的国、共两党的革命家们也都是隐瞒为接受外国金钱而投身革命的事实。孙中山行医与投书失败后造反的情节与黄巢、洪秀全落第谋反情节大同小异，不同之外是得到外强金钱资助。没有外国的金钱，中国会党不会变身革命党。兴中会百名成员名单中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众多致力大陆扩张的日本要人，同盟会员中有大批黑龙会会员参与。日本外务省出版的《东亚志士录》中记载了上千位参与同盟会和为反清革命献身的日本人名，其中有半数以上是黑龙会成员，说明了同盟会的外国属性。在二十世纪中国，投身革命就是投靠外国势力，这话让读革命史长大的人难以接受，但却是中国革命家们的真

实历程。中国的革命、暴动都是外国金钱、军火所策动，革命党人不过是外强向中国扩张的工具。

革命与改良之争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赴欧美各国考察，了解了各国乱倡民权、暴力革命带来暴政及血腥灾难的历史。他特别被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灾难规模所震撼，在考察后得出结论：立宪对国家人民有利，而暴力革命的本质让愚民、暴民成为统治者，将带给国家和人民祸害。中国新政改革中，越来越多海外保皇党人接受革命宣传，相信革命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等两封著名的公开信，阐述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他写道：“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他驳斥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鼓吹的种族革命说，经过几百年融合，满汉早已平等，革命党的反满口号是“大怪不可解”。

1903年6月，革命党中的理论家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文以革命党在日本编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故事，和清廷杀维新党人作为“立宪更流血”，流血合情合理的论据，将康有为走渐进、平稳进步道路的主张斥为“甘当满人奴隶”。章太炎不讨论西方革命带来长期灾难的事实，

专注于人身攻击，谩骂康有为“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骂光绪皇帝为“载湫小丑，未辨菽麦”。结果，章太炎鼓吹的暴民造反，种族仇杀，及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赢得了多数国人喝彩，章此文后被革命党奉为反清革命的代表檄文。

随后，改良与革命的论战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人之间继续。拳乱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阐述该报的三条宗旨为：一、报纸取《大学》新民之义，因为要维新中国，必先维新民众，中国所以不振，在于民众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将采取中西道德为德育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为智育原本。二、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附从。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创刊号上，他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此后在《新民丛报》连续刊载。《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呼吁国人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国人“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强调“国民”意识对于国家，“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新民丛报》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权利、义务等新思想观念，介绍了西方文明中几百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介绍文章包括：《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派生物学家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等。在《新民丛报》第3号、第4号上，梁启超连续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创设自由政治”，保障国民“自由权”的模范政体。

在宣传“西学”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梁启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批判科举制度和“孔学”，在这方面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划清了界线。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学说变其思想

（欧洲之兴全在于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他提倡思想自由说：“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窒息；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又遭窒息，自兹以来，已经二千多年了”。[54]

《新民丛报》号召青年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和奴性，作具有新思想的“新民”，影响了一代青年。此后几十年的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是在《新民丛报》的影响之下成熟起来的。黄遵宪称《新民丛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胡适说《新民丛报》是代表和创造了时代的杂志，读该报使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梁漱溟回忆说，他十五岁时寻到了整整三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

随着汉民族主义运动在日本兴起，《新民丛报》的影响力逐渐不敌日本人资助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宣传排满革命的刊物。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等刊物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倍增。在《民报》第二期上，同盟会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开始向国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暴力革命学说。革命报刊在栏目等方面继承了《新民丛报》的风格，但在内容方面抛弃了后者追求的自由、宪政、共和目标，“偏于一党”，“为灌夫骂坐之语”，“为危险激烈之言”。

将社会一词及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并不主张社会主义，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逐步改良，维护私有产权，反对暴力革命。1906年1月，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刊载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后将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一书），在其中指出：中国人尚未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而宜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

制，实行君主立宪，待国民的共和资格确立再移植为共和宪政。改良的进程须是逐步的，革命并不能加速改良，而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私有财产被侵犯，私人土地被任意剥夺，私产被收归国有将危及国本，而无助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梁启超的改良主张，《民报》专门发表号外批驳，掀起了论战。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东、刘师培等写手以《民报》为阵地，率领同受日本人资助的香港《中国日报》及上海《苏报》二十多种革命派报刊，连续刊文批判梁启超的改良主张，挑起了一场论战。

革命党人的主张之一是排满，称满人当政是中国衰弱的主因，“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必须武力恢复汉族江山，其它民族接受汉族统治天经地义。胡汉民在论战中称：“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刘师培列举史籍以证明满州不属中国，而是外夷、敌国，以此了证明必须“排满革命”；孙中山骂梁主张改良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称“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55] 对于革命党人的上述论调，首创“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指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也是中国国民，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民族融合，满族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满汉冲突已经不再重要，满族出身的贵胄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已不再只是满人利益的代表，清廷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立宪，主动接受限制权力，走向虚君共和，在这种背景下的排满兴汉说只能挑动民族仇杀，对推动中国进步无益。并且，换一个汉族皇帝并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

革命党人的主张之二是反对立宪。章太炎撰文称：“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汪精卫在其《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两文中提出：“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对革命党人反对立宪的主张，

梁启超指出，出洋考察的结果显示，有无君主并不是民主、共和与否的标志，中国宜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改良，通过君主立宪达到国家富强。

革命党人的主张之三是鼓吹暴力革命，反对和平、渐近的改良，声称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梁启超反对破坏立宪进程的种族革命，反对法国式的暴乱革命，更反对革命党暗杀满人官员的恐怖活动。他指出：“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中国民智未开，如果鼓民气，其结果势必引起暴民骚动和外国干涉。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革命将酿分裂之患，招干涉惹瓜分之祸；“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代价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对梁启超关于“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的警告，章太炎回应：“革命不免杀人流血”。

论战中，梁启超单枪匹马，革命党有黑龙会资助，利用写手众多优势，将《新民丛报》称为“独夫之机关杂志”，将主张“君主立宪”的和平改良宣传为“要专制”，将主张以暴力革命改朝换代宣传为“要共和”，批判梁维护私有产权的主张说：地主占有土地“徒手坐食”，农民沦为佃农是“地权失平”，农民遭受地主的压迫是“人权失平”，鼓吹三民主义纲领，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由革命党将土地收归国有，再行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声称推翻满清皇帝即为实现共和。随着论战持续，革命党人的暴力性彰显，根本拒绝理性探讨与诚意对话，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实施人身攻击。比如，汪精卫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文章标题，未及辩论已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文中指梁启超“不排满者如同汉奸”；胡汉民在以“辩奸”、“民意”等笔名自称汉族英豪，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是满奴国贼。

梁启超感到革命党人是在谩骂而非论战，于是在 1906 年 7 月的《新民丛报》第 83 期上发表了《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革命党拒绝停骂，继续在《民报》上斥梁为“清政府弄臣”、“文妖”，斥《新民丛报》被斥为清政府的御用新闻。梁启超托徐佛苏向革命党人建议“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孙中山拒绝梁的和平论争建议说：“革命与保守，理不兼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1907 年 7 月，梁启超、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以及张君勱等 300 余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政闻社”，宣言四项政纲为：“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宣言提出：“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首最当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政闻社宣言首倡人权保障，将人权的保障和制度变革并列为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在致康有为信中指出：“革命党在东京占极大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举国的革命狂热”是国家的心腹大患，若不尽快实行立宪，革命将不可避免。[56] 10 月，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同盟会不容宣传不同主张的社团，派章太炎在《民报》撰文称：对中国来说“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57] 派张继、陶成章率数百暴徒冲击政闻社的成立大会，殴打政闻社主要成员，打得梁等落荒而逃，再向他们发出暗杀威胁。在人身威胁和经费不足的困境中，梁启超既无力继续论战，也无力维持报纸。1907 年底，《新民丛报》在出版第 96 期后停刊。至此，持续两年的改良与革命的论战以改良派失败结束，梁启超“开发民智”、宣传西学的影响力终于敌不过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宣传。《新民丛报》停刊后，改良派拥护者纷纷投向革命党阵

营，暴力革命、排满的主张赢得了更多青年和各地反清会党的拥护。后来胡汉民在自传中回忆录中就论战结果写道：“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实，同盟会之“全胜”不是胜在论战，而是胜在有黑龙会的金钱支持，胜在黑道暗杀威胁。孙中山口口声声民权主义，民权立国，但连不同主张的和平论争都不容，以暴力和黑社会的手段对付论战对手，显示其民权不过是抄袭西方词句，真正信奉的只是暴力消灭异己。这一点在他统治期间被充分证明。不仅孙中山，革命党人都是如此。革命党们不仅自认有权以武力冲击不同主张团体的集会，更自信有权暗杀异见者。秋瑾、徐锡麟等恐怖主义者不仅宣称要“杀尽满人再图立宪未迟”，还以恐怖威胁对付主张立宪改良的汉人。可见，革命党民权词句背后是专制与暴力。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不敌日本人资助的《民报》，主张和平改良的政闻社不敌诉诸暴力的同盟会，预示了中国改良和立宪运动夭折的命运。几年后，革命党策划暴动推翻了清政府。但是，革命后上台的革命党不得不抛弃其论战中的基本立场——排满、排蒙、“杀尽满人”，证明了梁启超民族同化、“五族共和”主张之正确。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将康、梁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斥为反动。然而，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证明，康有为、梁启超在世纪之初的预见正确：种族革命不能带来进步，暴力革命带来流血、大乱，暴民成为统治者对国家人民是灾难。

革命党人对康、梁的论战留下了恶劣的传统。此后百年，革命党人的文章，论战中传承了同盟会当年的不讲道理，胡搅蛮缠、谩骂、恶毒人身攻击甚至恐怖威胁。当年《民报》论战文章让人明白，革命党的文风大都一样，与暴力革命党之间不可能有讲道理的论战。

第 5 章 载沣当国

摄政与罢袁

拳乱平息后，十八岁的载沣以皇弟身份率团赴德为德使克林德遇害向德皇威廉谢罪，成为满清皇族出访西方第一人。到柏林后，他因谢罪礼仪与德方发生争执。德方要求载沣晋见德皇时行中国跪拜礼，载沣力争说，世界各国使节觐见彼此元首时均不行跪拜礼，若德皇强欲清朝使者行中国礼，传闻于他国，反为德国之耻，获德方放弃跪拜要求。赔罪后，载沣在欧考察参观了军校、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一路谢绝国内各级官员迎送，显示出开放和务实的作风，获各国舆论好评。归国后，他进入贵胄学堂，主修算学、化学、电学等十三门近代课程，用从欧洲自购带回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在日记中记载了关于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等的观测记录，并率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穿西服，被外界认为是代表着新思想。外界的看法没有错。1906 年，在清廷讨论立宪问题时，载沣明确支持了立宪。

1908 年 12 月 2 日，载沣抱着年幼的宣统帝（溥仪）举行登基大典，定 1909 年为宣统元年，颁诏大赦天下。摄政后，载沣树立勤政开明形象，颁布诏书申明：“凡先朝未竟之业，莫不敬谨继述”，“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仍以宣统八年为限，……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迂延，贻误时机”，[1] 要求凡是朝廷交议的有关宪政事件，要首先研究，议复不得超过五天。

载沣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满族王公贵族以军中贵胄少壮派要求“去袁”。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及恭王溥伟力主杀袁，谓“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前一死，在

袁的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2] 奕劻、世续、张之洞等军机大臣坚决反对，谓杀袁或致北洋军兵变及列强干预的严重后果。张之洞力阻杀袁不光是为了袁世凯，也为了自己，因为他也感到了满清贵族的排挤。袁世凯预感到凶险，一面以积极拥戴载沣作皇帝争取载沣的谅解，一面称病躲到天津，投奔亲家杨士骧，并准备远赴日本避祸。

虽握有兄长光绪帝的“诛袁”遗命，载沣最终还是否决了满蒙权贵们的杀袁动议，决定以回籍养病为由罢袁，颁布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朝廷体恤之意。”载沣否决杀袁动议除了因为北洋军集团的反对和张之洞、那桐、奕劻等大臣力阻，还因为他是倾心西方文明的革新者，想推进改革，不想上台后杀改革派领袖。经庆亲王奕劻和英国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出面担保无事，袁世凯由天津返回北京，向摄政王辞行，挈家仓皇离京。官场中人避之惟恐不及，只有杨度、严修前来送行。张之洞在袁离京前叹道：“行将及我，亦自危其势之孤也。”[3]

离京后，袁世凯没有回项城老家，而是到彰德（今安阳）城北门的洹上村，购天津何氏的别墅，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载沣并未对袁的追随者实施清洗迫害。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仍与袁保持着密切联系。袁的老友徐世昌仍旧外放总督、后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幕僚赵秉钧仍任民政部侍郎，儿子袁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袁世凯的罢职引起列强的关注。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唯一强有力的人”，地位无可替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评论说：“随着袁世凯的退休，北京政府中再也没有一个性格坚强，并有知识和才能的人。”革命党人抓住袁世凯被逐事件大肆宣传，称此为满汉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例证以煽动革命暴动。不过，懂军事的旗人铁良同时被逐证明，事件并非满汉之争。

各省成立咨议局

罢袁后，载沣在推动立宪方面与袁世凯同样积极，将陕甘总督升允等几位反对立宪的官吏开缺以表明立宪国策不可动摇。1909年内，载沣连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将袁世凯在直隶的地方自治选举经验推向全国；要求各省督抚（新疆奏明缓办除外）遵守《九年筹备立宪事项清单》规定的时间表，将“筹办咨议局”之事一年内办齐，以1909年10月14日（九月初一）为“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开会之期”；要求各省省城及各府厅州县设立自治研究所，将“城镇乡应办自治各事，演为白话，刊布宣讲，以资劝导”，“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以为地方自治“储备人才”。[4]在载沣领导下，全国过半省区成立了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推动地方自治机构的机构。

宪政编查馆拟出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为自治之初级，诚非首先开办不可”，人口五万以上为镇，五万以下为乡，乡镇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地方自治设为上下两个级别：城镇乡为下级地方自治，限五年内初具规模；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限七年内一律成立，先上级进行自治试点，嗣后再推至乡镇，城镇设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乡董办事之地为自治公所，乡镇自治范围主要限于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以及本城镇乡之慈善。

关于选民资格，《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居民内除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经议事会特别议决可为选民外，必须年纳税或捐地方公益二元以上者才可充当选民。”《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借鉴西方自治与民主的经验，规定以拥有一定财产作为咨议局议员的资格条件，将无业游民，赤贫者，文盲等没有责任感和参政能力者排除出选举。这样的限制在会匪势力庞大的中国对防止义和团式的暴民运动极为必要。因为，地方自治经费主要来自地方公款、公产、公益捐

款，交纳捐税者才关注自治经费的使用，才有参与地方事务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多年后，苏俄引入中国的共产革命以文盲、赤贫者、无业者为乡村基层领导，结果使大批地痞流氓成了基层领导和祸害乡村的恶霸，证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提出的以财产与文化为参选资格的正确。

在教育落后、风气闭塞、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省的首次咨议局议员选举困难重重，存在投票不踊跃，候选人由督抚指派，贿选，个别地方出现了暴力操纵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全国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基本公正。至 1909 年（宣统元年）10 月，除新疆外，各省均成立了省咨议局，共选出议员 1453 人，候补议员 58 人。根据选举章程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实际选出的咨议局议员以士绅为主，绝大多数年富力强，具有科举功名、国内新式学堂毕业学历或留学日本资历，代表着有知识和教养的阶层，其中不少议员还具有从政或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经验。各省议长基本由当地有声望绅商或教育界人士担任。

10 月 14 日，各省咨议局同时召开了第一届会议。根据《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职权为：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岁出入预算事件、税法及公债事件、担任义务之增加事件、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事件、权利之存废事件、选举资政院议员事件，申复议员谘询事件、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之争议事件、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等。各省咨议局会议上，议员们踊跃提出关于地方建设和发展实业的议案，内容包括立法、保护主权、弹劾官吏、发展实业、改革弊政、推动立宪政等等。奉天咨议局预备议案中，实业议案占了四成。各省咨议局会议内容主要围绕推动地方建设与立宪的要务，包括督促改良司法、开办各级地方审判厅、筹办巡警、维护社会治安、建立自治研究所、普设宣讲所、筹措自治经费、教育改革等。[5]

江苏是绅商推动立宪和参加咨议局选举最积极的省份。在议长张謇主持下，咨议局在议事日程、审查提案、议员提议、讨论、表决程序、议案三读通过等方面相当规范，与列强各国的议会已大致相同。广东的咨议局议员选

举中，合资格选民，约有 14 万人，占广东 2800 多万人口的 0.5%，全省选出议员 94 人，其中绅商占了绝大多数。在随后的两年中，广东咨议局共召开常年会和临时会议各两次，形成议案 147 件，内容主要关于地方建设，如筹抵赌饷（筹款以抵偿禁赌带来的经济损失）、改良监所、举办家庭工艺、设立游民教养院、设立教育会、设立劝学所、统一省财政等等。度支部大臣载泽根据广东咨议局的决议奏请广东全面禁赌，获清廷批准实施，反映出咨议局议政的历史作用与末代清政府尊重地方自治的真诚。

新成立的咨议局不可避免处于地方督抚属下的地位。清廷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规定各省督抚与咨议局的关系为：督抚如不同意咨议局的决议可不施行，也可以要求咨议局复议。虽然《各省咨议局章程》尚未赋予立法权，咨议局的决议案对督抚尚无约束力，但已经确立了议会与行政机关相互牵制的架构，对督抚的行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地方督抚对政权之外出现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自然很不习惯，感到碍手碍脚。长期以来，辖区的财政盈余是督抚们的私库，各省咨议局要求督抚们报告年度预决算，接受议员审核，多引致冲突，一些咨议局以停会进行了抗争。咨议局追求成为与省督平等的独立立法机关，争立法权与监督权无可非议，但有些议员们要求改革一步到位，走向了偏激。随着革命党的反清活动的升级，各省咨议局逐渐背离了和平改良道路，部分议员暗通会党，出现了咨议局与革命党、会党合流的情况，显示新生的绅商阶层尚不具备民主与宪政所需的素质。

请愿与逼宫

受革命会党四处暴动的影响，立宪派不满清廷的立宪时间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立宪派领袖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警告“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11 月，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

上海举行了“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决定组团赴京请愿。“请愿国会代表团”启程前，张謇为代表团饯行，告诫代表“秩然秉礼，输诚而请”，“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也不已”，即使政府不能全部接受请愿要求，我辈也对国家对后代问心无愧。

1910年1月，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到京，向都察院递交了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的请愿书，再遍谒亲贵大臣递交副本，寻求支持。请愿书谓“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摄政王清楚，答应在一年内召开国会意味着召开没有民意基础的假国会。他对请愿代表团优礼相待，耐心安抚，寻求互谅，颁布诏书回应请愿代表团的呼吁。他解释道：“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之时，召集议院”。他劝说各省议耐心等待立宪条件具备再开国会，坚持1917年召开国会的“九年立宪时间表”。请愿拒绝载沣的解释，决定扩大请愿规模。张謇致函各省咨议局长，邀齐集北京，组成“议长之请愿团”。

6月，各省咨议局长或副议长率150多名请愿代表到京再次请愿，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咨议局联席会议，成立了“咨议局联合会”，推湖北省咨议局长汤化龙和四川省咨议局长蒲殿俊为正副会长，决定在资政院开幕时提出请速开国会议案。孙洪伊等请愿团代表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其中指责清廷预备立宪“真诚意少，敷衍之意多”。与此同时，“咨议局联合会”在各省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请愿，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学生罢课响应。

请愿压力使清廷陷入两难：坚持按九年筹备清单的时间表实行渐进改革为立宪派、各地督抚所不容；迁就请愿运动的要求，召开没有地方选举基础的假国会无异抛弃立宪计划。在革命党日益严重的颠覆威胁下，清廷只好以政局稳定为要，迁就各地督抚的联名要求，放弃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宣

布将预备期缩短为六年，定于 1913 年召开国会。载沣在上谕中声明：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急亦无可再急。国民应循之秩序，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万不能再议更张。[6] 他向请愿代表说明，国会的设立不可能说办就办，以朝廷所规定的 1913 年召开国会的期限，距现在也只有两三年，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没有就绪。他呼吁请愿者体谅朝廷难处说：“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渎请”，“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壮往则有悔，虑深则获全”。

各省咨议局议长们都清楚载沣上谕中所说的“民智未尽开通，财力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迭之虞”是实话，清楚召开国会须有基层选举基础，需要准备时间，立即召开国会要求不切实际，以张謇为代表的真正立宪派主张在朝廷已经让步的情况下不宜再行追逼，请愿应适可而止，但部分暗通革命党和具有会党背景的请愿代表坚持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以配合革命党人关于清廷立宪为骗局的宣传。他们像革命党一样在种族问题上做文章，抨击官制改革后汉族官僚人数比官制改革前少，将清廷的任何解释、呼吁均指为拖延行宪借口。这时的请愿团已经丧失了立宪所须的和平妥协精神，背离了张謇告诫的“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宗旨，思维与行动均转向了革命。

背离立宪的革命党思维还表现在新开议的资政院中。根据章程，资政院钦选、民选议员各占 100 议席，因新疆咨议局缓办未选出，最后钦定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 98 人。钦选议员为宗室王公世爵 16 名、满汉世爵 12 名、外藩王公世爵 14 名、宗室觉罗 6 名、六各院官员 32 名、硕学通儒 10 名、纳税多者 10 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后，再由督抚复选确定。1910 年 10 月，清政府遵行九年筹备立宪时间表主持资政院开院，资政院议长正副议长由皇帝钦派贝子溥伦、法部侍郎沈家本担任，载沣临院致辞。开议后，留日归来的四十位议员成为提出议案、质问、说帖的主力军和资政院议政活动主导者。根据《资政院章程》，资政院职权为议定国家预算、

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项。资政院的设立是清末筹备立宪，是“庶政公诸舆论”，以“为他日设议院之权舆”的重要步骤。资政院与成熟的现代国家议会虽有距离，但是立宪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然而，留日归来的议员将在日革命党的激进、极端和暴力思想带到了资政院，将资政院的会议变成了抨击清廷的讲堂，主导第一届会议通过了速开国会案和弹劾军机处案。议员们明知资政院开院都过于仓促，立即召开国会条件并不具备，却刻意与激进请愿运动相呼应，将资政院办成了煽动对抗的机关。对请愿运动好言相劝无效，清廷只好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解回籍。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一众督抚支持请愿运动，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会党背景的请愿领袖们针锋相对，举行秘密会议，相约谋求“各省独立”。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南议长谭延闿、四川议长蒲殿俊等人相约，返回各省联手会党暴动，推翻满清政权。至此，绅商议员正式与会党合流，促开国会运动转向了暴力革命。

促开国会运动背离立宪初衷的原因之一是革命威胁。日本立宪没有革命威胁，所以能够成功。而清廷的立宪遇到了宪政国家立宪时不曾有的障碍。在日本朝野扶植下，同盟会大搞暴动和恐怖活动，策划以恐怖暗杀阻止立宪，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计划刺杀从欧洲考察回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严重干扰了立宪进程。受革命党声势影响，促开国会请愿运动转向激进。请愿骨干中鱼龙混杂，立宪公会商绅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会党，推动请愿中带有借机造反的打算。他们中的部分人看清了革命的强势，早早与革命党接通了联系，准备配合起事。在他们带动下，促开国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变了质。

革命党行刺贝勒事败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抨击革命党以恐怖活动阻挠立宪改革的行径，抨击革命党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革命党人都知道，梁所指是孙中山。孙频繁策划暴动，但从不亲身赴险，总是遥控暴动，事败先逃。对梁启超的评论，他无言回应。章太炎乘机再掀“倒孙风潮”，率光复会员宣布脱离同盟会，恢

复光复会的独立活动，致同盟会会众革命情绪低落。同盟会骨干汪精卫决定以亲自行刺的行动来洗刷“远距离革命家”的恶名。在促开国会运动中，他来到北京埋土炸弹行刺载沣，事败被捕。狱中，他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句。载沣认为杀革命党人对立宪不利，可能招致更多革命党人效法，决定以怀柔化解恐怖，将原拟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不对汪等用刑，派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到狱中说服汪精卫放弃革命与恐怖，为清廷效力。在经历了血腥的二十世纪后国人才知道，对颠覆者、刺客最宽宏的政府是末代清廷。

促开国会运动背离立宪初衷原因之二是地方督抚对中央逼宫。日、俄改革的经验证明，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须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充裕的国家财政和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相配合。日本明治天皇在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后才推行维新。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颁布的《奉还版籍令》和《废藩置县令》都在加强中央集权。而清廷自太平天国暴乱开始，中央集权不断衰落，到了庚子拳乱中南方督抚拒绝朝廷“乱命”时，多数省已处于半独立状态，慈禧太后只是靠着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本和督抚互相牵制维持着中央政令通行。财政方面，清廷在庚子赔款后财政破产，靠对外借贷和向地方摊派度日，严重依赖各省上缴。如此困难局面中开始的变法新政在最初几年因慈禧太后的强力领导和袁世凯、张之洞等汉族重臣支持尚能顺利进行。随着革命党的暴动和颠覆威胁升级，清廷的中央权威进一步衰落，中央与地方围绕集权、分权和财政分配的冲突已经难以解决。慈禧太后去世后，中央与地方在权威和财政方面的冲突爆发。载沣要执行立宪时间表，只能向地方摊派改革开支，催地方督抚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1909年1月，载沣颁布《清理财政章程》，要求在全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章程公布后，地方督抚纷纷上书，或婉言抵制，或弹劾本省财政监理官独断专横，使中央这一政令无法实施。随后，清廷再设立督办盐政处，颁布盐政新章程，要求将各省的重要财源盐税收归中央。地方推行新政事项，诸如办学校、办实业、举行地方自治等等大幅增加财政开支，

因此各省督抚反对中央垄断财源，抵制中央垄断盐税收入。由于载沣的中央权威日益丧失，各省督抚不断拒绝中央的财政摊派。度支部尚书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毫不退让，应对中央与地方督抚在财源问题上形成的僵局，载沣颁布了上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7]但中央和地方财政均捉襟见肘，冲突无法和衷共济地解决。

《时报》评论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度支部尚书载泽）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8]

在军事权方面，载沣派弟弟载涛、毓朗、铁良等亲贵统领禁卫军，大力提拔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为军事领导人，任留德国归来的荫昌为陆军部尚书，任留日归来的良弼为禁卫军协统，任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张绍曾、蔡锷等留日归来的青年为各省新军统制（师长，省新军最高军官）、协统（旅长），希望通过亲手提拔将领增加在军队中的权威。1910年春，载沣通告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统一整合全国军事力量，通过海军处电令驻各省兵舰一律听从海军处命令，不得擅离驻地。中央收督抚军权的政策遭到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督抚抵制。李经羲公然电称：如果实行军谘使监视各省军务而不受督抚节制，那就请朝廷将督抚一律裁撤，否则不予承认。在两江、两广、陕甘总督及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巡抚联合致电抵制之下，载沣的军事统筹计划也告失败。清廷推动地方自治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中央权威，包括满蒙督抚在内的地方官员日益抗拒中央政府的政令，纷纷以支持赴京请愿运动的方式挑战清廷的权威。1910年11月，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十八省督抚联名奏请明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这时的联名奏请形同最后通牒，潜台词是若清廷说不大家就支持会党暴动。在地方督抚联合逼宫形势下，莫说是缺乏政治资本的摄政王载沣，就是当国四十年的慈禧太后也无能为力。载沣坚持九年预备立宪期，推动立宪与地方自治等施政没有错，他要求适度加强中央集权，使中央有财力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也没有错。如果人们知道这样民间发动全国

请愿运动在此后百年都不再可能就会明白，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并非拖延，而是相当激进了。

逼宫之后，汉族督抚和咨议局领袖们再借种族问题向清廷发难。1911年5月，清廷颁布了《新内阁官制》。其具体内容为：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设立配合君主立宪制，辅弼皇帝担负行政之责的责任内阁。撤军机处设责任内阁举措是新政以来官制改革的继续，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新内阁官制》构架，是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重大进步。按照立宪计划，各省督抚不再直接上奏皇帝而上报告给内阁，内阁对皇帝负责，受资政院制约，中央权力中心由皇帝转向内阁。载沣提出的责任内阁成员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庆亲王，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民政部大臣善耆（肃亲王，皇族），度支部大臣载泽（镇国公，皇族），海军部大臣载洵（贝勒，皇族），农工商部大臣溥伦（贝子，皇族），理藩部大臣寿耆（宗室，蒙古贵族），陆军部大臣荫昌（满族），司法大臣绍昌（满族），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学部学务大臣唐景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各省督抚学革命党作法，在民族问题上做文章，指责责任内阁为“皇族内阁”，上书朝廷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援引英国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的范例，由要求重组内阁。各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齐赴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联合会，联手资政院以种族理抵制新内阁。清廷拒绝咨议局干涉中央决定权。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在其中称：“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一年来，各省咨议局立宪派组织的赴京请愿团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设责任内阁。清廷缩短了召开国会的准备时间，撤旧内阁，成立了新内阁，基本满足了请愿团的要求。载沣要继续推动改革，就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权威。在汉族大员和地方督抚日益与朝廷离心离德的形势下，载沣任命几个信赖的皇族进入内阁实属无奈之举。事实上，载沣任命的满人

内阁成员中没有保守、无能之辈，都是著名的改革派、立宪派。其中，奕劻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明确主张三权分立、体制改革，在官制改革方案中明确主张立法权属议会，是清廷作出立宪决策，决定逐步放弃皇权的主要推动者；[9] 载泽作为首席考察大臣，是推动立宪的功臣。考察归来后，他派人将从各国搜集的资料辑成书籍数十种，将其中三十种撰写提要，进呈慈禧、光绪，积极推动立宪，将四百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参考，与戴鸿慈一起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等书，向国人介绍欧美宪法和宪政思想，在立宪派和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声望。他在《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日本国运之勃兴”，“国度进于至强”，是因为“其所争者在公家之是非，而不在一己之利害，有政党而无私党，以至诚之心行大公之事，皎然可质于神明”；民政大臣善耆、海军大臣载洵都是贵族中立场鲜明的立宪派，与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出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主张“凡事先交资政院参议”，与度支部大臣载泽等人常激烈争论，代表着国会对行政的制约；司法大臣绍昌是新政中司法制度改革的功臣，主持起草或颁布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等众多重要的法律文件，积极推动在县、府、省设立各级审判厅，各级检察厅则接受法部领属和监督。[10] 载沅任命这样几位积极推动立宪、进步的内阁名单并无不妥，并且他还申明，这届责任内阁为过渡性质，按预备清单步骤，两年后的 1913 年将正式召开国会，届时责任内阁将由选举产生。然而，这时的汉族督抚、汉族咨议局员们抛弃立宪初衷，以阁员种族比例为借口否定改革步骤，指责清廷改革没有诚意，与鼓吹“驱除鞑虏”、“立宪是满人骗人东西”的革命党沆瀣一气。不少立宪派绅商、议长、议员脚踏黑白两道，另一身分就是会党。他们看清了清廷权威衰落的趋势，早早已与会党、革命党联络，准备加入造反。立宪派与会党黑社会搞在一起，立宪断无成功可能。在地方督抚和各省咨议局的联手通牒面前，清廷被迫步步退让，中央权威尽失，各省督抚抵制中央日益变本加厉。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纷争从来都存在，如果仅是权力划分和财政问题，清廷还有寻求美英列强支持继续推进改革和立宪的可能，但在地方督抚的挑战和革命党的颠覆威胁互相响应，互相利用的形势下，载沣正确与进步的改革计划注定失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史书称清廷组“皇族内阁”是爆发革命的一大原因。实际上，载沣摄政以来的举措均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之举。武昌暴动后，载沣解散了“皇族内阁”，让袁世凯组阁。袁世凯在组阁中排除了皇族，革命党并不因此放弃推翻清政府的计划，袁世凯之后的民国政府排除了满人，革命党依然坚持要推翻政府。可见，反对“皇族内阁”只是造反借口。

第6章 辛亥革命

会党泛滥

清代，全国人口从清初的一亿暴增到道光年间的四亿多，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清廷继续实行海禁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失业农民没有出路，纷纷投身会党。当时奏折中这样报告会党情况：“夫会匪者，其初固无业之游民耳。无业则游荡，游荡则无赖，无赖则凶横。无业则饥寒，饥寒则贼盗，贼盗则奸宄。会匪者，凶横奸宄之所聚而成也。”^[1]会党与黑社会、土匪无大区别，其生存均是以非法所得为主要来源，成为社会的毒瘤，严重威胁着社会安定。清末，会党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山堂林立，各霸一方，开设香堂，霸占码头，勒索绅商，迫使不少绅商加入会党以求保护，土匪、会党普遍合流，主流社会黑社会化。

陶成章介绍会党情况写道：“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两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一名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以及种种之诸教，皆为白莲教之分系。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之支派。”^[2]天地会系乾隆年间五位南明遗臣（后被尊为五祖）在福建云霄县创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其三十六条誓之第一誓为：“自入洪门以后，须孝顺天地，奉敬神明。但看清朝江山改变，转朝之日，众英雄举起旗号，兴兵同心合胆，夺回明主江山，登基龙位。如有不依，五雷诛灭”。两百年间，天地会发展出了三点会、三合会、小刀会、仁义会、江湖会、串子会、汉留、忠义会、公议会、情义会、面子会等众多派系，其中仅在江浙支派就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会、贬私

党，关帝、玉泉、千人、古城、红旗、黑旗、白族、白莲等等。[3] 天地会要求入会者要交三十六之数的会费，取三六一十八，代表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意。天地会众互称兄弟，两百年来发展出一套高度机密的互相识别暗语和手势，会内流行“开口不离本（指天、地、人、神、祖五本），出手不离三（以取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茶烟俱用三指）”口诀，对上了暗语就是自家兄弟，须接待食宿。其暗语“打鹧鸪”（拦路打抢）也与土匪无区别。三合会为洪门的一支，取天地人合一之意，据说由广东籍肇庆人士严贵邱创立于嘉庆年间。入会仪式与天地会大同，要摆上香案拜关二哥，斩鸡饮血酒结盟。三合会“首领称总理、元帅或大哥，以下有香主或二哥，白扇或三哥，再有红棍，最下级称草鞋”。[4] 哥老会（红帮）也发端于乾隆年间，太平天国暴乱期间在湘军内迅速发展。攻陷天京后，三十万湘军被裁撤遣散，难以归农，以非法活动谋生，蔓延各省成为规模最大的帮会。哥老会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特点，也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与义和团一样敬五祖、关圣、桃园结义、瓦岗寨、梁山泊、少保忠武王岳爷爷、杨再兴、牛皋等众多偶像，会众结为兄弟，首领“龙头”对会众享有绝对权威。青帮是清代三大帮会之一，其渊源比天地会，哥老会要早。道、咸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造成了江浙一带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数以万计的水手纤夫聚集在两淮盐场，与当地青皮结合，以贩私打劫为业，多成为青帮会众。[5]

遍布大江南北的会党有一些共同特点。特点之一是专制残酷，视杀害异己为天经地义。例如，天地会会仪式有“歃血、饮酒、钻刀”的拜盟程序，先向“五祖”牌位跪拜，再从刀剑下钻过，然后立誓：“入会后如有异心，死于刀下”、“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如若悖盟，刀下身亡”、“如有负心，不得好死”、“不忠不义刀下亡”等等，各人姓名开单焚化，斩鸡头后取血滴入酒内分饮以壮胆气；洪门二十一则中规定，私行毁坏香主之声名，或对香主作邪曲之言语者，剝其两耳；入会后一月内不纳会费者，剝其两耳，并加笞七十二下；洪门十禁中规定，不可私授外人以会章，犯者处死；洪门十刑规定，无事诈为有事者，笞一百八等等。会党的残酷专制可从洪门入会仪式中得到

反映。新会员须由老会员介绍，介绍人问：“进我会后，为敌人所知得杀你，犯我会条款亦杀你，你愿意吗？”答：“愿意，决不连累兄弟。”盟兄告诫洪门的十条十戒、三十六誓、七十二例、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后问：“你如违犯了条款应当怎样？”答：“死于刀枪之下”。盟兄令管事斩凤凰，管事斩鸡后喊：“有如此鸡！”[6]会党特点之二是体现游民思想，其特点一是无所谓是非，反对秩序，期望天下大乱。拳乱中，南方会党与北方拳匪遥相呼应，围教堂，杀教士，发动暴乱，只是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南方的封疆大吏采取了东南互保，出手镇压，才使得南方免于会党暴乱。会党特点之三是不择手段，其弄钱方式与历代强盗、各国黑社会没有区别，生计主要靠贩私盐、贩鸦片，开场聚赌，经营妓院、烟馆，贩卖人口，绑票勒索，抢劫敲诈等等，毫无正义性质。庚子拳乱后，北方会党被大批剿灭，南方会党因局势稳定而更加蔓延。例如，哥老会在湘鄂黔蜀赣等省势力遍布州县，山头人数少则百人，多则数万，很多地方从官到兵均被会党控制，入会者从流氓无赖到官员绅商学界，无孔不入。时人描述会党泛滥的情况为：“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梟，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8]“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9]“沿江之九江、安庆、芜湖、大通、金陵、镇江、仪征、瓜扬一带，五方杂处，往往藏垢纳污……哥老会匪、安清道友，遗迹诡秘，支党蔓延”；[10]以湖南为例，哥老会山堂林立，派系错综复杂，主要有金龙山、腾龙山、泰华山、锦华山、金凤山、天台山等，每个县均有山堂，先后出现王秀方、马福益、龚春台、焦达峰等四位省内“龙头大哥”级的首领。在闽、粤，主要会党势力为的三合会，在皖、豫主要为“大刀会”、青帮，直隶山东主要有“在理会”、青帮，上海等地主要为“青帮”。在“广东惠、潮、嘉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11] 海外会党情况与国内大致相同，华侨十之八九加入洪门，仅美国旧金山一地就有二十多个洪门堂所。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旅英华侨挂名致公堂

者逾十万人。”海外洪门的生存依靠商人成员捐献之外还有“卖猪仔”，收保护费等黑社会收入。

会党虽然人数众多，遍布各地，但门派复杂，无统一的组织，互相隔阂，只能扰乱一方，不能形成政治力量。然而，庚子拳乱后情况不一样了。日本玄洋社、黑龙会扶植孙中山为会党革命领袖，召集中国各路会党成立了以颠覆清政府为宗旨的中国会党的联合阵线——同盟会，将各路会党联合到了革命与排满的旗帜之下作为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使中国会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同盟会、光复会也是会党，也具有会党的上述特点，也以恐怖暗杀为反清和消灭反对派的手段，也期望天下大乱，例如会党团体文学社（后武昌暴动的发起者之一）的《大江报》所刊《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它们也是为了弄钱不择手段，例如，两湖会党领袖焦达峰、居正等人或盗金庙里金菩萨，或对有钱人下蒙汗药，江浙会党领袖徐锡麟、陶成章等人谋抢银行，或计划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然后一举歼灭。[7] 海外会党同样不择手段，其特色是组织革命公司，邀引信众入股，承诺革命成功后分钱。

黄花岗暴动

同盟会成立后，中国各省的会党领袖穿梭往来于日本中国，策动种族革命。在各省代表赴京请愿运动高潮中，同盟会在广州两次策动暴动。第一次新军暴被镇压后，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及南洋、东南各省代表策划第二次暴动。1911年4月，黄兴，谭人凤、朱执信，陈炯明，赵声等同盟会首领在广州再次发动暴动，率会众攻入总督衙门，迫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纵火焚烧了总督衙门。清军击败了暴动军，黄、朱等暴动骨干逃到了香港。清政府将七十二具暴动者遗骸收殮合葬于城郊红花岗。

几年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时下令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树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随后国民党将此次“黄花岗之役”暴动宣传到

家喻户晓。但历史事实是，黄花岗暴动是日本操纵的，暴动军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雇佣军，经费、军火来自日本。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同盟会的两次广州暴动均是日本阻挠中国立宪、颠覆清中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既非正义，也非进步，更与爱国无关，中国人没有理由纪念这样的暴乱。国民党大力宣传、纪念黄花岗暴动是为了掩盖自己作为日本雇用革命党的起家历程。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发起了日本同盟会第二次“倒孙风潮”，要求撤孙中山，改选新总理。虽然得黑龙会帮助保住了总理地位，孙中山也只好离开玩不转的日本同盟会，被迫到南洋另起炉灶，成立独立的新组织，只是沿用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会南洋分会。倒孙不成功，章太炎、陶成章抛弃同盟会招牌，在东京以光复会名义活动。在此同盟会总部人心涣散之时，宋教仁吸取孙、黄在边陲举事多年失败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效仿法国大革命，攻占北京，实行中央革命，然后号令全国；中策是召集长江流域各省庞大的会党势力在中部举事；下策是孙、黄长期坚持的边陲暴动。他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不宜扩大”。在日本同盟会群龙无首的形势下，他提出成立独立的新会党组织以领导中部的革命，获得同盟会各分会负责人的一致拥护。在各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多数人主张抛弃同盟会之名。宋教仁也想抛弃同盟会旗号，但他知道，同盟会是黑龙会的机关，抛弃同盟会将失去黑龙会的支持，于是决定新会党沿用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于右任、陈其美等一批苏、浙、皖、闽、湘、川、滇的同盟会员在上海举行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宋教仁制定的在中部各省暴动的计划，发表宣言指责旧同盟会总部“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指责孙中山“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混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声明另立新组织是因为广州暴动失败后总部领导人“一以气郁身死

（指因游说南洋同志抛弃孙中山的路线而被胡汉民毒死的赵声），一以事败灰心，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迫于情之不能自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声明中部总会独立行动，废除总理独裁制，“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12] 会后，中部总会派成员分赴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设立分会，策动新军暴动，促成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为中部暴动奠定了基础。

保路运动

甲午战败后，中国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从此陷入财政困境，只能靠向列强借款维持财政。当时，清政府可用作向列强抵押的只有修建铁路的路权。路权抵押借款合同通常规定，如果清政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铁路所有权归外方所有。因此，对外借款的历程也就是出让路权的历程。庚子拳乱后，《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更大，清政府财政破产，只得继续以路权抵押借款。从《马关条约》到预备立宪的十几年中，列强通过合办或贷款取得了万余公里的中国路权。其中包括：俄国修建的东省（东清）铁路（满洲里到旅顺，全长 2,500 多公里）、法国修建的滇越铁路、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日本修建的安奉铁路、京汉铁路（芦汉铁路，1904 年比利时贷款获路权，后俄、法加入组合股公司）、正太铁路（太原至正定，法国巴黎银行取得贷款权修建）、关内外铁路（京奉铁路，英国与俄国激烈争夺后夺得修建贷款权）、沪宁铁路（上海至南京，英国贷款获路权）、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英、德资本集团贷款获路权）、沪杭甬铁路（英国贷款获路权）、广九铁路（英国获贷款权修建）。

拳乱中，义和团以大肆破坏铁路发泄仇洋排外情绪。拳乱过后，国人明白了铁路之利，开始想自己建铁路。1903 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新政热潮中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国内绅商集资建铁路。

商部、户部、外务部赞同锡良的奏请。清政府顺应绅商的呼吁，决定停止执行出让川汉铁路修筑权换取英国贷款的计划，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改变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铁路的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商办铁路，宣布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华人投资 50 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给予奖励。[13]

1904 年，四川成立了半官半商的川汉铁路公司，打出爱国旗号向百姓集资，在集股章程中声言：“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在粤汉铁路方面，清政府向英国借款 675 万美元，以原借款额近倍的高价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了 1898 年出让的粤汉铁路路权以支持粤、湘、鄂三省绅商自办粤汉铁路，任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定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会后，三省绅商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款。在苏杭甬铁路方面，清政府支持浙、苏两省商民自建杭州至嘉兴段铁路，两省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筹款。几年中，清廷先后收回了粤汉、川汉、苏杭甬、津浦等铁路路权和部分已经出让的采矿权，各省绅商成立的十几家铁路公司自建铁路。

各省督抚和绅商只看到列强建铁路赚钱，不懂得自身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三方面都不具备建铁路的资质。资金方面，商办铁路公司宣称不招洋股、不借洋债。实际上，外国银行或公司不会借钱给毫无信用的民营公司。不借洋款，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来源只有靠“官股”与“民股”筹资。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均破产，绅商没有雄厚资本的情况下，所谓官股、民股、商办等等都是痴人说梦。商办铁路公司的实际运作是由各省官府以“按亩派捐”，或在税收项目下附抽米捐股、土药股、盐茶股，房捐股等等向穷困百姓强制摊派搜刮。例如，湖北咨议局决议提出的拒洋款方案中包括，强迫房主以两月房租收入购买铁路公司股票，开设铁路彩票，向各县摊派五至十万元购股，向全省教育会成员摊派薪俸十分之一购股，向各地商会、军人会、及其它团体购摊派股份，声称可以集资数千万元。[14] 尽管各省当局以办铁路的名义

想尽办法向民众摊派、搜刮，无奈百姓穷困，各商办铁路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均不足建路所需的两成。在技术方面，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声言不聘洋技师。但国内除了詹天佑之外全无有合格的工程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各省铁路各自为政，对重大技术问题完全无知，既无统筹规划，又无设计能力，根本不具备建铁路的资质。在经营管理方面，半官半商的铁路公司与洋务运动以来所有官办企业一样，任人唯亲，缺乏监督机制，各铁路公司筹集到的股本都因挪用、贪污呈巨额亏空。其中亏空最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四川、湖北间的川汉铁路改由商办后实际集资不及建路所需资金一成，所收股款账目混乱，被经办人员层层贪污挪用，其中在上海招股收到的 300 多万两股款存放钱庄亏空了 200 多万两。

经过几年铁路商办，标榜爱国的收回路权民间商办的灾难浮现。各省商办公司建路全无进展。川汉铁路公司只建成几十公里运料车通行的路，对外谎称是建成的铁路。粤汉铁路司的情况与川汉铁路公司大同小异，高层职员浪费贪污严重，在铺设了几十公里不合格的铁路后，1600 万元实收资本金就花去了约 1000 万元。几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向当地民众每亩加捐搜刮来的股款被挥霍、侵吞得所剩无几，公司资不抵债，信誉扫地，造成民怨沸腾。

在清廷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推行铁路商办时，先进国家都已认识到铁路事业国有化的重要性，德国、俄国、墨西哥、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都在实行铁路国有化。梁启超在《外资输入问题》一文中批评铁路商办政策说：拒洋款“既不衷于学理，又乖于史实，徒为识者所笑。”^[15]曾大力支持铁路商办的杨度在反省后向邮传部上书坦承，商办后，粤汉铁路三省各自为政，不仅没有建成铁路，反而陷入纠葛。这样下去耽误的不仅是铁路建设本身，更是错失发展机遇。他建议效法先进各国，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向外国银行借款筑路。国内舆论界也开始抨击铁路商办政策。《商务官报》指出：“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非但无益，反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

优。”[16]《东方杂志》指出：“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筹款的艰窘而论，铁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毕，而政府是没有时间去等的”。

清政府意识到了商办铁路政策有误，于 1908 年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负责研究先进国家铁路国有化的经验及核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收支。盛宣怀是朝臣中最懂实业者，对商办铁路几年带来的问题最为清楚。他在邮传部奏折中指出：欲使铁路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全力，断难办到。数十年前，德国民间亦要求自办铁路，聚讼多年，一路不成。德国政府认识到如此重大要政，决不能因民间牵制而受到耽误，于是决然定策，铁路路权全部收归国有。如此才有今天德国铁路的四通八达。民办铁路有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各省商办铁路如能集款兴建，至今六七年也多少应有所成就。粤汉铁路赎回已有三年，商办筹款一无成效，湘、鄂两省设立拒款会，鼓吹不借外债，筹款自办只是徒托空言。事实证明，那些主张铁路商办的绅商们清谈误国。由于民办铁路缺乏国家控制，经理之人结党营私，虚不务实，将从老百姓处搜括来的巨款虚糜坐耗，甚至侵挪倒账，结果是“路工濡滞，耗费浩繁，皆出意料之外”。铁路不能完工，则所入必不能敷所出，亏损必使民众受苦，“是欲利地方，而适所以害地方也”。按目前拒款摊派的办法，即使再过三十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铁路。向外国借债虽然并非万全之策，但是对现实财政困难，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国，只有靠政府出面举债与统筹。在开矿、修建铁路等兴利事业中，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订合同时“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洋款办事业利大弊小，是可行的。根据上述分析，他建议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17]

接受了梁启超、杨度、盛宣怀等人的意见，清政府得出结论：各省绅商没有能力建铁路；铁路必须由政府统一协调；中国经济与商业不发达，国内资金缺乏，无法从民间筹集到足够的铁路建设资金，建设铁路只能向外国银行举债；外国银行不可能巨额贷款给任何私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和信用为

铁路事业举债；从贷款建路还本付息的情况看，国债用于铁路事业可以十几年偿还本息；为避免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中国应效仿俄国、日本、德国、墨西哥等国，将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贷所需资金，并聘请西洋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建造铁路。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国有，“由官借款”，“准商民买股”的政策。据此，张之洞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五厘起息）用于粤汉与川汉铁路。清廷尚未批准借款合同，张之洞在各省反对声中带着未能建成粤汉铁路的遗憾去世。1910年7月，清廷在各省反对铁路国有的浪潮中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负责推进铁路国有的既定国策和对外借款谈判事宜。在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所定铁路借款草约的基础上，盛宣怀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代表进行了二十多次艰苦谈判，向四国争得了中方在借款期间有权将借款之半数存于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原先规定只能存于四国银行）、删除了四国有权参与建造的若干枝线条款等项重大让步。1911年5月，清廷颁布了“干路国有、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的上谕，宣布废除推行六年多的商办铁路政策，将全国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收为国有。上谕指出，以往路政，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导致路政的错乱纷歧，在粤“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川“倒帐甚巨，参迫无着”；在湘、鄂“设局多年，徒资坐耗”，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愈深，后果何堪设想。收路谕旨颁布之初没有受到强烈反对。在四川，总督王文韶认为停止收取租股以充铁路建设款可以减轻人民负担，表示支持。在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讨论铁路国有上谕的大会上，与会者承认商办公司建铁路陷入困境，铁路工程耗资巨大，靠收取田租入股杯水车薪，三十年也修不成，同意政府收为国有。

紧接着，邮传部公布赎买商办铁路公司股民股票的具体办法为：对亏空不太严重的湖北、湖南公司按两省商办铁路公司股票的面额，以国家保利股票换取商民持有的商办铁路股票；对亏空已经过半的广东铁路公司股票，从优发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对于亏空最

严重的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以国有铁路保利股票换回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已用于铁路建设的官股和民股部分，对尚未使用的股款由股东决定取回股本或换取国有铁路保本股票，对因管理不善造成的近千万元亏空（四川商办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 1400 万元股款，其中近千万元股款已被公司经理作投机生意亏掉）由股东自负，政府不予补偿。应当说，清政府的上述出价对于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几省商办铁路公司股民十分优惠，合情合理。

赎买办法出台后，全国各省对此政策态度截然不同。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一致认为国有政策对富强国家有利，支持政府的国有政策；而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因本省的铁路公司已经破产，期望通过煽动民众起来闹事迫使中央政府替他们填补亏空。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对商办铁路资金不足、管理困难与缺乏统筹等三大弊端同样清楚，但为一己私利，向民众隐瞒巨额亏空，以刚刚成立的咨议局和资政院为煽动民众的机关，继续推出“拒借洋款，万众一心筹足两千多万建路款”等决议，组织成立“拒款会”，声称向外国银行借款筑路是丧失了主权，继续以爱国主义口号煽动民众入会捐款，为破产铁路公司填补亏空，欲借民众反对力量迫使中央财政为商办铁路公司填补亏空。民众不知道众多国家向外国商业银行借款筑路强国的成功范例，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成为闹事的工具。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的亏空最大，公司股东们反对政府收路办法也最为激烈，要求中央政府为公司补亏空。会后，公司主要股东邓孝可在自己办的《蜀报》上撰文说：“今政府此举，就吾川人言之，尚不无小利。故就愚见所及，吾川必欲争川路商办，甚无味也。以交通便利言，则国有自较速；以股息之利言之，则商办亦难期。况吾川路公司成立之性质，记者始终认为谋交通利益而来，非为谋路股利息而来者，故曰听国有便。但要求政府把几年来已用去之款与上海损失之款，一并用现金偿还。”^[18] 与此同时，在京请愿的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向朝廷递交了四川绅民的请愿书，抨击盛宣怀制定的对四川商办铁路公司的赎买办法。

6月初，盛宣怀和邮传部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申明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无权慷全国百姓之慨替四川商办铁路公司弥补投机失败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政府将只赎买四川公司已用于铁路建设和公司结存的款项，不会替四川公司填补亏空，催王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川省绅商和咨议局拒绝接受中央政府不补亏空的补偿办法，拒绝政府派员查看账目，以“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的说法煽动民众请愿。

清政府不接受川商的无理要求，继续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一千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将《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湘、鄂、粤、川等省。与张之洞 1909 年所签草约相比，盛宣怀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借款合同争取到了更有利的条款，包括：5%的低利率（国内钱庄利率高达 12%至 15%）、不以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而以百贷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中方委任总办或督办、优先使用中国原材料、中方拥有对采用贷款国产品与原材料有监控权、贷款四国银行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等等。盛宣怀在奏折中报告：在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是唯一的选择。雇用有经验的外国工程师有利于避免返工，保证工程质量。拒款派要求拒聘洋人工程师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说明借款谈判之艰难及合同之有利说：“以上各节，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只要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三年内接通，则十年内可以还本。并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四省的绅商领袖们知道，逼中央政府为自己铁路公司补亏空的打算摆不上台面，不约而同地将敲诈政府的动机向民众隐瞒，以指责盛宣怀借洋款卖国来煽动民众闹事。邓孝可在《蜀报》再发表题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文章，煽动说：“今直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外，更以两湖财政作抵。

我自信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邓与罗纶、刘元声等地方名流联名，抨击盛宣怀说：“一为卖路，二为路线给了外人，三为用款规给了外人，四为工程规给了外人，五为购料规给了外人，六为利息规给了外人，七为夺诸国民，送给外人。斥盛宣怀卖路，借款合同丧尽国权”。[19]

6月中，四川铁路公司的几位名流绅商主要股东召开股东大会，煽动民众说，川路为光绪皇帝批准川人自办，不能收回国有，四国银行条件太苛，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如不同意，川人将死争到底，并在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以“路亡国亡，路存国存”的口号号召鼓动川民起来“破约保路”。会后，罗纶、邓孝可等人再召开万人保路集会，演说称：“川汉铁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国也完了”，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赴京请愿。咨议局首领们散发了《保路同志会公启》，以光绪牌位为招牌，号召“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在煽动之下，现场民众跟随痛哭，痛哭使更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加入闹事。保路同志会控制的《蜀报》等川报以清廷“不但夺路，并且谋财”的说法煽动民众对抗政府，将盛宣怀艰苦谈判争取有利条款，与四国银行达成的借款合同指为“卖国契书”，将整个事件宣传为清政府从川人手中霸占路权以讨好洋人。在北京资政院，以萧湘为代表的川籍议员与川省咨议局遥相呼应，以爱国口号煽动民众闹事，逼迫中央政府替川省铁路公司填补亏空。

因川省搜刮被动成为铁路公司小股东的民众和青年学生不了解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商办铁路的种种困难、弊端，愚昧地认为借款应该没有抵押的，抵押借洋债，与洋人签合同，聘洋工程师，给外人以优先购货权等等即是卖国，他们不了解上层绅商为一己私利煽动暴乱的动机，抱着与义和团拳匪一样的仇洋心理，被上层绅商煽动起来，成了奸商制造动乱的工具。为了私利，上层的川省绅商名流、咨议局议员，在京的川籍资政院议员们开始联手会党

计划暴动。川省会党早已与同盟会串通，准备造反，在与绅商串通后立即以“保路同志会”名义公开活动，会众迅速发展到了二十万人。

在川商煽动暴乱的形势下，王人文连发两电，请求朝廷答应川民要求，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并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盛欺君误国之罪。对川商和川省的要求，盛宣怀坚持认为，铁路国有政策和补偿办法有理有据，利国利民，在现实国家财政破产的情况下，政府对各省已破产商办铁路公司的赎买办法合理而优惠，是最能保障商民利益的办法，政府没有理由接受绅商的勒索。摄政王同意盛宣怀的主张，认为国库没有理由替川省商办铁路公司补贪污舞弊造成的亏空，决定继续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下令将王人文革职，派赵尔丰接任川督。

赵尔丰到任后试图以安抚化解冲突，两次亲莅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股东爱国可嘉。川省铁路公司股东会坚持要求政府按全部集资额赎买他们手中的股票，实际要求中央政府为弥补他们的投机贪污亏空。赵表示无权答应，川路公司主要股东于是发动成都及周围州县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在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和光绪“铁路准归商办”上谕，鼓动民众号哭。为平息本省动乱，赵尔丰只好与王人文一样，请求清廷改变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清廷重申拒绝为四川商办公司弥补亏空，要求赵尔丰维护秩序。此时，原反对国有政策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转变立场，认为要求政府填补亏空过于无理，主张将川路余款纳入国有路款。邮传部奏请派李稷勋继续管理宜昌分公司，摄政王立即批准了邮传部的奏请。任命消息传到四川，保路同志会一面宣传“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川人必誓杀此二贼”，一面联络会党准备暴动。9月7日，赵尔丰拘押了蒲殿俊、邓孝可、股东会会长颜楷、张澜等煽动闹事的保路同志会首领。“保路同志会”纠集万余成都民众冲击总督衙门，造成流血冲突。绅商控制川报再以“成都血案”的报导进一步煽动民众暴动。同时，川省咨议局，“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会匪哥老会合流，改同志会为同志军，联合发动了武装暴动。

保路同志会煽动暴乱的同时，湘、粤、鄂铁路公司也在煽动暴乱。湖南咨议局领袖们本来就有会党背景，经同盟会联络与会党制定了联手暴动计划。川乱中，湘省铁路公司股东一面煽动民众到巡抚衙门请愿，一面联络会党会武装暴乱，杀害了清兵二十多人；粤省铁路公司煽动商民罢市请愿，不用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湖北绅商咨议局议员们煽动商民闹事，同时与会党首领张伯烈一起策划暗杀建议政府实施铁路国有的杨度。对川、粤、湘、鄂四省对抗国家政策，云贵总督李经羲指出：滇、黔、桂支持铁路国有，川、湘、鄂、粤反对国有只因一省私利而已。此言切中了要害。所谓保路运动与爱国、卖国无关，实质是绅商为了私利勾结会党勒索政府的暴乱。

挑起成都血案后，川省绅商联手二十万保路同志军暴动，围攻成都。清政府急令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三十一标入川查办会党暴动。端方带兵入川在半途被兵变的军中会党杀害。控制湖北新军的会党趁鄂军调川，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暴动，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督抚趁机分离，保路运动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

保路运动中首先遇难的清廷要员端方是真正立宪派。庚子拳乱期间，他署理陕西巡抚任上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强力制止了拳乱在陕西蔓延，维护了陕西的秩序，使慈禧太后能有了个安全的避难之地。日俄战争后，他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联衔奏请革新政体，“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受命出洋考察时，革命党人策划行刺，端方力主考察之事为国家急务，不能因一颗炸弹而退缩。考察回国后，他将考察结果辑成的《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奏报清廷，奏请立宪，提出改定官制、仿行西洋的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中央行政统一、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等八项改革建议。革命中，真正的立宪派端方成为暴乱的最早牺牲者，印证了他的“各国立宪无不流血”之言。军中会党不光杀害了端方，还将端方请来鄂处理铁路问题的留日铁路专家弟弟端锦也一起

杀害。会党们将端方的头颅砍下送到武昌的暴动革命党指挥部作为投身革命“投名状”，显示“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阻止立宪性质。

保路运动揭示晚清立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盛宣怀、端方那样按现代文明规则行事的立宪派相比，领导“拒洋款”运动、“保路运动”的四省绅商、咨议局议员们是假立宪派和真会党。他们打着爱国旗号，煽动百姓闹事为自己谋私利，与会党一起发动暴乱，真实目的是勒索政府，即他们自己所言的“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他们所提“拒洋款”、“路亡国亡”等口号与拳匪之“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大同小异。就商而言，保路运动是破商业秩序，输打赢要的耍赖运动，是绅商们发动的另一场拳乱。在向中央政府敲竹杠不成的情况下，他们与会党黑社会勾结暴动，既没有进步性，更与爱国无关。保路运动中，绅商与会党黑社会合流的事实告诉人们，他们之前发动的促速开国会、赴京请愿等运动并非真是要推动立宪运动，而是借立宪之名实现一己之私。

各省的“保路”运动能够形成燎原之势的主要原因是日本通过同盟会的策动和资助。以川省为例，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张澜等人是留日会党，奉派回国举事的。黑龙会、同盟会将四川哥老会首领俞竞成接到日本，将他发展成了同盟会员，再被派到四川准备反清武装暴动。保路运动中，同盟会策动暴动的内定方针是“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哥老会的各路首领摇身一变成了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原来处于秘密状态的会党纷纷公开以保路同志会的面目冲击官府。四川绅商、立宪派本来就多有会党背景，绅商领袖罗纶身兼哥老会和保路同志会两会的首领，证明保路运动黑白两道勾结举事的真相。不仅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骚乱的领导人大都有留日会党背景。会党发动的保路运动代表日本推翻清政府的长期计划。

虽然清政府在革命中被推翻，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大势所趋，符合世界进步潮流，是正确与进步的。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同样顺应世界潮流，

宣布“统一路政”，继续实施铁路国有政策，而且仍是以路权抵押“借洋款”。这时，各省绅商们自知“借洋款卖国”、“路亡国亡”等口号难再蛊惑人心，纷纷主动要求政府将商办铁路公司烂摊子收归国有。民国政府交通部仍按盛宣怀制定的收路方案出价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不过再是现金收购，而是用无法兑现的中交京钞，分十五年支付，实际大幅降低了出价。曾经成功鼓动暴乱的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股东们清楚以制造暴乱的办法向民国政府再敲竹杠不会成功，纷纷接受民国政府交通部的出价。此时，绅商们后悔两年前拒绝接受清政府更加优惠而合理的赎买方案，暗自承认发动保路运动是无理取闹。

民国政府将全国各地商办公司的路权收回国有后，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铁路督办，主持收拾商办公司留下的粤汉铁路烂摊子。粤汉铁路工程仍依革命前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向英国银行借款，委任英国人为总工程师，从英国购买材料。从 1912 年到 1916 年，民国政府出让给列强的路权超过了 13000 公里，是为列强攫取中国路权的第二次高潮。1917 年，借洋款修建的武昌至长沙段的铁路建成。袁世凯之后，民国政府的建路运作与清政府一样，仍是借洋款建铁路。革命没有改变出让路权，借洋款，请洋人建铁路的现实，只是延缓了建路的进程，保路运动中的“拒洋款”、“拒洋人”口号只是煽动暴乱的借口。当年张之洞念念不忘的粤汉铁路因革命修修停停，直到 1936 年才修通，并且仍然是“借洋款”、“聘洋人专家”才得以建成。假如知道四省铁路因保路运动和革命被拖延了二十多年，盛宣怀会怎样叹息？

国民党当政后，为宣传辛亥革命，将“保路运动”宣传为爱国运动，同时尽量隐瞒孙中山办铁路的故事。辞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与保路运动前的锡良和各省绅商一样，大力鼓吹建铁路，提出在五至十年内建成 350 万公里铁路的目标（这一吹牛目标五十年后都没达到），其建路方案仍是“借洋款”，而且是既出让全部筑路权，又出让经营权。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孙中山再谋出卖路权换洋款，于 1919 年 12 月设立八省（军政府控制范围的粤、桂、

湘、鄂、川、滇、黔、闽八省）铁路局，任命岑春煊兼总裁，谋求以路权借洋债。孙中山比保路运动前的各省绅商更加胡来。各省绅商将路款大部亏空，总算是用款了一点铁路，而孙中山以建路名义得款完全充作军费。这时，各省绅商知道东征西讨的孙中山厉害，没有人再喊“路亡国亡”的口号，也没有人敢出面斥孙中山卖路即卖国。同样都是以路权抵押借洋款，革命党的史书将盛宣怀斥为卖国，将保路运动和孙中山赞为爱国。可见，革命宣传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掩盖一党之私和外国势力的操纵之手的把戏。

武昌暴动与各省独立

1907年春，孙中山离开日本，同盟会内发生了“倒孙风潮”。同盟会内各路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决定自立山头，在长江流域起事。8月，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张伯祥、邓文翬、王武、吕志伊、方汉城、傅梦豪、聂荆、刘玉山等会党领袖在东京青山举行了共进会成立大会，推举资格最高，各地码头最熟的四川哥老会袍哥兼孝义会首领张伯祥为会长（因张未就任，改邓文翬任会长），决定共进会宗旨同于同盟会，军旗为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的“铁血十八星旗”。铁血象征暴力，十八星象征满清入关前关内汉族十八个行省（不包括清不允许汉族迁居的满洲、西藏、青海、内外蒙古和新疆，十八星想法来自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中起草的号召汉族十八省会党起事的文告）。

会议发表的文言与白话两版本宣言基本是在重复宗方文告的大意，只不过表述更加粗俗和暴力。文言宣言说：“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为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白话宣言说：“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后来才被满人进来，做了中国

的皇帝。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兄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到了今天，那满人只顾请洋人来保护它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把中国的各种权益都送给洋人。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到了那时难道不会把汉人斩尽杀绝吗？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20] 共进会于各省设立分会，按照会党以日后作官相号召的传统约定分会负责人即为举事成功后各省的都督。共进会另起山头引起同盟会的不满。按会党规矩，拉出人马，另立山头有违帮规。但同盟会自身涣散，无力阻止会员另开山堂。于是双方各退一步，黄兴默认同盟会员们另立门户，共进会同意不设总理，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

共进会成立后，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更趋涣散。1908年，共进会的骨干们从日本回到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两广设立分会，发展会众。会党领袖们从日本带回的不仅是革命纲领和暴动计划，更重要的是日本朝野支援的革命要素：钱和枪。有了这些，会党们回国后一呼百应。孙武、焦达峰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联络长江两岸会党，建立了五镇会党军队，在湖北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随后，身为湖南哥老会龙头的焦达峰又在长沙成立了共进会湖南分会，在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联络会党，编成几镇会党军。江西会党领袖邓文翬返赣成立了共进会江西分会。1911年初，共进会将总部正式迁回国内，会长刘公带着十八星旗图案回国，在武昌设立了总部。

四川保路运动中，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汉口召开会议，促成了湖北共进会与三年前成立的另一新军中的会党组织文学社会合并，组建了以刘公为指挥部总理，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的暴动指挥部，定于中秋节起事。9月，四川绅商和咨议局的领袖们与哥老会合谋发动了暴动，

以哥老会武装为主力的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清政府急令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三十一标入川镇压暴动，致湖北防务空虚。

10月9日，革命党在宝善里自制炸弹意外爆炸，孙武受伤入院，蒋翊武出逃，暴动计划泄露。紧急中，下层会党军官发动了暴动，各营响应。革命军推日知会成员，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为暴动军临时总指挥。经一夜激战，暴动军占领了汉口，湖广总督瑞澂逃上兵舰，暴动军在汉阳门城楼和钟鼓楼上升起了十八星旗。12日，暴动军占领武汉，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后被张之洞邀至湖北，三次派往日本考察军事。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善待属下，在军中享有崇高声望。在1905至1908年清政府举行的三次秋操中，他作为南军的实际指挥者调度有方，指挥南军击败北军，在全国声誉鹊起，成为湖北新军中唯一能够一呼百应的将领。新军暴动后，暴动官兵群龙无首，强拉黎元洪到会场，拥戴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与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共同主持临时指挥机构——“谋略处”。黎不赞成会党暴动，坚辞不受。汤化龙主持谋略处，宣布在武昌咨议局设立军政府，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地方和通电全国宣告湖北军政府成立，向海内外发布《布告全国电》说：“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愿我族协力同心，复黄帝衣冠之旧，执戈起义，启中华礼教之源”，“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山河”，“中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余年，我国民而有爱国心者，必当扑灭满清，以恢复祖国。”“深恨胡虏，非我族类”，“.....殄灭满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诛戮汉奸，以登亿万生灵于衽席”。[21] 随形势发展，黎元洪看到满清大势已去，自己的军政府都督之名已布告天下，只好同意加入革命军阵营，宣誓就任都督。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到达武昌，要求废黎取而代之。暴动军将士拒绝了黄、宋的要求。黄、宋单枪匹马，只能顺从暴动军的决定，接受黎元洪的委任。

在日本朝野的支持下，同盟会早在全国各地发展势力，通过会党控制了各省军队。武昌暴动消息传出，各省革命党乘机起事响应。在湖南，焦达峰、陈作新率会党武装攻占了长沙，枪杀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迫走湖南巡抚余诚格，宣布湖南独立，由二人任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成立，任命早已与会党勾结的湖南咨议局领袖谭延闿为军政府参议院长；在陕西，哥老会、刀会率新军进攻省府，陕西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自杀，同盟会在陕西新军中的首领张凤翔、钱鼎、万炳南以秦陇复汉军正副大统领名义宣布成立陕西军政府，封了三正三副六个都督；在山西，会党武装于 10 月底攻占了巡抚衙门，枪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联手省咨议局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在江西，驻南昌新军于 10 月底占领了南昌，与绅商各界组织了军政府，推原江西巡抚冯汝骥为都督（后江西都督几次易人）；在云南，新军于 10 月底，占领了军械局，礼送云贵总督李经羲出境，于 11 月 2 日宣布云南独立及都督府成立，推蔡锷为都督；在上海，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李燮和组织了光复军，同盟会的青帮首领陈其美（陈英士）也组织了暴动军，两军联手暴动，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11 月初，陈其美以帮会手段迫走李燮和，成立了自任都督的上海军政府，贴出《军政府布告》说：“满政府者，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共建共和国”；[22] 在贵州，哥老会首领张百麟、黄泽霖于 11 月初率哥老会会众占到九成的新军占领了贵阳，宣布成立贵州军政府，推杨蔭诚为都督；在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原抚署门口挂“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旗，改称都督，通电独立；在浙江，新军、会党攻占了杭州抚署，逮捕了巡抚增韞，驻防将军德济拥浙江立宪派首领、原浙江省咨议局的议长汤寿潜为都督，汤宣布就任军政府都督，宣布浙江独立；在广西，巡抚沈秉堃接受革命党人的要求，于 11 月 7 日宣布广西独立；在福建，新军暴动，闽浙总督松寿自杀，将军朴寿战死，咨议局与暴动军联手，宣布军政府成立，推驻福建的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孙道仁为都督；在广东，陈炯明、邓铿

率新军在惠州起事，于 11 月 9 日占领惠州城。广东咨议局议长邱逢甲在广州邀集上层人士会议斡旋两广总督张鸣岐同意，于 11 月 10 日宣布广东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张鸣岐为都督，原提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张、龙拒任逃走，会党推举同盟会骨干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后任都督）；在山东，巡抚孙宝琦接受了革命党的要求，宣告成立山东临时政府；海军方面，在革命党人黄仲煊的策反下，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在率舰队访问英、美归途中宣布脱离王朝清易帜。

清廷的中央集权到载沣当政时已极度衰落，受到各省百般挑战。武昌暴动后，各省乘机宣布独立。11 月，隆裕太后在多数省宣布独立的形势下颁布了“罪己诏”，承诺开放党禁，组织完全内阁，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任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属抚慰劝导，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期望立宪派人士出面帮助解决危机，以求“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23] 但这时，多数省的立宪派已变身或投靠革命党，立宪派多已抛弃立宪初衷，转而支持暴动。武昌暴动后的五十天内，原本已半独立的各地督抚或弃官而逃，或与会党的军政府合流，十四省、上海和海军主力宣布脱离清王朝，清王朝走向覆亡。

杀满人狂潮

辛亥革命前，汉族会党在日本编造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煽动民族仇恨，将《革命军》小册子在日本大量印刷，运到国内煽动会党仇杀满人、蒙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充斥暴力血腥的宣传。暴动中，各地汉族会党按照革命宣传的调子，掀起了“杀鞑子”狂潮。“当时局势剧变，人性横决，且因属民族革命，所用口号，乃‘兴汉灭满’四字，故在那三几天内，武昌城内外无辜被杀戮者，不下千数百人”。[24] 据满人记载，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无数满人被逼自杀，或隐姓埋名，自称汉人。

各省宣布独立后，新上台的会党军政府不可能制止民族仇杀。因为，民族仇杀是同盟会煽动革命主要卖点。各地会党对满人、蒙人（蒙八旗），和汉八旗的屠杀在推翻满清目标达到后仍然持续，直袁世凯上台后提出“五族共和”国策辅以武力镇压会党才得以令制止。翻开《清史稿》，长串的殉清者名单只是屠杀死难者的一小部分，种族仇杀之惨烈超乎人们的想象。究竟有多少满人在辛亥革命中被杀害永远无法确知。人们只知道，两百年多来的八旗驻地在辛亥革命后不见了满人。鲁迅曾指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可以说，体现暴民思想和鼓吹种族仇杀的《革命军》小册子也体现着辛亥革命的性质。

杀满人狂潮中，湖北军政府颁布了由宋教仁匆忙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其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为首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构成，三机关各有权限，互相牵制，三者分别代表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的权利，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尽纳税、当兵等义务；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其权限类似于总统，总揽政务，对议会负责；议会有制定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等权。革命党在民族仇杀狂潮中公布的这些外国抄来的“保障人民权利”条文没有意义。如果他们真的信奉“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的权利，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那就不会长期鼓吹民族仇杀，也不用暴动了。因为清廷正是以上述条文为目标，切实走向民主、宪政，切实准备保障上述人民权利。而且清廷准备由未来的国会决定国体和政府，准备放弃帝制。

“会党世界”

武昌暴动后，各地会党沉渣泛起，由秘密转为公开，本性暴露，首领自封都督，暴动军倚仗武力胡作非为，抢劫银行、商号，勒派军资，开办赌场，搞得各地社会治安极度恶化，全国陷入血腥与混乱。报刊舆论在革命中惊呼“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混乱中，社会各界一致认为会党是革命后的首害。新成立的军政府也要维护社会秩序，新上台的都督们纷纷下令镇压会匪，遣散会党武装，撤换军队中的洪门、哥老会军官，处决作乱与会党首领正法，用行动承认了清政府长期以来镇压会匪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说明了会党革命的祸害性质。

在保路运动策源地四川，新任总督赵尔丰释放了保路运动中拘捕的九位绅士。九位被释放绅士发表《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说：由于政局变动，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当然作废，所以保路同志会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随后，赵尔丰与蒲殿俊等保路运动首领谈判后同意四川独立，发出文告说：“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蒲殿俊宣布“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成立及自任都督。然而，这时被绅商们请来暴动的哥老会武装已不受控制，在十天后将蒲的军政府推翻，另一留日归来的会党首领尹昌衡宣布成立自任都督，原咨议局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的四川光复军政府，成立军政府后的第一件事是将已经交出政权的川督赵尔丰斩首，将赵的头颅游街示众。尹昌衡不仅自封都督，还自封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在四川军政府的门口挂上“大汉公”的招牌，将军政府办成了哥老会的总公口。受此鼓舞，原来隐密的黑社会猖獗于市，哥老会公口林立，会众头戴珠花，脚插靴花，招摇过市，为非作歹。[25] 光复军政府也不得安稳。哥老会众为主的“同志军”在成都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即会党黑话“打起发”，先后抢了大清银行，

浚川源银行和众多票号，将被禁止的赌博重开，在军政府门外设赌摊百余处。一时，全城乌烟瘴气，民众纷纷逃亡，或将贵重物品易地寄存。[26] 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所谓（保路）同志军，部分是土匪，部分是各地的乡团，持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铜、铜铜，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或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27] 哥老会政府不得不面对会众为非作歹的难题。会党首领尹昌衡只得发布“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下令取缔成都市二百多个公口的招牌，以软硬两手策略将几十万同志军遣散，对抗拒者就地正法。

在湖南，哥老会首领焦达峰、陈作新自封军政府正副大都督，会众们庆祝说：“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28] 于是，都督府成了哥老会的堂口，车水马龙，吃大锅饭，都督身兼龙头老大，忙于应接会众，无暇治事，会众为非作歹，天怒人怨，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在绅商与各界的支持下迅速发动兵变，杀了焦、陈两都督，在湖南各界的支持下对会党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在陕西，革命中成立的军政府被不识字的哥老会首领们掌控，各级官员全被哥老会的人取代，陕西“各州县均有一二首领，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讼词，直代县官行政”。[29] 随着会党在革命后肆意作乱，会党军政府不得不下令镇压会党，杀了领导暴动的会党首领万炳南，将会党的暴动军改编。在湖北，共进会首领刘公在暴动后第一件事是衣锦还乡，“把祖传的豪华第宅修葺一新，还修筑四座碉堡，派一营兵把守。[30] 军政府成立后，会党在革命军中组织“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密谋再举暴动，推翻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得知后下令取缔会党，搜出旗帜，大印，名册等等后将谋反的军政分府的会党首领李秀昂、张国荃等一批革命中的会党暴动骨干分子处死。大印之外，密谋再举暴动的“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还制作了上书“替天行道”的飘布一卷，[31] 显示会党革命之陈腐。武昌暴动中的会党首领张振武在军政府成立后不承认黎元洪的都督权威，多次扬言要再举革命，称“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黎元洪在凶险处境中调虎离山，

在议和后请袁世凯帮忙在北京将张等处决，然后通电列举张策动全国二次革命，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罪证。在广东，身为会党首领的陈炯明出任军政府都督后下令取缔三合会，镇压几年前领导潮州黄冈反清暴动的会党首领许雪秋、陈涌波，领导镇南关、云南河口等地反清暴动的会党首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人及其会众武装，将参加钦廉防城暴动的会党武装改编、遣散、或镇压。因为，“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割仇人，挖取心肝食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32] 在云南、江西，革命军政府也不得不如清廷一样，宣布哥老会、洪江会为“会匪”、取缔会党，处决首领。新政府上台后除了杀暴动功臣外别无选择，因为会匪们只认枪不认理，非武力镇压无法制止混乱局面。杀满人狂潮之后是会党自相残杀狂潮，充分显示出会党革命祸乱性质。

袁世凯复出与载沣隐退

革命军控制武汉后，清廷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南下途中密赴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告以“慢慢走，等着瞧”，冯心领神会。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精锐北洋新军赶往湖北镇压革命党人，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军舰配合荫昌。然而，荫昌指挥不动北洋军。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向载沣上奏：应对困局“非袁莫属”，强调请袁出山收拾局面既是北洋军的呼吁，也是“东交民巷”的意向。载沣清楚列强支持袁世凯。革命爆发前，载涛、载洵从欧洲考察归来时曾报告列强多质问中国政府为何不用袁世凯。革命爆发后，著名记者莫里循在《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中说：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迫于内外压力，载沣下诏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命主持收拾武昌暴动局面，将主持实施铁路国有政策的盛宣怀革职，派杨度到彰德传达任命。袁以足疾未痊，辞不受命。载沣再派徐世昌到彰德传旨。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给予

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经费等项出山条件。载沣不允。这时，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重臣致电摄政王，明确要求调回湖北前线的荫昌，改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警告如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在朝野强大的拥袁压力下，载沣只好接受袁的出山条件，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抚事宜”，节制湖北海陆各军，特地在谕令中加了“抚”，以表示同意袁世凯提出的“宽容武昌事变诸人”的条件。10月31日，袁世凯接受任命，离开彰德赴任。11月2日，奕劻率那桐、徐世昌、载泽等内阁主要成员提出辞呈，资政院总裁世续代表议员奏请解散现有内阁，另组新内阁。载沣发布上谕，批准内阁总辞，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适宜”。[33]

11月3日，清廷在各省宣布独立的乱局中公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十九信条》）。《十九信条》不再依据皇权特色的日本宪法及《钦定宪法大纲》，而是以英国的“十二条政纲”为蓝本，基本废除了皇权，确立虚君共和议院政治体制，规定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族不能担任总理，皇帝不得干涉行政，只是象征性的元首，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不能干预，甚至连皇室的经费和典礼都需国会讨论。在资政院众议员的的敦促下，载沣在太庙宣誓皇室遵守十九信条。

对于载沣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根据刚刚公布信条中关于总理大臣须由国会公举的规定，要求清廷收回成命，由资政院选举决定内阁总理。11月8日，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34] 资政院选举内阁总理后，载沣颁布罪己诏，承认三年来的政策有误，希望国家能够恢复正常秩序，向隆裕太后提出辞任监国，并发布了最后一道上谕，根据资政院选举的结果再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这时，中外报纸及海外华侨及留学生的报纸都刊出了要求袁世凯作“中国共和

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的电报。[35] 11月13日，袁世凯率卫队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11月17日，袁世凯组阁：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内阁成员中没有皇室成员，但也没有排斥满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载沣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退居藩邸，并且要求其他王公贵族“恪守家法，束身自爱”。[36] 至此，监国摄政王载沣结束了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在执政三年中，载沣大力推动地方自治和国会选举等立宪准备举措，要求“分年预备，切实施行”。[37] 革命的严重威胁之下，他陷入了怎么作都错的困境：坚持九年筹备清单的时间表，实行渐进改革遭到立宪派和民众的谴责；迁就立宪派和民众的激进要求，立即召开没有地方选举基础的国会，指定议员，则面临更强烈的谴责。面对促开国会运动的请愿，载沣百般说服，保证立宪国策不动摇，被迫将预备立宪的时间一再缩短。在革命党频频暴动，地方督抚联手向中央权威挑战，立宪派纷纷加入了革命阵营的形势下，载沣向虚君共过渡的计划注定失败。虽然载沣在罪己诏中将暴动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但清廷立宪失败及覆亡不是因为载沣的政策有误，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无力抗拒日本朝野操纵中国会命党的颠覆。

由于多数省宣布独立，君主立宪的基础不再，《十九信条》不再可能实施。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进步性。宪法学家陈茹玄说：“《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祚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38] 还有人说《十九信条》若早半年宣布会赢得立宪派的拥护，可能避免革命。上述早十年、早半年宣布虚君共和能避免革命的说法是一厢情愿。革命与否不取决于立宪派，不取决于《钦定宪法大纲》，不取决于比《钦定宪法大纲》更进步的《十九信条》，也不取决于清廷的施政。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

史书称清廷的“皇族内阁”和“收回路权”两项政策“倒行逆施”引发了革命。实际上，载沣的上述两举措均合情合理，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之举。日本扶植中国会党推翻清王朝是多年的既定方针，载沣无论怎么作，无论采用日、德那样的君主立宪宪法还是英国的虚君共和宪法都会被赶下台。

正如《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未能实施不影响其进步性一样，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载沣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开明、进步和宽容的统治者。上台之初，他握兄长诛袁世凯的密诏而放弃杀袁；他励精图治，按照《九年立宪清单》积极推动立宪进程，推动地方选举与自治，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自愿放弃专制，接受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他宽容面对绅商全国串联组团赴京请愿、宽容面对迫到他府邸的请愿者，宽容对待革命党刺客，派人说服汪精卫放弃恐怖活动，亲临资政院发表开院致词，宽容面对资政院激进议员“弹劾军机”。全国暴动中，他颁布罪己诏，承认施政错误，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彻底抛弃皇权。退位前，他的最后行动是收回任命袁世凯组阁的诏令，再根据资政院选举结果重新任命。就推动共和立宪，保障人民权利，宽容异己，勇于承认错误，不恋权位，回归平民等方面而言，他以后的统治者没有与他比肩者。

载沣称执政三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走下摄政王位时，他平静地说：“这回可以回家抱孩子了。”[39] 溥杰在《父亲醇亲王载沣》中写道：“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把权力看得较淡。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他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还喜欢天文学，夏季夜晚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熏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

离开政治舞台载沣以读书为乐，挂一副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清帝逊位后，载沣比所有的清朝遗老遗少都看得开，不参与复辟活动。

南北议和

武昌发生暴动后，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向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军政元老建议：“此次武昌起义乃制清朝于死命的一大转机。当此之时，使中国本土革命成功，同时防止革命波及满蒙，使满蒙得日本之领导而获独立，方为日本应取之策”，[40]“以中国之辽阔富饶，日本不应只固执将眼光锁定于中国东北；放眼南方，应可见其无限的天然财富。”[41]他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只卖军火给清廷的政策说：“武汉之革命军纵令为官兵所讨灭，其核心力量革命党仍将健全保存，到底难以铲除尽净。……此际失革命党之情感，将来无论是否对中国进行瓜分，都将大大有所损日本国家之利益。”[42]同时，他致信三井物产总经理益田孝，要求他帮助革命军。益田孝阅信后，往见担任三井总顾问的元老井上馨，井上答：援助革命军之事须经政府同意。于是，益田与桂太郎一同面见首相西园寺公望，获西园同意援助中国革命党。得政府批准后，三井立即向革命军提供大批军火。10月底，袁世凯离开彰德赴任，同时指示冯国璋加紧进攻武汉。他知道，要达到结束战事目的须有军事上的胜利。冯国璋指挥北洋军击败了暴动新军，攻克了汉阳，迫使黄兴等人逃离湖北。会党革命军乌合之众原本不是精锐北洋军的对手，冯国璋不难镇压暴动。但日本对革命军的军火援助改变了力量对比，也改变了局势。得到日本军火的革命军实力大增，顶住了精锐北洋军的进攻。[43]在中国变局的关键时刻，内田良平的意见对中国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渡过危机后，革命党内部发生了领导权之争。黎元洪在湖北通电，请各省派代表到武汉商组临时中央政府，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和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上海商组临时中央政府。结果，赣、粤、桂等省代表则到了湖北，浙、苏、闽、湘、直、鲁、豫等省代表到了上海。11月16日，到上海的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各省都督

府代表联合会”，并以联合会名义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上海举行。对此，湖北方面坚持各省代表赴湖北商讨大计。11月26日，英国公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斡旋南北双方，代表北方向南方各省革命军代表提出了停战、清帝退位、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等三项议和条件。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一致同意北方的三项条件。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随后，南方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汉口展开议和谈判，达成了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未来国体和政府等共识。

南北议和期间，内田良平以革命军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与三井物产会社订立了三十万圆武器弹药费借款合同。[44] 根据合同，日本“云海丸”号轮船秘密运送步枪一万支到上海交给了革命军；日本“巴丸”号轮船再运步枪12000枝，子弹2000万发，机关枪6挺，大炮6门，炮弹5000发到南京。[45] 日本的几次军火援助使南北两军力量对比逆转，帮助江浙暴动联军攻占了南京，挫败了袁世凯武力镇压暴动，恢复秩序的计划。

孙中山抢任总统

革命军占领南京后，部分南方革命党人要求撕毁与北方达成的议和协议，抢先成立临时政府，推举江苏代表雷奋、马君武、湖北代表王正廷等三位同盟会员仓促起草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中，南方十五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会上，代表们就是否单方面推选临时大总统，发生了分歧。少数代表主张，举袁世凯为总统众望所归，南方应遵守协议，信守拥袁承诺；多数代表则认为，得日本军火后形势有了不同，应当抛弃和谈承诺，抢先单方面推举大总统，并且一致推举黄兴为临时大总统人选。黄兴知道，黑龙会指定的中国革命领袖是孙中山，违背黑龙会的意思不能成事，于是告诉众人，孙中山即归，应留总统位给孙中山。李书城回忆：“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组织临时政府，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

‘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46]

武昌暴动前夕，正在美国犹他州小镇 **Orden** 筹款的孙中山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暴动次日，在孙中山从报纸上得知暴动消息，立即致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以未来中国政府首脑名义求见，并向美国政府寻求财政支持，致电黄兴：“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回国”，随后动身前往华盛顿。美国政府不承认孙有资格代表未来政府进行外交活动，拒绝接见。被拒后，孙中山通过朋友向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转交信函，同样以未来中国政府首脑名义寻求资助，在信中以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的承诺向英国寻求借款 100 万英镑。他的筹款信函在英外交部被传为笑柄。格雷称孙为“大言不惭的政治家”，转告孙“英国保持对中国革命的中立和对袁世凯的尊敬”。美、英国碰壁，孙中山来到巴黎，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宴请席间同样以中国未来首脑名义提出向法国借款。西蒙以中立与四国银行团协议理由婉拒了孙的借款请求。[47] 在向西方列强借款失败之后，孙中山转向了日本，致电宫崎滔天和内田良平，说他将回中国领导革命，约他们香港见，然后从马赛登轮船回国。行前，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呼吁列强勿向清政府贷款，支持以他为首的未來中国政府，并大谈新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开矿、筑路，声称新政府将制定新的海关税则。

12 月 16 日，孙中山在星加坡向邓泽如等侨领表示：“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48] 到香港后，孙中山得内田良平率大批黑龙会会众迎接。12 月 25 日，孙中山在宫崎滔

天、池亨吉二氏等大批日本浪人的陪同下抵沪。下船时，他被记者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带回来多少钱”。孙中山答：“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可言也”。他回国的第一句话就否定了南北议和结果，暗示将武力北伐。

这时各省自立的军政府均在财政危机中。各省的军政府均面临兑现革命回报承诺的巨大压力。各地的革命军是受升官发财蛊惑投身革命的，在暴动要求兑现承诺，得不到钱即抢劫银行商号，绑架勒索，以兵变威胁闹军饷，成为各省的首害。报纸上关于“孙中山偕大批日本人回国”、“孙中山携巨款归国以资助革命军”的报导使各省的革命党领袖看到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希望，大家都把孙中山当作财神救星来迎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报告说：“孙中山抵沪后朝夕接待大量内外客人来访，门庭若市……盛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

到上海当夜，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骨干立即密谋抢先成立临时政府及推举总统事宜，决定撕毁和谈协议，抢得民国政府之名，同时准备武力北伐。关于总统人选，黄兴一如既往，推举孙中山，孙中山则抱“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49] 各省代表认为孙中山带回了巨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军费，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候选人。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章太炎听到同盟会内部推举总统坚决反对，称这是破坏南北和谈的背信之举。他特别反对推举孙中山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候选人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由于同盟会已预先开会内定总统人选，并将内定结果传出，非同盟会控制的省份不能提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人选，推选没有悬念。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随即发表通电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子身归国，毫无发动，竟承选举，何以克当？唯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

龟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同时，他致电袁世凯称：“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对于南方代表撕毁和谈协议，不征询海内外各界意见单方面推选总统，袁世凯斥革命党“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召回谈判代表唐绍仪，电告伍廷芳不再承认和谈协议。南方独立各省虽然抢得临时中央政府之名，但其单方面选举结果不获国内外各界的认可。南北议和之时，梁启超就指出，真正有能力收拾混乱局面者唯袁世凯。选举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不仅国内各界，包括相当部分革命党人的共识，英美为首的列强各国也明确表态，认为袁是避免中国大乱的不二人选，而孙中山是空话政治家。在革命党内，黄兴对南方单方面选举大总统也有不同意见，提出只要袁世凯能迫清帝退位，即应举袁为大总统。革命阵营不同意撕毁协议的代表支持黄的提议，于是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了黄兴的提议，向北方作出举袁承诺。根据南方的承诺，伍、唐再举行会谈，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双方达成“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项共识。在此基础上，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奕劻支持公决，载涛、毓朗反对。隆裕太后决定“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50]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匆忙赶到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自任临时大总统及各部总长、次长的任名单，同时将任命犬养毅、頭山滿、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日本人为政府顾问之事对外界隐瞒。孙中山抢先宣布就任大总统之举被舆论抨击为程序草率，形同儿戏。国内各界和列强各国拒绝承认这种黑箱作业产生的总统和政府。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声明“君主、共和问题”须付之国民公决，不承认临时政府，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錕、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北洋将领通电，声明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被孙中山任命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和被任命为总长的

社会名流们无人来南京就任，追随的名流只王宠惠、蔡元培二人，临时政府成了“次长内阁”。

1月7日，犬养毅、头山满等人来到南京就任顾问，向孙传话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反对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妥协，指示孙中山联合岑春煊、康有为共同对付袁世凯。[51] 根据日方意思，孙中山制定了六路大军北伐计划，准备军费借款到手后武力北伐。但是，各界要求袁世凯任总统的呼声强大，孙中山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发表通电，承诺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总统。犬养毅对于孙中山的通电声明不满，两次致函孙中山，要求孙“勇往迈进”，“北京已在阁下之掌中”，并谓“袁譎诈百端，心术不测，愿阁下勿寸步去南京也。”[52] 根据犬养指示，孙中山于1月18日再电袁世凯，提出了北京不得更设立临时政府、袁世凯必须公开发表服从共和政见等“五条要约”作为辞临时总统的附加条件。不待袁世凯答复，孙中山将其“要约”公诸报端，陷袁世凯于被动。对于孙中山提出的附加条件，袁世凯指出：所提条件与先前协商的内容不符，如果孙中山非要为议和附加新条件，他只得不再承认与伍廷芳先前谈妥的事项。孙中山直接向袁世凯提附加条件之举实际否定了伍廷芳的南方谈判代表资格，使南北和议陷入停顿。

对于孙中山抢先宣布就任总统，黎元洪指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

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53]

南方革命党推举总统的投票中，光复会代表浙江省对孙中山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同盟会内，光复会与孙中山之间的派系矛盾由来已久。因没有积极兜售满蒙而不获黑龙会信任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章太炎不买孙中山的账，推动了“倒孙风潮”，使孙难以在东京同盟会总部立足，被迫远走南洋。在南洋，孙中山与陶成章因筹款发生了冲突。陶撰文指责孙贪污革命经费，再次发起“倒孙”，带领光复会恢复独立活动，深为孙中山记恨。武昌暴动后，上海的革命党形成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竞争。暴动将士推举光复会的李燮和为上海都督，同盟会首领陈其美以暗杀威胁迫李离开上海，宣布自任了上海都督。李燮和转到吴淞宣布自任军政分府都督，使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孙中山回国前，《民立报》撰文声称孙中山将带回巨款和兵舰若干艘。待孙中山到上海时，却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对此，陶成章直指是孙中山是利用舆论误导“骗取总统”，声明与孙中山势不两立。两个恐怖组织发生冲突，唯有恐怖办法解决。孙中山、陈其美决定，按照帮会规矩除掉陶成章，指派蒋介石、王竹卿于 1912 年 1 月刺杀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杀陶后，孙中山、陈其美同时做戏，分别通电吊唁及下令缉拿凶手，孙再致电浙江都督府，请“优予抚恤，并将其生平之行谊及光复之芳勋详细具报，备付将来民国国史”。在陶成章之前，光复会的另一领袖赵声不明不白地暴亡，被怀疑是孙中山指派胡汉民所毒杀。陈其美惯以暗杀对付异己，在革命中枪杀了民军参谋长陶骏葆，组织暗杀李燮和，杀陶后再暗杀了袁世凯的部将郑汝成，后来自己被两个部下暗杀。如此互相暗杀的会党当然不可能推动立宪共和。几年后孙到绍兴东湖陶社祭陶，称“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并题“气壮山河”匾额。这样暗杀对手后的做戏后来被孙中山反复使用。

辛亥革命的属性

一、日本人策动和资助的革命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支持中国会党势力从内部瓦解清政府，向满蒙扩张的政策，指定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负责执行这一政策。犬养派遣宫崎滔天到中国专门调查反清会党的情况，[54] 选定了承诺革命成功后划满蒙予日本的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1905年，黑龙会召集在日本的中国各路会党领袖，组织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指定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黑龙会只是扶植同盟会的执行机构，其背后有大隈重信、犬养毅、尾崎行雄等“民党”领袖，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界元老，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财界人士，及无数受政党和军方控制和操纵的“大陆浪人”。孙中山身边的宫崎寅藏、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都带有日本政界，军界下达的扶植任务。宫崎寅藏、和田三郎、萱野长知、平山周、池亨吉等人办的《革命评论》专门介绍中国、俄国革命。无数日本人受革命宣传影响向中国革命党慷慨解囊，直接资助、支持孙中山的日本的“革命友人”就有三百人之多。[55] 在日本朝野的扶植之下，同盟会能量巨大，能够指挥各路中国会党，将势力渗透到中国各省的军中，各省督抚身边和各省咨议局。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致函宗方小太郎说：“我将日本视为第二个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是令人遗憾。”[56] 孙中山说对辛亥革命贡献大的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此言误导。酝酿辛亥革命的十年中，华侨的资助微不足道，是日本人的资助使孙中山为首的反清革命党、留学生得以穿梭往来与东京和中国各省之间，得以成立众多的革命组织，办众多的革命刊物，印刷并运送大批革命刊物到中国各省，或是在上海日租界内直接印刷送到各省宣传革命，在各省军队中发展势力。同盟会是日本人召集成立的，武昌暴动的领导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也是日本人扶植成立的，响应武昌暴动的各省革命军领袖、会党领袖大都是从日本回国闹革命的，各省军政府的都督、

部长、高级官员，新军中的革命党将领差不多都是在日本培训出来的，如领导云南暴动的四十多位新军将领中三十几位是留日归来的，辛亥革命的旗帜——铁血十八星旗是在日本设计的，其汉族十八行省的说法出自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期望向中国扩张的日本人期待中国爆发革命，为此愿意出钱出力，甚至牺牲生命。日本的《东亚志士录》一书介绍了一千三百多位献身中国反清革命日本人，其中七百多人是隶属黑龙会的辛亥革命骨干。后来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辛亥革命的狂热具有代表性。得到中国革命爆发的消息后，时年 22 岁的驻朝鲜军官石原莞尔激动地带领手下士兵登上山顶对天鸣枪，流泪高呼“支那革命万岁”。日本人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是辛亥革命的真正起因。清政府选择了立宪共和的正确道路，但无力抗拒日本朝野策动的颠覆。革命党的“即使清廷领导变革有成效也要推翻”的论调背后是日本朝野不希望清廷改革立宪成功的心态。孙中山不愿暴露自己和同盟会多年接受日本人扶植的实情，因此只提华侨、留学生和会党的贡献而不提日本朝野。其实，若无外国资助，留学生和会党连个像样的会都开不起来，遑论革命。应当说，辛亥革命不是中国人的选择，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辛亥革命之母是黑龙会，是日本朝野。革命党声称辛亥革命是“由清廷的皇族内阁和铁路收归国有等倒行逆施所引发”。其实，责任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均合情合理，经日本人和革命党歪曲宣传被用作了推翻清政府的借口。

二、种族主义的革命

清末宪政改革的诉求之一是消弭民族裂痕，而革命党视满、蒙、回、藏区为外国，长期号召杀“鞑子”，鼓吹分裂。革命党理论家章太炎声称，光绪皇帝因出身而注定不可能是开明改革的皇帝，声称对于清廷的新政“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57] 汪精卫声称：“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

竭力反对。”[58] 按照革命党人的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汉族君主统治其它民族才是正理。因为骂光绪帝，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论调，刺杀摄政王，章、汪等人成了革命英雄，说明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既非正义，也非进步，只是种族主义运动。

革命中，各省军政府上台后均布告天下，称光复了汉族江山，布告中心内容均是强调汉族报仇雪耻。江西哥老会支派洪江会（六龙山）的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誓，人神共殛”，口号为：“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陈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洪江会会票上书：“还我河山、忠孝仁义堂”，背书：“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洪江会暴动中的《布告天下檄文》中写道：“夫我辈之起，志在驱满贼耳。……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以酬报”。同盟会辛亥广州暴动总指挥赵伯先创作的《保国歌》中写道：“中国汉人之中国，非我族类心不同，民族主义大复仇，二百年后先回头。还我江山归旧主，不逐胡人誓不休。取彼民贼驱异类，光复皇汉笑呵呵！”这些誓词檄文显示，革命会党相比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没有进步，不同只在于增加了“灭满兴汉”、“光复皇汉”。各地会党打着“大汉”旗号展开了对满人的种族屠杀，造成满、蒙、藏、回各族强烈要求分离出中国。若非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宣布“五族共和”的国策，制止杀满人狂潮，则革命后的中国将只剩下汉族十八省，广大满、蒙、回、藏地区必将分离出去。鼓吹民族仇杀的同盟会、孙中山在革命后根本无法解决民族分离和仇杀问题，无法推动民族和睦。孙中山在 1912 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要了解他所言的“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之言须再看他的《通告海陆军将士文》和《临时大总统文告》。后两文件充斥“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满人窃位”、“逆胡猾夏，

盗据神州”、“异族专制”、“不为异族效命”、“重睹汉仪”、“鞑虏”、“野番贱种”等大汉族主义论调，[61] 这未免让人相信他之“民族统一”是杀尽“鞑子”之意。

对于日本朝野推动的汉族主义潮流，康有为指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今革命者，曰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曰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别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59] 梁启超指出：中国只可行政治革命，不可行种族革命，“革命将导致全国糜烂，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同道互戕，彼此为敌，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入侵的时代。”[60] 康、梁的警告后来不幸成真。

三、倒退性质的会党暴乱

作为辛亥革命准备的“十二次暴动”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暴动军通知居民必须在门前点一灯，或在门上张贴一“明”字，以示附明之意。按洪门规矩，最高领袖虚位以待朱明苗裔。革命家秋瑾在日本加入洪门，仪式高挂“反清复明”大旗；潮州黄冈暴动中，会党建立“大明军政府”；惠州七女湖暴动中，暴动军告示称：“正面天子，立转明朝”、南宁、柳州的会党暴动时自称“大明天国军”；钦廉防城暴动中，洪门首领王和顺发布布告称：“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光复会在誓词和《光复军文告》中阐明“光复汉族”、“剪灭满夷”为宗旨等等。据冯自由回忆，在海外只能用洪门“反清复明”的名义才得以筹饷。明末极度黑暗，灭亡是天谴，清灭明是历史的进步。在清廷确定以立宪、五族共和为基本国策时，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诉求，要求倒退回最黑暗的明朝。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第三天，孙中山率临时政府文武百官到明孝陵祭拜。会场悬挂朱元璋像，孙中山在《祭明太祖文》中称：“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

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在《谒明太祖陵文》写道：“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他将革命成功归结为朱元璋的保佑，说明了辛亥革命与共和、民国国家精神格格不入。当时，秘书宋霭龄反对孙拜明孝陵说：民国是共和制度，不应一开始就去拜旧朝皇陵。孙答：你在美国呆久了，不明国情，推翻满清依靠着洪门、青帮、哥老会、三合会，他们都打反清复明旗号，同盟会也以此为号召。因此革命成功要去拜明陵，以向会众们交待。此言道出，辛亥革命完全不是革命党后来宣传的“资产阶级革命”，更非“民主革命”，而是会党两百多年来“反清复明”事业的继续。

辛亥革命的动员口号倒退、陈腐。洪江会暴动中的《布告天下檄文》中写道：“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翼，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四川广安孝义会首领张伯祥的革命号召是：“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份。”^[62] 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等会党鼓动造反的新意在于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孙策划的“兴中会”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该会宗旨称，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63] 如此革命动员相比千百年来农民暴动动员并没有进步。孙中山的海外筹款活动是随意许愿式革命动员的代表作。这种承诺高回报的革命股票筹款结果必然是失信海外会党，埋下革命后遍地革命军抢劫闹饷的祸根。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经人介绍拜盟加入洪门致公堂，被洪门大佬黄三德封为“洪棍”军职。美洲洪门大老司徒美堂、黄三德两大佬为孙中山的暴动出力出钱，贡献良多。1911年，孙中山在广州暴动失败后再赴美国，再靠美洲致公党发展，成立“革命公司”、美洲洪门旧金山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以

未来革命军政府名义向美洲洪门会众发行革命股票（分 10 元、100 元、1000 元三种面值），作“革命传销”。革命爆发后，他带着筹饷局筹集的万余美金赴欧筹款，然后回国抢任了临时大总统。然而，他的“几万万”筹款计划失败，临时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无法向海外洪门兑现革命股票的高回报，在辞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向海外洪门赖账，因此与美洲洪门结怨，被洪门谴责为“过河拆桥板”。[64] 孙中山逝世时，旧金山致公堂总会发铁板通令说：“孙贼背盟，例不能享受洪门荣典，所有分堂不可下半截旗，亦不可派代表往吊”，[65] 可见结怨之深。

从惠州三洲田暴动开始的“十二次暴动”中，基本队伍全是洪门会党武装。三洲田暴动的都督是会党首领郑士良，黄冈暴动的总司令是会党大佬陈涌波；七女湖暴动队伍是三合会众，防城暴动的都督是三合会首领王和顺，镇南关暴动的前线指挥官是会党首领黄明堂。按照温哥华洪门民治党的说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六十八人是洪门兄弟，“保路同志军”是哥老会武装，首领是哥老会袍哥，武昌暴动的主力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也会党组织，入会形式为开香堂、立盟誓，与三合会无异。辛亥革命的队伍基本为各路会党的联盟，在陕西是三合会、慕亲会、哥老会、匕首会等会党的联盟，革命军分为复汉军和洪汉军两个番号，前者为同盟会武装，后者是其它会党武装；在浙江是二十多个会党的联盟，同盟会以“旧堂号口一律不变”的方式拉会党入伙，共同旗号是“光复汉族”。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指出：“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会党造反的结果是全国暴乱，黑社会沉渣泛起，招摇于市，抢劫，绑票，开娼馆、烟馆，无恶不作。革命中流传“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66] 道出了会党革命的祸害。章士钊在后来回

首辛亥革命时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67] 为维持秩序，新政府不得不镇压会党。会党的首领、龙头们作都督后不得不残酷镇压会众，是会党革命祸害的另一证明。辛亥革命既与资产阶级无关，更与民主无关。梁启超指出，中国尚未形成资产阶级，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立宪派不认同，也未资助会党革命。绅商们积极推动促开国会请愿运动是因为担心会党革命断送立宪。他们中不少人勾结会党黑社会是为了维护商业利益。武昌暴动后，张謇力促朝廷派军镇压暴动，说明了绅商并不支持辛亥革命。

四、恐怖主义的革命

1895 年的“兴中会”第一次暴动（广州暴动）就是一起恐怖活动。暴动中，兴中会众们在“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黄兴为首的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的光复会都是从事暗杀满人的恐怖组织。刘静庵、王汉、胡瑛等谋刺铁良，吴樾谋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邝佐治谋刺出洋考察的海军大臣载洵，熊成基、黄兴、赵声等再次谋刺载洵…… 革命党的历程就是恐怖暗杀的历程。刺客徐锡麟的一番话代表了恐怖主义者的思维：“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 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之反文明、反进步无庸赘述。在清廷锐意变革，引领国家进步之时，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代表着专制社会抗拒变革的力量。革命后，革命党将鼓吹和从事恐怖活动的邹容、吴樾、徐锡麟、秋瑾、汪精卫宣传成了革命英雄，在各地为刺客们大建纪念碑，传承着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果说，坚持暗杀满人官员的恐怖分子即为革命志士，那么暗杀汉人官员的回人、藏人恐怖分子也是革命志士。这种种族仇杀逻辑只能带来无休止的冤冤相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乃是日本人策划的种族主义、恐怖主义革命。它推翻的清廷已不是拳乱时昏庸的清廷，而是推动立宪、自治，推动向民主转型，

公布明确的立宪时间表，自愿放弃皇权，接受虚君共和的进步清廷。宣布预约变法后，中国在各方面的巨大变革有目共睹。在清末的变革中，中国政治多元、宽松，组党自由，政党、团体数以千计，办报自由，百家争鸣，报馆数百家。宣布预备立宪后，清廷不断重申恪守《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积极推进的地方自治，咨议局选举，资政院选举，保证按立宪时间表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甚至同意在条件并不成熟时提前召开国会。被推翻的清政府已不再是秦制的专制王朝，而是领导实施脱胎换骨变革的开明政府。至今，清末新政十年仍是中国历史上公民自由度最高的时期，是中国追赶世界潮流在社会各方面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国人最自由，财产权、生命权最有保障和最公平的时期。不幸的是，清廷推动的立宪革新被日本人扶植的会党暴动所断送。

清廷选择的和平改良，走向立宪、共和是中国的正确选择。日本不希望中国立宪成功成为日本的竞争者，不希望中国摆脱被肢解的地位，于是扶植会党推翻清政府。如此输入的辛亥革命反立宪，反共和，带来倒退与祸乱。有人争辩说，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皇帝，剪掉了中国人头上的辫子。如果只为达到这两目标，则辛亥革命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清廷推动立宪时已明确宣布，国会召开后，国体由国会公决。清廷已经表示不坚持满族皇权，也包括不坚持头上的辫子。只要按清廷的立宪时间表，到期召开国会，民意会决定要不要皇帝和辫子。争辩以推翻满清皇帝论辛亥革命之功者的背后理由其实还是恢复汉族江山。中国的历史证明，最黑暗，杀人最多的朝代不是外族入主的朝代，而是汉族皇朝。

辛亥革命将中国拖离了和平改良立宪的轨道，拖回了暴力专制之路，将中国陷入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革命后，清廷承诺九年实现的地方自治，国会民选，立宪、共和的目标在一百年后都没能达到。辛亥革命是会党革命，会党的破坏性之一是随时背约，言而无信。革命中，革命党在兵败时签署议和协议，得到日本军火后，立即撕毁协议，单方面制定《临时政府组织法》、

《临时约法》等服务一党之私的所谓大法，同时准备发动武装叛乱。辛亥革命使会党的不讲原则，不择手段，随意出卖国家利益，随意起兵造反，暗杀对手，嫁祸政敌，肆意搜刮民财，草菅人命等等罪恶泛滥。后来的革命党都继承的这些恶习。这些恶习是真正的辛亥革命精神。辛亥革命后，军队翻几番，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这才是辛亥革命的遗产。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发布《罪己诏》，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民初的主要政党不仅以共和、统一、民主、进步为名，而且确实以它们为宗旨，显示清末改革带来的巨大进步。岂知，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政府再无清廷那样的罪己认错之举了。仅此一点已让人们怀念清廷。

清廷的立宪和地方自治计划虽因外强颠覆失败，但其伟大意义不可磨灭。清廷将地方自治作为基本国策的行动表明，它准备彻底放弃两千多年来中央集权的“秦政”，走自治、联邦、立宪之路，准备跳出两千年来通过暴力、流血和连年灾祸改朝换代的轮回，走和平，妥协，平稳向新政体过渡之路，学习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清廷播下的地方自治的种子在十几年后催生了联省自治运动。

第7章 孙黄卖国

革命党宣称推翻清廷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实际上，革命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就财政而言，革命带来军队翻番，庞大的军费没有着落。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数十万革命军集结到了南京一带向新政府索要军饷，抢劫民财，为钱财地盘火拼事件每天发生。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各界和列强不承认，而是没有财源。以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不管谁主政，解决财政困境不外募捐、发债券和向列强借款三途。革命后，各省延续清末作法，截留税收，关余（即列强控制的关税扣除偿还列强债务后的剩余）掌握在列强手中，**a** 革命党成立的临时政府没有财源，孙中山向海外洪门发革命股票圈来的区区数十万元杯水车薪。革命军头们认为孙中山携巨资归国，将孙当作财神，一致捧孙为临时大总统。上台后，孙中山面对发军饷的巨大压力。到南京后，他立即谋求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西方列强拒绝承认未经国民公决，又没有代表性的南京政府，当然拒谈借钱。《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写道：“人们普遍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而获得拥戴。但他的巨款是多少颇有疑问。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1]

革命前，孙中山远走美国，除了同盟会“倒孙风潮”原因之外，筹款是赴美动因。他从日本人那里已经搞了十几年的钱，愿意为中国革命捐钱的富商们差不多都握有他的借条。他的筹款难度越来越大，于是转去美国搞钱。听到革命爆发的消息后，他立即向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搞钱。因为他知道，坐总统位将面临兑现革命高回报承诺的压力，必须带着巨款回国。被西方列强拒绝承认政府并拒绝借款后，他只好向老后台日本方面搞钱。在三十万军

队闹饷的险境中，他接受《东京日日新闻》（1月12日）采访说：“今后两个月内能否得到两千万日元，是件大事，胜负的关键是资金问题”。

由于没有财政资源，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任免、宣言之类文件基本不出总统府。外界知道的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禁蓄辫缠足、禁鸦片、禁赌博、禁贩卖人口等表明进步的法令。外界不知道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真正运作是孙中山、黄兴按照多年来的套路，向日本大肆出卖领土、主权、国有资财，以商民私产强作抵押谋取借款。早在孙中山绕道欧洲回国向欧美列强寻求借款时，黄兴已派何天炯为代表赴日本与三井物产交涉借款，并派人在上海与日本大仓洋行交涉，以沪杭铁路作抵押借款400万日元，以招商局财产、汉冶萍公司等国有资产为抵押筹措巨额军费等等。[2] 成立临时政府后，孙中山继续以何天炯为借款谈判代表，同时进行几项借款秘密谈判。

秘密谈判之一是以满洲主权换借款。十年来，孙、黄凭借割让满蒙承诺得到日本人无数金钱。回国路上，孙中山在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通过三井物产会社上海分社职员的山田纯三郎（在庚子年在三洲田暴动中遇难的大陆浪人山田良政之弟）转达，要求三井公司为南方革命军提供一、两千万日元的军费。[3] 得孙口信，三井物产会社将曾在上海多年，与黄兴、陈其美相熟的森恪从纽约支店调回上海支店，负责联络孙、黄。[4] 成立临时政府后，孙、黄决定将满洲再卖一次，由黄兴在上海向森恪提出了以满洲主权换取日本提供巨额军费的意向。三井物产公司首脑益田孝将黄的意向转达给了井上馨、桂在郎和山县有朋等日本政界元老。正策划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枢密院议长山县表示：“赞成乘此机会，与革命党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于我。”元老们商议后指示三井财团与南京临时政府展开谈判。森恪得令，开始为孙、黄同时操办“合办汉冶萍借款”、“招商局借款”、“苏路借款”、“满洲借款”。1月下旬，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三井物产签订了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南京草约”，主要内容为汉冶萍公司集股3000万元，中日各半，日本借款转股权，日本再借500万元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

2月3日，孙中山携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黄兴卧病不能出席）与森格、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举行了借款谈判。森格传桂太郎的话说：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必要保全满洲。……日本可派军舰接孙中山或黄兴秘密赴日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让予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如在阴历年底得不到 1500 万元，则万事休矣，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免有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5] 当天，森格在孙中山、胡汉民催促下急电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益田孝：“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阴历）以前如无 1500 万元难以作战，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 500 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 1000 万元。此项借款，如在 5 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中山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 500 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 1000 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中山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中山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 4 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 1000 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6] 随后几天，孙中山不断通过森格向日本方面催要巨款。孙如此急迫是因为其一，袁世凯正在说服清廷和平退位使南方失去拖延的借口；其二，南京政府在财政绝境中撑不了多少天了，黄兴为应付每日数十起索要军饷寝食俱废，以至吐血，转向主张放弃北伐。

孙、黄秘密借款案之二是汉冶萍公司股权借款。汉冶萍公司是洋务运动的招牌项目。洋务运动中，鄂督张之洞大力推行“湖北新政”，筹官银 580 万两在武昌成立了湖北铁政局。1891 年，大冶铁矿投产，1894 年，汉阳铁厂投产。日本贫铁，觊觎中国铁矿资源。甲午战后，日本人将中国东北（满州）和湖北的铁矿作为吞并目标。官办铁矿与铁厂因腐败和经营不善而

巨额亏损。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7] 1896年，清政府改官办的汉冶萍公司为“官督商办”，任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由于招不到商股，盛宣怀只得依靠向日商借款维持。1898年，清政府向日商借款开办了萍乡煤矿。1908年，清政府根据盛宣怀的奏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任盛宣怀为总理。

作为清政府唯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等于当时中国的重工业。从1908年到1911年，日商八次向汉冶萍公司提供了近两千万日元贷款。汉冶萍公司无力偿贷款，日债转为股权，日本向汉冶萍公司派驻了顾问、工程师、会计师，逐步控制了公司，也即控制了中国重工业。保路运动中，盛宣怀主持实施铁路收归国有政策而被指为国家罪人被迫东渡日本避难，汉冶萍公司处于停工状态。作为私人持股三分之一汉冶萍公司大股东，盛宣怀积极筹划向日本银行借款，使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希望出让的手中的私人股权，以免在战乱被剥夺。

武昌暴动后，黄兴派代表何天迥赴日兜售汉冶萍公司股权换取借款。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也通过王勋（孙的亲信、外交总长王宠惠之兄）向盛宣怀传话，要求盛出面与日本三井财团签定借款合同，将得款交他的革命政府。到上海后，孙中山一面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会面，正式提出向三井物产借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三井方面出500万日元支持南方革命党人；[8] 一面与森恪谈判以满洲主权换取日本借款，其中也包括了出让汉冶萍公司股权借款。孙中山的借款要求通过日本制铁所所长中村雄次郎、三井物产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外务大臣内田报给了西园寺首相。[9] 与此同时，黄兴致电盛宣怀，以没收汉冶萍公司相威胁，逼迫盛宣怀与日方谈判借款事宜。为保私产，盛被迫以汉冶萍公司的名义与日本银行展开了借款谈判。

1912年1月5日，森恪赶回东京，向总社首脑益田孝汇报了会谈情况。[10] 1月11日，日本外务省出台了由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的《日中合办

汉冶萍大纲》。1月12日，西园寺内阁会议通过了外务省起草的《合办大纲》，[11] 决定以日中合办汉冶萍为条件，对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期间，孙中山、黄兴要求盛宣怀根据《合办大纲》继续对日谈判汉冶萍公司股权借款，威胁若不配合则没收盛氏私产。盛因负责推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身败名裂，流亡日本，深知承担中日合办汉冶萍意味着更大的卖国骂名，要求孙、黄澄清谈合办是临时政府的意向，新政府对合办后果负责。孙、黄拒绝澄清，要求由汉冶萍公司自借巨款，将得款提供临时政府，摆明勒索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盛回复说，由汉冶萍公司自借巨款无人肯借。1月26日，孙、黄以南京临时政府名义秘密与三井物产会社缔结了与盛宣怀在日本所谈借款合同不同版本《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其主要内容为：

(1) 公司资本定为日币 3000 万日元，由中日合办；

(2) 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

(3) 公司已借日债 1000 万日元之外再借 500 万日元，总额 1500 万日元作为日方股金；

(4) 前项 500 万元由公司贷予南京临时政府，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余额作为向三井购买军火的费用。[12]

这一契约书实际将部分汉冶萍公司国有股权出卖给日本换军火。契约书签署后，黄兴再电盛宣怀，逼迫盛按“南京草约”速办合办借款事宜。盛为保私产屈服，在神户与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签署了中日合办汉冶借款萍草约，同时委托三井上海支店的森格与南京临时政府交涉收回私产事宜，并精心保存了孙、黄发起中日合办汉冶萍谈判的证据。

由于袁世凯正在说服清帝退位，留给孙、黄开战的时间不多了，二人一日数电急催盛宣怀速签正式借款合同，同时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金钱军火到手后六路大军北伐。在整个“汉冶萍公司合办借款”谈判过程中，孙、

黄以剥夺私产相威胁，逼盛宣怀出面操作，而将借款谈判、草约内容等等对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和南京参议院隐瞒。1月31日，革命党在东京办的《民立报》披露了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抨击借款案出卖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南方阵营领袖黎元洪和章太炎致函孙中山谴责借款案；张謇两度致函孙、黄，表示此事“于国防、于外交皆为大失败。民国政府肇建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歎笑？……中日合办之说，万不可行”，[13] 并重申拒任南京临时政府部长职以抗议孙、黄卖国交易；南京参议院谴责孙、黄出卖主权，声明出让汉冶萍权益须提交参议院议决，否则违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向临时政府提出质问书，要求临时政府派人到参议院就汉冶萍公司借款案解释；湖北参议员、“民社”骨干刘成禺提出议案：“临时政府押借外债及发行军用钞票，未交院中议决，有背临时组织大纲，計分三项：一、以兵力强迫招商局押借外款；二、擅发军用钞票；三、以汉冶萍合同押借据款，致成中日合办。凡此三端，既失政府信用，又足激变民心，应请公决。警告政府，另议善法。”对参议院的质询，孙中山答复说，借款系以私人出面押借，借得200万元，转借给了政府。刘成禺等再质问：该200万元借款，其条件究竟是什么？私人借款，私人究系何人？孙、黄无言以对。

孙、黄秘密借款案之三是以轮船招商局财产抵押借款。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创办官督商办公司。日本希望取得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以在中国长江流域与英国抗衡。革命爆发时，轮船招商局已变身商办公司，属于私人财产。孙、黄指派陈其美武力胁迫招商局董事会同意以该局财产作抵押向日借款1000万元给临时政府。董事会负责人答复，如此重大问题断非董事会议所能决定，须由股东大会决定。陈其美限股东会于1912年1月27日开会决议同意资产抵押借款。股东们拒绝开会以抵制临时政府勒索。2月5日，英驻日本大使就招商局抵押借款案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迫使日本外务省在讨论向南京临时政府巨额贷款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孙、黄秘密借款案之四是以筹建中央银行权换取借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阪谷芳郎博士（前大藏大臣）、原口要博士（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铁道顾问）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顾问，提出以操办建立中国中央银行之权换取日本提供一亿日元借款。为充革命军军饷和对袁世凯开战军费，孙中山要求日本方面在议案成立后十日内向南京政府提供 1000 万日元。阪谷芳郎收到孙中山委任函后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2 月 6 日，原口要携带阪谷芳郎给孙中山的信函和建立中央银行“特许状”的中英文译本来华，着手建立中国中央银行。

在谋求从日本借款的同时，孙中山政府采取了以下办法搜刮国内商民。

勒索商会：张謇在其日记中记载：“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初成立，急需军政各费，欲责商会更助五十万，余劝勿扰商，自任为筹。”张謇不愿看到革命后新政府勒索商会，宁可个人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得 30 万元充作临时政府的经费，取得了孙中山的欠条。当然，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后再未还款，实际还是勒索到了张的 30 万元。此外，黄兴、陈其美分头向各地商会勒索军饷；

发行军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各路革命军均在控制区内发行军票，因其信用扫地，遭到商民抵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以临时政府名义发行了总额 100 万元的军票，作为军饷发给革命军。革命军士兵领到军用票后立即到商家强兑银元，或强买实物。商民恐慌，“钱业、米店相率停市”以抵制军票勒索；[14]

发行军需公债：1 月 8 日，孙中山签署法令发行军需公债一亿元，声称以政府将来所收钱粮作抵押。国内商民和海外华侨均清楚这样的军需公债为勒索伎俩，无人认购。海外洪门和华侨们所持孙中山发行的革命股票尚兑现无门，感觉被骗，当然不会再认购其军需公债。与发行军票一样，临时政

府将军需公债券发给各省督军作为军饷。各省革命军持公债以武力胁迫商家认购，或以公债强换物资；

动用盐税：公债、之外，南京临时政府还打起盐税的主意。对此，张謇警告：“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丝毫挪移，因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张无力阻止孙中山动用盐税，只是由于临时政府迅速垮台，孙中山才没有来得及动用。

在国内民间极为困窘的情况下，政府强迫募捐、发债券等也与发军票一样受到抵制，所得数额不大，对解决财政困难杯水车薪。孙、黄与日本方面的几项秘密借款谈判消息被披露出来后，全国各界，包括部分革命党内部人士，强烈反对。章太炎、张謇带头抨击孙、黄卖国。孙中山拒绝与北方重开和谈，坚持等待日本金钱武器到手后展开北伐。对此，章太炎直指孙中山是舍不得大总统位。

最后让孙中山承认北伐无望的是日本军方的立场。孙与森格达成的出让满洲借款案在日本高层会议上遭到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军方认为，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是日本军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以生命换得，无须再以金钱收买。日本各界，包括军方，长期以来向孙中山提供了巨额的金钱，现在不应是日本再付金钱，而应是孙中山无条件兑现出让满蒙的承诺。^[15]军界之外，外务省也对满洲借款案持反对态度。外务省警告借款资助孙中山北伐会引起其它列强干预。根据军方和外务省的意见，日本政府最终决定，放弃扶植革命党北伐推翻袁世凯的计划，停止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日本政府的决定使孙中山的几项借款案一齐泡汤。2月8日，日本政府通过益田孝、森格转达，指示孙、黄对袁世凯妥协。同日，隆裕太后决定清帝退位的消息见报，使孙、黄失去了继续拖延取消临时政府的借口。在日本高层否决几项借款案，举国反对出卖主权的形势下，孙中山只得放弃“六路北伐”计划，准备下台。

实际上，拖延取消临时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并不只是孙、黄的主意，背后是日本方面扶植革命党北伐推翻袁世凯的计划。日本放弃这一计划如同十几年前“还辽”一样，不是主动，而是被迫。当年“还辽是”沙俄等列强逼迫的结果，如今放弃资助革命党北伐也是其它列强不容日本操纵革命党北伐推翻袁世凯的结果。宫崎滔天在回忆录中披露日本操纵孙、黄拖延议和准备北伐的内幕说：“这段时间内，袁世凯每次提出妥协条件时，我们便敷衍应付，不置可否，想方设法拖延谈判时间。胡瑛的先头部队来到芝罘，在那里等待这一千万元借到手，但是等到的却是对方的爽约。后来，袁世凯又提出谈判的条件，说是愿意听取你们的任何意见。最后我们提出了让皇帝退位的要求。袁世凯答应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再也没有拖延时间的口实，不必继续谈判下去了。当然，即使再拖延时间，也没有指望得到一千万元了。”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如章太炎所言，孙中山确实舍不得总统位。但在借款不成，北伐无望的情况下，他只得被迫向参议院提出辞临时大总统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票（十七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电盛赞袁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

孙中山请辞后，参议院继续向他质询汉冶萍等借款案真相。孙答复参议院称“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已经废止。参议院继续质询详情。2月23日，孙中山在第二次参议院会议上就汉冶萍、招商局两借款案作答：“汉冶萍之款系该公司以私人资格与日本商定合办，其股份系各1500万元，尚未通过合同于股东会，先由该公司借日本500万元，转借与临时政府，而求批准其事，先交200万元至300万元，俟合办公司成立，交清500万。该款已陆续收到200万元。本总统以与外人合股，不无流弊，而其交款又极濡滞，不能践期，是以取消前令。惟已收支之200万元照原约须为担保之借款。”[17] 事实是，孙中山通过勒索手段胁迫盛宣怀与日方谈判出让汉冶萍

公司股权换取借款，得到了部分款项。孙与日本谈的是出让满洲换 1000 万，另有 500 万来自汉冶萍合办借款。三井物产支付孙中山的 200 万元银票是这两项借款的首付。在收到 200 万日元后“合办借款”曝光，参议院质询，孙、黄再逼迫盛宣怀出面办理废约事宜，要求盛替他们背卖国和赖账的黑锅。在整个汉冶萍借款谈判缔约、废约过程中，孙、黄反复以没收盛宣怀私产相威胁。

盛宣怀何等精明，当然不能不明不白地为孙、黄背卖国黑锅。他想披露孙、黄的黑社会勒索手段，以及下列事实：关于汉冶萍借款有两份草纸，一是他与小田切所签的神户草约；二是孙、黄签定的“南京草约”（沪三井之约）；两约内容根本不同。他表示“我若再含糊，袁、孙并力集矢，死有余辜”，准备拒绝孙、黄的出面废约要求。但得知汉冶萍公司借款案已实际作废后，盛宣怀决定为收回几百万私产忍气吞声，放弃公布孙、黄勒索真相，安排召开股东大会，由股东会决定废约事宜，以对日本银行作交待。同时，他在贺袁世凯的当选大总统函中婉转说明自己在汉冶萍公司合办借款中被胁迫的苦处和无辜。

国人不了解孙、黄勒索盛的真相。如同辛亥年一样，再度掀起了声讨盛宣怀卖国的运动。民社、湖南共和协会、江西联合分会、四川共和协会、河南共和协会、国民协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等团体宣言对盛“处以最激之办法四条：私产概行充公、盛氏家族一律逐出民国之外、汉冶萍公司股东应立即反对盛宣怀合办之举，否则将其股票充公、宣布死刑”。[18] 2 月 24 日，盛宣怀分别致电汉冶萍公司董事杨学沂、赵凤昌等人安排召开股东大会废约，同时就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向众股东说明：“所有此事合办缘起，往来电文，特此抄送全分，望即刷印多分，开会之日，分送各股东阅看，便当一目了然”。2 月 28 日，三井物产应盛宣怀的要求出具了南京临时政府批准“沪三井之约”的证明。孙中山怕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借款案真相公之于众，向森恪撒谎说盛宣怀与小田切所签汉冶萍公司借款草约与南京临时政府无关。

3月22日，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召开了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否决了中日合办汉冶萍案，以仍选举盛宣怀为董事长的决定表达了相信盛氏无辜，间接地谴责了孙、黄的勒索。至此，孙、黄策划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案”划上了句号。

出卖满洲、出卖苏路路权、轮船招商局私产抵押、出卖建立中央银行权等几项借款虽然胎死腹中，但孙、黄几项借款案谈判得到了200万元巨额首付款，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众股东有苦说不出，成了是遭受革命党欺凌的羔羊和南京临时政府卖国的牺牲品，其中盛宣怀在收路权之后再背了一次卖国骂名。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最大的“会党公口”不是尹昌衡的“大汉公”四川光复军政府，不是焦达峰的“洪家天下”都督府，不是陕西的“哥老会码头”军政府，而是孙、黄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短短一个多月间，孙中山、黄兴疯狂出卖国家主权、领土、矿产资源、铁路路权，勒索商民财产，制造灾难超过任何一个会党都督府，是“会党世界”中最黑暗者。孙、黄一个多月间的作恶仅是革命政府作恶的开始。中国从些开始了革命党百年作恶的时代。

孙、黄的几项卖国借款案虽然在列强对日压力和各界对南京临时政府压力下废除，但其遗祸持续几十年。如此遗害无穷。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政府被迫为孙中山抢劫商民的临时政府军票、公债履行偿还义务，以抽签分六年还清。日本方面不甘被孙、黄以割让满蒙一骗、再骗，巨额金钱打水漂，在三年后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中特别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要求袁世凯政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权益收钱后赖账的行径付出代价，日本军人在二十年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满洲，要求强硬兑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为获金钱扶植而一再的割让满洲承诺。

对同盟会元老们，对国民党革命家们而言，孙、黄在日本和南京的卖国行为不是秘密。但这并不影响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领袖展开吹捧孙中山为“国父”的竞赛。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护自己的革命家名声、爱

国名声，革命家们会自觉地联手隐瞒作外国势力工具，出卖主权领土换取革命经费的真相。

第 8 章 袁世凯当国

清帝退位

1912 年 2 月初，袁世凯上奏清廷与南方达成的赞成共和、优待皇室条件、皇族，及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共十九条。隆裕太后授袁世凯全权成立临时共和政府，与革命军协商统一办法。2 月 12 日，清廷颁布了最后一道上谕——退位诏书。第二天，北京各家报馆全文刊登了这一清廷的最后诏书。

退位诏书体现了末代清廷顺应民心，避免生灵涂炭、民族仇杀和国家分裂的胸襟。当时，汉族会党“驱除鞑虏”的宗旨使国家走向分裂。鞑虏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革命党驱除鞑虏的口号意味着迫长城以北的广大满蒙族地区分离出中国。革命党人在“汉族十八省”建立大汉军政府时，蒙人理所当然地要求分离，建立独立国家。1911 年底，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称帝，将汉族官员驱逐。1912 年 1 月，呼伦贝尔盟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预备独立。在满蒙回广大区域独立趋势迅速蔓延形势下，若无清帝宣布和平退位及袁世凯政府及时公布对满蒙各少数民族的平等的待遇承诺，北方满蒙回地区分离出中国在所难免。由此可见，同盟会长期以来“反清复明、驱除鞑虏”宗旨是分裂回家的口号，清廷和袁世凯在革命中选择和平向新国体过渡道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南北方达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的主要内容为：

保留清帝尊号，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民国政府拨四百万元岁用予清废帝；清帝辞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清王公世爵仍旧；皇族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皇族私产受保护；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与汉人平等，信仰自由；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后来，革命党对退位的满清王室享受优待忿忿不平，认为是革命不彻底。须知，与清帝发布退位诏书避免北方满蒙回地区分裂出去的贡献相比，上述优待条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要而合理。而且，清废帝从未得到上述优待，民国政府因财政困难从未履行优待承诺，小朝廷只得靠卖宫中宝物维持生活。

清廷覆亡不是因为其保守，专制，而是因为不敌日本金钱武器的颠覆力量，不敌会党代表的专制力量，因为其推动的地方自治瓦解了自己的中央权威，以及因为财政破产的拖累。拳乱后，清政府财政赤字每年在 3000 万两以上，[1] 几乎所有省的财政都入不敷出。以 1909 年的东三省为例，奉天岁入 580 万两，岁出 940 万两；吉林岁入 180 余万两，岁出 450 万两；黑龙江岁入 90 万两，岁出 200 万两。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均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2] 财政破产的局面使中央与地方在财源问题上尖锐冲突，中央不得不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对外借款，使冲突爆发。

末代清廷的主要政策都顺应了进步潮流，没有暴政，堪称一代开明、进步的统治者。摄政王载沣积极推进立宪改革，主政后所颁书均顺应进步潮流，如申明立宪国策诏书曰：“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内外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翊赞新猷。言责诸臣，亦应于一切新政得失利病，剴切敷陈”；大赦诏书曰：“戊戌政变获咎，及先后犯政治革命嫌疑，与此次被胁自归者，悉原之”；推行地方自治诏书重申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各省咨议局开议的时间表；颁诏第一、二届各省咨议局筹办宪政事宜，要求“内外诸臣应竭诚负责，并命宪政编查馆稽核所奏成绩，有因循敷衍、措置迟逾者，甄劾以闻”。面对全国性的赴京请愿运动，摄政王宽容应对，宽容处置革命党刺客，

下诏开放党禁。革命爆发后，他发布了“罪己诏”，检讨过失，承担责任，主动请辞监国摄政王位。隆裕太后同样爱民大度，在革命中懿旨发帑银 20 万两赈湖北遭兵难民，发帑银 24 万两设立慈善救济会。革命党后来神化自己的同时尽力将末代清廷妖魔化。然而，在开明、宽容、推动立宪、顺应进步潮流方面，革命政府无法与末代清廷相提并论。

清廷覆亡并不影响清末十年新政变革的伟大成果。新政十年改革使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了现代化，催生了中国首部宪法大纲，是中国迄今空前绝后的伟大体制变革。孟子曾说：“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但中国两千年的秦制根本不容有听从民意的制度设计，也没有听从民意的代议机关。新政中，清廷效法西方“庶政公诸舆论”的议院体制，在京城设立了资政院，在各省设立了咨议局，以资政院为议院之基础，各省咨议局又为资政院之基础，开始向代议政治过渡。清廷承认皇帝也要遵行宪法，否定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秦制，显示出抛弃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变革的决心。

资政院和咨议局虽然只是预备机关，还不是正式的代议机构，但是从章程和实际运作进程来看，已经具备了现代代议机关的主要职能。根据《资政院章程》，资政院应行议决事件包括国家岁入预算、国家岁出决算、税法及公债、新定法典及嗣后修改等等，拥有了立法与财政之权，除选官用人仍由皇帝决定外，资政院已拥有现代代议机关的基本权力。所以说，清末十年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的“光荣革命”，它和平地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统制度。美国汉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指出：“粉碎两千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而是 1901 至 1910 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这蒙蔽了学者们的眼睛，使他们难于理解中国近代革命、静悄悄的新政思想和体制革命……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 and 体制的转变。1911 年后，置

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借清王朝的崩溃索取荣誉。他们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不感兴趣.....在因循袭旧的历史上，那些站在‘孙的 1911 年革命’之外的人们，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或敌人。头号敌人是袁世凯，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干人物，从 1912 至 1916 年的民国总统。他没有大吹大擂，却在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成就、使人惊叹的中国新政变革，就这样被遗忘了。.....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3]

《临时约法》

在同盟会内部讨论抢先成立政府的会议上，孙中山与宋教仁围绕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展开了激烈争论。宋教仁认为，总统制易导致集权独裁，需要以内阁制约束最高权力，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有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大总统尊其贵而虚其位，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孙中山要求大权独揽，称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之大计”。黄兴劝宋教仁服从总理孙中山，宋力争不让，与孙争到“面红耳赤，几至不欢”。作为几成定局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人选，孙、宋二人的主张都有自谋之嫌。僵局中，宋、黄专程赴南京，与各省代表商议。各省代表根据南北议和期间仓促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否定了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决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

1912 年 2 月 6 日，孙中山获悉日本方面否决了他的借款要求，在辞职前赶紧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无限扩大国会权力，剥夺总统权力，制定专门限制袁世凯总统权力的约法。根据孙的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十几个人儿戏般地起草、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

法》），于 3 月 8 日公布。修改后的《约法》规定参议院垄断政治权力，剥夺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和对参议院的制约之权，使总统沦为参议院的傀儡，为日后国会与总统冲突、“府院之爭”、议员腐败等等埋下祸根，成为民初政治动荡的灾难源头。孙中山要当总统时极力主张总统集权制，总统作不成了，立即要求剥夺总统权力。这种利用大法服务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作法是会党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特点的典型表现。

与宋教仁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一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只是照搬了西方法律中的三权分立、人民权利的词句，对各项权利全无保障条款。律师章士钊评论约法说：《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项权利，却没有规定如何切实保障这些权利不被侵犯，《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

[4]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清帝宣布退位后，孙中山为袁世凯就任总统提出了定都南京，须到南京就职，须遵守他制定的《临时约法》等为难条件，声称要在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后才辞总统职。孙的为难要求不仅为国内各界和列强各国反对，连革命党人组成的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反对。2 月 14 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召集参议院中的同盟会员开会，要求在第二天复议重新投票决议定都南京（如此革命党通过党员开内部会议操纵议会的情况此后持续了百年）。次日，黄兴威胁参议院说：“议院须于今日自动的翻案，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2 月 16 日，黄兴再威胁参议院说：“过了正午十二时，参议院再不改过来，我立即调兵冲入参院强行通过。”[5] 临时参议院在武力胁迫下屈服，更改表决结果，通过定都南京。上述行径显示，孙、黄没有丝毫共和素养。

袁世凯当然拒绝孙中山的为难条件，北方各地商会、咨议局、团体、报馆纷纷上书、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势新报》、《大共和日报》等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南方参议院“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为寒心”，[6]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这时，孙、黄在财政枯竭，革命军随时兵变的形势下无法在南京继续撑下去了。在举国反对声中，孙、黄被迫放弃定都南京的要求，也不敢再武力威胁南京参议院。没有了孙、黄的威胁，南京临时参议院重新作出定都北京的决议。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剥夺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免民国政府成立受阻，出现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接受了孙记《临时约法》，但坚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南京方面拒绝袁世凯的任命，南北双方又为内阁总理人选争执不下。经张謇出面调停，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的同时加入同盟会。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对革命党妥协，接受革命党服务私利的《临时约法》是一场政治灾难。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辞临时大总统职。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再提出派一万革命军护送议员北上，并长驻北京的要求。对此，黎元洪通电称孙的要求是亡国之举，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不得一误再误，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声明，如果南方革命党阁员再以各种理由拖延，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在北方政界军界一致反对声中，孙中山只得放弃无理要求。4月20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日，唐主持主持内阁成立会议，宣布阁员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未获同意，由唐暂代）。

就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发布了对蒙古族待遇的特别通告，申明奉行“五族共和”，禁止“驱除鞑虏”口号，禁止歧视满人蒙人，发布总统令确认蒙古王公、喇嘛的封号、特权，申明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藩属，申明保证优待各族人民，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组成亲邦，共享共和政府。对于前朝旧人，袁世凯强调，民国由清廷禅让而来，要“饮水思源”，确实遵守优待清室承诺，“优容前清耆旧”，“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民政长须由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者担任。他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作官，对应邀前来者尽量接见，“礼敬如宾”。

袁世凯的民族和睦政策和善待清廷旧人的政策有效扼制了满蒙回族地区走向分离，也使清室复辟派受到鼓舞。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为首的宗社党积极推动清廷复辟。溥伟、刘廷琛、陈毅、王宝田、温肃等人会聚青岛，商谈武装复辟计划。溥伟将自己北京房地产和书画文物出售抵押筹得了百万军费策动忠于清室的张勋济南举旗勤王。袁世凯获悉复辟计划，下令加强济南戒备，使张勋不敢轻举妄动，挫败了溥伟的“癸丑复辟”计划，同时对复辟活动采取了宽大政策，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对倡言复辟的宋育仁、劳乃宣等人“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宽大为怀”，发川资回籍养老。袁世凯“饮水思源”，信守优待清廷的承诺的怀柔宽大政策安抚了前朝遗老，调和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冲突，维护了国家统一，消除了种族仇恨，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各界和舆论一致盛赞袁世凯为缔造民国的伟人。这种赞扬恰如其分。因为，若长期鼓吹“驱除鞑虏”、民族仇杀的孙中山政府继续存续，满蒙地区定然独立出去，民族仇杀不会停止。

1913年2月22日，积郁成疾的隆裕太后病逝，仅享年46岁。史书记载：“二月二十一日，隆裕后已是弥留，到了夜间，回光返照，开眼瞧见宣统帝在侧，不觉呜咽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国已亡了，母又将死，汝尚茫然，奈何奈何？我不能再顾你了。’”^[7] 接内务府大臣世续报闻，袁世凯立即派荫昌、段芝贵、孙宝琦等人前往宫内帮助料理治丧事务，指示国

务院发出通告：“兹逢大清隆裕皇太后之丧，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议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特此通告！”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休会一天。2月14日，民国政府在大和门前广场隆重召开了国民哀悼会，参议院院长吴景濂主祭，恭读祭文，盛赞隆裕太后有逊位之德，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同“共和之美”，大会决定为皇太后建立铜像以表彰功勋。哀悼会期间，各使馆均下半旗致哀。祭奠之日，袁世凯臂带黑纱举哀致祭，并特备赙仪三万元。民国各地军政要员，也纷纷向清室发来唁电。副总统黎元洪唁电：“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山西都督阎锡山唁电：“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国民哀悼会的发起者吴景濂发表公启说：“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念谓美利坚之独立，受战祸者或七八年；法兰西之革命，演惨剧者将数十载，虽伸民气，实苦生灵。前清隆裕皇太后，默审潮流，深鉴大势，见机独早，宸断无疑。诏书一下，化干戈为坛坫，合五族为一家，大道为公，纷争立解。盖宁可以敝屣天下，断不忍涂炭生民，所谓能以私让国。”各大报纸均刊载了悼念隆裕太后的文章。其中《亚细亚日报》载文云：“隆裕太后去岁，不为亲贵浮言所动，力主共和，实为有造民国。今一日崩御，我五族国民，当同情哀悼。”祭奠之后，袁世凯召开了国务院特别会议，按照《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之规定，决议“隆裕太后祔葬崇陵，更兼赞助共和，有助于民国，故所有丧礼，务须从优，费用亦归民国政府负担。”参议院立即通过了国务院提案。袁世凯复令各部、院长官亲往致祭，特派赵秉均等政府军政大员与逊清御前大臣共同在太和殿侍班守灵，步军统领衙门亦设值班官员轮流护灵。还专派了民国的仪仗队、军乐队及守卫人员前往参加丧礼。

隆裕太后一生充满不幸。由慈禧太后作主成为隆裕皇后后她才知道，光绪本来看上的是德馨家的二女儿，婚姻是慈禧强加于她和光绪的。婚后她长期受光绪冷落，成为光绪与慈禧矛盾的牺牲品。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瀛台，

心情不好，动辄拿隆裕出气，甚至殴打，隆裕只有压抑心中委屈，哭怨老天对自己的不公，每天早上还是照例要去问候光绪，陪光绪吃饭。后来，光绪有所反思，开始同情隆裕。但隆裕从进宫当皇后就没真正快乐过，既不得光绪宠爱，也不得姑母慈禧的欢心，在经济上窘困得时常命人将首饰等值钱物品送至宫外典当。革命中，她发布了清王朝最后的上谕——《退位诏书》。退位后隆裕的心情可想而知。溥仪晚年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

中外舆论对隆裕太后的评价公正。她决定退位是为形势所迫，也是因爱国爱民。她在最后诏书中说：“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在国家将分裂，革命党挑起战争的形势下，隆裕太后的退位决定确有使国家免于战火之功。若清室拒不退位，听从个别王公劝说，退归忠于清室的满洲，则全国将陷于分裂与战火。隆裕太后与袁世凯携手达成了历史上流血最少的改朝换代。随着革命党当权，末代清廷和袁世凯被长期丑化。多年后，当国人见证了长期战争的政权更迭，见证了新中国政权大规模屠杀旧朝人员，长期迫害与旧政权相关人员时才能体会隆裕太后避免生灵涂炭主动退位之爱国爱民，才能体会袁世凯强调饮水思源，遵守优待退位皇室协议，重用前朝旧人胸怀之伟大。

孙中山办铁路

辞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离开南京，在周游中大力鼓吹建铁路。他在上海演讲说：“实行社会主义，以建设铁路为先”；在北京演讲说：“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者非他，即建筑铁路问题是也”；[8] 在接受西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此后中国将采社会主义，以建筑铁路为先。得知孙中山鼓吹铁路国有与大办铁路，袁世凯投孙所好，成立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任孙中山为会长、黄兴为副会长，发布总统令“授孙文以筹

划全国铁路全权”，每月拨三万元为办公经费，让孙考察铁路，首先安排孙中山去参观他在清末新政中修建的“京张铁路”。精于操办实务的袁世凯对孙中山的“大炮”（吹牛）之名早有耳闻，深知建铁路的里程不能乱吹，但为让孙中山不在政治上拆台，不再搞暴动而委任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委任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1912年7月，《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在上海采访孙中山后写信给莫理循说：“孙拿出地图，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这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在各省划了很多支线。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他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看着席地而坐，向我介绍铁路计划的孙，我在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他所描绘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这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不称职了。我真想花一百美元请人给孙画张像，他坐在地板上，旁边摊着一张地图，幻想着十年后中国布满铁路线。从越南老街到中国云南的小铁路就花了800万英镑。老天爷！一条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要举办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供达赖喇嘛逃跑之用。……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因为我一想起这个狂人认为他一挥手，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打开钱包，把金币抛洒在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在上海的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有着同样印象。他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

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党魁。[9]

10月，孙中山宣布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提出了集资60亿元、建350万里铁路（绕地球40圈）的计划。他在谈话中说：“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20余万（英）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70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5倍于美，苟能造铁道350万里，则可成全球第一强国。他主张“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10] 中外国记者们闻此都与端纳一样，认为孙疯了。因为60亿元相当于列强的岁入总和。一位美国人评论孙中山的铁路计划说：“他是如此的不切实际，幼稚得不值得重复，他不适合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11] 宣布成立铁路总公司后，孙中山率大批失业的党人，乘坐袁世凯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特制的豪华花车先后到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巡游。

袁世凯花钱让孙中山玩铁路以免除政治麻烦的安排没有奏效。孙中山的真正心思并不在铁路，在铁路豪游中筹划着造反，以考察铁路为借口赴日寻求支持，于几个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当孙中山叛乱失败逃到日本后，民国政府清查发现，孙中山在豪华视察中挥霍了120多万两公款。这笔巨款对当时破产的国家政府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的亏空。当年张之洞办官办铁路公司因管理不善而巨额亏空；晚清新政中各省办商办铁路公司也因管理不善而巨额亏空，但张和各省商办的公司多少还是建了一段铁路。而革命后，孙中山光吹牛考察一番即造成了巨额亏空，可见革命家败家的规模和速度空前，超乎想象。九十年后的2002年，中国铁路的营运里程也只有7万公里。这时人们才理解端纳采访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孙中山后为什么如此愤怒。

国会选举与孙陈刺宋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黄兴周游各省，宋教仁成了同盟会的主持人。为与共和党竞争，他决定解散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组新党——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他指出，会是秘密斗争的产物，已不合于现代政党政治，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已处于监督地位”，通过“相摩相荡”的党争达到政治日益向上，共和制度确立，政党自身完善和发展。[12]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五政团联合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宋起草的《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在宣言中，宋教仁借鉴美英经验提出“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在国民党纲领中，他放弃同盟会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的宗旨、口号，加入了追随进步潮流的妥协、包容、依法行事等内容，为国民党参加国会竞选奠定了基础。大会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翔、贡桑纳尔布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阎锡山、谭延闿、赵炳麟、陈锦涛、张继、孙毓筠、尹昌衡、于右任、蒋翊武、马君武、田桐、胡瑛等 30 人为参议。

同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了根据《临时约法》规定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三法案，启动了国会选举。《国会组织法》参照美国架构，分国会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 274 名，具体分配为：每省 10 名、蒙古 27 名、西藏 10 名、青海 3 名，由各省和地区议会或选举会选出；中央学会 8 名、华侨代表 6 名；众议院的议员按人口比例每 80 万人选出 1 位（人口不满 800 万之省，亦可选出众议员 10 名），总计议员 596 名，参众两院合计议员 870 名。《选举法》虽没有对参议员候选人文化、财产的限制条文，但规定参议

员由地方议会选出，而地方议会议员有资格限制规定，如此保证了议员有责任心和议政能力。由于当时对各省人口未作调查，故在国会组织法中规定了各省众议员名额为清末省咨议局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并具体规定了清末未设咨议局的蒙古、青海、西藏的众议员名额。众议员选举人条件为：在选举区内住满 2 年以上、满 21 岁、小学以上毕业男子，年纳直接税 2 元以上，有值 500 元以上之不动产者。当时，大多数国民文盲，妇女文盲率更高，无业游民数量庞大，全民普选既难于操作也不利国家进步，对候选人文化、财产的资格限制是进步的体现。《临时约法》与《国会组织法》公布后，各主要党派开始竞选，宋教仁离京南下，将竞选与在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相结合，巡回各省宣传宪政民主和政党政治的主张，演说极具魅力，轰动一时，在国民中取得了极高的声望。

11 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海外流亡归国。他捐弃前嫌，支持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思想是梁启超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提出的。他指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13] 他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设想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不搞政党，立宪派改组形成的改良派组织政党，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改造成政党，形成两大政党为主的政党政治局面，实行责任内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以达到立宪民主政治的目标。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从海外致信袁世凯，建议举外债渡过财政难关，集合立宪派清朝旧官僚组织政党，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归国后，梁启超推动以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和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联合，与国民党形成抗衡局面。他感到可以由此实现“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政党政治局面。

梁的两党制设想与宋教仁不谋而合。二人联手致力于实现两大政党互相制约的宪政格局。

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新生的民国举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国会议员选举。这次选举的登记选民约4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宋教仁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大胜，获得参、众两院40%以上的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选举结束后，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申明主张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中央地方分权。3月22日，应袁世凯之邀赴京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次日身亡，年仅32岁。中国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之路就此中断。

宋教仁遇刺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刺案。其来龙去脉须从同盟会内的山头之争说起。清末，湖南领全国风气之先。宗方小太郎在调查中国数省情况后指出，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作用巨大，“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他建议日本政府“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接受他的建议，日本朝野首先开始联络湖南会党。召集中国各路会党和留学生成立同盟会时，日本黑龙会没有从势力最大，人才济济的湖南会党选领袖，而指定在国内会党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不大的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作为平衡，黑龙会决定，指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湘派会党领袖起草同盟会章程。[14] 黑龙会没有从势力最大的湘派会党中选领袖的原因是，湘派领袖们有爱国主义观念，宋教仁、陈天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在发刊词中有“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之言，所刊文章在关注日战争的同时也揭露日本向中国扩张的野心，因此被日本当局以手续理由迫令停刊。显然，湘派会党的爱国主义观念与日本向满蒙扩张的目标不相符。

同盟会成立后，湘派与孙派不可避免地出现领导权之争。在会旗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发生分歧。孙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会旗。这一要求背后是黑龙会的意思。青天白日旗源于日本的旭日旗。黑龙会扶植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

同盟会，孙中山有必要通过旗帜表达服从。他不能明说是源于日本旗，而坚称是早已亡故的陆皓东设计。黄兴对孙坚持日式旗帜不以为然，指责孙中山“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15] 要求以华兴会的井字旗为会旗，并声言如必用青天白日旗则退出同盟会。不过，抗争的湘派们端的也是黑龙会饭碗，在黑龙会支持孙中山现实下只得妥协。宋教仁日记中表达对孙的不满道：“其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同盟会内的另一大山头浙派（光复会）也对孙作领袖不满。1907年中，日本政府礼送孙中山离日，浙派借经费问题发起“罢孙”。虽然黑龙会出面迫使浙、湘两派服从大局，让黄兴出面维持了孙中山的总理地位，但“罢孙”风潮使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中的独裁地位被实际废除。

孙中山远走美国后，宋教仁主持成立了另一会党组织。为得到黑龙会的继续支持，他沿用了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中部总会，但强调中部总会独立，废除总理独裁制，采取“合议制”，宣布“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他批评“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6] 批评孙中山在沿海打了就跑的策略，主持制订了以湖北为中心，策动长江中部各省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重点在新军官兵中发展势力，促成了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为武昌暴动创造了条件。

由于宋沿用了同盟会之名，孙中山得以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归国抢先坐上总统大位。宋教仁对孙中山归国途中以未来元首的名义发表一系列谈话颇为不满。当北一辉从上海到南京去劝他拥护孙中山时，宋教仁气愤地说：“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宋教仁所言只是气话，他不能扳倒日本人支持的孙中山，只能在张继等人相劝时顺势下台阶，到上海参加孙中山欢迎会。[17]

到沪当晚，孙中山在同盟会高层会议上与宋教仁围绕新政府组织形式发生了激烈争执。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孙因自己要当总统，坚持实行总统制以大权独揽，称内阁制不适合国情。二人激烈争论至不欢而散。宋的防止总统独裁之词触到了孙中山的痛处，让孙忍无可忍。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联手陈其美暗杀了浙派领袖陶成章以报复陶两次“倒孙”及推举临时大总统时对他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宋教仁反对孙中山武力推翻袁世凯的北伐计划，反对孙中山以迁都南京制袁的无理要求，指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宋此言不光让孙中山怨恨，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不满。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张合法参政党政治，提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推动立宪共和。在五党联合组成国民党的系列会议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出席了会议。虽然仍被推举为名誉上的国民党理事长，但这时国民党众望所归的领袖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宋反对起兵造反，合法参选参政的主张得到国民党人的普遍拥护。竞选活动中，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18] 宋教仁以他符合民意的主张，出色的组织、演说才能和理论素养赢得了各地民众和革命党人的一致拥护，演讲会场面壮观，所到之处，支持者人山人海，风头声望一时无人可及。

孙中山坚持暴力推翻民国政府的计划，不容有人挑战他的权力地位，对宋成为实际党领袖忍无可忍。在宋教仁领导国民党竞选期间，孙中山以全国

铁路公司总经理名义带领一批会众乘火车在全国考查铁路，被舆论界披露出不利新闻。同行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记载：“随行的有卫队、参谋人员以及许多美女。”张謇对此抨击说：“及见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风云潦乎，荣悴顿殊。宫室车马，子女玉帛之奉，过于昔日之王侯”。孙中山在国家财政破产的情况下公款豪游不仅为进步党人抨击，也令国民党内同志极为不满。宋教仁在各地巡回发表的竞选演说中讲到创建民国贡献时只提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同时批评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说：“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19] 孙中山难以忍受丧失领袖地位的痛苦，对报上宋教仁演说轰动、宋教仁批评他的铁路计划的报导极为愤怒，认为宋教仁对自己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早前的陶成章。作为会党，孙中山虽然知道三权分立、民权等字眼，但并不接受合法竞争、政治多元、妥协包容、权力过渡、领袖更替等理念。他信奉“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会党准则，认为以暗杀对付挑战者理所当然。考察铁路期间，他并没有象袁世凯希望的那样醉心于铁路，淡出政治中心，而是盘算着起兵造反。1912年底，曾长期扶植孙中山的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得此消息，孙中山感到有了造反的底气，于是制定了暗杀宋教仁，嫁祸袁世凯，制造借口起兵造反的计划，派陈其美实施暗杀。

帮助孙中山杀掉陶成章后，陈其美得以收编浙派人马，势力膨胀。他也对宋教仁解散同盟会极为不满，认为宋教仁改会为党坏了帮规，因此愿意为孙中山再次效命。得孙授意后，他指使应桂馨在上海刺宋。作为上海青帮大老，陈其美的青帮党羽遍布上海、江浙。应桂馨是青帮“大”字辈头目，受陈提拔重用。暴动前后，陈帮应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助陈暗杀了政敌张献贞，陈再帮助应摆平命案，派应担任孙中山卫队长。临时政府解散后，应在陈支持下成立了自认会长的青洪帮及哥老会的联合公口——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的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布下的眼线，替陈搜集情报。接受刺宋的任务后，应桂馨安排了栽赃袁世凯及总理赵秉钧的伪证——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

在国民党取得国会选举胜利时，宋教仁的同乡刘白（字羹臣）风闻会众中流传宋另组新党坏了帮规之言，提醒宋防范加害。宋在复信中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20] 孙中山得知宋教仁要从武汉来沪与黄兴“商议一切”，向陈其美交待后于 2 月 10 日匆匆离沪，以考察日本铁路的名义赴日寻求支持，同时避免见宋。

3 月 22 日，应桂馨、洪述祖安排的刺客武士英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对宋教仁行刺。刺案发生后，袁世凯电吊宋教仁，严令江苏都督缉拿凶手。在日本的孙中山反应迅速，一面通电要求严究凶手，一面要求日本外务省勿助袁世凯，同时动身回国。三天后，孙中山回到上海，接收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召集国民党高层开会，在会上提出“联日讨袁”，起兵讨伐北京民国政府。不明真相的黄兴主张循法律程序调查，谓“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21] 孙中山阻止司法调查程序，谓对付袁世凯只有武力讨伐。黄兴不知道，孙中山此时担心的是司法调查程序将使他与陈其美策划的刺宋案真相败露。由于陈其美事先早有栽赃布置，江苏警察厅迅速查获了凶手与洪述祖之间往来电稿。司法调查程序开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查获证据公布，法庭破天荒地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就在此时，凶手武士英在上海模范监狱被人灭口，使调查程序无法继续。

宋案达到了栽赃目的，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顿成声讨的对象，原本进展顺利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举袁世凯、黎元洪、梁启超分任总理、协理的计划泡汤，连推动三党合并的梁启超也因拥袁而备受责难，三党的不少党员改变支持袁世凯的立场，三党合并后在议院争得多数的希望落空，袁任命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成杀人嫌犯，声名狼藉。不久，嫌疑人应桂馨和赵秉钧也被灭口，公布所谓证据的程德全遭到国民党人追杀。随着主要

嫌疑人被灭口，宋案司法调查程序不了了之。各界根据栽赃资料的指引，指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宋案的幕后主使，国民党人控制的《民立报》、《民权报》充斥讨袁檄文。

国民党人后来神化孙中山，编造了袁世凯因怕宋教仁控制国会使他无法当选正式大总统而杀宋的故事。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制造宋案嫁祸袁世凯的设计：第一，国民党虽为当时国会第一大党，但只控制四成议席，袁世凯得到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组成）和其它党派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当选总统并无悬念；第二，若说袁世凯和赵秉钧蠢到留下一系列关于谋杀的往来函等待下台，再派刺客到上海监狱将刺宋案凶手灭口殊不可信，况且，这些“取证”、灭口等行动对袁世凯而言力不能及，但对控制上海地区的陈其美则易如反掌。从栽赃角度来看，陈其美预先伪造函电证据，在调查审判程序开始后灭口阻止调查是合理的设计；第三，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在日记中多有指责孙中山人品之词；

第四，宋将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知己和事业同路人，在信中和竞选演讲中盛赞袁世凯而不提孙中山，临终前最后的遗嘱是口述电文致袁世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第五，孙中山在宋案前就提出过“二次革命起兵”之说，了解情况的共和党人曾指称国民党向日本借款购械，准备谋割据东南”。[22] 宋案后，孙中山极力阻止司法调查，迫不及待地发动武装叛乱。梁启超分析说：“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23] 而一系列事实让人相信，宋案不仅是“同盟会人自屠”，更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宋教仁的日本挚友北一辉也得出与梁启超一样的结论。北一辉长期任宋教仁的助理，与孙中山身边有宫崎滔天，黄兴的身边有萱野长知一样，负有代表日本方面支持之责。北一辉对宋遇刺极为悲痛，展开独立调查后提出了宋案系孙中山与陈其美所为的结论。[24] 还有一些事实支持梁启超、北一

辉的结论。例如，《孙中山年谱》1912年的记载几乎详细到了每一天，而从孙中山从宋案前在沪活动到案后由日返沪，即1913年初至3月27日期间记录空白。[25] 显然，这期间的记录是因后来神化孙中山的需要被隐瞒。

会党之间没有妥协精神，有了冲突互相暗杀并不奇怪。宋案之前，孙中山、陈其美曾合作杀了反对派领袖陶成章，宋案后不到两个月，陈其美又暗杀了拥护袁世凯政府，反对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的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显示出孙、陈合谋暗杀与“二次革命”叛乱间的关系。宋案十年后，孙中山有言道“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所制”；他的信徒戴季陶后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抨击宋教仁“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26] 这些言论是梁启超、北一辉结论的另一注脚。

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宋案的阴影下开幕。梁启超代表袁世凯致词：“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民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随后，国会进行了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的选举。国民党为一方，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展开了竞争。国民党要求记名投票，三党要求无记名投票。由于国民党带有恐怖组织的特性，记名投票对国民党的政治对手意味着的人身风险。结果，国民党在宋案阴影的投票中再胜，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国民党人控制了参议院。众议院选举在共和等三党议员坚持下采用了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民主党的汤化龙、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正、副议长。两院选举让人相信，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胜除了宋教仁领导有方外，国民党的恐怖威慑力是决定原因，有暴力恐怖组织参与和竞选还谈不上民主。

“二次革命”叛乱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表面上拥护北京政府，实际拥兵割据南方。副总统黎元洪反对革命党割据，带头在湖北取消军政府，并发出“十害”通电，呼吁“军民分治”，废除各省革命军自封的都督，由中央政府任命各省民政长。梁启超响应黎的呼吁，撰文抨击革命党控制南方四省割据是以专制手段反对中央，反对共和。[27]

1913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新省级官制》和《都督府组织令》，将黎元洪在湖北实施的“军民分治”推行全国，规定大总统任命的“民政长”为一省行政最高长官，各省军政受中央陆军部领导，各省都督的设撤兼任由国务会议决定。孙中山坚持割据，指示国民党都督抗拒中央政府政令。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闿、安徽的柏文蔚等国民党都督通电宣布不承认中央政府任命的民政长，不容中央政府染指势力范围，秘密联络南方各省联手对抗中央，将国家拖入南北分裂。

被迫辞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没有放弃举兵北伐推翻袁世凯计划，相信日本还会提供金钱武器支持他推翻袁世凯。1912年底，他在铁路考中得知日本西原寺公望内阁辞职，前首相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感到机会来了。桂太郎长期致力于向中国扩张，积极扶植孙中山。庚子年，时任陆军大臣的桂太郎与首相山县有朋、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策划趁中国内乱肢解粤闽，派出大陆浪人和孙中山策动两广独立和惠州暴动。由于美英等列强的警告，日本政府被迫停止实施肢解计划，致孙中山和日本浪人的“三洲田暴动”失败。不久，桂太郎上台第一次组阁，在任内主持缔结了英日同盟，推动日本对俄开战，夺取满洲，同时积极扶植在日本的中国会党反清，支持黑龙会召集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指定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在桂太郎第二届首相任期内，日本积极支持中国会党颠覆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促成了辛亥革命。武昌暴动后，桂太郎接受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建议，推动日本政府在关键时刻向南方革命党提供了大批日本军火，帮助革命党人顶住

了北洋军的武力镇压，使孙中山得以抢到了临时大总统位。辞任首相后，桂太郎积极推动革命党武力讨伐袁世凯，支持孙中山出卖满洲主权、汉冶萍公司矿山产权、轮船招商局产权、苏路路权等等一系列借款案。由于西原寺公望新内阁担心美英干涉而最终否决了向孙中山提供军费北伐的计划，导致孙中山被迫下台。

得到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的消息后，孙中山立即策划了连环套计划：自己离沪赴日避开，派陈其美暗杀国民党内对手宋教仁，然后回沪国民党的领导权，将刺案嫁祸袁世凯作为起兵北伐的借口。到东京后，他面见桂太郎密谋武力北伐推翻国民政府的计划，并与桂太郎发起成立了中日同盟会。然而，桂太郎内阁上台不久即在护宪运动中垮台。孙中山赶紧求见日本新内阁成员。获得新外相牧野伸显和日本军界要人的支持承诺后，孙中山在日本购置军火，准备国内起兵。

3月，孙中山在宋案发生三天后回到上海。这时，宋案凶手已抓获在押，司法调查已经展开。孙中山召集陈其美、黄兴等人开会，定了袁世凯是称刺宋主使人的调子，要求立即起兵北伐讨伐袁世凯，致函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人，告诉他们将有日本军火源源而来，要求他们通电以宣布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政府。见孙中山执意起兵，黄兴一百八十度转弯，放弃循法律途径解决宋案主张，转而主张行刺，召集汪精卫、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等人成立“血光团”，计划携带炸药进京行刺袁世凯，声称“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4月，民国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署了“善后借款”合同。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国民党都督李烈钧、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按孙中山的要求，通电指责政府借款的目的是用作对付革命党人的军费。“善后借款”合同是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四国的银行所签订，因革命爆发而被搁置。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四国银行团续谈借款。四国银行团愿借款给袁世凯政府作日常费用，以维护北方的秩序，后因南方临时政府反

对而被搁置。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四国银团借款合同涉及东北三省税收，被迫邀日、俄两国加入组成了六国银团。对此，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说，六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损害了中国的行政独立，有违“门户开放政策”。根据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银行退出了六国银行团。美国的行动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谈判地位。英国为首的五国银团担心美国单独以更优惠的条件对华贷款，修改苛刻条件，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总额为 2500 万镑（合两亿银元）的《善后借款合同》和《善后借款垫款合同》。借款合同规定的归还庚子赔款和对外旧债占去借款之半，实收借款额仅为合同借款额之半。财政破产的中国政府长期陷于借新账还旧账的窘迫，这一半借款额也只能应付政府半年的行政经费。梁启超指出：“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张謇指出：“大借款为吾国命脉所关，断无终止之理”；财政总长熊希龄指出，辛丑条约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赔款和外债负担沉重，国家财政赤字每年以亿计，财政破产，民国政府成立后库空如洗，“南京库储仅余 3 万，北京倍之，不及 6 万”。[28] 革命前，中央的收入来自各省的解款。革命后，各省几乎全部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使中央政府失去财源。革命中，南北方都扩张了军队，全国兵员由清末的 50 万人膨胀至 110 万人，军饷每月近千万元，较宣统年间中央军费膨胀了四倍多。而裁兵须清还欠饷，发给恩饷，没有钱裁不了兵。革命带来军费开支以亿计，任何人当政，舍大借款别无它法。事实上，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以出卖满洲领土、铁路路权、汉冶萍公司矿权、设立中央银行及财政管理之权换取对日借款，宋教仁也曾计划将锑矿权出卖予日本换取经费支持。因此说，国民党人指责大借款没有道理可言，只是为自己起兵叛乱制造借口而已。

对于国民党数省的叛乱意图，副总统黎元洪致电黄兴和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四都督，呼吁“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解决，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北方诸省都督与北洋军将领一致通电谴责破坏共和；蔡锷领衔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声明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

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谓“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西南军民将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

由于国民党控制的几省都督已公开抗拒中央政府，袁世凯下令罢免对抗中央的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和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和安徽柏文蔚等人的都督职，调兵南下准备平叛，北洋集团冯国璋等八十二将领再通电，决心武力维护共和。孙中山将日本提供的军火弹药自上海运到九江，策动李烈钧、陈炯明分别在江西、广东发动叛乱。奉孙之命，李烈钧在湖口成立了自任总司令的“江西讨袁军”，通电讨袁，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孙中山的指挥下，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及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先后宣布独立。黄兴也积极策动叛乱，到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宣布独立，宣布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同时致书策动北洋系将领张勋倒戈讨袁，致书豫匪白朗策动其配合攻取河南，拆毁铁道。反袁派岑春煊也借机谋反，宣布自任讨袁军大元帅。

国民党人控制的数省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发动叛乱各省的省议会，调北洋军由京汉、津浦铁路南下平叛，命海军在长江加入平叛。政府军与国民党叛军在江西、南京一线发生了激战（即国民党史所称赣宁之役、癸丑之役）。7月25日，政府军李纯部击败叛军，占领了湖口。孙、黄的叛乱没有得到武昌暴动时那样的响应。各界民众和绝大多数军队将领反对国民党人破坏初建的民国法统。在国民党内部，相当部分党员也反对武装叛乱。政府军南下平叛时，梁启超、蔡锷师生发表了声明，支持政府平叛，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武力破坏共和。不得人心的叛乱迅速失败。7月底，黄兴寻求日本后台保护，乘日舰离宁赴沪。北洋将领倪嗣冲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人，被日军拒绝。孙中山与以往一样，遥控造反，自己早早安排了退路。见日本没有出兵支持，弃众先逃。8月4日，当四川第三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自称四川都

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响应叛乱时，孙中山已率叛乱骨干逃往了日本。首领先逃，各省叛军作鸟兽散，被动响应叛乱的各省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和“讨袁”旗号，宣布效忠政府，持续月余的国民党叛乱在国人唾弃声中结束。通过平叛，政府军扫除了国民党人在南方数省的武装割据。北京政府总检查厅发布了对孙中山、黄兴、岑春煊、陈其美、李烈钧、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张继、熊克武、钮永建、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叛乱首领的通缉令。

与庚子年三洲田叛乱一样，孙中山此次叛乱的败因还是日本政府退缩。在孙中山赴日寻求支持时，日本的大陆扩张派和军界表态支持，也提供了金钱、武器。但真到要出兵支持叛乱时，日本政府与庚子年准备出兵占领闽粤时一样，担心对华出兵招致美国为首的其它列强联手干涉，新内阁禁止日军向国民党人提供援助。日本军界虽服从了政府命令，但相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仍有利用价值，出动军舰接应国民党叛乱首领。至 8 月底，除陈炯明等人逃往南洋外，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一众叛乱骨干全被日本军舰接到了神户。

长期花费扶植孙中山的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对孙中山失望，不愿再到神户去接应孙等。因为，十几年前测试时，孙中山满口承诺革命成功后将满洲划归日本，然而将孙捧上临时大总统位后，孙要求将满洲再卖一次，再索要一大笔钱，拿了 200 万首付后下台。内田对吞并满蒙计划和合办汉冶萍公司等协议落空的结果极为不满，指责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29] 内田良平是黑龙会的首领，但不是大陆扩张派的最高领袖。大陆扩张派的首领犬养毅、头山满认为孙中山仍有利用价值，日后还会上台，[30] 将国民党叛乱骨干由神户接到东京，安排生活，继续豢养。其中，头山满将孙中山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供应一切。头山如此决定，内田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扶植孙中山等人。孙中山等国民党叛乱骨干得日本军舰接到日本，被日本大陆扩张

派继续豢养扶植的事实显示，“二次革命”叛乱是日本大陆扩张派颠覆中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孙中山后在《中华革命党宣言》中解释他所谓的二次革命说：“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按他这一解释，对某事不满就可以接受外国金钱武器颠覆政府。有这样的革命家在，国家永无宁日。袁世凯平定叛乱，捍卫了新生民国，无愧当时各界“缔造民国伟人”的赞誉。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

《临时约法》规定由国会制宪，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政府和总统。新国会选出后，梁启超推动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以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为党纲。梁启超在进步党成立会上阐述政纲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根据进步党和国民党的一致意见，国会于 1913 年 6 月底议决先制定宪法，按《国会组织法》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分别选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于 7 月开始制宪。然而，制宪刚刚开始，国民党人在南方发动了武装叛乱，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南下附孙叛乱，制宪进程受阻。

平定叛乱后，袁世凯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由于制宪没有完成，正式总统无法选出，成立已年半的民国政府仍是临时政府，总统仍为临时总统，不获列强外交承认，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梁启超上书袁世凯，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尽快完成制宪，选出正式总统。袁世凯依梁氏的建议，发布了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人承诺宽大，将通缉范围限制于孙中山、黄兴及暴动各省国民党领导人。8 月，黎元洪领衔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要求速选总统，再定宪法。因应各地要求，进步党改变主张，提出了由众议院先制定《总统选举法》，据此选出大总统，然后再制定宪法的议案。议案获众、参两院表决通过。10 月 4 日，国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总

统选举法》。其中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10月5日，中国第一部《大总统选举法》正式公布。

1913年10月6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国会在这一天根据《总统选举法》举行了中国首次总统选举，开创了民选总统的新纪元。众多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前来见证了总统选举。当天，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黎元洪当选总统、副总统。多数国民党籍议员投了袁世凯的票，间接表达了反对孙中山、黄兴叛乱的立场。当众议院院长、选举会主席王家襄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时，在场的各位议员，进步党、国民党，以及一些小政党的党员不分政见地为第一次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欢呼。虽然初生的民国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为民选总统作好充分准备，首次总统选举在诸多方面不如人意，存在胁迫、捣乱和政府派出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但选举基本顺利，结果众望所归。黎元洪在革命中被迫登上政治舞台中心，但在随后的南北和谈，民国建立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率先提出裁减军队，在孙中山发动叛乱时坚决维护共和，通电谴责叛乱，代表了维护民国法统的民意。在他影响下，部分革命党人放弃了造反，转而维护民国法统。他当选副总统也反映了国人珍视民国法统的主流民意。

10月10日，中华民国在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世界各国纷纷发来贺电。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日、英、俄、德、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国立即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美国、秘鲁、巴西三国在

4月国会正式成立后已宣布承认民国政府），并致贺电。各列强驻华外交官均出席了当天的总统就职典礼。典礼后，袁世凯接见北京外交团的全体成员，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显示民国融入国际社会，不再是暴力排外的愚昧中国。

当国的几年中，袁世凯在外忧内患，政府财政枯竭，革命党叛乱的逆境中领导民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快速进步。政治方面，民初延续了晚清的宽松局面，成为组党、办报最自由，舆论最自由、人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骂总统的文章多不胜数。例如，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笔名天仇）在《民权报》（1912年4月19日）以《杀！》为题，刊出“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袁世凯坦然面对这样的暴力文字，表现出大政治家的胸怀。

在经济方面，在清末地方建设中建树良多的袁世凯领导民国在逆境中造就了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袁世凯当国的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开办企业最简便自由的时期。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诀窍很简单：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二是保护经营自由；三是注重立法，以法律维护私人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在晚清十年新政推动商业立法的基础上，他推动颁布实施了关于企业注册和开设公司的法令。从1912年到1914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都有长足发展。在币制方面，民国政府根据梁士诒的建议铸造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的银元。这种币面铸袁世凯头像，被民间称为“袁头币”（袁大头）的新银币在全国流通无阻，很快就取代了其它银币的地位，是为中国铸币史上最成功的银币。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后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的教育制度法规，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和《实业学校令》，对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小学教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设修身、

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国语，取消读经课，女子加设缝纫，男子加设农业；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分政法、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各类；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与 1904 年的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缩短了学制，规定初小为义务教育，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提高女子在教育方面的地位，除大学还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中的高级师范学校，都可设女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所规定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算术课的比例；将手工、家事、园艺、缝纫等实用科目正式列入课程，这就加强了生产知识技能训练。清末民初取得的教育成就后来被革命党刻意埋没，不为后辈青年知晓。张元济、陆费逵、范源廉、沈颐诸等教育家 1914 年编成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反映了民初教育水平之高。这部女子高小教科书内容包括：《礼记》、《左传》、《国策》、《论语》、《孟子》以及历代名家诗文，《亚衣丹》、《记某法人事》、《鲁滨孙》、《英民之特性》、《述奈端轶事》、《斯密亚丹》、《海伦》、《达尔文》、《苏彝士巴拿马两运河》、《斯巴达妇女之美谈》、《立那》、《盲女》、《巴黎观画记》等及西方历史文化的课文，有讲述美国“丧明失聪”的残疾女孩儿罕伦（即海伦·凯勒）自强自立、学有所成的感人故事（感动了世界上无数人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愿望），有《民族之演进》、《社会》、《政体》、《爱国》、《我国地图》、《我国之交通》等常识，有培养爱国情操的课文，有《赋税》、《国债》、《资本》、《公司》、《保险》、《专利》、《通商》、《国货》、《币制》、《股份》、《慈善事业》等介绍经济学的课文，有《习劳》、《蚤（早）起》、《慎微》、《惜阴》、《友爱》、《和睦》、《自立》、

《诚实》、《忍耐》、《退让》、《礼貌》、《崇俭》、《交友》、《爱护古物》等关于伦理、审美，倡导良好生活习惯的课文，有《国文》、《文字》、《小说》、《诗歌》、《书信》、《阅报》等介绍语言、文体知识的课文，有《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四篇介绍主要宗教的课文，每篇二三百字，简要介绍该宗教的创始者、教义、传播、影响等，有《蚁》、《蜜蜂》、《象》、《狮》、《鹰》、《稻》、《麦》、《色》、《热》、《热与色关系之发明》、《火山》、《纺织》、《机器》、《纺纱机之发明》、《制麻》、《毛织品》、《育蚕》、《种痘》、《利用废物》、《利用天然力》等介绍大自然，启发蒙昧，激发学生求知欲的课文（课文中甚至涉及了今天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理念），还有《裁缝》、《烹饪》、《浣濯》、《造花》、《俭妆饰》、《婚姻》、《良妻》、《婴儿之保育》、《教子》、《姑舅》、《家计簿记》、《女子职业》、《看护妇》等专为女生编撰的家政课文。课本中竟没有选李白、杜甫的作品，所选是白居易的《赎鸡诗》、《放鱼诗》等感发恻隐，培植同情心的诗篇。其中，国文（第一册第二课）的课文这样写道：“今人之言曰：不习外国文，无以周知世界情状，固也。然本国文尤当注重。盖国文者，国粹之一也。相传至四千余年，通行及二十二省。苟国文不达，微特寻常应用扞格滋多，抑且蹈忘本之讥矣。俄裂波兰，禁用波文。英亡印度，专教英文。日本县台湾、并朝鲜，亦废汉文、谚文，通令小学校用和文课本。推其用意，无非因国亡而文尚存，则其遗民虽屈伏于势力之下，而腾怀故国，耿耿不忘，终难泯恢复之想也。然则求国之强，而蔑弃其文，有是理乎？”^[31]一部民初的普通教材，内容之丰富，理念之先进，无党派之私，在一百年后令二十一世纪的学子羡慕不已。与当今宣扬斗争、仇恨、一党之言、一党之私的党化教材对比，人们不能不怀念更加进步的民国初年。

《天坛宪法草案》与《中华民国约法》

在任临时大总统上，袁世凯接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聘请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F·J· Goodnow）教授为政府的宪法顾问，批准成立了杨度、马良为正副会长的宪法研究会，以向制宪机关反映政府的意见。1913年2月，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及民主党等四大党的议员18人组成了宪法讨论会，开始磋商宪法原则和内容。4月，古德诺来华，受命草拟民国宪法。他认为中国有君主集权的传统而向无议院传统，普选制暂不适合中国，行政之权归于中央政府的总统制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强固政府，维持政局稳定，以改良财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与人民的法律关系，等若干年后再采用内阁制较为有益，建议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应是具有弹性的纲要，以便日后修正；在内容上宜采用美国式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6月，古德诺拟就了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强化行政权力为主旨的宪法纲要，交宪法研究会。

7月，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出三十位议员组成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会场开始制宪。六十位宪草委员中，委员长汤漪率二十八位国民党籍委员控制了制宪。起草刚开始，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于是出现了国民党人一面在南方武装叛乱，一面又在北京主导制宪的荒唐局面。为早日完成制宪，袁世凯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暂时容忍荒唐局面，派官员将古德诺草拟，宪法研究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大纲草案”共二十四条，主旨在于打破临时约法国会垄断权力的规定，要求“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国民党人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以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为由拒绝接受宪法大纲草案，将袁派来的官员逐出了会场。10月，在南方的叛乱被平定后，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向袁世凯提交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

国民党人制定的《天坛宪草》服务革命党一党私利，其破坏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破坏了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宪政原则，将总统代表的行政权置于国会控制之下，规定总统行政的决定均须经革命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没有国会认可什么也办不成，而国会的权力不受制约。按照西方三权互相制约的设计，国会通过不信任案或弹劾案来制约总统的行政权，总统也可以解散议会来制约国会，当国会对政府的提议通过不信任案，内阁又不愿意辞职时，内阁可以提请总统解散并重选国会，让选民作出判断。例如，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规定，解散议会权不必经国会同意。但是《天坛宪法草案》规定总统解散国会须获得议会多数同意，实际废除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使国会得以滥用权力，形成多数暴政。对于天坛宪草中革命党控制国会剥夺总统行政权的设计，古德诺指出：“在用内阁制者，行政权以解散议院为最效力之武器，议院有恶意，或轻率之举动，惟此足以制之”。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对天坛宪草表达同样批评说：“总统解散众议院之权如得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始能解散，不免为有名无实之权。若惟议会有武器，而政府毫无武器，其结果会出现议会专制之奇观，不可不防也。”其次，天坛宪草根本违背了代议制度原则，制定了寡头政治的框架。它规定设立四十位委员的国会常设委员会，在国会休会期间，这个常设委员会代行宪法解释权、国务总理同意权、请愿权、建议权、质询权等等。对此，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进步党的法律专家张东荪也抨击国会常设委员会权力的合法性说：“国会之补助机构，自不应与国会有同等之职权，且其职权非自国会委任而来，乃宪法上直接赋予者也”。国民党籍宪草委员张耀曾承认，设置国会委员会提案目的明显是要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以为党派斗争服务。第三，宪草中规定众议院可以通过不信任决议倒阁，但没有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行使不信任权，实际规定国会有随意倒阁权。按照天坛宪草，议员总数过半就可以开议，过半出席议员同意即可倒阁。这种条文明显是服务国民党人操控政府的专制

条款。第四，天坛宪草规定了国会权力不受制约，国会立法权凌驾于司法、行政两权之上，总统处处受制于国会，成为国会傀儡的框架。它将国会权力尽量扩大，侵入行政领域，将人事任免权、解散国会权、紧急命令权、军事权、外交权、法律公布权、戒严权、赦免权等总统权力架空。

对于天坛宪草，古德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代议制经验的国家，国会目前只应作为咨询机构。而国会推出的宪草使总统“徒拥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将导致政府不稳定。总统应对国会通过的宪草等议案拥有否决权。他建议将原来的两院制构想改为一院制，赋予总统钦定议员及解散国会的权力；[32] 袁世凯的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与古德诺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中国若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对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惟有由大总统决定政治方针，不问何党派，只要“有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才能致富强；进步党的法律专家张东荪指出，《天坛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是立法（国会）至上，国会权力不受制约。

袁世凯反对国民党人主持制定的宪草，指出：“国会不信任权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国务员即使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在众议员少数人之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他向国会提出咨文，指责国会侵犯了总统的法令公布权，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大总统行使制定官制、任命官吏、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行政权时无须经国会同意。对于袁世凯的《增修约法案》，国民党人控制国会以宪法已在起草过程中为由予以拒绝。袁世凯不能容忍发动武装叛乱的国民党继续专权国会，要求各省对国民党控制制宪局面表态。直隶冯国璋、刘若曾、浙江朱瑞和屈映光、河南张镇芳、湖南汤芑铭、广东龙济光、江西李纯、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湖北黎元洪等各省都督、民政长迅速复电表示，发动叛乱，危害国家的国民党人断无理由继续盘踞国会，主导宪法起草，要求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议员。11月，报刊披露出徐秀钧等国民党籍议员与南方叛乱骨干李烈钧与密谋策动推翻政府的往来密电，各界对国民党人控制国

会的不满爆发。袁世凯顺势发布命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随着国民党垄断国会局面打破，宪法起草委员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被废弃，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停会。1914年1月，袁世凯据政治会议决议下令解散第一届国会，成立“筹办国会事务局”筹选新国会。至此，孙中山发动叛乱使国会在开幕半年后被解散，制宪受阻。这种局面是孙中山胁迫南京参议院制定出国会专权《临时约法》带来的必然灾难。袁世凯上台之初接受了孙中山的恶法，使自己陷入了要么作国民党人国会的傀儡，要么背毁法恶名的困境。

应进步党人的请求，袁世凯指定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了前云贵总督李经羲为议长的政治会议作为政府咨询机关。5月1日，袁世凯政府提名57位议员组成的约法会议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大总统具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之权，经参议院同意，有解散立法院之权，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其立法机构称为立法院；仿美国，设国务卿职位等等。新约法的主旨是纠正《临时约法》国会专权，凌驾行政权的弊端。

中华革命党成立

被日本人接到东京安顿后，孙中山、黄兴发生了争执。孙中山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因为党众不服从领袖命令，指责黄兴在宋案后反对起兵“贻误了战机”，在起事后不坚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他在致黄兴的信中写道：“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不满于兄之处也。”[33] 黄认为孙是将自己的失败之责推给他人。在革命前

途问题上，孙主张再举“三次革命”，黄兴主张缓行革命。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党人之间出现冲突全由背后的黑龙会决定局面，此次也不例外。奉黑龙之命，宫崎寅藏“在 1913 年 9 月间几乎每天往访孙、黄，以缓和两人对立”。他在信中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34] 宫崎的调解未能消除孙、黄分歧，在日本的国民党人分裂为了两派：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谢持、居正等人追随孙中山；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人支持黄兴，反对再举“三次革命”。黑龙会认为坚持颠覆民国政府的孙中山更有利用价值，决定扶孙弃黄。孙中山最清楚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指出：“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第三次革命成功的前提是寻求日本的支持”。[35]

这时，内田良平、黑龙会和日本企业界、军界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再向十年前那样慷慨了，因为第一，日本朝野对扶植中国革命党多年而未能在革命后达到取得满蒙而感到失望；第二，日商们大都握有孙中山的革命借款欠条，对在中国革命后获得偿还感到失望，不想继续被冤大头；第三，袁世凯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声明：“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孙中山从日本商人处搞钱困难，于是转向其它列强筹款，例如向美国商人戴德律（James Deitrick）提出以中国百货业、矿业、钢铁工业、兵器工业、运输业等各项经办权利换取向 1000 万美元的革命经费。列强不相信孙中山有资格出卖商业经营权利，无意提供资助。从东西方列强都没有得到慷慨资助，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们生活开始艰难，除拥孙派骨干得黑龙会资助仍衣食无忧外，普遍党众得到的资助微薄，甚至根本得不到，生活穷困，一些党员只得向官费留学生乞贷，“买点红薯充饥”。[36] 孙派革命党人尚且困窘，不愿再举革命的黄兴一派对日本朝野缺乏利用价值，就更得不到资助，在日本难再立足，纷纷为了温饱四散世界各地，无所作为。其中，黄兴离日赴美，寄身美洲洪门会党。

不久，在日生活困窘的流亡革命党人时来运转。1914年7月，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元老、陆军、财阀纷纷向外务省递交意见书，主张乘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采取强硬路线，夺取德国在华势力范围。黑龙会立即决定，重新成立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作为压迫袁世凯政府的工具，于当月在东京召集革命党人大会，宣布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宣布新党采取党魁独裁制，沿用他的《革命方略》，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党旗，党员必须对他个人效忠，宣布陈其美为副党魁兼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张人杰为财务部长。两年前，宋教仁将会党同盟会改造成了公开的现代政党国民党。如今，孙中山将党又改回为会党，要求加入中华革命党者“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37] 要求会众用黑社会语言在他面前宣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服从命令、尽忠职务、严守秘密、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当面按上指印，宣誓承认孙对自己有生杀之权。

党众对孙盟誓后，孙自己也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38] 居正后来回忆：“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仪式有异议，孙中山寸步不让说：一、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对‘服从个人’有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见识有限，应该盲从我……。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39] 孙中山、陈其美坚持首领对会众有生杀之权立场是了解宋教仁刺案的钥匙。

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孙中山将人民划分为几等：“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凡于革命军未暴动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暴动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40] 他认为自己有权指定谁有资格作公民，有权剥夺绝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资格，有权将中华革命党之外的全国三百多政党取缔，显示他的革命理想其实是变相帝制。流亡在美的黄兴批评说，宣誓附从一人，加盖指摸“迹近污辱”。曾奉孙之命带头叛乱的李烈钧说：“国内之国民党机关，虽被袁氏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地政府，从未有干涉，而中山先生又新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岂不是将海外已成立之国民党取消，是以绝不赞成。”黄兴等人离开并不影响孙中山“毁党造党”。有日本人提供的金钱，孙中山的新党不愁没有中国留学生和原同盟会员来投。

成立新党后，孙中山沿用老套路筹款，具体行动包括：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了商谈，与坂野吉三郎主持的“精神团”订立盟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它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41] 通过坂野运动日本军界；成立中日实业协会，承诺出卖中国商业特权，换取金钱支持；签署发行中华革命党债券集资，承诺推翻袁世凯政府后由国库偿还等等。9月，日本出兵占领了原德国租界胶东半岛，日本军部以中华革命党为颠覆民国政府的工具，开始向孙中山提供金钱军火。有了军部的强力支持，中华革命党号召力倍增，流亡海外的失业革命党人和留学生纷纷向孙中山宣誓打指模，参加革命。孙中山组建了由日本浪人、日本军官为骨干的“中华革命军”，分赴东北、山东日军占领区，招募扩充武装，充当日本中国政府的别动队。在山东，中华革命军以山东日军占领区为后方，向民国政府管治区大举进攻，占领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

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黄兴、李根源、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谭人凤、熊克武、龚振鹏、白逾桓、刘大同、汪精卫、于右任等原同盟会员以欧事研究会为名另组新党，多年搭档革命的孙、黄就此分道扬镳。没有列强资助的欧事研究会无所作为，挂名成员四散各国。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的不同命运说明，中国革命的原动力来自外强。外强颠覆中国政府的计划造催生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党，外强的内定造就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坚持向外强出卖领土主权和颠覆政府，因此总能得到外强的金钱、军火扶植，总能召唤到大批想通过造反实现野心的游民，总可以“毁党造党”。孙的行径虽在当时为民国政府和国人所不齿，但名声是可以通过宣传改变的。后来革命党控制宣传工具，将当初的卖国、叛乱行径都宣传成了革命举义，将负责扶植孙的日本大陆扩张计划执行者都宣传成了革命友人。

《恰克图协约》与蒙古分离

随着汉族会党革命兴起，蒙古人感到了“驱除鞑虏”口号的威胁，强烈地要求独立出中国。1911年7月，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亲王代表四盟，率代表团赴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支持建立内、外蒙统一的独立“大蒙古国”。俄国吞并蒙古的愿望强烈。十七世纪，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开始了向蒙古和黑龙江流域扩张的步伐，经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界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塔城界约》、《伊犁条约》，将中俄边境步步向东、向南推进，侵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确定了将边界推进至长城脚下的“黄俄罗斯计划”，要求将蒙古、新疆和满洲吞并。其它列强不容俄国吞并满蒙。在其它列强的强烈警告之下，俄国被迫承诺遵循“门户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俄国清楚，自己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的“大陆扩张计划”冲突，要避免再次的日俄战争就不能将外蒙霸占为属国，而只能以蒙古自治的形式间接控制，于是在讨论蒙古人要求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俄国政府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

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42] 会后，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答复外蒙古代表团说：“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不能实现，但俄国将支持蒙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双方协议，俄国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蒙古独立后给予俄国特权。

武昌暴动后，革命党在全国掀起了“杀鞑子”狂潮，使蒙古人更加坚决地寻求独立。11月，蒙古军队在俄军的支持下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及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国号“共戴”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的行动：发布大总统令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43] 致电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劝哲布尊丹巴“勿再听信他人唆使”；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代表前往库伦申明优惠安抚的民族政策；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其中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給”；大批加封的蒙古王公，优待脱离库伦“大蒙古国”回归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亲自接见回归中国的库伦贝勒，晋封其为郡王等等。但是，在中国南北分裂的形势下，袁世凯无力阻止沙俄策动蒙古独立。

1913年7月，俄、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以东经116度线为界瓜分内蒙为各自的势力范围。10月，沙俄驻华公使与“大蒙古国”代表展开谈判。民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沙俄干涉中国内政。沙俄不理睬中国的声明，与“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俄蒙协约》规定，俄国支持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蒙古无论与何国订立任何条约，未经俄政府允许不得违背本约

及附约内之各条件，实际否定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俄蒙协约专条》（附约《通商章程》）规定，俄国人在外蒙享有自由居住、往来、经商、租地、买房、开垦，经营矿产、森林、渔业等事业，进出口免税，开设银行，设立邮政，设领事及领事管辖的贸易圈，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特权。俄蒙签约消息传出，全国政党团体纷纷通电斥沙俄侵略，各地纷纷成立“救蒙会”、“抵制团”等，抵制俄货，不为俄人服务，索兑俄币，导致华俄道胜银行纸币“不能流通市面”。在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梁如浩辞职。新任外交部长（前驻俄公使）陆徵祥向俄国声明：“中国万难承认《协约》，因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凡有关蒙古之协约均须与中央政府，而不能同库伦缔结，外蒙之事非经中国承认者，一概无效。”沙俄强硬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声明，提出居中蒙之间进行调停，以让蒙古当局接受俄国提出的外蒙古“自治”方案，放弃立国为条件，交换中国政府保证不在蒙古驻军，不向蒙古移民，不在蒙古设置官方机构。由于在外交承认、缓付赔款和善后借款等问题上有求于俄国，袁世凯政府被迫同意了俄国安排的外蒙古“自治”，承诺不向外蒙古移民，同意俄人享有俄蒙《商务专条》所规定的在外蒙古的各项侵略特权的《六条草约》。

在中俄达成《六条草约》之际，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沙俄乘中国内乱推翻《六条草约》，拒绝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袁世凯政府无力用强，被迫对俄妥协，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与权利的要求。1914年9月，中、俄、蒙三方代表根据《中俄声明》在恰克图开始谈判。这时，孙中山在日本军部扶植下组织了中华革命军派回山东等地日军占领区，声言开展推翻民国政府的“三次革命”。孙的叛乱及背靠日本的颠覆活动使民国政府在对沙俄交涉中处于腹背受敌的软弱地位，被迫一退再退，接受俄国的安排，与外蒙代表坐在了一起谈判。谈判中，俄国代表得寸进尺，拒绝任何让步，强硬地驳回北京政府提出的收回唐努乌梁海的要求，多次以停止谈判相要挟。

中、俄、蒙三方谈判期间，日本出兵强占胶州，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在华一系列特权的《二十一条》，同时策动中华革命党以山东、东北日军占领区为基地开展颠覆政府的行动。俄国想乘日本压迫中国之机支持蒙古代表拒绝中国政府的宗主权等要求，但这时俄国深陷欧战自顾不暇，与中国一样的谈判地位软弱，也被迫软化立场，同意了“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要求。1915年6月，俄、蒙、中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共二十二条，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俄蒙协约》签定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采用民国年历；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

《中俄蒙协约》使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丧失，仅保留名义上的宗主权。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在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指出：“（外）蒙古无疑已沦于俄人之手。其独立全系俄人所操纵，三倍于东三省之土地、矿产等天然富源，尽为俄人囊括而去”。[44] 对中国来说，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各种特权的无疑丧权辱国。但它是俄日两强同时压迫，中华革命党在山东为虎作伥发动军事进攻的局面下，袁世凯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了。袁世凯主持恰克图谈判与主持随后的对日《二十一条》谈判一样，体现着弱国爱国领袖的悲壮。在日、俄两面压迫，革命党为虎作伥，内乱外患的逆境中，袁世凯领导民国政府艰难对俄、对日交涉，维持了清朝遗留版图的大致完整，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在多年后拒绝革命党人的宣传，评价袁世凯为爱国者。

《二十一条》与《中日盟约》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一个多月中，孙中山、黄兴与日本方面同时展开多项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借款谈判。担心其它列强联合干涉，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停止资助孙、黄北伐。没有了日本提供金钱军火，孙中山被迫下台。随

着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三井公司应内田良平之请借给黄兴的 30 万日元、森恪通过萱野长知借给黄兴的 15 万日元、以及藤濑政次郎付给孙中山满洲借款和汉冶萍公司借款的 200 万元首付都打了水漂。日本朝野对未能得到满洲、汉冶萍铁矿和铁路路权且损失巨款的结果强烈不满。黑龙会写道：“中国一次革命因袁世凯之出现，变成种瓜得豆之结局。我国志士原期待革命成功后，日支国交可得以调整，满洲问题可以解决，故而不惜为革命党付出大量援助。值此际却不得不对以往之对支政策加以重新检讨。……革命之结果以枭雄袁世凯独得渔翁之利而告终，受我国志士多方援助之革命党一派，竟甘於不彻底之妥协。……我国志士吟味以不妥协之妥协而完成革命之经过，不由生出意犹未尽之感叹。……历来即给予革命党以几多同情之我国志士，于是不得不重新返回冷静自我之立场，以之考察中国问题。”[45] 日本朝野对袁世凯上台后不承认孙中山出让满蒙承诺不满，因此支持反政府的革命党发动叛乱。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时，山本权兵卫内阁顾虑英美干涉决定继续奉行与英美协调的政策而下令不准日军介入，但在华日军不顾政府命令，派军舰将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叛乱骨干接到了日本。日军这样作是因为，日本大陆扩张派准备推翻袁世凯，要留着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作为推翻袁世凯的人才储备。

孙中山不甘坐等日本起用，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反政府计划。1914 年 4 月，他致函第二次上台组阁的大隈重信首相，向大隈建议：“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余地，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得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那之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何也？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共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

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国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要之，助一国之民党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46] 大隈正在考虑以逐孙中山离日为筹码，换取袁世凯承认孙中山临时政府答应日本的各项在华利益，得到孙中山的建议函后改变了逐孙想法。

7月，欧战爆发，日本决定趁机向中国扩张，同时决定起用孙中山为首的流亡革命党。根据政府决定，黑龙会召集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作为推翻袁世凯政府的工具，在《备忘录》中说明：“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47]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它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48] 8月，在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的背景下，孙中山向头山满提出了发动颠覆北京政府的“三次革命”计划，再向犬养毅寻求支持说：“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

本政府务必支持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49] 10月，内田良平向元老及大隈内阁提出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在其中提出，日本应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兑现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作出的承诺，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采用日本兵器，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给予日本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依据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及日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大纲》等几个文件，日本外务省整理出《对支政策文件》（《二十一条》草案），报大隈内阁会议获得批准。

11月，驻山东德军向投降，日军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区域，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无力拒日，只得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宣布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地区”。加藤外相认为时机成熟，命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日置益提出两项压迫建议：“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50] 加藤外相批准了日置益的附加建议。当月，在美国的黄兴通过北美洪门的冯自由向孙中山传话：反对与日本黑龙会合谋压迫北京政府，“慎勿驱虎进狼”；李根源、程潜、熊克武、林虎等前叛乱骨干也在东京发出联名通电申明：“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人响应黄兴、李根源等人的主张，联合致电孙中山要求“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

1915年1月，袁世凯政府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军。日本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撤军要求，日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觉书》）。日置益刻意在交涉细节上表现对中国的倨傲与高压，不通过中国外交部，坚持在袁世凯总统接见时直接面交，选用印有机关枪和军舰的

水印纸书写《二十一条》，并威胁说：“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迅速商议解决，并保守秘密，否则须对后果负责。中国革命党与日在野人士过从甚密，势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则日政府实难控制革命党不在中国行事。”此言道出了日本朝野豢养孙党的用意。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内容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权益共二款；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规定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共七款，规定日本在华享有一系列特权，包括中国政府须聘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等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对中国的强权压迫，但条条都是孙中山主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内容。1897年，孙中山在接受内田良平测试时就承诺革命后割让满蒙予日本；在同盟会总理任上，他长期靠出让满蒙予日本的承诺向日本朝野筹款；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上，在与日方多项借款谈判中承诺予日本汉冶萍公司权益及中国政府须聘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等一系列在华特权。事实上，日本的《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孙中山信函中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三年前代表日本方面与南京临时政府谈判的三井物产会社职员森格、《顺天时报》的龟井陆良、《大阪朝日》的神田正雄、《大阪每日》的丰鸣舍松、榑崎观一、《时事新报》的小川节等名记者，以及大谷光瑞师的幕僚渡边哲信、正金银行支店长实相寺贞彦等人为首的日本民间人士积极支持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51] 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民意认为，孙中山十几年来反复向日本人作出让满蒙，予日本在华特权等各项承诺，换取了日本巨额金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又重申了这些承诺，又收了钱，日本不能再受骗，要强硬完成交易。

对于日置益当面递交的刻意压迫与威胁，袁世凯恰当应对，并不当场阅看，回应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

办理，当交曹（汝霖）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在日置益离去后，袁世凯在《二十一条》文件上批下：“荒唐荒唐！实堪痛恨！”，明确表示其中第五号没有讨论的余地。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后来披露：“总统保证说，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他表示，有消息说日本以 30 万日元资助中华革命党军攻打政府军。”[52]

随后几天，袁世凯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他在会上说：“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53] 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袁世凯采取了五项对策：其一，拖延开始谈判，让外交部长孙宝琦称病请辞，指派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以便摸清日方的意图；其二，亲自向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以试探日本的态度；其三、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向元老松方正义侯爵和山县有朋公爵探询日本政府意图；其四，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谈判地位；其五，不理睬日本的保密要求，向中外报界透露《二十一条》内容，动用民意拒日。会议期间，外交部成立了外长陆征祥、副外长曹汝霖、参事顾维钧等人组成的最高规格研究小组，征求英美国际法专家的意见，紧张研究对策，并向中国驻外使团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群策群力，帮助政府应对。2月2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方面代表日置益、参赞小幡西吉、高尾亨开始了秘密谈判。按照预定的拖延对策，外交部将原定的每周谈判五次减为三次，后再减至每周一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长篇开场白，然后用茶，尽量占用谈判时间。与此同时，曹汝霖秘密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面见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要求日本“留亲善余地”。

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日本仅以一至四号通知了英、美、俄、法四国，而将《二十一条》中最重要的第五号对四国隐瞒，要求中国政府将第五号保密。袁世凯派顾维钧化妆进入英、美使馆，直接将“第五号”透给英美，[54] 同时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报界，冀通过列强施压日本及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对日周旋。《二十一条》被披露出来后，各地民众掀起了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强权压迫，上海民众成立了“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民众成立了“爱国会”，山东民众成立了“救亡团”，江西妇女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广东商界成立了“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民众成立了“国事研究会”。一时，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欧美列强也猛烈抨击日本的行径，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漏告”要求条款之第五号深表遗憾，同时照会日本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美国国务卿拜兰针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提出“不承认主义”，即不承认日本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一切行为与政策。日本政府对美英的立场回应说：“可以降低要求，第五号为希望条件”。对于袁世凯不理睬日本保密的要求披露《二十一条》全部内容之举，日本方面按照日置益的建议，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相威胁。

日军在华威逼升级之际，孙中山在日的卖国活动也在升级。他担心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后，日本将抛弃他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于 2 月 5 日与日方代表，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等签订了与《二十一条》内容相近，规定日本全面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日盟约》。作为回报，犬冢信太郎先是拿出几万元现金由山田纯三郎转交给回国组织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刘大同、蒋介石等人，随后又经山田纯三郎之手交给孙中山三十万元。[55] 孙中山订立《中日盟约》的消息传出，海内外华人一致谴责，黄兴、李根源为首的欧战研究会谴责孙中山助日亡华。2 月 25 日，黄兴、陈炯明、钮永建，柏文蔚，李烈钧等五位“二次革命”叛乱骨干联名发表了“不倚赖他族”长篇通电（有电），在其中为叛乱（癸丑之

役) 自责并谴责孙中山“倚日”道：“兴等无状，与父老兄弟别亦既两年，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凡此所谈，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烦兴等言说短长，实为遗憾！……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发表有电的同时，黄兴连发两电给孙中山，斥孙“效法平西（平西王吴三桂），以图一逞”。[56] 孙中山拒绝黄兴的劝告，于 3 月 14 日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催促将《中日盟约》稿送交日本外务省，并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虽然声名狼藉，却极为实惠，签约后再次获得了日本朝野的大笔金钱资助，其中包括实业家久原房之助提供的 140 万日元和三井物产联络孙的中间人犬冢信太郎经手的百万巨款资助。[57] 孙中山收钱后给日本的资助者提供了签名收据，保证借款由他主政后的中国政府偿还（久原在 1965 年去世时仍保留着孙中山签署的多张巨额收据）。孙中山在日的筹资行动还包括，请求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服陆海军省，向他的讨袁革命提供援助；[58] 会见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日本军方向他的中华革命党提供支持；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商讨出让中国商业经营特权事宜，谋求金钱援助。

孙中山在日本的卖国活动为日本迫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谈判增加了筹码。日置益向中国方面主动透露了孙中山的《中日盟约》动议以迫袁世凯从速签订《二十一条》，暗示否则日本将与孙中山展开谈判。日本的孙

中山筹码确实让中国政府谈判代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内阁阁员们一致斥孙中山“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59] 袁世凯因应黄兴等“二次革命”骨干为叛乱自责的通电签发命令，取消对黄兴等人的通缉，表示欢迎他们回国效力，并许以政府高职。黄兴再声明与孙中山决裂，“从此决不轻言国事”。[60] 不过，革命党人在日本外侮压迫面前与袁世凯政府达成的和解只是假象。黄兴等人只就癸丑叛乱忏悔，谴责孙中山倚日，没有对自己长期倚日忏悔。后来的事实证明，革命党人都怀有强烈造反之心，“决不轻言国事”只是得不到外强扶植时的失意之言，一旦得外强金钱武器之水浇灌，他们的造反之心立即发芽。就在当年底，除抱病在美的黄兴外，李烈钧、李根源为首的一众欧事研究会员重新“倚赖他族”，响应日、孙的召唤，加入了讨袁“三次革命”，证明革命党人不会真正忏悔。

在军事上无力抗争的情况下，袁世凯在不与日本摊牌的前提下据理力争，拖延谈判时间，采取各种手段对日周旋，包括将日使所递交《觉书》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细节也泄露给了新闻界，以利用民间力量和抵制日货的浪潮协助对日交涉。曹汝霖次长后在回忆录中披露，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日本天皇会否因谈判破裂而决定出兵。当得悉日皇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大隈重信首相以政府名义提出《二十一条》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之意时，袁世凯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对于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中国政府对舆论采取不加管制的宽松态度。陆征祥答辩道：“现在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61] 这里，陆总长讲的是实话。民国政府刚刚于 1914 年 12 月公布了《出版法》。这部《出版法》继承了清政府 1908 年《大清报律》的办报自由原则，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警察官署，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明确宣告办报无须政府批准。

在中国政府就《二十一条》对日艰难周旋的四个月中，民众掀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十九省都督表示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对日交涉，要求拒绝向日本武力屈服；商民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商会成立了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的“劝用国货会”，推动全国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华出口减少过半；绅、商、学各界联合在张园举行了有四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总统府每天收到大量表达支持政府对日交涉信件、电报。日本在华各大商行向东京施加压力，指责政府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导致了中国人仇日。爱国运动极大地帮助了政府的对日交涉。在国际上，陷于欧战的协约各国为争取日本支持而默认其对华压迫，没有加入欧战的美国一面对日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提出抗议备忘录，声明“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损害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损害门户开放政策一概不予承认”，[62]一面向中国政府暗示对日施压到此为止。尽管如此，美国的声明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政府，迫使日本删去了袁世凯表态没有谈判余地的第五号及列强各国申明不接受的部分内容。

多年后，陆征祥披露袁世凯就《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艰难写道：“袁世凯总统于接到日使这份要求文书后，曾苦心研究，逐条亲批讨论的办法。双方虽不断会谈，但一直拖延至 3 月 8 日，仍无结果。日置益遂于是日往见曹汝霖次长，带着恫吓的声明道：‘会议迁延，使日本国军民，势难再忍耐，若于数日内对于重要各条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但彼时我方派赴日本游说之有贺长雄，正奔走于元老派之间，日本内阁之凶焰，似已稍戢。事态僵持到 4 月 26 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 24 条，务请我方同意，同时，日本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我方在此最后关头，亦于 5 月 1 日也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不料到了 5 月 7 日，日置益终于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

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它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它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 4 月 26 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5 月 7 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五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8 日下午，袁世凯总统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副总统、国务卿，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府秘书长、院秘书长等皆列席。会前，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来访我，劝我国最好接受日本之要求，以避免危机，日后整军修政，埋头十年，可与日本一算旧账。我往列席袁总统所召集之会议时，特将英使朱尔典之言面告袁氏，袁氏聆悉后，显得万分痛苦，并沉痛地说道：‘今日只有忍受奇耻，接受日本要求，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63] 顾维钧披露袁世凯 5 月 8 日主持决策会议的情况说：“袁世凯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 48 小时。袁世凯沉默。”[64] 最后，袁世凯通告接受最后通牒决定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

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65] 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回忆说：“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6] 5月8日会后，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奉命将修改后的《二十一条》送往日本公使馆。曹汝霖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政府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出，国人不了解《二十一条》交涉的艰难，不相信政府的解释，指责袁世凯卖国。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承认《二十一条》。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运动。这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发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了这个危机之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5月25日，陆征祥与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了包括十三件照会的《中日新约》（《民四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允借款建造烟台至潍县铁路，山东加开商埠，境内及沿海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第二，中国允将旅顺、大连租借期，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均延长为九十九年。日人得在南满商租土地，居住往来，经营商、工、农业，得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工商业，允于东蒙开置商埠，允日

本在南满采矿，允借日款建造南满、东蒙铁路，允在南满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教官。第三，中国允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中国不准他国在福建建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基地及其它军事设施。国人多不清楚，在军事上无力抗拒压迫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利用列强和民意经过艰难地讨价还价后接受的已不是《二十一条》，而只是“十二条”，第五号七条、第四号全部、第三号一条被删除，另外关于山东和满洲的条款作了修改，与日本原提出的条件大为不同，全部条款不是加了“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经过艰难的周旋，袁世凯达到了接到《二十一条》当天的保证：第五号没有商量的余地。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民国政府的对日交涉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67] 他从《二十一条》交涉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学生抗议政府签署《二十一条》为卖国条约之时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批评学生们是“理智失常”，是得了“爱国癡”。[68] 在题为《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中，胡适批评“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69] 名记者陶菊隐披露：“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70]

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袁世凯在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上逐条朱批、黑批达 76 条之多。其中，在外交部送交的《二十一条》卷宗的封皮上批示：“各条多有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针对合办矿业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针对建铁路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

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针对开商埠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针对汉冶萍矿厂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针对福建让与批示：“荒唐、荒唐，领土怎能与第三国”；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批示：“简直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针对日本要求的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项批示：“办不到”；针对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圈出“或购买”三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指示：“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71] 他拒绝了日本的保密要求，将关键内容对外披露，利用媒体、民意和列强施压，迫使日本无奈地收回了军方认为最重要的第五号七条，非但没有卖国，反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在日强我弱，英美列强主张中国妥协的现实下以灵活外交手腕化解了日本军方诉诸武力的计划，取得了弱国外交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可以说，袁世凯政府整个《二十一条》对日交涉中的表现无懈可击。在交涉期间，袁世凯策划领导的长达八个多月的全国性爱国运动极大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高速增长，启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为几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民国政府就《二十一条》对日交涉期间，孙中山多次通过《中华革命党通告》诬陷袁世凯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二十一条》。北京政府签定《民四条约》后，孙中山一面在日本遥控指挥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进驻山东、大连的日军占领区背靠日本进攻中国政府军，一面借国内抗议政府卖国浪潮对袁世凯展开攻击，污蔑称：“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72] 多年后，国共两党为维护革命和革命家的名声，联手歪曲历史，隐瞒袁世凯在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压力下批准签署删除了关键第五号的修改条约的事实，根据孙中山的上述污蔑之词，将民国政府签署的“民四条约”作卖国论，给袁世凯扣上卖国帽子，同时极力掩盖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向日本主动向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框架内容，推动日本武力压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在中国政府对日交涉期间与日本签定《中日盟约》等

等劣迹，将助日亡华的孙中山神化为国父。国共两党的上述宣传说明，革命党所写的历史基本由谎言构成，其中的“卖国”、“爱国”字眼是服务一党的私货。

在黄兴、陈炯明等革命家放弃革命，支持政府对日交涉时，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陈其美，登上了历史舞台。奉陈其美之命暗杀陶成章后，蒋介石跑回老家躲了起来。1913年，他奉陈电召到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叛乱，在孙中山、陈其美逃亡日本后再回乡躲避。1914年，蒋介石由张静江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派到日本人在大森为中华革命党建立的“浩然庐”军事学校学习。1915年，孙中山得日本人提供军费，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在山东和东北建立起了背靠日军的根据地，从事颠覆民国政府的活动，被孙中山任命为东北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奔走于日军占领下的青岛、大连。他了解孙中山向日本政府提出卖国建议和签署《中日盟约》的过程，也了解黄兴、陈炯明等人支持政府对日交涉的立场。他坚持写日记，妥善保存日记。但是他加入中华革命党，任职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期间的日记却没有留存。原因显然是，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有损“国父”和他自己的形象，与他后来在领导抗战时写下的抗倭日记不兼容。在孙中山逝世之初，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推动神化孙中山情有可原，但他在1930年代孙中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二十一条》内容的信函公之于众后继续神化孙中山就只能说明，会党中人打指模发誓效忠的结盟关系高于一切，革命党人不会忏悔。

第9章 日本推翻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

辛亥革命中，倪嗣冲、段芝贵等北洋将领曾劝袁世凯乘天下大乱黄袍加身，袁拒绝说自己世受清室恩遇，不能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天下，另外，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尚须对南方用兵，“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1] 就任总统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把持国会剥夺总统行政权，政府任何决定都无法通过的局面极为失望。根据两位洋顾问的建议，他向国会提出了《临时约法修正案》。修正案遭国民党控制的国会拒绝。在平定国民党人的叛乱后，他被迫解散国民党人控制的国会，同时也开始怀疑没有帝制是否中国之福，感到慈禧太后时代高效决策的机制更适合中国。这时，美国顾问古德诺提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和制定法律时，如若借鉴西方国家，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2]。古氏提出改行君主制的三条件为：一、改制不可引起国内人民与列强的反对以免招乱；二、君主继承法应明白确定，以解决嗣位问题，否则改制无益；三、政府应预为计划，使人民得与闻政事以发展爱国心，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否则改制未能有永久利益。[3] 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建议，

中华民国并非由民意成立，实系清帝让予统治权而成，议会政体对中国并不理想，中国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以保持秩序和进步，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不光法律顾问建议恢复帝制，列强也在推动袁世凯实行帝制。日本公使日置益先是向袁世凯公子袁克定建议恢复帝制，随后向袁世凯捎话：“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英国也在推动称帝。英使朱尔典在怀仁堂国宴间开始称袁世凯“陛下”。

在这样的推动下，袁的幕僚杨度串联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筹安会六君子）发起成立了致力推动改行帝制的“筹安会”（后改组为宪政协进会），在宣言中将民国以来的政治动荡归咎于民国政体。援引古德诺的文章，筹安会主张实行君主政体，杨度、刘师培等人先后发表了《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一批鼓吹帝制的文章，推动“讨论国体”，实行君主立宪，通电各省征求会员，派遣代表来京。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响应筹安会号召，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王士珍、刘冠雄（海军总长）、冯国璋、龙济光、陈宦、汤芑铭、倪嗣冲、段芝贵、陆荣廷、阎锡山、朱瑞、赵倜、孟恩远、李纯、张作霖等等文官武将通电“赞成君主”，促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早登大位。

动荡的政局使袁世凯转向赞同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关于君主立宪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的意见。在筹安会和众文武劝进声中，他派人就改行帝制询列强各国的态度。英使朱尔典、美使芮恩施、德皇威廉二世均表示，实行帝制与否系中国内政，不会干涉。为争取中国倒向同盟国，德、奥两国暗示实行帝制后将立即予以外交承认，德皇还答应给予财政、军事援助。驻日公使陆

宗輿、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传来大隈首相支持中国实行帝制的口信。得到列强各国支持的表态后，袁世凯决定改行君主立宪制，派左丞杨士琦向参议院转达声明说，改变国体听之国民。10月，梁士诒、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等人发起成立了“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向参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筹安会、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一再向参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参议院“另设机关，征求民意”，“立法贵简，需时贵短”，“以定国体，而固邦基”。

劝进潮中，一些非北洋六镇的地方诸侯也积极参与，以图打消袁世凯的猜疑及稳固地盘。例如，山西的阎锡山不仅积极劝进，还安排父亲住到北京，以让袁世凯放心；东北的张作霖向袁世凯保证：“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而一些袁世凯老搭档对帝制不以为然，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骨干，汤化龙，张謇等立宪派纷纷以辞职或称病抵制称帝，黎元洪、周学熙等人则密函袁世凯反对实行君主立宪。12月，国民代表大会举行了国体公决投票，通过了推戴书，请袁世凯“早登大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申令“另行推戴”。参议院二上推戴书，袁世凯接受，在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众多官员循旧制，行三跪九叩大礼。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恢复帝制，改纪年为“洪宪元年”。

讨袁战争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了甲申政变，袁世凯率清军击退了日军，维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迫使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仓皇逃回日本，也迫使日本将吞并朝鲜的计划搁置了十年。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在朝鲜降下龙旗，率残兵退回天津。屈辱中，他痛感中国若不变法图强将步朝鲜后尘沦为日本殖民地，从此成为朝廷中最坚决的改革派。拳乱后，他成为领导清廷变法图强，预备立宪的主将。得知中国预约变法后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革，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

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的是一个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为向中国大陆扩张，日本通过半官方组织黑龙会扶植在日本的中国会党，召集各路会党联合组织成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如此，袁世凯领导的立宪运动与日本扶植的会党种族革命展开了竞赛。袁世凯当然不敌日本，革命会党势力日益壮大，在辛亥年发动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革命中，日本大陆扩张派不但出手支持革命党造成了南北对峙局面，还准备支持孙中山北伐推翻袁世凯，准备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顾虑引发与其它列强的战争，日本政府最终否决了大陆扩张势力扶持革命党武力北伐的计划，使孙中山被迫下台。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积极维护满蒙主权，使日本通过策动中国革命吞并满蒙的计划落空。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在军事上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牵制和民意最大限度了维护了中国主权，使《二十一条》变成《民四条约》。日本朝野对主要要求被拒绝的结果极为不满，决定扶植孙中山和中国的各路反袁势力推翻袁世凯。精明的袁世凯一时糊涂，没有想到在日本政府支持帝制表态的同时，日本军部在积极部署着“讨袁”之战，扶植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军，派日本军事顾问扶持，提供武器弹药。在日本金钱、军火的扶植下，孙中山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许崇智、廖仲恺、张继、蒋介石等人在日军控制的大连、青岛设立了司令部。^[4]与七八年前派骨干到各省策动辛亥革命一样，黑龙会和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骨干赴十数省成立分部，策划推翻民国政府的“第三次革命”。其中，陈其美回到上海老地盘建立起了反政府武装，吕志伊到云南建立起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策划反政府暴动。

在袁世凯接受推戴之时，日军参谋本部在中国的倒袁活动分南北两方面在加紧进行：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在旅顺与关东都督府配合，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青木宣纯中将（驻上海武官）和松井石根中佐在上海策动南方各省倒袁。青木是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的创始人。日俄战争中，

他奉参谋本部之命，在北京组织“特别任务班”潜入西伯利亚及满洲地区，破坏俄军运输线。从此，特务一词传入了中国。接到倒袁指示后，青木密晤梁启超，说服梁及其弟子蔡锷加入讨袁，随后安排蔡锷以治喉病为由，穿和服离京，将蔡接到日本与孙中山密谋南北呼应推翻袁世凯，再安排蔡锷经越南回滇举兵。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安排在日的反袁派领袖岑春煊回国策动西南独立。

袁世凯决定称帝后，日本政府突然改口，联络英、俄、法、意等列强发出反对称帝的警告，令袁骑虎难下。12月22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歃血为盟，兴师暴动，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具名，电请袁世凯永除帝制、惩办杨度、孙毓筠等六位筹安会发起人和朱启钤、段芝贵、梁士诒等七位通电各省劝进的发起人，限于25日前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成立唐继尧为都督的云南都督府，组织两万“护国军”起兵讨袁。蔡锷率第一军兵出四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兵出桂粤，唐继尧率第三军总司令（辖六个梯团）兼云南都督，留守云南，打响了讨袁战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从川、湘、桂三路攻滇围剿护国军。原本完全不是北洋军对手的云南军队得日本经越南转运到滇、川的精良武器和军需物资扶持，所向无敌，杀得北洋军节节败退。几个月前登报声明反对“倚日”和颠覆政府的李烈钧、李根源（任护国军驻粤港代表）、熊克武等人在日本和孙中山的召唤下回到“倚日”阵营，证明他们的“决不轻言国事”之言只是得不到扶植时的气话。

在护国军迅速北进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再发严重警告，若实行帝制则武力干涉。袁世凯知道，云南起兵背后有日本人策划，于是宣布缓行帝制，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支持护国军。大隈重信内阁拒绝了袁的请求，主持作出了“要注视南方动乱的发展”的内阁会议决议。[5] 除未直接出兵外，日本方面各种倒袁手段同时并举：政府说服列强各国同意拒付北京政府盐税款，从财

政上扼杀袁政府；派日本广州总领事馆书记藤村赴云南，在蒙自设领事馆，负责扶植护国军事宜和策动云南独立；派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派驻肇庆领事官太田、书记米内山策动两广独立；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与情报部长福田雅太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频繁举行对华政策研究会，研究讨袁战争进展；日本朝野向中国各派反袁势力提供巨款支持，其中：富商大仓喜八郎贷给宗社党领袖，前清肃亲王善耆 100 万元；富商竹内和久原房之助向孙中山、陈其美提供了 80 万元（孙中山承诺以四川矿权作抵押）；[6] 日本政府承诺支持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凯，策动黎辞职以打击袁世凯；日本军部指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居正、顾问萱野长知在山东通电全国讨袁；日军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兵分两路，沿胶济路西进向民国政府军发动进攻，威逼北京政府，与云南护国军形成南北呼应；日军帮助中华革命党东北军组成东北军航空队，提供潍县飞机场，由飞行学校教官坂本寿一任航空队司令，直接参与中华革命党东北军的军事行动；日军派出野战医疗队帮助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战地救护；青木宣纯安排日本邮船将梁启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一行从上海经越南送到广西，成功策动了岑春煊、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

1 月底，蔡锷率护国军在四川泸州大败北洋军张敬尧部，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索性倒向革命阵营，宣告贵州独立。2 月，护国军在滇桂边境击败政府军。3 月，日本内阁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成为帝国完成上述（日本在华权益）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日本将承认南方的反袁军为交战团体，对帝国民间有志者同情以排斥袁氏为目的之支那人的活动，并援助资金物品之举，政府不负公开奖励之责任，但默许它是符合于上述政策的”。[7]

在护国军开始北伐时，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采取袁世凯当年的对策，按兵不动，索饷索械。在护国军北伐胜利在望时，在冯国璋、张勋、李纯、靳云鹏（山东）、朱瑞（浙江）联名致电多省督军（五将军密电），要求速

行取消帝制。3月下旬，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宣布将推戴书发还各省，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复归民国五年年号。4月1日，袁世凯命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并要求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护国军拒绝了袁世凯的停战呼吁，提出推翻袁世凯政府“六条方案”：一、袁世凯于一定限期内退位，可免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帝制大典筹备费及此次战争军费6000万元，应由查抄袁世凯及杨度等十三人财产赔偿之；四、袁世凯子孙三代，剥夺公权；五、袁世凯退位后，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指令。紧接着，在日本领事和梁启超、岑春煊、李根源等人斡旋下，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再宣布独立，刘显世、陈宦、汤芑茗、陈树藩、程潜、刘存厚等各省少壮军头宣布讨袁，唐绍仪、梁启超再通电促袁世凯辞总统职。

讨袁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日本极为活跃，与福田雅太郎、田中义一等日本军方人士密切联络，接受日军的武器金钱支持，指挥各省的中华革命党暴动反袁。5月，孙中山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本庄繁中佐安排下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宣言讨袁，指挥居正和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向政府军进攻，同时与青木宣纯、山田纯三郎密切联系，致函田中义一要求日军再提供两个师的装备。[8] 山东将军靳云鹏知道自己不是中华革命党军背后日军的对手，弃职出走。同月，在日本领事的支持下，接受日商巨款的岑春煊召集滇、黔、桂、粤等省实力派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对抗北洋政府的西南割据政府——军务院。至此，多数省宣布独立，袁世凯政府垮台。

日本寺内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扰乱全国之策，卷起各地讨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輿在1916

年 1 月 16 日致外交部电中指出：“日本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陆相提出：“现在，应采取让袁彻底退出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方政治势力（指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之手段为有利”；[9] 孙中山在 1916 年 4 月自东京致居正电中要求“凡百举措，表面宜避与日人有关系”；[10] 云南革命党人在宣布起兵讨袁时委任中华革命党的副领袖陈其美为云南都督府顾问；袁世凯去世，日本人目的达到，立即停止了对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军的支持。一系列事实和文件证明，袁政府因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拒绝《二十一条》而被日本布署推翻，讨袁战争是日本报复袁世凯拒绝《二十一条》要求而策动颠覆中国政府的战争。战争前后，日本人同时利用着孙中山、梁启超、蔡锷师生、岑春煊等反袁派，以及陆荣廷等西南独立派。了解日本的倒袁计划后就会明白，日本政府在中国推戴潮中声明支持袁世凯改行帝制的表态是“欲擒故纵”之计，袁世凯称帝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让中国陷入分裂对日本有利”是当时日本朝野的主流思潮。基于这一思潮，日本朝野策动辛亥革命，支持南方革命军造成南北对峙，支持国民党人在南方四省割据，支持孙中山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叛乱。让日本人失望的是，袁世凯平定了国民党人的叛乱，消除了南方的割据。于是日本再策动讨袁战争。袁世凯代表清末民初中国的立宪、进步与统一，讨袁战争的实质是扼杀中国的立宪，分裂了中国。与三洲田暴动、“二次革命”一样，日本所策划、指挥的讨袁战争是的外强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是推翻护国的袁世凯的战争。这样的外强祸害中国，欲肢解中国的战争居然被革命党宣传成了护国战争，并且宣传到尽人皆知，深入人心，是为革命宣传颠倒黑白的代表案例。

袁世凯逝世

在冯国璋等北洋五将军联名发出促取消帝制的密电后，袁世凯命秘书张一麟起草了撤销帝制的文告。张一麟记述袁世凯对他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

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11]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发在北京去世。至此，护国军所提的袁世凯退位问题不复存在，讨袁战争结束。

袁世凯清楚自己是被日本人推翻的，临终前自挽一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表达不忘他和国家在一年前蒙受日本最后通牒的奇耻大辱。这一自挽联正好点出了他一生的两大功绩：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缔造民国。

甲午战败，袁世凯得中日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写道：“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他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他认为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除变法自强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1895年，经刘坤一力荐，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令条陈变法事宜。早对变法图强周密系统思考的袁世凯很快呈上了变法图强的实施纲领《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力主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建议：1、设立馆院，罗致各地通晓中外情势之才，并聘请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和旅外华人入馆，令其专研西学西法，作为朝廷施政依据；2、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寻章摘句之学，选士以讲求实学为标准，使旧式八股章句之才“尽变为经济应世之才”。为西学、新学人才开设特科，分西律、技艺、军务三途，仿照正科，按生员、举人、进士逐等考选；3、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5、裁

汰冗员，精简吏治，创办新法，挹用洋才。在振兴经济理财方面，他建议：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设立商会、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鼓励、扶助开设工厂、饬厘税，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袁世凯提出的条陈对局势分析透彻，所提改革内容广泛，比当时闻名天下的公车上书更务实可行，为清末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后来清末的十年新政基本是袁世凯上述建议的实施过程。

经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联合举荐，袁世凯被任命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1895 年底，他奉旨在天津小站督练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陆军，聘请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教学，成立了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采用德、日军队建制，督练出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军队。他主持编撰了适合新军的《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融军规、军令、军纪及教育于一体，通过通俗、易懂、易记的歌词，对士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育。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在参观新军操练后写道：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中国兵弱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12] 1897 年，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的危亡形势下，袁世凯连上说帖促变法维新说：“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力陈当务之急是“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提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仿行西法，试行变革”。

1898年，袁世凯携“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龢再促变法。慈禧太后批准了变法，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引导下开启了百日维新。袁世凯积极支持康有为、严复的变法活动，捐款加入康、梁发起的强学会，率先捐款500金用于学会开办图书馆和报馆。维新中，光绪诏令一个接着一个，百日颁布了180多道新政上谕，大批罢黜守旧臣，代之以激进维新党人，招致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弹，使改革失去了地方大员的支持。在大多数派官员要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呼吁声中，维新党人向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提出“诛杀荣禄，围园劫后”极端主张，将袁世凯推到宫廷斗争的风口浪尖。袁世凯认为这样激进的维新不可行，反对孤注一掷的计划和死亡威胁。在维新党人必败的形势下，他对谭嗣同“设词推宕”，[13]选择了趋吉避凶，在慈禧太后政变后顺势告密。应当说，百日维新缺乏必要的准备和支持，举措过于极端，没有成功的可能，袁世凯的选择对维新的成败不具决定作用。在后来民国大总统任上，袁世凯下令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建立祠宇，宣付清史馆立传，以此表达了对告密的歉疚。

变法新政中，袁世凯在推动新政的各个方面领先全国。他推动赴日留学不遗余力，曾表示要亲赴日本访问参观，强调“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安排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数月，回省后予以重用。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他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学堂中的学生和东渡留学日本的学生。这些得袁资助的学生中走出了蔡锷、孙传芳等著名将领。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八人赴美留学，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二十人赴日留学。在他推动下，直隶官费留日学生占到全国两成。在推动地方自治、发展实业等方面，袁世凯领导直隶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鼓吹大汉族主义“驱除鞑虏”，推动民族仇杀，使满、蒙、回、藏地区强烈要求独立分离。在国家走向分裂之时，袁世凯力主优待

清廷，谴责民族仇杀，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和睦相处，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说服统治东北的张作霖放弃独立承认民国政府，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成功说服内蒙王公们放弃独立，吸引逃往外蒙的贵族也陆续返回内蒙，代表着因清廷被推翻而丧失的国家凝聚力，避免了种族革命造成中国版图只剩下汉族十八省的分裂。他因维护国家的统一，开创五族共和，而成为民初中外各界一致认同的中华民国缔造者。

袁世凯败于、死于拒日护国，他之后的北洋将领败于、死于拒赤护国，这就是清末民国的历史主线。在袁世凯垮台后，革命党制造了连年战乱，南北分裂，革命党再转投苏俄，带给中国遍地血腥。后来，国、共两党利用宣传工具掩盖清末民初的改革进步，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军领袖们贴上反动标签。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对比袁世凯与革命党，才了解袁的伟大、爱国、爱民与进步：袁推动立宪，革命党实行一党独裁；袁推动地方自治，革命党扼杀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袁推动经济建设，革命党搜刮军费挑起战乱；袁保护私有产权和经营权，革命党以革命的名义谋财害命；袁注重立法，推动法律建设，革命党废除清末以来的法律建设成果；袁尊重新闻出版自由，革命党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党化一切传媒；袁办教育不遗余力，革命党党化教育，在教材中塞满一党之私。经历数十年革命暴政后，人们怀念袁世凯，和他代表的进步、自由的清末民初时代。

革命党后来丑化袁世凯主要在签署“二十一条”和称帝两点上做文章。事实是，袁世凯并未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关键之处都作了修改，实际是拒绝了“二十一条”。正因为袁的拒绝，才有日本发动的讨袁战争。袁的称帝，不应简单与倒退、祸国划等号。袁世凯代表着清末民初中国追求进步潮流，走向共和、立宪方向。在当时中国，没有人比袁世凯深切、急迫地希望见到中国实现共和。袁的期望受阻于革命党把持国会，拥兵叛乱，以约法为斗争工具阻挠立宪。无奈之下，袁决定效仿英、日，走君主立宪之路，因此

号洪宪，寓意开启宪政时代。法皇拿破仑带来共和，日皇明治带来立宪，俄皇彼得带来改革，“中国华盛顿”袁世凯尝试君主立宪无可厚非。倘无日本颠覆，袁世凯真能称帝二十年，完全可能领导中国早早实现地方自治，立宪共和。

临终的袁世凯表现出了革命党人不具备的品质——认错。他在遗书中写道：“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其子袁克齐回忆说：“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袁世凯在废除称帝时和临终时两度坦然认错。相比之下，革命党家们心中有太多革命之恶，不可能坦荡认错。瑕不掩瑜，就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迎合世界进步潮流和爱国爱民而言，袁世凯无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黎元洪继任总统

讨袁战争结束时，既非北洋系，也非国民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成为南北双方均可接受大总统人选。国务总理段祺瑞请黎元洪“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时，讨袁战争的灾难性质显现：南方形成割据，国家陷入分裂，中央政府空有其名。日本扶植唐继尧、岑春煊成立的西南军务院提出以恢复革命人制定的《临时约法》和革命党人垄断权力的国会为拥护新政府的条件。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拒绝革命党人重新利用旧《约法》和旧国会专权。于是，孙中山动用日本金钱策动海军宣布脱离政府。6月25日，接受孙中山资助的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通电宣布独立。海军主力第一舰队的叛离瓦解了北洋政府对沿海各省的权威，同时使革命党人可从海上迅速运兵北上，使北京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威胁。为免国家再陷内战，段祺瑞政府被迫

妥协，同意废弃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接受革命党制定的旧《临时约法》和国民党人控制的旧国会，使革命党利用约法和国会祸乱国家的灾难重演。

北京政府接受旧《约法》和旧国会专权只换得的南方名义上通电撤销西南的军务院，西南撤销割据局面依旧，中央政府徒具空名，政令依然不能通行全国。一场日本背后策动的讨袁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和长期的祸害，政府被颠覆，西南数省形成割据局面，中国统一被摧毁，革命党重新盘踞国会，利用旧约法垄断政权，阻挠立宪，此后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二十多年。

第 10 章 孙中山破坏法统

对德宣战案与府院之争

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总统府顾问莫理循建议中国加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停付对德庚子赔款，通过参战与各大强国结成联盟，在确定媾和条件的会议上得到一个席位以利摆脱财政困难。总统袁世凯接受莫的建议试图参战，但因不获列强支持而无法实施。1914 年 10 月，日军出兵击败驻山东德军，占领了胶州湾地区。1915 年 1 月，中国政府两次照会日本要求从山东撤军。日本拒绝撤军，并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当天，袁世凯指示外交部立即研究参战与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外长陆正祥、副外长曹汝霖、参事顾维钧等人组成的参加和会问题研究小组，征求国际法专家意见后向袁世凯汇报，阻止日本人进一步对华侵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入协约国参加欧战。根据外交部研究小组的结论和莫理循的建议，袁世凯决定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派莫理循游说俄、英、法、美等公使支持中国参战。各国公使表态支持，唯日本反对。日本担心中国参战后将成为战胜国一员会影响其在华的利益因而阻挠中国参战。财政上依赖日本借款的中国政府无力抗争，被迫搁置参战计划。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政府也希望对德国宣战，同样由于日本的反对而受阻。1917 年初，德国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对航行在德国指定海域的船只一律击沉，美国随即对德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促采取一致行动，表示愿意提供借款作为参战经费。苦战中的英、法、俄等协约国一面促中国参战，一面与日本达成秘密协议，以承认日本在山东权利换取日本派海军参战。有了与英、法、俄的密约，日本改变立场，支持中国政府对德宣战。

为扭转战场困境，德国政府采取金钱收买手段影响战局，在欧洲以 8000 万马克巨款资助流亡欧洲的革命家列宁回国发动革命以迫使俄国退出战争；在亚洲以 100 万元巨款贿赂留德归国的总理段祺瑞以阻止中国参战。段祺瑞拒绝了德国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通过中间人的贿赂，坚持为战后收回德国租界而对德宣战。3 月，段祺瑞主持政府照会德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对德停付赔款、欠款，同时申明对德国侨民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概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政府对德绝交后，梁启超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中指出：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利于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资格，利于解决一系列外交悬案，利于营造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也利于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他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各界的普遍拥护，也得到了汪精卫、蔡元培等国民党人的支持。但是，总统黎元洪出于权力斗争考虑与段祺瑞作对，不顾宣战对中国收回主权的好处，反对对德宣战。北京新政府在讨袁战争后向南方革命党人妥协，同意遵行旧约法，总统与总理权责界定不清，本已存在的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府院之争）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白热化。黎元洪、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的冲突让孙中山感到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倒袁”目的达到后，日本军界、商界立即停止了对孙的金钱武器支持，孙旗下的中华革命党军军饷不济，纷纷接受北洋军收编。孙中山希望通过反政府行动重新赢得日本朝野的扶植，多次发表通电，反对政府对德宣战，指责段政府对德宣战是为了对日借款，指示把持国会的国民党籍议员阻止对德战案通过。

段祺瑞政府谋求对日借款是事实。自从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末民初的历届政府只能以主权抵押对外借款维持，其中主要是向日本借款。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北京政府、段祺瑞政府都不得不谋求对日借款以维持政府运转。所不同的是，袁、段借款并不出卖领土主权。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取得的借款主要是“西原借款”。欧战期间，日本乘大战中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占领亚洲市场，与俄国等协约国家大做军火生意，对外贸易从入超

转为出超，外贸额、工业总产值、现金保有量均翻番，国内经济一片繁荣，大量购买英、俄、法等国公债，一跃成为资本输出国。1916年10月，寺内正毅内阁上台。新内阁大藏相西原龟三提出改变对华侵略压迫的政策为“彻底亲善”政策，建议举措为：“以有余的资本、智能与中国勤勉的劳力和无尽的富源相结合”，帮助中国振兴实业，同时帮助日本获得原料；效仿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发展棉花、羊毛生产，进行地质调查（主要是找石油）的经费；贷款一亿元给中国办国营铁厂，以使日本获得生铁和矿砂；对华借款不以资本主义经营为目的，不收手续费、不打折扣、十足交款，抵押条件宽松优惠。西原希望通过亲善作法使日中像德、奥两国那样，由经济同盟开始，最终达到消除经济国界，实现日中合并的梦想。寺内首相赞同西原的主张，决定改变大隈重信内阁武力压迫中国的政策，派西原主持向中国提供贷款事宜，仿效美国的“金元外交”推行“日元外交”。在随后寺内内阁的两年任期中，西原六次来华谈判贷款，通过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另组财款团以规避四国（英、法、俄、日）银团限制单独对华贷款的协议，对华提供优惠贷款约4亿日元，相当于此前日本对华贷款总额的三倍。欧战尾声时，寺内内阁总辞，继任的原敬内阁决定停止执行西原的亲善政策，“西原借款”大半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

张勋兵变

收受德国贿款后，孙中山指示国民党籍议员阻止段祺瑞的参战案通过。由于讨袁战争结束时被迫接受了旧约法，段祺瑞政府像袁世凯政府一样成了国民党国会议员的傀儡。1917年4月，段祺瑞召开各省督军的联席会议，向督军们解释对德宣战并非要派兵出国作战，而是为着战后收回德国的在华权益。督军们了解了对德宣战的国家民族的好处后一致支持对德宣战。5月，国务院再向国会提出对德宣战案，国民党人控制国会再次拒绝通过。段祺瑞被迫与几年前的袁世凯一样，以武力对付国会专权，派军警包围了国会，强迫议员通过了议案。

出于权斗考虑，黎元洪拒绝督军会议的决定，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段不承认黎的免职令，通电各省，要求表态。督军团在徐州召开会议，联名通电，要求黎宣布废止旧约法，解散旧国会。要求被黎拒绝后，督军团决定“兵谏”，派兵北进。黎元洪电请徐世昌、梁启超进京调解而不得，电召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张勋复电黎元洪表示拥护总统，率十营“辫子军”以调停之名由徐州开赴北京。

进京后，张勋邀保皇派康有为等策划清帝复辟。7月1日，溥仪在张勋、康有为为首的复辟派拥戴下在紫禁城宣布复位及恢复宣统年号，任命张勋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王士珍等为内阁大臣。一时间，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都挂起了龙旗，清朝遗老把盘在头上的辫子又放了下来。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宣布反对清廷复辟，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电令各省出师讨伐张勋。7月3日，段祺瑞于在天津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自任总司令的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命段芝贵率北洋陆军第8师和第16混成旅为东路，沿京津铁路北进；命曹錕率北洋陆军第3、第20师为西路，沿京汉铁路北进，两路会攻北京。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战事结束，溥仪颁布第二次“退位诏书”后逃入英国使馆，清王朝复辟被粉碎。如同讨袁战争一样，清廷复辟的背后也有日本的扶植之手，日本富商大仓喜八郎向前清肃亲王为首的宗社党提供了百万巨款支清王朝复辟，证明了日本推翻袁世凯并非是为反对帝制。

8月中，段祺瑞重新主持的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此举受到协约各国热烈欢迎。经过几年大战，殴战双方死亡千万，人力资源的消耗使协约各国的战事难以为继。中国对德宣战后，协约国军最高指挥官，法国福歇元帅请求中国政府派出劳工援欧。接受协约国请求，北京政府在威海卫成立了华工招募事务局，在天津、青岛、上海等港口城市设置招工点，协助英法两国招募华工。几个月后，华工分批乘船抵达法、英、俄等国，担负运送军用物资，

修筑工事、道路，上火线抬送伤亡士兵等等任务。其后，约五万华工在大战中葬身异国或失踪，在欧洲留下了无数写有中文姓名，或仅有死亡日期、编号、“万古流芳”、“鞠躬尽瘁”之类的墓碑。

以外国贿款分裂国家

孙中山希望通过反政府行动重新赢得日本朝野的扶植。他反对对德宣战及反英的通电没有打动日本朝野，却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下旗归国的德国公使辛慈在离华前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以段祺瑞拒绝的 100 万贿款收买孙中山采取行动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或者干脆颠覆决定对德宣战段祺瑞政府。孙中山是筹款高手，知道一国政府不会在乎百万元，张口就要求克里平将贿款增加一倍。他判断对了。德国资助了列宁 8000 万元，不在乎多一百万，痛快地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但以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中国对德宣战，或制造中国内部分裂为条件。孙中山痛快答应了德方的要求。随后，德使在上海向孙支付了部分现款，余款在德国支付给了孙的代表曹亚伯。[1] 孙用两百万德国贿款中的五十万元收买了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主力第一舰队的主要将领。接受孙的收买，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联名通电宣告海军独立，追随孙中山“护法”。孙中山再以三十万元收买了大批因张勋解散国会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南下，将德国贿款的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在段祺瑞平息兵变，举国称颂段“再造民国”时，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维护约法”（护法）宣言，通电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经日本人在西南策动讨袁战争，西南数省已呈半割据状态。控制两广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陆和控制滇、贵，插手四川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出于互相利用和维护地盘的考虑复电欢迎孙中山南下。然后率章太炎、陈炯明、朱执信、廖仲恺及接受收买的旧国会议员政客，乘海军第一舰队的“海琛号”军舰南下广州。离沪前，他坦承分裂计划说：“此行主要目标是保持广东作为军事基地，邀请整个舰队到广东来，组织国会，建立政府”。[2] 1917 年 8 月下旬，在北京复辟兵变被

平定，“护法”已是师出无名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接受贿赂南下的220余国会议员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议员人数只有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通过了他制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其中规定：“护法军政府”设大元帅作为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不设内阁总理；大元帅独裁一切政权、军权，决定一切重要政务，全权调动指挥所有军队，决定政府机关的组织、增设与裁并，决定官吏之任免，发布军政府条例、法令，无须对“国会非常会议”负责，任期与权力均为无限。这一大纲显示，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其实是变相帝制。

9月1日，孙中山召集91位议员举行了所谓国会非常会议，操纵议员们选自己为陆海军大元帅，选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会后，孙中山导演了授印的仪式，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任伍廷芳、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胡汉民等人为各部部长，任戴季陶为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后，孙中山履行对德国人的承诺，纠集滇、黔、桂、粤等省军队和程璧光指挥的海军组成“护法军”，分别从湘、川和闽、浙向民国政府军发起进攻，同时派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员分赴各省起事。在孙中山指挥及金钱策动下，黎天才等人组织了“湖北靖国军”、高峻、郭坚等人组织了“陕西护法军”、河南、山东等省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靖国军”，各地革命为纷纷以“护法”为名再次叛乱。段祺瑞主政的北京政府一面通电宣布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非法，一面急调北洋军和湘、粤、闽等省军队镇压叛乱。至1918年初，护法军程潜、谭浩明部占领了长沙、岳阳，唐继尧指挥滇军、黔军及川军罗佩金部组成的靖国军联军攻占了重庆、成都，段祺瑞为镇压失败引咎辞职，国家再次陷入南北分裂。

迎孙中山南下的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本想利用孙保自己的一方地盘，没想到孙南下后成立大元帅府，宣布自己独裁。他们当然不可能臣服于没有军队的孙中山，于是宣布拒绝接受“国会非常会议”选举的大元帅和孙中山任命的元帅职。陆荣廷会同广西督军谭浩明致电孙中山和在粤国会议员申

明：“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观听……此举不敢轻为附和”；唐继尧也通电申明：“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3] 陆荣廷任命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在记者会上申明：“建立临时政府不符合宪法。在有总统行使职权的同时，没有必要要选一个非常大元帅。因此，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4] 随后接替陈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也拒绝承认孙中山任命的省长朱庆澜、胡汉民。双方在招募军队、官员任命和财政控制权等问题上冲突日趋尖锐。孙中山决心以武力教训桂系督军莫荣新，令海军炮击位于广州观音山（越秀山）的广东督军府。但这时，程璧光也不再听命于孙中山，转而支持控制广东的桂系。程为了海军军响而附孙，孙到广州后不再支付海军军费，而桂系陆荣廷却承诺向海军舰队每月支付十万元军饷，程当然不再听命孙中山。孙感到程不再有用，采取几年前对付陶成章、宋教仁一样的帮会手段，派亲信朱执信等人将程璧光暗杀于海珠码头。[5] 对于暗杀事件，《华字日报》在社论中披露：“孙中山当众宣布程璧光因不奉命而处死刑。”[6]

德国在东西方的两笔巨额贿款虽未能挽救其欧战败局，却改变了世界历史。在西方，接受贿款的列宁回国发动了十月革命，开启了共产革命时代；在中国，接受贿款的孙中山先趁张勋兵变收买议员和海军南下广东，破坏了民国法统，造成了南北正式分裂局面，开启了军阀混战时代。二十年前，日本“大陆经略”势力满意孙中山“革命后割让满蒙”承诺，扶植孙为中国革命领袖，十年前，日本金钱造就了同盟会和孙总理，如今，德国金钱造就了广东军政府和孙大元帅，也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和军阀混战。

以外国贿款分裂国家 孙中山希望通过反政府行动重新赢得日本朝野的扶植。他的反对对德宣战及反英的通电没有打动日本朝野，却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下旗归国的德国公使辛慈在离华前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以段祺瑞拒绝的 100 万贿

款收买孙中山采取行动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或者干脆颠覆决定对德宣战段祺瑞政府。孙中山是筹款高手，知道一国政府不会在乎百万元，张口就要求克里平将贿款增加一倍。他判断对了。德国资助了列宁 8000 万元，不在乎多一百万，痛快地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但以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中国对德宣战，或制造中国内部分裂为条件。孙中山痛快答应了德方的要求。随后，德使在上海向孙支付了部分现款，余款在德国支付给了孙的代表曹亚伯。[1] 孙用两百万德国贿款中的五十万元收买了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主力第一舰队的主要将领。接受孙的收买，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联名通电宣告海军独立，追随孙中山“护法”。孙中山再以三十万元收买了大批因张勋解散国会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南下，将德国贿款的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在段祺瑞平息兵变，举国称颂段“再造民国”时，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维护约法”（护法）宣言，通电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经日本人在西南策动讨袁战争，西南数省已呈半割据状态。控制两广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陆和控制滇、贵，插手四川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出于互相利用和维护地盘的考虑复电欢迎孙中山南下。然后率章太炎、陈炯明、朱执信、廖仲恺及接受收买的旧国会议员政客，乘海军第一舰队的“海琛号”军舰南下广州。离沪前，他坦承分裂计划说：“此行主要目标是保持广东作为军事基地，邀请整个舰队到广东来，组织国会，建立政府”。[2] 1917 年 8 月下旬，在北京复辟兵变被平定，“护法”已是师出无名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接受购买南下的 220 余国会议员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议员人数只有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通过了他制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其中规定：“护法军政府”设大元帅作为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不设内阁总理；大元帅独裁一切政权、军权，决定一切重要政务，全权调动指挥所有军队，决定政府机关的组织、增设与裁并，决定官吏之任免，发布军政府条例、法令，无须对“国会非常会议”负责，任期与权力均为无限。这一大纲显示，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其实是变相帝制。

9月1日，孙中山召集91位议员举行了所谓国会非常会议，操纵议员们选自己为陆海军大元帅，选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会后，孙中山导演了授印的仪式，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任伍廷芳、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胡汉民等人为各部部长，任戴季陶为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后，孙中山履行对德国人的承诺，纠集滇、黔、桂、粤等省军队和程璧光指挥的海军组成“护法军”，分别从湘、川和闽、浙向民国政府军发起进攻，同时派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员分赴各省起事。在孙中山指挥及金钱策动下，黎天才等人组织了“湖北靖国军”、高峻、郭坚等人组织了“陕西护法军”、河南、山东等省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靖国军”，各地革命为纷纷以“护法”为名再次叛乱。段祺瑞主政的北京政府一面通电宣布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非法，一面急调北洋军和湘、粤、闽等省军队镇压叛乱。至1918年初，护法军程潜、谭浩明部占领了长沙、岳阳，唐继尧指挥滇军、黔军及川军罗佩金部组成的靖国军联军攻占了重庆、成都，段祺瑞为镇压失败引咎辞职，国家再次陷入南北分裂。

迎孙中山南下的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本想利用孙保自己的一方地盘，没想到孙南下后成立大元帅府，宣布自己独裁。他们当然不可能臣服于没有军队的孙中山，于是宣布拒绝接受“国会非常会议”选举的大元帅和孙中山任命的元帅职。陆荣廷会同广西督军谭浩明致电孙中山和在粤国会议员申明：“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视听……此举不敢轻为附和”；唐继尧也通电申明：“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3] 陆荣廷任命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在记者会上申明：“建立临时政府不符合宪法。在有总统行使职权的同时，没有必要要选一个非常大元帅。因此，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4] 随后接替陈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也拒绝承认孙中山任命的省长朱庆澜、胡汉民。双方在招募军队、官员任命和财政控制权等问题上冲突日趋尖锐。孙中山决心以武力教训桂系督军莫荣新，令海军炮击位于广州观音山（越秀山）

的广东督军府。但这时，程璧光也不再听命于孙中山，转而支持控制广东的桂系。程为了海军军响而附孙，孙到广州后不再支付海军军费，而桂系陆荣廷却承诺向海军舰队每月支付十万元军饷，程当然不再听命孙中山。孙感到程不再有用，采取几年前对付陶成章、宋教仁一样的帮会手段，派亲信朱执信等人将程璧光暗杀于海珠码头。[5] 对于暗杀事件，《华字日报》在社论中披露：“孙中山当众宣布程璧光因不奉命而处死刑。”[6]

德国在东西方的两笔巨额贿款虽未能挽救其欧战败局，却改变了世界历史。在西方，接受贿款的列宁回国发动了十月革命，开启了共产革命时代；在中国，接受贿款的孙中山先趁张勋兵变收买议员和海军南下广东，破坏了民国法统，造成了南北正式分裂局面，开启了军阀混战时代。二十年前，日本“大陆经略”势力满意孙中山“革命后割让满蒙”承诺，扶植孙为中国革命领袖，十年前，日本金钱造就了同盟会和孙总理，如今，德国金钱造就了广东军政府和孙大元帅，也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和军阀混战。

桂系议和

发动内战的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宣布讨伐政府军后依靠陆荣廷的桂军，唐继尧的滇军与北洋军作战。陆、唐附孙起兵只是想趁乱扩张西南的割据地盘，并不想作孙的战争工具，经过几个月的“护法战争”后认识到西南数省不具备武力北伐的实力，开始寻求与北洋政府停战议和以保存实力。1918年初，陆荣廷、唐继尧宣布组成桂、滇、粤、湘等省的“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公布了《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联名通电响应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与政府方面达成了停战两周的协议。南北和谈的阻碍来自孙中山。由于孙中山拒绝取消非法军政府，重新主政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只好派北洋军第3师代师长吴佩孚、第11师师长李奎元、第1路张敬尧等部组成援湘军武力镇压叛乱。经过3个月的战争，张敬尧、吴佩孚率部大败护法联军，占领了湖南大部，迫护法军退到湘桂边境。

5月，陆、唐宣布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废除大元帅独裁制，代之以岑春煊（主席总裁）、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懌七总裁合议制，宣布放弃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所谓护法战争，息兵议和。孙中山对不能独裁的军政府不再感兴趣，像以前抛弃日本同盟会、抛弃民初的国民党一样，抛弃了广州军政府，离粤赴日。黑龙会派宫崎寅藏，泽村幸夫接船，仍然安排孙等的一切，以备后用。

孙中山的护法叛乱不仅制造了南北分裂与混战，更大的祸害是拆散了国会，破坏了法统，使第一届国会留京议员不够《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总统所须的总数三分之二的议员人数无法选出合法总统，也无法举行宪法会议。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段祺瑞效法辛亥革命初期的作法，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举行全国大选。由于粤、桂、滇、黔、川等南方五省加入“护法”叛乱，不承认北京政府，湘、鄂、陕三省成为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的战场，无法举行选举，大选只能局限于十四行省举行，选出了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

1918年8月，第一届国会期满，临时参议院解散，新国会（第二届）开幕。168名参议院议员选“交通系”领袖梁士诒、朱启钤为正副议长；406名众议院议员选“安福系”（皖籍官僚为主要的政治集团，因成员常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活动得名）领袖王揖唐和刘恩格为正副议长。在代总统冯国璋任期届满，不会连任，安福系在新国会中占得多数的前提下，段祺瑞当选新总统没有悬念。但梁士诒、朱启钤倡导冯、段一同下野，推超然派系的元老徐世昌为总统，以调和北洋直、皖两系冲突，推动南北早日和平统一。冯、段顾全大局，接受了倡议。同月，北洋军将领吴佩孚通电主张和平，意在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桂系接管的南方军政府立即以总裁主席岑春煊的名义复电吴佩孚响应和谈。

9月，新国会选徐世昌为中华民国总统。10月，徐世昌宣誓就职。为推动南北议和，徐世昌下令免去主张武力平定南方叛乱的段祺瑞国务总理职

务，任命钱能训代国务总理。这时，海内外各界一致呼吁消除分裂。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名流为首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总商会、教育会等有影响力的民间团体呼吁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上海《字林西报》则呼吁列强各国共同斡旋。响应呼吁，英国公使朱尔典再次出面斡旋北南双方议和，警告分裂损害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也电劝南北双方息争统一，派其顾问韦洛贝为南北统一拟就了调和意见书，在华英美协会促请两国政府向中国南北双方调停。英、美、法、意根据日本原敬新内阁的建议，通知中国政府，在实现南北统一前停止对北京政府提供借款，迫北京政府停战和谈。因应国内外的斡旋、呼吁，大总统徐世昌声明“以诚心谋统一，以毅力达和平”，钱能训总理致电南方军政府总裁主席岑春煊，谋求和谈。岑春煊复电响应政府和和平期成会的呼吁，声称支持推进和平统一，双方分别向军队发布了停战令。

1919年2月，北方发起的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北京国务院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广州军政府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双方达成几项初步妥协：南北两个国会均停会，另召开新国会；西南各省取消独立，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成立弼政院，南北各推弼政80人，民国六年七月以后的对外条约交弼政院审议；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唐继尧为滇、黔巡阅使；拨补西南各省军费积欠。

南北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还是自孙中山。孙中山坚持分裂，拒绝和平统一，拒绝放弃他贿买另立的非法国会。几个月后，他趁五四运动中国人谴责北京政府之机，指挥南方革命党人提出了北方无法接受的“完全恢复国民党人控制的旧国会”、撤换南方指定的北方督军、省长等要求，使和谈破裂，内战继续。多年后，国民党史家称孙中山南下另立政府，发动“护法战争”为“第一次护法运动”。其实，国民党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运动是在执行外国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计划，是破坏民国的法统祸国殃民之举，给中国带来了长久的分裂混战灾难。

关余款催生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他的筹款能力。从 1897 年到 1916 年，孙中山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日本朝野。讨袁战争结束后，日本朝野停止了对他的资助，使他的影响力顿时低落。这时，他因反政府立场被德国相中，获得德国的巨额贿款。运用德国贿款，他收买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另立了政府。自封大元帅后，他通过日本记者河上清再向日本朝野推销满洲说：“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7] 这时，日本政府正与控制北方局面的段祺瑞政府洽谈借款，对孙的老调兴趣不大。

寻求日本资助受阻后，孙中山开始打关余的主意，派他的外交部长伍廷芳与北京公使团交涉分享“关余”。根据《辛丑条约》以关税作庚子赔款担保的规定，列强控制中国海关，代征关税抵庚子赔款及其它外债本息，将所余款项，即关余，交还中国政府。随着列强对华贸易的增长，关余数额也逐年增长，成为中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孙中山非法另立广州军政府虽然受到举国谴责，却获得列强同意从 1919 年 6 月起分享 13% 的关余（粤海关、江门关、三水关、九龙关、拱北关、潮海关、琼海关、梧州关、龙州关等两广九海关的关税收入）。孙中山以政府首脑名义秘密向列强搞钱的策划极为成功，在军政府被桂系改组，他自己离粤赴日再回沪后，他通过代表伍廷芳在 1919 年内收取到了数百万元的关余。按说，关余款是国库重要收入项目，其动用应由国会议院决定，13% 的关余实际应是两广地方的财政收入，但孙中山将收取关余之事对国人秘而不宣，将关余巨款变成了自己的私款。得知孙、伍廷芳以军政府名义收取关余后，主政军政府的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合议解除了伍的总裁职。伍廷芳携带列强承认的收取关余印信和 185 万关余款离粤赴沪投孙。

有了关余巨款，孙中山决定再次“毁党建党”，重建国民党。国民党是宋教仁在民初所建立。宋抛弃会党黑社会的一套体制与习气，抛弃了领袖独裁

制，将同盟会为首的几个会党脱胎换骨地改造为公开，现代的政党，以理事长代替了个人独裁的总理制。此时，孙中山在国民党名称之前加上“中国”二字以区别宋教仁合并五党创建的国民党。1919年10月，孙从上海向中华革命党各部发出通告：“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有关余巨款在手，孙中山一呼百应，建立了更大规模的党，设立总部和各地分部，创办一大批党刊。金钱吸引之下，大批失业政客和会党来投，远在福建呈割据状态的陈炯明也为了军费听孙调遣。孙中山恢复了总理个人独裁制，将国民党倒退回了会党模式。但为适应发展党员的需要，他不得不放弃打指模、当面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的帮会仪式。此后，国民党史家不提合并五党创建国民党的事实，称国民党系由孙中山改组自中华革命党。

自封总统

1918年，孙中山利用北洋军从福建驰援广东，以广东告急为由游说桂系军阀拨出二十营粤籍军队，交陈炯明率领征闽（国民党后来称援闽）。从此，孙中山算是有了听命于自己的二十营军队。陈炯明击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指挥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地区共二十余县，与北洋军划界停战。1920年8月，桂系主持的广州军政府发兵攻闽，造成广东空虚。在上海的孙中山乘直皖战争之机，以关余拨军费为条件，命陈炯明回粤。为了军费，陈炯明再次附孙，兵分三路向广州进军，中路叶举部攻饶平，左翼邓铿、洪兆麟进潮汕，右翼许崇智部由上杭、永定至梅县、兴宁。广东人民憎恨桂系在粤四年搜刮军费，欢迎粤军回师。粤军势如破竹，于8月底占领潮汕，于9月初三路会师合攻惠州。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通电反桂，率部在省城河南岸通电宣告独立，促桂军回桂，迎陈回粤。广州各团体组织的“全省各界联合和平维持会”筹足二百万元，作桂军离粤的开拔费。消息传出，桂军军心动摇，防线崩溃。岑春暄，陆荣廷，林葆懌，温宗尧四总裁通电“取消军政府，拥护南北统一”，桂军残部逃回广

西，桂系在粤的统治结束。1920年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受到各界搭牌楼挂“欢迎粤军凯旋，还我广东自治”旗帜欢迎。粤省议会决议推举陈为广东省长，希望他继续早年在粤省咨议局议员任上的地方建设的大业，让粤省人民过上太平日子。为了军费，陈炯明电邀孙中山回粤。孙中山在上海以军政府总裁的名义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广东督军一职。

回粤后，孙中山在1921年元旦演讲中表示要举兵北伐，推翻北京政府，[8] 随后召集部分三年前贿买南下的部分议员组成了“国会非常议会审查委员会”，以“附逆”罪名将随他南下的两百多议员中的半数开除出“非常议会”，增补一批追随者，使“国会非常会议”成为听命于自己的机关。[9] 2月中，孙中山无视他自己操纵旧国会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中关于“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870名）的三分之二才能举行总统选举”的规定，要求“国会非常会议”选自己为总统。对孙此举，云南的唐继尧、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等各省的主政者明确反对，连为孙中山收取关余巨款的伍廷芳及蒋介石、吴稚晖等追随者亦认为不妥。粤军将领们抨击孙说：南方选出总统，无异自树目标，招引北方来攻，广东现时军力粮饷不宜支持战事。他们要求孙中山“就此作出答复，以释群疑”。[10] 虽然反对者众，但握有关余巨款的孙中山不愁没有支持者。他下令广州地区的报刊不得刊登反对选总统的报导，只许报导拥他任总统的文章。于是有独立报刊报导：“连日华侨请举总统之电，皆以国民党名义拍电，声言正名定分，速举总统，其词若出一律.....其在国内，则以国民大会为表示.....向国会请愿。”[11]

4月4日，孙中山宴请部分非常国会议员，“演说选举总统之不容缓.....当时议员吕复起而置驳，孙愤极，至以席上之酒壶掷击。”[12] 4月7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在林森主持下胡乱通过了特为选孙为总统制定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这一伪大纲中规定，政府体制为总统制，非常大总统总揽政务，不设内阁，总统任命部长，决定无需附署，总统不受国会制约，

无明确任期，总揽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孙中山挟持“国会非常会议”自封总统的消息传出，举国反对。其中，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湖南省长赵恒惕在致电广州国常议会（青电）：“查国会再集广州以来，法定人数不足，无可讳饰，大总统选举原有成宪可循，今以非法手续，卒予变更，既启纷扰，尤损尊严。况此种恶例一开，尤而效之，祸伊胡底！”

4月10日，孙中山不顾各界反对强行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命议员以记名投票方式选自己为大总统。众议员清楚投记名反对票可能招致会党手段对付而不敢投反对票，于是选举过程在两小时内胡乱结束。结果毫无意外，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香港《华字日报》报导暴力胁迫加贿选的情况说：“按孙氏之谋得总统，酝酿已久，此次忽成为事实，闻亦系金钱魔力之作用。国会议员领款最少者亦有千元，多或至三五千，总共费去不下二三十万元。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被张继、田桐、居正率暴徒棍棒交加，甚至被殴到重伤。”[13]《申报》报导：“各议员在东园聚会，其反对选举之议员，在园中亦为人所扑击。”“众议院议长褚辅成向来为会中最负责任之人，此次对于选举总统，非常反对，所议既不行，今已决意离粤……又白逾桓、狄楼海亦因反对选举，在东园议员俱乐部，被殴至重伤，闻狄氏伤势甚重，恐有生命之虞也。”当事人白逾桓描述暴力胁迫情况说：“六日与同人(指反对选举总统的议员)在新世界宴客，商议进行方法，席散外出，即有张继、田桐、居正等率领暴徒百余人，暗伏两旁草地，用铁杆乱击来客，狄君楼海被击伏地下，身受重伤，至今性命堪虞，桓次出，亦被暴徒围击头面胸臂，血肉横飞，幸得洪(兆麟)师长兵士营救，得以不死，时方晚间十时”；“7日，林森趁隙发出通告，开两院联合会，是日张继率领七八百暴徒入场，多不带旁听券……复有人动议，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案。此案内容无国会，无内阁，无时效，只有一长生不老、孤峰突出之总统。求之古今东西各国，罕有其匹。按照法律手续，应付审查乃不审查，只经林森读数遍，即做通过。通过后应公布，乃不经公布，即有人动议即日选举总统。田桐且动议

用记名投票法，以威吓之。记名投票乃权要用以压迫选举人之武器，学者每有訾议，吾国大总统选举法订于袁世凯铁骑纵横之下，犹不录用此制，而田桐竟开口成宪.....一日三小时竟通过如许重案，破坏民国之根本，儿戏国事至此，独不令人痛心乎!”[14] 议员记名投票后，孙中山立即以军政府名义通电宣布自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华字日报》报导：“此次选举总统，固藉华侨电报以为鼓吹。近日复以华侨名义，组织锄奸团.....谓选举总统实为应付时局的必要，如有意图破坏者，即是北方奸细，决以强硬对付云云。[15] 5月5日，孙中山在举国反对声中宣布就任非常大总统，国民党组织了号称十万人的广州市民的庆祝会。

孙中山不顾举国反对坚持作总统的重要目的是搞钱。他要复制另立军政府获享关余的运作，以总统之名争取列强承认，获取更多的关余。他自封总统的行径造成了南北两总统对立的局面，破坏了民国的法统，也使桂系与北方达成的停战，走向和平统一的形势逆转，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祸害。对于孙中山的分裂之举，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刘镇华、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等各地将领以及湖南省教育会、农会、工会立即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宣布不承认所选的总统，北京公使团也声明不承认广州所选大总统，不资助广东政府。与当年不顾南北议和的共识抢先宣布就任总统时一样，孙中山的任命也遭到抵制，陈炯明拒任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唐绍仪拒任财政部长（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陈决裂

1913年，孙中山在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时多次促主政广东的陈炯明起事。陈犹豫再三后附孙加入了叛乱，宣布“广东独立”，结果原来拥护他的广东省议员们纷纷表态拥护中央政府，声言“急盼中央派兵痛剿”，陈统率的万余粤军顷刻瓦解。叛乱失败后，陈炯明没有追随孙中山去日本，而是逃亡南

洋。流亡中，陈炯明苦思广东和中国的出路，认为应当走地方自治，粤人治粤，建设广东为模范省，后建立联省政府的道路。1917年，孙中山再次发动“护法”叛乱。陈炯明更加犹豫。他知道所谓护法的分裂性质。但作为多年的会党，他摆脱不了服从领袖的帮规，再次附孙叛乱。

陈炯明是会党，也是绅士。与永远造反的孙中山不同，陈炯明怀有搞好家乡地方建设的理想。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他倡办了海丰地方自治会，设立了戒烟局、育婴堂和义仓，创办了《海丰自治报》。在广东咨议员任上，他大力推动地方建设，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辛亥革命后，他在代理广东都督的一年中曾积极推动禁赌禁烟、关闭娼寮，推行新政。再次附孙叛乱后，他对“护法”祸害家乡感到痛心。率军占领闽南二十多县地区后，他决定在这里实践地方自治理想，搞起了地方建设的“漳州试验”。

“漳州试验”的内容之一是办教育。陈炯明发布《振兴教育令》，禁绝私塾，要求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达到“一乡一校”，提出教育支出“占岁出额之强半”。在他的推动下，漳州地区建立了各类学校数十所，夜校近百所，在漳州成立“新闻学书局”，“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6] 他还计划在南方创办大学，制定了派遣当地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的计划。

“漳州试验”的内容之二是办报自由。陈炯明鼓励在控制区内办报和宣传各种学说。在他推动下，区内报纸刊物大量涌现，其中著名的有《闽星》、《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等。他在为《闽星》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办报自由、言论自由和注重教育的环境必然带来思想进步，使原本文化相对落后，思想相对闭塞的漳州地区一跃成为影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重镇。

“漳州试验”的内容之三是基础建设。在陈炯明推动下，漳州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建成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说：“漳州到处在建设，道路被拓宽，大批新屋建成，街道清洁，治安良好。几大市政工程包括：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大为称赞。”经过两年的地方建设试验，漳州成为举世瞩目的“模范城市”。国内学者名流，外国记者纷纷慕名到漳州参观考察。美国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在报告中写道：“陈氏在漳州施行了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与重税”。[17]

1920 年秋，陈炯明为了军费率驻闽南粤军回粤，将桂系逐出广东。被广东各界推举为省长后，他将“漳州试验”的经验在家乡推广，继续清末地方自治的未竟之业，推动发展实业，改实业科为实业厅，设立了“经济调查局”，推动成立了广东总商会，继续实施在咨议局议员时推动的禁烟、禁赌改革要务，出台了一系列禁赌的条例，严厉打击烟赌，对私吸私售鸦片，聚赌者一律施以重罚。

在教育方面，当时广东省总人口约 3000 万，300 万学龄儿童中九成失学。1920 年 12 月，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接受了陈提出的教育独立，不受政府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不受地方财政干预，不得挪用等上任条件。在陈炯明有钱先办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广东省政府推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六年计划：即自 1922 年 8 月起，至 1928 年 7 月止，在六年的时间内，分期推广义务教育，使 300 万适龄儿童入学；同时制定了对教师的优厚待遇：公立学校老师月薪最少在 36 元，每年可加薪，至 125 元为限；公立学校全部免费，原来每个学生每月 3 角的学费取消。[18] 广东省议会于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中规定：“本省人民无分男女，由满七周岁起，皆有受六年教育之义务。每年预算不

能超过十分之三用在军事上，而最少要有十分之二为教育经费”，“本省划定之教育经费，由教育机关保管之，无论何项政费，不得挪用”。

陈炯明还特别重视女子教育。早在他任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时，他就提出：“女子为教育上之根本，尽人而知，乃我省之女子小学寥寥无几，而于外州府尤甚，风气未开故也。为开通风气计，则女学宜先从小学人手，盖年龄在十二岁以下，其教师尚可以男子充之，阻力已少，经费无多，较易办理。若无经费，则每县一区责成地方官办理，亦自易易。……现在风气未开，恐师范未易举办。然余为办女子师范者，非谓不宜办师范，其能办师范者亦听。……非谓师范不宜办，不过须先办小学以开风气：且今年办小学，明年未尝不可办师范。其所以先办小学之故，因女师范风气未开，人未肯来，而女师范之师范，亦难得其人。”

在市政建设方面，省政府在各城市成立市政厅，按照漳州经验，将省公署、交涉署、财政厅、市政厅、高等及地方检视厅、县公署、图书馆、大会堂合建一地，成为广州的政治中心，把东山一带的丛墓限期迁走，将梅花村、竹丝岗一带建成了广州模范新式住宅区，大兴道路、路灯、公园，疏通改造排污沟渠，铺设排水管等市政建设项目，建成了广州市第一、第二、第三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办美术展览、运动会；省府颁布了卫生规则，卫生局雇用清道夫清扫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设立新式屠场，监督检查肉类卫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省政府出台各项注册规定：要求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实行市民生死婚嫁登记注册制度，赢得市民颂扬。对于陈炯明领导将广州建设成为漳州之后的另一模范城市，胡适赞扬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的地方建设中正是逐一地研究具体的问题，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地推动国家进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教授在中国讲学时称赞陈炯明说：“他在一个以做官而得享受

豪华生活为报酬的国家里，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19] 黄炎培参观广州后盛赞“模范省建设”带来的新气象写道：“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 33 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20]

在陈炯明推动广东模范省建设时，孙中山在忙着发动讨伐桂系的战争。被逐出广东的桂系希望息兵，请湖南督军赵恒惕出面调解。赵通电呼吁两广息兵，陈炯明通电响应。桂系首领陆荣廷表示同意息兵，但指回粤的孙中山是西南战乱祸根，谓有孙中山在粤，两广不可能和睦，战争不会休止，息兵须以驱孙离粤为条件。陈炯明意识到孙中山的四处讨伐计划与建设模范省计划的冲突，内心同意陆所提条件，且不满孙中山收买加暴力胁迫地通过非常国会选自己为大总统的自封之举，但他多年附孙造反，没有勇气逐孙，拒绝了陆的要求。1921 年 6 月，孙中山收买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滇军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等部组成讨陆（荣廷）联军，兵分三路进攻桂军，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第三次附孙，率军伐桂，与桂军决战于梧州。桂军守将刘震寰接受孙中山的关余款收买临阵倒戈宣布独立，致桂军全线动摇，陈炯明率粤军乘势长驱直入，于 9 月攻占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桂系首领陆荣廷、谭浩明通电下野，经越南逃往上海，讨陆战争结束。

粤军在贫脊的广西无法筹措到足够的粮饷，陈炯明履行开战时作出的“桂人治桂”承诺，率粤军撤回广东。孙中山不准返粤，电命陈率粤军再北伐入湘，并命陈在广东搜刮军费 400 万元。陈炯明对伐桂战争造成粤军万余伤亡和粤省财政 800 万元巨额亏空极为痛心。他明白了，陆荣廷的孙中山

是西南战乱祸根之言正确。于是，他不再奉孙的电令，拒绝再充当孙的炮灰，也拒绝继续在粤省向家乡父老搜刮军费。陈炯明拒筹费，孙中山只好另想办法，向张作霖提出奉、皖军阀秘密结成三角同盟，南北夹击直系计划，要求张作霖提供 300 万元的军费资助，获张口头答应。

12 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纠集滇、黔、赣军北伐入湘。对于陈炯明抗命及公开反对北伐，孙中山再次使出会党手段，派人暗杀了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不久再暗杀了陈达生、陈永善、关国雄等粤军将领），[21] 并在杀邓后按当年杀害陶成章、程璧光的套路作足厚葬题词之类的功夫，追授邓铿为陆军上将，厚葬邓铿于黄花岗，并亲书碑文。[22] 在亲信遇害的警告面前，陈炯明于 1922 年 4 月宣布辞职下野，离开广州退居惠州，命粤军第一军不参加北伐，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孙中山不接受陈的辞呈，宣布罢免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总长三职。至此，孙、陈正式决裂。

4 月下旬，直奉战争爆发。出乎孙中山意料，开战仅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退回关外。孙南北夹击直系计划随之泡汤。在陈炯明拒绝参与，北伐军费没有着落，粤、湘两省人民一致反战，赵恒惕宣布湖南保境安民的形势下，孙中山只好搁置北伐计划回师广东，将桂林大本营迁到广东韶关。这时，在广西的粤军前敌总指挥叶举率军回师广州，与回师广州的孙军形成对峙。

粤军逐孙

击败奉系控制北京后，吴佩孚通电倡议恢复民国法统及第一届旧国会。贵州袁祖铭、云南唐继尧、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熊克武、湖南赵恒惕、江苏齐燮元、湖北萧耀南、浙江孙传芳等各省领袖，以及叶举、洪兆麟、关国雄、李炳荣、熊略、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钟景棠等粤军将领通电响应，电劝徐世昌、孙中山同时引退，请黎元洪复职，恢复民国统一法统。

1922年5月31日，徐世昌回应各省督军的电劝，通电表态“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6月1日，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召集两百多位旧国会（第一届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宣言民国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命令无效，民国七年由新国会选举产生的徐世昌大总统亦无效，旧国会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由合法大总统依法另组合法政府。6月2日，徐世昌通电宣布辞职，吴佩孚及曹錕领衔十省区通电促请，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面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由于此前孙中山曾一再承诺会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北、南两个非法总统并存局面将结束，旧国会将恢复，制宪将重新开始。6月3日，蔡元培，胡适，沈士远，高一涵，尹炎武，李建勋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孙中山及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辞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23] 《申报》社评说：“旧国会复活问题，酝酿已久。故洛吴（佩孚）徵求意见，既得豫，鲁，奉，晋，陇，湘，鄂，苏，川，滇，黔，桂十二省督军及陈炯明（时广东废都军）之赞成，此事当然可以解决。徐既辞职，孙中山护法之主张，得以达到，其自行告退，恬淡如中山，谅不难视总统如敝屣，至继任之人，现在趋势，自倾向于黎黄陂（元洪）复职。”6月4日，广东省议会决议：通电赞成统一、推陈炯明为临时省长，请陈回省主持、举行“送孙”大会。

然而，孙中山背弃承诺，从韶关返回广州后指使“国会非常会议”（民八国会）通电宣布不承认吴景濂、王家襄议长在天津复开的国会（民六旧国会），要求粤军将领服从他的“大总统令”，继续实施武力推翻民国政府的北伐计划。粤军将领们痛恨孙中山连年挑起战端，在粤横征暴敛，祸害家乡，

纷纷促总指挥叶举武力逐孙。因应粤省各界呼吁，叶举通电响应北京各界结束南北分裂的呼吁，要求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同时宣布广州戒严。6月12日，黎元洪宣布暂行大总统职权，撤销他在四年前同日的发出的解散国会令，下令各省停战，任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旧国会议长王家襄、吴景濂随黎元洪入京，宣布在天津的旧国会移往北京。紧接着，吴佩孚分别电劝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停止北伐，北上共商国是。经过孙中山制造分裂几年，民国法统已难以恢复。有倡议恢复民国六年（1917年）国会者，有倡另召集新国会（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吴佩孚在保定召开各界会议，商讨“恢复法统”。会议决定，采纳梁启超、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林长民、汪大燮、钱能训、王芝祥、孙宝琦、张耀曾等名流“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的建议。

在举国盼望停止内战，恢复民国法统和国会，和平统一时，孙中山拒绝放弃非法总统称号，坚决阻止国家走向和平统一，强硬拒绝粤军将领们的电劝，向广州报界宣布继续武力北伐，并在招待广州记者茶话会上威胁说：“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粤军若不于10日内退出广州市外三十里之外，他将用八寸口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之内，把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师的职权，制裁他们了。”[24] 6月14日，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率粤军旅、团长军官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荣新）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履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

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民国前途，实嘉赖之。”同日，叶举、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粤海军部长汤廷光共同签署布告张贴于广州，促孙下野。孙中山再次拒绝粤军众将领的劝告，威胁武力镇压粤军。粤军将领们忍无可忍，决定武力解决。

在逐孙还是杀孙问题上，粤军将领们意见分歧，就此向陈炯明请示。陈禁止部下杀孙。粤将们从陈之意，通过陈、孙之间的中立派魏邦平和孙的秘书林直勉通知孙中山将炮轰总统府。6月15日晚，孙在林等的护送下登上珠江上的“楚豫”舰避难。6月16日凌晨，粤军炮轰了总统府，占领了省市机关，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离粤，停止北伐，南北妥和平统一，是谓六一六事件（粤军炮轰总统府事件）。6月17日，孙中山指挥海军战舰炮轰大沙头、沙河、观音山等地报复，炸死广州平民百余人，摧毁了天字码头、东堤一带众多商铺，随后率舰队退到黄埔，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率入赣的北伐军回师镇压粤军。海军海圻、深深、肇和三舰响应和平统一通电，拒奉孙中山之命。服从孙中山的海军余部在广州城外四乡大招民军，在珠江截米截煤以供给养，“宝璧一舰所截夺由香港运入广州的米粮，则共值十二万元。广州市内米价膨胀，纸币低跌，人心浮动”。[25] 这时，被围困于黄埔军舰上的孙中山生死操于粤军之手，是陈炯明的禁杀令保了孙中山性命。6月29日，陈炯明捎信给孙中山请求和解，天真地以为孙会放弃战争计划与他捐弃前嫌。孙中山拒绝和解，要求陈写悔过书才不再追究，同时布置对陈实施暗杀，交手枪予粤军将领黄大伟，命黄刺杀陈炯明，并表示：“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26] 黄大伟晚年证实，他因不忍而未从命。

7月初，广东省议会等团体于通电赞成统一，请孙中山下野。7月中，粤军在韶关、翁源一带击败了回粤的拥孙北伐军，广东议会与叶举等粤军将领电请在惠州的陈炯明返广州主持政局，在上海的章太炎也电劝陈炯明出山，继续推动“联省自治”运动。8月，在永丰舰上避险的孙中山得知接受收买的

北伐军战败退到粤赣、粤湘边境只好离粤，乘英舰“摩轩号”经香港赴沪。英国派军舰接孙离穗并非支持孙中山，而是希望像粤人一样，想让他早点离开减轻粤难。8月中，陈炯明接受各界促请，返回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继续联省自治大业。9月，国会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之名开会，五年前接受孙中山贿买南下的“护法议员”中的大多数人承认广州的“非常国会”（民八国会）非法，邹鲁、谢持等少数孙中山亲信“非常国会”议员赴沪投孙，“非常国会”散伙。国民党史家后来称孙中山和少数亲信议员在举国谴责声中离粤为“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六一六事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爱将。孙、陈决裂之前，蒋介石支持陈炯明，也反对北伐。陈炯明辞职后，蒋介石也于4月辞去了北伐军第二军参谋长职。返乡途中，蒋介石致函陈炯明促其出山。6月，蒋介石在溪口接到孙中山从永丰舰上发来的护驾电命，动身回粤救驾，于6月29日登上白鹅潭的永丰舰。在随后的四十多天，蒋介石随侍孙中山左右保驾，还拍下了戎装站在孙中山侧的威武护驾照片。孙离粤后，蒋介石将孙两个月避难期间的活动辑成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小册子，在其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然后请孙作序。作为回报，孙中山一年后派蒋率团赴俄谈俄援，使蒋介石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如今，在中正纪念堂中，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画像摆在了主要位置，显示“六一六事件”对于蒋介石崛起的重要性。然而参观者多不知道，粤军为结束内战、分裂，恢复国家法统，同时也为阻止孙中山出卖领土主权（粤军截获了孙中山密谋以海南主权作抵押换取军费的卖国密约），再三电劝孙中山取消非法政府而再三被拒，不得以才开炮逐孙，并且只驱逐不加害，整个炮轰行动是维护广东安宁和国家安定、统一的正义之举。

第 11 章 苏俄输入共产革命

新文化运动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中学生辅导读物《青年杂志》。与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一样，他两次赴日留学仅数月，在日主要从事排满、革命的活动。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他表达激进思想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1916 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将在日本“暗杀团”中结识的陈独秀聘为了北大文科学长（系主任），并在给教育部的公函中造假，称陈“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就职北大后，陈独秀将《青年杂志》迁到了北京，更名为《新青年》。

1917 年 1 月，《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在文中向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化、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对积习千年的矫揉造作、压制自由思想的古文套路，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写作工具，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提出了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需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事”，号召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写作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

十年新政中，清廷开创了舆论自由环境，发起了地方自治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清廷播下的进步种子在民初开花结果。袁世凯政府对日

交涉“二十一条”期间推动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使将舆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进一步提升。在舆论自由的环境中，《文良改良刍议》得以引发了自由地讨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响应胡适的“思想解放”号召。钱玄同在《随感录》中写道：“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回应国内的讨论，胡适再提出通过创造国语文学建立起真正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语言——国语，[1] 呼吁“国文科必须改为国语科。十岁以内的小孩子，绝对应该专读白话的书；什么‘古文’，一句也用不着读”。胡适的白话文号召得到青年的热烈响应，一场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茅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随着新文化运动展开，发行量和影响力不大的《新青年》名声鹊起，发行量增加了十倍，成了思想界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白话新诗。根据胡适的主张，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部将白话文教育，白话教科书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开始编写白话文中小学课本。至此，由学者讨论开始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教育国策。对此，胡适评论说：“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新文化运动在汉语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现代文学进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使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人们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促进了国民的精神解放。通过推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知识、教育是少数人专利的局面，打破了文言文对思想和创造力的禁锢，将西方以人为本、白话交流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让

学子摆脱古文的束缚，自由地思想，方便地表达，使下层民众得以接受教育和知识，掀起了对精神束缚的一次“放足”运动。胡适后来说明：“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然而，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却不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专制，缺少宽容、多元并立的精神，禁止自由的思想，不容异见。新文化运动原本号召冲破专制思想的牢笼，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骨干自己却表现强烈的思想专制。《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发表了激烈、极端的《文学革命论》。在纽约的胡适读后心中不安，致信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对胡适所持的宽容态度不以为然，在复信中说：“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赞成陈独秀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主张宽容异见的胡适在《新青年》论坛中日益孤立，《新青年》从“平等讨论”走向了拒绝“平等讨论”，“不容匡正”，最后到了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一样的“骂人有理”的地步，与宋明理学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两极思维没有区别。

在民国宽松、自由、多元的环境中，人们不用担心因发表见解，或极端言论，而被整肃，不用担心砸饭碗，不用担心被逮捕，陈独秀得以自由办杂志，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号召；鲁迅得以谴责中国历史满纸仁义道德背后是“吃人”，得以主张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得以否定旧文化说：“二千年来所

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所以我要爽爽快快地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语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2] 学界，政府，国人平静接受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们的激烈言论，允许他们自由地表达思想，但以陈独秀等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却不容许争论，不容异见，拒绝德先生（民主 Democracy）、赛先生（科学 Science）所要求的宽容异己精神。新文化运动期间，梁启超考察了英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目睹了论辩双方“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后感叹：“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但作为崇尚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会党，他不可能引导新文化运动走向自由与宽容。

在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共产革命学说传入中国。新生的苏维埃在建立政权后立即建立了向欧亚各国输出革命的专门机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

专制特色正好适合暴力革命说的传播，成为中国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的重要原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骨干没有成为共和宪政的推动者，而是接受共产革命学说，纷纷投身暴力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没有成为共和宪政的摇篮，而是成了暴力革命的摇篮。一年后，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与义和团暴民同样野蛮，北大的学者、精英们为暴行欢呼，显示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失败。

共产学说的由来

民国初年，共产学说经日本被介绍到中国。这时，该学说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话题，没有人要根据这一学说建立政党。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组建了以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派人到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革命主宰中国和世界的二十世纪，由于资料披露与学术研究不充分，没有人对马克思其人、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起源、苏俄革命的起源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各国学者的几十年研究，人们在二十一世纪才了解到真实的马克思、列宁其人，才了解共产主义学说、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共产学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犹太教的假弥赛亚（Messiah 基督、救世主，拯救者）运动。十七世纪，一位名叫沙巴蒂·萨维（Sabbatai Zevi, 或 Shabbetai Tzvi, 1626-1676）犹太教信徒在二十岁时出现精神异常，破坏教规，亵渎犹太教神灵，公开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因此被开除犹太教籍。事件让强烈期盼弥赛亚的犹太人感到有了希望。各国犹太信众相信沙巴蒂将开始统治全球，自己流浪世界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了，纷纷变卖财产回到以色列，等待弥赛亚降临。由此，一场关注沙巴蒂的弥赛亚运动席卷世界。然而，沙巴蒂心中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的创世者上帝，而是魔鬼撒旦，他相信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魔鬼撒旦。当时，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弥赛亚的狂热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商业，土耳其当局逮捕了沙巴蒂。信徒们涌到监狱朝拜沙，贿赂监狱。有了钱赚，当局把监狱城堡

的很大一部分给了沙巴蒂，允许他妻子、许多拉比和仆人和沙巴蒂生活在一起，使监狱成了沙巴蒂的小宫廷。但来此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动乱，当局指控沙巴蒂谋反，下最后通牒要求他通过奇迹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如果不能产生奇迹就须皈依伊斯兰教或受死。沙巴蒂展示不出神迹，求土耳其国王允许皈依伊斯兰教，摘下犹太教拉比的帽子，对着它吐了一口唾沫，公开亵渎犹太教。土耳其国王接受皈依，给沙巴蒂起了新名字。沙巴蒂的叛教让全世界的犹太信徒们希望破灭。部分信徒不愿承认上当受骗，坚持尊沙巴蒂为弥赛亚，由此发展出了以秘密崇拜魔鬼为基础的假弥赛亚运动邪教，即沙巴蒂主义。按照犹太教的说法，在两种情况下弥赛亚要来临，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坏人。沙巴蒂主义声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好人，只有让所有人都变成坏人，让所有人都堕落、犯罪才能让弥赛亚来临。以这样的说法，沙巴蒂信徒发展出的魔教公然把罪恶神圣化，颠倒几千年来的传统善恶标准。

沙巴蒂死去的五十年后，另一邪恶假弥赛亚，雅可比·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出生在波兰（现乌克兰境内）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童年深受沙巴蒂主义影响，在十几岁时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孩子组成的抢劫团伙。长大后，弗兰克亵渎犹太教，自称是沙巴蒂的转世，是活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将要统治全世界。他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称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坏的，要终结一切法律（法规），摧毁和败坏一切人类文明，直到人败坏到不能再败坏为止，然后拯救人类，要通过犯罪找到通往上帝的路，要不受任何法律、法规、道德的约束。他和信徒们搞性狂欢活动，称要回到共夫共妻的状态。他以邪说赢得了沙巴蒂信徒们的拥护，成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沙巴蒂信徒的领袖，于**1759**年在一个小镇建立了一个公社。他要求公社成员把所有钱财都交由财政统一管理，消灭私有财产，打造出了共产主义公社雏形。逐渐，弗兰克的邪说在各国沙巴蒂主义信徒中流传，形成了弗兰克主义。其要点为：无神论；拒绝法律和秩序；否定任何道德底线；恐怖主义；摧毁现存世界，推翻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夺取各国权力；消灭

私有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共产）等等。弗兰克的弥赛亚设想是，推翻各国政府，进行一场世界大革命。

1770年，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4—1812）为首的一伙沙巴蒂—弗兰克信徒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组织起来，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实施弗兰克摧毁人类文明和信仰道德体系的弥赛亚梦想，指派神学教授信徒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 1748-1830）筹划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性颠覆组织，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要求最终实现沙巴蒂—弗兰克的弥赛亚使命。根据银行家们的授意，魏萨普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创建了秘密组织——光照帮（光照派，光明会，光明帮，Order of the Illuminati, The Illuminus Organization）。光照帮信奉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其名称的拉丁语意思是“受到特别启示者”。1776年5月1日，亚当·魏萨普推出了世界革命《核心计划》，将这一天定为光照帮的誕生日。《核心计划》的要点是下列八项政治纲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把所有私人 and 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废除爱国主义，提倡国际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达到“人类幸福繁荣大家庭”。[3] 光照帮的帮规包括：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帮主魏萨普任最高委员会领袖；下级服从上级，帮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无限忠于最高委员会和帮主；会员相互监视，并监视会员的亲戚、朋友；对叛变者以极端手段处置；入帮须发毒誓承诺把生命献给帮会等等。由于光照帮的目的不可告人，魏萨普要求会员保持高度的秘密性，寄生在神秘共济会组织里，所有会员都用化名，魏萨普给自己起的化名叫“斯巴达克”（奴隶造反领袖）。在光照帮中，魏萨普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定期向上级汇报以控制会员。1782年7月，世界各国的共济会领导人在德国法

兰克福市郊区召开一次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共济会与光照帮结盟，承认光照帮的领导地位。至此，光照帮秘密控制了在全世界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共济会，只不过共济会的低级会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了撒旦邪教的工具。

1786年，弗兰克、罗斯柴尔德、魏萨普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三巨头会面，决定弗兰克为沙巴蒂—弗兰克主义的精神领袖，提供渗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西方三大宗教广泛人脉，罗斯柴尔德所代表的弗兰克主义银行家财团负责提供资金，魏萨普负责领导光照帮负责具体策划世界革命。三巨头会面后，光照帮和共济会领导人召开了执行世界革命计划的秘密大会，策划在法国举行大革命，并在会上宣判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瑞典国王的死刑。会后，光照帮控制的法国大东方共济会创立了雅各宾俱乐部，开始实施法国大革命计划。操纵雅各宾党人，光照帮引爆了法国大革命，发动暴民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建立了巴黎公社，以法国国民议会名义发布声明，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暴动推翻政府。通过罗伯斯比尔、马拉（1743-1793）等秘密会员，光照帮假雅各宾党人之手实施了《核心计划》的一系列步骤：恐怖专政，展开大规模屠杀实施其“消减人口计划”；指挥暴民摧毁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烧毁图书馆，摧毁文学和艺术品以摧毁他们认为是个错误的文明；宣传“阶级斗争”、“人民统治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煽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等等，以实施其“摧毁旧世界”计划。

让魏萨普失望的是，雅各宾的号召没有获得广泛响应。1847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实现《核心计划》，将其外围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这时，光照帮因策动法国大革命的事实被揭露而声名狼藉，不便再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它更不能公开其毁灭性的《核心计划》，于是派成员摩西·赫斯（Moses Hess, 1812—1875）出面雇佣《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将《核心计划》改写成共产主义纲领文

件。根据光照帮的要求和魏萨普的《核心计划》，马克思改写出了《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共产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由此问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源头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正义者同盟，而是光照帮。上述渊源关系体现在：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信条源自沙巴蒂、弗兰克的妄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共产党称他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1760~1797）是光照帮会员，其共产主义主张直接来自光照帮，其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的光照帮，巴贝夫《平等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弗兰克主义和光照帮“人类文明是个错误”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巴贝夫的思想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要推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称巴贝夫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再后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宣言清楚说明传承巴贝夫主义，而巴贝夫上断头台之前承认自己是幕后组织（光照帮）的代理人；共产党的标志颜色红色源自沙巴蒂用红色代表鲜血、复仇；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魏萨普的《核心计划》；共产党旗帜中的锤子、镰刀图形来自光照帮旗下的共济会；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一语是共济会第二级别会员间的相互称谓；五月一日成为“国际劳动节”不是共产国际的偶然决定，而是因为那一天光照帮成立纪念日；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的伦敦会议决定委托马克思根据光照帮的理论撰写宣言，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名字（二十年后马克思的名字才署名《共产党宣言》）；受命写《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没有表述过《核心计划》八项纲领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

主要观点来自《核心计划》，《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摧毁旧世界、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思想源于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理论；后来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章程，入党发毒誓，要求党员互相监督，对叛党者处死，以夺取政权目标，剥夺私人财产，继续革命，改造、控制人思想等等理论、实践都源自光照帮帮规和毒誓；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品的国际歌传承的也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

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想掩盖《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 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占有了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情况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 100 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 100 英镑，资本家按 5% 的利率而不是 8% 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 5% 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

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以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新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 1840 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的饥荒结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在持续了三十年的繁荣期间，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得到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坚持以“解放全人类”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以服务的撒旦教的《核心计划》纲领。

马克思于 1841 年 4 月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他在大学毕业的当月即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 Hermann von Berg 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

的要求，当 1841 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耶拿大学。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 Plutarch 反对 Epicure 的论争和比较了 Epicure 和 Democritus 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资本论》不是严肃探讨经济学的著作，而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宣传撒旦教纲领的政治宣传著作。二十世纪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资本论》后指出，该书唯一资料来源是恩格斯于 1845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带着极大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进行了新的翻译，检查其资料来源，发现恩格斯选取的是从 1801 年到 1818 年的资料，已经过时了（但恩格斯却没有说明），其中错误引用资料和弄虚作假总共有 23 页（全书 354 页）。亨德森和查乐勒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其书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资本论》同样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共产党宣言》在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后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农民反对杀地主夺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机会作地主；正经的工人反对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作工厂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们只要求得到切实的，逐步生活改善，对“砸烂整个旧世界”、“得到整个世界”的光照帮理论不感兴趣，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更不会计划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工人、农民都怀有致富梦想，不想自己成为富人后被穷人暴力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

只有流氓、暴民才会想“摧毁旧世界”，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得到整个世界”等等宣言不感兴趣。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初期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加入了宣传仇恨上帝与人类的撒旦教会，他思想彻底改变，开始崇尚毁灭。他在毕业论文中六次使用“毁灭”一词，以至同学给他起外号叫“毁灭”。他在剧本 **Oulanem** 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不算上富有。马克思读大学后花费无度，常常欠债，从不体贴父亲养家的辛苦。他的父亲表达对儿子的绝望写道：“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8] 马克思的个人生活展示他伪善的一面。他创立学说抨击剥削，以劳苦阶级代言人自居。但在生活中，他极端鄙视体力劳动，从未打工挣钱，毕生不劳而获，不承担养家义务，靠父亲供养，靠资本家朋友恩格斯的“剥削”收入供养，靠遗产生活，毕生是个剥削者，且奴役了女仆海伦一生。马克思终生信奉撒旦魔教，宣言“向上帝复仇”，选择了撒旦教女婿、选择的撒旦教徒墓地。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保存了百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其中的二人通信中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并非像宣传的是在交流人道主义和改良社会，提高人民福祉。 [9] 苏联将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文字长期隐瞒，不敢公之于众，只选择性地允许出版了百卷中的十几卷。未出版的八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所表达的主要是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对人类、对上帝的仇恨，以及妄图主宰世界的狂妄。

马克思学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谋求改善工人福利，不是主张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秩序，杀人夺财，号召以暴力夺取资本

家的全部财富甚至生命，以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判马克思主义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罗氏这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劳而获，集体抢劫，谋财害命。在二十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付诸实践，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天文数字的私人财富和人民生命，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历了这些灾难后人们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人和马克思心中的撒旦。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将罪恶神圣化，且身体力行地作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与上述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一样崇尚毁灭，自私，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伪善，漠视他人痛苦。沙巴蒂、弗兰克都曾在自己的监狱宫廷中聚众淫乱，这是后来欧洲换妻、滥交的源头，也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源头。共产主义者们口口声声为解放全人类，实行的是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供自己享用挥霍，视他人生命为蝼蚁，发动连绵不绝的屠杀和整肃运动。从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到马克思，到各国共产党领袖，这个群体将罪恶不断升级，造成的灾难规模也不断升级。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学界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评委会评选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评选结果，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高票上榜。

列宁与十月革命

与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魔教信徒，也崇尚毁灭。十六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10] 这是撒旦教的仪式。与列宁合作多年的斯特鲁威（**Struve**）评价说，列宁的个性特征是仇恨。1891—1892年伏尔加河地区大饥荒，列宁是当地知识分子中唯一反对向农民提供人道救援的人，声称“饥荒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毁灭了旧的农民经济，为社会主义铺路”。他的革命热情不是源于对穷人的同情或正义理想，

而是基于对权力的欲望和社会的仇恨。他的这一思想特征对二十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对社会的仇恨而革命，这一点在各国国会党革命家、共产革命家身上具有普遍性。

列宁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崇尚恐怖主义。十九世纪末，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世界。法国总统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卡斯基略（1898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1年）、俄国教育部长博戈列夫（1901年）、俄国内务部长西皮亚金（1902年）、俄国内政部长普列韦（1904年）、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1906年）、俄国总理斯托雷平等各国政要遭到暗杀。

[11]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是以“破坏与恐怖活动”为宗旨的民意党敢死队员，因涉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处死刑。成长于这个时代的列宁深受其兄的影响，确立了恐怖主义思维，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等组织模式十分欣赏，称民意党是模范的组织。1896年，列宁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捕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三年，被逐出上层社会。从此，他仇恨社会，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

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布鲁赛尔举行的第二次代表会上分裂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和以马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少数派）。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如何“获取经费”和“使用经费”。孟什维克主张合法获取和使用经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择手段。革命党筹集经费不外四种来源：一是党员交纳的党费，其数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其二是国际资助；其三是反沙皇的商人、企业家捐款，如巴库石油大王马·伊·斯柯别列夫的赞助；其四是抢劫国家或私人的财产。前三项来源并不足以维持日益扩大的革命需要，革命须靠抢劫，即布尔什维克党员们所说的“没收活动”。“没收活动”最初还比较温和，以“革命很快就会胜利”说法让银行出纳员放弃抵抗，劫走钞票。因为革命经费需求无限膨胀，布尔什维克成立了以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为首组成的“剥夺”和“游击行动”组织，展开

了大规模贩毒、印伪钞、杀人、抢银行、绑架富豪等犯罪活动。[8]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历史其实就是恐怖活动、武装抢劫的历史，斯大林不否认这一点。[12]

1905 年，沙皇颁布了《十月十七日法令》，推行宪政改革和普选，申明尊重公民的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任何非恐怖主义政党都可以通过选举在国家杜马中公开活动。按照改革法令，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要放弃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就可参选，也可以公开合法地发展党员。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主张停止犯罪与恐怖活动，参加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派则继续从事抢劫、绑票。

在 1906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德哥尔摩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派主导会议通过了《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要求解散抢劫组织。会后，列宁发表《告全党同胞书》称：“没收活动不是原则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心理素质就是雅各宾主义，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果断行为为达到目标而斗争，不是戴着白手套从事斗争。”[13] 至 1907 年，列宁、斯大林、卡蒙和克拉辛等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恐怖组织犯罪上千起，其中包括大规模伪造钞票、暗杀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恰夫卡瓦泽亲王、抢劫第比利斯一家银行的 34 万卢布和财政部的 20 万卢布、绑架勒索巴库石油大亨、洗劫了“尼古拉一世”号客轮、抢劫了众多邮局和火车站。[14] 孟什维克派对布尔什维克不理决议继续抢劫，让社会民主党人背上劫匪恶名感到愤怒。社民党领袖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败坏了党的名誉。两年来，我们没有向全党报告布尔什维克的犯罪活动。现在，我们必须同他们决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决议取缔布尔什维克的犯罪活动，并对第比利斯和巴库发生的罪案进行调查。1907 年底，列宁在当局的追查、孟什维克派调查及社会各界一致谴责的压力下流亡欧洲。

流亡中，列宁以颠覆本国政府，支持俄国乌拉尔地区独立为卖点得到了光照帮分支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资助。1830 年，光照帮帮主

魏萨普去世。同年，“邪恶天才”马志尼加入了意大利光照帮通过共济会控制的分支组织“烧炭党”。不久，马志尼成为光照帮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按照光照帮的行动计划召集会议策划成立第一共产国际，派秘书沃尔夫负责筹备。经过几年筹备，“第一共产国际”（简称第一国际）于 1864 年成立。创立共产第一国际的同时，马志尼还创立了黑手党。马志尼去世后，雷米（Adriano Lemmi, 1822-1896 意大利银行家）接任，负责光照帮在欧洲的运作。雷米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总部，训练列宁成为俄国共产革命的领导人。欧战爆发后，德、奥政府向鼓吹“击败邪恶的俄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列宁提供了秘密津贴。随着德国在战场走向失败，德皇威廉决定，扶植列宁的革命党作为德国的别动队，从内部瓦解沙俄。1916 年 11 月，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受民众谴责沙皇政府的影响哗变。将军们怕哗变的消息传出去影响欧洲战事，劝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国危局。1917 年春，沙皇尼古拉接受劝告签署了退位诏书，杜马（议会）选出了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着手建立民主国家。在沙皇与改革派联手完成和平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的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彼得格勒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苏维埃（soviet）监督临时政府，使俄国陷入两个政权并存的分裂局面。4 月，德军护送列宁、克鲁斯卡娅、季诺维也夫一行从瑞士至德国经瑞典抵达彼得格勒，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也送回了俄国。

回国后，列宁与托洛茨基联手，按照与德国人的约定发表了《四月提纲》，在其中提出了俄国退出战争，不承认二月革命后各党一致拥护的临时政府，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全部土地国有化，将俄国金融机构合并成苏维埃控制的单一全俄银行，由苏维埃控制生产与分配，创建新的共产国际等项纲领。在 5 月的全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列宁以结束战争和“无偿分得土地”的口号赢得了厌战士兵、农民和无业游民们的支持。几个月后，他用德国最高司令部源源不断提供的汇款

[15] 收买拉脱维亚雇佣军，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政变，武力推翻了临时政府。

夺取政权后，俄国举行了立宪会议（制宪会议）选举。自十九世纪初十二月党人提出召开立宪会议主张之后，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包括包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反对沙皇专制政党的主要口号。自信布尔什维克党能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胜，列宁在政变成功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布尔什维克如果在选举中失败将服从人民的选择”。然而，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惨败，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获胜的其它政党理所当然地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要求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这时列宁露出真相，从鼓吹“制宪会议是人民意志完美的体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立宪会议如果与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就注定在政治上死亡”，然后主持推出了“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取消了民众通过“二月革命”争得的民主权利，展开了所谓对资产阶级叛乱的镇压，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武力镇压了立宪民主党组织的“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请愿”游行，捕杀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1月4日，立宪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苏维埃政府宣布对彼得格勒实行军管，禁止公共集会。布尔什维克党报《星火报》发布公告称：任何在立宪会议附近集会游行将者将被武力镇压。1918年1月5日，俄国人期待了百年的立宪会议在首都彼得格勒的塔里达宫如期召开。列宁调集军队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开枪打死百余抗议民众，由此开启了一党专政的极权时代。

对列宁的专政之举，第二国际领袖罗莎·卢森堡抨击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行为。”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谴责：“苏维埃以赤裸裸的专政代替了选举，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苏共后来将此次血腥镇压宣传为“人民起义”。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晚年《访谈录》中披露革命实情说：“十月革命只是一场未放一枪的宫廷政变，不曾有阿夫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也不曾有工农武装攻打冬宫的激烈战斗。列宁挥动手臂说宣布‘工农革命实现了’是共产党宣传部门编造的故事。真实的十月革命只是列宁的卫队长带领十几个人逮捕临时政府部长们的一场恐怖主义者的政变。政变成功后，列宁按照与德国人的密约，派托洛茨基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不仅退出欧战，还出卖了俄国百平方公里的领土。直到几十年后德奥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列宁接受了德国数千万马克的巨额贿款，对俄国犯下严重的叛国罪。”事实上，列宁、托洛茨基接受的革命金钱不仅来自德国政府，还来自沙巴蒂—弗兰克主义银行家们。沙巴蒂—弗兰克主义者在继续推行光照帮的世界革命计划。

武力镇压立宪会议后，列宁废除了宪政议会，紧接着取缔独立报刊物，实施红色恐怖屠杀，成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契卡），负责屠杀新政权认为的“反革命”、“投机倒把者”和“消极怠工者”。“十月革命”的另一领袖托洛斯基与列宁理念相通。他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我们不仅要关起来，还要把他们送上断头台。”[16] 当时，俄国是农业国，工人人数很少，占总人口只有约百分之一。尽管百分之一的产业工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听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布尔什维克坚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为掩盖犯罪起家的真相，苏共将沙皇暗探局、临时政府保留的列宁等人恐怖活动、犯罪活动的档案销毁灭迹（这些档案只是布尔什维克犯罪记录的一小部分）。

苏联解体后，历史学家们从资料中找出线索，披露了列宁统治的几年间布尔什维克犯罪惊人的史实。十月政变时全俄流通货币量仅 196 亿卢布，

至 1921 年暴涨到 160000 亿，卢布贬值率是法国大革命时货币贬值率的 40 倍；几年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煤、铁产量均比布尔什维克统治前下降了八成，谷物产量减少了一半，大饥荒蔓延全国，上千万人死于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主编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评价十月革命说：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人们熟知要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不要偷窃、不要抢掠等公认道德信条，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剥夺私有财产，以革命的名义可以偷窥、抢掠，声称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权杀死他们认为的敌人。[17]

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理论，决定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派人到匈牙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发动欧洲革命及到亚洲各国建立共产党。根据列宁的决定，俄共在海参崴的地下组织开始在中国物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人，其中一个发展对象是李大钊。李几年前赴日本短期学习，在那里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一系列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被俄共确定为了发展对象。1918 年秋，俄共在哈尔滨的地下组织派出海参崴出生的柏烈伟（S.A.Polevory，又译鲍立维、鲍立温、布鲁威、百禄威、波列伏依）到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与刚刚来到北大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联络，将李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在华最早的党员。“李大钊与柏烈伟来往密切，柏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18] 苏共革命依靠的是德国巨额金钱，向中国输出革命不是靠小册子，也是靠巨额金钱。当时，中东铁路当局虽未被苏俄接管，但中东铁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掌握着铁路的部分资金。哈尔滨俄共奉命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和资金输送渠道。当年孙中山因得日本金钱扶植而能

量巨大，如今李大钊因有苏俄的革命经费扶植也能量巨大，一呼百应，组建了众多的革命团体，创办众多的革命刊物，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国民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避免当局的注意，研究会以马尔格斯研究会为名，使当局误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工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北大教职员会、俄国灾荒赈济会、新知书社、新潮社、《少年中国》月刊、《国民》杂志、《新潮》月刊等等。[19]

1918年11月，全国学校放假三天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了演讲大会。蔡元培、胡适等社会名流在演讲中赞协约国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赞美国为支持正义、打败强权作出了贡献，唯李大钊称“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而应为俄国的革命胜利欢呼。”[20] 这里，李是站在苏俄“世界革命”的立场宣传苏俄“小册子”中的列宁理论，而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会后，北京各校学生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北大学生提灯游行到段祺瑞宅前表示祝贺，陈独秀撰文赞颂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公理战胜强权例证”。[21] 而李大钊撰文称：“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22]

这时的李大钊不仅仅是发表演说的学者，还是执行列宁“开展反帝运动”、“直接行动”指示的指挥官。他召集北大激进学生成立了北大学生会和学生南下宣传团，发经费资助学生们赴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以“救国会”的名义发展组织，采取行动反对巴黎和会。“学生救国会”的名称和李大钊手中的革命经费对青年学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通过苏俄金钱的召唤，李大钊迅速建立起了以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刘仁静、张申府，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上海的邵力子，湖南的毛泽东、蔡和

森、李维汉等人为骨干的全国网络，为发动全国运动作好了准备。同时，李大钊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团”，派邓中夏等人率北大学生组织进工厂、上街头，以平民教育之名在各地开展起了苏俄策动的所谓反帝运动。

1919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和会在巴黎开幕。英、美、法、意、日五国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着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赴法前向民众承诺的收回德、奥在华权益，取消领事裁判权、列强在华租界等要求。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次和会主要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不属于本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对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主张，日本代表称中国的要求涉及1915年5月的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和1918年9月的《中日换文》，《中日新约》可因中国参战而作废，但《中日换文》则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署，应属有效。

《中日换文》是北京政府为取得“西原借款”与日本签定的密约，其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的条文。国人不知道政府曾与日本签署了这一密约，中国代表的顾维钧也不知道，但英、法政府代表知道。因为英、法为争取日本参战与日本密约，承诺支持日本接管所有德国在山东利益。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一直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利益的立场。威尔逊倡议和会时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体现着美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政策。在日本出示中日1918年《中日换文》后，他询问中国代表说，1915年的中日新约是日本以最后通牒胁迫签订，而在1918年9月大战即将结束，日本不可能再压迫之时何以中国仍以密约形式“欣然同意”。中国代表团无言以对，威尔逊建议由英、美、法、意、日五国组成的国际联盟暂时托管德国在华权利，以备归还中国。无奈之下，中国代

代表团同意了威尔逊的建议。日本拒绝由五国托管德国在山东权利的提议，并以退出和会要挟。

应对苏俄组织共产国际，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于筹组旨在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了不使和会破裂，达到成立国际联盟目的，威尔逊总统在海上自由原则上对英国做出让步（他的“十四点原则”中的海上自由原则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德国在山东利益问题上对日本作出了让步，以换取英、日支持建立国际联盟。4月30日，英、美、法三国最高会议同意了在对德和约内订明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转让予日本的要求。

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在从法国密电北京政府，陈述了代表团倾向接受和约的如下考虑：

1、对德关系：《凡尔赛和约》草案中毕竟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例如其中的第120条、第129条、第131条、第132条、第133条、第134条、第八章第一附件等款项，废除了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了中国须向德国支付的辛丑赔款，要求德国归还在庚子战争中掠走的天文仪器，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赔偿一战期间给中国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如果中国拒绝签署协约国共同对德《凡尔赛和约》，那么中、德在法律上仍将被视为处于战争状态，中德两国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另立新约，而中国对于与德国直接订约到底能否获得《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权益并无把握。

2、对日关系：尽管《凡尔赛和约》草案将德国原在山东所取得的权利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但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让日本声明嗣后由中日两国另行磋商，由中国收回政治权利，这一点比较中日1915年订立的《民四条约》以及1918年订立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还是有所修正。即便中国拒绝接受山东条款，中日之间的既成事实并不会因此发生变更。在中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使日军撤出山东，直接收回以前德国在山东取得的各项权利

的情况下，日本不但可以单方面依据《凡尔赛和约》继续享受它在山东已经实际取得的权利，而且还可以借口中国不接受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推翻它在最高会议上所作的各种承诺，那样，中国将有可能连收回政治权利的希望也落空。

3、对英、法、美关系：英、法、美毕竟在远东与日本存在着利益冲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只有借助英、法、美对日本的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既然日本已在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将山东政治权利交给中国的声明，而且英国外交大臣复函中国时又留下了文字证据，因此中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后，倘若日本食言，不履行最高会议决定，英、法、美三国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但如果中国拒绝承认上述三国在和会上作出的决定，以后再要求三国出面干预，它们就有可能因为与中国感情不洽而找种种理由袖手旁观。

4、与国联的关系：《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际联盟盟约》。如果中国不接受《凡尔赛和约》，那中国加入国际联盟就不能以《凡尔赛和约》作为法律依据，中国成为国联成员的机会就要大为减少。倘若中国不能加入国联，中国的外交就要陷于孤立，国联给予成员国的各项权益，中国就没有资格享有，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必将受到损害。

5、舆论未必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虽然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都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不满，但是舆论不一定能主导国际局势，国际事务的最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国家实力。

6、国际社会的外交压力。[23]

北洋政府接受了陆的意见，倾向于签署《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期间，列宁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宣布要在世界各国都建立共产党。俄共从 35 国选定的 54 名建立共产党联络人参加了大会。俄共在其制定的《第三国际组织法》中规定：“此新

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第一条），“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第二条）”[24] 俄共在《新共产党宣言》说：“现在我们国际共产党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秩序，实行新社会党的新秩序。我们谨盼各国男女，同会于现在得遇第一次胜利的共产党旗下”。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分赴各国建立共产党。其中，共产国际派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Нюм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ртма**）从哈尔滨来到天津，与李大钊一起策划了中国的反帝运动，并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支部事宜。1919年来华的苏俄军官缪勒尔回忆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苏共没有安排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这一方面是因为，苏共已经在中国率先发动了所谓反帝运动，派李大钊领导着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苏共要淡化中国反帝运动背后的苏俄操纵色彩。

与布尔特曼密谋后，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 **May Day** 杂感》一文。李大钊在 5 月 1 日发表该文并非偶然。这一天是共产党始祖——光照帮的成立纪念日。光照帮将这一天规定为行动日子。根据这一帮规，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决定 5 月 1 日在中国“直接行动”，启动中国“反帝运动”。两天后，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认可日本接收德国原在山东权利的消息传到国内。李大钊和布尔特曼指挥北京的学生组织在 5 月 3 日晚召开了开展反帝运动的会议，否决了多数学生的和平举行示威、守法游行的主张，要求采取暴力行动，操纵学生们制定了暴力殴打或杀害外交官的计划，安排骨干准备了汽油、火柴等放火的工具；收集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币制局总裁陆宗輿、驻日公使章宗祥等政府文官的照片。[25]

5月4日，北京学生组织按照李、布部署，召集十三所大学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帝运动”大会，随后举着“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标语牌和旗帜，先赴使馆区，向英、法请愿，然后按计划奔向曹汝霖私宅赵家楼，砸开门窗，将曹家砸烂，再放火将中西合璧三大院五十多间房的赵家楼焚毁，将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砖砸围殴至浑身是血，伤数十处。警方遵行政府“文明对待学生”的命令，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对学生们打砸烧暴行保持克制，只是将其中三十多名学生逮捕。

5月5日，李大钊指挥学生组织在北京各高校开始了罢课。北大学生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反对暴行，宣布退出学生运动。傅斯年直指北大学生行径如拳匪，建议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首创“五四运动”说法的罗家伦后来反省说：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罢课运动中，胡适劝学生复课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5月6日，大总统徐世昌在各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舆论压力下下令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在爆竹、军乐和欢呼声中返回校园，成了英雄。民国政府再退一步，派代表到北大向被捕的学生道歉，但颁令禁止学生干政，声明政府不可能按学生的要求处理外交。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是全国示威运动的指挥中心，各地学生代表穿梭来此接受指令。李大钊向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团体南北发出指令，要求将运动扩大，派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合学生运动；派邓中夏先到长沙再到上海。[26] 在李的指挥下，北京的学生罢课请愿运动持续，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听命于李的各地学生代表在市民中散布“日本人在水中下毒”谣言，发动仇日罢工罢市

运动。在李的指挥下，学生们以反帝名义对二关门的商家实施打砸抢，逼迫手段包括将纸包大便扔到尚未关门的店铺内。商人为了自保被迫加入罢市。5月18日，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一文，指政府卖国，号召推翻军阀统治，“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7] 5月21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2000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与日本的军事协定。6月3日，李大钊指挥北京学生散发了自己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这一完全没有征求北京民意的宣言威胁政府说，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鼓动之下，示威请愿升级，北京城陷入混乱，政府逮捕了数百闹事学生以维持秩序。李大钊的指挥部不仅指挥着北京的学生运动，还指挥着上海、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的工人罢工和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各地政府惊呼“二次义和团已经发生”。

6月8日，北京政府在全国示威运动的压力下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被学生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撤职，自己也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参、众两院议长登门将徐的辞呈退回。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各地报刊挽留徐世昌的电文铺天盖地，因为各界清楚，徐大总统在内外应对中无可指摘。徐世昌接受各界挽留，同意留任。6月13日，政府总理钱也提出辞职。

6月28日，陆征祥从巴黎发回电文，其中写道：

(1)“大总统钧鉴：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

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职无状，致貽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祥、廷、钧、组。二十八日。

(2) 分送唐少川、朱桂莘两议和代表鉴，并请转全国务团体、各报馆鉴：吾国对于德约仅争保留山东三条，乃直至今日，穷尽方法，卒归无效。祥等因此次和会当谋世界永久和平，论是非不论强弱，故不畏强御，提此主张。不幸事势中变，难遂所期；然吾国仍不能迁就，致成自杀。祥等已拒绝签字。惟外势迫切如此，吾国若再长此鹬蚌相持，则亡将无日，此不绝如缕之国命，今即悬诸上海会议。当此创巨痛深之下，谨痛哭陈词，一致呼吁，务求双方牺牲，从速解决一切纠纷，而一以维持国本为前提，庶几种种问题无难立决。全国一致对外，卧薪尝胆以救危亡，否则国将不存，争于何有？临电怆痛，诸希明察。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胡维德、孔祥柯、许宗汉、郭秉文、徐谦、汪兆铭等。俭(二十八日)。印。”[28]

北京政府同意了陆总长的意见，授权陆部长相机处理。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绝签署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7月22日，李大钊指挥学生联合会宣布停止学潮，历时两个多月的五四运动结束。

五四运动结束后，北京的报刊掀起了一场关于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暴打章宗祥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各界舆论袒护学生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暴行，称学生行动出于爱国，

政府和法律应该服从爱国的口号，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反对暴行。其中，北大讲师梁漱溟指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30] 他预见到，打着目标正确的旗号随意施暴将带来灾难。然而，梁漱溟等人法治呼声和胡适希望学生回到学校，作一点一滴改良的呼声被激进革命口号和爱国口号淹没。

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续推出鼓吹苏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针对李大钊鼓吹外来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灵丹妙药的宣传，胡适撰文回应，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李鼓吹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写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抨击胡适的和平渐进的改良主张，称问题与主义密切不可分，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靠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搞阶级调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宣传赢得了大多数学生的拥护，“新文化运动”就此烟消云散。学联停止学潮后，李大钊又领导了一场维持半年之久的宣传共产革命和苏俄的热潮，为学生暴行，为“平民征服政府”叫好。

胡适只知道五四运动闹出了乱子，但不可能知道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五四运动不是中国国民自主的运动，而是苏俄操纵的运动，五四运动的诉求不是民主，而是暴力，它是苏俄操纵中国走向的首秀。“五四运动总司令”李大钊在运动一年多前就开始接受苏俄的指示和

金钱。五四运动期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成立了旨在“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即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秘密特务组织——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和专门负责向中国等东方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东方局。在威尔逊总统致力建立扼制共产革命蔓延的国际联盟时，列宁针锋相对，制定了建立共产国际，开展世界革命和世界反帝运动的战略。执行列宁的战略部署，共产国际代表布尔特曼到天津与李大钊密谋了开展全国性反帝运动的计划，然后二人一起在北京号令全国，发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发表《北京市民宣言》，要求解散政府，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鼓吹“直接行动”加“牺牲精神”，“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29] 这两位全国运动的总司令一面代表着恐怖主义，鼓动学生放火甚至杀人，颠覆政府，一面也代表苏俄引入中国的反帝运动，他们散布的民族自决说法和“日人置毒”谣言的策划来自苏俄，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市民团体通电，声明的背后也是苏俄金钱的推动。毛泽东后来称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实，李并非总司令，而是苏俄的传令兵。五四运动的幕后总司令是共产国际，是列宁。参与指挥五四运动的不光有布尔特曼，还有运动期间在中国活动的柏烈伟（鲍立维、布鲁威、百禄威）、伊万诺夫（伊文、伊法尔）、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荷荷诺夫金（霍乐勤）、阿加廖夫（在上海活动，联络李汉俊、吕运亨（1885—1947）办俄中双语《劳动》杂志）、缪勒尔（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华）等等二十多位共产国际间谍、特务活动于中国各地，收买各阶层精英，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进行着准备，[31] 是他们在幕后操纵着五四运动，将运动从一伙北京学生的示威扩大为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推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将矛头指向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苏俄操纵的五四运动的真正目标并非中国的山东主权，而是向中国输出革命和开

展世界反帝运动。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学术研究组织，而是苏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筹备组织。五四运动后不久，苏俄派员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骨干们基本全体变身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

与同盟会靠日本金钱成事、布尔什维克党靠德国金钱成事一样，李大钊、布尔特曼因有苏俄的金钱而建立起能够号令全国的舆论网络和组织网络，能在全国众多城市发动起全国性运动。运动中，李大钊派学生骨干去各地联络青帮组织举行罢工，其中包括派张国焘等人赴上海联络青帮领袖李凤池，发动了“六三同盟罢工”。[32] 五四运动后，苏俄加大力度向中国投入革命经费，使宣传革命期刊在一年中猛增至四百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一年中，苏俄资助的社团如雨后春笋，遍布全中国，数量猛增至近四百个。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等。中共后来称五四运动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这些说法没有错。五四运动是苏俄东方反帝战略的一部分，即李大钊所说的“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它的意义是苏俄向中国输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它标志一个重要的分界。从日本人 1897 年决定扶植孙中山开始到一战结束，日本的影响力主导着中国的走向；五四运动是苏俄主导中国走向时代的开始。

苏俄属性之外，五四运动还具有暴民属性。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北京政府在弱国外交中尽了全力，无可指摘。当时，中国政府在签不签和约的问题上处于两难困境。外交总长陆征祥所指出，和约中德国放弃辛丑条约所

得权利，交还天津、汉口租界等项条款对中国有利，倘不签字，中国既无力收回日据山东租界，又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且将来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时反可能招致日本进一步的侵略，对中国更不利；拒签和约虽能显示中国走向自主外交，照顾国人情绪，但无助收回山东权益。胡适指出：五四学生运动并没有帮助中国取得什么外交成果，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无助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应当明白，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屈辱地位是国家长期贫弱内乱，外强颠覆中国政府所致，并非北洋政府及其外交对策所致。但是，青年们很容易接受反帝运动口号的煽动，不由分说给政府扣上卖国的帽子，又打又烧。这是深植国人心中的暴民倾向发挥着作用。学生们的暴行无助于收回山东权益，与爱国无关，与当年的拳匪无异。从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国人树立了打外交官、杀外交官以表现爱国的传统。反对暴行，在暴行后退出运动的傅斯年、罗家纶等人不代表五四精神。李大钊及殴打外交官、放火烧民宅的学生们才代表着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共产革命精神和中国暴民精神的混合，说到底它们是一回事。

与五四精神相对立是北洋时代的精神和北洋政府。在北洋时代，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垄断，不同势力自由竞争，民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人们可以大胆地否定偶像、批判传统，鲁迅可以将国家形容为“黑暗的铁屋子”，青年毛泽东可以鼓吹分裂说：“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参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33] 在那个时代，政府宽容到了极点，学生放火，打人后获释，政府还派人到学校道歉，依学生的要求惩办被指为卖国的官员。北洋时代精神就是自由与宽容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代表是批评学生暴行的胡适、傅斯年、罗家纶和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理性地看待政府外交，和平地提出主张，反对暴行。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代表着宽容和理性，在五四运动后

的十年中代表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代表着中国对苏俄帝国主义的抗争。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蒋梦麟在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胡适和蒋梦麟提醒学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团体生活中，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针对五四运动中的激进行动，胡适提醒青年们：对社会制度的思考，要以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他主张学生们应注重切切实实，一步一步的改革，不应动不动就要推倒一切，他反对煽动学生以罢课的形式去参与政治。对于新文化运动伙伴转向指挥暴行，胡适后来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表达忧虑说：“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尽管《凡尔赛和约》让中国受到屈辱，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外交成就不容忽视。通过参加和会，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作为战胜国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随后还加入了国联，代表顾维钧成为国联宪章委员会十五委员之一，代表王宠惠成为国际法院法官。与十九年前清廷对全世界宣战举动相比，中国在外交上的进步不可谓不大。

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路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说，美国是在和会上唯一没有利益的国家，美国没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威氏此言是事实。美国对其它国家，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长期出面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动员中国参战时，美国国务卿蓝辛和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多次发表谈话宣传参战“将有助于保证中国政治的和领土的完整”，美、英、法等国驻华公都曾

表示参战后将改变中国国际地位。这使得国人对和会抱有极大期望。和会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抗议运动，视美国为救星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转而响应苏俄“反帝国主义”号召，结果，威尔逊总统不惜代价建立国联的举措未能扼制共产主义蔓延，反而助推了苏俄向中国输入共产革命。威尔逊对英、日妥协的决定受到国内共和党人的猛烈批评，曾向中国承诺参战有助于收回山东权益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愤而辞职，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主持达成的，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总统对日妥协的政策成了美国民主党人在次年大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宣传五四运动的史家们称帝国主义在和会上瓜分中国领土主权并非事实。美国没有背弃动员中国参战时的承诺。新总统哈定上台后宣布美国不参加前任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也不加入《凡尔赛和约》体系，并倡议在华盛顿召开有美、英、日、法、意、中、荷、比和葡萄牙等九国举行远东太平洋问题的会议，其中一项要求是纠正美国在中国山东问题上违反承诺对日本妥协的错误。为阻止将山东问题纳入华盛顿会议的议题，日本向中国提出略作让步的《青岛节略九条》（《山东善后处置大纲》），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华盛顿会议主持公道，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1921年11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九国会议（太平洋会议），在会上向日本施压，迫日本与中国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帮助中国收回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于这一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中国代表顾维钧指出：“在任何外交谈判中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这次与日本谈判，中国所获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事实证明，莫理循在大战之初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参战有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建议正确，美国国务卿蓝辛和驻华公使芮恩施关于参战有助于维护国领土完整的谈话也没有错。

李大钊为首的俄党宣称五四精神是反帝爱国精神。反帝说是苏俄编造出来欺骗中国人的说法。它声称，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中国灾难的原因。革命要打倒以美英为代表帝国主义。事实上，中国最大的领土主权威胁来自俄国。若无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满蒙、华北早已被俄国吞并。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致力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同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工大会）。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工会及无政府党代表黄凌霜及中国各界代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瞿秋白、刘少奇、彭述之、王荅美等 30 多人，以及日本（片山潜）、韩国（金奎植）、印度（鲁易）、蒙古、爪哇等国代表。大会回避美国为中国收回山东的主权作出的巨大贡献，回避苏俄霸占中东铁路地区拒不交还中国的事实，要求东方各国服从莫斯科指挥，开展所谓反帝运动。共产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共与“非无产阶级之革命党”联合以对抗帝国主义者，批评中国和朝鲜把美国当成亚洲解放者是错误倾向，要求亚洲各国成为反帝，即反对英美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先锋。在大会召开之时，苏俄外长齐切林（C. V. Chicherin）通知英美法日等国，要求华盛顿会议不得讨论满洲中东铁路问题，表达了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要求霸占满蒙的立场。参加华盛顿会议政府代表们清楚，苏俄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而参加远东劳工会议的代表们则接受苏俄的革命经费，听从苏俄的指挥，开展矛头针对帮助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反帝运动。列宁提出反帝说时，苏维埃政权尚在生存危机中，还没有机会继承沙俄的在华权益。到了华盛顿会议时，苏俄在政权巩固，势力达到远东后立即继承沙俄的对华野心，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压迫。历史证明，不仅苏俄幕后操纵的所谓五四运动不是真正为了中国的利益，其后几十年的反帝运动全都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五四运动中被撤职的曹汝霖后来回忆道：“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

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34] 曹先生所说的“三人成虎，世不加察，恶性宣传，俨如铁案”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特点，也是此后百年革命宣传和革命党史书的特点。革命党史书中的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基本都如五四运动一样，以爱国口号煽动国人颠覆政府，制造暴行，运动背后都是外国势力的金钱、军火操控。从义和团烧教堂、烧翰林院，五四运动烧赵家楼，到农会的烧杀，到红卫兵烧杀，一脉相承。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时，一群前北大学生发起了重走五四之路的活动，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显示中国的暴民土壤深厚，火烧赵家楼，欧打外交官那样的暴行还会重演。

苏俄创建中共

五四运动前，共产国际代表布尔特曼来华，与李大钊策划发动中国反帝运动，同时传话共产国际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五四运动后，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威廉斯基）到西伯利亚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负责向远东各国输出革命。维连斯基上任后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派荷荷诺夫金为代表来华再与李大钊商量建党，同时从海参崴派员先后接触了五四运动学生联合会骨干姚作宾（建国后被中共枪毙）、黄介民等人的“大同党”，俞秀松等人的“社会共产党”和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等组织。[35] 经过一番评审，苏共决定以李大钊这一路人马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基础。对于拟建的中国共产领袖，苏俄有着一番考虑。它知道在中国成功发动五四反帝运动是因为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帮助，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这种情绪，因此要淡化五四运动的苏俄色彩，于是决定不让共产国际党员李大钊出任中共领袖，而任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噪一时的陈独秀为中共领袖。在苏俄看来，中共领袖名义并不重要，因为各国共产党均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最终由苏共政治局领导。

1920年1月，柏烈伟奉命为荷荷诺夫金作铺垫，在天津与李大钊、陈独秀作建党事宜的预先商谈。这时，陈独秀因与妻妹同居及“在八大胡同嫖娼斗殴抓伤妓女”丑闻被北大开除，正在谋生计。困境中的陈独秀得柏烈伟传话共产国际许以经费请作党领袖，欣然同意，随后离开天津南下，应陈炯明之邀去广东办教育。当月，荷荷诺夫金来到天津，与李大钊面谈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宜。会见后，二人分头行动，荷回伊尔库茨克向维连斯基报告，李致信陈独秀通报建党计划。[36] 李荷的会见被天津一家报纸披露，报道说李大钊与俄人密谈“图谋不轨”。报馆的消息来源是北洋政府的一份通告。北洋政府在破获俄共哈尔滨地下组织时掌握了李大钊与苏俄的勾结的情况，在通告中指出：“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了机关”。

3月，因故延误了半年才传到北京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北京报刊发表。新生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在中国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奔走相告，热情赞颂苏俄革命。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们不知道，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维连斯基的建议，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不久后再升级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组织庞大，下设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情报部，其中网罗了不少“中国通”，与华侨中的俄共党员组成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携手，致力向中国输出革命，颠覆中国政府。

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利高里·维津斯基（Grigorii Voitinsky，吴廷康，胡定康）携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秘书马迈耶夫等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建立中国共产党，先与李大钊接上头，然后携李的介绍信到上海再与陈独秀面谈。维觉得光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阵容不够大，设想将主持《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和主持的《时事新报》的张东荪拉来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按照欧洲国家流行的名称，叫中国社会党。维的这一设想颇似黑龙会拉各路中国会党建立同盟会的作法。然而，张东荪等人并不同意共产学说。张与考

察欧洲后归国的梁启超组织了倡导欧美民主制度的讲学社，反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指出：“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无那阶级，党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他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说：“工人听了不过是罢工，没有什么要紧，农民不识字，他是不听的……独是兵与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过是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梁启超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复信中指出：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故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政党，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中国只有“流氓无产者运动”。他主张先发展工业，并达成劳资协调，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致力于教育和福利事业，而不是搞暴力革命。[37] 梁启超、张东荪之外，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北大学生，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凌霜指出：马克思所根据来做演绎的统计有许没有待证明，“他前头的社会党和社会学者早已说过了，例如蒲鲁东在他《什么是产业》一书中已屡言了”，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经济“会弄坏了科学”，“按各个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38]（黄因发表上述观点不久后被开除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经过几次座谈，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对马克思学说及俄人主持中国政党的打算均不认同，决定退出，[39] 维津斯基只好放弃合组社会党构想。

5月，维连斯基作为远东共和国商务使团（优林使团）成员参加与中国政府谈建交。中国政府不可能知道，使团成员维连斯基还肩负着四项秘密任务：第一，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他总政策要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第二，同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三，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唤起

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40] 在北京谈建交期间，维连斯基召集在北京的俄共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在会上宣布正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时，他的代表维津斯基已经奉命赶赴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6月，维津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指定陈独秀和张国焘为负责人，提供金钱用于在中国各地建立共产党支部，宣布来年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俄人建党对穷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个好消息。有俄人提供的津贴优厚，加上在当时宣传共产主义并无危险，各地穷困知识分子纷纷变身职业革命家。例如，穷教员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月刊》湖南发行人后收入倍增。苏俄的革命经费点石成金，迅速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建成了中共支部，再创办了一大批刊物，其中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月刊》，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的《劳动者》等等。有了钱，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不再依靠销量维持，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共产党》月刊，在各大城市秘密发行。与此同时，维津斯基在主要城市开办起外文学社，作为培养中国的革命骨干的人才基地，在上海开办了印刷厂，组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众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向各地派发。

在建立中共前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分赴各国，建立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荷兰、丹麦、美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法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瑞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新西兰、加拿大、南非、日本、巴西、智利等 40 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要求共产国际“渗透到各国的群众团体中去”，“遇有必要可以欺诈，不择手段，隐瞒事实真相。”[41] 共产国际撒豆成兵，迅速建立数十国共产党的法宝是金钱。苏俄信使，或外交官将布尔什维克从俄国东正教会、商人、地主处掠得的珠宝、钻石、鸦片

等等带到各国。各国共产党收到这些贵重物品后变卖为现金。为了将贵重物品带到中国，优林使团和格克尔等苏俄外交代表都执行转交经费的任务。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通信中的重要内容是送钱问题。例如，“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42] “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 10 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43] “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44] “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 20000 美元，请尽快答复”。[45] 苏俄以鸦片的方式向中国输出革命是革命祸害性的注脚之一。

共产国际送钱的另一办法是汇款。比如，1920 年 8 月 17 日维经斯基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密电通知上海接收汇款地址为：“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1922 年，苏俄在哈尔滨开设了远东银行（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分行和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作为莫斯科向中国汇款的代理机构，将莫斯科的款项通过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转给中共；1923 年 3 月 11 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 3 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 1300 墨西哥元已经收到”；1923 年 5 月 22 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 960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1923 年 7 月 26 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 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 3500 美元和 278 英镑。”[46]

了解日本黑龙会、富商、军部巨额金钱资助同盟会才能了解辛亥革命，了解了苏俄向中国巨额资金调动才能了解中国的共产革命。中国革命史就是

日、俄金钱、军火输华史。没有日、俄等外强的金钱扶植，中国怀有野心的青年根本成立不起像样的组织，甚至开不起一个像样的会议。日本黑龙会召集中国会党成立同盟会的背后是出钱供养中国各路会党领袖，维津斯基来华召见李大钊、陈独秀的背后是共产国际派人送到上海的美元现金及钻石。有巨额金钱，苏俄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建党，指定领袖，召集人马，召开代表大会。与获得扶植的组织迅速发展对照，未获苏共选定与资助的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后改名为东方共产党）、俞秀松的社会共产党、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今日派共产党）、吴玉章、杨闇公等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YC 团）、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中华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团体风流云散，不为人知。张东荪的“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一语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游民投身革命的规律。

中共一大

操办建立中共后，维津斯基于 1921 年春离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В.А.Никольский，瓦西里）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荷兰人马林（Maring, 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斯内夫列特，菲力普斯）来华主持召开中国支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来华主持中共大会尼克尔斯基公开的职务是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真实身份是苏俄特务（2006 年，俄学者 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921—1923 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五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47] 马林在其手稿中记录：“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48] 共产国际派曾长期在中东铁路地区从事情报活动的尼科尔斯基来主持中共一大很自

然。因为，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路径经过哈尔滨，苏共的指示、金钱、派员主要是通过俄国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机关来到北京、天津的。

到上海后，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向各地支部发出了开会通知信，要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代表大会。通知信中以最具知名度的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邵力子，沈钧儒和戴季陶等六人为发起人（这六人后均未到会）。代表大会能够召开的关键不是通知信，而是随信一起汇出的丰厚差旅费。开一次会赚到 150 银元（散会另有 50 银元），这对月薪 8 银元的教员毛泽东等小知识分子意味一扇幸运之门。

1921 年 7 月 23 日，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李公馆”（李汉俊之兄，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者包括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邓恩铭、王苓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由于尼科尔斯基的英语不好，与中国代表难以交流，会议由精通英语的马林主持，由李达、李汉俊担任翻译。

一年前与荷荷诺夫金、维津斯基商谈建立中共的“北李南陈”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关于李大钊不出席的原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召集人已经考虑到会议代表多为教师、学生，才决定在暑假召开“一大”。1918 年初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来，李大钊频繁往返北京、天津、哈尔滨，会见苏俄代表兼领取经费，创办了众多刊物，成立了众多的团体，领导了五四运动，基本脱离了校务。因此，张国焘所言的校务繁忙无暇参加会议说应是内部约定的托辞。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的首次全国会议应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他是两年前五四运动的领

领导人，苏俄要掩盖操纵五四运动与中共建党的关联。另外，李、陈一年前在天津已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过成立中共事宜，此次会议只是照本宣科，李出席与否不重要。被马林指定为大会主席的陈独秀当时正在帮助陈炯明办教育，委托陈公博、包惠僧为代表出席。陈独秀没到上海开会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

因为开会的经费由共产国际支付，会议理所当然地由尼科尔斯基和马林主导一切。会议的内容并非讨论，而是听马林宣读共产国际依据苏共文件为中共预先制定的理论一系列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纲领》在内的大部分文件只有俄文本或英文本，连中文本都没有。与会者多数不懂外文，对纲领、宗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等外来说法完全陌生，对翻译解释似懂非懂，无从发表意见。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具有一定政党独立意识，对被动地接受外国人制定好的一系列文件和组织安排感到不满，在会上提出通过预定文件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马林对周等的提议感到愤怒，认为下属支部无权提出这样的动议，拒绝了周、陈的要求。这一分歧注定了周、陈等人不适合继续作中共党人。

会上，马林宣布中共中央的组织安排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任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书记），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前由周佛海代理委员长；[49]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主持，并按照苏共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宣布了中共的工作机构和计划，由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周佛海后来解释“劳动组合书记部”名称的由来说：“‘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则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50]

宣读组织安排后，马林宣布通过了决议案、宣言、党纲等全套预定文件。决议案中规定，中共每月应向共产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宣言根据苏俄向中国扩张的需要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民主联邦”显然指苏俄。宣言中有如此表述并不奇怪。苏俄花钱召集一群穷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会，文件当然表述苏俄利益，收钱开会的代表们也只能举手同意陌生的文件。

共产党的纲领源于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理论则源于撒旦教毁灭性的纲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一个不很重要的错误理论，但作为政治纲领，马克思学说是个极大的灾难。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平地谋求工人福利，使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根据这一纲领，苏俄在国内已经在大规模地暴力剥夺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了。通过建立中共，苏俄将暴力剥夺他人财产生命的纲领引入了中国。这时的中国，各地各界一致地选择了联省自治、和平统一、走向联邦、实现立宪共和之路。但由于苏俄对中国施加强力影响，中国被推上了血腥、暴力的革命之路，将二十世纪中国推入了血腥恐怖之中。中共一大会议上宣读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专政”、“消灭私有制”、“没收土地等私有财产归社会公有”、“无产阶级专政”等纲领后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两位洋人召集一群中国书生开会引起了上海当局的注意。会议中，有密探推门而入，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决定立即休会，按照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改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马、尼认为自己已被警方注意，上火车易被察觉，决定不去嘉兴。马林的判断正确。他 4 月在维也纳领取来华签证时曾被捕。来华后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日本警视厅 6 月底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法租界当局也提前侦知共产国际要在租界召开会议，加强了警戒，在上海报纸刊出了《取缔集会条例》。7 月 30 日，中共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上的画舫继续进行。没有洋人主持的会议变成了无所作为的船游。船游结束时，代表们根据马林的交待，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51] 随后每人再领 50 银元差旅费解散。

陈独秀后来在狱中透露中共一大情况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叫我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52]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中国当时患贫，而不是患不均，无产可共。[53] 代表陈独秀来沪参加会议的陈公博对作洋人的开会傀儡不满，在会上提议应派人到俄国先作考察。提议被马林不客气地驳回后，他感到继续开这样的会没有必要，决定不去参加南湖继续的会议，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他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第一件事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考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家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之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作法简直是与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我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俄国的关系，故推他作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里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林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得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共产党员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议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国人反对，又取消方案。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

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此类事不一而足.....我本来性格是硬梆梆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54] 一年后，马林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所谓党内联合，陈公博拒绝接受这样一个政党派入另一政党秘密活动的安排，声明脱离中共，选择出国留学。

与陈公博一样，暂代陈独秀任中共临时总书记的周佛海也不满须完全听命于苏俄的安排，于不久后脱离了中共。他在二十年后反思参加中共的经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55] 周有反思忏悔的素质，这是他不能继续作共产党人的重要原因。不过，他在反思中包揽了过多的责任。乱子并非是一群年轻人闹下的。外强要输入金钱军火影响中国，中国政府抗拒不了，外强有钱召集人开会建党，年轻人抗拒不了诱惑，要召集多少人都可以做到。

一大会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起因是，马林为中共工作人员规定了月薪标准，命张国焘拟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并申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领导，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和申请经费。陈独秀反对说：“这等于是雇佣革命。中国革命是我们自己事，我们不需要向所谓国际报告，没有国际的钱我们也可以革命。中共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也没有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我们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的事，要保留独立自主，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然而不久，陈独秀自粤返沪，在上海租界被捕。马林花费数万元巨款为陈支付了律师费、保释金和对《新青年》的罚款，保陈出了狱。被苏俄金钱“捞出来”后，陈独

秀想明白了：有苏俄金钱才有中共，要继续当这个领袖，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收起了自己的领袖脾气，按照马林的要求，定期向莫斯科写工作汇报和经费申请，接受共产国际的按月拨款。陈独秀等人不知道，他们收取的金钱大部分是俄国东正教会的财产。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没收东正教会财产的法令，暴力剥夺了几十亿金卢布的教会财产。苏共是在国内大饥荒，每天饿死人的背景下将金钱输出到几十个国家建立共产党的。中共党员们收取的优厚经费是以俄国饿殍为代价的。几十年后，解密的《马林档案》（《斯内夫利特档案》）中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在俄国大饥荒时领取美元、墨西哥元（即当时在中国流通的“鹰洋”）、港币及中国元的收条，有赤色职工国际一次次向中共美元汇款各种签字收条；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工作档案中有莫斯科一次次向中共巨额付款的记录。

召开中共一大的同时，苏俄在莫斯科开办了为东方国家培养革命骨干“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大学），在中国开办了外文学社，作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预备班。学社由维津斯基的翻译杨明斋（共产国际党员）主持，由维津斯基夫妇讲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李达讲授日文。学社第一期招收的 60 名学员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后来的中共要人。次年，外文学社的学员被送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的中国班。

多年后，毛泽东为将自己宣传为中共缔造者，决定将中共成立日期从 1920 年改到了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共在延安时代并无建党纪念日之说，只是以苏俄国庆日 11 月 7 日为党庆日。在那一天，学员们可获加菜，有肉吃。[56] 1958 年，中宣部找包惠僧写有关中共一大的材料。包奉命写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在其中吹捧毛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突出的天才，卓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中国拯

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不过，包文从侧面证实了两点：其一，中共在 1920 年就设立了临时中央，“工作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其二，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会上没有发言。[57] 经办一大代表报到的李达后来披露，一大时毛泽东尚未入党。他对毛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再加入”。[58]

留法勤工俭学

1902 年，李石曾（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随同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赴法留学。农学专业毕业后，他出版了法文版的《大豆的研究》专著，在巴黎西郊创办了“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从家乡保定高阳县农村招募 40 多人赴法工作。他在工厂内开办了工人夜校，自编教材为工人讲课，让工人夜间学习中文、法文和科学知识。他的豆腐工厂日益红火，产品参加了“万国食品博览会”，享誉欧洲。

招工人赴法勤工俭学成功后，李石曾致力为国内青年创造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希望通过勤工俭学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回中国，推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国家富强尽力。1912 年，他与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发起“留法勤俭会”。1915 年，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1916 年，他们在巴黎再成立了以“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接待了 100 多位赴法勤工俭学生。1917 年，经教育部批准，李石曾在保定城乡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华法教育会”相继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地设立了分会，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在全国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热潮。1919 年 3 月，“华法教育会”安排首批的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生们从上海乘船出发，途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赛得港、苏伊士运河，到达法国马赛，绕道英伦再到法国，途中要走四十多天。

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李石曾考虑得比较简单，认为按在法国开豆腐厂的经验，留学生可以通过“勤工”资助自己“俭学”。然而意外的是，从1919年底开始，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到法国的1600名勤工俭学生找工困难。勤工俭学生中形成了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为首的要求法华教育会或政府定期资助的“津贴派”，和以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为首的坚持勤工的“觅工派”。“津贴派”组织勤工俭学生向华法教育会请愿。李石曾万没想到，来法的勤工俭学生不去勤工，而要求供养。他的华法教育会只是个组织机关，并无供养勤工俭学生的资金。面对请愿，他好挪借其它款项，以工作后有余款偿还为条件，接济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日五法朗。有了接济，“觅工派”消失，勤工俭学生们全体成了“津贴派”，大家争相借款。李石曾借出的款项有去无回，无以为继，只好发出通告说：“吾人既无基金，公家亦不给经费，所有用费，皆由组织人勉强借贷与捐助而来，且所得之数，远不及所需之数。华法教育会原无资金，又无入款，无法使学生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59] 通告发出后，勤工俭学生们转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要钱。1920年2月8日，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请愿游行，以女学生打头阵，围攻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资助，是为轰动法国的“二八事件”。法国警方拘捕了攻打使馆的闹事学生，李石曾出面保释了被捕学生，同时在中国国内发起了为勤工俭学生募捐的运动，并筹备在里昂大学开办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中法大学，以帮助留学生度过难关，解决出路问题。

后来的情况更加出乎李石曾的预料。勤工俭学生围攻中国公使馆的丑闻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共产国际正要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建立各国共产党，开展反帝运动，感到这批能闹事的留学生正好符合革命的需要，决定选择一些请愿骨干作为培养对象。勤工俭学生中的周恩来因英文较好，可以与共产国际代表沟通，获共产国际首批选中成为职业革命家，从此有了相当不错的革命工资收入，不用再勤工，而是西装革履，住在旅馆里，行踪保密，被共产国际送到德国，然后再转到英国接受特工和谍报训练。

1920年夏天，共产国际通过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出面，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莫斯科派人到巴黎，通过巴黎的光明社操纵青年团，鼓动勤工俭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通过周恩来为首的一批秘密下属，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各种从事斗争手段，包括如何煽动、纠集群众，如何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如何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如何吸引学生加入斗争等等。与黑龙会的金钱能轻易将留日学生召集旗下一样，共产国际的金钱也能轻易将勤工俭学生们召集旗下。勤工俭学生们很快因有无革命工资而境况迥异。勤工俭学生们都想成为周恩来那样投身革命，逐渐地，他们根据接受苏俄金钱的多少分化出了“全脱产”（领取全额革命工资不用勤工）、“半脱产”（领取部分革命工资半勤工）、和勤工三个阶层。得到共产国际供给的“全脱产”阶层立即摆脱了艰苦生活，开始了革命生涯。“全脱产”阶层的另一代表是全职从事领导留学生闹事的赵世炎。他表面上与勤工俭学生是一伙，口口声声“觅工”，实际秘密享有革命工资，与闹事学生利益完全不同。勤工俭学生的大多数是“半脱产”阶层。其中邓小平的革命工作是印刷《少年》（即后来的《赤光》）等革命宣传品。[60] 与十几年前赴日留学生们无心学业，争相领取日本人提供的经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们争相领取苏俄提供的革命工资，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勤工。

与日本大陆扩张势力将中国留学生当作颠覆清政府的人才储备供养一样，苏俄将在欧的勤工俭学生当作了颠覆北洋政府的干部训练营，也愿意出钱供养这批人。如同当年日本人资助同盟会办《民报》等革命宣传刊物，将报纸大量运回国内分发给会党策动革命一样，苏俄资助的《赤光》等刊物也大量印刷，运回国内策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随着共产国际投入金钱的增加，勤工俭学生中的“半脱产”者大批升级为“全脱产”，勤工者大批升级为“半脱产”，勤工俭学不复存在。法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很多，大多数留法学生成了这两种思潮的信徒。不同的是，作无政府主义信徒不会获得资助，而作马克思主义信徒可以获得资助。勤工俭学生只要常读法国共

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就可以每月从共产国际处领到相当不错的津贴，[61] 于是几乎全体走上了既无风险，又有收益的革命道路。

李石曾被勤工俭学生不断索款搞到病倒，不得不回国养病。1921年1月，挂名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借赴欧考察教育之便到巴黎了解勤工俭学生的情况。他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既没有勤工，也没有俭学，而是像当年留日学生一样，大多数靠索取资助和从事革命活动生活。他意识到，勤工俭学运动已经脱离了“华法教育会”的初衷，靠政府资助和国内募捐供养无以为继。他在给民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欧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难以造就”。鉴于“华法教育会”没有财政来源，勤工俭学生对教育会索求无度，蔡元培发出了“华法教育会”破产通告，宣布解除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经济关系。[62] 正在此时，蒙达尼学校将一些拖欠学费的学生除名。已经在领取共产国际革命工资的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津贴派”骨干借机发动请愿运动，于2月28日组织400多的勤工俭学生再次包围了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高呼“要求生存权、求学权、面包权”口号，向中国政府索要金钱。公使馆无法抵挡闹事学生，求助法国警方保护。警方逮捕了部分请愿的勤工俭学生，是为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二·二八运动”。少数正派的“觅工派”勤工俭学生反对围攻公使馆勒索金钱，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认为勤工俭学生应信守赴法时的初衷，到工厂去做工，以劳动维持生活和学习。多数勤工俭学生不知道，请愿运动领导者们早已听命于共产国际，享有革命工资，围攻中国公使馆的请愿运动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策动“反帝运动”的一部分。

勤工俭学生们在法国闹事以求不劳而获，而北洋政府却在尽量想办法为他们安排出路。1921年夏，在李石曾募捐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决定以法国放弃的庚子赔款加上陈炯明主政的广东省政府捐款在里昂大学中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的中法大学。里昂大学校方了解到中国勤工俭学生普遍没有勤工，其中的蔡和森、陈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人专职从事宣传共

产革命、发行革命刊物，要求从中国国内招收能够支付学费的留学生。里昂大学校方的这一决定公布后，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利用勤工俭学生的不满情绪，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发动了占领里昂大学的暴乱。法国警方没收了暴乱学生的护照，里昂市长下令将李立三、陈毅等 104 名暴乱骨干遣送回国。共产国际设法使暴乱的主要领导人赵世炎免于遣送，让他留在法国继续领导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勤工俭学生中的张若茗在报上撰文披露占领里大暴乱事件真相说：“勤工俭学事业本是以勤工手段达到俭学目的的一桩事，绝没有不勤工而达到俭学的可能，不然便是怠工……当初蒙达尼的学生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他们的理由是找工困难。但现在工作位子很多，而他们不去做工，竟有得到工作而辞去的。”[63] 留学生中的曾琦、李璜等人反对勤工俭学生接受赤化，专事闹事，成立了反对赤化的“中国青年党”，通过《救国》杂志揭露俄共指挥中共，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的真相，直指第三国际下属们为“卢布党人”。

如同十几年前日本黑龙会召集在日本的各路会党联合成同盟会一样，共产国际先是在法、德、比等国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少年共产党，再将这些组织联合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 年，共产国际在巴黎西郊的波罗涅召开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部署中国革命和反帝运动。代表中的赵世炎、周恩来（柏林代表）、李维汉（“工学世界社”代表）、刘伯坚（比利时代表）郑超麟（后被肃为“托派”）、尹宽（后被肃为“托派”）、袁庆云、王凌汉等人全都脱离勤工俭学成了领取苏俄工资的“脱产”革命家。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名存实亡，勤工俭学生们抛弃了李石曾制定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勤工俭学宗旨，投身苏俄旗下，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领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成了以闹事为能的群体。如同十几年前接受日本人资助的同盟会引领暴徒暴力对付主张改良的“政闻社”一样，

接受苏俄资助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也是以暴力对付没有外国资助，势力孤单的青年党，捣乱青年党的会议，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64]

共产国际以巨额资金强力推动，将法国作为了共产革命干部的训练营，从勤工俭学生中培训出了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许德珩、李立三、陈毅、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熊雄、高风、罗学瓚、张昆弟、徐特立、肖三、傅钟、李卓然、何长工、欧阳钦、刘清扬、黄齐生、马志远、袁子贞等共产青年。1923年，共产国际开始从勤工俭学生中选拔骨干派往苏俄受训。其中，赵世炎、聂荣臻被送入莫斯科东方大学，邓小平等人被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聂荣臻再被送入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学习。1923年双十节，六百多华侨在巴黎 ZATARIA 饭店举行国庆纪念会。“入夜，周恩来率领十余名共党份子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意图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65] 周恩来最早被选中培养，也最早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干部。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安排，准备回国任职黄埔军校了。

晚清新政改革中，清政府积极派留学生出洋。袁世凯、张之洞为推动留日运动出钱出力，多方奔走。清政府期望学子们带回科技与管理学识领导改革，富强国家。但是，在日本朝野金钱召唤下，留日运动变质，学子们抛弃学业，将革命活动作为进身捷径，拒绝日本文部省出台的约束规则，发动请愿闹事，然后成了领取日本津贴的革命党，再带着颠覆政府的计划回国，成了反清革命的骨干。十多年后，悲剧重演。中国民间与政府合力发起了另一次留学运动——勤工俭学运动，同样期望学子们带回科技与管理学识富强国家。但国人殷切期望不敌外强金钱的影响力，勤工俭学运动同样变质，勤工俭学生们不像李石曾豆腐厂工人那样勤工俭学，而是既不勤工，也不俭学，不去工作，图不劳而获，将才能用在了在欧洲闹事和勒索自己的祖国，不断发动围攻公使馆的暴乱，随后集体接受共产国际津贴，变身职业革命家群体，

同样带着颠覆政府的计划回国，成了共产国际属下的别动队。两次留学运动的变质过程展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脉络。

青年毛泽东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组织者。他与蔡和森组织湖南学子赴法的半路，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不去了。内中原因在二十一世纪才为人知。1919 至 1920 年间，毛泽东三赴上海操办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请岳父好友章士钊帮忙筹款。章运用影响力，找湖南省长赵恒惕特批拨款及出面向社会各界募捐，筹得两万银元巨款交毛泽东作为安排湖南学子赴法之用。

[66] 通过章士钊筹款之事只有一起去取款的毛泽东、蔡和森和彭璜三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知道。随着蔡登船赴法，彭璜突然离奇失踪，[67] 毛泽东掌握的专款成了不为人知的私款。有了钱，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毛的同学们都奇怪毛怎么一下子阔气起来了。登位后，毛泽东关照了章士钊，在大饥荒中指示周恩来拨给章士钊一所大宅和一大笔钱。1962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宴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为自己“庆九”。章士钊女儿在回忆录写道：“毛主席泽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1963 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没有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68] 这里，毛泽东所言不实：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唐铎确认，他和肖子璋等四十多位湖南

学子没有得到过毛泽东经手的专款资助；[69] 秋收暴动是苏俄驻长沙领事馆出钱策动的。可以说，湖南各界为赴法勤工俭学生捐出的两万银元巨款去向，与毛同时追求湖南才女陶毅（字斯咏）的同龄青年彭璜的下落只有毛泽东知道。

第 12 章 联省自治运动

地方自治与省宪

两千年来，中国实行大一统的秦制，没有地方自治的理念与制度。1906年，载泽等人考察后向清廷介绍英国的自治体制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接受考察大臣的建议，慈禧太后将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作为预备立宪的内容之一，清廷开始了为立宪作准备的地方分权基础工作，决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咨议局。载沣当政后继续推动地方自治运动，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法章程》，要求各地尽快完成地方自治以为立宪打好基础。瓦解秦制与王权的地方自治也在瓦解清廷的中央权威，清廷推动的地方自治成了清王朝覆亡的原因之一。

民初，袁世凯继续推动地方自治，公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和《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施行规则》，在其中规定每县划分四至六个自治区域，实行地方自治，提出了分三期筹办地方自治的办法。这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地方自治是走向富强的正路。学者张东荪在《地方自治之终极观》一文中提倡自治说：“以英美之自治精神提倡于我，而不可以大陆派之帝制精神移植于中国也。何也？英美之自治出于人民之自觉。易言之，即出于道德上、政治上之义务。此政治义务为先天所赋，履行此义务即为自我实现也。大陆之自

治，实不得谓之自治，盖全基于中央政府之委任，其权非固有的，而为让与的，以与英美相较，则如南北两极，绝不相侔矣”，“中国欲图存且强，则非采用英美派之自治不为功”，“以自治精神为今日解决地方制之终极问题之匙”。[1] 学者丁佛言认为，“合各地方为国家之意思以成国家，则建设巩固；集地方势力以监督政府，则政治改良，故而健全的中国政治体制要必在制定宪法时充分注重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其大要中央取列举主义，地方取概括主义。”[2]

袁世凯之后，大总统黎元洪颁布了《地方自治令》，要求继续地方自治的进程。不久，孙中山以“护法”为名发动叛乱，将国家拖入南北分裂。各省期盼和平，希望通过推动地方自治来避免本省卷入战祸。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提出“联省自治”，主张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的模式，既反对中央权力过大，也反对地方走向分裂割据。他写道：“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3] 他认为，通过地方自治，“废督裁兵”、军队国家化，消除军阀割据，联合自治的各省共同组成联邦共和国可以实现和平统一，地方自治只会更加巩固、而不会破坏国家统一；诉诸武力只能带来连年的军阀混战。在梁启超、胡适、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十多万代表在北京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和自治运动同志会，标志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启动。

民国政府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在孙中山以“北伐”、“讨贼”等名义制造战乱的几年中，民国政府内务部继续主办着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传习所），各省区所属道县自治讲习分所也在继续运作。1920年1月，大总统徐世昌因应各省自治的诉求，颁布了经新国会通过的《县自治法》，规定以县为自治单位，设县议会与县参事会。直皖战争后，西南各省看到武

力北伐打败北方政府军无望，为保存地盘和实力也纷纷表示拥护“联省自治”。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先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及开始制定湖南省宪法，四川、浙江、广西、贵州等省也相继宣告自治。1920年底，章太炎连续发表通电，建议联省自治的具体步骤为：“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4] 章的设计获得全国各界的一致赞同。1921年中，陈炯明电请浙江都督卢永祥召集各省区代表到上海制定宪法。接受陈的电请，卢永祥通电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同时召集成立了浙江省宪起草委员会。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川军总司令刘湘，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前陕西督军陈树藩及湖北省议会、山东省议会议长等地方领袖纷纷通电响应卢永祥，制定省宪运动在全国展开。当年，湖南、浙江、云南、四川、广东率先制定出了省宪宪草，湖北，广西、福建、陕西、山西、贵州、江西、江苏、河南等省跟进积极酝酿省宪。

湖南自治与省宪

1918年初，吴佩孚指挥直皖联军击败了湘桂“护法”叛军，占领了湖南，段祺瑞政府任命皖系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1920年5月，吴佩孚率直系第三师北撤。湖南前咨议局议长、督军谭延闿乘机纠集各路湘军，宣布复任湖南督军兼湘军总司令。6月，湘军将领赵恒惕率部击败张敬尧，迫张退出湖南。驱张后，谭延闿根据梁启超起草的《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制订省宪法，不再接受中央政府任命，并召集官绅开会讨论湖南自治。同月，湖南各界成立了以推动自治运动为宗旨的“联省自治会”，致力于联省自治。会党谭延闿并非真正认同自治与立宪，只是以鼓吹自治、立宪作为谋求割据的借口。因翰林名望而被湘军拥为挂名总司令后，谭大力委任党羽，在主政几个月后被湘军将领们驱逐。逐谭后，湖南各界举行各公团联合会议，推举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赵谓一身兼任湘军总司令和省长不妥，请省议会另选省长。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赵恒惕真正认同自治与立宪，发表通电响应章太炎的“联省自治”主

张，宣布湖南继续实行“湘人自治”，成立了“湖南自治法筹备处”，聘请在湘的知名法学专家和学者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百里、彭允彝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在岳麓书院开始起草湖南省宪法。赵恒惕致书梁启超说：“共和十载，政局屡更，南北纠纷，愈演愈烈，长此以往，生民益困，国本益倾，来日大难，念之心悸。湘承兵燹之后，牺牲至巨，创痛至深，恒愚谬掌军钐，愧无长策，思惟以武力勘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是以屡集全省军民长官协议，决定以全省自治为全国率先，庶冀于联省自治得早日实现。”1921年7月，湘军北上援鄂，赵恒惕联络川军刘湘进攻湖北，驱逐了湖北督军王占元。8月，吴佩孚反攻，湘军大败南撤。赵恒惕担心吴军乘胜南下湖南，请英国住汉口领事出面调停，同时促长沙的省宪审查委员会尽快通过省宪，以湖南制宪自治的事实从法理上阻止吴军南下。审查委员们在北方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达成妥协，完成审查，交全省投票公决。11月1日，全省开始对宪法草案进行总投票。经过一个月的投票，省宪草案以1800多万的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192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首部地方自治宪法——湖南省宪法公布，让国人看到了息兵与联省自治立国的希望。纪念这一大事，长沙造币厂赶制了“湖南省宪成立”的纪念银币、铜币，银币上还雕上了赵恒惕的肖像以表彰赵推动立宪的功绩。

《湖南省宪法》的要点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议员民选；省长为最高行政长官，人选由议会提名，全省公决确定，任期四年，掌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法官和行政官员等大权；省议会为立法机关，议员按人口比例直选；省高等审判厅为司法机关，长官（含检察厅）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司法审判独立进行，不受行政干预。参考美国、德国等联邦国家成法，湖南省宪以省权列举的方式体现了“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在宪法上划分”的联邦制精神。湖南省宪公布后，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出通电，促湖南当竭尽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湖南省宪法。省议会改选后，赵恒惕以1581票的高票当选中国首位民选省长，同时赢得了湖南和全国各界的广泛支持。

在积极推进湖南自治的同时，赵恒惕派人到西南各省联络“联省自治”，为中国联省自治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浙江宪草

发表联省自治通电后，卢永祥召集原浙江省议员何建章、沈钧儒等人组成省制宪会议开始起草浙江省宪。1921年9月9日，浙江公布了《浙江省宪法草案》（九九宪草）共17章158条，向省内各地区征求意见。至1923年1月，制宪会议收到了各县起草的浙江宪法草案100部，列名参与起草宪法者达万余人，显示民众广泛参与。省政府经审编分类，将按100部宪草分三种体制主张用红、黄、白三种颜色纸张印出，将省制宪会议拟订的“九九宪草”和汇合各县的“三色宪草”一并分发各县，交全民讨论投票。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审定的浙省宪草比湘宪、粤宪更加完善。但随着卢永祥在1924年的“齐卢战争”中兵败下野，浙江宪草案被束之高阁，未获颁布实施。

广东宪草

1920年，陈炯明回粤后立即推动地方自治，颁布了《选举县长与县会议员暂行条例》，推动民选县长，民选县议员。1921年1月，广东省议会选出了以黄毅为主任的省宪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省宪。陈炯明提出，要以广东为普鲁士，把中国变成“德意志式联邦”，疾呼“国本安危，在此一举”。省宪起草中，黄毅与湘宪、浙宪的主要起草人王正廷密切联络，参考湘宪、浙宪及瑞士，美，英，德，法，加拿大，奥大利，比利时，荷兰，巴西，葡萄牙，土耳其，日本等国宪法，于6月完成省宪初稿。9月，广东民选县会议员完成；11月，民选县长完成；12月，省议会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共15章135条。

广东宪草取消了省长对省议会决案的否决权，对省议会的开支之权作出了限制，规定每年省预算中的军费开支不超过30%，教育经费不少于20%。这一限制条款是陈炯明针对孙中山四处挑起“讨贼”战事，在粤搜刮军费灾难

而特别提议的。广东宪草中注重教育，谋求和平发展，关注劳工权利的条文体现了陈炯明注重地方建设，反对军阀混战，强调基层自治的主张。相比湖南省宪，浙江宪草，广东宪草更加强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权利，在第二章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著名政治学者周鲠生对广东宪草第二章评论说：从来宪法对于人民之自由，大都仅有原则之规定，而无具体的保障方法，其结果等于空文。或则宪法之规定，仅能防制行政部之专制，而不能限制立法部之侵害自由，今之广东省宪，则能补此种缺憾者也。比较而言，广东省宪草案却是各省宪法中最完善和可行者。

云南的自治运动

张勋在北京发动兵变时，云南督军唐继尧出于维护西南独立的考虑通电响应了孙中山的叛乱。在随后几年的内战中，唐继尧认识到了附孙叛乱的分裂恶果，转向拥护联省自治运动，积极推动制定省宪。他指出，中国幅员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也不应中央集权，应借鉴北美，建立联邦共和国。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唐继尧大力推动地方建设，开启了云南的“建设时代”。其新政举措包括，实行新县制、注重市乡自治、兴修水利、建电力抽水站，帮助滇池周边农田实现了规模灌溉，解决了小农分散的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他治下，昆明市内的公路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市内建起了自来水厂，周边农村推广了用电和用肥田粉（化肥）。为解决云南的交通难，他积极推动发展航空业，修机场、买飞机、建航校，并设想利用全省各地的水面建立水上飞机网。在教育方面，他筹办了东陆大学（云南大学）。“自唐氏民十一返滇，励精图治，从事建设以来，全省上下，均本其进取之精神，谋各项新事业之发展。故为期虽短，而成效昭著也。”[5]

联省自治运动中公布的省宪或省宪草有着下列共同点：调尊重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对省、县两级行政首长的权力予以节制；强调基层县、乡自治；禁止军人干政等等。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湖南、四川、浙江、广东各省省宪法第一条完全相同，均规定各该省为中华民国之

自治省，没有一省要求脱离民国中央政府而独立。省宪一方面否定了中央集权，禁止本省督军专权，为国家在联邦主义基础上的永久统一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强调省内基层自治，列举县级事权。其中，广东宪草列举了县事权十一项，最为详细。

联省酝酿国宪

制定省宪热潮中，各界积极推动国宪的制定。1922年3月，各省议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商会联合会、农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银行公会联合会、律师公会联合会、报界联合会上海举行了“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决议各省自制省宪后再联合制定国宪，推举张君勱、章太炎、张东荪等著名学者组成的“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开始草拟国宪。8月，国是会议宣布制定国宪要点为：（一）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国防军不超过二十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百分之二十；（四）各省军队改为民团；（五）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不得当选为省长；（七）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6] 湖南政府省长赵恒惕率先通电响应国是会议，呼吁建立联邦制国家，自制省宪的各省领袖跟随响应。

9月，胡适提出“建立于省自治之上的联邦统一国家”主张。他指出，用集权形式施行于最不宜集权的中国，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而依据省自治的联邦制才是打倒军阀、南北一统的有力武器。中央集权制下，省级首长（如早期巡抚和当时的省督军）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其所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利益，并以中央政府之代表的身份在各省行使统治权。在联邦主义之下，各省自治，当地事务由当地人自己来决定、管理。省级行政首长（在联省自治中被称为省长）由各省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省长的权力不是来自中央政府，而是来自本省的选民。如果各省能够自治，联邦制即水到渠成。胡适的主张得到张东荪、王世杰、李石曾为首的学界支持，也得到了中

国各界及除孙中山外的各省领袖的一致拥护。四川的刘湘、贵州的卢焘、广东的陈炯明、江西的陈光远、浙江卢永祥、陕西的陈树藩、东北的张作霖、直系的吴佩孚等地方实力派都在辖区域开展不同形式的自治运动，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十五省先后宣布自治，实行联省，效仿湖南，积极制定省宪，顺、直省议会也曾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赴沪共同制定省自治法纲要。陈炯明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深刻反省，摆脱了会党观念，反对军治、党治，提倡民治，从暴力革命党转变为联邦主义者。他后来总结写道：“联省自治”即联乡治区，联区治县，联县治省，联省治国。析言之，即全国政治组织，以业治为经，域治为纬，组成五级政制。自乡治以上，各级构成分子均以区域职业两种团体为基本单位，其顺序则以乡治为基础。由此基础，层建而上之，则为区、为县、为省、为国是也。“政治组织之根本，在于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规定之方式，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国小民寡，集权之制容或可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美之合众，德之联邦，皆分权制。英之帝国，其属地如澳洲，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实为分权之尤。俄以广土众民行中央集权，今亦已革命矣。”[7]

联省自治否定两千年来的秦制，代之以层层自治：联民治村、治镇，联村镇治市县，联市县治省，先从体制上建立各省自主的小型自治共和体，逐渐把属于地方的治权交还地方，引入分权，制衡，妥协，消除政权与军权分家，消除党权，由人民以自治的方式自下而上改造社会，走改良进步的道路，最终通过选举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在联邦制之下，中央政府允许各省独立，承认省宪，各省派代表组成联省议会，制定联省宪法，以达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地方自治可以制衡中央，避免出现独裁专制，既可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又可以划清中央与地方权限，消除各地军阀割据。联省自治，建立联邦与武力统一、中央集权道路的冲突实际是西方宪政共和与东方专制的冲突。因此说，推动联省自治、联邦建国与走向共和宪政是一回事。

联省自治运动标志中国选择了最适合国情的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建立联邦制国家道路。在这场运动中，中国思想界，学界认识到，清廷确定的先预备立宪，推行地方自治，在各省选出议会，再建立有各省民意基础的国会，然后制宪、立宪走向共和的时间表并没有错。事实上，联省自治运动正是实施清廷实施地方自治，民选，走向立宪共和大业的继续。若非外强干涉，清廷制定的立宪目标会达到。同样，若无外强在北洋时代干涉，中国的立宪目标将在北洋时代达到。

曹锟当选总统与首部中华民国宪法

1923年9月，国会召开预选会议，讨论总统选举。《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议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开议。第一届国会议员共870位，开选议员人数须在580位以上。民国以来，和平统一、制宪与总统选举的最大敌人是孙中山。这一次，他再次出手破坏，派人到北京活购买议员南下广州以阻止北京国会的总统选举。出于派系争斗考虑，各派反直势力也抵制总统选举：浙江卢永祥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300元薪金的条件动员议员南下上海“完成制宪”以阻止北京举行总统选举；直奉战败的张作霖也采取手段动员东三省议员离京回东北。对于反对势力的联手拆台，直系政府劝阻议员出走无效，只得以贿制贿，用直系各路军阀的捐款和向各县的摊款收买国会议员留京参选。

10月5日，国会投票选举总统。由于贿选被披露，除美公使舒尔曼外，各国使节均未到场观看。选举结果不出意外，曹锟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在武昌暴动纪念日宣誓就任总统。几年后，国民党在当权后控制宣传工具，大力宣传“曹锟贿选总统”、“猪仔国会”，却隐瞒孙中山购买议员南下，购买加暴力胁迫议员选自己为非常大总统、购买议员南下拆台导致北京国会无法选举，曹锟被迫贿选等等史实。革命党史书中只有曹锟贿选而不见孙中山贿选，是党化宣传服务一党私利隐瞒真相的典型一例。

1923年10月10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国会宪法会议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宪法），议长吴景濂立即主持了宪法颁布典礼，总统曹锟宣告中华民国宪法公布。经过十年制宪，民国终于产生了中国第一部宪法。民国制宪经过了长期艰难的历程。1913年7月，国民党一面在南方发动武装叛乱，一面操纵国会垄断政治权力，制定了服务国民党垄断国会专权的《天坛宪草》。无奈之中，袁世凯根据国民党籍议员暗通叛乱的证据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解散了国会，搁置了《天坛宪草》。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为避免继续分裂，向革命党人妥协，恢复了革命党人专权的国会（称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两院议员组成宪法会议继续制宪。1916年9月，宪法会议通过《天坛宪草》（“一读”），1917年1月，宪法会议对《天坛宪草》开始“二读”程序，逐条进行讨论，6月，张勋进京发动兵变，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二读”中止。随后，孙中山收买议员南下，在广州另立政府和所谓国会非法会议，分裂了国家，也分裂了国会，使制宪无法继续。1922年8月，直系控制北京政府后要求恢复民国法统，推动旧国会重开，继续制宪，除对一部分条文进行二读外，又补充了《地方制度》与《国权》两章。由于孙中山再度贿赂部分议员南下，二读程序无法完成，直系政府只得花钱召集议员回京“宪选并进”。在南方孙中山和反直军阀联手收买议员南下拆台的阻挠下，制宪会议因人数不足，先后流会达44次之多，显示制宪之艰难和孙中山对制宪进程破坏之惨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讨论，宪法会议终于在1923年10月10日完成了《地方制度》与《国权》两章的二读，及全文的三读，通过了中国首部《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和反直势力抨击这届国会为“猪仔国会”，并极力贬低和否定1923年宪法。但宪法专家张君勱指出，这部宪法的内容相当可取。事实上，1923年宪法中“大总统”一章的内容基本抄自《天坛宪草》，并未加入有利于直系的条文，并且删去了《天坛宪草》中扩大总统权力的两条，可见曹锟为首的直系并未操控制宪服务私利。后来国、共两党将1923年宪法宣传为“曹锟宪法”是出于一党私利的恶意诋毁。

1923 年宪法是一部体现联邦制的宪法，是清末立宪与地方自治大业的传承，也是中国联省自治运动进步成果的结晶。其重大进步表现在新起草的《地方制度》与《国权》两章。从清末到民国，中央的集权要求与地方的分权要求之间冲突不断。1923 年宪法能够最好地消除这些冲突。关于中央和省的权力分配，1923 年宪法既非完全中央集权制（单一国家制），也非典型的地方分权制（联邦制），而是反映联省自治运动的诉求，规定地方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以列举法界定了中央权与地方权，列举中央权有：外交、国防、国籍法、刑事、民事及商事之法律、监狱制度、度量衡、币制及国立银行、关税、盐税、印花税、烟酒税其他消费税、邮政、电报及航空、国有铁道及国道、国有财产、国债、专卖及特许、国家文武官吏之铨试、任用、纠察及保障，其他依本宪法所定属于国家之事项，规定省除没有宪法修正提议权以外，享有教育、经济、市政、水利、财政、内政、金融、社会福利等地方自治的权力。联省自治运动中，各省省宪或宪草均将军事权纳入省事权，1923 年宪法把军事权收归中央，规定省不得自置常备军，不得设立军官学校及军械制造厂，还规定省法律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省不得缔结有关政治之盟约，省如以武力侵犯邻省，政府得以国家权力强制之等。出于对军阀割据的担心，1923 年宪法文本中没有用“联邦”或“联省”的字眼，但其《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体现了联邦制。

宪法颁布后不久，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的枪炮镇压，体现联省自治运动成果的 1923 年宪法也被国民党废弃。然而，在经历数十年革命后，主流宪法学者们认为，作为中国唯一一部联邦制宪法，1923 年诞生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各种宪法版本中最具宪政精神，最合中国国情，也是最好的一部宪法。其中的《地方制度》与《国权》两章能够最好地解决地区间和民族间的冲突。与它相比，其后的宪法版本均体现向一党专制和向秦制的倒退，完全不能与它相提并论。

清末以来，中国的走向被日、俄两强左右，重大关头的选择均不是中国人的选择。联省自治运动和 1923 年宪法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而短命。然而，中国人曾经的正确选择不因短命而贬值。可以预见，在中国真正宪政时，新宪法将与 1923 年宪法相近，后者将浴火重生。

第 13 章 从对华宣言到北伐战争

第一次对华宣言

欧战中，德国为使俄国退出战争，以巨额经费扶植列宁回国发动了革命。夺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履行对德承诺，与德、奥、保、土四国同盟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宣布俄国退出战争。1918年，英、法、日、美等协约国联合出兵俄国，帮助旧俄政府平定苏俄革命，协约各国军队先后从摩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登陆。受协约国军干涉的鼓舞，顿河地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北高加索邓尼金的志愿军相继起兵反抗苏维埃政权，整个俄国一片混乱。趁俄国内乱，德国、土耳其背弃《布列斯特和约》，攻占了克里木（克里米亚半岛）和南高加索。

5月，中国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对苏的武装干涉，成立了以段祺瑞为督办的参战事务处，与日本签定了共同对苏俄作战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8月，段祺瑞政府发表了出兵宣言（中国海参崴出兵宣言），宣布出兵消除俄国内乱后远的东混乱局面。北洋政府加入对苏武装干涉的考虑符合国家利益，一是要与英、日等列强协调一致以获得贷款；二是希望趁俄国内乱收复被沙俄侵占的满蒙领土。发表出兵宣言后，北洋政府宣布取缔俄共在哈尔滨建立的苏维埃，武装驱逐了盘踞中东铁路地区苏维埃民兵，并派出最精锐的陆军第九师宋焕章支队和海军海容号军舰进驻海参崴。

这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四面受敌，控制区域狭小，不获任何国家承认，俄国在亚洲的广大区域被沙俄将军高尔察克、谢苗诺夫、中东铁路管理局长霍尔瓦特等旧俄势力控制，整个俄国受内战摧残，大部分工厂停工，人民陷于饥饿之中。内外交困中，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扩充红军与白卫军和协约国军

队作战，一面在外交上采取对策，打破国际上无国承认的孤立状态。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致力与中国建交，以瓦解中、日在俄国远东合作，同时为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在 1918 年夏举行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C. V. CHICHERIN）在报告中称：“我们要通知中国，我们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一切占领地，恢复中国在这片领土上的主权。我们同意放弃我国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们准备放弃赔款。”

1919 年 7 月，苏俄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声称：苏俄愿将沙皇政府自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归还中国，将沙俄掠夺的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无偿归还中国，放弃庚子赔款，取消在华一切特权，放弃俄商在中国境内所有之工厂，并要求中国政府驱逐前俄政府的驻华公使和领事，与旧俄政权断绝一切联系，立即派出代表与苏方谈判建交。[1] 这一宣言只是苏俄争取与中国首先建交，打破外交孤立，配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一种策略。起草对华宣言的维连斯基按照他对“反帝”口号的理解将归还中东铁路等内容写入了宣言，但苏共中央则按照几百年来俄国扩张的计划，为将来赖账作了埋下伏笔：一是宣言由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而不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二是在宣言中抛出人民自决论，称“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那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1920 年春，北洋政府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宣言经《东方杂志》全文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对巴黎和会结果感到屈辱的国人闻苏俄的承诺欢欣鼓舞。苏俄通过李大钊等人控制的数百团体、报刊掀起了亲苏和要求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的运动。北洋政府不会像民众一样，见到宣言中的几句好话就头脑发热。北洋政府清醒地看到：第一，苏俄宣言只是空头支票，因为沙俄侵占中国的 150 万平方公里领土、

中东铁路及一切租让的矿产、森林及支付旧俄的庚子赔款当时均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第二，东北地区虽沦为俄、日势力范围，但中国从未放弃主权，苏俄只应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无权宣言放弃中国领土，无权宣言该地区民族自决归属。[2]从财政困境考虑，中国政府需要与协约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以获得贷款；从主权考虑，中国希望借各国联合干涉俄国之机出兵收复被沙俄掠夺的满蒙领土。基于上述考虑，北洋政府没有回应宣言，但采取了恰当的应对，通过驻丹麦等国使馆与苏俄接触，同时派出了以张斯麟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赴苏俄进行“非正式之接洽”。[3]

第二次对华宣言

在派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列宁派优林（M.Y.YURIN，伊格内修斯·尤林）、裴克斯(ALEXANDER K. PAIKES)、越飞(ADOLF JOFFE)、维连斯基（威廉斯基）等人组成代表团，以远东共和国商务使团名义来华谈建交。1920年5月，优林一行抵达满州，受到中国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8月，优林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时，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击败了白俄势力高尔察克军团和各国的武装干涉部队，枪决了高尔察克等一批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旧俄将领，控制了俄远东大部分地区后向蒙古和中国东北推进，美、英、法等国承认对苏武装干涉失败，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撤军，日军退到以海参崴为中心的远东滨海地区和库页岛，中国政府退出了联合武装干涉，白俄军退到了中国东北。

当《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条件归还沙俄自中国攫取的权益”的承诺可以兑现时，苏共政治局决定背弃宣言承诺，继承沙俄的在华权益。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优林代表团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履行对华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的要求，拒谈无条件交还沙俄所占的中东铁路和外蒙古，声明只谈建交，并承诺中苏订立商务条约后，苏俄愿将江东六十四屯归还中国。苏俄的归还江东六十四屯承诺是另一张空头支票，因为这时江东六十四屯尚不在苏俄控制之下。北京政府当然不接受以第二张空头支票来注销第一张空头

支票的戏耍，坚持要求苏俄先履行宣言承诺。结果，双方谈判未获进展。为表示与苏俄接触的诚意，北京政府在与苏俄谈判的同时停止了对旧俄人员的外交待遇。

1920年9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了一份照会，交赴俄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张斯麟带回请北京政府签署。这份后被称为《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照会要求，中东铁路归属须由两国政府另缔新约决定，中国政府须将中国境内反抗苏维埃的军队解除武装，将反组织成员逮捕拘留，引渡苏俄，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将旧俄人员驱逐出境。配合背弃一年前宣言中的承诺，苏俄悄悄从俄文版《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删除了关于愿将中东铁路无条件交还中国的条款。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俄将《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条件退出蒙古、无偿交还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在华特权的承诺改为须“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也参加”。显然，苏俄照会中的要求成了其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条件，苏俄以此办法悄然将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无条件修改成了有条件，以《第二次对华宣言》的一系列要求作为《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附加条件。北洋政府本来就怀疑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诚意，见到《第二次对华宣言》后确信，苏俄宣言中的承诺只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欺骗之词。

由于苏俄在政权稳固后拒绝履行对华宣言中无条件放弃沙俄在华权益的承诺，霸占了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拒绝从蒙古撤军，北京政府坚持要求苏俄先履行宣言承诺，归还中东铁路地区的主权，从蒙古撤军，再谈建交。于是，两国建交谈判破裂。面对苏军占领外蒙后不再撤军的事实，北京政府认识到，在向中国扩张，夺取中国领土方面，苏俄与沙俄并无不同。

考察孙陈

辛亥革命后，日本朝野对捧孙上台后却没有得到满蒙感到失望，在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袁世凯后立即停止了对孙的资助。1917年，德国相中了反政府的孙中山，以巨额贿款策动他颠覆段祺瑞政府。趁张勋兵变之机，孙中山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叛乱，收买被解散国会的议员南下广东，另立政府和国会，将国家和国会拖入分裂。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孙中山通过记者向日本朝野重复割让东三省、蒙古和东南沿海地区给日本方老调，希望再获日本扶植。这时，俄国爆发革命，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署了共同出兵干涉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对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及其出让满洲的老调不感兴趣，无意再资助孙。从日本方面弄不到钱，孙中山转而接触美、英、法、德等列强，仍是以出让领土主权相承诺要求提供巨款。美、英认为孙中山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只同意让孙政府分享关余，拒绝其它资助。欧战困境中的德国对孙中山拿了巨款却没能阻止中国对德宣战感到失望，也拒绝对孙资助。

遍求东西方列强遭拒后，孙中山想到了新生的苏俄。1918年，俄国在内乱之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存续成疑，孙中山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通过美国华侨向列宁发去了祝贺新政府成立的电报，在其中写道：“中国的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奋斗十分钦佩，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俄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了东方人民希望，类似的新制度会在东方建立起来”。列宁在中国辛亥革命时就关注孙中山了，在文章中颂扬他不知道已经下台的孙中山说：“欧美国家的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和傀儡，而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4] 此时，在新政权不获任何国家承认，十四国联合干涉中的危机中接到了孙中山的贺电，列宁倍感可贵，指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复信给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齐给孙发出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在其中写道：“您，尊敬的导师，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当帝国主义从东西南北伸出魔爪要破坏俄国和中国的工农革命

的时候，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联合万岁！”[5] 按照向中国输出革命，物色在华的扶植对象的构想，列宁先后派驻上海的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耶夫·鲍德雷、波波夫上校和波达波夫(POTAPOFF，波塔波夫)将军于 1919 年底至 1920 年春来华考察孙中山和陈炯明。其中，波达波夫将军持列宁亲笔信到上海会晤了孙中山。这时，孙中山对西方列强仍抱幻想，双方只是互相试探一番。波考察孙后报告说：“孙是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目前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在中国各地有大批追随者”。[6] 随后，波再到漳州考察了陈炯明。列宁考察陈炯明是因为陈发表了社会主义言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发表后，中国的知识界被苏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感动，掀起了宣传苏俄革命学说热潮。新文化运动重镇漳州成了宣传苏俄革命学说中心。受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的影响，陈炯明在《闽星》杂志的发刊词中喊出“全人类社会主义”的口号，引起了苏俄的关注。配合考察，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维连斯基亲自撰文称“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7] 1920 年 7 月，苏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局，派刘江到上海再联络孙中山。孙请求苏俄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出兵侵华，与他在广东的革命武装南北夹击，推翻中国政府。刘江离沪后，孙中山派参军李章达赴俄提出缔结军事合作协议的建议，再度要求引苏俄红军入侵新疆、甘肃、四川，援助他的革命党，帮助他推翻政府。[8] 仍在应付内战的列宁无力扶孙，但更增加了对孙的好感。

1920 年 9 月，苏俄派优林使团来华谋求建交以打破在国际上无国承认的孤立局面。北京政府要求苏俄履行宣言承诺，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和从蒙古撤军。苏俄拒绝履行承诺，双方建交谈判破裂。建交受阻后，苏俄将维护主权的北京政府和要求收回满蒙主权的张作霖确定为在华的主要敌人。奉命来华建立中共的维津斯基在与李大钊、张国焘会谈中介绍苏俄在华的两手策略说：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有必要与北京建立关系，共产国际则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9]

年底，维津斯基与柏烈伟、陈独秀一起南下广州。陈独秀是应陈炯明之邀出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津斯基则是奉命再次考察陈炯明。考察后，维将见陈的情况告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俄共派驻广东的情报员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索洛科夫知道孙中山主张北伐，武力推翻北京政府，陈炯明主张和平统一，联省自治，二人意见分歧，认定反政府的孙更有价值，而陈的主张不符合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的需要，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扶植孙中山，称“广州政府可以成为我们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10] 接受斯特拉霍夫的建议，列宁再派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再次当面考察孙中山和陈炯明。1921年底，马林经李大钊介绍，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向孙表示，苏俄可以帮助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和一支国民党党军。孙中山对金钱军火扶植从来是多多益善，表示赞同马林的建议。随后，马林到了广州考察陈炯明和国民党政府。正在推动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向马林坦言：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没有显然的阶级区分，用不着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一党独裁、中央集权都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走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召开国会，人民议政的共和宪政之路；各国有各自达成社会主义的途径，中国的统一不应“依赖外力”。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陈炯明的立场与苏俄发动中国革命的目标格格不入，同时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和国民党，提出苏俄推动中国革命应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建议扶植国民党。得马林报告，列宁指示进一步考察孙中山和国民党。根据列宁的指示，共产国际指示派驻广州主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谢尔盖·达林进一步考察孙中山，摸清孙的国内外政策及对苏俄态度。为免引起孙的怀疑，达林以翻译的身分，与张太雷、瞿秋白一起会见了孙中山，并留驻广州继续考察孙。

中共二大

在广州考察国民政府时，马林了解到，国民党在广州、香港、汕头海员中拥有众多党员，与海员工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向莫斯科建议：中国共产

党过于弱小，中国革命应依靠国民党，派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发展。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列宁在 1922 年 1 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指示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与国民党联合。陈独秀、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这时尚抱有独立政党观念，反对将宗旨不同的两政党混在一起。陈独秀致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维津斯基，表示反对与国民党联合。马林对中共中央抵制他的两党联合计划气愤，离沪返莫斯科，准备说服共产国际下达正式命令。行前，他准备好了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一系列文件，请维津斯基代他召集中共二大。

1922 年 7 月，维津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谭平山、包惠僧、高君宇（高尚德）、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张太雷、杨明斋、陈望道、项英等十几人举行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独秀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张国焘报告了参加莫斯科劳工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宣读了马林准备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下属，须听命于莫斯科的苏共政治局，不得独立决策，决议须得到莫斯科的批准。^[11] 马林准备的大会宣言称：“华盛顿会议（太平洋会议）的实质是要侵略，瓜分远东各国，远东各国应联合在苏俄周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同意归还山东，制止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苏俄担心美国会采取同样办法迫使它归还霸占的中东铁路地区，因此要求中共站在苏俄的立场反美，开展针对美国的所谓反帝运动。中共代表们并非全不

知道华盛顿会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大家拿接受苏俄的经费开会，必须举手通过马林的二大宣言，跟着苏俄喊反帝的口号。

对于马林建议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指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多数代表在会上发表了反对意见。维津斯基无权支持他们的意见，只是宣布了共产国际的任命：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任组织部长。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常驻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派代表团常驻莫斯科。这种模式后成了苏共中央通过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定式。

在中共召开二大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在上海、广州活动的代表利金（赫尔扎诺夫斯基）的报告。马林在其后被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的报告中表达了对中共的失望和对国民党的赞扬，提议将中共中央迁至广州，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而利金向莫斯科提交了与马林战略不同的方案，主张中国革命须以中共为主角。这时，列宁病魔缠身丧失了控制力，开始当家的斯大林认为，派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夺取国民党权力是个好办法，批准了马林战略。

“孙吴合作计划”

苏俄谋求同中国政府建交时，吴佩孚发表了希望联苏制日的言论，同时在控制区内允许中共发展工会组织。苏俄在中国的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注意到吴的言行，向苏共政治局建议以吴为扶植对象。接受维连斯基的建议，苏共中央指示维津斯基、马林与吴佩孚建立联系。[12] 马林考察后向莫斯科报告：“伊尔库茨克局的俄国人相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13]

与马林考察孙中山同时，苏俄派裴克斯使团来京，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由于裴克斯使团与优林使团一样，只谈建交拒谈履行宣言承诺，拒谈交还中东铁路和从蒙古撤军，建交谈判无法进展。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紧

在中国物色推翻北京政府和张作霖的代理人，在马林考察否定陈炯明后将在华的代理人选锁定为吴佩孚与孙中山。根据政治局决定，共产国际指示李大钊加紧与吴佩孚的联系，推动“孙吴合作”以建立新的北京政府，[14] 同时要求李为苏俄远东领导人维连斯基来华亲自考察吴佩孚预作各项准备。

1922年5月，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维连斯基赴洛阳会见了吴佩孚，随后向切林和托洛茨基报告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经我们中国朋友（指李大钊）长期工作，我访问了吴佩孚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吴佩孚委托我转交托洛茨基的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15] 苏共政治局接受了维的建议，任命副外交人民委员，曾主持对德和约谈判的外交家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要求越一面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一面促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或在二者之间最后确定扶持对象，以达到推翻北京政府，建立亲苏中国政府的目标。

8月中，越飞率随员24人经赤塔、哈尔滨来到北京。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等十余位学界名流在东方饭店宴请了越飞一行，向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俄宣言中承诺的感激和要求苏俄履行对华宣言中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沙俄在华权益的期望。越飞清楚，与中国建交谈判无法进展是因为苏俄拒绝履行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作为代表，他只能执行苏共政治局的决定，在谈判中强词夺理，玩弄词令，拒绝履行承诺。但在内部报告中，他吁请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放弃帝国主义行径，履行宣言承诺，向中国移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他的建议遭到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训斥。[16] 斯大林训示：从1919和1920年的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就那个宣言及时作出回答，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务必坚持由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共管，必使俄国在此铁路上享有居于优势的利益保证。在关于外蒙古问题上，不允许排除蒙古国本身。”收到训示后，

越飞才明白斯大林的意思，那就是两次对华宣言的承诺不可当真。他在给加拉罕报告中抱怨说：“当然，只消耍上一点手腕，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我以为，这将意味我们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意味我们华政策的失败。”[17] 但在谈判中，越飞只能执行斯大林的训示，在与北京政府举行的关于缔结商约、庚子赔款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问题上“耍手腕以使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越飞知道这样的建交谈判没有意义，他必须在政治局下达另一任务——物色推翻北京政府的代理人方面取得成果才能交差。在这方面，他在到北京后已立即着手，推动“孙吴合作”。来华途中，他收到莫斯科转来的吴佩孚致托洛茨基的信，知道莫斯科对拉拢吴佩孚极为重视。他派军事顾问格克尔(А. И. ГЕККЕР)和马林到洛阳给吴佩孚捎信，同时派马林也捎信给孙中山。在两封信中，他分别促吴、孙二人支持苏俄在中俄谈判、俄日谈判及外蒙问题上的立场，联合对付抵抗苏俄扩张的张作霖。[18]

越飞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希望的回音。孙中山这时正在困境之中。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后，向孙中山发出了“恢复法统，恢复国会，结束南北分裂”的呼吁，要求孙中山取消非法的广州独裁政府，停止武力北伐。孙中山拒绝了吴佩孚和全国各界“恢复国会，结束南北分裂，和平统一”的呼吁，坚持武力北伐，结果被粤军逐出了广州。躲在珠江军舰上避难期间，他通过陈友仁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谢尔盖·达林捎信，表示要投靠苏俄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苏俄是我危难之中的惟一的朋友。”他告诉苏俄代表说要离穗赴沪继续斗争，如果斗争失败就去苏俄。[19]

8月24日，孙中山刚到上海，马林找上门面交了越飞的信函，并传越飞的话说，共产国际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联孙反陈”，但苏俄支持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必须支持苏俄的立场。

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表态支持苏俄驻军蒙古和接收中东铁路，希望苏俄帮助他建立军队。他通过马林向苏俄提出了“两套计划”：其一是取得俄援后在广东发动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再与张作霖南北呼应从湖南、四川两个方向进攻吴佩孚，如果打到北京，张作霖不交出北京的控制权则请苏军进入中国讨伐张作霖；其二是“西北军事计划”：若第一套计划失败，他的军队将通过四川、广西、山西等省绕过吴佩孚势力范围转移到西北，在蒙古边境，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建立西北军事基地，请苏俄其军队训练、装备，然后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进攻北京，一举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向马林表示，实施上述计划需要苏俄资助大约 200 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几乎同样数目的金卢布），再三询问苏俄是否能够帮助他在中国西北部或土耳其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向他提供飞机、汽车、火炮等等。[20] 越飞无权就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表态，但对孙的立场感到满意。

“两套计划”反映出孙中山思维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没有国家民族利观念和主权的底线。为实现政治野心，他反复邀请俄军侵入中国，助他推翻政府，同时主动表示将助俄向中国扩张。在主动而反复地引强邻入侵方面，孙中山无疑是中国历史第一人；其二是妄想症特点。十年前，孙中山提出了集资相当于列强岁入总和的 60 亿元、建 350 万里铁路（绕地球 40 圈）的计划。

《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在上海采访他后家道：“孙拿出地图，随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他直言“孙比疯子还要疯”。如今，孙中山的十万大军通过四川、广西、山西、蒙古、新疆、库伦进攻北京计划与当年的 350 万里铁路计划一样妄想。

得到孙中山的满意答复后，马林于 8 月底召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及翻译张太雷等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西湖会议）。[21] 会议主题是扭转中共二大上不服从莫斯科指示倾向，消除中共中央的独立政党意识。会上，马林宣读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联孙反陈”的指示，命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仍保持共产党独立和纪律，实行“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对中共丧失独立性，须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不认同，只同意与国民党“党外合作”。马林宣布，中共作为共产党际的支部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刚刚被马林花重金赎出拘捕房的陈独秀明白了没有苏俄的钱就没有中共的道理，放弃己见。陈独秀表态服从后，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蔡和森等少数反对者的意见，决定党员按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联孙反陈”，与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决裂。会后，陈独秀与李大钊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去加入国民党，并传达苏共援孙和中共决定党员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陈独秀提出孙中山须废除“按指印、立盟誓，宣誓效忠总理个人”的帮会作法。急于获取俄援的孙中山表示欢迎中共加入国民党，欢迎苏俄帮助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须按指印对他个人盟誓效忠，并立即主持仪式接受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等宣誓，将入党誓词从服从孙中山个人改为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改打手模为每人签名。

对于共产国际“反陈”的命令，中共广州的组织颇为抵触。两年来，中共在广东的发展得益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允许陈独秀在广州设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讲习所”，还提供经费支持陈独秀办《广东群报》宣传社会主义，支持了 1922 年 1 月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22] 在“六一六事件”前还在劝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的陈独秀在西湖会议后执行共产国际“联孙反陈”的指示，斥陈炯明为革命叛逆。但中共广州支部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领导人拒绝像陈独秀那样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的政策。结果，中共开除了谭植棠，严重警告陈公博。陈公博反对俄人操纵中共，继续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中共中央申令陈公博到上海接受训斥，陈索性声明脱离中共，抛弃曾经热情宣传的共产学说，到国外留学。

物色代理人作推翻北京政府部署的同时，越飞执行苏共政治局的政策，装模作样与北京政府进行建交谈判，抗议中国不向苏俄支付庚子赔款，声称苏俄的两次对华宣言中关于放弃俄国在华利益的承诺并非永久有效，如中国漠视苏俄利益，苏俄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前的许诺。中国外交部拒绝苏俄一面宣言放弃沙俄在华权益，一面又要求继承沙俄收取庚子赔款权利的帝国主义要求，照会越飞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越飞不理睬中国政府照会，反而照会中国外交部，声明中东铁路为苏俄政府的财产。外交总长顾维钧复函越飞，抗议苏俄声称中东铁路区域属于苏俄主权范围的立场，再次要求苏俄履行承诺，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越飞回复外交部，再度强词夺理地声称，关于中东铁路，苏俄对华宣言的意思不是无条件交还中国。

几年前，孙中山以叛乱威胁破坏了袁世凯政府对苏、对日交涉。此时，他故伎重演，多次致函越飞要求苏俄助不要与北京政府打交道，而以他的广州政府为中国政府。他在致越飞信中写道：“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能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你们的政府能否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23]与当年以武力颠覆计划为压迫中国政府的日本送上施压筹码一样，孙中山此时的武力颠覆计划再次为苏俄对北京政府施压送上筹码，使北京政府腹背受敌，谈判地位更加软弱。

越飞一面在谈判中耍赖，一面再派格克尔、苏驻华海军武官贝利和汉学家伊万诺夫到洛阳拉拢吴佩孚，促“吴孙合作”，联手对付苏俄的敌人张作霖。吴佩孚提出，与孙中山合作的前提是孙放弃与张作霖的军事同盟。这时，孙中山等不及俄援，在致力与张作霖结盟，期望等到张的军费援助。格克尔考察后向越飞汇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希望他与孙中山联合建立政府，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吴将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24] 为实现“孙吴合作”，越飞建议苏共

中央向孙中山和吴佩孚承诺给他们未来合组的亲苏政府提供 2000 万美元的贷款。[25]

《孙越宣言》与“二七大罢工”

控制北京政府后，吴佩孚了解到了几年来中苏迟迟不能建交的原因在于苏俄拒绝履行对华宣言的承诺，霸占中东铁路，拒绝从蒙古撤军，明白了苏俄促他与孙中山联手对付张作霖是因为张拒绝苏俄吞并满蒙，明白了自己要获得苏援必须同意出卖满蒙和中东铁路主权，及承诺推翻张作霖后建立亲苏的傀儡政府。曾提出“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吴佩孚当然不会去作苏俄傀儡。1922 年 11 月，他复函越飞，表明了苏俄须从蒙古撤军和归还中东铁路的立场，[26] 并将越飞捎给他的拉拢信函向报界披露，实际是将苏俄一面试谈建交，一面密谋颠覆中国政府的行径公之于众。1923 年元旦，直系领袖曹锟、王怀庆等北洋将领发表通电，谴责苏军占领蒙古，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27] 1 月 4 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曹、王等将领的通电，呼吁“及时准备实力，盖必有以济谈判之穷，方可预操最后之胜”，表达了拒作傀儡，拒绝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扶持的立场，宣言为维护主权不惜一战。

吴佩孚表明立场后，越飞立即抛弃了“孙吴合作”计划，在给苏共政治局的报告中写道：“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的对立关系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28] 收到越飞报告及得知了吴佩孚通电内容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决定：“采纳越飞同志的建议，扶植孙中山及其国民党”。[29] 根据苏共政治局的决定，越飞于 1 月 17 日秘密到沪，在李大钊陪同下会见了孙中山，对孙作最后面试。在此之前，越飞的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已经进行了数月秘谈以为越、孙会面作铺垫。越飞在面试后向苏共政治局报告说：孙中山明确赞成苏俄驻军蒙古，赞成中东铁路维持现状。他是我们的人。他提出推翻北京政府的要价不过是 200 万墨西哥元。我们值

得花这笔钱。孙请求我们派一个师去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要求我们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30] 根据越飞的面试结果，莫斯科立即决定：扶植孙中山。

得政治局批准复函后，越飞于 1 月 26 日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内容为孙中山同意苏俄继续占有中东路及沿线广大地区，同意苏军继续驻军外蒙古，及越飞同意不将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宣言不仅沉重打击了北京政府的对苏交涉，更让北京政府感到了严重的颠覆威胁。宣言隐瞒了苏俄与孙中山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那就是，苏俄承诺向孙中山提供军事、财政援助，扶植国民党推翻北京政府。苏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关于不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的承诺与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一样，是欺人之谈。因为这时苏共已经命令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苏俄顾问已经准备来华改组国民党，“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计划已经全面启动。苏俄加入如此“不引入”条文只是为了帮助孙中山掩盖投苏事实。这里，孙中山与苏俄在玩互相利用的游戏。孙并非不知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保持组织独立将使国民党丧失独立性。但他认为，为获取苏俄金钱军火值得作这样的交换。而苏俄打算先提供军事、财政援助扶植国民党，同时派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夺权。

扶植孙中山之外，苏共政治局的另一决定是打击吴佩孚。根据共产国际传达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于 2 月 1 日在郑州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派包惠僧、陈潭秋等中共党员借助湖北哥老会势力发动铁路工人罢工。1 月底，吴佩孚在洛阳召见铁路工人代表，劝说不要成立全路总工会。工人代表按照中共决定强硬拒绝。吴佩孚知道铁路工会的背后有苏俄的操纵之手，于是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请他说服工人放弃成立总工会，谓若执意成立总工会将以武力解决。李大钊同样强硬拒绝说：“请去问京汉线上的几万名工人吧。”吴佩孚明白，工会与李的背后是苏俄，自己通电要求苏从蒙古撤军得罪了苏俄。

2月1日，共产国际劳合组织（赤色职工国际）不理睬吴佩孚禁止举行大会的公告，召集数万工人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宣布2月4日起全线大罢工，并发表宣言，提出将铁路局长赵继贤、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撤职，郑州地方官向工会道歉等要求。2月3日，总工会机关由郑州秘密迁移至武汉，李大钊以南下讲演为名坐镇武汉，与中共中央的张国焘、中共武汉负责人陈潭秋、江岸工会领导人施洋、林祥谦一起指挥京汉铁路开始了大罢工。大罢工直接威胁了吴佩孚的管制和军饷来源。吴调军警包围了工会会场，命令取消罢工，恢复铁路交通，中共调动工人纠察队对抗。2月7日，鄂督萧耀南下令开枪镇压，致数十工人纠察队员及罢工工人死伤。策划“二七”血案的李大钊、张国焘、董必武、林伯渠、中共湖北区委员兼江岸工会书记项英、张源光等中共组织早早避入租界，逃离武汉，安然无恙。达到以罢工工人的血来打击吴佩孚声望的目的后，共产国际代表维尔德通过劳动组合书记张国焘下令京汉铁路工人复工，并向中共支付了“二七”罢工遇难的铁路工人家属抚恤金。为这次大罢工，共产国际破费了数万卢布。其实不仅这次罢工，中国各地的所谓工人运动全部是共产国际的金钱所策动。在华活动的“赤色职工国际”就是苏俄以金钱策动各国工运专门机关。几十年后解密的马林档案、共产国际档案披露出，共产国际每次策动中国工运、农运背后都有巨额的资金调动。

3月，共产国际通过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组织举行了为元宵提灯会，以“打倒军阀”，“否认国会”，“推翻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还我自由”等口号煽动民众，再造成民众与军警冲突，致数十人受伤。事件后，曹锟在给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的电报中通报：北京大学管理图书员李大钊设有俄人供给费用秘密机关，请侦查严办。

“二七血案”是苏共政治局打击吴佩孚决定的产物。从策划五四运动开始，苏俄便主导着中国的舆论，中国强人的进步或反动标签全由苏共决定，顺苏俄则进步，逆苏俄则反动。张作霖最早抗拒苏俄霸占满蒙，最早被苏俄认定

为反动军阀。在吴佩孚没有表态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及要求归还中东铁路之前，共产国际控制的中文、俄文刊物大力宣传吴佩孚为“开明将军”、“进步将军”，而在吴通电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后，共产国际制造了“二七惨案”，给吴贴上反对派、“反动军阀”、“帝国主义走狗”等标签。几年后，吴佩孚被苏俄枪炮击败，退居白帝城。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来采访，表示愿供百万借款和军火助他吴东山再起领导讨赤。吴拒绝道：“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决定于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吴佩孚此言不假，倘若他在 1922 年表态支持苏俄霸占满蒙，那么中国革命领袖非他莫属，也就不会再有“国父孙中山”说法了。在苏俄强大的影响力面前，拒作傀儡的中国强人都难免身败名裂下场。

孙中山投靠苏俄，支持苏俄占领满蒙的立场让长期扶孙的日本朝野感到被骗。斯大林知道，想强占整个满蒙将引发另一次日俄战争，于是派越飞赴日本解释《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并密谈苏日瓜分满蒙。1 月底，越飞以疗养为名飞赴日本热海，就《孙文越飞宣言》向日本方面作解释。孙中山派廖仲恺随越飞赴日，在日本与越飞及其秘书谢瓦尔沙龙磋商俄援、建立国民党军校、组建国民党军、向国民党派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等具体事项。经过一个多月的秘谈，越、孙达成协议，内容包括：苏俄向国民党提供 200 万金卢布的援助，其中 70 万金卢布用于建立国民党军官学校；苏俄在两年内向国民党提供 10 万军队武器装备及军事教官；苏俄派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到华南支持孙中山；参照苏俄制度改组国民党，参照红军制度建立国民党军等等。3 月 8 日，苏共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越飞与孙中山达成的上述协议，[31] 决定成立齐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三人委员会负责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事宜，已掌握苏共最高领导权的斯大林签署了会议的决议。5 月 1 日，越飞自热海电告俄共中央批准了向孙中山提供援助的决定。5 月 15 日，孙中山复电越飞表示感谢及将派员赴俄讨论具体事宜。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马林召集四十位中共各地代表（代表党员420人）在广州举行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得以召开是因为共产国际拨出的数千美元专款。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马林在会上重申，中国的劳工运动和中共过于弱小，目前推动革命运动须依靠国民党，中共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马林的“党内合作”主意是根据他在爪哇推动印尼社会主义运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创建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的经验。马林不知道，建议获准实施的背后是斯大林与孙中山在斗法。孙中山一贯为获取金钱、军火不择手段，没有国家、民族、主权和道德的底线，什么条件都答应。因为他知道，有钱有枪，夺取政权后他可以不履行承诺。在这方面他有成功经验。二十多年前，他以革命成功后出让满蒙获的承诺赢得了日本朝野的支持，被指定为中国革命领袖，获得了日本朝野的无数拨款、捐款和军火。当日本朝野不再给钱时，他转向了苏俄，打算将满蒙再卖一次，以同样承诺再换取苏俄的金钱军火。斯大林知道孙中山是想利用苏俄援助壮大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军，而国民党壮大力量后是否还听命难说，于是安排中共到国民党内去发展，逐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他解释这一策略说：“我们不能从莫斯科公开地向国民党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出席三大的中共代表们不会了解孙中山、斯大林的如意算盘，纷纷表示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另一政党不合道理，或以沉默表达不认同。这时，毛泽东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眼光。他不像陈独秀、张国焘那样学者式地考虑问题，而是认为像《水浒》中三打祝家庄那样钻到内夺取国民党权力是个好办法，在会上称党内合作是个好主意。

对于中共大多数代表的反对意见，马林重申，中共作为下属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代表们只好服从，举手通过了马林准备好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保持组织独立，在国民党内秘密发展。最后马林宣布共产国际的人事任命：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五人为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罗章龙为中央局秘书。共产国际的人事任命其实是马林拿主意。马根据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调整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一直反对国共“党内联合”的张国焘排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主持中共一后，马林南下桂林广州考察了孙中山、陈炯明。途中，他在长沙参观了毛泽东主持的文化书社和青年聚会，对毛泽东颇有好感。此次会上，他将支持“党内联合”的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集中在国民党建的黄花岗烈士陵园，由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教唱《国际歌》。在大会闭幕时唱《国际歌》是共产国际规定给各国共产党的程序，中共不能例外，在三大后自觉地长期执行。

三大结束后，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中共现有党员 420 名，其中工人 160 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中共是个过早地制造出来的早产儿，它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32] 参与创建中共的李达因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选择了退党，并给陈独秀留话：两个目标不同的党怎么可以合在一起，即使联合，也必然要分手。

蒋介石访苏

1923 年 5 月，在日本的越飞通过马林转告孙中山：苏俄将向他提供 200 万金卢布和大批军火，并派出的第一批军事顾问五人来华。他要求孙中山严守秘密，因为他仍要装模作样地与北京政府继续建交谈判。孙中山复电感谢苏俄扶植，表示将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详细磋商。[33] 9 月，苏俄代表鲍罗廷(MIKHAIL MICHAEL BORODIN) 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主持改组国民党。同月，奉孙中山派蒋介石为团长，率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

抵达莫斯科后，蒋介石一行会见了受到高规格接待。这时列宁已痴呆，最高权力由斯大林与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掌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GEORGII CHICHERIN)，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E. M. SKLYANSKY)，俄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LUZUTAK)，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L.B.KAMENEV)，俄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等苏方要员分别会见了代表团。蒋介石向苏方转达了孙中山催要援款的要求和孙中山的《军事计划书》。[34] 这一计划书是蒋介石为孙中山拟定的，主要内容为要求苏俄帮助国民党在库仑和乌鲁木齐建立颠覆中国政府的军事基地。八年前，孙中山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和最后通牒压迫中国时指挥中华革命军进攻政府军，黄兴通电谴责孙“效法平西，以图一逞”。此时，孙、蒋在苏俄霸占满蒙，图谋推翻中国政府时再次“效法平西”，向苏俄提出引狼入室的计划。蒋介石晚年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谴责苏俄侵华野心，但没有对自己请苏俄进兵库仑和乌鲁木齐表示过忏悔。

苏俄对孙、蒋的邀请并不领情，认为苏军占领下的库仑已不再是中国领土。托洛茨基以蒙古宗主国口气说：苏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人染指蒙古，你们要北伐，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为免引发苏日冲突，苏共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孙中山想中蒙边境建立军事基地的“西北军事计划”，只承诺将运送军火、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为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及组建军队。斯大林、托洛茨基对国民党代表团催要军火要求和所提“西北军事计划”感到不快，于是将代表团晾在莫斯科一个多月不予理睬。蒋介石对坐冷板凳感到愤怒，在日记中写道：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他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35]

11月1日，契切林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道：“新任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同志希望对孙逸仙的参谋长应该表现得亲热些。可是情况恰恰相反，只有我和斯克良斯基同志在招呼他，结果参谋长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

里”。接受加拉罕的意见，苏俄安排蒋介石出席了苏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安排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专门讨论国民党问题的会议，及参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军事院校、军营和工厂。参见中，蒋介石感到了苏俄革命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感到了苏俄视蒙古，在革命旗号下向中国扩张的野心，对苏俄革命得出了负面结论。

回国后，他在写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表达对联俄政策的疑虑说：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36]

第一次东江战事

以“护法”名义在广东建立非法政府后，孙中山发动讨伐战争无竟无休，为筹措军费在广东横征暴敛。陈炯明在几次充当孙中山的战争工具后拒绝再附孙北伐。1922年6月，孙中山被反对内战分裂的粤军逐出了广州。8月，孙中山逃到上海，得苏俄代表马林登门，捎来了苏俄新任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扶植邀请。困境中的孙中山决定投靠苏俄，申明支持苏俄在蒙古驻军和占有中东铁路以争取俄援。1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达成接受俄援的协议。

在粤成立非法军立政府一遭，孙的最大收获是以军政府名义收取了“关余”。遍向列强寻求金钱扶植而不获时，孙中山手中的本钱用一个少一个，还不敢放手动用关余。得苏俄援助承诺后，孙中山决定放手动用中手剩余的关余款，武力讨伐陈炯明。他以关余款购买盘踞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部和桂军刘震寰、沈鸿英部为雇佣军，派邹鲁，叶夏声密赴香港提取关余款

24 余万元，派孙科到香港向港商杨西岩、伍学煌卖官，许以夺取广东权力后的商业利益，换取他们出资，作为贿买滇军、桂军的另一部分军费。争取关余时，他不断呼吁驻华外交使团勿将关余交北京政府，称交北京政府关余不啻资助北方的战费。然而，他却将收取的关余全部用作了四处讨伐的军费。

12 月，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滇军总司令，沈鸿英、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桂军第一、第二路军司令；纠集在闽的国民党军许崇智部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为司令，发动了讨陈战争（第一次东江战役）。杨、沈、刘率“西路讨贼军”出梧州沿西江东进，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出闽入粤，两面逼近广州。陈炯明不忍在家乡开战摧毁“模范省”建设成果，命四万粤军退到东江、潮、梅避战，通电宣布下野说：“炯明既去，则政争者自无所资以为口实，当然不至再逞干戈。所部请北京政府收编”，[37] 随后离穗回海丰家乡。粤军将领们派代表到海丰劝陈出山统帅粤军对孙开战，陈表态：只要能避免糜烂地方，他不介意部下接受收编，[38] 然后再退居香港避战。遵陈嘱，粤军东退，杨坤如率部守惠州，林虎、陈炯光，翁式亮，锺景堂等部退驻兴宁，五华，蕉岭，大埔一带，洪兆麟率驻潮汕，[39] 滇桂军随即占领了广州。

2 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建非法的大总统府，但宣布在河南士敏土厂设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由他个人独裁一切政务、军务、任免官员、公布条例之权操于一己之手，权力无限，不受任何制约，没有任期限制。名称虽不同，但大本营与大总统府一样，均是孙中山的独立王国。随着孙中山回粤，陈炯明的广东模范省建设成果被摧毁。

5 月下旬，滇桂雇佣军和国民党军对惠州发动总攻。粤将杨坤如率所部 6000 余人凭借三面环水地利坚守。鉴于孙的雇佣军在此之前攻入博罗大肆烧杀抢掠，惠州绅商民众为免涂炭众志成城，出钱出力助粤军死守。孙军久攻不下，转而对惠州长期围困。7 月，孙中山声言如不能攻下将火烧惠城至

毁灭，并由虎门炮台调来大炮，轰击惠城。9月，孙中山来到惠州城下，亲自操炮向惠州城内发炮致平民死伤。[40] 退驻兴宁，五华，蕉岭，大埔及福建的粤军见孙军无意停战只好分三路反攻，于10月败孙军于博罗，再攻至樟木头，杨坤如率部出城反攻，孙军败退。11月，粤军进占石龙，广州震动，孙中山再次避上永丰舰，准备逃离。至此，粤省商民与粤军同仇敌忾，挫败了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东江战役”。

第三次对华宣言与拥苏运动

1923年中，苏俄将越飞召回，派两次签署对华宣言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接任驻华全权代表，派鲍罗廷到广州负责领导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军校和国民党党军，筹备武力北伐推翻北京政府。赴北京途中，加拉罕先到了沈阳会见了张作霖，试图利用奉、直之争说服张作霖放弃坚持满蒙主权的立场。张重申支持北京政府对苏交涉，要求收回中东铁路和蒙古主权。加拉罕失望离沈。

9月上旬，加拉罕抵达北京，向报界发表自相矛盾的谈话说：“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迄今仍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些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表述后被称为“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这第三次对华宣言的话，那就是耍赖——既高喊“无条件归还沙俄攫取的在华权益”收买人心，又坚持继承沙俄攫取的在华权益，霸占满蒙。

9月中，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代表、中俄交涉使王正廷开始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加拉罕要求只谈建交，其它一切待建交后再谈。王正廷要求苏俄先履行宣言的承诺，从蒙古撤军及交还中东铁路，以显示尊重中国主权。对中国的要求，加拉罕与越飞一样强词夺理，以流窜白匪利用外蒙古进犯俄国，中国政府未采取措施等等为借口，拒谈履行宣言承诺，拒谈从蒙古撤军，建交谈判无从进展。

在加拉罕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苏俄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了拥苏运动。国人不了解苏俄对中国的强权压迫，不知道北京政府对苏交涉之艰难、屈辱，不知道孙中山通苏拆台，不知道苏俄一面谈建交，一面启动了扶植国共两党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更不知道领导全国亲苏运动的李大钊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苏俄和国、共两党煽动下，各地大学的教授和青年学生们纷纷上街请愿，要求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抗议北京政府拖延与“唯一真正平等待我”的苏俄建交，北京、上海知识界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文章，致函北京政府和外交部，敦促政府立即承认“唯一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苏俄政府，立即与苏建交。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亲苏运动中，苏俄指挥国、共两党和所资助的报刊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收回满蒙权益的北京政府扣上了反动军阀政府帽子，营造出了拥苏等于进步的舆论潮流。

关余危机

《辛丑条约》规定，庚子赔款以关税（进口税率是按进口货价值百抽五）作担保。此后，列强控制中国海关，代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后以税款抵庚子赔款及其它外债本息，将所余款项，即关余，交还中国政府。1918年，孙中山派非法任命的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与北京公使团交涉，成功获得列强同意按13%的比例分享全国关余。唐继尧、陆荣廷联手以七总裁合议制结束了孙中山的独裁，孙抛弃广州军政府离粤赴沪，但仍通过伍廷芳继续秘密收取关余巨款。主政军政府的桂系不容忍伍廷芳继续将关余款交孙中山，经七总裁合议后决定解除伍的总裁职。伍廷芳携带印信和185万关余款离粤赴沪。伍离职后，粤海关将粤省关余拨交桂系主持的广州军政府，由新任军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接收。通过另立政府，孙中山成功占有了390万元关余巨款。运用这笔巨款，他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国民党，调动陈炯明所部驻闽粤军回粤推翻了桂系在粤统治。

1921年1月，孙中山回粤后向公使团提出了继续收取关余的要求。公使团知道孙中山用关余巨款四处发动讨伐战争，决定支持中国南北统一，以

“关余不能被滥用”答复拒绝了孙的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给国务卿许士（CHARLES E. HUGHES）的报告中写道：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他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41]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罗赫德根据报告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此外，在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中山言行的报告中多次出现“精神失常”的描述。[42] 北京公使团决定将 1921 年的 250 万元广东关余支付北京政府后，孙中山决定以武力夺取关余，发布军政府令，宣布两广各海关须听从军政府管辖。应对孙中山的威胁，广州领事团从香港派兵至广州西堤“护关”。粤军将领们对孙中山将广东关余巨款完全用于了发动所谓讨逆战争，而完全没有用于广东地方开支强烈不满，通电反对孙中山私占国库，要求孙取消非法总统之名，在孙拒绝要求后发动了“六一六”兵变，将孙逐出了广东。

1922 年底，孙中山获得了苏俄的扶植承诺，决定动用手中的关余余款，收买滇桂军和粤军许崇智部组成东西两路讨逆军由桂伐粤，迫陈炯明下野，粤军东退。1923 年 2 月，孙中山回粤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第三次入主广东。这时，俄援金钱尚未到手，孙中山手中的关余花得所剩无几，于是他再打关余主意，任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为军政府外交部长，命其子承父业，继续致力收取关余。

1923 年 9 月，孙中山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向公使团发出备忘录两件，要求公使团将 1920 年 3 月以来的两广海关关余交给他的军政府，威胁否则武力强收关余，制造了“关余危机”。北京外交使团拒绝了孙的要求，决定武力护关。美国公使舒尔曼声明说：“广州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的障碍，并且对外国人利益及条约义务颇为蔑视。孙中山若得关余将延长中国内乱。”12 月初，北京公使团调美、英、日、法、意、葡等国军舰 23 艘开入广州白鹅潭示威，国民党则在广州以爱国和口号相煽动，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武力护关的同时，舒尔曼来到广州，先后与伍朝枢和孙中山面谈，

然后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建议，由北洋政府拨出部分关余给广州，供疏浚西江之用，暂时缓和了关余危机。4月底，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英、美、日军舰撤离。6月，列强支付了部分粤海关关余给大元帅府，指定用于西江疏浚。孙中山任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作出以关余款修水利的姿态，持续半年的关余危机至此以妥协结束。

此后，革命党将这次关余危机宣传为是孙中山爱国与反帝之举。其实，孙中山制造的关余危机是因为被自己购买入粤的滇桂军不断索饷，搞得焦头烂额，请神容易送神难，才打起关余主意，与爱国完全无关。在索要关余的同时，孙中山在谋求其它列强的资助，向来广州的美国公使舒尔曼，三井商行，德国驻广州领事提以广州的一座水泥厂、采矿权，沿海捕鱼权等等抵押换取巨额借款。^[43]视广州军政府为中国统一障碍的舒尔曼当然不会与孙中山谈资助，更不认为孙有权出让国有资产和各项主权。日、德方面均已被孙中山骗过钱，也无意与孙谈资助。公使团两次拒绝孙中山分享关余的要求是为中国做了好事。因为，孙中山连年东征西讨，制造战祸，钱到他手中全部成了战争经费与一党经费，完全不会用于民生，甚至关余危机中的妥协办法，指定用于疏浚西江的关余款最终也未被用于西江治理，也被孙用于了“讨逆”战争。事实上，北洋政府时代的历史就是孙中山不断发动战乱，分裂国家，出卖主权的历史。孙三次入主广东，不断发动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无穷祸害。对广东而言，孙中山购买入粤的滇、桂军截留广东财源，收取买路钱，给广东地方带来了巨大灾难。照孙中山这样无休止地收买雇佣军发动“讨逆”、“讨贼”战争，收买暴徒贿选及暗杀政敌，莫说 13%的关余，全国关余、整个国库的钱也不能满足他的战费需求。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动因就是要求将财政收入尽可能多地用于办教育和地方建设，反对发动战争，反对搜刮广东民财作为北伐战费。伍廷芳携广东关余款离粤附孙时曾声称“拒以国民之钱资民贼”。然而他带给孙中山的关余巨款全被孙用于了组织私党、发动战争和买凶暗杀。伍氏父子为孙中山打理关余真正是“以国民之钱资了民贼”。

关余危机中喊出的反帝口号是苏俄创造出来的。这些反帝口号在二十世纪蒙骗了无数中国人。根据苏俄的说法，帝国主义是以美英为首的列强，但不包括霸占中国领土最多的苏俄。事实上，压迫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是沙俄和苏俄，所有不提苏俄帝国主义的中国反帝运动都是苏俄操纵，服务苏俄利益的。被苏俄指为主要帝国主义的美国其实是帮助中国的真正朋友。美国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在世纪之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扼制了俄、日肢解中国，在庚子赔款谈判中担当了中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首倡了退还庚款的运动。若无美国扼制，中国早被俄日肢解。在北洋时代，美国同样起着扼制着苏、日肢解中国的作用。美国主导的两次拒付关余子孙才真是“拒以国民之钱资民贼”。美国在关余危机中指定关余款的水利用途是对中国、广东民众的负责之举。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声言的“我们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之语道出了关余危机的真相，那就是祸国与投俄，既非反帝，也非爱国。

苏俄改组国民党

苏俄扶植孙中山的条件之一是按照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接受这一条件后，苏俄任鲍罗廷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共派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负责改组并领导国民党，及建立国民党军。1923年10月，鲍罗廷偕苏俄军事顾问雅科夫（YAKOV GERMAN），弗拉基米尔（VLADIMIR POLIAK）到达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党员重新登记，以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1月，鲍罗廷公布了根据《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等俄共文件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鲍罗廷制定新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代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全代会和中执会并列最高机关，总理权力不受制约，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任

何决议的否决权。这样的文件不像是现代政党的党章，而更像会党帮规。在领袖独裁制方面，革命党与会党没有区别。此后几十年，国民党党章经多次修改，但鲍罗廷制定的独裁框架没有改变。关于建军，鲍罗廷引入的苏俄党军模式与中国古来军队只效忠首领的传统相通，所不同的新事物是确保军队效忠一党的政工组织（苏俄后来也按照这样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红军）。这种党军模式后来被中共总结为“党指挥枪”原则。根据共产国际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军的部署，鲍罗廷预定军队中的政工要员由共产党人担任。

鲍罗廷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基本照搬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内容，在民族主义解释中加入了反帝，在民权主义解释中加入了阶级斗争，强调“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而。”^[44]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没有平等观念，本来就与“天赋人权”不同。他将国民分为“民国之国民”与“反对民国之人”，拥护民国之个人及团体得享自由及权利；反之则不得享有民权。他所谓的拥护民国实际是拥护他独裁之意。在否定自由、平等、人权、私有产权、崇尚暴力等方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三民主义强调大汉族主义，共产主义否定祖国。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基本合流。

加拉罕对孙中山“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感到得意，向齐切林报告国民党新党章说：“关于三民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声明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根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但他不希望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当党还没有最终形成，还没有巩固的时候，他对决议作了这些无关紧要的、更多是文字上

的让步。” [45] 加拉罕不知，驯服地接受苏俄改组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作为会党，孙无所谓原则，为获金钱武器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条件都答应。当年在日本，他以未来政府首脑的名义将满洲、蒙古、路权，矿权，经营权等等一诺出卖。相比之下，在“三民主义”的文字上作些让步不算什么。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全）于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这时广州已经被赤化得像个苏俄城市，到处是红旗、标语，新主人——苏俄顾问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大会会场悬挂列宁像，一派苏俄景象。大会从筹划、主持到决议案，由鲍罗廷一手操控，主持大会的孙中山成了宣布开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在致词中说：这次大会“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46] 这里，孙中山说得不准确。不是国民党没有机会开代表大会，而是中国以前根本没有全国代表大会这回事。全国代表大会是苏俄引入中国的新事物。在国民党之前，共产国际召开的三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开了中国的先例。中共党员们对全国代表大会完全陌生与被动，国民党员们当然也一样。当时，中文里还没有“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大会主席团”等词，国民党人当然没听说过，不明白主席团何用、“宣言”、“党纲”、“党章”有何区别，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和规程同样茫然，不明白为什么议事日程上的每个问题都要作出决议。鲍罗廷筹备大会时曾准备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因国民党人不能理解它的作用而不得不放弃设立。[47]

按照鲍罗廷的安排，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全面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接受苏俄指导，接受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要职。他解释鲍罗廷修改后的新三民主义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8] 他解释鲍引入的党国体制说：“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49] 国民党人并不都如孙中山一样为了援助什

么条件都接受。众多国民党人反对如此投靠苏俄的安排。江苏代表茅祖权提出：“既然共产党人接受我们的纲领，就应该放弃他们的纲领，解散他们的党，否则就不要加入国民党”。冯自由、方瑞麟等人提议，在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以防止国民党员同时成中共党员。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位元老联名上书孙中山《检举共产党文》，反对按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揭露“俄人替人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订定。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借俄人之力，于有意无意间使人党隐为被共产党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50] 检举书所言是事实，苏共政治局在决定扶植国民党之前就决定了派中共打入国民党，从其内部夺取控制权，将共产革命引入中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表述只是为应付外界的视听和掩盖赤化中国计划。在国民党公布各项改组文件的一年半前，马林已在中共西湖会议上宣布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计划。这些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议和检举书被鲍罗廷指挥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为首的左派多数否决。会议通过了鲍罗廷拟定的新党纲、新党章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接受了鲍罗廷安插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

经过苏俄改组，国民党在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俄化。1919年，俄共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随后，两局取代了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力地位。不久，政治局权力超越组织局，成了俄共最高权力机构。改组国民党时，鲍罗廷照搬俄共架构，设立了类似苏共政治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决定孙中山挂名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旋辞职，改任瞿秋白）、戴季陶、邵元冲、伍朝枢等七位左派为委员，以此办法将张继、邹鲁、林森、邓泽如等反对“俄化”、反对鲍罗廷主持国民党的元老们排除出了最高领导层。翘首等待苏俄军火的孙中山一切听从鲍罗廷安排，任由鲍通过中政会掌控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最高权力向独裁领袖和几位亲信集中，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沦为举手走过场的模式是党国独裁的必然局面，苏共如此，国民党如此，后来中共也是如此。

国民党一大标志中国传统的专制独裁与苏俄的党权独裁相结合，标志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在中国确立。政治学者李剑农指出：“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之前约法至上，之后党权至上。”[51]

国民党一大之后，俄援源源而来。国民党的财政主管廖仲恺与中共主管陈独秀一样，须每月向鲍罗廷报批预算，再呈莫斯科批准，才能获得每月数万元的经费。鲍罗廷名义上是孙中山的顾问，但作为俄援管理人，实为广州国民党政府的最高主宰。对国民党和广东被赤化的情况，陈炯明痛心指出：国民党的党国，其经费由苏俄提供，内政外交政策完全由苏俄掌控，军队由苏俄顾问指挥，这比当年日本在“二十一条”中对中国的要求有过之无不及。不同的是，“二十一条”是日本武力强加中国的，广东赤化是孙中山主动引入的。[52]

苏俄建立黄埔军校

鲍罗廷主持一大期间，切列潘诺夫率领的苏俄军事顾问小组来到广州，开始为国民党筹建军校，鲍罗廷向国民党、共产党发出了招生通知。这时，蒋介石访苏归来向孙中山复命，获孙任命为军校筹备委员长。蒋介石向孙中山汇报了访俄不良观感，同时流露出对国民党内左派俄党的不满。鲍罗廷得知蒋介石对苏俄和廖仲恺等左派的不满言论后，在国民党一大上将蒋排除出了中央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蒋一气之下留书请辞到了上海。蒋的盟兄张静江认为蒋此举是不识时务，致信孙中山，为蒋求情，在信中强调蒋与陈其美的结拜关系。张静江多次巨资资助孙中山，说话有分量。蒋也感到一时义气用事，致信孙中山表示悔意。接张、蒋信，孙中山打消了让蒋介石作程潜、许崇智或李济深副手的念头，在鲍罗廷面前为蒋说情。这时，孙中山只有建议权，决定权操于鲍罗廷之手。4月，蒋介石回到广州，反复向鲍罗廷表达亲苏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

义”，“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鲍蒋的立场转变感到满意，同意由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53] 军校招生消息传出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经考试，第一期正取 350 人，备取 120 人，其中主要是中共各地党组织向军校选送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5 月，苏俄一面在北京以通牒方式迫北京政府放弃主权要求，一面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开办了以推翻北京政府为宗旨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再派来由瓦西里·布留赫尔（化名加伦）将军等 40 位军事顾问来打理军校。6 月 16 日，蒋介石精心选择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两周年日举行了黄埔军校开学日，以强调自己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学典礼上，“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54] 孙中山在讲话中说，军校要学习苏俄经验，俄国革命之能成功，是因为有革命军和革命党，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苏俄。名义上，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三人组成校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实际上，军校的一切决策大权操于鲍罗廷之手。军校本部之下设有六部：戴季陶、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任正副主任的政治部，李济深、邓演达任正副主任的教练部，王柏龄、叶剑英任正副主任的教授部，林振雄为主任的管理部，周骏彦、俞飞鹏为正副主任的军需部和宋荣昌、李其芳为正副主任的军医部。

10 月，苏俄军舰伏罗夫斯基号（VOROVSKY）抵达广州，运来了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军火，包括大炮、机关枪，步枪 12000 枝，子弹 400 万发。这批军火武装了黄埔军校的三连学生兵、广州警备部队，及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随伏罗夫斯基号军舰又来了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加入了黄埔军校。军火之外，苏俄还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千万元资金用于建立中央银行，提供了 300 万卢布作为黄埔军校的建校经费。12 月，苏俄再运来 9 架飞机、步枪弹药 500 万匣、机枪 12 挺、大炮 58 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55]

苏俄向国民党提供金钱、军火、顾问、教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接受向军校和党军内安插共产党员。斯大林在决定出钱为国民党建立军校之初就采取了防范国民党儿大不由娘的举措——安插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主持军校的政治部。孙中山曾试图派亲信戴季陶、邵元冲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结果二人因不获鲍罗廷信任而被迫辞职。鲍罗廷任命了刚从莫斯科到广州的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青年周恩来并不具备军事资历。虽然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系假造，[56] 但蒋确有军事学历与资历，而周恩来的资历完全与军事无关。他赴法勤工俭学后不久即被共产国际选中，送去德国、英国、苏俄接受特工和情报等方面的训练，得任黄埔军校要职是因为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季米特洛夫介绍信。这时，孙中山、蒋介石都明白了，黄埔军校的事苏俄说了算，任由鲍罗廷安插共产党人。

就任政治部主任后，周恩来大量增加军校的政治课程。多达 26 门的政治课中，除照顾孙中山面子安排了三民主义课外，其余都是宣传共产学说的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的解剖、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等共产主义课程。继周恩来之后，共产国际再安插了包惠僧、邵力子、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于树德、安体诚、高语罕、熊雄等公开的或秘密的共产党人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政治部秘书、总政治教官和政治教官等要职，将黄埔军校办成了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据点，同时也办成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据点。随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日益扩张组织，国民党内制止共产党人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因应呼声，蒋介石要求周恩来交出军校中共产党员名单。周拒绝了蒋的要求。在苏俄主持局面之下，蒋介石限制共产党人在军校发展的措施无法实施。黄埔军校时期安插的中共秘密党员日后遍布了国民党党政军界，成为中共后来打败国民党的奇兵。

在要求党军效忠一党，效忠领袖个人这一点上，孙中山、蒋介石与苏俄顾问没有分歧。他们都要求培养党领袖的驯服工具。孙中山在对当时广东军

政府的所谓文武两学堂——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学生的训话中都强调，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57] 蒋介石明确要求学生无条件服从领袖，向领袖个人效忠，向校长效忠。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于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 [58] “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 [59] 如同袁世凯小站练兵建立起效忠自己的北洋军一样，蒋介石通过学生军也建立起效忠自己的黄埔嫡系。学生军的团长何应钦、营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副营长陈诚、连长以下的胡宗南、桂永清等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嫡系班底。

黄埔军校既是一所学校，也是一支军队。继 1924 年 10 月第一批军火之后，苏俄又接连运来数船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 4000 支，子弹 400 万发；俄国来复枪 14000 支，子弹 800 万发；各种机枪 90 挺，各种炮 24 门，总价值将近 300 万卢布。 [60] 在苏俄金钱武器的扶植下，黄埔学生军迅速发展成了数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在全国所向无敌的军队，国民党军一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黄埔军校的开办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事，而是中国极为屈辱的一页。其背景是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要求苏俄按照对华宣言承诺交还中东铁路，从蒙古撤军，苏俄决定武力推翻北京政府。黄埔军校是苏俄强权压迫中国，武力推翻中国政府计划的产物。最屈辱的是，苏俄一面在北京与民国政府谈建交，一面在广州建立军校，培养推翻中国政府的军官，同时运来军火建立推翻中国政府的反政府军。黄埔军校的开办给中国带来连绵灾难。黄埔第一期学生组成的学生军成为镇压广州商团的主力军，第二期学生军成为“东征”扼杀联省自治运动的主力军，第三期学生军成为消灭反对赤化的杨、刘军和“第二次东征”的主力军。此后二十年间，黄埔军校学生们率领国、共军队在斯大林操纵下杀得中国血流成河。多年后，黄埔师生们都为投身黄埔、参加

革命而自豪，感谢军校给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无人附俄推翻维护主权的本国政府而忏悔，无人持苏俄军火祸害中国而忏悔。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19年，苏俄在政权存亡难料，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地区完全不在其控制之下的背景下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无条件放弃沙俄在华的一切权益。1921年，苏俄红军击败白卫军占领了蒙古，扶植成立了人民党亲苏政府，与亲苏政府签订了《苏蒙友好条约》。1922年，苏俄渡过险境，占领了远东地区，同时决定扶植孙中山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北京政府。1923年，苏俄击败高尔察克、邓尼金，完全控制了俄国远东地区和中国中东铁路地区，处境与四年前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时已完全不同。虽然苏俄继续与北京政府谈判建交，但已视北京政府为即将倒台的政府，摆出蛮横压迫态度。进入1924年，苏俄迎来了外交上的重大转机，英国工党政府上台，迎合社会主义运动，率先与苏俄建交。紧接着，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瑞典、日本等二十二国与苏建交，帮助苏俄摆脱了外交困境。在中国，知识界发起了拥苏运动，李大钊率马叙伦等数十知名人士联名致函顾维钧、王正廷呼吁要求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胡公鄂等近百各界人士向北京政府同样呼吁，北京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无条件承认苏俄；部分学生为此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拖延与苏俄建交；北京教育会等九团体发表抗议宣言，“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国民党、共产党在广州、长沙、武汉、上海、芜湖、保定、哈尔滨等许多城市发动民众团体通电，要求速与苏俄建交。国人不清楚北京政府对苏俄交涉收回主权之艰难，只知道苏俄宣言承诺了无条件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各界拥苏是不明真相，但李大钊为首的苏俄在华爪牙则是奉苏俄之命行事，对政府蛮横施压，且肆无忌惮。李大钊亲率北大学生代表团到外交部请愿，要求与外交总长顾维钧面谈，递交北京学生联合会具名信函威胁顾说：“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

鉴”[61] 声称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蒙人享有民族独立的权利有权独立，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外交。在苏俄通过李大钊操纵之下，北京各界民众呼吁无条件与苏俄建交的集会、请愿、游行运动一浪高一浪。在拥苏声浪中，少数了解苏俄压迫中国真相的学者指出，拥苏运动实际服务苏俄利益。例如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国民党人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直指拥护苏俄运动是在“维护俄国人的利益”。[62] 不过，支持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声浪微弱，而苏俄策动的拥苏运动声势浩大，苏俄资助的左派报刊上赞颂苏俄的文章铺天盖地。在赤色宣传影响下，中国青年学生以拥苏为进步，积极投身所谓反帝运动。

在苏俄在北方策动亲苏运动，在南方扶植孙中山武力推翻威胁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北京政府被迫软化立场，退而提出中东路财产两国平分，中国政府以中东路财产担保，发行该路半价现值的国库券偿还苏俄，然后收回中东铁路。加拉罕强硬拒绝中国政府的妥协提议，称：“中东铁路完全由俄国出资建成，只能照现有之章程，局长归敝国政府派员，董事会照现有之章程，由中俄两国共同办理，否则无可讨论。”对于加拉罕的蛮横说法，中国对俄交涉督办王正廷驳斥说：“贵代表每次声明主持公道，以刻下之言而论，利益于贵国之事贵代表即愿保存，无利益之事即不愿提议，此种办法毫无公道。况中东路系在中国领土所造。”加拉罕干脆以沙俄强权腔调说：“不论公道与否，不能将东路让予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这时的北京政府与对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袁世凯政府同样屈辱，被迫再退。1924年3月14日，加拉罕拟就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1条及中俄协定附件7种。该协议草案默认苏俄与外蒙的条约，默认苏俄从外蒙撤军日期由苏俄自己决定。中国政府拒绝签署这一屈辱草案。但是，弱国无外交，随着建交国家倍增，运往广州的军火和筹建黄埔军校准备就绪，苏俄视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无足轻重，与九年前的日本一样，以最后通牒相逼迫。3月19日，加拉罕向王正廷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分别发出限四十八小时签署的照会。照会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

所限的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中苏交涉已结束，《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不能修改，此后非无条件承认，不能恢复邦交。”北京政府被迫再退，要求先谈废弃与沙俄旧约的问题。苏俄拒绝了北京政府退一步的要求。在各地拥苏运动声势浩大，广州国民党羽翼丰满，颠覆威胁日益迫近情况下，北京政府如同“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时的袁世凯政府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无奈地答应先建交，再协商悬案的最后通牒。5月30日，顾维钧与加拉罕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七件声明书、两件换文，以及一个议定书。次日，两国宣布建交。北京政府坚持了几年的苏俄须先履行宣言承诺、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从蒙古撤军再谈建交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体现了从优林、裴克斯、越飞到加拉罕对华谈判中的耍赖立场，以悬案另行商定的说法将苏俄对华宣言中无条件放弃沙俄在华权益的承诺一笔勾销，将中国方面几年交涉所提要求全部拒绝，规定苏俄完全继承沙俄在华权益，半点都不归还中国。虽然北京政府从收到苏俄对华宣言时就怀疑苏俄的诚意，王正廷、顾维钧也不乏外交才能，但政府在内外交困，自身的法统地位处于苏俄扶植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之下，在遍布全国的苏俄外围组织示威的压力之下，也只能接受屈辱协定，默认苏俄军事占领蒙古，继续霸占中东铁路的现实，默认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形成的疆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定两周后，苏俄扶持乔巴山宣布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使蒙古正式成了苏俄属国。北京政府发表声明申明不承认蒙古独立的立场以向国人和舆论交待，但无力改变苏俄控制蒙古的现实。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被迫签署的最屈辱条约之一。因为，在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过程中，苏俄以一系列手段压迫中国政府就范：公然以金钱武器扶植孙中山为首的反政府势力准备武力推翻中国政府；公然在全国煽动反政府示威，威胁中国外交官，煽动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政府在谈判中退让；以其金钱资助众多中国革命刊物控制中国的舆论，将无数中国青年洗脑

为欺压中国政府的帮凶；最后以最后通牒的手段逼迫北京政府放弃主权要求。后辈青年想象不到北洋政府被迫与苏建交时的屈辱：苏俄代表加拉罕在北京向中国政府发出限三日签字的最后通牒时，苏俄扶植国民党的大批军火在运华途中，鲍罗廷在南方招收军校学员作为北伐推翻北京政府的人才准备，苏俄在与中田建交同时派大批特工以外交身份来华，将其驻北京大使馆办成了颠覆北京政府的指挥中心，俄轮再不断运军火到广州，将反政府的国民党军武装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交仅一年多，苏俄就发动了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

加拉罕执行莫斯科的指令，在谈判中耍赖加威胁，但仍然获罪。斯大林对他不满，不是因为他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而是因为他两次签署作出放弃沙俄在华权益承诺的对华宣言，认为加拉罕对华不够强硬，损害了苏俄利益，在不久后以“叛国罪”将加枪决。加拉罕经手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已经是最后通牒，已经是武力压迫产物了，但斯大林仍不满意，可见苏俄亡华比沙俄更加凶恶。

废约运动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前后，国共两党发动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废约运动）。废约运动宣传苏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真正朋友，宣传英美等列强为帝国主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从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力势力”，同时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全党推动歌颂苏俄的运动。李大钊召集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联合会等上百团体组成了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发起“反帝国主义运动”周，鼓动学生以义和团手段对付美英人士。

苏俄操纵的废约运动一面以民族主义的“废约”的口号煽动民众仇视西方列强的情绪，一面采取一切办法转移中国人对外蒙古、中东铁路的关注，刻意掩盖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占有最大租界，将蒙古分离出中国等事实。在废约运动的鼓噪中，皖、奉两系及北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苏俄赤化中国的祸害，铭记义和团的暴力对付洋人貌似爱国，实际祸国的教训，反对苏俄在华煽动暴民运动，坚持以外交手段谈判废约，显示出中国政府是遵守前政府所签条约的负责任的政府。

多数国人不知道，北洋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积极而卓有成效。1921年5月，北洋政府签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德协约》，废除了德国在华的特权，通过以德国原购中国铁路债券冲抵，中国政府获得了余额1100余万德国战争赔款，其余润延续至抗战初期购买德国军火。[63] 国、共两党在后来的现代史中刻意回避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宣传废约运动为反帝爱国运动。了解了从苏俄对华宣言到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过程就会知道，当时中国受到的最大帝国主义压迫来自苏俄，废约运动是共产国际领导，服务苏俄利益的运动。

奉俄协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纯属于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许中国政府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允许第三者干涉。”上述条款涉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张不认可等于无效，而张作霖抨击北京政府签定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丧权辱国，宣布自1924年5月1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东三省各界团体通电支持，反对协定。

1924年7月，加拉罕再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京政府迫张作霖同意《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称如果大纲协定再被张拒绝，苏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北京政府被迫派代表与张作霖谈判，无功而返。加拉罕再亲自去东北与张作霖面谈关于中东铁路的细则，以苏俄准备派出红军进入中东铁路沿线清剿白俄军相威胁。正在筹划对直系用兵的张作霖无力强硬拒苏，按照外交帮办杨卓（包青山）的建议，接受了苏俄代表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关于“停止援助冯玉祥”等“三原则”的口头允诺，同意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9月20日，苏俄与奉系的代表在奉天（沈阳）签署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奉俄协定》）及《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内容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基本一致，后者规定：中东铁路设理事会为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由十人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五人，理事长由华人担任，副理事长由俄人担任；监事会由五人组成，华人为两人，俄人为三人，监事会会长由华人担任；铁路管理局局长由俄人担任；副局长两人，华俄各一人；在中东铁路归属未有彻底解决之前，所有盈余均由理事会保管，不得动用的规定。出乎张作霖意料，苏俄接管铁路后，但对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的口头承诺全不认账，俄方局长独断收支，转移利润，使协定中的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所有权益中苏双方各半，双方平等的内容成了一纸空文，使协定中规定的中方权益沦丧。不仅如此，苏俄进一步将中东铁路地区作为推翻北京政府和张作霖东北当局的基地，将中东铁路的收入用于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冯玉祥的财源。苏俄控制远东地区之前就开始通过掌握中东铁路资金的哈尔滨苏共向李大钊提供巨额秘密资金，控制远东后，苏俄以中东铁路为向中国输出革命的管道，向中国派遣人员，调动资金，将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经营成了推翻中国政府的基地。

在签约受骗后，张作霖怀疑帮办杨卓通苏，在得到杨是苏俄安插在他身边间谍的证据后将杨枪毙（中共后来将通苏出卖中东铁路利益的杨卓纪念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采取行动反击，依据《奉俄协定》强行接收中东

路全路事务，拘捕旧总办奥斯脱罗木夫、地亩局长关达基等人，迫使俄方让步。此后，奉俄在中东铁路上冲突不断。苏俄对张作霖恨之入骨，加大力度扶植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指示国民党，共产党发动列针对张作霖、吴佩孚的所谓反帝运动，将支持了北京政府维护主权的张作霖、吴佩孚宣传为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

孙中山镇压商团

1922 年底，孙中山获得苏俄扶植后贿赂滇桂军入粤，逐走了陈炯明。1923 年 2 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府。接受贿赂入粤的滇桂军为钱而来，不断向孙索要巨额军饷。大元帅府成立后的八个月中，粤省财政收入只有 300 多万元，财政支出却高达 1000 多万元。这千万元支出主要是支付滇桂军军饷的开支，是对广东地方的祸害。滇桂军得不到足够军饷，于是就地截夺税收，设卡收厘以充军费，吞噬了粤省税收及厘金收入的大半。

为满足滇桂军军饷及东征西讨的军费，孙中山残酷搜刮粤省商民，办法之一是增加苛捐杂税：加征厘税、招商承办税、房屋租捐、商业牌照税等等；办法之二是向民众摊派；办法之三是剥夺社会，拍卖官产、公产。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长廖仲恺颁布了《广州市民业保证条例》、《惩治妄报-610;承官产条例》等一系列搜刮民众的恶法。其中一条规定，凡有产业者均须缴验契证并按房产价值缴交 3%的民产登记费。由于连年战乱，众多私产无法提供合乎大元帅府要求的契约，结果被大元帅府武力剥夺私产；办法之四放开赌禁、烟禁。烟、赌是清末为害广东最惨烈的社会痼疾，每年直接、间接损失数以亿计。陈炯明主政广东时的最大地方建设成果是禁烟、禁赌。然孙中山主政广东后重开烟、赌，官府抽头，将陈炯明时期的禁烟、禁赌之功全部摧毁，使烟、赌重新蔓延，社会毒化，粤省民生凋敝；孙的办法之五是卖官鬻爵，例如在发动讨伐粤军战争时派孙科到香港向港商杨西岩、伍学煌卖官换取讨伐军费，成立大元帅府后任二人为财政厅长和盐运使，让二人利用职权捞回买官开支，并让二人帮他继续搜刮军费；孙的搜刮办法之六是强发军

票，债券，例如在 1923 年 4 月底由大元帅府财政部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以武力胁迫强制发行面值数百万元没有抵押、没有信用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

当时粤港报纸关于孙政府横征暴敛的报导不胜枚举。例如：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因提出反对没收变卖寺观、庵堂、庙宇公产的议案，被市长孙科以附逆罪名扣留，勒罚五万元，经人从中调解，罚款一万元，始获释放；[64] 粤籍国会议员马小进在北京发言反对孙中山变卖三院使“盲人老人乞丐流离失所”，被孙指为附逆；[65] 孙中山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不遂，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并援引美国在欧战时期收管民有铁路为先例；[66] 美国归侨李洞云致函《华字日报》：欧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便利军事运输起见，确曾收管民有铁路，但对铁路公司的每年收入，照数依法偿还，大元帅府中人，既晓援引美例，必深知无疑。今之车脚补回与否，一字不提，但云收归国有，则非遵依美国先例办理可知矣。或曰：阔人祇知要钱，美例不美例，管他甚则。不过，帅府群彦欲捧出那位西式自由神，吓吓四邑（指广东省台山等四县）金山伯，而不知其舞文弄墨，实无异于欺诈取财也；[67] 1923 年 6 月 12 日，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不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8 月，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祇得申报服从；[68] 9 月，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广州市郊的烟花爆竹厂停产或迁出广州地区以抵制强征印花税；10 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元帅府索款而藏匿或逃亡；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五万元借款要求而被迫关门；《华字日报》刊署名“香山老人”来信写道：余自辛亥至今，避乱海外者凡六次，以年垂七十之人，生当乱世，实属不幸。十二年来之纷扰，以今年为最惨。省城

与别县吾不知。予香山人试言香山怪状。石岐有国民党分部，各乡镇有分区，一般强徒，藉此包官府，包土匪，无所不为。尤甚者，迫人入党，谓本党系大元帅作总理，入党则受大元帅保护，否则属逆党，属乱民，必遭杀戮。始则少年血气之辈，如蚁附膻，近则农夫粗工，亦受驱迫。余年老居乡，不问世事，本无入党之必要。六月时为势所迫，卒之一家十三口，除小孩外，入党者八人。查入党费富者十元，中人家六元，贫者二元。予初拟纳费而不注册，该分部长不允，谓每年仍要纳常费，予不得已遵缴八十元，但非吾所愿也。吾香山之如吾被迫者，不可数计。闻诸三点会虽猛，亦未常加人以暴力。广东长此以往，恐永无安宁之希望；[69]“粤京以党治国，非党人不能任官职。而番摊公开，鸦片公卖后，摊与烟均为党人办理，固不待言。今某大学筹备处某科长，又兼任鸦片公卖处局长……是为粤京学界之败类，彼等则曰党治之成绩也”；[70]“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祇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常时被查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夫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71]“广州市本来是一个庄严璀璨的市区。但自孙政府执政后成恐怖的世界。从前他们未有执政之前，天天的攻击人家怎么样不好，怎么样黑暗，怎么样野蛮，而自家则大吹特吹他们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怎么样好处，怎

么样救国，怎么样代人民求幸福。我们脑筋简单的人民一听见这良好的主义，莫不欢天喜地的表同情于他。以为他们是先觉的智者，确具有三头六臂，拯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上的能力。所以出力的有人，出钱的有人，帮着他们，以为他们执了政权，则我们一般人民，必定得无穷的幸福了。而不知他们自执有政权之后所干的事，大大不对，我们不独不能得享有丝毫的幸福，反被他们压迫到不能出气。孙政府在广州的成绩，除了破坏地方，荼毒人民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重征租税哪，苛抽杂捐哪，强拉夫役哪，变卖公产哪，杂赌公开哪，鸦片公卖哪，白昼杀人哪，掳人勒赎哪，以及压抑舆论哪，大兴党狱哪，凡此种种所为别人所不敢为。日出不穷，犹未已也。搜括人民的脂膏，剥削人民的骨髓，以饱他们的私囊，供给那一班吃人不吐骨的凶狼兵士，而至于掘无可掘，抽无可抽，日暮途穷的时候，则又连他们向日所恃以欺世盗名盗利的三民主义，也想牺牲不要，而欲试验共产主义的政策，朝三暮四，可知他们实在没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方针，而且没有一点的人格。黄炎培所描述陈炯明主政下的‘一岁之广州市’，与这个孙中山所统治下的广州市，相隔不过两年，广东人民的处境，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真令人浩叹！孙中山口唱民权主义，而其违背民权基本原则的行为，莫甚于破坏司法独立，实行党化司法，强迫司法人士入党。孙中山要武力统一全国，给广东人民带来灾难，也为全国人民带来灾难”。[72]

外国领事的报告从侧面反映了孙政府暴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简庆斯（DOUGLAS JENKINS）在报告中写道：“孙政府在广州拉夫，强征苛捐杂税，至民怨声沸腾，罢市工潮频发。杂税中包括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鱼税引起鱼场罢市，饭馆税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征收此税，至今仍在谈判中。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该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为藉口抽取军饷之用，现工会会员如码头装货工人等，正在罢工中”；[73] “广州的烟馆赌场继续做繁荣的生意，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赌场大都为军队所包办，政府从赌场抽头。孙中山政府以不合法契据为借口没收的私产值达 1500 万港币，

但只能以低价变卖，因买者恐孙垮台后，其产权将不为新政府所承认”；[74]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报告中估计，孙政府于 1923 年内搜刮广州民财达 1.2 亿元之巨。[75]

有官府暴政必有民众反抗。粤港报纸关于民众抗税、罢市、请愿的报导同样不胜枚举。例如：1923 年 3 月，北江一带船民因北江重重关卡征收“柴艇费”罢市；7 月，广州总商会请愿抗议《商业牌照税条例》；9 月，广州鱼贩商行因当局加收鲜鱼税罢市；1924 年 1 月，广州火柴公会 10 家工厂停业抗议开征“火柴捐”；2 月，广州各行商人抵制军人强行使用军用手票，与军人冲突，东莞万顷沙渔民抗议渔税承商征税苛例与军警冲突；3 月，广州制鞋商人抗议开征“胶鞋捐”罢市；广东银业公会所属各银号罢市抗议开征“银市买卖捐”；东莞当押行商人罢市抗议驻军强行征收商业牌照费；4 月，广州总商会请愿抗议当局提高地方税 20%、提高厘金 50%；广州各药行商人罢市抗议当局开征“药品特种捐”；北江一带商会请愿抗议军人私设关卡；佛山商人罢市抗议军队开征 20%军费及 40%印花税附加捐；5 月，广东内河船商公会总罢航抗议开征“加二军费”；南雄纸业商人罢市抗议滇军在粤北开征 2.5%土产附加捐；广州、顺德丝商罢市抗议厘税承商勾结军人欺压商人；6 月，广州烟酒商罢市抗议开征 20%附加税；佛山酒楼茶居罢市抗议开征筵席捐；广州糖面业商罢市抗议开征 2.5%销场捐；粤北石矿商罢业抗议每担矿石征收 3.5 元附加军费；7 月，乐昌县商会请愿，抗议驻军重复收取百货捐等等。[76]

贿赂滇桂军入粤后的两年中，各路军队在广东水、陆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向商旅征收保护费，强行拉夫，设卡收取买路钱，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二十多处这类关卡。在孙政府和各路军队的祸害下，广东商家关门、工厂停工，物价飞涨，商人频繁罢市，拒绝接受当局发行中央银行纸币和期票，拒绝为孙中山的北伐承担费用。深重苦难中，广东商民不甘被无

止境地鱼肉，痛恨作为苏俄附庸的孙中山政府，呼吁组织商团自我保护，扩大商团武装以维持治安和保护商家的利益。

民国之前，商民从未有过集资建立武装这回事，商团武装始于孙中山第一次统治粤省期间，是孙中山的暴政逼出来的。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叛乱，南下广州另立军政府，挑起西南军阀混战，使商民在政局动荡，各路军阀你来我往，战祸连绵中难以生存。商民被迫组织商团武装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此次孙中山第三次入主广东，对商民的搜刮更加残酷，粤省各地的小规模商团武装无力自卫，商民不得不召开全省商团公所委员会议，决定在广州商团之外在佛山、江门、石岐等中小城市也组建商团武装，将全省商团军扩充至五万人。商民们宣布成立武装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商场，维持治安，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

巧取豪夺搜刮民众仍无法应付滇桂军和党军军饷，孙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孙中山口口声声民权、民生，其实心中只有他的独裁梦和无休止讨伐战争。财政危机中，他拒绝放弃讨伐战争，大力扩军，变本加厉搜刮军费。1924年5月，广州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向广东商家勒索铺底捐，商民无奈，被迫酝酿罢市及各城市商团联合行动。5月28日，广州、佛山、番禺、东莞、顺德、清远、江门、香山等百余商埠的代表在广州秘密召开了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决定各城市的商民武装“大联团”，组建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推举广州总商会会长陈廉伯为总长，佛山商团团团长陈恭受为副总长，决定各埠商会集资统一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扩充商团武装。会后，各商埠商会集资百万，订购长短枪10000支，子弹300万发，并向国民党政府申领了进口武器运的许可证。得知商团准备扩充的消息后，孙中山要求滇军首领杨希闵、桂军首刘震寰武力镇压。杨、刘反对孙中山投靠苏俄、赤化广东，同情商团反抗暴政，拒绝了孙的要求。

8月，载商团所购武器的哈佛号轮船到达虎门，孙中山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号轮船押至黄埔，扣押了商团的枪支弹药。商民数次到大元帅府请

愿，要求发还枪械，遭黑白两道反复勒索，支付 60 万元巨额赎金后仍无法领回被扣枪械。广东的各商会认清了军政府勒索无止境，发动全省商人罢市及停止向政府纳税。26 日，广州总商会、商联会等代表七人面见孙中山，要求允许成立联防总部、无条件发还扣械和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孙中山拒绝了商会代表的要求，并威胁若不复业将炮轰西关。商团拒绝高压，准备武装暴动，驱逐附俄赤化的国民党政府，宣布粤省独立。官民对峙中，英国代表领事团声明若国民党政府炮击商民，各国决不袖手旁观，随后调集九艘英舰在白鹅潭江面示威。

这时的国民党政府财政全无结余，靠每日税收应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商民的罢市与停止纳税对孙中山来说意味财源断绝，动摇统治。孙中山派部分滇、桂、湘军和黄埔学生军开进广州，准备武力镇压商团。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粤军李福林等将领反对武力镇压商民，出面调停，与商团达成了六项妥协：“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孙中山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下取消通缉令，发还封产；2、范军长、廖师长担保大元帅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3、省团联防改组，受省长节制，其细则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被驳之点，由范军长、廖师长出面主持公道；4、商店复业，军队解严；5、商团报效政府军费 50 万元，于领械时缴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军长、廖师长担任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上述商团与政府各退一步的妥协方案得国民党方面汪精卫、伍朝枢的赞同。8 月 30 日，各城镇商店恢复营业。9 月 1 日，孙中山发出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和《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指责“英国政府支持商团叛乱”，按照苏俄反帝运动的口径宣称：“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

9 月 3 日，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和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根据与奉、皖订立的联合反直盟约，决意纠集湘、赣、豫

军和部分粤军、滇军组成北伐军加入军阀战争，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和《告广东民众文》，下令再向广东商民搜刮北伐军费。9月20日，陈廉伯、陈恭受履行妥协协议，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然而，孙中山拒绝履行妥协协议，决意霸占扣押的商团枪械用于北伐。10月4日，全省188个商团代表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再次罢市和停止纳税以抗议孙中山背弃六条协议及搜刮升级。孙中山获知商团佛山会议后下令武力镇压。滇、桂系和国民党军的部分将领拒奉镇压令。就在孙中山预感兵变随时发生，准备再次离粤出逃之际，他等了一年多的苏俄军火船“沃罗夫斯基号”军舰于10月7日抵达黄埔港，运来了山炮、野炮、轻重机枪，长短枪8000支，子弹400万发等苏俄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苏俄代表鲍罗廷向孙中山确认，苏俄的金钱与武器将源源而来。有了苏俄提供的钱与枪，孙中山立即强硬，不顾部分将领的反对，下令武力镇压商团和罢市的商会、商民。商团不知道孙中山获得苏俄军火，于10月9日宣布，因国民党政府背弃协议而停止履行向政府“报效”50万元的承诺，警告大元帅府若不发还被扣枪械将第二次罢市。孙中山电令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持苏俄军械镇压商团。

这时，孙中山只是傀儡，广州国民党政府由鲍罗廷主事。苏俄来的鲍罗廷认为武力镇压反抗者很正常，早已拟定了详细的镇压计划，爽快同意的孙中山的意见。10月12日，鲍、孙成立了苏式“革命委员会”，布署对商团大规模镇压。1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广州实施戒严，14日，国民党由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商会仍然不知道国民党获得了俄援军火，拒绝复市，命商团武装集中于西关拒守。10月15日，鲍罗廷、孙中山下达了对商团的总攻击令，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及粤、湘、桂、赣军，兵分五路围攻商团大本营——西关。、谭平山同情商团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见国民党军有了苏俄的强大支持，抛弃先前支持商团的立场，加入了对商团的镇压。在国民党军的大炮轰击下，广州西关一片火海。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等俄党指挥国民党警卫军和黄埔学生军持苏俄先进武器将万余商团武装消灭。西关的大火一直烧了三天，广州繁华的商业区成了一片焦土，

两千多家商户财产被焚毁、抢劫，倾家荡产，商民损失近亿，是为“西关惨案”。至10月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的数万商团被苏俄武装的国民党军、黄埔学生军剿灭，死伤无数。其中清远的起义商团抵抗最坚决，但终于不敌苏俄枪炮，被彻底消灭。随后，国民党军再跟进对各地商团残余实施了报复性搜查清剿。为掩盖镇压商民的惨状，国民党政府在西关大火之后迅速进行了清理掩埋。国民党血腥镇压后，商民的反抗并未停止，又发动了广东驳载工会所有客轮停航抗议军队开征“横水渡捐”、11月的广州当押行商罢市抗议当局以无法使用的军用票抵押借款和12月的南雄县商罢市抗议军人劫掠商店等一系列抗争行动。[77] “广东各界救粤联合会”在国民党镇压商团后在香港发表通电，历数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为：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78]

古往今来，商人最不敢，也最不愿与官府抗争。但在赤化的广东发生了全省商民被迫组织商团武装，集资购枪，武装自卫，与军队开战的壮举，说明苏俄和国民党在广东搜刮压榨得太惨烈了，商民们在赤化压迫下没了活路，只好冒死与官府抗争。国、共两党在镇压民众后控制宣传机器，称商团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将官逼民反，武力镇压商民的暴行宣传成了“平定商团叛乱”。事实上，商团被轻易镇压正是因为英国等列强对镇压商团袖手旁观。商团幸存者们都感到被英国向孙中山发出的“绝不袖手旁观”警告所误导。多年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革命党人没有人对当年受俄人指挥，持俄国军火镇压中国商民的罪恶表示过忏悔。如今，“革命伟人孙中山镇压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叛乱”之类革命党宣传仍在欺骗着的青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乘列强联合干涉俄国之机恢复了对蒙古的主权，张作霖支持沙俄将领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 SEMIONOV)、翁格恩(恩琴, ЕФКИН, 1887—1921)以外蒙古及远东一带为“反苏复国”基地，

以利乘俄内乱收回满蒙主权。1920 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出兵配合苏俄剿灭翁格恩部，暗示苏俄将进兵外蒙古。北洋政府外交部将电报转给了统治满蒙地区的张作霖。张作霖看清了苏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与沙俄无异，其对华宣言是欺人之辞，拒绝俄出兵外蒙剿匪的要求，让北京政府回复苏俄说：“蒙古之事纯系中国内务，无须他国干涉”。苏共通过共产国际蒙藏部发表声明称：军阀张作霖的在蒙势力及翁格恩匪帮在蒙的军事占领严重地危害了苏维埃政权及共产国际在蒙开展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苏俄将攻占谢苗诺夫所控制的滨海地区、军阀张作霖所控制的满洲地区、翁格恩所占领的外蒙地区，打破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包围与封锁。从这时起，苏俄将张作霖列为了在华头号仇敌。

1921 年 6 月，苏俄红军由恰克图进军库伦，苏俄致电中国外交部称：“苏俄部队进入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的请求，帮助中国剿匪，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击溃翁格恩的“亚洲师”占领库伦后，苏俄扶植成立了蒙古临时革命政府。张作霖抗议苏俄背弃宣言承诺，无视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声明拒绝接受苏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请剿匪徒”之说。苏俄不理睬北洋政府和张作霖的抗议，占领蒙古不再撤军，并与蒙方代表签署了否定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年底，苏俄为推翻张作霖作同时采取两方面行动：派马林到桂林、广州考察孙中山、陈炯明；派李大钊以苏俄援助承诺拉拢络直系将领冯玉祥。

1922 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率奉系退出关外，宣布“东三省自治”，暗中联合皖系，准备与直系再战。苏俄派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同时物色打击张作霖的代理人。越飞到北京后立即以俄援承诺拉拢吴佩孚，条件是支持苏俄占领蒙古和霸占中东铁路。吴佩孚拒绝出卖主权，通电支持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于是，苏俄将吴佩孚也列为敌人，通过李大钊进一步策反对吴佩孚不满的冯玉祥。奉苏俄之命，李大钊到北京南苑当面向冯玉祥传达了苏俄扶植意向。1923 年 9 月，加拉罕到

北京任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再派李大钊去策动冯玉祥反张作霖、吴佩孚。

[79] 冯玉祥同时接受张作霖与苏俄的策反，与直系将领与胡景翼、孙岳密谋结成了反吴三角同盟，准备倒戈。

1924年9月初，控制浙江的卢永祥与控制江苏的齐燮元之间爆发了争夺上海控制权的江浙战争（齐卢之战），张作霖通电声援卢永祥，调兵入关，曹錕、吴佩孚通电讨伐张作霖、卢永祥，调孙传芳部由闽入浙讨伐卢永祥，直、奉两系展开再次较量。9月15日，奉军袭击热河朝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6日，孙传芳攻占江山，震动杭州，卢永祥的浙沪联军退守龙华、松江、上海一线。17日，直、奉两军主力在山海关一线开战，双方均伤亡上万，直军现颓势。22日，奉军第二军李景林攻热河朝阳，俘直军千人，奉军推进至朝阳、凌源、平泉一线。10月初，奉军攻克赤峰，但奉系支持的卢军兵败松江。10月中，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吴佩孚任命孙传芳为浙督兼闽浙巡阅使，江浙战争以直系的胜利结束。直系虽获江浙胜利，但在山海关战线不利。为扭转战局，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命冯率军出古北口北上进攻奉军。10月22日，冯玉祥率部从古北口、密云突然回师，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配合下占领北京，囚禁了曹錕，发动了“北京政变”。10月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要求曹錕下令停战并下野，免去吴佩孚所兼各职，组织摄政内阁。冯的倒戈使直系军心动摇，奉军乘机出击，直系全线崩溃，吴佩孚率残部逃到天津，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发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成了讨伐对象。张作霖指挥大军乘胜沿津浦线向南推进，沿途收编直军部队，直逼北京，鄂督萧耀南为首的直系长江各督纷纷通电讨冯。冯玉祥无力抗拒奉军和直军的两面夹攻，按照李大钊传达的苏俄意向，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入京共商国事，抛出和平统一口号，以舆论阻止张作霖、吴佩孚的讨伐，并宣布组成黄郛为代总理的摄政内阁，将所

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

吴佩孚虽败，直系仍控制着中部各省。在直奉两系不能扳倒对方的形势下，军事实力衰落，但政治声望崇高的段祺瑞成了唯一两系都能接受的主政人选。11月24日，不获直系、奉系和列强各国承认的黄郛摄政内阁辞职，段祺瑞接受直、奉两系和国民军的联合推戴，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兼总理，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和内阁名单。与过渡性的临时执政府相配合，国会公布了组织大纲11条。12月13日执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撤销1923年宪法、宣告《临时约法》失效、取消国会机关。

逐废帝

清帝退位之时，排满的革命党多反对优待条件，认为既然清帝已无力抗拒，索性逼迫退位，冯玉祥就是这样的主张者之一。发动政变控制北京后，他下令将清废帝逐出紫禁城。11月5日，鹿钟麟率数十军警与警察总监张璧、教育总长李石曾等人将故宫包围。切断电话线后入神武门径趋溥仪住所，逼迫废帝溥仪及全部清室随侍人立即出宫。溥仪提出宽限一个月、或十日、或三天再搬，被鹿拒绝及以开炮相威胁。溥仪只好仓皇收拾私物逃离紫禁城，到后海醇亲王府故宅暂时落脚，太监、宫女四散各奔东西。被逐后，溥仪对记者无奈地表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以暴力和不人道的方式消灭清室小朝廷后，冯玉祥命北京市民全城悬挂五色国旗以示庆贺。

溥仪被逐出宫消息传出，国民中中出现赞扬和遣责的对立声音。赞扬者以章太炎、孙中山和会党革命家为代表。章太炎致电代理内阁总理黄郛，赞逐废帝之举为“第一功”，称溥仪接受张勋兵变拥戴而复辟，导致了内乱，不遵守协议在先，“优待条件自消”；本应追究溥仪的刑事责任，如今只令其出

宫，“仍似过宽”。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谓“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会党革命家们不提民国政府在清帝退位后从未遵守优待协议的事实，希望如法国大革命那样将废帝推上断头台。反对者以段祺瑞、胡适为代表。段祺瑞在逐帝次日致电冯玉祥指出：“颂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佐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北大教授胡适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再致信黄郛，谴责驱逐方式代表着“东方的野蛮”。胡适写道：“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界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指月余前瑾太妃去世），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80]** 谴责信函在报刊发表后，同样引来赞扬和抨击。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致信胡适说：“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全程操办南北议和谈判的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指出：“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81]** 而知识界针对胡适的信展开围剿。他的朋友周作人发表文章称：“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觉得非常骇异”，“既然清室复过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以暴力驱逐溥仪出宫是一件“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胡适复信周说：“我以为，此次若从容提议，多保存一点‘绅士行为’，此事亦未尝不可办到。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点。”李书华、李宗侗批评胡适说：“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

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是迟了十三年了”，“清室优待条件乃非牛非马、不伦不类、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一种条件。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论。”胡适对二李批判不再回应，但在日记中写道：“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亡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隘空气而已。”

废帝被逐不久，段祺瑞在就任临时执政后下令解除对溥仪的人身限制。被逐回醇亲王府故宅的溥仪逃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随后由日本人护送到天津，安排驻进日租界张园。

孙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末，刚刚血腥镇压广东商团的孙中山在韶关收到冯玉祥、段祺瑞邀请北上共商国事的电报，复电称择日北上，随即回到广州。这时的孙中山是鲍罗廷的傀儡，重大事项均须征得鲍的同意，北上与否自己不能决定。11月1日，鲍罗廷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孙中山北上事宜。会上，孙中山提出晋京之前先去日本访问，谋求推动实现中、日、俄三国联盟。孙中山“三国联盟”的构想始于鲍罗廷到穗主持国民党。从来要求独裁的孙中山开始感到仆从地位的难受，希望在苏俄援助之外再获日本援助，以在日、俄间玩平衡的办法改变处处受制于苏俄的局面。于是，他致书日本老后台犬养毅，提出中、日、俄、三国大联盟的构想，希望重新得到日本方面的扶植。[82] 鲍罗廷对孙赴日的提议不置可否，同时在给苏共中央的报

告中写道：“孙中山到日本碰壁后就会明白他的中、日、俄计划是个幻想。”[83] 11月5日，孙中山向日本驻广州副领事清水表示：我党除主义外，其余均可牺牲，可拥护段、张以助其统一。故在会议（与段祺瑞、张作霖的会议）中国国民党之唯一要求是自由组织政党及运作。清水回应：日本对此次之内乱标榜不干涉主义，中国之统一若是得到日本近年的希望，统一之机运已开。今日希望援助统一之完成。[84]

11月10日，孙中山携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多人起程赴日。行前，他接受日本记者采访说：“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85] 同日，鲍罗廷按与加拉罕商量好的计划行事，以国民党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号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指示国共两党发动全国性的国民会议运动。

2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神户。日本朝野对他投靠苏俄，公开支持苏俄驻军蒙古不满，认为他长期承诺将满蒙让予日本，现又承诺将满蒙让予苏俄是欺骗了日本。犬养毅没有来见孙中山。孙中山想去东京，日本政府也没有给他发来请柬。孙中山只好在神户发表谈话、演说，希望重获日本朝野扶植。然而，他既鼓吹中日苏三国同盟，又鼓吹中日结盟的“大亚洲主义”（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谈话的结果在三国都引起反感。中国舆论抨击他出卖满洲，神户、大阪的四家报纸发表社论抨击他投苏，而苏共政治局对他脚踩两只船，接受俄援后又跑去日本鼓吹与日本结盟不满。承诺割让满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主线。凭借重复这一承诺，他先是获得了日本近二十年的金钱军火扶植，然后又获得了苏俄的巨额金钱军火扶植，运作极为成功。但是，游戏到最后他玩过了，企图同时戏耍日、俄，不免让人相信美国外交官指他思维有问题的说法。连东京都去不了，孙中山这才明白，日本朝野已经不愿再听他的老

调了，他的“三国同盟”、中日结盟的“大亚洲主义”在日、苏都不受欢迎。11月30日，碰了一鼻子灰的孙中山最后一次离开了日本。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号抵大沽口，段祺瑞、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争相登船恭迎。由于直系、奉系、皖系和国民军各派势力正在互相角力，战争一触即发，北上的孙中山一时成了和平统一的象征，各派争相以热捧孙中山作和平姿态，全国各界也通过高喊欢迎孙中山来表达对和平和统一的期望。各派各界的热捧使孙中山的风头达到了顶峰。12月31日，孙中山由天津赴北京，在前门车站再受到各界盛大欢迎。

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6月，马林在报告中建议共产国际“召开有中国实业团体、商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军队及政党等九种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86] 这一建议的真实意思是，以共产国际操纵的国民会议取代中国国会。马林的建议立即获共产国际批准。7月，维津斯基向中共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发动促开国民会议运动的指示，要求中共推动召开国民会议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运动。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时局主张》，推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等口号。按苏共的解释，帝国主义是仅指英、美、法、日等列强，但不包括霸占中国最大片领土的苏俄；军阀指反对苏俄向满蒙扩张的张作霖、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将领，但不包括民国以来和平与统一的最大破坏者，不断发动战争的孙中山和苏俄建立的国民党军。1924年11月初，鲍罗廷主持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其中以马林建议的召开九种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为全国统一条件，要求在中国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将这一运动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汇合成所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运动。此外，鲍罗廷指示国共两党派出国民会议宣传员分赴各省区，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宣传召集国民会议的重要性。中

共鸚鵡学舌，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其中号召展开国民会议运动、废约运动，打倒反动军阀运动。

11月21日，段祺瑞在天津发出“马”电，宣布接受各方拥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宣言“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于一个月内召开解决时局纠纷、解决军阀割据、中央财政、废督裁兵等紧迫问题的善后会议。加拉罕、鲍罗廷针锋相对，指挥国共两党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杭州、徐州、长沙、武汉、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张家口等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期成会、后援会等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推动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运动，实际拒绝承认北京政府，要求维持分裂局面。12月初，张作霖与孙中山在天津举行了会谈。张提出，只要孙中山放弃共产主义，断绝与苏俄的关系，放弃苏俄策动的所谓反帝运动，他就愿意捧孙上台。会谈后，鲍罗廷主持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声明说：孙先生与越飞于上海签订之联合宣言主张中俄亲善，声明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坚持国民党自己的党之主义。张作霖明白，《孙文越飞联合声明》的真实内容是赤化中国，国民党的声明背后是苏俄在主事，于是放弃捧孙。

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由于南北仍未统一，全国国会选举因革命党人抵制而不法举行，善后会议只能由指定代表参加。条例规定代表资格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1925年元旦，段祺瑞电邀孙中山、黎元洪、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王士珍等政界要人和各省区法团参加善后会议。这时，政府推动的善后会议和苏俄在背后操纵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会议都期望声望崇高的胡适参加，胡的选择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胡适决定参加“善后会议”，为推动国家和平统一尽力。他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87] 北大教授周甦生作出了与胡适一样的抉择。他坦言：“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

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国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88]

按共产国际的既定政策，鲍罗廷主持国民党发表了抵制善后会议的宣言，下令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善后会议，以孙中山名义复电段祺瑞，称“善后会议谬误”，“所有军财大事须由国民大会决定”。这时，孙中山病入膏肓，加拉罕、鲍罗廷主持着国民党，也决定着中国国民会议团体的组成，中国的时局和走向实际操于苏俄之手。鲍罗廷代拟的孙中山电报见报后，社会各界抨击国民党、孙中山抵制善后会议是作苏俄赤化中国的工具和傀儡，是中国的主要危险，连国民党内的右派也反对鲍罗廷主持国民党，反对孙中山奉苏俄代表之命抵制有利中国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冯自由、彭养光等人不顾鲍罗廷的禁令，出任了善后会议委员，劝说党内同志支持善后会议，并抨击廖仲恺、汪精卫等左派包庇袒护共产党，姑息养奸，声言：“本党同志对于该共产及败类分子所把持之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颠倒谬行，大动公愤，指责弹劾，要求改组，早已不承认其有效。”

1925年1月中，维津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周恩来、陈潭秋、项英、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王荷波、罗章龙、尹宽、杨殷、汪寿华、李启汉等二十人举行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传达莫斯科的一系列决定和部署：内容之一是《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内容之二是宣布莫斯科关于促召开中国国民会议运动的决定；内之三是鲍罗廷拟定的反对善后会议宣言，其中要点是重复共产国际制定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内军阀”等口号；内容之四是传达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的指示，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扩大左派，打击右派，反对中派右倾”，在国民党内

大力扩充共产党的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等等；内容之五是组织任命。维津斯基指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任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项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宣布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五人组成中央局，由李大钊负责设在北京的北方局，由张国焘负责设在汉口的长江局。

《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中说：“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机会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苏共视中共如下级支部，将其高层内斗作为中共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并不奇怪，只是让中共代表们如坠雾中。共产国际代表宣布的中共组织任命更具苏俄色彩。因为，当时的中共规模不大，二十人开全会，领导层以这些人为主，并无必要搞什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苏俄要将其架构名称搬来中共、国民党，两属党代表们不能有异议，只能接受。后来中共党史中，早期的机构设置混乱，因为莫斯科派频繁换来不同大员作不同的宣布。国民党史机构设置较为连贯，因为鲍罗廷一手打理了四年。

1月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其中拒绝国民党为善后会议设定条件说：“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89] 2月1日，执政府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抵制，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段祺瑞发表通电指出：“今之急务莫如防止革命；欲防止革命，莫如速定国是；欲求国是之速定，则舍国民制宪无他途”。站在中国立场，段祺瑞所言极为正确。继清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代表着中国的立宪大业，代表着民选国会和国民制宪的正确方向。在外强不断的阻挠干扰之下，北洋历届政府始终朝着正确的方面艰难迈进。

2月2日，鲍罗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申抵制善后会议，禁止国民党员参加会议，指示上海、广东等各大城市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善后会议提出人民团体（革命组织）代表人数应占善后会议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等条件。虽然有杨永泰等12名国民党人拒绝遵从俄人作出的中执会决定，坚持参加了善后会议，大多数国民党人还是遵从苏俄决定抵制善后会议，奉系及西南数省未派代表出席，黎元洪、唐绍仪、梁启超、章炳麟、朱启钤等政界、学术界名流也拒绝参加，致参加善后会议开幕式的各省军政和各界代表仅86人，没有达到被邀请人数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从一开始就处于艰难境地。

“善后会议”要解决的紧迫问题首先是贯彻和平主张，止息战祸。由于国民党军阀和西南各省的抵制，会议在“改革军事”“整理财政”等关键问题上无法进展。段祺瑞交议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收束军事大纲案》《整理财政案》等三项重要议案无一获得通过。会议期间，受鲍罗廷指挥的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反对善后会议国民大会”，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包办善后会议”等口号。3月1日，鲍罗廷、加拉罕召集全国一百多个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二百多代表在北京举行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主要是那些当年接受孙中山贿款南下的“国会非常会议”议员政客。现在，他们不再端孙中山的饭碗，而开始接受苏俄的经费和指令，在北京专门从事反政府活动。贯穿大会的苏俄制定的“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反动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这些口号中的反动军阀，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等完全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定义。国人不知道，“反对军阀包办”口号的背后，是苏俄金钱在操控着中国舆论，是苏俄代表鲍罗廷人在决定谁是国民代表，谁是人民团体，是苏俄在包办着中国的内政。

段祺瑞执政府虽能将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查封，但无力制止苏俄操纵破坏善后会议的活动。在国民党的抵制之下，善后会议虽经延长会期，

但无法在裁军，和整理财政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160多位代表在3个月会的会议上讨论了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等30多项议案，以不可能有实质作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三个象征性条例收场。结果，苏俄指挥国、共两党，通过促国民会议运动成功挫败了代表国人和平统一愿望的善后会议。

第二次东江战事

孙中山、鲍罗廷血腥镇压商团后，广东商民成立了“各界救粤联合会”，促陈炯明率粤军驱逐孙政府，承诺捐助军饷。在粤省商民请求和段祺瑞执政政府发出“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全国”号召的鼓舞下，陈炯明决定出山。1924年11月，他在汕头召开会议（第二次汕头会议）。江西方本仁，湖南赵恒惕，福建周荫人，云南唐继尧等各地联省自治运动领袖和广东商团代表，“各界救粤联合会”等民间团体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打出继续推动联省自治运动旗号，决定组建“联省自治军”（联治军），发出“平粤难”通电，推陈炯明为救粤倒孙领袖。会后，商界积极筹措“联治军”开拔军费。12月16日，陈炯明通电就任粤军总司令，任林虎、洪兆麟、叶举为右路，左路和中路指挥。

在广州，鲍罗廷部署东征讨陈，任命滇军杨希闵为讨伐军总司令，以杨部为左路，以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以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杨、刘看出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们讨陈的背后的逐个剪除异己计划，消极抵制“讨陈”。许崇智也看出，陈炯明的粤军和客军被剪除后，他的粤军也会成为异己，也不积极讨陈。然而，客军和许崇智的消极抵制未能影响战役的结果。因为苏俄训练、装备出来的黄埔军精锐之师已发展到所向无敌。

1925年2月，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及两个教导团共4000余人由广州黄埔出发向粤东进攻，是为国民党史书所称的第二次东江战事（第一次东征）。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简庆斯报告讨陈情战况写道：“目击者告诉我，

每一节载满军队的火车都由俄国军官检查装备后才开赴前线。俄国人特别注重机关枪队，空军全为俄人所控制，铁甲火车也全为俄人设计和驾驶。苏俄的加仑将军亲自到前线阵地观察，制定作战方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和粤省议会致电苏俄大使加拉罕，抗议苏俄导演中国内战，为苏俄大使置之不理。”[90] 香港《华字日报》报导：“此次蒋介石所统率转战东江之学生军，每排有俄人任指挥，故此种学生军，所用枪械均系去年由俄舰所运来者。是此次东江粤孙两军之战，换言之，即粤军与中俄两国共产党之战也。”[91] “俄舰运来的武器，以大炮，铁甲车，机关枪为最有效。大炮共有 28 尊，所配弹药充足，口径为九生半，而粤军所用者为七生半，口径相差二生的，威力远逊，每次战争均为炮火所迫，不得不退”。[92] 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的回忆：“铁甲车队共有 150 多人，有铁甲车厢几节，有火车头，可以驰骋在粤汉，广九，广三等三条铁路线上，也可作陆军使用到没有铁路的地方。铁甲车由钢板制成，一般子弹打不进去，车上还安装有机关枪，钢炮，可以随时打击敌人，需要时还可拖大炮到前线……铁甲车队的经费不是从大元帅府拨来的，而是由苏俄帮助的。[93] 华字日报》记者从汕头报导说：“连日外报载俄国共产党加仑将军驾驶铁甲车直冲粤军之阵线，汕中人民无不切齿发张，目孙军为吴三桂之继起。又以前次中山招致外省流寇，已吮啮粤民，至于几无完肤，今又利用外人，以延长内乱，可谓绝无人心……昨已联请省议会代表民意，通电北京加拉罕，提出抗议矣。[94] 装备落后的联治军不是苏俄武装并指挥的国民党军黄埔教导团的对手，党军于 2 月 5 日攻占了东莞，11 日占深圳，15 日占淡水，29 日占海丰，3 月 7 日占汕头，一直打到兴宁。联治军林虎部退入赣南，叶举、洪兆麟余部退入闽南，杨坤如部仍守惠州城，陈炯明率残部从汕头渡厦门，后赴上海，第二次东江战事结束。

东江战事是苏俄赤化中国的战争，是扼杀中国联省自治，摧毁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战争，是荼毒中国，祸害中国商民的战争。陈炯明出山挂帅代表着粤省商民维护地方利益、民众利益的诉求，联治军的战争是得到民众支持的正义战争。代表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的联治军虽然正义，但无力对抗苏俄的

飞机、大炮、铁甲战车，失败是必然的。蒋介石率领学生军连战连捷，声威大振，一举奠定了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他晚年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更是危险。”然而，他没有忏悔受苏俄指挥，持苏俄枪炮镇压商团、镇压联治军的“不堪设想”之事，没有承认过东征中用俄援金钱频频发给攻城“奋勇队”的赏银 [95] 而军力大增，帮助自己崛起的事实。不光蒋介石，所有的黄埔将领都为东征、北伐的革命经历自豪，没有人为充当苏俄工具祸国殃民忏悔过。至今，革命党的史书中对这段历史还是站在苏俄的立场，称苏俄指挥的第二次东江之战是“陈炯明叛变革命”，“革命军消灭陈逆”。

孙中山逝世

1925年2月，孙中山肝病恶化。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扩散，挽救无望，建议趁清醒留下遗言。鲍罗廷命吴稚晖、汪精卫拟出孙中山遗嘱和致苏俄书交孙签署。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享年60岁。当日，为促进和平统一，北京政府决定为孙中山隆重操办，下令举行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决定跟随下半旗。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拒绝临执政府的国葬令，决定效法列宁实施防腐剂法保存遗体，按孙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苏俄使馆出面安排，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后举行大殓，移灵柩至中央公园社稷坛，组织十万民众吊唁，再送灵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苏俄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及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致电国民党悼念孙中山，并赠送水晶棺。

对于孙中山遗嘱，国民党内出现了置疑声音。孙中山的同盟会老友邓泽如在《顺天时报》上刊文指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孙中山遗嘱为伪造。鲍罗廷在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以决议“此后国民党开会主席恭诵孙中山遗嘱时全场起立，默致哀思”的方式驳回了邓的指责。不过，邓的指责是事实。鲍罗廷主持推出的孙中山遗嘱和《致苏俄书》确实是苏共政治局批准的文件，其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苏俄三次华宣言的欺骗宣传相呼应。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梁启超评价说：“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 [96]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拘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97] “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借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 [98]

事实确如梁启超所评价。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就是外强在中国扶植工具，制造战祸和分裂的历程：1895年，他趁中日甲午战争之机，要求敌国日本提供金钱军火支持发动暴动，从1897年，他以“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的立场通过测试，被日本大陆扩张内定为中国会党领袖；1900年，他执行日本人趁八国联军出兵之机肢解中国广东福建的计划，策动两广独立，在台湾设立指挥部，在广东发动暴动；1903年，他在河内向法国当局提出划华南大片地区为法国租界，换取法国提供金钱武器助他暴动；同盟会成立后，他在日本金钱的支持下长期在中国东南沿海策动暴动，阻止清廷立宪；1910年，他向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咸马里）、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推销“中国红龙计划”，委任布思为中国同盟会驻外国的财务代表去联络JP摩根等家族要求提供1000万美元革命经费，承诺革命成功后由新政府向美国出卖中国权益来偿还。他的承诺包括：新政府支付高额利息给出钱的美国财团；新政府里安排为出钱的美国财界人士任职；新政府将委任布思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新政府将向美国出让铁路、银行、矿山（割让满洲矿藏）。[99]（2011年7月30日，洛杉矶南帕萨迪那市ONEONTA CONGREGATIONAL CHURCH教堂首次向华人开放，让世人了解了孙中山1910年3月间在此策划出卖上述国权换取1000万美元的活动）“中国红龙”计划后因为同盟会分裂，光复会在东京重建总部，另竖旗帜影响到孙中山的地位而流产；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他与日本订立了出卖满洲、汉冶萍公司的密约，还准备出卖苏路路权，轮船招商局股权；1914年5月，他致函大隈重信，提出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颠覆袁世凯政府建议。他的卖国建议构成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基本框架；1915年2月，他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出卖中国满洲等一系列主权的《中日盟约》，还是以出卖主权要求换取金钱军火扶植，签约后收取了满铁株式会社要人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支付的三十多万元；1916年，他接受日本军部的金钱武器支持，在山东建立了以日军占领区为依托的反政府根据地，

背靠日军向政府军进攻；1917年，他接受德国的巨额贿款购买国会议员南下另立了政府，发动内战；1918年11月，他继续出卖满蒙，在上海向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表示：“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0] 1921年，他回粤重组军政府，与法国公使洽谈以海南岛抵押借款，消息被《华字日报》披露引起各界抗议，才被迫放弃；同年，他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承诺给予香克在华组织和开发工业的特权，换取香克帮助他的南方政府发行一亿金元公债；1922年，他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JAPAN-CHINA FORESTRY, MINING AND INDUSTRIAL SOCIETY)代表签订密约，以出卖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广西之林矿开发优先权等等换取日方金钱武器资助。[101] 这一出卖海南的密约被粤军将领叶举截获，成为粤军发动“六一六驱孙离粤事件”的动因之一。粤军逐孙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阻止了他出卖海南主权；1923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府名义继续出卖海南岛。旅港琼州同乡会便发出挽救琼州的通电说：“（孙中山）此次入粤，日以筹饷借债为事，赴澳赴港之使，接踵于道，又以为未足，并派廖（仲恺）向日本政府大借外债，以退让琼州各种权利为条件。现据确实报告，日政府已派池田氏来粤与廖氏接洽。此项借款一成，琼州必为台湾，琉球之续矣。夫琼州处于我国之南，为南方最良好之军港，日人窃视已久，乘我国内乱之秋，对于南方执政诸人，几无日不百端利诱，冀达其目的，今幸廖氏以琼州自献，当然不惜巨资，乐于购买”。[102] 上述不完全记录显示，孙中山出卖国家所有、民族所有、商民所有，没有他不敢卖的东西，他为个人野心可以出卖一切，他的革命生涯就是筹款生涯，卖国生涯，就是以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大肆卖国换取军火、军费的生涯。

卖国之外，孙中山是民国法统、制宪和和平统一局面的最大破坏者，是为了一党之私将权力斗争之道引入立法的始作俑者。他要当总统，就坚决主张总统制，要求尽量扩大总统权力；他面临下台，就转而主张内阁制，胁迫临时参议院制定出专为限制总统袁世凯的《临时约法》，将国会作为自己的党

争工具。民国政府成立不久，他串通日本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破坏了民国法统和制宪进程。他自认有权随时推翻政府。1917年，他以“护法”之名另立政府，将国家拖入长期的分裂混战局面。另立广州军政府后，他以金钱、棍棒加暗杀威胁胁迫议员选他为大元帅、非常大总统，实行变相的帝制。从1917年以“护法”名义另立政府到去世，他坚决阻止和谈与统一，章太炎挽孙之“孙郎使天下三分”的评价恰如其分，他的破坏为民国历史留下了无穷后患。

国民党当权后，要求国人必须信奉“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何货色呢？孙的民族主义鼓吹“驱除鞑虏，灭满兴汉”，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与“五族共和”不相容，是使国家永无宁日的宗旨；孙鼓吹民权主义，同时自认对异己有生杀之权，要求党众宣誓“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再打指模。他是将会党黑社会的暗杀之道引入政治斗争的代表人物，留下了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海军司令程璧光、粤军将领邓铿，联省自治运动领袖陈炯明（未遂）、名记者黄远生等一连串指使暗杀的记录。这样跨黑白两道，崇尚暗杀者其实不配谈民权；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在投靠苏俄前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投靠苏俄称：“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103] 实践上，孙中山在投靠苏俄前是典型的会匪作法，与黄兴、陈其美等人反复勒索各地商会，以军政府、大元帅府名义残酷搜刮、血腥镇压商民、剥夺社会公产，投靠苏俄之后，他效法苏俄的暴力剥夺。如果他真有一点儿民生同情心也不至于将商民逼到组织武装以自卫，也不至于以黑白两道手法勒索商会，然后撕毁承诺，最后大规模武力镇压商团。他与陈炯明的决裂，分歧在于，陈照顾民生，要地方安宁，要地方建设，要教育经费；孙不顾民生，要讨伐和军费。孙的一生筹款无数，吞款无数，半点也没有考虑民生，相反是疯狂掠夺民财以实现个人野心和独裁梦。

孙中山先是作日本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再作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是清末北洋时代中国战乱、分裂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和平统一，立宪共和的最大敌人。他讨逆、讨贼计划无尽无休，对金钱军火的需求永不满足，勒索商民不遗余力，一再武力镇压商民，以军政府名义盗窃国库关余发动战乱，他将会党黑社会的手段引入国家政治，私立约法，开创了利用国家大法服务一己之私的先河，他反复叛乱，以护法为名的另立政府、另立国会，摧毁了民初的和平统一局面，开启了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民国时代最大的国贼、民贼。他将国家领土主权从东北卖到海南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他向日本兜售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活动是几年后日本侵占东北的重要动因。他助推的苏俄赤化中国进程祸害中国直到二十一世纪。国共两党齐心协力吹捧、神化孙中山毫不奇怪，因为两党革命家群体都与他一样，因得外强扶植，作外国势力颠覆中国政府工具而崛起，两党有必要协手掩盖孙中山的罪恶，通过继续编造伟人、国父神话来维护党的私利与党国统治的合法性。

“二赤”壮大

1924年初，苏俄派切列潘诺夫率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来到广州为国民党筹备军校。10月，苏俄第一艘军火船到达广州。此后两年，数艘俄轮往返海参崴、广州，向国民党输送军火、坦克，拆散的飞机、汽油和煤等物资，派来了大批俄国教官，战机驾驶员和坦克手，向广州国民党政府提供巨额资金，帮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航空局，海军局。国民党一大后的广州，“船入珠江，看见苏联的货轮迎面而来，又见数艘挂红旗的世轮寄碇江心。上了岸，不时遇到穿革命军制服的洋人从身边经过，东山一带，见中间坐着顾问，两边踏板上站着卫士的汽车急驶.....[104] 苏俄武装国民党军新式步枪威力远超吴佩孚，孙传芳，陈炯明军队的汉阳造，拥有先进武器的国民党军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苏俄扶植中国反政府势力的金钱、军火投入超乎时人想象。在南方扶植国民党军事集团之外，苏俄还在北方扶植起了冯玉祥军事集团，以作为打倒

张作霖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乘列强联合干涉俄国之机恢复了对蒙古的主权，张作霖支持沙俄将领谢苗诺夫、翁格恩军以外蒙古及远东一带为“反苏复国”基地，拒绝了苏俄要求出兵外蒙古剿匪的要求，对苏俄红军进军满蒙提出抗议，推动北京政府明确要求苏俄履行对华宣言的承诺。苏俄将张作霖列在华头号仇敌，制定了南北夹击推翻北洋政府的计划，指派李大钊拉拢冯玉祥，为推翻张作霖作准备。1922年11月，在吴佩孚表达了反对苏俄霸占满蒙的立场后，苏俄加紧了拉拢冯玉祥的步伐，派李大钊到北京南苑，向冯玉祥当面传达扶植意向。1923年，加拉罕来到北京任全权代表，再派李大钊见冯，策动冯相机倒戈打击吴佩孚。[105] 经李大钊穿针引线，加拉罕亲自出马考察冯玉祥，向冯提出援助计划，条件是冯须承认苏俄占领蒙古和中东铁路，必须接受苏俄向国民军派顾问团，必须接受在军中建立共产党员为主的政治部，以及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活动。冯以支持驻军蒙古和占领中东铁路，接受苏俄各项条件的表态通过了苏俄的测试。加拉罕对冯的表态满意，向苏共政治局报告“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106] 建议扶植冯作为推翻张作霖的工具。苏共政治局批准了加拉罕的建议。1925年春，以伏龙芝为首的苏共中国委员会提出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援助的计划，获苏共政治局批准后开始执行。根据计划，苏俄提供给冯玉祥巨额资金、步枪50000余枝，机关枪5000挺，炮160尊，飞机10架，电话400部，价值74万卢布的毒气弹及其它物资。[107] 根据援助协议，苏俄迅速赤化冯军和中国北方，举措包括：安插王若飞、宣侠父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政工要职；派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冯军中发展公开和秘密的党员；选拔国民军军官到苏俄受训；乘着五卅运动煽动起全国反帝运动热情，在张家口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招收京、津大中学生参加国民军，将700多录取的学生编成五个中队；在包头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派王若飞到河南筹办北方联合军校等等。

扶植冯玉祥是为了利用。加拉罕与鲍罗廷为国民军制定了计划，要求冯挑起与张作霖的冲突，支持国、共两党在北京展开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系列行动。虽然吴佩孚表态维护主权后被列为了敌人，但因为吴反对张作霖，苏俄仍然要利用吴倒张。苏俄中国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在中国政策报告中说得明白：要利用通电反奉的吴佩孚，推动冯玉祥与吴佩孚联合打败张作霖，推翻段祺瑞政府，成立一个有吴，冯和广州国民党人的新政府。需要指出，利用吴是暂时的，应准备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后即发动反对吴的战争，因此须让冯玉祥控制华北，作好反吴的准备，同时要在上海大力建立工人武装，将上海建成中国革命的中心。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伏的建议，指示加拉罕回北京与维津斯基据以执行，全面展开推翻张作霖的行动。[108]

杨、刘、唐抗争

1922 年底，孙中山用“关余”巨款收买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入粤讨伐陈炯明，帮助自己回粤重建了大元帅府。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滇桂军长期驻粤，向大元帅府讨要军饷，从广东地方搜刮军费，与国民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俄援没到之前，孙中山需要依靠滇桂军的武力维护统治，拉杨、刘加入国民党，并委任要职。1924 年秋，苏俄扶植国民党的军火船到了广州，鲍罗廷开始主持广东与国民党。1925 年初，鲍罗廷发动了东江战事，命杨、刘讨伐陈炯明的粤军，希望借此削弱杨、刘的实力。杨、刘清楚，国民党利用完他们迟早会向他们下手，在东江战事中保存实力。党军在苏俄飞机大炮配合和苏俄顾问指挥下击败了粤军，取得了胜利，鲍罗廷也开始部署收拾杨、刘等异己。作为准备，鲍罗廷先派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赴桂，联手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歼灭了支持西南联省自治的沈鸿英军，控制了广西，扶植形成了新桂系。

云南的唐继尧也感到将成为鲍罗廷和国民党军的收拾目标，与杨、刘商议决定联手夺取广西，再进兵广东，推翻大元帅府，驱除苏俄势力，在两广继续推行联省自治。4 月，唐继尧率领由滇、黔二省组成的“建国军”自贵州

东部入桂，杨、刘从东征前线撤回广州，时发表联合宣言指责国民党投靠苏俄赤化两广，表示拥护唐继尧领导联省自治运动，准备与党军决战。鲍罗廷指挥依附国民党的谭延闿、许崇智、程潜通电讨唐。这时，国民党内就应对杨、刘兵变意见分歧。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主张避免内战，寻求妥协，派邹鲁前往香港劝杨、刘息兵，承诺改组大本营以满足二人的政治要求，对二人既往不咎。鲍罗廷否决了胡的建议，派廖仲恺召集蒋介石、何应钦、许崇智、朱培德、谭延闿及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等人在汕头东征右路军总部举行会议，传达武力消灭滇桂客军的决定。没有实权的胡汉民只得服从鲍罗廷的决定。与此同时，杨希闵、刘震寰在香港与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的代表以及广东商团代表陈廉伯举行会议，商讨联合讨伐俄党，推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

5月下旬，蒋介石指挥党军主力向广州挺进，杨、刘集中兵力在广州东郊地区布防。6月5日，鲍罗廷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名义下令免去杨、刘的建国滇军、桂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命党军讨伐滇桂联军。杨、刘指挥滇桂联军攻占了广州国民党机关，发布公告谴责国民党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明兵变目的为阻止苏俄与国民党为害并赤化广东，声言“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6月11日，蒋介石率党军向滇桂联军发起总攻，两日后击败了装备落后的滇桂军。滇桂联大部投降，杨、刘逃往香港。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回到广州，被鲍罗廷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

在武力消灭杨、刘的同时，李宗仁与范石生奉鲍罗廷之命联手击败了唐继尧率领入桂滇军。唐继尧知道不敌苏俄，寻求英国援助。英国声明不干预中国内政，拒施援手。7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迫唐继尧退守云南，控制了广西全境。不久，国民党收买唐的部下将唐暗杀，控制了西南诸省。国民党史家后来称控制西南战事为“平定杨、刘之乱”、“打倒军阀唐继尧”。其实，“杨、刘之乱”的确有，不是在1925年，而是在1922

年底接受孙中山购买入粤，给粤省带来祸乱。1925年的杨、刘誓师宣言讲得明确，反对赤化，反对苏俄统治广东，要求西南继续联省自治。他们与唐继尧一起，代表着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在陈炯明之后对苏俄赤化的最后抗争，是正义之师，1925年没有“杨、刘之乱”，只有苏俄扼杀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的“俄党之乱”。

俄党政府与廖案

消灭“杨、刘”后，鲍罗廷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大元帅府和大本营，一为削去伐滇桂不积极的国民党内粤系代表人物胡汉民、许崇智的实权，二为使原副元帅唐继尧失去入主广州理由，三为整编军队，将服从苏俄指挥的南方各省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在广州宣布国民政府成立，指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将伐滇桂不积极的国民党内广东地方派首领胡汉民、许崇智削去实权贬为外交部长和军事部长虚职，迫二人出走。鲍罗廷照搬苏俄的党国模式，将孙中山的“五权”、五院统归于党权之下。这一党国模式的特点为：取消国会、取缔学术自由、取缔出版自由、取缔商会等民间团体，全面摧毁清末以来中国改良进步的各项成果。后来，国、共两党津津乐道国民革命，口口声声谴责满洲国为伪政权。其实，所谓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全为苏俄扶植产物，广州国民政府是最早的伪政权。梁启超点评广东国民政府一针见血：“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109]

国民政府由苏俄一手建立，党务、财政、军事、从事大权皆操于鲍罗廷之手，是苏俄在华建立的俄党政府。俄党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呈左中右三派局面。以廖仲恺、孙科、汪精卫、徐谦等人首的左派唯鲍罗廷意旨是从，积极推动赤化；以胡汉民、张继、邹鲁、谢持、戴季陶、许崇智等人为首的右派对俄人把持党权，安插左派和共产党强烈不满；以蒋介石、何应钦等一

批将领为首的中派在左右两派间骑墙。国民党右派对秘密共党主持国民党早已忍无可忍，被鲍罗廷排挤的粤军地方将领将矛头指向了左派首领廖仲恺。陈炯明在与孙中山决裂时就指出廖仲恺是秘密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共，帮助苏俄赤化广东和中国。[110] 这一点在国民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遇刺。案发后，鲍罗廷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廖案。周恩来在廖仲恺遇刺当天赶到医院探望，并发表了《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指廖案系国民党右派所为，意在破坏两党合作。“廖案检察委员会”公布追查结果为，暗杀系国民党右派所为，参与策划者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朱草文、林直勉，魏邦平、梁鸿铭、杨金龙、梅光培等粤军将领。鲍罗廷借廖案实施清除国民党内广东地方势力的预定计划，将第四军副军长梁鸿铭为首的一批粤军将领枪决，将胡汉民软禁，将许崇智开除出特别委员，提拔李济深接掌许崇智第四军军长之职，间接剥夺了许的军权。

投靠国民党的粤军将领中，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是陈炯明之后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支持胡汉民，要求粤人治粤，反对鲍罗廷在广东搜刮北伐军费。消灭陈炯明的粤军和刘、杨的滇桂客军后清除粤派残余势力是鲍罗廷的预定计划。以廖案为借口，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派胡汉民作为中国国民党赴国外代表，逼胡出国，以汪精卫接替胡的中政会主席位，然后再逼许崇智离粤赴沪。许一走，鲍罗廷逮捕了梁鸿楷、魏邦平，派蒋介石率黄埔军与新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联手将粤军梁鸿楷部缴械。清除广东地方势力派后，鲍罗廷增补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中政会委员。随着粤军首领被逐，黄埔系主导了国民党军，蒋介石确立了国民党内最高军事领袖的地位，成为廖案事件的最大赢家。

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1925年初，斯大林决定在中国发动目标针对美英日列强和中国政府的所谓反帝运动，派维津斯基担任中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批准拨出巨额款项汇到上海、香港，作为策动反帝运动的经费。根据莫斯科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文件，声言“扫除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要求重点在上海、广州发动反帝运动和针对英美的示威游行。中共上海当局组织策动了一系列的罢工、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挑战租界当局的管制底线。5月15日，在示威中被租界巡警枪击受伤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去世。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要员召开会议，决定借此事件掀起全国性的反帝运动高潮。5月30日，中共组织两千多学生、工人到租界游行示威，继续挑战租界警方。英巡捕开枪驱赶，造成死伤。中共通过瞿秋白、郑超麟、沈泽民等人主持的《热血日报》将事件宣传为“五卅惨案”。

6月，苏共电汇巨额资金到上海、香港作为反帝运动经费，苏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将五卅运动升级的“九条指示”，其中包括“采取措施使现时的中国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否则就让那政府分裂和瘫痪……；倘若上一措施不能成功，就以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推翻现政府，成立新政府”。[111]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组成了李立三为委员长的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反帝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以苏俄金钱收买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学生举行罢课，指挥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商界联合会举行示威，高喊“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冲击租界，要求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撤换上海英、日领事。在镇江、汉口、九江、南京、青岛、重庆、广州等城市，中共成立了无数工会、沪案后援会等组织，组织罢工、煽动对外国人实施暴力攻击，制造了众多巡捕开枪事件。

根据苏共政治局关于在广州、香港同时发动反帝运动的决定，国、共两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等一系列工会组织。6

月中，国、共两党在香港发动数万工人举行了支援“五卅反帝运动”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离港到广州去领取津贴并在广州游行示威，同时发动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罢工。6月23日，苏俄顾问指挥来自广州、香港的十多万罢工工人、郊区农民、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的学生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游行示威，冲击英租界，引英国驻沙基警方开枪，然后大力宣传“沙基惨案”。当月底，共产国际通过国、共两党操办，在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派来德国、朝鲜、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前来在大会上发表鼓动收回香港的演说。

省港大罢工使香港进口船只减少了九成，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交通停滞，地价跌落，垃圾堆积，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配合香港罢工，切断对香港的食物等供应以打击了港英当局。在苏俄巨额资金的支持下，中共每日向省港罢工工人发放所谓救济金，收买罢工长期示威游行。以英、日为首的列强一方面派出数十艘军舰在上海、香港附近示威，一方面谋求和解，组成美、英、日、法、意、比六国人员的“沪案调查委员会”，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与中国政府代表商谈解决办法。北京政府与列强各国交涉容易，但是无力制止沪、粤、港的罢工和全国的反帝运动。在省港持续罢工的同时，苏俄北方同时策动了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兵变以及国共两党的反政府暴动（首都革命）。

对于“五卅运动”的真相，梁启超写道：“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112]“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工人因不愿罢工挨打。”“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13]“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

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14]

反帝运动中，共产国际推出的打动中国人的口号之一是收回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始于 1840 年的中英战争。很多国人不知道，领事裁判权不仅因为洋人在中国横行，还因为中国当局无理。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只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窗口，实行洋行（公行）制度，规定由广州十三洋行经管，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英国需要大量购买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而中国不开放贸易，很少购买英国工业品，于是英国对华贸易赤字，黄金、白银流向中国，只好以印度种植的鸦片输入中国作为支付手段。当时，吸食鸦片在全世界合法（英美都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英国本土也有鸦片贸易。鸦片之害报到朝廷，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下令收缴鸦片，英政府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配合，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鸦片存货。但是，林则徐不光将英商交出的两万多箱鸦片销毁，还采取了一系列无理措施，包括要求外商写保证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受死，要求英商互相担保不贩鸦片，下令砌墙封锁广州外国商馆，对外商馆并断水断粮，禁止中国人与洋商接触，将携带欧洲文字的信件中国船夫处死等等。这时，发生了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群殴致中国人林维禧身亡事件。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林则徐要求随便杀个英人偿命。义律赞同收缴鸦片，但认为林的其它举措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惯例，侵犯了英商的财产权和生命权，拒绝交英人予林用大刑，也拒绝交出一英人抵命。于是，林下令封港，对所有英船实行淡水封锁，默许属下向淡水源投毒。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议会就是否出兵保护英商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以 271 赞成，262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出兵，战争爆发。中国史书称此次中英战争为“鸦片战争”，而英国、香港史书中称为“淡水战争”。其实，引爆战争的缘由并非鸦片，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以及大清律与国际法的

冲突。蒋廷黻评论鸦片战争说：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英国不接受中国连坐，大刑，戮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以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林则徐禁烟没有错，但断水，要求连坐等作法代表着落后，英国迫使清廷接受领事裁判权有其道理。

与中国人认为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代表不平等，试图赶走列强的想法不同，日本人接受欧美的理念，承认领事裁判权有其道理，认为外国犯人拒绝日本旧司法体制的审判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也是被迫开放，与外强签订了“治外法权”条约。开国后，日本迅速变革，“脱亚入欧”，感谢迫使自己开放的佩里将军，以过“佩里节”的方式庆祝开国。1889年，日本在立宪的同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司法体系。欧美各国接受日本新法，迅速取消了在日本领事裁判权。日本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过程告诉人们，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正道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和公正、进步的司法体系，而非煽动民众对外国人施暴。五卅运动中，中国革命党人在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做文章，只说其一，隐瞒其二，以爱国口号煽动排外。国人不了解，苏俄发动中国反帝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以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煽动中国人反对美英日等列强，转移中国人对中东铁路和满蒙的主权的关注。

共产国际推出的另一打动中国人口号是收回租界。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大力宣传租界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强权压迫中国的产物，收回租界即是爱国。然而事实是，除俄国和苏俄霸占租界之外，其它租界都不是列强武力强占的，而是中外政府协商的租赁。最早的上海英租界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因担心华洋杂处滋事而决定将上海县黄浦江河滩的一部分租给英人作为租界。双方签署的《上海租地章程》写明：“.....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挈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厦门鼓浪屿租界，是清政府出于“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考虑决定

出租的。[115] 天津美租界是清政府主动划出租给美国的。美国领事不敢要，请示华盛顿，华府忙于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于是暂时接管。1880 年、1896 年，美国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清政府未作答复。美国领事将天津租界转给英国，成了天津英租界。[116] 比利时、意大利没有在华军事力量，其租界是与清政府签约租赁的。1843 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地地主不同意，英人“未逞”。[117] 列强在华有租界，中国在海外也曾有租界。1871 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大清国与日本均在对方享有治外法权。随后，大清国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和“仁川清租界”。民国政府继续租地给洋人。袁世凯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条约，将法租界面积扩展至 15150 亩。[118] 洋人租地要付钱给中国政府或民间地主，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中国地主们视列强为大客户。

租界是当时中国境内法治最清明的地方。由于治安良好、没有匪患，租界吸引大批华人涌入。天津英租界开辟时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到 1938 年，人口接近 8 万，除几千洋人外其余都是华人。[119] 几十年间，租界吸引了众多富贵显要、革命家来此居住、活动。鲁迅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写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张自忠住天津英租界，天津知名企业刘锡三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内以获和平的经商环境，使“盛锡福帽厂”品牌壮大。红军劫掠漳州时，商民选择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120] 保护经商安全而设立的租界促进了经济，带动周边的经济，促进了就业、市政建设。厦门鼓浪屿租界小贩太多堵塞道路，租界工部局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是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立了“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不影响小贩生计。[121] 租界实惠商民可见一斑。就促进经济而言，它与后来中国经济特区大同小异。与上述平等、协商而来的租界相反，俄租界倒真正是帝国主义武力强迫的产物。

所谓反帝运动，收回租界运动是苏俄策动，当然不会提及收回最大的苏俄租界。

所谓反帝运动的另一蛊惑口号是关税自主。1925年10月2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及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等国代表在北京召开了关税会议。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王宠惠出席了会议。会上，各国代表同意自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关税自主，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之税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在当时各地军阀割据一方，靠收取厘金养兵的国情下，北京政府无力裁撤厘金，会议未能达到中国关税自主的目标。会议期间，国、共两党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党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等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挑起与军警的冲突，为正在准备中的北伐推翻国民政府计划造势，将致力于中国关税自主的王宠惠、沈瑞麟、王正廷等中国外交官骂为卖国贼。示威者们不清楚，中国关税自主的主要障碍来自苏俄，因为苏俄扶植的国民党军事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苏俄是中国南北分裂局面的主要推手。

进入1926年，苏俄在中国准备就绪，决定发动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为避免给英、日联手武装干涉的借口，斯大林决定结束五卅与省港大罢工反帝运动。[122] 据斯大林的决定，北京的加拉罕与上海的维津斯基向国、共两党发出停止反帝运动的指令，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封锁，撤消省港罢工委员和罢工纠察队，恢复省港交通宣布，停止排英，除海关进出口货附加税等事继续向粤港英方交涉外，取消罢工的要求条件，宣布持续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反帝运动如下特点：苏共中央决定发动；苏俄提供资金支持；国、共两党（国民党清共后退出）出面操办；苏俄资助的工会，学生会形成听命于苏俄的“反帝大联盟”网络；以

革命、反帝、爱国等口号煽动民众，利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打击美英日等列强，服务苏俄利益；绝口不提霸占中国最大租借地的苏俄帝国主义等等。在几年后的中东路战争中，反帝大联盟奉苏俄之命在各大城市发动暴乱，与苏俄里应外合，喊出的口号不是保卫中国，而是“武装保卫苏联”，证明中国反帝运动服务苏俄利益，中国形形色色的反帝团体、反帝大同盟（大联盟）实际都是俄党。

第三次东江战事

利用廖案清除广东地方派势力的同时，鲍罗廷发起了肃清退守粤军的第三次东江战事（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派苏俄总顾问加仑（GALLENT）指挥第一师，蒋介石指挥第二师，以何应钦，李济琛，程潜分任第一，二，三纵队长。1925年9月，国民党军在广州誓师，然后开始东进。

抵抗党军的粤军极为悲壮，因为党军其实是俄军，有苏俄运来的大批野炮，有清一色俄人机师的14架苏俄战机，有俄人为枪手的机关枪团，由大批俄国军官组成指挥系统，而粤军装备落后，呈必败之势。陈炯明愤怒抨击国民党充当苏俄工具说：“彼等以军权财权托于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袁世凯所不敢承认者，彼等竟自动的让与俄人。彼等若真讲共产主义，犹有可说，所痛心者，专共他人之产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粤省固将断送，而其影响将及于全国。余为粤人，万难再忍，且亦责无旁贷。现正与林、洪、叶诸将准备一切，一俟饷械齐集，即当一举而廓清之。”[123]

月中，党军连续炮轰惠州城。两年前孙军进攻惠州时，粤军凭坚固城墙可长期固守。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坚固城墙被苏俄野炮轻易摧毁，惠州不幸的成了第一个被外国大炮轰毁的中国城市。重炮轰开城墙后，加仑将军指挥党军从飞鹅岭攻入惠州，振臂高呼“乌拉”。惠州失守后，粤军节节败退，

党军接连攻占了河源、海丰、紫金、五华、兴宁、汕头，粤军残部退入闽南。至此，第三次东江战役结束，代表粤省地方自治和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的粤军被苏俄枪炮剿灭。在 11 月 7 日庆祝苏俄革命的大会上，蒋介石讲演说：“我们应该庆祝这个纪念日，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即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俄国革命失败了，我们今日便不可能有这个革命。让我们欢呼俄国革命成功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此时，他需要高呼拥苏口号给鲍罗廷听，以巩固自己军权与地位。一年多前，他因不满孙中山“过信俄人”而弃官离粤，从上海写信给廖仲恺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词而已。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24]他不会承认，率黄埔军镇压商团，两次东征绞杀了广东地方建设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正是作了“俄奴”。

被党军再次击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他为官时不置产，无私蓄，在香港陷入穷困，依靠旧属接济过活。在港的穷困生活中，他写出了《中国统一刍议》、《法制产生》两书，阐述他反对党国体制，通过联省自治建立联邦中国的主张。他前瞻性地指出：“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前已言之。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代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政之下者也。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的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面，不能为有效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现，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

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他指出号召铲除专政说：“而根本救国之图，非合五族四万万人之力量，缔造新国，铲除任何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须取消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表示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他批判党化教育：“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故香港。香港《工商日报》时评：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国民党控制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陈逆炯明死于港”。曾经为粤闽地方建设贡献良多的陈因迁葬费用没有着落，灵柩一直寄存于香港东华义庄。其故旧和部下发起募捐，筹集葬费，1934年得陈济棠和惠州各界捐助，陈炯明才归葬惠州西湖紫薇山。

郭松龄反奉与首都革命

1921年，北洋政府“蒙疆经略使”张作霖明确指出，苏俄的《对华宣言》承诺是对中国人的欺骗，在侵略中国方面，苏俄与沙俄没有区别。他要求北京政府坚持以苏俄履行宣言承诺为建交前提条件。张作霖的主张是不容置疑的常识，任何国家也会在建交时先要求收回对方侵占领土，再谈建交。苏共政治局对张作霖的立场无比愤怒，将张列为了在华的头号敌人，确定以向满蒙扩张，推翻张作霖和北洋政府为对华政策目标，在随后的几年中致力拉拢吴佩孚，扶植孙中山和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

1924年9月，张作霖与苏俄签署了《奉俄协定》。签约后，苏俄背弃承诺，独霸中东铁路。张作霖上当后将负责《奉俄协定》的苏俄间谍杨卓枪毙，以武力捍卫权益，拘捕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斯大林有心出兵满洲武力推翻张作霖，但他清楚，日本不允许它吞并整个满洲，直接出兵

满洲将引爆再次的日俄战争，于是决定扶植国民军来推翻北京政府和张作霖。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加拉罕派李大钊于 1925 年初与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达成了协议：苏俄向国民军第二军派军事顾问团及提供军火援助；胡支持苏俄的立场，承诺对张作霖开战。[125] 协议刚达成，胡景翼去世，加拉罕赶紧再与冯玉祥达成相同的协议。随后，苏共经外蒙古之库伦运给向国民军包括大炮和飞机在内的强大军火，向国民军大量安排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员。

苏俄推翻北京政府的另一部署在北京。与中国建交后，苏俄在驻北京大使馆内设立了旨在颠覆中国政府的“北京活动中心”。“活动中心”首脑居然由驻华大使加拉罕兼任，成员包括别尔金将军、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维津斯基、苏俄军事情报局派出的驻华武官盖克尔等人。“北京活动中心”指挥情报人员致力于对所在国的外交期刊杂志的收集和研究；重点研究重要阶段、重要事件的当地国印刷品；对重要目标实施监视与追踪；建立侦察、间谍网，其中特别强调在张作霖统治的北京及东北地区发展间谍网，招募间谍和线人。

1925 年，苏俄一面发动国民会议促成、“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关税会议等运动，一面策动反张作霖的部将，通过李大钊联络上了奉系的两位重要将领——郭松龄与杨宇霆。郭是东北军中“陆大派”（陆军大学毕业生派）首领，统率着奉系最精锐的部队，在奉军中享有崇高声望。第二次奉直战争获胜入关后，张作霖获得了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控制权，任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为四省都督。加拉罕获悉郭松龄因未得都督职而对张作霖强烈不满，派李大钊策反郭起兵反张。奉加拉罕之命，李大钊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发展为了秘密共产党员，通过李德全策反了郭松龄夫人韩淑秀，再通过韩策反郭。“北京中心”采取了几项举措推动郭松龄下决心反奉：一是大力宣传张作霖为反动军阀；二是为郭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攻打天津计划；三是由中东铁路局出钱收买驻黑龙江奉军将领承诺配合郭反奉；四是动用遍布华北、东北的苏俄情报网为郭提供情报。[126] 郭松龄知道，李大钊的背后是苏俄，希望像冯玉

祥那样倒戈后得苏俄军火支持，于是决心举兵反张，与冯玉祥订立了联手倒张密约。郭、冯再以允诺地盘的办法拉直隶督办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联盟，约定利益分配为：冯助郭经营东北，郭助冯经营西北，李景林再得热河地盘。在幕后操纵反奉三角联盟的加拉罕计划，策动冯玉祥起事占领北京、直隶，对张开战，策动孙传芳在南方对奉系开战，策动郭松龄起兵反张，命中华国民党和国民党在京城暴动，多方联合倒段驱张，在满洲建立亲苏政府。在策动推翻北京政府的同时，斯大林指示“北京中心”小心行事，不要损害苏日关系，争取在时机有利时与日本谈判。

11月22日，在全国反帝运动高潮中，郭松龄在直隶滦州通电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通电促张作霖去职将政权交张学良，随后率军经山海关、锦州、新民直逼奉天。苏俄“北京中心”决定，由国、共两党配合，在北京直接夺取中央政权，并将行动命名为“清张倒段”的“首都革命”。根据加拉罕的决定，国、共两中共北方区委成员赵世炎、陈乔年组成暴动指挥部，指挥工人保卫队、学生敢死队、农民自卫队组成的暴动队伍展开一系列颠覆行动：攻占了邮电局和警察局；在全城散发“建立新政府宣言”传单；组织学生进行示威游行，打出“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螫贼”等标语，将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和陈启修推在学生队伍前面游行；包围了位于铁狮子胡执政府，唆使暴徒殴打了段政府大员章士钊；包围吉兆胡同的段祺瑞宅；放火焚烧了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指使学生于当夜分头到章士钊、朱深、叶恭绰、李思浩、曾毓隽、刘百昭、梁鸿志等段祺瑞政府大员的住宅打砸烧。29日，国、共两党联手在天安门召开了五万人的国民大会，率众高呼“武装平民”，“打倒段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号召武装暴动，在会后再组织了全城大游行。与“北京中心”策动北京暴乱相配合，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为郭松龄举兵反奉及首都暴乱叫好道：“中国的事态在极大程度上改变远东的形势，进而改变全世界的形势，在中国的事态中，已经可以听到遥远的世界革命的声音。”遵照苏俄“北京中心”的指示，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发表了《为郭松龄倒戈反奉告全国民众书》，在其中号召

“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127] 指示东北地区共产党配合郭松龄。然而出乎“北京中心”和暴动指挥部意料，反奉三角同盟中的冯玉祥以扩张地盘和保存实力为重，临阵背约，不举兵配合“首都革命”，反而趁乱去夺取李的直隶、热河地盘，向三角同盟盟友李景林开战。为保地盘，李景林宣布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通电讨伐冯玉祥，与冯军在杨村等地展开激战。冯玉祥的背约使加拉罕、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暴动失去支持，迅速溃散。

日本在东北与北京的情报力量不比苏俄差，掌握了苏俄策动郭、冯反奉，指挥东北中共和国民党势力配合倒张、倒段，扶植亲苏东北政权的策划，决定支持张作霖挫败郭松龄的兵变。12月7日，关东军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警告郭松龄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郭松龄致电日本公使和驻华外交团，声明保护在东北的外国人，尊重既成条约，要求日本不要干涉。12月13日，郭军攻克营口，沈阳震动。张作霖向日军求援，准备逃往大连，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15日，日军从朝鲜调兵开来满洲，向郭松龄发出第二次警告，禁止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二十华里以内有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18日，关东军司令官斋藤义夫少将移驻奉天，指挥日军守城，使张作霖得以将军队悉数调往对郭作战前线。郭松龄听信李大钊传达的苏俄支持保证，相信日军不会冒与苏军冲突的风险出手干涉。令他意外的是，关东军出手干涉，苏俄袖手旁观。22日，郭军与奉军在巨流河激战时，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新民一带郭军阵地以配合奉军，出兵扮作奉军从侧翼压迫郭军，掩护奉军吴俊升部骑兵突袭了郭军后方白旗堡。郭军将领们见形势不妙，拒绝再服从郭的命令。郭松龄意识到兵变失败，携妻潜逃营口。日本领事馆迅速将郭的行踪通知奉军。25日，奉军在新民将郭松龄夫妇逮捕。张作霖下令以赤化罪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暴尸三日，对附郭官兵免于追究。至此，苏俄策动的

郭、冯联手倒张，发动北京暴动夺取中央政权的计划因日本的干预而失败。整个事变看似是一场奉系内乱，实际是日、俄两强为争夺满洲在中国斗法。

中共在“首都革命”中指使学生放火烧《晨报》馆的起因是该报副刊开辟了《对俄问题专栏》，刊登关于苏俄霸占满蒙是否是帝国主义的系列论争文章。中苏建交后，陈启修教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为苏俄在华行径辩护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一文。政治学者张奚若发表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反驳陈文。《晨报》副刊主笔的徐志摩在编者按中指出：“苏俄问题至今是个没开刀的毒瘤。尽管里面脓水已满，却没有一个人去触动它。张奚若敢于捅破这个毒瘤，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最知耻的人。”响应徐的号召，众多知识界名人士撰文加入了讨论。梁启超撰文指出：“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沉吟地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一国的国民性可以换一面招牌就得转变的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祇是专制，对外祇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128]“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129]“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祇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祇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祇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

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130]一个多月中，《晨报副刊》“对俄问题讨论专号”刊文近三十篇，反对苏俄的观点压倒了拥苏观点，《晨报》率领一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舆论界打击了苏俄帝国主义的气焰。苏俄发动反帝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转移中国人对其占领蒙古、满洲关注，《晨报》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得罪了苏俄，结果被俄党焚毁报馆。

“首都革命”暴乱过后，中国知识界就火烧晨报馆事件及其背后的“对俄问题”继续讨论。学者燕树棠在《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一文中谴责暴乱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胡适与中共领袖陈独秀的下列对话代表了当时中国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

胡：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是争取自由之举吗？

陈：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

胡：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竟也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这使我深感诧异。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会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残忍的社会。

陈：说到容忍，我辈无法容忍，共产党被严捕，五卅惨案，又可曾容忍？

胡：君入狱，大家设法营救。君出狱时，我等谈笑一座，君应记得。

陈：你何以参加善后会议？

胡：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

陈：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

胡：何为帝国主义？

陈：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慨叹：“你我不是曾同时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31] 胡适痛感，《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烟消云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并且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没有宽容精神的所谓新青年注定会重拾旧势力的道路。[132] 胡适所怕的后来不幸成为现实——自由被排斥，异己思想被禁止，社会变得更为残忍。

参加首都革命暴乱，烧报馆的学生们不知道苏俄颠覆北京政府、推翻张作霖的计划，但中国还是有有识之士清楚并敢于说出真相的。例如，章太炎直言：“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133] 章不但直言，还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联合会”一起致电苏俄大使加拉罕，抗议苏俄在华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134] 然而，胡适、章太炎还不知道有更严重的情况：苏俄早就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秘密运入了驻华大使馆，加拉罕大

使身兼着推翻北京政府行动的总指挥，“首都革命”的暴乱骨干就是以苏俄使馆提供的枪支枪击了政府卫兵。这成为几个月后卫兵们开机还击造成“三·一八惨案”的重要原因。

在被烧后复刊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撰文写道：“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135] 在这时的中国，苏俄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力大到难以想象，得罪苏俄的后果当然极为严重。《晨报》讨论苏俄问题导致，报馆被烧，主持讨论的徐志摩不屈不挠，在《晨报副刊》继续坚持信仰，更让苏俄记恨。几年后，他乘机遇难，机上乘客仅他一人，让人怀疑是与得罪苏俄相关。

讨赤联合阵线成立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派代表向吴佩孚提出建议：直奉战争的结果只能使苏俄得利，希望奉直联合对抗苏俄赤化。吴佩孚仍不想对奉系认输，拒绝了张的建议。1925年，吴佩孚组织了湘、鄂、川、黔、豫、陕、晋七省联防，浙江督军孙传芳在南京宣布组成自任总司令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讨奉联军，随后再与七省联军联合。10月，吴佩孚在孙传芳、萧跃南、周隆人、岳维竣、阎锡山等各省督军的推举下宣布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发表了联合讨奉通电。

吴佩孚打出反奉旗号后，苏共政治局立即开会论中国局势。会议认为：“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民族运动领袖，.....吴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会议决定，支持反奉联盟推翻张作霖和北京段祺瑞政府。根据苏共政治局决定，加拉罕派代表密会孙传芳，

承诺为其提供军火，拨给子弹 100 万发，助孙击败张作霖，条件是保密及允许在其辖区开展反帝运动。[136]

11 月，苏俄策动了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中共与国民党在北京发动暴动，图一举推翻北京政府。日本人出手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兵变。随后，张作霖挥师南下入关，挺进京津，与李景林、张宗昌组织的直鲁联军及晋军联合讨伐冯玉祥。在苏俄扶植冯玉祥控制华北的形势下，吴佩孚、孙传芳认识到，真正的威胁是苏俄赤化中国的计划，是苏俄扶植的“南北二赤”，认识到张作霖“直奉相争只能有利苏俄赤化”意见正确，决定抛弃直奉恩怨，接受张作霖的联合对抗苏俄赤化建议。12 月 31 日，吴佩孚、孙传芳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组织的“讨赤联军”，共同进攻冯玉祥。至此，直奉联合，讨奉联盟转变为了讨冯和对抗苏俄赤化联盟。次日，冯玉祥在奉军和直军包围的形势下通电下野，赴苏俄避难。

吴佩孚加入讨赤后，苏俄再度放弃援吴构想。根据苏俄的政策转变，李大钊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讨吴大会”、“反英讨吴大会”，提出了“打倒吴佩孚”、“反对张吴联盟”、“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等口号。1926 年 3 月，加拉罕再致函吴佩孚，劝吴与冯玉祥合作，希望拆散讨赤联盟。吴佩孚拒绝了加拉罕的拉拢，斥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4 月，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通电、撰文支持讨赤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反赤之声，洋洋溢耳。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137]

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下台

1925 年底，吴佩孚、孙传芳抛弃直奉恩怨，接受张作霖直奉息争联合对抗苏俄赤化的建议，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组织的“讨赤联军”，联合讨伐北赤冯玉祥。1926 年 1 月，冯玉祥在讨赤联军夹击形

势下通电下野，赴俄避难，苏俄顾问接手直接指挥国民军，继续致力推翻段祺瑞政府。

3月9日，苏俄顾问根据莫斯科的反帝运动指示，指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航道。次日，公使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交照会，抗议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封锁大沽海口及阻断铁路交通。12日，两艘驶入大沽口的日舰与大沽炮台的国民军发生了炮战。16日，列强各国在大沽口集结20多艘军舰示威，八国公使就大沽口事件联合向北京临时执政府发出限四十八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提出要求为：国民军停止大沽口至天津战事；解除对大沽口敷设的水雷及水道封锁，并恢复航标；所有作战船只泊大沽口外，停止歧视外轮；除海关当局外任何人不得对外轮搜检等等。当晚，段祺瑞执政府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将复函送达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称政府正在竭力设法恢复由北京通海的自由交通；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范围，所提要求应可由中国地方军事长官与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协商解决，请各国勿诉诸武力。17日，鲁军青岛舰队司令毕庶澄向列强表示接受所提五项要求，国民军司令鹿钟麟声明遵守《辛丑条约》，愿撤封锁，并向日本领事承认对12日大沽冲突事件负责。

正当危机走向化解之时，苏俄“北京中心”向中共、国民党北京党部下达了对段祺瑞政府的攻击令。3月18日晨，李大钊、徐谦（鲍罗廷拉拢冯玉祥的代表）、顾孟余（国民党宣传部长）、中共北方区委的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实施利用民众爱国情绪组织北京近万学生市民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提出将八国公使驱逐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等与当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一样的无理要求，计划挑起暴乱，解除卫兵的武装，一举推翻段祺瑞政府。“北京中心”的行动不只是策划集会，还向中共北方区委提供了枪支弹药。中共北方区委也不只是召集集会，还向骨干发放了枪支和带铁钉棍棒。集会后，赵、陈等率暴乱队伍包围了位于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的国务院，向院内抛掷燃烧弹，抢夺卫士的枪支，乘乱向政府卫队

开枪袭击，造成卫队死伤。在几个月前的“首都革命”中，北方区委的赵世炎曾指挥暴动骨干开枪袭击执政府卫队，因此执政府卫队知道中共组织的示威队伍是混有持枪暴徒的。此时，执政府卫队被枪击后迅速开枪还击。枪战酿成了 47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是为“三一八惨案”。

第二天，国、共两党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在天安门前召再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召开国民会议宣言》和《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声称帝国主义制造了惨案，煽动民众加入反帝运动。同日，段祺瑞下令严惩凶手，抚恤死难者，通缉破坏政府和平处理危机，组织学生冲击政府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

《临时执政令》指出：“近年以来，李大钊、徐谦、易培基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武器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临时执政令执政府外交部向苏俄大使加拉罕提出了抗议，谴责苏俄以其大使馆为中心，策动暴乱。政府发布通缉令后，李大钊，徐谦等三一八事件策动者躲入苏俄大使馆，顾孟余则干脆逃去了苏俄，显示整个事件系由苏俄大使馆所策划。躲在苏俄使馆的李大钊继续指挥着全国的所谓反帝运动，指挥全国学生联合会借“三一八”死难学生出殡掀起示威高潮，指挥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的共产国际外围组织的反帝及“倒段”运动。

“三一八惨案”后，国、共两党借血案掀起了迫段政府下台的舆论攻势。两党隐瞒苏俄使馆与国共两党推动无知学生冲锋在前，地下党员躲在学生中开枪射杀政府卫士引发枪战，造成学生遇难，自己却毫发无损，安然躲入了苏俄大使馆等等事实，一边倒地谴责、栽赃政府。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人为代表的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倒段”运动。一时，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舆论战中的报人有不明真相者，但其中倒段的主力如《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是受苏俄操控的。主持《京报》邵飘萍是舆论战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成为共产国际的“特别党员”，是与李大钊一样接受苏俄指示，领取苏俄津贴的俄党。服务苏俄之外，他利用新闻敲诈，过着妻妾成群，挥金如土的生活。惨案后，邵奉命行动，主持《京报》连续发表了百余篇“三·一八惨案报道”，推出了《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在其中歪曲事实，隐瞒暴徒开枪袭击政府卫兵的事实，掩盖苏俄、共产党、国民党制造血案以图颠覆中国政府真相，刻意煽动民众攻击政府和外国人，成为“北京中心”操纵的一员舆论战线大将。

舆论战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鲁迅。“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连续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七篇谴责政府的檄文，称惨案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称“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称“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然而，在苏俄蓄意借学生的血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被披露，众多在三一八惨案后谴责北京政府的知识分子醒悟并发表谈话和文章谴责苏俄时，鲁迅沉默了。三年后，当苏俄为霸占中东铁路与中国东北军开战时，鲁迅对苏俄制造流血不置一词。国人不知道，这时的鲁迅同时与日本在沪间谍和苏俄在沪间谍往来，暗中为双面侦探内山完造传递着消息，他日记中记载的“汉堡嘉夫人”是苏俄间谍左尔格（RICHARD SORGE, РИХАРД ЗОРГЕ）的助手，[138] 他同时得到共产国际在华势力和内山完造的保护，因此当时被谴责是“与共匪互相利用”。[139]

国人不知道，中苏建交后，苏俄将其驻京大使馆办成了兵营、军火库、情报中心和颠覆活动指挥中心，成立了加拉罕领导的颠覆北京政府的“北京行动中心”，领导着大批以外交官身份来华的苏俄情报特工人员，在使馆中储藏了大量军火，其中包括 2000 支日本新式步枪，2000 支德国新式步枪和大批弹药，[140] 中共北方区委发给“首都革命”和“三一八”暴乱骨干的枪

支就来自苏俄使馆中的军火库。一年后，张作霖从苏俄北京大使馆搜出的文件显示，苏俄以庞大经费相继发动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策划了推翻张作霖的“郭松龄反奉”，以大使馆为基地策划了“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借学生和民众的血煽动颠覆民国政府。知识分子们不知道，五四运动、拥苏运动、反帝运动、“首都革命”，以及此次三一八暴乱均是苏俄所操纵，这些运动的前台领导人李大钊是听命于苏俄共产国际党员。三一八惨案后二十多年中，苏、中两共反复使用组织学生挑战政府管制底线，乘乱袭击，制造血案，再借血案展开宣传战，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的颠覆套路。

“三一八惨案”后，执政府被举国声讨，贾德耀内阁在谴责声浪中引咎总辞。随后，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发动倒段政变，率部包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通电宣布引退，仓皇逃离北京。至此，苏俄通过策动反帝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达到了推翻段执政府的预定目的。三一八惨案前，段祺瑞在国民中享有崇高声望。这不仅因为他长期坚持维护民国法统和国家主权，还因为他淡泊金钱名利的高尚人格。他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声名，各政治派系都承认他在私德方面无懈可击。宣布退出政坛后，他不像后来冯玉祥那样口头宣布上泰山读书实际为东山再起奔忙，而是真正隐退。1926年12月，天津大雪，冻死不少流浪难民，段祺瑞利用其影响力赈济灾民。与此同时，他因几万元借款而被前总统黎元洪告上法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闻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家里揭不开锅，安排了救济。这两条新闻反映了民国政府的清明。下台后的段祺瑞信守了“三一八惨案”后的终身食素誓言，在晚年身体虚弱也拒绝开荤，说“人可以死，荤不可开”，可见他对学生在执政府门外遇难之痛心。对比其后害死数千万人而无谢罪之心的革命党统治者，人们倍感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领袖群体之爱国爱民和品格高尚。可以说，若非外国势力颠覆，由段祺瑞这样爱国爱民的人执政，中国完全会更早富强。

中山舰事件

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内形成了反对投靠苏俄的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说帖。在其中指出：“窃以本党改组虽出自我总理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俄人鲍罗廷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陈与苏俄本有密切关系，其所组织之共产党为苏俄给养。……陈独秀此次之加入吾党乃有系统有组织的加入。当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是海参崴）开大会，议决利用我党之方法，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甲）则使我党从国际之仇怨；（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乃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夫此二标语实堂堂正正无可非议，然动之制为具体政纲宣示世界则我党永远获得国际上之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1924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现了中共在国民党内散发的秘密文件，其中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青团员保持独立的严密组织。[141] 对此，邓泽如指出：“共产党、共青团之决议皆属秘密的，今既为本党查得，诈谋毕露，与准其跨党之旨完全相反……彼等只知有第三国际共产党，何尝计及本党耶！”以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据此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提弹劾共产党案，声明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并发展秘密组织是颠覆国民党之举，呼吁“党内不可有党”。弹劾案被鲍罗廷领导廖仲恺、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多数否决。1925年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同盟会元老召集“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会议，披露了中共计划从内部瓦解国民党的秘密文件，冯自由等人发起成立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声明宗旨为抵制苏俄赤化国民党，要求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结束俄党包办党务，取消与共产党有关的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拒绝外国人染指本党事务。应对右派反对赤化，鲍罗廷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进一步扶植汪精卫、廖仲恺为首的左派，打压不积极

讨伐滇桂的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刺案”发生后，鲍罗廷利用事件清洗了广东帮，然后动手收党内右派，宣布将冯自由等人开除出国民党。

这时，斯大林正在部署国民党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他担心国民党“儿大不由娘”，决定在北伐前尽快安排共产党人接掌国民党的军权。1925年秋将驻广州顾问团团长加伦调往冯玉祥的国民军，派季山嘉（古比雪夫 V. V. KUYBYSHEV, KISSANGA）来广州接掌顾问团，安排共产党人接掌权力。到任后，季山嘉向国民党军的各个师、团安插中共党员作党代表，使公开的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政治部，秘密的共产党人遍布军中，并提供金钱、军火，让中共在广东发展了数十万工会、农会会员和上万装备精良的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国民党人对鲍罗廷主持国民党已经强烈不满，对季山嘉到任后推行更加激进的夺权举措忍无可忍。11月，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傖，候补委员邵元冲、沈定一（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吴稚晖等人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旁举行第四次中央执委会议（西山会议）。委员们对俄人把持国民党，在党内、军中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群情激愤，决定将会议升级为一届四中全会，作出全会决议：一、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候补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二、解除俄人顾问鲍罗廷职务；三、取消政治委员会；四、中央执委会暂移上海；五、停止广州中执委职权；六、推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傖为常务委员；七、弹劾汪精卫；八、定于1926年3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另起炉灶，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俄人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相抗衡。

应对“西山会议”派反对赤化的抗争，鲍罗廷继续贯彻“打击国民党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准备将西山会议派人士和吴稚晖、孙科为首的虽然没有参加西山会议但支持西山会议派主张的一批国民党人全部开除出

党。而负责领导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维津斯基反对将吴稚晖、孙科等有影响的国民党人开除，称可以让中共中央将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公开党员数限制在三分之一以下，说服孙科等人放弃反苏反共。鲍罗廷同意让维一试。经维津斯基操纵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上海与孙科达成妥协：陈、张承诺自我限制在国民党内的扩张；孙科等人同意出席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随着孙等人转向广州，维津斯基成功瓦解了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中央的计划。这里，孙科等人相信共产党人的自我限制承诺极为天真。因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承诺并不算数，中共须听命苏俄顾问，鲍罗廷、维津斯基须均听命莫斯科，决定政策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在担心国民党人拿了军火不听指挥，明确要求季山嘉加快夺取国民党权的步伐。根据他的指示，季山嘉在加快安排共产党人接掌国民党权力，鲍罗廷也在继续执行让左派在国民党内占绝对优势的方针，向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共党员传达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方针，指示。[142]

1926年1月1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减少国民党人对俄人主持国民党的不满，鲍罗廷安排汪精卫出面主持大会。这样的象征性安排并不能减少大会的苏俄色彩。因为，与一大（一全）一样，二大（二全）也呈一派赤化景象。会议开幕时，几架苏俄飞机在会场上空编队飞行，撒下鲍罗廷起草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传单。会场悬挂着苏俄的镰刀斧头红旗，大会按照苏俄顾问的安排高呼苏式革命口号，唱苏式革命歌曲。另外，大会反映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扩张没有“自我限制”，256名国民党代表中，公开的共产党员超过百人，还有很多代表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呈现世界政治者上绝无仅有的政党颠覆奇观。除了鲍罗廷、维津斯基和季山嘉，谁也不知道共产党渗透国民党的具体情况。国民党人虽然不知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渗透的详细情况，但清楚按照这样的渗透，国民党很快将被从内部颠覆。

大会上，鲍罗廷宣布了他决定的新一届国民党中央委 80 人名单，其中中央执行委员 36 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4 名，中央监察委员 12 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8 名。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有常务委员之名而无常务委员会之实。鲍罗廷模仿苏共政治局取代中央全会掌最高权力的模式，宣布设立常务委员会（中常会）掌党权，任命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为常委。会议通过了将“西山会议派”骨干邹鲁、谢持等人永远开除出党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发表了根据第三国际文献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有“打倒帝国主义”、“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等苏俄制定的口号。与会国民党人都清楚苏俄霸占着最多的中国领土，但无人敢于出声。

国民党二大从策划到结果均由鲍罗廷一手包办，众国民党人如同傀儡，按要求举手通过一项项让中共从内部接管党权的议案。按照维津斯基的要求，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中被限制在了三分之一以下以安抚国民党人，但中共党员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职位。多数国民党人对成为苏俄属下，党内存在一个秘密异党深为不满，反对赤化呼声没有因《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而削弱，而是更加强大。鲍罗廷感觉到了国民党人的愤怒，在会后开始主张放缓中共夺权的步伐。但顾问团长季山嘉拒绝鲍意见，并将鲍主张放缓的意见报告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加紧让共产党人夺取国民党党权、军权，不满鲍罗廷“照顾国民党人情绪”的意见，调鲍回国，让季山嘉全面接掌广州大权。鲍离粤后，季山嘉更加激进地赤化国民党，让中共更多地夺取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权力，致国民党人要求对苏决裂的呼声高涨。

从国民党一大到二大，蒋介石小心地保持中派立场。对于苏俄的面目，他是国民党内最早有清醒认识者。率团访俄归来时，他因多有批评苏俄的言论而被鲍罗廷排除出国民党领导层。他一怒离粤后，盟兄张静江晓以屈伸之理，致信孙中山力保，才回粤得任军校校长。蒋介石清楚，要想在鲍罗廷掌

控的国民党内谋得一席之地，拥苏是必须的，于是改变立场，积极表现出拥苏姿态，注意与国民党右派保持距离，成功获鲍罗廷委以军权。二大上，蒋介石获鲍罗廷任命为中委，中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在鲍罗廷离粤，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强烈要求反击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可能再维持中派面目，必须在左右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顺应绝大多数党员的呼声，反击季山嘉的压迫。他的决断不光是因为对苏俄面目的清醒认识，还因为他意识到，在苏俄安排共产党人夺权的情况下，他可能随时被抛弃，只有利用手中军权反击才能保住军权。

3月8日，蒋介石向汪精卫力陈国民党的实权不可落于外人之手，与共产国际联络应有一个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月中，西山会议派向蒋介石密报：汪精卫将蒋的建议报告给了季山嘉，季已制定了对他下手加害的计划。3月18日，中共党员、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突然率中山、宝璧两舰驶入黄埔，除去炮衣摆出开战姿态。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了李之龙及各军的中共党代表，包围了广州东山的顾问团公馆，将苏俄顾问团和苏共派来的布勃诺夫使团软禁，将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包围缴械，将第一军中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全部免职，是为“中山舰事件”（3·20事件）。

缴械工人纠察队是蒋介石早已预定的行动。苏俄引入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给社会安定和经济运行带来空前的灾难。苏俄资助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扣货、没收、阻运、封厂、捉店主、对商家敲诈勒索，煽动工人罢工，随意将厂主、地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甚至杀害，造成粤省人心惶惶，百业凋零，国民党政府的税源枯竭。赤化不仅给商人、厂主带来浩劫，也威胁到了国民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商家、社会各界和绝大多数国民党人要求打掉纠察队恶霸势力的呼声日益高涨。顺应国民党人和社会各界呼声，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蒋介石早有取缔纠察队的计划，因此借“中山舰事件”出手武力解决。

“中山舰事件”中被软禁的苏俄使团来头可不一般，是斯大林派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钦差团”。团长布勃诺夫在苏共党内地位崇高，任苏俄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团员包括苏共中央委员、远东边区区委书记库比雅克，苏俄工会领导人列普谢，红军将领隆格瓦等高级官员。使团先到哈尔滨了解了奉俄中东铁路冲突情况，再到北京听取了驻华大使加拉罕、武官叶戈罗夫，武官助理特理福诺夫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B. H. SOLOVYEV）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及鲍罗廷、广州苏俄顾问团成员尼洛夫、捷列沙托夫、切列潘诺夫等人关于广州顾问团的工作汇报，然后到张家口、包头听取了国民军苏俄顾问团的汇报，再到上海听取陈独秀关于中共的汇报，于 3 月中到达广州，没想到刚听了汪精卫的汇报即遭软禁。软禁中，布勃诺夫召开了广州苏俄顾问团会议。会上，第一军顾问斯特彼诺夫承认，中山舰的异动与苏俄顾问团有关。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布勃诺夫批评广州顾问对国民党方面发号施令，在国民党军中设立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是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这样的作法是导致事件的主要原因。他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下令苏俄顾问团立即改变作法。[143]

仍需要苏俄的支持蒋介石见好就收，采取缓和策略，通过索洛维约夫向苏俄方面表示，行动只针对季山嘉个人，而非针对苏俄，要求苏俄召回季山嘉，让鲍罗廷复任。软禁中的布勃诺夫建议苏共政治局对蒋妥协，召回华南顾问团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奥利金)等十多位顾问。索洛维约夫支持布勃诺夫的让步建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解释说：“使团决定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并召季山嘉回国是缓兵之计，以便赢得时间除掉蒋将军。……现在我们吃一点亏，作出一定的牺牲是为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过去的形势。”[144] 斯大林接受布勃诺夫和索洛维约夫的建议，决定暂且退让，将季山嘉等一批顾问撤职，指示在北京的鲍罗廷返回广州复任收拾局面。退让的同时，斯大林指示立即削减对广州国民党军的武器供应。

得知苏俄召回季山嘉的妥协决定后，蒋介石解除了对使团的软禁。3月24日，布勃诺夫召开了广州顾问团全体大会，在报告中将“中山舰事件”归因于顾问团过激，要求“只作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当晚，布勃诺夫使团携季山嘉等被撤职十多位顾问乘“列宁号”俄轮回国。斯大林制拍板决定了“党内联合”，通过共产党人从内部向国民党夺权的策略，指示鲍罗廷、加拉罕、季山嘉等实施。季等切实执行，被指过激，被撤职成了替罪羊。由“中山舰”事件开始，领袖制定的政策失败后将责任归咎执行者过激成为各国共产党领袖们诿过的惯例。

接复任命令，鲍罗廷从北京绕道海参崴乘船，于4月回到广州重新主持国民党。他发现，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赢得了国民党内的一致支持和空前声望，意识到此时犯众怒难犯，否则在广州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于是撇开左派首领汪精卫，根据布勃诺夫向国民党右派退让的意见与蒋介石单独商量事件善后，答应了蒋介石全权调动苏援物资的要求。由于李之龙的舰长职是党主席汪精卫委派，汪撇不清与李之龙和中共的关系，也难以澄清“异动事件幕后主使”的流言，被迫引咎辞国民党名义领袖职，自我放逐，宣布赴法国养病。鲍罗廷以抛弃左派领班的办法来讨好国民党右派。与鲍谈妥后，蒋介石以保护名义派兵护送汪精卫出洋。

5月15日，鲍罗廷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宣布了莫斯科向国民党右派退让的决定，然后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会议通过了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等等。为缓和国民党人的愤怒情绪，鲍罗廷在全会后再任命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使蒋介石

同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掌握了国民党大部分军、政、财权。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被免去了国民党要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受到限制。表面上，中共跟随苏俄转变政策，表示拥蒋，宣言“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陈独秀发表文章颂扬“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柱石”，但在内部，中共对在国民党内处于难堪地位不满，陈独秀通过彭述之向鲍罗廷建议，策动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各军以及新桂系军队联手消灭蒋介石指挥的第一军。[145] 武力倒蒋的建议被鲍罗廷否决后，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转变为党外联盟的建议。建议再被共产国际否决。两次意见被否，陈独秀开始厌倦傀儡领袖地位。

一党打入另一党夺权的计谋极为荒唐，在政治史上绝无仅有，违反常理和常识，其结果只能是两党决裂，中山舰异动只是国民党被迫反击的借口。中山舰事件中，《申报》、《时事新报》、《东方通讯社》等报社论称，事件可能是右派与蒋介石联手策划的反击行动。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在当时苏俄顾问要通过共产党完全夺取国民党党权军权的情况下，国民党人无路可退，反击是唯一出路，没有中山舰的异动也不难找到其它借口。蒋介石果断出手，在事件中展示了魄力和手腕，分寸把握得当，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国民党人的一致拥护。表面上，“中山舰事件”以苏俄中共、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各退一步达成妥协，蒋介石取得了对苏俄顾问团强硬抗争的胜利，但斯大林和蒋介石都清楚，妥协只是暂时策略，二人都在计划着最后利用一下对方，然后决裂并清算对方。

南口大战与党军北伐

冯玉祥下野赴苏后，苏俄顾问指挥国民军主力退守南口附近，继续执行推翻北洋政府的计划。同时，苏俄加大了援助国民军的力度。1926年5月，讨赤联军调集五十个师，分五路向南口、晋北、西安、甘肃等地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国民军撤退到绥远一线后在苏俄的强大援助之下固守。这时，奉系拥兵35万，飞机260架，军舰数十艘和奉天兵工厂；直系拥兵20多万和湖北汉阳、河南巩县两兵工厂；孙传芳拥兵20多万，控制闽、浙、苏、皖、赣等东南五省中国最富地盘。但是，直奉两系加在一起也不具备与苏俄对抗的实力。二十多万国民军名义上由总司令张之江统帅，实际由苏俄顾问直接统帅。赤化与反赤的两军在京西南口、多伦、晋北的千里战线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战。“讨赤联军”名符其实，表面是与国民军作战，实质上是在与苏俄抗争，不仅不能同时应付“南北二赤”，连对付苏俄统帅的“北赤”都实力不济，历时四个月久攻不下。

南口大战开始后，苏共政治局认为讨赤联军被国民军拖住，时机成熟，决定发动北伐战争，对“讨赤联军”发动南北夹击的总攻。根据苏共政治局的决定，鲍罗廷于1926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加伦为总顾问，将国民党各路军队改编为北伐军序列：

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介石（蒋中正），军事总顾问加伦，总参谋长李济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兼，后何应钦继任），党代表缪斌，顾问切列巴诺夫 A. Z. CHERAPANOV(ZEBROVSKY), V. A. STEPANOV;

第二军（湘军编成，辖三个师）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李富春，顾问预不罗甫斯基；

第三军（滇军编成，辖三个师）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顾问马赤意利克（G. MATSEYLIK）；

第四军（粤军编成，辖四个师）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顾问 V. GOREV, M. G. YEFREMOV（ABNALD）；

第五军（粤军编成，辖两个师）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顾问 LUNEV；

第六军（湘军为主，辖三个师）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党代表黄绍竑，顾问 N.Z.KONCHITS；

第七军（桂军编成，辖六个旅，每旅两团）军长李宗仁，顾问马迈也夫 Z. K. MAMAIV。

第八军（湘军编成，辖四个师）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顾问 F. L. OLSHEVSKY, V. GOREV。

苏俄决定国民党北伐的时机有着重要的财政原因。领导国民党击败陈炯明后，鲍罗廷将西南各省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众多革命军拥挤于广东，防区、军饷不够分配，主客籍军队矛盾日益尖锐。经过孙中山多年在粤搜刮军费，苏俄开展工农运动，纠集游民组成工农武装，对商家敲诈勒索，使粤省经济一片萧条。粤籍军人均希望客军早日北伐离粤，以减轻各路党军对粤民的搜刮。寄居广东的客军将领如湘军谭延闿、程潜，滇军朱培德均希望通过北伐打仗恢复自己的一方地盘。“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开始不信任国民党人，下令减少援助，使广州国民党当局的财政更加困窘。鲍罗廷与国民党人一致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军队与政府机构已非广东财政所能供养，须尽快离粤，以向外发展来摆脱困境。各路军党军将领也盼望通过北伐谋得一方地盘。

7月1日，鲍罗廷发布了北伐动员令和《北伐宣言》，其中称北伐的目的是消灭“讨赤联军”，武力统一中国。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孙科手捧的孙中山遗像前接受了国民政府代表谭延闿和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分别授予的印、旗，然后率十万党军兵分三路，出师北伐。配合国民党北伐，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推翻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军离粤没有减轻广东民众的苦难，而是雪上加霜。与孙中山伐桂、“援湘”、“援闽”在粤搜刮军费一样，党军北伐同样加大在粤搜刮军费的力度，强发公债千万元，下令所有军费开支均强制以两成以上的公债支付，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并增加了民间勒索的名目，让广东民众无不怀念前清和陈炯明主政搞“模范省建设”的时期。

北伐军首先从韶关攻入湖南。在剿灭西南诸省联省自治运动的同时，苏俄也要求扫除湖南的自治，于1926年春扶植唐生智发动兵变，迫走了赵恒惕，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吴佩孚抵制苏俄赤化，支持赵恒惕旧部叶开鑫回湘逐走了唐，省议会通电“迎赵复职”。离湘后，唐生智所部湘军被鲍罗廷编为了北伐军第八军。北伐军7月入湘后，第四军、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配合，击败叶开鑫占领了湖南全境，将赵恒惕逐离湖南，至此，湖南六年的自治局面结束，中国联省自治运动，连同中国人和平统一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选择被苏俄枪炮扼杀，中国被拖回了武力统一的秦制老路。

8月，吴佩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誓言“与赤化党决一死战”。23日，孙传芳在上海各大报上刊出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谓“如以外国人指挥过激党，则举国所疾，虽欲避舍而不能，如去外国人削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可商之国事。”在战场上，苏俄指挥的国民党北伐军挟飞机、大炮优势对吴、孙的讨赤军取得节节胜利，相继攻克重要据点汀泗桥、贺胜桥，于9月上旬攻占汉阳、汉口，经月余围困，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

南方的国民党开始北伐后，苏共与北赤首领冯玉祥在莫斯科签订了《军械借款密约》。密约内容为：苏俄向国民军提供总额超过 1090 万卢布的军械款，军械包括步枪数万余枝，子弹数千万发，机关枪数百挺，大炮百余尊，炮弹数万发，飞机十架；冯玉祥承认外蒙共和国，承诺将来建立政府时聘俄人任政府顾问，给予苏俄一系列在华特权。[146] 随后，苏俄派冯玉祥、新任苏俄顾问乌斯曼诺夫（SANGURSKY）、中共党员刘伯坚、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一行秘密回国，实施对“讨赤联军”南北夹击计划。9 月 17 日，冯玉祥率于右任、孙岳、方振武、史可轩、弓富魁、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徐永昌、邓宝珊、何其巩、石敬亭等国民军将领和退守绥远的五万国民军在五原（今内蒙）誓师，发布了刘伯坚起草的《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宣布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在五原成立国民党党部。躲在北京苏俄使馆中的李大钊向冯玉祥传达了自己拟定，报莫斯科批准的北伐部署：固甘援陕，联晋图豫，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北赤国民军占领西安后，苏俄在西安开办了“第二黄埔”（北方黄埔）——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命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的共产党人史可轩为校长，邓希贤(小平)为政治部主任，任命在黄埔军校受过训的共产党员刘志丹任政治教官，随后在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城市先后开办了十六所军事学校，为不久后中共在西北各地发动暴动作好了人才准备。

攻占领武汉后，南赤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军转入江西，在加伦将军指挥下分三路向南浔路各据点发起总攻，于 11 月初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南昌。北伐第一军何应钦部的两个师击败福建周荫人部。败局中，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了苏、浙、皖三省将领的军事会议，部署保卫江浙，然后北上见张作霖。在苏俄赤化中国的威胁面前，张作霖、孙传芳决定捐弃前嫌，共组安国军。12 月 1 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接受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北方十五省领袖的联名通电推戴，宣布就任安国

军总司令，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会后，张作霖发表了《反共宣言》（《张作霖宣言》），在其中表达爱国反赤立场说：“吾人不爱身家则以，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苏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安国军要拯救国民，拒绝赤化”。他决心领导各路北洋军对苏俄的赤化坚决抵抗，保卫民国政府。

12月，南赤北伐军占攻了福州，随后分东、西、中三路攻入浙江；北赤冯玉祥遥相呼应，率国民联军从陕甘向讨赤联军发起了反攻，击败刘镇华部后由潼关入陕。安国军孙传芳、张宗昌部无力抵抗党军的飞机、大炮节节败退。国民党军于1927年2月底占领了全浙，于3月占领上海、南京。安国军刘宝题、皖军陈调元、王普，湘军叶开鑫等部相继投降，北伐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安徽。至3月底，南赤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控制了整个南方，苏俄计划数年的北伐战争胜局确立。

北伐战争不是中国的内战，而是苏俄武力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与中国建交后，苏俄在广东建立军校，提供数千万元的金钱、巨量而且先进的军火扶植“南北二赤”，将它们扶植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几年中，苏俄在华肆意横行，指挥“南赤”国民党赤化中国南方，指挥“北赤”国民军赤化中国北方，将其驻北京大使馆办成了颠覆活动中心，相继策动了全国反帝运动，首都暴动，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苏俄制定的北伐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一口号声称，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是美英日等列强。然而，当时中国所受的帝国主义压迫主要来自苏俄。苏俄一面霸占满蒙，一面以发出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要求苏俄履行宣言承诺交还满蒙的底线被迫与苏建交。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欺压邻国如此猖狂的帝国主义。至于军阀，当时中国的最大的军阀不是直系、奉系，而是苏俄扶植起来的国民党军和国民军这“南北二赤”。北洋政府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因坚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中国人选择的和平统一，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走向

宪政共和之路，拒作俄国附庸成为苏俄吞并满蒙，赤化中国的阻碍，被苏俄宣传为反动政府，反动军阀。从北伐军的序列可以看出，南赤国民党军的主力都有苏俄顾问在指挥，北赤国民军同样是俄人在指挥。在北伐战争中，苏俄的军官、飞机、大炮横行中国。因此说，北伐战争是祸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战争，而张作霖领导的讨赤战争是正义战争，悲壮抵抗苏俄及国共两党仆的讨赤联军、安国军将士明知不是俄人对手而拼死一搏，称得上是人民英雄。

苏俄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准备北伐的同时，斯大林决定，在黄埔军校之外再建立一所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大学，按照苏俄模式塑造中国的未来。1925年中，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苏共将在莫斯科建立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劳动大学”，成立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招生。消息传出，各地青年踊跃报考。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录取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作文。“国民革命”是苏俄引入中国的说法。苏俄将其输入中国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其目标是推翻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中国政府和张作霖、吴佩孚，将共产主义制度推行中国。简言之，国民革命即赤化中国。苏俄在华发动国民革命的关键一步是建立以推翻中国政府为宗旨的国民革命军、国民军。因此，作文的标准答案是苏俄制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推翻反动政府”口号。当然，何谓反动的解释权在苏俄代表手中，凡在作文中提到中国主权、归还中东铁路、满蒙主权者概不能录取，只有按照苏俄要求在作文中写出“打倒反动军阀”、“推翻反动政府”要点者才能通过考试，才算符合苏俄要求的革命人才。

经过这样的考试，第一批录取了 300 名学生，其中多数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180 人来自广州，50 人来自上海，50 人来自京津。300 人中有 20 人是内定的国民党要人子弟，其中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

冯洪国，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李宗仁之弟李宗侗、内弟魏允成，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女婿屈武，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张发奎之弟张发明，邓演达之弟邓明秋，叶楚仓之子叶南。

苏共将中山大学安排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的一座俄国贵族别墅中，对外保密，不挂牌子。校园中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1925年11月7日，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主持了隆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大）开学学典礼。会场并列悬挂苏共党旗和国民党党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这时的苏俄正处于内战后的经济危机中，到处是内战废墟，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苏共为输出革命不惜血本，为学校投入一千多万卢布的巨额资金和十分紧缺的外汇，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优于苏联教师的优厚待遇，其中包括西服、大衣、皮鞋、冬装，每人每月十五卢布的生活津贴，还安排中国学生寒暑假夏令营或参观旅游等等。师生以俄文名相称，中文名互相保密。

中大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所、翻译局和中文印刷厂等三个附属机构，课程主要为：语言（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军事训练等。历史全部为党化的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等课程也是党化，即赤化的内容。军训内容主要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苏俄任命共产国际的代理人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先后安排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到中山大学演讲。1926年，苏共将十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和二十位中共旅欧支部党员送入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共要人邓小平、傅钟、李卓然。

中大开学时，苏共高层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派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斯大林控制着东方大学，托洛茨基控制着中山大学。中大校长拉狄克和多数教师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托派思想和论点主导着中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著作在校内广为流传，造就了学生中的托派群体。

“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断绝一切关系，同时严禁国民党各级组织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国民党与苏俄决裂的事变在苏共党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失败，斯大林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为要他的中国政策辩护。一时，苏共党内和中山大学内两派辩论异常激烈。不久，斯大林联手布哈林发动了反对“托季联盟斗争”，以政变的方式将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整垮，同时将中大的托派校长拉狄克流放西伯利亚，任命亲信米夫接任校长。米夫奉命在中大展开了残酷的整肃托派运动。曾发表拥护托洛茨基理论和主张的中大学生们成了审查、批斗、监禁、流放的对象、甚至被秘密处决。深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演讲影响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整肃“托派”运动中尝到了共产革命的残酷。（后来米夫自己也被以托派分子罪名枪决）。192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盛大的游行中，部分中国学生呼喊了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斯基的口号，引发流血斗殴，是为震惊了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红场事件”。斯大林借“红场事件”在苏共党内和中山大学中国学生中发动了对托派的另一波大清洗，约两百名中国学生被以托派罪名逮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另有很多中国学生从校园神秘失踪。

1928年，共产国际将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增设了一个专门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特别班（老头子班），学员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当年拥护斯大林而没有被整为托派的学生中走出了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王稼祥、沈泽民、陈昌浩、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等中共领导人。

经过革命的残酷洗礼，平安回国的中大学生们带回了苏俄的整肃经验和整人套路。例如，夏曦后来主持了“苏区肃反”，将同志几乎杀光。中大新校长米夫上台大力整肃托派，1930年底，苏共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大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却持续到了下一世纪。

蒋介石与苏俄决裂后才意识到，两年前斯大林安排国民党高层子女赴苏学习原来是操控国民党的计谋，儿子蒋经国和其它国民党要员在中大学习的子女都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质。这时的蒋经国被迫在中山大学发表谴责父亲，声言断绝父子关系的言论和文章以自保。其实，蒋经国没有从中大神秘消失不是因为他谴责父亲的表态，而是斯大林要留着他来控制蒋介石。斯大林这一招极为成功。此后十年，蒋介石为了儿子人不得受制于斯大林。蒋经国晚年在其《自述》中谴责他曾经的母校说：“苏联共产党除原有的东方大学、列宁学院及一般军事学校，收容中国左倾青年入学，受布尔塞维克的思想训练之外，并特别在莫斯科创设中山大学，专收中国学生，希图大量地训练和制造各种各式的第五纵队。俄帝对我的阴谋，可说是无孔不入的。”确如蒋经国晚年所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与黄埔军校的开办一样，是中国屈辱的一页。苏俄同时在中俄两国开办颠覆中国政府的反政府分子训练营，操纵中国的走向，服务对中国扩张和输出革命灾难，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凶恶的帝国主义了。两校学员投靠苏俄而崛起，不会对依附苏俄反中国政府的经历忏悔。

第 14 章 国民党对苏决裂

迁都之争

“中山舰事件”危机中，苏俄暂时退让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剥夺蒋介石的权力。随着国民党北伐走向胜利，鲍罗廷奉命部署剥夺蒋介石的权力。1926年12月，鲍罗廷率国民党中央机构抵达武汉，宣布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及国民党政府将迁都武汉。蒋介石清楚，斯大林在“中山舰事件”中的退让是暂时的，自己的附俄之路走到头了，决裂不可避免，决心不让鲍罗廷主宰国民党的情况重演。应对鲍罗廷成立武汉中央的夺权行动，蒋介石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留驻南昌，国民政府迁都南昌。至此，国民党分裂出了两个权力中心。

1927年初，蒋介石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致电莫斯科，要求撤换鲍罗廷。共产国际拒绝了蒋的要求。蒋介石再通电国民党中央，以改组国民党中央为同意迁都武汉的条件。鲍罗廷拒绝改组要求，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推出了旨在剥夺蒋介石军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及全会决议，在其中宣布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更换组织部长，解除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最高职务，削减北伐军总司令权力，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七人集体领导。大会推翻了一年前通过的《整理党务案》，重新承认中共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让已经辞去国民党中央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复职，要求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应对鲍罗廷继续独裁和赤化国民党的行动，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政治会议，决定清除渗透到国民党内共产党人，并在会后立即采取行动，将共产党

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捣毁。3月10日，鲍罗廷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推出了“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决定剥夺蒋党权、军权。至此，国民党内的两个权力中心公开决裂。

南京事件

出师北伐后，蒋介石对报界发表谈话说，北伐只针对北方军阀，北伐军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蒋的声明不能算数，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根据政治局决定，共产国际于1926年底召开了指挥中国革命的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推出了《中国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北伐军占领区开展反帝运动、工农运动和收回租界运动。[1] 苏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公开文件只提了开展运动，苏俄的秘密文件才显示莫斯科的真实指示。一份共产国际下达给苏俄驻北京使馆中的“北京中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俄文决议案该文件中写道：“有必要采取所有的措施激发民众反外国人.....引导外国军队干涉内政，毫不犹豫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抢劫和殴打。为煽动可广泛运用这些事件引发与欧洲军队冲突”；[2]

苏俄驻北京武官向安插在北伐军各军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发出秘密训令写道：“现时应全力调动中国的民族情绪.....利用汉口各种事件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人。.....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惨杀，亦可实行。”[3] 遵照莫斯科“暴行反帝”的秘密训令，鲍罗廷和北伐军各军党代表指挥北伐军在所到之处建立工会纠察队武装，制造针对美英日列强的排外暴行，造成外侨避迁，社会混乱。1927年1月，鲍指挥北伐军和数十万民众冲入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将英国军警赶出了租界。美、英、日赶紧增兵上海数千人以表达维护租界的决心。[4]

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和第二军政治问主任李富春立即遵照苏俄训令指挥北伐军士兵对美、英、法、意、日等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学校、医院、商店、教会烧杀抢劫。[5] 在共产党员指挥下，北伐军杀害了英国领事、美籍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 E. WILLIAMS）、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等一批传教士，强奸了百余外国妇女，将英国领事夫人轮奸至重伤，枪击并劫掠了日本领事馆，强奸了35位日本妇女，殴打了在领事馆避难的日侨，将其中5人殴致重伤，负责保卫领事馆的日军大尉荒木龟雄为未能阻止暴行而自杀，[6] 当天，列强各国派出170多艘军舰在长江及中国沿海示威。其中英、美军舰对南京北伐军进行了报复性炮击，致南京军民死伤数十人，是为中共长期掩盖真相的“南京事件”。

当晚，蒋介石派人分别向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和日本芜湖代理领事藤村表示他本人将前往南京亲自处理事件，以诚意谈判解决善后，希望日本出面调停。25日，蒋介石乘楚同舰到南京下关，在舰上召见了北伐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杨杰报告说，南京事件是军内中共党员和中共南京支部所策动。随后，蒋介石亲临南京暴乱现场处理事件，下令将肇事的第六军第三师缴械，将数十名实施暴行的士兵处决，通缉实施暴乱的第六军内的以林伯渠为首的共产党人。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澄清暴行系北伐军中的共产党人蓄意制造，目的是要挑动外国势力与北伐军火拼。他保证，南京的暴乱事件不会扩大，北伐军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国民党将组织专门委员会公开调查南京事件。

3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关于炮轰南京事件告全体男女工人、全体劳动者、劳动青年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书》，称英美开炮“是因为中国革命最近的胜利威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号召世界劳动人民“最坚决地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支持伟大的中国革命”。3月2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向日本政府电报：此

次南京抢劫事件为北伐第二军、第六军、第四十军中的共产党人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策划，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专门针对领事馆、教会、学校中的洋人。[7] 根据各方面报告，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提出：共产党策划南京事件意在引列强介入北伐达成消灭蒋的目的，日本应配合蒋介石处理南京事件。[8]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币原的意见，命令日本军舰不得参与报复行动。原本准备报复的日本舰队司令在驶回上海后自杀，留置遗书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见国人。

上海武装暴动

1922 年，共产国际建立了专门负责向远东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又称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局），任命维津斯基为局长，马林和片山潜为委员。1926 年春，为准备配合推翻北洋政府，在中国策动暴动，苏共将远东局迁到了上海，任命维津斯基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为成员。[9]随后，远东局立即着手策划暴动，计划效仿十月革命，趁国民党北伐之机抢先建立上海苏维埃政权。10 月，北伐军由鄂入赣，击败了孙传芳军，远东局下令举行暴动。由于计划泄露，暴动被孙传芳轻易的镇压。11 月 5 日，北伐军攻陷九江的消息传到上海，孙传芳后方动摇。远东局通过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等中共党员指挥收买的上海青帮发动了总同盟罢工。

1927 年 2 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远东局发动了第二次武装暴动，向罢工工人发放枪支，由中共党员指挥暴动军与上海守军与租界警方开战，造成百人死伤。因北伐军止步上海外围，远东局下令停止暴动和总同盟罢工。3 月中，国民党北伐军攻占了龙华和苏州，上海直鲁军军心动摇，鲁军全线溃败，远东局再发动了第三次暴动，指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率 3000 多工人与青帮组成的武装纠察队破坏上海各区的铁道、电线、电话线、自来水管等，然后占领警察厅，电话局，兵工厂，火车站，再武装

进攻租界。3月22日，薛岳率国民党北伐命军第一师进入上海近郊，中共武装纠察队占领市区，宣布成立上海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北伐军对峙。两天后，南京发生了北伐军暴行事件，蒋介石处理南京事件的同时严令保护上海中外商民的安全。

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指示北伐军上海总指挥白崇禧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武汉冲击租界事件和南京暴行事件在上海重演，并向报界发表声明，保证将妥善办理南京事件善后，国民党军队不会武力收回租界。白崇禧随后宣布上海戒严，武力制止任何暴力排外，收缴工会武装武器。中共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收编了直鲁军残部，势力壮大，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金钱军火扶植，拒绝接受戒严令，发表《为上海巷战告全世界工人》及《告全国工》书，要求白收回缴械命令，否则再行总同盟罢工。3月27日，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召开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检阅纠察队，按照苏俄指示提出了“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等口号，切断了进出租界的交通，推动在上海复制南京的排外暴乱。

搜查苏俄使馆

中苏建交后，苏俄将北京代表处升格为驻华大使馆，以外交官的名义派来了大批情报特工人员及军事人员，在北京大使馆内设立了以颠覆中国政府为目标的“北京中心”，下设情报、特工中心，任驻华大使加拉罕为中心首脑，领导颠覆中国政府行动。苏俄大使馆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使馆，馆内设有兵营和军火库。1925年11月，“北京中心”策动“首都革命”暴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向暴乱骨干提供枪支弹药。暴乱因冯玉祥北约溃败后，“北京中心”将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骨干、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骨干等中国政府通缉犯，连同国、共两党机关长期庇护并豢养在使馆西院兵营院内，让指挥暴乱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以大使馆为据点，继续从事颠覆活动长达一年之久。其间，李大钊负责联络“南北二赤”，策划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五原誓师，为冯玉

祥制定了出潼关、入河南，与国民党北伐军夹击讨赤联军战略计划，同时继续指挥着北京城内的颠覆政府活动。

国、共两党反政府骨干藏身苏俄大使馆在列强中是公开的秘密。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早就发现苏俄使馆内军营院中中国人频繁进出，夜间举行会议，将此情况通报给了北京政府。京师警察厅派密探扮作三轮车夫监视侦查，逮捕了帮助李大钊与外界联络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渤海（黎天才），在李供出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后将其释放。

日本反对苏俄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支持张作霖对抗苏俄赤化中国。北伐军兵进江浙时，东久迩宫亲王作为日本天皇的全权代表率土肥原贤二等人来到北京，推动北张南蒋联手反赤。土肥原将日本情报网搜集的苏俄使馆内躲藏的中共党人的名单、馆内要图提供给了张作霖，向张解释李大钊为冯玉祥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意思是与国民党北伐军汇合，“消灭奉军，饮马黑水”。此外，日本将苏俄颠覆北京政府的计划通报了列强各国，建议使团一致行动支持张作霖。[10] 各国公使商讨决定，支持北京政府搜查苏俄使馆，并向张作霖说明：虽然《辛丑条约》规定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入内，但苏俄政府以使馆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指挥中心，窝藏政府通缉犯，贮存军火，早已违反了国际法和中俄、奉俄协定，并且苏俄曾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自动不受《辛丑条约》保护，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搜查苏俄使馆。各国公使委托荷兰公使欧登科出面协助张作霖端掉苏俄使馆内的颠覆活动窝点。3月，日本方面再向张作霖通报了蒋介石将出手反赤的情报。在列强各国的支持下，张作霖决定突击搜查苏俄使馆。这时，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得知了搜查使馆计划，通告使馆内的李大钊走避。李不相信张作霖有胆动苏俄使馆，对躲避劝告置之不理。[11]

4月5日晚，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军警、宪兵强行进入苏俄使馆内军营搜查，拘捕了躲在其中的李大钊一家及六十多位共产党、国民党人及十多位俄人，搜出大批枪械、子弹。使馆人员在警察进入时正在焚烧文件，消防

队员和军警缴获了百余箱来不及销毁的秘密文件。北京警察厅派人翻译整理了这些苏俄文件。其中包括：

苏俄颠覆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计划及实施细则；

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国民党和其它组织的联系和指令记录；

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

苏俄利用冯玉祥的计划及报告；

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

《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行局、苏俄政治保卫局、苏俄红军军事情报局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等领导机构发给驻华苏俄外交与特工组织的密码电文；

苏俄政府给驻华武官训令：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此件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二分之一，其译文为：“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即遵照办理可也。①现时应全力注意增长中国革命运动之国民性质，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以国民党为中国国民独立党，而为有利国民党之宣传，应扩大利用汉口各种事件，及英国对于各该事件之态度，资为证据。第一可以证明国民党国民工作之进步。第二可以证明欧洲各国对于中国革命战鬪力之显然的薄弱。②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③破坏张作霖之威信，宣传张氏为国际间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妨害中国国民党自由工作之受雇者。④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以下被焚）。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

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⑥现时应暂缓实行共产党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霖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本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霖失败以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国民党内，暂行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本阶级亦应保留。⑦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于一切运动之中，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但于激动排外风潮之时，将日本除外，殊足以引起不愉快之观感。故实行激动排外风潮时，必须假托反对不列颠（英国）运动之名义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导人员（以下被焚）”； [12]

《苏俄在华密探局组织法》及《苏俄在华特务组织系统表》：苏俄在华设有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 [13]

《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预算为：（1）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共中央军事指导人员经费50,000元；（2）资助冯玉祥国民军反奉经费共美金148,830元；（3）国民军第二、三军（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4）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除广东外，总计半年预算即为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100万元；

《蒋介石、冯玉祥向苏俄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俄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此项清单系从燃烧中抢出），其中冯玉祥与苏俄的军械借款协定总额为1090万卢布；

《援助国民党北伐军的财务清单》；

《北京中心在华特工组织的工作指南》等等。

4月9日，苏俄代理外交委员长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称北京政府侵犯了苏俄使馆人员的治外法权，搜查使馆事件系帝国主义的挑拨行动，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工具，要求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释放所拘俄使馆馆员，交还使馆文件，称否则或引发战争，称苏拟撤回驻北京外交人员，苏俄政府决不屈服任何人之挑衅。此外，苏俄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组织了抗议中国政府搜查使馆的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外交部驳回苏俄抗议说：使馆不得利用治外法权暗藏军火，容留反政府组织和政府通缉犯，不得成为助长所驻国内乱的机关。此次搜查并未包括使馆，仅限于使馆附属房屋。在苏俄使馆附属房屋内查出的军火、宣传物品和反政府党人足以证明苏俄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苏俄所提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被中国驳回抗议后，苏俄召回了驻京代表赤尔尼率领馆员二十余人，宣布断交。

张作霖不仅拒绝苏俄的抗议，还批准将部分从苏俄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供中外人士参观，分十批陆续公诸报端，以行动表明了坚决讨赤的立场。苏俄大使馆的文件被报纸披露后，国人为苏俄颠覆中国政府计划之周密，对中国政局分析之精到、安插密探之多、动用金钱数额之庞大震惊，各界纷纷谴责苏俄以金钱武器操纵国、共两党推翻北京政府的罪恶。对于中国舆论的谴责，苏俄派外长李维诺夫称中国政府搜获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的文件系伪造。

不久，北京政府将从苏俄使馆搜查到的机密文件内容翻译编辑成百万字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该书的《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章显示，苏俄一手建立、训练及装备了国民党军；苏俄操纵国民党北伐军推翻北京政府；苏俄提供金钱策动了所谓反帝运动；苏俄提供了中

共经费的全部和国民党经费的大部；苏俄用于扶植中共和国国民党的经费和运来的军火数额极其巨大，足以击败中国的政府军，颠覆中国的政府。搜出的苏俄文件内容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是如何走上革命轨道的。查获文件中的一封莫斯科给鲍罗廷的电报暴露苏俄策划北伐，在中国制造祸乱的目的是为了自身安全。该电报：“我们的人帮助南方军队北伐，但却不能让南方军队占领全国；我们的目的，是要用这一个军事行动，来牵制其他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来打苏联。”[14] 张作霖将苏俄秘密文件公之于众后，斯大林主持苏共政治局下达了“除掉中国满洲地区的独裁者、反苏反共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的命令。8月初，苏俄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局特工站站长 K.萨尔嫩接到了暗杀张作霖的密令，开始行动。[15] 由于张作霖公布的苏俄机密文件暴露了国民党、共产党的受外国扶植起家的老底，两党均惧怕《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流传，国民党攻占北京后立即下令停止公布苏俄文件，国、共两党联手将《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全部销毁（据说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该书的存世孤本）。

逮捕李大钊等俄党后，张作霖面临如何处置的难题。审讯中，李大钊对服务苏俄，为苏俄从事谍报活动，领导共产党、国民党颠覆政府，奉苏俄之命策反郭松龄、冯玉祥等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态度上十分配合与坦白。（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当年的《李大钊供词》原件，但供词内容至今被禁止公布）中共推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等名人出面说情营救，策动北京教育界和政界发起了呼吁宽大处理的请愿活动。一向尊师重教的张作霖犯了难，认为像李大钊这样替洋人作内应的汉奸罪当处死，但又不想背杀教授的恶名。于是，他特致电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张学良等安国军主要将领征询对李大钊的处置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高级将领一致主张“将俄奸、赤匪李大钊立即正法”。当时报纸刊载的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赤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在讨赤联军将士一致表态后，张作霖批准以里通外国罪判李大钊死刑。李大钊表示接受判决，提出愿接受绞刑而不愿被枪决。张作霖同意了李的最后请求，批示拨款特为李进口

了绞刑架。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俄党被处绞刑，另有十四位被判徒刑。之后，中共地下组织发起将李大钊出殡办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并打出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的挽联。李的北大同事们发起了募捐厚葬。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梁漱溟、马叙伦、李四光、鲁迅，国民党要人汪精卫、陈公博、戴季陶等参加捐款。[16]

李大钊的十年红色生涯代表着苏俄对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代表苏俄赤化中国的祸害。十年中，苏俄背信弃义，霸占中国领土，将蒙古分离出了中国，将中国推入战火和内乱，李大钊接受苏俄的金钱，在北大成立了无数组织团体，办了无数刊物，组织了学生南下演讲团，领导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指挥学生实施暴行，领导了工人运动，拥苏运动，促无条件与苏建交运动，替苏俄联络孙中山、吴佩孚，领导了二七大罢工、全国性的国民会议运动，策动了冯玉祥政变、郭松龄反奉，领导了“首都革命”暴乱，策划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在政府通缉后举家藏身苏俄大使馆，继续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策反阎锡山脱离讨赤阵营，策动冯玉祥、阎锡山夹攻北洋政府。十年间，李大钊充当了苏俄颠覆中国的工具，一派苏俄论调地宣称“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17] 张作霖指李为汉奸没有错，北京政府对李的判决属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北大同仁们厚葬的是学者、思想者李大钊，而中共地下组织发起厚葬的是苏俄特工李大钊。

中共后在纪念、歌颂李大钊时称李之从容赴死是坚信共产主义，多年后将判处李大钊死刑的民国法官王振南以反革命罪处死报复。其实，李大钊在临刑前曾向密友吐露对共产革命的怀疑说：“循着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18] 这句将死之言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作了苏俄特工后欲罢不能的内心冲突。因为他知道，走上附俄道路后已经不能回头作回独立学者了。或许，他的内心冲突已经发展至幻灭，以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服从判决，从容赴死来寻求解脱。

四一二事变

北伐开始后，斯大林命鲍罗廷加紧剥夺蒋介石军权的部署，蒋介石预感摊牌迫近，开始为对苏决裂作准备，秘密派人向日本传话，谓“不久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尚祈关照”，[19] 派唐生智与张作霖代表杨宇霆接触。日本反对苏俄赤化中国建立亲苏政府，积极推动蒋介石对苏决裂。在北伐军向北推进的同时，日蒋双方频繁接触：1926年11月，日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了蒋介石；12月，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派铃木贞一到九江见蒋介石；[20] 1927年初，币原外相派其亲信、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会见了分裂两派的国民党要人，再到南昌会见了蒋介石；[21] 蒋介石派吴铁城秘密赴日会见日本朝野要人，[22] 双方达成了联手阻止苏俄赤化中国，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共识。

南京事件中，英美军舰炮击南京报复北伐军暴行，日本命令日舰不得采取报复行动。蒋介石在自安庆赴南京途中得讯，立即派黄郛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了沟通，向日方通报共产党制造事件的真相，重申他严禁排外的立场，保证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暴乱。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认为，共产党在南京实施暴行是欲使蒋介石垮台的政治阴谋，采取强硬措施等于帮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蒋的权力，建议温和处理，配合蒋介石，各国联手挫败苏俄赤化中国计划（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币原外交”）。接受币原外相的建议，日本政府决定不采取武力报复行动，支持蒋介石处理事件，推动国民党对苏俄决裂。根据日本政府的决定，币原外相训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循外交途径解决南京事件。在南京事件后的北京公使团商量应对排外暴行的会议上，英国主张武力报复兼经济制裁，币原强调日本相信蒋介石能够制止1900年那样的排外暴行，劝说英、美放弃武力报复，配合蒋氏处理事件。[23] 他解释说，如果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使蒋介石垮台，这正是苏俄所希望的结果，目前，国民党内部已出现追随苏俄与脱离苏俄的两派分裂，各国

一致行动支持蒋介石解决南京事件才不致落入苏俄与共产党的圈套。他建议国向蒋承诺将支持反共新政权以推动蒋介石与苏俄决裂。

币原外相的建议与美国政府的立场不谋而合。通过中山舰事件，美国相信蒋介石持反共立场。南京事件后，美国政府主张放弃对北伐军武力报复，而敦促蒋介石镇压各地的工人武装，等待国民党转向。英国政府接受了币原的劝告，奉行与美、日一致的政策。于是，北京公使团会议决定，放弃对国民党北伐的联合干涉，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排外暴行，调查南京事件，惩办肇事暴徒，支持蒋介石控制局势。莫斯科对没有引爆列强的联合武装干涉感到失望，对各国支持蒋介石控制局势感到紧张，加紧部署“去蒋”。根据指示，鲍罗廷召蒋赴宁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准备调虎离山实施逮捕。

列强各国的分化政策见效，大多数国民党人呼吁蒋介石出手结束鲍罗廷掌控国民党的局面。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右派主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提出的《护党救国案》，要求立即清除党内、军中的共产党。4月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宁案（南京事件）必须获得完全满意之解决”，推动国民党下决心对苏决裂。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再开紧急会议，会议主席蔡元培出示了监察委员整理的《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和《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的罪状》等文件。会议列出了国民党中央中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名单，通过了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等委员联名提出的《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要求立即“清共”。当晚，黄郛再晤矢田领事，向日本方面转达了蒋介石对币原政策“充分理解”的立场，通报了“目前正在招集将领反复计议，俟准备完成后即付诸实行，四五天之内可见分晓；与共产派分离问题解决后立即着手解决南京事件”。日本方面立即将蒋的通报透露给了张作霖，促张下决心搜查苏俄使馆。

在日、美、英积极推动蒋介石与苏俄决裂的同时，苏俄则加紧制造针对美英日的排外暴行，希望挑起三强出兵与蒋介石开战的局面。根据苏俄的指示，刘少奇指挥武汉共产党人于4月3日在汉口逮捕日商和日本水兵，攻击日侨，引致日水兵登岸开枪报复，事件造成数十华人、日人死伤，是为“四三事件”。4月4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日集会，要求日本水兵撤离，接管日人的工厂、商店。在武汉，鲍罗廷指挥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冀“以汪压蒋”。4月5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与陈独秀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汪陈联合宣言》）。宣言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汪精卫承诺国民党不会制裁党内共产党人的联合宣言遭到国、共党人的一致谴责。国民党人谴责汪精卫亲共附苏；在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宣言被指责为是右倾投降主义，成了陈在不久后被罢免总书记时的罪状。4月5日夜，北京政府军警端掉了苏俄大使馆中的颠覆指挥中心。张作霖立即将搜出的部分文件公诸报端。这些苏俄文件清楚显示，苏俄指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实施针对美英日人的暴行，指示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展开对国民党右派斗争，计划操纵国民党北伐军推翻北京政府，让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部夺取领导权，清除蒋介石为首的所谓国民党反动派。一时，全国舆论在谴责苏俄的同时，强烈谴责国民党和北伐军充当苏俄赤化中国的帮凶。

4月7日，一批长期以来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员发表联名宣言，谴责赤化说：“中国共产党受卢布之豢养，奉第三国际之命令，叫嚣隳突，向为国人所不齿。及民国十一年秋，共产党徒陈独秀等声称愿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信仰本党主义，谨守本党党纲，服从本党纪律，本党总理素抱既往不咎与人为善之怀予以容纳。彼等寄生其中，渐形滋蔓，置本党之主义党纲纪律于不顾，仍惟卢布之豢养是重，惟第三国际之命令是遵，破坏本党之言论举动，层见叠出。各地同志及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力主曲突徙薪，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加以严重之训令，彼辈犹怙恶不悛。……同人根据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之付托，奔走呼号，不敢告劳，特胪列共产党破坏本党破坏国家破坏社会之罪状如左：

破坏本党之罪状：共党分子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自有忠于本党之责任。而彼辈何如者，其对于主义也，既借口民族自决，世界革命，以破坏民族主义；借口无产专制，以破坏民权主义；借口阶级战争，以破坏民生主义.....

破坏国家之罪状：.....共产党辄唱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须服从第三国际指挥，苏俄是工人的祖国，列宁是我们革命的导师，世界革命成功万岁，鲍罗庭万岁，种种口号标语，缘之而起.....

破坏社会之罪状：.....共产党以打倒知识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为幌，拆散知识阶级资产阶级与农工联合之阵线，复以该党之流氓地痞，把持总工会，农民协会，擅设纠察队劫制羣众，任意骚扰，任意拘捕，任意鞭挞，任意杀戮，任意牵缚游街，任意没收货物，任意敲诈商民，任意压迫自由，贿赂公行，睚眦必报，有绅皆劣，无土不豪，而真正农夫工人，田不得佃，工不得作，复困之以会金月捐，重足侧目，誓与偕亡。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偶尔取缔，则诬为摧残农工，鼓动罢业，以致交通阻塞，商肆停闭，物价飞腾，金融枯竭，军饷拮据，庠序鞠茂草，礼义廉耻荡然无存，革命军甫临上海，各界喁喁待治，及共产党挟伪市民政府与武装纠察队以横行，布流言蜚语以恫吓，租界如遇大敌，市民顿现恐慌。长此以往，固有生产，胥将废辍陵夷，更无产之可共。而乃招摇于众曰共产共产，是不啻先掠人之饼为已有 而画饼以充人之饥也。”[24] 实际情况确如宣言所指，北伐战争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祸害。随着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区扩大，苏俄策动的工人运动、工人武装在各大城市蔓延，总工会和纠察队成了各地恶霸，所谓工人运动就是鼓动工人不干活，结成工人武装敲诈勒索，随意以“工贼”、“反革命”罪名杀人。在工人运动兴起的城市，工会漫天要价地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仅工会向东主勒索一项就令业主难以生存，迫使老板逃亡或自杀。例如，有店员工会章程

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三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四个月，最长者可达五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工资还要加倍；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之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三至四倍，即原有薪水不足 20 元者应加至 120 元，不足 30 元者加至 140 元；不足 40 元者加至 160 元。[25] 共产党在各地鼓动成立的工会大多如此。逼迫店东增加工资十多倍的工人运动对各地经济和民生的摧残是毁灭性的。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租界交通断绝，日侨撤退，工厂、商家关门，万余武汉工人失业。社会各界对苏俄引入的恐怖工人运动深恶痛绝，一致盼望取缔工人武装以拯救社会与经济。

4 月 9 日，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再次联名发表“救党护国”的长篇通电，痛斥苏俄引入中国的工农运动敲诈勒索、暴力剥夺、杀人放火，斥武汉国民党中央是俄人傀儡，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纓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4 月 11 日，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分别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和蒋介石递交了不设时限的《宁案通牒》，要求“惩凶”及“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保证将来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赔偿损失，否则将采取行动。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清楚与苏俄的决裂不可避免，等待着决裂的时机。苏俄使馆秘密文件见报后，他决定对苏决裂，分别向美、英、日等列强，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征询意见，得到各方的支持表态。4 月 12 日，蒋介石在南京下达了武力清共命令，命令以武力解散各地的中共武装工人纠察队，宣布取消鲍罗廷主宰的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成立负责清查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的清查委员会，取缔共产党。当天，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的国民党军同时行动，取缔中共组织，将工

人纠察队、农民武装缴械，解散，将一大批中共领袖、共产党员、工会骨干处决，是为“四一二事变”。在上海，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为免受到“军队镇压民众”的谴责，请上海青红帮出面查封纠察队各据点，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4月13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白崇禧下令武力驱散，将工人纠察队武装残余缴械。在广东，第四军军长兼总参谋长李济琛与古应芬、李福林、陈孚太、邓彦华组织特别委员会，任钱大钧为戒严司令，派海陆军包围了黄埔军官学校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钢铁工会、海员工会、河南驳载工会、酒楼茶室工会等中共下属机关，击败粤省各地的工会纠察队、农团军，封闭工会机关两百余处，拘捕共产党人两百多人。汕头国民党军同时行动，将共产党广东农军总指挥罗绮园及各路指挥彭湃、龚楚等领导的，作恶多端的农会武装缴械，粉碎了彭湃举行暴动及建立广东苏维埃的计划。随着各地工会，工人武装恶霸被打掉，工农武装为所欲为乱捕路人，随意敲诈勒索商家和杀人情况被制止，恐怖局面结束，各界和民众拍手称快，经济生活迅速恢复正常。

梁启超记录从苏俄引入“工运”、“农运”、“土地革命”到四一二事变写道：“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即俄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俄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真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共产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糊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26]

得到社会各界一致拥护的四一二事变标志国民党对苏俄决裂，不再作苏俄傀儡和赤化帮凶，标志斯大林通过扶持国民党北伐建立中国傀儡政府计划的失败。莫斯科、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武汉中央和中共对四一二事变深恶痛绝，称事变为反革命事变，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称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工人阶级及共产国际的敌人。五月一日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各自举行五一游行，谴责中国国民党叛变革命。

国、共两党所谓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过是苏俄出钱出枪祸乱中国的“赤化”过程，即“斯大林的中国战略”。这一“大革命”扼杀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走向宪政，联省自治的进程。几年前，陈炯明拒作俄人附庸，拒绝祸害家乡，被国民党称为叛变革命；“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也因拒作苏俄傀儡被称为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具有外国操纵性质和祸害中国性质，站在苏俄立场的所谓的反革命正是站在中国立场的正义和爱国。共产国际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局是专门从事策动暴动和颠覆中国政府活动的机关。“四一二事变”迫使它暂停颠覆活动，这从侧面证明了“四一二事变”的正义性。

在“四一二事变”一周前，斯大林在的一篇讲话中把蒋介石比喻为一匹仍有利用的价值的老马，可以利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完这些人后就可以将他们“像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但他没有想到，他发表这篇讲话的当晚，张作霖搜查了苏俄驻北京使馆，使他“用完蒋介石后挤碎、扔掉”的

计划曝光，蒋介石跟着动手清共。四一二事变后，苏俄立即下令销毁斯大林这篇露骨的讲话。1935年夏，旅居巴黎的著名美国记者伊罗生（H·R·ISAACS）在查阅共产国际的简报《国际新闻通讯》时发现缺少了刊有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讲话的一期。于是他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寻找，那里恰好也缺少了这一期。回到美国后，他有幸从美国共产党那里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其中的那篇斯大林的讲话还是被剪掉了。他锲而不舍，终于从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处找到了刊有斯大林那篇讲话的通讯。这篇被斯大林严令销毁的讲话最好地诠释了革命党斗争术，也是了解中国四一二事变来龙去脉的重要资料。一年前，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果断出手反击，避免了自己被季山嘉清算。这一次蒋介石不上鲍罗廷调虎离山的当，果断出手“清共”，再次避免了自己被斯大林清算。

四一二事变后，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和英国外务大臣张伯伦分别表示，造成南京事件的共产党已受到中国政府的处罚，“宁案通牒”的要求已经达到。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就南京事件向美、英、日、法、意等国道歉，并分别达成赔偿协议，其中，中日间的赔偿协议于1931年4月换文，中国政府为南京事件（宁案）赔偿日方官民损失75万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与武汉政府抗衡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上，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予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至此，国民党分裂为汉、宁两个中央和两个政府。成立仪式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宣告南京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清共后的国民党仍不能摆脱俄党色彩，在宣言仍重复“打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等苏俄制定的口号。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会议通过了决议，取消广州“二大”作出的“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恢复邹鲁等人党籍（此后，“永远开除”后再“撤销开除”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传统）。作为清党行动的配合步骤，会议宣布国民党开始党员重新登记，

要求所有党员须接受三个月的调查，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

南京政府成立后发布了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罗亦农、于树德、张国焘、高语罕、李立三、瞿秋白、侯绍裘、林彪、周恩来、郭沫若、章伯钧、陈启修、詹大悲、李汉俊、方志敏、彭述之、沈雁冰、施存统、张太雷、邓颖超等 197 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要人。应对国民党对苏决裂，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四十位俄党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

南京政府成立后，列强各国立即宣布与武汉政府断绝关系，与南京方面建立外交关系。蒋介石、蔡元培等人电请汪精卫来南京加入国民政府。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通电拒绝，谴责“蒋介石反共、反革命”，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下令讨伐蒋介石。这时，列强各国在武汉江上集结了数十艘军舰，明确表达出为制止第二次义和团排外暴乱不惜一战的决心。为了武汉政府的存续，鲍罗廷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战略退却”，改口宣布保护外人商业财产，设法缓和管制区内因开展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而造成的经济崩溃和政府财政危机。苏共中央批准了鲍的“战略退却”建议，变相承认了北伐以来推行的反帝排外、到外建立工农武装、唆使工农武装为所欲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

阎锡山易帜与安国军政府成立

张作霖在审判李大钊时还不知道，策反吴佩孚、冯玉祥、郭松龄之外，李大钊躲在苏俄使馆期间还奉北京中心之命负责策动阎锡山脱离“讨赤联军”阵营。1926 年底，李在中共内部报告中说：“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27] 他在致阎的策反信

中写道：“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28] 随着北伐军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善于趋利避害的阎锡山看清了国民党的胜利前景，决定接受李大钊的策反，脱离讨赤阵营，派代表南下与蒋介石联系，表达转投意向。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4月初，阎锡山收到张作霖就如何判决李大钊的征询意见函，沉默不复，准备着易帜反张。6月6日，阎锡山宣布率军加入国民党，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给了讨赤阵营沉重一击。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代理政府元首，发表“讨赤”通电说：“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安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以为友。惟对于赤祸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讨奉。随着阎倒戈，安国军战线开始崩溃。

第 15 章 工农运动

苏俄引入土地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苏共采取强迫农民迁徙的办法来消灭富农，以暴力胁迫，将富农及其家属迁徙到生存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苏俄在迁徙过程往往长达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数十万人在迁徙途中因食宿条件恶劣冻饿而死。抵达目的地的富农及家属也多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而大批死亡。在剥夺富农私有土地和财产的过程中，全苏发生了上千次农民起义，暴动农民杀害了数千苏俄党政人员，十倍、百倍的起义农民被苏共军队屠杀。通过暴力剥夺和强迫迁徙，苏俄基本消灭了富农阶级。

1920 年，苏俄建立了中共，计划将苏俄的暴力剥夺地主财产的土地革命引入中国。1924 年，苏俄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开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传统中国乡村由地主乡绅、农民和游民等三大社会成分构成。地主乡绅承担着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财源的责任，是乡村的领袖；游民（包括地痞流氓、二流子）无产、无业、无责任心，为农民和地主所不齿，在乡村中没有地位，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乡村治理。苏俄土地革命培训的要点鼓吹讲阶级斗争，要求将农村秩序颠倒过来，以农村游民为革命先锋和农民运动骨干，唆使农民暴力剥夺地主乡绅的财产甚至生命。正经的中国农民信奉劳动致富，不愿意学杀人夺财，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学员中没有正经农民，而是以无产、无业、无责任心的小知识分子，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内容包括组织学员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教材内容包括杀人放火的各种教唆。例如，“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

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街，甚至打死”，“十六，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如万不得以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地民众搬迁一空，俟敌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十四，敌人来到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凡暴动胜利地方，各种书籍，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1]

1925年，苏俄在赤化的广东首先发动了暴力剥夺地主财产的农民运动，建立了遍布全省的农民协会、农民武装。1926年3月，随着北伐军入湘驱逐省长赵恒惕，中共在湖南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了会员数十万。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随着“南北二赤”控制区域扩大，农民协会组织遍及粤、湘、鄂、赣、皖、陕、闽、川、豫、浙、苏、直、鲁、桂、热、察、绥等十七省，苏俄引入的所谓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蔓延全国。

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通常套路为：共产党派经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的党员干部到乡村，召集最贫困的游民，以“农民一年到头劳动缺吃少穿；地主不劳动却坐轿子，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等说法煽动游民抢夺地主的财产。这样的革命教唆容易打动仇富的游民。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正经农民都害怕或不愿出头，而痞子们在农运干部的唆、指使成了打头阵的“革命先锋”，冲进地主士绅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随着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加入的农民也越来越多，农会势力越来越大，正经的农民也被迫加入协会，越来越的人抛弃善良。最后，农民协会随意剥夺地主的土地及其它财产，将他们及家人游街、驱逐、关押甚至杀害。被剥夺、迫害的地主士绅当然会起来反抗，组织武装以暴抗暴。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自在和谐，地主士绅与农民和睦共处，彼此依赖不存在阶级仇恨与你死我活的斗争。苏俄引入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颠覆传统的乡村秩序，制造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仇杀，将平静的乡村变成冤冤相报的仇恨之乡，暴力横行的赤色恐怖世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游民造反莫不造成赤地千里。梁启超评论这一次游民为主力的农民运动说：“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于非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齷齪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想走好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2]

苏俄不光引入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而且直接操纵着中国的农民运动。广东的农运由共产国际驻广东的代表直接操纵，湖南的农民运动由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直接操纵。1927年3月，共产国际召集湘、粤、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和河南武装自卫军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办公处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十三人为委员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是苏俄引入中国的概念和产物，成立执委会是苏俄代表的主意，农民运动背后是苏俄的操纵之手。以湖南为例，湘潭、平江、衡阳等十余县均成立了自卫军，农会武装的绝大部分枪支是苏俄领事馆所发放，只有一小部分是团防局夺取。在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的操纵和资助之下，湖南农会组织由1927年1月的200万会员激增至4月底的500多万。

彭湃、毛泽东这两位苏俄顾问选定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分别领导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这两地的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的缩影。这样的农民运动带来的是一片焦土。从“国民革命”中的土地革命，到苏区土地革命，到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到中共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到人民公社运动，再到文革红卫兵运动，苏俄引入中国赤色革命祸害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半个多世纪，给中国留下了最残酷血腥的记录。

湖南农民运动

北伐军入湘后，中共按照共产国际中国决议案的要求，在全省开展农民运动，以“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相煽动，指挥农会、农军将地主指为土豪劣绅，没收土地、剥夺其它财产、戴高帽游街、逮捕送监甚至杀害，以及烧屋分地，强奸地主妻女。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介按照列宁的经验培训中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1927年1月，毛泽东回乡指导运动，指挥利用农村的地痞流氓开展农民运动。他记录农运情况写道：“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现在有了权，任意给人定罪.....将地主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表态支持这种颠覆农村秩序的运动，下令将中共湖南省委为约束暴力而逮捕的杀人者全部释放。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戴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他从这样折磨人手段中“觉到一种从未有的痛快”，盛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好得很！”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其中为农会的烧杀抢掠叫好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痞子是最革命的，是革命先锋，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他要求“有农民运动的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相乡一县有十万枝。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在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极端口号。在他的推动和苏俄驻长沙的领事馆提供资金支持下，湖南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了两百多万人，农会暴虐从乡村蔓延到县城，最后发展至到省城长沙屠杀，全省各地暴力猖獗，村庄被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遍地焦土、尸体。很多地方把拥有田地稍多者，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作土豪劣绅镇压，在开大会时不问姓名地带高帽游街，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或用梭镖刺死。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照搬湖南农民运动经验，也大张旗鼓地鼓动杀人。

4月，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易（M.N.ROY）来华，传达斯大林指示，要求将农民运动进一步升温。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据罗易和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的指示组织几万人农会武装向长沙进攻。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已经过激，指示湖南省委停止进攻长沙，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称“湖南农运不是我们领导的，而是地痞与哥老会所领导”。中共的另一领导人瞿秋白也批评农民运动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罗易否决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消极，否决了我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斯大林、布哈林严厉批评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是在对抗共产国际决议，赞扬主张暴力的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表态，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表了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

体现共产革命精髓和游民精神的暴力土地革命需要依靠游民，或曰痞子，日本人策划的辛亥革命依靠这些人组成的会党，苏俄策划的土地革命也依靠这些人。中外革命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大都与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一样，从思想到行为属于游民群体。有产者、乡绅和正经农民必然反对杀人夺财的暴力革命，而游民缺乏是非准则、道德底线和同情心，心怀对社会的仇恨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野心，不会因杀人夺财而感到良心谴责。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毕生崇尚血腥、暴力，杀人夺财害死人民数以千万计。不仅他如此，他提拔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门生李井泉和吴芝圃后来也成为害死人最多的地方官员。毛泽东代表的痞子农民运动带给中国史无前例的灾难。多年后，他发动文革，将痞子横行的理想世界复制到了全中国。在策划文革时，他坚持痞子最革命的观点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3] 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成了红卫兵实施暴行的教材。多年后到韶山参拜毛泽东故居者或许不知，那所地主大宅是毛泽东在湖南农运中一面鼓动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一面采取措施保护自家宅子才得以留存下来的。这种保护自家，滥杀他人的作法最好地展现了痞子没有道德底线的特点。

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2年，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彭湃投身共产革命，在海丰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宣布与地主家族决裂，把自家的田契、铺约拿出来当众烧毁，被佃农称为“彭菩萨”。[4] 1924年，苏俄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鲍罗廷任命彭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首任所长。

1927年，接受了苏俄培训的彭湃回到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按照莫斯科制定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引鼓动农民杀人说：“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杀个干净；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士兵的家庭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列宁的法律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5] 中国的土匪历来有“交投名状”入伙的规矩，“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6] 彭湃同样规矩，要求加入农会者“大杀特杀土豪劣绅，杀他个干干净净”。[7] 按他的要求，农会杀人不是一刀下去就算，而是残酷虐死，将地主和被指为的反革命者大卸八块，烹煮吃掉，其残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土匪。“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锯成一块一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被卷入农民运动者因参与了杀人放火而恐惧复辟。海陆丰苏维埃要求以更严厉的红色恐怖来防止复辟，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处决随意指认的反革命，把砍下的人头穿绳挂在讲台，让人们习惯恐怖，要求农民参与屠杀和吃人以鉴别谁是中立和有保留的，将拒绝吃受害者心肝者斥为假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恐怖训练，赤卫队员们习惯了执

行杀人任务。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 100 多位农民。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他的父亲和兄弟被逼亲临刑场，参与杀害，再被逼迫食自己兄弟或儿子、父亲的肉。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就这样成功煽动起了阶级仇恨。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8]

8 月，共产国际召开“八七会议”，指示中共“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在其中要求“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派”、“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根据中央大纲，彭湃提出“起义纲领”为：“籍国民党者杀，反土地革命者杀，曾任文武官员者杀，曾充民团警兵者杀，曾充反动政府差役者杀，一切土豪劣绅者杀，讨债讨租者杀，还债还租者杀，藏匿契据者杀，立妾蓄婢者杀，不服兵役者杀，当堪輿命卜者杀，当巫婆媒婆者杀，吸鸦片者杀，盲目者杀，麻风者杀，残废者杀，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信仰一切宗教者杀。”[9]

11 月初，彭湃率领农民武装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11 月 7 日，农会按共产国际规定开大会庆祝苏俄国庆。会场布置为一片红色，悬马克思、列宁像，“在开会前先枪决八九个反动派.....在会场焚毁田契多达十余担”。[10] 彭湃在会上宣布，建立以莫斯科为“赤都”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将城中心的孔庙更名为有俄式花俏大门的“小莫斯科红宫”，东面广场命名为“小红场”，宣布建立苏俄模式的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等组织，颁布海陆丰苏维埃的《没收土地案》和《杀尽反动派案》。他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反动的就杀，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掉”，“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彭湃不愧为苏俄教官的好学生，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教唆发挥得登峰造极。他效法张献忠发布“七杀令”的

作法，在《海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凡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以及侦探、宣传员、警察、保安队、通信员与在敌各机关办事者，一律拿着枪决，[11] 要求每位海丰苏维埃代表完成杀二十人的指标，下令将一些未按时缴地契的农民和执行烧杀政策“不坚定”的农运干部杀掉，然后组织农会会员们一起吃人肉心肝。在这样的农民运动中，苏维埃政权将“小红场”变成了屠宰场，地主和所谓反革命被割头剖腹，直杀得“在海陆丰境内没有了豪绅地主的踪影”。[12]

投身共产革命前曾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的书生彭湃经苏俄培训后变成了杀人狂，领导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这时农民们才知道，投身革命后回乡的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布哈林在 12 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13] 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

1928 年，彭湃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军“清共”行动中被消灭。然而，杀人农运造成的仇恨无法消除。四十年后，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运动复仇，按照当年农运的办法，将彭湃的儿子彭洪、侄儿彭科、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一众亲属，以及当年杀人魔王的后代百余人杀害，按当年农会的作法，将彭湃亲属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残酷殴打了将 800 多当年农民运动中的杀人者和他们亲属、后人，将其中不少人打成残废，对数千彭湃亲属、战友及其后代展开血腥迫害。[14] 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共产党人当然不承认革命的祸害，文革后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这种说法显然自欺欺人。

如今，中共将当年的“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中立了彭湃的汉白玉雕像，在旁边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们到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像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无数革命纪念馆中一样，“红宫”纪念馆隐瞒当年农会杀人、吃人的革命罪恶，把“彭魔王”宣传成了“彭菩萨”。

夏斗寅兵变与马日事变

杀人放火的土地革命引起全国各界、国民党和北伐军将领的一致反对。中共领袖陈独秀感到了北伐军将领们的不满情绪，主张将土地革命降温，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坦言：“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苏俄代表鲍罗廷也向莫斯科提出同样降温土地革命的建议。在苏共高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乘机联手抨击斯大林主导的中国政策。斯大林联手布哈林对抗托、季，坚称中国政策正确，利用国民党武汉中央可以“对抗帝国主义”，驳回了陈独秀、鲍罗廷将土地革命降温的建议，任命罗易接替维津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负责召开中共五大及继续推动中国的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奉斯大林之命，罗易起草了中共五大的纲领，政治决议、组织决议等全套文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顺应民意和多数国民党人、国民党军将领的呼声，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与苏俄决裂。4月中，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来到武汉。27日，罗易、维津斯基、多里奥召集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位中共代表举行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苏俄代表鲍罗廷、米夫及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人出席了大会。会上，罗易宣

读了莫斯科制定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要求将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革命继续升温。对此要求，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向罗易进言说：暴力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引起国民党人，党军将领的普遍反对，建议缓行。罗易不清楚武汉国民党中央面临的危机，拒绝鲍罗廷降温意见，坚持要求按莫斯科的指示办。陈独秀表示继续将土地革命升级会影响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罗易严厉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失败主义”和“右倾”，申明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必须执行《中国问题决议》。鲍罗廷、陈独秀只好表示服从。根据罗易提出的大纲，陈独秀在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随后，罗易宣布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土地革命等决议案，宣布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等二十九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宣布按照苏共模式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由于陈独秀表达了不同意见，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报告是称：“中共党的领导状况不佳”。

中共五大会后，鲍罗廷主持武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派唐生智、张发奎率军北入河南，同时下令禁止管制区内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动，以缓和武汉周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里，鲍罗廷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占领区内针对英美日的暴力反帝运动和工人武装接管政权的工人运动，在农村开展暴力杀地主的“土地革命”。了解武汉政府危机的鲍罗廷根据国民党内多数党员对工、农、反帝三运动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列强武力干涉的警告，主张缓行暴力排外运动。斯大林批准了鲍罗廷的主张，指示约东北伐军排外，特别不准向日本人挑衅，以防止引发第二次日俄战争。而罗易在执行斯大林的另一指示，要求中共执行《中国问题决议》，继续在各地发动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

斯大林将农民运动升温的指示使中国暴力土地革命迅速蔓延，农民协会无法无天。中共举行五大时，与章太炎齐名的湖南名士叶德辉因写对联抨击农会胡作非为而被湖南农会武装处决，震惊社会各界。北伐军将士多为农民

运动的受害者，武汉方面所属的北伐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家属大批成为农会的刀下之鬼，军官中的反共情绪爆发。5月14日，国民党北伐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国民政府军主力二次北伐时武汉防务空虚，在宜昌发动兵变。他通电要求“清共”说：“我北伐军之昭示于民众者，亦是曰为民众谋解放，为国际求平等而已。不料军事日益发展，而共产党徒乘机窃发，盘踞要津，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我两湖。斗寅等以耳目所及，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我鄂久处军阀铁蹄之下，民众憔悴于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于他省。当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势利导，饥而食之，渴而饮之，收效之速，将如响斯应。而共产党徒董用威（必武）、徐谦、邓演达、詹大悲、张国恩、李汉俊辈，一般宵小之徒，把持政柄，操纵时机，以法律赋予政权，为私人报恩报怨之具，不悉官吏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谬托邪说，贪黷败常，举凡军阀所不敢为之箝制舆论，而悍然为之，军阀所不忍行之苛税细捐，而毅然行之，继奸佞横行市场以害商，教流痞扰乱闾阎以病民，诛锄非种，强奸民意，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斗寅等处此，忍无可忍，只有率我将士，为民请命，班师东下，扑杀诸獠，去此害马，重建新政，继续北伐，以竣初功。”^[15]随后，夏斗寅率军进攻武汉，被叶挺的独立团击败。兵变虽被镇压，但夏斗寅为民请命，反抗赤化的义举在军中影响巨大。

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听到军中各级军官对农运暴行的控诉，决定亲自走访湖南农村，了解农民对农会和农运的看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一個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

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调查后，许克祥决定采取行动。正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家乡的大宅也被农会抢劫，何父被农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何因应各级军官的呼吁，决定在湖南动手镇压农民运动。

5月21日（马日），许克祥得到秘密情报中共准备于5月底在长沙发动大暴动，“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大屠杀以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队员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共产党走。”当晚，他率军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被监押的地主乡绅，处决中共党员及工农运动骨干，民众“万人争睹，欢呼雀跃”，[16]是为中共史书深恶痛绝的“马日事变”。随后，许克祥发起成立了湖南救党委员会，在得报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将到湘视察后电令岳阳驻军将鲍等就地枪决。鲍等抵岳州后，得当地驻军团长彭德怀报信立即折回武汉才得保性命。被许克祥释放的地主士绅受尽折磨，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变卖家财，组织武装杀中共党员、农会干部和农会会员复仇。

第 16 章 中共暴动与红色割据

五月指示与汪精卫分共

马日事变后，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事变原因说：“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1] 而罗易致电斯大林，建议武力镇压反共的国民党军人。

在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行第八次全会上，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再次抨击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斯大林在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为自己的中国政策辩护，主导会议作出了继续将中国的土地革命继续升温的决议，在其中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第二次北伐。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指示（五月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组国民党，接管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领导权；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及两湖的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十个师团，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2]

6月1日，鲍罗廷、罗易召集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开会，传达莫斯科的五月指示。陈、张、鲍均感到莫斯科完全不了解武汉的情况，认为指示“荒唐可笑”。因为大家清楚，国民党军官们对杀人抄家的农民运动已经忍无可忍，已经发生了夏斗寅的兵变和马日事变，另一波清除中共和左派的兵变随时可能到来，命都可能不保，哪里可能执行莫斯科“接管党军”的指示。无奈中，鲍罗廷致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实际婉转

表示“五月指示”无法照办。[3] 但是，新来的代表罗易无知无畏，只知道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在鲍罗廷和陈独秀均表示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执行的情况下，罗易决定让国民党左派去贯彻五月指示，将《五月指示》电报出示给了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期望汪会支持共产党夺取国民党的权力。

随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汪精卫相信苏俄的工农革命宣传，唯苏俄顾问马首是瞻的左派首领，充当鲍罗廷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工具。为此成备受国民党内右派反对。对于国民党右派指责，他坚持拥苏拥共说：“我站在工农方面，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随着北伐推进，他见到各地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带来的祸害，开始反省数年追随苏俄的选择。在见到莫斯科的“五月指示”他恍然大悟，原来莫斯科几年的国共联合是要从内部颠覆国民党。指示中的“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更让他觉悟苏俄输入的革命原来带给中国的血腥和灾难，心中的苏俄道路，共产革命信仰轰然倒塌，顿时一百八十度转变，从拥共者转变为反共者。他决定立即与苏俄决裂，下令“分共”。他没有用蒋介石的“清共”字眼，是希望与苏俄、中共和平分手。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仑等 140 位苏俄顾问的职务。

随后，汪精卫向率军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寻求支持，率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等武汉国民党中央文武高层到郑州与冯会谈。会上，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宣布武汉中央决定“分共”，任命冯玉祥为北伐军第二集团军总指挥，提出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由河南南撤，一是为应付中共在两湖的暴动计划，二是要让出地盘拉拢冯玉祥。冯玉祥摆出支持武汉方面的姿态，但对武汉方面让出地盘和任命并不满足。他需要的是金钱。财政枯竭的武汉国民政府无力满足冯的军饷要求。6月20日，冯玉祥在徐州再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非常了解冯玉祥无所谓政治口号和纲领，唯地盘、军饷是图，开出了每月 200 万元军饷价码作为

脱离苏俄加入“清共”的条件，并提出互换兰谱。二人相利用，拜了把子，按年龄冯为盟兄，蒋为盟弟。冯接受蒋的收买，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清共”，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出形同最后通牒的电报，敦促武汉方面驱逐鲍罗廷和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

6月29日，汪精卫在庐山主持军政要员会议，正式宣布和平“分共”，下令中共党员贺龙、叶挺所部军队限期撤回九江，查封中共控制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通缉廖乾吾、高语罕等中共党员；要求拒绝脱离中共的国民党员退党。这时，汪精卫仍抱有幻想，以为亲苏亲共后可以好来好散。他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在指示中共拉出军队暴动了。得知罗易将密电出示给汪精卫后，鲍罗廷致电斯大林，要求将罗撤职。6月15日，陈独秀再致电共产国际，称莫斯科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中共完全同意，但在短时期内无法执行，申请缓行激烈的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以缓和国民党人及国民党军官的敌视。他强调中共在现实情况下必须退让以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同时，陈独秀也表达了对罗易将五月指示出示予汪精卫的不满。斯大林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决定召回罗易，派罗明纳兹（BESSOLOMINADZE）来华接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但拒绝陈独秀缓行土地革命的意见，命令继续暴力“土地革命”，要求中共用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组建自己的军队，指示汉口苏联领事再汇200万卢布给武汉国民政府作为组建中共的军队之用。

6月30日，已被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的鲍罗廷在家中召开中共政治局紧急会议。陈独秀早已厌倦了傀儡党领袖地位，对罗易为中共五大制定好的一切提纲和决议案，没有商量余地地要求中共代表通过决议并执行已经不满，对意见和申诉屡次被否更加愤怒，在收到斯大林再次的否决复电后决定不再作傀儡，不再向莫斯科唯唯诺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辞呈后不再听从鲍罗廷、罗易的召唤，拒绝出席中共会议。在没有陈独秀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部署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暴动，指示将驻扎南昌

的叶挺、贺龙所部拉出来，在南昌发动暴动。7月12日，鲍罗廷再集中共，宣布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层，撤销不听召唤的陈独秀中共总书记职，指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中，汪精卫在武汉再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了“分共”《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会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将鲍罗廷礼送出国。至此，国民党结束了四年鲍罗廷当家的时代。

南昌暴动

武汉政治局紧急会议后，周恩来、李立三奉鲍之命到南昌部署暴动。到南昌后，周、李在江西大旅社召集会议，宣布成立暴动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命贺龙、叶挺、蔡廷楷、周士第、朱德所部于1927年7月31日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23日，接替罗易来华的新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明纳兹和另一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诺伊曼，HEINZ NEUMAN，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抵达武汉。罗明纳兹不同意中共议定的31日发动南昌暴动的计划，谓暴动计划尚未经莫斯科批准。罗明纳兹突然表示不同意的背后是因为斯大林对暴动犹豫。指示中共发动暴动后，斯大林又担心暴动会引起列强干预，指示加伦率全体苏俄军事顾问撤离南昌，不参加暴动，指示罗明纳兹阻止暴动。7月26日，罗明纳兹、加伦在汉口召集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举行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不支持南昌暴动的电报，派张国焘赶往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了共产国际暂缓暴动的指示。这时，南昌中共的暴动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张只好默认。

7月31日晚，中共拉出贺龙、叶挺、朱德所部军队举行了南昌暴动，因故未能离开南昌的贺龙部苏俄顾问库马宁(M. F.KUMANIN，库曼宁)被

动参加了暴动。暴动军歼灭南昌国民党守军，占领了南昌城。中共指挥部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包括张国焘、彭湃、周恩来、叶挺、贺龙、郭沫若、李立三、朱德、高语罕、吴玉章、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及张发奎、黄琪翔、宋庆龄、邓演达、蔡廷楷、陈友仁、彭泽民等国民党人。指挥部散发了重复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内容的《八一起义宣言》和《八一起义宣传大纲》。[4]

接到南昌暴动消息后，汪精卫打消了“和平分共”的幻想，宣布中共叛变了国民革命，主持武汉中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命令张发奎、朱培德率部镇压南昌暴动，下令查封中共机关，解散工会及农会，收缴工人纠察队、农会武装的武器，捕杀共产党人。8月4日，中共暴动军被张发奎部击败，在南昌一番烧杀破坏后撤离，按照预定计划南下汕头港去接收苏俄从海上运来的军火。途中，暴动军在汤坑被陈济棠的粤军部队截击再败溃散，残部在酷暑中远征，士兵因喝田里的污水而大批死亡，到达汕头港时所剩无几。

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从犹豫转为过分乐观，认为南昌暴动军足够强大，立即批准了加伦在暴动前提出的暴动军南下广东接收军火的计划，命纽曼、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率领一支由五名师级首长、政治、军事工作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组成的苏俄人员团队到南昌去领导暴动军，下令两周内在海参崴备好一个军的军火装备运往汕头。苏共派顾问到南昌暴动军的最佳路线是从海参崴坐船由海路到汕头，这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至于武器、装备，从准备，装运再由海路运到广东需要几个月。南昌暴动军残部在汕头港等了一周不见苏俄军火船即四散逃亡，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暴动领导人分别逃往上海、香港得到共产国际接应安排，残部中的一支由董朗率领退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另一支由朱德率领投奔了驻扎韶关故交滇军范石生部，后移师湘南。至此，没等莫斯科的军事顾问动身来华，中共在潮汕地区的南昌暴动队伍已经不复存在。

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以南昌暴动翌日，8月1日为中共建军节。1949年建国后，中共将南昌的“中正桥”、“介石公园”，“中正大学”、“中正路”改以“八一”命名，在南昌市中心建立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将纪念馆所处的广场改名为“八一广场”。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中共将原来文件中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暴动之语一律改称起义。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罗明纳兹和纽曼召集在武汉的部分中央委员举行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杀人放火命令。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减少了对国民党的援助，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停止了对“南北二赤”的金钱武器扶植。冯玉祥附俄是为了金钱军火，对不提供援助的苏俄立即背离，接受蒋介石收买后声明加入“清共”。斯大林对长期接受扶植的蒋、汪、冯在壮大后同时决裂无比恼火，要求中共以最激烈的行动报复国民党“清共”、“分共”。

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命令中共“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会后，取代陈独秀的新任中共傀儡领袖瞿秋白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在其中要求“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派”、“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5] 瞿秋白另下达指示给福建省委、两湖省委，要求“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实行红色恐怖”。根据中共中央要求，湘鄂粤赣四省的中共省委分别下达了烧杀令。其中，湖南省委提出暴动口号为：“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烧！烧！烧！杀！杀！杀！”；中共湘南特委要求“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两侧五里内民房”，“盲目烧杀”、“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6] 中共广东省委发出指示函说：“我们不特可没收他们的土地，并且要准农民去杀戮他们，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7] “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

宁枉杀不枉纵”；[8] 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提出以“杀人、放火、抢物”为暴动原则和革命目标，提出“鼓励自由杀人”和“奖励焚烧房屋”，“把市镇的商铺焚烧殆尽”。

北伐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要求开展的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反帝运动已经将湘鄂粤赣四省祸害得到处有杀人放火了，八七会议使祸害再升级，湘鄂粤赣四省委指挥大规模烧杀，策动了百余起暴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嫌四省执行八七会议指示行动不够激烈，批评各省委说：“除海陆丰外，各地农村暴动大多只做到打豪绅，烧房屋，进一步做到烧田契债券，而于没收土地的工作则一点没有做。”[9] 大规模的烧杀引发了众多农民反对共产党的暴动。例如，在湘南特委动员农民烧杀的大会上，到会的几千农民感到如此没了活路，立即举行了反共暴动，把中共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随后永兴、耒阳的农民发起了反共大暴动，扯下赤色袖箍、领巾，打出白旗。中共急调其它农民武装镇压、屠杀暴动农民，对农民运动忍无可忍的国民党军再来镇压农民武装。[10]八七会议后几个月内，华南四省遍野横尸，处处焦土。

八七会议的另一结果是罢免陈独秀。召集开会时，罗明纳兹拒绝了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邀陈独秀出席的提议，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电令和《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宣布罢免陈独秀总书记职，由自己暂代总书记，作了题为《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八七会议告党员书》的主旨是为斯大林主持制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将国民党对苏决裂、清共、分共归咎于陈独秀、谭平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谭拒绝机会主义罪名，被开除出党）。苏俄在八七会议上引入中国的“机会主义”罪名此后被中共不断继续创新、升级。会后，中共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罪名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再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此后几十年，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罪名和整肃运动贯穿中共党史。

8月9日，罗明纳兹召集中共高层再开会，宣布将鲍罗廷离华前任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人临时常委改组，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指示，任命瞿秋白、向忠发（工人出身）、李立三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新的大会召开前负责主持党务。其实，中共成立以来，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共产国际文件和是共产国际大员朝令夕改的说法，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共的一切运作由莫斯科决定，高层们听从共产国际代表召集随时开会，全无自主空间，陈独秀因要求自主行事而被撤了职。

共产国际处置陈独秀的方式是革命党不能算是现代政党的一个例证。在现代政党中，加入与退出自由，党员不同意党的决定可以退出。而暴力革命党、江湖会党不然，不容党员退出，只能党将其开除，或指其叛变，采取极端手段处置。共产国际不仅不承认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甚至连各国支部的相对独立地位也不承认。陈独秀在一个多月前已经递上辞呈，不再参加中共的会议。共产国际称陈“闹独立”，不批准陈辞职，非要宣布罢免。会后，瞿秋白、李维汉向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的罢免决定及及让陈赴莫斯科当面承认错误的要求。陈独秀表示，在任上的每一行动均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失败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致，没有理由将失败归罪中共。他拒绝赴苏谢罪说，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无须到莫斯科去研究。陈独秀不去是对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若去莫斯科谢罪可能会有去无回。和罗明纳兹一起主持“八七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是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来华时有“斯大林宠儿”之名，但后来被捕失踪，可信的说法是被杀害了。陈独秀拒赴莫斯科谢罪避免了纽曼那样的下场。

9月，托洛茨基欲借在中国的失败再向斯大林挑战，拟出提纲（《九月提纲》）要求即将召开在苏共十五大上讨论。斯大林拒绝了托的要求，联手布哈林剥夺了托的权力。摆平托洛茨基后，斯大林将鲍罗廷作为其中国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迫鲍承认犯了错误，然后将其贬到了木材公司。鲍与大多数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大员一样，未得善终，虽然没有像加拉罕一样在大清洗

中被枪毙，但还是在 1949 年惨死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罗易是共产国际驻华大员中少有的善终者。被共产国际保卫局特工押回莫斯科后，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长篇发言，将失败责任归咎于陈独秀未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被指责泄密，他申辩说共产国际历次指示并未规定向国民党左派保密，自己不清楚在执行国共联合方针时为什么要向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保密。他求见斯大林想当面申诉遭拒，被开除出了共产国际。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失踪，获准回了祖国印度。晚年，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变为人道主义者。他说：“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组成的世界性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导致极权主义，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真正的革命不能通过阶级斗争或武装暴动实现，而应当通过教育来实现。他劝告人们不要对革命抱幻想。

共产国际在华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历史上耻辱和灾难的一页。后人难以想象，俄人在华召集开会，公然命令中国革命党杀人放火，给整个华南带来血腥恐怖。此后，中共在党史中只提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完全不提这一会议主旨——部署杀人放火，以及会议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如今，中共仍在以这样的革命宣传欺骗着后辈青年，仍然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次灾难性的会议。

秋收暴动与井冈山割据

八七会议后，苏俄驻长沙领事马耶尔不顾外交管身分，在长沙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开会，亲自部署暴动，要求农民武装立即暴动，攻打长沙。参加会议的毛泽东了解到，南昌暴动队伍已被击溃，不能来湘，认为让湖南农民武装的乌合之众进攻大城市没有胜算，在会上建议取消湘南暴动。马耶尔虽指责毛的建议为“临阵脱逃”，但还是批准将暴动时间从 8 月下旬推迟至 9 月，改为“秋收暴动”。

根据共产国际“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的口号，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等人提出“秋收暴动口号”为：“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暴动打倒湖南省政府！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及反动派！暴动没收土地！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没收资本家及银行的财产！暴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暴动胜利万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提出暴动任务为：（1）分土地；（2）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大地主的财产；（3）杀土豪劣绅地主及城市富豪；（4）夺取团防枪支，组织工农革命军；（5）烧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6）抗税抗租，捣毁反动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7）尽量破坏反动政府的交通机关；（8）恢复农民协会，农协专政；（9）组织革命委员会。[11] 9月9日，在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经费、军火的支持下，彭公达和暴动总指挥卢德铭发动了湘东、赣西“秋收暴动”。暴动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邱国轩等人率领的修水、铜鼓一带的几股会党土匪，向长沙进攻，沿途一路杀人放火，旋即被击溃。

毛泽东对力量对比的判断极为准确，预见到农民武装攻打正规国民党军驻守的大城市必然失败的结局，在进攻长沙的半路上果断抛弃暴动计划，决定率队伍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选井冈山落草不是草率决定，而是建立在一番“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自幼喜欢《水浒传》，憧憬占山为王，相信有枪杆子在手才有出头之日，在年初考察湖南五县农民运动时了解到湘赣边界地区山林地形复杂，利于土匪生存，而不利政府军剿匪，政府对土匪山寨长期无可奈何，匪患几百年不绝，其中井冈山地区西接江西的遂川、永新、宁岗，东接湖南攸县、酃县，山势险要，山上有王佐、袁文才为首的洪江会山寨。[12] 受命领导暴动后，毛泽东有了一支队伍，于是他不怕党的处分，决定到井冈山落草，实现他的宏图大志，表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9月中，毛泽东命令几路农民武装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会议，宣布离湘入赣，沿罗霄山脉向南寻找落脚点。

9月底，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整编队伍，将号称一个师，实际仅400多人的农民武装改编成两个营，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度，要求党员，战士忠于党，忠于领袖，以确保他通过中共党员控制农民武装。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是对苏俄通过党代表控制红军的“政治部建在军级”模式的改进，提高了党对军队控制力，确保军队遵从党领袖的意旨。他后来将此党控制军队的模式总结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三湾改编确立的军队效忠党，效忠领袖的党军模式影响深远。改编时被毛泽东发展入党的陈士渠回忆写道：“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 CCP，底下一张则写着‘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毛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如果有人叛党，党会对之严厉惩罚，主要方式就是死亡。”在后来毛泽东当政时代，无论他作出多么荒唐的决定，党员们都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互相监督，无条件追随。背后原因是入党时大家发了毒誓，知道服从组织就是服从领袖，质疑领袖决策可能被党处死，无条件效忠可以获得提升。参加改编“三湾子弟”后来成了毛泽东的嫡系，步步高升，其中走出了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宋任穷上将、谭震林副总理、陈伯钧上将、张宗逊上将、陈士渠上将、黄永胜上将、刘先胜中将、杨梅生中将、张令彬中将、韩伟中将、赖毅中将、谭希林中将、王耀南少将、龙开富少将、杨世明少将、余光文少将，刘型农垦部副部长、杨立三部长，其中只有何长工因一度追随张国焘失去毛的信任，官运不顺。

在队伍疲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决定率部到井冈山山寨入伙，利用现成的土匪山寨发展，徐图反客为主。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古城会议），说服农民武装骨干们接受了落草计划。随后，他派人以百条好枪为见面礼去报山门。毛泽东从《水浒传》等江湖小说中学得的手段在与土匪打交道时大派用场，但成功报山门的主要因素不是因为毛的谋略，而是苏俄军火，是苏俄领事馆提供的枪支。中共后来在党史中只宣传毛泽东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隐瞒了成功落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苏俄驻

长沙领事馆提供的暴动金钱和武器，土匪山寨不会接纳流窜到此的另一伙人，毛泽东就不可能创建红色根据地。分别盘踞茨萍、茅萍的王佐、袁文才接纳毛泽东入伙不是因为毛的祸福与共保证，不是因为毛率领的几百号人，而是因为毛分别献上的每处两百条好枪的进山礼。王、袁不缺乏人手，不缺乏大刀长矛，而是见好枪而动心，决定迎毛上山。事实上，不仅是井冈山，所有红色割据都是共产国际，即苏俄的钱和枪所创建。这一点是如今遍地的红色纪念馆需要隐瞒的。

11月中，中共临时中央通知毛泽东到上海开会。毛知道中央要清算他擅自动手，索性对开会令置之不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集瞿秋白等临时中央成员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印发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并函命湖南省委派人去取代“犯了严重错误”的毛泽东。临时中央指示发出后，中共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指示无从执行。

没多久，莫斯科又下达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红色武装割据的新指令。根据莫斯科的指示，罗明纳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再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追究农民武装攻打大城市失败的责任，将忠实执行攻打大城市指示的瞿秋白等人批判为“左倾冒险主义”，通过了罗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以“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为首要任务。既然传令攻打大城市的临时中央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拒绝遵行错误指挥的毛泽东就歪打正着地正确了。新一届中央顺势而为，不再翻毛泽东擅自拉走队伍的旧账，转而将毛汇报为建立武装割据的正确代表。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指挥队伍攻占了宁冈县城，随后召开万人大会，以三叉木架现场刺杀了被俘的县长张开阳和乡绅郭伟谦。此后，“万人大会”现场杀人成了井冈山红色割据地区的常见场面。在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泽东为庆祝大会写的对联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

生利；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乡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书生毛泽东要求民众参加大会，观看杀人。他表现出的残忍、恐怖让袁、王感到甘拜下风。二人决定推毛泽东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接受推举主持山寨后，毛泽东指挥队伍在山寨周边地区打家劫舍。他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说“财东”、“有钱人”他们就懂了。

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暴动军残部来投，毛泽东率部下山迎接。朱、陈部于1月进入湘南，与中共湘南地方党组织配合，发动了湘南暴乱。他们执行“八七会议”的指令，以“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为口号，在郴州、耒阳两县大肆烧杀抢掠，将所到之处的国民党基层政府人员，县、乡、保甲长和有钱人一律杀害。这样烧杀使朱德的暴动军在湘南无法长期立足。困境中，朱德得到毛泽东建立了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率军前来。朱德是留洋回国的将领，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年纪四十出头，是几位首领中最年长者，所率军队又是正规军，上山后被推举为司令。但朱与王佐、袁文才一样承认，山寨须由毛泽东作主。5月，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的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推原寨主袁文才任主席，自己任副主席。毛泽东运用中共从内部向国民党夺权的策略，势力一天天的壮大，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将军队编为红军第四军。

入主井冈山后，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不断完善警卫措施，将警卫人数不断增加。他精心为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安排了几处有后窗、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方便逃跑的房子。他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位于茅坪入山口的八角楼就是按上述考虑选中的。王佐、袁文才知道毛泽东已反客为主成了山寨首领，决定以联姻的传统办法来维护山寨旧人的利益。袁文才将亲信贺敏学的妹妹，人称“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许给了毛泽东，期望毛真正入伙，代表山寨人的利益。经袁文才操办，毛泽东在离开杨开慧母子仅半年多后即另娶了十八岁的贺子珍。

毛泽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消息给斯大林带来了惊喜。长期扶植国民党后落得“清共”结果让斯大林备受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指责。为证明中国政策正确，斯大林指示在中国南方四省举行暴动，建立中共党军与苏维埃政权。然而，他批准的南昌、广州暴动都迅速失败，指挥广州暴动的的外交官大批被枪毙。虽然他联合布哈林整垮了托季联盟，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但还是需要找到个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中国政策正确。听到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和苏维埃的消息，斯大林感到有了证明，指示将井冈山红色割据大力宣传，指示共产国际扶植扶植红色割据，向华南运送更多的军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大力宣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红色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史中，井冈山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后辈青年们纷纷到那里朝圣。然而，“红色旅游”的青年们多不知道，毛泽东统治井冈山的十五个月间，红军的主要活动是到周边抢劫，与普通土匪山寨不同之处是烧杀抢劫更为残酷血腥，规模更大，杀人更加残忍，红色割据时期是井冈山地区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1928年，朱毛红军绑架了天主教神父爱德华（EDWARD YOUNG），勒索两万美元未果。爱德华逃走，但中国教民人质多被杀害。[13] 红军军长龚楚在回忆录披露，红军绑了宁冈一乡绅父子三人勒索 250 元，乡绅家人东借西凑了 120 元加上妇女首饰珠宝交红军赎人，红军收钱后逼迫乡绅家人再交 500 元，家人交不出，红军还是杀害了乡绅父子三人。到朱毛红军 1929 年 1 月离开井冈山时，红色割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其中宁岗县人口从 1927 年的 13 万减少了一半，全县到处是红军烧毁房屋的废墟。

井冈山土匪山寨存续几百年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该区地形易于藏身，而是因为土匪们懂得“可持续性”生存的道理，山寨扩张有度，抢劫适可而止。而红色根据地欲壑难填，竭泽而渔，很快将有钱人及稍微有些钱的人消灭干净，将窝边草也吃干净，仅两年就使该区人口减半，也迫使自己必须转移。广为人知的“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紧紧拉住亲人的手”等歌词不是真

正的井冈山传统，龚楚等亲历者回忆录中那些鲜为人知又不堪回首的事实才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和“井冈山革命精神”。“三湾子弟”们在作了元帅将军后不会披露当年的革命真相，他们知道保守党的秘密是不能违反的纪律。1980年代，杨尚昆私下承认，龚楚回忆录中披露的井冈山纪事是真实的。革命党永远只会颂扬革命家，绝对不会纪念革命军烧杀的死难者。中共后来建了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古城会议纪念馆，三湾改编纪念馆及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等多处纪念馆，其中只有颂扬革命，而隐瞒苏俄的操纵，隐瞒红军到处抢劫、勒索，隐瞒红色根据地短短几年人口减半，到处废墟，杀人大会等等。

井冈山原山寨寨主王佐、袁文才没有想到，他们贪图两百条好枪引来了杀身之祸。不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为中共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决议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之一）中要求，在红色武装站稳脚跟后要肃清红军中的土匪。据此，中共派彭德怀将王、袁杀害（1950年代中共追认王、袁二人为革命烈士）。

广州暴动与中苏断交

南昌暴动后，斯大林希望在广东建立一块中共根据地以证明自己的中国政策正确，下令派出军事、政工人员，拨出足够武装一个军的军火运往广东。然而没几天，暴动军被消灭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让苏共政治局受到不小的震动。这时，如果停止执行原计划会让人感到托洛茨基对中国政策的指责说对了。于是，斯大林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指示罗明纳兹继续在中国发动暴动，并亲自决定在广州举行再次暴动，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以证明他的中国政策正确。为此，他批准拨出 200 多万美元的经费，派纽曼、爱斯拉（GERHART EISLER）、托维诺夫等暴动专家赴广州领导暴动。

1927年11月9日，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临时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了斯大林继续暴动的指示，驳回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佩佩尔关于南昌暴动失败后共产党在中国的力量削弱，暂不宜组织广州暴动的建议，提

出“要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与此同时，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也遵照指示在馆内设立了暴动指挥中心，将南昌暴动后逃到香港的叶挺、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以及黄平、彭湃、周文雍等人接来广州作为暴动骨干。

这时，正与李济深正为广东控制权激烈争斗的张发奎数派代表与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接触，谋联共抗李。对张的合作建议，苏俄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认为，虽然领事馆内藏有大批武器，共产党控制了张部的教导团，警卫团，赤色工会和农民武装万余人，但这些武装难以与国民党军队对抗，因此应当联手张的第二方面军。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携美元巨款到达广州。他否决了“联张”计划，要求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单独发动广州暴动。12月10日，斯大林复电纽曼，最后批准了暴动计划。

12月11日晨，纽曼为首的两百多名苏俄外交官及军事人员率叶挺、蔡升熙、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中共党人发动了广州暴动，指挥从张发奎军中拉出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及工人赤卫队、农民武装夺取了北门军械库的武器弹药，歼灭了国民党军千余人，再占了中央银行和省政府，在屋顶挂起镰刀斧头红旗。在进攻南堤的第四军军部时，暴动军遇到了强大的抵抗，双方伤亡惨重。12月12日，暴动指挥部在第一公园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广州公社），宣布人员组成为苏维埃委员长苏兆征（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张翌日在暴动中身亡），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宣布通缉蒋介石、汪精卫、李济琛、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陈公博、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

“当天，暴动军夺取了公安局及第十二师留守处的武器，攻占了燕塘陆军监狱，释放了囚犯，发给他们武器，召入赤卫队，命颈系红带。暴动军在广州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害者已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的清水变成了红色。武装工人到处搜索杀人。四军军部虽未攻

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在市内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之残暴：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14]

在蒋、汪合作之下，张发奎调兵返穗，黄绍竑率军东进，粤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军从河南岸渡河，合力镇压暴乱。12日晚，暴动指挥部准备逃跑，下令四处纵火，将广州变成一片火海。13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主力进入广州，在广州工人自发组织的铲共义勇军的配合下围剿共产党暴动军。14日，共产党暴动军退出广州城，向东江北江方面败逃，张发奎下令将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A. I. HASSIS，郝西诗，霍希斯）及带领馆外交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伊凡诺夫、玛卡罗夫等五名暴动指挥者以及共产国际调来参与暴动的百余名朝鲜人枪毙（纽曼等人潜逃）。短短几天苏维埃暴乱，苏俄指挥的暴动军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千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的家属及市民，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也伤亡数千人，参予暴动的两百多俄人半数伤亡，广州城被焚得到处废墟，大街小巷死尸遍地，尸臭弥漫全城，成了恐怖之城。公安局的临时清洁队载出数十车尸首运往郊外埋葬。[15]

鉴于苏俄将其驻广州领事馆作为了颠覆国民政府的暴动指挥部和军火库，苏俄外交官直接指挥武装暴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布对苏断绝邦交令说：“本月 11 日广东事变，究其原因，皆由共党籍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操纵指示之地。而其它各省，亦有爆发之虑。为治安起见，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联领事一律撤销，所有各省之苏联国营机关，应勒令停止营业。”15 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俄驻沪总领事馆递交了断交通牒，限苏俄领事（其中包括策动秋收暴动的苏俄驻长沙领事）一周内离境，勒令所有苏俄在华的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停止营业；详查苏籍侨民总数，苏侨均应领外侨护照。同日，蒋介石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重新确定外交方针。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作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有苏俄远东银行作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关闭，共产党扰乱是不会停止的……现在急需将俄国领事馆和商业机关一律封闭，以免共祸蔓延。”[16]

在莫斯科，当广州暴动指挥部放火逃亡时，莫斯科仍在为广州暴动叫好，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声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赶快起来，赞助中国的苏维埃，在广州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17] 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断绝邦交令后，共产国际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为广州暴动辩护说：“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18]

国民政府对苏绝交后，苏俄驻上海、汉口、长沙的领事馆下旗回国。至此，苏俄在中国南北政府的外交机构均被取缔，苏俄在中国指挥颠覆中国政府巢穴——驻北京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被全部端掉。对苏断交后，吴稚晖等人指责长期庇护国民党内中共党员的汪精卫是共产党的合谋者，指汪表示

反共是苦肉计。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人纷纷呼吁捕杀汪精卫。蒋介石以关怀为名，劝汪出国避难。已经转变立场，坚决反共的汪精卫在谴责浪潮中百口莫辩，只能吞咽附俄苦果，宣布再次出洋。陈公博、黄琪翔等汪派骨干也被迫辞职。黄琪翔随汪精卫赴法国后，李宗仁派黄绍竑率军入粤，以追究广州暴动责任之名与李济深联合讨伐张发奎，迫张也宣布下野出洋，张的第四军退到赣南，李济深夺回了广东的控制权。至此，国民党内汪派势力被基本清除。

广州民众两度见证了俄人主使纵火屠城：1924年鲍罗廷主持的西关纵火屠城和1927年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主持的西关及广州各处纵火屠城。两次大火都是彻夜燃烧，将广州城照得如同白昼，留下一片片废墟。两次广州大火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祸害中国的写照。纵火之外，苏俄报复国民政府对苏断交，将在俄的大批国民党员清洗或送去了劳改营，将在苏俄留学蒋经国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子女扣为了人质。几年后，苏俄在江西扶植建立了苏维埃国，特地以被国民政府枪决的广州暴动首领，苏俄驻广州副领事郝西诗的名字命名红军大学，显示出苏维埃国的附庸性质。三十年后，参与广州暴动的叶剑英元帅在一篇文章中称：“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19] 率军平定广州暴动的张发奎抨击叶文说：“叶剑英这一段话，从头到尾，可以说全是谎话。因为英、美、日、法等国当时根本没有用军舰或海军陆战队帮助我们，当然更谈不上替我军作掩护。我记得十二月十一日晨，我准备派人到沙面用无线电命令广州外围各部队回师勘乱，但当时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外国人住的沙面去拍发无线电报，还是托商人谭礼庭先生出面才拍发出去的，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什么外国的帮助。”[20] 叶剑英的“帝国主义干涉”谎言并不奇怪，中共总要找一些理由将苏俄使馆主持暴乱说成是革命、是反帝。中共后来在广州确定的革命纪念物是革命党颠倒黑白的典型：大元帅府、黄埔军校、广州国民政府、农民运动

讲习所等等旧址，个个是外强压迫中国，颠覆中国政府的灾难写照，无一不是广东和全国人民的灾难写照，中共为苏俄策动的暴动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作为“光荣的记忆”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了“中苏人民友谊亭”，上铭刻有“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之句，将此亭定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革命纪念物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些革命纪念物代表的是外国势力推翻中国政府、运来枪炮祸害中国的历史，当年的广州暴动是苏俄领事馆直接指挥，从朝鲜调来军队参与的暴乱。暴动者杀害了数千民众，将广州焚烧的满目疮痍。广州暴动的诉求是什么呢？中共广东省委发布的下列暴动口号告诉人们真实的广州暴动：

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与富农；

没收一切资本家财产；

杀尽工贼；

农民要求土地，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

没收土地归农民、士兵；

烧尽一切田契、债约；

没收阔佬公馆、洋楼给工人居住；

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

杀绝一切豪绅地主恶霸反动派；

赤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

其中，“没收一切土地”是暴动领导人张太雷的手笔。他嫌原拟“没收五十亩以上地主土地”口号不够革命，在暴动前改为了“没收一切土地”。[21]

上述口号说明，苏俄操纵的农民运动、广州暴动等祸乱之惨烈超过了闯、献、洪、杨。

第 17 章 北洋政府时代终结

蒋介石下野与国民党内斗

“宁汉分裂”后，双方分别继续北伐，汉方北进河南，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宁方进军鲁南。汪精卫、唐生智根据罗易“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1]的要求，声言讨蒋，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宁军。蒋介石急忙下令北伐鲁南的部队改攻为守，准备南撤。张宗昌、孙传芳策划乘宁军后撤之机发动反攻，败宁军于苏北、鲁南。

宁、汉相争的情况下，桂系举足轻重。李宗仁、白崇禧传承了民初以来西南领袖的割据之心，并伺夺取最高权力。在蒋介石下令北进时，桂系按兵不动，趁南京空虚，将旗下第七军布防芜湖至南京一线，掌控南京，形成对蒋逼宫之势。1927年8月，蒋介石在率北伐军反攻徐州再败，又遇到汉方讨伐，中共暴动和桂系占据南京逼宫一系列打击。困境中，蒋介石通电下野（第一次下野），回了家乡奉化，随后赴日本进行私人外交。

逼蒋下野后，桂系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再以“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为由，将汪精卫排斥出南京的权力中枢。然而，桂系取代蒋介石主政南京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首先，新加入国民党的桂系在国民党中央缺乏根基，李宗仁连国民党中央常委都不是，国民党元老们不买桂系的账；其次，拥蒋派抵制桂系主持的南京政府；第三，江浙财团、上海商界拒绝支持李宗仁，宋子文随蒋辞财政部长职，留下了千万元北伐军费巨债，各地的税收也不交给国民政府。在北伐军费每月开支两三千万而财政收入仅区区数百万的财政危机中，孙科政府上台后立即陷入困境；第四，军中黄埔系仍然效忠蒋介石，不受桂系调

遣，使桂系无法主持全局。拥兵控制两湖、安徽的唐生智趁各方抵制桂系之机以“护党”名义通电反桂。10月，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委发出讨唐令，“桂唐战争”爆发。11月，唐军兵败，唐生智通电下野赴日本养病，“桂唐战争”迅速结束。在部署讨唐的同时，李宗仁利用西山会议派排挤汪精卫。汪以吁请蒋介石复职的方式对付李宗仁，并准备接受张发奎和李济深的联名电请南下广州另立中央。

乘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斗，张作霖组织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部先后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向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在军事上承受巨大压力的冯玉祥、阎锡山为了保存地盘、实力，联名通电，敦促蒋介石复职主持北伐大计。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五元老也联名通电请蒋复职。在汪、冯、阎及元老联手推动下，国民党全会预备会一致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决议于1928年1月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届时李宗仁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和特委会军事常委会同时取消。至此，国民党内各派联手扳倒了桂系，为蒋介石复职铺平的道路。

二期北伐

1928年2月初，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决议案》和《整理各地党务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进一步“清党”的决议。会后，中政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全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冯玉祥、阎锡山为第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2月中，蒋介石赴开封与冯玉祥面议二期北伐，商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天津；第二集团军攻击京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的奉军，由河南新乡向彰德、河北大名一带北上，与第一、第四集团军会攻京、津；第三集团军自太原沿正太铁路出娘子关，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经

郑州、新乡，保定进攻北京。3月，蒋介石到上海与财界会商北伐的财政支持。

3月底，蒋介石统率国民革命军开始了二期北伐，在豫北的北伐军第二集团军面对张学良部的进攻采取守势，第三集团军开战后遭到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团的进攻，困守山西。4月中，蒋介石指挥第一集团军取得了突破，与第二集团军配合，击败了向防守鲁西南的孙传芳、张宗昌部，于5月1日进入济南，于5月中越过德州。山东战场的孙传芳、张宗昌被击败后，安国军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部向北退却，北伐军第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两侧一路追击，至5月底分别追击至保定、大同、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

济南事件

“南京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奉行“币原”，禁止武力报复以推动蒋介石对苏俄决裂。不久，抨击币原外交软弱的田中义一在日本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上台组阁，转而实行强硬政策。1927年6月，在北伐军进至山东，日本以保护在华侨民为由出兵占领了济南。英国、美国也担心国民党北伐演致另一次杀洋人的义和团运动，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天津。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命令北伐军迂迴北上。9月，下野的蒋介石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首相，了解日本对中国北伐的态度，并希望日本像当年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支持国民党北伐。田中表示反对国民党北伐，希望蒋介石专心致力于中国南方的统一。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为免日本出兵干涉，他在出兵前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北伐的范围将不包括满洲地区。4月，当国民党军继续北伐逼近济南，日军派出三千多兵力在济南城外设立警备区，构筑工事，收容日本侨民。5月1日，北伐军攻入济南。军中的中共党员继续执行共产国际的训令，再次煽动士兵对日本侨民实施暴行，杀害日侨数十

人，伤百余人，劫掠日商百余户。5月3日，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兵闯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交涉使署，枪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十八人。5月8日，日军向北伐军占领下济南发动进攻。蒋介石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冲突，命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上，另一方面循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

煽动士兵施暴的同时，中共利用舆论煽动民众反日排外。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彻底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撤退日本在华一切海陆军，收回青岛及胶济路，对日经济绝交，断绝对日邦交，驱逐日本使领馆出境。国民党政府是压迫民众运动的，要进行彻底的反日运动，必须打倒国民党及其政府。”[2]同时，中共在党内发出指示，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及日厂工人的罢工与示威，扩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引导商人、学生参加反国民党与反帝的运动等。[3]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各地组织成立了反日会，发起了抵制日货等运动，提出停止两国贸易、没收与处分商家的日货充作反日会基金、对日经济绝交、对日宣战、要求外交部长黄郛辞职等口号。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妥协处理事件的时，中共通过反日会等民间团体大力煽动仇外、排外，只宣传日本方面杀人，掩盖北伐军屠杀日侨制造惨案的真相（日本后在靖国神社中供奉“五三惨案”亡灵 185 人），希望挑起中日战争。在中共的推动下，全国反日情绪高涨。

6月，外交部长黄郛在各地反日浪潮中引咎辞职，王正廷继任外交部长，与日方就济南事件善后展开谈判，双方均承诺采取行动避免事态扩大，防止汉口事件、南京事件、义和团运动重演，防止北伐战争转变为中日战争。国民党政府积极制止义和团式的排外情绪，颁布了《排日取缔令》，在允许各团体发表意见的同时，阻止罢工、罢课、大规模反日集会、反日示威及反日宣传演讲，国民党军从青岛及胶济路撤退。国民党政府冷静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的政策奏效，日军释放了在济南事件中俘虏的 900 余国民党军，事件走向和平解决。中日政府承认，双方对事件起因认定存在分歧，承认双

方都有伤亡，决定将各自认定的事实经过和所受损失向国际社会展示，由国际社会来认定事件的责任。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日军杀害蔡公时等十八人以及在济南报复炮击造成了伤亡的情况，日方则在济南医院安排了有日方检尸人员、日军士兵、警察和中方代表参加的对济南事件中被杀害日侨的尸检。尸检照片显示，被杀日侨中，有男性被割去阴茎，有女性阴部被插入异物，部分死者被剜眼剖腹（尸检照片中的一张后来被用作了宣传日军七三一部队活体解剖的假证据）。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谈判，中日两国政府于 1929 年 3 月达成了《解决济案协议》。其中规定，日本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保证在华日本人的安全。至此，济南事件以外交谈判的方式获得解决。这一协议是民国政府在弱国外交中的成功一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获罪洋人”而不以“割地赔款”了结的首例。南京政府对事件的处理虽然理性，但也不得不迎合举国的反日情绪，定日军实施报复的 5 月 3 日为“国耻日”，同时掩盖北伐军 5 月 1 日杀日本平民的国耻。

济南事件后，田中义一首相召开了讨论中国问题的“东方会议”（自认脱亚入欧的日本称中国为东方）。会上，执政党政友会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担心武力入侵中国违反九国条约，将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麻烦。会议决定，在中国的内战危及日本在满洲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会后，苏联情报机关伪造了一份内容显示日本计划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在中国散布，一方面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希望挑起中日战争，另一方面转移中国人对苏俄霸占满蒙的注意。1929 年 2 月，《田中奏折》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报刊上登出，成功地煽动起了中国人的仇日情绪。日本外务省得知后向国民党政府抗议说在中国流传的《田中奏折》系伪造的（至日本二战战败投降，盟军方面没有发现日文版《田中奏折》文件或副本，让人相信日本外务省的声明真实）。苏俄与日本因争相向中国满蒙扩张而长期为敌。从五四运动，济南事件、南京事件、

全国抵制日货运动等等，苏俄借制造事端煽动中国人仇日掩盖自己霸占满蒙。《田中奏折》是苏俄制造中日争端获渔翁之利的策略之一。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1928年5月底，国民党北伐军四个集团军乘胜追击，分别占领了保定、大同、张家口，逼近平津。在讨赤战争败局已定情况下，张作霖下令停战，命奉系军队向关外退却，命张学良主持京、津。6月2日，张作霖发表返奉通电，对讨赤失败表示遗憾，宣布退守满洲以避免进一步流血。6月4日晨，返奉的列车在京奉、南满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被炸，张作霖遇刺身亡。他因为对抗苏俄向满蒙扩张，抵制苏俄赤化中国而遭暗杀。

俄国“十月革命”后，张作霖积极推动中国政府恢复对满蒙的主权。1920年底，苏俄通知中国红军将进兵外蒙古。张作霖敏锐地感到，苏俄实际是宣布它将继承沙俄在外蒙古的地盘，不承认中国对外蒙主权，认定苏俄不仅要蒙古，更要满洲，其对华宣言是欺人之谈。他强硬地要求北京政府回复苏俄说：“蒙古之事纯系中国内务，无须他国干涉”。根据他的立场，北京政府拒绝了苏俄要求出兵外蒙古剿匪的要求。从这时起，苏俄将张作霖列为了在华头号仇敌。从这时到北伐战争的几年间，苏俄拉拢吴佩孚，扶植孙中山、冯玉祥，提出“打倒军阀”口号和“国民革命”目标，策动冯玉祥与郭松龄结盟，策动郭松龄反奉，发动北伐战争等等行动的目的都是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张作霖和北洋政府。

1926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指出直奉争斗的结果将是助苏俄赤化中国，大家共同的威胁来自苏俄，说服吴佩孚加入讨赤联军，携手抗击苏俄扶植“南北二赤”颠覆中国政府。张作霖牵头组成讨赤联军后，斯大林下达了对张的暗杀令。8月，苏联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别尔金将军与三处(亚洲处)处长研究后，决定派境外工作经验丰富且通晓中国事务的特工站站长 K.萨尔嫩率布尔拉科夫、梅德维杰夫、费拉先科等人组成的特别行

动小组执行刺张任务。别尔金在给萨尔嫩的信中说：“萨尔嫩·克里斯塔甫同志，我们的党中央及斯大林同志都认为，中国的大军阀张作霖是我们在远东、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北亚开展苏维埃革命遇到的最大障碍，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总部决定派你去中国，组织并实施暗杀张作霖的绝密计划。”9月，布尔拉科夫在绥芬河车站被奉系侦缉队抓获，暗杀计划失败，张作霖躲过了一劫。[4]

12月，张作霖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成为中国对抗苏俄赤化的最高领袖。应对苏俄在东北三省策动暴动，他于1927年3月派兵搜查了苏俄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查封了苏俄在哈尔滨的运输公司代表处。4月，张作霖在列强各国公使团的支持下派军警强行搜查了苏俄驻北京领事馆，逮捕躲藏其中的李大钊等一批俄党，端掉了苏俄使馆内的指挥颠覆与情报特工中心，下令将搜获的苏俄策动颠覆中国政府的大量机密文件公之于众。机密文件中派中共党员从内部夺取国民党党权军权的计划帮助蒋介石下决心对苏决裂。

张作霖公布苏俄机密文件后，斯大林再次下令暗杀张作霖。奉斯大林之命，苏俄特工萨尔嫩、维纳罗夫、埃廷贡等人在哈尔滨会合，开始了另一次暗杀部署。1928年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密电暗杀行动组：“张作霖拟在6月3日乘火车从北京站出发。你们要秘密行事。同时提醒他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对俄视线引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到日本人身上。”6月2日晚，萨尔嫩收到莫斯科传来的张作霖所乘列车时间及车厢情报的密电。[5]为了嫁祸日军，苏俄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列经过时，守候在附近的埃廷贡引爆了炸药。

皇姑屯事件后，莫斯科将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特工调回国内，在几年后授予萨尔嫩苏联英雄金质奖章、授予埃廷贡苏联政府授予最高奖章——列宁勋章、保加利亚共产党则授予维纳罗夫社会主义劳动勋章。[6]1933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家组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以及

皇姑屯事件。李顿调查团数月调查未能查明皇姑屯事件真相，报告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中”。二战后，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于 1946 年 1 月 19 日发布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并重新审理皇姑屯爆炸案。这引起了苏联的极大担心。为了防止真相暴露，苏联国家全部让早已成为苏联间谍的冈田启介在关东军中物色替罪羊。冈田启介选定了弟子河本大作出面承担。此时躲在华北的河本正走投无路，按照恩师的指示写出了那篇广为人知的《我杀死了张作霖》供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调查后认为河本的供词缺乏证据，未予接受，同时决定对缺乏证据的皇姑屯爆炸案不予专门立案。1975 年，埃廷贡在写给当时的苏共政治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透露，他曾奉捷尔任斯基派遣到中国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7] 虽然日本方面始终否认关东军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但国人被苏俄和国共两党联手长期灌输而相信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军方所为。

在 1920 年代初的中国，张作霖最早认清了苏俄继承沙俄对华野心和苏俄赤化中国的灾难性质。经过一番混战，他与吴佩孚相继认识到了武力统一中国之路带来灾难，转而认同联省自治的道路。由于苏俄赤化中国动用的资源极其巨大，张作霖无力对抗赤化，讨赤失败是必然的。国共两党后来长期宣传说，张作霖、吴佩孚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其实，若真有列强像苏俄那样动用巨额资源支持，张作霖、吴佩孚的讨赤联军、安国军也不至于被消灭。张作霖领导的讨赤事业代表中国对苏俄霸占满蒙的抗争，代表着中国对苏俄赤化的抗争，代表着中国联省自治走向共和联邦的道路。张作霖为此抗争付出了生命。几十年后，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连绵祸害后，国人才能真正认识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悲壮。

张作霖之爱国爱民不仅表现在领导讨赤，还表现在热心教育事业。1916 年，他出任奉天省长伊始，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

手，更无以希望。”他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占全县岁出总数的 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标准之一。1917 年，他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提出吉、黑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教育部谓“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未予批准，他再致函教育总长强调在奉省设立高师学校的必要性。教育部终于同意将计划内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得张作霖特批的奉天省政府资助，奉天的师范学校免收学费，还发给伙食费。

在推动办师范教育的同时，张作霖大力推动出洋留学，下令对奉省二十县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统计。得知奉省在日留学生有只有 68 人，他决定增派两批公费生赴日，并派员赴日了解留学生在日情况，推出《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十六条》以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1919 年，日本物价飞涨使留日学生的生活困难，他下令给公费生增加资助，对学习指定学科的自费生给予额定奖励金。1921 年 10 月，教育部发出文件，将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遣送回国。张作霖听说后捐出十万元汇给这些留学生解燃眉之急。司徒雷登在北京办燕京大学，找张作霖筹款，张听了介绍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出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慷慨解囊。[8]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创办了东北大学。他对奉天省长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1923 年 4 月 26 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1925 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校园面积之大，国内首屈一指。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 300 元，南开 240 元，东北大学则为 360 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

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吸引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继东北大学之后，张作霖又于 1927 年以北京交通部名义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张作霖去世时，奉天全省职业学校达到 45 所，省立 6 所，县立 39 所，在校生达到约 5000 人，东北大学为全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多，学生最多的大学，有教授 300 人，学生 3000 人，每年经费为北京大学的三倍多。衡量一个统治者是否爱国爱民，一个简单的标准是看他是否热心教育。以此标准衡量，以袁世凯、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爱国爱民的政府。

张作霖遇刺身亡后，奉天省长刘尚清秘而不宣，避免了东北局势陷入混乱。两周后，张学良回到沈阳才为乃父发丧，奉系开始推举东北最高军政领袖的继任人。张作霖生前培养张学良不遗余力。奉系集团成员都清楚张作霖传位于长子张学良之意。郭松龄兵变中，张作霖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再以旧部感情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力主对参与兵变的军官既往不咎，一概留用。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让儿子作好人。通过郭松龄兵变的处理，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在奉军中的指挥能力和号召力，不再小瞧张学良。从此，张作霖放手让张学良独当一面，把七个方面军中嫡系的三、四方面军交由张学良指挥。被国民党北伐中败退入关后，张学良指挥的三、四方面军主力基本没受损失。张作相是张作霖的绿林结拜兄弟，深为张作霖倚重，在东北军界、政界深得人心，得到更多将领的推戴。但他无意角逐东北最高权力，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位。在 7 月 2 日的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大会上，张作相力举张学良，当众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中老一辈最有分量的人

物，张作相这番话一锤定音。大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司令。7月3日，张学良宣誓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23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宣告成立，推举张学良任委员长，统一管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重大事务。

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之初就向日本方面承诺北伐的目标范围不包括东北。占领北京后，他决定停止用兵，只求名义上统一全国。张学良也希望停战，派代表与国民政府展开了归顺中央的谈判，提出了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保持东北军权，财权独立的易帜条件。11月，张学良以贺天皇加冕为名，派莫德惠赴日，征询日本对东北易帜的态度。田中义一首相表态不反对易帜。经过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当局达成了东北易帜协议。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从三民主义，东北政府机关全部取下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改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2月30日，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武力北伐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令只及东南数省，大多数省份仍处于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易帜后的东北更是独立于中央政府：行政上，政务独立，中央政府只是名义上补行任免手续；军事上，三十万奉军，包括海军、空军不受中央政府调动；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为财政独立，不向南京中央财政解款，东三省流通独立货币——奉票。因此，东北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只是名义上的。

上台后，张学良实施了铁腕清除杨宇霆的预定计划。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在历次奉军出关作战中任总参谋长，负责指挥奉军各部，成为奉军内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领们的首领。1929年初，张学良设下圈套，将威胁他权力地位的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逮捕处决，通电宣布杨、常二人狼狈为奸，阻挠易帜，用人唯亲，动用公款等罪状，是为“杨常事件”。在郭松龄反奉中，杨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严惩附郭的将领，

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得到奉军广大将领的支持，张学良清除了杨、常，巩固了东北最高军政领袖的地位，成为二代“东北王”。

北伐战争结束

奉军退出关外，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了北京后，蒋介石以北京克复，向国民政府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国民政府和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人通电挽留。9月，北伐军消灭了讨赤联军张宗昌，褚玉璞余部。随着新疆、东北易帜，北伐战争结束。

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战争。新生的苏俄宣言废弃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沙俄自中国攫取的权益。在与苏俄谈建交的三年中，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要求苏俄履行宣言承诺，自蒙古撤军，收回中东铁路。苏俄背弃宣言承诺，一面在建交谈判中耍赖，一面指挥国、共两党发动拥苏运动，以扶植国民党武力推翻相威胁，迫使中国政府从坚持了三年的立场上一退再退，最后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放弃坚持了几年的要求与苏俄建了交。建交的同时，苏俄在中国南方开办了以颠覆中国政府为宗旨的黄埔军校。从1924至1927年，苏俄货轮先后六次运送军火到广州、汕头港口，武装国民党反政府党军，苏俄由陆路经乌兰巴托运送大批枪械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以近亿的金钱、军火，扶植起了反政府的“南北二赤”，派出数以千计的千军事顾问技术兵，指挥二赤击败张作霖、吴佩孚为首的讨赤联军，推翻了中国政府。这一屈辱的历程就是苏俄和国、共两党所称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带给中国的是倒退。清末以来选举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是中国追随世界潮流进步的成果。而这些进步成果随着北伐军各省而被取缔，代之以国共两党的党部。

在所谓国民革命过程中，苏俄将其驻华使领馆办成了颠覆中国政府的指挥中心，在中国各地策动杀人放火的“三大运动”（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指挥革命党，指示中共地下党领导北伐军对外国人实施暴行，指

示在暴动中采取烧杀等极端措施，将中国广大地区推入了战乱与血腥，留下尸横遍野和大片废墟。了解了北伐战争的灾难性质也就了解了张作霖领导的抵抗赤化战争的正义与悲壮。从苏俄对华宣言到北伐战争，中国的各种“反帝运动”、“爱国运动”都是苏俄金钱资助的产物，各种名目的反帝组织其实与爱国无关，不过是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真正爱国行动是张作霖的讨赤和蒋介石对苏决裂的四一二事变。

国、共在当权后都极力掩盖因苏俄扶植而上台的劣迹，将北洋政府、北洋时代宣传成反动统治和黑暗时代。在二十一世纪回首，人们会发现，北洋政府时代政治进步，人民自由，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和众北洋将领之爱国爱民远非其后革命党政府所能比拟，国共给张作霖、吴佩孚戴上的帝国主义走狗帽子戴在它们自己头上才合适。可以说，若无日、俄输入革命战乱，中国立宪共和的目标本应在北洋政府时代达到。

第 18 章 党国时代开始

国民党训政

1906 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定了推翻满清的《革命方略》。其中心思想是革命党独裁，不给其它政党留下任何活动空间。1924 年，孙中山手书了根据《革命方略》和共产国际文件修改制定的《建国大纲》。其中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在宪法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革命方略》中的革命党独裁和《建国大纲》的阶段设计是对清末以来立宪进程的倒退。宪政的要点是宪法权威高于一切，而上述方略、大纲规定革命唯一合法，其它党不允许存在，革命党党权不受制约，革命党内领袖独裁。孙中山借用西方“三权分立”说法，再加上传承科举制度的考试权和谏官制度的监察权，提出了“五权”架构，但其五权完全背离了“三权分立”中制约权力的核心理念，只起为革命党权高于一切装点门面作用，倒是与苏俄的党国体制理念相通。在以党权否定宪法权威方面，孙中山和苏俄没有分歧。因此，苏俄改组国民党时保留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鲍罗廷将五权构想与苏俄的党国体制结合，制定了“五权”统归国民党，党权由总理独裁的体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就职须宣誓服从国民党党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公布了根据《建国大纲》制定的《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宣布“军政阶段”结束，“训政阶段”开始。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武昌暴动纪念日这一天在南京举行了国民政府成立仪式，宣布国民政府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等五院，任命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后任于右任）分别出任各院院长。《国民政府组织法》体现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规定“五院制”只是名义上分权，实际党权一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政会）主宰五院，任命党员出任五院院长、副院长，作出施政决定命行政院执行；议决一切法律由立法院公布，立法院提出复议仅限一次，由中政会决定是否接受复议作出修改；司法院及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是中政会所定法律的执行者和解释者；考试院和监察院也是中政会的下属机关。国民党发布了《政府机关职员须入国民党令》和《宣誓条例》，要求政府职员必须宣誓“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于及努力于本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决议：无须召开国民大会制订约法，而由国民党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权利”。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训政时期为六年，到1935年结束。

虽然国民党在北伐中与苏俄决裂，南京国民政府仍是苏俄扶植的产物。苏俄引入中国的党国体制结束了清末以来政治多元，思想自由，组党自由的时代，开启了党国、党军的时代。对于国民党迁都、改国歌、换国旗、变政体为苏俄引进的一党独裁，章太炎抨击：“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1] 他沉痛宣布中华民国亡了，称自己已经成为民国遗民。章言有道理，民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本质的不同在于多元与专制。对于国民党的“训政”安排，胡适、张佛泉、萧公权等学者指出：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人民需要训练，国民党同样需要训练，因此不应另设一个由国民党训导人民的所谓训政阶段。胡适等人的反对意见被国民党拒绝。

神化孙中山热潮

孙中山逝世当月，鲍罗廷主持国民党高层作出决定，循苏俄供奉领袖尸体之例，将孙中山遗体送到协和医院做防腐处理，然后供奉于“水晶棺”内供民众瞻仰。1925年3月下旬，苏俄政府运来了“水晶棺”。但此时，孙中山遗体因防腐处理不佳变黑，不便再展示。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中央决定改为土葬，另制作中式沉香木棺，后又换苏制铜棺，将孙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准备按孙遗愿迁葬南京紫金山，因为十几年前孙中山文武百官拜谒明太祖孝陵时曾嘱随行的胡汉民等人说：待我他日辞世后，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实际表示要位列明太祖之侧，据说还有追随先祖孙权之意。

这时，国民党遇到了权力交接的难题。革命党内的权力交接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领袖更替须通过武力、暗杀或政变方式完成。国民党内有机会接任领袖的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展开了以神化孙中山为方式的竞争。汪、蒋、廖纷纷表示，将来要追随总理随葬左右，没有表示要随葬左右的胡汉民在推动神化孙中山也不遗余力。蒋介石在“东征”前线的黄埔军大会演讲中率先尊孙中山为“国父”，随后在党军中率先推行了“纪念周”，颁布了《总理纪念周条例》。条例规定：“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上午十时向孙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帅像时向青天白日旗行礼，然后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孙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最后演说孙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将蒋介石在党军中的神化作法推广到全党，开始在政府机关中举行总理纪念周。在众高层神化孙中山的竞赛中，国民党到处以“中山”命名地名，香山县改为了中山县，永丰舰改为了中山舰，在全国各地命名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广场等等。当时有独立报纸刊文批评神化孙中山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

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2]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修改党章，对“总理”一章增加附注说：“总理已于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保存此章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决定此后国民党党章虽有总理的规定而其党内再无新总理产生，将“总理”头衔永久留给孙中山专有。决议还在总章中增加了“纪念周”一节，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一次”。会后，国民党中央公布了《纪念周条例》。其中规定：“每周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纪念周程序为：（1）全体肃立；（2）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3）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4）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5）演说或政治报告；（6）礼成。纪念周仪式的核心“恭读总理遗嘱”，要求由主席带领诵读《总理遗嘱》。5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修订了《纪念周条例》，将纪念周确立为了党的制度，规定党员必须参加纪念周。

北伐军逼近北京时，蒋介石精心布署了“告慰总理”活动，派孔祥熙到北京西郊察看孙中山灵柩，指示文胆陈布雷撰写《祭告总理文》，要求“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北伐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效仿当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率文武百官祭告明太祖的作法，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到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举行了祭奠典礼，祭告北伐成功。仪式中，蒋介石颂读祭文说：“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担命之殷切，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李宗仁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司仪宣布祭告典礼开始，‘向总理三鞠躬’时，蒋介石忽然抚棺大哭，戴季陶、吴稚晖也随之大哭。有些人悄悄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

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蒋越哭越厉害，大家在旁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劝蒋不要再哭了，蒋哭个不停，至大家走了才不不哭了。”

祭告后，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将孙中山迁陵南京紫金山的正式决议。这时，国家连年战乱，人民极为困苦。据宋子文 1928 年 9 月全国财政预算委员会报告，北伐结束时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仅为 500 万元，而支出为 900 万元。在领袖崇拜的热潮中，高层中无人敢对民不聊生时修建浩大王陵提出异议。国民党不顾政府巨额亏空，在南京紫金山圈占风景区，花费相当于国民政府两年财政支出的民财为孙中山建陵。这样的决定在民国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议院制约，执政党不可能为所欲为。

与历代王朝一样，国民政府建陵也是各级官僚中饱私囊的盛筵。建陵完工前，国民党成立了总理奉安办事处，再制定了耗费巨大的奉安计划。1929 年春，规模空前的现代王陵建成，国民党安排了有史以来最气派豪华的奉安程序：派出以林森为首的迎榭专员携英制铜棺抵北平替换原苏制铜棺，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下令七日内全国降半旗，人民佩黑纱，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安排碧云寺起灵仪式，从香山步行抬到前门车站仪式，组织三十万民众护送灵柩，由南京开出专列，出动陆海空军赴北平迎榭，安排沿途各车站地方最高官员车站迎送，蒋介石率众文武到浦口车站迎榭，威胜舰载灵榭过江，三天公祭，蒋介石率中央委员三人一班轮流守灵。6 月 1 日，蒋介石主持隆重奉安大典，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国民党再组织数十万民众送灵，灵榭抵达紫金山入墓安放，其间礼炮七次大鸣一百零一响。[3] 奉安过程成为国民党高层攀比隆重的竞赛。

国民党内各派军头不甘在神化孙中山方面让蒋介石专美，各展拳脚。冯玉祥在孙中山逝世后即行动，下令所部国民军下半旗致哀，并提出极端主张，建议将北京天安门广场作为国民党的国葬场，安葬孙中山于此，然后再将黄兴、蔡锷均移葬于此，声称以此鼓动革命精神。他还强调“孙中山临死之时，

犹言余是其好朋友也”。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在其控制的豫、陕、甘几省地盘也大搞孙中山崇拜，大建孙中山纪念场所，以作为与蒋系中央抗衡。在其控制的豫、陕、甘几省地盘也大搞孙中山崇拜，大建孙中山纪念场所，桂系的动作也不慢。国民党二大会后，桂系立即在梧州北山举行了中山纪念馆奠基典礼。北伐胜利后，桂系在其控制的新老地盘也大建孙中山纪念场所。一时间，国民党各派系以神化孙中山为争权夺利手段，将全国各地搞得乌烟瘴气。有识之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乏谴责。其中章太炎做挽联抨击国民党奉安道：“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然而，在党国体制之下，国民党为所欲为，几年后又为廖仲恺搞了气派豪华的迁葬，耗费巨资将廖迁葬孙陵之侧。革命党口口声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国民党高层们心中理想是求追随专制残暴的明太祖，要求在紫金山麓排列出新一代的汉族王朝，而且要求规模超越历代王陵。

在神化孙中山热潮中，著名报人王芸生披露了孙中山 1914 年 5 月 11 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4] 将孙中山倚日卖国的部分劣迹曝光。在日本压迫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时，黄兴、陈炯明等革命家宣布放弃推翻政府的革命活动以支持政府对日交涉，但蒋介石等人追随孙中山“倚日”，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奉孙之命到山东、满洲日军占领区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在苏俄提出通牒压迫北京政府承认满蒙被占时，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众高层集体投靠了苏俄，充当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国民党众高层清楚，为了党国的利益，大家必须齐心协力维护孙中山的形象。于是，国民党控制舆论，极力掩盖孙中山在日本、苏俄以最后通牒压迫民国政府拆台卖国的事实，隐瞒孙中山倚日、投苏、卖国、暗杀革命同志，先作日本傀儡，再作苏俄傀儡的劣迹，将日、俄操纵的革命活动尽量篡改为是孙中山领导，以革命纪事中大量加上“奉孙中山之命”字眼。

在隐瞒孙中山卖国、祸国劣迹的同时，国民党在全国扩大“总理纪念周”会党仪式的规模，强迫全国、全社会参与神化孙中山的会党仪式——“纪念

周”。一时，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充斥《委员长蒋主席国府纪念周训词》、《胡汉民先生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等关于“纪念周”报导。国民党在《纪念周条例》中将“纪念周”程序和内容规定得复杂烦琐。例如，《纪念周仪规》对会场规定：凡举行纪念周的地方均需悬挂总理遗像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及“天下为公”横批，并左右配有党旗和国旗；对仪式程序规定：“全体肃立”、“唱党歌”，“向总理遗像和党国旗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全体随主席循声朗诵总理遗嘱”，然后是“主席讲话”或请其他人作报告。讲话后，全体宣读党员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信义为立身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勤俭为廉洁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清洁为强身之本”；对“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仪式规定：第一分钟是让人们“默默地想着总理底遗教，默默地思维着总理给我们的关于国民革命的目的、方法、工具和手段”；第二分钟是“将过去一周的工作检阅一下，究竟有无违背总理遗教的地方；.....如果有的，应如何面着总理遗像切实地忏悔，如果过得去，应如何分外的努力以实现总理底主义？”第三分钟则是“严密地计划一下，究竟未来一周的工作，要如何才能不违背总理的遗教，要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党忠实信徒的工作，.....要如何才能发扬总理的主义”。参加的学生们后来承认他们在长达三分分钟的静默中忍不住要笑；对着装规定：“参加纪念周人员之服装，除已有规定之制服外”，男性须穿礼服（素蓝色黑褂）或中山装，女性须穿长褂或衫裙，而且“服装材料，一律用国货。其颜色以适合时令、整齐划一为主旨”；对参加人员的站位与次序规定：参加人员“排列次序，依照礼堂之大小，按男左女右，酌量规定”。这样不断重复的烦琐形式引起人们的厌烦。对此，国民党不准精简烦琐，安排“纠仪员”检查到场情况，对无故不到者和失仪者均须报告主席纠正，在学校强制推行“纪念周”，向学生们灌输孙中山神话，否定思想自由。

为营造孙中山传人地位，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执会作出决议，将孙中山诞辰日、伦敦蒙难日、第一次暴动纪念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念日、就任非

常大总统纪念日、广州蒙难纪念日、逝世纪念日统统规定为法定纪念日，强迫全民在纪念日参加纪念孙中山活动，随后再将“总理纪念周”升级为“国父纪念周”，将孙中山作词的黄埔军校校歌规定为国歌，规定“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悬旗庆祝；总理逝世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

“纪念周”表面上是对孙中山的纪念，实际是国民党推行专制、独裁、扼杀自由思想的工具。1948年，在政权行将垮台时，蒋介石同意了机关团体停止举行纪念周，停读《国父遗嘱》。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神化孙中山，而是将神化运动带到台湾，在台湾建造了气势宏大的“国父纪念馆”，安排几十位空军士兵长年为大厅中的孙中山雕像轮换站岗，还规定站岗的两个士兵要纹丝不动，派军官去摆正他们的领带、军服，测量士兵两脚之间的距离。这种情景之荒诞比国民党在大陆推行“纪念周”更甚。蒋介石毕生神化孙中山的用意是神化自己。通过在军队中大力推动“总理纪念周”、神化孙中山的活动，他达到了训导军队效忠于党国、效忠自己的目的。晚年，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他没有反省的是，同盟会、国民党也不是中国的产物，而是日、俄扶植的产物。袁世凯临终承认称帝错了，而国民党人没有袁的那份坦荡，不会反省追随孙中山先投日、后投苏给中国带来的祸害。蒋介石去世时，国民党按照蒋介石神化孙中山的套路，在修改《国民党总章》，在“总理”一章之后又加了“总裁”一章，规定不再产生新总裁，将“总裁”头衔永久留给蒋介石专有，变相承袭了太祖、太宗，然后列祖列宗的帝制传统。清末民初，中国政党林立，没有哪个政党刻意强调领袖独裁，对领袖顶礼膜拜。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对清末民初进步的反动，革命党隐瞒投靠外国势力，充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政府工具等等劣迹，大搞党领袖崇拜，这就是所谓革命传统。

人权运动

对于国民党剥夺人民思想自由，大搞“纪念周”的倒退，胡适带头在中国公学公开抵制举行纪念周仪式，并抨击说：“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5] “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6]

1929年3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动了捍卫思想自由的人权运动。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中国的“五大仇敌”，“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针对“五大仇敌”，他主张进行一点一滴改良。针对革命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祸害，他提出要“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对“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扰乱国家社会的安宁”、反对“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没有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7]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出版了中国的人权运动的宣言书——《人权论集》。在序言中，胡适挑战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国父神话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他指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冯玉祥诸公也需要入塾读书；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

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8]“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一个当国专制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9]

罗隆基提倡人权说：“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0] 他在其“三十五条”“人权宣言”中宣告：主权在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人民允许不得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受国家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不得有宗教、政治信仰、社会阶级及男女的限制；国家保障国民私有财产：凡一切不经法定手续的没收及勒捐，均为违法；同时，国家也必须保障人民就业，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普及教育，不得将教育机关作为政治信仰的宣传机关；政府与官吏对全民负责：任何家庭或团体不得包办政府多数高级官吏；司法独立，法律至上：法律对全体人民负责，不向一党一派负责。法律应该约束政府，限制执政者的特权。任何人或任何团体不得处于超越法律的地位。军政长官无权解释法律、执行司法职权。法官人选不得有宗教及政治信仰的歧视。无论何人，不经司法上的法定手续，不受逮捕、检查、收押。不经国家正当法庭的判决，任何国民不受

任何惩罚。未经法庭判处，国家任何官吏不得以命令处任何人以死刑；军队对全体人民负责：不得以军事法庭代替普通法庭。非经政府的许可，任何军人不得在任何地点宣布军法戒严。他指出，国家是全体国民彼此合作以达到共同幸福的工具，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而存在，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当国家不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蜕变为某一家庭或某一集团的私有物时，人民就可以终止对它的服从义务，“民主政治，重要的条件是国家的统治权在国民的全体，不在某特别团体或特别阶级身上。”他批评国民党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说：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1] 他批判马克思主义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他直指马克思主义是“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12]

梁实秋指出：“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

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他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13] 他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各种思想并存，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国民党。他批评共产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14]

人权运动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国、共两党武力统一，暴力革命，革命党独裁，否定自由的信条根本对立，因而遭受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打击，被国、共两党共同斥为“反革命”。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发布了矛头针对公学校长胡适的《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强调公学教职员每日至少自修研究国民党党义半小时。高压下，胡适被迫辞职，只是因崇高声望而得免入狱。但于人权运动的另一领袖罗隆基因主张人权而

获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人权运动遭受打击时，罗隆基寄语未来写道：“百年后的读史者，当记住民国十八年的一段言论自由史，胡适因对《建国方略》和党义的批判，被认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15]

在二十一世纪，回望 1930 年的人权运动，人们倍感《人权论集》的思想光辉，倍感罗隆基早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公约》许多年的人权宣言之前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们不可能想象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比他们出版《人权论集》时更加狭小，批判革命党党义更加“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第 19 章 新军阀混战

第一次编遣会议

辛亥革命中，日本扶植的会党革命军遍地兴起，全国军队从清末的 40 万人翻番。之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护法”叛乱，苏俄扶植“南北二赤”，使中国军队数量再翻一番，达到 300 师 220 万人。北伐战争结束时，各路国民党新军阀成为国家的首害，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陷入每月 6000 万元的军费开支带来的危机。全部财政收入不够养兵，国民党新军阀们在地盘、税源和裁兵问题上冲突，南京国民政府与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一样，处于兵祸的严重威胁之中。

北伐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在北平碧云寺和小汤山两次讨论裁兵，提出了大规模裁军的《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设想削减军费，统一编遣全国部队，精兵简政。《军事整理案》的主要内容为：1、撤消各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到京师供职；2、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 50 至 60 个师，从各集团军中抽调精锐师直辖中央；3、编宪兵 26 万人，直隶中央。由于没有谈到裁谁的兵，会议没有出现反对意见，大家都同意成立“编遣委员会”主持全国裁军事宜。

这时国家名义统一，实际呈新军阀割据局面：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的占有南京、上海和江浙山东一带富庶地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贫瘠地区，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两市；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占有广西、两湖，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各路军事领袖都清楚必须裁兵，但谁也不允许裁自己的兵。因为，各路军队都是私家军。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了国军，军力迅速强大而

无内战之忧，但裁军时仍引起军人不满。在中国，私家军是各路军阀的命根，裁军就更难。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讨论消除割据和裁兵。关于消除割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两种主张在会上激烈冲突，双方均援引“总理遗教”为依据。孙中山当年在野时主张地方分权，主政时又主张中央集权。这种援引“总理遗教”的争论不可能讲清道理。在讨论裁兵时，李宗仁提出，裁兵不难，裁官难，建议由政府提供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作为裁兵的准备步骤。李的建议与撤政治分会的笼统决议一样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无力支付庞大军费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供大批军官出国旅游。实质问题无法解决，会议只能走形式，将蒋介石在汤山会议上提出的《整理军事案》再通过一次。其中笼统规定：“军政军令必须统一，全国军队数量必须裁减，军费预算不得超过财政收入的50%。”对国民政府财政而言，《整理军事案》提出的裁兵50万的目标即使能够达到，减半后的军费开支仍无法负担。因为，东北、西南的大部分省份不受中央染指，税收不上缴中央财政。中央政府无论怎样搜刮东南数省也无力供养全国暴增的国民革命军。全会能通过《整理军事案》是因为，该案它只说裁兵，不说裁谁的兵。全会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另外，蒋介石主导全会通过决议：在年底前撤消代表割据的各地方政治分会。与会者都知道，一纸决议并不可能消除地方独立状态。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高级将领在南京举行专门商讨裁兵的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编遣会议）。他采取几项举措作为裁军的铺垫。第一，他安排全体与会者向孙中山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反，愿受本党最严之处罚，谨誓”，要借仪式要求各派系服从党权；其次，他作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专题报告，要求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时的

日本四藩于大功告成后“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第三，他主导会议决定成立以自己为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第四，让宋子文向编遣会议作财政状况报告，坦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仅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要求会议通过决议：各省不得截留应解中央款项，裁减兵额。

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会议提出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其中规定全国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及海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设编遣区；全国设七个编遣区，通过裁兵使总军事支出不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 41%。然而上述一系列铺垫还是没有涉及裁谁的兵。蒋介石知道，不涉及实质问题的几次会议没有意义，于是硬着头皮切入主题，提出以汰弱留强为裁兵原则。蒋的黄埔系是当时最精锐的军队，汰弱留强显然是要多裁其它派系的军队，暗示首先“编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冯知道蒋的用意，针锋相对地提出裁无功留有功，要求先裁蒋的第一集团军所收编的十几万军队。当涉及触动私家军的关键问题时，会议陷入僵局。没有任何派系山头甘心被裁减。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因所占地盘贫困、狭小而心怀不满，认为蒋介石是在借裁兵削弱异己，在会议中途离开了南京以抵制编遣。地盘实惠的阎锡山保持沉默。冯、李一去，蒋介石主持了近一个月的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几大军头各自准备兵戎相见。

蒋桂战争

编遣会后，李宗仁、蒋介石不约而同派要员，带着优惠条件去拉冯玉祥作盟友。蒋派邵力子到华阴见冯，洽谈联手讨伐桂系，开出推冯出任行政院长，山东、安徽省地盘归冯的条件。李宗仁一面以巨资拉拢冯玉祥联合反蒋。冯玉祥对蒋、桂两方均虚与委蛇，准备见机行事，讨更大便宜。1929年2月，蒋、桂双方在两湖调兵遣将。李宗仁与广东的李济深暗中结成反蒋联盟，决定首先清除桂系势力范围内听命于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然后以国民党武

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作出决议：将鲁涤平撤职，委任何键继任，派叶琪等部进军长沙。蒋介石了解到二李勾结，电邀李济深北上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兼调停中央与桂系的矛盾，将李调虎离山。冯玉祥乐于见到蒋桂要开战，印好了大量未指名的讨逆布告，准备见机行事。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电命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几个代表地方割据的政治分会立即接受裁撤。3月21日，蒋介石将到宁的李济深软禁，任命李的部将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掌管广东，瓦解了桂粤联盟。3月26日，蒋介石宣布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叛乱，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下令讨伐桂系，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任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令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铁路沿线，阻止桂军南逃；任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令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任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令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并以海军和空军配合作战，蒋桂战争爆发。

冯玉祥看清力量对比后接受蒋介石 200 万银圆和山东地盘的收买，通电讨伐桂系，将讨逆布告填上了桂系首领名到处张贴。此前已接受蒋收买的唐生智、何键、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也同时行动，唐与旧部动手将桂系白崇禧逐离了河北，何通电拥蒋，脱离桂系控制，李、杨前线倒戈，迫使桂系将领胡宗铎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月初，中央军占领了武汉，蒋介石一面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率部追击桂军，一面派人招抚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5月中，何键协同粤军夹击梧州，陈济棠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桂军主力，桂系大将胡、陶、夏通电下野出洋，部队听候改编，战局胜负趋向明朗。李宗仁不甘失败，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救国军”讨蒋，指挥白崇禧、黄绍闓分两路进攻广州。蒋介石任何键为第四路总指挥，由湘南攻桂林；任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由粤西取梧州；任龙云为第十路总指挥，由滇经黔攻柳州。5月25日，何键攻占了桂林、平乐。6月2日，何、陈的湘粤联军攻陷梧州。12日，倒

戈桂将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奉蒋之命南下协助粤军击败白崇禧、黄绍闾。27日，李明瑞占领南宁，李、白、黄等分别逃往香港、越南。蒋桂战争结束。

蒋冯战争

1927年宁汉分裂时，蒋介石为得支持与冯玉祥拜了把子。北伐中，蒋介石战败，被桂系逼迫下野。冯玉祥看到桂系无力主持大局，通电迎蒋复职，并提出要在郑州为蒋造铜像，蒋则赞冯“一柱擎天，唯公有焉”。北伐胜利后，冯要求控制京津，蒋担心冯势力过大，将京津交阎锡山控制。冯对地盘不满，在编遣会议上拒绝裁自己的第二集团军，中途称病离宁，乘预先准备好的铁甲车回到自己地盘。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背弃与桂系密谋的反蒋协议，通电拥蒋。

冯玉祥知道蒋介石击败桂系后会对自己动武，于是打算把依仗苏俄，利用苏俄的游戏再玩一次。他知道斯大林痛恨蒋介石“清共”，希望推翻国民政府，相信要打出反蒋旗号就会重获得斯大林扶植，于是暗中与苏俄方面联络。冯玉祥这次判断错了。因为第一，斯大林不仅痛恨蒋介石得援助壮大后决裂清共，也痛恨他冯玉祥得援助壮大后跟随蒋清共，即使他是礼送苏俄顾问回国，斯大林仍然对他怀恨；第二，斯大林对他反复倒戈的习性充满厌恶；第三，苏俄国内饥荒，政权虚弱，暂时无意介入国民党军阀间的战争；第四，斯大林需要先对付准备收回中东铁路的张学良。这一次，轮到斯大林利用冯玉祥了。虽然无意再次扶植冯，但斯大林不明确拒绝，而是指示制定一份援冯的计划，让冯抱着俄援幻想去发动战乱以配合苏俄在满洲对国民政府动武。

蒋介石在讨桂时对冯的收买只是个个击破的缓兵之计，开出的大洋、地盘等条件也只是空头支票。1929年5月中，蒋介石在讨伐桂军胜券在握后着手收拾冯玉祥，公布了一份苏俄支持冯玉祥向天津、浦口发展，消灭阎锡山，将中国西北与苏俄连成一片的文件，暴露冯玉祥再次投苏的同时离间冯、

阎，然后通电开除冯的国民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下令通缉。冯玉祥立即回应，在陕西华阴召开了第二集团军高级将领会议，宣布组成自任总司令的“护党救国军”讨伐蒋介石，命山东、河南各部军队撤至潼关集结，命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以绝蒋介石进兵之路。应以冯的反叛，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宣布冯玉祥“勾结苏俄、背叛党国”，将冯永远开除出党，将冯及其属下高级将领撤职查办。

长期以来，冯玉祥将西北军看作是自己的王国，对部下采取家长式统治，责骂惩罚甚严，曾对迟到的旅长宋哲元军棍责打。北伐战争胜利后，刘郁芬、孙连仲、门致中、宋哲元、韩复榘、孙良诚等西北军高级将领分别当上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南、山东等省主席，但冯玉祥对他们仍然动辄责骂，甚至在韩复榘提出不同意见时逼韩到门外去站岗。以如此方式统治庞大军集团和地盘，土崩瓦解是早晚的事。蒋介石了解西北军部将们对冯的不满，暗中以封官许愿加赠款策反了韩复榘、石友三。冯对韩等已有疑心，派心腹李兴中接管韩的军权。韩充分了解冯的反复无常，在华阴军事会议后立即回军，逮捕了李兴中，将部队拉到洛南，与石友三一起通电拥蒋反冯，宣布“维持和平，拥护中央”。倒戈将军冯玉祥这一次尝到了当年吴佩孚被他倒戈的滋味，痛哭失声，责骂自己瞎了眼，认错人了。韩、石通电反冯后，蒋介石通电委任二人分别为河南、安徽省主席并奖励军费。在部将倒戈，中央大军向西北军进逼，苏援无望的形势下，冯玉祥只得承认失败，于5月27日通电下野。至此，蒋冯战争在开战后不久即迅速结束。

第二次编遣会议

击败桂、冯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提出了《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宣言》，要求全国设立八个编遣区，其中四个由中央政府控制，实际是要求各实力派交出军权，暗示否则武力讨伐。各地军阀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私家军，会议仍然无法达成裁军和削减军费的目标。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巨额财政赤字无法应付请辞。

国民党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赖苏俄提供金钱武器之外，唯有向民间搜刮战费。四一二事变后，苏俄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费支持，蒋介石靠向上海、江浙的商界勒索军费完成了北伐。国民党的搜刮、勒索使弱小的民间资本不堪重负，其中主要被搜刮的上海的民间资本已近枯竭。宋子文知道勒索难以为继，因此选择辞职。蒋介石不批准宋的辞呈，主持会议通过议决，在编遣期内全国军费每月 **1884** 万元，财政统一中央。宋子文因编遣费用不足再请辞，蒋介石再挽留。无奈之下，宋子文只好收回辞呈，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 **5000** 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 **1000** 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

由于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通过的编遣大纲、裁兵方案还是无法落实。蒋介石只能继续以武力征服各地军事割据。这样，军队膨胀问题无法和平解决，国家陷入军队多，战祸多，军队再多的恶性循环。蒋介石可以武力击败一个个地方割据首领，但所有地方领袖都有割据的倾向，仗是打不完的，蒋介石始终无法摆脱各种反蒋联盟的困扰，始终无法达到真正的统一。裁军无疑是中央政府必须采取的举措。阎、冯、李等反对中央削权也有地方自治势力的道理。两次编遣会议的失败证明了苏俄为中国安排的武力统一道路无法包容各种政治势力和地方势力的诉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原大战

李宗仁、冯玉祥下野后，阎锡山感到自己将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收拾目标，暗中联络落败的李、冯，结成反蒋同盟。冯玉祥战败后宣称“洁身引退，以谢国人，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是假，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是真。得阎召唤，他立即出山加入反蒋。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和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积极声援反蒋同盟。一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齐集阎锡山旗下。

1930年2月，阎锡山通电促蒋下野。3月15日，鹿钟麟领衔第二、三、四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拥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锡山通电接受拥戴，在石家庄设立了总司令部，宣布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任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任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任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向济南进攻。

蒋介石对阎起兵早有准备，宣布撤销阎锡山本兼各职，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任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任何成础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任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在蒋与阎、冯势均力敌的形势下，坐拥东北军重兵的张学良成为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双方均委任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另许以河北、山西地盘。张学良暂时沉默，等待时机获得最大利益。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进攻令，中原大战（蒋阎冯大战）爆发。蒋军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冯军再夺回归德，阎军占领了济南，蒋军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南方桂军占领了长沙。经过几个月相持，蒋介石逐步取得军事优势，迫桂军退守广西，挫败了冯玉祥的“八月攻势”，迫使阎军放弃济南。9月，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取得全面胜利，阎、冯军节节败退。

战局明朗后，张学良接受蒋介石千万元的收买出价，通电拥蒋，率十万东北军入关，迅速占领了平、津、河北，与中央军配合击败了阎军主力和冯军残部。阎、冯部将纷纷倒戈，阎军残部逃往山西，桂系军退回广西，反蒋联军瓦解，冯、阎相继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大战的最大赢家不是蒋介石，而是坐收渔人之利的张学良。张入关收编了大批阎军、冯军，接管了华北，节制晋绥，势力极大扩张。

1928 至 1930 年，中国北方经历了严重的旱、蝗、瘟疫灾害，陕西、甘肃、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北方八省饥荒，灾民死亡一千多万。旱灾最严重的河南九成地区受灾，灾民约 1600 万人，全省日均饿死千人。国民党新军阀在这样的大灾荒中不断开战，四个多月的中原大战造成双方三十万军队人伤亡和更多的灾民死亡，使北方八省灾荒范围扩大至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全国灾民上亿。大战后的中原，战沟纵横，尸骨遍野，十室九空，瘟疫流行，满目凄凉。

北伐胜利后，国库囊空如洗，裁兵失败，新军阀战祸连绵。人数暴增的革命军必然残酷搜刮百姓，勒索军费，为地盘开战。苏俄扼杀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将中国引上了武力统一道路，埋下了北伐战后必然的新军阀混战祸根。编遣会议涉及的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中，三个半是苏俄扶植的产物，证明了张作霖关于苏俄祸害中国论断之正确，证明了张领导讨赤战争的正义性。革命党史书中的国民革命（大革命）、北伐战争、“底定全国”等等篇章的背后都是国人的累累白骨。新军阀混战的灾难让国人不能不念推行地方自治，和平改良，军队少，不穷兵黩武勒索商民的清政府、北洋政府，不能不怀念革命前的好政府。

第 20 章 “武装保卫苏联”

中东路战争

三百年来，控制远东和北太平洋区域一直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1891年，俄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开始修筑西起莫斯科，绕过中国满洲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当大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见日本击败中国获得巨大利益，沙俄产生了非分之想。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了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修建的方案，称可缩短路程，利于向中国扩张；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也建议：“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沙皇批准了维、罗的方案，俄国开始设法让清政府同意大铁路穿过满洲。

1895年，沙俄联合德、法干涉，迫使日本还辽，同时联手法国银行，向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清政府提供了四亿金法郎借款，使清政府得以支付首期对日赔款一亿两。1896年，俄国拒绝了清政府原拟的贺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加冕专使人选，指名要求李鸿章为专使。有求于俄的清政府同意了俄国的要求，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贺加冕。俄国隆重接待李鸿章，要求与李密谈西伯利亚铁路事宜。李鸿章抱联俄制日幻想，与俄展开密谈，随后与俄国外务大臣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李与罗拔诺夫条约》、LI-LOBANOV TREATY）。这一密约的主要内容为：共同抵御日本；如与日本发生战争，两国不得单独与日本议和；为对日本作战，中国所有口岸允许俄舰入驻；为俄国将来运输便利，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得穿过黑龙江与吉林地方以连接海参崴；俄国在铁路沿线享有派驻警察、享有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中俄密约》允

许俄国军队在中国东北畅行无阻，实际将中东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且，密约规定俄国拟建贯穿满洲铁路为宽轨。这意味，在中国境内修建的铁路只能与俄国铁路衔接，中国无法利用。维特向沙皇报告：“从政治和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根据《中俄密约》，清政府出银 500 万两（全部资金为 1125 万金卢布，中国股份约占三分之一）与俄国合组了华俄道胜银行，与俄方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由于华俄道胜银行由俄国控制，俄国实际控制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和修筑铁路事宜，章程中的“中俄合办”成为俄国践踏了中国对满洲主权的幌子，俄国实际攫取在满洲收税、经营国库有关事业、铸造货币，及布设内地铁道电线等等诸多特权。

随后几年，华俄道胜银行修建了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再根据 1898 年的《旅大租地条约》出兵占领了旅大。修筑中东铁路过程中，沙俄不破财反大赚其钱。因为，沙俄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工，枕木、石料就地取材，而掠夺的中国资源远超筑路投资。1901 年，李鸿章逝世。临终时，李被俄国公使拿着文件到病榻前逼在中俄密约文件上签字。《纽约时报》11 月 9 日披露：“李的逝世是因为与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为满洲条约问题激烈争论，导致吐血而亡。”

[1] 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沙俄交李鸿章签署的密约不是李在密谈时同意的文本，而是俄方人员趁李吃饭时掉了包的文本。1903 年，穿过东三省的中东铁路（东清铁道）建成。通过贯穿满洲的中东铁路，沙俄控制了满洲广大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每年从满洲掠夺走天文数字的资源，仅伐木一项一年就掠夺中国上亿元。

1919年，生存危机中的苏俄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当时被国际共管的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1920年，在政权开始稳固，红军开始进向西伯利亚的形势下，苏俄再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其中删除了《第一次对华宣言》曾提到的“不受任何报酬返还中东铁路等财产”的内容，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关键处修改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张作霖看穿了苏俄霸占满蒙野心，指出苏俄在对华侵略方面与沙俄无异，其宣言是对中国人的欺骗，要求北京政府以苏俄履行第一次宣言承诺、归还中东铁路、从蒙古撤军为建交条件。张作霖所言完全正确。苏俄在此后两年霸占了中东铁路、北满和蒙古，其扩张野心比沙俄有过之无不及。1923年，苏俄在谋求与中国建交的同时物色孙中山为代理人，决定以金钱武器扶植国民党武力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北洋政府和张作霖。1924年，苏俄胁迫北洋政府签署了屈辱的《中俄悬案大纲》，随后通过间谍哄骗张作霖签署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奉俄协定》。两协议签订后，苏俄拒不履行，拒绝与东北当局分享中东铁路的盈利和控制权。张作霖只得以武力维护在中东铁路和沿线地区的权益。1925年，苏俄以军火、金钱扶持冯玉祥作为推翻张作霖的工具，策动冯与奉系将领郭松龄发动了推翻张作霖的兵变。兵变被日本出手支持张作霖挫败。1926年，苏俄操纵国民党军和国民军（南北二赤），发动了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张作霖拒绝对苏俄压迫屈服，说服吴佩孚捐弃前嫌，组成“讨赤联军”对苏抗争。至1928年，苏俄推翻了北洋政府，派特工制造“皇姑屯事件”，暗杀了讨赤领袖张作霖。[2]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多次与苏俄交涉收回中东铁路谈判无果。张的“俄国通”秘书邹尚友建议说：“苏俄发生了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仇恨共产党政权，若能趁此机会对苏发难，一举收回中东路主权，苏俄无力反抗，世界列强将支持中国的行动。”接受建议，张学良决定强行收回中东铁路。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根据冯玉祥通苏准备叛乱的密报，派军警强行搜查了苏俄驻哈使馆，搜出了苏俄准备再度扶植冯玉祥推翻国民政府的秘密文件，

然后下令将苏俄驻哈总领事、中东路各站负责人等 39 人逮捕，将中东路局苏方正副局长免职，是为“五二七事件”。事件后，苏俄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一面增兵海兰泡，满洲里。7 月 10 日，张学良派兵占领了中东铁路，驱逐俄籍人员，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共产团、妇女部、童子共产团，查封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外机构，派白党俄人接收机务处、车务处，并逮捕苏方 200 余人。7 月 13 日，苏俄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限三日让俄籍人员复职重掌中东铁路的最后通牒，同时破坏了乌苏里江铁桥。国民政府拒绝了最後通牒后，苏俄断绝了与中国的铁路交通，扣留中国在黑龙江上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

8 月 6 日，苏俄抽调陆海空四万大军，配以飞机、大炮、战舰和首次装备的 MC-1 型坦克，组建了侵华的特别远东军，由主持国民党北伐的加伦元帅（布留赫尔）任司令，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设立了司令部，布署向中国开战。8 月 15 日，张学良下达防俄动员令，组建了防俄军，任命张作相、万福麟为防俄军正副司令，招募反苏的流亡白俄加入防俄军。8 月 17 日，张学良代表国民政府对苏宣战。当天，中、苏军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扎兰诺尔展开激战，双方互有胜负。国民政府军被叛乱的冯玉祥拖住，无力援助东北军。10 月，苏俄特别远东军主力侵入中国东北。至 12 月，苏军攻占了海拉尔、扎兰诺尔和满洲里，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 17 旅旅长韩光以下 2000 余官兵全部阵亡，东北军败退。苏军担心再向南追击引发日俄战争，在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瞎瞎子岛后止步。至此，中东路战争以东北军惨败的结束。

12 月 22 日，张学良的代表蔡运升在伯力与苏俄代表苏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以恢复战前苏俄在满洲权益为主要内容的《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苏军开始撤军。战争的结果是，苏俄不仅仍旧霸占中东铁路，又霸占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瞎瞎子岛等岛屿。由于《伯力议定书》过于屈辱，南京国

民政府以所议超出中东路范围而不予批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蔡运升越权渎职，从严议处；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外交部长王正廷为谈判越权事件引咎辞职，获国民政府挽留。经张学良同意，国民政府改派新任中东路督办莫德惠前往莫斯科就中东铁路事宜与苏俄重新谈判。由于苏俄坚持伯力议定书有效，重开的谈判经 25 次会议而无结果，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中苏谈判不了了之。

中东铁路战争是了解苏俄十年在华所作所为的钥匙。新生的苏俄在政权危机中向中国人民开出了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和沙俄一切在华权益，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空头支票，在政权巩固后霸占蒙古和中东铁路，将阻止它实现向满蒙扩张的北洋政府和张作霖列为首要敌人，以金钱军火扶植“南北二赤”，武力推翻维护中国主权的张作霖、吴佩孚和北洋政府。其十年来的中国政策围绕双重目标：向中国输出革命与霸占满蒙。十年间，苏俄通过国、共两党发动的“反帝”、“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所谓反帝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绝口不提收回在华的最大租界——中东铁路地区。当国民政府要求收回中东铁路时，苏俄与沙俄一样，赤裸裸地武力侵华。当年沙俄决心武力霸占满蒙，只是因为其它列强不答应才被迫从满洲撤军。苏俄同样决心武力霸占满蒙，只是因为日本不答应而退缩。若无其它列强牵制，满蒙必如库页岛、海参崴一样，被并入俄国版图。

中东路战争中，在苏军向东北军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除通电号召“诸将士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之外并无军事行动。除了陷于新军阀混战腾不出手之外，国民党政府怯于对苏强硬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人靠承诺出卖满蒙先匹敌日本扶植，后获苏俄扶植而壮大，而上台。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得苏俄扶植而上台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像张作霖和北洋政府那样理直气壮地维护满蒙主权。

中共开除陈独秀

随着输出革命的规模扩大，苏俄感到了众列强联手抵制止共产主义及再次对苏武装干涉的威胁。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提出了以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依据，称“谁无条件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革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在 1928 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命令各国共产党以“保卫苏联”为基本纲领。在张学良缴获冯玉祥通苏文件，逮捕中东铁路苏方人员的“五二七事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了《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调红军向大城市进攻，扰乱国民政府后方，策应苏联的军事行动。

奉共产国际之命，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命各地中共在 8 月 1 日举行全国示威，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动员中国人“到街上去”，以“表示我们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拥护苏联的决心”。[3] 1929 年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宣称“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中共中央连续下达了《中央通告第 41 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 42 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等文件，在其中宣称“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指示各地中共在城市组织“飞行集会”、示威、罢工，指示红军从后方打击国民政府，派刘少奇到哈尔滨，派任弼时、潘汉年到上海，分别发动声援苏俄的示威请愿运动，组织成立声援苏俄的“反帝大同盟”组织，由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领袖带头，在《红旗》等党刊上大量发表拥苏反华文章，否定国家民族利益，鼓吹“阶级共同利益”，宣称“在中国境内建筑的中东路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谴责东北军要求收回主权

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号召“以铁血来保卫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声称“要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

对于这种在两国交战中为敌国助威的行径，被罢免的前领袖陈独秀以“撒翁”笔名连续三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以铁血保卫苏联”等口号，称“这样的口号会使群众误会我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卢布党”，批评中共中央“随便把群众领到街上玩弄”，并要求将他的信在党报上全部刊出，让全党讨论。中共中央向党员隐瞒了陈信的内容，在党刊《红旗》上刊出《中央答复撒翁的信》等文，斥陈独秀的意见为“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威胁若不改变主张将开除党籍。[4] 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为首的一批中共党员了解到陈独秀信的内容，组成了名为“无产者派”的小组织，支持陈独秀的意见，形成了以陈独秀为精神领袖的中共党内的反对派。

9月，中共中央再发出《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在其中指责陈独秀“搞小组织活动、反党宣传和反革命活动，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对于中央的指责，陈独秀反驳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对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10月，在苏军向东北军进攻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了指示信（十月来信），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尤其是在东三省开展革命和罢工运动，扩大游击战争，扰乱国民政府后方，配合苏联作战。根据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在其中斥陈独秀及其支持者们提出反对意见与苏共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挂钩，一起斥为“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60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要求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

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并建议苏俄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打回中国，与政府军作战。[5] 11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以“革命取消派”（托陈取消派）罪名将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高语罕、李孚、郑超龄、尹宽、马玉夫、蔡正德等反对派党员开除出党。被开除后，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抨击中共中央“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断送党，断送革命”，并与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等 81 位反对派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其中谴责苏联侵华。

共产国际和中共并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取缔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因为，中国的职业革命家们均依靠外国金钱从事革命活动，党的工作人员均享有高于工人收入的“革命工资”，作革命家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那些“半脱产”的“革命职业家”们都希望获得足额资助成为“全脱产”的职业革命家。被开除的反对派没有了莫斯科的资助，立即需要去各自谋生解决温饱，连会都开不起来，不用取缔就很快散伙。长期靠“革命工资”生活的张国焘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靠翻译为生，如果我出来，靠什么生活好？”[6] 张此言道出了一个道理：外国的金钱是中国革命之车的燃料。陈独秀信中所言“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会让外界误以为我们是卢布党”说法极为可笑。因为，中共是“卢布党”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存在“误以为”。张作霖在宣言讨赤时明确指出，国、共两党是“卢布党人”，是苏俄赤化中国的工具。翻开当时《时事新报》和《醒狮报》等众多报纸，抨击国、共两党为“卢布党”的文章比比皆是。[7] 陈独秀确实曾拒绝作卢布党人，但在共产国际花大钱将他从监狱赎出来后，他承认没有卢布不行，低头作了卢布党人，定期编制用款申请的用款报告。虽然他代表中共签收的是美元或银元，[8] 但钱来自苏俄。从 1923 年至 1927 年四一二事变，苏俄扶植国民党、冯玉祥的卢布、美元以千万计。如此巨额的金钱加军火足以推翻张作霖、吴佩孚，改变中国的走向。中共六大任命的总书记向忠发后在供词中承认，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金钱不是卢布，而是美金，其数额巨大。[9] 从建立中共到中东路战争，苏俄扶植中共的卢布、美元以百万计，中共所有的会议和决议无一不是苏俄经费

的产物。苏俄的金钱是中国各地武装暴动，红军和苏区得以创建的源头。领取苏俄革命工资的中国革命家们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苏俄入侵时会心安理得地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中东路战争结束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扶植成立所谓反帝组织的反政府行动没有停止。继“反帝大同盟”之后，共产国际又成立了“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艺作家联盟”、“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名目繁多的左翼团体。这些团体本质上与“反帝大同盟”一样，都是由交战敌国决定成立，提供资助，服务敌国利益，以扰乱中国后方为己任的敌国外围组织，即卖国组织。

建立中共时，共产国际就申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要求中共党员们消除国家、民族观念，站到国际，即站在苏共的立场从事革命工作。陈独秀不同意这样的要求，但委曲求全，作了傀儡领袖，不得不接受每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说法。罢免陈独秀领袖职务后，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专门一章强调“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在中东铁路战争中，陈独秀终因不能摆脱国家、民族观念而被中共开除出党。

被共产党开除后，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上的反省。在 1930 年代被国民政府监禁的五年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反省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这时，在西方世界大萧条背景下，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抨击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抛弃自由、民主、宪政理念。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军事工业化，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衰落，民主宪政国家锐减，西方知识分子纷纷鼓吹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胡适慨叹：“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制度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

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10] 在西方知识分子纷纷抛弃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理念时，狱中的陈独秀却回归了年轻时提倡的民主观。他写道：“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11] 1930年代后期，他阅读大量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了解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屠杀、逮捕、流放数百万人的事实。于是，他毅然抛弃了曾经的共产革命信仰，提出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12] 他写道：“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13] 他的思想转变同时为中共和共产党托派所不容。中共称他走向反动，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托派认为他的思想倒退了。[14] 陈独秀坚持反省与思想探索，批判苏联的政治制度说：“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统治的苏联”，[15]“对于苏联问题，不可迷信个人而轻视制度。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为后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应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斯大林的罪恶，乃是独裁制的逻辑发展。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为宝贵。……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16] “希特勒只许有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将使人类窒息……没有民主主义、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独裁、领袖独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17] 在世界各国知识界赞美苏联的潮流中，陈独秀洞

见了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和灾难性质，肯定公民自由、法治、普选制等现代民主制度遗产的普世性，回归了“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有、民享”的普世价值观，前瞻地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主张。虽然政治生涯充满失败，个人生活越来越困窘，但陈独秀不因个人利害得失而改变观点。在贫病中，他拒绝了蒋介石资助，也拒绝了中共以停止发表文章为条件的资助，坚持反省、思索，成为二十世纪最早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先驱。

共产国际建立苏区

1923年初，苏俄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声称共产革命不适用于中国，不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运来军火扶植国民党推翻中国政府，将共产制度、共产革命、暴力工农运动与反帝运动全面引入中国。1926年2月，共产国际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改组，成立了十一个地区书记处。其中之一是主管东方国家的远东书记处，由东方部部长彼得罗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任书记，成员有：原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和福京。4月，共产国际在上海设立了远东局，由维津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任主席，成员包括拉菲斯（化名马克思），格列尔（化名教授），福京（化名年轻人）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18] 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是专门负责向中国输出共产制度，策动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机关。

四一二事变后，在华的远东局成员面临危险，共产国际被迫撤销了上海远东局。撤销上海远东局不意味停止输出革命。共产国际立即派遣苏联军方情报机构要员牛兰（HILAIRE NUULEN）及夫人汪得利（GERTRUDE RUEGG）以独立商行为掩护，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站。牛兰原名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又名保罗·鲁埃格（PAUL RUEGG），原籍波兰，出生于乌克兰，曾长期任职“契卡”、“克格勃”，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只其中国化名之一，中共称他为“牛轧糖”、“交通毛子”。为便于开展活动，

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拥有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几家调动资金的商行。通过秘密联络站和各地苏俄领事馆调拨资金，共产国际相继策动了南昌、湖南秋收、湖北黄麻、广州、陕西清涧等一系列暴动以报复国民党“清共”。

1929年初，共产国际将远东局从海参崴秘密迁回上海，继续致力在中国策动暴动，建立苏区。远东局内分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政治部负责传达共产国际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和中共的情况；组织科负责向中共及远东其它国家共产党发放经费，安排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往来，无线电通讯，及安排重要会议等等；军事顾问部负责策动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牛兰夫妇以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为掩护，负责管理秘密电台、安排共产党人员往返苏俄，调拨经费，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中共与亚洲各国党之间的联络，接收、中转信件、电报、邮包，安排秘密印刷点和秘密会议等工作。通过牛兰的三家贸易公司，共产国际的巨额资金来源汇入中国，成为苏俄在中国创建红军、苏区，策动各地暴动的动力源头。

外强扶植中国革命党从来需要金钱军火同时并举。得知中共暴动军占领了南昌，斯大林下令向华南沿海运送军火以扶植中共建立武装割据。苏俄运送军火到华南已是熟门熟路，从1924年开始就不断从海参崴向广东国民党军运送军火。这一次，军火不再是给国民党，而是给共产党用于推翻国民政府。1929年3月，蒋介石软禁了李济深，任命李的部下陈济棠接掌了广东。陈与蒋介石一样，因在“国民革命”中高调拥苏获苏俄顾问重用。在赴苏联“游学”兼考察期间，陈接受共产国际的拉拢，领取了共产国际的党员证。主粤后，陈济棠与苏共与达成交易，苏共秘密海运大批军火、物资来粤，分别储藏在粤赣边区南雄县梅岭钟鼓岩山洞（东库）和粤湘边区的连州、连南、阳山地区的岩洞中，陈济棠协助庇护苏俄的军火库，暗助中共军队前来领取军火。[19] 最早创建红色割据的毛泽东最早来领军火，于1929年率红军来

来梅岭补充军火。有了巨大的军火库，共产国际中国各地不断策动武装暴动，相继创建了闽西、赣南、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鄂西北、陕北等地的红军和苏区。

陕西是苏俄扶植“北赤”冯玉祥重点经营的区域。苏俄在此开办了“北方黄埔”——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命接受苏俄培训的共产党人史可轩、邓小平、刘志丹为校长、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中山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名义上隶属国民军总部，实际完全由共产党掌控，学员全由中共选送，其中包括后来陕北红军的骨干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在西安中山军校之后，苏俄在包头、银川、兰州等城市又开办了十五所军事学校，在西北掀起了青年投身军校热潮，并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军中的苏俄顾问被礼送回国，但军校培养的八千多军官仍然听命于苏俄。共产国际指示这些军事学校的共产党员在西北发动了青涧等武装暴动，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金钱、军火分配决定着各地暴动规模和红色割据的消长。没有共产国际的提供的金钱军火就没有中国遍地的红色暴动、红军和红色割据。革命家们红色生涯的背后是共产国际的操控。例如，邓小平在法国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被送去苏俄培训，然后被派回中国主持“北方黄埔”，再被派到广西领导了百色暴动，再被派到江西苏区。

1929年之后，苏联设在广东的军火库长期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像磁石一样吸引中共各路人马前来，毛泽东率红军三打南雄梅岭，红军陈毅部、彭德怀部数打梅岭，都是为来此“东库”接受武器、物资和广东地下党在陈济棠庇护下生产的军服。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项英、陈毅部长期盘踞梅岭一带，背靠苏联军火物资库生存。陈济棠被逐离粤后，继任的余汉谋同样与苏联作交易，庇护着苏联设在华南的军火库。陈毅部长期盘踞的梅岭，南雄一带有了“南方小延安”之名。这就是中共后来宣传的红军华南游击战。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仍然不断来南雄、梅岭取军火，与项英不和的叶挺打军

火库的主意，打算在余汉谋的支持下另建军队，1941年，王震、王首道部南下五岭，目的还是一样。毛泽东“五岭逶迤腾细浪”之句写的应该就是他三次到过，山岭不高的南岭五岭之景。建国后，中共调大批民工填埋军火库山洞，以掩盖依靠苏俄军火、物资起家的真相。[20]

进攻大城市配合苏联

1929年10月，在苏军向东北军大举进攻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中央通告第60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要求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中共中央从上海派到各根据地的代表并非只带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信，更重要的是带着远东局提供的金钱。

12月，苏军在满洲击败了东北军，迫使东北当局签定屈辱条约，不仅恢复霸占中东铁路地区，还多占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岛屿。中东铁路战争获胜后，斯大林没有命令中共红军停止进攻大城市。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他认为资本主义灭亡阶段到来，指示各国共产党开展世界革命。根据指示，李立三于1930年2月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和《中央第70号通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要求各地中共发动工人罢工、地方暴动及策动国民党军兵变。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和各红军代表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指示。6月，李立三在上海再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要求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后，全国各地暴动和红军向国民政府的进攻一浪高一浪。在满洲，新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奉天后立即部署满洲暴动。长期遭受俄人欺压的东北人民对中共在中苏战争中号召暴动保

卫苏联一致痛恨，满洲省委也觉得指示难以执行，被迫将暴动扰乱东北军后方的计划搁置。在陕西，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将暴动军改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江西和闽西苏区，中共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印在了苏区出版物和钞票上以示支持苏俄。

红军进攻大城市的最大行动是红五军攻打长沙。奉中共中央指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于 1930 年 7 月率第三军（黄公略），第五军（彭兼）及第八军（何长工）将政府军何键部逼退到益阳，占领了长沙。入城后，红军纵火焚长沙各政府机关，向商会勒索 70 万元。[21] 8 月 1 日，红军宣布成立李立三任主席（未到）的苏维埃政府和滕代远任主席的湘鄂赣边工农兵暴动委员会。8 月 4 日，黄、彭在何键反攻压力下率军携夺取的大批物资退出长沙。红军残酷烧杀不是自中东路战争开始，而是八七会议以来执行共产国际“残酷报复国民党清共”的指示没有断过。“彭（德怀）、黄（公略）暴动军在湘东两年，杀人五万，每破一城，尽掠富农商人钱财。夺财的主要手法是抓捕商家，施以酷刑，通知家人限期勒赎。并且，连黑道规矩也不讲，不缴赎款杀，缴到赎款亦杀。在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公略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其子已成血肉糜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22]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马日事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28 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

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 28 日至 8 月 1 日，杀人在 5000 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23]

彭德怀、黄公略、孔荷宠在湘东烧杀之时，毛泽东率红军攻占了江西吉安，实施同样的红色恐怖。在占领吉安的 45 天中，红军每天贴出杀“反革命”的布告，在小县城吉安杀人万余，屠城之惨烈直如张献忠屠川。多年后，人们从革命党所写的史书中读不到湘东红色恐怖，读不到吉安大屠杀，只读到毛泽东率红军攻占吉安，扩大了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只读到“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迈词句，只读到何健派人挖了黄公略的祖坟，杀害了毛夫人杨开慧。这种服务一党利益的宣传是革命党史书的共同特点。

红军彭德怀、黄公略、毛泽东部执行报复指示的一项行动是对国民党军人家属大规模屠杀。北洋政府军在“讨赤”中并未屠杀共产党人的家属，例如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夫妇后将李妻赵纫兰释放。国民党“清共”时也未对共产党人家属报复，例如主政湖南的何键对滥杀地主的农民武装报复时并未报复农会骨干的家属，并未为难毛泽东妻子杨开慧。毛泽东领导屠杀时，杨带三子住在长沙平安无事。由于彭、黄红军在长沙期间杀害国民党军人家属过于惨烈，政府军将士一致要求对共产党家属同样报复。何键不想杀害湖南名人之女，但也不能拒绝国民党军将士的一致要求，于是想了个网开一面的办法，提出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解除婚姻关系即可免死。杨开慧拒绝作此声明，被判死刑。这时，杨开慧已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她写道：“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杨遇难后，毛泽东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应当说，毛泽东此言是真话。彭德怀攻长沙前曾问毛长沙有无私事要办，实际问毛是否想接杨入苏区。毛这时在井冈山有了新妻贺子珍，于是将话题岔开。几十年后，拆除杨开慧的旧屋时从墙缝中发现了杨的一首《偶感》诗。诗中写道：“天阴起朔风，浓寒入饥骨。念慈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

是否亦清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翻，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己时。”[24]

共产国际建立左联

中东铁路战争中，苏共在指示中共各地暴动，指示红军攻打城市的同时，决定成立一个旨在宣传苏联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中国支部”，在文化方面对国民政府作战，推动中国人亲苏。奉莫斯科之命，中共中央成立了潘汉年为书记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负责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任命冯乃超为左联书记。1929年底，在苏联击败中国东北军，继续霸占中东铁路地区的背景下，潘汉年、夏衍（沈端先）、周扬（周起应）、冯乃超等中共文艺界官员召集彭康、阳翰笙、郑伯奇、鲁迅、蒋光慈、戴平方、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作家、艺术家举行了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议。1930年3月2日，冯乃超、夏衍、周扬等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召集鲁迅、茅盾（沈雁冰）、郁达夫、钱杏村、丁玲、蒋光慈、田汉、柔石等五十多位拥苏作家、文艺家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大会，宣布由鲁迅、夏衍、阿英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宣布了题为《文学的理论纲领》的左翼作家联盟纲领，号召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会后，潘汉年、冯乃超和夏衍等人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资助下在上海浙江北路设立了秘密办公处，开办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漫画研究会、创作批评研究会、小说研究会（小说散文组）、诗歌研究会等一大批下属组织。1930年5月，左联追随苏俄，也举行纪念五一节活动，发表纪念“五一”宣言，要求文艺“与伟大的革命斗争相结合”，开展所谓反帝运动。

操办成立左联后，潘汉年奉命筹建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众多俄党文化团体。这些团体与左联一样，成立的决定来自苏俄，经费来自苏俄，以服务苏俄利益为宗旨。苏俄不仅在满洲战场获胜，在中国全国都得势。中苏战争中成立

的“反帝拥苏大同盟”和左联组织遍布全国，拥苏、左翼口号成了主流，上海的中国左联之外，又有了北平北方左联（领导天津、保定、青岛等地分支左联），以及旅日中国作家的“东京左联”。

左联成立后立即履行使命，宣传苏俄。共产国际组织了左联苏联观光团，选了一批人赴苏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以便让他们回中国更好地宣传苏俄。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在左联操办下推出了一大批拥苏刊物，诸如《前哨》、《北斗》、《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文学新地》、《春光》、《海燕》、《夜莺》、《小说家》、《今代文艺》、《东方文艺》、《新语林》、《每周文学》、《泡沫》、《浪花》、《榴火文艺》、《尖锐》、《令丁》、《冰流》等等，左联推出了一大批歌颂苏联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强烈的影响了当时的青年，更长久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几代青年。左联是与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样的共产国际下属组织，其操办的左翼文学运动、左翼戏剧运动、左翼电影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金钱扶植的产物。这些作品都是在苏联侵华的背景下歌颂敌国，抹黑中国政府之作，非此不算左翼，不获共产国际资助。

左联的另一重大行动是围攻主张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人权运动和“新月派”。围攻中，左联的主要观点为：否定自由、人权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成果，否定创作自由，要求文艺创作必须为苏共和中共服务，文艺必须是共产党的工具。通过在莫斯科接受培训的瞿秋白等人，共产国际将党化的文艺理论，即共产党所谓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输入了中国。瞿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等一系列文章中宣传苏俄，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自我，要求文艺作品必须服务共产党。其“作家做大众的留声机器”说法的真是文艺家必须成为共产党的留声机。因为，在共产党的字典中，无产阶级是指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自我称呼。左联提出的“走向民

间，走向工农大众”口号的真实表述是要求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改造自我，抛弃独立思想，作党文艺的工具。

在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就已经是围攻人权运动、文艺自由的主将。他对新月派艺术家的斗争方式不是就文艺创作展开讨论，而是在杂文中谩骂，将主张文艺创作自由，思想自由的新月派领袖梁实秋谩骂为“走狗”。左联成立后，鲁迅将其对人权运动、文艺自由主张的谩骂升级，将对梁的谩骂升级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不与鲁迅对骂，而是指出要害说：“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最后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25]“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26] 梁氏所言的“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是客气的说法。他没有明说的是，鲁迅和左翼作家们在接受共产国际资助。

左联并非文艺组织，而是交战敌国扶植成立的，在文艺领域致力于颠覆中国政府的别动队。从越飞与孙文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苏俄在中国策动了所谓国民革命。几年间，中国舆论中大量出现的进步、反动、军阀、是帝国主义等语汇都是莫斯科在幕后定义着谁进步，谁反动，谁是军阀，谁是帝国主义，谁是帝国主义走狗等舆论调子。在中东路战争中，苏俄在中国文化领域中推出了左翼说法。与上述说法一样，左翼说法也是苏俄定义着左翼或进步的舆论调子。根据对苏俄的立场，拥苏、作俄党就是左翼，或进步，反对苏俄霸占满洲就是右翼或反动。成立左联的主意是苏共政治局批准的，左联成立大会是莫斯科策划与资助的，筹备小组十二成员中，除鲁迅和郑伯奇二人

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题为《文学的理论纲领》的左翼作家联盟纲领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文件，其中解释何为左翼或进步文学的标准其实是是否拥苏或反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号召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实际是要求宣传苏俄革命，在文艺领域鼓动推翻国民政府。夏衍多年后在《懒寻旧梦录》一文中的“谈左联历史时不要忘记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鹿地亘、池田幸子等几位外国同志”之言间接暴露了左联背后的共产国际操纵之手。夏所提到的那几位“外国同志”都是共产国际的走卒。其中的美国人史沫特莱、日本人尾崎秀实（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二人来华后不久就参与了召集成立左联的行动。

国民政府取缔这样一个为交战敌国张目，鼓动国人反中国政府的颠覆组织理所当然。左联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左联派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作家代表出席了大会。1931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以泄漏会议地点的手段清除了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党内反对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处决的中共党内反对派人士中包括柔石、胡也频、殷夫（白莽）、李伟森（李求实）、冯铿等五位左联作家。这五位后被中共宣传为“左联五烈士”的作家并非因文艺创作、文艺思想被杀，而是由于他们举行为敌国张目的苏维埃会议，散发“武装保卫苏联”的传单，组织推翻中国政府的“飞行集会”等配合苏联入侵。他们中的柔石为敌国呐喊：“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飘扬起来了！……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底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着……猛烈地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暴动，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27] 殷夫为敌国呐喊：“政治上目前一个克不容缓的急务就是：武装拥护苏联。”[28] 这样公然服务敌国的颠覆者不会为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所容忍。林语堂后在《申报》“一夕话”谴责道：“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林的谴责切中了左联的要害。

作为俄党组织成员，左联的作家们必须像柔石、殷夫那样歌颂苏俄，号召推翻本国政府。反对艺术家成为政治和外国势力工具者，反对歌颂苏俄者，在中共战争中支持国民政府者受到中共与的内部整肃。作家蒋光慈反对在中东路战争中宣传拥护苏联，不再见容与左联，只好要求退出共产党。与对陈独秀不批准请辞而要宣布撤职一样，中共也不批准蒋光慈退党，而宣布将蒋开除出党，在《红旗日报》上称蒋为反革命。1931年5月，左联发布了《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罪名与蒋光慈一样：反对拥苏。

九一八事变后，左联与中共同样口径，宣言“武装保卫苏联”，联手其它俄党文艺团体推出了一大批打爱国旗号服务莫斯科的文艺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和夏衍编剧的《风云儿女》电影。这些作品以借宣传仇日的办法鼓动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及促中日开战及促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其中真正宗旨还是“武装保卫苏联”。正如苏俄出钱建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培养出了新中国党政军高层一样，左联组织中的文艺家后来成了新中国文艺的主导者。因此说，新中国文艺的源头在苏俄，灵魂来自苏联。

肃“立三路线”

各国共产党暴动接连失败后，斯大林发出了停止进攻城市的指示，并按照一贯作法，在各国共产党中找替罪羊。1930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宣布李立三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宣布共产国际的几项决定：将李立三免职；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在新共产国际代表到来之前掌中共中央领导权；停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虽然李立三主持推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一系列决议案完全奉了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争取革高潮”和“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指示行事，但作为下属的名义党领袖，李立三没有申辩的机会，成为继陈独秀之后，莫斯科激进指示的另一替罪羊。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矩，被撤职的中共领袖须到莫斯科去谢罪，听从发落。李立三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拒绝勇气，遵命赴莫斯科作检讨。临行前，他对怀孕的妻子说：“我这次去苏联，恐怕短时间回不来，孩子出生后，我又不在你身边，不管是男是女，就把他送人吧！”李想到赴苏后短时间回不了国，但也没有想到会被关押、留难十几年。他更不会料到会在新中国大难临头。在新中国总工会主席任上，他因主张维护工人权利而被毛泽东撤职。1961年，在刘少奇主持救灾声名鹊起时，一幅名为《刘少奇和安源矿工》的巨幅油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轰动一时。1921年，毛泽东、李立三曾奉俄驻长沙领事馆之命去安源策动工人罢工。毛泽东考察一番后就离开了，李立三则留在安源，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罢工，李立三出任了罢工指挥部总指挥。[29]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和安源矿工》油画被禁，取而代之的是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印刷了九亿张遍挂全国。据说，毛泽东看了油画后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没有提留在安源领导工运的李立三。而这时的李立三受尽批斗折磨，写信给当年安排他赴法勤工俭学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求救不获回音，不久后被宣布“畏罪自杀”，“自绝于党”，流传说法是服安眠药自杀，但其秘书李思慎否认这种可能，且医院“验尸报告单”上记载的身高、体重与李本人不符，更可能是被他的党杀害。

牛兰事件

中东路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为加强联络与支持远东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扶植中共颠覆中国政府，将其远东局从海参崴迁往上海。1930年3月，牛兰夫妇由莫斯科经哈尔滨来到上海组建起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远东局主任米夫不在上海，牛兰成为驻上海远东局的主要负责人。牛兰夫妇持有瑞士护照，在上海租界里租用了多处住宅和信箱，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

色工会远东分会”，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牛兰夫妇主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参与了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参与了建立中共“中央特科”。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光扶植中共，同时还扶植着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1931年初，远东局在香港建立了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阮爱国（胡志明）负责的“南方局”（香港分局）。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供出了中共在武汉、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设有资助中共的机关。顾的变节一方面是为保命，另一方面是因李立三成为替罪羊感到幻灭。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国民党军警捕杀了恽代英、蔡和森和向忠发（写下自首书表示脱离中共但仍被枪决）等中共高层成员，英租界警方逮捕了远东局主持人牛兰夫妇，从牛兰夫妇的几处住宅和租用的信箱中搜获了大批共产国际远东局及属下机构的机密文件、帐册。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

斯大林担心牛兰招供暴露苏俄以巨额金钱、军火在华策动暴动，建立红军、苏区及扶植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引致列强联手阻止苏俄赤化中国，于是决定不惜代价营救牛兰，调动国际亲苏名人配合营救，及动用手中的重要棋子。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举措之一是将孙夫人宋庆龄发展为共产国际秘密党员，在国民党“清共”后将宋接到苏联，再安排到德国居住，以淡化宋的苏俄色彩。在柏林，宋庆龄与邓演达发生了恋情，更坚定了反蒋和颠覆国民政府立场。斯大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之二是安排国民党高层子女赴苏学习，将蒋经国扣为了人质。此时，斯大林决定动用手中的宋庆龄、蒋经国这两张王牌，派宋回国参与营救，以人质蒋经国交换牛兰。宋回国前获斯大林再次接见及当面交待资助和联络等事项。

根据斯大林的决定，苏联成立了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和中共保卫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组，由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成员包括

苏联著名特工佐尔格（Richard Sorge, Рихард Зорге）和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行动组成立后立即行动，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展开密谈，达成了以两万美元巨款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手迹的协议。为确保万无一失，及避免暴露金钱来自莫斯科，苏联军方两位德籍交通员，分两路各携两万美元现钞到上海。佐尔格收到钱，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随后，共产国际各路兵马同时行动：通过国际红色救济会在全世界发起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组织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高尔基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抗议电函，呼吁释放牛兰夫妇；《真理报》大量刊登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的文章；命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开大规模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示威活动；宋庆龄回国后成立了自任主席的“牛兰营救会”，率蔡元培、鲁迅、林雨堂、柳亚子、郁达夫、陈望道、茅盾、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人发表宣言，打人权旗号促释放牛兰，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传达斯大林以放蒋经国回国交换特赦牛兰夫妇的口信，再找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交涉要求释放牛兰，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

为淡化宋庆龄营救行动的苏俄背景，共产国际安排美国人史沫特莱担任“牛兰营救会”的秘书，从旁指挥和操控。史沫特莱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由妓女姨妈带大。婚姻破裂后，史沫特莱到纽约作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的情妇，随恰托移居柏林，成了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在柏林，史沫特莱写出了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与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史也是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痛恨我所在的大城市（纽约），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1929年，史沫特莱以记者身分随情夫左尔格来华，

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旗下。左尔格，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加入了苏共。到上海后，左、史帮助周恩来建立了中共“特科”，史联络鲁迅，成功安排鲁出面成立左联。牛兰案发后，左、史一起加入了牛兰营救组。史沫特莱被派为宋庆龄的秘书和助手，与宋一起操办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营救牛兰的机关，一起联络肖伯纳等国际名人为营救造势。营救牛兰夫妇之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另一诉求是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共产党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苏联和中共苏区的屠杀不置一词，专门抨击国民政府，其实质与“四一二事变”前的国民党、中共、“左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一样，属俄党性质，其民权旗号只是服务苏俄的幌子。扶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时，共产国际组织人将宣扬仇恨、阶级斗争及性解放的史沫特莱自传译成了中文版，责成杨杏佛作序（杨铨）在上海出版，责成另一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通过“民权保障同盟”和国际舆论施压，共产国际成功帮助丁玲等一批宣传苏俄革命的共产党员获释进入苏区。

对于斯大林人质蒋经国换牛兰的交易口信，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撻吾怀也。”[30] 蒋介石知道日记将留给后人看，不会将人质交易写入日记。斯大林利用手中人质确实强力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

在斯大林众多举措的作用下，蒋介石放弃了处决牛兰的打算，将牛案交上海高等法院审理。采纳佐尔格的建议，共产国际以十万美元巨款收买负责牛兰案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收受贿赂的法官拟同意特赦，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次长郑天锡坚决反对，以请辞职抗争。罗等的反对不敌斯大林多种手段并举的强力影响，牛兰夫妇在不久后获释。这一结果显示

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势力之大，显示在国民党对苏决裂后，苏俄仍然掌控着中国走向，其影响力非中国政府所能抗拒。

第 21 章 苏区肃反

苏俄引入“肃反”

1927 年底，斯大林联手布哈林整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确立了独裁地位。1928 年，斯大林发动了肃清“托季联盟”支持者的整肃运动。这时，大饥荒降临苏联。斯大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十年来为快速军事工业化和输出革命无节制地搜刮粮食的祸因，将饥荒归咎于富农和反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作对。为清除党内异己，消灭国内反对苏维埃暴政者和各国共产党中不服从苏共指挥者，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作法，要求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肃反运动），以一些随意罪名整肃异己和不服从命令者。因为所谓反革命根本无从界定，肃反只是随意罗织罪名整肃异己和再次迫害富农的运动。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校长拉狄克被流放西伯利亚，斯大林任命的亲信校长米夫奉命在中大展开了整肃托派运动，在校的中共党员们最先领教了共产党内部整肃的残酷，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深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演讲影响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整肃“托派”运动中受到整肃，曾发表拥护托洛茨基言论的中大学生们成了审查、批斗、监禁、流放的对象，其中约两百多学生被以托派罪逮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中国学生从校园神秘失踪，实际是被秘密处决。

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开展肃反运动，还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肃反运动。针对中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中东铁路战争前后向中共发出了一系列开展整肃运动的指示，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罪名引入了中国，诸如反革命、托派、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社会民主党主张源自第二国际。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

国际虽挂名共产主义，但具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良，为工人阶级争取切实的利益。列宁反对伯、考的改良主张，要求暴力剥夺有产阶级，推翻现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独裁。俄共原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德国扶植下取了政权，但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和欧洲仍有巨大影响。确立独裁地位后，斯大林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听命于他一手操纵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将不服从莫斯科指挥的社会民主党列为敌人，要求肃清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尽管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共党内也不存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派别，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按斯大林的要求加入了肃清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肃清“改组派”，而中共自建党以来都是共产国际大员主持，不存在独立批评声音的空间党内派别存在的空间，当然不可能有改组派。“改组派”之名来自是国民党内“汪派”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改组国民党而得名。1928年2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方法为中央圈定和省市选举各一半，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汪、粤、桂等各反蒋派系反对蒋介石圈定代表的大会，汪派骨干陈公博在《革命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与汪派另一骨干顾孟余召集一批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成员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蒋下令取缔了陈创办的大陆大学和《革命评论》刊物。陈等再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发起了“护党救国运动”。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三大宣布以叛党乱国罪将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永远开除出党，宣布以叛党罪名将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瓦解了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组党计划。蒋介石对苏决裂后，邓演达与谭平山、章伯钧、施复亮、陈公博等前中共党人筹组新党——“第三党”，声称要继续国民革命。斯大林将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等国民党中的俄党接到了苏联。在莫斯科，邓演达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既抨击国民党分裂的宁汉双方，又抨击中共，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党领袖自居。这

时，权力斗争中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都希望邓演达为自己的政策纲领帮腔。斯大林在接见邓演达时邀邓作中共领导人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让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拒绝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斯大林支持他的第三党计划。在演讲中，邓演达提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会损害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应由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实现国民革命目标。对邓此说，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员布哈林称“自 1917 年后，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国民革命”，[1] 不给邓的计划存在的空间。斯大林对邓不听指挥，要另起炉灶不满，认为邓这样不听话的第三党没有利用价值，在向中共发出的肃反指示中指示中共肃“第三党”。至于对“托派”、“取消派”罪名都来自莫斯科的决定。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将反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等人开除出党，加给他们“托派”、“取消派”罪名，称他们不同意“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就是要“取消革命”。陈等虽被开除出党，他们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共党内确实有。共产国际认为有必要在中共党内进一步肃清像陈独秀那样坚持国家、民族观念者。

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指示信中随意编造出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要求中共效仿苏共展开内部整肃运动。按理，中共应对共产国际说明，本党内不存在上述派系。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都是共产国际任命的，他们清楚向国际提出不同意见将可能落得陈独秀那样的下场。李立三照本宣科，向各苏区发出文件，要求捉出上述派系人员加以整肃。不久，他成了替罪羊被撤职。继任的周恩来等人更加不提意见。只管传达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要求各苏区执行。在各苏区，中央委派的大员与各地原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存在山头派系的斗争，都有清除异己的需要。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正好给各个头领袖送来了清除异己的借口。他们认为肃反指示中的那些没有听说过的罪名非常有利于他们清除异己，于是迅速

按照共产国际捏造的罪名展开了肃反，并在肃反中创造出一些新罪名。例如，中央苏区创造出了共产国际指示没有的“AB 团”罪名。经过苏俄培训的书生们在肃反中承袭了苏俄肃反的残酷，并且加以发挥，在各苏区掀起了杀人狂潮。其中，创办《湘江评论》等刊物的书生毛泽东主持江西苏区肃反杀害了万余人，使中央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干部损失了四分之一；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书生邓子恢、邓发领导闽西苏区肃反，杀得三十个区委全部瘫痪；北京书生张国焘主持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人上万，将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基本杀光；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书生夏曦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带回了正宗的肃反经验，主持湘鄂西苏区肃反屠杀了数万人。两年肃反中，中共杀害了十多万革命同志，比国民党杀害了更多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将领，使自己的党政系统和军队濒临崩溃。

肃反是所有共产党都不例外的一种自杀机制，是手段极为残酷，无理可讲的屠杀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证明。共产国际推出的反革命、托派、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罪名显示着共产革命反进步，反文明的性质。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环境多元，自由，宽松，组党自由，结派提出主张更为平常，帝制都可以反对，没有什么不可以反对的制度与主张。苏俄输入共产革命后，反对革命成了罪名，在党结派成了罪名，苏俄引入的肃反给中国留下了残暴恶毒的记录。中国苏区肃反滥杀是斯大林亲自主使的。是他下指示发动了中国苏区的肃反，是他驳回各苏区对滥杀的投诉，直接导致了各苏区的第二轮、第三轮甚至第四轮肃反，指使中共以肃反名义屠杀了超过十万的中共干部、红军官兵，甚至他们及家属。一群经过苏俄培训国的知识分子，在俄人的指挥下实施了一场对中国人的大屠杀，是为梁启超、陈炯明、张作霖痛斥的赤化国耻的续篇。

肃 AB 团与富田兵变

在江西苏区，毛泽东与江西本地干部组成的中共江西省委互不买账，形成了山头之争。1930 年春，中共中央的肃反指示下达到江西苏区，毛泽东

主持红四军总前委发出了关于肃反的《第一号通告》，宣布“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号召“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布尔塞维克化”，要求查 **AB** 团。

江西的 **AB** 团出现于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占领江西后，中共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在江西展开了烧杀抢掠的工农运动。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段锡朋为首的一批江西国民党人反对苏俄引入的工农运动，成立了反赤团（**AB**）。宁汉分裂后，中共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AB** 团在成立数月后即被迫解散。肃反指示下达到江西后，毛泽东在红一、三军团中成立了各级肃反组织，任命亲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为肃反委员会主任，利用当地流传的 **AB** 团说法开展肃反，印发了《反改组派 **AB** 团宣传大纲》，其中要求“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指示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新领导人兼赣南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李韶九将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干部以 **AB** 团罪名“全部扑灭，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奉毛之命，曾、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八位红二十军领导人逮捕，对他们实施打地雷公、烧香火、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酷刑，[2] 将他们折磨的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不少人被当场被折磨致死。李白芳、马铭、周冕等人的妻子前来探望被拘押的丈夫，也被当作“**AB** 团”逮捕施以酷刑。[3]

江西肃反中实施的酷刑多达 120 多种，包括：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折断手指，雷公打手，香火烧身，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

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等，另外还有残害被捕者妻子的烧阴户，小刀割乳等酷刑。其中一种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拨弄铁丝如弹琴一样折磨受害者。这种酷刑竟然由书生起名为“仙人弹琴”。

段良弼经不住酷刑的折磨，被迫供称红军中有 **AB** 团组织存在，首领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西本地干部首领李文林是江西 **AB** 团。李韶九、曾山、古柏等人再据此扩大逮捕与屠杀的规模。如此，一供十、十供百，所谓 **AB** 团分子越查越多，屠杀规模越来越大。屠杀不是简单枪毙，而是极为残酷的杀戮，其中包括“剖腹剜心”。几个月内，毛泽东以“**AB** 团分子”罪名将江西的四万多红军杀掉了十分之一，以极为残酷的方式摧毁了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本地干部山头。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毛泽东隐瞒了酷刑和屠杀，只汇报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 **AB** 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4]

1930 年 12 月，红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在肃反屠杀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挑头在吉安富田发动了兵变，率部攻占了军部，释放了上千被关押的红军官兵，再包围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一大批“**AB** 团分子”，然后向赣江以西转移，沿途张贴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告同志和民众书》中说：“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对干部的培养他素来是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

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他想做党皇帝”。[5]

应对富田兵变，毛泽东召开了总前委紧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提到的“取消派”罪名，宣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是“AB 团取消派”，下令讨伐，并亲撰六言《讨逆檄文》说：“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6] 不久，兵变军被红军主力击败，兵变官兵被逮捕，被游街示众后屠杀。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为肃 AB 团运动辩护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7] 中共中央负责人不知道毛泽东所称的“乱供”是在酷刑之下逼出来的。

年底，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建立中央局，并任代理书记，成为中央在赣的最高大员。根据众多对“肃 AB 团”运动的投诉，项英展开了调查。1 月中，项英下令停止滥杀，撤销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成立了自任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和自任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红军，通知兵变的红二十军余部领导人结束兵变，听候中央局裁判，并主持发出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富田兵变领导人接受了项英的命令，到黄陂参加中央局会议作了检讨，事变就此平息。在项英的支持下，在富田兵变中被解救的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等人到上海向共产国际代表状告毛泽东在苏区肃反中滥杀无辜。

斯大林力挺滥杀

1931年1月初，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受斯大林派遣来到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仅22人，另有15人是米夫指定的代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李维汉、顾顺章，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夏曦、陈原道等苏俄归来的国际派听命于米夫，何孟雄、罗章龙、徐银根、王克全（凯丰）、史文彬、陈郁、余飞等非国际派代表不满米夫包办中共中央，质疑米夫突然召开中央全会的合法性，要求宣布会议为原通知的紧急会议。米夫驳回了何孟雄等人的要求，坚持会议为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宣布了以清算李立三为主要内容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宣布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为：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将瞿秋白、何孟雄开除出了领导层。

何孟雄、罗章龙退席抗议米夫一手包办中共全会，在会后散发了林育南起草的《告同志书》和罗章龙编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宣布米夫召集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非法，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代表。米夫宣布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即反党，宣布将何孟雄开除出党。何孟雄为首的反对派拒绝高压与威胁，连续举行会议。中共领导层采取非常手段，将反对派会议的地点泄漏给国民党特务，致使何孟雄等二十四位反对派骨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处决。

在非常手段对付反对派，脱离者方面，革命党与会党、黑手党没有区别。革命党认为参加者没有脱离的自由，视脱离者，有异见者，反对派为叛徒、内奸，自认有权将这些人肉体消灭，采取暗杀、出卖等手段对付同志是革命的需要，不受谴责。何孟雄等人之后，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检举、捕杀，检举人拿了赏金后消失；不再受信任的前党领袖瞿秋白在中央撤离苏区时被保

卫局首脑周恩来亲自通知留下来打游击，结果很快死于国军之手；两位前领袖被怀疑是与何孟雄等人一样，被党特别手段处置。

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肃反。米夫在反对派退席后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在苏区开展肃反的指示，宣布派项英、张国焘、夏曦分赴江西、鄂豫皖、湘鄂苏区主持肃反。据此，新一届中共中央分别给各苏区省委，包括鄂豫皖边特委和赣东北特委等机关发出了肃反指示信。根据米夫的决定，新中央在给江西苏区的指示信中称“**AB**团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必须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这时，米夫和另一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 **И. А. 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同时接到了几个苏区控告肃反滥杀的投诉信和毛泽东为肃反运动辩护并指责富田兵变为反革命暴动的反告信。雷利斯基认为“反**AB**团”运动过火，赞成项英将肃反降温的处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主持肃反的米夫支持血腥肃反，认同毛泽东反告富田兵变的告状信。雷、米二人谁也命令不了谁，分别将意见报请莫斯科裁决。

中共肃反是斯大林发动的，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肃反升温是奉斯大林指示的。斯大林当然不会承认肃反有错。他赞赏毛泽东在苏区杀人立威的作法，表态支持“反**AB**团”，否定富田兵变，驳回了雷利斯基的意见。根据斯大林的裁决，米夫于1931年3月在上海主持作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十二月事变（富田事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毛泽东领导的肃**AB**团运动正确，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8]**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共中央“三人团”到江西苏区传达关于富田事变的两决议。任弼时到宁都青塘召开了江西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几项决定：《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宣布富田兵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宣布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完全错误，将项英撤职；宣布毛泽东复职总前委书记重掌中央苏区军权。

经斯大林裁决，被项英免职的毛泽东官复原职，执行反**AB**团屠杀的李韶九成了英雄，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复职后，毛泽东发

动了新一轮肃反运动，在红一方面军中掀起了另一波清查 AB 团运动高潮，下令将红二十军全体缴械解散，对赣西南的本地领导人和红二十军将士展开了报复性屠杀，将被项英救了命的李文林（毛泽东改组江西省委后降职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被项英劝回的富田事变领导人谢汉昌、刘敌、李白芳，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等一大批红军将领和江西本地干部杀害，将参与兵变的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干部基本杀光。为了不让被杀者喊叫及为节约子弹，屠杀者用大石头把“AB 团”们砸死，砸到脑浆迸裂。[9] 经过两轮肃 AB 团屠杀，的红一方面军四万官兵被杀掉一万多，与毛泽东争江西山头的本地党政干部几被杀光。参加清查 AB 团运动和镇压富田事变的黄克诚晚年忏悔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我黄克诚的人头是不足以抵偿的”。[10] 亲历肃 AB 团运动的肖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不堪回首。”

湘鄂西苏区肃反

1930 年 9 月，从苏俄受训回国的邓中夏被任命为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上任后，他趁蒋阎冯中原大战之机指挥红二军团占领了沙洋、石首、监利等县，扩大了洪湖苏区，随后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发动了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虽然他主持肃反已经到了杀红军领导人的地步，但还是被中共中央以肃反不力罪名撤职。1931 年 3 月，米夫任命苏俄受训归来的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接掌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到任后，夏曦以邓中夏被撤职为前车之鉴，积极推行暴力“土地革命”和肃反运动，在土地革命方面实行没收地主、富农一切财产，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在肃反方面照搬莫斯科来的经验，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各级政治保卫局，在红军和苏维埃内部展开了追查反革命的大规模逮捕，刑讯逼供和屠杀。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等湘鄂西苏区创建者对夏曦的恐怖肃反强烈不满，致信中共中央，控告肃反运动严重损害了苏区。他们的

投诉意见经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转到了斯大林手上。斯大林表态支持肃反。据此，中共中央驳回了万涛等人的投诉，并斥夏曦肃反不力。遭斥责后，夏曦只好将肃反升级，改组湘鄂西省委，将万涛、潘家辰撤职，对段德昌等人警告，把对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表示过不同意见者一律以“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逮捕。与毛泽东在江西的作法一样，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一供十，十供百，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千余红军将领和苏维埃干部，其中包括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四军政委万涛，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孙德清，红八师师长段玉林，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9]

令夏曦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中央仍然斥责他肃反不力。于是，夏曦于1932年夏发动了第二波肃反，又杀掉数千红军将士及苏维埃干部，其中包括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接任的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许多第一轮肃反中的主持人、杀人者成了第二轮肃反的刀下之鬼。例如，在第一次肃反中参与杀害了无数干部的周小康在第二轮肃反中被杀害。在第二轮肃反高潮中，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了围剿，红军被迫撤离洪湖苏区。撤离前，夏曦按照苏俄作法，命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嫌疑人全部杀害，将尸体装麻袋沉湖。红军撤走后，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湖水为之变色，起网常有死尸”。[12]

根据斯大林裁决，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各苏区加大肃反力度。1933年3月，夏曦在临时中央的督促下发动了第三轮肃反，再杀掉了洪湖红军的创始人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兼红六军政委柳直荀、杨英等数千红军将士和中共地方干部。6月，夏曦在中央督促下发动了第四轮肃反，杀掉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宋盘铭、红

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等数千人。这时，湘鄂西苏区红军和苏维埃高层被杀得只剩下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四个党员。唯一生存下来的湘鄂西苏区高层将领贺龙劝夏曦说：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13] 贺龙所言不假。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中共湘鄂西苏区在两年中通过肃反自我剿灭，杀害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民众，使三万多红军减员至三千。与江西苏区一样，肃反屠杀的方式极为残酷，苏区的创建者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等红军领导人被乱棍打死；王炳南先被打断双腿，再被砍杀；陈协平先被打断十指，再被用石头砸死。杀高层尚且如此，杀低层更加残酷。1934年5月，当夏曦准备发动第五轮“肃反”时，中共中央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危急形势下突然转变立场，斥责夏曦“肃反扩大化”了，下令将夏撤职。夏对中共中央的指责感到委屈，在传达中央指示的会上申辩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14] 夏所言是事实，他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才不得不发动一次次肃反，每一步行动都是遵从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谓扩大化是不干不行。

建国后，贺龙元帅为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道：“湘鄂西的人民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了”。他没有说这些革命者是怎样牺牲的。当被红军史的编写人员问到如果当时与夏曦斗争，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时，贺帅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显然，若贺龙像万涛等人一样反对血腥肃反早就被杀害了。他因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而成为湘鄂西肃反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是残酷的，共产革命残酷之最。从苏区肃反到文革，革命家们都是在举手同意杀害或参与整肃战友中走过来的，不如此是走不过来的。如今，在洪湖苏区纪念馆中，万涛、段德昌、贺龙的画像挂在一起。纪念馆中没有夏曦的画像，因为他犯了“扩大化”错误。

鄂豫皖苏区肃反

1930年2月，中共成立了鄂豫皖边界苏区特委和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红军三个师合编为红一军。6月，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传达到了鄂豫皖苏区。与在湘鄂西苏区处分邓中夏一样，中共中央以“肃托”、“肃反”不力为由处分了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郭述申。1931年初，米夫任命张国焘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张与陈昌浩、沈泽民一起到鄂豫皖苏区主持肃反。

与派赴湘鄂西的夏曦一样，张国焘到任后也引前车之鉴，加大力度肃反，成立了苏俄模式的肃反机构——各级保卫局，在军中秘密布置“政治战士”和“保卫干部”，负责监视各级干部，然后大批逮捕红军将领和苏维埃干部。经过苏俄培训的张国焘、陈昌浩、高敬亭、戴季英等中国书生坐堂刑讯，指挥酷刑逼供，实施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酷刑。在严刑逼供之下，被逮捕的干部和红军官兵被迫承认参加了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再迫胡乱指认。肃反机关根据口供再逮捕更多的人，红军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者十之六、七。[15] 肃反中，保卫局每天杀人，其中，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勒死，副军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一万二将士的红二十五军被杀掉一半；红四方面军十二个团的干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其余都被杀掉；红三十团团长、政委等主要干部被杀得换了三、四次；麻城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杀得只剩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光山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百余人被杀得所剩无几；罗南县工委书记郑新民和罗山县独立团长余范文等一千六百人被杀；商城县两千多人被杀；霍山县委、县苏维埃两百多人被杀；英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全部领导人，八个区委书记、半数以上支部书记被杀；“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说明当时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肃反中，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建者和有战斗经验的老干

部几乎被杀光.....肃反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16] 一位当年保卫局的成员披露：“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推下坑，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17]

与湘鄂西苏区的贺龙一样，鄂豫皖苏区的徐向前、王树声也是拥护肃反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几十年后，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附近发现了不少当年苏区肃反留下的千人坑。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

闽西苏区肃反

1931 年春，中共中央派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率代表团到闽西苏区，发动了“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运动的套路与其它苏区一样，也是逮捕怀疑对象，酷刑逼供，越供越多，越捕越多，越杀越多。最初，闽西苏区肃反中杀人还报中共福建省委批准。随着被捕杀者越来越多，杀人权被下放基层。为完成上级肃反指标，运动主持者随意指控、随意屠杀。结果，上万人遭受酷刑折磨或迫害，6300 多位党政军干部被杀害，甚至有儿童团员被杀害。运动导致类似江西“富田事变”的“坑口事件”：被指为社会民主党首领的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以武力抗拒捕杀，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后被武力镇压。

宁都会议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称赞得意门生王明为“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安排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名义总书记，扶王明坐上了实际领袖位。上台后，王明根

据各苏区的大量投诉信，指责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肃反犯了“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去纠错。

1932年10月，周恩来在江西宁都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项英、任弼时、邓发、顾作霖等人一致谴责毛泽东滥杀无辜。因下令江西肃反降温而被撤职的项英在会上带头发难，直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平时看书不外乎《吕氏春秋》、《贞观政要》、《金瓶梅》，应该离开总政委的职务。”[18] 在米夫离华，斯大林鞭长莫及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宁都陷入孤立，被与会者指着鼻子骂。会议根据项英的建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毛的军权。周恩来在《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议案》中称反“AB团”、反“社党”斗争正确和必要，但存在“扩大化”错误。会后，随着毛泽东去职，江西苏区的肃反降温。宁都会议对中共的一大创造是以“扩大化”掩盖罪恶。此后几十年，以作“纠正扩大化错误”报告作为残酷整肃运动的结束语成了中共的传统。

视军权为生命的毛泽东对宁都会议怀恨终生，此后对谴责并举手剥夺他军权的与会者逐一清算。十年后，他制造了皖南事变，借蒋介石之手除掉了项英。尽管周恩来主持宁都会议是执行王明的决定，并且按斯大林的意思为毛泽东肃“AB团”、镇压“富田事变”作了辩护和开脱，但由于他最后宣布剥夺毛的军权，也被毛泽东记恨。在后来的为臣生涯中，周恩来不断被毛泽东翻宁都会议的旧账，反复为宁都会议作检讨，直到临终时仍向毛泽东作最后检讨，称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犯了严重错误。

川陕苏区肃反

在一年多的鄂豫皖苏区肃反中，中共在杀害了数万红军将士和苏区干部，基本摧毁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1932年7月，蒋介石在《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腾出了手，对鄂豫皖苏区展开了另一次围剿。天怒人怨的苏区和被肃

反重创的红四方面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张国焘被迫率红四方面军逃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逃亡途中，原鄂豫皖苏区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在小河口会议上向张的独裁地位发起挑战。在处境孤立的逃亡路上，张国焘不敢犯众怒，以作检讨，吸收曾中生为最高决策层成员，改行集体领导等妥协办法渡过了危机。不久，长城抗战爆发给红四方面军带来福音。趁国民政府调兵北上应付日军，红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建立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在川北站稳脚跟后，张国焘继续肃反，一方面是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另一方面是为剪除异己，像斯大林、毛泽东一样要杀人立威。与两年前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一样，张国焘、陈昌浩成立了保卫局，列出黑名单，继续以“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罪名大规模逮捕屠杀。在持续一年多的川陕肃反中，邝继勋（红四军的第一任军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被绳子勒死）、余笃三（红四军政委）等数千红军将领被杀害，小河口会议上向张国焘发起挑战的原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及支持者们基本被杀光。对于小河口会议上发难的领袖曾中生，张国焘因顾虑引起哗变而没敢加害，等到在后来的长征途中才下手，将曾勒杀于川西卓克基。

晚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避血腥肃反，没有为支持肃反屠杀同志忏悔。脱离共产党的张国焘尚且如此，在党的高层们更不会忏悔。徐向前等幸存的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在晚年回忆录中一致谴责张国焘主持的血腥鄂豫皖肃反和川陕肃反，但全体回避自己当年表态支持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几十年后，众多川陕肃反留下的千人坑被发现。其中，仅通江洪口场的一座“肉丘坟”就挖出了五千多具红军尸骨中共将分散在川陕根据地各县的五十多处的红四方面军墓园中的两万五千具红军遗骸迁移到通江县王坪村，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开园时，中共安排上万军人、学生沿“千秋大道”进入墓园，在“铁血丹心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来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青年们不知道，当年红四方面军被迫逃离鄂豫皖苏区入川主要不是国民党军

的进攻，而是中共自己把红军将士杀得所剩无几，在土地革命中将苏区及周边稍有财产的人消灭，自己使鄂豫皖苏区不可持续了。建立川陕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签定了“巴山协定”，相安无事，与川军也无大战，千人坑中掩埋的红军死难者绝大多数是死于中共之手。

第 22 章 斯大林促中日开战

九一八事变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国策，优秀学生首选报考军校，职业军人备受尊敬。1922 年，美国在华盛顿九国会议上施压，迫使日本承诺归还山东及裁军。会后，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军，将军费预算从会前的 7.3 亿日元逐年削减。大规模裁军使众多职业军人变成了多余的人。如同中国无业游民加入会党寻求出路一样，日本职业军人们纷纷加入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寻求出路。

1929 年，西方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工业产值、进出口贸易下降约四成，企业大批破产。经济危机加剧了职业军人的不满情绪，军部要求结束由众议院中的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的“政党内阁”制，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军人组织反对裁军的行动升级，“樱会”计划发动政变推翻决定裁减海军的内阁，拥反对裁军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组阁；“爱国社”策划了刺杀滨口首相事件。

军界的另一诉求是向满蒙扩张。日本向满蒙扩张的“大陆经略”启动于十九世纪末。1897 年，日本玄洋社选定承诺满蒙划归日本的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标志日本开始本扶植中国会党革命。随后，以向黑龙江流域扩张为宗旨的黑龙会召集中国会党成立同盟会，支持同盟会回国暴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然而，随着袁世凯就任总统，日本朝野得到满蒙的期望落空，资助孙中山的热情减退。不获日本资助的孙中山弃日投苏，让日本军人感到一再被中国革命党人欺骗。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后，日本军人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应兑现孙中山、同盟会的对日承诺，将满洲割让日本，要求强硬完成满蒙交易的呼声高涨。“一夕会”成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提出了向满洲扩张的构

想（石原构想），其要点是：“一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以日美为代表的东西两大文明的决战。为准备对美国作战，日本须先占领满蒙，这样才能使“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石原构想”对日军军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军部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必须宣传“石原构想”和松冈洋右的“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理论，取缔违反上述理论的言论。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推动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满蒙占领计划》，在其中称：“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根据这一计划，关东军开始挑起事端，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尽管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兵力不过万余人，但狂热的“一夕会”军官们视三十万中国东北军如无物，决心“强硬完成满蒙交易”。

关东军的决定不光是出于狂热，更由于他们了解中国的虚弱。二十年的革命战乱、兵祸使全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后，战祸不息反增，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国民政府剿共等战祸没有停过，各路军队总数五倍于清末，分裂为互相敌对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中央政府号令仅及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始终处于各路军队，各派势力的颠覆威胁之下。国民政府最严重的威胁来自红军。共产国际建立的各路红军和几块苏区不断扩大，从省界边区向省府步步进逼。在国防方面，中国只有党军，各路军阀的私家军，不存在效忠国家的国防军。私家军的性质注定了各路私家军只求自保实力，无意国防。1931年2月，粤、桂系借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再兴分裂，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派其任命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到日本谋求日军支持讨伐南京政府，使日军更清楚了解了中国的四分五裂。

中国虚弱的原因还在于天灾。1928到1930年间，中国北方旱灾、蝗灾及瘟疫并发，八省大饥荒，灾民死亡千万。国民党新军阀在大灾中不断开战，使饥荒范围扩大至十数省。1931年夏，长江流域又发生了空前水患，

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会合，沙市到上海的沿江城市全部被淹，武汉被淹百日之久，淮河流域和京广铁路线以东广大平原地区一片汪洋，运河东堤溃决，淹死上百万人，洪水退后，痢疾、霍乱与饥荒并发。天灾人祸使本已破产的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日军中本来就有下级军官擅自决断采取行动的“下克上”传统。狂热的少壮派军官们实际控制着军部决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一夕会”成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支持下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同时配合实施建立由军部控制的“举国一致内阁”计划。他们的决定得到多数关东军官兵的支持。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300余人以中国军队破坏柳条湖附近铁路为借口，向七千多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发起进攻，以二十四人伤亡的代价攻占了北大营，造成东北军部队伤亡三百多人，是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原本定于9月10日回沈阳，因听说土肥原组织了暗杀团而留京不回，住进北平协和医院。事变当晚，他电话命令东北军不作抵抗。第二天，东北军不战而退，撤向锦州。在东北代理指挥的张作相到北平请张学良速回沈阳主政，张学良拒回，命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应付一切。张作相效仿张学良，留在老家锦州也不回沈阳。主帅脱逃，东北军各级军政官员层层效仿。9月19日，数千日军几乎未遇抵抗便占领了沈阳（奉天）、四平、营口、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丹东——沈阳）沿线十八城市，轻易占领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缴获了完好无损的步枪、手枪11万支，机关枪60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余门，飞机262架，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以及大批器械、物资。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东北军战机无一升空，大炮无一发射，所有武器装备完好地被日军少量军队缴获，为世界军事史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

占领沈阳后，日军抄没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边业银行、中国银行金库、大帅府的金库，获黄金、白银及现款无数。

日本政府对事变感到突然。9月19日，若槻首相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应对。陆军大臣南次郎称事变为关东军的自卫行动，而币原喜重郎外相认为事变是关东军企图绑架政府的阴谋，要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件。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撤出事变占领区。兵力不足万人的关东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请求派遣驻朝鲜军团增援。内阁命令驻朝鲜军司令林銑一郎不得派兵增援东北关东军。然而，林銑一郎拒绝内阁命令，独断派出了三万日军增援关东军。有了朝鲜军的增援，关东军按照占领整个满洲的计划一路向北满推进未遇真正抵抗，至21日轻取长春、吉林两市。

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得事变消息后立即赶回南京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政治方面，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会后，国民政府外交部迅速采取几项应对举措：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起诉日本违反了《九国条约》，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并提出了日军撤兵、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赔偿损失、设中日调和公断之永久机构等四项要求；国民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希望主持公道。应国民政府要求，国联召开专门会议，谴责日本侵略，决议限日本在10月13日国联会议前从事变占领区撤军。日本内阁一再命令向关东军撤军。关东军对文官政府命令不予理睬。10月22日，国联鉴于日本未按要求撤军，再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完成撤兵。对国联决议，日本驻国联代表声明：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日本军队将尽快从事变中占领的地区撤出。11月，关东军继续北进攻，占了齐齐哈尔和黑龙江省主要城镇，进入了日苏协议的苏联势力范围。

正在应付全国大饥荒，到处反抗暴动危机的斯大林深知无力对日用强，决定避免与关东军开战。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政策，并愿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立场，中东铁路苏方代表传莫斯科命令，禁止苏军拦阻日军沿铁路运送军队。日本方面拒绝了苏联的缔约请求。苏联的主动示弱帮助关东军打消了对进一步向北满进军会引发日苏战争的担心，放心地从黑龙江抽调兵力回师奉天，准备进攻锦州。应对关东军进攻锦州的态势，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英、美、法三国驻日大使分别警告日本政府不得进攻锦州。张学良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守土命令，命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以保存私家军实力。

12月，关东军不理睬美英的警告，攻占了锦州。东北军再退至热河一线。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无意对日强硬，只作口头谴责。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照会日本和中国，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承认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史汀生主义），国联则派出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的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到东北调查，谓等调查报告出来后再议。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时，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奉斯大林之命声明苏联不准备参加调查团。

年底，日本若槻内阁因在国联会议上作出的撤军承诺无法兑现而总辞，犬养毅上台组阁兼任外相，长期主张向满洲扩张的“陆军三大长官”之一荒木贞夫接任了陆军大臣。为保日本在国联的地位，同时也为修复日中关系，犬养内阁继续敦促关东军撤出事变占领地区。关东军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事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怀疑日本政府高层接受了中国的贿款而不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事变中，日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缴获了数十张日本政要收受张贿款的收据，将之公之于众。于是，日本民意、军部和日皇一致支持少壮军官们占领满洲，关东军军官继续“独断”，拒绝日本政府从占领地区撤出的指令，文

官内阁更加弱势。1932年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至此，日军以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了整个满洲。关东军入侵的过程中，除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部有一阵抵抗外，辽、吉、哈等地大批军政负责人向日军投降。3月1日，关东军扶植成立了满洲国。新上台的犬养毅内阁拒绝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不承认满洲国，军部与内阁矛盾激化。同月，李顿调查团经过调查提出报告书，否认了日本方面的事变为合法自卫说法，确认成立满洲国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议以国际共管取代日本独占，在东北三省实行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国联通过了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起草的《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日本拒绝接受该决议，宣布退出国联。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采取绥靖政策，只作谴责姿态，实际默认日本占领满洲，希望日本继续北进对苏开战。1932年5月，日军狂热军官闯入首相官邸，将拒绝承认满洲国的犬养首相杀害，是为“五·一五事变”（五月事变）。在日本民意支持军国主义的情况下，文官政府只得屈从军方。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9月，日本政府放弃若槻、犬养两内阁对狂热军官说不能的立场，正式承认满洲国。至此，狂热军官绑架了军部，军部绑架了文官政府，法西斯内阁取代了政党内阁，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谴责张学良不战而逃。回应谴责，张学良一再宣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对不起国家，称“现在不便公开”，暗示是蒋介石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张的说词只能蒙骗青年学生。因为，他易帜的条件是军权、财权不受中央染指。从易帜前到易帜后，东北军从来就没有服从过蒋介石的军令。六十年后，重获自由的张学良终于因拿不出经得起专家鉴定的蒋介石手令而改口，承认他因相信日本政府会约束关东军，为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日军扩大战争的借口而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他没有说的一个不抵抗原因是，当时他相信那些收受他贿赂的日本政要们会约束关东军，没想到日本军人会公开他行贿的证据以打击文人政府。他没有说的另一不抵抗原因是，他要保存实力，拒绝以私家军去与日本强敌拼老本。这一考虑并不奇怪。各路军阀都与他一样口头抗日，实际保存实力避战，当日军进攻热河，

孙科政府请各路地方军阀援助张学良时，无人响应，证明对外避战保存实力是私家军必然选择。各路私家军虽然保存实力，但至少名义上服从政府，不至于进攻政府，然红军却是乘外强来犯进攻国民政府军。当国民政府从围剿前线调兵北上应付事变时，红军乘机追击北上国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空前胜利。

宁粤战争与蒋介石下野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李济深提出了“分治合作”口号，变相要求地方自治。元老胡汉民针锋相对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强调中央集权。在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改任立法院长后，胡汉民不甘作蒋介石属下，转而主张“分权”和“党外有党”，不断以搬孙中山遗训的办法压制蒋介石，阻止国民党中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2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再决议尽快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约法。胡汉民再阻挠说：“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蒋介石不容胡汉民一再阻挠，将胡软禁，然后公布了根据《训政纲领》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宣布从1931年6月1日开始施行。这一约法体现苏俄引入中国的党国体制，规定党权不受制约，国民党为唯一合法执政党，其余党派非法，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官员皆由国民党任命，政府从属于国民党，国民党执掌立法权。虽然上述党国模式与宪政不符，但国民党不否定宪政，宣布了1935年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时间表。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给反蒋派送上了联合倒蒋的借口。5月，西山会议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推汪精卫为领袖，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旗号向南京中央发起挑战。9月初，反蒋派纠集“护党救国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粤方军队刚刚入湘，“九一八”事变爆发，粤方暂停了军事行动，蒋介石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谈判，提出自己下野，结束内斗，共赴国难，双方达成妥协。10

月，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在上海与汪精卫、胡汉民举行了和平统一会议，宁粤双方达成协议：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宁粤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12月，蒋介石通电辞职，第二次下野。宋子文同蒋介石共进退，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粤方入主南京，任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将十九路军调宁，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第二轮“武装保卫苏联”

1931年4月，苏联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笠原幸雄中校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1]日本武官的建议很有道理。因为他清楚苏联大饥荒造成的国力虚弱。斯大林当然更清楚当前苏联的虚弱，对日军北进的兵锋充满恐惧。半年后，关东军军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不仅占领了南满，还向日苏协议规定的苏联势力范围北满推进。担心日军北攻苏联，斯大林决定对日避战妥协，采取一切手段将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向中国，让中共去推动中日开战。根据此决定，共产国际于9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一次执委会议，为中共制定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任务案中称，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目的是侵略苏联，中国共产党必须武装起来，继续保卫苏联，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大城市，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

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王明已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于9月22日推出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为满洲事变宣言》。宣言称：“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

根本危险”；“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夺取一省、数省胜利和实行武装暴动的总计划”，“满洲事变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2]

9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了署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第二军团长贺龙、第三军团长彭德怀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毛泽东在这份亲笔书写的文告中写道：“士兵兄弟们！你们受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你们想想看：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卖命？如果说你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就是你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你们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家？你们的长官把你们当作牛马，当作炮灰，要你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拼着性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们！.....你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如果你们住房地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士兵的利益，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着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啊！”[3] 9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了《就满洲事变第二次宣言》。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

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

发表宣言，下达文件之外，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在国民政府后方进攻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行动。中共地下党在北平、上海和南京召集了十万人的“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散发了《上海八十万工人告世界工人书》；策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殴打外交官，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打至重伤辞职（施肇基继任）；组织南京学生包围南京政府机关，呼喊“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组织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指示迅速发展在中东铁路战争期间成立的各省、各地区，甚至各县的“拥苏大同盟”组织。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拥苏大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号召青年团员、儿童团员和各界民众拥护苏联、以保卫苏联为己任。根据中央指示，各地的拥苏同盟组织迅速扩张，其中湘赣的“拥苏同盟”发展会众多达 16 万人。[4] 1932 年元旦，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略，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是地主阶级国民党。……祇能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中共宣言：“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各地“拥苏大同盟”、“左联”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北平二十万人抗日救国大会等组织的俄党面目在九一八事变后充分显现，他们宣言、口号中的“救国”不是救中国，而是“武装保卫苏联”之意，是斯大林要求的促中日火拼以保卫苏联的安全。

一二八淞沪抗战

决心武力霸占满洲是从沙俄到苏俄的一贯政策。两年前，苏俄为保护其在满洲的势力范围投入重兵击败了东北军。可在如今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国内大饥荒，日本、德国两个反共国家对苏联东西夹击的态势正在形成，斯大

林不敢对日用强。为化解日军北攻苏联的威胁，斯大林采取了几项对策：第一，命苏军对关东军坚决退让；第二，指示制定交易方案，将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第三，指示策动中日在华南开战，陷日军于中国战场；第四，决定承认关东军扶植建立的满洲国；第五，决定不参加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以避免激怒日本。

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共产国际同时向中共、宋庆龄、何香凝、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及控制上海报纸的地下党员下达了促中日开战的指示。几路人马得令后立即行动，在上海等地发动了反日运动。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宣言，以反日、爱国、救亡等口号鼓动上海民众反日；[5] 共产国际资助的《申报》开辟了推动中日开战的宣传专栏；十九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策动进攻驻沪日军。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前身为邓铿組建的粤军第一师，后被鲍罗廷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以陈铭枢为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的第十师，北伐攻克武汉后被扩编为第十一军，中原大战后被改编为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九一八事变后，桂系迫蒋介石下野后主持南京政府，任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凭借私家军班底十九路军控制着宁、沪。与国民党各路党军一样，十九路军也被苏俄顾问安插有大批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国际和中共通过这些地下党员，操控着十九路军。

1932年1月20日，中共地下党策划了一起反日事件，安排人在上海租界围殴五位日本僧侣，将其中一人打死，两人打成重伤。围殴事件煽动起了在沪日本人的仇华情绪。千余日侨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请愿，要求出兵保护侨民，同时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商店。应日侨要求，日本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了道歉、赔偿、惩罚施暴者及取缔解散上海民间反日团体的“限期要求”。乘日人仇华情绪高涨，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告全国民众书》、《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等文件，在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想占领上海了”，“党应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

击，动员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6]

1月25日，日军以中国政府未在限期内惩处肇事者为由，派兵进入中国管区。同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辞去行政院长职。汪精卫临危受命，于28日接任行政院长。当晚，十九路军向驻沪日军发起了进攻，激烈巷战持续至29日晚，日军火力优势在巷战中难以发挥，全线退回日租界，双方伤亡惨重。驻沪日军兵力薄弱，日军参谋本部和海军高层决定暂时停止上海作战，从日本国内向上海增兵。汪精卫也准备增兵上海，发表了《对淞沪事变宣言》，命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张拒绝起兵，汪只好请下野的蒋介石出山。1月30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迁都洛阳，准备持久抗战。蒋介石临危受命，发表了《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以鼓舞士气，同时向十九路军下达了避免战事扩大的命令。他清楚，有中共红军在南方威胁政府，对日用兵会腹背受敌，重演九一八事变后调兵北上被红军追杀的惨败一幕，于是与汪精卫达成共识：扩大战事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只能给中共红军带来追杀国军的机会，国民政府应当尽量推迟与日本全面开战。

然而，蒋、汪控制不了局势，局势被莫斯科操控着。中共党员控制的十九路军在尽量扩大战事。莫斯科还有更多棋子可调动。国军最精锐的德械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是黄埔军校时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共产党员。根据莫斯科将上海战事扩大的密令，张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第五军赴沪参战。蒋介石拒绝了张的参战请求，命张只作增援姿态。蒋介石不派兵增援上海的另一原因是他无兵可调。因为防御江西、湖北的中央军不能调，担心从剿共前线调兵会被红军乘机追杀，其它地方诸侯的军队只唱抗日高调，乐于隔岸观火，根本不听中央调遣。

2月，日军增调军舰十多艘、陆战队7000人参战。因上海作战不力，日本大本营几次换帅，先任命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再改

由陆军派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为指挥官，再撤换了植田谦吉，组建了上海派遣军，派原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中日交战期间，英、法、美、意四国抗议日本以上海租界为作战基地，联合敦促中日停火，并分别调军舰和军队数千增兵上海，国际联盟通知日本将在 3 月召开的日内军会议时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问题。

淞沪战事持续近半月后，十九路军作战伤亡惨重，多次电报要求中央调兵增援。蒋介石拒绝了十九路军的要求，申斥该部不服从中央命令，擅自发动战事致使沪局无法收拾，申明“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蒋介石严令蠢蠢欲动的第五军按兵不动。3 月 1 日，日本军舰载第九师团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到嘉定、太仓一线。3 月 3 日 日军攻占了吴淞炮台，3 月 6 日，十九路军全线溃败。这时，日本方面掌握了苏联策动淞沪战事一系列行动的情报，内阁与军部达成共识，决定在得胜后结束上海的战事，不让苏联策动中日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计划得逞，通过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向中国方面递交了和谈的建议，委托美英法各国领事出面调停。汪、蒋也在避免战争扩大，谋求结束战争。中日两国政府在英美调停下立即开始和谈，历时三十四天的淞沪战事结束。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中日双方于 5 月 5 日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恢复战前态势和“三项谅解”：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反日运动，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军。对中国来说，国民政府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明智之举。因为，政府腹背受敌，继续战事意味苏区的扩张威胁。淞沪抗战刚爆发，中共对各苏区下达指示，要求利用国民政府应付淞沪事变的大好时机，采取战略攻势，扩大红军及苏维埃区，指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七省全面出击，同时发布了《关于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总同盟罢工，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打倒国民党政府。[7]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团在洪湖出击，歼灭了国军第 48 师特务团、工兵营、第 4 师

12 旅和第 144 旅，击溃增援的第 142 旅缴枪 3000 余支；[8]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红军黄安县经金家寨进攻苏家埠，围困苏家埠两个多月，歼灭政府军两万人，缴枪一万五千，威逼武汉；中央红军向赣南重镇赣州发起进攻，然后南下入闽攻占并洗劫了漳州。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使国民政府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得以腾出手来应付大举进攻的红军，迫使中央红军撤离漳州。

6 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在会上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攘外必先安内”是国军将领们在 1929 年中东路战争时提出的策略。当时，冯玉祥乘苏俄入侵之机兴兵欲武力推翻中央政府，政府陷于攘外与安内无法兼顾的困境。山东的陈调元、石友三提出“攘外安内之谋”，联衔各地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说：“吾国兵燹频仍，民生凋敝，近复边患日亟，共祸嚣张，凡属军人，宜如何猛省，凛煎豆燃箕之戒，策攘外安内之谋”。[9] 蒋介石通电表示同意说：“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搏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10]

九一八事变时，奉调北上的国军遭红军追杀，损失惨重，更让国民政府感到攘外必先安内。淞沪战事期间，国民政府再遭腹背受敌之苦。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说：“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临时向各苏区下达进攻命令说：“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

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再建北方苏维埃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由于各路红军的大举进攻，中央军主力无法脱身，部分奉命从围剿战场抽调赴沪的政府军再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地方实力派各自拥兵保存实力，使国民政府对上海战事无兵可调。

针对中共趁外患颠覆政府的行动，蒋介石在庐山定“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11]“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祇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祇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

明朝为前车之鉴。祇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祇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2]

“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是斯大林为解除日本关东军攻苏威胁和蒋介石围剿红军压力所策动的。战事前，苏俄指挥在华的各路人马协同行动：宋庆龄、何香凝推动蔡廷锴开战，在战事中赴前线劳军，发表慷慨激昂演讲，与蔡廷锴高调见面合影，发动上海各界捐献款物运动，声称筹得巨款 700 万元（其实这笔一相当于十九路军八个月军饷的巨款主要来自莫斯科）；中共制造了杀日本僧人事件。淞沪战争爆发时，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奉命不加拦阻，保持远东的平静，鼓励日本在华南对华用兵。与此同时，中共连续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在其中称：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上海战争明显地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积极地加入这一战争”；在莫斯科的中共领袖王明连续发表文章，在其中一再的宣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13] 潜伏于国民党的张治中等人奉莫斯科之命联手推动扩大上海的战事。淞沪战事结束后，苏联公开向日本提议出售中东铁路，并于 6 月 22 日在东京与满洲国代表开始了正式会谈，申明了承认了满洲国的立场。淞沪战事前后，共产国际下属们在所喊的反日高调实质与中东铁路战争中和九一八事变后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及建立“拥苏大同盟”行动一样，均是服务苏俄利益的策划。

汪精卫、蒋介石认清了斯大林促中日开战的布署，以不扩大战事，停战和谈挫败了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淞沪停战后，斯大林指示宋庆龄和中共将促中日开战的运动升级。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下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将出面对日和谈的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打伤。这一暴行与李大钊指挥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殴打外交官，中共北方区委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学生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一脉相承，均是执行苏俄指示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在于，鼓动青年殴打的目标总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或日本人，而决不是对中国领土野心最大的俄人，也不会是与苏俄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足见沪战事中的爱国口号与暴行表象是反日，实质是拥苏。

无知学生们容易受爱国口号的煽动。他们不知道，《淞沪停战协定》与爱国或卖国无关。协定主要内容是恢复战前态势。战前态势有国政府默认日本驻军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中国军队退出上述地区等屈辱状况。但屈辱是当年义和团打爱国旗号祸国的结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成立时承认前政府签署的《辛丑条约》没有错。

中共在淞沪抗战前后坚持推翻政府的事实证明了汪、蒋限制战事扩大，尽快谋求和谈政策的明智。在日、苏强敌外侮和中共武装心腹威胁的情况下，“攘外必先安内”无疑是国民政府自然而明智的应对。在蒋介石奉行“攘外必须安内”方针的几年中，宋庆龄、何香凝、遍布全国的救亡团体等俄党高喊停止内战，促国民政府立即与日本全面开战，却从未促中共红军停止进攻国军，从未促中共放弃推翻国民政府宗旨。多年后来人们才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中国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是斯大林为苏俄安全要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策略在起决定作用。

第 23 章 中华苏维埃国

苏俄在华建立伪国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在各地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时派周恩来到江西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操办建立苏维埃国。周恩来不是空手来赣，而是带着共产国际起草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全套建国文件。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经斯大林批准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兼红军总司令，博古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邓发、张鼎丞、王明、彭德怀（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孔荷宠、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向应、方志敏、任弼时、沈泽民、谭震林、曾山、夏曦、刘少奇、邓子恢、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徐特立、阮啸仙等 63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与几个月后成立的满洲国一样，中华苏维埃国也是外强扶植的傀儡国。不同的是，后者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直接威胁着中国的首都，对中国的危害更大。中华苏维埃国在各方面都体现苏俄属国的性质：其一，建苏维埃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二，建国日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苏联国庆日；其三，

建苏维埃国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宪法大纲申明中华苏维埃国隶属苏联；其五，苏维埃国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一样，高层成员名单全由俄人决定；其六，苏维埃国的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架构是苏俄引入产物；其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的是列宁头像；其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中规定的镰刀锤子国徽、五星红旗国旗取自苏俄寓意；其九，苏维埃国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九部一局）从名称到架构都照搬自苏俄；其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布：“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谁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允许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有权分离出去的。少数民族独立条文是莫斯科专为将中国满、蒙、新疆并入苏俄版图的目标所制定的。这时的苏俄通过其控制的“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蒙政府、东蒙（呼伦贝尔）政权、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权控制着中国半壁江山；其十一，中华苏维埃国的宗旨是“武装保卫苏联”，《红色中华》刊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说得清楚：“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苏俄通过中华苏维埃建国文件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祸害。其一是“专政”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和反革命份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其二是剥夺私有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规定共产党享有政治特权，有权剥夺

指定阶级的公民资格，经济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苏俄苏俄引入的专政说和剥夺说在中华苏维埃国存续的几年中造成控制区内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减少，在后来的新中国带给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死难。

对于外敌入侵之时成立的苏维埃国中之国，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指出：“国家社稷被断送的最大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1]

苏维埃国的社会

苏维埃国将苏俄统治模式复制到了中国。这种模式对百姓全面监视，取缔自由。苏俄建立政权后设立肃反机构——政治保卫局（格伯乌 GBU）。最初，肃反机构主要是对付布尔什维克党的变节者，后来对付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建立中共的同时，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共培养政治保卫系统的骨干，从赴法勤工俭学生中选中周恩来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培养对象，送周赴英国、德国接受系统培训。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开始将其政治保卫系统引入中共。1926年，鲍罗廷通知陈独秀，苏共将帮助中共培训政治保卫干部，建立情报特工机关，中共选派了要员顾顺章、陈赓和陆留三人从上海登俄轮赴苏，被苏共安排到伯力、海参崴等地苏俄红军特种部队接受各项特工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侦破、审讯、刺杀、爆破、劫狱、射击、秘密通讯等等。几个月后，中共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携苏俄特工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归国。1927年，共产国际在武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脑的中共中央特务科（特科），下设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的保卫股、负责镇压脱离中共者的特务股（红队）、情报股和负责收编江湖武装的匪运股。从苏俄受训归来的顾顺章兼任了保卫股长和特务股长，陈赓担任了情报股长。1928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正式规定中共的各政权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六大会后，莫斯科安排全体中

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卫培训。随着在中国建立苏区，苏俄将其政治保卫制度移植到中国，在各苏区建立保卫部和肃反委员会。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后，成立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

现代政党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来，中国政党如云，一人身兼数党者大有人在。没有哪个政党残酷对付想退出者。帮会、黑手党和革命党都有报复变节者的作法，但设立专门机构对付想退出者却是苏俄的作法。苏俄将这种史无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国。中共特科传承了苏俄以极端手段对付变节者的传统。特科一号首脑周恩来、二号首脑顾顺章曾率领红队残酷报复了不少前同志，一起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顾顺章变节后，周恩来率康生等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来到上海顾宅，将顾的家属，上门的朋友及杂工等十几人（一说 30 多人）斧劈，绳勒的极端方式“满门抄斩”，埋尸庭院，上浇水泥封盖，以残酷报复警告党员变节的下场。周领导的灭门报复行动受到斯大林的夸奖。[2] 相比会党，共产党报复变节者更加残酷。共产党明确要求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信条是为党的利益没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政治保卫局，照搬苏俄名称为 GPU，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在其它苏区也设立了政治保卫分局，政治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主要干部都经过苏俄培训，莫斯科受训归来的邓发接替王稼祥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上海转移来的中共特科成员们成为政治保卫局的骨干，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人先后担任了政治保卫局下属各部部长。政治保卫局属下保卫队官兵武器装备最先进，配有长短枪，佩戴绿色加红框的领章，胸前佩戴“GBW”（或 KBU，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俄文缩写，这一“绿领章部队”就是后来中共公安部和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前身）。

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各级分局，在基层单位和乡村派有特务员。与在苏俄一样，政治保卫局不仅监视和对付中共干部，红军将士，还监视、对付区内全体民众。与苏俄的“契卡”和政治保卫局一样，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也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政治保卫局可随意拘捕、审讯、处决他们指称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保卫局还负责执行肃反屠杀，按照革命党的规矩，以枪毙，暗杀对付变节者、逃兵，以使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清楚变节和脱离革命的严重后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苏俄政治保卫局模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政治保卫局向政府、红军部队派出特派员，向高级官员派出保卫员，规定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使苏区陷入恐怖。

在苏维埃国，民众的日常活动受苏维埃政府监视。苏维埃政府在路口设卡（递步哨），实行“赤色戒严”，盘查与逮捕被认为的可疑份子，村民离开村子须有路条，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须事先报告，否则会被扣押。[3] 民众被强迫编入数不清的苏维埃外围组织，如：贫农团、赤卫队、赤色工会（苏维埃国中并无工人阶级，长工，推车子的、抬轿子的、挑脚的、做短工的、手艺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会）、雇农工会、青工组织、女工组织、革命互济会、省县区乡各级反帝大同盟、儿童团、少先队、慰劳队、歌舞队、妇女队、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补衣队、摊铺队、清洁队、口号扇子队、选举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户口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组织。上述组织像一张大网，将苏区的全体民众网罗进去。苏维埃政府不允许有人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网进上述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上述组织中设有监视、互相检举揭发的制度，包括常委会制度、

代表值日制度、内部评审制度、开生活会制度等等。[4] 民众为保全身家，不得不参加组织，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务，参加诸如唱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烧菩萨、换农民家里的“天地君亲师位”为“革命始祖马克思”等等活动。[5]

苏维埃政府通上述组织和制度向老百姓摊派人、财、物，诸如：向每村摊派慰劳红军的毛巾、黄麻草鞋与布草鞋；强迫老百姓买“革命战争公债”；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求买了公债的农民将所购的公债券退还给政府，变购买为捐献；号召捐献首饰银器等以支持革命；开展“借粮”给政府运动（政府不会偿还）；开展节约粮食支援革命运动；组织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自带饭无偿为红军家属耕田；发动儿童团员“交月费一铜板慰劳红军”；“扩红”：强制性派给各村扩红（参加红军）人数指标，其中长冈、上才溪、下才溪等乡，全部青壮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当了红军或给共产党做工。[6] 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承认，由于财政危机，苏区的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日渐荒废。学童被组织成儿童团负责岗放哨，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7] 毛泽东将苏区这种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社会模式确立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来在延安时期和夺取全国政权后均以苏维埃国的社会模式为样板，要求将全体人民纳入一张大网，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在二十多年后按苏区的集权社会模式建立了全民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残酷搜刮下没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间，中央苏区爆发了数十起武装抗争。更多的老百姓选择逃出苏区。为防止民众逃亡，苏维埃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处死。曾有个管钱的管理员花钱买了张路条试图逃跑，抓回后被处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尽管如此，逃跑仍大量发生。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于是，苏维埃将怀

疑可能逃跑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逃亡无路时，自杀事件大量发生。自杀者中包括大批共产党干部。苏维埃报刊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8]，间接反映出苏区自杀情况之严重。

参加围剿苏区的蒋鼎文晚年披露苏区情况说：“谈到共产党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一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们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当干部，用革命翻身斗争清算为诱饵，鼓动对富有的亲友斗争，杀死亲友留下血债，使人们因怕报复便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脱离不了共产党的羁绊。在国军进剿时，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枪威胁老百姓，不准向国军吐露一点匪情，甚至谁与国军接近谁便遭殃。我们进入赤区，老百姓不敢和我们多讲话，并不是老百姓不欢迎我们，而是老百姓害怕这些流氓匪干的残忍杀害。国军是流动的，不能永远驻下来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来和国军合作。匪军可以杀人放火带走壮丁，留下残弱妇孺，国军不能这样做，国军进入赤区探不到一点匪军消息，匪军可以留下匪干，留下儿童做国军的情报，反而对外宣传说老百姓厌恨国军，说老百姓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他们杀死不稳份子也诬赖是被国军屠杀的。我在江西行军时，时常发现被共匪屠杀的僵尸无人收殓，惨不忍睹。”[9]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

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将暴力血腥的农民运动引入中国，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和毛泽东是苏俄选定的两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经苏俄培训，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两个代表人物。1928年，毛泽东奉共产国际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红色政权的名义颁布了《湘赣边区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该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条文是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来的，也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为中共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法草案》。这一草案与《井冈山土地法》大同小异。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照搬苏俄的暴力剥夺，不给地主、富农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按当时中央苏区约三百万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农计，至少有六万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剥夺财产与生路。苏维埃国没有可持续财政来源，存续主要靠无偿剥夺。剥夺完地主、富农后，土地革命不能结束，需要继续以相对富裕者为剥夺对象，继续剥夺中农，最后剥夺到贫农头上。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不仅地主、富农被消灭，连中农也被消灭，人民全体赤贫，苏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经济一片衰败，人口迅速减少。不少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理想的红军将领对此感到幻灭，脱离了革命。例如，红军创始人之一龚楚因看到苏维埃政权对苏区人民残酷压榨违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国民党。1934年，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重建江西，废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归原主”为原则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在调查黎川和广昌两个县的重建情况时发现，多数农民没有耕种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抛荒，少数农民耕种了分得的土地，但收获后悄悄地把相当于地租的钱或粮送给原地主以维持地主和雇农的关系。熊式辉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10]

《井冈山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典型的强盗法，体现共产革命的真谛——暴力抢劫他人的财产，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否定私有产权，政府任意剥夺，为所欲为，不受监督与制约。两土地法又可称为奴隶法，因为它们规定苏维埃政府有权剥夺一切私有土地，实际宣布农民只能为苏维埃政府劳动，全体成为政府的奴隶。以这两土地法为代表的苏区土地革命带来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隶制度。中共建国后推行的暴力土改，对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马克思的暴力剥夺理论和苏俄暴力剥夺实践，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内容，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展的苏区土地革命，以及根据苏俄纲领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土地革命和《井冈山土地法》将几片苏区

变成赤贫世界。二十年后，毛泽东将苏区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国，通过土改和合作化将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时，将苏俄引入的灾难扩大到极致，将全国农村变成了赤贫世界。

苏维埃国的财政

苏区的兵民比例远超历朝历代，庞大的中共机关和十几万大军远非贫困苏区的经济所能供养。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延安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两百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粮饷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中共前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是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他披露中共的财政说：“共党经济来源：（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11]

苏区的实情正如向忠发所披露，红色割据赖以生存的财源，次要是靠苏俄资助，主要财政来源是靠抢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户的钱财来解决军粮军饷。红军“打土豪”与土匪的传统办法相似。毛泽东喜爱《水浒传》一类游民小说，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办法，上井冈山后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其意思是红军只抢大户，不许见老百姓就抢。这两条纪律显示出革命党的无耻，居然在“打土豪”时标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苏区都是各省边区，也是贫困地区，有钱人本来就少，军队大规模地“打土豪”很快将大户打光。于是，苏维埃将“大户”的标准迅速降低为普通农户，打土豪也就成了见财就抢。一段时间后，苏区及周边乡村看得见的财富被抢劫殆尽。因治安和灾荒等原因，老百姓通

常都会埋藏些积蓄。看得见的财富被“打”光后，红军转以百姓埋藏的财富为目标，称“挖浮财”。红军编制了“挖浮财”的指导文件，培训如何利用绑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财宝。如红四军政治部编了一份《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传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勒索。这份勒索教材的要点包括：

第一步 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 在周密调查后迅速捉人（绑架）：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

第三步 贴条子：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有走狗随时为他们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一来心疼，二来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开数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数目太大，把出款人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一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使再减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害，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第六步：优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里，特别当你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你有了相当把握时，便一面继续宣传侦察，一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会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场。万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甚么人进去，都在那里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你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卖；

第九步最后一着：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着，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

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着筹款来个最后一着，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红四军军委书记陈毅在给上海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1、城市筹款。红军.....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格，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疏松，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12]

中共湘赣省委的文件记载红军抢劫办法说：“军费很困难.....我们对这一问题决定以下的办法：1、责令苏区土豪写家信，利用游击队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区的家里，限期送款来。对于某些反抗缴款的土豪立即杀一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其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 3、组织短枪队及精干的游击队深入白区打土豪杀反动首领，发动群众斗争和收土豪的款子（罚土豪的款子应按照他的经济状况，数目不要提得过高，务必使他很快地送现款来）.....4、查田中查出的豪绅地主，除没收其财物外，须严加审讯，追出他埋藏的，并向富农罚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窃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农，除

没收好田外应罚他一笔钱。”[13] 中央苏区勒索筹款的案例之一是红军活捉了国军师长张辉瓒后向国军漫天要价，勒索赎金。赎金谈成，红军派代表去拿钱，但手下人擅自杀了张，并割下张的头颅装盒放木排顺赣江漂下，使“筹款”泡汤。鄂西苏区红军常见作法是“绑活票”，即到县城里将有名的富户每家绑一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当中难免有人质因惊吓或折磨致死，家人一次次送钱后结果还是撕票。[14]

苏区的有钱人本来不多，红军军费的需求无限。十几万大军靠抢劫生存不可持续。当红军将农民藏匿的积蓄勒索殆尽，“打土豪”打到农民的生产资料，当期收成和种子农具时，苏区的油水已被榨干，“打土豪”的收入急剧下降。于是，红军到苏区周边的“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占领一个地方，杀地主富豪，掠夺财物以充军饷。很快，新“红区”的土豪也被打光，红军只得将抢劫范围不断扩大。

红军到周边地区抢劫的另一方式是“打谷草”，又称“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境抢劫的术语。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动员红区的农民跟随红军到“敌占区”去抢割成熟的庄稼挑回苏区来，红军拿大头，百姓拿小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录说：“打草谷成了苏区革命群众最盼望的盛大节日”。他的这一说法显然源于列宁“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之言。红军的“打草谷”不光使华南经济衰败，还造成华南百姓道德沦丧。逐渐地，打过谷草的苏区农民不再愿意辛苦劳作，只盼着跟随红军外出抢劫粮食。红军和参加打谷草的苏区农民都知道，打草谷是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从别的佃农口中夺食。大家很清楚被抢了一年收成的佃农将会多么悲惨，但在红色熏陶中慢慢习惯了抢劫为生，是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一个证明。红军到苏区周边“打土豪”、“打谷草”的结果是使苏区周围形成一条数十里宽的无人区。红军只有不断扩大苏区，或长途奔袭更远的城镇抢掠才能维持生存。随着红军抢

劫范围扩大，周边的商人、百姓闻风而逃，整个华南陷入灾难，无怪当时报刊和各界人士均称红军为赤匪。

被抢劫之外，苏区农民还遭受着苏维埃政府苛捐杂税、不断征粮、摊派的压榨盘剥。苏维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和各种捐献，摊派款，其中土地累进税免税额低至全家总剩余粮食 100 斤，[15] 实际是向农民的口粮部分征税。以赤贫者为对象的苏区税收无论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钱。毛泽东承认：“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16] 收不到多少捐税，苏维埃只好对赤贫农民采取另外搜刮办法——强派徭役。苏区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乡村里青壮男子所剩无几，传统上不下田的小脚妇女成了田间耕种的主力。苏维埃向妇女们摊派众多无偿劳务，诸如照顾伤员、洗衣补衣、制作军鞋等等。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红军抢劫形成的苏区周边无人区，苏区与外界的贸易断绝，区内物资奇缺，信赖流通的工商业难以生存。苏维埃没收小工厂主的政策使苏区内本来就少得可怜又难以生存的工商业绝迹。毛泽东在调查后写道：“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18] 工商业绝迹使苏维埃政府税收枯竭，更加依赖抢劫生存。苏区龙岩的工商业衰败是苏维埃国摧残工商业的一个写照。毛泽东有诗云：“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实际情况可不是“金瓯一片”。龙岩成为苏区后，原有充满活力的私营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工厂作坊被苏维埃没收充公改成了红军的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或改为国营的生产合作社，在几年赤化中大批倒闭。

苏区的财政另一来源是金融剥夺。为开辟财源，苏维埃国大力印钞发债。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由于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维埃纸币。苏维埃国成立后，苏维埃政府继续大印钞票，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吸收了大量民间银元。不久，中共离开苏区西逃，苏区民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和公债都成了废纸。1933年，苏维埃政府发行经济公债300万元。由于地主、富农财产已被抢光，大批农民被胁迫参加红军，农民根本没有钱买经济公债。毛泽东在调查中披露，60%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摊派摊到儿童头上说明，苏区民众的钱财已被榨干。

随着红军扩充，打土豪收入减少和农村经济衰败，苏区的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征粮摊派越来越多，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原本粮食富足的华南苏区陷入饥荒，苏区农民们很快全体赤贫。至此，华南苏区复制了苏联革命导致饥荒的过程。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这被多数共产国家所印证。苏维埃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打土豪、剥夺土地，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金融剥夺等等说到底都是一回事——抢劫。打土豪是抢劫，剥夺土地也是抢劫，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等等无一不是抢劫。抢劫是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共产革命、苏区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性质。

打漳州 红色权

无节制地剥夺民众财产导致苏区经济崩溃，不断扩大打土豪的地域范围也难供养庞大的党机关和数万红军，财政很快陷入危机。九一八事变对中共是个大喜讯，乘蒋介石从江西围剿前线抽调军队北上应付日本人，红军一路追杀，打了空前的大胜仗，缴获物资无数。中共在胜利喜悦中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国。两个月后，淞沪战事爆发，给中共带来另一喜讯。中共中央决定，

趁国民政府调兵北上抗日，南方防务空虚，集中红军主力攻打大城市，将小打小闹的打土豪升级为打一个城市，做一单大的以解决苏区的财政危机，并将目标选定为富庶的侨乡漳州。

1932年3月末，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了漳州城。从贫困边区进入富裕城市，红军个个眼红，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抢劫及向商会勒索。老红军曾志回忆道：红军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鞋店里没收财产。陶铸带人绑了一个地主的儿子，获赎金3000多元。[20] 杨成武回忆道：“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21] 聂荣臻回忆道：“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交款”。[22] 在占领漳州的49天中，红军抢得百多万元大洋、大批金银珠宝、布匹、医药、汽油、食盐等物资，全军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了四元零用费，喜气洋洋地过了另一次“革命的盛大节日”。这样的“盛大节日”发生在所有红军占领区的周边。例如，彭德怀1930年率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征集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三万块。”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腾出手来应付南方红军的扩张。中央红军在达到目的后撤回，请了大批挑夫挑抢劫的物资满载而归回到瑞金。[23] 中共党史上，红军打漳州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赞颂为毛泽东领导的辉煌革命胜利。建国后，中共在漳州建立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馆以红军留下的“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扩大红军”、“扩大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等三条宣传标语为证，宣称红军打漳州是为了反帝，“留下了爱国光辉的足迹”。参观的青年们多不知道，红军打侨乡漳州、鄂东小镇黄石港与“反对帝国主义”无关，只是大规模的武装抢劫而已。当年参加抢劫的老红军们回忆起打漳州

都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没有人对抢劫勒索商民有所忏悔。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查田运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在各苏区内开展暴力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这种暴力、无偿地剥夺私人财产的土地革命摧毁经济基础，摧毁税收的源头，虽能贴补苏区财政于一时，但不可持续。随着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税源枯竭，各苏区很快都陷入了财政危机，迫使中共必须挖掘新的财源以解决苏区财政问题。应对财政危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是继续在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剥夺私人财产补贴财政。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想出了进一步搜刮百姓财产的办法，起草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在其中声称“要通过查田运动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抓出藏在苏区的内部敌人”。毛泽东查田主意的要点如下：

一、降低标准再划出地主、富农：在地主已被剥夺干净后，先向富农开刀，剥夺富农财产，再向中农开刀，将几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亩地主标准降到十亩或更少，以“查阶级”借口将无数已经很穷的中农“查”成“隐瞒田产的地主、富农”，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迫交“罚款”或“捐款”，罚作苦役。[24] 在毛泽东试点的胜利县（今于都），几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经剥夺了地主 810 家，富农 766 家。查田运动中，苏维埃降低标准又“查”出地主、富农 536 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农剥夺私产。[25]

二、株连：例如在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26] 显示查田运动中的株连比历史上的连坐更加厉害。

三、分财产：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以现场举手通过的方式，被查人的财产，将其中一小部分分给红军家属，将大部分没收充作红军军费，鼓动农民当场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财产，将其鸡鸭猪等煮了在大会上分食。

四、人身消灭。如同几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查田运动”也是暴力掠财运动。运动中，经贫农团大会多数人举手通过，被查人或以暗藏敌对分子罪名处死。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下达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要求将毛泽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试点的查田运动推广各苏区。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保证说，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会再行分配。但随着查田运动展开，苏维埃政府将“有钱人”、地主的标准不断降低，再查出一批地主，一些原本分得土地的农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剥夺。这种反复实施分田地作法被内部人称为翻饼。有的地方一年翻饼两、三次，种田收成达到温饱线者都不可避免地划成地主。农民认识到分得的田并不是自己的，随时将被剥夺，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翻饼的结果是苏区农业衰败，饥荒蔓延。针对中央苏区的翻饼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评说：“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传令兵当然不可能指出查田运动真正性质。查田运动实际是一场打干净“土豪”后再以贫苦农民为目标的新一轮“打土豪”运动。由于真正有钱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苏维埃从贫苦农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钱财，中共中央通过推广查田运动解决财政危机的目标未能实现。

扩红运动

为应付国民党围剿，中共苏区不断征兵扩充红军。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自愿征兵制并不可当真。在苏区，没有人自愿当兵，扩红须依靠强制摊派兵额。苏维埃政权通过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

农妇代表会等众多团体控制到每一个人，苏区民众在苏维埃的扩红运动中无处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苏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突击扩红运动，要求在年底前扩红25000人，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集中押送到红军各部。中共中央扩红运动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等”条文，不仅说明扩红强抓强迫，还说明不仅是壮丁，连少年、老弱也抓。毛泽东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老红军刘英披露当时苏区抓壮丁的情况说：“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一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28] 强迫抓来的兵一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一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29]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红军李一氓回忆道：“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

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31]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32] 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33]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34]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35] 中共建国后宣传国民党“抓壮丁”黑暗，而上述事实告诉人们，真正黑暗的是苏区的扩红运动。

共产党到来之前，各边区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扩张适可而止，边区社会青壮男人务农者多，土匪少，经济生活可以持续。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青壮界人全都吃粮当兵，苏维埃社会几乎无人从事生产，只能靠到周边白区去抢劫维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与扩红等运动的多重摧残下，苏区经济崩溃，区内土豪被打光，稍有财产者被“查”光，跑光，民众全体赤贫，即使没有国民党军围剿，苏维埃与红军也只能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一样，必须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区迁移了。

第 24 章 围剿与长征

四次反围剿

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于 1930 年 11 月调大军对迅速扩张的苏区展开了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情报率军主动退却，在赣江东岸布下了埋伏，取得了龙冈伏击战的胜利，毙伤国军数千，活捉国民党江西剿匪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对湘鄂西苏区围剿方面，国民党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策略。红军一样凭借共产国际提供的国军围剿计划准确情报避强击弱，取得了双桥镇战役的胜利。结果，国民政府对江西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两边都败，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

1931 年 2 月，蒋介石调集大军，任命何应钦为剿总司令，开始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的动员演讲中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由于参加围剿的各路国民党杂牌军认为南京中央欲借围剿红军削藩而各取自保对策，使何应钦指挥不灵，围剿难以奏效。5 月，国民党内部宁粤之争升级，蒋介石从围剿前线调兵应付粤军，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争相后撤，红军乘机反攻，连打五个胜仗，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各苏区进一步扩大，逼近各省府，使国民党政府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

7 月，蒋介石再调集十几万大军，聘请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策划，并出动空军配合，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由于潜伏在国民党机要作战部门的间谍钱壮飞身份暴露逃离，中共失去了前两次反围剿中制胜的情报法宝，加之两军实力悬殊，政府军一路攻克要塞，深入苏区。中央

红军被压迫于兴国、宁都之间方圆二百里的山区，陷入困境。8月初，国民党宁粤之争再度升级，粤、桂军北侵入湘，讨伐宁方，蒋介石急忙从围剿前线抽调国军主力赴湘应付粤军，红军乘机追杀，却高估了自己力量，被国军蔡廷锴部击败，损失惨重。在中央苏区面临不保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围剿，调军北上应付日军。红军再度追杀，大量歼灭国军，缴枪万余，并成功策反了江西宁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两万多人加入红军，取得反围剿的空前胜利，中央苏区范围空前扩大，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了一片，地盘从五县扩大到二十一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苏区也扩张至数十县。对国民政府而言，中共的苏区恰与日军在北方的压迫形成了南北夹攻的局面。蒋介石痛感有苏区的心腹之患没有办法对日开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中共的三次反围剿胜利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得到共产国际在华情报网提供的准确军事情报。在策划各地武装暴动，扶植建立中共红军的同时，共产国际建立了在华的情报网，帮助中共建立了特科情报系统。1929年，共产国际派德国人左尔格、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华潜伏上海，从事情报活动，同时提供巨额经费，安排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等机要部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共产国际通过安插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间谍钱壮飞获取了国民党政府部署对红军第一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通过左尔格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偷出的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密码及其它机密，将这些国军围剿的机密情报转给了江西苏区。有准确情报，毛泽东才得以取得龙冈伏击战役的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时，钱壮飞在逃离前向共产国际再次报告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共产国际再次将情报转给了中央苏区，再次帮助毛泽东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三次围剿期间，左尔格领导着近百人组成的，分为国际组和中国组的共产国际在华间谍网，还向苏联保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去接受间谍培训。被周恩来介绍给左尔格的共产党员中有后来成为毛泽东亲家的张文秋（张一萍，当时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左尔格作向莫斯科发回了 597 份急电，其中

的 335 份通报给了中共各苏区及红军。1932 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筹划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将所窃取的有关情报通过宋庆龄转达给了中央苏区，使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之前做好了准备。

[1]

由于苏区扩张逼近省府，严重威胁着国民政府的安全，蒋介石不得不在北方热河吃紧的形势下对南方苏区再次围剿。1933 年 2 月初，蒋介石再到南昌布署，自兼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开始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济棠认为蒋介石调粤军离粤去剿共是为夺取广东，采取保存实力的策略，只派余汉谋率六个师在粤赣边界虚张声势，并不真正配合蒋介石的剿共行动。尽管如此，何应钦、蔡廷锴、罗卓英等部仍然取得对红军作战的节节胜利。

2 月 23 日，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国军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三天就逼近了热河省会承德与南部的长城防线。3 月 4 日，没等蒋介石北上，日军轻取了热河省会承德。承德失守后，蒋介石不得不匆匆抽调围剿红军的部队北上保卫平津。红军再次趁国军北上一路追杀，歼灭了北上的罗卓英部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主力，逼近南昌、抚州。蒋介石再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在南北两面不得兼顾的局面下，国民政府军南北两面作战都败，中央红军再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空前胜利，歼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缴枪万余，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四十五县，红军扩大到近三十万人，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在川北，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乘国军北上之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苏区。中共的第四次反围剿也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日军北方入侵，平津吃紧，胜在日俄同时压迫中国政府。

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蒋介石根据协定将擅自开战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首领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到闽后，十九路军与红军

彭德怀部打了几仗后，双方互表停战意愿。十九路军的前当家陈铭枢派前中共党员陈公培携蒋光鼐的亲笔信前往中央苏区，寻求结盟反蒋。同时，陈铭枢与桂系李宗仁、陈济棠等反蒋派联络，推胡汉民出面另立政府，实行粤桂闽大联合，共同倒蒋。李、陈、胡一直都在进行反蒋活动及谋求另立政府，但他们看到认为十九路军未获日本或苏俄的强力支持难以成事，于是采取观望态度，对十九路军的联络不置可否。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得知十九路军结盟反蒋的意向后指示苏区接受结盟请求，共同反蒋。但是，博古的表态并不算数。这时斯大林因希特勒上台而迅速改变中国政策，从扶植中共反蒋转向促中日开战，推蒋领导对日开战。他不再支持国民党内的倒蒋活动，拒绝扶植邓演达在俄推销的“第三党”，对十九路军的倒蒋活动持反对态度。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表态称十九路军闹独立的背后有日本人肢解福建的计划，称十九路军不是真正“反帝”。根据莫斯科的表态，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示中共：“不应当与十九路军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现在与他们谈判会成为陷阱”。共产国际表态后，博古改变立场，指“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来更多的欺骗性”，拒绝接见来到瑞金的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指示军事联络员张云逸说去福建的目的只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

这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十九路军展开谈判，称可以利用十九路军反蒋转移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压力。刚刚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与十九路军展开虚与委蛇的谈判。1933年10月，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中共苏维埃国代表潘汉年（潘健行）在瑞金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中的“反日”是幌子，真正内容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贸易，释放共产党员等等。徐回闽复命后，蔡廷锴对协定没有明确“共同反蒋大计”感到失望，认为中共对十九路军的意图不够了解。蔡不知道，中共

谈判的立场取决于莫斯科，而莫斯科已不再积极反蒋，也不允许中共再签署反蒋协定。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主导的福建省府在福州市南校场（今五一广场）举行了“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以“生产人民党”及“中国第三党”的名义宣布另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是为福建事变（闽变）。十九路军没有想到，他们反蒋和另立政府的旗帜不获响应。全国各界和各地将领一致谴责十九路军趁北方外强压迫搞分裂，国民党内的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邹鲁等反蒋派也通电谴责事变为背叛分裂，招引外寇，煽动赤祸；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接受中央政府的收买，宣布不支持闽变。中共中央背弃与福建方面的协定，发表宣言，斥“福建人民政府”为“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的敌人”。

应付闽变，蒋介石从剿共前线抽调九个师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指挥大军分三路入闽。在中央大军压境和粤、共两方背弃支持承诺的形势下，十九路军内部分化，戴戟、黄强（十九路军总部中将参谋长）、毛维寿（六十一师长）等将领宣布脱离事变，十九路军五个军中的四个倒戈归顺中央，叛军迅速土崩瓦解，被中央军缴械。

平定“福建人民政府”分裂闹剧后，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十九路军的番号，将叛军收编。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事变主谋得日本驻福州领事接应，安排船只假道台湾送到了香港。这让人相信，福建事变与二十年前国民党“二次革命叛乱”一样，具有日本背景。共产国际说对了，日本长期策动福建、西南独立，陈铭枢、李济深、胡汉民、桂系李、白进行反蒋活动时都曾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

第五次围剿

四次围剿苏区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军签署了妥协的《塘沽协定》，暂时缓解了华北和平津的危机，得以腾出手来应付南方苏维埃国的心腹之患。

为再次围剿作准备，国民政府派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与美国订立了 5000 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进口了一批先进武器装备，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了陆军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前国防军司令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 将军为首的德、意、美军将领为军事顾问和教官，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根据国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情况，塞克特为第五次剿围制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战术，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方针。围剿开始前，蒋介石在训练营训话说：“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2] 1933 年 9 月，国民政府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采取塞克特制定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从苏区外围开始筑碉堡，开建公路，步步为营，逐步紧缩包围圈，向苏区中心压迫。在国民党政府军第五次围剿进展中，国民党内反蒋派发动的福建事变使围剿行动被迫停顿。平定福建叛乱后，蒋介石指挥大军完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并步步为营地不断缩小包围圈。

这时的中央苏区掌握最高领导权的博古和李德。顾顺章变节后，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移往江西苏区，派周恩来先到江西中央苏区主持中央局，任命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博古为中共临时最高负责人，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博古的请求，共产国际任命莫斯科伏龙芝军校毕业德国共产党员李德（奥托·布朗，OTTO BRAUN，LI TEH）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年底，李德由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陪同，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了中共最高军事领袖。中共中央在瑞金城郊专为“洋钦差”李德门盖了三居室的独立住宅，安排伍修权为翻译，还为他安排了女人。

1934年1月，从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会与建党以来的历次大会一样，也是以宣读莫斯科各项决定为内容。博古在会上宣布莫斯科决定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为：总书记博古，[3] 政治局成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项英、王明（陈绍禹）、张国涛为常委，康生、任弼时、张国涛、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其中要求“直接革命”，取得反围剿胜利，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批判“富农路线”等等。博古宣布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中有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台尔曼等外国人，宣布成立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等十七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张闻天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十一个人民委员部，宣布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上述会议内容显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名称到内容完全苏俄模式。

为救牛兰送美金来华的李德没有想到自己成了中共领导人，没有想到会来到苏区，更没有想到到苏区后立即挂帅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战事。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不过两个多月时间。而此次围剿，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消耗的新策略。代价高昂的堡垒战术击中了苏区的命门，将苏区对外交通和物资供应线切断，使苏区范围被不断压缩，红军游击战、运动战使红军诱敌深入个个击破战术无从发挥。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将区内和周边稍微有钱的人都打光，将苏区经济搞到崩溃，须靠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抢劫维持生存。堡垒战术使红军无法再到外围抢劫，苏区内粮食和物资供应立即短缺，米价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4] 整个苏区陷入了财政和物资供应的全面危机。博、李搭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成立苏维埃粮食人民部，下令正常粮食征收之外以“借谷”名义向苏区百姓另搜刮 60 万担粮食，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5] 红军缺少重武器，无力攻坚，在国民党军的碉堡连公路组成的严密封锁网中无法机动作战，以往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国军一支的战法更无从施展。李德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下令采取“短促突击”战术。然而，在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术面前，突击的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后处处受制，不仅调动不了对方，自身后路都难保，突击战术也不可行。毛泽东后来批评李德指挥失误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6] 其实，李德未尝不知道与优势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对红军不利。他后来分析当时的困境说：“只要敌人不放弃堡垒战，就不可能诱敌深入到我们区域实施歼灭战。”[7] 确如李德所言，塞克特的经济封锁加步步为营战术是专为对付红军运动战而制定的，这一战术使毛泽东所说的诱敌深入套路根本无从施展。在自己地盘尚且不能打赢的情况下，放弃苏区，跑到外围作战只是毛泽东专为打击博古、李德的随便说法。当时，不经莫斯科批准，博古、李德无权放弃苏区到转移到外线去。中共后来为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将运动战，诱敌深入的战法过分吹嘘。实际上，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并非胜在毛泽东会指挥运动战，而是胜在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提供了准确的国民党军事布署情报，胜在国民党内斗和和日军在北方用兵。

经过对中央苏区外围长达半年的清理、压缩，陈诚、薛岳、汤恩伯等部国民党军主力于 1934 年 4 月向中央苏区腹地的广昌挺进。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县城，距苏维埃国中心瑞金仅百余公里，是防守瑞金的要冲。博古、李德只能在要么弃守广昌、瑞金放弃苏区，要么只能打阵地战防守广昌两策之间选择。他们无权放弃苏区，只得下令坚守广昌，任命彭德怀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总指挥，指挥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筑垒与国民党军展开阵地防御战。至此，塞克特“避免游击战，采取正规战”战术达到了逼红军主力阵地决战的目标。阵地战中，国民党军的装甲车、德国山炮等装备的优势得以发挥，红军无法招架。粟裕后来回忆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

垮。”[8] 经过两个德国人指挥的十八天阵地战，红军伤亡 5000 余人，全线败退，国民党军攻陷广昌，苏维埃国门户洞开，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广昌战役的结果反映出人心向背。苏维埃政权几年来抢劫为生，红军烧杀抢掠，为人民痛恨。中共在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实施的抢粮暴政使民怨更加沸腾。而政府军对苏维埃暴政的围剿得到人民支持，国军士气高昂，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的国民党军中高级军官身先士卒。这一点从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官兵伤亡比例高于部队实际官兵比[9] 的事实得到证明。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10] 李德回忆说，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被俘者”。[11] 相比之下，红军方面士气低落，逃跑严重。几年来，中共的查田运动、强摊公债、扩红运动、肃反运动使苏区成为恐怖绝望的世界，大批苏区民众冒着杀头危险出逃。由于苏区农村青壮年男子全被征用，农村劳动力丧失，土地被弃耕。第五次反围剿时，苏维埃政权再度下达根本无法完成的扩充红军（扩红）指标，逼得基层“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自尽”；[12] “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13] 这样强迫征来的兵一有机会当然溃散。例如，“一军团补充到区 1663 人，到补充师的只有 728 人，路上跑了 935 人。这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14]

广昌失守让人们看出了苏维埃国失败的前景，红军中出现了叛逃潮。例如，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和独立第四团建制向国民党军投降。不光士兵逃跑，红军将领中也出现了投降、叛逃的浪潮。叛逃者中包括中央军委参谋长龚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

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四十多位高级将领。对于红军中出现的叛逃浪潮，中共发出追杀令以警效尤。苏区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的捕杀令。

红军叛将中地位最高的龚楚（时有朱毛龚红军之说）选择脱离红军的心路历程具有代表性。他因对苏区肃反和土地革命的残酷提出质疑而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批斗，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批斗中，红三十四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会后，龚楚质问黄为何无中生有，黄答：“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这事让龚楚更加怀疑共产革命的正义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免于死……。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肃反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我的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

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豫，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暴动及后来的红军革命，暴动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当时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广西来的很多同志被冤枉整肃。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杀害。……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决定脱离中共，离开红军，立刻逃亡。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广昌战役后，龚楚不再犹豫，避开身边政治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员，只身逃离。他留下一份给政治部何主任的声明说：“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 [15]

西逃

广昌失守后，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向莫斯科报上了李德拟定的《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计划》，申请放弃中央苏区西逃。在等待莫斯科批准的同时，三人团作准备上路部署如下：

扩红：发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和《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要求在5至7月的“扩红冲锋季”扩充红军五万人；

筹粮（借谷）、筹款、赶制军需：下达了《关于收集粮食突击的决定》，[16] 要求加大筹粮、筹款力度；强调“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用品的需要，万分迫切”，[17] 发动赶制军械弹药和军需品的运动，强迫民工“冲锋劳动”，加班赶制军需；

屠杀：建立苏区的同时，苏俄指示在各苏区设立了保卫局，将撤离时屠杀不信任者的作法传给了中共。准备西逃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按照苏俄作法，将苏区的中共干部分为三等：一等随中央机关和红军撤走；二等留在苏区坚持游击；三等为怀疑有可能叛变者，交由中央政治保卫局秘密处决。这时负责制定撤离干部名单的中组部长李维汉成了决定高层命运的判官。他拒绝了前中共最高袖瞿秋白的苦求，将瞿划为了二等，注定了瞿不久后被枪毙的命运。博谷、李德本来有意按照项英的建议将毛泽东划为二等，但担心被赞赏毛的斯大林怪罪，不情愿地将毛列为了一等。根据“三人团”的决定，中央保卫局于 1934 年 5 月 23 日发出紧急命令，要求用赤色恐怖办法杀尽所有地主富农，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18] 随后，政治保卫局将被认为“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者押送到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山林深处，让他们自挖墓坑，然后一刀一脚。

收到“三人团”的西逃申请时，斯大林正在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九一八事变后，他最担心的是日军北攻苏联，下令在华南挑起中日开战（淞沪战事），图引爆中日全面战争。在中日美英政府共同努力下，淞沪战事以签定妥协协定的方式结束，斯大林的计划落空。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强烈地感到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两面夹击的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他决定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命令共产国际放弃在各国发动革命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接到了中共放弃中央苏区的申请。他感到中共扩张苏区威胁国民政府都城不再符合苏联的利益，认为红军离开赣、湘，解除对国民政府心腹威胁，有利于推动国民政

府对日本开战。1934年6月25日，他复电批准中共中央撤离苏区，指示红军到西北边境去等待苏联接应。

接到斯大林批准复电，“三人团”立即布署战略转移，决定先西进入湘，与贺龙、萧克所部红二方面军会合，再向四川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靠拢。为免军心大乱和叛逃潮升级，“三人团”将放弃苏区的重大决定高度保密。他们知道，十万大队人马长途转移必须多带粮食，下令将筹粮、“借谷”运动升级，要求“秋收后借谷60万担，收买谷子10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共借谷100万担粮食”。[19]这时的苏区，土豪早已被打光，浮财和存粮食被挖尽，所能搜刮的只剩下了田中的当季谷物。三人团知道，抢这一季新粮必须在两季水稻收获时节，即八、九月间，早了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收获了会转移藏匿，于是要求在9月15日之前完成“借谷”。

8月，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的部署紧锣密鼓：下令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积累埋藏在瑞金附近山里的金银财宝和钞票全部挖出；再发布扩红紧急动员令要求突击扩红；安排数千人将中央机关、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的物资、机器设备打包；下令以最大力度打土豪筹款，“积极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制定筹集现款的计划与实施情况，通过多种方式筹集现金。”[20]在苏区土豪早已被打光，苏维埃政权准备离开苏区的情况下，中央的“借谷”、筹款、“不留任何钱财给敌人”的指令实际是要求“有钱就全部打光”。苏维埃疯狂摊派和借谷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因缴不足“借谷”而自杀的事件大量发生，其中以瑞金、长胜等地为最。也有农民奋起抗争，但农民当然不敌红军，抗争均被镇压。

9月，田中稻谷成熟。月底，苏维埃粮食人民部委员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10月初，国民党军相继攻陷兴国、宁都、石城。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训令》，通知红军全体长途行军。10月10日晚，博古、李德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八万多人大队离开中央苏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

发。红军押着强征来的 5000 多挑夫挑着抢得的 100 多万担“借谷”和中共中央各机关单位整理携带的大批物资，浩浩荡荡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中共政治保卫机关断后，在对怀疑对象大规模屠杀之后，再根据苏联红军在部队转移前杀戮伤病员的传统，[21] 将掉队的红军官兵、情绪低落者、被怀疑可能变节的官兵、伤病员“残酷处置”（处死）。保卫局安排给红军各级长官的警卫等人员是“政治保卫局”特务，负有监视和随时奉命“处置”任务。红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们了解一些警卫员特务的情况，但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可能还有高层在他们身边安排有特务。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清除怀疑对象，保卫局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中展开了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22]

红军西逃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背后深层原因是，红色政权在几年间，将苏区及周边地区的民财搜刮殆尽，在这片区域无法再呆下去了。几年间，红军人数由数百人增加到红军加中共中央机关十万之众，为供养如此庞大的集团，苏维埃政权将苏区及其周边的地主、富农打尽，将农民埋藏的金银，存粮挖尽，通过查田运动将中农也打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必须像游牧部落逐水草迁移一样转移到其它地方了。三十年后，中共宣传部门将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改编成了《十送红军》，将原词“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改为“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那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中共推出《长征组歌》唱道：“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

似海不能忘”，“红军主力上征途， 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 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 亲人何时返故乡。”而真实的情况是，红军临走，中共以“借谷”、“筹粮筹款”的口号抢走农民当期收获的口粮、种子，榨干这片土地的最后油水，带着百万担抢得的新粮和几年间抢劫的大批金条、银元、烟土离开了，留下在收获季节失去了一年的活命粮，来春连种子都没有的苏区农民面对饥荒前景。红区农民的灾难还不止是失去钱粮。在中共连年的“土地革命”中，农民被迫参与了斗地主、分浮财、杀地主，手上或多或少沾有地主、富农的血。红军走后，百万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红军家属（红属）要面对被害者家属们组织“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苏区人民的仇恨在红军逃亡时爆发，村民追杀红军的掉队者。

苏俄在华建立苏维埃国的祸害之大可由苏区人口变化得到反映。仅仅几年的时间，红色政权就使江西人口从 2000 多万锐减到减至 1400 万。陈诚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历代都有匪患，其为祸之烈，虽在妇孺亦耳熟能详的，在唐为黄巢，在明为闯献，都曾创造过空前未有的记录。然以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相较，可就都望尘莫及了。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中国乃至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闯献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闯献，其手段之惨毒，也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 MR.SIMON EBERHARD 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人，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后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

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恻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23]

红军没有都走，留下的部分如游牧民逐水草迁移一样，转移到周边有油水的地方“坚持打游击”，继续祸害相邻地区。革命宣传中的“烈士方志敏”故事是了解“坚持打游击”的代表案例。1925年，方志敏在弋阳领导农民运动，拒绝祖母和父亲的求情，将反对农运的地主五叔方雨田杀害。1930年7月，方志敏率红十军攻陷富庶的瓷都景德镇，抢劫大量财宝，除了留下赣东北苏

区自用的钱财外，解往中央苏区赤金 2 箱，白银 48 箱。此次行动中，方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勒索到大笔赎金，杀害了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抢了邓的家产。1931 年，方获共产国际任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等职。1932 年，方率红军两次劫掠廿八都古镇，再将两、三百地主、商人及其家属绑架到江西作“肉票”，收钱后将很多人质撕票，将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祸害得一片萧条，再无恢复。《衢州文史资料》记载“过红军”浩劫写道：“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联合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杨益丰、隆兴源南货店和杨元亨、金同顺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号店堂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保长谢盛仔带人挑着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只赎回部分人，其余人被撕了票。”[24] 中央红军离赣后，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流窜到皖南，其中的红十九师占领了旌德县，施故伎，再绑架了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夫妇及他们几个月大的婴儿海伦作“肉票”，逼迫师达能写信到上海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总部，向教会勒索巨额赎金二万元。师达能在英文信中讲述了被抓捕和敲诈的过程，并引用圣经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方部红军勒索不成，将师达能夫妇砍头，将冒死为史达能夫妇求情的中国基督徒张师圣一起杀害，将婴儿海伦抛弃。惨剧消息传出，中外震惊。方部逃离后，安徽省省主席刘镇华下令厚殓殉道者师达能夫妇，以军车护送他们的灵柩到芜湖。1935 年 1 月 2 日，基督教内地会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国民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国家领事馆代表，各界中外人士，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前往参加。在芜湖外国人墓园中师、史夫妇墓碑上刻着十字架，以及圣经“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等句。教会尊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为中国内地会献身于中国的第七十三和第七十四位殉道士，在上海新闻路内

地会总部礼堂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25]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动海内外，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遗孤爱伦，有不少家庭愿意认养她。一位青岛教徒致信师、史亲属表达了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道：“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以衷心崇高的敬意。”[26]

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调兵于 1935 年 1 月击败方部红军，逮捕了方志敏。国民政府试图让方悔过自新。方拒绝放弃共产信仰，在狱中写下不少文章，在其中记录了政府为劝他改变信仰特将他从囚室普通号搬到优待号。劝方弃恶从善未果，国民政府在半年后以谋杀达能夫妇罪名判处方死刑。建国后，中共将方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选为小学课，隐瞒方打家劫舍、滥杀无辜的罪恶，宣传方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等等拒绝忏悔的诗句，让无数懵懂少年憧憬追随方烈士，是为革命宣传之可怕的一个例证。方在文章题目中用了爱字。作为被共产宣传洗了脑的革命者，他只知党性，泯灭人性，拒绝为杀人放火忏悔，坚持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生命，没有资格谈爱。

放行

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陈接受蒋介石每月增加 20 万元军费，另一次性发给开拨费 80 万元，机关枪 100 挺、重机枪 50 挺、迫击炮 40 门、弹药 1000 多箱等优厚条件，通电就任南路军总司令。在派兵入赣参加围剿的同时，他指示部下“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拖延入赣。与新疆的盛世才一样，在赴苏考察期间接受了苏共的策反，与苏联达成了代理帮助中共的协议，在主粤后替苏俄庇护

设在广东的军火库，代向中共转交军火、物资，秘密收购苏区出产的钨矿砂，替斯大林转军饷给红军。在政府军步步进逼中央苏区的形势下，中共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密谋达成了停战、互通情报、红军借道过粤等项协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南下，借道广东赴湘。中共携带的家当中包括，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笨重的修枪炮、印钞票、印书法文件的机器设备，军需物资和弹药，医院的X光机等等。“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大搬家’的红军是一支奇怪的队伍。”[28] 由于携带的物资太多，每个军团都成立了后勤部，押着上千副辘重担子。由于离开时仓促，中共中央装档案文件的担子被挑错，中共早期档案被留在了苏区，不久后在国民党军清剿威胁下，由项英下令烧毁。因此，莫斯科保存的中共从建党到1934年各种会议记录，报告，名册等档案成了完整准确的孤本，其中部分如今已解密。

中共强拉挑夫时只说挑到广东即付银元。入粤后，挑夫们要求发钱回家。中共背弃承诺，拒发银元，要求挑夫继续前行。五千挑夫或罢挑，或四散逃走。红军只好让红八军团的新兵当挑夫。结果，本来五千挑夫挑的东西要近万新兵来挑，红军大队首尾几十里地，防御上也不堪一击，若非有陈济棠明拦暗放根本不可能入湘。入粤后，红军先到南岭苏俄军火物资库补充物资，然后过粤赴湘。其实，蒋介石通过眼线完全了解陈济棠暗助红军过粤的情况，只是佯装不知。苏联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不光陈济棠、盛世才在与苏联作交易，蒋介石也在作交易。他要借陈之手放红军入湘，一为解除红军对政府都城的心腹威胁；二要利用西行红军牵制随时可能举兵叛乱的桂、粤、闽地方派系；三要以追剿红军的借口让中央军势力进入西南，打破西南数省的割据状态；四要留着弱小的红军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赎回被扣为人质的儿子，并争取再获苏援。

11月，挑着笨重设备、物资的中央红军大队到了湘江边。这时，蒋介石完全可以指挥大军在湘江边消灭丧失战斗力的红军，但他虚张声势，放中央红军过湘江。主湘的何键与陈济棠同样考虑，不想与红军作战损失自己的实力，只想赶快离湘，待红军渡过湘江后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虚张声势追击一番。虽然蒋介石、何键有意放行，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是减员六成多，八万多大军只剩下三万多。红军严重减员不是因为血战，而是因为逃亡。“扩红”中强抓来的红军，强征来的挑夫一路都在寻找机会逃亡，在大军趁夜渡江时有了机会，当然四散逃跑。后来，国、共两党联手隐瞒了红军被放行过湘的情况。在国民党方面，湘江守将何键和薛岳编造了“湘江战役”故事交差，蒋介石心知肚明，在红军渡过湘江后不但不追究防守之责，反而下令嘉奖何、薛的战役之功，以向国民党内各路反蒋派隐瞒放红军西进的真相。中共方面则需要隐瞒逃亡潮和国民党放行真相，于是更是妙笔生花，编造出了“惨烈湘江战役”故事。

放红军过湘江后，何键电令贵州省主席毛光翔阻击红军于锦屏、黎平一线。在与王家烈大战中损失了黔军嫡系老本的毛光翔一来指挥不动手下的杂牌军，二来也像陈济棠、何键一样想保存实力，只想让红军离开，同样虚张声势。为借剿共扫除西南割据，也为留着红军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蒋介石不仅放红军过湘江，更一路放红军到西北。如此，红军长征不过是在蒋介石及各地军阀明堵暗放佯追中的一路西行，并未发生重大战斗。稍有军事常识者都清楚，若真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挑着数千担子，有众多中央机关老弱病残拖累的十里长队断难顺利走到西北。中央机关队伍中的毛夫人贺子珍在长征路上两次生产（其中一次流产）而未掉队就是红军长征一路安然前行的一个证明。

遵义会议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掌最高权力后，张闻天、王稼祥对学弟博古当上司心怀嫉妒。宁都会议被免职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军权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

后感到来了机会，开始怂恿张、王倒博。高层中最恶毛的项英了解到毛的宗派活动，向博古提出警告说毛泽东会伺机夺取军事指挥权。[28] 得项英警告，博古拟将毛泽东留在江西让项收拾，但又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最后还是决定带毛一起上路。

渡湘江时，中共中央电台故障，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络中断。博古、李德的权威来自莫斯科的任命。一时失去莫斯科的遥控，书生博古和长征红军中唯一老外李德顿时弱势。众高层越来越大胆地向他们发泄不满。博古承受不住指责和暗藏杀机的威胁而一度企图自杀。毛泽东感到时机成熟，开始实施夺权计划，在行军的担架上拉拢王、张联手倒博。西逃路上，中共高层们躺在担架上行军，[29] 无疑是以众多士兵生命为代价。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到，抬担架的士兵骨瘦如柴，一批批地倒毙于道旁，以至于士兵的人数与这些中央直属队的人数日趋接近。躺在担架上长征的事实是了解革命和革命家内心世界的钥匙。因此革命家们都会尽力掩盖这段史实。

一路上，毛泽东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应开会追究失败责任的说词逐个向王稼祥、张闻天、陈云争取支持。得到王、张、陈的支持表态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国民党军力薄弱的贵州西进。周恩来善执行而缺乏决断魄力。从在法国被共产国际选中培养后，他一直唯莫斯科的指示是从，从未自主决策。在三人团中，他完全听命于博古、李德。与莫斯科失去电讯联系后，周恩来与博古一样感到了长征路上兵变的威胁。他虽然不善决断，但长于趋利避害，在判断力量对比后选择了倒向毛、王、张、陈代表的多数派，答应了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行止的动议。穿过老山界后，中共中央于 12 月 12 日在湘黔边界的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去向。博、李无力否决毛泽东通过“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提出意见，一时处于弱势。挑战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成功后，毛泽东乘胜继续扩大战果，一路上逐个私下说服动议再开政治局会议“追究错误路线责任”，周恩来抛弃博、李，按毛的意思向

博古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博无力否决周恩来支持的动议，只好同意再开政治局会议。18日，中共中央在湘黔边界的黎平再召开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会上，张闻天、王稼祥按照毛泽东的主意向博古、李德发难，指责他们的军事领导是错误路线，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求追究责任。按照事先约定，陈云、毛泽东、周恩来表态支持张、王，形成了足以挑战博古、李德最高领导权的多数，主导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作出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黎平会议后，红军进向贵州。蒋介石命令争斗中的毛光翔、王家烈联手剿共，尽管他知道内战中的毛、王不可能去剿共。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猴场再召开中央局政治会议（猴场会议）。由于“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在黎平会议上已经说了不算，会议由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会上，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原计划。在多数派主导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拟出的意见：第一，今后的重大军事行动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第二，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北渡乌江到遵义一带建立黔北根据地。会后，红军渡过乌江占领了遵义。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成功瓦解了“三人团”，以“集体讨论决定”策略剥夺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随后，毛泽东向最高领导权发起了冲击，向周恩来建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领导权问题。周恩来知道，自己和博、李一样，权力地位来自莫斯科的任命，在莫斯科的影响力暂时丧失时，博、李弱势，自己也一样，出头对抗多数派，对抗杀万人不当回事的毛泽东意味凶险，于是接受毛的提议，再向博古、李德提议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李已丧失了独裁大权，只能同意。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其中为军事失败作辩护，强调力量对比悬殊。随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左倾错误。张从未涉足军事，只是在陈述毛泽东的意见。张报告后，毛泽东、王稼祥向博古、李德发难，并按照密谋行事，注意不指责“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拉周倒博。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毛、张的指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发言，反对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博、李身上。周恩来仍保持惯常作风，作和事佬，要求心平气和。一时，两派意见形成僵局，会议无法作出决议。毛泽东在暂时休会时在会下游说周恩来出面提出将会议扩大，让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在博、李与毛泽东为首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僵局中，周恩来的意见具有决定作用。博、李知道将一批非政治局委员扩大进会议意味着颠覆政治局，但长征半路没有莫斯科撑腰，无力否决周的扩大提议。

第二天，政治局会议被扩大，毛泽东提议的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非成员参加了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先作了一番自我检讨，称自己军事指挥执行者对失败负有责任，请求中央撤他职，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从长征前开始，周恩来一直抱病，一切决策均出自博古、李德。此时，作为“三人团”一员的周恩来的自我检讨及承认军事失败之责实际是要求博、李对军事失败承担责任。周的讲话宣布了“三人团”解体和博古、李德最高领导权的作废。随后，毛泽东率张、王、陈及扩大进会议的军团领导人要求追究失败责任，博、李不敢否决多数意见，支持博古的凯丰等人也不敢再挺博、李，会议在毛泽东实际主导下作出决定：撤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最高领导机构，由张闻天代理总书记，报莫斯科批准；[30] 由周恩来、朱德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协助周恩来；张闻天执笔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其中给博古、李德戴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

遵义会议决议中对博古、李德的指责谈不上什么道理。早在 1933 年春，共产国际就电报指示中共中央采取运动战的军事方针。[31] 蒋介石开始第

五次围剿后，共产国际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说：“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32] 执行该指示，博古、李德要求复制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中通过运动战，诱敌深入然后打歼灭战的制胜套路。然而，国民党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绝不孤军深入的策略正是针对前四次围剿中红军的套路制定，令红军的运动战术无法实施。李德退而求其次实施“短促突击”，国民党军坚持配合碉堡稳扎稳打的赛克特战术，“短促突击”也无法实施。在国民党军推进到苏区门户广昌时，博古、李德只得下令阵地防御。李德后在回忆录中指出：“我们大家完全清楚，阵地战对我们不合适”，“广昌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是通向苏区中心的必经之路，党的领导人无法承担不战而弃的政治责任，因此将它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33] 在政府军吸取前几次围剿中教训，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且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的败退是必然的，换了毛泽东指挥结果也一样。毛的博、李要求打正规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丢失，犯了“左倾错误”等指责只是一种有效的夺权手段。李德晚年在回忆录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一路上搞宗派活动的结果。事实确实如此。项英关于毛泽东伺机夺取军权的警告说对了。从离开瑞金开始，毛泽东一路精心策划，分步实施，看准了与莫斯科联系中断的时机，利用张闻天、王稼祥对年轻同学博古的嫉妒获得了最初的支持，然后再拉陈云，再拉周恩来，通过几次会议剥夺博古、李德的领导权，推举无意掌握最高权力的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以张的“国际派”背景来争取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结果的认可，推举缺乏军事决断能力，又抱病无力指挥的周恩来主持军事，自己作周副手掌握军权。会议的结果显示出毛泽东的眼光。他不在乎头衔，只在乎军权，相信只要军权在手，夺取党权将不成问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商量接管最高领导权事宜，让周恩来出面找博古交接。博古对苏区和红军在他领导下遭到重大损失感到痛心，而对失去最高权力却很淡定。因为，他本无个人野心，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也非他本意。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王明赴莫斯科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在上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定由博古总负责，并报请莫斯科批准博担任总书记。二十四岁的博古对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甚感突然，再三推辞，强调自己年轻，不懂军事，不熟悉国情，连中央委员都不曾担。但莫斯科批准了远东局的任命，博古只好从命。来到中央苏区，他立即领导了第五次反围剿，经历了接连失败。与莫斯科电讯中断后，博古意识到随时可能兵变，提心吊胆。因此，当周恩来在遵义找他交权时，博古如释重负，坦然将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印章和中央书记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立即命人把文件担子挑送代理总书记张闻天处。

博古交权后，毛泽东立即走出了关键一步棋——派人去莫斯科汇报，取得斯大林对会议结果的认可。这时，博古的坦荡帮助了毛泽东。王明赴莫斯科前与博古约定，万一电讯联系中断只认潘汉年为双方联络员，别人一概不认。这一约定只有博古知道。毛泽东提出找人赴莫斯科汇报时，没有私心权谋考虑的博古向毛说明，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会议决定的权力交接是不算数的。博古找来潘汉年，向潘交待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与结果。这时，博古若不提潘汉年，毛泽东寻求莫斯科认可的努力就通不过王明这一关。毛泽东对博古指定潘汉年为赴苏代表充满疑虑，要求派陈云同去以作耳目。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要求。于是，潘汉年、陈云中途离开红军大队，分别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到了上海，经宋庆龄安排去了莫斯科。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作为中央红军最高指挥机构。这时，病中的周恩来与全无指挥经验的王稼祥只是毛泽东掌权独断的陪衬，毛泽东正式夺回了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的军权。从此，他紧抓军权再也不放，直到去世。遵义会议的策划中，毛泽东运用了两大制胜招数：其一是在休会时进行会下活动，单独谈话，个个击破，取得关键的支持，然后

在复会时达到目的；其二是将会议变为“扩大会议”，将支持者“扩大”进来，绕过规定程序，绕过代表资格，表决权的限制，不按规定人数表决，使自己原本通不过的议案非程序地成为政治局决议。这两大招数所体现的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此后当权的四十多年中，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反复应用这两招，逢政治局会议一定扩大，将非政治局委员的亲信扩大进来，在两派意见相持时休会，在会下施展非会议密谋手段，虽非堂堂正正，但在权力斗争非常有效。凭这样的招数，加上军权紧握，毛泽东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胜出。

建国后，中共在神化毛泽东的热潮中将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说成是确立毛泽东为全党最高领袖，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中共最重要的会议。影响了一代人的《长征组歌》将“遵义会议放光辉”作为的组歌的核心段落，在其中唱：“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王明在回忆录中对遵义会议结果作不同评论说：“毛泽东篡改、伪造党史，他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成功。”在红军的官兵记忆中，占领遵义与占领其它城市一样，只是兴高采烈地享用当地物产，并无欢庆遵义会议的记载。

云贵转圈

在 1934 年底的猴场会议上，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北渡乌江到遵义一带建立黔北根据地。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认为贵州人烟稀少，红军难以生存，会议决定到四川建立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北进，于 1935 年 1 月 24 日轻取了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入川要冲——土城。进城后，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畅饮茅台酒。26 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在附近的复兴场与万余川军开战遭到惨败，损失了两千多人。随后，毛泽东以土城败仗和川军强大为由，向中央提议改变入川计划。这时，博古、李德已无权，张闻天、周恩来不作决断，政治局接受了毛的提议。随后，毛泽东指挥三万大军二渡赤水退回遵义，再三渡赤水至川南，再四渡赤水返贵州，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宣传部门吹嘘为“毛泽东用兵如

神”的“四渡赤水”。转圈时间长了，高层们开始质疑毛泽东坚持不入川的理由。毛泽东以辞职要挟，企图压制质疑声音，不料，张闻天当真以最高领袖身份主持会议批准了辞呈。在毛下不了台的困境中，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让毛泽东检讨一番收回辞呈。由于周恩来主导会议作出迁就毛的决定，大军继续黔转圈。

“四渡赤水”其实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在黔北兜了四个月的圈子，用意是回避入川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遵义会议决定北上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无疑最有利于中共和红军。但毛泽东有如下的权力斗争考虑：中央红军只有两万多的残兵败将，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兵更加强盛；虽然他通过遵义会议实际掌握了中央红军指挥权，但名义上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并未成为正式的中央红军统帅，更非党的领袖，而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是中共高层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在党内、军中资历在自己之上，会师后，不管凭资历还是凭兵力，张国焘都可能成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中央红军完全可能被红四方面军收编；张国焘不像周恩来那样在军事上和权力竞争中缺乏自信，而是与自己一样杀人立威，紧抓军权的人。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极力避免入川与张会合。但是，他不能将自己的考虑摆上台面，又想不出不入川有什么更好的去处，于是带着红军在贵州转圈，期望在拖延中碰到好的去处或机会。

然而，在转了几个月圈子后，越来越多的将领提出质疑，毛泽东无法向众将解释为何要如此转圈。他清楚，高层们已经普遍不满，再这样转下去他的指挥权可能会被多数意见剥夺，于是决定离开贵州。离开贵州何去又是个难题，往东是退回，往西是天险绝路，往南出国也是绝路，唯一的出路是北上入川。毛泽东决策不从大军的处境出发，而从保住自己军权出发考虑。为避入川，他决定到云南去碰运气，希望在拖延中得到张国焘被蒋介石消灭的消息，或是找到类似井冈山的地方再建一块割据。1935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经会泽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在云南转了半个月后，高层们都看出，入云南比在贵州转圈更加荒唐，军事将领们对转圈子忍无可忍，林

彪，彭德怀以及李德公开质疑毛泽东为什么由黔入川的好路、近路不走，却指挥大军跑到云南转更大的圈子，更有人表示怀疑毛泽东率军转圈的用心。毛泽东感到再一意孤行引发兵变的威胁，不敢继续犯众怒，只好结束转圈，于5月中率军由会理北进入川，穿过了凉山彝族地区，硬着头皮去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西逃以来，蒋介石借追击红军打破西南各省长期的割据局面，收获巨大。随着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命薛岳率中央军进入贵阳，将黔军改编成中央军五个师，分驻各地，将贵州军阀王家烈和毛光翔免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任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扫除了清末以来的贵州割据状态。红军进入广西时，中央军尾随而至。有福建事变被平定的前车之鉴，桂系不敢再对抗中央，被迫执行中央的编遣决定，自我裁军。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贵州、云南转圈时，蒋介石期望红军北上入川，好复制贵州举措，收拾四川的割据。因此，红军从云南北上入川时一路顺畅，没有战斗。

会师与分裂

1932年秋，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离开了被“打土豪”和肃反祸害到无法立足的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趁四川“二刘”开战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于年底翻过秦岭，进入川北，建立了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入川时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34] 入川后，中共在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搜刮十万大军和机关的庞大军需供给，很快将区内民财搜刮殆尽。红军战士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筹粮写道：“一打、二征、三借、四买。打，就是打地主、土豪，没收他们的粮食，这是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征，就是征收义务粮。基本上按照《公粮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广大劳苦群众由于翻了身，对党和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因而纷纷献交公粮，不少人除交够公粮外，还把自己的口粮也献交出来，宁愿自己吃野菜、喝稀粥，这种情

景着实感人。借，就是打借条向富有的人家借粮。买，就是用银元和苏区的票子向群众买粮。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仍不能满足前方部队的需要。当时，从北川每天要派几千人回中坝来运粮食。怎么办？好在这时正值麦熟季节，我们便采取了‘割借’的办法。所谓‘割借’，就是对富农、地主的麦子，我们组织人到地里去直接收割。参加割麦的人划片包干，规定任务，连割带打、晒，由苏维埃政府派人去收秤，然后打个借条，盖上大印，确定今后成立政府时再偿还。用这种办法搞粮食来得快。我们割了地主、富农的麦子，老百姓高兴得很……当时，江油和彰明两县人口将近 30 万，平均每人大约献出了 30 斤口粮。在这里，我们前后共筹集了 900 多万斤粮食。”[35]

搜刮之外，中共在川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将鄂豫皖苏区的打土豪暴行复制四川。中共的口号是“赤化全川”[36] 和“消灭发财人”，[37] “只要当过保长的都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将中农也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常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38] “红军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烽火频惊，富户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川北百万难民跑红（逃避赤祸）逃往成都重庆。”[39] 1933 年 11 月，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红军退走后的川北地区调查，将见闻发表于《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其中的《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一文写道：“通南巴三县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廩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

宣传员，后以知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埡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40]“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南江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

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在宣汉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在绥定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达 111 万之巨。”[41]“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42] 经过红四方面军短短两年的祸害，川北流失劳动力 60%，田地荒芜 70%，只剩下贫农，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一样，很快榨干了苏区的民财油水，到了必须转移的时候了。

1935 年 1 月，红四方面军修好了一部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后新中央的电报，获悉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和已经离开瑞金根据地，即将入川。张国焘清楚，红四方面军无法单独对抗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联合进攻，在川陕抢劫收入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根据地难以为继。于是他决定，去与中央红军汇合。3 月底，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从苍溪渡嘉陵江西进。与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一样，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也展开了屠

杀，保卫局奉命将关押的数千地主、富农和受到怀疑同志杀害。第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奉命实施坚壁清野，烧毁民房。老百姓嚎哭连天，跪求红军不要放火。被强征入伍的巴山子弟新兵不忍动手，但军令如山，只好放火，将千佛岩到威州一百七十余里内的民房全都烧光，留下一片废墟和红云崖上的巨幅“赤化全川”石刻和无数“拥护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等红军石刻、标语。

5月，张国焘在绥靖城（今阿坝州金川县城）宣布成立自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当月底，他接到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的电报，于是将红四方面军总部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派余天云、李先念率红三十军西进迎接中央红军。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先锋部队在懋功（今小金县）会师。6月14日，两军高层见面。四方面军在关帝庙里举行了欢迎大会，以大碗鸡肉、猪肉、牦牛肉、熊猫肉和土酿青稞酒款待中共中央领导层，并向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盐巴、炊具等物资装备，还调拨几千人给中央红军补充兵员。短暂欢聚之后，双方的紧张关系显现。为避免磨擦，两军相隔几十里安营。

6月26至28日，两路红军高层在懋功两河口镇（小金县城北70公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河口会议）。中央红军方面在政治局中占有多数，主导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拟定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其要点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进，经甘北宁夏北进向外蒙古去获取苏联援助；一、四两方面军统归中央军委指挥，任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这时的中央红军是一万多衣衫褴褛的残兵，而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是八万强兵。张国焘对中央红军挟政治局多数优势指挥四方面军的安排不满，但下不了对中央红军用强的决心，在会后不情愿地率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共同北进。张的手下对追随中央红军残兵败将的安排不满，两军会师之初的亲密关系不再，发生发生互相谩骂，四方面军的官兵称一方面军是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称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四川跑出来的土匪”，接着是互相抢粮、抢枪、打人，甚至发生了武装对峙的摩擦。

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了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杂谷脑会议）。会上，他指责毛泽东的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指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不将四方面军当作自己人，意在控制我四方面军”，“他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只剩下万把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军事路线的错误就能够解释的吗？造成中央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将领们一致认为，现在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向中央红军提供给养，岂有被一方面军收编之理，一致反对一方面军挟中共中央以上级自居指挥四方面军。更有将领提出应当果断收编中央红军。7月18日，陈昌浩代表四方面军将领致电朱德，提出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给予军委独断决行之权；[43] 追随张国焘的中共川康省委也致电中央要求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收到红四方面军和川康省委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于7月21日至22日在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举行了有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芦花会议）。毛泽东利用一方面军在政治局中的多数优势主导着会议，对红四方面军关于分享领导权的要求作出一定妥协，免去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主导会议通过了他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和一、四两方面军混合整编的方案。混编方案内容为：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任总政治部正副主任，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成立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分别任总指挥、政委、参谋长的前敌指挥部，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多年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披露毛泽东的权谋说：“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

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44] 毛泽东安排张国焘取代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安排病中的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可谓一石数鸟的权谋：在军权方面向张国焘作一定妥协，将红四方面军分拆，剥夺了张国焘部分指挥权，还降低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为自己摆脱周恩来助手地位作好了准备。

红军北进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命红四方面军停止前进，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增加红四方面军九人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人），要求中央红军全面检讨错误，实际迫中央交出红军最高指挥权。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不顾张国焘、陈昌浩的反对意见，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中央军委对两路红军的领导权，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否决了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和张国焘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要求，只同意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同时通过了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和《夏洮战役计划》。前者体现毛泽东的权谋，要点是分拆红四方面军，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经阿坝北上，利用朱德的声望牵制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将领难以轻举妄动；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机构随右路军行动；后者要点是北上靠近苏联去接受军火。张国焘、陈昌浩未敢在会上拒绝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制定的会议决议和计划，实际是接受了红四方面军被分拆。会后，红军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分成左右两路分头北进，经甘肃的夏河、洮河去“接通苏联”。

北进中，中央机构和右路军经班佑穿过大草地北上的路极为险恶，而张国焘所率左路军的北上路线是一条坦途。毛泽东意识到这样走的话张国焘将率先进入苏联控制区，获得苏联的接应，可能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共新领袖，

于是说服张闻天同意，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再召开没有张国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沙窝会议决定的左右两路北上的计划，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张国焘率军跟随中央机构走。会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命张国焘率左路大军向右路军靠拢。

张国焘拒绝接受红一方面军控制政治局推翻原定路线的决定，召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决定“审查中央路线”。这时，毛泽东安排朱德任左路军总指挥的权谋奏效。在张国焘要“审查中央”时，声望崇高的朱德表态拥护中央，使四方面军将领陷入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对一方面军用强的一致意见。在四方面军众将分歧、犹豫中，张国焘无法作出对中央用强断然决定，只得服从毛泽东的电令，率左路大军向右路军靠拢，跟在右路军后面走。

进入草地后，左路军陷入困境，野菜、灌木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烧光，大军没柴烤火，士兵患上脚病，行走困难，部队越走越慢。张国焘意识到跟在中央红军后面走草地是在走入绝境，于9月初作出决断，命左路军停止北上，掉头南下过冬，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陈昌浩与徐向前所部右路军也停止前进再定行止，并再次致电中央，提出南下川康天全、芦山、道孚、丹巴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复电否决了张的计划，坚持要求张国焘率左路军跟随北上。9月8日、9日，张国焘两电陈、徐，命二人率所部南下与左路军会合。陈、徐决定奉张国焘之命，停止北上。毛泽东见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服从张国焘的命令，感到处境危险。

9月9日夜，毛泽东率中央机构和中央红军残部（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脱离右路军不辞而别，单独北上向甘肃急进。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向陈、徐报告：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知去向，只发现被抛弃的数百伤兵。陈、徐致电红一方面军不见回复，四方面军众将领们认为红一方面军是叛逃，请求追击。陈、徐否决了追击请求，遵张国焘电令，率三万多右路红军掉头南下，再走入大草地。当天，张国焘召开红军将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红一方面军出走。会上，四方面军将领对毛泽东率军不辞而别群情

激忿，原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的将领们也一致谴责毛泽东和中央的行为是制造分裂。会议决定，推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人组成新的临时中共中央，是为中共党史所称的另立中央事件。

乘夜逃跑后，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会合，然后北进。由于蒋介石放行，红军除在川甘边界的腊子口遭遇冷枪袭击外，一路通畅。9月12日，毛泽东在甘南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俄界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北进苏联去获得支援。会后，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并以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9月27日，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到达了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在那里，中共中央见到了久违的报纸，意外地获悉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高岗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合，占领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五县，于是召开了高层会议（榜罗镇会议），决定改去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

陕北红军也是共产国际所创建。1925年，苏俄扶植冯玉祥，前提条件是派共产党人编整、控制国民军。国民军占领西安后，苏俄在西安、包头、银川、兰州等城市开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等十多所军事学校，培养了8000多听命于苏俄的军官。“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发动了清涧等暴动，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将游击支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随后再将同盟军改编成红二十六军，组织成立了习仲勋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在红二十六军之外再建立了红二十七军。

榜罗镇会议后，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与徐海东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合。急需陕北红军支持的毛泽东了解到陕北根据地仍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肃反，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为代表，奔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保卫局，下令停止肃反，释

放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一大批中共陕甘领导人和红军将领。随后，中共中央落脚陕北。

斯大林选定毛泽东

1935年9月，潘汉年、陈云到了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王明见到潘，知道博古本人认可了会议结果，认为由国际派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可以接受，将遵义会议的结果报斯大林批准。斯大林敏锐看出，长征半路上挑战莫斯科权威的政变非张闻天、周恩来所为，背后主谋应是敢于自作主张的毛泽东，目前中央红军真正的领袖不是张闻天或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派潘汉年来汇报应是毛的安排，毛是在寻求对遵义会议结果的认可。

建立中共以来，斯大林一直在提拔毛泽东。共产国际大员马林不喜欢具有独立政党意识的陈独秀、张国焘，欣赏不讲教条，支持钻入国民党内夺权的毛泽东，斯大林同意马林的汇报，对毛泽东有了最初好感。北伐战争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积极推动暴力农民运动，为杀地主叫好的表现非常满意。国民党清共后，毛泽东独断敢行，率军脱离必败的暴动，上井冈山落草，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为斯大林有了个反击托洛茨基对中国政策指责有了个证据。于是，斯大林在中共六大上指定缺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毛泽东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频繁出现。中东路战争后，斯大林指示中共开展肃反，毛泽东率先大规模屠杀异己。斯大林赞同杀人立威，驳回苏区领导人对肃反屠杀的投诉后，拍板支持毛泽东，任毛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据投诉对毛泽东肃反中滥杀无辜展开批判，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斯大林感到毛泽东仍然有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前将毛泽东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指示在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和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毛泽东文集。长征前，项英多次向博古警告毛泽东正在进行私下活动，目的应是伺机夺取军权。博古知道斯大林欣赏毛，没敢将毛留下来让项英收拾，不情愿地带毛长征，结果项英的警告应验，毛泽

东在长上发动政变夺了权。斯大林知道，而张国焘率领着一支更强大的红军，张与毛的两支红军呈一山二虎之势，有必要在毛、张之间确定谁为中共领袖。对于张国焘，斯大林早有不满。斯大林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喜欢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在建立中共时，斯大林与马林一样，对张国焘、陈独秀表现出来的独立政党意识极为反感。因此，他要求从工农中选拔共产党领袖，指示由工人出身的党员主导中共六届新中央，将张国焘排除出了中共领导层，并将张留难在苏联反省了两年多。虽然张在苏联一再表态驯服，但斯大林对张没有打消疑虑。此时，在毛、张之间，斯大林选择了毛泽东，批准了遵义会议的结果。

王明并不清楚斯大林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所作的选择，还以为斯大林选定“国际派”张闻天为中共最高领导权。可以想象，王明若早知夺博古权的是毛泽东就不会那么痛快地将遵义会议的结果上报斯大林了。不过，王明怎样向斯大林进言不具决定意义。无论王明怎样报告，斯大林都会选定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残酷无情的毛泽东。理由很简单，斯大林自己因此而胜出，他也会为中共作出这样的选择。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即赴陕北，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及对遵义会议结果的认可。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与毛泽东一样清楚，谁能取得最高党权、军权胜出取决于斯大林的认可。张国焘自信以中共创始人资历及红四方面军实力，获得莫斯科的认可不成问题。但是，他漏了一招，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及早派代表赴莫斯科寻求认可。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张闻天，通知新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已经成立，要求原中央改称北方局，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不知道，林育英已经带着斯大林批准遵义会议结果快到陕北了。

12 月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听取了林育英传达莫斯科对张闻天、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认可，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12 月 22 日，林育英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国焘，表示赞同张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45] 张国焘复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46] 1936 年 1 月 16 日，林育英二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47] 张国焘复电质疑：“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48] 林育英三电张国焘、朱德：“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宣布“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林育英代表莫斯科的来电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极大地打击了张国焘的权威。张国焘决定一搏，对林育英和中共政治局的电报置之不理，率军南下，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红四军、红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南下与他会合。

中央红军入川时，川军没有死战，只想驱赶红军离川。如今，红四方面军返回四川想再建红色根据地，川军决心死战保卫家乡，川人深怕红军再来祸害，积极支援川军作战，众志成城。重新入川的红四方面军经过北上、南下，两次走草地折腾疲弱不堪，严重减员，士气低落，被川军大败，人马损失过半，余部在川流窜几个月无法立足。建立根据地割据一方的计划破灭，张国焘只好承认没有苏联支持的红军没有前途，于 1936 年 6 月致电林育英

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取消另立的中共中央，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国民党军围剿之下于 1934 年 11 月由湖南桑植北上。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赶紧下令将红二六军团升格为红二方面军，使之与张的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不受张国焘节制，并强调莫斯科已经认可他主导的中央，要求贺、任听命中央。

长征结束

1936 年 7 月，红四、二两方面军会师甘孜，然后继续北上陕北。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长征结束。在毛泽东、张国焘分而再合的尴尬中，林育英出面作和事佬，保安赶到宁夏同心县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迎接张国焘、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陪同张国焘体面地到达保安。至此，中共和红军取消了分裂，重新团结在了共产国际的旗下。几年后，林育英在延安病故，毛泽东亲为林执紼并题写墓碑，以感谢林在关键时刻来到陕北传达裁决，代表莫斯科匡扶之恩。

经莫斯科裁决认可毛泽东、张闻天的中央，张国焘号召力衰落，他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强兵在三走阿坝大草地后剩下四万残兵，从此无力再挑战毛泽东。有人说，两河口的张国焘对毛泽东如同鸿门的项羽对刘邦，因为不忍和“妇人之仁”而走向失败。这种比喻不准确。项刘背后没有操纵者，而张毛对决胜负不取决于二人或王明，而取决于斯大林。斯大林不喜欢张，即使张在两河口采取军事行动将中央红军收编也没有前途。

不仅毛、张领袖之争结果不取决中共，红军长征能顺利到达陕北也不取决于毛泽东如何领导，而主要取决于苏联的影响力。在日军华北压迫，全面抗战随时爆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与当年的李鸿章一样，有了“联苏抗日”的想法，于是决定不歼灭红军，只把红军赶到西北边远地区，以留下联苏通道。另外，蒋介石还有不能明言的考虑。那就是他想救儿子回国。他知道，如果

坚决消灭红军，他扣为人质的儿子就会在苏联消失。解密后的俄罗斯档案显示，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与斯大林作交易，图以红军的生存换回他的儿子。[50]

红军长征能到陕北的另一决定因素是蒋介石与西南军阀斗法。蒋介石要借追击红军之机扫除西南割据；西南诸省则各自保存实力，既不想与红军开战，又不想向中央救援，只虚张声势地打几枪应付中央政府，实际礼送红军过境，甚至送大洋，送补给以让红军尽快离开地盘。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收获巨大，迫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迫使云南军阀龙云和四川诸军阀服从中央，为西南日后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他在峨嵋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表达为抗战作准备的考虑说：“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反映他利用剿共经营西南的意图。

了解了斯大林、蒋介石之间的交易就会明白，影响几代青年的“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等等系中共宣传部门编造的故事。红军长征是平安走过来的，在泸定桥、安顺场、腊子口等地都没有战斗，因此红军将领们的回忆录中关于“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斗的记载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编造痕迹明显。几十年后，人们在红色旅游中才知道，没有木板的铁索桥并无可能爬过，“十八勇士冒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等长征战斗故事系虚构，五百米高的腊子口峭壁根本无法攀援。多年后，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在亲身重走红军长征路后指出：“出于自身的需要，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歪曲了长征故事。毛泽东的作用被神化了；好象整个长征中，就是他一人在挽救红军，瓦解蒋介石的重重封锁。毛泽东夸大了长征的距离，实际路程可能还没有二万五千里的一半。”[51]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中有一大部分是毛泽东为避免与张国焘会师而带着红军在贵州、云南兜圈子的冤枉路。林彪在长征中就对毛泽东率军在云南兜圈子提出质疑，直指长征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52]

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中共成立了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苏维埃国，与日军形成了对国民政府的南北夹击之势。在日军压迫中国的华北事变期间，红军完成了长征，但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去西北边境“接通苏联”获取军火，继续致力于推翻准备抗战的国民政府。在大敌当前之时，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而言，红军长征是不义的，是苏俄祸害中国的一个篇章。

建国后中共大力宣传红军长征艰苦卓绝，靠吃野菜，草根完成长征，而隐瞒了高层们躺在担架上长征的事实。一些老红军回忆录显示，红军在长征途中吃得不差，至少高层吃得不差。老红军李一氓多年后在谈饮食的文章中写道：“1934年秋天，开始了长征。一路上，有时供给好，有时供给不好，这主要看地区了。湖南、四川都不错，广西、贵州、云南差一点，当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肃。长征的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我们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我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过云南宣威时，弄到大批火腿，可惜的是炊事班把它剁成块状，放进大锅，掺上几瓢水，一煮。结果火腿肉毫无一点味道，剩下一大锅油汤。有的同志很精，申明不向公家打菜，分一块生火腿，自己拿去一蒸，大家这才知道宣威火腿之所以为宣威火腿也。在这点上，肖劲光同志收获甚大，他的菜格子除留一格装饭之外，其他几格全装了宣威火腿。生活最苦的一段当是在川西北的两三个月。那时把口粮包干了，不开大锅饭，每人分的口粮规定吃五天，实际上我两天半、三天就吃完了。准备大饿两天。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行军到一个地方，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萝卜干，还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这可救命了。吃了黄油，不禁精神抖擞，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极大。那时，董必武同志同我们一路行军，有个同志送他半只野羊腿，他知我们有点烹调本事，就交给我们做，讲明平均各分一份，我们当然乐意接受这个小任务。冲过腊子口之后，进入甘肃。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人合资共得银元一枚。我们遵从这里回族的风习，

杀羊的事请卖主照规矩办，有个方向问题，我们全不懂。羊皮归卖主，我们只要羊肉，所以价当如此。我们几个人把羊分为若干种做法，当然有羊肉锅贴。只须一顿，我们几个人当晚就把一只整羊消灭了。”[53] 老红军何涤宙记载，红军将士在遵义十几天中的主要活动是下饭馆，做皮衣，打篮球，跳舞联欢。[54]

长征红军不错的物质生活背后是沿途人民的深重灾难。从古至今，远征大军一路上解决军需无非靠抢劫，红军长征更是如此。苏俄对中共的援助主要是军火，红军离开苏区时所带的金银、大洋、烟土均是打土豪、打周边、打漳州城抢来的。上路时携带的盘缠对于浩大的长征军需来说是杯水车薪。大军必须一路席卷民众钱粮才能继续前行。红军每到一站，总是占据村镇中最好的房子，逼村民交出银元、粮食、用品、草料，将当地资源尽量享用，并将剩余钱粮席卷而去。就掠夺百姓维持军队而言，红军的作法比历史上的流寇更加残忍。例如，长征红军到云南某县，县长将红军认作了国军，率领当地绅士百多人迎接。毛泽东也就将错就错，吩咐他们备好粮食军饷，安排民夫、向导。休整后离城开拔时，毛泽东下令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杀掉，并说：“如果敌人都像云南那个县长那么蠢，中国革命早成功了！” [55]

红军西行路上人烟越来越稀少，粮食越来越短缺。数万红军通过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抢劫就空前残忍。在藏区，红军为了生存和行军抢走大部或全部粮食，屠杀部分或全部牲畜，甚至连田里未熟的青稞也大量割走。少数民族区多不是农业区，村民存粮不多，气候恶劣，被红军抢走粮食、牲畜的农牧民难免冻饿而死。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

也不留条子。”采访了几十位长征老红军的孙淑芸在《长征》一书中披露，红军长征时与藏民交战的次数远多于与国民党军交战的次数。真正的战斗不是对军队，而是对民众或村民武装。革命家们都会自觉地隐瞒红军长征一路抢劫的实情，只说长征一路播下革命的种子，最多只说亏欠藏民，但不会为残忍抢劫忏悔。因为，像龚楚那样反对烧杀抢掠的红军将领早就离开革命队伍了。至今，藏民中仍传承着对长征红军的仇恨。

第 25 章 建设与备战

整顿财税

1922 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列强各国同意中国关税自主，但要求撤销各地重复征税的厘金关卡。厘金制度始于太平天国之乱。当年，清廷无力剿灭太平天国匪患，靠湘军去镇压，允许湘军设卡收取厘金（千分之一，即一厘）自筹战费。匪患被平定后，厘金制度没有取消，反而蔓延。各路军队看到如此来钱容易，纷纷效仿，在全国水陆交通要冲遍设关卡，敲榨勒索过路商民，祸害社会。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一大祸害是军队倍增，收取买路钱的厘金关卡倍增。林立的厘金关卡成为中国经济领域里的首害。列强提出取消厘金的要求合理，是引领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建议。

在 1925 年的关税特别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于 1929 年 1 月 1 日以前裁厘，会议通过了中国关税自主案。段祺瑞政府宣言裁厘无疑正确。但厘金制度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弊端，其背后祸根是泛滥的军队和军阀割据。厘金是各省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军阀割据局面不改变，政府的裁厘宣言只是一纸空文。1926 年 4 月，段祺瑞政府垮台，关税会议案就此搁置。这时，苏俄扶植“南北二赤”使全国军队数量与厘金关卡再度翻番，全国厘金关卡遍地，“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一物征之于甲省者，复征之于乙省；而省内厘卡林立，重迭课征”，货物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被窒息。

南京国民政府与段祺瑞政府一样推动裁厘与关税自主，外交部向各国宣布，所有不平等条约未到期者应行重订，旧约满期、新约未订者，依临时办法处理。美国率先承认中国关于关税自主的原则，同意与中国另订新约，国

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签定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美国带动下，到 1928 年底，德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葡萄牙、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相继承认了国民政府和
中国关税自主权（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无担保的西原借款才与中国签订新关税条约）。为配合关税自主的新关税税则实行，财政部于 1928 年 12 月在南京召开了苏、皖、浙、闽、赣五省裁撤厘金、实行新税制的会议，推行裁厘改“特种消费税”。

1929 年 2 月，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海关进口税则》，以按进口货物不同类别等级实行的差别关税代替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抽五的均一关税。裁厘后，商品流通显著通畅快速，各地政府还节省了厘卡的行政开支，工商业者普遍欢迎，但造成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国民政府只好开征“统税”作为“中央国税”。裁厘改税，提高关税，设立中央银行等整顿财税金融举措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1928 至 1931 年，中国新设立的厂矿企业 662 家，资本总额 2.5 亿圆，发展速度超过了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

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1919 年 4 月，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Y)应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中国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的邀请来华讲学。杜威特别关注教育领域，提出了“经验就是生活”，“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杜威、胡适师生的推动下，美国朝野积极捐款资助中国平民教育运动。

1923 年 8 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平成立了资助中国平民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聘请晏阳初等一群留美学人任职平教会，负责主持该基金会的资助项目。1926 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晏阳初提倡“博士下乡”，并身体力行，举家迁往农村，许多

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同事也放弃大学教职来到农民之中，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道路，由此开启了中国乡村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教育须担负改造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的责任。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大部分文盲在农村，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他提出以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健康（卫生）教育（四大教育）来医治“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具体办法为：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平教会编写了备受欢迎的“千字课”等 600 多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 60 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以卫生教育救“弱”：卫生教育内容包括保持个人、家庭及周围环境的清洁，防治传染病，改良习惯；还包括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等乡村建设的内容。1934 年，平教会在定县全县建成乡村保健系统，让农民每年人均负担大洋一角，享受基本保健。这一系统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应将识字教育和公民教育相结合，培养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

定县平民教育的探索引起海内外各界的重视，晏阳初与杜威、爱因斯坦一起当选为“全世界为社会贡献最大十大名人”。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

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美国朝野对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没有因抗日战争中断。194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特别规定，援助款项的10%用于中国农民的乡村建设方案，美国称此条款为“晏阳初条款”。

平民教育救国的另一探索代表是儒家学者梁漱溟。他探索以儒家传统引领乡村建设的民族自强之路。他反对西方思想，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凋零的根源在于儒家传统道德被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和中国文化的失调，中国改良和乡村建设的出路在于发扬儒家传统道德伦理，重建儒家的“伦常关系”、“伦理本位”，通过“孔孟之道”代表的儒家道德复兴农村，实行“乡治”。1929年，他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且身体力行，亲自到乡村去考察研究。1930年，梁漱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所作了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演讲，提倡改良，反对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提出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来替代。他的乡村建设号召得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响应，也得到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1931年，梁在韩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区，推广其乡村建设理论，探索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之路。他以北宋《吕氏乡约》为范本，以乡约的形式推行儒家伦理教化，以“乡农学校”作为实行乡村建设的自治组织，继续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运动，提出以村学代替以往的乡公所，乡学代替区公所，在对乡民实行教育，让乡学担负行政管理责任。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

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个跑偏案例是陶行知和他的晓庄师范。接受美国民间资助，陶行知于1928年在南京城郊成立了一所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试验学校——晓庄师范，组织师生自己动手建校舍、图书馆，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农民学校和“联村自卫团”。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

论。其中三大主张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经传媒介绍，陶行知和晓庄师范的影响渐大，前来参观考察者中包括蒋介石、吴稚晖等国民党政要和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教授。经过克伯屈教授介绍，陶的教育探索斐声海外。但是不久，陶行知抛弃教育救国的初衷，加入了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变身外围俄党，将晓庄学校办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散发反政府传单和破坏京沪交通的颠覆据点。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勒令该校停办，通缉陶行知。

探索通过乡村建设救国的最成功范例是山西的村政建设和模范省建设。清末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为地方自治团体，播下了基层地方自治的种子。1918年，阎锡山在督军兼任省长任上继承清末的地方自治未竟之业，推行“村政建设”，在村一级推行自治，主持颁布了山西省《村编制现行条例》和《各县村治简章》。前者规定在村下设闾，以二十五家为闾，设闾长一人，满五十家则设闾长二人，人口多的村子闾数增加；后者规定村长、村长副资格为：朴实公正，兼通文义，年三十以上，无不良嗜好，有一千元以上（村长副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规定村长、村长副由村民推举，县知事选任，报省道公署备案；另外还规定村长代行警察职务。

联省自治运动中，阎锡山提出“行政之本在于村”的村政建设理念。他指出：“一省以内，依土地之区划，与人民之集合，而天然形成政治单位者，村而已也。村以下之家族主义失之狭，村以上之地方团体失之泛，惟村则有人群共同之关系，又为切身生活之根据，行政之村舍此莫由”，[1]“在中指出：“欲使人民从事于民治之练习当如何，实行民治主义之村本政治而已。村无活体之组织，民即无施治之实际。村禁约，村宪法也；村公所，村行政也；息讼会，村司法也；保卫团，村武力也。此活体之组织也。试行此种者，即民治之练习也。但此尚是少数人，如欲使村中全民练习，非实行村民会议不可。”[2]他要求实行民治，“让好人当政”，拒绝“党人当政”，依靠乡

绅而非依靠党人，通过教育和公共道德由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由村民自己商量出办法，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以达到乡村复兴。他在《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序言中写道：“日前余归家省亲，村长李君复天，持其编就之河边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请阅于余。余正以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业经脱稿，县村计划案亟待分别编拟，尤应赶速编拟村计划案，以为编拟县计划案之张本。因见其所拟，政治经济，相辅并进，尤以经济方面，就本村实况，虽迁就现状，规定增进生产之普遍办法，而纲举目张，应有尽有。各项章则，尤大致齐全，苟能确实循序进行，不难日起有功。兹为全省各村编拟计划便利计，将河边村计划案作为榜样，印发各村，以资各自编定计划案之参考，所望全省各村，分别各就本村实况，就应兴应革，编拟十年建设计划，并脚踏实地，照所定计划确实办理，将来村建设必能有成也。”

在阎锡山领导下，山西省颁布了《改进村制条例》，要求设置村公所、村民会议、村监察委员会、息讼会、保卫团等机构，在省长公署内增设村政处，全省划分为十二个考察区，每县加派整理村范员一名，专门办理和考察村政。在军阀混战，南北分裂背景下，山西省奉“闭关自治”，村政建设按部就班，大力推行“六政三事”：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剪发、放足和种棉、造林、畜牧，省署颁行了《县地方设区暂行条例》、《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村禁约》，推动乡村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自治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随着村政建设稳步推进，山西的乡村普遍制定了名为“村范”、“村禁约”的村规民约。“村范”为村民的言行规范，“村禁约”按各村习惯，自行规定的村法。其中通常列举禁止事项，如禁女子缠足，禁毁坏树木，“某某村公议禁约如下，不准贩卖金丹洋烟，不准聚赌窝娼，不准打架斗殴，不准游手好闲，不准忤逆不孝，不准儿童无故失学，不偷窃田禾，不准毁坏树木，不准挑唆词讼，不准缠足，不准侵占别人财产”等等。阎锡山评价村政建设的上述举措指出，“村范”与“村禁约”相辅而行，以村范开其先，以禁约善其后，这样“既

足补法官检察所不及，又可省警察渗设之繁费”，并能收到“坏人者畏社会制裁之力，日见其少”的效果。

阎锡山故乡的《河边村组织暂行章程》是山西村政建设方案的典范。该章程类似村的宪法，强调对权力的制约，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西方宪政理念。其中规定，村民大会是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家长会议，闾邻居民会议，闾邻长会议、村公所，调解委员会，考评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保卫团及公安团，经济建设董事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章程还规定，村民大会的权力由村民推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制约，凡常住村中之士绅，年高望重能主持公道者，皆得当选为监察委员，但现任村公务人员不得任监察委员。邻长闾长村副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一年，并得连选连任。一闾之事，由全闾居民会议解决。一邻之事，由全邻居民会议解决，但不得与村务会议之决议案抵触。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掌管纠察弹劾审计事项，监察村公务人员溺职等行为，初审村预决算，审计村财务事项。村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正当时，监察委员应提出弹劾于村民大会。监察委员有探询村公所所处置之一切事件经过及列席村公所会议之权。[3] 比较阎锡山的山西模范省建设和陈炯明的广东模范省建设可以看到，二者均强调民间自治，基层自治，依靠乡绅，即依靠有财产、学识、有责任心的好人，反对依靠政党、党人，强调基层人民自己管理，制定民约，除恶扬善，专注发展经济，注重教育。在阎锡山主持的 1917 年到 1927 的十年山西发展黄金时期，山西省在中国历史上率先构建了县以下的区村闾三级行政网，全省呈现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良好局面，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模范省，吸引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接受阎锡山的建议，参照山西和江苏作法，国民政府于 1928 年 9 月公布了《县组织法》，其中规定，县以下实行四级制：县下划区，区下设村和里，村里下编闾，闾下编邻。1929 年 3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设之基础案》，要求在 1934 年底前完成全国的县级自治。学习山西经验，云南、浙江、江苏等省也推行了村制。

陈炯明、张作霖之爱民表现于热心教育，阎锡山也一样。模范省建设中，山西的教育事业也是全国的典范。阎锡山从三个方面入手启迪民智，一是普及国民教育，二是创办职业教育，三是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开通知识为宗旨的社会教育。他主持颁布了《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山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程序》等，对各地完成义务教育的时间、要求以及师训、经费筹措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中，山西儿童入学率超过 80%，领先世界。

可以说，如果陈炯明、阎锡山的模范省建设不被外国枪炮扼杀，能在中国各地得以推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 1920 年代就起飞了。随着后来国民政府被推翻，阎锡山，梁漱溟、最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成果被摧毁，联省自治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中所依靠的有财产，有学问，有责任心好人——乡绅阶层不仅被新政权剥夺了治权，剥夺了财产，更被大规模屠杀，好人乡绅阶层不复存在，农村的基层由“党人”当政，大批地痞流氓执掌了乡村的基层权力。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乡村村治百病丛生，1920 年代山西村民自治的水平仍遥不可及。

从国防设计委员会到资源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有识之士认识到中日必有一战，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学界领袖捐资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在“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专栏文章中敦促政府早作战略应对。蒋介石阅后邀请胡等商谈救国大计后决定成立规划备战的机关。为延迟全面战争的爆发。1932 年 11 月，国民政府秘密成立了以“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为宗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亲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

授权丁文江决定委员会人选。丁文江与翁文灏（秘书长）、钱昌照（副秘书长）提出了包括的各学科专家的委员会成员名单。其中包括曾昭伦（化学工程）、李四光（地质）、竺可桢（地理、气象）、吴有训、钱昌祚（军事航空）等四十多位中国各学科最著名的专家。科学家们在民族危亡时刻响应国家召唤出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自愿接受每月 100 元的低标准经费以为国家节约开支。[4] 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委员会活动经费。为尽量推迟抗战，国民政府将这一机关对外保密。

翁文灏主持制定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委员会下设七个组：

军事组：负责对三军力量、防御工事与设防区域、兵工厂及其辅助力量全面考察，制定抵御外敌入侵的计划，对现有兵工厂之整理与扩充、新厂设立，国内兵器、弹药种类及数量、战时军队编制、装备、海空防、江防等提出计划；

国际组：根据蒋介石“于调查之外，应负责建议计划外交策略之责”的要求，负责研究日本、苏联、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对华政策；

经济及财政组：负责调查财政现状，筹划战时维持财政支持的管理办法，参照国外经验，为国家货币改革提出意见；

原料及制造组：负责对国防主要原材料的国内蕴藏量作全面调查，并就特种矿产利用、兵工用钢制造、煤和石油的开采、冶金工业发展等制定具体计划和实施方案；

运输和交通组：主持对全国的运输能力、铁路、公路、航运、通讯的现状进行普查，提出相关方面的备战计划，主持对落后器材改造及新器材的试制与购买，尤其注重引进新式军用通信器材；

人口、土地及食粮组：负责调查全国农业及粮食、农村金融状况，制定战时粮食供应计划；

文化组：负责修订教科书，普及国防教育和军训，制定精确地图。

七小组成立后立即启动了众多的有关国防、备战的重大课题研究。其中包括：陕北油田地质调查，华北硫磺调查，黄河水力测定量，燃料研究，试探陕北石油矿计划，调查四川油田报告，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四川盐产调查，勘察长江上游水电进行计划，上海钢铁厂调查报告，平汉、平绥、正太三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煤矿状况调查，桐油及锑矿调查，固定式直立炉碳低温蒸馏试验，各省工业调查，军事电气设备之筹划运用，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兵工用钢制造问题，军工制造能力之预算及扩充办法，兵工制造推及民营之办法，首次工业普查等重大项目。到 1934 年 4 月，委员会各组完成了 156 项课题，提出了实用报告和全国国防工业实施计划。工业普查结果显示，关内华资工厂共 2, 435 家，雇用工人 49 万人，总资本 4 亿元，总产值 11 亿元，与满洲 200 多亿工业产值比较极为薄弱，预示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国民政府采纳了报告中的大部分建议，着手实施。

1935 年 4 月，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仍由翁文灏主持实施国防战略资源开发、军工基础的计划。资源委员会加紧改造和迁移军事工业，在完成四川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的调查的基础上，拆迁了汉阳钢铁厂，在重庆建立起了钢铁基地（今重庆钢铁公司前身），成为战时后方主要的兵工用钢供应厂家。该基地中张之洞购于英国的大型轧钢设备一直用到 1980 年代末。在交通运输业方面，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几年的调查结果制定了“铁路调查”、“铁路军事运输”、“各铁路近三年来各站上、下货物详细统计”、“利用外资大规模修筑国内铁路及整理已成铁道外债方法”、“国防铁路和公路初步动员和建设计划”等方案。根据这些建议，国民政府加紧建设公路铁路，在至全面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相继建成了粤汉、浙赣、陇海、同蒲等铁路重要干线。

军政部次长陈诚报告说：“1932年至1935年4年的国防建设的成效相当于民国以来二十年的总和；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4年的总和。”

在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几年中，中国一代最著名的归国学者们胸怀报效祖国信念，在科学与工业领域默默进行着全面抗战的准备，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主持的许多基础性的调查是中国近代首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所制定的“重工业五年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众多计划对后来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其中一些计划在战后，直至1950年代台湾的工业经济发展中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币制改革

清末以来，国际银价长期下跌，使中国本已破产的历届政府更难以偿付以黄金计价的外债。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的波动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冲击着中国的币制体系，历届政府都想改革币制，均因政治动荡与战祸连绵未能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国内货币流通极其混乱，银两、银元并用，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孙头”等，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辅币规格成色不一，纸币种类繁多，发钞的中外银行多达三十家，纸币流通范围狭小，偏僻城乡流行着商家、钱庄及其它非金融组织发行的私票。这种“每埠为一国”的货币流通混乱局面严重阻碍着商品的流通。1933年3月，在日本步步进逼华北的形势下，国民政府趁内地银元大量涌入上海，银根相对宽松，发布了《废两改元令》，以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为正式本位货币，强制在全国流通。币制改革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货币混乱局面，为进一步施行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

“废两改元”后不久，国际上发生了白银风潮。美、英等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导致国际上美元贬值，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外流，

通货紧缩，银根紧张，工商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大量倒闭，失业激增，物价暴跌，外贸巨额逆差，人心恐慌。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维护币值稳定，也为全面抗战作准备，国民政府根据设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实施进一步的币制改革，废除难以为继的银本位制，以法币制取代银元。根据币制改革决定，财政部先发行一亿元的“金融公债”，拨给中央银行 3000 万元，中国银行 2500 万元，交通银行 1000 万元充实三大银行资本，为三行发行法币作准备。

1935 年 11 月 3 日，财政部长孔祥熙主持颁布了《改革币制令》及《兑换法币办法》，宣布在全国立即实施法币取代银元的币制改革。改革内容包括：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外，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逐渐收回现行流通纸币，停止使用；废除银本位制；强制将全部银元、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规定法币为全国唯一通行、不予兑现的货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英、美两国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积极支持，分别派出了李兹·罗斯、甘末尔、杨格等经济专家来华协助策划。《改革币制令》颁布后，英国驻华大使援引“国王规章”和中国法令，规定英国在华侨民必须停用白银、银元，接受法币，美国则以继续按每盎司 0.45 美元价格收买中国白银的行动支持中国政府的币制改革。日本清楚中国币制改革的备战意义，阻挠改革，日军向宋哲元施压，禁止银元南运，以防止南京政府通过币制改革控制华北金融。

币制改革得到民众和工商界的欢迎，法币在南方发行顺利。新币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迅速显现，通货紧缩得到缓解，全国物价平稳回升，百业复苏，在不久后带来了少有的外贸顺差。币制改革后，全国近七亿元白银被收归国有，不再流通，法币与现银脱钩，中国货币不再受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币制改革的次月，美国停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国际银价在一周内大跌一成，国内金融得免动荡，与英镑固定汇价的法币起到了稳定汇率，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的作用。

通过法币改革，国民政府将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极大地扼制了地方割据。在不久后的全面抗战中，币制改革的巨大作用显现，在国家经济被蹂躏，财政收入枯竭的形势下，国民政府靠发钞票弥补战时的财政危机，以法币贬值为代价坚持长期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共发动了抗议国民政府滥发钞票的运动，称是搜刮人民之举。这种说只具煽动作用，谈不上道理。因为，若无在1935年实施法币改革和抗战中增发钞票，国民政府断无可能长期抗战坚持到胜利，抗战中增发钞票和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国人必须为长期抗战付出的代价。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

在日军进逼华北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既要加紧备战，又要尽量推迟战争，于是决定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名义备战。1935年春，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分别发表了号召开展“建设运动”的谈话，名流学者们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发表文章、讲演，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年底，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緬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等重要提案，在其中强调：“在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緬铁道之必要”。与大纲相配合，国民政府颁布了《工业奖励法》，鼓励发展重工业，将重工业发展和重要战略资源项目交直属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统筹，以为战时工业动员作准备。资源委员会设立了钨业管理处和锑业管理处，严格管制最重要的出口换汇资源钨和锑，并拟定了限制铁砂出口办法，规定凡出口铁砂须持有实业部颁发的出口许可。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拟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其要点是引进德、美等国的资金、设备、技术，迅速扭转中国重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情况。6月，国民政府成立了蒋介石、孔祥熙任会长，实业部长吴鼎昌、秘书翁文灏为委员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筹委会，提出国民经济建

设运动宗旨为“自救救国”。筹委会提出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内容为：实行保护和奖励工业的政策以振兴工业；开发矿产：调查各地矿产，改进采掘方法，禁止地方政府与任何特殊势力把持矿产，与民争利；设立征工制度，动员老百姓为筑路治河，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义务劳动；以推行农村合作、活泼农村金融、流畅农产运销、鼓励垦牧等举措振兴农业；流畅货运：发展全国各处的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在各地设立主要农作物的公共仓库和运输机关；调节金融：鼓励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设置完备之农村借贷制度。国防方面，国民政府于 1935 年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在武昌成立了陈诚为处长的陆军整理处，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训练。蒋介石在指挥围剿红军的同时视察了川、滇、黔三省，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1936 年，国民政府大力发展空军、海军，修建江防、海防要塞，包括江阴、南京等要塞区，从德国购买了重炮。在外有世界经济危机、日本步步进逼，内有中共武装颠覆威胁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困难形势下，全国工业、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取得了年增 10% 的巨大成就，[5] 备战的几年成为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评论说，经济建设运动成效显著，若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应可引领中国走上快速现代化的富强之路。

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发起了“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侮自卫”为主旨的“新生活运动”。3 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决定，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南京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启动仪式，主持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举行了启动新生活运动的仪式，各地最高行政长官纷纷成立了亲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分会。在南昌，蒋介石亲自推动运动，在十万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宣传“新生活”。会后，南昌当局组织了数千人的盛大游行。南

昌新生活运动第一阶段的两项中心工作是整齐、清洁，主要宣传：城市卫生建设，宣传“不随地吐痰，预防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公共设施建设；市容整顿；公共场所治理；加强公务员管理；组织各种新生活团体和讲习；生活风俗改良；募捐救困。当时的报导说，南昌“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著进步。”新生活运动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提倡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等数十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对净化社会空气，改善公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蒋介石推动下，南昌新生活运动轰轰烈烈，为全国运动树立了榜样。各地发动学校、机关组织新生活运动服务团，进行宣传、服务，配以警方的督促和检查。例如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积极推动，以身作则，使山东市容整洁，行人车马秩序改观，新生活运动成效显著。

1935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三化”方案模仿当时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义作法，提倡“全民备战，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其中，军事化要求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生产化要求节约、刻苦，反对奢华浪费怠惰游荡；艺术化要求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肃仪循礼，整齐清洁。蒋介石要求以日、德国民生活军事化、刻苦耐劳习惯为榜样，改变国人懒散的习惯。各地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按此要求组织团员和中、小学生参加军训，组织起童子军，培养尚武习武风气。

“新生活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禁毒。在江西，中共苏区以鸦片买卖为重要财源，使鸦片交易泛滥。蒋介石决心在新生活运动中树立禁毒成功的典范，亲任全国的禁烟总监，主持颁布了禁毒令，宣布处决制造、贩卖和运输鸦片者，成立戒毒协会，勒令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戒毒或接受强制性治疗，处决拒绝接受戒毒治疗的官员，要求六年内根除贩毒、吸毒，宣布以

1936 年元旦为吸毒者自愿登记最后期限，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他推动新生活运动禁毒的成就受到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的表彰。

1936 年国庆日，蒋介石发表专文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强调通过新生活运动奠定民族的精神基础，通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奠定民族的物质基础，两者互为表里，相辅为用。

中西本位论争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按照历代开国传统，率众文武赴曲阜朝圣，主持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以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教育宗旨。1931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学校须制蓝底白字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方针，同时提出以儒家道德伦理抵抗共产革命学说，发起了新一轮尊孔运动。

尊孔运动中，曾在岳麓山崇古学堂读经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在湖南掀起了读经复古运动，要求官员、军人以《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为守则，要求青年信仰儒家的五伦八德，“南天王”陈济棠在广东也掀起了尊孔读经运动，成立了以“实践道德，改造人心，阐扬国粹，奖励学术”为宗旨“明德社”以推动尊孔读经。陈济棠主张在生产建设方面，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用外国工程师，至于做人须以中国传统为本，必尊孔读经。他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我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我决心反共了。”^[6] 对于当时各地领袖推动尊孔读经，胡适批评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他提出，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济棠反对胡适的批评说，做人方面不能学外国人，不能忘五千年老祖宗这个本。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新生活运动中，北大学生申寿生发表了《我们要有信心》一文，提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因为中国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一味摹仿。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对寿生文章代表的当时青年人中普遍的看法，胡适指出：“鄙薄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所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却没有一间四十年的大学，甚至没有一间真正的大学。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 [7]

胡适指出：中西文化有两方面的不同：从理智（科学）方面说，中国文化自暴自弃，不思不虑。求知是人类天生的要求，但中国不但不能满足它，且还要制裁和断绝它。比如中国文化中的“绝圣弃智”、“断思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等。西方文化则不断的寻求真理，其第一特色是科学，而科学的根本精神在求真理，比如，古希腊学者亚基米德的故事。从情感、想象力（道德、宗教）方面说，中国文化安分、知足，其主要特征是非理智化、非人化、非社会化，所以科学不发达。西方文化不安分、不知足，其主要特征是理智化、人化、社会化，所以科学淘汰迷信，科学抬高人的能力而增加其自信，科学提高物质生活而有余力照顾别人的需要。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两大弊端：其一，内容太贫乏：在古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已不及西方文化。单从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四项，古代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已将中国先秦文化比下去，特别是造形美术与算术方面；其二，造孽太深：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中国文化的病痛一大堆，它独创出了鸦片、小脚、八股等“三大害”，贫、病、愚昧、贪污、纷乱等“五鬼”和仪文主义、贯通主义、亲故主义等“三个亡国性的主义”。这些病痛，“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何况我们竟是兼而有之，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丛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他不由悲叹“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他肯定西方文化说：西方文化主要为自由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最大的特点，是将民主与自由并举，以为民主与自由是一物的两面，不容分割。如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它最精彩的一点是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民主政治须以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多年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的论断）。基于西方文化在整体上优于中国文化的看法，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解释说：第一步，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第二步，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铁轨、汽车、电线、飞机、无线电，把血脉贯通，把肢体变活，把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

须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和幸福。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

“全盘西化”主张立即引来围攻。上海的何炳松、王新命、周佛海、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寒冰、樊仲云、武育干、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西化。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回应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卫道教授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我们走入歧途，堕落了。对此观点，胡适再发表《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两文指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品质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狱、板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贤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接触之后，那由科学民主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渐崩溃的。七八十年来我们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虽然还不曾整个学到其精髓，终究已经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

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夹棍扳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都是我们的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从来不曾讥弹的；这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文化从来不曾引导向上的。说我们在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了，堕落了，这真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中国人只有放弃一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胡适承认，“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说：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而“充分世界化”的说法则可以避免“全盘西化”一词所引起的一切琐碎的争论。其实，胡适早前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现代化主张正是中西文化结合之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比革命党人有更多的尊重。

第 26 章 华北事变

将相之争

1931 年，国民党内各路反蒋派推汪精卫为领袖，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准备军事讨伐南京政府。在粤方军队进入湖南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主动下野以平息内斗。紧接着，斯大林策动了中日淞沪战事，粤方委任的行政院长孙科因无力处理事变而辞职，汪精卫临危受命，接任行政院长，主持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出决议请蒋复职，形成了蒋主军事，汪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在应付日本压迫方面，二人达成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蒋、汪的共识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胡适直言“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1] “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2] 支持“国联调查团”《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共管东三省的建议。[3] 因为大家看到，中国军队私有，没有效忠国家的国防军，反而有红军推翻政府的严重威胁，军事上无力御侮，因此反对不切实际地唱立即对日宣战的高调。

1932 年 3 月，关东军扶植成立了满洲国，开始向热河扩张。汪精卫命华北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增兵热河。最高领袖张学良拒绝政府染指其华北地盘，让汪的守土号令无法通行华北。6 月，汪精卫率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到北平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讨论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顺便约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不把没有兵权的汪精卫放在眼里，称病不见。汪得知张称病时去了北海船游，极为愤怒。7 月 17 日，关东军攻入热河，汪精卫通电命令张学良率军守土。张称汪无

权过问军事，再次拒绝命令，同时却向行政院索要 200 万元军饷。8 月 6 日，汪精卫发出“鱼电”，痛斥张学良“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平日不以一文税收解诸国库，不但税收多少中央无从过问，即税收官吏亦自行委派，未尝一白中央”，促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并表示自己愿与张一起辞职。汪精卫的斥张通电切中了军阀们抗战无能，敛财有道的时弊，得到国内舆论的一致支持。确如汪所言，张学良易帜的条件之一是东北税收不受中央染指，易帜后从未上缴一文予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张的奉天帅府金库中抄得上亿钱财，这在当时堪称世界富豪级的巨额财富。统治华北期间，张大肆贩卖故宫国宝，其中包括“王右军快雪时晴图”和“唐寅踏雪寻梅图”。[4] 应对汪电和舆论的压力，张学良在记者会上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护，宣布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汪精卫立即复电准辞，称是打破军人执政局面的开端，随后在南京主持作出政治会议决议，撤销拒绝中央号令的北平绥靖公署。然而，汪的决议在军头面前无效，宋哲元、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张学良部将领衔发表了五十七位将领联名通电声称与张共进退，以此方式拒绝汪的撤署令。汪精卫无奈，与宋子文飞赴庐山晤蒋介石商讨应对。蒋介石以“恐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的说法偏袒张学良，电请张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汪精卫以行政院长之尊要求与张学良共同辞职而不能，愤而再度辞职出洋。

长城抗战

1933 年 1 月初，日军攻占了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消息震动了全国，因为历史上山海关被占意味外族入主中原。蒋介石没有立即从南方调中央军北上。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从第三次围剿前线调兵北上被追杀而损失惨重，红军势力逼近了南昌和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对苏区的围剿。1 月 18 日，张学良与冯玉祥等二十七将领发表了保卫热河通电。军阀们发表守土通电意在向全国舆论作个交待，谁也没有打算真以私家军去与日军拼老本。华

北二十多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首先考虑保存自己的东北军实力，派宋哲元、孙殿英等非奉系军队守卫要津，而将东北军留在河北后方。非奉系将领们各有招数避免为东北军去挡强敌。在张学良等人发表保卫热河通电时，胡适向国民政府提出，吸毒、沉缅女色的公子哥张学良没有能力指挥华北抗战，华北抗战必须易帅。这时的张学良确如胡适所指，毒瘾严重，精神萎靡，外出视察不时要停下用毒，见客时都要离座去打吗啡针，连军令都会忘记发出。主帅如此，华北大军之混乱与各自盘算自保的情况可想而知。2月初，蒋介石再到南昌，自兼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开始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虽然陈济棠保存实力，只在粤赣边界虚张声势，何应钦、蔡廷锴、罗卓英等部仍然对红军作战节节胜利。

2月23日，日本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及部分满国军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热河抗战爆发。热河人民长期遭受省主席汤玉麟的压榨，趁日军进犯发动抗暴的民变，组织民团攻击汤部。在日军和民变的夹击下，汤玉麟的北线部队或投降，或溃退。得知前线战败后，汤玉麟动用所有运输车队，载运大批财宝、鸦片，弃城而逃，手下各部争相逃命，大军全线溃败。日军三天就逼近了省会承德与南部的长城防线。3月1日，学界领袖胡适、丁文江、翁文灏联名电请蒋介石速到华北亲自指挥。蒋介石覆电：立即北上。然而，没等蒋介石北上，华北国军一触即溃，日军以百余人小股部队长驱直入，于3月4日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由于溃败迅速，国军来不及破坏热河省的主要公路和桥梁。日军得以从锦州快速运送物资送到长城一线，夺取长城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后才止步。至此，热河抗战以日军占领热河全境和长城主要关隘的结果迅速结束。

承德失守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红军战场调兵北上保卫平津。中央红军乘国军北上一路追杀，歼灭了罗卓英部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主力，逼近南昌、抚州。在南北两面不得兼顾的局面下，国民政府军队南北都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空前大胜，红四方面军则乘国军北上之机建立了川

陕苏区。蒋介石清楚国民政府不可能对日军与红军两面作战，电请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继续主持行政院及对日妥协谈判。

汪精卫在得山海关失陷消息后立即前往日内瓦，向国联递交了《对暴日侵略宣言》。1月16日，国联举行了十九国特别会议。令汪失望的是，国联会议只对已退出国联的日本作一番谴责，没有制裁措施，默认了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接蒋请回国主持行政院的电报后，汪精卫清楚，蒋介石是要让他再次出面主持对日妥协，苏俄在中国推动的促对日宣战和所谓救亡运动是希望中日开战是为了苏联利益，对日谈判停战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于是不顾亲信陈公博回国复职将再背一次骂名的警告，决定回国复职，争取挫败苏俄的计划。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以张学良引咎辞职为条件。

这时，国内舆论一致谴责张学良，胡适直指张学良在体力、精神、知识、训练方面不能担当重大危急局面，[5] 丁文江发表公开信抨击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借助朝野舆论和各派系的压力，蒋介石劝张学良辞职出国。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等国民党内派系也乘机倒张，顺便自己唱爱国高调。在朝野压力下，张学良只好接受蒋的劝退，于3月6日通电引咎辞职，然后携家眷赴欧洲考察。行前，他向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舆论指为“娇妾重于国土”。出洋豪游欧州的八个月中，他每月耗费四十万元，相当于中央军四个师的经费，证明了汪精卫要求张辞职之正确，也证明了胡适、丁文江和各界对张评价之准确。

张学良辞职后，汪精卫回国，继续主持政务外交。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他积极主战。经过推动华北抗战失败，目睹国军装备之低劣，士兵之困苦，各路私家军将领抗命避战，索饷无度，各地实力派空喊抗日口号而盘算保存实力，中共趁华北危机全线出击进攻政府军并举行“八一拥护苏联周”等等严酷事实，他感到中国真正抗日者寥寥，不具备抗战力量，再次归来后转而推动和平运动。陈公博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历程。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陈为

十九路军募捐了万枚手榴弹，日军进犯热河时他北上劳军，但刚到北平各路军队已败退回来。他目睹前线溃败惨状后写道：“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塘沽协定》

长城战败后，日军占领了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二十二县，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市民纷纷南逃。这时，西南的桂、粤、川、滇系，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等各路反蒋派军阀对华北战事隔岸观火，采取保存私家军实力的策略，同时唱抗日救国高调，通电反对谈判妥协。各路反蒋派与中共都希望中日早日开战：反蒋派希望借日军削弱中央军以利倒蒋，中共希望趁外敌入侵北方在南方扩大苏区。国民党的各路反蒋派军阀虽然对抗中央，但至少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而中共的苏维埃国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是对国民政府的最大威胁。长城抗战时，红军大举追杀从江西，湖北北上的国军，国民政府只好像淞沪抗战时一样，把保卫首都南京的中央军最精锐的德械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调到华北前线，使首都更加空虚。蒋介石、汪精卫清楚，有南方苏区的心腹之患，对日之战没法打，国民政府除了在华北对日军妥协别无选择。

国民政府与日军在华北达成妥协是斯大林最不愿见到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兵锋北向，斯大林深为恐惧。他指示共产国际、中共、宋庆龄、何香凝立即在华南挑起中日开战以使日军停止北进。奉斯大林之命，共产国际在华的各路人马挑起了淞沪战事。日本增兵上海，关东军只好暂时搁置北攻苏联计划。蒋介石、汪精卫联手推动和谈，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让斯大林感到失望。中国长城抗战时，希特勒上台并宣言反共。斯大林倍感到被日、德夹击的威胁，迫切地要求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对日军北攻苏联的担心没有错。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内部的“北进”与“南侵”之争在升级。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为代表的“皇道派”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主张“北进”攻苏，而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林銑十郎等

“一夕会”成员为代表的“统制派”支持海军的“南下”计划，主张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进攻东南亚、印度和澳大利亚，两派矛盾日益尖锐，主张“北进”的皇道派获得更多中下级官支持，势力更大。

蒋介石了解日军内部的“北进”与“南侵”之争，认为日军北进攻苏的可能性更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以后，俄必先取攻势，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一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坐以待毙也。” [6] 蒋、汪都知道，中国各地促对日开战运动系苏俄所操纵，中国明智的选择不是早日对开战，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推迟全面战争。推迟全面战争就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和谈，而主持和谈意味着背负卖国的骂名。中国古来就有向签署城下之盟的外交官泄愤的恶劣传统。因签署和约背负骂名者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秦桧。他在国家无力再战的形势下出面签署了和约，换来了南宋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国人不念秦桧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反而将他铸成跪像，千年唾骂。而因秦桧签署和约得以在和平环境中写爱国诗词的辛弃疾、陆游千古流芳。另一签约背骂名的代表是李鸿章。他因代表国家签署《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被清流和国人骂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开创了更加恶劣的传统。受苏俄操纵的青年们以殴打外交官、捣毁、火烧外交官住宅来表示自己爱国。恶劣传统加卖国骂名的威胁之下，国人，政客，军阀纷纷不负责任地唱主战高调，几乎无人敢于公开言和。

在中日和谈中，双方的外交官、政府首脑都受到人身威胁。在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济南事件后和九一八事件后两次因主持谈判被中共地下党组织人殴打、捣毁住宅；一二八抗战后负责对日交涉谈判的首席代表郭泰祺被受操纵的暴徒殴致重伤；在日本，拒绝听命狂热军官的首相滨口雄幸、

犬养毅接连被刺杀，使日本文官无人敢于主和。舆论压力和人身威胁之下，主和需要比主战有更大的勇气，要求主和外交官准备既牺牲生命又牺牲名节。在这样的局面中，国民政府内与日本文官政府内一样，无人敢于出头去为国家利益讲和。蒋介石对中央军校学生们训话说：“如果只考虑我自己的名望的话，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但我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把国家社稷断送掉，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7] 这里，他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他没有为国牺牲名节的勇气，不敢出面主和，甚至不敢公开主和。他只能三番五次地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和谈。

汪精卫清楚蒋介石请他复任行政院长是要让他背骂名。汪与蒋的不同之处是汪不怕牺牲名节，坦言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介意挨骂。得知汪精卫决定回国，陈公博写道：“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汪先生离国，行政院长还是虚悬，汪先生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因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8] 汪精卫回复陈公博说：国家需要就应有人出头讲和背骂名。汪精卫愿意承担和谈责任，但行政院长不可能自己出面，还须有人出头作和谈代表。在日军威胁平津的形势下，蒋介石请盟兄黄郛作对日和谈的代表。济南事件中，时任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出面对日谈判达成了日本撤军的协议，为国民党北伐立了大功，同时背上了卖国贼和“现代秦桧”的骂，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刺杀威胁，被迫辞职隐居，连家人都不敢上街。此时，年老多病的黄郛当然不想再趟混水。经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一再恳求，黄郛最终决定，甘冒被刺风险为国效力，甘愿再背一次骂名。果然，他在北上的火车上遇到投掷炸弹暗杀，自己侥幸躲过一劫，但卫兵和周围民众被炸死多人。杀手可不是青年泄愤那么简单，背后应当有苏俄阻止中日和谈的指示和中共的安排。

到北平后，黄郛成立了自任委员长的政务整理委员会，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展开了没有筹码的艰难谈判。蒋介石指示黄郛尽量推迟全面战争。这样的指示对谈判代表而言并无意义。行政院长汪精卫作了有意义的指示，致电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黄郛：“除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四省之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汪挺身承担责任和骂名的表态使谈判得以进展。1933年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密谈后达成停战备忘录，5月31日，何应钦与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达成了《塘沽协定》。与蒋介石一样，何应钦也怕签署协定背骂名，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签署了协定。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军对继续进军华北没有把握，选择了见好就收。协定签署后，日军北撤，平津危机缓解。

《塘沽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国军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日军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以侦察，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长城线以南的上述地区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这一协定无疑屈辱的。但屈辱不是国民政府造成，也不是北洋政府造成，而是义和团暴乱和《辛丑条约》的结果。《辛丑条约》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列强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线，历届民国政府只能接受前政府所签条约。

签定《塘沽协定》的消息传出后，主持谈判的汪精卫和经办者黄郛再次成为举国声讨的对象。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如清末的“清流”一样，以抨击公开主和的汪精卫和受命和谈的黄郛来表现自己爱国。黄郛在上海的住宅被人投炸弹，并收到死亡威胁信。对此，他坦言：出面谈判者对这种打着爱国旗号的威胁防不胜防，必须面对。^[9] 此时，蒋介石不向舆论界承认他批准了《塘沽协定》的内容。他在日记中（6月3日）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其实，他没有屈，他没有公开承担《塘沽协定》的责任，国人不知道他批准协定内

容的内情。黄郛对蒋介石将《塘沽协定》责任完全推给别人的安排不满，在电报中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10] 陈公博后来写道：“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11] 顾维钧多年后披露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妥协的困境说：“他们不能事先获得国际上给予支持来应付可能出现后果的保证。他们害怕一旦日本正式对我宣战，封锁我港口等等，而国际上都袖手旁观。他们还害怕在刚刚对江西共产党的威胁做好应付准备之时，被迫外内两面作战，以致腹背受敌。同时，他们不敢公开申明妥协的观点，害怕激起公愤，推翻政府”。[12] 国民政府这种困境正好为共产国际、中共和唱爱国高调的反蒋派所利用。

1933年8月，在汪精卫因主持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被举国骂为卖国而辞职赴法的周年之际，国民党执委会的中央政治会议在反蒋派“新清流”的主导下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汪随即提出辞职。蒋介石急忙从剿共前线回南京，否决政治会议的决议，请求汪精卫收回辞呈，并向中央政治会议说他支持汪的外交路线。随后，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对汪精卫的不信任案，汪精卫收回辞呈，蒋介石回江西继续主持剿共。与黄郛一样，若非置个人荣辱于不顾，汪精卫是不会回国再背一次骂名的。汪、黄二人担当达成的《塘沽协定》是国军无力保卫平津的形势下，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范例。协定中，国民政府没有割让华北的国土，没有放弃热河主权，没有承认满洲国，虽然默认了沿长城与满洲国为界，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但它没有像《辛丑条约》那样明确承认外国军队的驻军权。可以说，在长城战败，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无险可守的

情况下，通过国际调停与外交努力达成这样的妥协是负责任的政府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部少壮派军人对《塘沽协定》非常不满，认为没有达到扩张的目的。他们继续采取“下克上”行动，谋求在华北扩张。对《塘沽协定》最不高兴的不是日本军官，而是斯大林。他非常害怕中日在华北达成妥协后，日军会掉头北攻苏联。根据他的指示，共产国际发动了谴责国民政府卖国、要求对日开战的运动，其中包括指使爱国贼青年向中国主和官员发出死亡威胁。

对国民政府而言，《塘沽协定》是救命条约。通过条约，国民政府让日军在华北暂时止步，从而能够腾出手来应付福建事变、冯玉祥叛乱和中共红军的武装进攻。若无此华北妥协的条约，国民政府完全可能在四面作战中迅速垮台。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经办人黄郛去世。汪精卫在悼词中表露心迹说：《塘沽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间误解，但政府已慎重考虑了这种危险。他呼吁：“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争取间达到：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13] 他向国人解释说：“签订停战协定并不意味着投降，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他引证明末的史实说，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归顺新政权。[14]

察盟军叛乱

1925年，冯玉祥投靠苏俄，获取援助壮大崛起。1927年，他在苏援断绝后宣布清共。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甘成为蒋介石下属，希望通过反蒋

与苏俄再续前缘。1929年，他趁中苏满洲开战之机兴兵反蒋，期望再次得到斯大林的扶植。斯大林虽对冯玉祥接受扶植壮大后清共极为愤怒，但感到冯仍有利用价值，回复说准备再次援冯以鼓励冯兴兵反蒋。冯举兵后并未得到俄援，被斯大林戏耍。反蒋战败下野后，冯相信斯大林还会援助他，一直等待机会恢复地盘。在日军攻占热河后，冯玉祥感到机会成熟，与胡汉民、张学良等反蒋派密切联络，互相利用，伺机举兵。1933年3月，国民政府将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部西北军主力东调以保卫平津。趁察哈尔防务空虚之机，冯玉祥跑到张家口联络旧部，树旗造反。一时，西北军旧部、东北义勇军、汤玉麟第三十六师残部、察热满几省土匪会党武装、蒙古地方武装等各路因日军入侵而失去地盘的杂牌军纷纷来投，冯玉祥迅速纠集起了十万人武装。宋哲元碍于旧上司面子，默许了冯玉祥树旗纠集人马。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察盟军），通电声称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将独立对日作战。

历来说一套作一套的冯玉祥敢于举兵叛乱是因为看准了国军在日军进逼平津的形势下腾不出手，其目的并非抗日，而是重建私家军，图谋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割据。打抗日旗号趁外患搞内乱，是冯玉祥、中共红军和各路反蒋派的共同套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内的各路反蒋派均打抗日、反蒋旗号图谋割据一方。广东的陈济棠不断谴责南京政府围剿红军而不去抗日，但在华北吃紧，中央命他派兵赴华北抗日时他坚决拒绝。私家军制注定了各路私家军阀、党军不去与日军拼老本。冯玉祥在察省发动叛乱后，胡汉民立即积在南方积极策动粤军和桂系起兵响应，冀利用日本人压迫的形势倒蒋。在察哈尔树起了造反大旗。他知道，要想得到苏俄的援助须先取信于中共。于是，他按照1925年的附俄套路，邀请中共派人加入他的察盟军作党代表以取悦斯大林。应冯邀请，中共派出了武止戈，张存实，许权中等300多党员加入了察盟军。随后，冯玉祥请中共代表武止戈赴苏，向苏联传达寻求援助意向。

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冯玉祥趁外患搞内乱，声明不承认“察盟军”的合法地位，对察哈尔实行军火及粮食医药物资禁运，命令晋绥军集中于晋北，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形成围剿之势。6月9日，国民政府华北最高负责人，北平军政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致电冯玉祥严正指出，在国民政府与日本已签协议达成妥协之时，“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将破坏国家艰难取得的停战大局，给日军乘机侵入察哈尔提供借口。他敦促冯解散所谓抗日同盟军。冯玉祥知道政府军不便在外敌面前开打内战，拒绝政府停止叛乱的敦促，于6月15日在张家口召开“抗日同盟军代表大会”，宣布军政纲领。与冯玉祥假抗日真叛乱一样，投奔他的汤玉麟部和打着“东北义勇军”旗号的数万流寇，也不是为着抗日来，而是为了军火、军饷和一方地盘而来。那些自称的东北义勇军若真想抗日就不会从东北跑来察省。如同辛亥革命军把孙中山当成财神一样，十万乌合之众把冯玉祥当作财神，投冯为了军饷。与当年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为革命军闹饷所苦，在广州大元帅府为滇桂军闹饷所苦一样，树旗后的冯玉祥立即为旗下各路杂牌武装闹饷所苦。计划中俄援金钱不到手，发不出军饷，冯玉祥感到了兵变内讧的威胁。他知道，从贫困的察省再搜刮也难以供养大军，且这十万乌合之众的要求也是无止境的，于是决定趁日军集中杀伤力进攻长城，察省附近的广大地区由满军和降日的热河土匪驻守（日军只派有少数顾问教官）[15] 之机决定向满军驻守防务空虚多伦扩张以扩大搜刮范围。7月，冯玉祥指挥“察盟军”从满军手中夺取了多伦和察东四县，随后打舆论牌，通电全国吹嘘战胜日军收复了多伦，让长城抗战惨败后盼望好消息的国人欢欣鼓舞。奉共产国际之命推动中日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团体借此大做文章，争相通电祝贺歌颂，以吹捧冯玉祥抗日爱国的方式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对于冯玉祥假抗日，真割据的把戏，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冯的捷报电报上批了“无耻”二字。汪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察盟军收复多伦不是取自日军之手，而是取自满军之手，冯玉祥是在勾结中共赤化察哈尔，向国民政府搞独立。汪此言切中了冯举兵的要害。他在热河抗战、长城抗战中从未像宋哲元那样，率军真打一把，无非是发通电，唱高

调。作为军阀，没有军饷、军火与地盘利益的事他是不会干的，此次竖旗兴兵无非是向国民政府搞独立。

7月12日，何应钦在北平召集宋哲元、庞炳勋等冯旧部华北军政领袖开会，决定派员到张家口传达北平政务委员会、军委会北平分会“关于解决同盟军问题的办法”。这时，冯玉祥对俄援还没有死心，拒绝中央提出的办法。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发表时局通电，申明政府“全力谋国内和平，国际安定，清除匪祸”的立场，向冯提出了“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使察省脱离中央、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煽动赤祸”等四项原则，以及“同盟军大部解散，少部收编，对坚持不肯收编或解散的，则以武力解决”的收编方案。同时，国民政府调集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征等部十五万大军逼近张家口表明武力平叛决心，并实施分化策略，派人说服察盟军各部归顺中央。西北军旧部，东北义勇军，热河军等加入叛乱原是为军饷，见冯玉祥支付承诺的军饷，纷纷弃冯，表示归顺中央。

与1929年一样，冯玉祥图谋通过举兵造反获得斯大林扶植的算盘再次打错了。北伐战争前，苏俄的中国政策目标是推翻北洋政府。为此目的，苏俄以巨额金钱、军火扶植冯玉祥作为推翻北洋政府的工具。而此时，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目标是引爆中日战争，瓦解日军北攻苏联的计划。为此目标，他暂时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推动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本开战。冯玉祥的反蒋叛乱完全不合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另外，斯大林扶植冯玉祥壮大后落得冯加入清共的结果，极为厌恶倒戈将军冯玉祥，怎么可能让冯再骗一次。斯大林通过中共向冯传话：不会向察盟军提供援助，要求冯服从中央，一致抗日。斯大林的表态让冯玉祥感到叛乱的失败前景。还有一个因素让冯玉祥感到失败前景，那就是他感到在互相利用的游戏中不是中共的对手。在进攻多伦之前，冯得到密报说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在察哈尔的中共前委，准备将察盟军改造成为红军，拉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建立新苏区。攻占多伦后，他再获悉，中共指示察哈尔前委，要

求把组建起来的察盟军拉走。事实确实如此，中共吸取几年前的教训，一再指示察哈尔前委要警惕冯玉祥再次叛变，要求仅与冯玉祥保持“非正式关系”，准备时机成熟时将冯的军队“拉出去”。在获俄援无望，部将纷纷倒向中央或中共，李守信所部满洲军逼近多伦的形势下，冯玉祥承认造反失败，于8月2日发表声明称无意内战。8月3日，何应钦发表谈话，敦促冯取消察盟军，部队北撤，让出张垣、宣化，由佟麟阁维持治安至宋哲元率部回任。得知部下佟麟阁已服从中央，准备迎接宋哲元回察哈尔后，冯玉祥于8月5日通电宣布取消察盟军，迎佟麟阁接管张家口，迎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再次声称赴泰山隐居读书。随着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察盟军将领大部分接受政府收编或遣散，少部分作回土匪。

察盟叛军中的方振武部和吉鸿昌部在中共承诺俄援和南方胡汉民承诺起兵配合及提供军费的诱惑下拒绝政府收编，打出“抗日讨贼军”旗号继续与政府军对抗，并暗中要求胡汉民在南方火速起兵以对国民政府南北夹击。胡回复电称积极筹款，准备汇出。^[16] 8月24日，中共前委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了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人为常委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率“讨贼军”经商都、呼和浩特再南下蔚县，实施到冀南建立新苏区的预定计划。与冯玉祥一样，方振武、吉鸿昌打抗日旗号也是叛乱借口。他们完全没有打算对日军作战，而是以“八月十五打到北平吃月饼”为口号，计划南下去攻占国民政府治下的北平，企图模仿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9月21日，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讨贼军”南下到密云、怀柔，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一方面威胁北平的安全，另一方面以违反《塘沽协定》的行动为日军送上了进一步南侵的借口。日本飞机投出传单，警告“讨贼军”三日之内离开《塘沽协定》规定的非军事区范围，否则消灭。被日军警告后，方、吉不是按照旗号去对日作战，而是率军仓皇南逃。10月，国民政府调集晋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在昌平小汤山

地区将“讨贼军”击溃。“讨贼军”在政府围剿中内部哗变，中共前书记柯庆施以赴北平汇报工作为由逃走，吉鸿昌、方振武在穷途末路的形势下宣布投降，接受国民政府收编。至此，冯玉祥趁国难发动的察哈尔武装叛乱被政府军平定。

收编叛军的商震网开一面，放方、吉二人逃走。二人逃走后继续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方振武逃到香港后向胡汉民提出了在黄河、长江流域再发动叛乱的计划；[17] 吉鸿昌逃到天津后继续谋划叛乱，与中共党员南汉宸一起制定了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名义起兵的计划。1934年11月，法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吉鸿昌，将其引渡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以颠覆罪将吉鸿昌处决于北平天桥。刑前，吉鸿昌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的诗句为自己的叛乱颠覆活动作最后开脱。多年后，中共通过出版物、电影将吉鸿昌宣传成了抗日英雄。而历史事实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讨贼军”从未与日军作战，察盟军敢于进攻多伦是因为那里没有日军，方、吉计划攻占北平也是因为那里没有日军，在日军动武警告面前，“抗日讨贼军”不敢奋起抗日，而要南下向国民政府管治区进攻，谋发动另一次“北京政变”。国民政府果断平叛，消灭所谓讨贼军是正义、卫国之举。

冯玉祥叛乱被平定后，中共中央指责总前委在事件中没有很好利用局势，在事件后没有及时和冯玉祥决裂，将原中共张家口特委成员及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往张家口的主要干部撤职或降级。1935年春，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中共党员宣侠父的撮合下又拼凑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继续打着抗日和反蒋旗号从事叛乱活动。

《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与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斋藤内阁上台，反对关东军武力向华北扩张的广田弘毅接替鼓吹“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任外相。上任后，广田提出“日本应促进中满关系之改善，以宽大之态度对待中方之要求，向中方表示日本

对中国本土无任何野心”。在 1933 年 10 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推出了“协和外交”举措，其中包括改善对华关系及日军止步华北。在广田推动下，关内外恢复了通车、通邮和区间贸易，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日本驻华军方对广田外相推行的“协和外交”政策不满，在 1934 年相继制造了为向华北扩张制造借口的两次“张北事件”和“察东事件”。华北暂时的安定局面对国民政府极为重要。蒋介石得以暂时摆脱两面作战之苦，腾出手来应付红军的威胁。

1935 年 5 月，《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主笔白逾桓相继在天津日租界被枪杀，打“义勇军”旗号的民团武装孙永勤部与东北义勇军、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军”一样，从热河南下到《塘沽协定》规定的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不是对日作战，而是要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割据地盘。关东军以上述三事件为借口指责国民政府破坏《塘沽协定》，派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指责两刺案系国民党支持的排日行动一部分。交涉的同时，日军越过长城南下，是为“河北事件”。

6 月，酒井隆向国民政府华北最高负责人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其中要求国民政府取缔排日活动，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部撤出华北，以及罢免对日本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推迟对日开战的大局，国民政府命政府军配合关东军消灭孙部武装，不给日军开战的借口，并决定接受日方备忘录中的要求。6 月底，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华北日方代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秘密签署了协定（《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7 月初，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后被宣传为正式的《何梅协定》。秦土、何梅两协定的要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事件有关的负责人；取消察省、河北省和平津的国民党机关；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国军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

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反日活动等。

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本华北驻屯军把《塘沽协定》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取得了察哈尔省的实际控制权，迫使中国政府承诺撤换反日官员、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国民党机构），及承认日本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特权。根据两协定，宋哲元部，赵登禹所率一三二师撤到长城以南，驻冀察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国民党省市党部、宪兵、蓝衣社等均先后由平津撤出。对于日军在华北的扩张行动，蒋介石慨叹：“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18] 他指示何应钦：“日本得寸进尺，漫无止境，最后之决心不可不有，以防万一”，命河南省主席刘峙加紧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和实施洛阳防御计划。[19]

9月，接替梅津美治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提出建立冀、察、晋、绥、鲁五省“亲日、反苏、防止赤化的联合自治体”，实际要求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同月，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推动“华北自治运动”，相继拉拢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前风云人物出任“华北自治”领袖。拉拢段、吴、孙失败后，土肥原拟订计划：“第一步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掌握其中一人领衔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20] 他认为，宋哲元长期受中央军排挤，渴望自己的地盘，会乐于在日军支持下在华北独立。

华北驻屯军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之举破坏了广田的“协和外交”政策。10月，广田外相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正式提出了《日本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案（广田三原则），其要点为：一、中国须停止排斥日货以及排日教育，如中国阳与日本亲善，阴结欧美与日为仇，则无亲善之可能；二、日本认为惟有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方能使日本相信中国确有对日亲善

之诚意，中国方面或有种种关系，不能即行承认之苦，然无论如何，满洲国事实的存在，中国必须加以尊重，并须设法使满洲国与其接壤华北之地区，保持文化的经济的密切联络；三、赤化势力泛滥乃日满中三国之共同威胁，赤化运动发源于某国，故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赤之必要。对于日本政府提出的“联合防赤对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指出：“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21] 为尽量延迟对日开战，国民政府采取了拖字诀——既不拒绝也不接受。

日军少壮派对日本政府谋求与中国政府亲善的政策强烈不满，称“广田三原则”为“水鸟外交”。在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奉广田外相之命与国民政府代表展开谈判期间，日军不理睬内阁的政策，制造了“香河事件”，策动冀东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亲日派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散发要求自治的传单，并自行成立临时维持会。日本政府向军方立场靠拢，在谈判中增加了撤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和解除北平市长职务的要求，图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对华北的控制。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联手要求消除内斗，促反蒋派们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蒋介石亲赴山西邀阎锡山，再电邀叛乱失败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请二人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11月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全会电促两广中央委员来京出席，组织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开幕式上，对推迟全面战争贡献最大的汪精卫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行刺，身负重伤。

在日军的压迫面前，唱高调的中国主战派既无风险又可博得爱国美名，国民政府在主战派的骂声中忍辱妥协，与日本周旋尽量地推迟开战。当时，日军到底是北进苏联还是南侵中国并不确定，蒋介石、汪精卫选择对日本妥协，推迟开战无疑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明智之举。政府不可能像那些“新清流”一样不负责任地推动立即开战。蒋介石安排自己负责剿共，推汪精卫主持外交。从长城抗战到华北事变，汪精卫在第一线主持妥协，背负骂名，终

致遇刺。一个月后，参与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寓所被暗杀。中、日两国一样，谋和的道路极为凶险，主和派须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汪精卫在遇刺后为凶手求情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政坛中，敢说“平生无私仇”者，除了汪精卫找不出几个人。汪精卫淡泊名利，清廉自持，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作风无可挑剔，在政界声望崇高。辛亥革命后，他履行“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结婚赴法国求学。“九一八”事变后，他不计较个人荣辱毁誉出面主持对日妥协，与国民党内众多一面唱抗战爱国高调，一面暗中寻求日本援助的反蒋派们形成鲜明对照。刺汪案背后迷雾重重。一说背后主使人是李济琛、陈铭枢指派的刺客王亚樵，一说是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等四青年所策划。汪无私仇，刺汪应是政治谋杀。从涉嫌刺汪的华克之（张建良）事后逃到延安，莫斯科最怕中国对日妥协周旋推迟全面战争的情况看，刺汪案应与莫斯科的意愿相关。被刺后，汪精卫接受了两次手术，一颗子弹无法取出，再也不可能恢复健康。

11月11日，土肥原代表日方向宋哲元发出通牒，限宋在九日内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出兵河北。11月12日，国民党在华北危急的背景下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当天，宋哲元在日军攻打平、津、察的威胁下被迫发表了“自治通电”。13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在日军的压力下通电响应宋哲元。宋、韩的自治通电震动了全国，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蒙上阴影。回应宋、韩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任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在华北走向分离的形势下，蒋介石与东京参谋本部作出了同样的估计——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蒋还认为，日本会先动手，日本“北进”开战之日即

是华北安定之时。基于这样的判断，他在五大上的对外关系报告中说：“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小不忍则乱大谋”，“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22] 蒋介石还发表了支持汪精卫政策的声明，表明华北的对日政策是他和汪精卫共同负责的。国民党众高层们均非常清楚，尽量推迟对日全面开战的外交政策是国民政府的明智之举，而从长城抗战到华北事变中开创国民党团结的五大（五全）的局面，没有汪精卫出面背骂名背到遇刺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有少数清流唱高调，不过在日军逼近平津的背景下，多数人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汪精卫执行的外交政策。大会在汪遇刺缺席的情况下，全会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会主席。会后，蒋介石捐弃前嫌，委任反对派领袖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总长（杨杰为副参谋总长）。

汪精卫赴欧疗伤（直到西安事变后再次响应国民政府召唤回国复职），蒋介石只好亲自主持对日妥协。11月20日，他向有吉明大使表示：“率直言之，予对三原则，全然同意，无何等对策，甚望及早商谈具体实施方法，但华北发生事故，则必至陷于无可商谈之结果，望日本慎加考虑。”他以赞成三原则的空洞表态谋求华北的安定，要求日本政府制止日军分离华北的行动。宋哲元、韩复榘部分满足日军要求的“自治通电”令日军一时难以确定通牒算是被接受了还是被拒绝了。这时，日本内阁顾虑挑起对华战争将导致与美英对抗，下令中国的驻屯军停止实施分离华北的行动。华北日军在内阁和元老们压力下搁置了军事行动计划。土肥原转而策动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脱离国民政府。

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军策动下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区域，包括通县、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芦龙、宝坻、宁河、昌平、香河、三河、顺义、平谷、兴隆等二十二县和延庆、龙门、赤城、塘沽、大沽等地。宣言列举了南京政府使共产主义蔓延中国的“六大罪状”。实际上，自《塘沽协定》后，冀东各县已为日军控制，殷汝耕宣布冀东自治与否都一样。对于冀东自治政府的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于26日宣布不予承认，及通缉殷汝耕。

在成功策动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及以自己为顾问，宋为傀儡领袖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这时，日军陈兵山海关，海军集结青岛，逼宋哲元宣布华北独立，国民政府则要求宋忍辱负重对日周旋，维持华北现状，谓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在不甘作傀儡又不得不妥协的困境中，宋哲元与何应钦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仅在名义上保持国民政府主权，实际实行自治的特殊华北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部分地满足日方的要求。政务委员会的半独立模式源于日本在讨袁战争中策动西南独立的西南军务院。其内容是地方割据，只在名义服从中央。东北易帜后，南京中央政府在军事上暂无力消灭割据势力的情况下，与原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达成妥协，先后批准了半独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西南政务委员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默认各政务委员会只在名义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独立自主，军队不受中央调遣。此时在日军压迫，华北危急的局面下，政务委员会成为最大限度地对日妥协，推迟全面战争爆发的无奈之计。蒋介石顶着国人抗议浪潮和舆论的压力批准了在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的办法。

12月中，华北当局宣布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以日方土肥原为顾问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会的十六名委员中包括日方推荐的万福麟、王揖

唐、王克敏、秦德纯、张自忠、石友三等人。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军强硬派认为政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搪塞之策，日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日军强硬派所言不错。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都是停战协定性质的临时约定，并非两国的正式条约。国民政府以这种临时停战协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设计确实是对日军强硬派的搪塞之策，同时也符合国家利益，推迟全面战争的明智之策。

从《塘沽协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军在华北扩张的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事变中，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基于日苏将有一战的判断对日尽量周旋，推迟对日开战。蒋、汪的判断不错。日军内部“北进”攻苏与“南侵”侵华之争在升级。1934年初，力主进攻苏联的荒木贞夫因主张遭内阁否决被迫辞去陆军大臣职。支持“皇道派”的大批中下级军官对北进攻苏的主张屡屡受阻而强烈不满。1935年中，主张南侵的“统制派”骨干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大臣林銑十郎的支持下在日军内进行大规模人事变动，将陆军省次官柳川平助在内的一批“皇道派”军官调职，迫使皇道派第二号人物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辞职。皇道派对此不满，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永田铁山的办公室，用战刀将永田劈死。可见两派冲突之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汪精卫认为在妥协中等到日苏开战将是国民政府政策的最大胜利，决定在不割让领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妥协。国民政府推迟战争的政策奏效，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后来长期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应当说，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中的应对无误，符合国家的利益。

第 27 章 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

共产国际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决定以引爆中日战争的办法化解日军攻苏威胁。据此决定，共产国际策动了中日淞沪战事，成功让日军不得不搁置攻苏计划。淞沪战事期间，蒋介石、汪精卫联手限制战事扩大，通过和谈达成停战，挫败了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同时也帮助国民政府暂时摆脱两面作战困境，得以应付红军进攻的心腹之患。1933年，希特勒上台备战，让斯大林感到了德、日联手反共的恐惧。应对德、日两面夹攻战略威胁，斯大林作重大政策调整，放弃在各国策动暴动的世界革命战略，决定苏联加入国际联盟担任常任理事国，与西方世界改善关系，设法将德国法西斯进攻方向引向西方，设法将日本法西斯的进攻矛头引向中国，指示共产国际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及加大力度推动中日全面开战。

1933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传达苏共政治局的政策转变，命令各国共产党停止暴动，转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其中特别要求中国共产党推动中日开战。根据共产国际指令，宋庆龄、何香凝、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华组织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无数抗日救亡组织。这些组织与中东铁路战争后成立的各地“反帝大同盟”、淞沪战事期间成立的“中国反帝大同盟”、“拥苏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等基本是一伙人马，都是以俄党为骨干，共产国际在华共产国际召集成立，由苏俄金钱资助，接受共产国际制定宗旨口号，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国人不知，救亡组织的抗日口号与中东铁路战争时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一样，服务是苏俄安全利益，而非中国利益。抗日救亡口号打动了

无数国人，使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遇到极大的道义障碍。谓救亡组织与“反帝大同盟”、“拥苏大同盟”等俄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只促政府停止剿共，却没有一个组织敦促中共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宗旨。例如，宋庆龄出面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全国人民名义推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在其中要求停止剿共，全面对日宣战，没收日本在华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要求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取代国民政府等等，但没有要求中共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不了解上述组织和口号的苏俄属性，以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时尚。

青年学生们不知道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备战举措，不知道国民政府对日交涉之艰难，不知道国民政府设计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对日周旋的苦衷，无知青年们很容易接受救亡口号煽动，去指责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后不久，华北自治区内两位著名报人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日军指责国民党政府违背了《何梅协定》，集结主力于山海关一线，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取缔反日活动。两暗杀事件摧毁了国民政府艰难达成的妥协局面。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基本政策是通过妥协推迟战争，希望维护华北的安定局面不可能制造刺案给日军送上南下借口，而致力推动中日早日开战的中共在日租界制造刺案是顺理成章的设计。青年们不知道，华北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汪精卫在与斯大林斗法：蒋、汪尽力推迟中日开战，等待日苏开战，日本军界北攻苏联一派的意见得到越来越多军官的支持，而斯大林以推动中日开战保苏联、苏共的安全，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救亡运动的不是要救中国，而是救苏联，将战火早日引入中国，使日本关东军进攻苏联的计划流产。

一二九学生运动

共产国际导演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主要作品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根据共产国际推动中日开战的指示，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成立了彭涛为首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周小舟为首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

在北平各大中学校建立起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联合会”等推动中日开战的外围组织。得到国民政府拟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刘少奇指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北平工委）和中共河北省委将学生示威游行升级，开展罢课请愿。随后，华北中共通过北平学生联合会和在北京各大学中的所谓救亡组织召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国军二十九军根据《秦土协定》南撤。

1935年9月18日，共产国际领导旗下的中国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了“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口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开战。12月9日，黄敬（俞启威）、姚依林、郭明秋等中共地下党员率北平各大中学数千学生示威游行至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了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剿共、对日开战及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请愿书。华北当局在高喊爱国口号的示威面前学生面前左右为难：为推迟开战，需要履行对日方作出的取缔反日示威承诺，但又不能武力对付学生。当局只好派军警分驻各大学校门阻止学生出校游行示威，同时严令军警禁止对学生动武。军警们办法是以不上子弹的空枪，木枪、水龙吓唬、驱赶学生。在学生背后操纵请愿的华北中共知道军警不敢镇压，指挥学生挑战军警，如同制造“八一三惨案”时一样，安排地下党骨干混在示威学生乘乱袭击军警，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尽管军警严守不许动武的命令，避免了流血冲突，中共仍然惯用套路将事件升级，展开舆论战、宣传战。共产国际属下的各路人马同时行动：中共北平工委发出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将学生挑战军警中双方皮肉轻伤大力渲染，发动北平学生总罢课，以“军警血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题目，号召全国学生掀起反政府浪潮，提出另组“工农学兵国防政府”；中共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党组织同时行动，组织当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组织青年上街示威请愿；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国际资助的刊物大力宣传“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学生”，掀起了指责政府卖国投降、镇压学生的舆论浪潮；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的救亡组织召集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 283 位共

产国际标签的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各地救国团体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立即对日宣战。一时，谴责政府对日妥协，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开战的浪潮席卷全国。

国民政府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清楚，立即对日开战不利于中国，而只能让苏联满意。如果没有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忍辱负重，背负骂名，努力推迟战争赢得几年备战时间，如果按照苏共、中共和那些唱高调的“救亡”团体的要求，将长城抗战立即升级为全面对日开战，中国不但不能坚持长期抗战，政府还会被中共迅速推翻。在中共掀起的对日开战宣传运动中，《大公报》发表独立社评指出：“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1] 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看清了促中日开战运动的祸国实质。胡适在其《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中明确主张停战谋和，直言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他更不怕挨骂地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他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胡适因此见解被共产国际操纵的刊物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回应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一二九学生示威运动后，北平六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了《告同学书》，反对青年学生被利用为政治斗争工具，要求学生专注于学业。12月14日，

北平市长秦德纯邀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茶话会，面劝学生即日复课，勿作轨外行动，顾及华北现在环境，勿因言语引起对外纠纷，希望学生理解政府的苦衷。15日北平市政府与各大学当局宣布，自16日起学生一律上课，如有违反，严惩不贷。然而，大学校长的劝告、北平市长的劝告，北平市政府的禁令，大学当局的禁令等等都不敌中共北平工委的幕后策动，不敌中共罢工、罢市、罢课的煽动。16日，中共在各大城市同时策动了学生请愿运动，在北平天桥、前门两次召开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开战的万人大会。军警奉命驱散集会，中共工委按预定布署指挥学生与军警搏斗。17日，华北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指出“共党在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声明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18日，受共产国际资助和操纵的全国总工会发表了《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称“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号召举行全国罢工以迫使政府对日宣战。尽管华北当局对学生示威请愿应对的极为克制，禁止武力对付学生，但共产国际和中共散布的屠杀学生之词对各地不明真相的民众极富煽动力。奉共产国际之命，宋庆龄率鲁迅等所谓左翼人士采取行动，通电声援学生，抹黑政府，促中日开战，促政府停止剿共。

12月28日，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宣布在全国的示威浪潮中成立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奉命与日军周旋，作出允许日军随时在河北演习，日本商社在华北投资发展，在政务委员会中任用亲日派等等让步，部分满足了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时拒绝了日本强硬派要求的华北宣布独立。迫于英美等国的外交压力，日本接受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半独立设计。在到七七事变华北沦陷短短的一年半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艰难地与日方交涉周旋，在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方面作出了学生们想象不到的贡献。

谴责政府卖国的示威学生们不知道，苏俄一面策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在积极与日本谈判，准备将中国主权的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这一谈判开始于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2月，苏联与满洲国在东京重开洽售中东铁路的谈判，苏联将索价由原先的6.25亿日元减至2亿日元，满洲国还价1亿日元。1935年1月，苏、满在东京订立了以1.4亿日元总价让售中东铁路的草约。俄、日这一交易证明了张作霖从1920年开始就谴责苏俄帝国主义论断的正确，也证明了张作霖领导的讨赤战争的正义性，证明了苏俄在华发动的北伐战争的祸害性质。于苏、日间的中东铁路交易，国民政府外交部申明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不承认苏满的交易。而中共声明支持苏、日的中东铁路交易。作为苏联的属下，作为俄党，中共从来不具有民族性，如此声明并不奇怪。但从侧面反映出，共产国际、中共推出的救国、救亡、抗日口号只是煽动中国民众反政府，间接保卫苏联安全的一种手段。上街请愿、参加罢课的学生们更不会想到，煽动他们请愿，煽动他们促国民政府对日开战的中共领袖在抗战爆发后禁止共军对日作战，“一二九运动”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后来的八年全面抗战中所作的全部指令都是关于打击政府军的，没有一条是指挥对日作战的，而被学生们骂为卖国的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直到胜利。这些后续事实说明，“促对日开战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学生运动”等运动的实质只是改头换面的“武装保卫苏联”。尽管国民政府在整个华北事变中应对正确，但国民政府时代与十几年前的北洋政府时代一样，斯大林强力主导着中国的走向。不久，斯大林策划了七七事变，成功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使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计划彻底泡汤，国民政府在斗法终究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产国际操纵中国文艺界推出了无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文艺作品，影响了当时的青年纷纷投身救亡运动，投身到了共产国际旗下。建国后，中共推出了以“一二九运动”为题材的电影《青春之歌》，风靡一时。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共地下党员黄敬在运动中攀上电车演说之举在银幕上再现，感动了新中国的一代青年。新中国的青年们更不清楚救

亡运动背后的苏俄操纵，更不清楚“一二九运动”服务苏联利益的真相，全体被“学生爱国，政府卖国”的宣传洗了脑。

瓦窑堡会议

1934年，在苏联出售中东铁路予满洲国的谈判失败，关东军逮捕了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担心关东军北攻苏联，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应对：指示中共、宋庆龄开展促使早日立即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批准红军向西北转移以解除红军对国民政府都城的威胁；指示共产国际在华宣传抗日，营造蒋介石领导抗日的气氛；派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负责落实他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等等。上任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向各国共产党发布指示，要求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关门主义”的态度，建立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建立各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落实斯大林政策调整的重点是中国，主持为中共度身定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有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孔原、林育英（张浩）等中共代表参加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题为《法西斯进攻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中要求中共停止反政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发言响应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的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经斯大林亲自批准，苏共于8月1日将王明的发言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题目在莫斯科发表。这一被宣传为《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文件与长征途中的中共

中央无关，完全是共产国际为苏联安全在莫斯科制定推出的。这一宣言的发布对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很有帮助。首先，它反诠释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受苏联操控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共受苏俄操控，中共的重要文件出自莫斯科的意向。中共的宣言可以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说明了中共的苏俄傀儡性质；第二，它说明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苏俄操控性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莫斯科发动的，是服务苏联的利益，为了苏俄安全考虑；第三，它说明了不久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也是苏俄策动，是莫斯科为其安全所策动。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莫斯科派林育英携带密电码回国向中共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经过蒙古长途跋涉，林育英于 11 月到达陕北。12 月，林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集中共政治局开会，传达莫斯科的政策调整。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等人对莫斯科的转变感到突然。会后，毛泽东在向红军干部所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说法拒绝莫斯科的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致抗日指示，实际拒绝接受“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口号，坚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其中将互相矛盾的莫斯科指示和毛泽东主张混在一起，将“日本帝国主义”与领导全国抗日的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称中共的任务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要求“扩大苏区，扩大百万红军”。

阅中共报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向中共发出了《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指示文件，训斥中共中央违反了斯大林的指示，称中共的“反蒋”宗旨违背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责令中共停止反蒋，“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形势下组织全民抗战为中心任务，所有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个任务”，“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抗战，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归属如何”。毛泽东又不能不执行共产国际命令，于是采取阳奉阴违的应对，在正式文件中删去“反蒋抗日”词句，推出了专为应付莫斯科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在其中改口说“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但在内部以“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两个口号三个神话

1926年，共产国际将远东局迁到了上海。拨款策动暴动和工农运动之外，远东局的一项重要行动是召集大批中国文艺家到旗下，开启了所谓左翼文化、左翼文艺运动。在电影方面，共产国际通过其间谍钱壮飞在北平创办了光华影片公司，派中共党员钱杏邨（阿英）加入了六国影戏营业公司，安排田汉等人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1929年，在苏联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共产国际命令上海文艺界下属加大力度宣传苏联，号召推翻中国政府。根据指示，中共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负责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召集创造社的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杨邨人、沈茜苓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启动了中国左翼电影。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华建立了以宣传苏联，扰乱国民政府后方，煽动颠覆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下属组织——左联。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担心日军北攻苏联，开始促中日开战。据此，共产国际资助中国的左翼文艺家，将明星影片公司转型，抛弃神怪武侠爱情片，以促对日开战为主要宗旨。1933年，中共中央文委成立了由夏衍、钱杏邨、王无尘、石凌鹤、司徒慧敏等人组成了左翼电影领导小组。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左翼文化，左翼电影迅猛发展，“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四家主要电影公司在当年就推出了43部“左翼电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谴责日本侵略东北，而绝口不提苏俄侵略东北。左翼电影当然不能提苏联入侵东北，霸占东北，因为左翼电影的财政资源来自莫斯科，其骨干夏衍、钱杏邨、田汉、阳翰笙听从共产国际指挥。

斯大林作出推动中日开战决定后，共产国际在华资助成立一大批以推动中日全面开战为宗旨所谓救国会组织。其中包括“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上

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文艺家协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新闻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等等。一时，抗日救国宣言铺天盖地。如同当年日本人召集各路会党成立同盟会一样，共产国际召集上海的众多救国会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然后再召集各城市的救国联合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指派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派中共秘密党员钱俊瑞具体打理。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不再需要宣传反政府的左联，决定将左联解散。由莫斯科决定成立，再由莫斯科决定解散的事实说明，左联是苏俄一手扶植建立的工具。同救国会组织也是苏俄一手扶植建立的工具。这些俄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由莫斯科提供经费，由莫斯科指定代理人，由中共秘密党员牵头。

救国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文化界救国会。1935年12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召集界275位中国文艺家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推出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文化界救国会的最主要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牵头的文艺家协会，其成员包括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洪深、郑伯奇、欧阳予倩、郑振铎、谢冰心、白薇、臧克家、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宋云彬、李健吾、周立波、沙汀、艾芜、叶紫、任白戈等作家。根据《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领导”、“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等口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了“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

上海文艺界的国防口号不获延安认可。毛泽东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拒绝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不知道延安坚持反蒋方针，积极推销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和国防文学的口号。让他头疼的是，“左联”的招牌人物鲁迅反对解散“左联”，拒绝签署“文艺家协会”宣言，与胡风、徐行等文艺家一起提出坚持反政府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

号，抵制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延安派来冯雪峰传达的是与“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完全冲突的“反蒋抗日”方针，并且冯表态支持鲁迅、胡风等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如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在上海文艺界表现为了“两个口号”之争：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人主张“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应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以国防为创作主题”；鲁迅、胡风则坚持“左联”不能解散，要求文艺界在国难当头时开展反政府的阶级斗争。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作家徐懋庸致信鲁迅指出：“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与冯雪峰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将晚辈徐懋庸的私人商榷信件公开发表，斥徐“向国民政府投降”，骂宣传“国防文学”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等中共文艺家为“四条汉子”、“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的发难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以称赞鲁迅的方式抵制莫斯科推动的“国防”口号。奉命推销“国防文学”口号的中共文艺大员周扬感到无所适从，特地到延安就“两个口号”之争请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不敢明确否定共产国际的指示，以“真理越争越明”的说法不置可否。周扬这才明白原来毛泽东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于是赶紧向毛承认错误。奉命支持鲁迅的冯雪峰因得不到延安的明确表态支持而无所适从，索性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冯因此得罪了毛泽东，在二十年后被毛整肃）。

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虽未被中共中央认可，但在共产国际与王明指挥之下，全国文艺家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掀起了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作品大量出台，《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夜奔》、《青年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风云儿女》等一大批抗日救亡主题的电影、戏剧强烈影响了一代青年。

文艺家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两个口号”之争根本无所谓是非。两口号背后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斗法。斯大林要求中共与中国人民为苏联的安全对日开战，间接保卫苏联；毛泽东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既不想保卫祖国，也不想保卫苏联，认为日本人打进中国是好事，有利于中共发展，有利于中共在“日蒋两败俱伤”后夺取全国政权。由于毛泽东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不置可否，这一争论成为中共所写革命史的长期悬案。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开始正式否定“国防文学”口号。文革中，毛泽东批准将“国防文学”口号定性为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投降主义口号”，将被鲁迅咒骂的周扬等“四条汉子”逐一整肃。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外，共产国际与中共联手营造了影响了几代青年，影响持续至今三个神话。神话之一——鲁迅。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时成绩不好。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特别关照来到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他解释说：“我小的时候，曾跟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总是很尊敬，同时也觉得应该高看那一国的人，或许这就是周君感到特别亲切和值得感谢的原因吧。”在藤野的帮助下，鲁迅两次学期考试都勉强得到了 60 分。于是该校中有传言说藤野偏袒鲁迅，泄露了考题。学期末，鲁迅的学年成绩是 58 分，其中解剖学是 59.3 分，均不及格。学医之路受阻，鲁迅另谋出路。回国后，鲁迅弃医从文。他在《〈呐喊〉自序》写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

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里，鲁迅所言不实。他多次谈到在仙台的教学用电影。但日本仙台医专的后身——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等一批师生调查结果是，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没有电影放映设施，仅有的关于日俄战争幻灯片中并无鲁迅所说的关于中国人的镜头，并且鲁迅所说的关于藤野先生与“讲义风波”也与事实不符。鲁迅青年学子首要是谋进身之路。孙中山从医之路不通，于是投书李鸿章打算作幕僚，投书之路再不通，于是投身会党，决心造反。历史上秀才变身造反领袖的历程大都如此。现代革命家们在崛起后都会编造个为了救国救民的故事。鲁迅被糟糕的成绩的老师偏袒传言刺伤自尊，学医之路不通，于是弃医从文，并编造出了电影事件或幻灯事件，声称自己的选择是“以期唤国人实现强国强种的第一要务”。

回国从文后，鲁迅在文章作品中宣扬日本流行的“支那观”、“中国印象”、“中国国民性”、“支那特质”，抨击中国人自私，懦弱，猥琐，残忍，愚昧，将中国人描写成是黑暗“铁屋子”中“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一群神经病人，是“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癆的”愚昧之众，只配被“砍头示众”，称“我向来不惮于用最险恶的用心揣度中国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最多不过是奴隶”。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堕落，中国文化、中医药等等一无是处。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成名作中，他通过精神病患者的妄语表达对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全面否定，称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从中国的书缝里看到的是“吃人”二字，称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称“中文不灭，国无希望”，称“凡有来到中国的，尚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鲁迅不爱中国人民，笔下没有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人形象，要说有可亲可敬的形象，那就要数日本人“藤野先生”了。

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鲁迅没有谴责过日本，在中苏满洲开战时，他没有谴责过苏联，在中国知识界都了解了苏俄国内大规模流放、屠

杀富农，造成饿死千万人大饥荒事实时，他歌颂交战敌国苏联为“曙光”。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没有只字谴责日寇入侵，没有只字提到保卫祖国。相反，以“阿二”为笔名发表了《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歌谣，极力挖苦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外强入侵危机的努力。事变爆发后，分裂的国民政府宁粤双方均认为在国难时应当停止内斗，粤方停止进兵，蒋介石主动下野换取结束内斗。在日军占领锦州，占领东北全境的国难背景下，宁粤双方达成妥协，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了宁粤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在政府召开系列会议争取各派系尽力暂停内斗应对国难之时，鲁迅写打油诗讽刺道：“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淞沪抗战中，鲁迅举家躲进特高科特务内山完造的联络站书店，写着骂中国政府的文章，写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还有兴致招妓。[2] 他知道内山是日本间谍，[3] 但不隐讳与内山的深厚关系。孙中山受日本人长期扶植，日本友人众多。鲁迅也一样，受内山完造等人多次邀请去日本访问、疗养，另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松本重治等一众日本友人，其中不乏特殊背景者。在国难当头时，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学界精英捐资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在“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专栏中敦促政府早作战略应对，为政府准备抗战献计献策，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曾昭伦、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昌祚等一大批知精英响应国家召唤，出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自愿接受低薪为国效力。而这时的鲁迅住在上海日租界，忙于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忙于在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为日本人增田涉辅导，请日本人内山嘉

吉教木刻等活动。他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宴会，席中友人全是日本人。他不光混迹于日本人中，更在治外法权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咒骂中国政府，同时称自己所享受的出版言论自由为“伪自由”，将自己的 一本骂政府的文集命名“伪自由书”。从仙台医校辍学后滞留东京几年，无业的鲁迅却过着富裕生活，雇用日本女佣，还能资助二弟留学。有研究者怀疑，这期间鲁迅受雇于特高科刺探留学生动向，他离日回国可能带有特高科的使命。国人不知道，鲁迅通过日本同文书局大量出版谩骂、讽刺政府的文字的同时收取着丰厚稿酬。

《社会新闻》刊文谴责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作汉奸”，[4] 学者陈源直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陈言没有错，鲁迅不爱中国，爱日本，晚年在日租界一住就是九年，一直住到去世。

与孙中山一样，鲁迅也是周旋于日、苏两宿敌之间。共产国际认为坚持反政府及大力歌颂苏联的鲁迅有利用价值，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左尔格到华后立即联络了鲁迅，为鲁操办了五十寿筵，将鲁发展成了共产国际的“马前卒”，拉拢鲁加入了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在沪别动队。共产国际将鲁迅树立为左联招牌人物和反政府的左派作家旗帜。鲁迅没有辜负共产国的期望，加入左联后著文骂政府，骂章士钊、骂杨荫榆、骂胡适、骂梁实秋、骂林语堂、骂徐志摩、骂陈源、骂李四光，遍骂爱国名人，同时大力讴歌苏联。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抗战，他没有为中国军人的牺牲动情，唯为俄党动情，以“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诗句哭共产国际特务，人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杨杏佛，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哭在中苏战争中讴歌敌国苏俄，号召颠覆中国政府的柔石等作家。毛泽东后来称赞鲁迅骂政府的精神为“骨头最硬”。其实，鲁迅不是骨头硬，而身在日租界，又得共产国际扶植，腰杆子硬。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共事的文人、骂政府、骂青年，唯独没有骂过二十世纪侵略和压迫中国最甚的日、苏。他与孙中山一样，先亲日，收受日元，后亲苏，收受卢布。孙中山收受无数日元后投靠苏俄引起日人痛恨，鲁迅也一样。鲁迅去世前曾急着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去世前两天曾造访两位日本人，去世时只有日本医生须藤在场。鲁

弟周建人和鲁妻许广平曾说，须藤医鲁犯了与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符的错误，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其子周海婴认为，鲁迅可能死于日本间谍之手。[10] 由爱日本转去爱苏俄，死于日本人手不奇怪。

1935年，共产国际转向，为中共和国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拥护政府，将可能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感到坚持反政府，反对解散左联，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鲁迅不再好用。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投身“一二·九”运动，多年后为《周海婴回忆录》作序的王元化坦言：“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在日、苏这对宿敌之间玩脚踩两只船是危险的。孙中山长袖善舞，最后落得两边不讨好，临终时成为苏俄顾问监控对象，丧失自由；鲁迅晚年同时利用两边，自以为得计，死于两强之中谁手都有可能。共产国际对利用对象策略通常是抛弃之前最后再利用一把，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去世后，共产国际的反应过于快速，系列行动一个紧接一个，让人相信怀疑是预先安排好的：鲁迅病逝当天，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亲赴中央研究院与蔡元培商议治丧，在当天的上海《大晚报》发表了《鲁迅先生讣告》，宣布有毛泽东、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等俄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中共地下党迅速组织了大批学生为鲁迅送葬，[11] 共产国际各路人马将鲁迅治丧办成了向国民政府作政治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剿共的示威运动；共产国际属下的上海救国会等组织为鲁操办了隆重葬礼，盖上了“民族魂”旗帜以表彰他配合共产国际反北洋政府，反国民政府，及积极拥苏的表现；仅仅几个月后，共产国际的另一马前卒蔡元培和共谍邵力子推出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俄党人权同盟成员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题字，宋庆龄与蔡一起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在其中宣称：“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共产国际神化鲁迅的组合动作如此迅速，让人怀疑鲁的死因。

毛泽东喜欢鲁迅，通过赞扬鲁迅间接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防”口号。抗战期间，毛泽东决定以鲁迅的名字命名延安的艺术学校，将鲁迅越捧越高，赞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经共产国际和毛泽东联手，鲁迅被推崇成了中国民族英雄，尽管生活在日、苏欺凌中国时代的鲁迅毕生颂扬日、苏并咒骂中国人和维护主权的中国历届政府。鲁迅受到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吹捧不只因为他反政府，还因为他与共产革命领袖们有众多相通之处。其一，他们都崇尚毁灭与死亡。鲁迅内心灰暗，称“死亡有大快乐”，[5] 将中国看作是“黑暗的铁屋子”。他歌颂苏联“把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6] 称“中国未来，会出现沙漠……如果中国人再不死一些，和平不会到来吧？变成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吧”，[7] 这种想法正与毛泽东相通。人们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看到破坏，看不到建设，看到毁灭，看不到改良和进步；其二，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有恨无爱，不爱任何人，将民众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蝼蚁。鲁迅与琴姑有过一段初恋，娶朱安后，琴姑一病不起，凄凉去世。鲁在后来的岁月和文字中没有再提及这段恋情。1906年，鲁迅奉母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朱安（1879——1947）结婚。婚后四天，鲁迅东渡日本。此后，朱安长期独守空房，伺候娘娘(绍兴话婆婆)，但没有换回鲁迅的爱，甚至同情，得到的是“内心十分痛苦，感情上十分孤独的”一生。1927年，鲁迅与北京女子师范兼课时的学生许广平同居，抛弃了为他牺牲青春的发妻朱安。同居之后，鲁对许冷淡，再没有像陪她看电影散步。鲁会友聊到半夜不许许睡，要求许在旁侍候，不准插话，为客人斟茶倒水，准备饭菜。有朋友看不过去，劝鲁迅对许广平好些，鲁一笑置之。在许之后，鲁迅与才女萧红交往火热，许广平对常去鲁迅住所的萧红颇为不满，鲁袒护萧，训许不要胡闹不懂事。鲁迅和北大校花马瑀也曾有过一段感情，《鲁迅日记》中有部分缺失，是鲁迅自己销毁还是被人藏匿不得而知。有猜测说，失踪部分记述了鲁迅鲜

为人知的恋情。鲁迅不仅对身边的女人没有真爱，或恻隐之心，甚至对母亲前来同住都感到厌烦。鲁迅兄弟反目的原因外人不得而知。令人信服的解释是，鲁迅对弟媳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在个人生活中，鲁迅对琴姑、朱安、许广来，马克思对燕妮、海伦，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毛泽东对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何其相似。他们不仅对妻子没有爱，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其三，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刻薄，恶毒，没有宽容。鲁迅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痛打落水狗”等论调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专政等论调相通。鲁迅反对人道主义，主张冷酷，称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8] 鲁迅为宣扬革命专政的苏剧《解放了的堂·吉珂德》叫好，欣赏剧中革命者的那句道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了吧？——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9] 他的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的撒旦教毁灭观一致，特别为毛泽东所欣赏；其四，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不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乐于见到自己的国家战败。马克思、列宁声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列宁因声言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战败而被德国选中为扶植对象。在民族危亡，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为政府备战献计献策，为国家民族默默奉献时，鲁迅毫无国家民族观念，撰文赋诗，以“血沃中原”、“刀丛”、“暗夜”等语言咒骂政府，反对国防口号，反对解散左联，坚持颠覆政府的立场。国防口号虽然是共产国际为苏联安全所提出，但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会反对国防口号。而鲁迅坚持在外强入侵时反政府，反对国防。他因这一立场而在死后得毛泽东长期推崇；其五，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喜欢谩骂、挖苦而拒绝心平气和的讨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不讲道理，挖苦、谩骂反对暴力革命的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达六、七十处，骂“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

等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考茨基关于“英美可能和平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的看法完全正确。鲁迅同样不讲道理，谩骂论敌之处俯拾皆是。他与梁实秋对文艺的看法有分歧，不是平和讨论，商榷或论争，而是对梁展开谩骂和人身攻击。谩骂文风是鲁迅获毛泽东推崇的另一重要原因。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在思想专制，文风刻薄，喜欢谩骂方面颇为一致。

作家苏雪林更致信蔡元培抨击神化说：“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莠为熏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已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梁实秋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佾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

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

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12]

鲁迅死后不仅备享共产国际安排的哀荣，还成了中共文艺、文化之神。毛泽东在新中国继续推崇鲁迅。根据毛定下的调子，鲁迅的文章被编入教材，影响了几代青年。在此后的毛泽东时代，谩骂文风长期统治报刊文坛。新中国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胡风，反右文章，《九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文革的“大批判”，“批孔”等运动中的文章都传承着鲁迅与毛泽东共通的专制思想和谩骂文风。文革中，红卫兵有恨无爱，以迫害人为乐。红卫兵和毛泽东都坦言这样作是在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于是，毛泽东时代晚期书店中几乎只剩下毛、鲁的著作。毛泽东赞扬鲁迅，神化鲁迅，但不会容忍治下有鲁迅那样骂政府的作家。多年后，当被问及设若

鲁迅处于反右运动会如何时，毛泽东回答说：“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3]

共产国际在救亡运动中推出的神话之二——东北义勇军。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退入关内，日军在东北增兵后也只有几万人，满洲广大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散兵、土匪纷纷打出“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旗号。各路义勇军并未打算与日军血战，而是相约退入苏联，希望得到苏俄扶植。义勇军没有想到，这时的斯大林正在向日军示弱、讨好日军，因此对跑到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不但没有扶植，反而将他们关押进战俘营服苦役，害得他们大批病饿而亡或精神失常。没有跑到苏联的义勇军残部一部分投奔冯玉祥加入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叛乱，一部分留在东北作回了土匪，还有一部分加入共产国际组织的“东北抗联”。尽管东北义勇军从树旗到逃苏没有像样的对日作战，但这并不影响共产国际领导上海左翼文艺界以其为题材炒作拔高，妙笔生花。于是，义勇军成了共产国际促中日开战的主要宣传题材，被国防文学、国防电影宣传到家喻户晓，编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唱遍全国。

共产国际在救亡运动中推出的神话之之三——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义勇军不管旗号真假总是中国人自发组织的。而抗联与红军、苏区、中华苏维埃一样，是共产国际一手建立。国民党清共后，共产国际不仅创建了华南的鄂豫皖、湘鄂赣、洪湖等几块苏区，还决定在北方也建立苏区，以南北夹击国民政府。但华北地处平原，交通便利，不利于武装割据，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不利于红色割据生存，于是共产国际决定在人烟稀少、森林密布，割据容易立足的满洲建立苏区。为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机关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频繁召集会议部署暴动。然而，东北人民倍受沙俄、苏俄压迫，讨赤领袖张作霖拒绝老窝被赤化。这是张被暗杀的原因之一。易帜后，张学良相信苏俄饥荒虚弱，想出手收回中东铁路，也不容苏俄在满洲策动暴动，派军警突击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了策划暴动的共产党干部，缴获了大量苏联策划满洲和中国各地暴动的机密文件。暴动计划泄露后，中共中

央派刘少奇到奉天任满洲省委书记，继续负责策动满洲暴动。东北人民唾弃在中苏战争中鼓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中共，刘策动暴动受阻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暴动计划。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的几万日军只能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中共中央决定趁东北的广大地区权力真空时机建立东北苏维埃，从关内抽调了冯仲云、周保中、赵一曼、魏拯民为代表一大批干部派到满洲，在满洲建立了磐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饶河游击队。1932年6月，中共上海北方工作会议（满洲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满洲红军发展成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的另一方面军。会后，中共改编满洲游击队为工农红军游击队，在东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杀地主，夺劫财产，同时消灭收编小股义勇军。满洲人民称拥苏的红军游击队为红匪，组织民军自卫，抗击红军游击队的劫掠。东北红军在民军打击下军心涣散，减员严重，难以立足。1933年，斯大林在德、日形成对苏夹攻的形势下改变政策，将其中国政策由暴动推翻国民政府转为宣传抗日。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直接向满洲省委发出了“一二六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停止土地革命，改打抗日旗号，把部队番号由工农红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中共中央转入苏区，满洲省委从此直接听命于共产国际。1936年，共产国际召集中共游击队和各路义勇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作为牵制关东军的工具。其中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其余各军为王德林、李杜、谢文东领导的义勇军。

抗联与左联一样，是苏俄扶植的工具，其宗旨是牵制满洲日军，消除日军北攻苏联威胁，而非保卫中国，其对日作战是苏日作战的一部分，而非中国抗日的一部分。中日全面开战后，共产国际解散了满洲省委，组建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把抗联十一个军重组为三个省委领导的一、二、三路军。日军不容忍满洲有苏联控制的武装，对抗联采取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心、经济封锁等办法，把居民集中起来建大屯以武装把守，严格封锁物资，散发传单，张贴布告，承诺对放下武器的抗联士兵宽大优待，保证生命安全，对

提供抗联情报者重奖。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第二军参谋长林水山、一路军总务处长金光、第三军第七师师长于海云、第四师师长陈云升、第二师师长兰志渊、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第四军第五团参谋长李鹏飞、第四军第四师师长刘振国、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等人先后率部脱离了抗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后，苏共履行条约规定，将抗联调到苏联，与苏俄扶植的朝鲜共军一起改编为苏联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国际旅），任命中、朝俄党周保中、李兆麟、崔庸健、金日成分别担任旅长、政委和营长，将该旅训练成了特种部队。训练内容包括：收发报，照像，测绘、爆破、跳伞、滑雪、游泳、攀岩、爆破等侦察技术。于是，抗联将士们变身为了苏军。

根据斯大林促中日开战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资助的“左翼文化运动”从鼓吹颠覆政府转变为宣传对日作战。在义勇军之外，左翼文学、电影也以东北抗联为宣传题材，不过注意在宣传中隐瞒抗联受苏俄指挥的真相。建国后，中共的宣传重点从东北义勇军转为抗联，加工、编造出众多抗联抗日的故事以作中共领导抗日的证据。

东征抢粮

落脚陕北后，贫穷的陕北供养不起突然到来的数万军队，中共中央和红军陷入了物资供应危机。共产国际只派林育英送来了指示和密电码，没有送来钱粮。193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国民自救救国之道》的广播讲话，号召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同日，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林彪等人在瓦窑堡在开会讨论生存问题。会议决定，复制几年前利用日军在淞沪开战之机打漳州解决生存危机套路，利用日军进逼华北国军无暇西顾之机，到富裕的山西去抢劫物资解决生存危机。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打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旗号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东渡黄河，分三路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由于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三路红军一路席卷晋西、晋南、晋中广大地区。在富裕的汾河流域，红军官兵见到了大群骡马、羊群和从未见过的大宅。有丰富“挖浮财”经验红军将士通过敲打地面声响准确判断出窖藏位置，将山西民间贮藏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全军欢天喜地。抢劫的同时，中共注意宣传，于3月1日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在山西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先锋队布告》，斥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卖国。阎锡山电请蒋介石派兵援晋，蒋介石急派陈诚率中央军三个纵队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助阎剿共，同时命张学良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围歼红军主力于黄河东岸吕梁山区。4月，陈诚、阎锡山合力在同蒲路一线击败了红军。5月初，红军得张学良暗助，带着从山西五十多县掠得的大批金银财宝、粮食、物资，押着近万山西壮丁退回河西。回程中，毛泽东再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称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回到陕北，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高层会议作“东征胜利总结报告”，称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批评林彪在抢粮战役中拒绝中央拨兵补充晋北红十五军团的电令为“本位主义”。会后，毛泽东派周恩来，潘汉年赴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展开停战谈判，将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14]

东征战役是革命兵祸的一个例证，毛泽东在抢粮战役前后所发的抗日通电是革命党没有道德底线一个例证，明明是抢劫钱财粮食物资之战，却通电打出抗日旗号，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妥等等。它告诉人们，一部革命史就是革命军祸害老百姓的历史，就是革命党没有道德底线，编造栽赃的历史。“东征战役”不仅给山西百姓带来兵祸，还摧毁山西自民国以来村治建设的成果，

将山西多年模范省建设积累的财富劫掠而去，证明改良带来富裕，革命带来祸害。

东征抢粮战役中，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被身边的特派员枪杀。紧接着，刘的亲信杨琪、杨森也相继神秘死亡。这让人相信背后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间的山头之争。率中央红军向陕北根据地进发时，毛泽东知道接管陕北地盘将引来山头之争，于是决定利用肃反手段。他先指责陕北根据地领袖刘志丹在领导上不正确，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共北方局派员审查陕北根据地领导层。刘志丹没有抵制，接受了肃反大员的逮捕，自己走进了瓦窑堡班房（今子长县盐务局机关），被戴上了脚镣（后来长期走路困难）。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的另一陕北山头领袖习仲勋后来说：“埋人的土坑已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扮演救星，传令停止捕人杀人，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经过这一关一放，刘志丹等陕北根据地创始人成了无职无权的犯错误者，还要感谢毛泽东，毛顺利接管了陕北根据地，下令新建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派亲信为政委，执掌实权。虽然刘志丹表态服从中央，但毛泽东仍担心陕北山头对中央红军山头的威胁。“东征”中，毛泽东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任命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几天后，刘志丹在被保卫局安排在身边的特派员裴周玉枪杀。几年后，毛泽东感到在陕北站稳脚跟，才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题写了“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的颂词，主持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歌颂刘志丹和及其领导的陕北红军的贡献，决定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周恩来跟随毛泽东，写诗颂扬刘志丹“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两广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两广沿袭了清末以来的呈割据状态，不仅不容中央政府染指，而且随时准备挑战中央政府权威。两广的地方割据与中共的红色割据形成呼应，使国民政府始终处于被推翻的威胁中。将中央红军赶离江

西、湖南后，国民政府加紧修建粤汉铁路为抗战作准备。广东方面想方设法抗拒中央政府势力随铁路进入广东。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变，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配合华北的行动，日军积极与两广联络支持倒蒋。日军的意向与两广反蒋派一拍即合。广东领袖胡汉民、陈济棠邀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商谈合作。土肥原一行抵广州前，西南政务委员会曾专门决议“密饬新闻检查机关，自今日起至日本少将土肥原抵粤之日，凡新闻纸有对于土肥原有任何批评者，一律禁止登载”。[15] 密商中，广东方面承诺取缔抵制日货的机关，日军承诺向广东方面提供贷款，帮助建立“华侨银行”、提供军火助广东起事。与此同时，桂系也秘密接受了日本的军事教官和军火的扶植。

1935年底，蒋介石向广东代表传达了解决桂系武装割据的决心，要求陈济棠配合。陈知道蒋介石解决桂系后的下一个目标将是自己，暗中联络桂系一同对抗中央。1936年1月，元老胡汉民去世，蒋介石趁机向广东提出了取消半独立地位的五条要求，其中包括由南京政府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的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粤系人马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取消粤币，统一使用法币等。陈济棠拒绝中央染指地盘，加紧与桂系商议起事。

1936年2月，红军犯晋抢粮，陈济棠、李宗仁决定趁南京政府调兵北上之机起兵推翻中央政府。配合起兵，李宗仁发表了《焦土抗战论》，以抗战高调寻求各路反蒋派支持，同时通电指责中央政府对日妥协，压制了西南出兵抗日的积极性。按约定，陈济棠通电响应李宗仁，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开战。6月1日，粤、桂方面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冬电”，指责中央政府不对日开战，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纠集三十万大军，配以百架飞机，数十条内河军舰，组成了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的“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打着“北上抗日”旗号进兵湖南，是为“两广事变”。

应对西南叛乱，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通电斥两广以抗日之名破坏统一，图谋颠覆中央政府，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国民党军委会通电命令所有两广军队服从中央军令。承受日军压迫的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等北方军政领袖们虽然也有倒蒋之心，但他们清楚，促政府立即对日宣战是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是破坏抗战大局。因此，他们通电反对两广的军事行动，支持中央政府平定两广事变。北方军政领袖们的立场使两广联合北方反蒋力量推翻中央政府的希望落空。两广叛乱没有得到期望的各地实力派响应，却得到了中共声明支持。远在陕北生存困难的中共无意，也无力策应两广起兵，通电支持两广起兵只是希望两广与中央开战以减轻政府军围剿陕北苏区的压力。

两广叛乱在蒋介石的意料之中。在向广东提出取消半独立地位的五项要求时，蒋介石已经有所部署，暗中策反了陈济棠的部将。几年前，他用收买李济深部将陈济棠，承诺以陈代李的办法搞掉了李。此时，他如法炮制，策反了陈的部将余汉谋，承诺以余代陈。蒋介石能策反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官许愿，而是因为两广借日军在华北压迫发动叛乱不得人心，多数粤军将领也反对趁外患搞内乱。

6月上旬，报界披露了两广低价获得日本军火和桂系大批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的消息，全国各界一致谴责两广勾结敌国叛乱。舆论影响下，主政湖南的何键拒绝桂系的拉拢，表态拥护中央，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表态效忠中央。何表态后，中央军进占衡阳，封锁了粤桂联军的北上道路。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电宣布决议：撤销主持两广的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结束两广的独立状态；撤销陈济棠职务，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立即通电，宣布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率军向广州挺进，同时向陈济棠发出通牒，限陈一日内离开广东，重演了当年陈济棠取代李济深的一幕。紧接着，粤军第二军军长张达通电服从中央，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广东空军全部 72 架飞机

飞离广东，降落南昌机场，投奔国民政府。当蒋介石接见飞行员，颁发承诺收买条件的每机两万元奖金时，黄光锐率全体官兵谢绝奖金，声明投归中央只为报国，不为金钱。得知粤军效忠中央，陈济棠控制的西南机关官员纷纷出逃。7月18日，陈济棠在众叛亲离形势下通电下野，携广东白银储备巨款逃到香港。

广东归顺中央后，蒋介石立即动手定桂，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名升暗降，委任黄绍竑主政广西，意图分化新桂系。然而，李、白、黄拒绝就职。蒋介石调集顾祝同、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广西，命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西进，命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命何键部向湘桂边境进军。桂系在四面包围中没有瓦解，而是紧急扩军，动员地方民团后备兵源二十万，准备据险固守，同时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和顾问以洗刷通日恶名，争取舆论支持。虽然新桂系在与中央的军事对抗中因失去了盟友陈济棠而处于劣势，但其内部团结，蒋介石的收买分化法宝未能奏效。在中央与桂系对峙之时，发动闽变失败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一众反蒋派感到时机来临，积极推动桂系对中央开战，并制造了杀日商事件，企图借日军压迫蒋介石，暴露出他们打抗日旗号制造内乱的面目。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已与中共秘密停战，中央对桂系开战只能让日本人，中共和张、杨获益，决定和平解决事变。8月，蒋桂双方的代表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往来于南宁和广州斡旋妥协。9月中旬，蒋介石亲赴广州与李宗仁会晤，说服桂系在日本大敌当前之下不可再开内战，希望桂系支持中央，并承诺李、白可保留在广西的最高领导权。桂系放弃叛乱，双方达成妥协：南京答应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的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桂系宣布服从中央。谁都知道，李、白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条件只是给自己叛乱失败找台阶下。他们虽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但准备继续留在广西称王。待局势平稳后，蒋介石拒绝了李、白继续留在广西的要求，任他们以中央要职以调虎离山。李、白无奈接

受任命，离桂赴宁。桂系服从中央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一众反蒋派也只得承认制造内乱失败，声称被李宗仁出卖，纷纷逃到香港、海外。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的两广事变“在各界和国民党主要军事将领的一致反对声中被蒋介石以两手策略平定。

通过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国民党中央结束了自讨袁战争以来的两广割据状态，营造了一致对外的局面。政令得以通行两广后，国民党中央公布《国防会议条例》，决定设立领导抗战的国防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国防会议议长，李宗仁等三十人为国防会议委员。根据条例，国防会议不属于政府系统，为国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防决策机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将会议成员范围扩大，包括了中共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后在再将国防会议改称国防最高委员会，负责领导抗战。

随着两广事变平定，八年的陈济棠治粤时代结束。这期间，陈济棠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不遗余力，建树良多，创办了广东省立勳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委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以重任，提供优厚待遇，建成了海珠桥，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及三十多条马路及一批港口、公路和大中小学。经历孙中山在粤多年的祸害后，粤人盛赞陈济棠主政八年为广东的黄金年代。这也证明了陈济棠治粤、阎锡山治晋的地方自治模式最能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富强。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将卷走的巨款和主政时 200 万元购买军火机器的定单归还国民政府用于抗战。

国共谈判

在华北日军步步进逼的形势下，蒋介石与甲午战后的李鸿章一样，想联俄制日。李鸿章联俄制日被证明是引狼入室，不但没减少灾难，反而是将满洲送入了虎口。蒋介石知道淞沪战事系共产党策动，背后是斯大林的意思，

也知道苏联不会为了中国对日开战，但为了被扣为人质的儿子，他还是想尝试联苏。1935年初，他派前侍卫长邓文仪出任驻苏使馆武官，嘱邓了解苏联的态度，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向中共传达了特为中国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放弃反蒋、暴动和建立苏区，服从蒋介石领导，共同抗日。8月，蒋介石同时收到了邓文仪报来的中共《八一宣言》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OLOV）转达斯大林希望与中国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口信。蒋介石知道，要想联苏制日须先与苏共达成关于中共红军的妥协。他指示回国述职的邓文仪立即返回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中共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同时派陈立夫出访欧洲，然后秘密赴苏商谈中苏结盟。回到莫斯科后，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取得了联系，先后与王明的代表潘汉年及王明本人会谈。邓传达国民政府的和谈条件为：取消苏维埃，苏维埃政府人员可以参加南京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开到外蒙。王明表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内，建议两党在国内举行谈判。1936年1月，蒋介石通过鲍格莫洛夫大使回复苏联的结盟邀请，条件是苏联须命令中共放弃武装割据，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鲍格莫洛夫称国共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见苏俄没有诚意，蒋介石电令邓文仪停止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谈判，电令陈立夫放弃秘密前往苏联谈判的计划，同时督促张学良加紧围共。他知道，只有军事围剿才可能促使中共坐下来谈判。

斯大林无意与国民党政府结盟对日，但需要中国帮助挡住日本，因此指示中共与蒋介石和谈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宋庆龄向蒋介石推荐中共特科成员“红色牧师”董健吾向中共传达国民政府愿意和谈的信息。经蒋批准，董乘张学良的飞机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传信。正在山西抢粮的毛泽东提出了“停止内战的五项要求”，交董带回南京。国共两党高层就此接通了中断八年多的联系。

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为代表与陈立夫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展开了谈判。曾转达了国民政府的四项条件：红军主力从山西北上到察绥外蒙边境展开抗日，陕北红军经宁夏北移到外蒙之边境、其它游击队由国军改编。国民政府的这一条件比先前有所退让，放弃了此前提出的取消苏维埃和改编红军的条件。蒋介石希望红军北移，将日军进攻的矛头引向外蒙和苏联。由于毛泽东拒绝接受北调红军的条件，周、曾谈判未获得进展。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说：“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则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16]

8月，潘汉年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国，来到陕北保安，向毛泽东报告了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接触。这时，斯大林急于让中共接受蒋介石领导，共同对日作战，命令中共与国民党展开和谈。毛泽东虽抵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指示，但必须服从命令与蒋和谈，于是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北，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个师围剿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率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四十多位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红军将领联名致书蒋介石称“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同时，潘汉年携毛泽东致国民党领导人、周恩来致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文件赴上海与国民政府谈判周旋，希望通过谈判减轻蒋介石围剿的压力。蒋介石清楚中共谈“箕豆之争”只是缓兵之计，在临潼对记者谈话回应：“不论共产党标榜若何，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随后，蒋介石到洛阳“避寿”，调嫡系部队约二十个师，集结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入陕剿共。

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开始秘密谈判。陈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四项原则为：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指挥；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红军只保留3000至5000人，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潘提出中共条件为：国民党停止剿共行动，保留红军组织与领导不变。上海的潘、陈谈判与莫斯科的潘、邓谈判、南京的周、曾谈判一样，由于中共拒绝放弃武力推翻政府的宗旨而无法进展。潘汉年将谈判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利用张学良在西安的电台复电潘汉年，强调国民党必须先停止剿共，中共对红军的控制不容谈判。这时，毛泽东策动西安事变已箭在弦上。

11月19日，潘、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陈立夫重申国民政府的条件：只允许红军保留红军三千人，其余由收编。中共拒绝国民政府改编红军为政府军，要求国民党先停止围剿。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第二次谈判毫无进展。

11月21日，彭德怀指挥红军两个军在东北军的暗中配合下在山城堡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使中共在谈判中多了一些筹码。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编红军，也不再要求师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同意红军大部可不由南京编遣，仍归共产党领导，但改编后的红军人数限制在三万以内，同时拒绝了苏维埃政府与国民政府平等要求，不接受两个政府局面。12月8日，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陈立夫约第三次会谈。在策划西安事变进入倒计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拒绝在关键的军队问题上作任何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来致电张学良，谓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促张采取行动。两天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通过西安事变达到了从莫斯科到南京几次秘密谈判中没能达到的迫政府停止围剿目的。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入关内，张学良虽仍为华北统治者，但已处处受制于中央。他想恢复入关之初雄踞八省的威风，派亲信苗剑秋密赴日本，

以承认满洲国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日本军方正要向华北扩张，拒绝了张的要求。1933年，日军向热河扩张，张学良不情愿地挂帅领导长城抗战。由于他与各路军阀都想着保存实力，国军一触即溃。丢热河后，张学良在举国谴责声浪中被迫辞职出国。游欧期间，他申请赴苏，希望像冯玉祥当年那样得到斯大林的扶植，然后回国反蒋，恢复地盘。这时，斯大林正在推动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开战，当然不会扶张反蒋。并且，斯大林仍记恨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对苏开战，拒绝了张的访苏请求。1934年2月，张学良归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受命率东北军南下，配合中央军和杂牌军围剿豫鄂皖边区的红军。张学良作出遵命姿态，亲赴前线视察督战，同时暗中筹划开辟一方独立地盘。他的智囊黎天才、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多次讨论后献上了《致张学良建议书》，主要内容为联苏、联西北军，在西北建立割据。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入陕，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在借红军来削弱自己东北军的山头，对蒋的剿共指示阳奉阴违。同时，他采取多项举措争取斯大林的扶植：一是多次密晤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鲍向斯大林转达他与中共建立反蒋同盟的计划，称新疆的盛世才曾是他的部下，苏联应当给予他同样的支持；二是模仿盛世才的作法，在书架上摆上《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张扬地听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等人讲共产主义理论，在报纸上发表赞赏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图赢得斯大林的好感；三是花重金请宋庆龄、董健吾安排，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辗转送去了苏联以同时向毛泽东、斯大林示好。宋庆龄、董健吾等在沪开办有专门安排中共要员子女的“大同幼稚园”，该园是斯大林人质计划的一部分，办园的钱就来自共产国际。张花大钱安排毛子由沪赴苏多此一举，未获多少讨好效果。

斯大林对张学良的反蒋计划和亲苏亲共举动全无兴趣，此时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安全，是如何防止日军攻苏，其中国政策已经不再是反蒋暴动，而是推动蒋介石领导对日开战。张的反蒋割据计划破坏了斯大林的战略。与不久前对冯玉祥一样，斯大林无意扶植但不明确拒绝张学良，传话让张去与中共联系。几年前他要让冯玉祥心存幻想去反蒋，如今他要让张心存幻想，利用张去资助不断向莫斯科催要金钱的中共。斯大林这一招奏效。张学良认为搞定中共就可以获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扶植，到西安后主动联络中共。刚刚立足陕北的中共正在在被消灭的险境之中，军事上数万弱小的红军处于中央军、晋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等近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经济上在贫瘠的陕北无法获得足够给养，难以生存。得国民党剿共前敌最高司令官发来的建立联系邀请，毛泽东感到如得神助，赶紧采取几项举措联张：集中红军精锐在对东北军的作战中显示强势，以争取联张筹码；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口号对东北军展开宣传战；发布《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全体将士书》，以抗日号召争取东北军将士停止剿共，成立周恩来、叶剑英领导，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西北联络局），负责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联络。1935年10月底，红军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击败了东北军，俘虏了东北军第善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西北联络局立即行动成功将高策反，并发展成了中共秘密党员，然后放高回洛川向张学良传达联合意向。

接到中共传来的联合反蒋意向，张学良派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秘密协议。有了与东北军的秘密协议，毛泽东解除了后顾之忧，立即发起了“东征战役”，率红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抢粮。晋军主力布防华北应付日军，晋南空虚，阎锡山急请蒋介石增援晋南。蒋介石电命张学良配合陈诚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断绝红军退路。然而，这时的剿总副帅张学良在巴结中共，亲自驾机秘密飞抵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面谈。二人商定：张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再谈；张掩护中共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张与新疆的盛世才交涉协助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等等。

3月16日，李克农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与张学良谈判的结果。毛泽东派周恩来与张再谈。4月，张学良携巨额大洋见面礼密赴洛川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表示将拥张为“西北王”，同时提出请张放红军西渡黄河回陕北及支援红军弹药。张学良满口答应接济红军，但要求红军在河东与中央军决战，谓红军回陕北会令中央军大军跟随进入陕北，对红军不利。这时，张学良与中共玩起了互相利用的游戏。张的如意算盘是，让红军与中央军火拼，帮助自己扩大地盘；毛泽东则要推张反蒋，利用张学良渡过军事和财政难关。为获苏援，张学良尽量讨好中共，与周恩来达成秘密协议：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张以金钱，弹药接济红军；放红军西渡黄河回陕；东北军、红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红军退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帮助张在蒋介石面前有个剿匪胜利的交待。张学良履行协议，抵制蒋介石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断绝红军退路的命令，暗保红军携大批抢劫来的粮食物资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回陕北后，毛泽东履行密约，命红军从与东北军对峙的前线撤退，让出一部分地盘给东北军，送给张一个剿共战功，同时以担保斯大林将援助反蒋为诱饵，促张下决心起事反蒋。为了苏联援助，张学良步步上钩，更加卖力地讨好中共，秘密提供给中共巨额大洋与大批弹药，并玩盛世才一样的把戏，向中共提出了入党申请，希望以此取悦斯大林。

在拉拢十七路军方面，苏俄十多年来赤化西北军的功夫帮了毛泽东大忙。1925年，冯玉祥投苏，苏俄顾问开始在国民军中大量安插共产党员，其中在杨虎城所部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安插了上百共产党员。与蒋介石、陈济棠等党军将领向苏俄顾问表示拥苏一样，党军中的杨虎城也积极表示拥苏，要求加入共产党。如同对张治中一样，中共让杨保持国民党员身分，但派地下党员谢葆真嫁杨，从旁控制。1932年，因肃反而丧失战斗力的红四方面军被政府军击败，被迫逃离鄂豫皖根据地，南渡汉水进入巴山地区。1933年，红四方面军趁长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北上，入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塘沽协定》签定后，日军北撤，平津危急解除，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委任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调杨虎城十七路军主力三十八军进入汉中，与川军共同围剿红四方面军。杨虎城采纳潜伏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宋绮云、徐梦周等人的建议，与中共红四方面军达成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陕军秘密资助红军”的秘密协定（汉中协定、巴山协定）实现了“巴山无战事”，瓦解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在互不侵犯协定的保护下，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得到大发展。汉中协定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帮助中共开辟了由西安至红军川陕根据地的三条秘密交通线，使大批共产党人，大批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物资通过这三条红色交通线进入川陕根据地（中共在建国后特拍摄了电影《红色交通线》歌颂秘密通道的救命之恩）。毛泽东在落脚陕北后亲自主持发展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这时在杨虎城身边担任要职的南汉宸、王炳南、张文彬、韩威西、宋绮云、魏以畴、米暂沉、王菊人、蒋听松、刘子华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成了毛的奇兵。毛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策反说：“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通过埋伏在十七路军的地下党策应，毛泽东达到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目标，挫败了蒋介石的西北剿共计划。

达成“三位一体”协议后，毛泽东顺势扩大战果，一面加紧推动张学良起事反蒋，一面发表了《创立全国各党派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示各地的外围救亡组织掀起请愿运动高潮，促国民政府停止剿共，为张学良、杨虎城起事营造气氛。1936年5月，中共通过地下党员胡愈之操办，召集全国六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共产国际为救国会的两大诉求是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和停止剿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救国会成立后立即在西安发动了促东北军停止剿共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发动了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中共、张学良、杨虎城、宋庆龄、救国会领导人之间频繁联系，配合行动。共产国际

只知道救国会遵照指示推动中日开战，而不知道毛泽东在指挥这些组织在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起事。

6月，李宗仁、陈济棠趁红军进攻山西，中央军主力赴晋之机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被迫将西北中央军南调应付兵变。受两广事变鼓舞，张学良也计划反蒋起事，在7月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再次密晤苏联外交官寻求莫斯科支持倒蒋。密晤后，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再次举行了秘密谈判，讨论利用两广事变起事反蒋。这时，张的如意算盘是，先以联合政府作诱饵拉拢中共，利用中共赢得斯大林信任，取得苏联的军火援助，建立西北联合政府，然后以西北割据领袖的名义命令红军与西北的毛炳文部，马步芳部及河南的中央军火拼，东北军得乘虚控制陕甘及河西走廊，再利用红军、西北军去与中央军作战，推翻蒋介石，取蒋代之，成为全国领袖。而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以“西北大局面总司令”和中国领袖位引诱张学良，利用张摆脱困境，然后让张、杨去与蒋火拼，最后建立中共的西北割据。在互相利用的游戏中，张与毛打的都是苏俄牌，都打算以蒙古国为榜样，建立背靠苏联的割据地盘。谈判中，周恩来一再向张承诺苏联会像当年支持孙中山、冯玉祥那样，支持张取代蒋介石。张学良再上钩，与周讨论了中共地下党员杜重远、胡愈之制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然后商定：东北军与红军乘两广事变之机联合行动，在西北宣布独立，以兰州为大本营，打通苏联，割据西北，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盟，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然后夺取平津。计划中的敌人是中央军、宁夏马鸿逵马步芳、甘肃的胡宗南、平津的宋哲元，而非华北日军。

返回西安后，张学良按照承诺再接济红军钱粮军火，允许中共在西安设立秘密代表处，帮助中共开辟了苏区与外界联系的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电令在兰州的于学忠为红军提供协助，并给中共送上了最需要的帮助——让中共利用西安“剿总”的电台为中转站。这时的中共急需与莫斯科联络，陕北电台功率微弱，连在上海谈判的

潘汉年都无法电报联系。有了张学良的电台，中共得以经上海宋庆龄接通莫斯科，立即以总书记张闻天的名义向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发出了长征中断电讯联系后的第一封电报。中共在电报中说：已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准备发动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东北军月饷 200 万元全靠南京，一旦发动反蒋即完全断绝。陕西物产供给杨虎城部三万人尚嫌不足，甘肃人口 200 万，税收不足 10 万元，红军所处的陕北地区更加困难，申请国际每月资助三百万元，并提供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等。[17] 毛泽东向莫斯科隐瞒中共因山西抢到钱粮及张学良提供钱粮而渡过危机的实情，只管向莫斯科索要金钱军火，命令不得反蒋。

接到中共关于联张西北举事和吸收张学良入共产党的请示，斯大林对中共与张学良密谋反蒋反感，否决了接纳张学良加入中共的请示，通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反蒋，联蒋抗日”。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从来是合适就执行，不合适就阳奉阴违，此时再展谋略，采取了对斯大林和张学良两边骗的办法：对张学良隐瞒莫斯科否决“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实情，骗张称莫斯科已决定向援张，大批军火将源源而来，同时采取假吸收入党的办法，通知张学良说入党申请已获准，开始在往来密函中对张“同志”相称；[18] 对斯大林，毛泽东表示服从联蒋抗日的指示，隐瞒与张继续密谋及假吸收入党之事，并加紧催要援助说：“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你们答应 11 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并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19] 被中共称为同志后，张学良相信是斯大林接纳自己为同志，相信苏援军火将源源而来，于是决心起事反蒋。

“两广事变”没有引起张学良期望的反蒋响应。承受日军压迫的北方的国民党将领通电反对两广事变，以王以哲军长为首的一批东北军将领也公开反对两广在民族危亡时扯旗向中央造反。实力派们的反对让张学良难下决心与

两广呼应起事。没有张的响应，两广事变被迅速平定。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开始了对红军陕北根据地的第六次围剿，命胡宗南部由湖南回师甘、宁，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入潼关。危急形势下，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致信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张学良磋商起事计划；加紧推动张学良起事反蒋，并继续骗张说，苏联已在新疆为红军准备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援物资，等待中共西路军去取，请张学良配合西路军打开道路；派潘汉年从延安赴上海与国民政府代表和谈；致信宋庆龄和救国会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指示救国会采取激烈行动，将促停止剿共的请愿运动升级。

接潘汉年带到上海的毛泽东亲笔信，宋庆龄和救国会领袖们立即行动，联络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孙科等国民党要人，请他们出面推动停止剿共，同时部署将请愿行动升级，部署罢市、罢课，挑战政府维护秩序的底线。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中共地下党员）、李公朴、沙千里（中共地下党员）、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是为“七君子事件”。七人被捕后，宋庆龄、救国会联合国民党内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反蒋派，掀起了反蒋高潮。共产国际在国外同时行动，组织了哲学家约翰·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十六位国际名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谴责独裁，要求国民政府释放“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中国的十六位名人与共产国际相呼应，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带着铺盖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声称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

通过“七君子事件”，共产国际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大做文章，为国民党政府戴上了专制和热衷内战的帽子，宣传“七君子”事件为爱国义举。国人不知道，“七君子”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共产国际代理人，整个救国会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操纵的组织，其行动是斯大林为将日苏战争转变为中日战争计划的一部分，而毛泽东另有部署，那就是通过救国会行动制造气氛，推动

张学良起事颠覆政府。准备起事的张学良对舆论界不断声称他魂萦梦系白山黑水，背负国仇家恨，希望有机会打回东北，声称他想抗日，暗示是蒋介石下令不让他抗日。虽然国人人都知道东北军不战放弃了东北，但张学良在西北的抗日高调还是让无数人信以为真。中共唱日高调同样伎俩：在江西一面高喊抗日，一面大举追杀北上保卫华北的国军；打出“北上抗日”旗号，是赴华北抗日，而是赴西北去接通苏联，到西北再打抗日旗号抢劫山西。国人不知道救国会的俄党性质，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在密谋西北割据，在中共与宋庆龄领导的救国会等无数所谓抗日救亡组织煽动下，加入了请愿。在国内外联合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好释放了“七君子”。“停止内战、对日宣战”的声浪中，蒋介石的剿共遇到了极大的道义阻力。

11月25日，德日签订了反共条约。斯大林对此极为恐惧，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一致抗日。毛泽东不理睬莫斯科的命令，加紧推动张学良发动兵变，派周恩来与张学良策划请蒋介石前往西安予以劫持的计划，同时将推动张、杨“扣蒋”的计划向斯大林保密。与周密谋后，张学良再三电请，并亲赴洛阳请蒋介石到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12月4日，蒋介石、蒋鼎文（拟任命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拟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一行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达成了停战，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杨，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东北军、十七路军服从命令，开到陕甘前线剿共；或调往福建、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面促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严词拒绝，强调剿共已至“最后五分钟”阶段。当晚张、杨密商发动兵变。张学良致电陕北，要求叶剑英返回西安，参加策划。毛泽东复电称叶剑英已经上路而不让叶动身，以使中共在起事关头隐身局外。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变，张指挥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所驻临潼华清池，将近百蒋介石卫队全部杀害，拘禁了蒋介石、陈诚、

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杨指挥十七路军控制西安的车站、机场、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的武装，扣留飞机和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随即，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释放在押上海的爱国领袖、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召开救国会议等呼吁。当天，国民党召开了高层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系苏俄所策动，决定电令驻俄大使蒋廷黻向苏俄提出抗议，通过中共代表潘汉年和苏联代办传话警告莫斯科：如蒋有不测，中国或被迫与日本共同对俄。中共也召开了高层会议。会上，张闻天、朱德等多数高层成员认为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应先斩后奏，促张杀蒋，毛泽东则坚持“杀”字不由中共说出，坚持等待莫斯科的来电再决定对策。

西安事变消息传出，举国反对张学良在国家面临入侵之时发动兵变。13日，张学良电阎锡山、刘湘询对事变意见，盼阎等响应兵变，一起推翻中央政府。阎锡山电劝张学良、杨虎城勿做“减少抗战力量，移对外战争为内战，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之事。北平宋哲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下野的冯玉祥、流亡的李济琛、程潜、唐生智、朱培德等通电拥护中央，促张学良猛醒；胡宗南、刘峙、徐源泉、张发奎、薛岳、孙连仲、傅作义、汤恩伯、李服膺、王靖国、赵承绶、宁夏青海将领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等百余将领通电请求中央下令讨伐张学良。众多张、杨的部将也反对兵变，杨虎城部师长冯钦哉声明未参与西安事变，东北军军将领于学忠、刘多荃声明不同意张学良的行动。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乐于见到去蒋后的混乱局面。韩复榘在事变中发表了“马”电，呼吁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其蠢蠢欲动之势，预示着去蒋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得到西安事变消息和国民政府的警告，斯大林极为愤怒。九一八事变开始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消除日本进攻苏联的威胁，为此策动了淞沪战事，抗日救亡运动，促中日开战的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中共放弃武力推

翻国民政府的宗旨。他要引爆中日战争，推动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让中国帮助他瓦解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因此，他三番五次要求中共服从蒋介石领导，国共共同对日开战。然而，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的计划，国民党关于被迫联日对俄的警告是让他恐惧。他清楚，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的独立行动，背后一定有毛泽东的策划，于是亲拟电报，以最严厉的措辞命令毛泽东：“事变为日本策划阴谋，苏联明确反对张学良策动的事变，决不给张学良任何支援。中国最需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分裂与内战。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是领导抗日的唯一人选。苏联绝不容许杀蒋，中共必须和平解决事变，放弃内战方针，否则正符合日本军阀与亲日派的愿望，对苏联和中共不利。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20]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再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接宋庆龄转来的斯大林电报，毛泽东庆幸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没有明说杀蒋。他知道不执行斯大林命令可能立即被罢免的严重后果，立即派周恩来赴西安促张放蒋。这时中共政治局成员们才感到毛泽东坚持等待莫斯科指示之英明。

张国焘后来写道：“西安事变的主因是张学良相信了周恩来的诺言，一旦抓了蒋介石，张学良可以得到苏联的军火。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毛泽东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

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14日，周恩来与张密谈，告之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出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21]

在南京，国民党高层就如何应对事变出现分歧：戴季陶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武力讨伐西安以维持纲纪，何应钦于17日通电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任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路及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下令进兵西安，并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以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一派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主张和平救蒋避免内战，安排将胡适谴责张学良的文章向西安空投以向东北军官兵说明事变的祸国性质。

事变后的国内外反应出乎张学良的意料。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刊出社论抨击张、杨的兵变将导致中国内战，斥张学良为汉奸，指事件是日本人策划的阴谋，是妄图导致中国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呼吁国民政府勿与张学良妥协。全国一百多家报纸和知识界一致谴责事变。胡适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致电张学良，表明反对事变立场说：“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22] 清华大学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著名教授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北京大学教授联名宣言，呼吁国民赞助讨伐张学良以维护统一大业。更让张学良感到严重的是，东北军中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缪澄流等一批将领对事变表示反对，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更声明要效忠国家，召集该军

师长开会做出决议：“唯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将支持西安事变的副军长黄显声（黄后在中共推出的小说《红岩》中被歌颂）软禁；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冯钦哉宣布效忠中央。在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一致谴责事变，中央军进逼西安的形势下，张学良只好同意和平解决，向南京方面保证蒋的安全，请蒋手令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在获得张、杨的不加害承诺后，南京方面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和平解决事变。

被囚禁在西安高桂滋公馆的蒋介石拒绝在胁迫之下签署任何文件，写了政治遗嘱《告全体国民同胞书》、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及写给当时被斯大林扣在苏联作人质的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的遗嘱，要求将其政治遗嘱在南京和全国报纸上公布，要求将其余两份遗嘱转交夫人和儿子蒋经国。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到西安，劝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见到宋捎来的宋美龄亲笔信，读到其中“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之句大为感动。12月22日，宋美龄飞到西安。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蒋告宋，他未向张、杨作任何承诺，要求宋美龄不要与张、杨签署任何文件。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恩来展开了谈判。中共遵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之命，对国民政府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苏维埃政府的红军改名；在特区内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等“四项保证”。在此基础上，宋美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停止剿共”等项承诺。12月24日，周恩来见蒋，当面作出四项保证，蒋对中共的承诺不予理睬，周转达斯大林放蒋经国回国的承诺，蒋介石态度顿变，同意停止剿共，承认中共合法存在。得蒋停止剿共承诺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宣言，声称与事变无关。

得知中共声明后，张学良明白了，他利用中共获得俄援称雄西北的计划已经破灭，他在与中共互相利用的游戏中输了，被毛泽东和中共利用了，当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自保——放蒋。但是，想放蒋也不那么容易。杨虎城强烈反对放蒋，声言至少须迫蒋签署一些保证文件才能放。而杨的戒严司令孙蔚如更向杨提出“放蒋扣张”的“反政变”建议。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也反对放蒋，认为那将使东北军成为替罪羊。张学良意识到，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结盟已不复存在，局势已非他所能控制，蒋介石和自己均身处险境，于是果断决定亲自放蒋，向蒋介石负荆请罪。12月25日，张学良不辞而别地陪同蒋介石夫妇飞离了西安。在飞机上，蒋告诫张说：“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张答：“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23] 张学良此时的举动和表白一方面是受到胡适“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劝告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表达对西安事变痛悔和被中共戏耍后的窝囊。

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南京市民夹道欢呼，万人空巷，庆祝爆竹彻夜不绝，其它大城市也纷纷举行庆祝蒋委员长脱险大会。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加入了庆祝活动，各国驻华使节亦纷纷前往外交部道贺，各大报纸用“举国狂欢”形容庆祝蒋介石脱险的活动。国人热烈庆祝蒋介石脱险是因为认识到对日一战在所难免，国家需要蒋介石来领导抗战。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们也纷纷表示愿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赴国难，李宗仁、白崇禧带头通电，表示盼望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蒋介石以对于西安事变事先防督未周向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国民党中央准假慰留。

张学良突然离陕后，西安一片混乱。东北军的少壮派要求继续执行预定计划，对中央军开打内战。此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尚不知道中共已向蒋介石承诺服从中央，东北军主战派联络中共商量对中央军开战，中共表示红军不能加入作战。消息传开，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纷纷谴责中共说：挑起事变后又提出和平解决，秘密妥协，将盟友出卖给蒋介石，牺牲东北军、十七

路军以图自身私利，可见中共事变前承诺的苏联援助完全是欺骗。面对东北军将领的质问，周恩来一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共决不会出卖盟友，决不让东北军受害，一面指挥叶剑英、博古等中共派到西安的代表立即销毁中共参与策划事变的证据。与张学良一样，杨虎城也感到被中共利用的窝囊。他质问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24] 杨下的孔从周等将领提出要求中共一起对中央开战，杨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蒋介石）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25]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整编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宋哲元等电劝杨虎城服从中央命令，张学良派王化一持亲笔函飞赴西安，嘱所部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在国人一致反对内战，中央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其中第六十九军军长何柱国还潼关向顾祝同当面表示服从中央，随后率东北军一部从潼关北撤。1月30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呼吁避免内战，避免西安被赤化。绝大多数东北军高级将领支持于学忠的立场，表态反对内战，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参加抗战，更有一些将领独立行动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方面。根据多数将领的表态，东北军高层作出了服从中央政府的决定。当晚，杨虎城、周恩来与东北军部分将领开会，商量应对。周恩来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推动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计划，继续隐瞒对蒋介石作出的“四项承诺”的情况，鼓励东北军内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对中央发动内战。

2月2日，孙、苗、应等人发动了夺取东北军领导权的暴动（二二事件），率手枪连枪杀了主和派领袖王以哲、剿副总官长宋学礼、参谋长徐方、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参谋处副处长蒋斌等人。杨虎城下令全城戒严以

配合孙铭九等人的兵变。王以哲等人死难消息传出，东北军众将领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为首的“抗日同志会”骨干，东北军驻蒲城的骑兵第十师和驻周至、眉县的第 106 师宣布脱离西安方面，效忠南京，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缴械；东北军第 105 师刘多荃部宣布服从中央，将中共秘密党员高福源枪毙，并以东北军全体将士名义致电杨虎城，要求立即逮捕孙、苗、应等叛乱分子，否则将回师西安平乱。在大多数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反对内战通牒的压力下，杨虎城只好承认支持孙、苗夺取东北军军权的计划失败，赶紧下令通缉孙铭九等人以自保。孙、苗、应等人急忙向周恩来求救。周命刘鼎送孙等到苏区暂时庇护。为撇清与孙等发动事变的关系，周恩来拒绝孙等在苏区久留，将他们分别送到天津、上海租界躲避。几天后，因反对内战遇害的王以哲、宋学礼等人的灵柩由专车运达北平，朝野各界举行了隆重公祭，显示大敌当前朝野拥护中央的军心、民心所向。

东北军主力宣布服从中央后，蒋介石顺势彻底解决东北军不受中央染指，在北方长期割据的问题，命令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留原防地不动，其余东北军东调豫皖，接受整编。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开入西安，分别与中共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谈判服从中央的具体事宜。3月初，西北军、东北军代表杨虎城、于学忠到杭州见蒋介石谢罪，蒋介石将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允杨虎城出国考察，至此，东北军不复存在，西安事变结束。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申明在“五项要求”的基础上向国民政府作出“四项保证”。其中“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26] 中共提出没有人会反对的“五项要求”良言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自己向国民党作

“四项承诺”找个台阶，而其“四项保证”的实质意义只有一个：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接受“共产党人输诚受命”，通过了《根绝赤祸案》。该决议案针对中共的“四项保证”，申明四项原则如下：

1) 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2) 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3) 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兼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4) 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国民党的这一议案在形式上算是为十年“剿匪”划了名号。

2月22日，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发表宣言，对外维护主权，对内和平统一，根绝赤祸，努力经济建设，消灭阶级斗争。蒋介石发表谈话：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予以自新之路。国民党全会后，中共宣布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案》，接受其中的“四项原则”，保证停止采取暴动政策和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拥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最高统帅，接受国民政府指挥等等。国民党则宣布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承认陕甘宁地区为特别行政区，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开放党禁，承认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合法，释放政治犯，关闭反省院，允许共产党的报刊和其他政党的报刊发行等（国共两党达成的上述协议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被公之于众）。随后，周恩来率博古、林伯渠、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往来于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展开谈判。

6月初，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举行了国共合作的第三轮谈判，周恩来递交了中共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提出，可先成立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国民革命同盟会，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同盟会来解决，他本人具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同盟会与第三国际建立关系以代替共产党的关系。周恩来等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为第三轮谈判定下原则为，军队名称、政府名称等无关紧要者都可放弃，但军队和地盘决不受国民政府染指，共产党掌握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国民政府不得染指边区政府人事安排。毛的上述原则实际将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服从国民政府和红军改编等项承诺推翻。由于双方在关键的中共军队改编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谈判没有进展。蒋介石这时还不知道，周恩来等人上庐山谈判时，刘少奇正奉命策动芦沟桥事变。毛泽东知道，中日开战已进入倒计时，与蒋的谈判只是走个形式。待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再无力向中共施压。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三轮谈判无可能继续，国民党只得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又被迫默认中共对其军队的独立指挥权。

作为中共绝处逢生，走向壮大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毛泽东挽救中共的杰作。毛泽东利用张学良达到了迫蒋介石停止剿共的目的，然后灵活地作出“四项承诺”，放弃无关紧要的苏维埃之名、红军之名和红军番号，作出没有实质意义的停止土地革命等承诺，换取了既不交出军队，又获国民党政府承认合法地位及发给军饷的实质好处。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斯大林的安排，承诺放弃他声言“已到最后五分钟”的剿共布署，放弃和谈中坚持的，最为关键的取消中共对红军的控制权和武装割据两项条件。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因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信守了在西安对斯大林所作的停止剿共承诺，使数万红军得在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央军、宁夏马家军等百万军队的四面包围中转危为安。国民党从停战谈判之初的条件一退再退，推出自欺欺人“接受中共输诚”决议，最后在庐山谈判中彻底认输，停止了剿共，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每月向中共发放

二、三十万元军饷；而中共达到了毛泽东坚持的军队、地盘不受染指的谈判条件。蒋介石在 1937 年 1 月的《西安半月记》中承认：“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27] 他并非不明白“接受中共输诚”决议的荒唐，但为换取儿子蒋经国回国，他放弃了和谈中的最重要的条件，向中共认输。如果蒋介石挟西安事变后举国一致拥护的声望，将中共的“四项保证”连同中共拒交出军队、拒绝交出地盘事实公之于众，则儿子蒋经国就回不来了，不过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将改写。汪精卫所言“蒋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党和第三国际，中共和斯大林是西安事变的赢家”说得没错，蒋介石为了儿子在西安事变后的被斯大林和中共牵着鼻子走，埋下了国军在抗战中长期遭受共军打击，不得不布署精锐重兵防备中共扩张，被美国人指责专注于内战的祸根。

西安事变是斯大林操纵中国走向的一个代表事件。事变是毛泽东瞒着斯大林策划的。毛泽东能成功利用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因素不是他的谋略，而是斯大林的影响力。张学良之接受“三位一体”，援助中共不是为了讨好中共，而是为了讨好斯大林，若非为了苏俄军火，张学良断然不会驾机去洛川，断然不会援助穷困弱小的红军，不会去讨好毛泽东。同样，杨虎城接受“三位一体”也是因为苏俄安插中共党员操控十七路军的十年赤化之功。有斯大林让张对苏援心存幻想的答复，才有毛泽东推张起事运作的可能。用了承诺苏援引诱，毛泽东才能摆布张学良。如果斯大林明确表达拒绝援张，让张对苏援死心，则毛泽东不可能策划西安事变。同样，让蒋介石停止剿共，谈判立场一退再退，最后搞个输诚决议糊弄党众的也是斯大林的影响力，斯大林手中的人质法宝能够让蒋介石从命。西安事变达到挽救中共的最佳结果不是因为毛泽东的策划，而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共下达的和平解决电令。事变结果的决策人是斯大林。了解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决策，须了解事变前半个月德国和日本签署的《共同防共协定》。这一协定的矛头指向苏联，让斯大林极为恐惧。事变期间，在欧洲的汪精卫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共同防共

协定》，这让斯大林更加恐惧。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提出中国可能联日对苏的警告对斯大林的压力超乎人们的想象。为拆散反共反苏的联盟，为制止中国走向联日对苏，斯大林动用一切资源与手段，一是坚决严令毛泽东和平解决事变，二是承诺援助国民党对日作战，三是动用手中人质王牌，以蒋经国归国的条件换取蒋介石停止剿共。为了化解德、日结盟攻苏的威胁，斯大林把手上的王牌全用上了。表面看来，中共通过接受国民政府改换番号就换取了国民政府承认合法地位、支付巨额军饷是毛泽东挽救中共和红军的杰作，实际事变进程完全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是斯大林与蒋介石交易的结果。有斯大林承诺援助国民政府，才有蒋介石承诺付给中共军饷。中共的军饷其实是斯大林付的。毛泽东策划事变固然精明，但让中共和红军转危为安者非毛泽东或蒋介石，而是斯大林。同样，推蒋介石出来领导全面抗战的主要影响力也不是因为各界、各派的一致拥护，中共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从未真心拥护蒋介石，中共更是从未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推蒋出来领导抗战是斯大林的策划，斯大林在幕后操控的结果。斯大林需要中日全面开战，需要蒋介石来出面领导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后称张学良是帮助中共革命胜利的“千古功臣”。实际上，中共在困境时的“天助”都来自斯大林。因与斯大林的交易，陈济棠才在广东保留中共的军火库，让中共来取军火，才放红军过粤，因与斯大林的交易，蒋介石才一路放红军长征到陕北，因为要讨好斯大林获取苏援，张学良才放红军渡过黄河，才向中共送上“天助”的钱粮弹药，才为中共在西安设立联络站，通讯中心，因为斯大林安插在军品众多的共产党员，杨虎城才与中共订立停战协议，因为要获苏俄扶植，张、杨才听毛泽东摆布起事反蒋。要不是因为苏俄和斯大林，张、杨断不会受中共的摆布。没有苏俄的影响力不会有中共和红军，更不会有毛泽东策划西安事变的成功。

对于中共和张、杨在西安事变中打出的抗日旗号，胡适当时就指出：“在绥远已开始作战，中央军已到了抗日前线，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及重要官吏和将领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

天下人都当作傻瓜。这回的西安事变，是祸国叛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勘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勾结中共，背叛国家，破坏统一，叛国祸国的国家民族之罪人”。[28] 全面抗战中，西安事变、二二事变发动者们的表现证明了胡适的上述论断：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为中共制定了对日避战的政策；杨虎城坚持在国难中再举叛乱，在国外考察时与冯玉祥、张学良同样套路，跑到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军火金钱扶植，向斯大林表示回国要再次发动兵变，声称“此番绝不手软”。斯大林希望蒋介石领导中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人，将杨在莫斯科的表演通报蒋介石作了人情。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杨在抗战中再举叛乱，通过宋子文致电诱杨回国将其逮捕；“抗日同志会”首领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在抗战中先后投降了日军。建国后，中共将西安事变、二二事变宣传为爱国抗日之举，将张学良、杨虎城宣传为爱国将军，将孙铭九等人安排为政协委员，优待照顾。应德田晚年在其《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依然声称参与策划西安事变是为抗日，毫无忏悔之意。西安事变、二二事变策动者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说明，两事变的发动者与两广事变发动者一样，打出的抗日旗号只是叛乱，制造内战分裂的借口。

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获特赦，被蒋家父子长期软禁。因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不可告人，张学良致死也不肯亲口披露西安事变的内幕。他在与毛泽东的互骗游戏中成为输家，主要不是因为毛泽东高明，而是因为他自己错判了斯大林，相信操纵中共反蒋多年的斯大林会支持他反蒋，没有认清斯大林在希特勒上台后转而拥蒋出来作中国抗日领袖了的政策改变。事变后，张学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判，为发动事变痛悔。在几十年后重获自由时他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他承认自己一生“鲁莽操切，胆大妄为，闯了大祸，是民族的罪人。”他定居美国后，中共多次派各方人士邀他回大陆，

回东北老家参观，他拒绝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张学良如此说是因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是他在陕北资助红军，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转危为安。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产党来报答他这个“大功臣”会令他尴尬；如果他表达对发动西安事变悔恨会使中共尴尬。因此，他在夏威夷购置了墓地，用落叶不归根的行动表示不想在临死前再被中共利用一回。他向张氏后人交待说，有机会去沈阳、天津转转，去上海、北京走一走，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2013年，一批由张学良的印度籍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HYLAND LYON）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秘密文件在美国纽约拍卖。密件中包括一封由毛泽东署名的信函，一份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署名的信函，一份以抗日为名的八条协议稿，和一份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之后的自省表白。六页信函的第一页内容关于如何夺取兰州，出兵绥远，进占甘、凉、肃，取宁夏，控制陕甘宁交界处的黄河东岸，通过已经安排好的新疆配合，最后打通苏联的具体用兵计划，最后一页是众多国共领导人的联络假名及一些暗号。八条议稿内容是张与毛的相互配合与协调的原则。其中第一条的甲、乙项是建立“联合战线”，丙项则是“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清楚显示联合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张学良保存这些文件原本是等待与毛泽东共同签署的。这批密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价十几万美元收买，后再被中共以近百万美元的高价买走。显然，中共收买这批密件是为掩盖毛泽东、张学良密谋西安事变的真相。

西路军覆灭

1934年6月，斯大林复电批准中共中央撤离苏区，指示红军到西北边境去接收苏联军火。1936年6月，中共在陕北通过西安与莫斯科恢复了电

讯联系，致电莫斯科索要金钱军火，包括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等，并报告已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起事反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29] 斯大林否决了毛、张制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命令不得反蒋。于是中共领导人联名致电王明转电共产国际要求援助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如不能与东北军联合反蒋，南京国民党一时又拒绝停止剿共，红军迫于生存的需要将不得不向较富庶地区发展。如此不仅将被迫放弃现有苏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黄河）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30]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31] 接到电报，毛泽东迅速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要求夺取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并告张学良称双方分享苏联军火，合作建立西北割据政府。显然，中共向莫斯科索要的军火与抗日无关，是为对付国民政府，建立西北割据之用。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的中央军委。通过这一安排，毛泽东摆脱了名义上是周恩来副手的地位，让周恩来失去了军权，成为了自己的副手。借执行“打通国际”的“宁夏作战计划”，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央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组成左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毛泽东下达的上述命令与其说是军事考虑，不如说是服务他的权力斗争计划。通过下达十月作战纲领，毛泽东再次肢解了红四方面军。为堵住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将领对他保存红一方面军实力的质疑之口，他将原属红一方面军，人数很少，且半路收编的第五军（军

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编入了左路军，让红一方面军在北线面对强大东北军。众高层不清楚而只有毛泽东清楚的是，与张学良的停战协议已经秘密达成，红一方面军面对东北军实力不会受损。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大部分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张国焘和朱德带领红四方面军余部沿黄河东岸北上，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南线面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部。显然，红军只有控制黄河渡口，才能保持与河西部队的联系。但毛泽东让红一方面军回避作战，国民党军推进到甘北，占领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了宁夏通道，使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被隔断。11月10日，毛泽东发出中央军委电令，宣布取消“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将已在河西的左路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命西路军继续去打通到苏联的陆路通道；以在河东的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让已在河西走廊的近三万红四方面军主力成了孤军。11月15日，毛泽东发中央军委电令，命西路军向凉州前进，谓苏联正准备从新疆接济，要求西路军在后援断绝的情况下作千里西征。

11月19日，毛泽东再电，命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民勤一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叫停西征是因为，蒋介石命中央军进逼陕北，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处境危急。他知道，西路军回师不能解决陕北根据地的危机，解决危机成败在于加紧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兵变反蒋，不过让西路军摆出个回师的架式多少对陕北有些帮助。按照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停在了甘肃荒凉之地。11月下旬，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青海的马步芳部、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向在古浪的西路军发动进攻，歼灭了西路军5000余人。陈、徐率部弃古浪西逃，在路上召开了军政委员会研究出路。会议认为，中央军委下达的远赴新疆获取接济的任务无法完成，留在凉州、民勤的沙漠地带无法建立根据地，也是死路一条，唯一活路是退回陕北。于

是，陈、徐致电中央谓形势对西路军极为不利，请求重新考虑行动计划。中央军委复电：就地坚持。12月上旬，供给断绝的西路军在干柴洼、横梁山、古浪城、古浪南山等地与马家军及地方民团激战，再损万人。至此，三万西路军损失过半。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2日，中央军委电命西路军调头东进。这一电令不是对陈、徐“重新考虑行动计划”请求的回复，而是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正派周恩来与宋美龄、宋子文进行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让西路军再作回陕策应中央的态。经过两天谈判，周、宋达成了中共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停止剿共的口头协议。24日，毛泽东再电西路军命令东进。当晚，周恩来与蒋介石面谈，蒋认可了周宋达成的口头协议，决定接受中共服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按理，国、共达成了停止围剿红军的和平协议，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危机解除，只要中共电命西路军宣布停止反政府军事行动，马家军、中央军即会停止剿共军事行动，在祁连山的西路军完全可以走出绝境，安全退回陕北。然而，陕北根据地危机解除后，毛泽东不再需要西路军东进策应了，于27日再电西路军，命令调头西进，继续执行“打通苏联”计划。中央军委的这一电令是中共归顺中央“四项保证”欺骗性的证明，也是毛泽东和红军无意放弃武装颠覆国民政府宗旨的证明。事实上，毛泽东一面向国民政府保证服从归顺，一面派军去“接通苏联”获取军火，准备推翻国民政府。西路军军政委员们不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情况，不知道中央已经向国民政府表态服从归顺，不知道中央的“四项保证”，接到中央军委“调头继续西进”电令后感到进退两难。他们想，抗命东进率军回到陕北，自己将面临整肃，遵命西进可能全军覆没，但自己总有退路，回到陕北好交待。于是高层们决定服从军委命令，下令向马家军进攻，同时各自预备退路。

1937年元旦，西路军攻占了高台，西路军委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派军西渡黄河接应。中央军委复电：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此令对处于荒野寒冬，给养断绝，伤病倍增的西路军无异是等死令。几天后，西路军遭到

马家军和地方民团围剿，董振堂、杨克明率领的红五军被全歼于高台。1937年2月1日，西路军余部在倪家营子再遭马家军重创。陈、徐再电中央军委，要求派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前来接应。2月17日，毛泽东复电斥责西路军不听指挥，有分裂倾向。陈昌浩再电延安求援，毛泽东复电称，准备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委的援西军。西路军众军委委员们明白了，他们在天寒地冻中等不到援西军了，于是各自安排弃军逃生。陈昌浩、徐向前、秦基伟等西路军首长以返回延安汇报为由带警卫排悄然离队，逃往向延安。途中，警卫排士兵全部战死，仅几位怀揣路费的首长逃出了河西走廊。陈、徐、秦逃离后，西路军于3月初在甘西的倪家营子被歼灭。残部分成左右两支队逃亡。李先念率左支队七百多人逃到了苏联境内，在两个月后被共产国际派出的陈云接应到迪化；王树声、李聚奎率领的右支队部在甘西被歼灭，仅王树声等七位首长化装逃回陕北。至此，西渡黄河去“接通苏联”的三万西路军覆灭，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大批西路军将士埋骨祁连山下。

通过两次分拆红四方面军，安排西路军上不归路，毛泽东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本钱摧毁。在西路军步步走向绝境时，张国焘、朱德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另一部也兵败宁夏。1936年11月，张国焘随周恩来逃到保安，从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的统帅变成了光杆司令，没有了挑战毛泽东权力地位的本钱，只有听从毛泽东发落。1937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张国焘知道失势者辩解没人听，遵循权力斗争规则，承认错误，争取从轻发落。毛泽东主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其中列举张国焘的三大错误为：土匪主义、军阀主义、分裂中央。会后，红四方面军干部遭到整肃。李先念多年后回忆披露，当时和他一起返回延安的西路军将士，被上级分别招去“谈心”，被问是希望留在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因表态留延安在活了下来。那些回答希望到苏联的战友被大批秘密杀害。司马璐先生多年后回忆披露，一位曾参与处置西路军将士的西北山头的干部说，我们首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缴下

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活埋。曾有人表示不相信这党的命令。执行者申明，难我们不会与他们过不去，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逃到新疆的原红四方面军骨干也被清算，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徐克勋）、红五军政委黄超等人被以托派罪名枪毙（二人在几十年后被中共追认为革命烈士）。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们不甘被整，许世友等四十多位将领闹出了“造反事件”。毛泽东不敢采取对“富田事变”参与者那样屠杀行动。当年在江西，李文林等江西山头主要是党的山头，而不是军队山头，他可以对李等屠杀，而在如今陕北，红四方面军是军队山头，西路军虽被消灭，红四方面军余部势力仍然不小，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像对李文林为首的江西本地干部一样全面清洗兵变随时发生，于是停止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整肃，转而采取招安对策，将表态效忠的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四方面军将领拉拢为自己人。

虽然通过安抚红四方面军干部稳固了军权，但张国焘的存在让毛泽东头疼，一来作为中共创始人和曾经的红四方面军统帅，张在党内军中声望犹在，随时可能振臂一呼召集旧部挑战自己的权力地位；二来若斯大林对自己不满也可能再扶张崛起。他知道将张干掉可能会让红四方面军山头众将心寒而铤而走险酿成兵变，将张留存党内高层会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独裁地位，而张又会像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将领那样效忠自己，于是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让张在延安呆不下去，迫张出走。不久，张国焘在党内的批判会上遭到前部将领钱钧以鞋底抽脸暴打。会后，毛泽东安抚张说：“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张投诉：“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毛：“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在毛的屋檐下，张国焘只好低头，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书，在其中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

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32] 然而检讨后，让张难以容身的事不断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颇为安宁。一天，高层在延安看戏，毛对发动七七事变的功臣何基沣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指邻座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忍无可忍，怒而退席，[33] 明白延安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不久，张国焘借参加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逃到了汉口，在那里联络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人寻求支持，冀联手召集中央会议剥夺毛泽东的权力。王明在苏曾与张国焘明争暗斗，到延安还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威胁，不响应张。其他人均不支持权力斗争中的败者。倒毛不成，张国焘在汉口发表了《敬告国人书》，指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战诚意，声明脱离中共。声明发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王明、周恩来、博古一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答复子健（张国焘）的公开信》，驳斥张的《敬告国人书》。

张出走后，毛泽东继续对张清算，提出了“张国焘企图武力加害中共中央”的说法，将 1937 年 3 月决议的三项错误升级为“反党罪行”，以防止张的旧部结伙翻案。毛泽东提出“加害中央”的证据是以叶剑英为证人的“密电事件”。毛、叶的版本为：1935 年 9 月 9 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发去密电，令陈挟持中共中央南下，谓如毛与中央红军不从则武力解决。叶剑英先得到了电报，连夜策马送交毛，毛连夜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脱离险境。毛、叶的上述版本缺乏说服力，一系列反证让人相信“武力解决密电”子虚乌有。反证之一，密电事件的收电人陈昌浩否认“武力解决密电”存在；反证之二，杨尚昆回忆说：“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34] 反证之三，彭德怀回忆说：“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

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35] 反证之四，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对于 9 月 8 日和 9 日这两天发生的事有详细记述，还完整地引用了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及张的复电，但没有提及有密电之事。徐帅确认：“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徐向前说“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显然是针对叶剑英声称前敌指挥部的一个副科长向他提供电报之说的澄清。[36] 上述杨、彭、徐的回忆证明，叶剑英报告的“密电”就是张国焘命陈、徐南进的电报，其中并无“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叶剑英在 1982 年接受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37] 然而，叶也没有提到张国焘命右军南下电令之外另有一份密电。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否定张国焘发出“武力解决”密电说指出：“第一，中共的有关文件中没有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第三，当时负责收发电报的机要电台工作人员没有发现‘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第四，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均按自己的密码本发出和译出，谁也无法译出对方的电报。[38] 中共党史的各种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和朱、王两教授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及密电故事系毛泽东为给张国焘定罪而编造的谎言。

“密电”子虚乌有，从红军分裂到张国焘出走的脉络就清楚了：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拥有八万强兵，中央红军仅有万余残兵。军力对比之下，张国焘掌最高指挥权在情理之中。毛泽东以两军混编的办法剥夺张对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以中央名义迫张服从。张及四方面军将领拒绝接受。毛泽东感到两军武力冲突一触即发，于是不辞而别，撇下了同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投共的原国民党军赵博生、董振堂部）、红十二军和数百伤兵，率一方面军主力乘夜逃走，先落脚陕北。于是，张国焘不再承认张、毛的中央，另立了自己为首的中共中央。这时，莫斯科派林育英到达陕北传达斯大林认可张闻天、毛泽东搭档的中共中央及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林育英只是信使，并无在红一、四方面军间宣布认可的授权，因为莫斯科并不清楚红军和中共中央分裂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开始施展手段，说服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宣布张国焘的中央非法。林育英致张第一电是以个人名义建议张将分歧交国际裁决，第二及第三电改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认定张的中央非法，要求取消。这第二、第三电是否真是林本人之意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毛的手笔和授意。毛利用林育英信使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身分模糊致电红四方面军，瓦解了四方面军对抗陕北的勇气。张国焘承认失败，放弃另立的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利用国民党军推进到黄河的形势将红四方面军一分为二，待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改变作战计划，不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南线配合，将四方面军主力搁在河西，然后电令西路军西进、停留、调头东进、再调头西进。西路军被马家军歼灭后，毛对丧失军事本钱的张国焘展开整肃，迫张脱离延安，然后编造出了“密电事件”给张定了“反党”罪。可以说，毛后来给叶剑英挂尾元帅衔，赞他“吕端大事不糊涂”，都与合作编造密电事件相关连。毛泽东视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为权力地位威胁，宁愿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送入河西走廊灭掉。这样一来，红军整体虽然弱小了，但毛相信只要有权力地位在，只要有莫斯科的认可，援助会源源而来，军队削弱后可以再壮大。

战胜张国焘过程中，毛泽东利用林育英代表莫斯科致电四方面军起了关键作用。张闻天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39]，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曾质疑林育英共产国际代表身份，[40]二人都因此惹毛记恨，在后来遭毛整肃。几年后，林育英病逝，毛泽东亲为执紼题碑，以表达林的匡扶之恩。有人说，毛泽东赢张国焘赢在利用林育英“假传圣旨”。这是毛制胜原因之一，但毛胜张不取决于林。斯大林选定毛是决定因素。如果斯大林选定张国焘，毛泽东再怎么利用林的名义发电报也没有用。

多年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总结西路军的败因说：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电令马首是瞻，那最后决定权实际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41] 其实，徐帅为首红四方面军将领们最清楚，西路军是毛泽东、张国焘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他们不愿挑明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想让后人了解他们因表态效忠毛泽东走过来的历程。

迫张国焘出走后，毛泽东批准怀孕的张夫人杨子烈离开延安。毛让杨捎话给张说：“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张国焘知道与中共为敌的下场，接受毛泽东的警告，此后保守中共秘密，淡出政治舞台。他后来回忆说：“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明毛共产党内斗争的极端残忍性。”[42] 其实，毛泽东因顾虑红四方面军余部兵变而对张国焘算客气了。张、毛二人分别主持的苏区肃反比这不知残忍多少倍。

对于离开延安的动因，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洛川会议上对毛泽东、张闻天在民族危亡时提出避免对日作战，壮大力量准备将来与蒋介石开战的方针感到痛恨。这里，张是在美化自己。因为，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创始人，张也没有民族危亡观念。在中苏战争中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苏联国庆日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时，在长城抗战中追杀北上的国军并扩大苏区时，张都没有想到国难当头的民族大义。西安事变后，在中共一面宣言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一面组织西路军去“接通苏联”获取军火时，张也没有谴责这种欺骗国人的行径。他在权力斗争落败时才想起民族大义。应当说，张国焘在出走时的《敬告国人书》和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谴责洛川会议方针只是在发泄权力斗争失败的怨气而已。虽然他在回忆录中没有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忏悔，没有对率领红军杀人抢劫忏悔，没有对主持肃屠杀革命同志忏悔，但他见蒋介石时的一句“兄弟在外糊涂多年”似乎表达了一切。他终究告别了革命和革命信仰。相比其他中共革命家，他享受了更幸福、平静的晚年。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在当年西路军埋骨的河西走廊建了多处西路军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其中的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马家军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显示西路军失败的悲壮。不过，纪念馆没有告诉人们的历史背景是，中共一面向国民政府作出“四项保证”，通电停止内战、归顺中央政府，一面命令西路军拒绝政府军收编，不是东进去抗日，而是西进去获取外国武器以颠覆正在准备抗战的国民政府。有一些历史事实是革命纪念馆不会展示，刻意回避的。马家军为什么将西路军头领砍头呢，血腥的背后是更加的血腥。数万西路军在荒凉之地转战数月，为了生存对沿途回藏民众的蹂躏，杀戮，比马家军残酷得多。马步芳、马步青在向行政院发出的申请拨款赈济电文中描述了西路军沿途的祸害写道：“南京行政院长蒋钧鉴，军政部长何赐鉴，窃查共匪窜据山丹永昌等处，时历数月，焚杀蹂躏，备极惨苦。职部奉令进剿，业将该地先后克复，所有详情均经电呈在案，惟劫后

子遗颠沛流离，冰天雪地，无衣无食，哀哀生民竟度非人生活，刻值甘肃情形混乱，请赈实属无法，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座，我公体念蚩蚩者氓遭此浩劫，惟堪悯恻，迅拨巨款，赐予救济，全活炎黎，安辑流氓，地方国家均深利赖临电，迫切不胜待命之至。陆军第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同叩巧印。” [43] 革命纪念馆只述说革命军的悲壮，却隐瞒了革命军的一路劫掠。在冻饿而死的西路军将士背后是更多冻饿而死的被劫民众。因为西路军沿途对回民的烧杀，才有回民武装将西路军将士砍头报复的残酷。幸存的西路军将士们即使在晚年回忆录中也没有对自己参与的劫掠烧杀忏悔过。因为，作为党人，为了党的利益，那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第 28 章 国军抗战

七七事变

挑起中日冲突是苏俄维护本国安全的中心思想。维经斯基来华建立中共时阐明：“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恐惧日军北攻苏联，立即通过共产国际策动了中日淞沪战争，促国民政府对日开战运动，在 1934 年批准红军退到西北，解除红军对国民政府都城的威胁。1935 年，希特勒颁布了“国防法”，规定普遍实施义务兵役制，大力扩军，德国再度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英法等国奉行“绥靖”政策，希望将德国的进攻矛头引向苏联。应对英法的绥靖政策，斯大林采取与德国暗中勾结，密约瓜分欧洲的对策。这时，他最怕的是中国政府搞“东方绥靖”，在华北对日妥协，将日本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

国民政府确实在搞“绥靖”。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尽量与强敌日本周旋，以妥协政策推迟与日本的全面战争。蒋介石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认为，日本必然发动战争，但进攻方向尚不确定，可能进攻中国，也可能进攻苏联。日本去攻苏对中国有利。因此，他与汪精卫制定了对日妥协谈判，尽量推迟对日开战的方针。蒋介石怕背骂名，推汪精卫出面主持对日妥协。汪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主持了一系列对日谈判，以在华北对日妥协的方式使日军向华北扩张的要求获得部分满足，暂时止步华北。应对蒋、汪的“东方绥靖”策略，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命令中共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指挥在华的各路人马掀起以促中日开战为宗旨的所谓抗日

救亡运动，其中的代表作是以暴力冲击加舆论攻势迫政府对日立即宣战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兵变（二二六兵变）。以香田清贞为首等一批狂热的“皇道派”陆军青年军官发动兵变，打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改造国家”的旗号袭击了内阁，枪杀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军事参议官兼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秘书官松尾传藏等政要，占领了首相官邸、国会、陆军省、警视厅，发表声明要求任命力主进攻苏联的“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以真崎甚三郎为内阁首相，建立军部统治。虽然昭和天皇下令镇压兵变，将部分主张北进向苏联进攻的“皇道派”激进分子清洗，将暴动骨干处死，但广田弘毅为首的新内阁不得不屈从狂热军官，接受军部提出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出任陆军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领大将军衔的现役军人担任及扩军备战等要求，提出了30亿元空前规模的预算，将军费开支大幅增至14亿元。“二二六”兵变后，日军内的“北进”派势力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在北进派的影响下，广田内阁于1936年11月在柏林与德国政府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德结成的反共同盟矛头针对苏联。斯大林不能再等待慢功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而要求迅速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正当共产国际制造了“七君子事件”迫蒋介石对日宣战之时，张学良与毛泽东发动了意在推翻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打乱了斯大林的部署。斯大林对张、毛的事变极为恼火，以最为严厉的措辞命令毛泽东和平解决事变，严令毛泽东接受蒋介石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在斯大林主导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得到全国各界、国民党内各派的一致拥护。斯大林乐于见到中国各派团结在蒋介石领导下准备对日开战的局面。令他不安的是，日军并没有趁中国政局动荡发动侵略战争的打算，没有在华北集结重兵，反而是在满洲集结了重兵。斯大林感到日军北攻苏联迫近，要求立即动手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策动华北国军向日军挑战的指令。

毛泽东也希望中日早日开战，认为日本人打进来可以帮助中共获得安全和发展机会。两年来，他阳奉阴违地抵制莫斯科的红军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命令，拒绝国民政府染指中共军权和地盘。对于共产国际立即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指示，他决定切实执行。根据莫斯科和延安的指示，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时化名胡服）向驻守卢沟桥地区的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发出主动进攻日军的指示说：北平的态势是“敌弱我强”，所以应该主动出击。[1] 在日军随意在华北进行军事演习的形势下，以爱国口号策动官兵向日军开火不难做到。

1937年7月7日夜，中共华北地下党与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党员联手行动，先是绑架了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日军的一名离队士兵，然后在黑暗中向日军开枪。枪击过后，日军清点，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该士兵在1960年代的访谈中说，他在找地方大解时被绑架，在芦沟桥战事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回队。战后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七七事变的证词为：“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夜间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信号，判断这是中国士兵用暗号在互相联络”；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在东京大审判中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在事变中配合了中共。

7月8日凌晨，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冀察当局电话交涉士兵失踪和枪击事件。这时，二十九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副参谋长张克侠、第110旅旅长何基沣指挥二十九军219团接连向日军发起进攻。[2] 7月8日4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在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二十九军开火。众将认为，与中国的协议规定百人以下演习不用照会中方，现在士兵失踪又遭枪击，不能对二十九军的挑衅示弱。[3] 7月8日5

时，田代下达了反击命令，5日30分，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向卢沟桥进攻，中日两军开战，是为卢沟桥事变。

7月8日晨，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在其中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声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7月9日，中共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萧克、左权、徐海东等红军署名通电全国，声称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请授名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动身庐山。14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在庐山，正在召集庐山谈话会的蒋介石、汪精卫获悉芦沟桥发生事变，立即主持制定了“不屈服、不扩大”的应对方针。

共产国际引爆中日战争的行动不光在中国，也在日本。从策动淞沪战事开始，共产国际在中国、日本的间谍队伍与中共协调行动，都在执行莫斯科促中日开战的方针。1932年，莫斯科得到了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日本将军谈话的情报。广田表示：“日本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与中国开战纯属偶然，是被人带入了‘历史漩涡’，越转越深。日本应苏强硬政策，为占领东西伯利亚不惜一战”。得到这一情报，莫斯科立即部署，将佐尔格从上海调到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与共产国际旗下的日本间谍尾崎秀实配合，共同领导数百日本间谍队伍，执行共产国际下达的避免日本对

苏联开战任务，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更具体的说是在日本政界、军界推动对中国开战的任务。[4] 1937年6月，近卫文磨上台组阁，尾崎秀实出任了首相顾问兼私人秘书，出席首相的智囊团会议。推动近卫首相对中国开战的同时，尾崎把日本高层的情报报告给了共产国际，同时通过他的助手，中共党员中西功从上海将情报发往延安。

芦沟桥事变两周前，东京军政界传出了“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九一八事变）的流言。日本政界要员大谷光瑞和军界高层冈本清福奉命来到北京制止日军可能策划的“第二次柳条沟事件”。二人认为：“日本现在不宜在华北挑起事端，必须设法加以防止意外爆发的战争”。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5] 因此，芦沟桥事变传到日本，刚刚上台一个月的近卫内阁和日本军部对开战消息感到突然。军部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于7月8日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电令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7月9日凌晨，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再致电宛平县县长王冷斋，通知“失踪日本兵已经找到”，希望国民政府方面停战。

这时，日本军部内“事变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激烈争论。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将领为代表的“事变扩大派”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可以用恫吓的老办法，“对支那一击”使中国政府屈服。不扩大派没有那么人多势众。其代表人物是日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石原根据“胜利极限点”理论和第二次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坚决反对日本进攻华北，反对“得陇望蜀”，警告中日全面战争只能使苏联坐收渔人之利，将使日本消耗数十亿日元的军费，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日本绝无取胜的希望。他建议近卫首相速飞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谋求立即停战。“扩大派”们虽有心向华北扩张，但也没有想与中国全面战争，其中最激进的小矶国昭的主张是占

领黄河以北地区后止步，大多数的主流意见是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后止步。

日本没有全面战争的计划，但斯大林必欲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不会只在芦沟桥动手。延安和刘少奇还有一连串部署。紧接着卢沟桥事变，中共指挥二十九军中的地下党相继制造了大量杀伤日军的北平“广安门事件”和通州保安队杀害数百日本、朝鲜侨民的“通州事件”。[6] 在中日两国政府谋求避免战事扩大及日本军部内“事变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激烈争论时，接连发生的杀伤日军的“广安门事件”和屠杀日本侨民的通州暴行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在华日军强硬派和军部的“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同时也摧毁了中日两国政府避免冲突扩大的努力。于是，日本方面被斯大林的部署牵着鼻子走：五相（首相近卫、外相广田、陆相杉山、海相米内、藏相贺屋）会议抛弃了“不扩大”的既定方针，同意了陆相杉山元提出的向华北增兵的动议；接受石原的建议正准备飞赴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谋求停战的近卫首相因军部内“扩大派”主导了局面而无法成行；日军统帅部决心报复“通州”、“广安门”杀日人暴行，任命日本“二二六事变”中的重要参与者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接到撤职令后心脏病突发而亡）；7月16日，日陆军省提出了宋哲元正式道歉、师长冯治安免职、中国撤退八宝山附近军队等限期要求；7月26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29日，北平失陷，宋哲元逃离，30日，天津失陷。攻占平津后，日军强硬派在国内举行了庆祝活动，“不扩大派”的声音被军事胜利和民众狂热压制。

对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影响重大的芦沟桥事变后被中共宣传为是日军为挑起全面侵略中国而蓄意制造的。然而，二战结束时盟军缴获的日本官方档案证明，芦沟桥事变前，日本并无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部署，华北日军兵力

仅 7000 人，不及国军二十九军人数的十分之一，东京日军参谋本部在事变前一个月还命令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7] 日本在芦沟桥事变前没有对华开战的计划，倒是有进攻苏联的计划，关东军有着对苏开战的军事部署。一系列事实证明，芦沟桥事变是苏共和中共蓄意制造的。例如，二十九军向日军发动攻击发生在 7 月 8 日 4 时，日军下令开炮是在 7 月 8 日 5 时，两军战斗发生在 7 月 8 日白天。但是，中日军队在宛平刚刚开战，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已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毛泽东率红军众将致蒋介石的“请缨杀敌”通电。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在南京政府高层获得报告前，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没有可能在战斗刚刚爆发时发出通电，除非中共事先知道事变将发生。发出通电后，中共意识到自己反应过于迅速而暴露了真相，于是在报刊上刊出“七七事变”说法，硬是将七八事变说成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当时没有想到七八、七七一天之差的背后玄机，跟着中共称卢沟桥事变称为“七七事变”。挑起芦沟桥事变，挑起中日战争的行动是苏共、中共必欲掩盖的机密，有关文件不会留存。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通过一些间接资料还是能够暴露真相。例如，奉刘少奇之命指挥芦沟桥挑战的张克侠多年后披露：“我在 1929 年就入了党。1937 年 4 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 [8] 张所言的“这个指示”是刘少奇部署在芦沟桥向日军挑战的密令。

被苏、中两共拖入中国战争泥潭后，日本侦破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等人的共产国际间谍身份，将二人逮捕。两首领被捕后，他们的间谍团队还在，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继续执行共产国际陷日本于中国战场的指示。日本恨透了尾崎秀实、佐尔格等间谍，特意选在苏联国庆日将他们处决，间接披露苏联挑动中日开战的真相。战后，中共、日共长期将尾崎秀实纪念为革命英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是三国共产党联手策划芦沟桥事变（准确的说是七八事变）的一个注脚。

庐山谈话会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集党政军要员在庐山举行了商讨对日问题会议。会议决定，继续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上庐山，广泛听取各界对外交、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的意见。7月初，首批谈话会代表应邀上山。7月8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程潜等军政要员商议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应战不求战，力求局部解决，做好两手准备，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的方针，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指示外交部和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分别与日军方面展开了交涉、谈判。

7月16日，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开幕。16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各界名流，其它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出席了开幕式。主持会议的国民党中央会主席汪精卫先向大会汇报了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情况。在长城抗战后打抗日旗号发动叛乱的冯玉祥带头唱抗日高调说：“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众人跟随，高调主导了大会。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决心抗战的演讲，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主战高调的气氛中，只有很少人不怕挨骂积极主和，或者主张尽量推迟全面开战。军委常委徐永昌指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知识界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为代表的少数精英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下于大战发生前为之”。少数人主和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中日在国力、军力的巨大差距：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时年钢产量曾达到5万吨，而1937年全国钢产量仅4万吨（不算日据下的东北钢产量56万吨），而日本钢产量为580万吨，还控制着中国关内煤产量的三成，铁矿沙、炼铁的

九成；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仅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和少量小型舰艇，且主要部件和原材料依赖进口，日本能生产飞机、大口径火炮、汽车、坦克、军舰；中国只有小型、陈旧的舰艇 60 余艘，排水量共约 6 万吨，其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 1896 年从英国购买的，日本有包括近 300 艘大型军舰的全球最强舰队；在装备方面，国军每师平均兵员 9600 人，但步枪仅 2000 支，且以落后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士兵只有粗布衣两套，草鞋两双，每日只吃两餐，其中一餐是稀饭；日军每师团平均 22000 人，轻重机枪 600 挺，汽车 1000 辆，战马 2000 匹，山炮 200 门，装甲车 20 辆，加上军事素质差异，战斗力为国军十倍。因此胡适提出“中国为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日本陆相杉山元则声称“一两个月就能战胜中国”。在讨论是否发布应战宣言时，会议出现分歧。蒋介石决定采取折衷办法，不发应战宣言以为和谈留余地，但公开发表他的“最后关头”讲话表达中国抗战决心。7 月 19 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见报。随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龙云、商震、陈诚、阎锡山、汤恩伯、刘湘等将领发表抗战通电，各界纷纷成立抗敌后援会，集会游行，表达拥护政府的抗日决心。

7 月 28 日，第二期谈话会在牯岭举行。蒋介石已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会议致电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将士，声言“宁使八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会上，胡适、王世杰、傅斯年等人针对不少人提出的在战时将大学改成短训班，让大学生参加战时工作，甚至停办高等教育的提出反对意见。胡适指出一战中，各国把大批大学生送上前线，到战后才认识到失策。他主张吸取欧战各国的教训，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办常态教育。接受胡适等人的建议，国民政府决定在全面抗战中坚持办大学。因日军攻占北平，第二期谈话会于 29 日即告结束，原定第三期谈话会因淞沪战事而被取消。

根据这次会议关于坚持办教育的决定，国民政府在不久后将避难到长沙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后再迁往昆明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

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政府均致力于防止战事扩大，争取和谈停战。日军攻占平津后，两国政府没有放弃避免战事扩大的努力，约定在上海就卢沟桥事件、广安门事件到通州事件善后事宜举行停战谈判。8月初，奉广田外相之命，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展开了议和谈判。日方提出停战条件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9]** 8月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上海开始了卢沟桥事件、广安门事件、通州事件的善后和谈。

然而，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部署不仅限于华北。在策动芦沟桥事变的同时，共产国际还部署了在上海策动国军向日军进攻，动用了安插在国民党内的一颗重要棋子——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1923年，张治中入读苏俄出钱开办的红色大学——上海大学，被共产国际发展成为了红色代理人。与大学中的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任弼时等共产党人相比，他的红色身份更加保密。一年后，张治中被苏俄顾问调入黄埔军校任职。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小型婚宴上，张是客人之一，让人相信他与周恩来是同志。“中山舰事件”中，张因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而被国民党右派指为“黄埔四凶”之一。右派所指没有错，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确实都是俄党，只是张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红色身份不曾暴露，获蒋介石信任。在通过刘少奇策动二十九军华北开战的同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直接向张治中发出了进攻日军的指令。根据指令，张治中向南京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在上海“先发制敌”的开战建议。1937年8月9日，在中日代表展开停战谈判当天，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策动保安队杀害了海军中尉

大山勇夫等驻沪日军官兵，挑起了日军的报复行动。8月13日，张治中不待蒋介石批准，径自命令驻沪国军向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挑起了第二次淞沪中日战事。驻沪日军仓促应战，要求国内派兵增援

蒋介石清楚日军有北攻苏联的计划，清楚苏联最希望中日早日开战并在推动中日开战，清楚扩大淞沪战事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五年前的淞沪战时，他与汪精卫联手制定了不扩大战事，对日妥协周旋的明智政策，与日本签定了停战协定，等待日苏战争爆发。因为有汪精卫出头负和谈责任，国民政府在五年中成功贯彻对日周旋政策，让斯大林引爆中日战争的计划受阻。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制定了“不扩大”的方针。但是，在庐山谈话会上，冯玉祥等人掀起了唱抗战高调的潮流，蒋介石怕被骂为妥协投降，换上戎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下山后，他不想承担和谈责任，分别约见了英、美、德、法大使，希望列强出面调停迫日本停战。然西方列强只作抗议姿态，无意对日用强。德国与日本有反共协定，顾虑中国为对付日本倒向苏俄，表态愿意为中日两国政府传话。淞沪战事爆发后，蒋介石抛弃了高层一致同意的限制战事、争取和谈停战的既定方针，决定在上海把战事扩大，希望在上海有重要利益的美英进行干预，迫使日本停战。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对日作战声明，出动仅有的空军力量轰炸了日军虹口阵地和日海军第3舰队，以高志航为首的弱小中国空军与日空军展开了激战。

驻沪日军官兵被杀及国军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军部内“不扩大”派的声音顿时丧失号召力。8月15日，日本内阁发表追随军部立场的声明说：“为膺惩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日本继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第三次设立天皇亲临的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组建上海派遣军赴沪。共产国际在华北、华东一起动手挑起中日战争的策划达到了预期效果，中日双方轮番增加兵力投入，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将可调用的中央军几乎全数投入淞沪，并西南调各路诸侯部队增援淞沪。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陈诚指挥第十五集

团军在虹口、杨树浦、吴淞、宝山、罗店一带与日军激战，淞沪战斗升级为“淞沪会战”，两国政府的和谈陷于停顿。

与五年多前的第一次淞沪战事时一样，共产国际在沪人马在会战前后大作爱国秀：张治中在开战前向所部国军将士慷慨陈词说：“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特揭櫫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10] 共产国际下属团体高调募捐支持开战；各界救国会又高调发起了捐献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等支持开战运动。国人不知道，这些爱国秀是在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推动战事升级的指示。

9月，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应国民政府请求召开会议讨论中日战事问题，日本拒绝派代表出席会议。为配合外交，等待九国公约国会议会推出制裁日本措施，蒋介石继续向淞沪战场增调川军等地方杂牌军，甚至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宋子文的税警团都调上了淞沪前线，使国军在淞沪的兵力增加到 73 个师约 70 万人。李宗仁、白崇禧等高层将领反对蒋介石孤注一掷的指挥指出：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我军在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作战应适可而止，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上海保卫战是为向国人交代，宜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李宗仁更建议考虑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11]

10 月中，日本外务省声明：如中国提出和平建议，日本不拒绝谈判。10 月 25 日，日军攻陷战略重镇的大场，国军第十八师守军几乎全部牺牲，师长朱耀华自杀殉国。在国军已无力拒守的情况下，蒋介石不顾战场危局，为等九国公约会议迫日军停战撤军，严令国军在淞沪死守。11 月 3 日，九国公约国在布鲁塞尔开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表沉痛演说，促请各国制裁日本。11 月 5 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国军侧后，合围上海。

同日，日本广田外相提出的讲和条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给了蒋介石。条件内容为：内蒙自治、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维持中国主权，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等。这些条件是石原莞尔和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为首的日本主和派艰难推动的结果。他们向军部呼吁中日战事扩大只能让苏联得益，应积极谋求通过外交渠道尽快结束战争，推动陆相杉山元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请德国人出面调停。日本主和派们认为，上述停战条件主旨是恢复战前态势，没有赔款和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完全在中国国民可接受的范围内，中国政府定会接受条件达成停战。德使陶德曼劝国民党政府说：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拒绝讲和，后来德国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但是，日本主和派估计错了。蒋介石以“所提条件可以作为协商基础”的词令搪塞，对日本方面的停战提议不作接受或拒绝的表态，同时将日本提出和谈条件对国民政府军政高层隐瞒，拒绝众将领要求有序撤退的建议，命令几十万大军在险境中坚守。然而，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后，淞沪战场的国军腹背受敌，已经无力执行蒋介石的坚守命令。11月8日，淞沪国军开始溃败。直到这时，蒋介石才下令撤军。这时的撤军令已无意义。三天前可以作到有序撤退此时变成兵败如山倒，淞沪几十万国军自相践踏，争相逃命，各部队完全丧失了配合与联络，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先退的部队为防追击而大肆破坏路桥，断绝了后面国军的退路，撤退中的人员、装备损失比会战中对日军作战的损失大得多，溃逃路上一片狼藉。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淞沪会战结束。

国军在会战中损失了八十五个师，伤亡官兵三十三万多人，[12] 宝贵的德国装备的坦克部队和空军基本被消灭，是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溃败损失。李宗仁后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

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淞沪会战虽然惨败，但一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狂言，国军上下同心决一死战的气概赢得了国际社会尊敬。蒋介石夫妇的英勇无愧于将士，蒋四度亲赴前线指挥，在苏州附近遭到日机追击，险遭不测，宋美龄冒险赴上海慰问伤兵，在路上遭到日机袭击，车毁人伤，被迫出国疗伤。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发表社论评价说：“中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须知若干中国军队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阵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淞沪会战是蒋介石军事生涯的大败笔。他以元首身份自兼会战最高司令官，角色冲突。指挥极为失败。首先，他倾尽全国精锐投入淞沪战场就极为荒唐，直接造成几十万大军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饱受日本空军攻击，损失惨重，许多国军部队在调往前线途中已被重创。其次，在败局已定，退路不保的严峻形势下，他抛弃原定的及时退守计划，一再拒绝有序后撤的建议，强令几十万大军为等待一个国际会议决议而死守，直到战线崩溃时才下达可有可无的撤退命令。作为司令官，蒋介石对几十万大军自相践踏，溃逃损失超过两个月作战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淞沪会战更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大败笔。作为政治家和元首，他拒绝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的意见，以升级战事的方式赌英美列强出手制日，同时将日本方面提出的停战建议对高层隐瞒，在关键几天中以不置可否的方式拒绝了和谈机会，

让几十万大军坚守，甚至在日本杭州登陆，国军后路被抄时仍然强迫大军坚守，等待虚无缥缈的九国公约会议制裁。会战结束后两周，九国公约会议结束，只发表了谴责日本的宣言，而没有推出任何实质性制裁日本的措施。这样的会议结果政治家们意料中的事。英、法期望德、日对苏联开战而无意对德、日强硬，英国外相艾登早前在国会演说得明白，日本，意大利已经退出国际联盟，英国无力制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尚未走出大萧条，对亚洲贸易的一半是出口日本，因此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只声明谴责日本践踏了九国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协定，无意采取强硬制裁行动。蒋介石并非不清楚九国公约会议强硬制裁日本的虚无缥缈。他硬要赌九国出手迫日本撤军是无非是想回避自己作议和停战决定的责任，想躲避骂名。

蒋介石对议和的恐惧是因为中国有唾骂议和者的传统。被骂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在国家军事无力御敌的形势下出面签署和约，换来了南宋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自己被铸跪像永遭唾骂。史学家吕思勉为秦鸣冤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挾赖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13] 胡适也为秦鸣冤说：岳飞等大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14]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有机会看到蒋介石日记，阅后说：委员长满脑子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心怀岳飞情节的蒋介石最怕被骂为秦桧，勇于战场献身而怯于决策主和，不仅不敢承担和谈责任，甚至不敢公开日本的停战建议。他拒绝宣布上海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将战事升级，隐瞒了日本主和派冒杀身风险提出的和谈建议，一再否决撤退的建议，背后不便明说心结是怕被骂为不抵抗。两国交战中，唱高调容易主和难，主持和谈须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在日本，主和的首相屡屡被刺，文官内阁只好向军部屈服。在中国，汪精卫因主持和谈又背骂名又遇刺。汪精卫赴欧后议和便没了可能，于是出现几十万大军为等会议结果而

坚守的荒唐，然后是溃败的悲惨。可以说，淞沪会战中数十万军民既是死于日军侵略，也是死于蒋介石害怕被骂投降的私念。共产国际和中共策划的七七事变、广安门事件、通州事件，杀害大山勇夫事件和淞沪进攻行动环环相扣的，策划功夫是用到家了，但是如果蒋介石不怕挨骂，坚决限制战事扩大，拒绝将淞沪战事升级，像日本主和派那样勇敢推动和谈，则斯大林挑起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不会得逞。淞沪战事中，日本通过德使转交的和谈条件完全在中国政府接受范围内，如果蒋介石像汪精卫那样不计较个人名节，勇于承担和谈责任，接受日方“恢复战前态势”的停战条件，中日完全可能达成五年前第一次淞沪战事时通过和谈停战的结果，中国完全可能避免八年全面抗战，则中日战争可能转变为日苏战争。然而，蒋介石怕背骂名的心思自我摧毁了国民政府在芦沟桥事变后限制战事扩大努力，成全了斯大林的策划，将中日两国拖入了全面战争，粉碎了国民政府奉行了数年的“东方绥靖”政策，也彻底粉碎了关东军的北攻苏联的计划，帮助斯大林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威胁。如果是那样，二十世纪世界史将完全不同，不过蒋介石可能像汪精卫那样身败名裂。

蒋介石将淞沪战事升级成全面战争结果是斯大林最满意的。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消息使莫斯科欣喜若狂。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LITVINOV)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EON BLUM)表示，他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为了不暴露苏联推动两次淞沪战事的运作，也为保护红色代理人张治中，斯大林淞沪战后不久把向张治中传达指示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召回国灭了口。

[15]

南京保卫战

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后，日本政府命令华中方面军止步上海，不得向南京追击，并再请德国出面调停，向中国政府再提恢复淞沪战前态势的停战条件。在日军参谋本部内，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继续努力

谋求中日停战议和。石原呼吁，日本应止步中国，与德国夹攻真正的宿敌苏联。他的主张得到陆军参谋本部多田骏次长和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以作战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第三部部长塚田攻少将为代表的“扩大派”则主张乘胜占领中国首都以达到迅速征服中国目的。在两派意见激烈斗争中，“不扩大派”稍占上风。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多田次长主导下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下达了《临参命第138号》电令，命令日军“追击不得越过苏州至嘉兴以东的‘制令线’”。参谋本部主和派感到，对中国有利的和谈条件将遭遇中下级狂热军官的反对，要想达成停战必须赶在日军占领南京前有和谈结果，于是急请德使再次向蒋介石传话，表示和谈条件不变，促蒋介石尽快决断。蒋介石不肯承担讲和责任，以“考虑”词令回复，拖延议和。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从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迂回包抄一举迫使国军全面撤退，伤亡很小，锐气十足，狂热军官们不肯在胜利时止步，被日本舆论赞为“推进神速胜利者”的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决心乘胜攻占中国首都，使自己成为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百年梦想的实现者。11月15日，柳川召开军团会议，让全体军官决定是否乘胜进攻南京。会议决定“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屈服中国政府的作战意志、争取更有利于日本和谈条件”，“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会后，第十军迅速向南京进军。

在日军攻向南京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要求高层集体决定弃守还是坚守南京。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提出，与其在南京作无谓防守，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多数高层也主张弃守南京。李宗仁指出，上海南京间一路平原，军事上无险可守，国军主力上海新败，无力防守南京。对日作战打持久战，不计较个别城池的得失是开战以来大家的共识，与其在南京打无谓的保卫战，不如将守南京的国军撤往长江两岸阻止日军的攻势。蒋介石何尝不知道弃守南京在军事上的

合理性，但他有难言之隐。其一，弃守都城将影响国民政府和他本人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和西方，战败投降天经地义。清代有了“清流”和汉奸骂名以来，主战、高喊军民与城池共存亡才被认为是爱国，为免生灵涂炭而主和，接受城下之盟都被骂为卖国、汉奸。张学良因弃守东北而背的了不抵抗骂名，他不想因弃守南京而北投降或卖国骂名；其二，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来解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斯大林通过不同渠道传话，苏联不会坐视日本侵华。就在几天前，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还传话，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决不坐视。蒋介石当然不会相信苏联会真心帮助中国，但他宁愿赌一把，也不想挨骂；其三，他仍期待九国公约国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制裁行动，迫日本撤军，那样他就不用承担和谈责任了；其四，他知道国军各派系在质疑他让地方军、杂牌军去与日本拼而保存中央军实力，如果不战而弃守南京他将难以军法处置不战而逃的守将。在为免生灵涂炭承担议和责任与打一场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形象保卫战之间，蒋介石选择了后者，决定打一仗给斯大林看、给公约九国看、给唱“血战到底”高调者们看、给各派系看的形象保卫战。

11月16日，蒋介石再次召开高层会议讨论保卫南京问题。他在会上定下基调：南京保卫战必须打。由于上述考虑摆不上台面，于是他搬出“国父陵寝必须保卫”作为保卫战的理由。蒋介石唱高调，众高层照跟，谁也不再力主弃守或宣布不设防，会议冷场。李宗仁打破沉默提出，如果一定要守南京宜只作象征性的防卫以减低战火摧残，也避免国军在新败后再遭重创。在象征性防卫还是坚守这一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不作表态，因为他知道，象征性防守显然还不如宣布不设防，且下令作象征性防守还是要背妥协投降骂名；他更不能明说死守，那在军事上完全无理且须对重大牺牲负责。休会时，蒋介石向过气军阀唐生智表示，如果没有适当守城主将人选就自己留下来守南京。唐知道，蒋意思是让他挂帅守城。

11月18日，蒋介石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守卫南京，称若无人愿意留下来他将亲自指挥守卫南京。唐生智站起来配合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对不起国父的在天之灵。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蒋、唐一番话使军事会议变成了政治会议，唐的死守高调等于给弃守、不设防之议戴上了投降帽子。谁也不愿被指为怯战、投降，于是众高层附和高调。蒋介石当场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作为最高统帅和会议的主持者，蒋介石在李宗仁提出的象征性防守意见和唐生智的“誓与南京共存亡”高调之间不作出明确的指示。于是，连续三次的最高层的军事会议在人人怕挨骂的气氛中不明不白地结束，在对南京三十万军民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模棱两可，没有人说得清会议决定的到底是死守还是象征性短守。11月20日，国民政府在中日军队在苏州、常熟激战的形势下宣布迁都，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蒋介石任命罗卓英、刘兴为南京城防副司令。迁都宣言发布后，南京民众纷纷恐慌外逃，在南京的外国人自发地组成了“国际委员会”，推举德国人拉贝为主席，在金陵大学，教会医院，高等法院，各国使馆，包括日本的领事馆以及国民政府建筑内设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向难民提供庇护。在国民政府撤离前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唐生智发誓与南京共存亡，随后下令南京戒严，破釜沉舟，断绝十几万大军守城官兵的退路。12月1日，国民政府机关开始撤离南京，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命令南京市民移居到“国际安全区”，将南京的行政责任委托给了“国际委员会”。

11月下旬，日军参谋本部的多田骏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赶紧命令第十军停止前进。第十军“以下克上”，不理睬参谋本部的命令，向南京迅速推进。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不想让柳川平助轻易得了头功，也擅自向南京进军，同时致电军部要求批准向南京进军及占领南京。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根据秘密制订的《京沪保卫战计划》开始在上海与南京之间修建了两条防御线：吴（苏州）福（福山）线和锡（无锡）澄（江阴）线。由于蒋介石一再拒绝有序撤退，致上海大军“兵败如山倒”，

来不及在苦心修建的两防线布防，也根本找不到工事图和防御工事的钥匙，吴福、锡澄两防线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惨遭迅速追击的日军行军越过。至11月底，日军占领了苏州、无锡、常州、江阴要塞，形成了对南京的合围。由于推进过于迅速，日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显现，弹药食品成了问题。在此之前，国军已实施了“焦土”政策，先行焚烧，使日军很难得到补给，进向南京的数万日军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实施“就地征发”，即就地抢劫物资。在蒋介石拖延回应日本主和派两度提出的停战提议的半个月中，日军参谋本部的强硬派抬头，压倒了主和派。12月1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和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在狂热军官们的压力下向强硬派低头，发出了向南京进攻的《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任命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全权指挥“攻略南京战役”，由朝香宫鸠彦亲王（天皇叔父）中将接任松井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职。

蒋介石感到将日本方面的议和提议一直隐瞒下去不是办法，向高层如实报告又感到为难，于是命外交次长徐谟陪同德使陶德曼来到南京，让徐、陶向众高层作个交待。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再召开高层会议，让徐次长向高层报告他隐瞒了近一个月的“广田和平建议”。报告后，众高层追问日本是否还历其它条件。得知日本方面没有其它条件，众人均表示可以接受日本提议，应尽快停战。蒋介石还是不作决定，逐个问众高层的意见。唐生智沉默，白崇禧说：“如果是如此条件为何要继续战争？”徐永昌说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同样答复。蒋再问唐生智，唐谓赞同众人意见。众人全部表态同意后，蒋介石表示：德国调停不应拒绝，但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16]当晚，蒋回复德使陶德曼说，中国愿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与日本开始和谈，但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再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复电蒋介石，对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电报称苏联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才出兵，实际是宣布一个月前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决不坐视”承诺作废。前三次南京高层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打南京保卫战的主要考虑一是赌斯大林出兵中国对日作战，二是要等列强出手迫日停战。收到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复电后上述两个南京保卫战理由都已经不成立，苏联摆明是不出兵了，九国公约会议已摆明不采取对日干涉行动了。按说，蒋介石有充分理由立即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下令军队撤离，使南京免遭战火，同时也有充分理由当机立断接受日本一个月前提出的，国民政府众高层一致同意（除一个唐生智外）的和谈条件。然而，蒋介石在这时仍然拒绝停战，坚持打南京保卫战。其理由已经很清楚，他要以打一场南京保卫战来维护自己的形象，避免自己被骂为妥协投降。当晚，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后离宁。

12月6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命徐谟将日本的停战建议再报告一次，然后请陶德曼将其“以日本条件为和谈基础”模棱两可答复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转告日本外相广田。而这时，接受日方条件实现停战机会已在蒋介石的拖延中不复存在，即使蒋介石此时明确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也无法达成停战了。因为，日本的主和派从来没有完全掌控大局，所提“不要承认满洲国，不要赔款，仅要恢复战前态势”的和谈条件有利于中国接受，但为日本强硬派反对。在蒋隐瞒拖延的近一个月中，日军的军事胜利鼓舞了强硬派，主和派垮台，强硬派主导了政府和军部，不再承认主和派提出的停战条件。在强硬派的主导下，日本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修改了原先的和谈条款，加入了“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等条件，日本政府只好对蒋“以日本条件为和谈基础”传话回复说须征求军部的意见才能答复，实际表明日本政府无法按照一个月以前所提条件谈判。主和领袖石原莞尔见和谈无望，感到日本大难将至，辞职离开军界。

12月7日，唐生智下令：城外国军不许退入城内；城内国军不许逃出城外；设连坐法以绝士兵的退路。作为南京守军最高司令官，唐生智只是将兵力分成外围与城墙守备两部，而没有下达明确的作战计划和出击，应变、后勤支持等具体安排，特别是没有为南京城内军民有序撤退作出安排。这时日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南京，南京军民的退路只剩下下关江边一个出口。唐生智下令撤掉从下关到江对岸浦口和上游武汉的渡轮，收缴江中所有船只以断绝南京守军的退路，命令防守挹江门的第36师和长江北岸的胡宗南部对任何擅自渡江逃跑者格杀勿论；命令江北胡宗南的第一军射击渡江北上的船只。在要求三十万军民殉城的同时，唐和一些高层将领写下了军事史上丑恶的一页：各自为自己预留了逃跑的汽艇、小船。

12月9日，日军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其中说：“百万日本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处于包围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格杀勿论，然对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如继续抵抗，南京将焚于战火，千年文化将毁于一旦，十年苦心经营将化为乌有……。”唐生智拒绝劝降，重申全体军民与南京城共存亡。

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城外圈的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了进攻。由于松井石根大将下令保护名胜，禁止日本在进攻中用炮，战斗成为短兵相接的搏斗。日军遇到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国军第88师的顽强抵抗，日军一度占领光华门，国军教导总队反攻夺回，双方极为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插手南京战事，于12月11日晚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12月12日晨，蒋介石改令再电：“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如南京能多

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17] 12日当天日军攻破中华门，蒋介石得到的消息后再改命令，于下午电话命唐生智撤退。

接蒋令后，唐生智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匆匆宣布撤退，但没有说明如何撤退、谁先退，谁断后，只是口头发布了“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的命令。会后，他带着卫队径自逃到下关，乘预留的专用汽艇渡江北逃，一走了之。匆忙中，唐竟忘了向防守撤退通道挹江门的第36师传令解除对撤退者的格杀令和对所有船只渡江的禁令。主帅一跑，众高级将领有样学样，纷纷逃往下关，乘偷偷保留的专用船逃命。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撤退时不管其它部队死活，先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低级军官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也跟往下关逃跑，当兵的再跟随。于是，数万国军部队和南京市民潮水般地涌往下关，大军土崩瓦解，自相践踏。守卫挹江门的第36师执行督战令，向撤退军队开枪扫射。经过激烈的国军间内战，逃命部队战胜守江门部队，冲开了挹江门时，逃命通道上叠起了几层尸体。逃到江边的军民发现无船渡江。军民们只好抓一块木板、一条树枝跳进江中，试图游水渡过两公里宽的长江，结果不是冻死江中，就是被江北未接到撤退令的胡宗南部开枪射杀。部分士兵见无法渡江就返回城中，扔掉武器，脱掉军装，化装成平民潜入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整个南京保卫战，在对日军战斗中阵亡的国军并不多，而死于自相残杀、自相践踏、溺江死亡、江中射杀者约有八万之众。[18]

12月13日，攻城的日军吃惊地发现，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突然失踪，南京城不再有人防守。入城后，他们见到到处都是国军抛弃的军装武器，知道有大批中国军人潜藏城内。入城后，日军华中方面军在淞沪之战中曾受到中国平民和学生组成的“便衣队”袭击，于是在南京“安全区”实施了大搜捕。搜捕中，脱掉军装的国军士兵对日军展开袭击。日军加大搜捕力度和范围，将怀疑为军人者一律处死。攻陷中国都城的消息传到日本，各地举行了提灯庆

祝游行，东京人涌向皇宫，“万岁”呼声响彻全城。华中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暂停了攻势，因为他们相信首都陷落后国民政府会投降。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以武汉为临时首都，将部分机关西迁重庆。而在此时，延安也在庆祝南京沦陷。毛泽东在延安举杯为国民党政府丢了首都干杯。他后来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 [19] 联系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阐述的让日、蒋火拼消耗的战略方针，在南京沦陷后举杯庆祝，潜伏共谍刘斐在高层会上力主张死守南京，唐生智要求军民殉城作破釜沉舟安排，刘、唐二人在中共建国后均获任高官等事实，史家不禁怀疑国军南京守军从死守到突然逃跑，自相残杀过程中有中共的谍影，刘、唐可能是在执行毛的战略。

南京保卫战是统帅只顾个人名誉，不顾生灵涂炭的典型案列。在淞沪新败，南京无险可守的形势下，蒋介石决定打一场“形象保卫战”，否决了众将领和德国顾问提出的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但在军民殉城死守还是象征性防守，守多长时间，怎样撤退等一系列关系几十万军民性命的重大问题上不作明确指示。他不便言明的考虑是，明说象征性防守等于指示可以逃跑，也会被骂为不抵抗。于是他私下授意唐生智出头唱死守高调。遵蒋之命，唐多次唱殉城高调，作自断退路的部署。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离南京前下达指令模棱两可，既像是李宗仁建议的象征性防守，又像是支持唐生智声言的“誓与南京共存亡”。可悲的是，不光最高统帅蒋介石怕背骂名，唐生智唱爱国高调时，所有的高层将领无人敢向汪精卫那样不怕挨骂地批评不负责任的高调，每个人都怕背骂名、都不想坏了自己名声。中国文化中要面子、说大话、许逃跑不许投降的恶劣品质在保卫战决策会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唱爱国高调留芳名，避免生灵涂炭留骂名的恶劣传统之下，蒋介石、唐生智为一己名声，先是唱死守高调，又夕令朝改，朝令夕改。蒋在命令“持久坚

守”的电报中称“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这时苏俄和美英都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兵干涉，“大变”之词显然是为荒唐决策作说词。蒋、唐二人的突然下令撤退直接造成了数万国军将士死于自相残杀与践踏。弃职率先逃跑的唐生智因握有蒋介石撤退令而不受追究。从唐在会上慷慨激昂唱高调，又偷偷为自己预留汽艇的事实看，蒋、唐在唱“与南京共存亡”高调时已经约定了虚张声势打一阵就撤，已经约定了“相机撤退”。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两位统帅在拿军民生命儿戏。不管蒋、唐是否事先约定虚张声势，南京保卫战都是枉赔十几万性命的荒唐战例。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公告对国军将领的奖惩决定。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对四十余名将领惩处。其中，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放弃雁北天镇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以不战而逃的罪名枪决，白崇禧、陈诚被降级等等。韩复榘在临刑前大呼冤枉说：“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杀韩之举证明，蒋介石坚持要打一场南京保卫战的用意之一是要证明自己没有不战而逃，要堵属下的嘴。不过，他枪毙韩复榘只是剪除异己之举，因为他没有追究临阵脱逃，造成数万国军死于自相残杀的唐生智。

12月26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强硬派增加了新条件的停战建议。蒋推托有病，命宋美龄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代接见。张群知道蒋介石不想拍板讲和的苦衷，向蒋献策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意思是说多打一阵，待河山破碎后再讲和就可获谅解，不坏名声了。蒋介石接受献策，表态拒绝日本新条件。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华声明，“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中日和谈之对象，中日问题绝无第三国调停之可能”。至此，日本请德国作的三次调停以失败告终，中日和谈达到停战的大门关闭，中国长期抗战的大幕拉开，斯大林变日苏战争为中日战争计划大匹敌成功，从此不用再担心日本北攻苏联。

为掩盖将帅制造自相残杀事实，国民党宣传部将南京的死难指为全部日军所为。但查阅当时报纸，重慶國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政府均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抗議、譴責。1938年，国民政府代表在国际上谴责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两万平民。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约十万人遇难的统计数字。因这一统计数字没有区分战死者与被屠杀者，联合国没有通过谴责日本屠杀的决议案。建国后，中共在南京修建了“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纪念解放南京过程中牺牲的解放军，而没有立碑纪念南京保卫战前后的死难者，更没有立碑纪念过大屠杀死难者。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和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的数字。这些说法是新一届领导层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之举。因为，在国民政府时代和毛泽东统治时代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说法。1975年版《新编中国史》关于南京沦陷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国际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支持“三十万人大屠杀”的说法，认为这一说法不能在尸体掩埋、当时南京人口记载、安全区收容了二十多万人事实等方面自圆其说。南京人口統計显示，日军占领南京后外地難民大量湧入,南京居民人數迅速增加数十萬。国军將領衛立煌在回憶錄說他曾便衣進入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市區，见市容煥然壹新，市民們豐衣足食，是國統區難以见到的景象。事实上，南京沦陷时尸体最多的地方是挹江门和江边，那是国军一夜自相残杀、自相践踏、军民被射杀江中、冻死江中所留下的场面。如今宣传“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物所提出的照片证据其实多是这些场面。

当年庐山谈话会上、南京保卫战高层决策会上，大家为了自己名声合力营造了唱高调才爱国的环境。如今，环境依旧，质疑“南京大屠杀”者会被指为汉奸，说大屠杀死难人数少于三十万者不见容于中国。中国民间关于建立镇反运动、土改运动、反右运动、大饥荒、文革受害者纪念馆的呼吁均不获准，唯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获准建立；反映日本人在华烧杀的文艺作品受到鼓励，反映沙俄、苏俄在华的烧杀的作品则被禁止，显示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和民族主义环境是当局推动的结果。

徐州会战

占领太原后，日军停止了在华北的进攻，转而在南方进攻，试图打通南北战场。12月下旬，攻陷南京的南路日军渡长江北上，先后占领滁县、蚌埠等地，在淮河一线与国军形成对峙。1938年3月，北路日军板垣征四郎率日军第五师团进攻临沂，矶谷廉介率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进攻滕县。坚守滕县孤城的川军第41军122师与日军血战两天，全军覆没，师长王铭章发出“决以死拼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与112师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攻占滕县后，日军继续南下，在沙沟击败汤恩伯部第52军后逼近大运河和徐州东北30公里的台儿庄。蒋介石调国军仅有的9门155厘米巨炮、反坦克炮和几架飞机配合台儿庄国军作战。这一支持虽数量有限，但对国军的士气鼓舞极大。3月下旬，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了进攻，孙连仲率第二集团军死守待援，伤亡过半。4月初，汤恩伯军赶到，李宗仁前往台儿庄郊外指挥国军击退了濑谷支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所向披靡，不断向中国内地推进。台儿庄之役首次顽强阻击，迫使日军撤退，虽然称不上什么胜仗，但国民政府太需要一个好消息来振奋人心，于是发布了歼灭坂垣、矶谷两师团两万余敌的台儿庄大捷的报导。消息传出，武汉几十万人举行了庆祝台儿庄首捷的盛大游行，歌声和爆竹声响彻云霄。中国史书就有吹嘘、撒谎传统。如《汉书》中的汉高祖大败匈奴、汉武帝大败匈奴实际是兵败进贡，“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宋史》中的黄天荡大捷实际是宋军全军覆没，“世忠仅能自免”，雅克萨大捷实际是清军万余打俄军数百，战后清王朝割地，镇南关大捷实际是清军数万打法军千余，战后赔款等等。“台儿庄大捷”宣传是吹牛传统的延续。虽然日军板垣师团认为台儿庄之役丢人，给予濑谷少将转为预备役的处分，但国军损失惨重。当时国军装备太差，打几枪就没有子弹了，只能靠血肉之躯去与日军的优势火力拼，国军士兵腰缠炸药包去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当然谈不上什么胜利，能守住已经是可歌可泣了。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为鼓舞

士气，基本逢战必吹，搞到捷报频传，越吹越离谱，例如将国军伤亡四万余，日军伤亡三千余[20] 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吹嘘为“湘北大捷”，将国军五万余人久攻日军一个大队扼守的要隘不下的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吹嘘为昆仑关大捷等等。抗战胜利后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对台儿庄之战仅“台儿庄方面，战区以第二集团军之一部（第三十一师）固守”数语，从侧面否定了台儿庄大捷之说。张发奎将军后在自传中直言“我们几乎从未取得一次胜利。”

1938 年 5 月，日军兵分五路，进攻徐州，国军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命第五战区部队向豫、皖边界山区撤退。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铁路西进，于 6 月 6 日占领开封。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徐州会战结束。会战的结果是，国军六十万大军与几万日军周旋了五个月，丢弃了几乎全部重装备，从日军的包围圈逃出。在当时双方国力、军力、财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会战也只能是这样的结果。尽管会战失败，王铭章等数万为国捐的国军将士永载史册。

武汉会战

日军受阻于决口的黄河，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沿长江两岸进攻。蒋介石坐镇武汉，调集 130 个师和各型飞机 100 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 30 余艘，共 110 万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1938 年 6 月，日军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击退了川军杨森部攻占了安庆，随后沿长江西进，于 6 月下旬抵达了马当。马当江防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经数月修建，坚固异常，蒋介石相信凭此可阻止日军至少一个月。然而日军采取迂回办法轻易攻占了马当炮台。而陈诚指挥国军第 16 军和第 49 军反攻马当时，日军凭借坚固的马当国防工事反让国军屡屡受挫、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放弃进攻马当，退

守彭泽。波田支队顶住国军反攻后，与来增援的 106 师团配合，于 7 月领了彭泽、湖口、九江，于 8 月攻占了瑞昌。

9 月 25 日，日军 106 师团的穿插部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迷路，被薛岳指挥第 4、第 66、第 74 军围攻，经激战三昼夜，国军以阵亡两万多人的代价歼灭日军数千人。被围日军得第 17 师团增援突围。此役为赣北作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役，时称“万家岭大捷”。国军以弱击强，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军优势火力，伤亡数倍不可避免，能歼灭日军第 106 师团近半已是最成功的战役了。战役中，国军 153 旅副旅长张灵甫率精锐小部队攀悬崖奇袭德安张古山，然后坚守数日，重伤致残，为国军围歼日军第 106 师团四个联队立下了大功。不幸的是，张灵甫没有死于抗战，而是后来死于了内战，抗战英名被长期掩盖。

青岛、上海沦陷后，广州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港口。1938 年 9 月，日军攻占了江防重镇广济，国军被迫从江防要塞田家镇撤退，武汉的江防门户洞开。蒋介石抽调一半粤军去保武汉，致广东的防守空虚。10 月 11 日，日海军一部从广东大亚湾登陆，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于 21 日攻至广州城下，守将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下令弃守。

随着广州失陷，粤汉铁路和国民政府最后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重兵防守武汉失去了战略意义。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定弃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誓言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10 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大本营以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然而，中国政府没有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没

有达到结束战争的目标，而是战线拉长，战争范围扩大，速战速决计划失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

会战中，国军伤亡数十万，十倍于日军，其原因除了力量对比悬殊外，国军严重的派系、军制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军事委员会为协调派系、资历等等所苦，无法根据作战需要去调配兵力，军令须经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五个层次才能到达部队，造成指挥不灵，贻误战机。万家岭之战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各军搁置派系之争，中央军嫡系与杂牌川、粤军同仇敌忾，良好配合。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隔岸观火，乐于见到两败俱伤。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周佛海写道：“在被包围的汉口的双十节庆祝会上，郭沫若惊人地宣布接到了前线来的一个电话，说取得了一次战胜日军的大捷。当我听到周恩来、郭沫若两位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纯属虚构的报告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些报导的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广大的老百姓。他们怎么可以号召人们誓死保卫已经注定要沦陷的汉口呢。”[21]

“七七”事变时，日本黄金储备，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不过 14 亿日元，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约 10 亿日元。随着战线拉长，日本国力军力无法应付，国会在 20 亿日元的临时军事预算用完后不得不将军费支出预算增加到 50 亿日元，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和军事物资供应出现危机，“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日本政府预算的 1939 年财政支出为 100 亿日元，其中军费开支高达 80 亿元。日军参谋总长坦言：“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难以维持”。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开始实施工商企业内迁计划。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开始了迁都重庆的安排。这时的中国的工业仍极为落后，“三大产业”是机制面粉，纺织和火柴业而已。国民政府实业部 1937 年注册登记资料显示，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仅 4000 家，绝大多数在江苏、上海、浙江，其中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制造工业和四成的工业资本。企业主当然不愿内迁。他们知道，搬迁将使他们的企业

丧失生产能力。不过政府强制实施，工商企业也只得从沿海沿江地区迁往大后方。

占领武汉后，日军对宜昌形成了包围，在宜昌待运的九万多吨工业器材必须在长江枯水前的四十天内运川，否则在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将无法运输。按当时运力计，运这些物资和人员至重庆需要一年。在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的主持下，宜昌工业大撤退奇迹般地如期完成了。卢作孚后来回忆说，那一段时间里，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纤夫昼夜拉纤，装货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抬机器、物资的队伍排成长龙，歌声，汽笛声、轮船上起重机声在江上回响，组成了悲壮的团结抗战的交响曲，显示出了国人抗战的力量。

宜昌工业大撤退成功地保存了民族工业的命脉。战前上海工厂和近 5000 家工厂，迁往后方者不过 200 余家，其中著名的企业有荣宗敬的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茂新面粉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织厂、华丰搪瓷厂，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武汉地区工厂迁往大后方约 150 家。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一批军工、发电、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石油化工等工矿企业在大后方迅速建起来。内迁后，工商业者生活困难自不待言。工业内迁的一大难题是动力。内地的基础薄弱，工厂的动力得不到保证。工业需要的石油制品运到后方须付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代价。1938 年 2 月至 1943 年 8 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战略轰炸（重庆大轰炸），造成大后方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工厂在频繁空袭环境中生产，其困难可想而知。

第 29 章 中共避战与扩张

洛川会议与红军改编

1937 年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平津沦陷，淞沪开战的国难中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二十二位政治局委员、各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会上，总书记张闻天作了《形势报告》，在其中称：蒋介石一贯反共，中共在抗战中应效仿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策略，让蒋、日火拼，两败俱伤。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其中提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为：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免对日作战，专注发展壮大。他要求八路军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夺取国民党的地盘，要求对政府方面对日作战军令以各种借口推托，等待日军杀伤国军后推翻国民党政府。毛泽东在国难中提出的避战方针让众高层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大家都记得清楚：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调集大军进逼陕北时，毛泽东曾率包括二十多位红军将领在内的四十六位中共高层联名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呼吁“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1] 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民政府作出了“四项保证”，其中主要内容是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芦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位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数十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表了“服从国民政

府领导”，“请缨上阵杀敌”的宣言；[2] 7月23日，毛泽东还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声明，在其中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众高层感到明里通电请战，暗里坚决避战说不过去。张国焘乘机挑战毛泽东说：在民族危亡、国军抗战之时，中共不应作壁上观，而应履行“四项保证”的承诺，与国民党并肩战胜日本侵略军。张的上述意见只是权斗策略而非出于国家民族考虑。因为，在苏联入侵满洲中苏开战时，大家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有民族意识的陈独秀等人早已离开了中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发言支持张国焘的意见。周恩来也非出于国家民族考虑，而是因为他负责与南京国民政府周旋，刚刚率队上庐山“请缨杀敌”，感到刚刚保证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立刻拒绝服从、拒绝作战难以向国民政府方面交待。他提出，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中共已经承诺红军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不履行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使国民政府拖延或取消对红军的军饷及武器弹药供给。

由于反对者众，毛的避战策略一时无法通过。于是，毛泽东再用遵义会议时体会，在会下个别说服的策略，推张闻天出面宣布体会三日。在国军激战，中共众高层集中休息的三天中，毛、张逐个说服周恩来等人说，若无日本人入侵，中共军队总是处于被国民党军围剿的境地，现在日本人打来，中共获得了安全环境，应当利用机会壮大军队才能在将来得天下，真与日军开战可能被迅速消灭，避战策略虽不好听，但很实惠。周等人纷纷表示接受。

复会后，毛泽东将其避战保存实力，趁机发展壮大的方针作了字面修改，改为“强调独立自主，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将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称为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获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3] 会议决定，在抗战中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作法，明里对国民党政府作“四项保证”，内部坚决拒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军令，所有国民政府的军

令须先报告延安，听候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军除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外一切照旧，红军和根据地的一切仍按中共中央的决定行事；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为地下组织；中共军队坚持游击战，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主要任务是壮大军队，扩张根据地。毛泽东将上述方针总结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4] 毛泽东这里的“一分抗日”是为使避战方针不显得过于露骨的说法，他实际禁止八路军对日作战，“一分”也不允许。

洛川会议对于中共的意义可比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帮助中共摆脱了被围剿的危机，而洛川会议的方针帮助中共从弱小走向壮大，军队从三万人发展到了百万大军。洛川会议定下的方针对中共极为实惠，但在国难当头时制定的这一方针实在见不得人。因此，中共将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张闻天、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内容列为机密，从毛、张文集和中共党史资料中删除，使国人了解到洛川会议只是关于抗日高调，红军接受改编，中共宣言服从国民政府军令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等。此后几十年，周恩来经常提到的“毛泽东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说法，主要是指毛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避战方针。

在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服从政府的“四项保证”，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为1.5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总指挥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二方面军改编的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和红四方面军改编的一二九

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林育英，林因病去职后由邓小平接任）。

根据毛泽东对抗日“十分宣传”的策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后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积极抗战姿态。8月29日，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中共发表的十大纲领和通电受到国人的热烈欢迎。9月22日，中共中央再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四项承诺：

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5] 几天后，毛泽东命一一五师赴太行山区，一二〇师赴晋东北关清山区，一二九师赴晋东南吕梁

山区，去建立“敌后根据地”。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华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

“平型关大捷”

占领平、津后，日军增兵华北，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师团）在一个月内相继攻占了南口、居庸关、横岭、怀来、延庆、张家口、宣化，以数千伤亡的代价造成国军数万伤亡，迫使国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全线撤退。1937年9月13日，日军攻占了山西重镇大同。阎锡山收缩战线，布防于娘子关、平型关和长城一线，在恒山、五台山，在平型关布下口袋阵。9月21日，日军的第五师团的前锋部队进入平型关口袋阵，陷入苦战。日军后续部队兵分二路，一路直接参与平型关作战，以解日军第五师团前锋之围，一路则是绕道越茹口，包抄国军平型关阵地的侧后。9月29日，日军攻占了繁峙，威胁到国军侧后。阎锡山为避免腹背受敌，决定全线撤退到忻口阵地布防，放弃口袋阵歼敌计划。10月2日，平型关国军全线撤退，平型关战役结束。10月11日，原平沦陷，月底，忻口失守失去忻口屏障的太原已不可能靠傅作义的孤军守住，11月8日，国军弃守太原，历时近两月的太原战役以国军伤亡十万之众悲壮结束。忻口战役中，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壮烈牺牲。郝梦龄将军在战役前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率一一五师入晋的林彪名义上服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但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实际拒绝阎锡山的战区军令，率一一五师脱离抗战，转入太行山北部去开辟地盘。脱离战事之前，一一五师曾贤生连长不甘临阵脱逃，擅自率所部突袭了停放在老君爷庙西南干河滩上的日军第五师团补给队的十余辆汽车，歼敌数十，缴获了汽车上的军大衣等物资，随后率连队赶上了大

部队。[6] 毛泽东对平型关袭击战斗虽然不满，但战斗已经擅自打了，他顺势而为，指示“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同时要求大力宣传。根据指示，八路军总部将一一五师本来已经夸大的战斗再夸大，上报阎锡山说：“缴获汽车 60 余辆，俘敌 300 余名”。[7] 对于八路军的吹嘘战报，国民政府只管鼓励嘉奖，并不追究细节。国民党宣传部按照吹嘘传统，在报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再将战果夸大为：“与有坦克车的敌军万余人，反复冲锋，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并缴获五辆坦克车”。对于国民党宣传部的吹嘘，上海独立报纸质疑捷报说：“日军在平型关的全部兵力不到四千人，怎么可能与敌万余人，反复冲锋呢？以八路军的低劣武器，怎么可能将有坦克车的敌万余人全部击溃呢？”对于中共吹嘘“平型关大捷”，亲身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国军第二战区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的刘茂恩将军在回忆录驳斥写道：“在敌军第五师团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林彪率部跑开了，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偷袭，虚幌一下就逃之夭夭。敌人从北楼口以西七十二里处左翼大小石口、茹越口堡（繁峙县北六十里）突入，迂回威胁平型关我军的后方，致功败垂成。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竟然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噱头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命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8] 日军的战报也从侧面否定了“平型关大捷”。日军统计的平型关战斗（包括对国军作战）日军损失为亡 167 人，伤 94 人。[9]

建国后，中共为证明八路军对日作战而在平型关建立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将原报的阵地战改称为伏击战，吹嘘一一五师歼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万余人。几十年后，为配合为林彪集团翻案，纪念馆还特别增加了林彪的铜像。

六届六中全会与两面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斯大林派王明回国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王明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行飞到延安，毛泽东率中共高层到延安机场隆重迎接斯大林派来的钦差，“把王明抱了又抱，亲了又亲”，在欢迎辞中把王明赞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10] 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求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对日作战。毛泽东不理睬王明传达的莫斯科旨意，坚持按中共的利益行事，对莫斯科采取阳奉阴违，表面不否定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内部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拒绝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坚决避战。为向莫斯科交待，王明一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明确政策。毛泽东不能否决莫斯科钦差的开会要求，不情愿地同意召开全会。

1938年9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林育英（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 17 位中央委员，及毛泽东扩大进来的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 38 位党、军亲信。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重申洛川会议决定的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强调游击战争和党的纪律，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游击，对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执行军纪处罚。毛泽东这里的游击战说法与洛川会议中的“一分抗战”说法一样，仅仅是为了不太露骨，实际要求“游而不击”，禁止对日作战。为了让莫斯科和中共党员容易接受，毛泽东在报告中将其“游而不击”策略称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报告之后，王明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报告。他重申莫斯科指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要求“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

工作方法和方式。”针对王明的主张，毛泽东再作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以“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否定王明的“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否定了西安事变后向国民政府作出的“四项保证”。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禁止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强调“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王的不同报告形成了冲突。二人都在以好听的字眼掩盖真实用意。毛以“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无产阶级领导权”等说法掩盖反政府立场和拒绝对日作战，王明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字眼掩盖服务莫斯科的用意。在对立的两方针间，众高层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方针。其中，周恩来对毛泽东避战方针从反对到拥护的转变具有代表意义。在洛川会议上，周反对对日军避战，经毛泽东在三天休会期间说服勉强接受了毛的方针，但会后不返回南京去与国民政府周旋，而跑到山西一呆就是几个月，称“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毛泽东清楚周不回南京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拒绝国民政府军令，拒绝对日作战，周对国民政府难以交代，活儿不好干，容忍周闹闹情绪。随着中共军队的壮大，周恩来悟出说一套，作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实惠，在六届六中全会承认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转而拥护毛泽东的避战方针。其他中共高层看到军队人数迅速翻了两番，地盘极大扩张，延安享受着一片安宁的实惠，与周恩来一样思想转变，衷心拥护毛泽东的避战扩张方针。全会上，虽然有彭德怀等极少数高层反对（彭因此在延安整风时成了整肃对象，地位跌落），绝大多数中共高层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避战方针。

得众高层拥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两面策略”，要求口头上要讲抗战，和服从国民政府，内部则坚决拒绝国民政府染指中共军队，拒绝国民政府的军令，不准对日作战。在这方面，毛泽东已经带了头，在会前亲笔致函蒋介石

石声称“中共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信国共两党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日寇终必失败”，在会议中决定将全会延长至两个月，使得其间八路军、新四军不可能有任何作战行动（这次会后，毛泽东在整个抗战期间以开长会的办法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将会议越拉越长，使高层们会议中渡过了八年抗战）。王明虽有长江局书记头衔，但既无党权又无军权，无力左右毛泽东的政策。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博古等人到重庆贯彻“两面策略”。批判了王明，毛泽东必须向莫斯科作出解释。全会结束时，毛泽东以全会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汇报会议结果，并派林彪以赴苏治伤为由，向共产国际解释他的方针。这次会后，周恩来不再闹情绪了，回到重庆只管唱抗战高调，贯彻毛泽东的“十分宣传”策略。

毛泽东可以抵制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但暂时无力抵制莫斯科钦差王明召开全会的动议。中共建党时规定每隔一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后建立了几块苏区，随后是几次反围剿、长征，确实不方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抗战爆发后情况不同了，毛泽东为贯彻他的避战方针将高层集中在延安开长会，各根据地太平无事，完全有条件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况且中共已经十年没开全国代表大会了，毛泽东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全会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共七大。虽然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斯大林认可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决定，但毛泽东非常担心王明会在七大上接任中共最高领袖，采取拖延召开七大的办法，等待时机整肃王明为首的国际派。

六中全会上的一大变化是张闻天的名义领袖地位不再被提起。长征路上，张接受拉拢，与毛泽东联手罢了博古的官，坐上了总书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重掌军权的毛泽东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会上以提出辞职来否决多数意见，新上任的张闻天不接受要挟，主持举手表决，撤销了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令毛一时不了台，幸亏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服与会者取消了表决。长征途中，张与毛多有摩擦。例如，张下令，早晨吹号后，所有人都要起床。

而毛习惯早上不起，抱怨说，这类事张本来可以不管。到延安后，张与毛更加不协调：张讲究程序规矩，要求开会有准备，有议程，逐项讨论，作出决定；毛反对按议程开会，喜欢东拉西扯开长会，指张知识分子气太重。一次会上，毛泽东交议一份文件。张拒绝说此议这次会不谈。毛怒将文件扔到了地上。[11] 权力地位稳固后，毛对张越来越不耐烦，称张为“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对中国“一事不懂”。张难以忍受毛的多疑、记怨，满口粗话、独裁、只喜欢顺从者，会议越开越长，东拉西扯，感到难与毛共事，选择主动淡出领导层，主动去搞点理论宣传等无关紧要的事，在党内名义上首位排名不再。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正式离开了傀儡领袖位，不再过问中央决策。几年后延安整风开始时，他更索性申请到周边农村去，以搞调查为名离开延安自我流放以躲避权力斗争。

中共华北扩张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执行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的方针，在华北大举扩张地盘，成倍地扩大队伍，不可避免地与华北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毛泽东知道，国军无法对日军和共军两面作战，指示八路军放手扩张，武力消灭阻止扩张的国军，并发明了“搞摩擦”和“顽固派”的说法，将国民党政府军阻止中共扩张地盘的行动称为“搞摩擦”，将拒绝中共扩张地盘的各地国民政府大员称为“顽固派”。

1938年中，八路军冀中军区和一二〇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了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所部河北民军，八路军山东纵队消灭了国军秦启荣部。毛泽东亲自撰文，为八路军这两战叫好写道：“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简直是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12] 对于毛泽东指名道姓的攻击，张荫梧发表公开信回应说：“我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可是我始终认为党的利益并不能高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民国 1937 年 9 月 22 日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已经清楚的提出，放弃赤化运动，取消暴动政策.....然而结果却完全与我们的理想两样。表面上他们在高唱‘拥护政府’的

口号，骨子里却仍干着曾经宣言放弃的阴谋勾当，别有企图！对于友军，则极尽其破坏之能事。谁都知道，河北民军是河北民众的武装，站在国军的立场，应如何爱护与援助，使其能在华北战场上发生更大作用。而共产党则分化诱驱，企图溶化在其特殊系统之下，将河北三千万人民所有的抗战武力，一变而成为他们一党自私的工具。因为防范得严密，阴谋未逞，便进而采取公开的武装威胁，多方面加以摧残。第一步便是 1938 年 4 月 29 日，暴力解决了民军邢台区司令部张锡九部，并将邢台的民团首领安庆善，路纪武，赵天庆等六人惨杀。民军参谋温文华，是辽县有名的公正士绅，也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毁家纾难，因为批评八路军‘游而不击’，竟予以‘托匪’的罪名而惨杀。河北民军无不为之哗然。1938 年 12 月初，日军由保定沧县向冀中进攻，鹿总司令命令民军第一、第六及特务三团，由南宫北上截击。乃行抵安国、博舒一带，八路军之吕正操部表示欢迎，竟于 15 日深夜二时，以三千馀之兵力，将其分别包围解决，除第一团力战不屈，突出重围，其余第六及特务团等，因变出意外，未加防范，大部均被缴械。”[13] 张荫梧所言在理。按照从西安事变以来的中共一再保证和《共赴国难宣言》，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在华北理所当然应该服从河北、山东、山西各省的省政府。但实际的情况是，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颠覆了省府。中共所谓的“国民党在河北的第一次摩擦”，即国民政府所称的“冀中事变”，是中共晋察冀边区武力取代了国民政府在河北的治权。中共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后在回忆录中披露，民军总司令张荫梧手下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显示，中共背弃承诺，继续在国军内和国民政府内发展地下组织。张荫梧率领的三个民团想不到声言服从政府八路军会对政府军动武，结果被中共地下党员与八路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和整理党务决议案，决定成立针对中共的“特别委员会”，反击中共的扩张地盘行动。会后，国民党陆续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毛泽东清

楚国军无力同时应付日军和八路军，也不敢让外界知晓抗战中的内战，指示八路军放手对国民党军用强，放手向国民政府管治区扩张。于是，八路军放手对国军用强，一二九师在冀西南发动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了国军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及所属九十四师、新二十四师等三个师；八路军宋任穷、程子华部歼灭了国军石友三部七千余人，八路军山东纵队歼灭秦启荣、刘桂棠部，重创了国军孙良诚、高树勋部。至**1940**年春，八路军将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及所部国军逐出了河北，集中优势兵力击败了驻守山东的国军，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了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在山西，中共的扩张早已开始。斯大林于**1934**年决定在中国发动促中日开战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共产国际在华资助成立了大批所谓抗日救亡组织，其中在山西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发起了“百万人签名捐款、数万人请缨上战场抗日”运动。华北事变中，阎锡山根据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推迟全面战争的方针将山西的“抗日救国会”更名为“自强救国会”，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改组为自任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牲救国大同盟，牺盟会），提供军费物资建立起牺盟会武装作为抗战预备军队。西安事变后，中共一面作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军队听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不在军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保证，一面指示在国民党军和各地的抗日武装中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夺取领导权。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局派出薄一波、杨献珍为首的大批党员打入牺盟会武装，准备夺权。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从八路军中抽调更多党员打入牺盟会和决死队（山西新军）武装。太原战役后，山西半壁河山沦陷，阎锡山的十几万军队损失了七成，基层国民政府政权大多瘫痪，中共乘机将山西多数县政府赤化为中共武装割据地区，并指示地下党将山西新军、决死纵队拉出来编入八路军。中共称此在国民政府管制区内建立武装割据为“建立敌后根据地”。阎锡山不容中共的颠覆行动，于**1939**年春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要求共产党履行不在国军中发展组织的承诺，要求薄一波、续范亭为首的山西中共党员退

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将新军（牺盟会和决死队）交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指挥。然而，受日军压迫的阎锡山无力对势力壮大的八路军用强，八路军因有日军压迫而有恃无恐，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领导人拒绝交出新军武装。

12月，阎锡山布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命令新军决死二纵队配合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进攻，中共控制决死二纵队抗拒军令。阎锡山通电全国，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率军讨伐，是为“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记述事变写道：“民国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消晋南三角地带内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时勾引晋省新军薄一波、韩钧、戎胜伍等叛变，这十余团之众，贺龙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上之主要攻势计划，完全被其破坏。”[14] 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华北事变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众多所谓抗日救亡组织的代表。这些组织是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指示的产物，它们在抗战中拒绝国民政府军令，拒绝对日作战，专门从事反国民政府，打击国军等表现证明，它们在抗战前打出抗日救亡旗号只是颠覆政府的借口。

为避免暴露八路军实力引来日军进攻和斯大林问“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罪，中共在获得河北、山东和山西大部分地盘后暂时止步，向国民政府提出谈判划定势力范围的要求，分别派出王若飞、肖劲光到秋林与阎锡山谈判，派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赴西安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谈判。在日、共夹攻中，国民政府对八路军除了退让别无选择。为寻求美国援助，国民政府不敢将内战实情公之于众，只得哑巴吃黄连，同意与曾经保证服从和通电请缨的中共举行停战谈判，划分管制区。1940年5月，国共达成协议：以漳河为界分占冀南、豫北，以汾河和汾阳至军渡公路为界各占山西一半。至此，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在华北与中共平分地盘，阎锡山被迫接受一手建立的新军变成共军的现实，与山西的八路军划界而治。中共在华北扩张成功的事实证明了汪精卫关于“长期抗战的获益者只能是苏联

与中共“论断正确。中共后来在现代史和党史中将从挑起内战，歼灭国军到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地盘的过程称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革命家中没有人质疑在国难中打击抗日国军的行动，在晚年也没有人为这样的革命经历忏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两面方针”不仅体现在华北国共战场上，还体现在其“文艺工作”中。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文艺工作者执行莫斯科拥蒋抗日方针推出了歌颂蒋委员长的歌曲《人人都爱他》。其中唱道：“吹起军号打起鼓，蒋委员长调队伍。人强马壮真威风，要打退东洋鬼子兵。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吹起军号打起锣，卖国贼汉奸坐大车，五花大绑家家喜，看我们政府扰纲纪。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政府人人都爱他。拿着大刀拿起枪，一对一对的上战场，各省军队组织起，学会了游击好自卫。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军队人人都爱他。”1938年秋，中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举行的歌唱比赛中，《人人都爱他》成为主打曲目。随着中共掀起打击国军，抢夺地盘的高潮，中共禁止八路军再唱《人人都爱他》。1939年，中共文艺工作者推出了《打击顽固份子》歌，宣传八路军在华北打击国军，从国民政府管治中夺取地盘。歌中唱道：“呸!呸!呸!顽固份子见了鬼，调转了枪口来对内，妥协投降开倒车，我们大家齐反对齐反对齐反对!打!打!打!顽固份子找摩擦，挑战把国共来分家，阻碍军民打日本，我们大家来打击它打击它打击它!”^[15] 上述两歌曲分别代表着莫斯科和延安的方针，不能为莫斯科与延安共同接受，彼此不容。但也有作品为莫斯科与延安共同接受，其代表是《黄河大合唱》。在八路军打击国军的高潮中，《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为毛泽东与王明共同接受。这一在苏联创作完成的作品与一大批“国防文学”、“国防电影”一样，服务斯大林促中日开战，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毛泽东的避战方针要求作“十分宣传”，也需要唱抗日高调。由于该大合唱中没有歌颂蒋委员长和政府的词句，也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得以成为延安的代表曲目。几年后，这台大合唱演给了访问延安的美国特使马歇尔观看，让马颇为感动。再后来，

《黄河大合唱》一直热演到了二十一世纪。听众们或许不知，歌中的“游击健儿”并没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而是在躲避日军，打击国军。“游击健儿”的高层们没有指挥对日作战，而是集中在延安开了好几年的会，直到抗战结束。听众还不知道，《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中“黄河之滨集合的一群”是对日避战，专打国军的队伍。

共日情报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按照几年前与杨虎、张学良订立休战协定的套路，派出情报干将潘汉年与日军方面接触。潘率刘人寿、董慧等中共情报人员接管了刘少文、刘晓等人建立的上海情报小组，组建了华南情报局，设立电台与延安、重庆、香港联系，恢复了与前中共“特科”成员袁殊（袁学易）的联系。袁在特科转移到苏区后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遣打入了国民党 CC 系，在抗战爆发后再打入了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岩井英一领导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岩井机关），成为同时领取苏、日津贴的双面间谍。1939 年 11 月，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经袁殊介绍与岩井英一举行了会谈。日军知道共军在他们所到之处早早避开，并对政府军的作战，牵制了政府军的重兵，愿意与中共携手对付政府军。双方约定共、日停战，互通关于国军动向的情报，联手打击国军。会谈后，岩井机关给潘汉年签发了特别证件，开始支付情报费经费。

在岩井机关的经费支持下，潘在香港创办了名为《二十世纪》的杂志，作为搜集情报及与日方交换情报的机关，开始与日军情报交换，潘每半月向“岩井机关”在香港的代表小泉清一交一次的情报，其中包括国军的布署，国共的冲突，与美英关系，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等等，岩井公馆则通过《二十世纪》向中共提供经费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情报，潘汉年再通过刘人寿等人设立的秘密电台向毛泽东报告并接受指示。不久，潘汉年经岩井介绍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潘通过岩井机

关向日军提供的情报获得日方高度评价。作为回报，日军通过岩井、潘汉年向中共提供了日军作战动向等情报及巨额经费。 [16]

通过潘汉年和岩井机关，中共与日军达成了在华北、华中停战的默契：八路军、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军默认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发展。有了与日军的停战默契，八路军、新四军得以放手打击国军、扩张地盘。例如，共军陈毅、粟裕、黄克诚部在 1940 年 10 月向驻黄桥的国军李守维部进攻时全不担心侧翼的驻泰兴日军，集中兵力歼灭了李部；新四军配合了日军摧毁国民党三青团、围剿江南的忠义救国军的行动。

共日休战是斯大林不能容忍之事。这时的斯大林倍受日德两面夹击苏联，三番五次电令毛泽东出兵进攻东北日军。毛以武器差为由拖延执行指示。在毛泽东被日本会不会进攻苏联、要不要执行斯大林命令进攻东北等问题困扰得长期睡不着觉时，潘汉年发来的日本放弃攻苏联的情报帮了毛大忙。根据潘的情报，毛泽东于 1941 年 5 月发表了《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等系列文章。6 月，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的文章成为在德国进攻苏联前的“英明预见”。德国攻苏后，斯大林更为担心日本关东军乘机出兵进攻苏联，在三个月内两电毛泽东，命中共出兵东北以牵制关东军。见中共迟迟不出兵北上，斯大林派孙平（弗拉基米洛夫）当面责问毛泽东为何不出兵北上。毛以潘的情报应对说：据情报，日本已经决定南进东南亚以获取战略物资。潘的情报不仅帮了毛泽东大忙，还帮了斯大林大忙。根据情报，斯大林将布署在远东防备日军的部分军队调往西线去应付德军。年底，潘的情报应验，太平洋战争爆发，毛泽称赞“红色小开”潘汉年立了大功。 [17] 潘汉年不仅从日军方面获取了大量情报，还赚取了巨额的收入。日军侵占香港时，潘汉年得岩井协助，将在港手下撤到了内地、上海，继续与日方的情报合作。1942 年，孙平向斯大林报告，他数度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看到日军情报和南京汪政府的机密文件。对此，正在抵抗希特勒进攻的斯大林无力干涉。

1943年，潘汉年与汪精卫政府情报负责人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被李拉去会见了汪精卫。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潘向汪建议联手对付蒋介石，表示新四军的目标是自身发展，不会与汪的南京政府过不去。汪已经吃够了联共的苦头，对共产党不再抱幻想，对共产党之言也不再相信。离开南京之后，李士群又引荐潘在日军公寓里会见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军最关心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与新四军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会见后，潘向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通报，称只要新四军不要骚扰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就不会为难新四军根据地。饶依潘通报行事，同时向延安密报潘汉年通敌。毛泽东以刘少奇、康生的名义电饶，澄清潘的行动经过延安批准。[18]

正太路破袭战(百团大战)

经过三年抗战，国军损失惨重，伤亡数百万，而中共对日避战，军队从三万人扩张至数十万，地盘从抗战之初的陕、甘、宁边区十五县扩张至两百五十多县的二十多块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中主要有：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下辖冀西军区聂荣臻（兼）部，冀东军区李运昌部、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平西（冀热辽）军区萧克部），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军区、太岳军区、策反牺牲同盟会十二个团编成的薄一波部、冀南军区陈再道部，冀鲁豫军区杨得志部），徐向前领导的山东根据地（包括了山东全省下辖冀鲁军区邢仁甫部、鲁南军区陈光部、淮海军区、胶东军区高锦纯部），贺龙领导的晋绥根据地（下辖晋西北区、大青山区李井泉部），新四军建立的淮南、淮北、苏南、苏北、苏皖豫鲁边区、鄂豫皖边区等根据地。

迅速扩张的八路军地盘压迫了日军占领区，开始与华北日军有所摩擦。对于控制区边界的摩擦，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对“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武力消灭，对日军坚决避战，只能退，不准开战。结果，八路军的华北根据地被

日军压迫得支离破碎。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认为，再这样见日军就躲说不过去，提议与日军打一仗，争取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顺便洗刷一下“游而不击、专打国军”的恶名。但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无权开战，作战行动须经毛泽东批准。毛反复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不准打正规战，对擅自决定对日军开战的将领要执行党纪和军法处罚。这里，毛的游击战说法是为使上述命令听起来不那么露骨，其真实意思是只准打国军，禁止对日开战。对于彭德怀提出的进攻申请，他以不作回复的方式“默否”。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对日军开战，于是将大规模作战计划改成破坏正太铁路（石太铁路的旧称）的小战斗计划，言明只打游击战，破坏交通。毛泽东对小战斗的计划也不批准。毛的“默否”让曾经通电请缨的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颜面扫地。朱、彭、周等高层认为，就算作个姿态，八路军也总应与日军打一仗。于是，朱、彭想出了一个荒唐办法——下预备命令。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参谋长）共同签发了破坏正太路战斗预备命令，报请延安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将预备命令搁置二十多天不予回复。朱、彭下不了台，决定行使一把指挥权，命令八路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按预备命令行事。8月20日，八路军和民工开始破坏铁路。聂荣臻的破坏战原计划是，八路军只打游击战，破坏交通、摧毁了十数个小据点后即遁入“青纱帐”。但彭德怀不想如此，他认为八路军自抗战以来见日军就躲，一次像样的仗也没打过，此次正副司令一起下令大部队出动应有点儿战果，破坏几段铁路，端几个碉堡就跑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下令：“彻底毁灭正太线和同蒲路之忻县至朔县段，使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联成一片”。这一带有“彻底”二字的命令显然是不准打了就跑。八路军发展迅速，但训练不佳，装备奇差，没有重兵器，只靠步枪、手榴弹的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火力强大的日军开战后歼敌很少，自身伤亡惨重。日军小部队坚守待援，援到反击，追击扫荡。10月10日，八路军收兵，“正太路破袭战”战结束。月余的铁路破坏战中，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虽

调动部队不少，战果仅是破坏了 60 多里的正太铁路和 18 座桥梁，歼敌两千余，[19] 自身被歼灭了万余人。就当时的战斗力而言，八路军对日作战只能与国军历次会战一样，伤亡数倍至十倍于敌并不奇怪。八路军对正太铁路和各条公路的破坏效果不大，日军一个月即修复了铁路、公路，恢复通车。然而这场破坏铁路、公路小战斗却是中共军队在全面抗战中最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了。

战斗既然打了，毛泽东只好顺水推舟，指示在延安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嘉奖电称取得了大战胜利，振奋了人心。周恩来终于有了夸战题材，命重庆的《新华日报》充分炒作，将战斗规模吹嘘成了“百团大战”，收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吹嘘表示不满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蒋介石很惊慌。”[20]

八路军的破袭战收兵后，日军并不罢休，在晋中、晋西北、冀察等地区展开了扫荡报复和三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八路军在分散逃跑中损失了数万军队。遭受损失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追究彭德怀作主开战，造成八路军损兵折将的责任，对彭进行了四十天的内部批判（彭后来称此为“毛泽东操了我四十天的娘”），以蒋介石给八路军发来的贺电作为彭的“犯错误”证据，批彭“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过早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招来日军报复，造成很大损失”。一年多后，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再为百团大战作检讨。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共应当感谢彭德怀作主对日军开了一仗。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没有对日军作战，“百团大战”收到了填补空白之效，极具政治和宣传意义。毛泽东对破袭战的宣传效果完全清楚，他不能容忍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再翻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旧账，给彭戴上了反党的帽子。

皖南事变

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民政府作出了“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保证，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芦沟桥事变次日，中共派代表上庐山，重申听从国民政府调遣，共同抗战。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批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准编为新四军，编制是四个支队，兵额 5000 人，归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指挥。然而，收受国民政府支付军饷的新四军并未履行承诺服从国民政府战区司令官的指挥，而是执行中共“洛川会议”和的六届六中全会方针，拒绝第三战区下达的在芜湖地区对日军作战的军令，专注于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地盘。

1939 年 6 月，蒋介石召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要求共军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毛泽东知道国军无法对日军和共军两面作战，在给中共东南局的指示信中要求新四军将妨碍和阻止扩张的国军坚决消灭，称“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于是，中共在华北各省扩张情况在华中再现，国民政府管制区域被中共不断压缩。1940 年 1 月，周恩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的编制为 22 万人，月饷为 440 万元（人均 20 元计）；新四军编制为三个师 5 万人，月饷 100 万元；要求补充子弹 1000 万发，支持中共各根据行政经费每月 20 万元。这时，新四军经过两年的扩张兵员实际已增至八、九万人，夺取了大片国民政府管制区域。4 月，卫立煌与朱德在西安达成了“晋西事变后的停战协议”，同意与中共在华北划分地盘。华北达成协议后，中共把扩张的方向集中在苏北。

随着新四军壮大，毛泽东开始剥夺宿敌新四军统帅项英的军权，任命刘少奇为中共华中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八路军、新四军联手在华中扩张地盘。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向东南局下达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当月，八路军第四（彭雪枫

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委）、第五两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进，与新四军罗炳辉所率第五支队、戴季英所率第四支队和叶飞支队配合，形成对国军的优势。10月上旬，八路军两纵队与新四军发起了“黄桥战役”，在苏中泰兴黄桥镇附近向国军第89军发动了突然进攻，经过四天的激战歼灭了89军主力和独立旅11000余人，枪杀了第89军军长李守维以下数千国军将士。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皓电”，历数中共军队打击国军和颠覆各地国民政府的叛逆活动，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对日作战。毛泽东在拖延二十天后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回复何、白的“佳电”，在其中避而不谈中共破坏抗战事实，辩称有“复杂原因”，“希望彻察”，抗拒皓电中调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军令称：“驱迫上道，其事甚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 [21]

在毛拖延回复期间，刘少奇制定了进一步打击国军的“曹甸作战计划”，其中要求“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计划获毛批准实施。11月29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十个团发动了“曹甸战役”，对江苏宝应县曹甸地区的国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发起猛攻，歼灭了韩部8000余人。从作战规模说，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作战，但不是打日军，而是打国军。中共自知在日军侵华时集中兵力歼灭国军正规军见不得人，后来在官方记载中刻意隐瞒这两战役，一律称在抗战中夺取的国民政府控制区为抗日根据地。实际上，这些地盘与抗日无关，主要是为了在扩大的地盘上征粮、征税、征兵。

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肆无忌惮的歼灭政府军行动，国民政府只好武力平叛。根据国民政府命令，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了在泾县云岭镇的新四军军部。12月8日，何、白发出复朱、彭、叶、项的“齐电”痛斥八路军、新四军道：“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俘鼓响应，夹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未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它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22]电报再次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命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于次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命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于当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对此命令，中共提出行军路线、安全措施、经费给养等诸多先决条件，实际拒绝北上。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再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命新四军“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部队开始

转移，但不是未按“皓”、“齐”、及“江”电指定的路线北进，而是南下茂林进向苏南。1月6日，国军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奉命指挥七个师在泾县茂林地区东南的丕岭一带将抗命南下的新四军军部围歼。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率一队人马突围，另三千新四军被国军包围后遵命北上，被国军放行北渡长江抵达皖北，是为“皖南事变”。

蒋介石不愿在抗战中内战升级，于1月12日下令停止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暂取守势”。会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通电抗议国民党军队包围新四军，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题词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新四军的行动。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声明对于违令的部队必须制裁，中共须遵守服从国民政府的承诺。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拒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发布在苏北盐城另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将新四军进一步扩编为七个师及一个独立旅。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蒋介石取消其17日的命令，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宋庆龄、何香凝及打着民主党派旗号的各中共下属党派配合中共行动，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打内战，促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对于皖南事变，《大公报》社评写道：“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

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1940年10月19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秦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除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疑的。’

[23] 当时在华的雷震远神父写道：“在皖南事变之前十个月的时候，八路军消灭了同属国民革命军的国军三个军六万多人，包括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第五军和鹿鍾麟的河北军的大部，却没有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日本军队。共产党不打日本，叛逆国家的大规模暴行对蒋委员长是重大打击。他对太行山的共军叛逆仍保守缄默，因为这事传到国外是可耻的事。同时，长江下游的新四军也有不法行动。如果蒋委员长在一九四〇年把共产党叛逆行动的真况公布，历史也许要改观。但是他没有说出，因此共产党更肆无忌惮。”[24]

3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逃亡途中被随行副官刘厚总枪杀。获悉项英遇害，王明悲愤写诗指毛泽东借蒋杀项。王明所指有道理。毛、项结怨已有十年，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以陈独秀为其中国政策的替罪羊，称中国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中共领袖是知识分子而非无产阶级。据此，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任命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为中共领袖，曾为湖北布厂工人的项英被任命为中共六届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对项英非常器重，单独接见，赠以钢笔和刻名手枪。回国后，项英出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王明、博古的主要支持者，兼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1931年初，项英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否定了毛泽东大规模屠杀的肃反，在调查后宣布富田事变是因抓

AB 团运动过火造成，参与兵变的官兵并无大错。毛泽东写信向中共中央状告项为 AB 团的后台。斯大林赞赏毛的杀人肃反，驳回了各苏区对肃反的投诉。根据斯大林的表态，李立三将项英撤职，让毛泽东重掌了江西苏区大权。得到撑腰的毛泽东发动了另一波肃反，将项英劝回的富田兵变领袖杀害，将参与富田事变红二十军将士几乎斩尽杀绝。1932 年 10 月，项英在宁都会议上带头向毛泽东发难，推动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解除了毛的军权。视军权为生命毛从此视项为大敌，盘算着报复。1934 年，中共决定逃离中央苏区时，项英向总书记博古提出警告，说毛泽东正在私下串连活动，目的是夺权，特别是要夺取军权，建议将毛留在江西，不要带毛上路。博因顾忌将来斯大林怪罪，没有接受项的建议。于是，毛对项再添新仇。

全面抗战爆发后，项英领导的江南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因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脱离了中共而不掌实权，项英是新四军实际最高领导人。王明归国后，项英成为王明在军中的主要支持者。在中共高层中，项英以生活简朴，不吸烟、不饮酒、不好色，与士兵同甘共苦著称。在新四军中，项英与士兵吃同样的饭，常把马让予伤兵，自己扛枪行军。据军医处长沈其震回忆，项英患病不用好药，坚持把好药留给伤员。他不仅看不惯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还批评毛躺在担架上长征，批评毛从不看望伤兵，指责毛弃杨（开慧）娶贺（子珍），再弃贺娶江（青）。六届六中全会后，项英明确表示将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项的部下扬帆碰巧对江青在上海演艺圈的旧事知之甚详。项命扬将所了解情况写成报告报给中共中央，表达反对毛江结合。项英此举显示出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天真。他应当知道，张闻天只有最高领袖之名，而无最高领袖之实，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被康生交给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党内唯一敢于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人，项成为毛在党内的首要政敌。得项英推动领袖换人和反对毛江结合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开始了清算项英的系列行动：派刘少奇逐步接管项英的兵权，在苏北盐城另立了由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总部，分批将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

了苏北，只留下光杆司令项英和少量部队在江南；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国民政府方面联系，规定所有对国军方面的联络都必须经他批准；亲自控制延安的电台，通过周恩来控制重庆的电台，切断项英与国民政府方面直接联系的渠道；派饶漱石任东南局副书记作为遥控项英和刘少奇的耳目。此外，潘汉年向日军的岩井情报机关提供了项英在江南指挥部会议上讲话。向日军提供哪些情报潘无权作主。这是毛泽东的授意，背后是毛泽东打击党内头号政敌项英的意图。[25] 12月10日，蒋介石严令新四军从铜陵渡江北上时，毛泽东致电项英要求改走苏南路线，但不将路线改变的情况电告蒋介石。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再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拒绝对军令的讨价还价，再令新四军军部走皖东路线由铜陵渡江北上。1月4日，项英、叶挺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茂林进向苏南。出发后项英发现周边的国军如临大敌，意识到蒋介石并不认可南下的路线，立即致电蒋介石申明路线改变。不过，按照毛泽东的规定，这封紧急电报只能发给延安转重庆。毛泽东以电讯故障的借口扣压了项英的一连串电报。[26] 当项英率残部突围时，毛泽东电台的故障也排除了。多年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于电讯联系中断的说法对不上号，毛称1月6日到9日电讯中断，而周称电讯联系是13日下午断的。对于这样巧合的故障，王明在回忆录中指出，毛泽东把新四军九成的精锐调到江北交给他的亲信刘少奇，留下私敌项英和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是借蒋除项的安排。

关于项英之死，官方的说法是随行副官刘厚总为夺项携带的金银而杀项等。但几个细节让人怀疑这一说法。其一，项英与李一氓中途为何脱离突围的部队；第二，杀项的刘厚总曾去延安受训。刘若是谋财害命之人不会冒生命危险追随有恩于他的项英突围而不乘乱逃跑；第三；刘厚总杀害项英后反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建国后被陈毅亲令匆忙处决。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王明后来在回忆录中不约而同地指出：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如果他们的判断准确，则刘副官杀项应是上述安排的一环。项英所部的覆灭与几年前西路军的覆灭颇为相似，都是毛泽东消灭党内军中对手的连

环套：分拆军队，逐步剥夺对手军权，造成孤军险境，通过电令调动，指挥孤军抗拒政府军令，借国民党军消灭异己。为除掉对手，毛泽东从来不在乎损失军队，除张国焘是如此，除项英也是如此。

国人当时不知道，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军部违抗国民政府屡次军令，除了借蒋除项用意之外，还要挑起全面内战，引苏联出兵入华助他进攻重庆。皖南事变前，他曾致电莫斯科，要求苏联出兵协助他推翻重庆国民政府，[27]事变后他称“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28]派周恩来面见潘友新大使，仍然要求苏联出兵。被潘友新拒绝后，毛泽东直接向莫斯科发了一连串“歇斯底里的电报”，称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要求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29]毛泽东的打重庆计划扰乱了与斯大林让中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防止日苏战争的计划相冲突。斯大林对毛泽东企图拖苏联入中国战场感到愤怒，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间接训斥毛说：“叶是一个打游击的人，查查看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同时，斯大林命潘友新向蒋介石当面表明苏联反对中国内战的立场。蒋顺势请莫斯科出面调停，试探苏联人想要什么。崔可夫将军表示，莫斯科将继续提供军火支持中国抗战，但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共军队的武力行动。为继续获得苏援，蒋介石答应了苏方要求。2月13日，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只好放弃引苏军打到重庆的计划，复电：“服从您的指令”。[30]

蒋介石停止对中共采取强硬行动不仅为了苏援，还为了美援。美国亲共的民意一直在施加压力阻止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少校是美国亲共民意的一位代表。1937年至1938年间，他两次访问中共在华北和西北的根据地，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回美后推出了恶蒋亲共

的报告和《中国的双星》一书，盛赞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与独裁，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意。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前获得了美国三笔共 7000 万美元的贷款（2500 万美元的桐油贷款、2000 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和 2500 万美元的钨砂贷款）。皖南事变时，美国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为继续获得美国援助，蒋介石不得不隐瞒中共对国军开战的情况。事变发生后，爱德加·斯诺和路易斯·斯特朗等听命共产国际的左派记者行动，发表文章抨击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内战，以阻止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刚刚结束华南考察的卡尔逊少校在夏威夷也发表谈话指责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罗斯福总统对中共没有影响力，所能作的是向蒋介石施压，警告要想获得美国的援助就不能打内战。他搁置了再贷 5000 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的议案，派特使居里访华考察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重庆，居里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总统不赞成国民政府反共行动，希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立场。蒋介石向居里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大规模内战。由于蒋介石反复保证不打内战，美国国会经过三个月的辩论后勉强通过了“对华租借法案”。

皖南事变后在继续贯彻对日避战，打击国军，扩张地盘与军力的方针。1943 年 2 月，新四军彭雪枫、罗炳辉部乘苏北日军进犯淮安宝应之机再次向国军苏鲁战区顾锡九军发动了进攻。[31] 至日本投降前，新四军以一个军的建制发展出了四十多万大军。井冈山时期，红军常常以少称多，一个营号称一个军，一个团号称一个军团。而新四军则贯彻毛泽东“避战闷头发展”方针，以多称少，四十万大军仍称一个军，到抗战胜利时，八路、新四两军冒出两百万大军。

建国后，中共修建了皖南事变纪念馆、黄桥战役纪念馆、上饶集中营（皖南事变新四军战俘关押处）纪念馆，将这些纪念馆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邓小平为“皖南事变纪念馆”题词“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上饶集中营纪念馆前的题词为“发扬革命传统”。这些纪念馆的共同点是掩盖重要历史史实，那就是新四军在国军艰难抗战时专门打国军，在黄桥战役、曹

甸战役中大规模地歼灭国军，抗拒北上对日作战的军令，国民政府在无奈中不得不武力消灭叛军。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显示，中共领袖们在抗战期间向八路军、新四军下达的指令没有一件是关于对日作战的，而全部是部署打击国军的。连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对日最后一战》命令实际也是对国军的开战令。如今，这些纪念馆中仍然重复着“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击退反共高潮”等颠倒黑白的解说词。这样解说词并不奇怪，遍布中国的革命纪念馆莫不如此。

“反扫荡”

在华北赶走了国民政府当局后，中共地盘逼近了华北日军控制区。尽管中共通过潘汉年向日军反复表示相安无事意愿，华北日军还是感到威胁，决定武力迫八路军后退。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大将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展开扫荡（五一大扫荡）。执行毛泽东对日避战方针，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军区机关采取化整为零对策，将大部队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藏身于老百姓中。一位参加“反扫荡”的“小八路”在晚年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所在的八路军部队在多次“反扫荡”中遵照上级缩小目标的指示，将各队分散转移，分成排、班、小组，与敌人兜圈子。作为八路军，他从没打过一个日本鬼子。并且，这不是他个人的特殊经历，他没有看过或听过别的八路军打过日本人。[32]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的日记与“小八路”的回忆互相印证。他写道：“看得出来，八路军战斗行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八路军根据延安的命令保存实力，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的原则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到前线去跑一趟，使

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即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被法西斯侵略之时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33]

中共在“五一大扫荡”中的最大战斗发生在辽县。由于八路军总是在日军进攻前转移，日军屡屡扑空。于是，日军第一军派出了由益子重雄中尉率领的“益子挺身队”，运用八路军装扮老百姓的战术，装扮成八路军，深入八路军根据地，通过无线电信号追踪频繁转移驻地的八路军指挥中枢。5月23日，“益子队”在辽县郭家峪附近将八路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干部学校、新华日报社等主要机关及保卫部队包围。被包围的2000多人中有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高级将领。双方激战至30日，八路军分三路突围，副司令彭德怀负伤，参谋长左权阵亡，“益子挺身队”以两人轻伤的损失造成八路军司令部及机关阵亡293人、被俘165人。由于是“反扫荡”中最大的战斗。中共后来将辽县作战宣传成了大战役，称八路军遭到配有大炮、飞机的日军大部队进攻，但“益子挺身队”成员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们总员124人，配有重机枪，但并没有空中支持和火炮。[34]

辽县作战是八路军见日军就逃跑，战后虚假宣传的代表案例。八路军的抗战史由类似虚的假宣传构成。在毛泽东禁止八路军对日作战，三令五申对擅自开战的将领军纪处罚的约束下，除彭德怀作主破坏了几段铁路外，八路

军没有主动对日作战过。郭家峪战斗中阵亡的近三百八路军并非牺牲于对日主动作战，而是死于玩捉迷藏被捉住。

郭家峪战斗中阵亡的左权参谋长是唯一在抗战中献身的中共将军，中共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以作八路军抗战的宣传。但是，左权并非牺牲于率军作战。战斗之前，他被以托派分子罪名迫害，长期申诉不得解脱，因此如被污为“二毛子”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和被骂为汉奸的张自忠那样求死明志，在战斗中故意暴露在炮火下。[35] 多年后，中共为左权平反，取消对左的留党察看处分，但不作对外公布。[36] 左之外，另外两位中共高级将领，彭雪枫和高敬亭也非死于对日作战，彭死于打国军，高因反对新四军打国军而经中共中央批准被项英枪毙。[37]

八路军“反扫荡”的策略是对日避战，化整为零装扮成老百姓，让老百姓作血肉盾牌去承担日寇扫荡的牺牲。日军只好对怀疑为八路军老百姓扫荡。建国后，中共以日军华北扫荡为题材推出了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三进山城》、《烈火金钢》、《平原枪声》等一大批宣传八路军抗日的文艺作品，塑造出了著名的小兵张嘎、李向阳等抗日英雄形象。这些文艺作品将华北百姓描写得吃穿不愁，与八路军亲如一家，掩盖八路军搜刮百姓，藏身百姓之中，让百姓遭受牺牲的真相。《狼牙山五壮士》是编造谎言的典型。被收录进小学课本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说：1941年9月，在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中共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七连六班的战士，宋学义与马宝玉、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为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绝路。然后五人在狼牙山绝顶跳崖，三人牺牲，宋学义与葛振林当时被山腰树枝挂住生还。“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口述，当时上级给他们命令是掩护首长。而据杨成武回忆，“六班的同志赶紧往棋盘坨山峰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转身攀上棋盘坨附近的一个山峰。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按杨说法，

在五壮士到达棋盘坨之前，日军已在那里，不存在“将敌人引上绝路”。“五壮士”故事还有另一版本。据当地村民们说，五人是八路军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百姓指给他们绝路，并将他们行踪告诉了日军。结果，五人中三人被击毙，两人溜坡逃生。太行山区老百姓提起中共的地雷战深恶痛绝，说八路军的地雷战不炸“鬼子”，专炸百姓，埋地雷是为保护自己，地雷一响及时转移。

战争史上，正规军队利用老百姓作掩护打游击战的案例不多，而军队为免平民牺牲拒绝游击战的例子却不少。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在战败时拒绝了手下军官的游击战建议。他说：我宁肯向格兰特将军（北军统帅）投降也不愿给人民带来灾祸。因为他知道，游击战意味将军队的牺牲转嫁到平民头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国际禁雷组织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战杀平民远多于军人。八路军华北反扫荡的“人民战争”是将军队的伤亡转嫁平民的代表。经过两个月的扫荡，八路军不受损失，而冀中根据地人口减少了一半。

第 30 章 和平运动

秘密谈判

第一次淞沪抗战时，汪精卫是坚决的主战派，多次电命北方将领对日开战，到了长城抗战，汪开始主和。陈公博披露写道：“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看清：“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中日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1]

庐山谈话会期间，汪精卫在私下讨论中向部分名流透露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定的《何梅协定》。胡适听闻当即建议：同近卫内阁谈判是可能的，国民政府不应错过这个机会，应当迅速纠正迎合主战民意的错误倾向，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应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寻求谈判限制战争实现和平。此外，胡并建议汪精卫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定的《何梅协定》公之于众以利对日和谈。接受胡适的推荐，蒋介石、汪精卫一起召见了高宗武，听取高介绍了媾和计划要点。汪精卫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不置可否，只表示同意展开谈判。[2] 蒋很清楚尽快结束战争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怕被戴上投降帽子，因此在媾和问题上不表态，保持进退自如。

淞沪会战中，日本主和派艰难努力，推动军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不要求赔款，不要求承认满洲国，只要恢复战前态势的讲和条件。蒋介石对日方停战条件不置可否，并将日方媾和请求向众高层隐瞒，要求国军坚守以等待九国公约会议结果。几天后，国军在淞沪战场大溃败。11 月下旬，日本军参谋本部的主和派在侵华日军军官独断向南京进军的情

况下作最后努力，请德使再次传话表示和谈条件不变。蒋介石仍然不置可否，拖延议和，将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继续向高层隐瞒。12月初，蒋介石在南京讨论保卫战高级将领会议上披露了日方一个月前提出的讲和条件。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能在“恢复战前态势”条件下停战没有理由继续战争。蒋介石还是不置可否。

日军攻克南京后，日本内部的强硬派得势，在德使转达的条件之外增加了“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和“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等苛刻条件。蒋介石对新议和条件不予答复。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在军方强硬派的压力下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召回了驻华大使川越茂，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日大使许世荣，中日和谈大门就此关闭。正在与国民政府代表董道宁秘密接触的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使东亚的结局令人绝望”。关上谈判大门的人，在日本是处于华北派遣军和强硬派巨大压力下的近卫首相，在中国是不承担和谈责任的蒋介石。蒋没有强硬派的压力，高层都同意广田内阁的停战条件，他的压力来自对骂名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了解蒋介石在抗战中一系列决定的钥匙。若他在接到广田内阁的停战条件后果断停战，中日战争完全可能转变为第二次日俄战争或日德夹攻苏联战争。但最怕被骂为作秦桧的蒋介石不会承担和谈责任。

随着在华战线拉长，日本财力、兵力力不从心，国会批准的20亿日元临时军事费预算半年用罄，被迫于1938年2月再追加约50亿日元临时军事费，侵华日军兵力达16个师团，为日本兵力的三分之二。日本参谋本部侦悉苏联远东军布署了28个师，飞机1500架，军备远超关东军，中日战争帮助宿敌苏联性质震动了日本朝野。在军力无法同时应付中、苏的情况下，日本议会、各政党猛烈抨击广田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第一次声明），要求尽快结束中日战争。因应国会和各政党的呼吁，近卫首相

于 1938 年 5 月改组内阁，邀请主张“和平解决中国事变”的宇垣一成大将任外相，设法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重建与重庆的沟通渠道，争取在年底前结束中日战争。

宇垣一成大将是与重庆联系的适当人选。民初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时，宇垣负责安排了亡命国民党人的生活，与国民党人建立了深厚关系。在沪宁、徐州失守，日军进逼武汉之时，蒋介石获悉宇垣出任外相，派张群电贺宇垣一成就职，表达和谈意向。1938 年 6 月，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在香港举行了为宇垣一成和孔祥熙面谈作铺垫的预备会谈。不过，日方提出的条件不再是淞沪会战中的“恢复战前态势”，而是加码为：承认满洲独立；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对日赔偿；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日本在某些地区驻兵；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等等。[3] 7 月 8 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外相）决定以拒绝日本和谈条件的蒋介石下野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授权土肥原领导的机关（在支特别委员会，竹机关，土肥原机关）制订对华策略，推动建立新的中国中央政府。[4]

7 月 18 日，孔祥熙向宇垣传话：“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5] 为赶在武汉失守前达成妥协，孔祥熙除不接受蒋介石辞职条件外基本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其它要求，并答应乘日舰赴长崎会晤宇垣外相。然而，宇垣外相计划的“长崎会谈”因陆军强硬派的反对而半路告吹。

在另一渠道，高宗武奉蒋介石、汪精卫之命致力对日媾和，派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上海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接触，联络到了影佐祯昭。影佐与犬养健拥护石原莞尔的主张，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真正威胁来自苏联，日中两国应消除敌对，

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东亚联盟，共同对付苏联。为此目标，他们积极推动日中和谈，促日本降低和谈的条件。1938年7月，高宗武在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谈中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蒋介石见日方将他下台作为和谈条件后怒斥高宗武。蒋不支持，高的和谈无法继续，只好称病住院。

“焦土政策”

1936年，桂系首领李宗仁以唱抗战高调的方式反蒋，发表了《焦土抗战论》一文，在其中指责蒋介石对日妥协，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迎合潮流，发表了“焦土演说”（最后关头演说）。会后，他实行“焦土”政策，要求在部署防守时实行“烧光”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国民政府在战火未至之前就将众多城市周围烧成一片废墟，甚至将整个村庄烧毁。日军将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称为“三光政策”。南京保卫战前，国军将南京周边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全部赶走，放火焚烧，使整个南京笼罩于烟雾之中。在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更进一步，不仅要求城郊成为焦土，还在武汉市区实行焦土政策，使日军占领的武汉是一片燃烧了两天的废墟。鼓吹、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李宗仁、蒋介石赢得了坚决抗战的名声，可“焦土政策”带给民众的灾难远大于日军占领，声称让日军无法生存的“焦土政策”首先害得民众大批死亡。

焦土政策造成的最著名的灾难是花园口黄河决堤和文夕大火。1938年6月初，蒋介石采纳“以水当兵”的建议，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造成黄水向东南泛滥，淹死百姓近40万人，冲毁民房140万间，淹没耕地2000万亩，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3万平方公里成了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灾，200万人无家可归。炸堤前，蒋介石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堤”。虽然国民政府在炸堤后以积极姿态成立了专门机构主持善后，组织灾民迁移去陕西和南

下豫西南邓县、新野等地垦荒，组织登记造册，发放救援等等，但是为了国军安全撤退和布防武汉，延缓日军进攻步伐，就在黄河水位高涨和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炸堤决口，实在是以抗战和“焦土政策”之名草菅人命。决堤造成的灾难不仅在当时，还导致随后中原地区的连年灾荒。

黄河炸堤在军事上没有取得多少作用，国民政府不久还是决定弃守武汉。弃守之前，蒋介石下令在武汉焚城，实行焦土政策。主持放火的陈诚不忍将商民财产也化为灰烬，故意泄漏放火消息，使放火计划武汉商界群起反对而没能完全实施。武汉焚城后，难民、伤兵、武汉的机关、上海、北京、武汉、南京等地的工商业者涌入长沙，使长沙人口由三十万骤增至五十多万。11月7日，蒋介石来到长沙，在蓉园军事会议上部署“焦土政策”说：“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6] 他严厉斥责陈诚在撤离武汉时焚城不彻底，使交通水利等设施留下来为日军利用，要求再不要出武汉焚城未尽之事。12日，日军攻陷岳阳，蒋介石离开长沙后致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再次强调“焦土政策”说：“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的彻底焚城的命令让长沙商民陷入了火海威胁之中。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部署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负责执行放火，警告焚城不力将受制裁。在层层压力下，负责放火的责任人风声鹤唳。11月12日夜，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预先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以为是放火信号，纷纷跟随放火，全城迅速变成一片火海。当日的电报代号为“文”，时称“文夕大火”。大火持续了三天，烧毁了长沙城中大部分建筑，吞噬了各地来长沙避难商号的财产，使半数百姓无家可归，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只剩下断壁残垣，是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次空

前浩劫。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长沙 190 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仓储的 200 余万石米基本成为灰烬，绸布业、湘绣业、公私医院基本被烧光，文物古迹损失无法估算。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文夕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十多亿元，相当于烧毁了全国三成的商民财产。中央社题为《一片焦土之长沙》的社论说：“长沙近三十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日寇没有趁火发动进攻，只是在广播中和报纸上抨击国民政府放火焚城愚蠢。大火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互相指责。共产党人指责国民政府祸害长沙，国民党人责称有共产党暗中纵火。

11 月 16 日，蒋介石来到长沙，登上天心阁视察，看到千年古城一片焦土。为应付全国各界谴责政府在日军距离长沙很远的情况下放火焚城，他下令严惩有关责任人，限两天内结案，将省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18 日，军法分监部分别判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有期徒刑。专案报呈蒋介石，蒋批“渎职殃民，着即枪毙”，借酆、徐、文等的人头平息民怨。酆悌、徐昆、文重孚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后，蒋介石总结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7]

“焦土政策”的逻辑是，领袖、政府有权以抗战的名义危害人民的财产生命。蒋介石推行“焦土政策”，一再严令安排纵火，注定了火灾必然发生。“焦土政策”的一些真相，如花园口决堤的真相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披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日本侵略造成中国军民数千万人死亡。国民政府没有说的是，抗战初期民众死亡的主因不是战火和日军的屠杀，而是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此后，经国共两党长期宣传，由“焦土政策”而来的“三光政策”被说成是日军的在华政策。

“焦土抗战”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震撼了汪精卫，他反对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反对为抗战而不顾百姓死活。他在长沙大火后谴责焦土政策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8] “牺牲是必要的。但近年以来，有许多人横着一种谬见，以为流寇方法，可以对付侵略，这是滥用焦土政策之最大原因。历史上以流寇方法对付政府，不是政府将他赶尽杀绝，便是他将政府打倒。这种方法不能为对外战争之用。”[9]

汪精卫推动停战

1938年9月，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传闻要主持傀儡政府而被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用斧头劈杀，10月，在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上，陈嘉庚提出“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议案，会议否决了梁实秋等少数人的反对意见，通过了“言和即汉奸”议案。对此，汪精卫驳斥说：“为什么言和即汉奸？如此说来，宪法规定国家的媾和权是作汉奸权了。”[10] 他直言，在全国都在高喊“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口号时，只有少数人准备真的为国家牺牲，大部分人希望别人去牺牲，且不肯老实地承认不愿牺牲自己，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和亡国的责任。

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日本愿意与更换领袖的“新生”国民政府和谈结束战争。响应近卫声明，北平的王克敏和南京的梁鸿志分别发表声明说，只有扫除共产主义中日和平才能实现，而且只有推翻了蒋介石，才能消灭共产党人。紧接着，长沙发生了“文夕大火”。受大火造成的巨大民众灾难震撼，汪精卫面促蒋介石以大局为重，自动辞职以争取实现停战。蒋拒绝辞职，汪与

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议后决定，脱离重庆政府，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运动，争取结束战争。

按照汪等商议的和平运动计划，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展开了谈判，确定密约要点为：日本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梅再与高宗武和翻译周隆庠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的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在上海虹口重光堂密谈，约定实现和平步骤为：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汪精卫发表声明脱离重庆，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谈妥后，今井与梅思平分别向本方报告。

在重庆，汪精卫、周佛海听取了梅思平关于重光堂密约及近卫宣言草案的汇报。汪的亲信陈公博劝汪止步说：先生几年前主持签署《塘沽协定》被骂为卖国并被刺，现在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对日言和必身败名裂。梅思平也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坚持说：“中国已无力再战，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大家必为共产党的俘虏。既然蒋介石拒绝以个人辞职争取停战，我决定自己出面单独推动和平救国。”陈公博再劝汪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考虑两天回复：“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随后，汪精卫派夫人陈璧君去云南、广东寻求龙云、余汉谋的支持。龙、余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当面保证支持和平运动，同时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

得龙、余的表态，汪精卫和几位和平运动支持者分散离开重庆。周佛海、陶希圣以视察、讲学为名先到了昆明。12月18日，汪精卫与夫人、秘书、女儿夫妇一行飞离重庆。临行，汪精卫留长信给蒋介石，谓所走的道路不同，

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到昆明后，汪精卫向龙云介绍和平运动计划为：自己到河内后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龙等西南各省实力派通电响应，在西南另建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结束战争。龙云口头表示支持和平运动，送汪一行飞赴河内。陈公博为汪的精神所感，表示追随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了”。

汪精卫及其支持者们把重光堂会议的日方代表当作了日本的全权代表。他们没想到，日本政府作不了军方的主，军方又被“下克上”，内阁的声明文本须经一大群中级军官同意才能发表。中级军官们反对确定撤军日期，声称战胜国不可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内阁只得妥协。12月22日，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谈判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符合重光堂约定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但删除了最为关键的“两年内撤军”内容。声明发表后，日本主和派纷纷抨击政府背弃约定，犬养健谴责政府声明说：“重光堂会议商定的日本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限期撤兵等项精神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号召力所在。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删除，使汪的和平运动丧失了号召力，我深感失望”；西义显直言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说：“近卫的声明预示了和平运动的阴暗前景”。^[11] 对于日本政府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背约，汪精卫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不过，作为主和者，他理解日方主和派的艰难，认为近卫声明虽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申明了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项符合中国利益的承诺，对实现和平仍有一定推动作用，于是决定不因日本人背约而放弃和平运动。他向追随者们坦言，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不介意多背些骂名。按照重光堂协议约定，汪精卫于12月26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和平倡议的声明。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指出，近卫内阁提出的条件比一年前日方的和谈条件更为有而确定，现在应该果断结束战争，继续战争只能让共产党和苏联得利。29日，汪精卫再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平通电、艳电），促国民政府接受近卫的三原则，早日恢复和平，谓“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艳电”在全国引起了严重分歧。上海和香港的报纸上刊出了一批公开支持的声明，支持者包括林柏生、傅式悦、褚民谊等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进行的调查显示：159个回答者中，63人支持汪的行动，25人反对，其余意见不定。[12]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否认自己曾默许和平运动，宣布汪精卫叛国，永远开除汪的党籍，下令缉拿汪及其追随者。原先承诺支持和平运动的云南、两广、四川等地方实力派全部表态反对汪的行动，使汪精卫依托西南诸省推动全国和平运动的计划泡汤。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下台，将汪精卫搁在了和平运动计划的半路。

河内刺汪

对汪精卫的打击不仅来自龙云等人背约和近卫内阁的下台，更来自继任的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对推动和平运动的消极态度。在日本强硬派压力之下，平沼内阁提出了不利和平运动的新条件。虽然作好了“跳火坑”的准备，汪精卫也难以承受接踵而来的戏耍、背约、孤独寡助多重打击。他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13] 正当汪精卫准备放弃和平运动流亡欧洲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河内，劝汪回重庆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

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得到汪的回复后，蒋介石再派谷正鼎来河内，向汪提供去欧洲旅行的护照和旅费，劝汪放弃和平运动计划。汪精卫同意赴欧，但表示还要回来推动和谈。[14] 得汪再次的答复后，蒋介石向军统局局长戴笠下达了刺汪令。3月20日，汪的秘书曾仲鸣预感汪有杀身之祸，提出临时换住汪的大房。当夜，军统特务行刺，曾仲鸣中弹十多发。临死前，曾仲鸣用最后力气为汪精卫签署了支票。两天后，曾仲鸣夫人，画家方君璧发表声明，在其中说：“鼓吹和平可能带来牺牲，但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死去换取民族的生。”曾经行刺和遇刺的汪精卫受到曾仲鸣夫妇精神的震撼。他想，曾仲鸣主动要求换房并不单单是个人效忠，而是为了和平运动献身，自己不应就这么放弃先前认为值得献身的和平运动。他改变主意，决定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为日占区的民众作些贡献。他表明心迹写道，“不仅是为了安慰我永世不能忘怀的朋友们，更主要的是为了民族存亡所系的这种政策。”

3月27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一文，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就会议的议和主题责问蒋介石道：“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蒋介石没有说那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曾仲鸣是为国而死的。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

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汪文使蒋介石陷入窘境，吴雅晖发表了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出面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露外交军事秘密”，反而间接证明了汪文披露的情况属实。

汪精卫质问得有道理。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接受胡适谋求外交解决的建议，与汪精卫一起召见高宗武。听取高介绍“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媾和计划后，汪精卫明确表示支持，而蒋介石不置可否，并在后来长期在和战问题上取骑墙态度，以使自己在和谈成功与失败时都能进退自如。在淞沪会战日军登陆杭州前接到广田的和谈条件时，蒋介石称可以作为谈判基础，在南京的高层会议上，他还是说可以作为谈判基础，既拖延了和谈，也默认了和谈。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就明确反对通过外交谈判达到停战就不会有高宗武、梅思平的对日谈判，就不会有重光堂协议。高宗武对日展开和谈是奉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共同指示行动的，没有蒋的批准就没有高的活动经费，因而不可能有高的和谈。汪精卫在出走前并没有隐瞒推动和平运动的立场。蒋介石通过戴笠的情报网对汪夫人赴云南、广东摸底，汪集团开会及出走的情况了如指掌。出于权力斗争考虑，蒋有意放对自己领袖地位最具挑战资历的汪出走。在汪出走后，蒋声言自己与和平运动无关，使原来国民党内主和派顿时都成了汉奸疑犯，迫使龙云和和平计划支持者们沉默或转唱高调，没有人再敢谈论和平谈判。

高层们不知道，蒋介石在下令刺汪的同时，在宣布汪精卫谋和叛国的同时派柳云龙、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与日本代表萱野长知在香港进行着秘密和谈。**[15]** 柳代表国民政府提出条件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日军撤兵；签订防共协定；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满洲问题另行协商。**[16]**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提出以“共同讨共”为和平先决条件。蒋介石饱受中共夹击之苦，接受“共同讨共”。**[17]** 蒋的秘密和谈之举说明，刺

汪非因和谈，而是清除异己行动。这一行动的部署应是在汪面劝他辞职时就开始了。在权斗较量中，汪精卫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河内刺汪事件后，日本主和派乘机发难，指责平沼内阁对汪背约。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平沼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面另组国民政府，搁置萱野长知与蒋介石代表间的秘密谈判，派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赴河内营救汪精卫。在死亡威胁中，汪精卫无奈地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登船赴沪。预感此去前景黯淡，他赋诗道：“把酒长亭杯已空，行人车马各西东。枫林不共斜阳去，自向荒郊寂寞红”。

成立政府

1939年5月底，汪精卫、高宗武一行由沪飞日，与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面谈建立新政府事宜。平沼内阁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决定调整在华派遣军各部的利益关系，将日军扶持成立的北平、南京两傀儡政府合并入汪精卫为首的新国民政府。随后，高宗武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在上海开始了筹组政府的谈判。这时的汪精卫是被重庆国民政府追杀的一介文人，除个人的声望和几个追随者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谈判中，日方得寸进尺，汪精卫一退再退，谈判多次不欢而散。汪精卫坚持国民党政府法统和青天白日旗底线，但同意了由日本人控制各级政府机关的顾问体制，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和蒙疆（包括长城以南的地方）的自治，承认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享有特权等日方要求。汪认为，在日占区，他对日方特权的承认是没有代价的退让。最终，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汪精卫政权沿用青天白日旗，但坚持在旗上附加被周佛海称为“猪尾巴”的“和平反共建国”黄带。

1939年底，汪、日达成了《调整中日关系协议》（《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调整中日关系协议》建立在日苏瓜分中国的秘密谅解基础上，即苏联承认满洲、“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

与山东各省、华中、华南、台湾与海南岛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日本方面要求会谈人员都在文件草案上签字保证永远不将方案内容对外泄露。和平运动成员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劝汪不要签字，退出和谈，出国隐居。汪精卫决定签字，并坦言：“退出谈判肯定对个人有利，而继续谈判，成立政府则对国家有利，这一协定不过是我的个人卖身契，中国我是卖不了的。”[18]

1940年1月，汪精卫签署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根据日苏谅解，苏联立即表态支持汪精卫政府。梅思平后来披露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的考虑写道：“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主张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干部同志会议意见亦颇分歧，但汪先生则提出如下之理由：

一、和平运动固已绝望，吾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日军以我等为俘虏亦属无妨。但如此做法，于个人或者比较有利，但于国家、于人民、于后方之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吾人既做到如此地步，则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即三数深知内幕者如影佐祯昭等，在今日固已明知我之运动前途渺茫，然彼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亦皆讳言和运之失败。其他不知内幕者，如和知、田尻之类则又与影佐等争功，以为影佐可以得到和平之门径，彼等亦可以另觅路线。于是自欺互欺，皆以为和平指日可期，殊不知前方军士、后方人民于和平宣传之下即已消失战意于无形。我等今日如果明白宣言和平运动已经失败，岂非揭穿西洋镜而增强日本军民之战意？我等为自全之计则可，为国家计则不可。中国之抗战非国际形势有极大之变化，则不足以图胜利。故非旷日持久不为功，非缓兵顿敌以老其师，而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别无良策也。重庆各同志现在正在整理后方、编训部队，

而我等在此颯颜厚面与骄敌相周旋，日夜以和平之说羈縻之。即其不信，使其怀疑，亦足以挫其锐气。但我等又不能以通电、宣言等空文搪塞，必须有所组织，以和平救国为号召，然后可以与敌人作一、二年甚或三、五年之周旋。如能延宕数年，使后方可以稍资休息，即使国际形势无变化，而后方自力之增强，亦可以作长期之抵抗。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二、从人民之利益言之：沦陷区域如一任敌人之蹂躏、而无中国政府之保护，则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而转为日军作伥而贼害良民者，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如果集合各方之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之政府，以统一沦陷区之行政，使沦陷区之人民不受敌人军政之压迫，则关系国家之元气，诚非细小。我等固知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受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之交涉，然较之一任敌人之宰割者当较胜一筹。且既有政府，则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则亦未始非人民所愿望。

三、至于共产党问题，我确信抗战愈久，则共产党之力量愈强，此在抗战中为无可奈何之事实。在后方区域，中央势力所及，自有控制之方法。至在沦陷区域，则中央势力既已不及敌人，所占者为点及线，其余必尽为共产党所占据。人民既无所领导，尤易为共党威迫、利诱所胁持。深恐数年之后敌人虽然败退，而沦陷区内共产党之势力则不易铲除，其恶毒或且视敌人为

尤甚。我等今日如能在沦陷区恢复国民党之统治、恢复国民党之组织，仍以三民主义领导人民思想，则沦陷区人民必能仍集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恢复并保存其民族意识，则共产党势力蔓延必可制止其大半。且今日后方同志反共工作甚为困难，盖既为联合抗战，当然不能明白反共。我等则无此拘束，且正可利用敌人‘共同防共’之口号，使敌人与共党互相牵制。我等如能运用得法，亦可于此夹缝中，在沦陷区内建树若干分之力量，将来自可与后方同志相结合。今日后方同志所不能做之工作，我等正可优为之，或且为战后工作奠一部分之基础。至于成绩如何，固视吾人能力转移。故欲在沦陷区内展张反共工作，则又非恢复国民党及组织国民政府不可。

四、再退一步言之：在今日之国内外环境下，抗战之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抗战如果胜利，则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者，不过个人之身败名裂而已，于国家、于人民无所损害也。即政府成立之后，不得已或须与敌人签订若干不利之条约，但抗战如果胜利，则此等条约当然无效。反之，万一抗战失败，则吾人已先在南京成立政府，或可利用轴心国际之牵制，使日本对中国之束缚稍为减轻，或可利用若干比较优良之既成事实，使战败之负担不至过于严酷。总之，我等组织政府，抗战胜利则无害，抗战失败则有利，为个人打算则为冒险、为狂妄，为国家打算则为万一不幸时之一种保险办法。

汪先生以上述各种理由及目的，为同志反复开导，并坦白声明：同志之参加尽可自由，有此牺牲之决心者即行参加；否则将来身败名裂，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则莫可谁尤。因此，即决定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所取之政策如下：
①恢复国民党之党治系统，惟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者参加中政会及政府各院部。
②恢复国民党之组织及三民主义之宣言。
③恢复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当时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
④正式宣布反共政策。
⑤与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进而与德、意等轴心国建立外交关系。
⑥内政方面恢复独立行政，撤废日本之军政。汪先生本此政纲，即于二十八年底经日本驻华代表影佐祯昭等与日本军政当局往返磋商，经过无数波折，日本方

得同意以上各项之政纲。又与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商谈合并办法，最后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青岛会谈，决定于是年三月以国民政府还都之方式，成立沦陷区统一之政府。”[19]

汪精卫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后，高宗武和陶希圣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密约原本在杜月笙、万墨林协助下离沪到了香港，在《大公报》发表了脱汪投蒋公开信，并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公诸报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立即转载了上述文件，蒋介石立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宣布取消对高宗武的通缉令，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共《新华日报》一齐发表长文号召“打倒走狗汉奸汪精卫”，是为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是“和平运动”计划最早的执行者，没有他操办就不会有汪精卫出走河内。日方谈判对手，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后来怀疑高 1939 年 2 月到箱根、东京与日本当局会谈时没有把汪的意见充分地向日本当局说明，会谈后也未将日方的意见全部地向汪精卫传达。[20] 和平运动的日方经办人犬养健在与高一起推动和平运动过程中感到高与汪集团内其他人不同。当时军统在上海活跃，汪精卫的追随者们因军统刺杀威胁而绝不轻易外出，唯高宗武若无其事，照常出行，称暗杀可以防备，且与高外出每一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高、陶事件后犬养才意识到，高不是胆大，而是有恃无恐。[21] 据矢野和犬养二人判断，高宗武从接受蒋介石的活动经费之日起就是蒋安插在汪精卫身边的卧底，奉命推动汪出走。河内刺汪事件后，高继续卧底，在汪签署密约后才携出走曝光，给汪的声望致命一击，助蒋介石塑造了从始至终坚决主战，拒绝对日妥协的形象。

高陶事件的另一主角陶希圣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因和平运动理念相投而追随汪脱离重庆到昆明再到河内。刺汪事件后，陶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一文，为和平运动辩护说：

“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他半路离汪投蒋的一种解释是：随着和平运动进入组织新政府阶段，陶被重庆当局列入通缉、暗杀名单，在生命和名节双失威胁下，陶选择了脱离和平运动，以献上密约原件的方式向重庆方面赎身。他在 1939 年 10 月 20 日的一封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22] 他信中的上述说法似乎符合这第一种解释。陶离汪投蒋的另一种解释是，陶也是蒋介石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卧底。因为若非如此，陶回归重庆后不可能获蒋介石重用，不可能再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不可能随蒋去台湾。高宗武前后行动矛盾，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说其父始终感到有愧于汪，高、陶二人晚年均不提对日交涉内幕和离汪原因 [23] 等等迹象让人相信，和平运动自始至终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中。

经历高、陶事件的打击，汪精卫不改初衷，继续推动和平，于 1940 年 1 月下旬赴青岛，与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了一连串谈判。北平、南京两傀儡政府分别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扶植成立。1937 年 12 月 14 日，在日军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之时，华北派遣军抢先在北平扶植成立了由王克敏任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成立政府的诉求是中日携手反共。其成立宣言称：“国民党窃据政柄，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中日同种，中日战争为同种相噬的悲剧。”北平临时政府在华北成立了以缪斌任会长，以反共防共，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为宗旨的“新民会”。缪斌认为，中日两国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新民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达到数十万，设立了中央训练所和新民学院，送学

员到日本学习后回国担任官职和新民学校教职，组织成立了新民少年团（童子军）、治安自卫组织、青年训练所、青少年女团训练队、青年团训练所、农村青年训练班、政治训练班、新民突击队训练班、新民合唱团，新民广播电台，办起了新民医院，《新民报》，在华北县、区、乡遍设新民分会和办事处，合作社，召开尊孔、敬祖先、谴责国民党的集会。一时，在日军控制下华北城市到处可见阴阳标志的新民会会旗。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了自任主席，陈公博为立法院院长的国民政府，举行了还都仪式。在重庆军统的追杀、延安通日、日本拖延承认以等待与蒋介石和谈，新政府受日军控制，行政上委任官员须征得日军同意，财政上靠日军从海关收入中拨给经费，军事上政府军由日本顾问控制的四面打击之下，汪精卫“苍老憔悴，微微闻到叹息之声”。[24]11月，日汪签署了《基本关系条约》，南京维新政府和北平临时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统一于南京汪精卫政府治下，日政府在拖延了八个月后终于承认汪政府，德国、意大利、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轴心国集团成员国跟随日本宣布承认汪政府。重庆方面声明日汪所订条约非法、无效，悬赏十万元缉拿汪精卫。

然而，蒋介石却秘密继续着对日和谈。蒋介石为日军和共军的两面夹击所苦，不得不承认汪精卫“长期抗战的受益者只能是苏俄和中共，应早日结束战争”意见正确，决定与日方展开和谈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军统局根据蒋的指示派人冒名“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展开和谈（日方称“桐工作”，中方称“宋子良工作”）。[25]日本军部为摆脱中国战场泥潭重新开通与蒋介石和谈的渠道，向重庆提出停战条件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26]重庆作出让步：承认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原则

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在国防上有必要时，日军可推迟撤兵；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27] 和谈期间，日军以战迫降，攻占了入川门户宜昌，对重庆猛烈轰炸，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危急形势下，蒋介石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在“三人会谈”即将举行之时，抗战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美国决心制止日本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扩张，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封锁，并决定大规模援华，蒋介石因应战略形势变化，搁置了“三人长沙会谈”。

1941年3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谅解方案为：日军自中国撤退，不索赔，协议门户开放方针，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承认满洲国，俟中国接受，日本愿依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直接与中国新政府和谈，如重庆政府拒绝，美国不再向中国提供援助。美国重申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原则，拒绝日本干涉中国内政。7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强化南进态势”。会后，日军继续南进，占领了西贡。美国强硬照会日本，要求停止南进，否则采取行动维护太平洋和平。日本面临要么从中国撤军，停止南进，要么对美开战的抉择。10月，近卫首相召集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举行会议（五人会议）。会上，近卫首相主和，东条陆相反对从中国撤军说：“假如屈服于美国的主张，支那事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满洲国和朝鲜殖民地也将不保……只有驻军才能使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28] 会后，近卫内阁因政策主张被否总辞，东条英机上台组阁，决定对美开战。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美、英、俄、中等26个同盟国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发表了联合国宣言，宣布全力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苦撑四年抗战盼望的与各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局面到来，蒋介石也终于等来了通过盟国战胜日本的局面，从此抛弃对日议和谈判。

乘日本对同盟国宣战之机，汪精卫与日本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谈判，与法国维希政府签订收回法租界协定，收回法国在北平、天津、上海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废除法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2年8月，汪精卫政府宣布：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日本租界。1943年1月9日，汪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权，收回北平使馆区，北平、天津、苏州、杭州等地的日本租界的协议。

和平运动终结

进入1943年，日本败势显现，汪政府的官员们感到末日迫近，周佛海暗中投蒋，开始按重庆指示行事。汪精卫虽准备好“跳火坑”，但在身败名裂来临时也难掩悲伤。他赋诗填词自嘲写道：“心字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在一次饭局上，他酒后痛哭失声地说：在重庆明明白白与蒋介石讲妥演双簧，因日本人以蒋为和谈对手才出面对日本讲和，不料出面后被蒋指为汉奸，自己上了蒋介石的当。

1944年初，汪精卫遇刺旧创复发，赴日就医，将政务交陈公博、周佛海全权代理。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手术失败去世。他最后的遗言是“我要回中国”。曾与他约定和谈停战的日本前首相近卫前来吊唁，在汪的遗体前默立了一个多小时。近卫清楚，由于他屈从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压力，从声明中删除了关于限期撤军的承诺，使汪精卫丧失了和平运动号召力，被中国人唾骂为汉奸。最了解汪精卫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汪精卫去世后，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坚持在职

务前加“代”字，申明：“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了汪政府的最后会议，宣读解散宣言后即散会。

汪精卫的酒后之言是真话，他的确上了蒋的当。第一次淞沪抗战后，二人一致认识到，国民政府不可能对北方的日军和南方的红军两面作战，达成了对日妥协，推迟全面开战，等待日军攻苏的共识。这就是和平运动的开端。蒋介石将汪精卫与日方达成的妥协协定秘而不宣，一是为推迟中日开战的考虑，二是要维护自己的名声。汪发表艳电后，重庆、延安均以鞭挞“汉奸汪精卫”来营造自己的抗战名声。其实，蒋介石没有资格骂汪卖国。是他与汪共同决定了对日妥协谈判方针，共同开启了和平运动，只不过在和平运动中他推汪出面。在汪组建傀儡政府时，他也在秘密进行着对日妥协谈判。他没有与汪一起出席与日本方面的“三人会谈”是因为，他幸运地等到了美国出手制日带来胜利曙光。中共更无资格抨击汪精卫。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对日避战，专打国军，与日军秘密勾结，交换情报。毛泽东不断将袁殊、潘汉年等人搞来的日本机密提供给斯大林，扮演着苏联间谍的角色。汪政府是日本傀儡不假。但国、共两党都是外国傀儡出身。国民党人都曾是日本傀儡，苏俄傀儡，共产党人从立党后就一直是苏联傀儡，高层们还是苏联间谍，还是抗战期间通敌者。汪精卫的汉奸名声就是被这样的国共党人骂出来。

只有了解了斯大林长期策划中日开战的历史事实，了解苏联从中日开战中得到的好处，才能了解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意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目标是促中日开战以消除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为了这一目标，他挑起淞沪中日战事，批准红军退到西北，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指挥在中国掀起了促中日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汪精卫看到，日苏战争可能爆发，联手制定了符合中国利益的对日妥协和谈的政策。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斯大林最怕的。为了苏联利益，共产国际指挥在华俄党加紧推动促中日开战的抗日救亡宣传。德日签定反共协定后，斯大林担心日本攻

苏的恐惧倍增，不再满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指示立即在华北和华南同时动手，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根据他的指示，共产国际和中共、宋庆龄等路人马同时行动，策动了芦沟桥事变和淞沪战事，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中日大打出手后，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了 2.5 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 30 个陆军师的装备和 1000 架的战机，派来 2000 名飞行员，500 名苏联军事顾问。苏联的援华不是为了帮中国，而是为自身安全，致力于推动中日战争扩大，要求中国拖住日本。并且，苏联对华提供军火不是无偿援助，而是军火生意，中国须以钨、羊毛和茶叶等苏联需要的战略物资偿还军火贷款。苏联派员常驻延安督促中共军队对日作战也不是为保卫中国，而是为了监督中共加入对日作战，帮助苏联消除日军北攻威胁。乘中日全面开战之机，斯大林实施了在新吞并的中国领土区域灭绝华人的预定计划，将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的华人以危险分子、日本特务等随意罪名大规模逮捕、关押、处决，或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消灭了远东三十多万华人。[29]

只有了解苏联对日从弱势到强势的转变过程才能了解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意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斯大林对日本处处示弱。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使苏联对日有了底气斯大林开始对日本处处用强。1938 年 6 月底，苏军占领了中、苏、朝交界处的小山张鼓峰。沙俄曾在《中俄瑛珲条约》条约中文本做手脚，在中文本中承认张鼓峰是中国领土，而俄文本中称张鼓峰是俄罗斯领土。日本不容苏军占据可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内阁派驻苏大使重光葵对苏交涉要求苏联从张鼓峰撤军。苏联强硬拒绝，日军大本营只好动武，派驻朝日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在装甲车、飞机的配合下经三天激战夺回了张鼓峰。苏军败退，诱日军追到到乌苏里斯克草原，加伦将军指挥远东军区四万大军配以两百多门火炮、两百多辆坦克、两百多架新式飞机将日军一个精锐师团歼灭。这回轮到日本在两面作战困境被迫对苏示弱，与苏联签定了妥协协定。张鼓峰事件推迟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国军不知张鼓峰的激战，还奇怪日军在 6 月集结完毕为何拖延了两个月才对武汉发起进攻。

张鼓峰之战后，斯大林继续对日用强。1939年5月，苏军在蒙古诺门坎挑起对日战争，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元帅指挥远东红军主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决战。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空战和坦克战。两面作战的日军再被苏军击败，关东军主力遭到重创。平沼内阁为这一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败仗引咎辞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最怕的是中日和谈及汪精卫主持签定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如果中日在淞沪会战中，或在南京保卫战前达成停战，苏联就不敢对日用强，就不会有张鼓峰、诺门坎对日作战的胜利，相反，可能被日、德联手推翻肢解。成功挑起中日战争，陷日本于中国战场泥潭后，苏联有了对日决战的底气，取得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战的战略性胜利，彻底摧毁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勇气和信心，实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略目标——消除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由于中日开战，斯大林敢于在东线基本算不设防，将西伯利亚的精锐抽调去欧洲。诺门坎战役期间，斯大林与德国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再瓦解了德、日的反共联盟，成功使迫日本放弃“北进”计划，转向“南进”太平洋。可以说，没有中日全面战争，就不会有关东军对苏军的惨败，就不会有日本南进战略，就不会有日、美开战，因而也就不会有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背后是斯大林引爆中日战争的成功运作。消除日本攻苏威胁后，斯大林于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瓜分中欧，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补充议定书》。^[30]然而不久，希特勒将进攻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与德国瓜分中欧的计划破产。为避免两面作战困境，斯大林再改变对日用强政策，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汪精卫看清了斯大林陷中日于战火以自保的算盘，富于预见性地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继续唱抗战的高调，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

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共产党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1]“共产主义同爱国主义格格不入，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共产党人利用战争执行他们摧毁中产阶级和偏下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使大部分民众失去工作，无家可归。这样，在赤贫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被共产党所利用。共产党通过非法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使群众变成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在知识方面破了产，那就可以使人民盲从得更加厉害。共产党是以他们的边区政府取代国民政府，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苏维埃中国，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保护国。”[32]作为曾经的苏俄顾问手下的左派领班，汪精卫反省后的论断可谓入木三分。他推动的和平运动是对付苏联和中共利用日华冲突计划最有效的策略。斯大林担心中日停战会带来日、德夹击的威胁，毛泽东担心中日停战打破他理想的“三国志”局面和延安的安宁。因此，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后，季米特洛夫立即致电中共中央：“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中共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和军队的投降派。”“中共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33]

武汉会战之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日本对苏联保持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陆路通道强烈不满，要求切断中国从国外取得战略资源供应的通道。虽然日本陷入了中国的战争泥潭无力北攻苏联，但斯大林在德国入侵威胁下仍担心德日夹攻，决定协助日本对中国的封锁，断绝中国经新疆通中亚

的西北通路，停止了象征性的对华援助，召回援华飞行员和顾问。蒋经国多年后写道：“抗战时间，苏联也有飞机和志愿队派到中国来助战。有一天，驻兰州的俄国飞行队里一个队员，因为多喝了几杯酒，对我露出真言说：‘我们到中国来打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点日本的新式武器做对象，来练习练习。’他们把我们流血争取独立生存的战争，当作他们练习武器的试验场所。所以经过‘练习’之后，飞机不来了，坦克也不来了。最后，更把东北接收来的日本的武器交给共匪，来打倒我们的政府了。俄帝这种狡诈狰狞的面目，谁都认识得清楚的。”[34]

1941年，为避免在欧战爆发后两线作战的困境，苏联单方撕毁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是日俄战争后两国多次瓜分中国满蒙和朝鲜势力范围密约的继续。对此条约，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而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这不过是苏日过去的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当张鼓峰，诺门坎战斗时，苏日军队便是在苏联满洲及外蒙古边境地方作战的，所以以后停战及划界委员会也是有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伪满代表参加的。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的今后安全，这丝毫不能也没有变更中国的领土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之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即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35]毛泽东为苏联辩护说：“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36]苏联与日本签定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让共产国际的秘密外围组织救国会陷入两难：若追

随中共表态支持苏联则暴露俄党面目面临国人的声讨，若保持沉默又难以解释。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等救国会成员讨论后发出一封措词温和的《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条约“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公开信发出后，周恩来严厉训斥救国会，勒令不得再报刊发表该公开信。沈钧儒赶紧向周检讨，[37] 率救国会改口拥苏。（1950 年代，中共在整肃反苏言论的运动中重新追究《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的主谋。经过当时救国会领导人之间的互相推诿，最后将责任推给了起草公开信的王造时，致王被划为右派，后被迫害致死）。共产国际下属们的拥苏表现证明了汪精卫“中共毫无民族意识，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38] 论断的正确。

战时对敌妥协从来极富争议。汪精卫对日和谈，争取结束战争的考虑与法国的妥协者赖伐尔（**PIERRE LAVAL**）、贝当元帅（**HENRI PHILIPPE PÉTAIN**）大致相同。法国的妥协者们提出了“与其莫斯科，不如柏林”的口号，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苏联，法、德相拼只能让苏联获益；汪精卫认为中日全面战争是苏联所挑起，是苏联所希望的，中日长期战争只能使苏联与中共受益。中日两国应尽快结束战争能使中国避免走上共产道路。大批国民党军投奔汪政府的考虑与汪精卫一样，看清了有共军在侧百般攻击无力抗战现实，于是相信“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相信全力反共才能“曲线救国”。后来，中共避战壮大后摘取胜利果实，苏联扶植中共推翻了国民政府，赤化了中国的结果证明汪精卫的远见。从战后共产阵营壮大，造成上亿人死难的事实看，以拒绝共产主义，中日停战联手反共为诉求的和平运动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假如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成功，达成中日停战，莫斯科会在 1941 年陷落，苏联不复存在，就不会有共产阵营和共产中国。革命党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惯用手法之一是利用民族主义，开展所谓反帝运动是如此，推动中日开战是如此，抹黑和平运动也是如此。

拒绝赤化之外，和平运动的另一诉求是反对“焦土抗战”，认为人民生命财产重于高调口号。突袭珍珠港当天，日军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摧毁了机场内的英国空军全部战机，炸沉了在港英国战舰。无力防守香港的港督杨慕琦率众官员向日军投降，这在香港和英国均未引来谴责。西方和香港民众认为在无力防守或无力再战时投降并无不妥。但在中国，从来是唱血战高调留芳名，为免生灵涂炭停战媾和背骂名。秦桧在军事上已丧失抵抗能力时出面主持了和谈，为南宋换来了一百五十年的偏安，结果被千年唾骂，在偏安中写爱国诗篇的陆游、辛弃疾受到世代歌颂。这种情况在抗战中再现。汪精卫出面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成立南京政府，使日军有了停止进攻的台阶。可以说，有汪背骂名才有重庆偏安，才有了蒋介石的不屈形象。

对于和平运动卖国求荣的指责，周佛海坦言：“生活在狂轰滥炸的重庆，比在上海还安全得多，老实说一个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不管在哪儿都有最坚固的防空壕，挨轰炸时总是安全的。空袭警报发出后，总有充裕的时间去作准备。对比一下，1939年我在上海却经常受到共产党分子和国民党政权特务分子的威胁。由于刺客的来临事先没有警报……；我想，这些恐怖分子对生命所构成的威胁，比日本的空袭要严重得多。”^[39]汪精卫在发动和平运动之初就因主持妥协谈判被刺，对和平运动带来的个人凶险非常清楚。他在《于友人书》中透露推动和平运动的心迹写道：“老兄，我在重庆时候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租得一间房子，有几十个卫士绕围着，我的安全是无问题的。如果敌机来呢？我会入地下室。如果重庆又象南京、武汉呢？我会随着机关迁移。我在中国国民党是副总裁，在国防最高会议是副主席，我没有最高权力，我言而听则幸甚，言而不听，则言者无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溃的时候，我还有希望名正言顺出来收拾，收拾不来，我以一死报国，生前甚逸，死后亦获令名。你替我打算，我有了这样的处境，如何会离开重庆？但是你知道我的，我从二十多岁投身革命以来，就不曾替自己打算过，何况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着国破家亡，我那里还有这些闲心，来替自己打算？”他解释成立政府的理由说，那至少可以减少日军对占领区人民的屠杀，

至少可设法约束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压榨。事实上，他和追随者们冒着暗杀危险与日本人周旋，确实帮助拯救了百万百姓，避免了大规模屠杀，保证了敌占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收编了大批来投的国军，使这些国军不参加对重庆政府的作战。百姓在汪精卫政权下生活过得去，物价平稳，没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政府也没有发行粮票布票限制吃穿。假如没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人争物资，不知会增加多少百姓被日军屠杀或冻饿而死。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沦陷区百姓没有谴责汪政府迫害，反而对汪政府心存感激。对德妥协的赖伐尔说：“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40] 这一说法也适用于汪精卫。汪在全面抗战爆发时说“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41] 他所言的牺牲不仅指生命，还包括名节。在汉奸、卖国骂名泛滥时，没有人敢于为了民众生命出头言和，大家只管高喊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焦土抗战。汪精卫及其追随者推动和平运动，组织南京政府，结果身败名裂。在举国骂声中，反对唱高调胡适评价汪及追随者说：“他们是爱国的”。[42]

惩办汉奸运动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界定汉奸为“伪政府组织官员”与“一切伪教育、文化、宣传机关及伪党部和社会团体”，公布汉奸罪的量刑为死刑、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包庇汉奸罪也可判处有期徒刑或处罚金。据此，国民党军统局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汉奸行动。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再修定《惩治汉奸条例》，规定：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明知为汉奸而藏匿不报或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条之罪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查封动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查封动产，得委

托该管地方行政机关执行之；明知为汉奸将受没收或查封之财产而隐匿、收买、寄藏或冒名顶替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

惩办汉奸运动的标志举措是处决汪精卫政府的主要成员。南京高等法院根据《惩治汉奸条例》作出《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判处陈公博（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褚民谊（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周佛海（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林柏生（南京政府宣传部长）、丁默村（浙江省长）、殷汝耕等人死刑，列举罪名为：“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行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汪政府的重要成员周佛海在抗战后期已归顺重庆。蒋介石给周写过几封“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让周“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抗战胜利时，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武装接收沦陷区的行动，得蒋安排免于死刑。蒋介石《准将周佛海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中所言“周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是事实，但贡献者岂止是周，汪政府其他成员均有此贡献，陈公博所言“南京政府的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43]也是事实。陈没有为自己辩护，但为汪精卫辩护说：“我不赞成汪先生离开重庆，也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来我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中最紧要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已抗战胜利，汪先生也逝世，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

有熬苦，更无荣可求。我对于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该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对一个已逝世而不能自辨的人，不应该这样谩骂。”这时，听众席上有人为陈鼓掌。[44]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在苏州受审时为夫辩护说：“我与汪先生不是汉奸。当年蒋委员长与汪先生有分工，抗战方面由蒋委员长负责；和平方面由汪先生任之。蒋委员长曾对汪先生说：‘抗战易，和平难’，汪先生说：‘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和平运动是当时中央的决策，与中央抗战决策并无妨碍，为什么将卖国的臭马桶套在我们头上？汪先生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出卖过，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政府控制区，至于南京控制下的地区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他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民众的需要……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衷心钦佩。……将大片国土让给日本人的不是汉奸，在日本占领区收复国土，组织政府，保境安民，援救陷区人民，不使陷区人民受日本铁蹄之苦的人倒成了汉奸，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她捶桌子质问检察官，原沦陷区民众为她鼓掌声援。匆促的审问结束以后，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索要签名。”被法庭认定犯有叛国罪后，陈璧君陈词：“如果日本将炸弹投到西伯利亚而不是投到珍珠港的话，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会完全不同，汪政府不会失败。”[45] 她所言不假。斯大林引爆了中日战争，成功地瓦解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莫斯科和中共最希望中日长期战争，最害怕汪精卫的和平努力获得成功。蒋介石为中共打击国军，夺取地盘所苦，对“长期抗战只能让苏联和中共受益”道理比谁都清楚，也想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但在国民党内的各路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抗战高调声中以维护权力地位和名声为重，声称与和平运动无关。假如蒋介石不怕背骂名，在淞沪会战中，或在南京陷落前接受日方主和派提出的“恢复战前态

势”条件，果断结束中日战争，则日本的炸弹完全可能投向苏联，那样就不会有后来的红色新中国了。

审判中，褚民谊为和平运动辩护说：我原在日本及法国留学得医学博士，回国后在广东大学任教授并代理校长……蒋先生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而救国则一。现在胜利到来，抗战者可称劳苦功高，与国同休。可惜汪先生忍辱负重，中道崩殒，不获躬逢其盛，然而国真得救，吾知汪先生必含笑九泉。本人追随汪先生有年，一则庆其救国之苦告成，一则叹其救国之情良苦。倘谓罪所当诛，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决当引颈待罪，毫无余憾。……检查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来救国救民的。我可以举一个例：苏州如果没有陈则民当时出来维持，恐怕苏州人民要受更大的害，这是苏州人民共知的。至于对英美宣战一节，本人前已讲过是有小便宜的。英国租界于北伐时收回了汉口，九江、镇江，而英在天津、沙面租界的租界是日本武力争得，交回我们的。至于意、法租界，哪一处不是宣战而收回的呢。检察官说法国贝当是伪政府，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将来收回失地才对。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是汉奸，而南京政府在敌人投降后第二天即自动撤销不是汉奸。……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仍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在昔所统治的地方都在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努力，是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本人愿速判本人以死刑，无稍减为无期徒刑至浪费国家公帑。本人自请处以死刑决不是承认有罪，不过是我求仁得仁而已。” [46]

惩办汉奸运动是一场极为荒唐的运动。在革命党的宣传影响下，国人以为汉奸之说古来就有，惩办汉奸天经地义。其实，战败媾和才是古来就有，

天经地义。唐太宗时，突厥兵至长安，唐朝“空府库”进贡突厥；[47] 唐肃宗时，回纥兵至长安，太子李豫(唐代宗)跪拜回纥王子称臣；唐肃宗把将女儿宁国公主进贡回纥，承诺“金帛，子女皆归回纥”；[48] 五代十国，石敬瑭称契丹可汗为父王；宋真宗称辽国萧太后为叔母；宋进贡辽国一百一十八年；靖康之后，宋高宗在军事无力抵抗情况下向金帝称臣。对上述历史事实，史书并无谴责战败称臣为汉奸的说法。“汉奸”一词首见于清史稿，最初是满人对汉人奸细的称谓。二十世纪初，日本人推动兴起了汉民族主义，接受日本人资助的革命党将汉奸说宣传到家喻户晓。其实，经过多次外族入主和长期的民族融合，纯种汉人并不存在。秦嬴氏属西戎，[49] 为外族入主，其后汉，魏、晋、南北朝、随、唐、五代十国均不是纯汉族朝代，隋唐杨氏、李氏是汉化胡人，[50] 主要军事将领如安禄山、哥舒翰也不是汉人。唐以后更不存在纯种汉人和纯汉族的江山。汉奸说与革命党同时兴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党是日本、苏俄扶植的产物。革命党宣传依附外族、外国者为汉奸，而他们自己恰恰是依附外族、外国者，他们的党是外国势力所扶植建立。国、共两党掩盖自己作苏伪起家的历史，以抨击汪伪来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

国民政府在撤退时知道，留下的老百姓肯定要在日寇治下过活。但抗战胜利后，政府回来掀起了惩办汉奸运动，将作了校长，警察之类的公职人员，沦陷区里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人，甚至教师都以“汉奸”、“附逆”的罪名惩办抄家，使没能随政府退入大后方的民众人人自危。例如，在沦陷区继续办教育的周作人被以“附逆”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四年，没收房产、藏书。如果日寇治下的校长是汉奸，教师和学生也难逃汉奸罪名。中共建国后也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继续开展“惩办汉奸”运动。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上海提篮桥监狱探望陈璧君，告陈说上面有意释放她出狱，条件是承认汪精卫有罪。陈璧君拒绝说，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国、共两党发布的惩办汉奸的条例，发动惩办汉奸运动的理由，一是为抄得更多“逆产”，二是借口整肃异己，三

是掩盖自己暗中“言和”。其中中共还有第四个理由——掩盖自己在抗战中通敌。

自从九一八事变前获得日本北攻苏联计划的情报，斯大林长期致力策划中日开战，以陷中日两国于战火的方式保卫苏联的安全。从“一二八抗战”到华北事变中，国民政府坚持推迟全面抗战，对日妥协和谈符合国家和国人的利益。在庐山谈话会后，蒋介石接受胡适的推荐，与汪精卫一起召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讨论媾和的计划，批准高宗武展开对日媾和密谈。此后几年的抗战中，蒋、汪一起及分别主持了秘密对日媾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运动和对日媾和无疑是挫败苏联计划的正确应对。在抗战中主持媾和谈判并无不妥，荒唐的是“言和即汉奸”的高调。高调压力下，蒋介石始终不敢公开言和，不敢承担和谈责任。蒋介石主持的秘密对日媾和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才放弃。他保持进退自如的策略幸运地等到战局转机。在美国决定制日后，蒋介石抛弃秘密媾和，营造自己始终主张血战到底的形象，在抗战胜利后以惩办汉奸运动和毁汪精卫墓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结果，汪精卫的“残驱化劫灰”诗句一语成讖。

第 31 章 抗战中的延安

换妻潮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带了三十位女红军。她们几乎都是中共最高层的“爱人”。当时高层们择偶多无正式结婚程序，而由中共组织出面“配对”。红军夫人中的几位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被留在了川康根据地，其他跟随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她们在延安经历了高层们另娶的痛苦，其中以贺子珍的经历最具代表性。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需要通过贺子珍赢得山寨旧人的支持。离开井冈山后，贺的地位下降。长征路上，贺为毛两次生育（一次流产），将孩子送给老百姓，自己落下了头晕病。[1] 毛泽东不把妻子生产之苦当回事。他曾对刘英（张闻天夫人）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2] 女红军长征在路上生下孩子送人，这种在革命党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举动是革命党否定人性的最好证明。经过艰难困苦到陕北后，贺子珍添了新烦恼。1936 年，共产国际将女作家丁玲送到了保安，毛泽东与这位杨开慧同学谈诗论词非常开心，特准丁不用通报进自己窑洞，任丁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写词赞丁“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7 年初，共产国际派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携女翻译吴莉莉（吴光伟，吴广惠，LILY）到延安采访，为延安作宣传。史沫特莱、吴莉莉的服装、学识、举止、谈吐与穿着破烂，举止粗鲁的红军将领们强烈对照，在延安刮起了一股旋风，[3] 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吴莉莉更成为延安的亮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对西方生活好奇向往，请史沫特莱教跳社交舞。于是，中共高层圈内掀起了社交舞热潮，延安夜晚开

始回响西方舞曲。历经长征艰难困苦的女红军们无奈地面对丈夫与来延安的女学生们翩翩起舞。

毛泽东常在黄昏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喝茶闲谈，询问史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询问外国的情况，与吴莉莉一起写诗填词。母亲早逝，由妓女姨妈带大，后经历婚姻破裂的史沫特莱蔑视婚姻关系，反对一夫一妻制，认为“婚姻对所有妇女都是一种压迫制度”，身体力行地在性方面自由开放，作革命同志的情妇。到延安后，她大胆地向朱德和彭德怀示爱，怂恿毛泽东与吴莉莉“谈恋爱”。她记录道：毛泽东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询问那种爱情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吴莉莉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翻译吴小姐听的。毛与吴讨论诗词，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以旧诗词的形式唱和往来，很开心。[4] 6月，吴莉莉在延安城里基督教堂改成的大礼堂主演了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赢得了延安第一美女名声。

贺子珍对毛与史、吴的浪漫交往忍无可忍，在8月的一个晚上冲进史的窑洞大骂，威胁说要委派警卫员杀“两个骚货”。毛动手扇了贺嘴巴，贺抄起东西怒殴了毛、史、吴，曾为宋庆龄促销的史不甘示弱，挥拳将贺的右眼打肿。无助的贺被警卫员带走后神秘失踪了七天，是为轰动延安的“吴莉莉事件”（吴光伟事件）。吴觉得委屈，吴要求中共中央就殴打事件给个说法。中共中央决定秘密了结事件，让贺、史、吴都离开延安。尚无独裁地位的毛不能违抗中央决定，与吴洒泪惜别。当月，吴莉莉烧掉了与毛泽东往来唱和的诗稿动身离开，周恩来怀疑吴是美国情报人员，安排人强行将吴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毛因此怀恨周恩来，是为日后不断整周的原因之一）。同月，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带着幼女，与李维汉夫人金维映，博古夫人刘群先等长征夫人们一起离开了延安，被送去了莫斯科治病。史沫特莱因骑马摔伤

延误，次月与斯诺夫人一起也离开了延安。此后几年，吴莉莉收到毛泽东四十二封情书，其中有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亲笔题“润之赠吴莉莉”的线装《聊斋志异》。[5]

贺子珍刚离开，康生将二十三岁的上海电影明星蓝苹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不久，毛决定与蓝结婚。毛泽东的婚姻须经中共中央批准。多数高层成员反对毛蓝结合，认为毛抛弃患难妻子，与历史复杂的上海影星结合不妥。远在江南的项英在电报中明确反对。周恩来、康生、贺龙等少数人支持毛蓝结合。贺龙说，堂堂党的领袖，多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周、康则要投毛所好。名义总书记张闻天综合众高层意见给毛写了封信，劝毛慎重考虑。毛泽东因避战方针带来军队、地盘迅速发展得到高层一致拥护，声望正隆，阅张后将信撕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6] 经周恩来协调，政治局同意了毛蓝结合，但提出了“约法三章”条件：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没有正式解除时（毛、贺的夫妻关系后维持终身）蓝苹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名义出现；蓝苹同志只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蓝苹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7] 毛泽东也退一步，表示接受组织的“约法三章”制约。1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摆了两桌酒席、宣布结婚及蓝改名江青。出席者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人。丁玲是唯一收到请柬而拒绝赴宴者。她在晚年回忆录中在披露说：毛在保安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窑堡的女人，包括红军女战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数了个遍，封了个遍，也未能凑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8] 婚后的江青受制中央决定，没有正式夫人名分。中共高层到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人从心里承认江青的“第一夫人”地位，只有周恩来对她恭敬相待，给了敏感好强的江青极大的精神慰藉。

史、吴离开延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批涌来延安。延安成为青年心中的圣地是共产国际宣传的结果。1935年，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将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宣传为抗日中心。共产国际知道，中共听命莫斯科的情况在中国广为人知，由俄人宣传中共效果不好，决定安排美国记者和国内独立报纸的记者出面宣传陕北。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宋庆龄推荐了在燕京大学兼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作为赴陕北采访的人选。经济、军事困境中的中共中央相信宣传陕北有助于摆脱困境，积极配合共产国际的宣传运作，成立了由特工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央对外联络局，负责安排记者来陕北事宜。李克农命中共北方局对斯诺进行了一番调查，然后向毛泽东推荐，获毛批准。1936年，斯诺在李克农安排下，由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陪同，持张学良开出的特别通行证来到陕北。1937年，共产国际和中共推出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以及史沫特莱文章等宣传陕北的作品。这些宣传品强烈地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使陕北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当时，只要有共产党各地办事处或知名人士开的介绍信（路条）或到延安附近的三原县参加短期训练（实为审查是否为国民党的特务）就可以去延安。大批怀着报国抗战热情的青年学生涌到了延安。女学生们给女性稀缺延安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也给经历长征艰苦的革命夫人们带来了恶梦。

当时，延安男女之比十几比一，从大城市来的女学生成了中共高层追逐的对象。伴随交际舞热潮，高层们纷纷寻找新伴侣代替走过长征路的红军老婆，大多数中央高层停妻新娶或有了第三者，贺龙高唱的“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代表了高层们的心态。延安换妻潮的特色是组织出面，给高层元配和女学生做思想工作，要求她们为革命作贡献。例如，中央出面说服贺子珍服从，安排她到莫斯科治病以让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代表组织动员高岗夫人杨芝芳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杨芝芳服从组织，同意了离婚。随后毛泽东、王明、王若飞、习仲勋出面，请19岁的女学生李力群吃饭，说服也她嫁给高岗。不少怀着报国热情的女青年到延安后遭遇

“包办婚姻”，在组织压力下被迫服从革命需要，嫁给不相知的革命高干，无助又无奈。[9] 在中共组织部门安排下，18岁的学生张茜嫁给了40岁的陈毅，22岁王定国嫁给了50多岁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17岁的康克清嫁给了43岁的朱德，20岁的浦安修嫁给了40岁的彭德怀，18岁的汪荣华嫁给了44岁的刘伯承，25岁的薛明嫁给了46岁的贺龙，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10] 老干部黄克功逼婚不成枪杀女青年刘茜则是革命换妻潮中极端的一例。

不仅中国的革命家换妻，来到延安外国革命家也沾了光。中共为外国共产党代表们安排有“临时夫人”。共产革命要求革命者服从革命的需要，要求革命女同志服从革命领袖的需要，苏联从建国之日起就有“共妻”运动。在江西，中华苏维埃为到任的外国人李德立即安排了革命“临时夫人”。中共沿袭苏维埃的“临时夫人”制度，为来到陕北的苏联代表、日共领袖野板参三等人安排了“临时夫人”，在外国革命家回国后发给临时夫人们“复员费”酬劳。[11]

“换妻潮”新婚欢喜的背后是弃妇的哀怨。贺子珍到莫斯科后又为毛泽东生下一子，并再遭幼子夭折打击。她陪伴毛泽东九年，为毛怀了十胎，生下三子三女，除在陕北生的李敏（姣姣）外，其他子女都送人或夭折。1939年的一天，贺听翻译读一段塔斯社记者发自延安的报导，当听到“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时她才知道自己已被抛弃。不久，她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那里被剃成光头，强迫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她越是反抗，医生就强迫她服更多的药。服药后她四肢无力，神智昏迷。为避免服药，她只好假装驯服，承认自己的确有病，顺从医生。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她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尽管尽量自我保护，

她还是被迫大剂量、长时间地服药。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告诉她到苏联帮她取出身上的弹片。可是来苏十年，弹片没能取出倒成了精神病人。其他延安弃妇同样悲惨，金维映、刘群先等人在苏失踪。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周恩来煞费苦心地派专机从延安将江青接到重庆“治疗牙病”，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泽东、江青补办了盛大婚礼，帮助江青以中共第一夫人身份亮了相。延安高层的换妻潮为各级将领树立的榜样，几年后建国时，中共干部队伍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换妻离婚潮，大批进城干部换了新夫人，中共组织按照延安的作法，出面帮助老干部换妻，动员女青年“为革命事业”贡献，作法是要求党员要听党的话，听党的安排。

边区财政

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历来是靠天吃饭，历代政府对这一地区都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特殊照顾政策。红军落脚陕北后，150万人口的贫困边区无力供养突然到来数万军队和中共机关。1936年，中共在物资供应危机中发动了东征抢粮战役，东渡黄河到富庶的山西去劫掠物资，加上得到张学良的资助，渡过了难关。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随后，莫斯科恢复了对中共的供养，通过宋庆龄向陕甘宁边区陆续汇去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12]

抗战爆发后，中共红军编入政府军序列，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每月60万元的军饷，并以抗日名义接受大笔的海外华侨和各界亲共人士的捐款。钱虽然多了，边区财政入不敷出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因为，中共执行毛泽东避战专注扩张的方针，党政机关和军队迅速扩张了数十倍，光是学校就办了一大堆，其中包括中央党校、马列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炮兵学校、卫生学校、通讯机要学校、自然科学学院、西北公学（专门培养保卫干部）等等，甚至还有为日共培养干部的日本工农兵学校。

机关、军队之外，中共还接待了大批来投的青年学生。青年们来到陕北后没有投身抗战，而都成了供给制的食客。

进入 1938 年，国民政府开始减少向拨付中共军饷。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共拒绝接受国民政府的调遣，拒绝对日作战。另一原因是，随着国土大片丧失，国民政府的税源枯竭而军费开支倍增，财政破产，只能靠滥发钞票来支持抗战，对国军前方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尚且无法保证给养，当然不可能再给专打国军的共军拨饷。1940 年底，国民政府在新四军歼灭国军韩德勤部万余人（黄桥战役）后重新实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禁运。

虽然避战的中共没有国军那样浩大的战费开支，八路军、新四军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夺权控制权后立即收税征粮，就地养兵，但中共军队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地盘扩张速度，导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和物资供应状况不断恶化。为养活迅速膨胀的军队和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横征暴敛，征公粮数从 1937 年的 1.4 万石增长到了 1941 年的 20 万石，[13] 四年间增加了十几倍。强征公粮外，政府征以公草税（马料税）、牲畜买卖税、斗佣、羊子税（向养羊者征收羊毛以为八路军制冬装，白羊、绵羊每头纳税羊毛 4 两或 1.2 元现金，黑羊、山羊每头纳税羊毛 2 两或 0.4 元现金）等苛捐杂税敛财，向民众派“公驮”等无偿徭役（1941 年，边区政府向老百姓派运“公盐”六万驮），对交不上公粮和税项者轻则以抗捐、破坏抗战等罪名游街示众、拘禁刑罚，重则以反革命罪名枪毙。作家萧军写道：“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孩子这话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曾到百姓家中索要。……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我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享受，……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

‘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14]

陕甘宁边区经济规模狭小，政府征税征粮搞到逼死人命[15]也养不起数十万众的庞大的中共军队和机关，也弥补不了高达四成的财政赤字。以下两个事件反映出民众在横征暴敛下之的困苦与愤怒。事件之一：米脂县一寡妇，拉扯五个孩子，种几块瘠薄山地，养几只羊勉强度日，收获的粮食大部分上交仍达不到边区政府制定征粮定额，全家只好吃糠咽菜勉强糊口。村长领着民兵到她家催交公粮，她苦苦哀求，诉说已经断粮了，请求政府照顾孤儿寡母。村长收不到粮，牵走了寡妇家的羊。后来，政府又征收草料税，她家没养牲口，没有草料，也没钱交。她向村长哀求。村长说：“你交不上，谁替你交？我怎么向上面交差？难道让我去替你坐牢”，命手下搜查她家，找值钱东西抵税，搜出了寡妇藏的一坛粮食。寡妇哭喊：“你们不能把粮食拿走呀！那是我家留的种子，我家断粮这么久也舍不得吃一粒。没有种子，怎么种地，没法活了”。村长不理，夺走了粮食。寡妇骂道：“你们这些丧天良的，挨千刀的！不得好死！老天爷，你怎么不睁开眼呀，劈死毛泽东这个害人精！”村长听闻，把寡妇抓起来押到县上。县里定她反革命罪，决定枪毙。寡妇的遭遇引起了乡亲们的广泛同情。乡亲们到延安当街哭诉，请求政府刀下留人。事情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民众普遍同情寡妇的情况后，下令将寡妇释放。事件之二：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县长征粮联席会议中突遭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被击死，另有其他七位县长被击伤，百姓听闻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老天爷有眼，这些人搜刮百姓遭到了报应。雷电还击毙了一农民的驴。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还是没睁眼，怎么不击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此言论，要定老农反革命罪。毛泽东得知后也下令不予追究。[16]

毛泽东不追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他清楚，以加大搜刮力度来解决财政问题不是办法，杀几个农民只能助长民怨。他感到，德国侵苏后莫斯科

的后续资助也成疑问，必须另辟财源。革命党都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都没有道德底线。孙中山和各路革命党军阀在军费困窘时想利用鸦片敛财，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决定，以种贩鸦片解决财政问题。不过，他比孙中山等人更会宣传，将此罪恶行径美其名曰“开展革命的鸦片战争”。

禁鸦片是清末以来历届政府的国策。晚清新政中，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章程与法规，主要措施为：（1）逐渐减少种植罂粟，在十内彻底消灭；（2）禁止吸鸦片、开烟铺或进口鸦片；（3）有鸦片烟瘾的官员必须于六个月内戒除。民初，袁世凯颁令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冯国璋曾献策用债票收买上海烟商的所有烟土存货，以后作为药品官卖。北洋政府的禁毒政策不敌革命党的祸害。南北分裂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阀为养兵开战而开放烟禁，收烟税充军费，使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随着苏俄赤化带给中国连年战祸，鸦片祸害愈演愈烈。历史学家顾颉刚在 1930 年代写道：“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两百家铺子，烟馆倒占了四十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份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的不计其数。”[17] 事实上，鸦片祸害最严重的是苏区及周边，即国民政府所称的匪区。因为，中共从建军之初就同烟土打交道。红军元老朱德在滇军旅长任上曾在川南纳溪、合江等县种鸦片烟获利，种得罂粟花漫山遍野。[18] 在江

西苏区，“朱毛红军”发扬了这一传统。红军在打土豪中主要查抄银元和烟土作为通货。鸦片买卖成为各苏区的重要财源，烟毒从各苏区向周边泛滥。

1935年，国民政府发动了“新生活运动”，重点要求在原苏区禁毒，公布了《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成立戒毒协会，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勒令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戒毒或接受强制性治疗，处决拒绝接受戒毒治疗的官员，要求六年内根除吸毒和贩毒。1936年元旦，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的名义宣布当天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宣布在此最后期限后种贩鸦片者将被枪决。当年，他因新生活运动禁毒成就受到国联的表彰。然而，国民政府的禁毒之功没有国联表彰的那么好。因为，政府管不了红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禁毒，红军在长征路上以鸦片当银元，以烟土换取粮食物资，走一路，贩一路。

国民政府忙于抗战时，中共在陕北忙于种贩鸦片，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进了延安东南的南泥湾，毁延安地区最后一块原始森林辟为罌粟（鸦片）种植区，派人采购来罌粟种子发给军队和农民种植，至成熟时，边区政府依土地的肥脊派人收取罌粟，与农户七三或六四分成，再定价收购农民分得的罌粟，请工匠将收获的鸦片开窑加工成烟土。中共中央任命任弼时、谢觉哉为负责鸦片贸易的专员，负责将鸦片运往国统区，再由李克农负责在国统区销售。

[19] 陕甘宁边区贩运鸦片到国统区的渠道有几条，一条是经宜川韩城，一条经耀县柳林，运往山西、河北等地国军守备区或日占区。因为日占区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军控制区，销售后所得的法币一部分作边区私发伪钞的准备金，另一部分成为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的活动经费。

“任弼时曾记载：‘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20] “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

不能制造的日用品。”[21] 任弼时、谢觉哉的一项工作是严格控制在本地的销售数量，采取措施迫本地烟民戒烟。谢在日记中记载：“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22] 为隐瞒种贩鸦片，边区政府禁提鸦片、烟土字眼，将大规模种鸦片的运动称为“大生产运动”，称贩卖鸦片生意为“土特产经营”，以“特货”、“土产”、“特产”、“代金”、“药材”等称谓代替鸦片字眼。

种贩鸦片不局限于陕甘宁边区，中共在晋绥边区也大种鸦片。当地农民说，“一斤洋烟膏换四十八斤小米，俺家的一人一天能割好几斤，可比种庄稼强。”几十年后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中的几百件手书文件记录，当年晋绥边区农户完不成摊派的种鸦片任务须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档案中不仅有“特产”、“特货”、“药材”字眼，也有“大烟”字眼。从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阎锡山在晋推行乡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禁毒。他广泛印发文书到每户，明令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贩卖鸦片者枪毙。然而，八路军到来摧毁了阎锡山治晋的二十年禁毒之功，使晋绥边区成了毒品生产加工区。“大生产运动”中，好地种罂粟鸦片，差地种粮食。西安报纸刊登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种植达到二十万亩。[23] 中共西北局总结种鸦片经验说：“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24]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 1935 年开展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很有成效。

“大生产”出品的鸦片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成为边区政府与各根据地财政拨款和军饷支付的主要结算手段。1941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边币取代法币，银行的平衡基金不是黄金、白银，而是烟土。从 1942 年起，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生产和贩运发展成种植加工贩运销售一条龙，陕甘宁

边区和晋绥边区成为中国的毒品制售中心。国民党政府无法消除中共的武装割据，因而也无法铲除陕甘宁边区毒源。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记录延安制售鸦片的情况写道：“当我问：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25]

国民党政府档案中也有大量关于各地共军强迫人民种植及售卖鸦片的报告，其中包括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刘茂恩（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杨德亮（第四十二军军长）等国军将领的报告和朱家骅、徐恩曾等国民党中统局要员的报告。[26] 中共内部秘件透露的鸦片贸易情况与弗拉基米诺夫日记、国民政府档案记载互相印证。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 1943 年 8 月 1 日联合签署的《秘密通知》写道：“（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 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 20%”，“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27]

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

[28] 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特货”、“鸦片”、“烟土”是一回事，[29] 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30] 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军队的一年口粮。[31]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财政上找到了出路”。“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1%的财政收入，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底，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32]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33]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收税；二、借债；三、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34]

上述内部文件显示，“肥皂”指鸦片，“财政上找到了出路”指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大量外购棉花等物资是靠“特产”去交换回来的。在边区财政中，“特产”比重排在第一位。建国后，中共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题词到处悬挂，以作政府关心百姓生活的证明。了解了边区的鸦片经济才知道，毛泽东号召发展的是鸦片经济。

在鸦片贸易之外，陕甘宁边区的一大财源是走私日货。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是进行日占区与国统区之间日货走私的主要批发站。[35] 走私日货的主要路线有：绥德往陇东宁夏；陕北经八路军驻防的黄河渡口将日货运入河西销到陕中陕南；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36]

有了贩卖鸦片及走私日货等项巨额收入，陕甘宁边区财政局面迅速好转。1942年，边区财政收入中，“特产”收入被单独列出，成为边区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向中共中央报

喜说，边区已经渡过了财政危机。边区秘书长兼主管鸦片贸易的专员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37] “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38] 1943年2月9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39] 这个数字七、八倍于1940至1941财政年度数。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4500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币，而当时领导全国抗战，开支浩大的国民政府财政年收入也不过就几亿，中共通过种贩鸦片创造了财政翻身的“延安奇迹”，财政实力大大超越了财政枯竭的国民政府。延安整风后，中共派赴东北开辟解放区的干部们随身携带鸦片，到热河、东北脱手作为经费。[40] 1943年，边币贬值，中共西北局的应对是“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41] 从1945年开始，边区财政收入统计中，“特产”收入不再被单列，而隐藏到其它项目中。[42]

“大生产运动”中，中央警卫营士兵张思德在安塞县的鸦片烟窑垮塌时被活埋。毛泽东在张追悼会上发表讲话，将制毒者张思德歌颂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称张死得“重于泰山”。这篇由秘书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被以《为人民服务》的标题在延安党报上发表，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老三篇”之首。为掩盖张思德死于“熬鸦片”的真相，中共为张编造出了死于烧木炭的故事。国人不会想到，“为人民服务”说法套用自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下达的《暑期训练精神要旨》，蒋文发表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中，胡乔木、毛泽东套用“为人民服务”说法颂扬制毒、贩毒。

中共的“革命鸦片战争”不止是毛泽东一人推动，而是中共高层一致推动的。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43] 歌颂制贩毒品的也不止是毛泽东、胡乔木，而是延安的革命家，革命文艺家们的一致行动。1942年7月，朱德、谢觉哉、徐特立，

吴玉章等“怀安诗社”成员一起视察了南泥湾，唱和古诗。了解陕北制贩毒品活动者都读得懂老革命家诗词唱和中的歌颂之词。例如，朱德《游南泥湾》诗中“今辟新市场”、吴玉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中“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精”、“撑持我大局”等句无疑是在颂扬毛泽东“革命鸦片战争”决策帮助延安渡过难关。建国后，毛泽东出席了任弼时的葬礼。一个重要原因是感谢任老主持鸦片贸易为中共财政翻身所作的贡献。2004年，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百年纪念会上讲话称，“任弼时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但是，任老最重要的历史作用——主持种贩鸦片却在纪念会和传记电视剧中被隐瞒。这样的隐瞒其实是中共革命家纪念座谈会和传记的共性。

歌颂制贩毒品的不光中共领袖们，还有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延安文艺家们得以在抗战中创办一大批文艺家协会、文化协会、“战地社”、“铁流社”、各种各样的诗社，及《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新诗歌》、《文艺月报》、《诗战线》、《战地》等一大批刊物都是得鸦片财政资助。“大生产运动”中，萧三、艾青为首的延安文艺界劳军团来到南泥湾慰劳三五九旅官兵。文艺家们不但知道鸦片生产、贩卖，还知道陕甘宁边区的贩毒财政。大家自觉地帮助党隐瞒革命真相，因为帮助党隐瞒真相就是帮助自己维护光荣经历。革命家、革命文艺家们都清楚歌曲《南泥湾》中“如今的南泥湾，鲜花开满山”之句所描写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大家们传唱这首红歌几十年，一起夸耀“宝塔山、延河水”的革命经历，只有极少数人不情愿地披露些许真相。例如，鸦片事务专员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在晚年被问及延安种贩鸦片之事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但确有这事，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44]

延安整风

全面抗战爆发后，斯大林派王明到延安监督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王明推动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准备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毛泽东虽能采取拖字诀，以战争理由推迟召开七大，但无力否决王明代表莫斯科提出的要求。1940年，中共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从各地选出了七大代表。这时，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在党内有着广泛的支持，其中，手握军权的项英明确表示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应对挑战，毛泽东通过制造了“皖南事变”除掉了项英，极大削弱了王明在党内军中的影响力。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毛泽东迎来了权力斗争转机，趁斯大林自顾不暇开始动手收拾国际派，命政治秘书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辑《六大以来文献集》。这一文献集对所搜集的519篇文章原文进行了众多删改，将其中对毛泽东不利的，如吹捧蒋介石的讲话，等内容删除，加入称毛泽东在党内一贯正确，一贯代表“正确路线”的内容。这种篡改后来成了毛泽东权力斗争的法宝之一，也成了中共文献编辑的传统。9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全体党员以《六大以来文献集》为学习范本统一思想。1942年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系列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国际派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格格不入，犯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号召延安青年开展向党和领导层提意见的“大民主”运动。他将胡乔木起草的社论稿亲自修改后以《教条和裤子》为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在社论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和苏联归来的国际派“红色教授”们“脱裤子”、“割尾巴”，称“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藏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且“各人尾巴粗细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在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他对莫斯科归来的国际派和知识分子的蔑视说：“红色教授们”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

或者关起。……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

毛泽东这样辱骂知识分子，除了对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国际派展开权力斗争的原因外，还因为少年、青年时感到遭受歧视形成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他曾向斯诺讲述青少年时的感觉说：“在东山高等小学，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的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在北大图书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45] 当时，图书馆助教张申府是毛的上司。一次，张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写错了，张退回让毛重写。毛对这件事记恨终生。在中央苏区，他饱受到被苏联留学归来的国际派指责，任弼时指责他“狭隘经验论”，博古指责他“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凯丰指责“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年青时的自卑和革命后受指责的记恨使毛泽东确立了仇视知识分子，特别是仇视留洋知识分子的心态。

响应毛泽东系列讲话中的“大民主”号召，延安中央研究院的青年们带头发泄到延安后的不满情绪，批判延安的等级制，批判领导主观武断，缺少民主精神。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办起了各自的壁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刊出了不少批评现实的杂文。其中，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列举两桩高层另娶新妻的离婚案例抨击一些有着“凌云志向”的女性来到延安后在高层“大男子主义”逼迫下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呼唤写作自由、精神独立，提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罗烽、萧军等作家也发表文章批评中共高级干部的特权。

毛泽东号召“大民主”只是整肃“国际派”的斗争策略，并没有打算接受批评，且根本不容忍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真的追求民主。3月底，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警告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要求成立各级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整风运动须在各部门、机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制止脱离领导的“自由化”倾向，称运动不仅检查领导层的问题，还要检查每个人的问题，人人都要反省自己的历史。随着这一决定颁布，持续仅一个多月的“大民主”热潮嘎然而止，向高层提意见的“大民主”运动转变成了针对提意见者的整人运动，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批评黑暗面的青年们和延安的机关干部们成了犯错误者，被迫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按决定要求学习毛泽东指定的“整风二十二个文件”，写自我反省笔记，互相批判、互相揭发。

5月，毛泽东召集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在讲话中提出党文艺方针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文艺应服从政治斗争、从属于政治；文艺应表现阶级斗争，而不是表现人性；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应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文艺工作者必须先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意思实际是文艺必须为共产党服务，即文艺、文化必须党化，否定创作自由和思想自由。在讲话中，毛泽东批判王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提出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战时期的文艺以抗日和国防为主题，为抗战服务”的方针，提出文艺应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毛泽东的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胡乔木加工润色后发表，成为中共指导文艺、文化界的“圣经”。中共在建国后以每年纪念这篇讲话的发表来强调在共产党治下文艺不得独立存在，文艺必须成为服务中共的工具。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成立了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作为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指定成员包括：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毛泽东秘书）、黄华（朱德秘书）、廖鲁言（王明秘书）、师哲（任弼时秘书）、王鹤寿（陈云秘书）、陶铸（王稼祥秘书）、匡亚明（康生秘书）。随后，毛泽东以总学委名义发布指示，要求全党暂停日常工作专搞整风。这时中共延安和各根据地的军队、机关执行避战方针，并无什么日常工作，党政军高层全体集中到延安开长会专搞整风，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对总学委负责的整风领导小组，延安上万干部被分成五个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自我反省。参与整风运动初期的“大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一阶段被迫检讨在“第一阶段”犯了“自由化错误”，揭发别人以求自保。总学委派出检查团，抽阅干部所写的个人笔记，以了解他们对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并从干部反省笔记中找出线索，跟进调查审问。

苏共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记录“延安整风”情况写道说：“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的问题。”“整风运动逐渐具有群众性了，甚至还要求战士和老百姓死记硬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以及‘整顿三风’等报告的内容。”“被批评者唯一的

权利是承认错误。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每个人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既可悲又可笑。”“毛泽东认为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这一政策的后果很容易预料到：今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除了‘毛泽东思想’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权威了。”“一年多来，各校的课程统统取消了。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许多行政机关也近乎瘫痪，只半天办公。人人都忙于开会或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报刊和讲话都吹捧毛泽东，辱骂‘教条主义者’。”“整风运动不仅是从精神上压制毛泽东的反对者，动员全党起来反对他们，还要求所有的人洗脑。”“知识分子受到整风的最沉重的打击。被洗了脑。”“可怕的暴力浪潮把毛泽东的对手都卷了进去，并使他们受到摧残。”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整风会议讲话中称：“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的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46] 根据这一讲话，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审干、肃奸，反特阶段，原本号召的整顿思想作风运动转变成了另一波肃反运动。在这一阶段，运动参加者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青年们都成了奸细、特务嫌犯，须反复交待个人历史，供众人评议，再由运动主持机构作结论。审干运动展开后，总学委进一步的推出了“抢救运动”，宣称要把堕落到边缘的干部抢救回来。运动持续了一年，造成冤案、自杀事件无数，使延安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之城。

延安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冤案是王实味事件。王实味是怀着抗战报国理想从各地奔向延安成千上万青年中的一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创作了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因贫困辍学后翻译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

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外国文学名著。1937年10月，他应范文澜之约来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几年中，他翻译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等两百万字的马列著作，同时对延安安全无抗战气氛，高层沉迷于跳摇摆舞、听京剧、组织诗社写旧体诗、等级制等等现实极为失望。

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度森严。中央办公厅（任弼时任主任）的主要工作是安排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运物资到延安以保障高层的“小灶”和其它生活供应的特殊需要。中共高层家中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有的甚至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及伙夫、马夫。在小城延安，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首长家属漫步；每逢周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警卫员守在学校、机关门口接首长家属。[47] 延安青年司马路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学习中共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我也坐在下面听。我的个子矮小，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一位比我年纪略长的同志从我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当时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比较轻松，有人敢于这样提问。陈云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命令毛主席一定要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在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我不写出来，陈云这段语录在中共党史上就会失传了”。[48] 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日记中写道：“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

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

1942年2月，王实味受毛泽东“大民主”、“帮助党整风”号召鼓舞，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呼吁“暴露黑暗”，批评在革命口号下日益强化的等级制度。他在连载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写道：“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在墙报文章中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的大胆批评赢得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在延安引起轰动，使罗迈（李维汉）为首的中央研究院领导成了众矢之的。

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四三决定》，要求制止“自由化”倾向，禁止反对各单位党委领导，警告说党内的“自由主义”正被特务分子利用，各机关学校出现的批评文章、壁报、小广播等等存在着反党的倾向。其实，王实味在“大民主”中还没有提出投奔延安的青年们心中的主要问题，没有质疑为什么不去参加抗日，为什么高层和军队将领们长期在延安集中开会等关键问题，而只提了一些“食分五等”之类的边缘问题就成了整肃对象。

压力之下，王实味被迫作检讨。然而，出乎意料，他的检讨不获接受，他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定为了“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文艺家代表人物”，随后，在“大民主”受到王实味批评的中央研究院领导人李维汉召开了一系列对王实味的批判座谈会，宣布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组织上是同志，思想已成为敌人”。两个月前支持王实味，视他为英雄的同事们争相以批斗他来保持与党一致。同事李宇超指王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同事陈伯达称王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露了他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形式的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骂王为“王屎味”；曾共同呼唤民主的艾青反戈一击，指“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同样被毛泽东点了名的丁玲在大会上在自责《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然后以狠批王实味来表现悔改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提出要“打落水狗”，指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破坏革命的流氓”。系列批斗会上，王实味受到无休止地批判围攻，孤立无援，没有申诉的机会，没有同志的同情，每次申辩都被同事们的怒斥打断。

批判王实味不仅发生在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的作家、文艺家、理论家们也以恶毒谩骂王实味来表达对参加“大民主”的悔过。在落井下石的潮

流中，作家萧军看不下去了，在会上仗义执言说：“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散会后，萧私下说：“这样的批斗是往人脑袋上扣尿盆子。”运动领导人得知萧的言论后派郭小川等四位运动积极分子来到萧军住所，指责萧破坏了会议，要求萧承认错误。萧军拒绝认错。不久，萧军在“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遭到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人的围攻批斗，陷入了王实味一样的孤立无援困境。萧妥协说：“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丁玲继续攻击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反驳道：“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萧军敢于顶撞同事是因为他曾与毛泽东多次单独喝酒，认毛为大哥。不过他在运动中为王实味出头等于顶撞了毛泽东，结果被停止了供给制口粮。[49]

由于王实味参加翻译了《托洛茨基传》一书中的两章，座谈会将王揭发为托派分子，有同事将王实味私下的“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言论揭发出来。李维汉作总结发言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王实味的确在我们党内外有意识有计划地散布了一套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王实味的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请王实味来延安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不讲情面地说：“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50]

人的精神承受力毕竟有限，王实味经不住长期批斗的精神折磨，没有申诉机会，只好顺应运动的要求，给自己扣上了“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等一堆帽子，自污“神经异常”以让运动领导者满意。他没想到，痛骂自己仍过不了关，继续遭受批斗。绝望中，他提出了退党要求。他以为，自己是主动来延安投身革命，现在既然不能见容于延安和中共，自己退出共产党，离开延安总可以吧。他又错了。共产党想加入可以加入，却不是想退就能退的，延安是他想来就来的，但不是他想走就能离开的。他的退党要求被拒绝，被继续批斗，且因申请退党罪加一等。延安所有的刊物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申辩的版面，党报《解放日报》开辟了围剿王实味的专栏。随后，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定调子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尽管王实味在到延安后早已向组织交代过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但毛泽东一句话，他被康生主持的社会部逮捕，然后被长期秘密关押在枣园后沟。随后，康生追查株连，宣布王实味、成全、王里(王汝琪)、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为“五人反党集团”将王实味一关就是五年。长期的秘密关押中，王实味不断申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申诉无门。1947年7月，中共将王实味乱刀砍至血肉模糊，抛尸枯井（1991年，86岁的王实味夫人刘莹接到中共平反王实味的一纸决定）。

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目标不是低层的青年。随着整风运动持续，毛泽东步步逼向权力斗争的对手——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成立总学委是毛泽东专为整肃王明等人的发明。其作法是，“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权力极大的临时机构，以政治运动名义接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这一发明关键处在于绕过了规定程序，不经过中央全会选举，讨论和决议，由毛泽东个人决定最高权力变更，达到政变的结果。若在正式的中央全会中剥夺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不会成功，而通过以整风名义成立“总学委”，毛泽东绕过程序剥夺了政治局的权力，剥夺国际派的权力，让王明等人有苦说不出。整风运动前，王明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毛一贯正确的说法，批评毛不抗日的政策，要求在

党的大会上与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作出评判。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派李富春、彭真、高岗等亲信挨个对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国际派”以逮捕枪毙相威胁，迫他们写检讨，“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国际派们知道莫斯科在打仗，没有人接受他们的投诉或求助，只好就范自污以让权力者满意。经过一年的“整风运动”，凯丰、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国际派”成员们纷纷对毛泽东表示驯服，拒绝顺从的王明因住院离开了权力中心。对于王明，毛泽东亲自出面，威胁说“如果你不交代，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王明相信莫斯科会给他作主，拒绝低头检讨。随后，他莫名其妙地病倒住进了医院。毛泽东指派金岳茂大夫在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让他汞中毒。在医院里，王明赋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抨击“毛泽东建立个人专制独裁。”随后，他感到被下毒，停止了吃药。莫斯科代表弗拉基米诺夫（孙平）得知王的处境后进行了干预，要求送王到苏联治病。毛拒绝放王走。王通过孙致电莫斯科求救。对德战争中的莫斯科一时无力干预。

国际派们俯首称臣后，毛泽东着手开始实施预定计划——建立个人独裁。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及毛泽东扩大进来的亲信。毛泽东主导会议，决定改组六届六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将王明开除出了书记处，将书记处改为毛自任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为成员的三人书记处，规定“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还决定书记处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宣传委员会，毛任书记、王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负责控制延安所有的报纸电台；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组织委员会，刘任书记，杨兼任秘书，负责统管统战部（统战部是苏俄引入中国的术

语和机构，其任务包括策反，收买敌对方人员）、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经过这次会议，中共的集体领导制不复存在，毛泽东完成了向斯大林式独裁制的过渡。这种过渡在共产政权中是必然的。会党、革命党是不可能“党内民主”的，所谓集体领导必然走向个人独裁。洪门、哥老会、青帮、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苏共、中共，以及各国共产党都会向领袖个人独裁过渡。确立独裁地位的革命领袖通常会抓住最高权力至死不放。而且，会党、革命党的最高权力转移没有正常的程序，二号人物的上位与变更也只能通过政变、阴谋、暗杀等方式实现。这次会后，毛泽东反复使用成立运动领导机构绕过规定程序达到政变目的的法宝，他整肃政敌，整肃挑战他独裁地位二号人物的历史构成了此后的中共党史。

确立独裁地位的同时，毛泽东将一年前号召“大民主”的手段重新施展，主持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第二个四三决定）。这一决定鼓动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同时要求扩大审干、反奸运动的范围，鼓励“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虽然一年前的短暂“大民主”已使王实味等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落入陷阱，但因为各单位都关起门来在小范围秘密批斗整肃，王实味被秘密关押，延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干部不知道王实味等人因言获罪被整肃逮捕的情况。青年们如同一年前的王实味一样，纷纷在“民主大会”发表了对延安高层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的激烈批评言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在鼓动“大胆说话，批评领导，揭露错误”的同时秘密成立了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部署将整风运动秘密升级为了“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要求在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中抓出敌对分子。“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是毛泽东亲自控制的整肃机关，其中康生全面负责整风和审干运动，刘少奇、高岗、彭真等人分头负责各局系统的审干、反奸运动，

众委员随时向毛泽东报告运动进展。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布署“肃奸”运动说：“特务如麻，党校已经挖出 250 个特务，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有 350 人。边区已抓到特务七千，恐怕有一万人，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万特务大军。”[51] 刘少奇一面主持中央党校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召开“民主检查大会”，要求知识分子和干部们响应“第二个四三决定”，向党提意见，一面召开“肃奸”小会，要求在审干运动中抓出更多暗藏在延安的“托派”、“国特”（国民党特务）和“日特”（日本特务）等敌对分子，并强调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从各地投奔延安、背景较为复杂的青年知识分子。

1943 年中，毛泽东再发动了针对投奔延安青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奉毛之命，康生召开运动动员大会，在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动员之后，康生指挥各单位的审干运动负责人以“历史复杂”，为国民党政府作过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新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和平时有发牢骚言论者为重点怀疑对象，从审查他们的个人历史入手进行整肃。“主管军事情报的中央军委参谋部二局在整风运动中成立了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在整风后被排斥出权力核心。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胡耀邦奉康生之命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同时暗中安排二十几个‘积极分子’分散在会场的各个角落观察每个人的反应，举报怀疑者，在会后即抓出了十几个‘内奸嫌疑分子’。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运动核心组织，指挥‘积极分子’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发明了‘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叫‘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

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通过上述手段，胡耀邦成功迫使内定的‘特务’们自我坦白，获得了涉及八十二人的检举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胡耀邦知道手头的检举资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仍要求根据这些材料拟定出了嫌疑者黑名单。

“审干”与“抢救”运动中的整人套路包括：

围攻：组织“积极分子”以“逐个帮助”的名义围攻怀疑对象，向被怀疑者施加精神压力，迫使他们承认罪名，然后将一些认罪者再树为积极分子，让他们再去“帮助”别人；

“钓鱼”：暗中布置社会部特工在各单位故意散布“反动言论”，诱人附和“上钩”，“钓”出“反革命”。谁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引诱招数，很多人附和“反动言论”后中招，被抓住罪证，成了审查、整肃对象；

写自传和交待材料：要求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反复写自传，填月表，要求交待内容具体每个月的历史，从重复书写的履历和交待材料中找出不同之处，将此作为隐瞒、欺骗罪证。康生向社会部整肃人员亲授斗争策略道：把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进行对照，从三部自传找出破绽。在没有复印机、电脑的手写年代，三次书写的自传必然出现众多差异和疏漏，康生这一整人招数可谓百发百中。运动这一招

数，运动主持人轻易掌握了所有怀疑对象的“罪证”，然后就几次自传的差异连续审讯，使受审人越说越糊涂，在压力之下屈招；

“顺藤摸瓜”：逼迫屈召者交待上下组织关系。结果是，一旦屈招，罪越认越多，最后精神崩溃，什么罪都招认，胡乱揭发、诬陷，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揭发、诬陷，被牵连者越来越多，原先大批内部秘密调查的个案转为公开审查；

“车轮战”：日夜审讯，直到被审者精神崩溃；

“填调查表”：党员被要求定时填缴“小广播调查表”，要求详细填写听到了什么不利于党的言论，批评上级的牢骚，和不好的话，向谁传播了等等。由于“不利于党的言论”、“牢骚”、“不好的话”均无从定义，因此填“小广播”表实际就逼迫人们陷害别人以自保，使人们互为仇敌，营造只有紧跟中央领导的揭发别人才是活路的环境；

隔离审查：各单位将审查对象和“抢救”对象拘押起来，不准回家，不许通信。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的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地，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各单位审干小组为完成“挖出特务”指标而对被审查者实施残酷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

假坦白：典型案例是“张克勤假坦白”案。整风运动中，十九岁的张克勤被检举为特务。经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的轮番审讯，张支持不住，被迫“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胡乱咬出了十几个特务。社会部长康生决定，将张克勤树为“坦白典型”，让张骑马戴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坦白运动”报告，以向所有与会者施加压力。[52] 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

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着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形成了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有一个组的学生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运动主持人立即为他们举行庆祝大会。大家互相介绍从反省到坦白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人去坦白。这样，坦白者越来越多，社会部根据坦白运动的交代，顺藤摸瓜，问题越搞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宽，特别是所谓假共产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问题，坦白者将日占区、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供了出来”； [53]

刑讯逼供：手段包括：哄骗恐吓、疲劳战（车轮战，连续几天几夜，最多者十五昼夜连续审讯不让睡觉）、坐小凳、五花大绑、压杠子、举空摔地、打耳光、吊打、饿饭（有人被饿一个多月）、渴水（不给水喝）等数十种，有不承认是特务者被折磨死；精神折磨的手段有假枪毙等，不少知识分子被吓疯。

上述手段只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人招数中的一部分。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延安窑洞里灯火彻夜通明，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们作为敌特嫌疑人，白天黑夜写自传，交代历史，自我反省，互相揭发。整风、肃奸、反特和抢救运动中，延安地区，各机关、学校都成了门口有警卫把守的关押处。大门内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不来往，在的延安城里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气氛极为恐怖。一大批响应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步王实味的后尘，落入陷阱，被“查”成了反革命或特务分子。在毛泽东、康生的指挥下，大批特务、托派、国特、日特冤案被制造出来。例如，军委三局电讯学校 200 多人中挖出 170 个“特务”；西北公学 500 多人，只有 20 人没有被“抢救”； [54] 甘、陕、川、豫、浙、鄂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因介绍来延安的青年坦白自己是“特务”而被审查为“特务组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 [55] 鲁迅艺术院 300 余人中有 267 人被打成特务；陕甘宁边区共“肃”出 1.5 万特务。 [56]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

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渍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溼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危拱之（叶剑英前妻）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获救后发了疯……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57] 亲历者薄一波多年后回忆延安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的惨状说：“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58]

运动中，众多青年知识分子被刑讯折磨致死，或忍受不了精神折磨而自杀，例如，柯庆施妻子曾宪兰便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59] 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叛徒后与三个孩子一同自焚，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呼着冤枉纵身跳下悬崖。[60] 更多的人像王实味那样神秘失踪。在迫害暗杀方面，延安的社会部与苏联的契卡一脉相承。苏联的很多屠杀是苏联解体后才被披露出来。康生曾帮助毛泽东销毁档案，社会部秘密处置的档案应该也早已被销毁了，延安整风中到底有多少人被秘密杀害，有多少人被折磨致死，有多少人自杀，大概只有毛泽东、康生知道。

毛泽东通过康生以审干和抢救运动的名义对拥护王明的党员干部大会小会批斗、关押，对党内各山头的高层异己进行整肃，迫使党内各个山头派系表态“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经过轮番整肃，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国际派纷纷低头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其中，王明在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王明清楚，没有莫斯科撑腰，他在延安恐怕性命都难保。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王明为首的国际派被排除出了中共权力核心，积极支持毛泽东整肃运动的刘少奇、任弼时、高岗、彭真等人获得提拔进入最高权力核心，成了整风运动的获益者。国际派中的周恩来因早早承认错误，表示效忠而获毛泽东留用。

苏共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记录延安的“审干、肃奸与抢救运动”情况写道：“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在夜里被抓走的。人人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1943年4月9日）被抓获并对自己的活动表示悔过的特务，人数显著增加。可疑分子不仅被捕，而且还被害了。（1943年7月17日）边区的党、政、军机构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分是学生和小公务员。整风的下一阶段是要在中共的中层干部中揭发特务，然后再在党的领导层中推开。这里就像监狱，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自杀事件众多。

（1943年7月23日）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1943年7月29日）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1943年8月11日）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943年8月21日）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中共的全部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正在被仓促修订。（1943年10月

28 日)“在这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周扬主持的延安大学运动、王子宜主持的行政学院运动、胡耀邦主持的军委会二局运动和曹轶欧主持的延安县运动被康生评为四个运动典范和向毛泽东汇报的“延安经验”。[61] 经康生将“二局经验”推广到各部门，胡耀邦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开始窜升。

1943 年底，苏联卫国战争形势好转，斯大林恢复了对中共的控制力。王明和弗拉基米诺夫早已向莫斯科投诉了延安的残酷整肃运动。斯大林通过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电令毛泽东停止整肃运动。毛泽东对斯大林恢复了驯服，宣布整风、审干及抢救运动结束，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年前，他惧怕召开七大，担心被国际派夺权。经过整风运动，他驯服了国际派，确立独裁党内地位，在政治局安排了亲信，基本达到了清除异己目的，营造了党内高层颂扬自己的热潮，感到可以放心召开七大了。毛泽东结束残酷整肃运动的办法是批评主持人过火，将整风运动坏事推到手下人头上。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连串发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观点。（1943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部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毛泽东对我说：康滥用职权，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1944 年 8 月 26 日）多年后国民党中央、军统高级官员的回忆录显示，国民党在抗战中并未派人打入延安及其它中共根据地。所谓国民党派奸细渗入延安只不过是毛泽东整肃异己的借口。

毛泽东按照他在江西苏区的统治模式，要求全体人民无遗漏地被装进党控制的大网里，要求全党、全民服从领袖意志，整齐划一。为此目的，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给人们洗脑，肃清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思想，摧毁人们的独立人格，代之以“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观念。延安整风运动强迫人人坦白，互相揭发，背地告发同事、朋友、同学甚至亲属，摧毁独立思想、摧毁人们的隐私空间、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否定人之常情，鼓励出卖他人以自保，将延安的革命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塑造成了没有人

性，没有独立思想的党工具。亲历者刘白羽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代表。整风运动初期，刘与丁玲、周扬等人一起通过批斗同情王实味的作家萧军向党表态。然而，参与批斗仍过不了关。审干抢救运动中，刘白羽被迫反复写材料交待历史。他后回忆在审干运动中痛苦经历说：“这时，我的思想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洗去我的罪恶，连骨头缝都挖掏净尽了，可是还不行。这怎么办呢？……这时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还要作整个支部每一个党员的历史审查工作。可是我自己的审查都过不了关。我一遍一遍地作思想检查，绝望到了极点……整个灵魂悚悚颤抖。”就在他准备跳崖自杀了断时，他的第五次自传获得通过。过关后，他立即转变角色，主持对党支部其他党员的审查迫害。晚年，他感谢延安整风运动写道：“‘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用这话说说明一个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苦难历程再合适不过了。”“延安整风使自己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我人生旅途中，最辉煌又最困顿、最甜蜜又最苦涩，最坦诚又最隐秘的恐怕就是这一转折了。”^[62]被洗脑后，刘完全了向党文艺家的转变，写出了众多帮助别人洗脑的党文艺作品。另一文艺家何其芳经历了同样残酷的整肃，同样的转变，成了党文艺家，写出了《我歌唱延安》、《生活是多么宽广》、《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一个早晨歌者的希望》等众多符合党需要的作品。从延安整风中生存过来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都与刘、何一样，从延安的残酷整肃中品出的是“辉煌和甜蜜”，心甘情愿地，不问是非地参与中共发动的任何整肃运动，不留情地整肃他人。

延安整风运动敲响了文艺创作自由的丧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的文艺报刊还算繁荣，至少有 26 种期刊和 3 种报纸刊登过文艺作品。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收录的 1936 年至 1942 年的文艺作品达三千篇。其间延安文化艺术界创办过至少 21 种文艺期刊，包括《文艺突击》、《山脉文学》、《戏剧工作》、《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中国文化》、

《大众习作》、《新诗歌》(延安版)、《新诗歌》(绥德版)、《前线画报》、《文艺月报》、《草叶》、《谷雨》、《诗刊》、《部队文艺》、《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研究》等等。1940年4月15日《中国文化》刊登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记载当时的文艺繁荣说：“物质条件虽然无比的困难，只要有人作，什么都会彻底克服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版了。《通俗读物》准备编辑了。《边区群众报》就要诞生了。《文艺突击》准备复刊了。这里，看不见所谓封闭书店、报馆、和查禁书籍，这里看到的，是一切出版物和出版事业的蓬蓬勃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一九三九年，改编了《新中华报》，出现了《军政杂志》、《前线画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延安世界语者》，继续出了几期《文艺突击》。”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上述期刊全部被迫停刊，活跃在延安的十几个文学社团全部解散。毛泽东的讲话最能解释文艺的凋零。他说：“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他不允许有独立于共产党的文艺存在。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营造了中共之外无文艺，中共意志之外无思想的局面，自由的文艺创作被彻底取缔。在这种党管文艺、党管思想的局面下，真正的文学社团和独立报刊无法生存。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达到了毛泽东的设想，从延安整风到1947年3月中共机关撤离延安，一个《解放日报》综合副刊取代了所有文艺期刊，“党报”之外的报纸和文化刊物荡然无存。

多年后王明称延安的整风运动是后来文革运动的预演，[63] 事实确实如此。延安整风开创的要阴谋套路、整人套路和运动模式后来成了中共传统被长期沿用。这些套路包括：指定“干部必读”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号召向党提意见“引蛇出洞”；“另起炉灶”，成立权力无限，临时性的运动领导机构夺取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权力，绕过规定程序达到政变目的；“摸底排队”；要求反复写交待材料，利用不同的交待材料的差异罗织罪名等等。延安整风中开创的整人套路在延安使数万人被陷害，在建国后使上千万人落入陷阱。后

来贯穿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整肃运动的整人术，通过政治运动消灭对手的基本模式都可溯源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通过互相揭发、暗中告密进行恐怖统治的模式后来贯穿了毛泽东统治时代，使告密、暗害他人成了毛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存方式。延安整风中助毛整人者都获得毛泽东的提拔，但后来大都遭到了类似的整肃。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的挨整厄运很像延安整风中他们审查的特务，只不过是换了不同的罪名。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在遵义会议时发明的操纵会议办法，将会议变成命亲信担任各组组长的大组漫谈，规定代表只准发言，不准记录，由他亲点“秀才”组成秘书组负责作会议记录及编制会议简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共重要会议都沿用这套模式，使人们从中共党史资料中看不到会议的原始发言记录，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大都说不清会议的具体情况。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极大地发展了一些苏俄引入中国的制度。其一，政治档案制度：整风运动中，人们被要求反复写自传，反复填写履历表，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中共的组织部门将每个人写的履历、检讨、思想汇报等，加上别人的揭发材料，组织对个人的评价材料收藏保管，为每个党员们建立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从此，中共确立了主要服务迫害目的干部档案制度，使每个人都被中共组织部门的无形之手控制着。建国后，中共将政治档案制度推向全国，通过政治档案操控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不过，利用档案整人的毛泽东、康生等人也难逃档案的控制。斯大林早就为他们建立了档案，也保留了一套他们的“黑材料”（这些档案至今仍在俄罗斯人手中）。

其二，新闻管制制度：整风运动之初，延安还有不少相对独立的报刊，《解放日报》还能刊登王实味提意见的文章。整风运动后，报刊大量停刊，《解放日报》负责人被整肃，独立声音的文章不再可能见报，中共从此确立了新闻传媒管制框架。按毛泽东的要求，《解放日报》社的负责人陆定一和

中宣部长胡乔木总结中共的新闻原则为：党性第一原则，革命立场原则，新闻的快慢服从党的利益原则，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原则，运用报纸指导运动原则，新闻保密分层次原则等等。他们解释说，新闻报导须服务党的利益，每篇社论，每条通讯，每个消息都要贯彻党的观点，为了党的利益，任何消息都可以隐瞒、删改，有的压一下稍后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有的集中在运动高潮时一起报导，形成宣传规模。延安整风后，中共开始发行专供高层阅读的参考消息，使知情权成为特权，与等级挂钩，级别越高可享受越多的知情权，同时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新闻管制制度的基础是取缔独立媒体。中共在延安已经取缔了独立媒体，建国后中共将新闻管制制度推向了全国，取缔全国的独立媒体。

其三，干部等级供应制度：整风运动之初，延安大、中、小灶的等级制度森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满怀理想的王实味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提意见引来杀身之祸后，延安再无人敢抨击等级制度、特供制度。整风运动后，不仅原有大，中，小灶制度保留，还发展出了按干部级别享受特供品制度展，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及为领导干部安全保卫等等级和特权制度。这些特权制度是官本位的，领导干部一旦被认定犯了政治错误，所享有的特权好处立即失去。仅此制度已使是中共高层成员不再敢表达反对意见，这也是整风运动后大家争相颂扬毛泽东的重要原因。建国后，中共将官本位的特供制度进一步发展，为高层们安排王公府第、别墅，建立香烟、米、鱼、肉、鸡、鸭、菜等消费品的特供生产基地，指定名厂家特供高层各种用品。

中共七大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要求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尚未确立独裁地位的毛泽东挡不住莫斯科支持的动议，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入侵苏联使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低落，也使王明弱势，毛泽东趁机动手发动了名为整风的整肃运动。在随后的两年中，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将留苏派彻底整垮，解除了王明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职务。在确立独裁地位后，毛泽东认为可以召开七大了。这时距中共六大已经相隔了十六年。

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发表，更不允许辩论，因此只是举手走过场的形式，真正的决定须在大会前由领袖作出，然后核心层通过，政治局会通过，再开个中央全会“统一思想”，以确保代表大会不会出现反对意见。毛泽东对整风运动后的独裁地位自信，同意实行一下党内民主，在全会前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主席团主席。选主席团主席作法是苏俄引入中国的产物。苏共大会主席团主席是最高领袖的当然人选。因此选主席团主席实际是确定领袖人选。高层成员们在整风运动的恐怖中不得不以颂扬毛泽东为生存之道。但在毛泽东一时无法控制的无记名投票中，众高层纷纷用选票表达对整人运动的不满。选举结果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刘少奇得票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得票仅排第四。这一结果让从来没有尝试过党内民主的中共中央不知所措。周恩来出面为毛泽东救驾，提议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主席。没有了无记名，大家失去了表达不满的勇气。除了朱德表态反对否定无记名投票结果外，众高层都附和了周恩来的动议。[64] 结果，核心层以内部协议的方式推翻了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由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

1944年5月，中共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为七大作准备的六届七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和毛泽东扩大进会议的十二位亲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事议程的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会场规则草案》。任弼时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将中共党史重新叙述，宣布毛泽东之前的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都犯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一贯正确，宣布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将王开除出领导层。《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彭真任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员会。经周恩来提议，全会决定此后以高层内部的协议方式决定最高领袖人选，不再搞无记名投票。

紧接着六届七中全会，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 547 名，候补代表 208 名，代表全国 121 万党员。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巩固了在党内的独尊地位，营造了全党对自己崇拜的潮流。大会以会场中央悬挂毛泽东巨幅画像方式与会者宣告，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已经确定。中共七大与国民党六大同时举行，中共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发表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提出：打败日本之后，存在着光明的和黑暗的两个前途，中共代表着光明的前途。

七大的主要文件是毛泽东署名的长篇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报告承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当时的国人和很多中共党员不可能了解中共刚刚在延安剥夺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整风运动。字面上，中共的上述承诺比国民党六全提出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更得人心，但国民党保障了相当部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和人民财产权，而在中共控制区，上述自由和财产权不复存在。当时著名报人储安平对中共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作出的民主承诺表示怀疑说：“近日中国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为大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

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们，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们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左右其意见。假如人们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如何能实行民主？”[65] “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因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66] 储的怀疑不幸言中。中共建国后立即取缔了《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承诺给人民的各项自由。

七大宣布，毛泽东为中共和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南。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独裁地位的《新党章》。其中规定：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以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举手通过苏共政治局各项决定的的走过场。此次七大同样是举手过场，不同之处是，代表们举手通过的不再莫斯科的决定，而是毛泽东的决定。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没有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副主席的规定，七大产生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等书记处书记均须听命于毛泽东，毛泽东身兼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因此，七大是确立毛泽东独裁地位的大会。新

党章中关于通常每三年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与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体制互相冲突，前者规定实际无效。

经过整风整肃，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等留苏派只能向毛泽东俯首称臣，在七大会上承认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病中的王明在被担架抬进“七大”会场参加了十几分钟的开幕式即退场，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前领袖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排名垫底，丧失了权力，曾在莫斯科助毛泽东获得斯大林认可的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彭德怀因发动“百团大战”而获罪，排名降至与他的军职不相称的第三十多位。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创造了长会的世界记录。各国政党开会通常数小时，长的一两天而已。中共建立之初，全国代表大会不过一两天。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之初，中共高层会议紧凑，逐项讨论后表决通过，少则半天，多则两三天，没有长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执行对日避战方针，高层无所事事，有充分时间写诗填词、唱戏、跳舞。毛泽东对有些将领想对日作战不放心，将党政军高层召集到延安开长会，例如，整肃彭德怀的会就开了四十天多。从 1942 年初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将开会拉长到经年累月，将高层们集中在延安开整风会、审干会、除奸会，反特会，斗争会。整风运动一搞就是两年，直到苏联在战场奠定胜局，斯大林对整肃留苏派进行干预，毛泽东才宣布结束整风运动。然而，毛泽东结束整风运动后将全体高层集中在延安继续开长会，六届七中筹备会和六届七中全会开了一年多，接着为期两个月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就上述会议内容和结果而言，三五天的会期已经足够。毛泽东率众高层长年累月地开长会，一是为对日避战，二是以长会战消磨党员们的独立思想，让全党习惯遵行他一个人的意志，三是要养精蓄锐，要等到抗战胜利，然后对国民党开战。算上延安整风前的各种会议，中共高层们在抗战八年中，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开会，实际是以开会名义消磨时间。在抗战胜利曙光中，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称：“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

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让日寇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坐山观虎斗。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 64%和伪军的 95%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 36%和伪军的 5%而已”。毛泽东的如此报告不仅是在撒弥天大谎，更是在污辱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对日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八年中，日军空袭国军控制区数百次，投弹万余枚，造成国军方面死伤万人，其中，对陪都重庆实施了长期的大轰炸，空袭陕西共出动飞机数千架次、空袭兰州、银川、西宁三十六次，与国军空军第十五中队、第十七中队在兰州展开惨烈空战。而对中共控制区，日军按照与中共达成的休战默契完全停止轰炸，相安无事。于是，延安有了数年开长会的闲暇，有了延安的京剧、舞会、秧歌剧热潮，有了《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众多演出，毛泽东得以发动旷日持久的延安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敢于质疑对日避战的中共党政军成员被清洗干净，剩下的人都学会了遵从、颂扬的生存之道，没有人会质疑。多年后，中共高层们中都自觉地在回忆录中回避延安在抗战期间长期的安宁，回避在全面抗战期间开了好几年会的经历，几乎无人坦承在抗战中完全没有参加抗战。这种回避才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

崇毛热潮

1931 年，斯大林任命毛泽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 年，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根据江西本地干部对毛泽东血腥肃反的投诉处分了毛泽东，并向莫斯科提议送毛赴苏养病。斯大林力挺毛泽东，否决了临时中央的提议，将毛提升为政治局委员。1934 年，根据斯大林的决定，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报告单行本，共产国际在为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将毛泽东称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935 年，斯大林将毛泽东列为共产国

际七大名誉主席，授意《真理报》在会后刊文赞扬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1938年7月，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向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指示说：“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67]

斯大林选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认为在共产党内推动领袖崇拜理所当然。在莫斯科推动共产党内崇拜毛泽东潮流时，毛泽东在陕北已经在营造顺从和颂扬自己才能获得提拔的环境。在毛泽东和斯大林合力推动下，共产党内出现了颂扬毛泽东的潮流：中共中央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校歌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彭真在其掌管的中央党校率先推出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因此获毛泽东提拔；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率先在致中央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将毛泽东置于中央书记处之前；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率先在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陈云提出了“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的说法。在颂扬毛泽东的潮流中，不赞成喊毛万岁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地位不断下降。[68]

随着整风运动走向恐怖，颂扬毛泽东在延安蔚然成风：“毛主席万岁”开始成为中共集会和报刊的主要口号；《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在《七一社论》中率先喊出了“毛泽东主义”口号，经毛泽东批准后推向全党；《解放日报》频繁刊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的大字标题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央党校大礼堂出现了毛泽东的金色浮雕头像，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中共开始向延安老百姓派发毛的肖像要求悬挂；长久流传在陕北的情歌《芝麻油》（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想死个人，呼儿咳叻，哎呀我的三哥哥）被改词成了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毛泽东主义”提法不获斯大林认可，于是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说法，

刘少奇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说法。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共推出了《毛泽东选集》，将秘书班子、理论班子的著名文章归入毛泽东的名下广为宣传。亲身经历延安崇毛热潮的何方在回忆录写道：“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问：‘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反驳：‘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皇帝。’还有一件怪事是在 1943 年 11 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69]

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中，高层们展开了颂扬毛泽东的竞赛。大会开始以毛泽东的画像代替马恩列画像，悬挂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毛泽东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在开幕讲话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他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结束讲话。[70] 整风运动中升上二号位的刘少奇在其主持制定的新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吹捧毛泽东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毛泽东思想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党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向全党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整篇报告中，刘少

奇以颂扬毛泽东为主题，提及毛泽东名字百余次。任弼石在发言中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康生、陈云等提议毛泽东任总书记。经过整风运动，国际派彻底认输，纷纷接受颂扬毛泽东才能生存党内规则，连最不买毛泽东账的王明也顺应潮流，表态“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第 32 章 中美摩擦

远征军惨败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民政府建成了昆明至下关的简易公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逐渐封锁了中国的港口，国民政府加紧修建滇缅公路，于 1938 年 8 月开通了从昆明至畹町的公路。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和照片，称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前往滇缅公路考察后赞这项穿越横断山系的云岭、高黎贡山等六座山脉和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五大江河工程为“世界奇迹”。

1941 年春，苏联与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封锁了中国经新疆的对外陆路通道，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运输命脉。英国驻缅印兵力薄弱，希望中国派出军队协助英军保卫滇缅公路，但担心中国出兵激发缅甸的民族主义。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与中国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结成了布防缅甸的军事同盟。在阿卡迪亚首脑会议上，英美决定将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分为由尼米兹（NIMITZ）海军元帅统帅的中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元帅统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勋爵统帅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统帅的，包括越南、缅甸东北部、泰国和印度支那的中国战区，决定中国派远征军赴缅甸战场作战。罗斯福任命曾在平津任驻华武官多年，懂华语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陆军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战区美国陆军司令、赴缅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根据首脑会议决定，中国派出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与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组成十万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兼保卫滇缅公路。1942 年 2 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访

问了印度。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元首，蒋介石在印度表达了同情印度独立的立场，引起英国的不满，蒙巴顿与蒋介石之间开始就缅甸战事互相指责。

3月，日军占领了仰光(RANGOON)，在同古击败了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英军刻意自保，放弃普罗美(PROME)撤退。英国方面只想利用中国远征军牵制日军以助英方在印度的防守，中、英双方在战略目标、作战指挥、后勤支持等方面均各打各的算盘，盟军在缅甸战场呈必败之势。在盟国军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史迪威提出了反攻仰光作战计划，命令中英联军向有优势空军的掩护和机械化部队的四个日军精锐师团发起进攻。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命令，称史迪威的命令是“自杀作战计划”。史迪威指责中国军队的私家军制，指责蒋介石越级下达命令，架空了自己的缅甸战场指挥权，史、蒋摩擦由此开始。4月初，英军突然撤往印度，蒋介石与史迪威部署的平满纳(PYINMANA)会战计划泡汤，远征军只得放弃平满纳退守曼德勒(MANDALAY, 瓦城)。日军第33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缅甸向导带领下隐蔽穿插过英印军的几道防线，于月中一举夺取了仁安羌(YENANGYAUNG)的滨河大桥，堵住了两万多英印缅的退路。英缅军死伤数千无法突围。正当英军准备投降时，孙立人率第远征军第新三十八师赶到解救了英军。英缅军突围后扔下中国远征军自行撤退，并在曼德勒大桥上装了炸药准备断绝后路，中英联合战线不复存在。

由于将空军调往地中海支持北非战场，盟军在缅甸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侦察。日军利用盟军这一弱点，在突破东线后立即派第五十六师团长途奔袭1500公里，穿越泰缅边境直捣远征军的后方要塞。4月21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突然出现在东线重镇乐可，击溃麻痹大意的远征军守军第五十五师后夺取了要塞。日军的千里奔袭显示出日军指挥官的胆识和冒险精神，堪称军事史上的杰作。4月25日，中、英、美三国代表会议决定取消曼德勒会战计划，撤出缅甸。当晚，蒋介石从重庆电令远征军御敌于国门之外，重点防卫远征军回国的要冲——腊戍(LASHIO)。史迪威也看到了腊戍的重

要性，连夜驱车赶到防守腊戍的第六军司令部。他发现军长甘丽初离开司令部在城里搓麻将，并对所属第五十五师丢了乐可城懵然不知，立即命令副司令罗卓英查办甘丽初，将丢失乐可的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交军事法庭枪毙。罗没有执行史的军令。4月29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轻取腊戍，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

腊戍失守后，盟军缅甸战场败局已定，远征军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史迪威果断电令远征军放弃回国计划撤往印度。然而，蒋介石越级干涉史的指挥，电询杜聿明撤回国内有无把握。杜知道蒋希望他率军撤回国内，向远征军将士隐瞒了司令部的撤往印度电令，只宣读重庆来电，称蒋委员长指示远征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回国之路要塞八莫，掩护主力经密支那回国。当杜聿明拒绝史迪威军令率军退向国内时，日军攻占了八莫。杜向重庆隐瞒了八莫失守消息，报称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可望成功。蒋介石不征询史迪威的意见越级命令杜率军回国。对于杜聿明抗拒远征军总司令部之命，下达相反方向的回国命令，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质疑说：“八莫已经失守，如果敌人先我而占领密支那，我军出路何在？我刚刚收到史迪威参谋部通报，盟军在密支那以南已经发现日本人的坦克，预料日本人将先于我军占领密支那。”此时，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率众将领支持杜的决定，称“誓死回国，决不到印度去听美英指使”。杜聿明拒绝了孙立人传达的史迪威命令，奉蒋之命令率大军退往密支那。

攻占腊戍后，日军配有坦克的三千快速部队迅速进向怒江峡谷，相继攻占了云南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使大后方云南顿时变成了抗战前线。一时，从畹町沿线败退的远征军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缅甸华侨和难民汇成的逃难人流拥挤于滇缅公路中国境内段，国军在滇缅公路沿线开始销毁不及运走的美援物资。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下令炸毁一个连的坦克用来堵塞公路，阻挡日军。日军快速清除路障后继续追击，于5月2日奔袭联接怒江两岸

的唯一通道，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的惠通桥。守桥国军果断炸桥，凭江拒敌。5月4日，日军对保山进行了大轰炸。

云南军民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政府欺骗宣传造成的。国军装备与指挥水平低下，派系复杂，加上共军在侧袭扰，根本不具备与日军正面对抗的能力，无胜仗可言。但国民政府宣传部控制国内报纸，将惨败消息一概隐瞒，将小败吹嘘为大捷。对于缅甸战场，国民政府封锁惨败消息，使报纸上充斥胜利报道，3月29日《中央日报》还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4月各大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五千”。在民众盼望“曼德勒会战大捷”消息时，日军突然打到边境，民众自然一片恐慌。

5月8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两个联队（相当于国军的团或加强营）抢在远征军主力之前，攻占了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地，缅北第一大城市——密支那，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云南的退路。此时，杜聿明麾下有六万远征军精锐，而占领密支那的日军只是经过千里奔袭、疲惫不堪的两个联队。孙立人师长向杜军长痛陈：既然决定经密支那回国，理所当然以绝对优势兵力拼死一战冲过要塞。况且，根据情报，日军应为小股部队，我军尚有四个半师及战车团、重炮团的强大兵力，应立即攻击千里奔袭密支那的小股日军疲惫之师，然后沿滇缅公路回国。野人山极为荒凉，为兵家绝路，让数万大军走入荒山绝路将葬送远征军精锐之师。杜聿明拒绝孙的意见，下令“弃车、弃炮上山，到山里与敌打游击，伺机进入国境”，[1] 率六万大军逃入胡康河谷(HUKAWAWNG VALLEY)的原始森林。杜的逃跑命令与日军布署千里奔袭的冒险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远征大军主动丢盔弃甲遁入山林之举让对防守密支的日军指挥官渡边师团长感到庆幸。他立即下令封锁原始森林出口。

胡康河谷东西两面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北接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河谷内瘴疠横行，方圆数百里无人烟，被称为野人山，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远征大军进山后很快迷失方向，互相失去联络的各部在人迹未至的原始山林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靠打猎、捕鱼和采集

野果为生，过上了半饥半饱的野人生活。一路上，远征军洗劫土著山寨，把部落里一切能够下肚的东西吃得精光，有的官兵为争夺一口食物而大打出手。再往前走找不到山寨，饥饿的士兵只好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吃，甚至吞食动物粪便。因为山上猎物越来越少，士兵打到猎物就地燃起篝火分食猎物。官长们发现士兵们不再抬兽肉下山，就派军官上山督猎。于是，军中天天发生冲突、火拼和军官失踪的事件。饥渴，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因不堪折磨而自杀的事件大量发生。

在断后时与军部失散的第二百师侥幸找到路穿越了野人山，于 5 月下旬雨季之前到达了中缅边境，回到国内时仅剩 2000 多人，受伤的师长戴安澜在途中牺牲。国民党政府需要这样的事迹鼓舞士气，经过报刊大力宣传，戴师长的灵柩一路受到万民景仰，从保山至昆明，沿途各地官员一律佩戴黑纱率民众迎送。第二百师的官兵成为万民欢迎的英雄，迎送规格一路升级，仪仗队越摆越壮观，最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戴安澜将军的葬礼。

第五军军部、第九十六师及新二十二师因胡康河谷道路被冲断，在雨季中被困野人山绝境。大军只好天天蹲在山洞里，靠着剥树皮挖草根填塞肚皮，虚弱的士兵常常往路边一坐就再也战不起来了。早晨醒来，士兵们发现有同伴在一夜之间被食肉巨蚁吃得仅剩白骨。沼泽中蚂蟥翻涌，体大如蛇，士兵不慎走入，顷刻间被蚂蟥吸干仅剩骷髅。山间毒蚊弥漫，没有火把驱蚊，士兵遭蚊虫攻击苦不堪言。幸运的是，一架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远征军熏马蜂的烟火，美军派来运输机飞空投下食物、药品，雨衣，帐篷，使丛林中的远征军绝处逢生。8 月，杜聿明所部远征军在美军飞机、联络官和空投电台的帮助下走出了胡康河谷绝境，不是回国，而是走了一圈绝路后到了史迪威当初下令前往的盟军印度兰姆伽基地，与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会合，远征军士兵吃到了久违的饱饭，得到了全套的美式装备和军饷。

赴缅的十多万远征军精锐部队回国时仅余四万人残部。捐躯的六万将士中有五万多人是窝囊地死在了缅北野人山中，死于了自投的绝境。一年后，

中国驻印军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的野人山之战中见到了第五军将士们的累累白骨，而且往往是数堆白骨环绕着枪架。走野人山的统帅杜聿明与走长征路的毛泽东一样，是让士兵抬着走的，[2] 二人征途的代价都是抬担架的士兵死掉二十多人。杜将军遁入野人山的决定虽然荒唐，但奉了蒋介石之命，抗了史迪威之命，押对了个人前途的宝，回国后未受处分，反获蒋介石提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坐镇昆明。

在远征军走进野人山绝境时，史迪威走出了感动美国人的“传奇之旅”。日军占领腊戍要塞后，他电令远征军撤往印度，谢绝了罗斯福总统派飞机接应脱险的安排，命令飞行员把文件带走，自己去追赶杜聿明，冀当面说服杜率军去印度。两天后，他到了缅北温佐，见到了因铁路中断而没逃远的罗卓英。在温佐到英多的路上，他见到中国远征军丢弃大炮、汽车，武器，装甲车，见到一群群绝望的伤兵坐在路边上强行拦车，互相火拼。得到日军占领密支那消息后，他放弃追杜，带领一行人赶往印度。沿途，史迪威收留掉队的英军官兵和缅甸难民，其中还包括一名缅甸孕妇。一名英国军官提议让所有的缅甸人离开，另一军官提议，将干粮分一半给那些平民，让他们各自逃命。史迪威认为在困境中抛弃妇女和平民可耻，决定带上他们，粮食平均配给，率队在山林中艰难跋涉。与杜聿明军一样，他们在食物医药断绝，被困荒野的绝境中被美军巡逻飞机发现，得到了空投的帐篷、食物、药品和电台，到达了印度的雷多（LEDO）。他的传奇之旅被美国媒体广泛报导，传奇英雄形象压倒惨败统帅形象。

远征军缅甸惨败中，孙立人将军显英雄本色，在仁安羌指挥新三十八师歼敌逾千，解救英军突围，在密支那执行正确军令，拒绝荒唐命令，完成断后掩护任务后率新三十八师掉头南下，杀开血路走捷径，于半个月后安全到达印度。在 6 月中举行的联合国纪念日德里十一国军队阅兵式上，新三十八师派步兵一排代表中国军队出席，以军容、步伐和精神面貌夺冠，被印度

各报赞扬为“世界一流军队”，孙将军赢得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高度赞扬和美国国会的勋章嘉奖。

在印度，史迪威拟定了“人猿泰山”计划（XYZ 计划），准备设立印度、昆明、桂林三个训练基地，将撤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残部和另组建两支中国远征军训练、装备成一流军队，分别从印度北部雷多和云南怒江对在缅日军发动反攻。史的计划经罗斯福总统批准后付诸实施，盟军在印度兰姆伽 (RAMGARH BIHAL) 建立训练基地，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接受了美式装备和美式训练，由美国考官讲授现代军事理论，步兵、炮兵、通讯甚至兽医知识，迅速壮大成为精锐部队。

史迪威的反攻计划不仅动用在印远征军，还要求继续从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以国内战场为重，要求延后缅甸反攻。美国以停止物资援助施压，迫蒋抽调军队服务缅甸战场。为了继续获得援助，蒋介石只好配合史的缅甸反攻计划，国民政府号召青年从军，在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十万学生大从军运动。

史、罗倒蒋

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罗斯福总统决定维持对中国抗战的空中运输线直到战争结束。1942 年 5 月，美国空军开通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支脉的中印空中航线。在这条世界上最险恶航线，飞行员中要作三次大起大落，要面对很少甚至没有无线电导航，不全的飞行图，日军战斗机的截击，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疾风，近半年的雨雪季节，几乎不可能紧急迫降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战地记者们称这条航线为“驼峰航线”（HUMP COURSE），飞行员们称这条航线为“空中地狱”，认为其危险性超过对日作战和在欧洲战场的对德轰炸。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兵工厂，美国的援助物资支持着英国、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通过驼峰航线运入中国的每月几千吨援助物资与美国运往欧洲战

场的物资量相比微不足道，对中国战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罗斯福将对英、对苏援助物资的支配权交给丘吉尔、斯大林，但将援华物资的支配权交给史迪威，拒绝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染指美援物资的调配，让蒋介石属下般地向史申请物资，埋下了中美摩擦的祸根。

在缅甸战场，史迪威对远征军将领只听命蒋介石，国民党军只效忠个人的私家军体制不满。到中国后，他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对蒋介石按亲疏关系治军等等更加不满。他发现，美国援助的部分战略物资下落不明，随后出现在黑市上，或通过走私方式被卖给了日本人。他不断向罗斯福状告国民党贪污、腐败、无能，在发回白宫的电文中斥蒋介石指挥混乱，能力低下、国民党派系纷争、国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指蒋无意向日军进攻，无意与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只知道榨取美国金钱与军火以备将来与中共作战，指蒋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要障碍，建议美国设法更换中国的领袖。不仅如此，他对蒋介石个人极为蔑视，在日记中以“花生”、“响尾蛇”、“无知”、“文盲”、“迷信”、“母狗”等恶毒词句咒骂蒋介石。提出缅甸战场反攻计划的同时，史迪威还提出了一套改革中国军事体制的建议，改革举措包括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授予前线指挥官全权，按能力与功过而不按亲疏关系任用军官等等。

应当说，史迪威并无资格指责中国的私家军制，也没有资格指责远征军只听命于蒋介石。事实上，史自己从不承认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这个上司，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来从不向蒋报告，而只向他的美国上司报告。他从缅甸撤向印度前向美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报告，却不向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居然是从报纸上得知远征军撤到了印度，其愤怒可想而知。因为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过于自信，史迪威与尊重蒋介石的第十四航空队主持人陈纳德将军也发生了冲突。

缅甸兵败后，史迪威一心想着缅甸战场反攻，向罗斯福所提建议全部围绕他的缅甸反攻计划，而完全不考虑中国战场。按理，在国民政府财政枯竭，

军需断绝，中国正面战场极度虚弱情况下，美国援助的有限资源应首先加强中国战场，而不应以缅甸战场为优先。但史迪威将绝大部分援华物资用于了缅甸战场和在昆明、桂林建立训练基地，多次拒绝蒋介石将物资用于维持正面战场和大后方运转的最低限度要求。由于英国对滇缅公路的通畅不在意，不打算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蒋介石不同意史迪威尽量将国军精锐拉到缅甸的计划。但罗斯福相信史迪威的说词，一再以停止援协的办法压迫蒋服从史迪威的计划。为了获得援助，蒋介石只好接受史迪威调动，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任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抽调第六战区主力到云南组织远征军在昆明组建训练中心，服务史迪威的“训练三十个中国陆军师赴缅反攻”计划。

在云南，史迪威与陈诚配合默契，关系密切。陈诚手下的少壮军官们受到史迪威蔑视与抨击蒋介石言论的暗示，制定了“清君侧”计划，准备效仿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如同“二二六政变”的军事行动，拥陈诚取代蒋介石。军统局破获了兵变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将参与“清君侧计划”的 600 多位青年军官逮捕审讯。蒋介石相信陈诚不会参与政变密谋，相信军官们是受到了史迪威鼓动，免去了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起用被贬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接任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胜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场的战略意义贬值，对蒋介石的态度日趋强硬，如同对下属般发号施令，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批准了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发起缅甸的第二次战役的计划，支持史迪威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九成用于缅甸战场，以停止援助施压，迫蒋介石调国军最精锐的八个军去缅甸作战。史迪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在缅甸战场得到满足，于 1943 年底率中国驻印军从印度雷多出发进攻缅北，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会师。

史迪威不仅支持“清君侧”倒蒋计划，更向罗斯福提出了暗杀蒋介石的“蓝鲸行动”计划，称“搬掉国、共两党达成一致抗日局面的绊脚石”。罗斯福

听信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报告，相信蒋介石军事上消极对日作战，政治上腐败无能，专注于勒索美国的金钱武器，保存实力准备与中共打内战。1943年11月，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当面告诉蒋介石夫妇：“你们必须设法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同时暗中批准了“蓝鲸行动”计划，要求三个月内不留痕迹地去蒋，物色一个能够与美国合作的人取代蒋介石，但要求超过三个月限期放弃计划。[3] 得罗批准计划后，史迪威的助手弗兰克·多恩拟出了毒杀、兵变、坠机等三套方案，史迪威选择了制造空难方案，命多恩在1944年初蒋介石出访印度的专机上作手脚，并要求机上要有几位美国人，免遭怀疑。史的暗杀计划因日本发动“一号作战”，蒋介石取消访印而被迫放弃。[4]

延安梦与民主牌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最主要分歧不是援华物质支配权，也不是正面战场和缅甸战场的优先考虑，而是对中共的看法。这也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1930年代，西方人因世界经济危机而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因苏联国力、军力快速壮大让而憧憬共产主义。在推动中国对日开战的同时，共产国际采取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组织左翼作家、记者宣传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安排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范长江等记者采访延安，推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国的西北角》等一批宣传延安和中共的作品。在斯诺夫妇笔下，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不讲人道，任人唯亲，代表着旧中国，延安廉洁、平等、朴实、上下一心，渴望抗日、渴望民主，朝气蓬勃，代表着新中国，称延安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他们批驳关于中共是莫斯科傀儡的看法，断言中共不是苏共扶植的产物，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斯诺妻子将延安之行称为“发现新精神和新人类的旅行”，称赞“中共在地球上最古老、变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脏地带创建着一个新世界”，“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他们极富人情味儿，更像

我们美国人，他们通过马克思主义观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在上海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埃文斯·卡尔逊读了《西行漫记》初稿后向斯诺说：“如果他们（共产党）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那么，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前卫队营长，他来华带有向总统提供中国情况报告的听命。经斯诺和端纳联系和国共双方同意及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卡尔逊于 1937 年 11 月开始了中共根据地考察之旅，从南京出发，途经武汉、郑州、西安、于 12 月中旬抵达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部，受到总司令的亲自迎接，先后会见了朱德、任弼时、左权、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指挥员（作家周立波翻译）。卡尔逊认为共产党军队内有家庭般的亲密关系和可敬的精神源泉，“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认为朱德总司令具有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和 U·S·格兰特的坚强。史沫特莱写道，当卡在夜里与朱德坐在八路军总部大院和一起吹起口琴的时候，卡对朱已有了父亲的感情。在八路军护送下，卡尔逊于 1938 年 1 月日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受到聂荣臻和举着“欢迎美国朋友”旗的边区群众欢迎。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下于 5 月初到达延安，与毛泽东长夜长谈。经过步行三千里的考察，卡尔逊说：“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和自制的一支军队。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是我终生难忘的阅历。”回到汉口，卡尔逊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给予共产党根据地和军队援助。他会见了刚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伉俪”的蒋介石夫妇，当面向蒋介石呼吁“结束国共两党间的流血”，称“八路军是一支抗日生力军。可是他们衣单食薄，急需食品、爆破筒和打坦克的弹药，尤其急需医药和绷带。委员长，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代他们提出请求，请您尽快地向他们提供援助！”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奉行“对日坚决避战，向国民党政府控制区坚决扩张”方针，向国民政府控制区大举扩张，国民政府不得不在中共根据地周边部署重兵以防侧翼被袭。蒋介石担心暴露抗战中的内战会影响美国人援华信心，没有将实情告诉卡，同时将中共对日避战专打国军的情况向外界隐瞒。其实，即使蒋介石如

实相告，沉迷延安的卡尔逊也不会相信。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他盛赞扬八路军，断言共产党根据地没有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呼吁援助八路军。他给总统寄去了共产党提供的缴获日军物品作为中共抗日的证明。此后，他在所到之处不放过任何一次演讲，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共产党控制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用史沫特莱话说，从延安归来的卡尔逊“已经对共产党着了魔”。美国的媒体基本都是左派立场，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人的宣传书籍、卡尔逊的文章让憧憬共产主义世界的美国人极为受用，美国记者纷纷加入了歌颂延安的潮流，描写共产党人为穿草鞋的勇士、超人，报导延安为最民主，最受农民拥护的社会。例如，美联社记者斯坦恩（GUNTHER STEIN）称“从延安飞到重庆如同一场噩梦”。[5] 共产国际的延安宣传举措获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人，心中都有了一个“延安梦”，对延安窑洞灯火充满向往。

皖南事变后，中共通过斯特朗、斯诺等西方记者编造了国民政府消灭中共军队不许中共抗日的谎言。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再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要求国共合作。美国方面不相信国民政府关于事变真相的说明，只相信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蒋介石坚持反共政策，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给日本造成南进的机会。”解释，相信周提供的，反诬国民政府的报告。罗斯福也不相信国民政府的解释，而是召见斯诺，咨询中国情况。斯诺早就是共产国际的宣传员，当然建议政府支持中国抛弃蒋介石。

与卡尔逊一样，史迪威心中也有一个延安梦。他不相信中共会一面宣言服从国民政府，一面拒绝国民政府军令，不相信中共会向国军开战，他深信“中共想抗日而蒋介石不让抗日，派重兵包围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认为抗战中国共两军对峙局面的责任在于国民政府不民主。他多次向蒋介石和罗斯福建议，从已经少得可怜的美国援华物资装备中拨出一部分去装备中共军队，称这样中共军队就会向华北日军进攻。他声言国共对立问题，只要他一去延安，即可解决。对史的建议，蒋介石指出，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提出

了“四项保证”，保证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目标，保证交出军队，听从政府统一指挥，共赴国难，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拒绝国民政府调遣，拒绝对日作战，从背后攻击歼灭国军，派重兵监视中共是国民政府的无奈之举，在中共没有交出军队指挥权之前，国共两党不可能联合抗日，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在中共没有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宗旨之前，美国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意味对国民政府更大的威胁。对于蒋的说法，史迪威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蒋只是借中共威胁来保存实力和向美国勒索援助物资。史迪威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也主张抛弃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责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场贡献小的可怜，国民政府腐败专制。史、高一一致认为，国共两党不能携手抗日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不民主，建议美国以停止援助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彻底改革，整肃贪污舞弊，与共产党联合。接受史迪威、高斯等人的贬蒋报告，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所言的国民政府财政枯竭是想勒索美国的物资和金钱，于是一再拒绝蒋介石增加援助的请求，反复以停止物资援助施压，迫蒋介石如同下属一样服从自己的决定。

卡尔逊、史迪威、高斯、罗斯福等人的上述看法代表着美国左倾思潮和美国人中国的肤浅认识。史迪威指责的中国私家兵制是事实。不过，中国的私家兵制积习久远，短期无法解决。蒋介石同意史迪威关于军制应改革的意见，承认在政府和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贪污腐败问题，但强调，整肃贪污也需要具备条件，在长期抗战导致经济崩溃，财政枯竭时谈整肃贪污过于天真。史迪威和美国民主党政府不了解，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想解决私家军问题，但没有钱去解决。经过数年抗战，重庆物价上涨数百倍，遍地灾民，政府发不出军饷，被迫让军队自行解决吃穿，于是才有部分美国援助物资卖到黑市，甚至卖给日本人的事发生。在国民政府财政枯竭的情况下，美国民主党政府拒绝出手帮助国民政府渡过难关，动辄以停止援助施压，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解决贪污，解决私家军制等等。史迪威对中国面临的最严重

的问题视而不见，处处牵制蒋介石，甚至在国民党高层推动倒蒋运动，企图策动政变，造成蒋介石指挥不灵，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抗战。

在史迪威、高斯的推动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 (JOHN P. DAVIES)和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 (JOHN SERVICE) 在 1943 年分别建议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以为向中共提供军火作准备。戴维斯在报告中称，中共军队是纪律严明，富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而华北也正是未来苏联参战时苏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地区，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可以搜集军事情报、判断苏联的意图，或许还可以消除俄国对中共的影响力。谢伟思在报告中称：中共实际上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实行的是温和的土地改革，中共强烈渴望民主，美国应将两党制民主模式移植到中国，派遣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延安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进而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戴、谢的报告得到高斯大使赞赏。[6]

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为此决定加入英美的反法西斯同盟，解散与反法西斯同盟相冲突的共产国际。1943 年 6 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至此，以巨额金钱，军火操纵中国走向二十多年的共产国际走入了历史。共产国际的解散让毛泽东感到被遗弃，感到再被蒋介石围剿的威胁。中共中央赶紧声明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蒋介石通过在重庆的林彪、周恩来向毛泽东传话说，中共要获合法地位必须放弃边区政府，军队听从国民政府调遣，要求中共于 8 月前作出答覆。同时，蒋介石将包围陕北的国军由 14 个师增至 21 个师，维持对延安的军事压力。除听命于中共的民盟等外围组织外，全国各界一致呼吁中共取消边区，以实际行动履行服从国民政府，参加抗战的承诺。这时，罗斯福接受史迪威和高斯的建议，以停止援助施压，迫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及与中共展开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蒋介石不同意美国与准备武力推翻政府的中共建立关系，但为了继续获得美国援助只好屈从罗斯福的要求，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宣传部长王世杰与中共代表陕、甘、

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开始会谈。美国的援助意向让毛泽东感到了精神慰藉。他再次指示拒绝向国民政府交出军队指挥权。利用美蒋摩擦的有利形势，中共在谈判中增加了共军扩编为十六个师及分享美国援助物资等要求。中共在军权、地盘不容国民党染指的立场使重庆谈判破裂。毛泽东命周恩来、林彪返回延安，同时决定投美国人所好，打民主牌，指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量刊登鼓吹民主的社论、文章。

1944年6月，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败的形势下，罗斯福不顾蒋介石反对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来华敦促蒋介石与中共改善关系，明确要求美军观察团前往延安。为了美援，蒋介石再次妥协，无奈地同意美国与延安建立关系。同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华莱士先生》的社论，盛赞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表示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7] 毛泽东在延安向前来采访的爱泼斯坦、哈里逊·福尔曼等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并未为实现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而努力，事实上我们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林肯在你们的南北战争时全力争取的事情，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日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至于政府，我们信仰并实行民主政治，我们正运用‘三三制’来限制任何可能的独裁，同样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不大相同。”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庆祝美国独立节的社论，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说：“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和其它民主势力。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什么叫同伴，如今日之美英也。……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8]

7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交军队指挥全权予史迪威及立即与中共达成妥协，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居高临下地通知美国将派观察组

赴延安，及准备向中共提供援助。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将前线作战部队交史迪威指挥，但要求先将史迪威所掌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交予中国政府。对于美国要求必须与中共达成妥协，蒋介石将隐瞒了几年的实情通报美国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以武力反对中央政府，拒绝兑现‘服从中央军令’的承诺，与日军夹攻国军，这是不能容忍的”，婉转地指出美国援助武力反政府的中共，在延安设立机构是对国民政府的最大不信任。与史迪威一样，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指责中共是为保存实力及勒索美国援助物资，坚持派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到延安，与中共建立半官方关系。

为接待美国观察组，《新华日报》发表了《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论英美的民主精神》、《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独立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纪念杰斐逊先生》、《真实的民主战士》等文章迎合美国民主党政政府。在美军第二批观察组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将《解放日报》8月15日社论标题由《欢迎美军观察组》改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并在其中称：“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住进延安窑洞后极为兴奋，感到是到了理想国。观察组中的外交官员，最早积极建议美国政府援助中共的迫不及待地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共崇尚美国的民主，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共想对日作战，是蒋介石从中作梗不让中共抗日，中共军队愿意接受史迪威的指挥，只有美国人能够迫使蒋介石妥协才能够避免中国的内战。毛泽东表示希望有机会访美，询问美国

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在发表亲美言论之外，毛泽东指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推出了一批鼓吹民主的文章。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自由》、《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天赋人权不可侵犯》、《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权》、《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等等。

百余美国观察组成员在延安考察后再分赴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考察。中共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的民主言论和中共报刊的亲美文章让他们极为受用。他们在两年中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是一边倒的亲共声音。其中谢伟思在报告中写道：“美国拒绝援助国民党以外的任何集团的做法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国内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可能爆发的灾害性冲突会加速到来”，“给中共援助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向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人可以成为美国的盟军”。他赞美延安和中共说：“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中共领导人年轻而精力充沛，知识、兴趣和阅历丰富，具有毋庸置疑的坚强信念，善于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他们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

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延安实行的‘三三制’、选举程序、民众之参与政治进程称得上是民主制度，那里井然有序，具有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军队士气很高，没有厌战情绪。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他否定中共受苏联领导说：“1944年夏有三名俄国人在延安：两人是塔斯社记者，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延安没有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9] 观察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援助中共有利于促进和平局面和防止中国内战，观察组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减少或停止“援蒋”。天真美国人不会想到，中共对日避战，打击国军，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靠种贩鸦片维持着延安财政，高层们集中在延安开了几年的会，响应“大民主”号召向党提意见的王实味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正被秘密关押，遭受着残酷折磨，很多人被逼得自杀。美军观察组不会想到，他们来延安时，三五九旅奉命将他们可能经过道路两旁的罌粟铲除，以掩盖种植毒品的真相。

[10]

斯大林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比美军观察组更了解延安。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领导听到蒋军在河南和湖南战败的消息非常高兴。这是上天赐给毛泽东的一份礼物。他与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加。他未来的内战对手正在被削弱。”“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

几十个打中国的师。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方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

的实质。”“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新四军总部的报告清楚证实，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这份电报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里。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毛称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冈村宁次大将总部。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主持人陈公博在一年后披露的情况与弗拉基米诺夫所言互相印证。陈写道：“去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11] 蒋介石在日记中斥中共道：“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12]

谢伟思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们想不到延安的另一面是因为天真，而史迪威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不是想不到，他们有大量关于延安另一面的报道但拒绝接受，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美国民主党人亲共不仅仅是因为受了斯诺夫妇、斯坦恩等左派记者的影响，还因为民主党在主张的强势政府、国家主义等方面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相通。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中，

德国和美国的民众都渴望强势领袖，建立强大德意志或超级美利坚。迎合这样的民意，承诺建立强大国家的领袖上台，在德国是希特勒，在美国是罗斯福。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通过高税收（个人税率最高达 91%，企业税率达 90%）强制进行财富二次分配，推行高福利的平等主义。如果不是最高法院裁决“违宪”，他甚至要把钢铁厂也收归国有。大战中对立的美国、德国两政府理念相似，都主张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主导人类生活。美国左派政府主张政府主导社会，剥夺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政策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13] 是“通向奴役之路”。马克思主义不仅强烈影响了俄国，也影响了欧美。自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工会、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都以苏联为理想国。罗斯福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左翼共产主义力量的支持下上台，在竞选中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美国大选前通过专门从事苏美贸易的阿姆外贸集团公司汇巨款给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人物，未来总统助手人选及美国各部委员会负责军工技术产品审批事项的官员。巨额中的相当部分最终到了罗斯福的儿子手中。[14] 当选总统后，罗斯福立即承认苏联，实行类似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政”，在二战中强力支持苏联，倾向终身执政（罗斯福死在第四届总统任上后，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一次”，意在防止罗斯福式专权重演）。希特勒和纳粹的邪恶众所周知，但罗斯福的新政带给美国的灾难则少为人知。因为美国左派长期主导着意识形态领域，将罗斯福宣传成了解决 1930 代大萧条的新政英雄。这种左派宣传其实是神话。罗斯福当选总统前一年（1931），美国失业率是 16%，罗斯福执政两届八年的 1939 年，美国失业率是 17%；罗斯福当选前的 1929 年，私人投资占美国 GDP 的 16%，罗斯福去世前的 1941 年，这一比率才恢复到 14%。1929 年美国的最高税率是 24%，罗斯福上台后把税率提升至 79%，扼杀了私人投资。“新政”的主要作为是通过高税收把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使政府权力疯狂扩张。因此，戈德堡在书中称罗斯福为“准独裁者”（QUASI-DICTATOR）。美国经济学者罗姆尔（CHRISTINA ROMER）指出，在大萧条之前的四十三年间，美国的经济

衰退平均长度只有十个月，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国家干预使经济危机延续十年之久。只是由于二战全面爆发后美国成为盟国军工生产基地，刺激就业增加才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左派宣传的“罗斯福新政”不仅无助解决经济危机，反而阻碍了经济复苏，使美国走上了“大政府”之路。[15] 由于政府专权思想与共产主义相通，美国民主党强烈亲共，希望中共上台，建立社会主义政府。这是史迪威事件、中美摩擦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在美国民主党当政期间被赤化为共产国家的主要原因。

豫湘桂溃败

中途岛战役后，美军切断了日本到南洋的海上交通线。为摆脱困境，日本决定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对日本本土及东海海上交通的轰炸威胁。1944年1月，东京大本营调关东军部队入关，命令中国派遣军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占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要地。中国派遣军奉命制定出由北向南进攻的“一号作战”计划。1944年4月18日，冈村宁次指挥六万日军从牟县一带渡过黄河，分三路向豫中国军进攻，开始了目标为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扫除盟军在华南的空军基地的“一号作战”。虚弱的国军一触即溃，四十天丢了河南，损失了三十万大军。白修德报道国军溃败情况写道：“4月，约六万日军进攻河南，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国军的防线。整个作战期间国军的统帅汤恩伯均不在他的指挥部。日军一支500人的纵队就能夺取数千国军防守的关隘。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百姓的军队且多年懒散，中国军队的第十二军和第十三军在败退时甚至自相残杀。在战区中心洛阳，司令部里一片混乱，河南军队掌握的七八百辆军用卡车大部分被军官用来运送私人财产、家属到安全的后方西安。军官们甚至强征农民的耕牛充作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征耕牛是农民无法忍受的。在军队败退的时候，农民认为等到了报仇的机会，他们以猎枪、大刀和铁耙为武器，开始将单兵缴械，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整个河南

的农村处于暴动的状态。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约五万国军军队被自己的同胞缴械。”[16]

河南失陷后，蒋介石将蒋鼎文、汤恩伯撤职，派陈诚指挥第一战区。5月底，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湘北继续进攻。几个月前，蒋介石刚刚与美英领导人在开罗举行峰会，此时华中溃败严重影响了他的世界反法西斯领袖形象。6月3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死守湖南，谓“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良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治，并由该长官全权处理，彻底执行！”。根据蒋令，薛命令张德能第四军死守长沙，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死守浏阳，鲁道源第五十八军死守醴陵，方先觉第十军死守衡阳。薛岳有心让老同事张发奎侄子为军长的第四军打出荣誉。不料事与愿违。日军迅速占领了长沙和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重创了第四军。率残部突围后，张德能被蒋介石将枪决。8月8日，率军坚守衡阳四十多天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日军允诺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的条件下放弃无望抵抗，率军向日军投降。不过，方先觉逃返重庆后不得不否认投降，申明是接受日军交涉结束抵抗。

9月，日军沿湘桂铁路继续向南席卷。蒋介石再次要求史迪威从缅甸战场抽调远征军回国支援正面战场，史迪威再次拒绝，要求蒋调监视中共的胡宗南部南支援，双方互不买账，完全对立。史的背后是罗斯福对蒋的鄙视。受毛泽东的亲美言论和观察组报告的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更加厌恶，以命令口气要求蒋将中国战场指挥权交予史迪威。蒋介石忍无可忍，要求撤换史迪威。10月，罗斯福派魏德迈来华接替史迪威。魏到重庆后发现，史迪威对交接未留下任何交代。11月，横山勇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长驱直入，攻陷桂林、柳州，逼近贵阳，危及重庆。12月，日军占领了南宁，日军前锋部队沿黔桂公路追击，一直追到贵阳附近的独山。一时，西南大后方人心惶惶，英国、苏联大使馆开始准备撤侨。在危急形势下，蒋介石派汤恩伯指挥

贵州防御，抽调西北防共国军南下贵州，魏德迈改变史迪威对正面战场袖手旁观作法，从缅甸战场调回两个远征军精锐师驰援贵阳，批准陈纳德实施被史迪威搁置了四个月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计划。蒋、魏的协调配合扭转了局面，陈纳德调全部可动用的空军战力对日军进攻华南的后勤中心武汉实施了摧毁性轰炸，给日军华南部队的补给线以重大打击。

日军的补给线受创，先锋部队在贫瘠的贵州无法就地取得足够的粮食，原准备夏季作战的士兵在深秋仍着单衣，饥寒交迫无力继续进攻，只好从贵州撤军。至此，湘桂作战（日军“一号作战”）结束。历时八个月的豫湘桂作战（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损失兵力 50 多万，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 2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146 个城市，36 个飞机场及 7 个美军空军基地。对日本而言，“一号作战”虽实现了“打通大陆”的目标，占领了广阔地域，但结果只具宣传价值，从战略上讲是愚蠢的作战。因为日军并无足够的火车、汽车利用陆路交通线，计划中的“打通往南洋交通线”没有军事价值。事实上，日军占领的漫长的陆路交通线从未起到运输作用。

关于河南大溃败的原因，首先是饥荒与民怨。经过几年抗战，国民政府财政枯竭，不得不靠印钞票和增加苛捐杂税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国统区物价成百倍地增长，原本已经难以为继的工商企业大批破产，税源进一步枯竭。战争和经济崩溃之外，国家再遭天灾打击。从 1941 年开始，河南连年旱灾，收成大减，部分地方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1943 年春，旱灾蝗灾蔓延河南全省，夏秋两季基本绝收，灾民上千万。河南几十万国军的军费和军需供应断绝，军费少到不吃空额就饿死军人的地步，[17] 只得搜刮民众生存，致使民心丧失，军心动摇，作战能力基本丧失。在国民政府和军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美国左派记者们利用饥荒掀起了声讨国民政府的浪潮，取得了斯诺一样的宣传效果。美国左派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之“河南有两害：黄河和汤恩伯”说法源于中共的宣传。河南人民

叫土匪为“老汤”（蹙匠之蹙的谐音），长期流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说法本与汤恩伯及其部队无关。[18] 抗战中，汤恩伯坚决拒绝中共向河南扩张，为中共痛恨，文胆陈伯达率先将四荒中的汤解释指汤恩伯，大力宣传汤部军纪败坏，汤恩伯贪污腐化。其实，财政崩溃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成立了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制定了六项救灾办法，包括将 1942 年度的粮食征购由 500 万石减为 280 万石，拨发三次急赈款共三千四百万元等等。国民政府在陇海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运灾民，总经费 800 万元，救济灾民 56 万。[19]

大溃败的另一原因是中共武装趁机对国军追杀、缴械。战后国民政府承认：“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20] 白修德的老师，左派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书中写道：“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用农具、匕首和土炮猛攻他们，解除了五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消灭，甚至活埋了国军士兵” [21] 费只说了其一。第一战区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将军指出了其二：“暴民对抗日国军缴械者不是农民，也不是用猎枪，小刀和铁耙，而是由义和拳转变而来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在豫、鲁、陕三省有数十万人马，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新式武器。”[22] 这“大批新式武器”的背后是中共在河南等地的赤化行动。北伐战争期间，苏俄策动中国农民运动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区委尽一切力量争取红枪会。1926 年冬和 1927 年春，中共派杨靖宇等一批党员将红枪会收编为“农民协会武装”。[23] 例如，河南确山县以红枪会员为主农民协会武装攻占县城，建立河南第一个中共县政权。抗战期间，进入河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继续发展利用红枪会武装扩充地盘，[24] 彭雪枫还与夏邑县红枪会首领结拜兄弟。[25] 豫省国军溃败时，

红枪会趁机对国军大举攻击、缴械。《登封县志》披露：“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颍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溃败原因之三是华北日军与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达成了停战妥协。有些停战默契，日军无侧翼被攻之忧，敢于抽调华北兵力全力对付国军，敢于孤军深入千里。而蒋介石却不敢抽调布防陕西监视防中共扩张的胡宗南部二十一个师。溃败原因之四是潜伏在军令部的共谍刘斐伪造命令，命国军“未奉上峰命令，不许移动”，帮助日军长驱直入、分割包围、逐个歼灭。[26] 溃败原因之五是史迪威拒绝援助正面战场。日军在豫中发动进攻时，蒋介石准备抽调在云南组建的赴缅远征军驰援华中，遭史迪威拒绝。史指责蒋有兵不用，在日军进攻时仍布署重兵防备中共的八路军。对此指责，蒋介石强调，若将防中共的胡宗南部撤走，八路军会立即吞并国军控制区。史迪威去职，魏德迈改变史对正面战场袖手旁观作法，调远征军支持正面战场，批准执行陈纳德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计划”，战场局面立即改观是史迪威对溃败负有责任的证明。溃败原因之六是史迪威倒蒋。史支持李济琛、龙云为首的反蒋势力密谋推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令国民党内人心、军心动摇，严重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在华中进攻之时指挥权威，加剧了国军的溃败。

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时大溃败并不奇怪。大战中中、英、苏均依靠美国的援助在坚持。根据美英约定的“重欧轻亚”方针，美国向盟军各国提供了 500 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一半提供给了英国；三分之一提供给了苏联，美国的援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帮助英、苏转入了反攻。美国的援助物资中只有不到 2% 提供给中国，而这些的援助也没有交到中国政府手中，而由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掌控用于了缅甸战场。中国获得援助很少，为援助付出的代价却极大。为了争取到美国援助，蒋介石一再屈服于罗斯福停止援助的威胁，按罗和史迪威的要求从中国正面战场抽调最精锐的八个军赴缅甸作战。可以说，史迪威在缅甸战场的军功是以中国正面战

场惨败为代价的。当日军逼近桂林，蒋介石亲自飞赴桂林指挥坚守时，史迪威下令美军撤离桂林，并在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应当做的是射杀蒋介石与何应钦，结束游戏”。

中国战场大溃败后，从未真正承认中国盟国地位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演讲中称美国给予了中国过分的援助。对于邱带有幸灾乐祸意味的指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回应：中国所获美国援助甚微，其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一星期之用。应当说，邱吉尔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惨败，英国战场能够坚持到胜利并非由于他指挥英明，意志坚定，而是由于美国的援助。中国开战时间最长，财力、军力底子最薄，经过几年与强敌作战，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枯竭的局面之下，除增发法币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外别无它法。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额从十几亿元增至千多亿，增加了 100 多倍。当时，国民政府仅运回美国印制的法币就占用了驼峰空运量每月达 150 吨，可见通货膨胀之严重。为应付中国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与解决军费问题，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在 1942 年 2 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 5 亿美元后，美国财政部指控中国政府提取的 2.4 亿元中有 8000 万美元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户。罗斯福根据这些指控拒绝再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严格限制对中国战场的援助。虽然美国政府后来在孔本人及各界的要求下通过查证否定了这项指控，但美国政府的指控摧毁了国民政府的声誉。罗斯福相信史迪威关于蒋介石在勒索美国援助准备打内战说法，相信中国最想抗日的是中共的宣传，一心想援助中共，希望看到蒋介石垮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曙光中惨败并不奇怪。

史迪威事件

中国战场的溃败与苏军白俄罗斯歼灭战、英美联军诺曼底登陆及缅甸反攻形成强烈反差，邱吉尔、罗斯福对中国战场愈加蔑视。1944 年 7 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印缅所有中美军队，包括中共的

部队，并通知美国将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物资以调动中共抗日积极性。蒋介石对罗斯福居高临下地要求他交权十分气愤，但考虑到依赖美援的现实，只好妥协，回电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希望另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派共和党人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少将为代表赴华协调蒋、史关系，并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作为史迪威将资助及指挥中共军队的准备。

9月，日军沿湘桂铁路向南席卷时，蒋介石再次要求史迪威从缅甸战场抽调远征军回国协助正面战场作战。史迪威再次拒绝蒋的要求，再向罗斯福状告蒋调远征军回国意在保全实力，待美国击败日本后与中共打内战。接受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驻延安观察组的建议，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三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全权交予史迪威。蒋介石通过高斯向罗表示，美国强迫国民政府无条件与中共妥协，必助中共坚持不承认中央政府，不服从军令，美国应首先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服从中央军令。

9月18日，罗斯福不顾蒋介石的元首身份，对蒋介石发出命令口气的电报，不仅拒绝蒋介石提出的调远征军回国，将美国援华物资调配权交中国政府等要求，并将蒋新提出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应首先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等要求一概拒绝，命令蒋立即授史迪威以统率所有中国军队之全权，称“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战场”。赫尔利感到罗斯福以命令下属口气致电蒋介石不妥，试图阻止将电报给蒋介石，然而史迪威坚持亲自将电报交蒋介石，要看蒋介石阅电的难堪。蒋介石阅电报后不予答复，在日记中称罗态度恶劣、措词荒谬的电报是“平生最大之耻辱”。史迪威则给妻子写了一首诗以表达他痛快心情，称罗斯福的信如一团辣椒粉，呛得蒋介石眼热心虚，脸色铁青，颤抖失声。蒋介石决定不再忍受，于9月20日请纳尔逊转告说，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蔑视此电与美国民主立国历史相违，是美国传统精神的污点，申明“以下三事绝不接受商量：一、凡与三民主义不合

之事，二、有损害中国主权之事，三，有损害中国国格及我个人之人格之事。中国军民愿为美国之朋友，亦愿虚心学习，但绝不能为美国之奴隶”。

蒋介石“美国强迫国民政府无条件与中共妥协，必助中共坚持不承认中央政府，不服从军令”之言说对了。中共感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将被美国抛弃，以及即将获得美国援助，于9月21日声明说拒绝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政令”及“失败主义的军令”，“绝不容许其统一，欲谈军令政令统一，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史迪威则以行动继续帮助着中共，致电长期支持他倒蒋的上司，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再次声称蒋介石无意对日作战，已成为中国统一及国共合作抗日的主要障碍，若不强硬拒绝蒋的罢免主张，中国的作战潜力将一并消失。显然，史迪威打算接管国军的指挥全权后扶植中共推翻蒋介石，颠覆他痛恨的国民党政府。

9月25日，蒋介石请赫尔利向罗斯福转达，撤换史迪威，另派高明。2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我不反对美国军人来指挥中国军队，但我反对史迪威来指挥，我无法与其共事。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官，要求召回一个他无法信任的官员的权利毋庸置疑”。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在美国的孔祥熙停止谋求经济援助回国。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蒋介石表示：“如果接受罗斯福的建议，那就是接受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我们要作好美国撤销援助后在西部四省生存的准备”。他准备在决裂后公开罗斯福总统的侮慢电报，让全世界及美国人民了解罗斯福的政治作风。负责调和蒋、史冲突的赫尔利大使向罗斯福表示，蒋史之间已无可调和，蒋介石已经作好了与美国决裂的准备，他本人支持蒋介石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进言，史迪威的错误是想压服一个领导贫弱国家与强敌苦战七年的领袖。蒋介石并非不肯合作，中国问题可望解决。如果支持史迪威，美国将失去蒋介石与中国，战争势必延长，增加美国的人力物力的损失。他建议依蒋的提议，派一美国军官在蒋的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罗斯福于10月5日复电蒋介石：拟

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及管理租借物资之权，但仍保留统率中国在缅甸军队及云南远征军之权，派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10月9日，蒋介石复电拒绝了史迪威继续担任中国战区指挥官，重申史迪威只关心缅甸战场而漠视中国正面战场，造成整个战区局面重大失败。10月19日，正在缅甸的史迪威接到罗斯福召他回国的命令。10月21日，史迪威从重庆离华返美，蒋介石大度地前来送行，表示遗憾。

史迪威回到美国后，《纽约时报》刊文批评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决定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27]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离任时建议美国退出中国政局，听任国民政府垮台。[28] 美国作家乔纳森评价史迪威在华的所作所为说：“他促成了美国在中国人最需要帮助时拒施援手”。[29] 应当说，促成对中国拒施援手的不只是史迪威，也不只是谢伟思、高斯、马歇尔、罗斯福等人。美国人普遍向往延安窑洞的心态决定了美国政府亲共、打压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根据亲共民意，民主党政府慷慨扶持苏俄渡过难关，在驱除法西斯轴心国之狼的同时养壮了共产主义轴心国之虎。

史迪威离华后，美国人的延安梦在继续。接替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一上任就飞往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与中共草签了成立中国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内容包括实行广泛的民主自由、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多党派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与国民政府分享美国援助的物资、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等等。赫的协议与史迪威、高斯的主张没有区别，只压迫国民政府与中共联合，而没有蒋介石一再要求的服从国民政府军令内容，更没有要求中共放弃推翻国民政府宗旨的内容。赫尔利在访问延安后的文章中写道：“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事实上，他们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30] 对于赫尔利带回重庆的《五点协议》，蒋介石拒绝说，中共从未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宗

旨，国民政府不可能在中共交出军队、放弃武装颠覆政府的宗旨之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更谈不上分享军事装备。

“史迪威事件”、“联合政府计划”是美国人“延安梦”的产物。这个梦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催生了战后共产主义阵营，也决定了战后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在战后中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在面对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时，美国人从“延安梦”中醒来，共和党人发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指责民主党导致了中国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发起了清除美国共产势力的“麦卡锡运动”。这时，美国人不得不为长期亲共付出代价，在欧洲应付柏林危机，在全世界应付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被迫出兵到朝鲜与共产主义阵营开战，然后再与共产主义阵营进行几十年的冷战。

魏德迈将军是美国亲共潮流中拒绝共产主义的一个例外。他在调查中国战场的情况后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共产党的军队没有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参加作战”。“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 1944 年仍在苦撑。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 1941 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蒋一直是四面作战：对抗日本，对抗以中共为代表的苏俄，对抗以前军阀或半独立省份文武官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美国人拒绝承认蒋介石所面临的困难，对中国战后的命运毫不关心。” [31]

雅尔塔密约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欧洲战场，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转入反攻，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在太平洋

战场，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开始反攻；在亚洲战场，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展开反攻。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美英决定召开盟国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最后赢得战争及战后利益格局。在准备召开盟国高峰会议时，宋美龄在美国发表了后被誉为“征服美国”的系列演说，激起了一股亲华和支持中国抗战的热潮。因应亲华潮，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了参加盟军峰会的邀请。邱吉尔和斯大林反对邀请蒋介石参加峰会。邱吉尔从来鄙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认为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缺乏贡献，蒋介石不够资格参加峰会。斯大林还不想撕毁与日本的中立协定与中国领导人聚首峰会，提出在德黑兰开会，理由是需要与苏军总参谋部保持联系，而连接莫斯科的电话电报线最远通到德黑兰。罗斯福迁就斯大林，决定在德黑兰举行“三巨头”会议，并在“三巨头”会议前在开罗先举行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峰会。11月，美英中三国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了没有实质意义的峰会。会上，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再借十亿美元以挽救经济。这时，苏联对德开战只两年多，英国四年，而中国已经抗战六年多，经济崩溃，政府财政枯竭，付不出军饷，被迫默许军队搜刮百姓生存。罗斯福相信史迪威报告的“蒋介石在勒索美国援助”之说，以国会不会批准说法拒绝借款请求。

开罗会议结束后次日，罗斯福、丘吉尔飞到了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实质性会谈，商讨战后利益分配。这时，美国的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虽然进展顺利，但能否应用不得而知。罗斯福担心如果原子弹不能使用，日本“全员玉碎”坚决抵抗，美国会因牺牲过大而放弃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目标。他原打算以军火支持中国军队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但在史迪威、高斯等人贬低国民政府的报告影响下决定谋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他知道斯大林出兵对日开战的要价是夺回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利益，决定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此行，他带着出卖东欧与中国的礼单去讨好斯大林，以达到让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目的。邱吉尔只关心他的“地中海计划”，准备与斯大林划分东西方世界在欧洲的势

力范围。会谈中，美英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征求斯大林同意后才发表，显示出此前开罗会议的作秀性质。

德黑兰会议中，罗斯福、邱吉尔在与斯大林进行一系列肮脏交易：罗、邱同意苏联包办东线作战，准备将东欧奉送为苏联势力范围；三人背着波兰流亡政府擅自画分了波兰东部的国境，将波兰战前领土的一半纳入了苏联版图；罗抛弃美国维护各国领土主权的原则，接受斯大林提出的对日作战条件，默认库页岛、千岛群岛和中国的东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实际背弃刚刚拟定的《开罗宣言》中“战后日本必须归还给中国”条文，将中 东北三省秘密送为苏联势力范围。

1944 年 9 月，罗斯福发出“侮慢”电报，以命令的口气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蒋介石强硬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在同盟关系破裂边缘，罗斯福决定退让，召回史迪威，同时决定答应斯大林在德黑兰提出的所有条件。10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赴苏与斯大林面谈，“三巨头”的再次峰会作准备。二人背着东欧各国，商定战后按百分比瓜分欧洲，将东欧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1945 年 2 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罗斯福、丘吉尔再次迁就斯大林，远赴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与斯大林举行会议，讨论对纳粹德国的最后军事行动、处置德国的原则、迫日本尽快投降以及战后世界格局等问题。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单独密谈。这时罗斯福已经病入膏肓，没有能力与斯大林讨价还价，完全被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会议结束时，三国领导人背着中国签订了由苏俄执笔起草的，交易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密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AGREEMENT REGARDING ENTRY OF SOVIET UNION THE WAR AGAINST JAPAN）。雅尔塔密约的主要内容为：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在战后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前途，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苏联恢复帝俄在 1904 年的日俄战争失去的如下权利：南库页岛（南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大连、旅顺港的租借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中东路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

共同经营，优先保障苏联的利益。雅尔塔密约内容是沙俄百年来向东扩张，吞并满蒙的计划的继续，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后放弃帝俄在华权利与租借地的《对华宣言》的欺骗性，也证明苏俄二十多年来向中国投入金钱、军火，开展的所谓反帝运动，所谓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等等均是俄国侵华扩张战略的一部分。《雅尔塔协定》还是美国左派政府长期亲共政策的结出的恶果，是美国的一大污点。它违背美国的立国精神，违背美国长期坚持的“门户开放”原则，违背《大西洋宪章》中“未经有关人民同意，不得改变领土”的原则，更是对这次会上确定的联合国基本原则的背叛。为了报复蒋介石驱逐史迪威，罗斯福背着中国政府将中国的领土主权出卖给斯大林。虽然密约中附加了“须征求蒋介石主席之同意”的条文，但罗斯福和斯大林均清楚中国政府不会同意。罗斯福肯定知道，在苏联红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后，只有美国才能迫使苏联从东北撤军。而他准备接受苏联吞并中国东北，将密约锁在保险柜里，根本不去“征求蒋主席之同意”。雅尔塔会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雅尔塔密约》传闻向罗斯福当面求证密约内容。罗斯福无法隐瞒，只好向赫出示密约。赫阅后指出，密约对战后世界格局和美国将产生非常不利的长远影响。半个月后，罗斯福去世，斯大林成了与罗密约的唯一解释人。作为头号强国，美国有实力迫使斯大林修改密约，但继任的杜鲁门继续奉行亲共政策，继续讨好斯大林，无意修改密约。这时的中国比二十多年前巴黎和会时更加屈辱。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出席，而雅尔塔会议却是几个外国人背着中国人交易了中国主权，而中国无力拒绝他们的安排。

《雅尔塔协定》的灾难性超过了二战前的《慕尼黑协定》。二战中，美国向苏联提供了 160 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其中包括飞机 15000 架、坦克及装甲车 22800 辆、大量其它军火及汽油、军服、粮食等战略物资，帮助苏联顶住了纳粹德国的进攻，势力壮大。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有能力不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落入苏联之手，但罗斯福、邱吉尔一味讨好斯大林，通过密约将东欧、满蒙送给斯大林统治，让斯大林去摘取对日作战的果实，帮助斯大林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吞并了东欧。二战后，西方世界每年庆祝

反法西斯胜利。其实，这样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因为，美英奉行亲共政策，在战胜一个破坏和平的邪恶集团的同时催生了另一个对世界和平、进步更具破坏性邪恶集团——共产主义阵营，将世界带入了长期冷战及核对抗的格局，这样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是人类正义和进步的胜利。

罗斯福、邱吉尔对斯大林的讨好还体现在联合国的设计上。讨论成立联合国事宜时，罗、邱主动妥协，同意了斯大林“一票否决”的要求，接受了只要苏联不同意就不能决议与作为的设计，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没有主持正义的能力机构。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得知苏联有“否决权”后对联合国的设计极为失望，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致死都反对这样的联合国宪章。胡适预见的祸害后来成为现实，联合国的历史成了苏共、中共运用否决权数百次践踏正义的历史。

《雅尔塔密约》对中国的伤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它决定了蒙古脱离中国而去，决定了苏联占领中国东北，决定了国民政府被推翻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纳入共产阵营的走向。《雅尔塔密约》的祸害很快显现，带来的灾难超乎任何人的想象：苏军占领、暴虐和掠夺了中国东北；苏联扶植中共挑起了国共战争，赤化了中国，催生了祸害中国最为惨烈的毛政权时代。当共产主义阵营挑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美国不得不为雅尔塔会议上媚共付出代价，派军队赴朝鲜，越南与共产主义阵营开战。六十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在拉脱维亚发表的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演讲中承认，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犯了勾结苏联、瓜分世界的历史错误，承认罗斯福签署的《雅尔塔协定》“承袭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不义传统”，导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统治东欧”。他誓言要“埋葬雅尔塔遗产”、不允许牺牲小国弱国的事情重演。拉脱维亚总统弗赖贝加（**VAIRAVIKE-FREIBERGA**）接着说：希特勒统治结束却是斯大林专制的开始。布什总统没有提《雅尔塔协定》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相信终有一天，另一位美国总统会就《雅尔塔密约》向中国人民道歉。

第 33 章 斯大林布署推翻国民政府

斯大林要满蒙

立国以来，沙俄不断向西，向南扩张版图，在十八世纪扩张到贝加尔湖一线，在十九世纪提出“黄俄罗斯计划”，计划将版图向南扩张至中国的长城，以新疆乔戈里峰到海参崴的直线为两国边界。苏维埃政权继承了沙俄的扩张计划，将新疆、蒙古和满洲视为其势力范围。1921 年，苏俄在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策动成立了“土瓦人民共和国”。在向新疆扩张方面，苏俄于 1924 年以助盛世才进攻马仲英为借口派红军侵入新疆，于 1933 年在新疆策动了政变，扶持盛世才成为新疆督办，随后派中共干部渗透到新疆的政府和军队，以“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 500 万金卢布借款合同，加紧对新疆经济侵略。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与中共联手，准备将新疆并入苏联。斯大林虽霸占新疆欲望强烈，但从战略考虑以扩大中日战事，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战，化解日军攻苏的威胁为主要目标，指示暂停策动新疆分离，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军火支持抗战。1940 年，苏联与盛世才当局签订了为期五十年的“租借新疆锡矿条约”，以开采锡矿名义攫取了对新疆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的控制权与武装守卫权。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无力顾及新疆，中断了对盛世才的财政和军事扶持。盛见苏联弱势，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将苏联顾问、专家逐离新疆，捕杀了策动新疆独立的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化名周彬，新疆民政厅长）、林基路等人。1943 年，斯大林因担心给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提供借口，决定在新疆退却，下令驻哈密红军及苏联在新疆之飞机制造厂、矿厂、银矿考察团撤出新疆。在对德战争转入反攻后，苏联重新在新疆扩张，相继在北疆、南疆策动三区暴动（三区革命），扶植成立

了艾力汗·吐烈成为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造成伊犁郊县的数万汉族人被屠杀，数千汉族妇女被奸污。1944年，苏联胁迫“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成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现名“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由于美国表态支持国民政府对新疆的主权，[1] 斯大林知道新疆不属《雅尔塔密约》中规定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不会允许他吞并新疆，于是决定以停止策动“新疆三区革命”作为谈判筹码换取国民党政府同意蒙古独立。

1945年6月，美国将出卖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内容通知了蒋介石。蒋在日记中写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如此，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2] 蒋介石无力否决美苏的密约，只好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苏谈判。7月初，斯大林亲自出马，率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宋、王、蒋展开谈判。斯大林表示，苏联需要建立一个西起新疆、中经外蒙、东北、东达千岛群岛的“安全带”以确保安全。宋子文强调中国对蒙古的主权，指出《雅尔塔协议》规定维持外蒙现状。斯大林说：“雅尔塔协议是莫洛托夫所起草的，其涵义即为承认外蒙独立，罗斯福已同意。”这时罗斯福已作古，密谋情况凭斯大林随意解释。要求蒙古独立之外，斯大林还要求中国承认苏联继承中东路沿线、旅顺和大连港等沙俄在华利益。宋子文提出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作为妥协，斯大林拒绝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宋力争说：“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不应表述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中长铁路（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所有权应归中国，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无奈弱国外交并无多少谈判余地，中国政府无力抗拒斯大林的强权压迫。

苏联出兵东北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决定发布促日投降公告，邀请中国加入公告。蒋介石同意加入，但要求公告署名在丘吉尔之前。蒋介石的要求理所当然，美国作为战胜日本的首要国家理应署名在前，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理应署名在英国之前。杜鲁门同意了蒋的要求。斯大林以苏联尚未废除与日本缔结的中立条约而不加入公告。

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共同履行开罗宣言，致力于战胜日本、根除军国主义、在世界上建立永久和平体系的长远的目标（第六条）；为此现时的日本政府必须被取缔（第七条），日本的主权将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其它由战胜国决定的小岛（第八条），日本军队必须被完全解除武装（第九条）；战胜国不打算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日本国家，但战犯必须严惩，新的日本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保证言论、思想和宗教的自由和尊重人权（第十条），日本的民用工业可以保留，能建立侵略力量的工业必须被消灭；日本依然可以参加世界贸易（第十一条），在日本达到上述条件后，占领军将会撤出日本（第十二条）；公告最后呼吁日本政府命令其军队无条件投降（第十三条）。

收听《波茨坦公告》广播后，铃木首相立即召开最高指导会议讨论应对。铃木主张接受公告，承认战败，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智郎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军部三巨头）反对接受公告，主张不公布《波茨坦公告》以维持日军决战士气，如果公布应附上表示坚决反对声明。文武意见分歧，会议决定由天皇“圣断”。天皇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以“国体维持”为条件。由于日本天皇没有立即决断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迁就军方立场，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拒绝《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得知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后，斯大林意识到美国已经能够独自屈服日本，苏联对日宣战已不重要，赶紧签署了向中国东北日军发动进攻的命令。8月8日，苏联撕毁与日本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由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读了对日宣战书。佐藤回到大使馆时发现电话线已被破坏，无法向国内通报。其实，他打电话回国也没有用，莫洛托夫宣读战书二十分钟后，配有3万门火炮、5000辆坦克、3500架飞机的150万苏联红军于8月9日零时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关东军主力早已被调到太平洋战场，战略物资储备也被调回国内准备本土决战，新扩编的关东军包括大批拼凑的满洲日侨和公职人员，战斗力大打折扣。在战争败局已定形势下，关东军没有坚决抵抗。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停战诏书，8月16日晚，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会议辩论战或降。军官们有作战之心，但清楚继续作战已无意义，决定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苏军投降命令。几天内，苏军控制了东北全境。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关东军积极扩军准备突袭苏联，向蒙古和西伯利亚扩张。苏联因大饥荒而无力拒日，斯大林倍感关东军的威胁，采取推动中日全面开战的办法化解日军北攻威胁，具体办法包括：策动淞沪战事、指示中共红军退到西北帮助国民政府解除首都威胁、为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发动救亡运动、促对日开战运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蒋介石为抗战领袖、策动芦沟桥事变，二次淞沪战事等等。成功引爆中日全面战争后，关东军苦心准备的军备没有用于攻苏，而被调去用于了太平洋战争，斯大林实现了瓦解关东军北攻威胁的目标。当关东军的军备被太平洋战争掏空，美国击败日本后，斯大林以“六天战争”消灭了关东军，恢复了日俄战争前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还超出了雅尔塔密约和中苏条约规定的势力范围，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实现了俄国百年的战略目标。莫斯科在解释出兵中国东北理由的《告人民书》中说得明白：“苏联同日本人的账须从四十年前的日俄战争算起。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让俄国丧失了远东的利益，夺走了俄国的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把俄国与远东隔开了。日俄战争的失败是俄国痛

苦的回憶，給俄羅斯留下了污點。為洗刷這一污點，我們等了四十年。現在，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不再是日本進攻俄國的跳板，而是蘇聯通向大洋的紐帶，是保衛我國防止日本侵略的基地。”[3] 出兵之前，蘇軍高層特到日俄戰爭俄軍陣亡將士墓前誓師，要一雪當年戰敗之耻，顯示蘇聯出兵東北與當年沙俄出兵東北的前後關聯。蘇軍不光要恢復沙俄在華權益和勢力範圍，還要對日軍展開瘋狂報復。亲历者寫道：“蘇軍在進攻中大批殺害在滿的日本開拓團移民，而且是為了殺人而殺人！我見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屍體，堆積如山……數萬日本人在蘇聯紅軍進攻中國滿洲的時遇害。”[4]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外蒙獨立

1945年8月，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在蘇軍席卷中國東北的背景下與斯大林展開了第二輪會談。會談中，斯大林以帝國主義口吻威脅說：中國除承認外蒙獨立外別無選擇，如果中國政府再不批准協議，蘇聯會將要求加碼，將內蒙也納入公決獨立的範圍。無力拒絕美蘇密約的國民政府在蘇聯已經將外蒙古獨立出中國，通過策動“三區革命”控制了新疆和大軍佔領東北全境的現實情況下也只能默認蒙古分離，退而盡量維護東北和新疆的主權。經過艱苦談判，宋子文與蘇方達成了妥協，以承認外蒙經全民公決投票獨立、兩國共同經營東北長春鐵路、宣布大連為自由港，對於長春鐵路直運蘇俄及由蘇俄直運出口之貨物免除關稅，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為海軍根據地等四項讓步換取了蘇聯方面的三項承諾：尊重中國東北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事務和不支持中共顛覆國民政府。蔣介石並不相信蘇聯會履行三項承諾，但在無力抵抗蘇聯壓迫的形勢下也只好批准談判結果。

8月14日，在日本宣布停戰的當天，外交部長王世杰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副本（條約須經雙方最高領導人簽署正本生效），《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及附屬文件。上述體現蘇聯要求的文件規定：蘇聯出兵東北，參加對日作戰；大連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的一半無償租與蘇聯，

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期限三十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三十年，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联人担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由苏联到旅顺、大连的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三十年；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独立与否；苏联政府承诺：同意给予中国的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全部给予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共的反政府活动；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尊重中国的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苏联军队于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开始从中国撤退，最多三个月完全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新疆的内政（不支持“三区革命”）；中国在收回香港之日收回庚子年被沙俄占领的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参崴。条约签署一个月后，苏军武力操纵公决投票，正式扶植蒙独立立国。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虽忍辱负重，但逃不脱签署不平等条约者的挨骂的命运。受命签约的王世杰因这一不平等条约在立法院受到严厉指责，被迫提出辞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体现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的不平等条约。在二战后所有列强均宣布废除与中国的平等条约和在华特权时，苏联却坚持继承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侵华利益，并要得更多，包括唐努乌梁海和新疆的一部分。与 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相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苏联实现了二十多年来与历届中国政府谈判没有实现目标——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重新攫取了宣言放弃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达到了沙俄百年追求的，让蒙古成为俄国远东安全圈一部分的目标。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的屈辱历程告诉人们，苏联十月革命后一再宣布的废除沙俄与中国的平等条约的宣言全部是谎言，苏俄发表对华宣言二十多年间，压迫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不是美英日，而是苏俄帝国主义，其间的所谓反帝运动全是服务苏俄帝国主义的运动。

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日，盟国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盟国受降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九盟国代表依次签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胡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指出，中国是中世纪国家，不可能战胜现代国家日本。抗战中，国民党宣传部门吹嘘出很多大捷，但国军实际没打过胜仗，即使1945年的“桂柳反攻”中也没有打过真正胜仗，收复广西龙州、南宁、柳州、桂林是因为日军撤退收缩防线。应当承认，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中国是跟着盟国取得了胜利。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近20万人，只占二战日军总死亡数的一成（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阵亡近200万人），而国军牺牲数百万官兵，包括205位将军和4000多位飞行员，海、空军基本全军覆没。英国、苏联得美国援助而反败为胜，中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援助，能够坚持到胜利已经很悲壮了。与国军惨烈损失相对照，中共军队贯彻洛川会议“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的方针，军队由西安事变时的数万发展成了抗战结束时的130万正规军队，200万民兵，占据了总人口1亿以上的16块根据地，成为八年全面抗战的赢家。事实证明了汪精卫在全面抗战之初指出的，长期抗战只能使苏联和中共获益。

根据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次日为胜利纪念日的国际惯例，国民政府政府在签署受降文件后宣布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国荣日），全国庆祝三天。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上将约德尔于5月7日代表德国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向盟军宣布投降并签署了投降书，5月8日被定为“欧洲胜利日”；5月8日，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在柏林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苏联宣布5月9日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然而，长期抗战胜利的国荣日庆祝昙花

一现。几个月后，国家陷入国共战争灾难，随着国民党战败，全国丧失了纪念抗战胜利的喜庆气氛。中共，禁止再提“国荣日”，指定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的 8 月 15 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应当指出，日本的停战诏书只宣布“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通篇没有“投降”二字，日本是在 9 月 2 日以签署投降书的方式宣布投降的。中共禁提“国荣日”是因为，9 月 2 日签署的投降书中写明“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受降方落款签署的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战后几十年，中共为掩盖在抗战中避战壮大的历史事实，淡化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致青年们不知道当年 9 月 3 日至 5 日的三天举国欢庆，没有听说过“国荣纪念日”。然而中共在二十一世纪又想起了国荣日，新一代中共领导人选择在这一天阅兵，不提国军抗战，不承认中共对日避战，借阅兵营造抗战领导者形象。投新一代领导人的所好，文艺家公然在作品中以毛泽东替换蒋介石宣传“开罗宣言四巨头”。

对国军抗日将士而言，还有比被遗忘更让人叹息的事，例如，抗日中十万从军青年之冤。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艰难维持着学生免费上大学，不必服兵役的保障教育政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之时，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人才入伍以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准备滇缅反攻，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中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国民政府成立了由何应钦、陈果夫、吴铁城、张治中、白崇禧、康泽为常委的全国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指导委员会，颁布了《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教育部等各政府部门同时还出台了配套的各项鼓励政策，如机关干部可以保留原薪，从军学生一律保留学籍，从军学生退伍时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优抚参军青年的家属等。西南联大也成立了梅贻琦任主任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推动青年从军。响应政府号召，国民政府控制区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掀起了参军热潮，众多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在社会各界响应政府号召时，中共地下党在各大大学发起了抵制征兵的行

动。[5] 中共的抵制未能奏效，十二万青年在两个月内应征入伍，被编为“青年远征军”（青年军）。国民政府成立了罗卓英、黄维、蒋经国任正副总监和政治部主任的青年训练总监部，负责青年军训练。青年军和其它部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素质高，有明确的效忠国家观念，而抛弃效忠一党、一官的私家军观念。但谁也没有想到，青年军组建不久抗战结束，青年军们或死于了国共战争，或在中共建国后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害，幸存者大多背着“历史反革命”的黑锅遭受长期迫害，蒙冤至死。

中、日、美对待阵亡将士迥异让人叹息。1944 年春，中日两军在滇缅公路要冲——松山展开激烈争夺战。国军第八军要赶在雨季来临前拿下要冲以保证二十万远征军的供应线，1300 多日军凭借两年中构筑的坚固工事（拉孟要塞）据守。战斗异常残酷，断粮的日军士兵靠吃阵亡国军的人肉充饥。经两个月苦战，国军以挖地道埋炸药办法攻克了松山主峰，打通了滇缅公路，阵亡 7000 余人，伤者逾万，日军除十几个幸存者外全部战死。[6] 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松山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树立了纪念碑。随着国军在内战战败，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墓地被毁，国军在松山、在云南的惨烈战役被掩盖，年轻一代几乎无人知晓，四十年间没有国人到松山战场凭吊烈士。美军为参与松山战役的 19 位阵亡美军联络官和飞行员举行了葬礼，在抗战胜利后再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美军阵亡将士的遗骸，迁葬回国，重新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国防部写出寻找报告，存入国家档案。日本人将松山战役列为“全员玉碎战”之一，出版了众多关于该战役的研究作品，十几位松山战役日军幸存者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松山战役回忆录。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批批日军“缅甸战友会”组织的“慰灵访华团”赴松山祭奠日军士兵亡灵，带回一些松山战场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松山战场唯一逃脱的日军炮兵中尉军木下昌已在中日建交后十六次到滇西，称余生全部心愿就是为松山亡友建慰灵碑，为此目的捐资在龙陵在原日军第 56 师团前进指挥部所在地赵氏宗祠建了白塔小学（赎罪学校），希望当地政府准许为松山阵亡日军立碑。[7] 在缅甸，日本企业捐出巨资，换取在当年战场修建“慰灵

塔”和纪念碑，包括军马的纪念碑，英国人妥善维护的缅甸英军阵亡将士公墓，而中国远征军烈士陵园难觅踪影，不少旅居缅甸的中国驻印军老兵提起此事就老泪纵横。中共不为国军烈士建碑，却毁了无数国民政府建立的抗战殉国将军陵墓和纪念碑，如武昌卓刀泉边的郝梦龄将军墓、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将军墓、南京灵谷寺抗战殉国国军将士牌位、湖南衡山的蒋介石手书“忠烈祠”匾和将士牌位、南京的航空烈士墓、纪念抗战胜利的芷江凯旋门（受降纪念坊，中国第一血字型牌坊）等等。

日本在二战中打了两场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者是斯大林所策划引爆，它使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泥潭而不能实施北攻苏联计划。中日两国的主和派都清楚斯大林的用意，但没能达到停战目标；对于后者，中国官方解释为法西斯侵略战争，而禁止传播东南亚各国的“亚洲人反殖民主义战争”评价。英国历史学者H.G.威尔斯评论日本的太平洋战争说：这场伟大的战争给殖民主义划上了句号，为实现白人和有色人种平等，创建世界联邦奠定了基础；英国历史学者 J.TOYNBEE 说：日本人迫使统治亚非的西洋人检讨过去二百年的殖民历史。日军击沉英国两艘最新战舰具有里程碑意义。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代表着支配这个地域的西洋势力。1941 年，日本首次让亚洲人了解到，西洋人并非不可战胜。日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缅甸前首相巴莫伍在独立宣言中说：“缅甸三次对英战争，结果失去独立。……缅甸人民会永远铭记日本对缅甸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教授乔埃斯评论说：“日本虽然战败了，却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独立运动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让各民族独立成为可能，粉碎了西洋势力让亚洲永远作殖民地的梦想。日本在占领时全面武装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给了他们武器，自信和不再允许白人殖民者支配自己国家的勇气，教给他们军事能力、政治能力，使他们能勇敢地与西洋殖民势力战斗。英国，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在战后深刻体会到，日本的占领使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使殖民地独立不可逆转”。[8]

“摘桃子”与破坏交通线

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待战后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担心日军与德军两面夹击，多次电令中共进攻东北日军以帮助苏联减少东面的日军威胁。毛泽东先以武器差为由一再推脱，再以潘汉年与日军交换的情报报告斯大林日方决定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毛泽东提供的情报帮助斯大林作出决定，将布署在远东防备日军的部分军队调往西线，应付德军。苏联战场进入反攻后，毛泽东不敢再抗命，派杨成武、罗瑞卿部和吕正操部到长城一线，准备等抗战胜利时抢占东北。

与罗斯福签定《雅尔塔密约》后，斯大林通知了中共准将出兵中国东北，要求中共配合对关东军的作战。^[9] 苏军出兵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电报指令：与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热烈欢迎苏军；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华北全面进军，“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武装阻止政府军受降，命令八路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武亭（朝鲜义勇队司令）所部立即抢占察哈尔、热河和东北地盘，接受日军投降，收编满洲军。8月12日，蒋介石电命“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申明坚决抗命。

发出抗命电的当天，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两社论，谩骂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

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里，毛泽东的上述污蔑之词恰恰是他自己抗战中的真实写照。在毛泽东抗战八年的电报文稿中，除秘书班子抄袭蒋百里理论写出的《论持久战》空谈抗日外，没有一篇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所有文稿、指示都是关于打击国民党政府和国军，在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充军队和地盘以及党内整肃的。自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他率中共高层在延安开了四年的整肃会议。在日本决定投降时，他发布的《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和七道军令主旨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国军的开战令。为掩盖对日避战，打击国军，准备内战，中共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将毛泽东指示保存实力，坚决避战的电报稿全部剔除。抗战期间，延安和中共主要根据地没有抗战气氛，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掀起了跳舞和吟诗填词的热潮，各机关还举办周末舞会，毛写下了“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等一大批闲情诗词，高层们组织了“怀安”诗社，文艺家们组织了“战地社”、“铁流社”、“战歌社”、“鹰社”、“山脉文学社”、“延安新诗歌会”、“边区文协”、“文化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举行了“街头诗运动”、纪念高尔基运动，延安礼堂上演的各种剧目不断，其中包括：《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打花鼓》、《旱船》、《二流子转变》、《逼上梁山》、《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同志，你走错了路》、《广州暴动》、《血祭上海》、《日出》、《雷雨》、《巡按》、等中国剧目及《俄罗斯人》、《带枪的人》、《前线》、《第四十一个》、《人约黄昏后》、《茨冈》、《母亲》等苏联剧目。

8月15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名义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向共军投降，并分别致函美国大使赫尔利、英国大使薛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请转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中共有权接收日军投降及处理投降后之一切问题。在上述要求被拒绝后，毛泽东下令破坏津浦、胶济及陇海（东段）铁路以阻止国军和国民政府人员到各地受降。

8月20日，毛泽东命令共军抢占东北，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计划，并指示组织各大城市武装暴动，与农民武装暴动里应外合，迅速占领全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各省委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其中，中共山东省委与山东军区颁布了《关于集中一切力量支援前线的训令》、《山东人民自卫队战时勤务动员办法》、《战士人民紧急动员纲领》、《山东战时民兵编制办法的命令》，紧急动员解放区民兵、自卫队、工农青妇文各团体，规定16岁至55岁的身体健康的劳动力一律担负战时勤务”。[10] 中共中央和各军区省委在8月的动员令暴露出，中共军队多年养精蓄锐，在苏军出兵后开始实施推翻国民政府计划的“下山摘桃子”部署，证明毛泽东及中共才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他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已经在磨刀，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对于中共日军停战后立即对国军开战，争夺受降权的行径，驻华美国司令魏德迈将军指出：“作为带领中国人民艰难苦撑抗战八年的领袖，蒋介石是接受日本投降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任何外国代表应该在中国战区内受降，而破坏抗战的中共在抗战中消极避战，抗战胜利以后却跳出来接收日本的投降，其行径无耻之极。”[11]

毛泽东准备对国民政府大打出手不具备决定意义，决定须由背后的斯大林作。斯大林这时还不想立即撕毁与国民政府刚刚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不想冒违反《雅尔塔协定》导致与美国冲突的风险。他指示苏军对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严格限制，禁止中共公开夺取大城市。毛泽东不能抗命，只好命令八路军以东北义勇军名义秘密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9月2日，日本签署了投降书，在其中申明向国民政府投降。9月5日，驻沈阳苏军奉斯大林之命禁止乘火车达到沈阳的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下车。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签字确认受降。9月14日，苏军代表通知延安：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东北大城市，已进入者须退出。

日军投降时，国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中共迅速抢占地盘，控制了华北、东北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并大肆破坏铁路、公路以阻止国军和国民政府人员到各地受降。不仅毛泽东下达了破坏津浦、胶济及陇海路东段之铁道交通的命令，中共高层都在发出破坏交通线的指示。刘少奇指示：“国民党的主要军队在西南，我们派两王部队（王震的三五九旅和王首道的三五八旅），下江南，与李先念的部队形成一条防线，在日本投降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地，让我们自己夺下城市”；周恩来指示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只要我们先占了，那就是我们的了。”[12] 根据中共高层的指示，中共军队和各地方局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交通线行动，成立了铁路破坏队、铁路工作队、交通控制队、公路破坏队等名目繁多的破坏队，动手拆路轨、炸桥梁、焚站房、毁电线，埋地雷，毁客货车辆，破坏了津浦、平汉、胶济、陇海、平绥、同蒲、北宁等铁路干线和主要的公路线，因此当时舆论称中共军队为“扒路军”。据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告，中共严重破坏了津浦（破坏 18 次）、平汉（破坏了 17 次）、胶济（破坏 10 次）、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九铁等铁路，摧毁车站 140 余处，炸毁桥梁 200 多座，剪去电线十几万余公尺，摧毁机车 80 多辆，破坏了众多工厂、矿山。很多交通线经国民政府修复后再遭中共反复破坏。破坏公路，铁路和桥梁之外，中共使出了“焦土抗战”式的祸国殃民手段，在河南决开了黄河堤，在江苏、山东扒了运河堤，在河北决开永定河、子牙河，冀以大水阻止国军调动。中共大破坏行动还包括工厂和矿山，要求让国民政府接收的是一片废墟。中共多年后用来宣传抗战中破坏日军交通线的图片其实大多是在抗战胜利后破坏国民政府交通线运动中所拍。因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也禁止破坏交通线，除了彭德怀自作主张破坏正太铁路外，八路军没有大规模破坏交通线，中共真正的大规模破坏交通线行动是日军停战之后。

大破坏行动中，八路军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盗墓。曹志福部还盗了清东陵康熙、咸丰、同治三陵。[13] 孙殿英盗清东陵广为人知。孙盗掘了乾隆、慈禧两陵，而清东陵共有五座皇陵，四座太后陵、加上嫔妃陵共 157 陵。

日本侵略占领东北后即在清东陵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守卫清陵多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守陵日军撤走，9月，八路军曹致福（一说曹治甫）部以“斗争皇上大地主”为主为幌子，展开大规模盗掘，在陵区周边五里设置警戒哨，派军队挖开地宫入口，或直接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地宫曾抵挡了无数盗陵贼，但抵挡不住军队。结果，清东陵其余 155 陵无一幸免，被盗掘一空，康熙大帝也被拖骨暴尸。当时八路军宣传：“乡亲们，中共早就说了，一定要打倒大地主。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八路军盗陵后，洞口敞开，无人管理。许多百姓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惠陵地宫里那位娘娘的尸体一点儿未烂，面目如生。她浑身被扒得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社会上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他们为了取金子，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治甫、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率八路军盗清东陵的消息见诸报端，舆论哗然。1946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政协会议上为此事件痛斥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周若无其事而言它。之后，中共匆匆封堵了康熙陵等地宫灭迹，负责执行盗曹、云等人去向不明。

在中共抢地盘，争受降情况下，国民政府需要日军配合，只向国军交防。蒋介石发表了题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号召中国人民“对战败的日本，要以德报怨”，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国民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将 120 万侵华日军和 80 万日本侨民礼送出境，保留日军原有的作战系统，将日军纳入国军补给体制，让日军享有与国军官兵同等待遇，解散了东北的三十万满军，就地释放。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赢得了在华投降的日军的配合。在华日军阻止中共破坏铁路，等待国军接收，与八路军发生不少战斗，半年之内死伤失踪近万人，协助国民党政府军接收了除东北外的大部分地区。

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对天皇制废除与否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反对分割、占领日本本土，迅速遣返日俘等具体措施。在各战胜国领袖中，蒋介石率先提出对日本天皇裕仁免于追究，向美国建议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因为，他最早看清了反法西斯阵营不复存在，共产阵营与反共阵营对立局面形成，日本将是反共盟友，维护天皇制以及日本领土完整有利于抗衡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才全面改变对日本处罚的政策，接受了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提出的建议。与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形成对照的是，斯大林将数十万被俘的德军和日本关东军押到了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作苦工，以虐待投降五十多万关东军方式发泄四十年前战败的仇恨，造成大多数战俘冻饿而死，剖腹自杀或集体点屋自焚。

重庆谈判

日本宣布停战当天，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赴重庆共商战后“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4] 遭毛泽东复电拒绝。为避免长期抗战后再开内战，蒋介石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斯大林，要求履行不支持中共反政府的承诺，施加影响促中共放弃推翻政府的宗旨。斯大林在盟约谈判中向国民政府作出不支持中共反政府承诺是因为顾虑美国的干预。二战中，他靠美国的援助反败为胜，充分领教了美国国力与军力的强大，决定以避免与美国冲突为战后基本原则。在欧洲，他遵守与罗斯福、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只在东欧扶植建立共产党政权，不援助巴尔干半岛以西各国共产党，命令法共、意共放弃武装，参加议会选举；在中国，他遵守《雅尔塔密约》，将中国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不向长城以内扩张以避免与美国冲突。他准备让中共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军队，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他这样打算的另一层考虑是对毛泽东不放心。他知道毛泽东没有执行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拒绝服从国民政府，对日避战，利用德国侵苏之机整肃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发展出近 200 万大军，因此他希望国、共两党互相牵制以实现苏联在华利益最大化。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接受了国

民政府的请求，电命毛泽东与国民党和谈，并否决毛泽东关于在各条战线发动向国民党军进攻的方针，表示不同意中共开打内战。[15]

8月20日，蒋介石再电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16] 胡适也致电毛泽东，呼吁中共放弃武力作第二政党，“以耐心毅力，和平发展，前途无量”。各界人士一致呼吁在国家一片废墟，经济崩溃时不可再开内战，呼吁国、共两党和谈，让国家和人民休养生息。在昆明的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 342 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提出了通过召开国事会议以促成联合政府成立的具体意见，连章乃器、胡厥文、黄炎培等共产党外围人士也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呼吁国共两党“以公正之态度促进和平统一”。

8月22日，斯大林以命令口气再电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苏联已与美国取得谅解，世界需要和平，中国也需要和平，现在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一味拒绝将使国际国内都无法理解，再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你去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将由美、苏两国共同负责。”[17]

8月23日，蒋介石三电毛泽东，请毛与周恩来“惠然偕临”，“已准备飞机迎迓”。[18] 毛泽东无意倾听蒋介石和社会各界的和平呼吁，但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决定赴重庆作个谈判姿态向斯大林交差，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謁，弟亦准备随即赴渝”，[19] 并要求美国大使赫尔利保证其安全。蒋介石立即请赫赴延安陪毛来渝。动身之前，毛泽东指示中共各局暂停在全国各大城市武装暴动的计划。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他对斯大林命令他谈判憋了一肚子怨气，在斯大林去世后仍在抱怨，称“1945年斯大林不让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20]

9月3日，国共在举国庆祝日本投降的狂欢背景下开始了谈判。谈判分两个层面进行：蒋介石、毛泽东单独密谈（二人十一次的秘谈内容从未公开）及两党代表谈判。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与周恩来、王若飞之间的两党代表谈判中，中共提出八项要求为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等项自由、给予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一切政治犯，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中共军队保留 48 个师军力（后来毛泽东让步为 28 个师）和中共参加受降。其中，前五项为应景要求，后三项才是实质要求。国民党提出：中共军队最多保留 12 个师、不承认中共的解放区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人员、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已经当选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在已当选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额等项要求。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会谈纪要》。纪要内容为：

——和平建国：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政治民主化：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国民大会：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 3 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五五宪法草案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双方同意将这些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双方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军队国家化：政府方面提出军队国家化，实行全国整编裁军计划。中共方面同意缩编军队，但不接受军队国家化。

——解放区政府：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府；国民政府表示在日本投降后不承认所谓解放区政府，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受降：中共要求参加受降，在部分地区受降；国民党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受降须在接受中央命令后才可考虑。

被国共两党称为《双十协定》的会议结果其实既无协定也无共识，只是双方各说各话。双方的分歧与抗战前的国共和谈中一样，在于军队和政权。国民党政府坚持军队国家化、政令全国通行，不承认独立于中央的中共政府；中共不承认中央政府，坚持不受国民政府染指的独立军队和独立政权。而且，中共在会谈中没有说的关键一点是，中共坚持以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有这样宗旨在，纪要中的政治民主化、各党派平等合作、和平建国等内容全无意义。蒋介石在签署协定后的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虽然《双十协定》没有达成妥协，但其中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等条文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国共在重庆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民主国家所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几个月后，上述代表进步方向的条文被写入了政协会议的决议及《中华民国宪法》。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数次高喊“三民主义万岁”，声称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背地里，毛泽东称《双十协定》为“一张废纸”，派代表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联络，要求苏联支持中共对国民党开战，同时遥控中共军队抢占了数百县城，对全国交通要道、工厂、矿山展开了大规模破坏，指示民盟主席张澜去与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潘文华等反蒋军阀联络，介绍龙、刘加入民盟，与延安建立了秘密电台联络。斯大林正准备向蒋介石提出合营东北的要求，暂时拒绝中共开战的要求。据此，驻重庆的苏联大使对

中共代表团的求见称病不见，通知中共代表应当参加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谈判与军事调解。斯大林向蒋经国信誓旦旦称，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苏联只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斯大林此言不可当真。国人知道，是他一手造成了中国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的局面。斯大林此言更骗不了蒋经国。参加谈判的蒋经国知道，斯大林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的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亲苏，必须接受与苏联“合营东北”。

苏联摧残东北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声明：“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对于中国政府维护东北主权的立场，美英法等国表示支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作出。莫氏之词是应付美国之词，斯大林对苏军有完全不同的指示。他何尝不想占领后不再撤军，干脆将中国东北并入俄国版图。这不仅是他宿愿，也是俄国百年来的扩张目标。但是，战前日本不允许他实现这一宿愿，现在是美国不允许。罗斯福虽默认中国东北为苏俄控制范围，但不允许公然吞并，在《雅尔塔密约》中规定苏联不能完全占有东北。既然不能吞并东北，斯大林决定掠夺与摧毁东北的工业体系。

经过日本长期经营，投资 100 多亿美元基础建设，东北的工业体系一流，发电能力达到 180 万千瓦，年产钢铁 200 万吨，煤炭 2500 万吨，水泥、纺织、石油、汽车、飞机、军火、化工等工业拥有一流设备。抗战中，

东北没有遭受战火摧残，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东北没有抵抗，东北整个轻、重工业体系和设备保持完好，有全国八成多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一半多的铁路里程。斯大林受够了日本关东军北攻的威胁，认为靠近苏联远东边境的东北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也不想让中国政府接收完好的东北轻重工业设施，认为中国掌握良好工业设施快速发展成东亚强国不符合苏联利益，视崛起的中国为苏联的安全威胁，希望中国继续积贫积弱。于是他命令苏军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苏联红军全面占有，将东北可用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将不便拆运的设施破坏。根据他的指示，苏军在占领东北后不仅接管军工厂，还接管了民用工厂，将东北的工厂全部认定为苏军战利品，拘留重工企业高管和技术人员，强迫他们指导日本战俘工厂为他们拆卸机器，装箱。苏军破坏、拆卸了各大城市的水、电、暖、煤气等系统，东北的飞机、汽车、坦克制造厂，东北电力网，鞍山、本溪等地骨干钢铁企业，抚顺煤矿，吉林、宫原、泉头三大水泥厂等工厂和基础设施，将拆下的设备运去苏联或就地摧毁。拆运破坏工业之外，苏军还掠走商店的布疋、百货以及各地粮库的粮食，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经过苏军抢劫、破坏，东北城市断水、断电、断煤，工人失业，市民生活陷入困境，纷纷外逃。驻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 Y. MOLINOVSKY**）元帅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直截了当地说：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

破坏工业和基础设施之外，苏军还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掠夺，劫掠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并且照搬占领德国后的作法，以早已印好的百亿面额“红军票”（两倍于满洲纸币发行面额）强迫流通，勒索商家，劫掠物资运往苏联，造成东北空前的通货膨胀。苏军撤走后，中共以接收的“红军票”继续搜刮军费，为害东北百姓。苏联入侵后在华发行巨额红军票是二十世纪中国遭受的最惨痛蹂躏之一。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少，但唯有苏俄在华强迫流通巨额纸币抢劫中国商民。仅此一项足以证明，苏俄是二十世纪祸害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夺取政权后，

中共东北人民政府以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收兑红军票（红军票 1 元折合 30 元东北币），但因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而不向苏军清算“红军票”，将巨额财富赠送给了苏联。

苏军在东北的拆运、破坏持续了半年多。当苏军在 1946 年的全中国反苏运动中撤离时，东北已被苏军破坏成一片废墟。中国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联络处共同组团（二十一人调查团）调查结果为，苏联的掠夺破坏给中国造成了 20 亿多美元（战前币值）的损失，相比国民政府公布的八年抗战财产损失数额 133 亿美元，中国在抗战胜利后遭苏军抢劫、破坏的损失何等巨大。“二十一人调查团”报告书指出：“自俄军摧毁后之工厂残迹观之，不难证实彼等之行为系出自预谋！彼取其所欲引为己用者，而毁其余，以防为他人所用。拆迁工作均在苏俄技术军官监督之下，命令日本技师执行之。装箱所需木材，均系就地征用，拆去之物，分海陆运往苏俄，其经陆路运往者，统集哈尔滨后北行，而大连及北韩之元山、清津、罗津等港，则为海运孔道。”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EDWIN W. PAWLEY)在《日本赔偿调查团报告书》中指出：“拥有东北工业 80%以上的南满，实际上未受任何交战损失为苏俄所占领。苏俄人员于到达东北工业区时，即开始对粮食及其他储存品作有系统的掠夺，从九月开始并对工业机械作选择性的拆迁。他们集中力量掠取几种物质、机器和设备，在掠取储存品与某类全部工业设备之外，苏俄人员还将大部份动力机器、发电与转电的设备、电机、实验厂、试验室与医院搬走，对于机械工具，他们只择取最新式和最好的，而将旧式工具留下。东北工业系统之最大部分，于苏军占领时期，遭受破坏，系由于苏俄拆迁设备及不能维持秩序所致。”

大规模破坏的同时，苏军在东北到处奸淫掳掠，强奸东北妇女数十万。当时，东北各大城市的中国老百姓关门闭户，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女人不敢出门，或女扮男装。一位率部投降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回忆录中记录苏军暴行写道：“我亲眼看见，屋子的房门之外，数十名苏联红军排成

一列长队，等候进屋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21] 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记录沈阳苏军暴行写道：“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红军甚至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或大街上强暴中国妇女。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束胸以免受辱。”苏军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苏军挨家挨户抢劫，开枪杀害反抗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22]

对于苏军的累累罪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除抗议外无力制止，靠苏军扶植进占东北的中共军队完全沉默，整肃军中的反苏言论者。一位进入东北的干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的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23] 八路军的烟酒并不能阻止苏军的暴行，甚至不能保护自己。中共高级将领卢冬生被苏军枪杀，中共保持沉默。八路军驻沈阳部队将苏军纪律败坏情况通知苏军政治部。苏军答复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二十多人。暴虐东北期间，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树立起了高大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俄国有在外国占领区内修建纪念碑和树立塑像的传统，将此视为征服一个地区的象征。苏军以“沈阳各界人士”、“长春各界人士”名义为自己树碑，实际上这时的东北各界人士被苏军暴虐吓得不敢出门。东北老人们一致的说法是，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苏军撤离东北后，中共残酷迫害，甚至杀害谴责苏军烧杀抢掠的中国民众。例如，沈阳南塔村蔡家兄弟、警察徐敬一、张玉清等众多东北人在镇反运动中被中共以“破坏中苏团结”罪名处决。1957年，中共号召“大鸣大放”，随后将数以万计谴责苏联红军罪恶的青年打成右派、坏分子长期加以迫害，甚至秘密杀害。[24] 中共不为惨遭苏军

奸淫杀害的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却精心维护着苏军在东北为自己树立的战机、坦克造型的巨型纪念碑。

在苏军祸害东北期间在满洲居住的拉里萨·阿纳托利耶夫娜（ЛАРИСЫ АНАТОЛЬЕВНЫ）在多年后投书俄罗斯《祖国与信仰》（“ОТЕЧЕСТВО И ВЕРА”）杂志，忿然写道：“1945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满洲地区。但是对这些解放者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我们至今三缄其口。那些罪孽在身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们，至今还躲在奖章和勋章的光环之后不做忏悔，他们面对胸前的奖章难道问心无愧吗？今天，俄罗斯没人敢于承认 1945 年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面对痛心疾首的历史，俄罗斯人选择了沉默，似乎红军官兵们全都名副其实地为祖国而战了。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呢？被他们凌辱过的那些中国女孩子呢？别忘了，她们要么自刎而死，要么从悬崖上投河，就因为她们不堪忍辱！根据我的调查，普通苏军士兵抢劫中国的商铺，整箱地把财物带回苏联；而军官却是整个集装箱地往回发运赃物——而就是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而去的。还有，那些反抗抢掠的中国人遭到苏联红军士兵的打杀，不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苏联红军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发生在中国东北，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苏军占领区。一位前往平壤寻访失踪盟军的奥地利人记录苏军暴行写道：“身佩汤姆森冲锋枪的俄国人，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冲进了房子，把妇女拉了出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年轻女人。俄国人把她们连同家具和抢来的其他物品，装在卡车里拉回了军营。翌日，那些被蹂躏妇女就被抛在了马路上。我还看见，俄国人走进农民家的菜园子，摘走了所有的蔬菜，全然不顾那家农民已经快饿死了，就指望卖菜糊口呢。可是，俄国人吃东西从来不付钱，至少我见过他们付钱。朝鲜人告诉我，苏联红军抢走了他们的家畜、蔬菜，从没有付过一分钱。”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主任哈尔·赖斯写道：“苏军在松岛从银行抢走了 800 万朝元，还仓库里拉走 60000 多磅的人参。苏联红军抢走几乎

该城所有市民的手表。”[25] 一位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的德国老太太回忆：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26]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指出：在对纳粹德军作战并攻占柏林的三年间，苏联红军强奸、轮奸了约 200 万德国妇女。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蹂躏自杀。有些妇女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儿女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27]

2013 年，波兰人在格但斯克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旁树立了一尊苏联红军士兵施暴波兰妇的塑像。塑像作者说：塑像竖立在 T-34 坦克碑旁边是个很好的补充，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波兰妇女的悲惨。乌克兰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科卢茨克说，东欧受共产党奴役的国家并不把苏联红军当成解放者，而当作纳粹一样的占领者。与受到共产党洗脑的老一代人不同，年轻一代人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世界在改变。今天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他们的前任犯下的错误道歉忏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中世纪教会的文字狱道歉，德国和波兰的领导人向犹太人道歉，美国为黑奴问题道歉。早晚有一天，新一代俄罗斯领导人会做同样的事。”但在中国，中共仍然禁止报刊，文艺揭露苏军在华暴行。早晚，中国的苏军坦克造型纪念碑旁边像波兰格但斯克那样也树立起补充塑像纪念被苏军残害的中国妇女，或者干脆被改建成苏军暴虐东北受害者纪念碑。

“战利品合营东北”

出兵占领东北后，斯大林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战利品合营东北计划”，其内容为：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工矿企业为苏军战利品，苏联以此战利品（工矿）财产权的一半作为与中国合营东北的股权，将第三国（指美国）的势力排除出东北。计划要求东北成为新疆一样的苏联的势力范围，使东北“蒙古化”。国民政府无力抗拒占领东北的苏联强权，被迫同意举行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谈判中，苏联将从东北撤军作为压迫中国政府接受其在东北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中享有主导地位的条件，实际是威胁中国政府，若不接受由苏联主导东北就不撤军。国民政府坚持苏联须先履行《中苏同盟条约》中的承诺从中国东北撤军，然后双方再谈合作协议。

在接收东北方面，国民政府遇到重重困难。为顺利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国民政府为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允许外蒙古独立和租借旅顺港等妥协换取苏联承诺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不支持中共反政府。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在长春成立了熊式辉为主任，蒋经国为特派员的委员长行营和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负责接收东北事宜。出于派系的考虑，蒋介石舍近求远地从西南调嫡系部队到东北接收。由于中共将陆路交通线破坏，政府军北上受阻，蒋介石只好请求美国军舰帮助运兵。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支持国民政府接收，派军舰协助。1945年9月13日，美军在青岛登陆，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第6两师在大沽登陆，进入天津，受到市民热烈欢迎，10月1日，美军再北上登陆秦皇岛，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国军将乘美国军舰从大连登陆。

斯大林原已对国民政府“先撤军，再谈合营”的答复不满，得知美国军舰帮助国民政府运兵登陆东北极后更为愤怒，认为美军侵犯了苏联势力范围，违反了雅尔塔密约，决定不再遵守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出的年底前从中国东北撤军承诺，也不再遵守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的承诺，决定将东北交中共占领，扶持中共军队阻止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占领

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拒绝了国军登陆大连的要求，将营口、葫芦岛两港交中共军队接防，让共军去阻止美舰登陆，同时将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军火库交予中共，指示中共东北局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放手武装阻止美蒋进入东北。有了苏军的强力扶持，毛泽东从关内调三十万主力部队进入东北接收武器，在锦州、营口、沈阳一线布防，指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提出以“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为“总任务”。10月27日，共军李运昌部按中共中央指示开火阻击乘两艘美国军舰抵达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登陆，迫使国军和美舰退回了秦皇岛。中共放手开火后，斯大林又担心引发与美国冲突，电令驻东北苏军从营口、葫芦岛撤防。苏军将两港交中共时通知说，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但中共军可以阻拦国民党军登陆，苏军不加干涉。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11月初，中共在苏联的怂恿下，通过驻重庆代表发表了拒绝国军进入东北的强硬声明。中共声明发表后，苏联大使要求中共更正说：“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接收只能做，不能说，否则给美国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

奉命进入东北接收的国军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海路受阻，只好从山海关陆路强行攻入东北。11月3日，国共在抗战刚刚胜利，国家一片废墟的情况下在山海关开战。毛泽东电令彭真、林彪“御敌于关内”，集中兵力在锦州全歼出关的国民党军。林彪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军队的劣势和困难，要求避免锦州决战。林彪的意见得到东北局领导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放弃在锦州与国民党决战的计划。毛泽东坚持独占东北的方针，命令阻击国军出关。在苏军的支持下，中共大军源源不断从山东经海路进入东北，占领了东北地盘，在沈阳、安东、本溪、旅大等城市宣布成立政府，同时占领了营口、葫芦岛等口岸和长春等城市的机场，破坏了出关的铁路、公路，堵塞了政府军

进入东北接收的通道。11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向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交涉接收事宜。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苏军即将北撤，对接收事宜概不负责。对于苏联的公然背约，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并致电美国政府：鉴于苏联违反条约，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要塞，国民政府无法接收，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全部撤离长春至山海关。与此同时，杜聿明率国民党军在山海关击败了共军，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打通了辽西走廊，11月15日，据守山海关的中共“东北人民自卫军”败退关东。

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接收东北后，美国军舰在苏军驻扎的大连海域示威，魏德迈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军在秦皇岛被袭击，将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决定退让，命苏军仍依条约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将中共军队和中共建立的军区、政府机关驱逐出东北各大城市三十公里之外，向国民政府解释苏军只是延期撤军。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从东北撤军，双方商定苏军将在1946年2月1日前完成自东北撤退日期，将东北交国民党政府接收。年底，国民政府名义上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辽北（含四平）、松江（含牡丹江）和嫩江（含齐齐哈尔）等省的行政权。而实际，国民政府当局在东北面处于险境。苏联虽迫于外交压力对国民政府作出让步，但继续逼迫国民政府同意合办东北工矿企业，要求第三国（指美国）不得进入中国东北。

斯大林的退让决定使毛泽东“御敌于关内，独占东北”计划成了泡影。刚刚连续下达对国民党军强硬命令的毛泽东突然面对苏军驱逐，颜面扫地，自尊受到极大伤害，只好托病住进延安医院，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去下达相反的命令。刘少奇接手后接受了林彪、陈云代表东北局提出的意见，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东北的军队“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东北的乡村建立根据地。为避免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背约，斯大林要求在东北抢占地盘的中共军队不得以八路军名义出现。遵斯大林命，中共

将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得到苏军提供的大批关东军精良武器，改名后的东北民主联军兵力迅速扩充至三十万，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兼东北局书记，总部设于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

反苏运动

1946年1月16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杀害了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的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九人。同日，《中央日报》报导了中共暴行及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声言“东北战利品合营”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则苏军不能确定自东北撤军日期。消息传出，流亡重庆的两千多东北籍人士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同乡大会后前往国民政府请愿，上街散发抗议苏军摧残东北，要求苏军立即撤军的传单。1月21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称东北一切日本企业，均为苏军战利品，苏联拟以战利品中的一部分企业交予中国，其余企业如煤矿、电力厂、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由中苏共管。2月1日，马林诺夫斯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东北煤矿、铁矿、钢铁厂、机器制造厂、非金属工业、化学工业、砖厂、水泥厂、盐场等工矿企业及民用机场8处共154项工矿项目名单，称以此名单所列苏军战利品与中国政府组合营公司，由苏方人员担任和董事长和总经理。

苏俄对华一贯以提新要求作为履行旧承诺条件的办法耍赖。列宁时代，苏俄连续发表对华宣言，承诺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沙俄在华权益，包括中东铁路区域无条件归还中国，随后又将履行上述承诺变成了建交谈判的筹码。此时，斯大林再玩同样把戏，以“合营东北”为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不支持中共军队对抗国民政府，不支持新疆的“三区革命”等承诺的条件。在提出合营东北计划的同时，斯大林通过驻华大使传话邀请蒋介石访苏。蒋介石清楚，斯大林在扶持中共占领东北，显示无意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邀请赴苏面谈是要求他倒向苏联，交出东北，即使目前同意访苏，接受合营东北，斯大林还会变本加厉，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他决定拒绝斯大林的访苏邀请，将苏联的“战利

品合营东北”的要求通报了美国。2月2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拒绝“战利品合营”要求的声明，宣布不承认所谓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苏军战利品之说，宣布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当天，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回应国民政府：不能同意中方从合办案中剔除各处厂矿，为消除满洲对苏俄威胁，东北的重要工矿电力必须中苏合办，否则不能确定从东北撤军的日期。

美国对苏军阻挠国民党政府接收及无限期拖延从东北撤军不满，将罗斯福与斯大林交易中国满蒙主权的《雅尔塔密约》公开披露。2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社评，在其中指出：“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这是我们引为感慨的第一点。这秘密协定，还有一段很难看的文字，就是：‘苏联应该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曾经发表过神圣的宣言，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建筑中东南满两路，是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与帝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个条约及由那个条约所获得的权利，早经苏联宣布废弃了。苏联今日重建需要旅大两港中东南满两路的权利，就重新主张重新要求好了，何必在文字上公言‘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

苏联出兵东北之后，中国各界人普遍担心苏俄与当年沙俄一样，将领占东北不还。随着苏军拆运东北工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上讲话中将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权益称为了“新的苏维埃领土”，苏军一再延缓从东北撤军等等消息披露，让国人看清苏俄霸占东北野心与沙俄无异，中共在苏军占领的抚顺杀害国民政府接收官员事件让国人的愤怒升级，《雅尔塔密约》和苏军拒绝撤军的消息使国人积蓄已久愤怒爆发，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请愿，高呼“要求苏军依约撤退”、“坚决反对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要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缉凶严办”、“边疆不容割裂”、“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彻底执行停战命令，迅速恢复交通”、“向苏

美英三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勿作现行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让步”等反苏爱国的口号。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东北的阴云》,在其中指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附件,进入我东北的苏联军队应于日本战败后的三个月撤退。这由去年9月2日日本签降之日起,苏军应于去年12月1日以前撤出我国东北。但以后因事势延宕,曾两度展期,中苏双方所同意的日期,是今年2月1日以前。现在已逾期半个多月,苏军尚无撤退征兆,也不知其理由何在。”“现今的中国,是遭逢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严重国难并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获得最后胜利的国家。中国与日本战,赌国运,拼存亡,为了什么?是为了要保全东北。.....苏联参加对日之战主要战场在我东北,中国有自知之明,对盟邦合作,不能只取不予,所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订明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尤其订明了关于东北方面一切事务的办法。苏联今日参战,日本明日投降,苏联大军源源进入东北。到今天,时间已有半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应该由中国收回;我们所付的代价,如外蒙古独立,中长路共管,旅顺港共用,大连辟自由港,都已照办。但苏军延迟不撤,中国政府不得顺利接收东北,是何缘故?这一点,是世界人民尤其中国人都要明白知道的。”2月22日,《大公报》社评《东北的经济与金融》中写道:“人人都知道东北的工矿建设甲于全国,经济部方面的接收人员就在着急,不用说进一步建设,就是现有的工矿,怎样使之不停顿而继续开工,就大为发愁。但是他们既到了东北,看了一些工矿,就倏然梦醒,因为机器物件大都搬走了,又何必为复工发愁着急?谁搬的?我们不知道。机器搬了,矿藏还在,总可徐图建设。其后知道,苏联方面对经济项目提出了要求,对许多重工业认为是战利品。目前的延不撤兵,或与此不无关系。抚顺煤矿,最初并未列在战利品的单子里,所以我们得经允许派员去考察接收。张莘夫等一行就是为此任务而去,但到抚顺后碰了壁,在回沈阳途中被拖下火车惨杀。据说张氏等被杀时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因为动手杀人的是中国人。”“再谈到东北的金融情况,那可说是军用票的世界。苏军入我东

北，使用苏军总司令部印刷的军用票。所以苏军在我东北的军费是完全由中国负担的。苏军在我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有多少呢？苏方却未告诉我们。这种军用票，是目前东北的主要货币，没人晓得发行的数额，使用者不需偿还代价，大量地使用出来，大量地流入民间，东北的金融情况可知。举一个例，譬如长春、沈阳等名城的房产建筑物，凡可接收的，每每有了新置产者，契约上签字卖产者是日本人，所得的购价是军用票。东北原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东北的金融如此，不仅影响了东北民生，也影响了全国的金融。最近黄金涨价的狂潮，固然有推波助澜的投机家，而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平津黄金源源出关。流入东北的黄金，难保不出口，而民间也不免购藏，一般心理自然信任黄金，而不信任钞券。平津京沪物价之涨，上海工潮之波动，与黄金潮及东北金融情况都多多少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报人王芸生因上述几篇社评在二十年后的文革中被清算“反苏罪行”）同日，傅斯年、储安平、王云五等二十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说：“中国在反侵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外交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2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阐述国民政府东北问题三原则为：必须符合我国的法令，尊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不与我国所签订的一般国际协定相抵触。

一月底至三月初，全国各地学生游行请愿持续不断。其中，重庆高校举行了两万人参加的反苏爱国大游行，举刀刺斯大林像，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苏联必须归还东北抢夺的物资”、“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捣毁了拥苏的中共《新华日报》和民盟《民主报》的营业部；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校万余学生赴苏联总领事馆示威；南昌市中正大学及南昌

中等以上十四所学校万余名师生举行了反苏游行示威；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王力、向达、沈从文、吴大猷、陈序经、贺麟、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雷海宗等百余教授发表了对东北问题宣言，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在国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团体也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国东北，要求苏联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立即从东北撤军，归还东北物资，要求“国际组织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苏方于其占领东北全部期间所作之行为”。

受中国反苏运动影响，美国民众促政府制止苏联霸占中国东北的呼声高涨，美、英相继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拖延从中国撤军，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抢掠的机器设备。回应美、英声明，苏军驻沈阳司令承认苏军拆卸东北机器装备运往苏联，但坚持苏军的行动符合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密约》。苏联的回应使合谋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美、英政府无言以对。蒋经国在晚年《自述》中记述从苏联占领东北到中国反苏运动的历史写道：“林则徐说：‘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这是金石之言！民国三十四年二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史大林订了雅尔达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达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中苏条约。在谈判的时候，美国方面有人主张：‘要结束战争，必须苏联参加，要苏联参加，他当然要提出对他有利的条件，等到他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给他好处。’到了今天，外蒙古、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的军港，乃至整个大陆，苏联都攫取去了；然而他究竟用来对付谁呢？”

民国三十四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史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

接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史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史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史大林。史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

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谓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在雅尔达协定中，规定东北的行政权及一切主权，都归中华民国政府。可是，苏联的军队来了，一切都等于废纸了。他用一切力量来掩护和培植林彪的部队，直到林匪的部队的力量可以支配整个东北的时候，才开始撤退。他们向我政府口口声声称道‘友好关系’，可是，日本关东军缴来的武器，就不肯给我们。经根据条约一再向他们交涉，到他们没有办法抵赖的时候，答复我们说：‘应该照办，不过，你们过一个星期再来。’过了一个星期，再去交涉时，他们说：‘等过两天再来。’又过了两天，他们说：‘对不起！关东军的武器原来是放在火车站，因为装车装错，运到莫斯科去了。’后来，我们去了一个公文，质问他们说：‘这么多的东西，怎么会不晓得而装错了呢？又不是一两个箱子，怎样会搬错？’他们满不在乎地回一个公文来说：‘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根据同盟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你们。共计步枪三千枝，马刀一百四十八把，东西现存哈尔滨，你们自己去收回。’这真是和我们开玩笑！其实他们是把武器交给匪首林彪，用以打击我们的政府了。

俄国不但要侵略我们，并且时时刻刻企图离间中、美两国的关系。我且举出两个事实，来证明俄帝的这种阴谋：第一件事，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东北交涉发生最后一次困难的时候。父亲为了要解决东北和中、苏有关的许多问题，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资格再去访问史大林。当时史大林曾经对我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至于俄人用武力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自满清入关以后，就开始了；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伊宁事件为止，不知若干次。因为，军事的侵略，是公开的劫掠，众目睽睽，没有人不知道是强盗行为；只要稍微涉猎中、俄关系历史的人，都会明白，用不着详细加以解说。我们统计，自一六四四年起，到大陆沦陷为止，俄国掠夺我们边疆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外蒙古在内，共有六百五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而与我们现有领土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父亲说：‘俄帝本是我们中国的世仇大敌！’”

斯大林武装中共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多次前往苏联使馆，申请获得苏联方面军火扶持以对国民政府开战。正在逼迫国民党政府“战利品合营东北”的斯大林指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与中共保持距离，不表态支持中共开战。蒋介石拒绝访苏邀请和“战利品合营东北”建议后，斯大林决定：苏军从中国东北撤军以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扶持中共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1946年2月28日，苏联开始从东北撤军，同时背弃《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将东北城市交中共东北局接收，授意中共“放手大打”。有了苏军支持内战的表态，毛泽东病愈复出，指示东北局“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28] 致电军调处代表周恩来拒绝国民党任何接收东北大城市的要求。苏军的通知让中共高层们感到毛泽东在半个月前坚持开战主张的英明。刘少奇赶紧承认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是犯了错误。其实，毛、刘主张都不重要。中国和平或战争取决于斯大林决定。若蒋介石接受“战利品合营”建议，则斯大林将命令毛泽东停止内战，苏军将再次驱赶中共军队，刘少奇就对了。

3月初，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了第二次全会。外交部长王世杰向大会报告了关于苏联以不撤军相压迫的情况。与会者群情激愤，要求立即宣布废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罢免经手交涉的王世杰。张继、邹鲁、谷正纲、潘公展等人提出必须坚持要求中共放弃割据政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宗旨，抨击国民政协代表让步过多。全会后，外交部根据会议要求照会苏联大使，要求了解苏军从东北撤军的情况。紧接着，国民政府召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以国民党控制国民参政会为由，拒绝派代表出席。参政会议通过决议案，呼吁中共切实依照协议，停止内战。同时，社会各界也呼吁国共双方和平谈判，避免国家在长期抗战后再开内战，胡适、傅作义代表各界致电毛泽东呼吁放弃武力，参加政府。中共的外围组织民盟提出倾向中共的妥协方案为：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不派军队进入，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解决东北问题。

两会议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连日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谓“反动顽固派的猖獗行动必须立时制止”，莫斯科的广播也猛烈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称重庆反动分子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条约》，破坏政治协商的各项决议，推动反苏运动。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不知道，甚至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也不知道，斯大林正在采取下列举措扶植中共向国民政府开战。

军火扶持

1946年3月，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撤军，将城市交中共立即占领，将缴获的关东军精良装备交给中共。时任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道：“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曾司令员见到的只是苏联提供军火的一部分。二战结束时，斯大林手上有巨量剩余军火，包括苏制军火、捷克斯洛伐克制军火、缴获东北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的军火、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的军火。他将剩余军火卖给中共，其中包括重型武器、美制耐寒军械，上百万支步枪、机关枪，数千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数百辆坦克，近千架飞机，数千辆机动车，数百万发炮弹，数千万发子弹，数十万个手榴弹，数百吨炸药、数百万只雷管、百万米导火线，此外还交给中共数百座军用仓库及一支松花江舰队。[29] 赫鲁晓夫后在回忆录中披露：“战败的日本兵放下武器，我们将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了中共。我们避免暴露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办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中共去取。”[30] 有了苏军提供的重型武器，中共军威大震。苏军撤出长春后，中共军队开始使用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向城内国民党军进攻，几天就击败国军占领了长春。

中共需要掩盖依靠苏联军火扶植推翻国民政府的真相，苏共也想掩盖以军火扶植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事实。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米高扬说：“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后，林彪部队在进入北平时将苏制武器全部上缴，换了美式装备”。[30] 他要通过米告诉斯大林中共作好了保密工作。为掩盖真相，中共定下了解放军军火缴获自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宣传调子。建国后，《解放军炮兵史》几十年难产。原因无它，要符合上述宣传调子，这炮兵史就没法写。在国共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千门榴炮运到山西打下了晋中，再运回东北打了辽沈战役，再运往华东参加了济南、淮海战役。中共的炮兵史最好地揭示了“三大战役”是如何制胜的，是苏联提供数千门大炮和技术人员催生了中共炮兵。中共的《坦克兵史》也是一样。

与国民党北伐时的飞行员、铁甲车手是俄人一样，中共最初的坦克手也是俄人。

人力资源扶持

苏俄不仅向中共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还向中共派出了技术兵种人员。例如，与北伐战争中一样，苏俄提供的坦克、大炮、飞机配有苏俄军事人员。根据多年后俄罗斯公布数据，近千苏联士兵死于中国的解放战争。这不仅披露了苏军秘密参加中共解放战争的规模，还说明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并非单纯的中国内战。

派苏军人员来华扶植中共之外，斯大林将整体投降的二十万满军交中共整编。这些满洲军与因苏联拆毁东北工厂制造出的数十万失去生活来源的东北失业大军一起，成为中共东北野战军迅速扩充的兵源，帮助中共在半年内扩充出几十万“东北民主联军”。国共东北开战后，斯大林将在朝鲜组建、训练并武装的数万朝鲜族精锐部队调入满洲，并入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31]因为这一扶植举措，几年后斯大林、金日成理直气壮地要求毛泽东调四野朝鲜族师入朝加入朝鲜人民军。

技术扶持

与二十年前向“南北二赤”派顾问一样，斯大林向东北野战军派出了数千名军事顾问。这些军事顾问参与军事指挥，为中共开办了空军、炮兵、工程兵等一系列军事学校，帮助中共组建了空军、炮兵、工程兵等新兵种。派苏联顾问之外，斯大林还将日本战俘中的数万技术人员秘密交中共东北野战军收编。这数万日本技术人员有军官、教官、飞行员、军工技师、工兵、化学兵、炮兵、无线电兵、医生、护士、摄影师、电报员、汽车司机、火车技工。这些日本技术人员成为苏共为中共所建一系列新兵种的教官，帮助中共培训出了空军、炮兵、工程兵，帮助东北野战军保养、维修日本关东军武器，日本战俘中的医护人员受命为东北野战军培训军医，治疗护理共军伤病员。

[32] 国共战争中的东北野战军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留用的日本战俘。[33] 众多东北野战军将士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日本军医、护士的治疗照顾的感激。当时效力中共东北野战军的日军战俘中村义光（日本“回想四野会”会长，1990年“回想四野会”赴东北代表团团长）回忆，他与八十余日本战俘一起被留在了东北野战军后勤医院工作，原以为会受八路军歧视，没想到获称“同志”，享受到特殊生活待遇。日本战俘们感激八路军的优待与尊重，拼死效力，为中共的东北解放战争立下无数战功，获颁奖章无数。例如，中村义光在四野六次立功，其中三次为大功；“回想四野会”赴东北代表团成员团本间雅子披露，她与四野的日本战俘同事在辽沈战役中三天三夜不合眼，抢救医治了两千多伤员，吃饭都在手术台上，并且全体为共军伤员输血。[34] 关东军王牌部队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被苏军解除武装后整体交中共收编，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该大队中的 20 名飞行员、24 名机械师、72 名机械员和 200 多名地勤人员也得受到中共的生活优待，帮助中共建立了东北航空学校，[35] 为中共培养出了 160 多位飞行员。

斯大林向中共提供技术人员扶植是中共东北野战军军力迅速提升的重要原因。没有这方面的扶植就没有中共在东北战场迅速战争国民党军的胜利。不仅如此，中共建国之初仍受惠于斯大林的技术扶持。日本飞行教官主持的东北航空学校成为中共空军的摇篮。从该校走出了 23 名开国大典空军阅兵飞行员，走出了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和功勋飞行员张积慧等新中国空军精英。被留用的日本战俘铁路技术人员成为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上千日本铁路技术人员主持修建了兰新铁路、山西铁路改造工程。四野第 29 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回了火车司机本行，在新中国受命为毛泽东担任南巡湖南段的专列司机。因为日本技术人员的贡献，周恩来 1956 年 6 月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他没有说的是，中共首先要感谢斯大林，因有斯大林的决定才有日本技术人员的效力。

后勤扶植

经过苏军半年祸害，整个东北工矿歇业，铁路停运，商业凋敝，贸易断绝，经济千疮百孔。苏军撤离后，政府军占领了东北中部，国民政府接管了中长铁路南线，五个中共解放区彼此孤立，在东北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这时，斯大林的强力扶持成为东北中共渡过难关决定因素。苏军帮助中共开辟了安东（今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通化经辑安、满浦到图们，大连到南浦，大连到罗津等水陆运输线。1946年11月，东北共军兵败南满，大军连同数万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退入苏军控制的朝鲜休整，在那里获得了后勤、医疗支持。随后，中共东北局将绝大部分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通过朝鲜沟通中共北满与南满根据地，使中共关外、关内与山东半岛形成了一个整体。毛泽东称中共在东北的地盘是背靠苏联，两侧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的舒适的“沙发”，800公里中朝边境是“我们隐蔽的后方”。有了苏军保护下的朝鲜后方，“东北民主联军”无国民党军背后、侧翼袭击之忧，得以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才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

斯大林为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的另一隐蔽后方是苏军控制下的旅顺大连。斯大林为扶植中共预作安排，在破坏东北工业基础时为中共保留大连部分钢铁、机械、化工基础设施不加破坏，苏军撤离时交中共控制，将在押的大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移交给中共东北局作为技术骨干，帮助中共在旅大建立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军队训练基地。国共开战后，斯大林再将满洲化学、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品等六家工厂移交中共，派苏联专家前来协助。在苏共扶持下，中共成立起了大连建新公司，利用大连港从上海、天津、香港、朝鲜运来军工生产原材料，在大连兵工厂开始了军火生产。国共战争中，大连建新公司等东北军工生产基地生产了火炮数千，各种炮弹数百万，手榴弹数百万，子弹数千万。这些军火源源不断运上了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作战前线。[36] 军火之外，旅大基地还向前线输送大批兵员、被服、医疗队。[37]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坦言：“我们除了没有飞

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38] 中共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大连军工生产问题给中共东北局并告华东局电》、朱德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派干部到大连组织兵工生产》的电报和《中央军委关于抽调干部去大连办兵工厂致聂荣臻等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在大连成立军工生产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派军工技术人员问题与中央军委、董必武的往来电文》等等。这些文电说明了大连兵工厂对于国共战争之重要，但没有说明军工基地是如何得以创办。中共不说的决定因素是苏联的扶植。

物资扶持

在苏联远东地区人民战后极为困苦的背景下，斯大林批准了“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计划，派百名专家到中国东北执行这一计划。根据援助计划，苏共与中共东北当局订立了秘密贸易协定，向中共东北控制区输送紧缺物资，中、苏、朝三共在平壤成立了军事合作委员会协调三共间的贸易事项，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和北朝鲜四个港口设立了办事处，负责接收援助事宜。苏共从朝鲜运送到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军火、粮食、煤炭、食盐、布匹、医药、工业品、电气、广播、印刷和摄影等器材设备等各种物资 2000 多车皮。[39] 这些物资不仅满足了中共东北战场的需求，还转运山东、晋冀鲁豫等各根据地。[40]

国共东北决战需要铁路网运兵、运物资，但当时的中共不具备修复铁路的技术。斯大林派苏联前铁道部长柯瓦廖夫(IVAN KOVALEV)率专家组赴东北帮助中共修复东北铁路网。为掩盖苏联介入东北之战，中共成立了吕正操为局长的东北铁路总局作为对外幌子，铁路总局的真正首脑是柯瓦廖夫。柯瓦廖夫主持将日式窄轨铁路改建为苏式宽轨，开通了苏联援助中共战略物

资的运输动脉，修建了大连码头的专用铁路，将存放在大连的数十火车头从车场运到大连码头装船，经对马海峡，运到朝鲜清津港，再转运到北满，修复了东北万余公里的铁路，百多座桥梁，使中共具备了能快速运输大部队和苏援重炮坦克的能力。苏共还通过远东外贸运输公司在佳木斯、富锦等处修建了码头，在哈尔滨增建了码头，于 1947 年春开通了援助中共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松花江航线，开始经此运动线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团城向东北解放区的后勤基地，军事院校和中心医院的集中地佳木斯市定期供货。东北局成员张闻天与苏联外贸和运输部门密切合作，通过松花江航线经佳木斯转运大批燃料、药品、衣服、靴鞋等军需物资到东北共军各部。

有了从苏联、朝鲜源源运动来的物资，有了日本、苏联的军事顾问、技术顾问，有了朝鲜、大连的后勤、军工和安全休整基地，有了修复的铁路和桥梁以迅速调动军队，中共调入东北的八路军迅速扩充成了几十万大军，在短短一年中形成了对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优势。斯大林扶植的不仅是一个东北四野，而是中共四个野战军，即国共战争中的全部共军。向中共提供军火并非无偿，斯大林通过挑起国共战争做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火生意，将战后剩余军火卖高价给了中共。中共在控制区推行暴力“土改”的背后是搜刮东北、华北农民的粮食，而搜刮粮食背后的动因是苏联援助协议中的粮食偿付军火债条款，中共每年须运去苏联数百万吨粮食以偿还军火债。

建国后，中共极力掩盖国共战争的苏联操纵性质，宣传中共推翻国民政府是靠“小米加步枪”，是靠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那里缴获的武器。事实上，东北决战中，中共的坦克、重炮决定了战争的胜败，东北野战军的军火来自苏援。二十年前，斯大林向“南北二赤”提供金钱军火规模巨大，足以推翻北洋政府。此时，斯大林向中共提供金钱、军火的规模更大，足以推翻国民政府。了解这些史实就会清楚，新中国的缔造者不是毛泽东，不是中共而是斯大林。是他缔造了东北野战军和东北根据地，是他缔造了中共四个野战军，

东北国共之战并非内战，而是与当年北伐战争一样，是苏俄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二十年前，苏俄运给“南北二赤”军火，给中国带来连绵战争，废墟和尸骨。长期抗战后，苏俄再给中共运来军火，再次将中推入战火，造成中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斯大林的这次扶持不仅带给中国四年多的国共战争，还埋下了朝鲜战争的祸根。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开战过程中，中、苏、朝三共约定朝共帮中共打天下后中共再帮朝共打天下，实际约定好了朝鲜战争。

美国的“联合政府梦”

斯大林有实力推翻中国政府，但能否做到取决于头号强国美国的政策。二战中，美国民主党政府亲共恶蒋，期望从延安窑洞走出未来中国的领袖。二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奉行亲共政策，幻想将美国的两党民主制移植到中国，拉国、共两党和谈。在中共抢占东北，破坏交通线，阻止国民政府受降时，美国军派飞机送林彪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中共将领到东北、华北前线指挥部，比帮助国民政府空运还早。

毛泽东坚持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无意谈判。但他须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命令毛泽东谈判，以向美国证明自己无意挑起国共开战。蒋介石无力抗拒苏联扶植中共武力推翻，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出手制止斯大林的颠覆。然而美国人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只好与中共谈判。由于共产党坚持军队、地盘不受染指，坚持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目标，谈判破裂。拉两党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失败后，具体操办人赫尔利大使辞职离华，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将军(GERGE MARSHALL)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停火和谈。马歇尔 1920 年代曾经驻华，与史迪威一样能讲汉语，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憧憬延安。二战中，他与史迪威携手，推动罗斯福总统停止援助国民政府，建议援助中共，是“史迪威事件”的主角之一。来华后，他立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声明美国援助须以国共两党和平建立联合政府为前提，迫使国民党与中共签署了停火协议，然后拉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三十八位与会者中有国民党代表八位，共产党代表七位，民主同盟代表九位，青年党代表五位，无党派社会贤达九位。会上，军政部次长林蔚报告整编军队计划，拟在年内将现有 253 师 380 万的军队缩编为 90 师 180 万人；国民党代表提议如期于 5 月 5 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除已选出的代表外，其余名额合理增加，第二届国民大会于宪法颁布后六个月内选举召集；青年党建议公平编遣，军民分治，军党分立，设国防部；民主同盟建议现役军人脱党，大量裁军，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美国顾问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后代以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负责制定方案以贯彻协商会议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期望解决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军事分歧，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

1 月 31 日，会议程序上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政协决议。其中，《和平建国纲领》要点为：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政府组织案》要点为：改组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政府，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大会案》规定 1946 年 5 月 5 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军事问题案》要点为：军队属于国家，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宪法草案案》规定，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公布之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提出修改原则十二项，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提出的意见，加以整理，制定五五宪草修正案。

政协会议不光是马歇尔促成，还是斯大林促成。中共派代表出席会议是奉了斯大林的指示。在蒋介石未正式拒绝“战利品合营东北计划”前，斯大林指示中共学习“法共经验”。后者是邱吉尔与斯大林按“百分比”瓜分欧洲为各

自阵营势力范围的产物。根据百分比协议，斯大林承认法国为西方阵营势力范围，指示法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推翻政府宗旨，交出军队，拥护政府。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周恩来向中共高层介绍了“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主持中共中央的刘少奇主张配合马歇尔的停战和政协会议建议，认为中共在国家一片废墟，举国盼望和平时应学习“法共经验”，下达指示称：“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在和平曙光出现时，毛泽东出院参加了高层会议。他看清了斯大林将支持中共开战的前景，看清了美国推动停战、建立联合政府政策有利于中共开战，在会上否定“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指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命“东北民主联军”向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2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宣布国共双方十八个月内大规模裁军的方案。然而紧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向政府军发动进攻，歼灭了国军五个营，使短暂的东北停战局面和全国和平的曙光随之消失，同时也宣布了裁军方案无效。多年后，毛泽东评论刘少奇主持中央推出的避免内战方针略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41]

3月初，马歇尔在反苏运动高潮中飞抵他向往了多年的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为马来访作了精心的准备，率中共专门筹组的仪仗队到机场欢迎。会见中，毛泽东向马歇尔大谈向往美国、向往民主，表示喜欢美国胜于苏联，称如果能出国访问将首先去美国。会见后，中共安排马观看“黄河大合唱”。马歇尔对毛、周的民主言论和大合唱极为受用，对延安更增好感。他不会想到，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正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大城市，毛泽东在会见期间指示东北局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阻止国民党军出关，他更不会想到，毛泽东为接待他把会讲英语的儿子都送到了乡下，以免儿子说漏了什么。[42] 马歇尔刚离开延安后，毛泽东一面指挥向东北国军开战，一面与周恩

来商定了专骗美国人的双簧策略，即周恩来在军调部与马歇尔商量停火方案，毛泽东在延安拒绝军调部的方案，以让军调处实际作废。

国军登陆东北及陆路出关被阻，只好陆路强攻出关。毛泽东要求独占东北，完全不允许国军出关接收，电令林彪、彭真：“马歇尔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寸土必争”。4月，郑洞国率领的国军与林彪率领的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展开了激战。经过一个月血战，双方伤亡均以万计。毛泽东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口号（马德里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要求死守四平。5月18日，孙立人率国军新一军突破共军防线，击败了共军。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接林彪急电，中共东北局紧急请求苏军出兵相救。斯大林担心美军介入拒绝出手援助。等待苏军出兵无望，林彪弃守四平率军北逃，被孙立人乘胜追击得溃不成军，弃了长春一直逃过松花江。正当东北民主联军丧失还手之力，孙立人率军追到哈尔滨附近，毛泽东准备弃守哈尔滨退往苏联之时，马歇尔出手救中共，以停止援助、停止帮助运兵相威胁，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追击及同意停火十五天。帮助东北民主联军保住哈尔滨后，马歇尔再逼迫国民党签定了松花江停战协定，将停火期延长至四个月，以调停的名义帮助获得了喘息和休整的时间。

在1946年5月至9月停火期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接受苏联军火，改编投降苏军的二十万满洲军，接受苏联的军训，军事实力倍增；变化之二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对“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展开清算，将支持方针的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降职为副书记、副政委，任命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兼任政委和东北局书记，将东北第一把手彭真原地降职为林彪副手，不久再将彭真调离东北，将反对刘少奇的高岗提拔为东北局副书记，排除了刘少奇对东北的影响（多年后，

“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成了刘少奇的主要罪状）；变化之三是中共制造了“李（公朴）、闻（一多）刺案”，推动美国朝野掀起了反对援助国民党政府浪潮，促使美国国会和政府决定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停战之前，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战无不胜。经过四个月停战，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脱胎换骨，在军队数量、兵源、武器装备方面均超越国民党军，而国民党不获美国援助，军心动摇，国、共在东北战场实力对比逆转，国民党军陷入被动挨打处境。

东北停战期间，共军在华北发动了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东北停战期结束后，林彪指挥十二个师三下松花江南，深入国民党军后方打歼灭战，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胜利。“三下江南”作战中，苏军提供的重型装备成为制胜法宝。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政委的吴法宪写道：“林彪告诉我们说，新一军难打，他们一个营，我们就要用一个师去打。五师一万多人要全部出动，还要外加一个坦克中队的四辆坦克。……大概经过三个小时，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加上一个保安团全部被我们消灭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坦克协同作战，感觉这坦克真是个好东西。”[43] 东北民主联军的另一制胜法宝是潜伏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刘斐、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的郭汝瑰等红色间谍事先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通报给中共，成为中共在东北决战中的幕后功臣。

在国共战争从东北蔓延全国过程中，马歇尔主持军事调解处向国共双方不断发出停战令。马氏的停战令的真实作用是偏帮中共。因为，美国对中共没有影响力，所能做的无非是以停止援助施压国民政府，禁止蒋介石开战。这样，美国政府在华政策和军事调停实际是只许中共开战，不准国军开战，纵容毛泽东大打出手。在国共之战升级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默认斯大林推翻国民党政府，同时变相承认美国在华的“联合政府梦”破产。年底，中共策划了“沈崇事件”，以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情节在全国发动了煽动起了反美示威运动。美国在华的海军陆战队在各地反美示威中撤离。1947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国共谈判破裂，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同时宣布苏联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的承诺，决定废除 1945 年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中共针锋相对，宣布自 3 月 5 日起，废除从未具有意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改称共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则关闭了马歇尔主持了一年的军事调解执行部，将其改称“对华联络处”，将罗斯福为援助中共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从延安撤离，将马歇尔召回（马不久后接任了美国国务卿）。

国共全面开战

1947 年 3 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制定出“重点进攻”的作战计划：重点之一是进攻延安以摧毁中共指挥中枢；重点之二是进攻中共山东根据地，集中兵力寻找中共主力决战。潜伏在国民党指挥中枢的共谍郭汝瑰、刘斐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计划报给了延安。得到情报，毛泽东采取坚壁清野、主动撤离延安策略，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精干机关与少量军队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派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平山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派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建后方工作委员会。毛敢于不离开陕北不光是因为派在胡宗南身边共谍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情报后三杰）等人不断递送来胡军动向情报。据说，胡宗南与张治中一样，早在黄埔军校时就被共产国际发展为了红色代理人。在胡率几十万大军在陕北“重点进攻”的一年中，一系列事实让人相信胡通共之说：胡军没有找到中共主力决战，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中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主席依然留在陕北；中共不仅仍控制着陕北大部分地区，还从容地搞土改运动；毛泽东在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范围内，带着电台，与苏联保持联系，向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发指示；毛与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因有通共的国民党军主帅相助，向来惧怕风险的毛泽东在胡军进攻面前淡定自若，在胡军攻进延安前几小时才离开。当时随同毛在陕北玩捉迷藏的机要人员后来披露：“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

也没公开”。[44] “重点进攻”的主帅通共，进攻大军稀里糊涂地葬送也就不奇怪。

在山东作战方面，潜伏共谍同样大显神威。中共华东野战军得到参与国民党最高机密的国军中将韩练成提供的国民党军军事情报，在莱芜战役中歼灭数万国军，乘胜扩大战果，将鲁中、胶东、渤海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巩固了共军的后方。暗助共军取得莱芜战役胜利后，韩练成冒险返回南京，不仅未受国民党处分，反而被任命为总统府参军，直接参与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在随后的孟良崮战役决策中，他向共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使国民党军在山东错误百出。多年后，毛泽东赞韩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周恩来称韩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赞韩立下了“大功、奇功”。中共潜伏于国民党军的另一共谍奇兵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郭汝瑰中将。他将蒋介石对孟良崮战役的作战部署报给了中共，并向蒋介石隐瞒共军动向，推动蒋改变原计划，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进攻决策。随着国军王牌精锐整编七十四师被解放军全歼，抗日名将张灵甫阵亡，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一败涂地，国民党政府走向垮台。应当说，中共挫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决定因素不是毛泽东指挥有方，而是苏联的扶持。有斯大林提供的军火，特别是重型武器，中共对军事实力方面从对国民党军劣势转为优势。“调动国民党的百万大军”的共谍也不是中共安排，而是苏俄早年向援助国民党投资的收获，是孙中山为获金钱、军火援助与苏俄作交易，接受苏俄在国民党内部安插共产党人的结果。没有苏俄军火、情报方面的扶持就没有中共挫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胜利。

1947年7月，国民大会于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宣布共产党为颠覆政府的非法逆党，宣布国家进入非常时期，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规定之限

制”，赋予总统独裁的权力（这个临时条款直到 1992 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10 月，国民政府宣布受苏联和中共操纵和资助的中国民主同盟为“破坏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的非法团体，限令民盟成员到卫戍司令部登记。民盟这时有恃无恐，由主席张澜发布《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应付国民政府的取缔，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高层得中共秘密安排到达香港成立了新民盟机关。重新成立的民盟放弃了民主宗旨，以中共提出的“用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为新纲领。同月，国民党反蒋派人士在香港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与民盟一样，民革也是受中共领导和资助外围组织，其宗旨也包括了中共制定的“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等内容。长期以独立民主党派面目出现的民盟、民革其实早就是中共操控和资助的外围组织，它们的实际领导人基本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其中一些人是直到几十年后去世时才以遗体覆盖中共党旗的方式公开秘密中共党员身份。而且，中共通过秘密党员控制的团体不仅这几个指定“民主党派”，例如赵朴初去世盖中共党旗，被称同志时，人们才知道佛教协会会长是共产党员。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充满幻想，长期奉行“倒蒋亲共”的对华政策。二战后，杜鲁门政府坚持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却完全没有坚持要求中共放弃武力推翻政府的宗旨，显示民主党人愿意看到国民党政府被共产党推翻。苏俄能长期操纵中国走向有赖美国政策配合。在苏联扶植中共推翻国民政府时，美国“联合政府梦”的作用是偏帮中共，允许共产党开战而不允许国民党应战。杜鲁门、马歇尔的“援助只提供给联合政府”说法实际向蒋介石宣布，要获美国援助须经中共同意。斯大林有能力推翻国民政府，也有能力命令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但他能否推翻国民政府须看美国的脸色。美国有能力制止斯大林扶植中共，有能力挫败斯大林的任何计划。但是，美国的民意和美国民主党政府亲共，默认中国被赤化，

纳入共产阵营，配合了斯大林的推翻国民政府的计划。如此，美苏共同决定了国共战争的结果。

美国政府对斯大林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默认出乎蒋介石和斯大林的意料，但合乎毛泽东的预料。毛泽东从美国人在延安的兴奋神情中看出美国人喜欢中共，厌恶国民党，不会真正支持蒋介石，因此对和谈、联合政府始终嗤之以鼻，坚持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毛泽东判断对了，美国在日本投降后没有向国民政府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军事上无力对抗苏联扶持的共军，经济上无力应付长期抗战带来的经济危机，无力应付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沸腾民怨，迅速走向崩溃。

当然，美国人不是全部亲共。共和党人抨击民主党默认苏联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反对政府的亲共反蒋的政策。在共和党抨击的压力下，杜鲁门总统不情愿地派魏德迈为特使来华调查中国内战的情况。魏德迈率使团考察了国民党各战区后提出报告，指出了苏联支持中共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实情。根据魏的报告，杜鲁门总统决定取消实施了一年的对华武器禁运。**1948年11月**，美援军火物资运交给了国民党政府。但这时，国民党的败局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已经在安排退往台湾了，美援军火已如雨后之伞，可有可无了。

对于美国民主党整个**1940年代**的中国政策，不光美国共和党人谴责，连民主党籍众议员肯尼迪也批评说：“国会已经申明，美国远东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国民政府之稳固。而杜鲁门政府坚持中国必须成立联合政府，否则不予援助，使国民政府遭受惨重打击，使中国被赤化。我们曾为维护自由中国不惜一战，而今它却被我们的总统断送。”国民党政府垮台后，共产阵营立即发动了朝鲜战争，要求赤化整个亚洲。这时，美国人才开始抛弃长期的亲共政策，为整个**1940年代**的亲共政策付出代价。

第 34 章 第二条战线作战

一二一事件（昆明学潮）

挑起东北战事的同时，毛泽东向各地的中共地下党发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线”的指示，要求利用国统区民怨策动反政府活动。根据指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展开了“第二条战线作战”，以郭沫若、沈钧儒为首的重庆中共外围组织于 1945 年 11 月宣布成立各界联合会以“反对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口号相号召，鼓动罢工、罢课、罢市，中共云南省工委策动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在云大联合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

应对策动的所谓反内战学生运动，云南省政府向各大学校长发出急件，要求劝阻学生集会。大学校长们反对政府禁止学生集会的指令。11 月 25 日晚，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召集数千学生集会，安排学联代表和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轮流发表抨击国民政府打内战的演讲，派人散发了《昆明市大中學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和《致美国政府书》等传单。会后，中共地下党成立了“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罢联），宣布全市学校罢课，并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學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在其中提出“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军撤出中国、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等项要求。云南当局要求学生在限期内复课，警方采取了收缴传单，清除标语，驱散宣传队员的行动。中共地下党则以“反对镇压学生”的口号来号召学生继续罢课，挑战警方管制。

“十一月底，昆明共谍学生以反内战为名，煽动各大中学生罢课。反共学生则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之对抗，各已罢课学校因而纷纷复课。共谍学生乃进行捣乱，正当联大同学召集会议商讨反罢课事宜时，职业学生所组织之突击队冲入会场，动手殴打，破坏会议进行，并使用武器，相继闯入各校，强迫教员学生罢课。11月30日，联大共谍学生在校内公开集会胁迫同学罢课。昆明第二军官总队学员按预定时间参观大观楼，列队经过该校，该校共方学生以泥块砖瓦袭击总队，继以叫嚣辱骂，引起互殴。总队以书面质询未得反应，遂於十二月一日集体往联大师范学院质询。相持间，一失业军人陈奇达闯入向该院掷手榴弹，造成惨案，而该校文学院亦有人同时向军官队掷出手榴弹，伤军官队队员。据共方称死四人，伤二十人。惨案发生后，昆明市共谍学生即发动全市各校总罢课，卒由政府将凶手正法，治安当局撤职后，暂无告事。”[1]

12月2日，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报刊报导“一二一惨案”，发动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攻势。《新华日报》的社论写道：“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2]“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3] 舆论攻势的同时，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学生抬四位死难学生棺木在昆明环市游行，组织数万民众举行三天公祭活动，召集昆明四十多所大中学校举行总罢课，发表了《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全国各界支持及援助罢课运动。配合云南地下党的行动，中共在延安和晋察冀、

晋绥、山东等地，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声援，在国民党控制区各大城市以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相号召，在重庆、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召开了追悼“昆明四烈士”大会，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

学生罢课运动中，新任北京大学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受国民政府之命来昆明“调解学潮”。他在声明中要求学生不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尽快复课，同时要求政府将凶手正法，将治安当局负责人撤职以平息学生运动。接受傅的建议，蒋介石宣布查办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代省主席李宗黄、驻昆明第五军军长军邱清泉，云南当局取消了集会游行禁令，负担死亡学生的安葬费、家属抚恤费、伤者医药费。在国民党政府基本满足了“罢联”的要求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停止罢课，以“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联发表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复课宣言》，但继续以学生死难事件为号召，在联大图书馆设立了“烈士灵堂”组织各界市民吊唁，组织送挽联、写悼诗、写祭文、捐抚恤款等活动，组织宣传队在主要街道、工厂和郊区演唱《凶手，你逃不了》、《不买中央报》、《凯旋》、《告地狱》、《潘琰传》（死难学生）、《审判前夕》等歌曲、话剧，将反政府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3月17日，云南省工委组织三万多昆明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人为四位死难学生出殡，安排激烈反政府闻一多教授等人组成殡仪主席团走在前列，带领送殡队伍高举“军阀杀人”，“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标语牌和部分挽联，高唱《送葬歌》簇拥着四辆灵车通过昆明主要街道。罢联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和《告三迤父老书》，造成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盛大场面。至此，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历时四个多月的“第二条战线作战”达到了目的。[4]

对于“一二一事件”，合众社报导说：“重庆国共两方报纸，发生极大笔战，互辩谁当负担本月一日在昆明残杀学生，致手榴弹两枚杀死四人伤十二人之罪。国军喉舌《和平日报》宣称共党残杀了该等学生，中共《新华日报》则宣称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该等学生。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治在昆明公开审

讯时承认受左派人士以三万元代价雇用。”[5] 国民党特工作出“一二一事件”系中共地下党收买的失业军人陈奇达混入学校向集会投弹，炸死四位学生的调查结论。[6] 云南代省长李宗黄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昆明学潮，实为共产党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潮。”[7] 关于国共两党对事件主谋的对立说法，从事件的结果对谁有利不难作出判断。国民党中央和云南省当局没有理由制造血案让自己在国内外声名狼藉，搞到自己被查办，而中共云南省工委奉命组织“第二条战线”作战，组织集会，制造血案，发动舆论攻势，停尸，设灵堂，组织出殡等一系列行动环环相扣，是陷政府于不义的最有效策划。从事件带来的结果看，国民党人的调查结果更令人信服。革命史告诉人们，制造血案、嫁祸政府以达到颠覆目的是革命党的惯用套路。民初的“宋教仁刺案”，北洋政府时的“三一八惨案”、“一二一血案”，半年后的“李、闻刺案”都是这样的套路，都是革命党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特点的展示。“一二一事件”与随后发生的“李、闻刺案”、“北平沈崇事件”、“南京五二零事件”、“公费运动”、“吃光运动”等等事件构成了中共在“第二战线”对国民政府的攻势，是中共“一校一事运动之预谋”。[8] 对于国民党得出的“一二一事件”系中共策划的调查结论，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反驳说：“我们从来没有煽动过学生罢课”。但多年后，中共地下党员们在回忆录中纷纷披露，他们确实国民党控制区煽动罢课、示威，领导了“一二一事件”前后从集会、罢课到送葬的四个多月的系列行动。在利用学生之死打击政府这一点上，“昆明一二一事件”与“三一八惨案”手法一致，证明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国，凡学生罢课、请愿运动背后必有苏共或中共的操控之手。这就是胡适、傅斯年等人一贯谴责“以学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道理。

李、闻刺案

昆明“一二一”事件中，中共地下党发布的《昆明市大中大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致美国政府书》等文件突出一个诉求——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目的显然针对美国两党和国会

正在辩论的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亿美元贷款案。民主党人反对援华的理由是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腐败，镇压民主。对于美国的这一情况，中共通过郭沫若向美国亲共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问计如何阻止美国对华贷款案通过。费献计：蒋介石独裁的新证据将有效阻止美国援蒋。于是，中共开展“第二条战线作战”，要轰轰烈烈地制造国民党政府镇压民主的证据。由于国民政府应对“一二一”血案和随后的学生运动无误，惩办了云南当局的军政官员，抚恤了死难者家属，中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一二一”血案后，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了 6103 日持久的声援昆明学生的运动。1946 年 7 月，在声援昆明学生的示威运动吕，因激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独裁而闻名全国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留美名教授在一周内相继遇刺。刺案后，中、美两国的知识界同时掀起了声讨国民党政府的运动。在中国，梅贻琦、朱自清、胡适、梁思成、傅斯年、沈从文等学者撰文谴责暗杀；在美国，费正清率左派学者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残暴、独裁、反自由、反民主、暗杀民主人士，呼吁国会断绝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9] 再联名率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 53 位教授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停止一切对华军事、财政援助。”与美国左派相配合，中共在延安、重庆两边通电，掀起了全国性的谴责国民党暗杀及悼念李、闻的运动。蹊跷的是，闻一多在李公朴遇刺后发表的演讲中宣言“等着第二枪”，没两天，闻遇刺。闻遇刺后，与李、闻一样有留美背景，以高调反政府著称的名教授陶行又发表“最后宣言”，称“等着第三枪”，没几天陶猝亡。与当年共产国际将鲁迅葬礼办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一样，中共在悼念运动的高潮中将陶行知的出殡办得与昆明“一二一”事件死难学生出殡一样盛大，组织了浩浩荡荡队伍由上海送陶灵柩到南京晓庄公葬，沿途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为陶树立了“万世师表”、“民主之魂”两面大旗。毛泽东在延安，宋庆龄在上海分别为陶题词。中共召集民盟等外围组织在香港、新加坡、纽约同时掀起了悼念李、闻、陶运动，将悼念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联系中共问计费正清，“一二一事件”提出“要求美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

即不得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诉求等事实让人相信，从与昆明“一二一事件”到“李闻刺案”，再到悼陶运动，持续一年的系列打击国民政府运动是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策划。毛泽东纪念陶行知只是“第二条战线作战”中的策划反政府策划，并非真心。从毛在几年后发动批陶运动的事实看，陶在“最后宣言”后猝亡是否巧合值得怀疑。

中共早在抗战爆发之初就制定了抗战后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毛泽东在苏联出兵东北后发表的一连串的所谓对日作战命令实际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开战令，东北已经开始的内战是因为中共阻止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国军无奈只得打出关外，中共接受苏联提供的军火已经挑起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参加“一二一”罢课运动和全国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师生们不知道上述情况，很容易被“要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等口号煽动起来，成为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工具。美国民主党政府知道苏联以军火扶植中共的事实，但不愿放弃长期以来的亲共恶蒋政策，继续以停止援助施压，迫国民政府与中共组联合政府。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极为成功，昆明“一二一血案”、李、闻刺案、全国纪念留美教授运动产生合力，推动美国朝野掀起了谴责国民党政府独裁的浪潮，淹没了援助国民党政府、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声音。其实，美国左派中的多数知道苏联和延安取缔一切反对党、取缔一切独立报纸和反对声音的独裁真相，知道国民党政府治下允许中共在国统区召集反政府集会、出版反政府报刊、发动罢工罢课、散发反政府的传单宽容政治环境。不过，他们受亲共思维左右，积极推动政府停止援华。在谴责国民党政府独裁的浪潮中，美国国会作出决定：停止对华贷款谈判，停止延续租借法案，停止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停止培训海军等一系列原定支持国民政府的合作项目。杜鲁门总统通知蒋介石，在国民党改变压制民主的独裁政策之前，美国不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在苏联军火援助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国会的决定实际宣布美国准备接受国民政府被推翻的事实。至此，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了胜利。

关于李、闻刺案，中共长期宣传刺案系国民党特务所为。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共认可的李、闻刺案证词都互相矛盾：李公朴太太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说李遇刺时是夫妇同行，一声枪响；中共 1958 年宣判的凶手谢继舫在供词中说李遇刺时独行，三声枪响；[10] 闻一多之子先说闻遇刺时“枪声大作”，[11] 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又说“美制无声手枪，声音很小，没有人注意”。从国、共两党当时的需要和刺案给两党带来的影响来判断才能接近历史事实。李、闻刺案时，国民党政府在昆明“一二一”血案后受到国内外的声讨，被迫将云南军政高层撤职以平息全国的抗议运动，没有再加害李、闻的动机。而中共大有制造血案的需要。为执行毛泽东在国统区发动打击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作战的指示，为找到国民党独裁的新证据，激发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以阻止美国援助国民党，选择有留美经历，又激烈抨击政府的李、闻行刺是合理设计。刺案十多年后，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张君达偷渡到香港后，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负责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的前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朱杰勤披露曾参与部署暗杀李、闻，并解释说：“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12] 时任驻昆明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吴思珩回忆写道：“昆明学潮过后没几天，跟着李公朴在昆华路演讲，骂领袖、骂政府不顾青年。共匪想利用时机把事态扩大，不择手段。在他演讲后回到家门口，即被共匪打死。那时昆明学潮还未了案，惟恐事态继续扩大，我们那里还敢把李公朴打死呢？这是共匪想造成大乱而制造的血案。军官总队的肇事案里（昆明惨案）究竟有没有共匪混在内，我们不晓得，但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是共匪所为。”[13] 革命党没有道德良心底线，惯用制造血案嫁祸政府、政敌手段。孙中山、陈其美暗杀宋教仁嫁祸袁世凯，制造叛乱借口；孙中山暗杀程璧光嫁祸桂系；中共制造“三一八惨案”嫁祸段祺瑞政府；斯大林暗杀张作霖

嫁祸关东军；斯大林制造卡廷森林大屠杀嫁祸德国人，了解了上述案例才能更接近“一二一血案”和“李闻刺案”的真相。

从结果看，昆明“一二一事件”和李、闻刺案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达到了苏共、中共阻止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目的。由上述事实可见，从中共为昆明“罢联”拟定的《告美国人民书》，到李、闻刺案，到联络美国教授联名谴责，是中共在第二战线环环相扣的精心布署。在多年后的文革中，中国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鲁迅的书几乎无书可读，然而，人们却可以买到费正清的著作。这种待遇应是毛泽东所决定，一是因费的亲共立场，二是因毛感谢费对“第二条战线作战”的贡献。

沈崇事件

李、闻刺案没几个月，中共北方局制造了“沈崇事件”。事件过程为，中共控制的亚光通讯社在 1946 年底报导“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中共地下党将这篇报导的剪报在北大校园贴出，召集女生集会抗议暴行，要求惩凶、道歉、赔偿以外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口号，然后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铁道管理学院、北平师范学院等八校学生、教授罢课、游行示威，中共中央接着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部署在各大城市及海外华侨中举行示威请愿要求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号召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上海、南京、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等地中共地下党跟进，联手发动了全国性的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的反美运动，组织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文艺界地下党组织聂绀弩、艾芜、何其芳等百余红色文艺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等等。这场由“沈崇事件”引发的“全国反美抗暴运动”持续了近一年，其间，美军在反美声浪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中共在美军撤离后宣布“第二条战线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反美运动中，胡适指出，事件本来是一个法律问题，后成为国际政治问题并引发反美风暴浪潮极为不妥，身为师表的教授们从事了与身分不符的行动。他的看法遭到学生们的痛骂。上海市长吴国祯、北大校长傅斯年以及众多报刊都指出，沈崇事件和反美运动是中共所策划和操纵，是对反苏运动的报复。吴、傅和独立报刊的理由很简单，对苏军在东北疯狂奸淫不置一词的中共渲染沈崇事件背后肯定不可告人的动机。

沈崇事件后，美国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审判档案中记录了法庭组成情况、审理情况、控方控告、辨方抗辩、法庭调查结果、法庭上出示的地图的照片、手套的描述、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大衣、内裤、上衣等的描述，辨方证人对所说强奸发生的地点对行人和交通情况的观察记录，美国医生对原告身体的检查记录等证据。根据上述证据，军事法庭宣告被指控强奸的美军军官皮尔逊无罪。事件的主角沈崇身份迷雾重重。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为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去了北大，被告知北大没有此人。他又听有人说沈是辅仁大学学生，于是赶到辅仁大学。传达室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那女生否认前晚曾去看电影，声言与沈崇事件无关。多年后，沈崇在红卫兵的审问中承认，她奉中共地下党指示色诱了美军士兵，她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打击美军，孤立国民党”。[14] 五十多年后，美国解密的沈崇事件档案印证了沈崇的坦白。

反饥饿运动

抗战胜利时，国家一片废墟，城市工商业凋零，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田园荒芜，灾民两千万，沿粤汉铁路行驶，两侧百里不见鸡犬人烟。中共拒绝各界让国民休养生息的呼吁，向国民政府开战。国民政府被迫为应战及摊派军粮，加剧了民怨。1946至1947年间，国共战争使饥荒蔓延，造成南方饿死农民数百万。

对国民政府开战的同时，中共利用饥荒和民怨在各大城市高校中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制定了“一校一事”计划，在各地高校发起了“公费运动”和“吃光运动”，号召学生把本来就不足的公费提前花完，把本来不够的伙食在短期内吃光，然后发动向政府要饭吃、要教育经费的“反饥饿”请愿运动。1947年5月，中共在宁、京、沪、苏、杭同时发动了“反饥饿”运动。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中央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剧专科学校的四千多学生高举“饿”、“我们要饭吃”、“我们饿的不能上课”等标语到教育部请愿，包围了教育部长朱家骅。抗战中，国民政府在经济崩溃的形势下坚持办教育，没有减少对教育的投入。学生教师的生活虽然也苦，但远胜普通百姓，没有挨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饥荒中同样保证了学生高于民众的生活水平。朱部长劝导学生不应该不顾国家困难，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学生质问：为什么有钱打内战，没钱办教育，朱部长无法应付暴乱，只得溜走。学生们用油墨在教育部大门上石柱上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大字对联。随后，学生队伍再到行政院请愿，在副院长王云五肥胖特征上大作文章，在行政院墙上画“人瘦猪肥”等漫画，在院内张贴“反饥饿、反迫害”等标语，以“民瘦官肥”四个大字盖上行政院的招牌。学生们在行政院内一面饱餐午饭，一面演丑化蒋介石的活报剧。第二天，中共地下党组织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再到教育部请愿，再闹一番。与南京同时，中共在京沪苏杭等城市也召集学校学生举行了请愿，成立了“学校争取提高公费待遇联合会”，宣布于5月20日即“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日子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游行请愿。中共地下党部署学生在游行中挑战当局管制底线，引发冲突，但在反蒋派领袖李宗仁负责的平、津保持温和，以达到离间李蒋关系的目的。

5月18日，国民政府宣布破获了共产党制造“三罢一惨”（罢课、罢工、罢市和惨案）的指示密件，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十人以上的罢课、集会、游行请愿非法，劝学生不要被共产党利用。5月20日，中共按计划组织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六十多个城市的数十万高校学生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指挥学生们高喊“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

袭击警员，酿成学生、警员受伤的冲突。国民政府严令军警对学生示威保持克制，出动大批军警维持各地秩序。按照制造北京“三一八”和昆明“一二一”血案的套路，中共地下党在事件后以学生流血为题材展开了抨击政府的舆论战，将鼓动学生挑起冲突，政府克制应付的轻伤事件宣传为血案、惨案，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大力营造上街示威光荣，反政府为进步的潮流。尽管全国报刊上出现了“南京五二〇惨案”、“南昌五二一惨案”、“武汉五二二惨案”、“北平五二二惨案”、“广州五三一惨案”、“青岛六一惨案”等宣传文章，国民政府坚持不对学生动武，挫败了中共制造血案的计划。

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极为成功，营造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咒骂政府、挑战政府为荣，争相发表抨击政府函电的时尚潮流。例如，“钱伟长等八十一位清华大学教师签署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宣言”、“北京大学六十二位教授致函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之学生表示慰勉”，“南开大学教授会发表对政府的抗议书”、“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率师生示威游行”、“中央大学教授会募捐慰问示威学生并抗议政府”、“金陵大学九教授赴教育部请愿”、“复旦大学洪深等教授抗议政府制造血案宣言”、“北大、清华、燕大、师院、中法、艺专、南开、北洋八校 586 位教授抗议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宣言”、“柳亚子、马叙伦、张澜、叶笃义、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支持学生、抗议政府宣言”，翦伯赞在致中央大学学生信中称“学生们的鲜血已经写成了新中国历史的序言”；参议员许德珩慰问学生时“泣不成声”；参议员黄炎培激昂抗议政府虐待学生；参议员梁漱溟污蔑政府血腥屠杀学生；周谷城致函学生表示“学生运动为挽救国家民族的运动，为创造历史的运动，始终支援”。不光知识分子争作慷慨激昂的政治秀，国民党反蒋派和中共外围组织也积极行动配合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在香港的李济深、在美国的冯玉祥也趁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讨蒋介石，希望看到国民政府垮台。

《东北公报》总编于衡解释中共操纵学生运动写道：“学潮初起时，大部分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分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16] 对于当时报纸谴责中共利用学生的文章，知识分子们争相否认。例如，茅盾发表文章否认学生运动受中共操纵说：“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就有人指为有背景。究竟学生运动有没有背景呢？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决不会凭空发生，运动之发生必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而一年来政治上之失尽人心，经济之崩溃，物价狂涨，内战火热，使全国人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一切就是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15] 以茅盾文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所谓进步文章其实是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一部分。新华社 5 月 23 日的时评写道：“运动广泛，是因为从群众最迫切的需要——要吃饭、要和平出发。人没有不要吃饭的，但是蒋介石今天的统治，却使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学生和大学教授）硬是没饭吃。人民所以没有饭吃，是因为蒋介石发动了全国大内战，破坏了全国人民所力争的和平。”5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将一年多前“第二条战线作战”的内部指示变为公开号召，在文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共上述两文实际透露，国民党统治区百万学生参加的“吃光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请愿运动、罢课运动，百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请愿确实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作战”。

事实确如于总编文章所言，中共这时确实控制着学校和学生。多年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王汉斌等学运领导人的回忆录透露了中共在抗战胜

利前后在学校发展势力的运作。王写道：“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第三种是北大。……地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相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7]

经过“由小到大，扎下根子”，中共控制了学校和学生。如同李大钊当年可以一呼百应地发动全国运动一样，中共地下党可以操纵学生开展反美示威运动、策划“一校一事”、“吃光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请愿、罢课等等运动。在中共控制学生的强大势力面前，绝大多数学者名流趋利避害，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充当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工具。那些积极参加“对国民政府第二条战线作战”的知识分子们了解全国大饥荒的情况，清楚自己与学生们享受着远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待遇，知道十万军警对学生克制，他们中的多数还知道中共接受苏联军火向国民政府开战，知道中共在北方农村正在开展

杀人夺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对中共的挑起战争，暴力土改、剿匪中的屠杀不置一词，抓住示威中的小冲突喋喋不休，因为他们知道国民政府很宽容，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几年后，面对中共在全国暴力土改运动、剿匪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屠杀，积极支持“吃光运动”、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的教授们沉默了。他们知道共产党厉害，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容忍反政府声音，于是积极登报检讨自污，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体卑躬屈膝。

金融战

长期抗战中，国民政府一直处于财政破产境地。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又起，军费开支有增无减，占了财政支出的 80%。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与八年全面抗战中一样，靠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一肚子怨气的国统区民众不知道，物价飞涨背后有中共在助推。东北内战爆发后，中共将新占城市银行、国库中的法币钞票立即运到国统区，通过中共地下党抢购物资。其中，不少钞票还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运送到北平。随着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占领的城市增加，向国统区投放的法币钞票也随之猛增。

运到国民党控制区的钞票中包括巨量假钞。中共与假钞打交道要追溯到二十年前苏俄的培训。1928 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会议期间对中共代表们进行了假钞培训，以其印制的中国假钞支付中共经费。[18] 1942 年，德国海军在太平洋截获的美国商船中查获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 10 亿元法币半成品。日军从德国购得了这批半成品，掌握了法币印刷秘密，印出了 40 亿元法币假钞。[19] 不久，苏军缴获这批假钞，将这批假钞连同日本专家和技术都提供给了中共。全面开战后，中共将日本专家指导下印出的法币假钞投放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分假钞，花假钞，以缴钞和假钞抢购物资。[20] 这些钞票是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势力庞大，组织发展迅速，一声号令就能发动罢工、罢课和示威请愿运动的重要原因。通过金融战，中共一举数得：搜刮到国统区百姓

钱财用于战争经费，推动国统区物价飞涨，推动国统区民怨沸腾，再利用民怨制造“三罢一惨”。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利用平沪间尚保持通畅的用中华、中国航空公司航线，把在北平收缴的大量法币、金圆券再投放到上海市场，加速了国统区金融的崩溃。

“四大家族”宣传

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行动之一出版文胆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指他们由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指他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侵吞了 200 多亿美元的财产。“四大家族巨额贪污”说不是陈伯达首创，而是美国左派报刊在抗战中宣传出来的。以这一说法为由，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国民政府财政崩溃，最需要援助时对国民党政府拒施援手。

其实，国民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蒋、宋、孔、陈始终受到反蒋派和独立新闻媒体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蒋介石长期在反蒋派的制约监督之下，三次下野时都须向财政部作出交待。南京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宋子文对经手的协议都向国民政府作了详细的汇报。孔祥熙早年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及向欧战国家出售战略物资积累了巨额财富，后又在上海股票期货界收入颇丰，是 1920 年代全国有名的富豪。长城抗战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时南京政府的财政每月收入 1500 多万元，每月支出 2200 多万元，其中军费支出高达 1800 万元。1933 年，国民政府财政因长城抗战亏空高达 6000 万元，宋子文无力应付财政亏空请辞，孔祥熙再次临危受命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上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稳定了金融秩序，实现了财政盈余，建立了法币体系，为国家后来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抗战中，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这时，主要财政总收入项目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由于国土沦陷而丧失。国民政府只能靠增发钞票维持数百万军队和政府

机关的开支，以法币贬值为代价坚持长期抗战。1944年，孔祥熙因强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建几十个机场的巨额费用（美国在抗战结束后以剩余战争物资冲抵了这些费用），抨击美国未能有效援华而成了美方人员最厌恶的国民政府高层，被美国民主党政府指控贪污了美国援华中的数亿美元。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期间到处演讲指责孔祥熙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要求“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以污蔑艰难打理国家破产财政的官员来博取自己的爱国名声。事实是，在长期抗战的财政困局之下，无人能比宋子文、孔祥熙作得更好。他们是中国长期抗战坚持到胜利的功臣。抗战胜利后，在孔本人和美国共和党人的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对民主党政府的上述指控开始了调查。调查结论虽未公布，但所公布的全体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总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为100多万美元，证明“孔祥熙贪污巨额美援”说是无稽之谈。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滥发钞票，导致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是事实，但这是国家在财政破产中长期抗战必须付出的代价。对美国民主党的指控，国民政府还可以要求独立调查，而对中共根据陈伯达的宣传材料定义没收官僚资本则没有可能进行独立调查。所谓四大家族中的二陈实际是贫困一族。陈立夫自己颇为看重其教育部长经历。抗战爆发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教育部长，先后主持了大学内迁，制定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制定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等制度，竭尽全力帮助学子们在战火中继续学业。他要求政府为学生提供“贷金”。财政部长孔祥熙坦言，战时财政破产，靠增发钞票维持，不可能为学生提供贷款。于是，陈立夫以私人名义借钱设立了助学“贷金”，资助了众多学子维持学业。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接受陈资助的学生后来谈及此事均充满感激。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财政崩溃国民政府没有偿还陈以教育部名义设立的“贷金”。多年后，人们津津乐道战时教育的贡献与辉煌，津津乐道西南联大，但很少人知道，主持成立西南联大的陈立夫为帮助学子继续学业而背了一身债。

当时的左派记者和美国政府均清楚，陈伯达推出 200 亿美元贪污说系随意编造。因为，美国在二战中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仅 16 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不过，在“第二条战线作战”中，荒诞的指控颇具宣传效果，极大地助推了国统区的学生示威运动。建国后，中共长期宣传“四大家族”的侵吞造成中国贫困。几十年后，人们了解到下列事实：蒋介石去世时并未留下庞大遗产，宋美龄在美国、台湾均无房产，靠她孔家外甥、外甥女资助养老。蒋经国去世后，夫人蒋方良陷入贫困。当明斯克市长邀她回故乡看看时，她坦白说没有钱回去，令市长愕然。1990 年代解密的美利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保存的宋子文档案显示，宋子文对公私金钱往来保留了清楚完整的记载，包括他亲自书写的自己名下的资产、1941 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 年宋子文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 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 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 1971 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他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注册会计师的签名。他的遗产分割书显示，他去世时的非固定财产只有 100 多万美元。1950 年，陈立夫被解职后赴美，生活无着，向孔祥熙借钱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开办了养鸡场。夫妻二人亲力亲为，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餐馆老板们钦佩陈立夫的自强精神，尽量照顾陈的生意。陈立夫夫妇还成功地作出了闻名纽约唐人街的“陈立夫辣椒酱”和皮蛋品牌（他们的“陈立夫臭豆腐”品牌因未通获美国食品卫生许可而失败）。官本位的意识深厚的国人认为陈立夫在美晚年生活潦倒，养鸡丢人。但陈立夫夫妇淡泊名利，自得其乐。陈果夫为政清廉，早逝的重要原因是无钱就医。

第 35 章 解放区土改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保留着血缘社会的自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农民有土地，有迁徙、经商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十多年来受军队祸害，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一家不苦，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他所言的河南镇平县情况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1920 年代，苏俄将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国，其土地革命理论颠覆传统的伦常、道德体系，把农民贫苦、不幸归咎于地主的剥削，教唆农民欠债不还、剥夺富有者的财产甚至生命。其实，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剥削，而主要因为革命，先是日本输入种族革命，造成军队数量翻番和长期战乱，然后是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造成军队数量再翻番，带给中国更大规模的战祸。革命战乱之外，中国农民之苦来自自然灾害和人多地少的现实。南京国民政府 1934~1935 年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国 80% 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农户）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到总耕地的 2%，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自耕农的比例超过七成，农村雇工经营者多，出租和放债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长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额因经营变动者多，固定不变者少，多数地主给雇工的报酬合理，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和地主和谐相处；农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贫困地区，农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地主；全国农村人年均收入 85 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 3.6 倍，是雇农的 4.2 倍，[1] 地主与农民收入差别不大。

祸害农民的军队中，以红军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养兵，给农民带来最惨的劫掠，几年就将苏区及周边搞到民穷财尽。红军之所以长征，政府军围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苏区已经被榨干了油水，红军必须去另辟根据

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承诺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随国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累进税制。抗战期间，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减少，苏联提供的资助和国民政府提供的军饷又有限，必须另辟财源。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避战保存实力，专注扩张地盘和军队的抗战时期总方针。其中，扩张地盘是为了扩大收租、收税区域以供养不断增加的军队。然而，地盘翻番的扩张速度赶不上军队数十倍扩张的速度，苏联又暂停资助，毛泽东采取了两项办法应对财政危机：一是制售鸦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剥夺地主敛财。在剥夺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据地抛弃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诺，开始新一轮的剥夺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东莒南等地农村以“双减”、“查减”等名义，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斗争地主大会，剥夺了数千地主。[2]这时的斗争地主只是掩盖暴力夺财的说法。因为，长期“减租减息”已使地主变成了贫苦农民，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基本被剥夺干净，在中共华北控制区内基本没有了富豪的地主。当时“关中无地主”、“华北无地主”的说法正是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农民全体都穷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抗战胜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中共将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计划试办土地公债，称以公债筹款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一办法既不合经济常理，也不合革命党的规矩。革命党不事生产，生存只能靠搜刮民众，所谓公债筹款到头来只能另类无偿搜刮。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将多年所收地租退给农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将地契交给雇农，称以此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还没实施，东北开战，中共急需开辟财源应付暴增的军费及偿还苏联的军火债。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泽东推翻了刘少奇刚刚宣布的“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指责赎买，和平土改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五四指示》中“一般不动富农土地、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规定不适应战争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办法，实行“急风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暴力土改在东北解放区率先展开。曾是东

北民主联军战士的管惟炎教授回忆东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写道：中共军队进入村庄，只要看到房子比较好就认定是地主富农，要求主人缴出浮财，屠杀不从者。以东北的宽甸为例：当地有两万人，计有两千人被杀，如此暴力屠杀的所谓土改在东北全面实施。[3]

在华北，地主富农家埋藏的金银成为运动掠夺的主要目标。“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多数地主逃亡或被杀，地主家属被抓来拷打审问。”[4]为逼地主富农交出财宝，土改主持者召开斗争大会、游街示众，侮辱殴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毒打地主让家属目睹，毒打家属让地主目睹，有的地方还鼓动地痞流氓“积极分子”扒光妇女衣服，肆意侮辱，游街示众，甚至轮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钱财。斗地主场面通常伴随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无数农民被指为地主、富农迫害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杀。“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5]

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与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先进典型是中共华北血腥土改的一个缩影。木栏杆村没有地主，村中一千多亩地属于邻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户村民中除几户自耕中农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户。李井泉听到木栏杆村无地主的汇报后说：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政治表现，看铺的摊子大小，看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于是，土改工作队制定了“查三代”划成分的办法，通过查看农民的祖坟划成分，将十几户祖坟有围墙、石碑的穷苦农户划为了地主、富农。在挖浮财行动中，工作队挖出了张拖喜、张拖长兄弟多年积攒的 200 大洋，作为浮财剥夺。两兄弟找工作队投诉。工作队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十几地主、富农，就应当有恶霸地主，于是将张氏兄弟定为了“恶霸地主”。木栏杆村的村民了解张氏兄弟的为人，一起为他们求情。工作队宣布对恶霸不杀不能平民愤，处决

了张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试点村出搞出了恶霸，表扬了工作队，要求推广先进经验。[6]

在冀鲁豫解放区，土改运动主持人要求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对地主实行出门报告，身带白条，否则格杀勿论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杀保人偿命，以致地主家家准备棺材。更骇人听闻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晋绥解放区，由牛友兰等著名绅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见中共土改运动之惨烈。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返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中，他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被八路军 120 师来占用为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中共的“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他还捐出 2.3 万元大洋作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他捐出“8000 银圆和 125 石粮食。”[8] 在土改运动中，工作队逼迫他再交出“底财”，将他在晋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拉来陪斗，逼其子铁丝牵父游街。被斗争、游街后，牛友兰绝食自杀。此外，著名绅士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破肚，抛尸河中，著名绅士刘少白、孙良臣在斗争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毛泽东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都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员，这些曾经支持中共边区政府乡绅领袖都如此惨死，其他地主在土改运动中的命运只有更惨。1946 年夏，中共永年县的土改运动中召开了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将宋活剐几千刀，最后将剩下的几根骨头喂了狗。[9] 铁丝牵父游街的牛荫冠回忆晋绥土改的情景时说：“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10]

1946 年夏，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交流土改经验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晋察冀解放区介绍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赶出家门去流浪、讨饭的

“扫地出门”经验：晋绥解放区介绍了“查三代”“查”出恶霸地主的经验，以及根据木栏杆村等地“土改试点”总结出的土改经验。晋绥解放区土改经验要点包括：派土改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秘密进村：绕开根据地原有的中共基层组织；“扎根串联”：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烂者为依靠对象（中共后来在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四清运动中沿袭了这一套路）；“发动群众”：启发动员贫苦者的“阶级觉悟”，激发农民仇富情绪，向他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动员他们诉苦；组织斗争：组织农民批斗、殴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属；剥夺地主财产。被毛泽东批“右倾”后，刘少奇转而积极推动暴力土改以赢回毛的信任，在会上指示将上述土改经验在各解放区推广，主持颁布了中共中央《全国土地法大纲》（共 16 条）。

传统乡村中，勤劳，务正业者均有作佃户和自耕农的机会。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二流子最为贫穷，最具仇富心态。会议要求以这些最贫穷，衣衫褴褛者为“基本群众”，依靠他们在农村中“串联”，扩大“基本群众”队伍，安排这些人带头斗争地主，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殴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称这样的局面为“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另一决定是在全国解放区推广将地主全家“净身扫地出门”的经验，要求每村必须按照下达的指标“划出”地主。按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残暴土改指标，各解放区在大会后“划出”地主的比例高达近 30%，其中晋绥解放区划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达到了 40%。[11] 根据谢觉哉日记记载，200 多户的木庵康宁村在土改中被“划出”了 90 多户地主、富农；118 户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划出 8 户地主，2 户富农，后在上级的要求之“划出”地主、富农多达 53 户；泉台三井镇一康姓中农被“划”成了富农，父子 6 人 2 人被杀，3 人自杀，家产被全部没收，唯一剩下的八路军儿子得讯回乡后愤而自杀。刘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农村的另一大灾难。这一大纲的主要内容为：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土改以前的农民债务、土改的执行机关是农会和贫农团、组织人民法庭等等。大纲字面上没有明说杀地主，但“以农会和贫农团为执行机关”，“组织人民法庭”等规定的实际意思

是赋予贫农团和农民大会杀人权，是按照苏俄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唆的杀人夺财作法，鼓动农民杀人。由于农民大会在多数村庄不可能经常召开，贫农团成了农村中是最高权力机关。如同 1920 年代农民运动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随意杀人情况一样，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队鼓动农民杀害地主，让农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状”，断了他们的退路。

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给华北农村带来了屠杀狂潮，中共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酷刑折磨、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队已宣布土改结束。然而当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们杀他二十个人”讲话传达到黎城后，工作队赶紧执行指示，在一个晚上就将关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杀害。亲历土改运动的农民回忆说：打死人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地主富农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滨海区被杀者有一万多人”。[12] “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 300 余人。冀东区杀死 7600 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 48 人，乐亭县处决、自杀 100 多人。”[13] “一些地方允许贫农团成立‘人民法庭’，冀东某村甚至让村民投黄豆来决定谁该被划为地主处死。有个农民因其祖父雇过一个长工而被斗争，小学生们被动员起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断气。”[14]

土改中杀人的方法有：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烧死）、“砖头会”（砸死）、“坐飞机”（摔死）、“倒拖葱”（拖死）、“过筛子”（铁筛子筛死）、“刮树”（活活刮死）等等。在胶东、晋绥、河北等地，杀地主、富农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

吊等等。一种办法叫坐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枣树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摇到受害人肉肿皮烂；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将被斗地主从长城烽火台上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大石头砸，直到脑浆迸裂。韩姓教书先生之妻被土改积极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积极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人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身上坐人拉着一路狂磨，磨到后脑勺塌陷，肋骨露出，脑浆、鲜血一路。[15] 贫雇农口号是：“斩草除根，将地主、富农全家杀绝”，甚至包括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兴县，千余人被杀害，近千人自杀，六十三人被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17]

在晋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为“百分之九十五群众要求打人、杀人，领导机关不能制止”；“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一升租子也是剥削”；“将地主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土地会议”后，阜平县土改工作队在半个月中杀了三百多人，平山县三天打死了一百多人，晋察冀区土改复查统计显示有四千多人被杀害，受迫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18] 被杀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扫地出门”的农户在东北、华北的寒冬中冻饿而死。上述例证显示解放区土改运动杀人规模之巨大。如此残酷屠杀的土改引致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毫不奇怪。一场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千百年来和谐自在中国农村变成了仇恨和仇杀的世界。

雷震远神父评论解放区土改说：“共产党执行莫斯科渗透中国的计划，开展阶级斗争。……农民中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煽动阶级斗争以攫取人民财产。共产党划定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为地主。划分阶级的尺度伸缩性很大，这个村庄的地主在另一村庄上可能是中农。财产之剥夺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一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

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让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以偿还旧债的借口抢掠富人，每一个活着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一件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19]

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一是依照“支部建在连上”控制军队的作法，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实行“支部建在村上”、“财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认定的地痞流氓积极分子为农村领导。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热辽土改工作团团团长黄火青在 1948 年 10 月的土改总结会上说：“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农，打击面大。有中农说：‘当兵（参加傅作义军）背起枪来打农会。’有的准备在火线上用枪打死斗争过他而又一同参军的贫农，热中更影响到巩固部队，部队大批逃亡，开小差。二流子打算着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志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解放区百姓大逃亡，一个村一个村，全村人逃往国统区、傅军占领区。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有一些流氓成分的村干部，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在冀察热辽党代表会报告中说：“在冀察热辽，土改中提拔的干部很多二混子与烟民。他们确起了先锋作用，但由于流氓本性，只有一部分改邪归正，另一部分则堕落腐化，挥霍经济果实，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黄火青、赵毅敏的内部报告证明，傅作义关于他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人民争先恐后加入傅军不用动员之说是真实的。亲历解放区土改的王宁（周小舟夫人）在回忆录中证实：“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

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20]

土改运动消灭了千百年来作为农村领导者乡绅阶层，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无产者原处社会边缘，怀有怨恨、报复心理，一旦掌握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必然滥用。河北曲阳县独古庄贫农团是土改后流氓、无赖在乡村当权的典型。由流氓、无赖组成的独古庄贫农团为勒索粮食，毒打中农张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烧、晕醒后再用灯烧耳朵”，致张残废。无赖本性懒惰，缺乏生产积极性，掌权后要求“吃净闹光”，在土改中宁要浮财而不要土地，不愿辛勤耕作，声称“吃吧，咱村地主富农多着哩”。该村早已进行过平分和复查，村中已没有地主、富农，但他们为捞取好处而“见肥就咬”，封门、没收财物。在工作组进村前后，贫农团接连封了八户的门，将被封户当天逐出。 [21] “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 [22] 地痞、流氓不仅出现于土改运动积极分子中，还出现在中共干部中。在晋绥党校的“搬石头”会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被要求挂着“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 [23] 如此整肃设计应是出于党内高层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二是要求农民无偿为中共的战争服务，即“支前”（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并不是要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而是要获得“取之不尽”的财政资源，将巨额军费负担由分散的乡村负担。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后写道：“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土改的结果让农民人人都害怕，极度紧张，因此中共要农民参军、出夫、出粮、出钱时，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动员农民支前与动员参军套路一样的强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队和贫

农团随意杀人的恐怖中，农民不敢拒绝支前。晋冀鲁豫区领导人潘复生的说：“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彭真在《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一文中说：“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就这样，中共通过土改控制农村和农民，征集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人力投入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 1.4 万副担架、4 万辆大车、10 万随军民工，30 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在平津战役中动员了 30 余万民工和 40 余万人的民兵武装；淮海战役，共动员民工 543 万人，征集担架 20 万副，大小车 88 万辆，挑子 30 万副，牲畜 76 万头，总共筹运粮食 10 亿斤。其中，山东解放区筹集了粮食 10 亿斤、食油 72 万斤、食盐 87 万斤和难以计数的蔬菜送到前线，胶东、渤海、鲁中南三区妇女做了军鞋 762 万双，军袜 22 万双，军衣 736 万套，军被 178 万床。[24] 刘少奇 1949 年 4 月在“天津讲话”中承认：解放战争时期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持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如同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共语汇中意味屠杀抢劫一样，中共动员意味着逼迫，意味着不响应召唤就没有活路。可以想象，这样的土改运动、支前运动对农业造成的摧残有多大。事实上，土改运动使大片农田荒芜，许多地区颗粒无收，是 1946 至 1948 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三是动员农民参军。参与斗争和杀害地主后，农民为避免地主组织还乡团回来报复被迫参军，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中共的革命史称：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踊跃参军支前。事实并非如此。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军。临沭县土改中动员参军的情况具有代表性。那里的参军动员是逼迫和哄骗相结合。逼迫手段包括“绑、打、押、罚”，“你不去就揭你家的锅，封你家的门”；哄骗手段包

括：“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参军后你家就不受穷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等等。有参军者后来回忆说：“谁自愿是婊子养的。动员参军比国军和鬼子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装疯癫。”[25]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持续整个国共战争期间。暴力土改必然激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在苏联，革命后剿灭白匪内战长期持续，苏共所谓的白匪其实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在中国土改运动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解放区逃亡的地主在国民党军支持下组成武装还乡团回乡报复，然后大批被中共军队镇压。中共称这种镇压农民武装反抗的行动为“剿匪”。暴力土改从东北解放区开始，推向全国各解放区，所谓“剿匪”也从东北开始，推向了全国，一直持续了十多年。与苏联的情况一样，被消灭的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匪”中，绝大多数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暴动队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罪行，是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它开启了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代。这场地痞流氓剥夺、屠杀正经农民的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道德，封死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开启中国人道德败坏进程。国民党主张保护乡绅，反对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这是它与苏俄决裂，与中共开战的动因之一。土改运动后，中共的党文艺推出了无数作品长期歌颂着这一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两篇代表性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共相关段落编入了小学教材，长久地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两作品同获“斯大林奖金”，是土改灾难之苏俄输入性质的一个证明。党文艺的土改文艺作品欺骗世人说，土改中的残暴是由于“恶霸地主”破坏活动所导致。事实上，土改运动的残暴是因为毛泽东指责温土改右倾，明确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谓的暴风骤雨方式。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队”在萧队长率领下进驻东北元茂屯开展土改，通过发动群众，肃清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反革命破坏势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其土

改运动背景是，“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后，导演蒋樾来到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拍摄，问一个农民当年扛长工的如何悲惨，农民回答：“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刘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土改运动掀起来的。地主、富农比一般人宽裕点儿，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暴风骤雨就是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当时，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两村共 700 户人，土改运动中在镇东门外共枪决了 73 人。”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高凤桐老人回忆《暴风骤雨》中地主“韩老六”的原型说，他在这里干了六年，担任保长是群众选的。他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老婆在小学教音乐，给小学生做点校衣，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27] 2006 年，记者田磊采访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型温泉屯。当年参加土改的老人说：“那时其实并没有大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求斗地主，就斗了有 300 亩地的顾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坏，经常资助四邻，在灾年舍粥给乡亲。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28]

第 36 章 国民政府时代终结

国民政府制宪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宣布 1936 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932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了新一轮制宪。1936 年，国民政府按照立宪时间表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5 月 5 日公布故称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大代表选举法》。

《五五宪草》规定国民大会为中央唯一政权机关，实施“权能分治”，国民大会行使中央政权，总统和五院行使中央治权；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行政院长与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免，对总统负责。宪草难免有“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党国体制内容，但其主流是走向宪政的进步。《国大代表选举法》也是党国体制和民主进步的混合。它规定国大代表共 1200 名，凡年满 20 岁之国民有选举权，年满 25 岁之选区内居民有被选举权，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为 1200 名国大代表之外的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可以指定 240 名代表。宪草和《国大代表选举法》公布后，国民党开始筹备各省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对宪草表决。随着当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和次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召开延期，《五五宪草》被搁置，宪政进程再次中断。

1938 年 7 月，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烽火中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以行动表达了迈向民主与宪政的诚意。国民党指定的 200 位参政员中，地方公私机关团体代表 94 位，文化经济团体代表 50 位，华侨代表 6 位。参政员中包括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张君勱、胡汝麟（石青）、罗文干、张东荪等国家社会党代表，曾

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中国青年党代表。参政员虽非选举产生，但包括了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知名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国民党指定的 200 位参政员中有 156 位出席了第一届参政会。大会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等决议案，决定设立省县参政会，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选举张君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博古、王明等 25 人为驻会委员。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王明为首的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表示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恳的态度，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奋斗。

1939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在陪都重庆召开了一届四次会议，会议呼吁早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回应参政会的呼吁，国民党在 10 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上决议在重庆兴建国民大会堂，定于 194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战事吃紧，国大被迫再次延期。1943 年 9 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筹开制宪国大的同时，国民党逐步开放党禁，释放了创建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张东荪，邀请他们参与制宪工作。

1946 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制宪国大。因应中共和民盟提出的调整国大代表名额的要求，政协会议决定原选举的 1200 名代表名额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和东北收复区代表 150 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 700 名，共计 2050 名，分配给各党派名额为：国民党 220 名，共产党 190 名，民盟 120 名，青年党 100 名，社会贤达 70 名。根据国共两党代表王世杰和周恩来提议，政协推定孙科、王宠惠、张君勱、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七人组成宪法起草小组，邀请宪法专家张君勱执笔起草。会后，张君勱接受蒋介石出面的邀请开始起草宪法。起草中，他抵制国、共两党的党派私利主张，尽量使宪草超然于政党。一个月后，他将拟就的宪草交宪草审议委员会讨论。5 月，国民党宣布将召开首次“制宪国民代表大会”。这时的中共得到苏联军火扶植，加紧准备武力推翻国

国民党政府，以国大为国民党一党包办为由抵制国大。由中共地下党主持的民主同盟跟随中共宣布抵制国大。民盟中央常委张君勱反对中共和民盟对制宪的抵制，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他指出，制宪国大是政协一致通过的，制宪委员会是多党派组成的，中共与民盟抵制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在抵制宪政。作为中共附庸的民盟随即宣布将张开除。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在国共东北开战的阴影下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以抵制制宪。大会选举无党派学者胡适为主席，继续民国以来艰难的制宪历程。12月25日，制宪国大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宪法，宣布训政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中共、民盟声明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正如张君勱所指出，中共与民盟抵制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在抵制宪政。因为，刚刚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超然于党派，通篇没有出现任何党派名称，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广泛政治参与的成果。它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体、政体、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基本国策，其中虽有“依据孙中山遗教制定”的党治内容，但阐明了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宪政原则，规定了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申明“国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申明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基本表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两座宪政基石。中共以抨击国民党独裁的方式拒绝宪法，真正的原因是它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应当说，中共没有资格抨击国民党的独裁，因为，国民党虽然独裁，但坚持制宪方向，切实走向宪政，而中共在控制区内完全不容忍其它政党存在，根本不容多党政治的局面出现，而且中共根本拒绝宪政。中共抨击国民党限制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等更是纯粹党争手段，与自由认同完全无关。尽管国民党政府治下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程度不如清末民初，但总还是自由度相当宽松。据1942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有130多家，图书出版量在抗战期间照样快速增长，即便在国共两军开战的黄桥战役、皖南事变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照样在重庆发

行，中共在重庆办的书店未受影响。相比之下，中共在控制区内完全不容独立声音和独立报刊存在。

1946 年宪法虽国民政府垮台而未能生效，但这不能影响它代表着宪政进步。国民党战败后，国大和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国大陆被废除，并被禁止援引，但它们代表的宪政民主方向在台湾被长期坚持，成为台湾后来民主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退台准备与二二八事件

甲午战后后，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快速发展。国民政府考查团员在参加“台湾四十年博览会”后感叹道：“台湾给人家搞了四十年，就和中国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1936 年，日本在台湾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其内容包括：推行日语，禁止汉语和方言，改日本姓名，过日本人的节日，从日本习俗，宣扬日本精神，灌输日本臣民思想，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号召台湾青年加入日军等等。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改变四十年来只在殖民地搞农业和轻工业，不搞重工业的政策，开始在台湾投巨资兴建钢铁、化学、机械和军工产业，将台湾作为“南进”基地。至 1939 年，台湾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化的殖民地。经过五十年日据，台湾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铁路港口、工厂电站、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成为亚洲除日本外工业化程度、平均教育程度和技术人员比例最高的地区，台湾民众在心理与文化方面与大陆渐行渐远。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受降及接收台湾，在台北设立了由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主持的行政长官公署。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随后，国民党利用所接收的日资产业，建立起公营经济，即党营经济，设立了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

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采取措施维持台币。战后交通、工矿的重建需要大量经费，长官公署与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一样，别无选择地增发钞票应付开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失业和民怨。

李闻刺案后，美国亲共派大做文章，掀起了谴责中国国民政府的浪潮。在左派压力之下美国国会作出对国民党武器禁运决定。在斯大林武装中共准备推翻国民政府，而美国拒施援手的形势下，蒋介石看清了国民政府被推翻的前景，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垮台后退往台湾事宜。台湾回归时，国民政府原定派三万军队和两万公职人员来台接收，后考虑台湾经济无法负担数万军队而仅调 5000 军队随陈仪来台分驻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等地。台共暴动时，台北市宪警仅 500 人。台湾共产党国民政府派大员接收台湾的同时，共产阵营任命唯一参加长征的台籍共产党人蔡孝乾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派其返台，决定利用民众的不满和独立倾向，趁着国民党驻军薄弱发动暴动。

与大陆中共一样，台共也是共产国际扶植的产物。在大陆建立共产党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将触角伸进了台湾，选中了台湾“农民组合活动”领袖谢雪红（谢阿女）、林木顺等台籍人士作为代理人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培养。1928 年 4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召集成立了谢雪红、林木顺、蔡孝乾等人为首的台湾共产党，为台共制定了以台湾独立为主旨的革命纲领。共产国际严禁在苏联境内鼓吹民族自决，却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鼓吹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在中共和台共的纲领中强调民族自决，以图肢解中国服务其向中国扩张目的。根据莫斯科的要求，台共开启了台独运动。日本当局知道台湾共产党的背后是宿敌苏联，两次发动“台共大检肃”，扼制了台共的扩张。1930 年代，共产国际在台湾成立类似“左联”的“台湾文化协会”，宣传赤化。与左联不同的是，“台湾文化协会”不仅宣传赤化，还谋求台湾独立。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共利用台北专卖局缉私队打伤卖私烟老妇事件，率骨干冲入专卖局打死 2 名职员，殴伤多人，然后与中共制造“三一八惨案”

同样套路，安排枪手藏身请愿民众中趁乱枪击行政长官陈仪，引致警卫开枪，造成民众三死三伤。血案后，台共率民众占领了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号召暴动。强烈不满国民党接收当局的台湾民众响应台共，拿起武器，迅速组织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万人武装。兵力弱小分散的驻台政府军队无力与暴动武装抗衡，行政长官陈仪发表讲话，声明接受请愿者的要求，承诺改革行政机构，成立委员会妥善处理二二八事件。3月1日，台共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处委会），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陈仪接受处委会的要求，宣布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尽量任用本省人士，定于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选县市长，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台共拒绝和平解决事件，成立了以台共领袖钟逸人为部队长的“二七部队”（以27日缉烟事件命名），召集日军退役军人和学生再次包围警局，夺取武器，打死、打伤大批大陆来台的军公教人员。险境中，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十二万人。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蒋介石不容退路有失，接到中统台北站的急电后立即调兵赴台镇压台共暴动。

3月9日，万余国军登陆基隆、高雄，迅速对“二七部队”展开清剿。3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台湾事件谈话，指出二二八事件系共产党在幕后策动，国民政府不容台湾被赤化。随后几天，登陆国军镇压了各地暴动，捕杀了数

百台共党员和暴动骨干，使台湾秩序恢复。台共残余将暴动武装转进埔里山区，声称化整为零打游击。4月，陈仪引咎辞职，国防部长白崇禧及蒋经国赴台处理善后，宣布处理事变四原则为：改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提前民选；调整人事，警备总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省府委员尽先选用本省人；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现行经济制度与中央法令抵触者分别修正或废止；恢复地方秩序，除共产党外，其他参与此次事变及有关人员免于追究。国民党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命台籍人士担任了省政府中四分之一职位，并承诺下属各机关尽量任用台籍人士。

“二二八”事件后，率数百台共骨干逃离台湾的台共领袖谢雪红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受中共领导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中共台湾省工委”、“台湾学生工作委员会”协同，准备迎接中共“解放台湾”。不久，国民政府随着战场失败党政军机关陆续退台。在中共赤化台湾的严重威胁之下，蒋介石果断应对，对在台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展开搜捕，于1950年1月逮捕了台共领导人陈泽民、蔡孝乾。二人得知中共在大陆展开大规模屠杀地主和国军抗战将士后抛弃了共产革命信仰与中共决裂。根据二人指认，国民党大批处决中共在台的卧底，其中包括：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郭秉衡、刘全礼、朱谌之、许强、郭琇琮、叶盛吉、钟浩东（台共基隆市工委会书记）、李苍降（台共基隆市工委会委员）、唐志堂（台共基隆书记），“寻找祖国三千里”骨干吴思汉、江德兴、谢瑞仁、蔡国礼等人，一举将“台盟”、“台工委”、“台学委”等中共在台组织摧毁。通过铁腕镇压“二二八”暴动、领导国军在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砲战中守住台湾，及镇压台湾共产党势力和台独活动等一系列举措，蒋介石挫败了台共赤化计划，使台湾民众避免了大陆发生的暴力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血腥。相比大陆赤化后的土改、镇反到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灾难，“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无疑是台湾民众值得付出的代价。

辽沈战役

1947年，蒋介石任爱将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希望挽回东北败局。然而，国民党军不敌苏联扶持的共军，陈诚在东北也一败涂地。根据史迪威多次提出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任命卫立煌主持东北，称卫与中共有良好关系。马与史一样厌恶蒋介石，与几年前史计划以陈诚取代蒋介石一样，马有心以卫代蒋。蒋介石顺水推舟将陈诚免职，接受美国人的推荐，任命卫立煌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

卫立煌曾为孙中山卫士，在北伐战争中立了战功，被苏俄顾问提拔为最年轻的师长。在剿共战争中，卫是中央军中最善于用兵的将领之一。蒋介石曾下令将卫率部攻陷的苏区中心金寨地区命名为立煌县以表彰卫。卫立煌虽有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名，但因不属于黄埔系而未获同样重用而对蒋心怀不满。西安事变中，卫在与蒋一起被扣押期间接受周恩来策反。七七事变后，作为八路军的名义上司，卫立煌向八路军提供弹药给养，多次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会面，并暗中要求加入中共。中共嘱卫保持国民党面目待机而动。1938年4月，卫应毛泽东邀请绕道延安见毛获毛设宴款待，与互相颂扬。离开延安后，卫将与毛泽东的合影带在身边视为至宝。策反卫成功后，中共顺势扩大战果，向卫的部队派去大批地下党员，成功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任天马）担任了卫的贴身秘书。[1] 有了卫的照应，八路军放手在山西扩张地盘，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新军拉出去成了共军，反手对国军第二战区作战。阎锡山难以应对复杂局面，只好将作战指挥权交给卫立煌。卫默许中共在山西、河南迅速扩张地盘与军队。“晋西事变”后，卫立煌代表国军与中共谈判，承认了中共扩张地盘的成果。中共大获其利，称此结果为“对顽固派斗争的胜利”。1941年春，卫到重庆述职，受蒋介石训斥后借故逗留峨嵋山不归。结果，第一战区指挥出现混乱，三个集团军二十六万大军在中条山保卫战中损失一半，被迫退出中条山地区。国军晋南惨败后，蒋介石革去卫的上将军衔，撤了他第一战区司令

长官及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被撤职后，卫立煌接受周恩来的进一步策反，正式投共反蒋，再次申请加入中共。周恩来再次要求卫留在国民党内，暗中配合。至此，卫成了中共在国民党高层的卧底。

蒋介石手上早有卫立煌通共的密报。但是，他清楚，国、共东北决战的结果取决于苏、美两强的中国政策，国民政府拒绝“战利品合营东北”建议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扶持中共决意推翻国民党政府，若美国不改变默认斯大林赤化中国的政策而拒绝援助国民政府政策的话，派谁主持东北或全国的战局都不再重要。于是，他接受美国人以卫立煌接替陈诚主持东北的建议，疑人照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统帅以让美国人满意，赌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改变政策，出手制止斯大林。他预感到，美国人不会改变政策，并不准备出手制止苏联，准备接受国民党政府被推翻的结果，这样的话东北战场和中国战场都不再重要，他索性让能干的陈诚离开东北去主持台湾，早作退路安排。

接到蒋介石的任命电报后，卫立煌通过侄婿汪德昭经苏联驻法使馆致电中共中央：“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2] 中共复电“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通过德昭转达）。[3] 到沈阳就任东北剿总司令后，卫立煌命令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困守沈阳，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十万大军困守长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五万人困守锦州、锦西至秦皇岛一线，让五十多万大军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造成靠空投补给困守的挨打局面，同时任汪德昭为秘书长负责与解放军联系。蒋介石感到卫立煌困守三座孤城按兵不动的部署的可疑，电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准备必要时弃守吉林、长春，将东北兵力退守华北。卫立煌不理睬蒋介石的电令，坚持守三座孤城的部署。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决心将主力撤退关内，卫以借口拒绝蒋命。[4]

得卫暗助，中共东北的百万大军控制了三座孤城以外的全部地区，在广大农村搞土改运动，获得大批钱粮和兵源，准备围歼东北国军。在国民党困守的长春、沈阳、锦州三城中先攻哪一座问题上，中共高层有不同主张。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不知道有国民党主将暗通配合，不知道有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间谍郭汝瑰提供国民党东北作战计划和部署情报，担心野战军主力从北满千里南下补给困难，侧翼受敌，主张在长春、四平一线与国民党军决战。有卧底王牌在手的毛泽东否决了林彪的意见，制定了先打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向关内的退路，切断东北国军与傅作义指挥的华北国军间的联系，然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计划。林彪感到，在大军围困长春的同时再分兵去攻锦州属于军事上的无理险着，但在毛泽东催逼之下只好硬着头皮执行。

对国民政府东北决战的决策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卫立煌的暗助不具决定意义。从“三下江南”到击败陈诚，东北野战军背后的强大力量来自苏联。斯大林以缴获日本关东军、朝鲜日军和德军的精良武器扶植中共，使中共东北野战对国民党军不仅有数量优势，也形成了武器装备优势。在准备对国民党军东北决战过程中，斯大林拍板签署了三个协定。协定之一是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与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签订的《哈尔滨协定》。其主要内容为：苏联在外交、军事方面全面扶植中共，协助中共在新疆扩张势力，将缴获日军的军火分批交予中共，向中共提供空军支援，将在东北所控有的军器及军事供应品卖给中共，同意中共军队在需要时取道北韩退入苏境，苏军在国民党军队对东北发动登陆攻势时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中共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各项特权，承认蒙古独立，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供应苏联还军火债，允诺辽宁、安东等省为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区，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5] 《哈尔滨协定》基本满足了苏联向国民政府所提“合营东北”的要求。出卖主权换取金钱军火扶植是革命党壮大的必由之路，布尔什维克党是这样，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

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是这样，中共和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无一不是这样。在《哈尔滨协定》的基础上，苏共与中共签定了协定之二——《莫斯科协定》。这一协定是在斯大林挑起柏林危机，杜鲁门总统批准向英国派出六十架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以向苏联示威的背景下苏联为应付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签定的。其主要内容为：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组织中苏共营的中华商业公司；苏联可以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为中共装备、训练 11 个师，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共派遣十万远征军及百万劳工助苏开战。[6] 协定之三是中共与朝共在《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签定的《平壤互助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朝共派军进入中国东北参加对国民党的决战，助中共统一全国，中共夺取政权后派兵赴朝助朝共统一朝鲜半岛。[7]

《平壤互助协定》表面看没有苏联参与，但其内容是斯大林的决定，中、朝两共都斯大林的下属，都要服从。在《莫斯科协定》和《平壤互助协定》签定后，斯大林将苏军在朝鲜训练、装备的精锐军队调到中国东北，助中共夺取东北。苏、中、朝三共间的上述三项秘密协定不仅决定了东北战局，还预定了几年后的朝鲜战争。三协定全部签署后两个月，中共发动了辽沈战役。共产阵营的系列协定说明，国共东北决战并非中国内战，而是外国势力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共产阵营的三协定和美国拒援国民党的国会议案一起，注定了国共战争的结局。随后的共军对国民党军的“三大战役”由谁来指挥，怎样打，有无卧底都不改变结局。

1948 年 9 月，中共东北野战军从沈阳、长春抽调六个纵队重兵到锦州作战，打响了辽沈战役，首先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卫以“沈阳只能固守自保”之词搪塞。[8] 锦州守将范汉杰连电告急，蒋介石再命卫立煌派兵援锦，卫以沈阳兵力不足为由再拒蒋命，并且要求蒋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 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卫立煌执行命

令。卫立煌再抗命。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抛开卫立煌，部署打通沈阳锦州通道，严令廖耀湘从沈阳西进、侯镜兵团从葫芦岛强攻塔山，否则军法从事。此时，若廖耀湘兵团从沈阳强力出击，攻锦的林彪主力将背腹受敌，凶多吉少。但在国民党主帅卫立煌配合之下，毛泽东调长春、沈阳重兵攻锦州的险招成了高招。蒋离沈后，卫立煌下达相反命令，命廖、侯稳扎稳打，不可强行攻坚。[9] 廖、侯奉蒋之命，分别强攻黑山、大虎山和塔山。在黑山、大虎山和塔山激战同时，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以五百多门重炮配合的强大火力压倒了锦州国民党军的反击，以人海战术向锦州发起强攻。范汉杰再次向卫立煌求援，卫置之不理。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下了锦州，俘虏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全歼范部九万大军。

辽沈战役中，最惨烈之战不是黑山、大虎山阻击战，而是长春围困战。1948年5月初，东北野战军向长春发起了进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一面指挥所部坚守长春，一面向卫立煌建议弃守长春。建议遭卫拒绝后，郑洞国率十万大军凭借日本人遗留的防御工事坚守。这时，毛泽东决定先打锦州，切断国民党向关内的退路，指示林彪实施最小损失的长期围困战术。

长期围困战术不是毛泽东首创，而是“刘邓大军”首创的。日军投降后，八路军全线出击，抢占东北、华北，在河北永年县遇到了国军王泽民、李孟兆、霍建之所部及三青团、青年义勇队等队伍凭借坚固城池工事的顽强抵抗。强攻不下，八路军冀南军区想出了长期围困方案，其中要点是“三个五”：在永年周围的五个县（永年、邯郸、曲周、鸡泽、肥乡），动员五万民工，修筑五十里的城墙，“困死敌人在城里，消灭敌人在城外”，其中关键点是不放百姓出城，利用百姓与守军争食的手段逼迫守军投降。经刘伯承、邓小来批准，八路军开始实施长期围困战，实际征调不只五万民工，而是二十万民工，在旧城外再修城墙、炮楼，使城内国民党军外出抢粮比共军攻城更加困难。于是，国民党军凭旧城固守，共军利用城外城长期围困。经过两年多围

困，中共于 1947 年 10 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永年。当共军进城时，城内三万多军民饿死了九成，只剩下三千人多人。

东北决战中，毛泽东决定将永年县围困夺城的经验用于长春，将长春数十万百姓当作了战争工具。根据毛的决定，东北野战军于 1948 年 5 月下旬开始对长春实施围困战，在城外设立数里宽的封锁地带，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入城内，除放带枪和军用品投降的国军士兵外，不放一个人出城。抗日名将郑洞国拒绝投降，鼓励士兵说，美国的援助将到，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局势将扭转。对他来说，最难的不是率军守城，而是安排长春百姓。他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兼顾军民，又不想让长春数十万百姓殉城，于是要求百姓离城。然而，共军不准百姓出城。随着围城持续，长春城内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吃光，长春百姓大批死亡，人相食。[10] 面临饿死的城内百姓纷纷冒死出城，在出城口成片跪求共军放生遭拒，被困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无吃无喝，一批批倒下饿死，尸体一眼望不到边。天热尸臭，饿殍腹部逐渐胀起然后爆炸，入夜长春城内尸体爆炸之声此伏彼起，毛骨悚然。一个奉命阻止百姓出城的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饿死百姓的战术而拔枪自杀。

原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宋占林回忆当年夏天长春城内饿死人的情况说：“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

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被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围困长春四个月后，铁石心肠的林彪在部下的压力下准备放老百姓出城。9月9日，他与罗荣桓、谭政、刘亚楼共同署名向毛泽东发出请示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11] 林、罗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的报告被毛泽东以不予答复的方式“默否”。10月17日，长春城内的滇军六十军的军长曾泽生获悉共军已占领锦州后率部投降，10月19日，郑洞国率其余四万国民党官兵投降。他修建的坚固工事没有派上用场，毛泽东达到了兵不血刃占领长春的目的。

长春曾是曾是东北最美的城市。1932年成为满州国都后，日本人规划了贯穿全城的六线大道，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在市内建设了多处宽广的花园，建立了分流制的排水系统，利用天然沟渠建成了最早的绿化带，铺设了煤气管道，将电力、电讯、照明线路沿干道埋入地下，

规划了全城的有轨电车和快速公路，使长春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花园城市。然而，解放军入城时，美丽的长春成了人间地狱，白骨之城，遍地死尸、白骨，十户九空，树皮都被剥光了、草被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街上到处是伤口化脓生蛆的国军伤兵，幸存的老百姓多已无力行走，全身浮肿，皮肤尸体般苍白，头发脱落，牙龈流血，舌头肿胀，夜盲，失去平衡，意识混乱。宋占林回忆解放入城后的情形说：“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理死，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人。我参加了埋死，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10月18日，蒋介石再飞沈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命令侯镜如兵团和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打通退回关内的通道。这时东北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的命令已无可能执行。11月2日，解放军攻占沈阳，东北五十万国民党军除万余人自海上逃跑外被全歼。11月3日，中共中央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祝贺占领沈阳、长春的贺电，中共报纸报导称“解放长春兵不血刃”，同时隐瞒了围城害死长春数十万百姓的真相。长春解围后，全城尸臭数月不散。解放军要求离城者须办理“难民证”，上印的“难民纪律”，其中主要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离城者讲述饿死人之事。

五个多月的长春围困战术蓄意饿死人数骇人听闻。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在其《战犯回忆》中说的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人。日本投降时，长春市人口约五十万，国共东北开战后，大批难民涌入长春，其中包括大批日侨和逃避东北农村暴力土改的农民。宋占林老人回忆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长春一下子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据估计，围城时长春总人口应在八十至一百万间，而解放军入城

时，长春只剩下十多万人（段克文回忆说仅剩六、七万人）。如此算来，段克文说的饿死六十五万人数字不是夸张。

长期围困战结束后，入城的解放军发现很多麻袋国军官兵写的信件。其中的一封诀别信写道：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从文笔看，“耕”应是 1944 年底响应号召从军报国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中的一员。“芳”没有能收到这些封信。多年后，长春发现了一个埋尸万人坑，“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12] 其中或许就有那个青年国军士兵“耕”的尸骨。

在长春围困战后，中共在若干城市攻坚战中推广运用了“长春模式”，[13] 以饿死平民战法收到兵不血刃的克城战果。“永年经验”、“长春模式”之外，中共的“百姓战术”中还有一种是“驱赶百姓打头阵”战法。“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

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14]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15] “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至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16] “百姓战术”不光发生在东北。国民党将军胡璉回忆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百姓打头阵”战法并非中共首创。苏俄在 1920 年到 1921 年的“察里金战斗”中就运动了这种战法。二战中，苏军督战队逼迫平民端枪上阵冲锋送死，其中还包括平民老人。[17] 法西斯也曾运用“百姓战法”。二战中，德军对列宁格勒实施围困战，造成城内平民被饿死一半，死亡人数高达 150 万。“百姓战法”是战争史上最耻辱的篇章。革命党与法西斯在不讲人性、使用百姓战法这点上没有区别。

占领东北后，苏联红军在大肆祸害东北的同时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高大的，战机、坦克造型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在纪念碑上落款为“长春各界人士”。建国后，中共在长春再建立了解放纪念碑，纪念东北野战军在 1948 年 5 月初进攻长春城时阵亡的共军将士。其实，解放军攻城只攻了一阵即改用围困战，攻城军人伤亡很少，围城却害死百姓数十万。在建碑纪标榜自己同时隐瞒滔天罪恶方面，中苏两共没有区别。长春解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共再建了一个长春解放纪念碑，长春市政府的碑文称“向为解放长春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按中共说法，革命烈士不包括围城害死的数十万市民。长春政府四十年后在继续掩盖围城罪恶。可见，时间不会冲淡

革命党之无良。1990年代，中共推出了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其中解说道：“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长春，这座塞外春城在长达七个月的围困后，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晚辈观众不知道，那好听的“熟透苹果”字眼背后是被害死的数十万尸骨，其中很多是腐烂到抬不起来，肉全变蛆。革命党不会为“百姓战法”忏悔，中国没有纪念碑纪念战争中的平民死难者。作家龙应台说，她采访的每个国军老兵在回忆当年国共战争经历时都痛哭失声，“那些不可言说的创伤从未被注视过，从未被抚慰过。”或许有一天，长春解放纪念碑会改成长春围困死难者纪念碑。

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内要求将卫立煌“军法从事”呼声强烈。这时，中共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特意将卫立煌列在其中，以掩盖与卫之间的合作。蒋介石清楚卫通共，但也清楚，在国民党军心动摇时暗中准备投奔新政权者不在少数，惩办卫只能加速党军将领投共，于是顺势作戏，对卫立煌只是撤职软禁，在不久后故意让李宗仁作好人，放卫逃走。到了香港，卫立煌收到周恩来信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给中共发去了建国贺电，用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雀跃万丈等词歌颂一番，而没有立即投奔共产党。他幻想美国人会扶他作“第三种势力”领袖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几年后，卫立煌领袖梦破灭后回大陆投奔了中共。中共给了卫与傅作义一样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虚位，但没有了延安和东北时期那样的恭敬。后来毛泽东不屑地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

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乘胜在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发起了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的徐州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奉中共密令率部倒戈，造成国民党军淮海防线崩溃，中共华东野战军乘机包围了国民党军东路黄伯韬兵团。11月15日，

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切断了敌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随后，毛泽东下令设立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为成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电令的指挥，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全歼了死守待援的黄伯韬兵团，再设伏击败增援的黄维兵团，迫使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放弃徐州，退至蚌埠，迫使副总司令杜聿明及西路邱清泉兵团南撤。在国民党大军困于天寒粮绝的困境时，中共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率部投降，拒绝投降的部队被共军歼灭，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杀，蚌埠不战而下，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数十万主力被歼灭，中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中共在淮海战役中的法宝之一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下党员将领。根据中共指示，张克侠、何基沣、王清瀚、廖运周等一大批将领临阵倒戈，使国民党防线崩溃；法宝之二国民党高层中的共谍向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情报。这些共谍包括，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国军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国民党军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国民党中统淮阴地区调查统计主任郑连魁，国民党江苏省中统调统室特情专员徐冠苏，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国防部监察局首席监察官吴仲禧，国防部第六厅第二科科长（中校军衔）许锡缜等人。有他们提供的国民党军动向情报，毛泽东得以指示正在进行中的平津战役放缓使国民党方面下不了从淮海战场撤离的决心，得以向华东野战军下达在何时何地伏击的具体作战命令，指挥出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埋伏战。总前委众将领起初对毛泽东电报遥控不以为然，但执行后发现无往而不胜，纷纷赞称“敌人的算盘珠子是由我们来拨动的”，“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中共淮海战役的第一功臣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学生，受蒋介石器重，被提升为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他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部署

等大量情报及时报送中共中央，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他将蒋介石对山东作战的指示传递给中共中央，成为解放军挫败国民党军在山东重点进攻的幕后功臣。窃取情报以外。他还拟订了让国军损失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隐瞒中共军队动向，推动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郭汝瑰对蒋介石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导致蒋介石决策错误，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郭汝瑰没想到，率部倒戈后的日子凄风苦雨，在肃反运动中成了“特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文革再遭批斗、游街、抄家。毛泽东对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尚且要整肃，对卧底间谍更不信任，更要整肃。

中共淮海战役的法宝之三是动员了五百多万民夫担任服务与后勤支援，是为世界战争史上动员民夫的最高记录。建国后，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军抓壮丁，冀鲁豫各省老百姓自觉自“支前”。其实，农民弃家上战场并非自愿，而是不去不行。通过土改运动，解放区的农民不再是自耕农，全都成为受中共基层组织指挥的民夫。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斗地主，杀地主，除了跟着共产党没有了退路。土改后上位的农村基层领导提出“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口号，拆农民的房子为解放军修筑工事，强迫老百姓上前线，送子弟参军。中共向农民们宣传的口号是：“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一切；战争胜利了，不光有房子、粮食，日子还会越过越好。”经历土改的华北各省农民一方面希望中共赢得战争以保住他们分得的财产，另一方面在胁迫下只得加入支前的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工兵队，冒风雪，忍饥寒，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解放军一声令下，百万民夫可以一夜挖掘出壕沟让国军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农民不光出人，更要出粮，出钱。例如，九百万人口的豫皖苏区在淮海战役期间派出民工两百多万人，担架八万余副，献出数十万双军鞋，三亿斤粮食，其中包括农民仅有的谷种。被俘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军

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写道：“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运伤员……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

大规模调动民夫不光是淮海战役的法宝，也是中共整个“解放战争”的法宝。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受到围困而无法补给，但共军在围困战中却可以因旷日持久地保障供给。中共后来长期宣传“农民支前充满喜悦”，而隐瞒支前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例如，苏中靖江县的县志最初记载：“1949年2至4月，刚刚被解放的靖江县人民，沉浸在喜悦中，解放大军在两个月以内，连续两次进行公粮征借，两个月之内，征发公粮650万斤，一次350万斤，一次300万斤。”五十年后，靖江县在修编县志时增加了“老百姓为了打内战而吃野草”的实情。应当说，一句“吃野草”不是百姓战争苦难的全部，没有血腥不可能征到那么多粮食和民夫。

币制改革

抗战中，国民政府靠增发法币维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共立即开战，国民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黄金、外汇结存急剧减少，黄金库存减至不足200万两，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也减至仅3亿美元，政府的货币信用破产。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涨了56倍，法币价值趋近于零。8月19日，蒋介石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权，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实行币制改革。改革的办法是：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与美元兑换率为4:1），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以一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实行经济管制和物价管制（将物价限制于8月19日水平）。根据币制改革文件，民众须将

所持旧纸币以三百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成新发行的金圆券，在 9 月 30 日之前将持有的金银及外汇全部上交给政府，不得私存，违者治罪。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在上海推行强制性币制改革措施，以延缓国民政府的金融崩溃。

8 月 23 日，金圆券开始发行。蒋经国在中央银行内设立督导员办公处，调动数万军警、宪兵、政府人员和“青年服务队”在全市的商店、工厂、公司、仓库、车站和码头进行大检查，收集举报，以囤积居奇罪名逮捕了数十位大户商人，要求将物价水平限制在 8 月 19 日的物价水平（八一九防线），不允许上涨。他以铁腕手段管制经济，提出“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等口号，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得不到一天安宁的”，[18] 以“奸商”、“不法官吏”的罪名枪毙了一批把存款汇往国外的批商人、官员，强令从外地向上海调运物资，以稳定上海的物价。

蒋经国破坏商业环境，随意治罪的各项举措暂时奏效，物价在一个月内在被维持在“八一九防线”以下，赢得了部分上海媒体与民众的喝彩，同时遭到商界和上海市政府的强烈反对。上海市长吴国桢指出政治高压手段无助解决经济问题，请求蒋介石撤自己市长职以维持政府威信，实际要求撤销蒋经国赴沪督导职。蒋经国则指吴反对打击商界是上海官商勾结对抗币制改革。蒋介石拒绝吴的反对意见，支持蒋经国“打虎”。根据举报，“打虎”的运动很快涉及到了孔令侃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蒋经国下令拘捕了表弟孔令侃，查封扬子公司，成为震动上海滩的最大新闻。扬子公司是官商，囤货不假，但所谓囤积居奇、奸商完全是随意罪名。上海各报刊及上海警方澄清说，在扬子公司查获的大批货物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并非孔令侃所有。宋美龄亲赴上海，迫蒋经国放了人。

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对上海的工商业者是一场浩劫，大批货物被迫低价出售，存期超过三个月的货物被没收，纸业、杂粮业、糖业公会理事长被扣

押当作人质，全市工商业损失以金圆券亿元计，大批商家被迫关厂、关店、转移资金。由于工厂也不敢滞留现金，又赶紧购买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涨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汉口、重庆、广州等地物价飞涨。在内战持续和中共金融战举措的背景下，政府强制措施控制物价、打击商界的作法无助解决经济问题，只能加速金融系统崩溃。11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停止“打虎”举措，取消限价政策，同时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不再限制人民拥有黄金、外汇，但取消了金圆券的含金量和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保证。政府放弃管制后，物价应声报复性飞涨，不仅突破“八一九防线”，更涨至“八一九”限价的25倍，同时金圆券也大幅贬值至一麻袋金圆券换不来一布袋面粉，遵行政府法令将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的资本家遭受浩劫，城市平民更加困苦。同时。

放弃物价管制后，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最后被上海市民与商界称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蒋经国为失败痛苦地天天喝到大醉。[19] 在推行币制改革的翁文灏内阁为币制改革与限价政策失败而宣告总辞后，蒋经国跟随请辞，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向上海市民道歉，随后黯然离沪。吴、蒋这次分歧成为数年后的台湾政坛的“吴国桢事件”埋下伏笔。暴力手段处理经济问题失败的教训和随后的思考成为蒋经国三十年后领导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宝贵财富。

1949年1月上海物价上涨至“八一九”限价时的128倍，至4月，大米的价格涨至限价时的6万倍，[20] 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全面崩溃。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指责蒋介石发行金圆券之举是吸收民财。李的指责有一定道理。蒋介石早就看清了国民政府被推翻的前景，派陈诚经营台湾，发行金圆券时考虑的已经不是维持财政，而是换黄金运台湾了。

关于运台黄金的数量，中共后来宣传称数额极其庞大，是日后台湾经济起飞和大陆人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半个多世纪后，新任民进党籍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师孟到了位于新店山洞的金库查看，见到了当年运台的大部分黄金。

这些黄金多为当年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形状不一，成色不足。陈估计，当年蒋介石运去台湾的黄金约 300 万两。有文献记载，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8 万两、银元 1520 万枚、美元 1537 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 5 亿美元。[21] 这 5 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只相当于中共因出兵朝鲜欠下苏联 40 亿美元外债的八分之一。陈师孟指出，那些金条对退台之初经济稳定的作用多半是心理上的。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在国民政府即将被推翻时，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建议将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者，以及珍贵文物资料送往台湾。蒋介石立即批准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决定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责成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具体执行。蒋经国安排了送学者们离开大陆的飞机。

傅斯年提出抢救计划是因为对共产革命有深刻认识。苏俄建立共产党之前，他也曾接受李大钊的共产革命宣传，担任北大的学生领袖，出面召集五四学生示威。当学生运动发展到放火烧民宅、殴打外交官时，他毅然退出学生运动。此后，他支持北洋政府抵抗苏俄压迫的立场，反对苏俄向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反对苏俄引入中国的共产革命、共产党和苏维埃。抗战中，他反对中共口头上宣称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实际却拒绝交出军权，对日避战。抗战结束后，他反对苏俄扶植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出面领导了反苏运动。他指出：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土匪流寇并无区别，一旦执政必然剥夺人民的自由会，摧残文化，[22] “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

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23]

在认为共产党将取缔思想与言论自由观点方面，胡适与传傅斯年看法一致。胡适指出：“自 1917 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极权主义者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胡适同意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列举的极权主义特征：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神化领袖；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24]

然而，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对新政权充满期望，选择留下来迎接共产党的新政权，1948 年 3 月选出的 81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只有 24 位选择了离开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一个因为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二是共产党大力宣传，营造民主形象的作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

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心态。

然而不久，傅斯年、胡适的预见全部应验，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实施专政，取缔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大规模屠杀旧政府人员和反对暴政者。那些谢绝了傅斯年安排离开大陆的名学者们没有想到，他们三年后就经历了极为痛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在报刊上发表检讨自污。在大陆知识分子饱受精神折磨时，海外的数千知识精英纷纷返回大陆准备效力新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他们在几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几年后的文革运动中基本被一网打尽，全体惨遭迫害，多数死于非命。

蒋退李代

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惨败后，统率三十万大军布防华中的李宗仁、白崇禧再次挑战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联合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兵团司令张轸等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实际迫蒋下台。在香港打国民党革命委会旗号的李济深趁机与桂系联络，推动倒蒋。蒋介石清楚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无悬念，积极作退往台湾的部署：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下令将中央银行储存的几百万两黄金以及白银、银元 and 外汇秘密分批运往台湾；派蒋经国在溪口设立电台，以便引退后继续指挥撤退事宜。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党政高层聚餐，宣布隐退，请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元旦，蒋介石发表了类似罪己诏的新年文告，表达个人引退和停战求和意向说：“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

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它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同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表达了拒绝和谈的立场。在中共决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之时，李宗仁相信只要蒋介石下台就可以达成国共停战，指挥桂系部下采取了逼宫行动：在武汉贴出了“蒋介石不下野，中共不肯和谈”、“两湖将局部和平”的标语，派人与中共联系，传达逼蒋下野达成和谈的意向。1月4日，蒋介石拜访李宗仁，请李主持局面，与中共和谈。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引退，请李宗仁当场签署了拟好的代行总统职文告，然后离宁飞杭，转往溪口老家。蒋走后，李宗仁发现文告对自己很不利，其中既未提辞职、引退，也没有明确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只提代行职权，意味着蒋介石随时可以中止“代行”，复职视事。由于蒋介石已将文告发表，李宗仁无可奈何。

在李宗仁迫蒋介石下台之时，新华社公布了两批“国民党战犯名单”。毛泽东亲自确定的战犯名单中包括有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吴铁城、吴国桢等国民党文武官员及蒋夫人宋美龄，还有思想界领袖胡适、出版家王云五、《大公报》社长吴鼎昌、独立党派领袖曾琦、宪法之父张君勱。由抗战领袖、抗日名将，自由、宪政的代表人物组成的所谓战犯名单显示，中共的战争是对艰难抗战和清末以来的宪政进程的反动，预示新政权将否定思想、出版、结社自由和言论等自由。

张君勱是几次宪草的主笔，代表着清末以来的制宪进程。毛泽东定张为战犯的一个原因是怀恨张在抗战中发表了《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指出绝无一国两军，自设特区的理由，公开呼吁放弃党军和共区割据，履行服从国民政府共同抗日的承诺的。抗战胜利之初，中共参加了国大，周恩来曾表示拥护张执笔的宪草，在张六十大寿时送了《民主之寿》匾，但在政权更迭之

际，毛泽东不容独立党派存在，要通过否定张代表制宪大业。毛泽东将胡适列为战犯同样在发泄个人恩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与全国众多青年一样，以胡适为偶像。在北大作图书馆助理员时，他求见胡适未能如愿，感到伤了自尊。公布战犯名单之前，毛泽东派中共地下党面劝胡适留下来带头拥戴新政权，并在“对胡适之先生广播”中承诺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挽留被胡适拒绝后，毛将胡列为战犯，称胡为国民党帮凶之首，并在新华社社论中将胡定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

就任代总统后，李宗仁无法容忍蒋介石通过溪口家中的电台继续发号施令，遥控一切，致函要求蒋不再问国事，早日出国，并索取央行库存黄金。蒋回复，请李领导政府，全权调整军政人事，但拒绝出国亡命，谓库存金银已转移安全地点，收支依常规进行，不受任何人干涉和妄支分文。蒋介石宣布引退，专心部署退台是败局中的上策。他精明地在文告中不提辞职，不提继任，为将来复职留下了通道。他知道，李宗仁迟早会投奔中共。下野前夕，为防桂系武力政变，蒋介石密令军统若李先他离开南京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25] 一年后，退台的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三日返回台湾，否则以自动放弃代总统职务论。李宗仁当然没有返台。随后，国大代表通过了对李的弹劾案，联名敦请蒋介石复任总统视事，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蒋介石在台北复任了总统。

平津战役

国民党军东北主力被全歼后，傅作义统率的六十万华北国民党军面临着中共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夹击，军心动摇。当中共军队逼近北京时，傅作义在是否把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的问题上非常矛盾。他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但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也只得与中共接洽，争取停战议和。毛泽东不接受傅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等条件，对傅的和谈请求拖延答复，命令刚刚结束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守军，命令华北解放军第三兵团在绥东地区截

住傅军向绥远逃跑的去路，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以避免刺激傅作义向绥远逃跑。

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已开始在傅作义身边安插眼线，策反了傅的把兄弟曾延毅、老师刘厚同、同乡杜任之、秘书阎又文、联络处长李腾九、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北平市长何思源、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等人。傅冬菊抛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道路，作了父亲身边的卧底。1948年初，傅冬菊奉中共之命窃取了父亲的机密文件，为中共提供了“解放战争中最重要军事情报”。

在北平被解放军包围的形势下，傅作义派崔载之、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为代表到三河县平津前线司令部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谈判。毛泽东拒谈条件，要求傅投降。在傅的代表与中共谈判往来期间，解放军在康庄、怀来地区歼灭了傅军第十六军和第一〇四军主力，将傅系部队主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截断了傅军西逃之路和平津之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傅军的包围。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了天津，全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所部十几万大军。16日，中共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中共将公开信交邓宝珊转递，然后由傅冬菊塞在父亲书房的大堆文件中，实际并未送达傅作义。1月22日，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并发表了广播讲话。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由于没有市民出来欢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清华学生去欢迎解放军入城，拍下照片广为宣传，所以照片中的欢迎人群全是学生。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继续刊登了毛泽东起草，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签署的1月17日致傅作义的最后通牒公开信。2月1日，傅从《人民日报》读到这封半个月前发给他的最后通牒信，感到震惊与愤怒，悔恨投共，但也只能接受献城后尊严尽丧的现实。十几年后，傅作义在文革中遭红卫兵鞭打，傅冬菊这才开始理解了

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后悔背叛父亲。她说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一是因感到对父亲了解太少，二是感到愧对父亲，难以动笔。

国共和谈

与华北的傅作义一样，接掌国民政府的桂系也在向中共乞和。毛泽东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拒绝一切和谈请求。然而，这时斯大林希望国共和谈。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计划即将实现时，他对即将控制全中国的毛泽东充满疑虑，担心毛像当年的蒋介石、冯玉祥一样，接受金钱军火扶植壮大后对苏决裂，担心毛成为第二个铁托，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拒绝服从莫斯科。他希望看到国共两党“划江而治”，互相牵制的局面，以利他在中国长久施加最大的影响力，让苏联大使罗申向中共提出与国民党和谈的建议。毛泽东不理睬罗申的建议，发表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和《评战犯求和》的新华社社论，表达了拒绝与国民党和谈的立场。

1 月 10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命令中共与国民党和谈。毛泽东不能违抗命令，不情愿地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但提出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等八项和谈前提条件。毛泽东一面令解放军继续军事行动，一面要求惩办和谈对手，实际坚持无条件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为向斯大林交差，中共安排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胡愈之、蔡廷锴、茅盾、洪深、朱学范、李德全等五十五人发表了拥护中共八项和谈条件的宣言。桂系通过在香港的李济深向中共提出了以迫蒋下台换取停战和平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答复桂系说，李、白亦为战犯，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作出贡献，先将战犯扣留，以表示和谈诚意。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宣誓代总统职并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次日，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中共

通过叶剑英、潘汉年等向李宗仁传话，希望李效法傅作义将功折罪，逮捕蒋介石及其嫡系将领。

1 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考察毛泽东。国民党对延安“重点进攻”时，中共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了刘少奇主持的办公机关——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劳大），一年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陕北来到华北，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西柏坡，米高扬向毛泽东重申苏联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停战和谈。为打消斯大林的疑虑，毛泽东向米高扬保证绝无铁托那样的独立要求，保证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如既往地服从斯大林的领导，同时电邀国民党代表北上和谈以向斯大林作服从姿态。

2 月，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等名流组成的南京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达国共再召开新政协，组成联合政府的期望，然后到西柏坡村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无论议和结果如何解放军都要渡江。桂系认为中共坚持军事行动可能是为驱蒋，于是安排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逼蒋出国。3 月 8 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 日，李宗仁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4 月 1 日，国民党再派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北上与中共和谈。国民政府代表团表示，蒋已下野，桂系主政，国民党仍有力量，希望达成和平。

毛泽东从来无意和谈，同意南京代表团北上只为作给斯大林看。根据毛的立场，中共代表在和谈中不给国民党任何妥协余地，坚持“惩办国民党战犯”，申明谈不谈得成解放军均要渡过长江，在措辞严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称“国民党犯有发动全面战争罪行”，宣布废除宪法及法统，国民党一切军队须由中共解放军收编，所列战犯如无悔悟表现将从严惩办等等。中共的和谈负责人周恩来以最后通牒口气表示：所拟草案为定稿，不能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如果到 4 月 20 日南京政府还不签字解放军就渡江。李宗仁、白崇禧原以为将蒋介石赶下台中共就会与他们合组联合政

府，没想到中共坚持他们也是战犯，无奈训令张治中不接受和平协定。20日，广州国民党中常会在中共限期日发表声明，宣布不接受中共和平协定和中共所指内战责任，愿依五原则修正和平条款，盼中共颁布停战令。至此，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和谈代表中，张治中、邵力子原本是当年鲍罗廷安插在国民党内的卧底，刘斐早已是共谍。在使命完成，战局明朗的形势下，卧底们留在北平正式投奔了中共新政权，黄绍竑南下避居香港，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团就此散伙。

国民政府退台

1948年7月，解放军开始进攻太原。阎锡山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强调以碉堡战法火力对付中共的“人海战术”。1949年1月，国民党北平守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解放军占领了北平，随后向山西增兵。阎锡山拒绝中共方面派杜任之、章士钊等人出面的劝降，提出“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的口号，表示：“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骨干（同志会骨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将资金和高层亲属转移到台湾及美国，咨询德国医生如何自裁，让川至制药厂制出五百瓶毒药（张照片见美国《时代》杂志和山西《复兴日报》）。3月28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邀阎锡山赴宁共商和谈大计，阎锡山在干部会上宣布了电文，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随后赴宁（阎一去再未能返晋）。

1949年4月21日，中共发布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中共第三、第二野战军同时渡江。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倒戈投奔中共，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解放军顺利渡过了长江，于4月24日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时，在野的蒋介石发表《和平绝望奋斗到底》一文写道：“现在共党匪军强渡长江，南京业已撤守，我爱国军民同胞，八年血战，从日本军阀铁蹄之下光复的首都，为

时未及四年，又沦陷在共产国际铁幕之中。我们今日面对着这一种摧残人民自由，毁灭国家独立，威胁世界和平的黑暗的暴力，每一个国民的生命噫是与整个国家的存亡结成一体而不可分了！中正虽引退于野，为国民一份子，而对于国家的危难，同胞的灾祸，仍自觉其负有重大的责任。际此忧危震撼之时，中正重申决心，誓与我全国同胞，共患难，同生死，并掬我赤忱，向我爱国军民特进一言。一、共匪强渡长江，扩大叛乱，摧毁人民自由，毁灭国家独立；二、共匪没有一点国家意识和民族思想，甘心依附共产国际，做侵略工具；三、全国军民要发挥一切力量，支持反侵略反共产、求生存求自由的神圣战争”，“中共要把我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领土，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共产国际的基地；要把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炮灰；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26]他的预见后来不幸被历史事实一一应验。

在攻占南京同时，中共二十五万大军向太原发起总攻。4月25日，中共宣布国民党山西方面主政的官员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四人为“战犯”而予以缉拿。共军以苏联提供的千门大炮很快摧毁了阎锡山多年修建的城防和碉堡，国民党守军十多人伤亡或投降，解放军付出了四万多人伤亡后攻陷太原，惨烈的太原战役结束。解放军入城前，省长梁化之、阎锡山之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市警察局长师则程率员警在市中心柳巷守御历五小时，至失陷时先杀其幼子幼女，最后击毙妻子史爱英，然后自戕；山西省政府统计处长兼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端在共军入城时将捕到共谍全部处决，与部下三百余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后集体自杀；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尹遵党在共军破城时与平遥县长吴寿台等率部署百余人集体自杀。5月，中共第三野战军占领杭州，上海，第二野战军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渡江攻占了武汉，随后击败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一

路向南席卷。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占领了广州，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国民政府时代结束。

国民政府时代是苏俄主宰中国走向的时代。它始于苏俄扶植国民党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北洋政府，终于苏俄扶植中共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国民政府。在这一时代，中国的战争都是斯大林所策划：中共武装暴动是他指示的，红军是他扶植建立的，红军对国民党军开战是他指示的，红军长征到西北是他决定的，中日全面战争是他下令引爆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也是他一手策划的。在这一时代，苏俄输入的革命带给中国连绵的战祸和千万计的死难。国民党在看清苏俄对华的扩张野心和赤化祸害后与苏俄决裂。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因维护主权，走向宪政，因拒绝作苏联傀儡，拒绝出让满蒙而被苏联操纵在华附庸推翻。在这一时代，美国有能力阻止苏俄赤化中国，有能力阻止斯大林推翻国民政府。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美国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花血本影响中国的走向，由于美国人因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而默认了苏俄再次推翻中国政府。

退到台湾后，国民党根据阎慧卿自尽前致阎锡山绝命电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之语在于台北市圆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及军政首长前往致祭，阎锡山撰写“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碑文、祭文、和《太原五百完人歌》，孙立人为冢题词。阎在歌中唱道：“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他还分析中共的取胜之道说：“第一条，中共不是政党，而是乱党。中共除了拿暴力夺取政权，还特别注重宣传，而且中共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使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相信中共是‘土地改良主义者’、‘内部的改良者’……第二条，中国经济落后，工人

生活困难，思想苦闷，思想容易左倾，工潮日益扩大。中共火上加油，挑动斗争，扩大风潮，造成顺势。国民政府疲于安抚应付，此为逆势；第三条，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私有，佃雇农生活痛苦，中共通过没收与分配两个横暴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但没收的做法，造反者可以这样做，政府怎么能够施行呢？国民政府不能打杀地主，只能实行‘二五减租’，是为逆势；第四条，国民政府要尽力保护人民，而中共是乱党，可以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中共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第五条，国民政府征粮、征兵、征税需要通过法律，中共则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中共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第六条，国民政府又要实行民主，又要剿共，左支右绌，政治效能非常低。中共集权独裁，政治上统治力强，而且不受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第七条，中共以世界革命做号召，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而国民党则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第八条，造反易，守成难。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总之，中共是世界历史上集造反之大成者。中共利用这八条把人民组织起来，再张起铁幕。等于造成一个烂泥滩，再好的汽车开进去，也是马力愈大，陷的愈深，损失愈大。共产党此种战略之下，我们的军队愈坚强、愈深入、愈吃亏。国民党焉能不败？”[27]

第 37 章 中共建国

斯大林定框架

1906 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提出了转变为宪政国家十五年时间表。革命后，民国历届政府继承了清廷的宪政目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历届政府均申明要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走向宪政。北洋政府走向宪政的努力被国共两党武力摧毁，国民党政府走向宪政的努力被中共武力摧毁。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曾对美国人大谈崇尚民主。这些言论只是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手段，共产党不变的立场是从根本上拒绝宪政。毛泽东的世界观是游民思想的传承，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信奉武力、权谋与利用，没有平等、协商和法律观念。他虽然派代表参加了美国人策划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坚持武力推翻国民政府，没有打算协商，对制宪、国会嗤之以鼻。

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毛泽东背弃内战时向社会各界作出的反对一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准备取缔中共之外的所有党派，不召开国会，不制宪。他向斯大林阐述建国方案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独裁者斯大林当然不反对独裁，但认为应作装点门面功夫，不应赤裸裸的独裁。他复电毛泽东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1] 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允许苏联国内多党存在而要求中国多党存在、政治协商不以为然，但这时他正设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当然不能抗命。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内战败局中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南迁广州，美国指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准备抛弃国民党与中共新政权建立关系，而斯大林指示苏联大使罗申随国民党南迁广州，谋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即将实现时，斯大林又突然想止步了。他的考虑是，一来担心毛泽东像二十年前的蒋介石、冯玉祥一样，接受援助壮大后与苏联决裂；二来感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希望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三来担心美国武装干涉；四来担心毛泽东成为另一个拒绝作下属的铁托。斯大林刚把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斥铁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并正考虑派人去暗杀铁托（铁托不久后写信回说：如果你再派人来行刺我也派个人去莫斯科，并且不用再派第二个人），他担心拥有更强力量的毛泽东成为他的另一麻烦。出于上述担心，斯大林谋求国、共划江而治，让国共两党互相牵制，同时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考察中共的立场。

在西柏坡，毛泽东一系列动作并举以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向米高扬再三保证将照顾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申明支持蒙古独立，表态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划清界限，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声明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谩骂美国和司徒雷登的文章，以间谍罪判处美国驻沈阳领事华德有期徒刑并驱逐出境等等，以行动证明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米高扬满意离华后，毛泽东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宣布“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会后，毛泽东派刘少奇访苏，将建国计划报斯大林批准。

7月，刘少奇率高岗、王稼祥及翻译师哲等人秘密访苏。在莫斯科，刘少奇再向斯大林当面保证中共绝不在苏美之间脚踩两只船，将奉行向苏联

“一边倒”，并申请于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建国。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一边倒”保证及“挤走”美国外交官的行动感到满意，决定放弃谋求划江而治，批准了中共建国，提出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应将建立中央政府时间提前。他承诺，在中共建国后立即承认新中国政府，给予新政权 3 亿美元贷款，派专家帮助新中国政府等等。为配合中共对刘少奇访苏的保密，苏联只披露了 1949 年 7 月高岗率领东北代表团（实际上高岗是刘少奇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签订贸易协议的消息。消息披露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指示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毛的信让流亡在香港的反蒋派们弹冠相庆，兴奋准备上京加入新政府。根据传来的斯大林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提前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建国，决定立即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协。这里，“没有反动派参加的”的意思是全部政协委员必须是中共批准任命的。中共决定，党派代表仅限于民盟等几个中共认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仅限中共的属下团体。根据中共的原则，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团体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中共领导的团体，“民主人士”有宋庆龄、钱昌照、萨镇冰、颜惠庆、章士钊、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张元济、梁思成等名流，其他代表包括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中共认定劳动模范，以及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曾泽生等国民党降将特邀代表。

从筹备政协开始，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开始了他少年立志的“坐龙庭”时代。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时代可没人敢如此。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决定将中南海“从速正式开放，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 年 5 月，北平特别市政府仿照当

时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成例，将这里命名为三海公园，正式开放。1930年12月，北平市府将公园名称改为中南海公园。在新华门楼底层门内，悬挂着由满清遗老张海若魏碑体题写的“中南海公园”横匾。公园依赖以下几项收入筹资改善环境，维修破损建筑：门票收入：公园门票与北海公园一样，均为五分；设停车场：脚踏车每辆收大洋一角，人力车大洋两角，汽车大洋五角；出租房屋的收入：中南海园内有居仁堂、喜福堂、欢喜庄、增福堂、来福堂、果园等百余处房屋。公园管理部门将园内房屋向市民招租，租价分五等，每间两元至六元不等；开辟钓鱼区，售票钓鱼票每张一元，限钓鱼二斤，超过二斤补票。公园利用这些收入维修园林内道路，增加路灯、座椅，建厕所，维修损坏严重的新华门、蜈蚣桥等处，雇清扫夫，花匠，请警察局派人驻园保全，使皇家园林焕发昔日光彩。整个国民政府时代，中南海与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一样是普通民众休闲娱乐，举行活动的场所。[2]随着国民政府垮台，美丽的中南海从市民公园变回了皇家禁地，是为共产革命实质是换个更专制的人作皇帝的一个证明。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大会以山呼“毛主席万岁”开始，民国以来在野党派、社会贤达批评政府，制约执政党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政协会议内容是举手通过中共的一系列决定：宣告建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名单，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等决议案。中共拟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人员组成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委员陈毅、贺龙等56人。

关于国号，建国前中共长期宣传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已广为人知。当时国人广泛爱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认为有必要变更国号。变更国号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他决定加入“人民”、“共和”几字。一些代表知道，中共拒绝民选，拒绝共和，要求一党专制，使国号中的

人民、共和字眼失去意义，于是在会上指出加多这几字并无必要。对此意见，中共以在议程中不安排讨论国号的方式加以拒绝。

关于国旗，中共的设计为四小星环拱于一大星之侧的五星红旗，一大星代表中共的领导，将爱国与爱党绑定；四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体现剥夺相当一部分有产者，主要农村地主，的国民资格。国旗上中共凌驾于人民的寓意与深入人心的共和、民主理念相违背。在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抨击中共独裁，但中共也不便明言一颗大星代表自己。于是，《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以不明说国旗中一大星所象征的办法回避党国寓意，只解释说：五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民国时长期敢言的名流政协委员们在重大的国号、国旗寓意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后，人们在镇反运动与土改运动中才知道，改民国为人民共和国意味着取消一部分国民的财产权与生命权。按照中共的理论，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决定谁有资格为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有权剥夺他们认定为敌人者的公民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

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中共在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

如同中华苏维埃国的建国，要员任命，各项纲领文件均是斯大林的决定一样，中共召开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斯大林的决定，或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新中国的国旗、国徽中代表暴力革命的红色来自苏俄，五星来自苏俄（中共、越共、朝共的国旗均有红色及五星），《共同纲领》和后来宪法的党国体制框架来自苏俄。

《共同纲领》

建国前，毛泽东计划取缔中共以外的一切政党，不开国会，不制定宪法，恢复中华苏维埃国。斯大林不同意赤裸裸的独裁，否决了毛泽东的计划，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毛泽东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决定，也不想完全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办，决定作些变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政治局会上宣布，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以指定成员的政协代国会，制定一个临时性质的《共同纲领》代宪法，成立自任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和周恩来、许德珩为正副组长的《共同纲领》起草组。这时，中共党内弥漫崇拜毛泽东气氛，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布置为，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两侧锦旗写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连党全会的新闻稿都要亲自修改才允许发表，显示中共在党内或党外均没有打算平等协商，不可能接受不同意见。

几个月后，中共将起草组拟出的《共同纲领》草案交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定稿。这一征求各党派和各界意见的程序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所谓“各党派”或“民主党派”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领导，所谓“民主人士”也是中共地下党或指定的亲共人士，具有决定意义的程序是毛泽东定稿批准。这种国家大法由个人定稿的程序进一步证明中共和毛泽东无意协商。与草案征求意见程序一样，新政协通过《共同纲领》草案程序也是全体举手走过场。在“毛主席万岁”声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背景下，政协代表们失去质疑的勇气。

从内容看，《共同纲领》的末代清廷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诸大法版本的倒退。《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确立虚君共和议院政治体制，以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族不能担任总理，皇帝不得干涉行政，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不能干预等项规定基本废除了皇权。此后民国制宪的几个

版本基本都表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两大宪政基石。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不受侵犯之权”。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最为进步，不仅阐明了上述两大宪政基石，还规定了地方自治原则，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旧政协制定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虽有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内容，但申明“国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申明了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归总统统帅，超然于党派、各党派合法平等等宪政原则。

然而新中国伊始，《共同纲领》将上述宪政基石和宪政原则人全面废除。首先，它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人民划分为不平等的阶级，将大部分有产阶级排除于人民之外；其次，它废除了民国宪法中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条文，宣布城市资产阶级，农村地主、富农的财产权利不受保护，实际宣布当权者有权剥夺人民的财产；第三，它否定军队国家化，强调军队必须效忠中共一党，服务中共一党私利；第四，它自相矛盾地一面规定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一面又规定中共对政治权力垄断；第五，它自相矛盾地一面规定国家保障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等权利，一面又以镇压反革命的条款否定上述权利。八百年前，英王约翰在贵族压力下签署了《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承诺王室不得随意侵犯私有财产权。这份文献确立了法治和自由民主的基础，可见，民主自由说到底是为了捍卫私有产权、个人利益。以剥夺他人私有财产为宗旨共产革命反民主，反自由，共产党制定的《共同纲领》也是如此。多数政协成员们举手通过这样倒退的大法是出于无奈。因为，中共已经在占领区开始了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家清楚，反对中共的纲领与反革命之间没有界限。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镇压反革命条款的受害者。镇压反革命

的条款被其后五十年的各中共宪法版本保留。期间，中共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

党国体制

1924年，苏俄在主持改组国民党时将党国体制引入了中国，将政治部、宣传部引入了国民党和党军。北伐中，国民党人看清了苏俄赤化的灾难性质，拒绝苏俄安排的赤化道路，对苏俄决裂，驱逐了苏俄顾问和党内军中的公开共产党人，但还是保留了党国体制及其代表性机构——政治部、宣传部。在整个国民政府时代，国民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法达到政治权力的垄断，无法取缔独立传媒，无法全面党化教育，甚至也无法全面党化军队。因此，党国体制在国民政府时代未能在中国全面确立。随着中共建国，党国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列宁、斯大林赤化中国的计划实现。

党国体制的核心是革命党垄断一切政治权力，将军队、政府、司法、媒体、思想、文艺、教育等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全面党化、赤化，不允许其它政党真正存在，取缔独立的司法，独立的传媒，独立的舆论和独立的思想，只允许一党的理论、纲领、信条和声音存在。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宣传中最具蛊惑力的卖点是抨击国民党独裁和鼓吹共产党民主。十年间，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充斥鼓吹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这种表象是中共领袖们游民特点的充分展现。他们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信奉暴力、独裁，完全没有平等、权利观念，更谈不上民主观念，但他们深通欺骗之术，纷纷发表民主言论作为推翻国民政府的斗争策略。毛泽东与孙中山一样深具游民意识，要求当权后取缔一切其它党派，革命党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在准备建国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表达了消灭所有其它政党的计划。斯大林否决了毛的计划，不同意赤裸裸地独裁，要求保留几个听命共产党的伪党派装点门面。毛泽东必须服从，不情愿地指定八个附庸党派继续存在，但同时实行党禁，不允许民众再组新党。获准继续存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农工民主党、民主促

进会（民促）、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都在党纲中规定服从中共领导，其领导人选由中共决定，多数由中共秘密党员充任。对于《共同纲领》中所有党派必须接受中共领导的规定，民盟领袖罗隆基抨击说：在野党不但可以不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更可以反对执政党，约束执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民盟盟章中若加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条文，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他提出，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对罗的要求，中共不屑理会。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说得明白：“房子（政协）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3] 毛此言道出了“民主党派”的真实生存状况。中共通过“民主党派”中的秘密党员控制着八个“民主党派”，通过控制经费、办公场所和提供给党派领袖们的“级别特供”待遇让八个“民主党派”俯首听命，成为政治橱窗。中共将此主仆关系美称为“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八个民主党派”的党魁、高层要员都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建国后没有停止在“民主党派”和港澳台及海外发展地下党员，并仍然让这些人将共党身份保密。

在党化媒体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申明要取缔舆论自由说：“要建立的政权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 在中共的语汇中，人民的就是党的，党的机关部门通常冠以人民字眼，如人民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等等，实际都是党的附属。毛泽东“只让人民有发言权”的意思实际是只有共产党有发言权。他的理想世界是党报之外无报纸，党媒之外无传媒。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人们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我宁可有报纸而没政

府，也不要政府而无报纸。”中共建国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取缔新闻自由，取缔民间报纸，实行对新闻、出版、报业、广播严格管制，将所有报纸纳入了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体系，在党报之外只留下了名义上是“民主党派”所办，实际也是中共控制的《光明日报》、《文汇报》与《大公报》。

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办报自由。《大清报律》宣布，办报无须审批，向当局备案即可。清末、民国时，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垄断，成立党派，创办报纸完全自由，报纸抨击政府，揭露黑暗蔚然成风，陈独秀可以办《新青年》自由表达观点，李大钊可以在苏俄秘密金钱支持下创办成批的刊物，成立成批的团体宣传苏俄革命，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可以创办《湘江评论》，自由表达观点。在赤化中国过程中，苏俄将控制传媒、党化报刊、新闻审查等制度引入了中国。国民党拒绝赤化，基本延续了清末以来办报自由局面。以“民国第一报人”张季鸾和《大公报》为代表独立报人和独立报纸不仅存在，还有发展的空间。张季鸾为《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社训，拒作党派工具，拒以言论自由作交易，坚持了“超党派，为人民说话，作人民的喉舌”的办报宗旨。《大公报》社评以敢于揭露黑暗、抨击国、共两党而闻名。在国民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敢于抨击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抨击国民党效仿苏俄建立党军是“国军私有，民治沦亡”，直指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起的中国内战，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蒋介石上台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党祸》等抨击文章。不光《大公报》如此，国民政府时期的主要报纸大都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社评，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文章为卖点。例如，《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等文，与国民党宣传部对着干。国民党政府习惯在这样的舆论抨击中为政。在政治多元，舆论宽松的局面下，民间不仅能独立办报，还能办独立的广播和通讯社。陪都重庆的民营报社、通讯社有两百多家。沦陷区的传媒更加繁荣，有报纸七百多种，广播电台数十座。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中共充

分享享受着舆论宽松的好处，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时在国统区照样办着众多赤色刊物，在抗战期间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新华日报》宣传共产党主张，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在建国前夕，独立评论家储安平对舆论的前景表示忧虑说：“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什么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5]

储安平的担心不幸成为现实，独立报刊在建国后立即被取缔。著名的《世界日报》变身《光明日报》是独立报刊被取缔的标志性事件。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日报》在抗战前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抗战胜利后，成先生在复刊宣言中坚持超然于党派立场抨击国共两党说：“共产党者不改变政策，仍如政府所传，专以杀人放火，斗争暴动为能事，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革命，势所必至。”解放北平后，中共没收了所有民营报纸，查封了《世界日报》。成舍我发表声明中说：“世界日报不特从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与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贷款，亦向来谢绝。中共所查封世界日报资产中，每部机器之齿轮，每块铅版之字粒，皆为余及数百同人绞脑汁，流血汗以获得。世界日报今虽暂时不能再向华北广大读者供献超然独立之社论，迅速确实之新闻，但过去数十年来，华北广大读者所给予世界日报滋育成长之鼓励，正可坚弥余及无数新闻战士，为新闻之自由继续苦斗之信念。”中共派民盟接管了《世界日报》，将其改组为名义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民盟领袖们没想到，几年后中共不容《光明日报》仅存的一点其它党派色彩，将其改组为另一中共党报。

没有了独立报刊，没有了敢于暴露真相的独立评论，没有了舆论监督，人民就失去了约束政府不做坏事主要武器。在《世界日报》为代表的独立报刊被全部取缔后，中共得以向全体国人封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共与朝共入侵韩国的决议，得以向国人封锁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中的大屠杀。在后来整个毛泽东时代，《人民日报》甚至成了毛泽东的私家报，其头版头条、编者按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栏，《人民日报》和中宣部的负责人陈伯达、邓拓、吴冷西等人直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撰写社论。在党国体制下，独立于中共的思想、文艺、理论刊物被全部取缔，思想界、文艺界、理论界被全面党化。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作为苏俄引入中国的祸害，政治部、宣传部的主要功能是隐瞒真相和推出谎言。政治部因党禁而存在，宣传部因报禁而存在。台湾废除党国体制后，没有了党禁、报禁，政治部、宣传部自然消亡，甚至新闻局也自然消亡。

在党化司法方面，中共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彭真为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的政治法律委员会（政法委），统管司法部、民政部、法制委员会等与司法相关部委。政法委名义上是政务院的下属机构，实际是党管司法的机关，其名称虽非搬自苏俄，但它代表的党管司法模式来自苏俄。在司法服从党权方面，新中国与苏联没有区别。在苏维埃国时期，中共照搬苏共的模式，实行以党代法，苏维埃政府中的司法部徒有其名，保卫局直接捕人、杀人，各苏区肃反中逮捕，屠杀均不经司法审判程序。延安时代，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等法院、法制室、司法委员会等机构也只具宣传意义，类似苏区保卫局的社会部直接捕人、杀人，社会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逮捕、关押、处死黄克功、王实味等一大批干部均由毛泽东决定，社会部执刑，完全不经过边区法院审判。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是参议会选举产生，实际由中共中央决定一样，边区的法院、法制室也是党的下属，须服从党的意旨，除民事小案外的所有案件审判均须上报中共中央决定。在筹备建国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王明、谢觉哉为首的“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作为党管司法的机关。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明起草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

法原则的指示》。几个月后，中共在《共同纲领》中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里所说的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主要指民国的“六法全书”。

六法全书是宪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的总称。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沿用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在沿用旧法的同时不断修改，补充，逐渐形成了“六法全书”。这部全书不是一个朝代、一届政府、一个政党的创造，而是清末以来几代法学家吸收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不断修改以适应国情的结晶，其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一样，是长期进步的成果。六法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也不是国民党所制定，而是包括中共的所有主要党派共同参与制定的，其特色是超然于党派。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指出：法律是缓慢进步的，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至关重要，不应因政权更迭而丧失。然而，在毛泽东藐视一切法规思想的主导下，中共建国伊始就将半个世纪司法进步的成果全部废除，斩断了清末以来法律的连续性。不光是中共藐视成法，山呼“毛主席万岁”的政协委员们全体追随，一致举手废除了一切旧法。他们想不到，中共立即发动了一连串整肃运动，使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尝到了没有法律保护的痛苦。他们更想不到，中共废除旧法后三十年不立法，除了一部党化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外无法，一切以中共的决定为法。

以政法委为代表的党化司法体制是对从清末到民国司法进步历程的大倒退。这一倒退意味着无数民众的灭顶之灾。在建国后几年中，中共不经司法审判屠杀了数百万地主富农和旧政权、旧军队人员。1954年，新中国宪法颁布，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在各界维护宪法权威和司法独立的呼吁声中，中共暂将法律委员会撤销，但拒绝民主党派提出的司法独立的要求。在1954年中共撤销政法委到1958年恢复政法委（政法领导小组）期间，中共党权统管司法的情况毫无变化。在认为司法服从党权方面，中共众高层没

有分歧。刘少奇在 1955 年 1 月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汇报时指示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6]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同年 9 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这几位中共领导人后来都尝到了没有法律保护的苦头。

1958 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书记挂帅”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要求党垄断一切领域，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根据通知，中共中央成立了彭真为组长的“政法领导小组”，各级地方也随之成立了一套各级政法领导小组，使各级司法部门完全纳入党权之下，是为日后各级政法委的前身。在司法服从党权的格局中，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机关名义独立，实际为政法委领导下的一家，与国民党政府之五院名义独立，但都服从国民党中央会一样。

在党化文艺方面，中共在延安已经将文艺全面党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申明，文艺必须是党的工具，歌曲，戏剧，小说等所有的文艺形式必须党化，为中共的政治斗争、整肃运动服务。在党化文艺局面下，传统文艺被消灭。例如，陕北情歌《芝麻油》被改词成了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白毛仙姑”故事改编为宣扬阶级斗争、杀地主的歌剧《白毛女》。建国后，延安的文艺党化局面推行全国，独立于中共的文艺作品被封杀，所有文艺作品只能围绕歌颂共产党的主题。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在改革开放中放松了对文艺的管制，但文艺党化，所有文艺作品须经中共宣传部门审查的格局没有改变，批评中共的作品仍被禁止。

在二十一世纪，国人回望政治多元，组党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教育独立、司法独立的清末、民国时代，不禁慨叹革命带来的倒退和灾难之巨大。

第 38 章 “抗美援朝”

共产阵营策划朝鲜战争

在战胜日本的最后阶段，盟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地位，美、苏出兵朝鲜，根据约定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的南北两边。占领北朝鲜后，斯大林派金日成回国担任朝共领袖，派苏军军事顾问赴朝训练朝鲜军官，以缴获的日军精良武器武装组建起了包括步兵、机械化师及苏 T-34 坦克部队的北朝鲜人民军，再将其中部分精锐机械化部队、坦克部队调去中国东北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1947 年 5 月，苏共与中共签定了《哈尔滨协议》，苏共承诺以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为中共东北战场的大后方；中共保证苏俄长期控制旅顺、大连。[1] 11 月，联合国决议在朝鲜举行民主选举，选出统一的朝鲜政府。由于苏联抵制，联合国的决议无法在北朝鲜实施。1948 年 5 月，南朝鲜选出了国家议会和总统。8 月，李承晚宣誓就任大韩民国总统。9 月，斯大林扶植成立了以金日成为主席的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半岛形成了两大阵营分别支持南北政府的对抗局面。这时，两大阵营正在柏林危机的对抗之中。为应付可能爆发的另一次欧战，斯大林与中共签订了《莫斯科协议》。其中规定，一旦爆发欧战中共须派遣十万远征军及百万劳工赴苏助战。协议签定后，中朝两共再根据斯大林的决定签定了《平壤互助协议》，约定朝共派军队助中共内战，中共夺取政权后助朝共武力统一朝鲜半岛。[2] 《平壤互助协议》签署后，斯大林调朝鲜人民军精锐部队加入了中共的东北野战军，帮助中共在三个月内全歼了东北国民党军的主力。

在共产阵营通过《哈尔滨协议》、《莫斯科协议》和《平壤互助协议》约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时，美国民意要求“撤回海外驻军，让我们的孩子回家”，美国政府大力裁军，关闭军工厂，将二战结束时的 1200 多万美军裁减了 1100 多万，同时决定以欧洲为扼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点，在亚洲采取“退出”政策。1948 年 9 月，美国宣布结束对南朝鲜的军事占领，开始撤军。李承晚曾扬言要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美国天真地以为只要南方军队弱小就会和平，不给南朝鲜军留重型武器。随着美军撤离，没有重炮、坦克、反坦克武器和空军的弱小南朝鲜军和南朝鲜民选政府处于北朝鲜人民军的严重威胁之中。1949 年 3 月，金日成率朴宪永、金一高等层访苏，向斯大林申请签定军事盟约及对南韩开战。

在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之际，斯大林感到苏俄将失去对旅顺、大连两港口的控制权。为保持在太平洋上拥有不冻港，他希望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以南朝鲜的釜山、仁川接替旅顺、大连，作为俄国在东方的不冻港，但又怕引发与美国的冲突。二战中，他充分领教了美国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决定以避免与美国冲突为战后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他搁置了金日成的开战请求，只同意与金日成签定《朝苏经济文化合作协议》、《朝苏军事秘密协议》和《朝苏军事秘密协议》。根据这两协议，苏联再援助朝共武器装备，包括 20 架侦察机、100 架战斗机、30 架轰炸机，向朝鲜派出 120 人的军事顾问团，援助朝共 10 亿卢布的物资。

4 月，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向中共提出履行《平壤互助协议》的要求。毛泽东表态履行《平壤互助协议》，调四野的三个朝鲜族师携全部装备弹药入朝编入朝鲜人民军，并建议在 1950 年上半年对韩开战。[3] 金一走后，毛泽东指示主政东北的高岗为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族师赴朝鲜安排招兵扩充等准备事宜。根据毛的指示，中共吉林省委于 6 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迅速扩充朝鲜族兵员。7 月，中共将四野朝鲜族第一六四师（师长李德山）、一六六师（师长方虎山，副师长洪林）连同轻、重机

枪、六〇炮、山炮等全部装备调入朝鲜，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和第六师，调正在南方的四野第一五六朝鲜族师北上准备入朝。有了四野调来的精锐部队，金日成感到实力倍增，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SHTYKOV，斯蒂科夫）再向斯大林申请开战，并开始在瓮津半岛和开城对南韩军武力挑衅。虽然这时苏联的原子弹已爆炸成功，斯大林还是坚守避免与美国冲突的原则，再次搁置了金日成的开战申请。

毛泽东访苏

与朝鲜战争计划启动 1949 年 12 月中，毛泽东以为斯大林祝寿的名义，率随员携寿礼到了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与苏联另签新盟约，谋求苏联的继续扶持。斯大林担心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让美国有了苏联违反《雅尔塔密约》的借口而不再承认密约给予苏联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大连等利益，对毛泽东的另签新约要求不作表态。12 月 24 日，毛泽东、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毛请求苏联提供海军和空军的援助帮助中共攻占台湾，斯大林不置可否。毛泽东对两次会谈无收获颇为失望。

几天后，斯大林从苏联情报部门得知，美国决定将在亚洲的战略防线退至菲律宾、日本、琉球一线，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排除出战略防御圈，这让他感到可以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而不致引发与美国冲突。他立即作出两项决定：与中共签订新条约结盟、批准金日成实施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1950 年元旦，斯大林通知毛泽东同意另签新盟约。随后几天，二人就发动朝鲜战争连续磋商。[4] 斯大林强调，苏联须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在朝鲜的战争中以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为限，暗示中共须履行《平壤互助协议》出兵朝鲜助金日成统一。毛泽东清楚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是斯大林金钱、武器支持的结果，知道斯大林的暗示不能违抗的，承诺出兵朝鲜以作“一边倒”的证明。二人敲定：发动朝鲜战争，中国派陆军赴

朝，苏联提供空军支持。随后，毛泽东电召周恩来来到莫斯科操办与苏联另签盟约。

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1.5声明），宣布美国将在远东奉行不介入朝鲜和台湾的军事冲突的政策，不向台湾国民党军提供军事援助，不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12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发表了“亚洲危机与美国政策”演说，重申美国在亚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将朝鲜半岛与台湾一起排除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圈之外。根据“在亚洲不介入”的政策，美军作好了中共攻占台湾的准备，蒋介石则不得不为逃离台湾作准备。1月30日，斯大林向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发出了批准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电报。

《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议》

在发动朝鲜战争和中苏另签新盟约的密谈中，毛泽东表示接受苏联的一系列特权要求，斯大林承诺帮助中共建立军工体系。根据二人密谈的框架，周恩来与苏联外长展开了具体磋商。1950年2月12日，周恩来与苏联外长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VYSHINSKY）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议》（特别协议）。通过这一特别协议，苏俄基本实现了当年沙俄将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纳入其势力范围，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中国的目标。

《特别协议》规定，苏联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军，在可能发生的欧战中苏联出军火，中国派兵员及1000万华工去保卫苏联。协议中中国增加兵额四百万的条文实际是“朝鲜战争计划”的一部分。协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国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中国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苏俄享受在华通商贸易特权等等。这些不平等条款与当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规定相似，协议中“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

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的条款意味苏俄分享中国领土的主权。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特别协议》竟然规定中国须减少一亿人口。[5]这一条款的意思显然不是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而是要求中国准备为可能发生的两大阵营战争死人。革命党史书称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中日新约》，双称《民四条约》，实际只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卖国。《二十一条》确有丧权辱国的内容，但那是最后通牒逼迫的产物。而更加辱国的《特别协议》却是毛泽东、周恩来找上门去与苏联订立的。中外历史上有过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还没有一个政府签署过如此倾全国之力去为别国效力，答应本国死六分之一人口的条约。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清楚，这样的《特别协议》一旦披露将引起中国另一次反苏运动，于是指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协议中加入了保密条款，约定在协议之外另签一个仅用于对外公布的幌子条约。两天后，周恩来与苏俄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了幌子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准备公开的《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议》（三亿美元贷款协议）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报道了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消息，而将签定《特别协议》向国内外隐瞒。报上刊登了斯大林、毛泽东参加了签字仪式的照片，没有人知道那是 2 月 12 日在签《特别协议》还是 2 月 14 日在签幌子盟约。几天后，有国内报纸报导了中、苏两合营公司的消息（中苏签定的经济合作协议中规定，在中国成立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立包括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四个合营公司，双方各占 50% 的股份）。四年前曾参加反苏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看出，这两合股公司其实就是国民政府拒绝苏联的“战利品合营东北”计划的一部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生和教授们纷纷组织游行，抗议苏联攫取中国经济权益，要求新政府作出解释，更有学生直指苏联侵略、新政府卖国。但这时，中共已经取缔了独立传媒，可以轻易地将学生请愿的消息封锁。

朝鲜战争爆发

斯大林批准朝鲜战争计划后，朝、苏、中三共发动战争的布署紧锣密鼓：1950年2月，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什特科夫达成了以黄金、白银及有色金属矿石换取苏联军火的协议；金日成派北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来华接收四野朝鲜族一五六师；苏联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负责开战准备；3月，毛泽东下令大规模军事调动，在东北集结了四十万大军，在河南集结了十二万大军，准备出兵朝鲜；4月，金日成率领庞大的军事代表团访苏要求开战后的军事支持，斯大林命金去北京与毛泽东讨论军事支持；同月，一五六师（一三九师、一四零师、一四一师中的朝鲜族官兵被编入该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机械化旅和一个摩托车团，携带全部武器装备进入朝鲜，抵达元山后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七师；5月，斯大林将金日成和朝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朴宪永送到北京，金与毛磋商了中国出兵支持问题；当月底，金日成一行离京回朝，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准备完毕，预定开战时间为6月25日，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批准了报告；6月初，毛泽东在京召开高层会议，讨论了出兵事宜。

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大军向南朝鲜突然发动进攻，全线侵入了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讨论朝鲜半岛局势紧急会议。为避免在联大形成与美国对抗的局面，斯大林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ЯКОВ МАЛИК）以抗议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为由不参加提案表决。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武装进攻决议案》，要求北朝鲜停战并撤回三十八度线以北。同日，李承晚通过韩国驻台湾大使向蒋介石面交了求援急电。蒋介石分别致电李承晚、麦克阿瑟，表示一经同意，即派军队赴朝鲜参战。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杜鲁门召集高层会议讨论了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ARTHUR JOHNSON）、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等将领从军事方面考虑，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反对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不应让台湾军队赴援南朝鲜。”杜鲁门接受了艾的主张。

6月27日，北朝鲜人民军攻占了韩国首都汉城，然后继续向南席卷，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开往南朝鲜，并发表“台湾中立化声明”（6.27声明）说：“鉴于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决定。”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开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援助韩国，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入朝以恢复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三个代表不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斯大林在密电中解释不参加安理会的考虑说：“这是为了帮助美国在安理会顺利获得多数赞成票，使得美国深陷朝鲜半岛军事问题，且逐渐丧失军事威信和道德权威。试想一下，美国持续介入朝鲜战争，且中国也被卷入朝鲜半岛，这不仅让苏联在欧洲加强社会主义赢得更多时间，同时也有利保持国际势力均衡”。[6]

6月28日，美国空军开始轰炸被北朝鲜人民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南地区，美国第七舰队的九艘军舰驶入台湾海峡，中共攻占台湾的计划泡汤。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美国与南朝鲜政府挑起朝鲜战争，声称“坚决保卫鸭绿江，支持北朝鲜，第七舰队的行动反映美国霸占亚洲的野心”。与中共相呼应，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也发表了指美国和韩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声明。6月29日，麦克阿瑟从东京第三次电请杜鲁门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出兵建议。麦的请求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但再遭国务卿艾奇逊反对。杜鲁门总统接受艾的“避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意见，拒绝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

6月30日，美国国会批准对北朝鲜宣战。7月1日，美军首批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在釜山登陆。随后，十二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荷兰、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陆续入朝参战，数十国响应联大决议为联合国军提供装备物资。7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杜鲁门的提名，任命麦克阿瑟元帅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帅立即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合国军朝鲜实地指挥官。

7月底，麦克阿瑟不顾美国政府的“台湾中立化”政策，率高级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台湾协议》，在台湾设立了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前线指挥所，调 F—80 型战斗机进驻台湾，将美军驻台湾“联络组”扩大为“远东盟军总部军事调查团”，运送武器装备援助蒋介石。有了美军的援助，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重新进占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麦帅的擅自举动鼓舞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同时让杜鲁门极为恼怒。

8月，长驱直入的朝鲜人民军在釜山一线遇到美军的顽强抵抗。随着美军的坦克和大炮源源不断加入战斗，补给线遭到美国空军的攻击，北朝鲜军在釜山战役遭受重创，战局出现逆转。8月底，五角大楼批准了麦克阿瑟提出的“陆、海、空三军配合，趁9月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9月15日，两万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的仁川登陆，迅速将北朝鲜军分割、包围。以中共解放军为主力的北朝鲜人民军经长途奔袭已是强弩之末，遭美军拦腰攻击全线崩溃。沃克将军指挥美军第八集团军与登陆军协同作战，全歼了北朝鲜人民军第三、第八、第十二师，再乘胜追击，于9月22日渡过了洛东江，于9月29日收复了汉城，然后继续向北追击。9月30日，南朝鲜第三师越过三八线进军北朝鲜。金日成见北朝鲜军主力被歼灭，仅三万残部逃回三八线以北（其中的方虎山、金武亭等一大批中共朝鲜族将领后来被以失败罪名整死），急电斯大林要求援助。

五次战役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时接到金日成和斯大林要求出兵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还提出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当晚，毛泽东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在会后向斯大林发出了决定出兵的电报。[7] 10月2日，毛泽东再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让众高层们谈对出兵朝鲜的意见。众高层都知道国家连年战乱后人民困苦，物价飞涨，不应出兵国外，但又知道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在东北及河南集结军队，指示东北局加紧修复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以作为苏联空军的作战基地，明摆着已经决定出兵。延安整风后，众高层都学会了服从毛泽东的生存方式。虽然大家都清楚派兵去外国与世界头号强国开战的灾难性质，但谁也不提反对意见，全体附和毛泽东。会后，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要林挂帅入朝。准备入朝的大军主要为四野部队，林彪又熟悉东北一带的作战环境，无疑是志愿军司令员的最佳人选。但他以生病理由拒绝挂帅赴朝。他在会上不提反对意见，但在挂帅入朝要求面前开口表示反对说：美国要武力入侵中国，几年前内战中就出兵了。美国人并没惹到中国，中国不该到国外去多管闲事，为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他提出，如果一定要出兵，也应屯兵于朝鲜北部虚张声势，出而不战，能不打就不打。[8] 毛泽东指责林彪拒绝挂帅是害怕。林彪反唇相讥说：你能打仗，你自己带兵去嘛。毛泽东无奈，急派邓小平召彭德怀来中南海，对彭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当即表态愿意挂帅。[9] 随后，毛泽东派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向美国再发出严重警告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会坚决干预。10月7日，联大以47票同意、5票反对和7票弃权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授权联合国军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反攻进入北朝鲜。当天，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美军第一师前锋逼近了鸭绿江、图们江。杜鲁门总统担心战争升级，电令美军止步。10月8日，毛泽东不经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会议讨论和批准，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这一命令其实不只是组军，而是出兵参战令。

同日，周恩来、林彪飞赴黑海海滨与斯大林讨论空军支持问题。毛泽东想通过二人向斯大林传递中共高层反对出兵的意见，作出犹豫姿态以利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更多军事技术援助。10月10日，美军的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的机场。斯大林认为这是美国在警告他在朝鲜止步，这时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已不是在朝鲜半岛扩张，而是如何避免与美国开战。他承认，先前根据美国声明发动朝鲜战争判断有误，准备放弃朝鲜半岛，接受北朝鲜政权被推翻。他向周、林表示，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如无外援，金日成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不如早点主动撤退。闻斯大林此言，周、林相信，中国可以不参战了。10月12日，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10月13日，斯大林向金日成发出了撤离朝鲜退入中国东北的指示电报。

在美、苏、朝都决定结束战争之时，毛泽东的战争狂热改变了历史进程。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没有苏联空军支持照样出兵入朝作战，要求以人海战术战胜优势装备。毛泽东坚持要出兵朝鲜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喜欢战争，习惯了战争加整肃运动的生活方式；第二，他要通过出兵打消斯大林对他的疑虑；第三，他要借朝鲜战争将投降的国民党军处理掉。几个月前，他已将投降的国民党军尽量多地集结进了赴朝大军，例如曾泽生所部国民党第六十军（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原陈明仁所部国军第二十九军、七十一军（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二、五十三军）等等。有这样的打算，他当然不介意有无空中掩护了。13日晚，他通过苏联大使罗申电告斯大林：“中国有义务派兵赴朝鲜”。[10] 斯大林得知毛泽东不要空军掩护照样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到流泪，连称“中国同志好”，电命金日成暂缓执行13日白天的撤离指示。[11] 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妥中国不出兵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电报不敢相信，以为是电报写错了。毛泽东不要空中掩护照样出兵的决定传到准备入朝的志愿军中，高级将领们为美军轰炸和朝鲜严寒忧虑，联名致信彭德怀，要求将出兵时间推迟到次年春天。毛泽东拒绝了众将意见，下令立即出兵入朝。

收到中共在满洲已集结军队可能出兵朝鲜的情报后，杜鲁门总统飞到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威克岛与麦帅会谈。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在国内一片废墟的情况下以衰弱国力和极为落后的装备介入朝鲜战争，断定美军会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杜鲁门总统接受了麦帅的判断。会见后，麦克阿瑟向记者宣布北朝鲜已经失败，联合国军将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全境，结束战争，命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联合国军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推进，截断朝鲜人民军退路，命令美军第十军从北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10月19日，美军第八军攻占了平壤。当天，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三十万中国志愿军从安东（丹东）、河口（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鸭绿江侵入朝鲜。当联合国军进向西北逼进鸭绿江时，志愿军不宣而战，突袭了联合国军。得志愿军捷报，毛泽东连发电报，命彭德怀再歼灭美军几个师。

第一次战役

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整个白天潜伏在树林里不动的中国志愿军，估计中国军队有五万左右。麦克阿瑟不认为五万中国军队能阻挡美军，下令继续向北追击。10月25日，二十多万志愿军向联合国军发动突进攻，兵力处于分散状态的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被迫全线撤退至清川江以南，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希望破灭，中共称此为第一次战役胜利。

遭遇突袭后，麦克阿瑟确定中国已经出兵入朝，致电华盛顿要求轰炸鸭绿江大桥、渡口以及从鸭绿江通往朝鲜的各条运输线。但是，杜鲁门担心战争扩大，一再否决麦克阿瑟的轰炸计划。麦克阿瑟力争道：既然北朝鲜发动了战争，中国无视联合国决议加入侵略战争，联合国军没有理由在战场缩手缩脚，华盛顿对战场指挥权的限制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军的作战。杜鲁门不情愿地同意轰炸，但对轰炸范围作了诸多限制。此后半个月，美国轰炸机群对新义州和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将鸭绿江大桥的朝鲜一端炸断。

第二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后，毛泽东督促彭德怀再度开战，在 11 月 18 日中称：“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按毛的要求，彭德怀指挥志愿军于 11 月 25 日发动了第二次战役，以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二军攻击美军第八集团军，在清川江以北击溃南朝鲜军第二兵团，迫使联合国军进一步南撤。12 月 5 日，联合国军弃守平壤，全线退回三八线以南，百万难民跟随美军南逃。美军主将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在南撤途中车祸遇难，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接任了联合国军朝鲜战场主帅。12 月 6 日，志愿军占领了平壤，24 日再占兴南，并继续向三八线以南追击。李奇微下令南撤藏有杀手锏，美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追入南朝鲜的志愿军上无空军掩护，下无地面工事掩体，在美国空军火力下成片阵亡。

图片

图片

这时，朝鲜的严冬降临，并且是五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美军有完备的后勤保障，部队全无冻饿之忧。但志愿军可就惨了。漫长的后勤补给线被炸中断，东北后勤处也无力满足国外几十万大军的供应，仓促入朝的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饿着肚子，大批冻饿死亡。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役，志愿军冻伤人数高达三万，其中四千人冻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战士邹士勇多年后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死鹰岭发现第二十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的连队，穿着单衣裤、单胶鞋，全体冻死在了冰雪掩体中。[12]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司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严寒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第 27 军 80 师 242 团第 5 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体冻死在阵地上。在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明补给线随修随炸，部队遇到粮、弹、鞋、油、盐供应的严重困难，请求

止步三八线，休整三个月。毛泽东复电拒绝止步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十三国提案，决议成立由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印度代表劳氏与加拿大代表皮尔逊组成的停战三人小组，要求在朝鲜先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它问题。毛泽东拒绝联大决议，命令志愿军继续南下。然而，饥寒交迫的志愿军士兵在冻饿中大批死亡，部队停在三八线，第二次战役结束。

第三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以停下来的方式结束后，毛泽东拒绝彭德怀休整的要求，命令志愿军继续作战。彭德怀无奈，于12月31日勉强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强令三十万志愿军在饥寒交迫中连续行军，把战线向南推进了一百公里。志愿军推进到三十七度线附近时，汉城民众再次大逃亡。1951年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中共在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刊出口号“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随后在全国城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但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战士在严寒中得不到衣食给养，冻掉手脚及倒地冻死者越来越多，大批伤病员因交通受阻，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只吃炒面的士兵普遍夜盲，不少人在夜间行军中失足山涧而亡。越过汉江后，志愿军全线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的狭窄地区，惨遭美军飞机轮番轰炸。在部队因冻伤丧失战斗力的情况，彭德怀于1月8日下令停止南下，第三次战役再次以停下来的方式结束。

1月13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安排朝鲜人民选举；召开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毛泽东再次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建议，拒绝彭德怀以电陈志愿军严重冻

饿减员和休整请求的方式表达的停战要求，命令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狂妄要求一举统一朝鲜半岛。在致斯大林电中，毛泽东透露强迫志愿军推进的动机说：美国不可能与中国比赛死人，中国以志愿军的人力来跟美国的优势武器拚消耗，不怕再伤亡几十万人。[13] 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宣布：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和谈建议。

毛泽东一再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决议，坚持与联合国开战的举动再现了庚子年慈禧太后向各国列强同时宣战的荒唐，但比清廷要恶毒很多。清廷宣战的毕竟是来到中国的列强，而毛泽东坚持在外国，对与中国不相干的全世界开战。中国拒绝停战建议后，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四国派军队赴朝鲜加入了联合国军，使联合国军派出国由十二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荷兰、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增至十六国，此外瑞典、印度派出了医疗船和医院到韩国为联合国军服务，展示出世界正义的力量。

第四次战役

根据志愿军一再作战几天后就止步的情况，李奇微确信，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只能维持“礼拜攻势”，超过七天就丧失战斗力，决定趁志愿军丧失战斗力时反击。他的判断正确。志愿军士兵除枪支、弹药、雨衣、棉被、军用铁锹外只能再背五天的炒面，超过一周就难以维持。1月25日，联合国军发起了代号为“屠夫作战”的反攻，西线以美第一、第九军所属六个师为主力，向汉城反攻，东线以南朝鲜军八个师为主力，向原州、清平川反攻。志愿军在饥寒交迫中应战，打响了“第四次战役”。

战役中，彭德怀要求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被苏方以不宜介入朝鲜战争的理由拒绝。苏联空军虽然派出了三个师参战，但严守避免与美国冲突的原则，将空战限于鸭绿江与平壤之间的“米格走廊”，不越过平壤一线。根据斯大林不准暴露苏军参战的命令，苏军制定了多项避免暴露身份的措施，

包括将苏军飞机上的徽记改涂成中共的“八一”标记，飞行员穿上中共空军的军服，禁止飞行员到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以免飞行员被俘。如此作战的苏联空军的当然不能对志愿军提供实质性掩护。没有空中掩护的志愿军只靠人海战术与美军强大的地面与空中火力拼，士兵整连整营地阵亡。

由于毛泽东在北京遥控指挥，司令员彭德怀的主要工作成了向北京发电报，和接收毛泽东的电令。彭一再陈述伤亡巨大，请求撤退，毛一再驳回请求，命彭坚守汉城不得撤退。彭德怀何尝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更知道在毛泽东之下为臣，君命稍有不就是大罪，十年前违反“不得对日开战”的君命，下令袭击了几段铁路，被严厉整肃加降级记忆犹新。于是，朝鲜战场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在国外作战的总司令飞返国都去申请撤退。到京后，彭德怀推开警卫直入毛泽东卧室，向毛陈述不准撤退的结果将是溃败。而这时，彭的陈述和毛的批准都不重要了，志愿军已经开始溃败。4月初，志愿军败退回了三八线以北。彭德怀的总司令有名无实，麦克阿瑟也差不多。杜鲁门否决了麦克阿瑟乘胜追击的建议，命联合国军止步三八线，第四次战役结束。

杜鲁门换帅

乘胜追击被禁止，麦克阿瑟不顾杜鲁门总统的战略考虑，允许美国飞机越过中朝边境，并发表了批评杜鲁门政策的谈话。杜鲁门不容麦克阿瑟挑战政府政策，于4月11日宣布解除麦克阿瑟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职务，任命李奇微将军接任。麦帅听夫人轻声告知被解职的消息后，沉默片刻平静地说：“珍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日本政府为麦克阿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天皇裕仁亲自到麦克阿瑟驻地为其送行，东京小学生放假一天沿途欢送他们心目中为日本的战后复兴作出贡献的麦帅。在夏威夷，麦克阿瑟受到了十万人夹道欢迎，在旧金山，欢迎人数达五十万，在纽约上百万。民众对总统将麦帅解职强烈不满，数万谴责信函电报发到白宫。杜鲁门答复：“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阿瑟将会逐步降为凡人，人民将会理解我做的不得不做的事。”

总统将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统帅解职无可非议，但是麦克阿瑟的批评是正确的。朝鲜战争其实是美国民主党政府长期亲共政策的恶果。罗斯福在二战中大力支持苏联共产政权，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帮助苏联建立了共产阵营。战后，在斯大林武装和指挥中共军队推翻国民政府过程中，美国左派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抨击中国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侵犯人权，却不提苏共、中共的残暴，不谴责共产阵营挑起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杜鲁门政府默认苏联赤化中国。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之下，斯大林指挥中共推翻了国民党政府。苏联在占领北朝鲜期间武装训练了强大北朝鲜军队，撤军时留下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以准备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显而易见，若无美国的支持，南韩民主政权将被共产主义阵营武力推翻。从朝鲜半岛撤军后，美国只要明确表达不容共产阵营推翻南韩政府的立场，斯大林不会发动朝鲜战争。然而，民主党政府在撤军后不断发表将台湾与朝鲜排除出防御圈外的政策声明，鼓励了共产主义阵营在朝鲜半岛扩张，帮助斯大林作出了开战决定，诱发了朝鲜战争。共和党人反对杜鲁门政府纵容共产阵营的政策，掀起了坚决取缔渗透到美国的共产势力的“麦卡锡”运动。在参议员麦卡锡明确要求调查杜鲁门、马歇尔民主党政府纵容共产势力扩张行径的压力下，杜鲁门不情愿地背弃“不卷入”声明，对共产阵营开战。出兵朝鲜后，杜鲁门政府在小打与大打之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生怕得罪了共产主义阵营，客观上鼓励了斯大林、毛泽东一再拒绝停战。当麦帅提出接受蒋介石出兵的建议时，国务卿艾声称“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将招致中共将出兵干涉和朝鲜战争扩大，令局势将难以控制，美国将深陷战争泥潭，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此言显示艾氏对共产主义阵营充满幻想，认知肤浅。相比之下，蒋介石、麦克阿瑟才对共产主义阵营有明确而正确的认识。蒋介石在战争爆发后立即指出苏俄是北朝鲜侵略的幕后决策人，联合国应谴责苏俄对朝鲜战争的责任，建议美国直接向苏俄提出停止战争的要求。蒋介石所言清楚道出了朝鲜战争的实质。发动朝鲜战争朝鲜人民军其实主要是由是从苏联训练回后回国的朝鲜军官和中共第四野战军高来的精锐之师。战争确实是苏共与中共所策划。如果美国政府接收蒋介石

的建议，严正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战争完全可能在中国出兵前结束了。中共出兵朝鲜后，麦克阿瑟将军指出：中国事实上已经对美宣战，美国应增派兵力，以空军优势迅速封锁鸭绿江及中朝边境，轰炸苏联和中国东北，航母编队开进渤海湾。实际上，麦克阿瑟主张不限制战争规模与范围的主张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佳策略。斯大林在 10 月初美军飞机攻击苏联机场时就决定退缩，向金日成发出了撤离朝鲜半岛的指示。若无杜鲁门对麦帅指挥的百般限制，若无美国的一再示弱，若麦帅能够按战争常理指挥，其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可以实现。在第三、第四次战役时，若无杜鲁门的限制，战争还是可能提前结束。杜鲁门政府怕激怒共产主义阵营的作法鼓励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继续战争，使共产阵营敢于一再拒绝停战。麦克阿瑟当时指出：“历史教训证明，姑息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证明他的论断正确。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自相矛盾，进退失据，想避免战争却引发了战争，想限制战争却扩大，想早结束战争却延长了战争。杜鲁门多年后写道：“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当年的侵略一样，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人会更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的海岸国家侵略。如果自由世界容忍共产党人武力侵略大韩民国，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抵抗来自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不制止侵略，正如 1931 年在满洲，1935 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没有加以制止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的基础和原则将受到威胁。”[14] 他的这番说法是在为其亲共政策辩护。若罗斯福、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真的拒绝共产主义扩张就不会有共产阵营，就不会有赤化的中国和朝鲜，若无民主党政府的“不卷入”声明及艾奇逊的亚洲政策演讲，也就不会有朝鲜战争。

第五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失败后，彭德怀再向毛泽东请求停战休整。这时，金日成承认武力统一失败，要求停战以保北朝鲜地盘。然而，毛泽东不顾国内严重的

经济危机和志愿军的巨大伤亡，拒绝停战，强令志愿军继续作战。4月22日，志愿军在毛泽东的逼迫下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至29日，志愿军攻占了国祀峰、梧琴里，逸里、富坪里地区，美军主力撤至汉城，汉城出现第三次逃难潮。李奇微摸准了志愿军的“七天作战”规律，下令坚守汉城，并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第二次春季攻势”计划。几天后，志愿军自带粮尽，被迫停止进攻。5月1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计划，李奇微下令发起反击。供给断绝的志愿军战斗力基本丧失，向北败退，联合国军全线追击，金日成抛弃与中国志愿军的联合阵线，命北朝鲜人民军队单独撤退以保存实力。

在志愿军司令部一再发出不顾士兵死活的命令以及朝鲜人民军单独撤退的形势下，志愿军士兵们决定抗命，拒绝在既无空中掩护，又无供应保障的情况下成为美军地面、空中火力的炮灰，第六十军一八〇师的上万官兵决定投降。这一行动为所有的志愿军部队作出了示范，志愿军整体丧失了斗志。联合国军在追击至三八线时止步，第二次春季攻势（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结束。

抗美援朝运动

发动朝鲜战争后，中共利控制全国报纸电台宣传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声称美国企图进一步侵略中国，利用国人的爱国热情掀起反美运动。事实正如林彪在拒绝挂帅时所指出的，美国无意侵略中国。二战结束时，列强各国一片废墟，美国本土未受摧残，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现役军人多达1200多万，具备征服任何国家的实力。如果美国真的支持国民政府，中共没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就算美国有心侵略中国，也完全没有必要先打朝鲜，从日本飞袭，或从中国漫长海岸线登陆更加方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最强硬的意见也不过是麦克阿瑟提出的“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可是，在中共取缔一切独立报纸传媒情况下，绝大多数国人不了解上述真相，不知道联合国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不了解全世界四十多

个国家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参与制止侵略行动。国人能听到的只有中共控制传媒宣传的“美帝侵略，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中共是在怎样的经济形势下出兵朝鲜的呢？经过长期抗战和内战，国家一片废墟，在新政权建立的半年内，各地物价在内战中恶性通货膨胀基础上再大幅上涨，先是工业原料、五金、化学工业品上涨，接着棉纱、粮食价格暴涨，整体物价上涨了十几倍。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控制物价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政府严控粮、棉、布、煤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全国现金统一管理，指定人民银行统一调度现金和管理外汇。毛泽东就是在国民如此困苦，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开战，并且在开战后数度拒绝停战，坚持与全世界为敌。

1950年12月，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遵照中共指示发出了《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的抗美援朝总会。政协、“民主党派”抗美援朝总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文联、全国美协等团体必须有所行动，纷纷发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发起了订立“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支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爱国公约”和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活动，北京书画界组织老舍、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浅予、溥雪斋、胡佩衡、汪慎生、王雪涛等名家举行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会”，[15]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吴晗、章伯钧、章乃器、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徐玉兰等名流带头撰文献艺，歌颂抗美援朝。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建国时的“三大运动”之一）。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一是鼓动反美、仇美。中共在各地组织了城市游行反美示威和集会。在政治高压和恐怖中，各行各业均开展了“控诉美帝罪

行“运动，鼓动民众“仇美”，鼓动学生投军。其中，文化、教育、宗教界、基督教、天主教所办的学校、医院、救济机关等团体被要求开展“控诉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的运动，要求声明割断与“美帝”的联系。例如，教育部长兼燕京大学校长马叙伦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致辞，宣布与三十多年来资助该校的美国断绝关系。中共控制报刊电台发起了诬陷美国侵略的宣传战，大量报导志愿军在朝鲜获胜和各地反美游行示威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一篇社论是抗美援朝宣传的典型。社论说：“通过宣传，克服人们对美帝国主义恨不起来的情况，真正建立仇美思想和仇美情感。要求通过运动激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的一个典型作法是让人们看地图，解释美国离朝鲜那么远，朝鲜又那么小，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气力去打呢？很显然的，就是因为朝鲜接连中国，占了朝鲜，就好打中国。”[16]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二是追查特务和谣言。中共出兵朝鲜后，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将中苏签订的《特别协议》密约公之于众，让世界各国看到了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控制中国及中共让国人充当炮灰的行径。虽有严格的传媒管制，但不少政协委员和高层知识分子从各种渠道了解了联合国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案，以及美国公布的中苏《特别协议》密约。大家与林彪一样清楚“美国侵略中国”宣传的虚假，还是有人私下对出兵朝鲜质疑。抗美援朝运动中，当局展开了追查“特务”、“谣言”行动，将所有质疑“抗美援朝”，谈论外界报导真相者以“特务谣言”、“亲美”或反革命罪名逮捕，甚至杀害。在镇反运动中每天杀人的情况下，质疑出兵朝鲜意味反革命罪名。恐怖之中，没有政协委员敢质问中共为何出兵决策不经政协讨论，没有人敢于指出与联合国军开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各界名流争相向中共献上“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支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爱国公约”，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艺歌颂抗美援朝的热潮。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三是歌颂联合国谴责的侵略者——志愿军。运动中，一篇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被广为宣传。该文结尾写道：“当你喝着香甜的豆浆准备上班的时候，当你把一粒糖果送进婴儿嘴里的时候，请你意识到是一种幸福吧，这样你才会知道，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该文在电台反复广播，成功推动了人民用爱国热情支持朝鲜战争的潮流。一时，各行各业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的热潮。小学生们写给志愿军的信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感动了无数人。运动中，中共组织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

有慰问团来朝鲜慰问，志愿军需要有胜利消息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需要英雄事迹向慰问团报告。于是，志愿军宣传部门编造出了一批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黄继光和邱少云故事。尽管英雄事迹编造不合情理，违反常识，但在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反运动中情节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没人敢于对英雄故事提出质疑。在编造英雄事迹方面，共产党宣传部的操作手法相同。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证实，许多“为了斯大林，冲啊！”的神话苏共宣传部门编造的。作为卫国战争老战士，他本人没有也从未听到过有人在战场上高喊什么口号。[17] 中共宣传部编造志愿军喊“为也胜利向我开炮”的手法与苏共宣传部一致。“祖国慰问团”带给志愿军慰问之外，往往带给志愿军更大的伤亡。例如，志愿军没有空中掩护，作战当然尽量选择在夜间。而慰问团一来，志愿军指挥部特别安排在白天发动攻击，以供慰问团代表们用望远镜观战（如五圣山上观战情节后被拍入电影），造成志愿军伤亡倍增。[18]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四是捐钱捐物。1951年1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动员国人捐钱捐物支持朝鲜战争。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跟随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国人捐献。为了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通知还对各项武器的

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 15 万元，一辆坦克 25 万元，一门大炮 9 万元。当时报刊广为宣传的“捐飞机、大炮”事迹包括：宋庆龄副主席出面号召各界为“天津妇女号”飞机集资，班禅额尔召僧众捐献“佛教号”飞机，河南豫剧演员常香玉率剧社六省演出半年筹集新币 15 万元捐了常香玉号歼击机等等。

宋庆龄、常香玉等人的高调捐款是中共推动抗美援朝运动运作的一部分，是满足当局政治、宣传需要的罕有案例。当时，国人普遍极为穷困，再怎么鼓动也捐不出多少钱。当时的国人不知道，抗美援朝捐钱捐物的主要部分来自工商业主，背后是工商业者的血泪。上海工商业主捐钱最多，“大康药房”业主王康年被枪毙事件最能说明工商业者捐献运动的来龙去脉。抗美援朝运动中，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让他“捐飞机、捐大炮”，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拒绝了干部的要求。于是，他成了对抗抗美援朝运动的反面典型。经当局动员员工揭发“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小业主王康年被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了。《解放日报》诬陷说：“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王康年被杀使上海的工商业者看清了利害。为了活命，大家纷纷加入了“捐飞机、大炮”活动，“捐款”折合飞机 4 0 4 架，受到了陈毅市长的表扬。[19] 到 1952 年 6 月，抗美援朝总会宣布，全国人民的捐款可购战斗机 3710 架，捐物 77 万多慰问袋，慰问品 126 万多件。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五是鼓励青年参军。“三大运动”中，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都以鼓动参军为重要目标。中共在国家长期遭受战火摧残，民生极为困苦的情况下穷兵黩武，不但将百万投降国军送上朝鲜战场，还要更多青年出国上前线。运动中，参军的青年中们被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往朝鲜。此外，数以十万计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被送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工、运输工和战地医院护工。参军的青年和民工们

在缺乏基本训练，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被派上前线，实际成了毛泽东不要空中掩护，不怕死人的炮灰。从朝鲜归来的老兵们回忆说，有的新兵连还没到前线就全部报销（死光）了。

停战谈判

1951年1月，联大通过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五点停火议案。金日成积极拥护停火议案，要求立即结束战争，恢复战前分界。然而，中苏两共以美国先撤军为条件拒绝停火。于是，联大再通过《谴责中国侵略朝鲜决议案》。5月底，联合国军发动反攻，将志愿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北。6月，金日成赴北京当面要求毛泽东停战和谈。在志愿军第五次战役惨败，部队开始投降的情势下，毛泽东不情愿地放弃武力打败美军计划，同意停战谈判。

7月10日，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上的开城来凤庄开始了停战谈判。共产党方面代表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将军(首席代表)、李相朝将军、张平山将军和中国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中共幕后的真正谈判负责人是秘密进入朝鲜的李克农、乔冠华。谈判双方在恢复战前态势方面没有分歧，但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共产党方面坚持战俘遣返派出国，联合国军方面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并强调其它问题或许可以再妥协，但在“自愿遣返战俘”问题上无退让余地。

联合国方面坚持“战俘自愿遣返”是出于对二战战俘处理的道义自责。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迎合斯大林，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战俘强制遣返要求。据此，盟军拒绝苏军战俘、纳粹关押的俄罗斯、克罗地亚、白俄逃亡者自由选择去向的要求，将他们移交苏联。这些战俘和流亡者回到共产世界后被大批枪决或送去劳改营。他们的悲惨遭遇被披露后，西方各国舆论和民意一致谴责盟军违反了道义原则。为免战俘强制遣返共产主义世界的悲剧重演，美国在谈判中坚持战俘自愿遣返，要以此来宣告：每一个与自由世界交战士兵都可以向自由世界寻求庇护。杜鲁门总统后来写道：“共产主义是不尊重人

类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我们不会同意将追求自由的人强迫送回到共产制度中去，也拒绝违背战俘的意愿将他们遣送的共产党统治地区去。” [20] 毛泽东与斯大林不愿看到任何战俘投奔自由世界。他们知道，一旦自愿遣返原则确立，会有更多的志愿军部队投降，因此坚持以战俘全部遣返派出国为停战条件。由于战俘去向的分歧，谈判陷入僵局。10月，联合国方面宣布停止谈判，直到共产党接受自愿遣返原则。于是，两大阵营为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各自的核心原则继续战争。不过，双方均不再发动大规模战事，只是在三八线两边布署大军相持。

细菌战诬陷

1949年，伴随解放军朝鲜族师调入朝鲜，出血热病（HEMORRHAGIC FEVER）在朝鲜开始流行。朝鲜战争爆发后，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出血热、天花等传染病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蔓延开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在北朝鲜喷滴滴涕防疫。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闻滴滴涕味称美军使用了“化学武器”。根据报告，毛泽东、斯大林决定利用传染病进行“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宣传战。1951年3月，中国代表在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上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此后，中、朝、苏三共联手在各自报纸、广播中宣传称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在中国，中共以宣传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散布瘟疫为手段，来煽动国人仇美情绪，来鼓动国人捐钱和报名参军。外交部长周恩来出任了宣传战主角，在国际上不断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发动细菌战。

回应共产阵营指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申明：“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细菌战”，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则指出：“共产主义阵营的指控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制止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传染病方面的无能。”1952年，共产阵营将“细菌宣传战”行动升级：中、朝两共分别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派团赴中国东北和北朝鲜调查的请求；中共自组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东北和朝鲜展开调查；共产阵营指定八国人士组成

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赴朝鲜调查；共产阵营的两调查团分别提出了调查报告；中共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宣布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声称东北部等地发现了带菌昆虫；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团体根据中共指示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配合细菌宣传战，毛泽东为当年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随后，中共在全国掀起了“除四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1953 年春，斯大林去世，新一届苏共领导层决定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及立即停止“细菌战指控”，在高层会上听取了北朝鲜总参谋长南日将军、苏联顾问索兹诺夫将军和北朝鲜人民军医药顾问斯里瓦诺夫将军等人关于美国并未投过细菌弹的证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会上确认细菌战是中共捏造出来的。会议在备忘录中承认：苏共、中共和朝共共同策划了指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诬陷。新领导层决定：将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驻朝首席军事顾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等人撤职查办；撤回苏联向联合国提交的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控；清洗有关美国细菌战指控的责任官员；修复被细菌战宣传损害的共产阵营形象。会后，苏共中央以部长会议主席团名义分别致信中共中央和朝共中央，声明苏共认为关于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控纯属捏造，苏联方面已经严厉的惩处了参与捏造细菌战的有关人员。接苏联大使当面递交苏共信函后，毛泽东将捏造细菌战责任推给志愿军总部称：“指控美国的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州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真实性的困难的，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21] 在朝共方面，中央书记朴成友向新任苏联大使指出，细菌战捏造是中共策划的，那些所谓细菌炸弹和里面的东西应是中共飞机投下来的，

里面并没有细菌。[22] 虽然苏、中、朝三共都在内部承认了细菌战指控系捏造，但为维护共产阵营形象，三共均不公开承认诬陷真相。

毛泽东是从来不认错的。苏联大使当面交信摆明让他承认捏造，他委过属下拒绝认错。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以继续开展卫生运动的办法让国人相信细菌战确实存在过，于 1955 年将“除四害”写入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3] 1957 年，朝鲜战争和诬陷细菌战活动已过去几年后，毛泽东不想将两年前写入的“除四害”内容删除，主导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决定继续在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由于老鼠、苍蝇和蚊子不好对付，难以捉到足够数量向上级交差，各地不约而同地将灭麻雀作为“除四害”的主要行动。从 1957 年底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各地均采取了对麻雀赶尽杀绝的办法，即全民参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驱赶麻雀，使所有麻雀无处栖息而累毙坠落。灭雀的灾难后果很快显现，各地林木虫灾迅速蔓延。以灭麻雀为主要内容的“除四害”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9 年初大饥荒降临才不了了之。1960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指示中说：“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变相宣布停止“除四害”，算是给细菌战诬陷划上了句号。作为细菌战诬陷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的全国灭雀运动给国家带来了长久的灾难，直接造成华北持续几十年虫害。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中共在官方文件和历史教科书中始终维护“美国进行细菌战”谎言，对毛泽东配合诬陷细菌战的题词进行处理，隐瞒题词中诬陷主题，只宣传“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顺便为毛泽东营造爱民形象。

朝鲜战争结束

1951 年，朝鲜战争双方都已同意结束战争。然而，因为毛泽东、斯大林坚持战俘强制遣返，不容战俘有投奔自由的通道，战争再持续了两年。1953 年春，斯大林去世，苏共新领导层决定放弃坚持战俘强制遣返的停战条件，立即结束朝鲜战争。5 月 11 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毛泽

东、周恩来面交了苏共中央决定结束朝鲜战争的信函，并要求毛泽东立即就苏共的决定表态。在苏共新领导层形同最后通牒的信件面前，毛泽东非常紧张，只能表态照办，指示中共停战谈判代表放弃战俘强制遣返派出国的要求，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

结束战争的障碍消除后，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代表于 6 月 8 日在板门店重启停战谈判，迅速达成了停战协议和保障战俘选择遣返国权利的战俘协议。双方达成的以恢复战前态势为主旨的停战协议体现西方阵营对共产阵营再次姑息，它既不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也还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韩国人民要求让北朝鲜为发动侵略战争付出代价，民众各界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高呼“打到北方去”。因应韩国民众的要求，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政府指示南韩代表退出谈判，宣布韩国军队决心继续战斗。杜鲁门总统派特使赴汉城，以提供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等条件说服李承晚接受了停战协议。7 月 27 日，中朝方代表团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议》。签署仪式仅十分钟，各位代表没有握手和任何讲话，签署协议即离去。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

按照共产阵营传统，中、朝两共在战争将战争死亡人数长期保密。战争中，全国解放军主力被轮番派到朝鲜战场，同时动员青年参军入朝参战，加上数十万担架队、运输队、铺路架桥队的民工，总人数有数百万。志愿军及民工伤亡极其巨大的原因，其一是没有空中掩护，军需跟不上，直接造成二十多万志愿军因穿着单薄在朝鲜的严冬被冻死；其二是毛泽东多次否决彭德怀停下休整的申请，强令志愿军继续作战，造成志愿军大批冻死。彭德怀及各级志愿军将领按照毛泽东的方式如法炮制，拒绝下级撤退的请求，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阵地、高地”、“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同样要求士兵赴死。国人所了解的朝鲜战争多是志愿军宣传部门加工出来的士气高昂、人人求战，不让上战场闹情绪的虚假故事。志愿军士兵私下流传的“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24] 才是军心的真实写照；巨大伤亡的原因之三

是中共将缺乏训练的新兵及全无训练的民工派上火线。新兵们根本搞不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往往一上阵就成批送命。中共对志愿军阵亡的统计不准确，对民工的死亡统计更是糊涂账，很多伤亡没有统计，无人知晓。志愿军第军军长张震曾在报告中承认：“在伤亡上，运输弹药人员与战斗伤亡为三比二”。[25] 此言透露出，战斗部队没有为运输弹药人员提供掩护，被派到朝鲜的农民运输工的牺牲比例高过志愿军部队。算上民工，朝鲜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死亡人数应有百万。在阵亡将士的统计和安葬方面，志愿军不像日军、美军那样精确记录阵亡将士资料，重视尸骨安葬。志愿军团级以下阵亡将士一律就地焚烧、掩埋，阵亡志愿军家属只获光荣烈属牌一枚，并无抚恤金发放。因此，志愿军中流传着“要想回故乡，拼命当团长”的说法。一个例外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葬于了朝鲜。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他要让金日成欠他人情。

朝鲜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长远而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中国在经历连年战争到处废墟，经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坚持出兵国外打侵略战争。这场侵略战争耗资巨大，中国在战争三年间投入朝鲜战争的物力、财力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一半，战费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使国内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全国农民挨饿，饿死人的事件大量发生。为应付超过百亿美元的战费及军火债，中共在战争期间以土改运动名义剥夺地主财产贴补军费、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从工商业者处勒索军费，编造美国侵略中国、美国投细菌弹、志愿军英雄故事等谎言欺骗国人，将到外国打侵略战争宣传为“保家卫国”，在国内将侵略军士兵宣传为“最可爱的人”，鼓动人民捐钱捐物资助侵略。第四次战役后，中国志愿军在军事上全无可能战胜联合国军及金日成要求停战的情况下继续战争，其原因只是因为毛泽东的好战。毛喜欢战争，他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继续欺骗国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作为朝鲜战争的策划者，中共当然是自己负担赴朝志愿军的一切军需。斯大林提供给金日成的武器装备是无偿的，而将苏联二战后积压的军火和剩余战争物资，包括部分美国提供给苏联的援助物资和武器，高价批发给中国。毛泽东为打朝鲜战争欠下苏联数十亿卢布的债务，需要长期以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偿还。为偿还战争债务，中共加紧搜刮农民，造成国内长期粮食紧缺，农民长期挨饿。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中共宣传亩产万斤的谎言，要求按高产量征收更多粮食运往苏联偿还朝鲜战争的借债，造成了1959至1961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国人数千万。从朝鲜战争结束至1960年代，中国政府超过一半的开支与朝鲜战争相关，不是战争费用就是偿还苏联军用物资债，到1965年才只还了朝鲜战争债务的六成。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共提供的原油等物资维持着金氏王朝的存续。毛泽东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共继续扶植朝共，在向本国人民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长期向朝共政权提供每年数以十亿美元计赠款，两共间高层互访统统围绕增款数额的讨价还价。中共向朝共的长期赠款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无尽灾难。依赖中共援助的金氏政权长期从事贩卖毒品、军火，印制假钞等活动，通过设在平壤近郊的“二月银光贸易会社”每年印制面值千余万美元的伪钞，通过其在海外领事馆及经贸分支机构洗钱，将其制造的冰毒、鸦片、人民币假钞、假冒伟哥等等通过吉林省输入中国。[26] 为维护最后共党的形象，中共不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三十年前，中朝边境的延吉只有几十位吸毒者，如今数以万计。朝鲜咸镜南道的首府咸兴是冰毒主要生产地。当地1克冰毒约值15美元，比中国便宜得多，因此官民都争相把毒品运到吉林省、辽宁省等地散货。吉林省虽展开扫毒行动，但官员都不敢公开承认毒品来源于朝鲜。[27] 朝鲜还在中朝边境设立了面向中国人的赌场。与延边圈河口相邻的朝鲜罗仙市的某涉外酒店内有严禁朝鲜人进入的大型赌场，客人全部是中国人。每年，数以亿计的中国资金通过这个赌场流出境外。[28]

朝鲜战争也给朝鲜人民带来长久的灾难。朝鲜战争结束后，北朝鲜人民陷入贫穷饥饿。北朝鲜人口为南韩人口的一半，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不到

南韩的十分之一。朝共与中共一样，为要核弹不管人民死活，人为造成大饥荒。1990年代，朝鲜饿死了至少 350 万人，即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29] 还发生了人肉事件。[30] 与人民水深火热相对照，金日成在饥荒中抓壮男输血，为自己建立了专门的延寿研究机构，要求寻找灵丹妙药使自己活到一百二十岁，延寿机构奉命分析了两千种药籍中记载的功效药草，进行了长生不老药的种植试验；[31] 金正日的私人厨师在饥荒中为搜寻珍稀菜肴跑遍全世界，曾到丹麦购买猪肉，到伊朗购买鲨鱼子，到日本购买海鲜类，到东南亚购买热带水果，[32] 曾随行金正日的俄罗斯远东全权待时普利科夫斯基披露，金正日访俄期间的三餐材料从朝鲜空运而来，饮食垃圾则密封后运回朝鲜。[33] 为逃避暴政与饥荒，成千上万的北朝鲜民众，包括朝鲜劳动党高层，纷纷冒死外逃。例如，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书记，“主体思想”创意者黄长烨趁利用之机逃入韩国驻北京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在朝鲜半岛另一端，韩国在战后短短半个世纪里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各界民众每年的 6 月 25 日都举行韩战爆发纪念活动，呼吁民众勿忘韩战给朝鲜半岛带来的民族伤痛。2011 年 6 月 25 日，韩国政要与各界四千多人在首尔市龙山战争纪念馆纪念“韩战”爆发六十一周年，呼吁还原韩战历史真相，勿忘韩战带来的历史悲剧。韩国总统李明博呼吁不要忘记 6•25 战争，不要让悲剧重演。韩战老兵尹声远和他的老战友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韩战期间如果没有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六十年前的韩半岛就已经统一。说到底，是中共造成了三八线两边南北分割的悲剧，造成了这一悲剧延续至今，造成北韩民众的长期苦难。”韩战老兵安在喆指出：“中共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纯粹是谎言。当时美国军根本没有进军中国领土，而且根本没有那个意图。如果没有中共的所谓抗美援朝，韩半岛早已统一，就不会有南北韩分离的痛苦。中共不支持北韩的话，北韩独裁政权不会存在，现在北韩的核武器开发、制造天安舰事件等等都是中共支持的结果。”正如安在喆所言，除了粮食及物资外，北韩的核子和导弹技术、原料，也都大多来自中共，中

共是朝鲜核爆的总后台。[29] 自由世界在停战谈判中对共产世界姑息的恶果超乎人们的想象。在朝鲜战争六十年后的今天，朝共在中共的支持下对世界的核讹诈没完没了。

对美国而言，朝鲜战争宣告了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破产。美国民主党政府长期亲共，醉心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民主的言论，处心积虑抛弃国民党，拥抱共产党。二战胜利后，杜鲁门政府知道苏联武装训练了超过防御需要的北朝鲜军队，知道苏军为北朝鲜军队留下了无数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知道金日成准备对南方动武，甚至知道毛泽东在中国东北集结重兵军队的态势。面对共产阵营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之势，杜鲁门政府将全部驻韩美军撤离，不出手支持韩国政府和军队，不断发表将台湾与朝鲜排除出美国的防御圈之外的政策声明，结果诱发了朝鲜战争。假如美国真想避免朝鲜半岛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假如美国支持南韩军队以保持朝鲜南北军事力量均衡，再退一步，即使美国不出手扶持南韩军队，假如美国发表的不是将朝鲜排除出防御圈外的声明，而是不容南韩被吞并的声明，斯大林断不会冒与美国冲突的风险发动朝鲜战争。事实上，美国民主党政府是真的打算听任朝鲜半岛和台湾被纳入共产阵营的。美国背弃其声明而卷入朝鲜半岛战争不是因为民主党政府拒绝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杜鲁门在共和党人调查民主党人通共党的压力下不得已的政策转变。在共和党人的压力下，长期亲共的民主党政府才出尔反尔，出兵开打。出兵朝鲜后，民主党政府在真打假打之间犹豫不决，进退失据，对任何军事行动都战战兢兢，生怕激怒共产党阵营，为前方主帅设下重重限制，结果使战争规模扩大，时间拖长，想拆除战争机器倒要重建战争机器，想送美国青年回家倒送他们上了远东战场，想削减军费倒耗费了约 670 亿美元巨额军费，想抛弃台湾又不情愿地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定防御协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美国在二战后以十分之一于朝鲜战费的金钱援助国民党政府也能避免中国和朝鲜赤化，也能避免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战。如今，在朝鲜公然声言随时使用核武器之时，美国政府应当承认其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亲共政策带来无穷后患。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评价朝鲜战争说：“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从卫星上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片，三八军事分界线以北，漆黑一片，只有平壤有些萤豆之光。而在南边，韩国灯火通明，那是繁荣与自由的灯塔，33000 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为捍卫这座灯塔而献出了生命。”如今，中共仍然重复着“美国悍然派兵侵略朝鲜，欲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谎言，仍然隐瞒志愿军被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决议谴责为侵略军，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执行联合国决议在朝鲜半岛维和的真相，仍然拒绝对发动侵略战争谢，中共的文艺节目仍在歌颂出兵入朝的侵略战争。并且，中国民间也在为当年的侵略辩解，当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作秀的名流们无人忏悔。

战俘自愿遣返

停战谈判因共产主义阵营拒绝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原则而破裂后，联合国军开始按该原则行事，将十一万共方战俘移交给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遣会），负责临时看管战俘。共产主义阵营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原则后，中立国代表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宣布，交战各国代表均可派人向战俘解释停战协议赋予他们的选择去向的权利，让战俘们在九十天内自己作出去向选择。联合国方面不对战俘做说服工作，完全尊重战俘的意愿。中共则组成了李克农、乔冠华为正副总指挥的解释团，千方百计说服志愿军战俘回国，承诺一切既往不咎。为向战俘营传递指示，保持对战俘的控制，中方早已通过火线假投降将代表派入了战俘营。[35]

九十天后，两万多志愿军战俘中的 14000 人选择了去台湾，7110 人选择了回大陆。选择赴台者中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即所谓解放战士。毛泽东将内战中收编的、整体投降原国民党部队派到朝鲜有借战争处理之意。“解放战士”们自知不获信任，坚决要求去台湾。其他选择去台者的考虑是担心归国后受整肃。他们担心的情况有先例为证。金门战役的九百多归俘回到大陆后被强制隔离集训，接受政治审查，被要求反省、坦白、人人过关、互相揭发，结果几乎人人都有了罪名，轻者被开除军籍、党籍，重者被以叛徒、

历史反革命等罪名判处徒刑，其中二五三团三营营长李子元等人被以投敌罪处决。志愿军战俘们虽不知道金门归俘遭遇，但大多预感到回国后被整肃的命运。不想回国的战俘们曾在战俘营采取集体行动表达“宁死也不接受强制遣返”的诉求。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相似，大部分朝鲜人民军战俘选择了留在南韩。[36]

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归国后被送到昌图县金家镇，在那里受到热情招待，首长接见，女学生献花，被告之休息一段时间后分配工作。随后，他们的 6000 余人，如同金门归俘一样，被圈禁接受“整训”和政治审查。经过长达一年整训和政审，归俘们被迫“交待问题”，给自己扣帽子，承认贪生怕死、失节、失密、为敌服务、暴露姓名、暴露部队番号等罪名，甚至被迫承认自己有叛变罪行，然后被开除军籍、党籍，团籍，档案里塞进了“内部控制”的政治判决书。此后，他们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下场悲惨，一些人因上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集团”，一些人成了劳改犯，还有人不堪迫害而自杀。[37] 歌颂“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风行全国时，英雄王成的原型，归俘蒋庆泉在遭受着“内控”和整肃迫害。接受“整训”的归俘们不是遭遇最惨的。归国的 7110 位战俘中，除参加“整训”的 6000 人外有 1000 多人去向不明。[38] 有文章披露，他们像当年苏军的战俘一样，被“特别处置”了。[39] 如果真是这样，则“处理名单”应是“解释团”在九十天说服时根据战俘们的思想倾向制定的。[40]

1954 年 1 月 23 日，14000 多位选择投奔自由的志愿军战俘着国民党军装由仁川搭美舰驶向基隆，标志“战俘依照志愿遣返”原则在全世界确立。台湾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舰迎接，并将这一天定为“自由日”。

志愿军撤出朝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志愿军驻军朝鲜拒不撤军，设立军事禁区，利用军事力量介入朝共的内部权力斗争，支持朝共中的“延安派”密谋推翻金日成。

金日成向苏共状告中共策动政变，苏共出面干预，迫中共从朝鲜撤军。毛泽东无力抗拒，只得同意。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赴朝，与金日成签署了《志愿军撤军回国的联合声明》，中共不情愿地结束了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朝鲜驻军。毛泽东要控制朝共源于他与斯大林的约定。他以承诺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同意由他领导亚洲共产党。赫鲁晓夫不承认毛泽东对亚洲共产党的领导权，支持金日成挫败中共控制朝共的计划，让毛泽东忍无可忍。这成为毛几年后与苏共决裂的原因之一。

志愿军撤离后，金日成对“延安派”展开大清洗，镇压了数千人，朝共“延安派”余党纷纷逃往中国。伴随清洗，朝共拆除志愿军会馆，纪念馆，改掉志愿军命名的地名，在出版物将中共志愿军改称为“图谋占领朝鲜的侵略者”，称志愿军撤离朝鲜是“被朝鲜人民赶回国的”。同时，朝鲜还开展了清除朝文中汉字的运动。如今，板门店停战签字会场陈列室中没有一张中国志愿军的图片。

第 39 章 镇反运动

内战中，中共在解放区展开杀地主、剥夺财产的土改运动，引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组织还乡团武装报复，中共再以军队对还乡团展开所谓剿匪战。建国后，中共将暴力土改和剿匪战推向全国。1950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镇压反革命”（镇反）的指示，要求掀起杀反革命的高潮。各地中共大员不认为存在严重威胁，没有立即展开屠杀。毛泽东不满，在下令出兵朝鲜的同时主持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双十指示，双十决定），在其中称：“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他要求“纠正过于宽大的倾向”，“当杀者即判处死刑”。两次指示后，各地大员开始了名为镇压反革命的屠杀。个别大员，如华东负责人饶漱石，顾虑商业环境还是没有展开镇反屠杀，被毛泽东点名指为是“对反革命宽大无边”典型（这成为他几年后被清洗的原因之一）。

1951年1月，中南局向中共中央报上了驻湘西27军的镇压反革命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1] 同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公安部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对报告批示：“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

波动。”毛泽东见报告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西北局向中央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 5,000 多人，杀了 500 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阅此报告后批示：“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2月中旬，毛泽东致电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大员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不止两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两万余人仅杀两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 1951 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 3000 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 1500 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 2 月 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 72 人，拟再杀 1500 人，这个数目太少”；“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2]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恶霸必须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3]

同月，毛泽东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其中下达了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的镇压反革命指标。这里，毛泽东所言的镇压不是逮捕判刑，而是处决。条例中列举的十二类反

革命包括：勾结帝国主义者，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者，聚众叛乱者、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者，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抢劫、破坏公私财物者，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伪造公文证件者，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等。毛泽东在条例中将反革命罪规定的尽量宽泛，不区分已遂、未遂，将“勾结”、“包庇”、“挑拨”、“传播谣言”、“煽动”、“策动、勾引”等无从界定的随意性罪名都作为镇压的依据。与《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挑拨”、“煽动”、“对抗”等随意罪名一样，毛泽东指示中的“恶霸”、“民愤”也是随意罪名。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各地大员开始突击逮捕、杀人。在北京，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指挥，在 2 月 17 日逮捕 675 人，第二天枪决了 58 人。毛泽东对罗在北京的做法立即表示赞赏。毛的赞赏让其它地方大员感到压力。3 月 7 日，罗再指挥逮捕 1,050 人，在 3 月 25 日枪决了 199 人。同月，天津市委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处决了 150 人，拟再处决 1,500 人。毛泽东再批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京津行动后，华东大员饶漱石为没有展开屠杀作了检讨。市长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 1068 人，处死 100 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 10000 人，杀 3000，关 4000，管 3000”。毛泽东复电：“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 [4] 4 月 1 日，中共上海当局发布了《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和《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规定：“反动党、团（国民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三青团等党派）的干部，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人员，南京政府所属各组织的成员均须

于在规定期限内亲赴公安局设立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总处’办理登记，对有隐瞒，抗拒登记者将予以严惩”。基层负责人不知道高层意图，大力宣传“只要登记、坦白，决不追究”。前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们信以为真，纷纷登记，并说明当年是为了抗日才加入这些党团组织的。然而，当局随后展开了对登记者的捕杀行动，于4月27日逮捕8,359人，于4月30日处决285人，于5月9日再处决28人，于6月15日再处决了284人。上海当局以反革命罪名大规模捕杀有旧政府背景和经历者，对新政权和解放后的经济危机有过牢骚话者，被揭发藏匿武器、散布谣言者，相信当局“不追究”承诺向政府登记参加过与国民党有关的组织者，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下达的指标。

被毛泽东不断点名批评后才展开行动的上海捕杀规模如此，其它城市的捕杀更为惨烈。几个月间，各大城市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数百。召开公审大会后立即处决数百人。由于毛泽东一再批评“宽大无边”，各地领导人以多杀来表现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对基层报上来的杀人名单一律照准。各地领导人知道，他们头上的乌纱由毛泽东一句话决定，纷纷主动提高杀人比例。例如，贵州当局将毛泽东下达的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提高到了千分之三，广西柳州专区提高到了千分之五。一时，报纸上“坚决镇压反革命”，“某某反革命分子伏法”的报导铺天盖地。报纸报导的只是部分城市镇反的情况，多数城市及农村枪毙“反革命”不登报、不公告，处决人数是糊涂账，很多乡村报送到上级的材料只有人名，没有关于罪行的详细材料。因为基层上报只是为了完成杀人任务指标。在安徽，桐城县当局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了报告。然而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即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没有一个人有血债。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还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以“给劳动人民丢了脸”的罪名一起枪毙以凑数。

为推动镇反升温，毛泽东否决了西北局提出的“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的意见，指示将杀人批准权下放到专署一级。[5] 各地大员知道毛泽东的意思是进一步下放，纷纷将批准杀人权下放到了县、乡级，部分地方下放给了工作组。镇反运动的判决过程通常与农运中的农民协会杀人一样简单，召开公审大会，台上挂出“人民法庭”横幅，运动主持者将认定的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押上台，有积极分子领喊口号，群众跟随，算是完成了审判，然后就拉人去枪毙。运动中，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法场。为增加震慑力，枪毙都让老百姓围观。死难者家属通常为免灾难扩大不敢去收尸。

中共在湘西的所谓剿匪最能说明屠杀之惨烈。1949年10月，为争取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投诚，解放军湘西军区（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和平军官训练班”，组织国民党投诚党政军人员学习，实施“教育改造”，请陈渠珍来参观训练班。陈眼见训练班不设警戒，允许学员周六回家团聚，学员们贴出学习墙报，写学习心得的情况，决定也向中共投诚。[6] 1950年3月，毛泽东的“镇压反革命”指示下达到了湘西，四十七军向上级报说：“已经镇压了反革命 4688 人，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经过几个月的镇反捕杀，四十七军在年底报告中提出准备缩减杀人规模说：“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并已告各部队和地方，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7] 然而，毛泽东阅中南局转来第四十七军的镇反报告后，将湘西杀人数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比较，指责指责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三千人杀得太少，将四十七军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在批示中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11] 各地接到指示，以四十七军为护栏，将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的屠杀再升级。四十七军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变缩减为扩大。在沅陵的屠

杀行动中，四十七军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处决汪援华、潘壮飞、周振寰的大会。汪援华，永顺县人，历任国军团长、副旅长、副师长，在 1937 年上海淞沪保卫战中率领特务营在浏行地区激战五天五夜，被《中央日报》以《浏行喋血记》为题报道了英勇事迹，1949 年率部向中共投诚，并动员其所部暂四师暂五师、国民政府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诚。潘壮飞，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团长、副师长等职，抗战中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 年率部向中共投诚。这次公审大会上处决的三人都是投诚人员，并都曾获得解放军“保证生命安全”的承诺。[8] 四十七军将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在押的三万多所谓匪特、反革命分子杀了两万多，将几个月前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写学习心得的国民党党政军投诚人员基本杀光，按照送投诚的国民党军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中共内部既定的处置办法，将余下的数千投诚国民党军送去了朝鲜。[9]

镇反之后，中共湘西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继续屠杀地主，被杀害者数以万计。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提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10] 中共内部的说法证明，所谓剿匪实际是屠杀抵制暴力土改，暴力征粮的农民。建国三年后，中共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新中国长期宣传的湘西剿匪实际是在 350 万人口的湘西地区屠杀了数万旧政府时期的党政军人员和反对暴政的农民。1979 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湖南当局重新审查后宣布，被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成员基本都是冤案，为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害的四万多人平反。

从湘西看全国，镇反运动中受害最深的是两百万国军抗日将士和一百万国民政府基层人员。中共在镇反运动杀害的 242 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曾经的抗日将领。他们中包括：何海清上将、宋鹤庚上将、夏之时上将、邓玉麟上将、糜藕池中将、谢崇阶中将、彭旷高中将、崔世昌中将、倪弼中将、曹

勳中将、赵世玲中将、周址中将、林伯民中将、田西原中将、李强中将、马守援中将、刘晴初中将、潘峰名中将、宋士台中将、金亦吾中将、武庭麟中将、欧阳珍中将、陈光中中将、陈宏谟中将、陈春霖中将、罗贤达中将、戴炳南、周磐中将、黄镇中中将、徐经济中将、夏炯中将、胡栋成中将、柏辉章中将、钟祖培中将、高倬之中将、黄祖坝中将、黄质胜中将、宋天才中将、李本一中将、李继龙中将、李楚瀛中将、杨屋中将、杨永清中将、何大熙中将、张卓中将、杨清海中将、张乃葳中将、张占魁中将、张国勋中将、余安民中将、张经武中将、陆荫楫中将、习自强中将、王春晖中将、王继祥、邓子超中将、甘芳中将、石毓灵中将、田载龙中将、包善一中将、汤毅生、刘进中将、刘召东中将、刘孟廉中将、刘邦俊中将、刘秉哲中将、刘培绪中将、危宿钟中将、阮齐中将、颜仁毅中将、廖卓如中将、廖士翘中将、廖泽中将、喻英奇中将（南京保卫战中负伤，用蒋介石颁发的一万银元慰问金创办了“保靖英奇小学”，请于佑任题写校名）、粟廷勋中将、韩起功中将、韩步洲中将、蒋在珍中将、段树华中将、梁顺德中将、陈应龙中将、裴元俊少将、谢灵石少将、鲁坚少将、褚怀里少将、蔡洪范少将、谢东山少将、蒋作均少将、韩子佩少将、韩进禄少将、蒙自仁少将、路可贞少将、廖开孝少将、廖剑父少将、谭化民少将、谭呈祥少将、潘琦少将、樊明渊少将、赵俊图少将.....百万国军将士有幸挺过了艰难抗战，看到了抗战胜利，却不幸成为中共屠刀下的冤魂。六十多年后，中共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找了一些老兵参加典礼，颁发奖章，为自己营造抗战领导者形象。然而被掩盖的事实是，真正抗日国军早已在建国之初被大规模屠杀，中共对此三缄其口，全无谢罪，更谈不上赔偿。

百万国民政府人员中，除少数在海外有影响的国民政府省主席、厅长以上的高官为“统战”目的不杀外，其余都成了镇压对象。发动“渡江战役”前，毛泽东、朱德曾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在其中承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除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

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速捕，不加侮辱、散兵游勇投诚报到者概不追究”。准备逃走的旧政府、旧军队相关者及富人们相信了安民告示，留下来归顺新政权。他们没想到，中共建国不仅不循历代开国大赦天下之例，相反将国民党政权基层官员及雇员中的大多数以“反动军人”、“特务份子”、“反动党团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关押或枪毙，将乡长、保长、甲长、村长等旧基层人员几乎斩尽杀绝。例如，国民政府贵州的 81 位县长全部被中共杀害。旧政府基层官员中的幸存者多数没有躲过随后的肃反等运动的打击。到文革时，与旧政府相关的人员基本消灭干净。害命之外还要谋财，中共中央在镇反运动中发出了《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要求没收被镇压、关押者的财产。

大规模的镇反屠杀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充斥关于要求放手杀人的指示，充斥“应当放手杀几批”、[12]“已杀七百，拟再杀七左右”、“应坚决杀掉”、[13]“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14] 等血腥字眼。与镇反运动同时的土改运动也是毛泽东一手推动，也是杀人如麻。如果加上同期镇压旧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抗争农民的“剿匪战”，中共建国后几年的血腥超乎时人和后人的想象，是古今中外政权更迭中最血腥的记录。血腥屠杀之外还有更大的迫害数字。两百万被杀害、关押的旧军政人员之外，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株连，受到长期迫害。四十年前，袁世凯在政权更迭时申明“饮水思源”，“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优容前清耆旧”，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创造了政权更迭最少流血的记录。民国后，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通常是旧军政首领通电下野出洋为止，大多数低层职员照样效力新政府。了解了中共建国后的血雨腥风，人们才感到袁世凯政治家风范之伟大，才感到清末、民国时代的宽容。

1952 年底，中共宣布镇反运动结束。由于镇反运动后期毛泽东重施延安整风后期批评“运动过火”的故伎，指责地方官员滥杀，各地官员跟随毛泽东转向，从多报杀人数邀功转为少报杀人数免责，镇反运动的死难人数被大幅隐瞒。关于镇反运动中的死难人数，蒋介石的一篇谈话可作参考。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要在一夕之间，把一个重人道和以忠厚宽大做传统的民族，变成一架战斗争杀的机器。我在下面只将共党自己公布的两套数字给你。第一套数字是根据各地共党军政委员会在 1951 年 10 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权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与 1950 年 10 月日之间所清算的‘反革命份子’为数达 119 万人；第二套数字，系从北平的《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等四种共党机关报纸所发表的新闻中统计得来，在 1951 年 2 月与 1952 年 2 月之间，它们所发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为 383 万人。这与第一套数字合计，共党自己承认的人数，已在 500 万以上。但此种计算，自然并不完全，因为就第一套数字而论，我政府还不曾获得共党华北区、东北区和西北边远区军政委员所发表的报告。就第二套数字而论，报上所载的数字，也不过是一部份。1952 年 1 月以后，共党反复不断举行大规模之清算，一定比上述数字要超出很多倍。”[15] 陈诚抨击中共以人民和革命名义屠杀的逻辑写道：“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16]

中共对旧政权人员的屠杀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祸害，苏俄就是这么作的。俄国革命前，沙皇流放煽动罢工的列宁时堪称优待，没有集中营和监狱，仅是流放到指定地区，列宁在流放地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作任何工作，有家属陪同。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将已经退位的沙皇罗曼诺夫皇族及亲王四

人斩尽杀绝。杀皇族仅是苏俄红色恐怖的开始。列宁要求“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在调查时无需寻找证据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17] 声称“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入的。”[18] 他下令所有农民必须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将抗拒交粮者就地枪决。时任苏共司法委员埃萨克·斯坦因倍格披露，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以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德国奸细等罪名“就地正法”。斯坦因倍格反对恐怖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回答：“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19] 列宁要求杀人的指示，命令不胜枚举。例如，“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一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把他们的全部谷物，统统没收过来；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质——照昨天的电令办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20] 建立红色政权后的几年中，苏俄成立了数百肃反委员会（契卡）和一千多个革命法庭，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百万人。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晚年回忆：“契卡和克格勃人员曾在签署枪毙名单时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无数死刑判决书上仅写了俄文枪毙一词（расстрел）的第一个字母P。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枪决了3000人。”[21] 屠杀之外，苏共没收被杀害者的财产，其中的部分金钱被用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了解了苏共建国后的所作所为就会清楚，中共的镇反照搬自苏俄。对比苏俄的肃反条例、苏共为中共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毛泽东建国后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会发现，三

者一脉相承。对比列宁的“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字眼，毛泽东的镇反指示又是一脉相承。民国时的张作霖，对苏决裂后的国民党政府谴责赤祸没有错，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完全是苏共镇反的再现。

镇反运动中，中共发展出了两套迫害人的制度。其一是管制制度，中共将幸存的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和旧政府雇佣杂役，国民党员，与国民党人有关系者，有直系亲属在镇反中被杀或外逃者，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者，曾经脱离共产党者，曾为国民党报纸撰文者等等数百万人列为“有历史问题者”、“内部监管对象”，对他们实施长期监控，要求他们经常向公安等“管制部门”“报到”，逢年过节和政治运动期间要接受当局训话，走亲访友，参加聚会要向当局申请批准。其二是苏俄引入的政治档案制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共要求干部写自传，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以这些材料作为整人手段。整风运动后，每个干部都有了自已看不见的政治档案。经过镇反运动，中共将政治档案制度由党内推向全社会，给每个人建立了一份本人看不到，无法申辩、澄清的政治档案，将全体人民都纳入了中共政治审查和监视体系。在随后没完没了的整肃运动中，人们的政治档案被塞进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包括党团组织的鉴定，被要求填写的各种表格，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别人写的揭发材料等等，甚至包括了日记、信件，男女私情等隐私材料。在确立党国体制后，中共营造了百姓没有政治档案就无法生存的环境。很多人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才知道自己蒙受了长期的冤屈是因为政治档案中被塞进了诬陷和陷害的材料，还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政治陷害。

第 40 章 土改运动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战后期，中共为贴补迅速扩张的军费抛弃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诺，在控制区内恢复了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不过不沿用苏俄输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称土地改革。经过抗战时期长期的减租减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被剥夺干净，农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状况。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偿还苏联军火债和应付军费开支，在解放区全面开展暴力土改运动，没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将划定地主的标准一再降低。中共解释农民贫困的原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事实并非如此。民国以来，中国农民贫穷的首要原因是兵祸。革命带来军队暴增，使农民遭受越来越多兵匪搜刮和战乱祸害。例如，红军靠“打土豪”维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后将稍有钱财者一律剥夺。各路军队的军饷、政府的开支以各种名义最终均由地主承担。费孝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以 1948 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十三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十三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 85 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 400 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的地主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田几十亩的自耕农。”

建国前夕，中国国民党领袖董时进博士上书毛泽东，请求共产党停止土改运动。他在意见书指出：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讲话提出的不到乡村人口 10%的地主富农占有 70%至 80%土地的结论依据不正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 16 省 175 万户农户中调查的结果显示，36%的农户拥有

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结论与本人在四川，江西农村的考察结果大致相同。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例如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数土地拥有者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土改后，分到土地者的高涨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应当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同时提倡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

中共要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农民和粮食，获取资源，当然不会接受董博士的建议。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已在解放区开展了几年的土改运动推向全国。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

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它财产”。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称土改的对象是共产党到来前三年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乡绅。人们按常识理解，既然是改革，应该是作价转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代表们针对中共解放区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须颁布一纸法令就能够达到均贫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阶级斗争。毛泽东拒绝了政协代表的呼吁，要求将在全国展开暴力剥夺地主的土改运动。

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没有说拥有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运动中，中共对地主不仅没收土地，剥夺金银、耕畜、家具、粮食及房屋，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殴打和屠杀地主。在土改还算温和的江苏，斗争地主的大会已经极为残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的土改运动中组织了 1, 352 次斗争会，每会批斗五、六个地主，该县 1, 751 户在乡地主平均每户经过三、四次斗争会。[2] 土改斗争大会的会场基本是酷刑折磨场。现场对地主实施的刑罚包括：捆绑、逼跪、殴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头上压石头、剥光衣服、逼爬、逼学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烧阴毛等等。[3] 在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的土改中，中农赵仲生母子被绑起来吊了一夜。[4] 中共江阴县委在总结中承认，土改斗争会上殴打，逼跪，剥衣服、浇冷水、吊打的情况普遍存在。[5]

与镇反运动的情况一样，毛泽东要求土改不得温和，而要“狂风暴雨”，要求杀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杀地主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层区一级，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杀人名单，区长或区委书记根据各乡土改工作组上报材料批准杀人。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像。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一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

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遍，真叫惨不忍睹。”[6]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一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一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调查十二县市，采访四百位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学者谭松介绍川东土改情况说：“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鼎罐就被划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土改中工作队为逼地主交出浮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篋’（强迫背炭火铁皮桶）、‘抱火柱头’（强迫抱烧红铁管）、‘吊木脑壳’（捆头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裤子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积极分子、民兵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

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果。” [7]

在广东，华南大员叶剑英、方方根据侨乡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学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宁慢勿乱”，制定了较为温和的《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土改不激烈斗争，剥夺地主但给活路。毛泽东对叶、方的温和土改政策不满，称“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称广东、广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犯了土改右倾错误”，调曾在东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铸、赵紫阳主持中南局。毛欣赏陶在广西“剿匪战”中血腥屠杀，欣赏被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赞为“宝贝”、“土改专家”的赵紫阳在东北和晋察冀的暴力土改经验。陶、赵清楚毛泽东嫌叶剑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够暴力，到任后立即提出“对地主要狠”。广东本地干部抵制南下大员带来的血腥土改经验，于是陶、赵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广东土改落后原因在于干部不纯，建议整肃广东本地干部。毛泽东批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将代表广东本地干部的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发动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以“地方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案”罪名整肃了数以万计的广东本地干部，整肃的手段包括关押，用刑，杀害，例如将中山县有数十位反对血腥土改的干部和广东全省约 5%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将更多的土改工作队员清洗。 [8]

“反地方主义”的同时，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广东的土改运动“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一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一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例如在粤西地区，仅在 1953 年初就有 1165 人在土改中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一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9]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

1952 年，中共将土改划定地主的标准降低，从中农中再划出第二批地主，对他们再展开斗争和屠杀，并对不愿要地主的财产，不愿参加斗地主的老实农民以对抗土改的罪名展开同样的残酷的迫害。这种降低标准再划一批地主的作法再现了当年红军降低标准再打出一批土豪最后将稍微有点钱财者都打光的作法。到 1953 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以及 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的罪恶隐瞒。

土改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标志。苏共在建立共产政权后立即发动了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共在苏维埃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这种杀人抢劫运动，国共战争期间将此运动推行整个解放区，在建国后再推行全国。苏共的消灭富农运动，苏共发动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都是共产革命打消灭剥削旗号，召集地痞流氓抢劫杀害正经农民，以抢劫的民财充军费的运动。在推翻国民政府战

争中，中共通过土改运动控制了解放区的农村和农民，将内战的巨额军费分散给解放区的几亿农民负担，调动数百万农民为战争提供资源和服务。建国后，毛泽东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战的朝鲜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国的农村和农民。因此，他称土改运动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在土改运动这样的史上最大规模杀人抢劫中，没有农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几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中共最早在东北推行暴力土改，导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组织还乡团报复，解放军再以剿匪名义镇压反抗者和还乡团，因此中共的所谓剿匪战也最早在东北展开。随后，中共的暴力土改扩大到华北，所谓剿匪战也扩大到了华北。从 1946 年东北“暴风骤雨”土改到 1955 年的农业合作化的十年间，中共在各地大规模的剿匪战没有停过，有 260 万反抗武装被中共正规军武力镇压。[10] 这些被镇压的所谓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武装。中共在历史教科书中赞扬历代的农民暴动，却以剿匪战的说法掩盖了建国前后十年间反抗土改暴行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这段历史有待重新书写。

土改运动带来的一大灾难是消灭了乡绅阶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1] 他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维持善良的必要条件，一无所有的游民必然作恶。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抱有“有地才稳”的观念，认为有产业，才有责任心。所以不论在城、在乡、为官、为商、为民都会以余钱置田产。千百年来，中国政府规模很小，县级官员很少，小县衙数人而已，县衙之下无官府，广大乡村由乡绅领导。乡绅，即地主，担负着乡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举办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乡村文化活动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乐善好施，怜贫恤老，肩负着乡村中的社会救济责任。例如，1842 年无锡连降大雪，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

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士绅每日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一碗；光绪年间，陕西乡绅严作霖等倾力赈灾，为地方志赞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发出募灾公启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一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12] 上述善举代表着乡绅群体的积善传统。

乡绅地主多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田秀才”，种田的“好把式”。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有动力、有知识去提高生产水平，改进农业技术，培育良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是当地最高水平，他们的先进耕作方法为农民起着示范作用，代表着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古诗中的春社就是乡绅领导乡村的写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村民大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地主召集，每个农户的当家人出席，商讨本年度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生产大事。乡绅是乡土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科举废止后，各地的新学堂几乎全部是士绅捐资创办。乡绅们是理所当然的乡村领袖，是民国时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乡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来领导中国乡村的“好人”阶层被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暴力消灭，农村从此失去了有责任心，有救济责任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

土改运动带来的另一大灾难是痞子无赖成了乡村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者。他们缺乏同情心，没有道德底线，易于被煽动起仇恨，什么坏事都敢作，他们大多文盲，能力素质低下，没有责任感，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后不去耕种，而是转卖给别人立即挥霍。这些人掌权后将人性中的恶充分发挥。几年后，他们成了

全国农村造假，吹牛，“放卫高产星”的带头人，成了大饥荒中的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的基层打手。他们没有领导乡村生产的正经本事，却能创造出骇人听闻、下流至极的迫害招数。

土改运动带来的第三大灾难是划分阶级成分。中国自古有地主，但没有地主阶级说，有富裕农民，但没有富农阶级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甚至富农概念与土地革命，苏维埃说法一样，由苏俄在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引入中国的邪说。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推出富农说的用意是，在够不上小地主的农民中再划一批人称为富农，以便多剥夺一批民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0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称：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从字面上看，中共的这一决定好像是对农民经济状况的一种评估。而实际上，中共将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划定为罪犯，不但要财，还要命，对不杀者也要作为长期的打击、整肃对象。土改运动中，中共宣称地主、富农经过三年“改造”后可以改变成分，届时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土改运动后，中共给幸存的地主、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此后三十年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居住行动自由，对他们残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农戴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含冤离世的，使他们的子女承袭种姓之罪，继续成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贱民，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像这样将有产者剥夺后到赤贫后再杀，再斗，再长期株连迫害，是共产革命所独有的罪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记录。

中共的土改运动是对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动。它否定生命权和财产权，否定人与人平等，否定妥协和宽容，煽动斗争、仇恨、抢劫和杀人，让痞子、无赖、懒汉不劳而获，并作农村的领导者，颠覆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使世代和平相处，和谐自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了谋财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

民中划分阶级，给全体农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经济学角度讲，土改运动摧毁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场，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业失去活力，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长期贫困，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土改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凋敝，农村基层领导劣质化，是土改灾难的继续。文革后，中共对建国之初被剥夺的部分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有所退赔，但是对在土改中被剥夺杀害的地主无平反，无退赔。土改运动五十多年后，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拒绝为当年杀害两百万地主富农谢罪天下。

土改运动展现了中共领袖们灵魂的丑恶。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鼓励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同时保护自己的地主大宅。张国焘在土地革命问毛说：“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你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他（指毛）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3] 毛泽东不只是随便为了情况需要说些激烈言论，而是积极鼓动农民杀其他人家的地主。刘少奇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其地主祖父、地主父亲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克勤克俭，苦心经营而逐渐发家，但在土改运动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们都与毛泽东一样，一面保护自己的地主之家，一面大力推动屠杀其他地主。

对于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土改运动是一场骗局。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就策划好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土改运动中，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9 月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于 1953 年 2 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制农民加入合作，以集体的名义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控制。广大农民的自耕农梦只作了一年多，在土改运动分得的土地连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全部没收。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1950 年在

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是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胁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 1950—1979 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14]

为维护土改运动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运动后长期丑化地主、乡绅，将编造的恶霸地主故事选入教材，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白毛女》是这种煽动的代表作之一。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有阶级性，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周扬组织贺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阶级斗争”要求改编“白毛女”故事，在杨白劳欠债不还的事实上虚构出，黄世仁为霸占喜儿要求本利全还，将杨白劳逼上绝路、大春参加了八路军等情节，将黄世仁描写成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恶霸，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剧本。1943 年 5 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扬感到该剧虽有了阶级斗争主题，但在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面还不够力度，决定对其主题再次“提炼”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以这个剧向中共七大献礼。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七大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白毛女》。毛泽东、刘少奇盛赞了该剧，刘并表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刘少奇此言，故事原型，乡绅黄世仁被枪毙，成了中共“党文艺”的牺牲

品。土改运动后，歌剧《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被冤杀的黄世仁在死后成了恶霸。

国民党的和平土改

1948年，蒋介石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负责为国民党安排退路。当时，台湾总人口 740 万，半数为农业人口，地租率高达收获总量的五至七成。[15] 高地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当时大陆农村的地租率也是那么高。其原因不是地主残酷压榨农民抬高地租，而是各路军阀、革命军队压榨地主，无节制地向地主摊派苛捐杂税，地主不提高地租高无法生存。高地租使佃农无利可图，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力低下，地租纠纷大量发生。随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陆续迁台，台湾人口激增，粮食物资奇缺，物价成十倍地飞涨。陈诚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若不能妥善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題则无法在台湾立足，决定推进行土地改革，从减轻过重的地租入手。1949年初，陈诚主持公布了《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将从日据殖民政府接收的 18 万甲“公地”以收获量 25% 的低租率放租给农民。这一举措赢得了民心，缓和了“二二八”事件以来的经济政治危机和政治危机，迅速收到了稳定社会，恢复农业生产的效果。在此基础上，陈诚开始推行分三步走的和平、渐进、有偿的土地改革计划。

三七五减租

陈诚三步土改计划的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国民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限制地租，而于 1929 年在浙江开始推行的“二五减租”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农民出产一石粮食先提取二斗五升作为种植和种子的工本费（先扣出佃农 25% 的生产成本），余下七斗五升再作对半分，地主和农民各得三斗七升五，如此将实际地租率降至 37.5%。1935 年 4 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开始将“二五减租”推行全国农村。抗战中，陈诚在湖北颁布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在鄂西推行二五减租，大受农民拥护，

促进了鄂西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随着内战爆发，鄂西二五减租的成果被摧毁。到台湾后，陈诚重新推行这一被证明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降低地租率的“三七五减租”政策遭到地主的反对。陈诚运用鄂西减租的成功经验，亲往台湾各县市，向县市长和各界人士说明减租的双赢效果。他请乡绅领袖请吃饭，劝他们说：“三七五减租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也保护了地主。今日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所走的路线，一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一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最大的错误在于制造残酷的屠杀……实行三七五减租，可避免共产主义”。[16] 经陈诚和 4000 多名“三七五减租”推行机构干部的宣传，地主们逐步接受三七五减租政策，与佃农订立“三七五减租”租约。1949 年当年，26 万公顷地主出租土地全部实行了“三七五减租”，签约佃农生产热情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生活改善的佃农纷纷娶新娘，买牛，买脚踏车，时称“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脚踏车”。1951 年 6 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陈诚主持草拟的《三七五减租条例》，使土改政策成为了法律。

公地放领

地租率下降导致地价下跌，为后续的土地改革计划创造了条件。陈诚开始实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步——“公地放领”。1951 年 5 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台湾省公地放领办法》，将从日据当局接收的公地分上、中、下三等按耕地全年收获量的 2.5 倍作价，有偿转让给农民，承租土地的佃农优先受领，其次为雇农及承耕地不足的佃农，农民连续交纳十年地租即获得公地所有权。受领公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再上台阶，帮助台湾经济走出了困境。

耕者有其田

实施公地放领的同时，陈诚开始布署准备土改计划最艰难的第三步——“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历代农民造反的口号，孙中山在革命时接

过了这一口号。其后，他为获苏俄援助接受了苏俄暴力剥夺为内容的土地革命纲领。北伐战争中，国民党人看清了苏俄引入土地革命的灾难性质，与苏俄决裂，抛弃了暴力剥夺私人财产的共产革命纲领。蒋介石退台后推行的“耕者有其田”与历代农民造反的诉求、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计划及苏俄引入中国的土地革命有着本质区别，要点在于拒绝暴力剥夺，坚持和平、有偿与渐进，是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改革，也即世纪之初梁启超与革命党论争中主张的改良。

为实施“耕者有其田”这一步改革，陈诚先安排培训了 2000 多名干部，动员了三万多名辅助人员，从 1952 年初开始进行了一年多的土地复查，摸清台湾地籍情况，将全省地主耕地重新丈量，登记造册，以防止地主隐瞒耕地。其间，陈诚主持改订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这一草案的原则是：兼顾地主与佃农的利益，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推动地主土地资金转移入工业。

1953 年 1 月，立法院通过了《耕者有其田法》。4 月，台湾省政府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条例的主要内容为：地主可保留中等标准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的土地，超过标准的耕地一律由政府强制征收后转给农民有偿受领；政府按耕地全年收获量的 2.5 倍作地价，以七成土地债券、三成公营事业股票补偿地主；受领耕地的农民分十年二十期及年息的 4% 偿付地价。地主们感到利益受损，反对土改政策，但无力对抗政府强力推行的土改，不情愿地放弃土地而接受债券与股票，从地主变身资本家。

经过 1949 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 年的“公地放领”，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了和平、渐进、有偿的土地改革，将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移给了农民，帮助二十万户佃农成了自耕农，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平、有偿的土改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积极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使台湾在不久后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可供出口换汇，造就了亚洲最繁荣的农村经济，

同时达到了“草山座谈会”决定的以农业培植工业目标，为不久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和平、有偿的土改也充分地保护了地主的经济利益，让地主们得到了债券与股票，离开土地转入城市工商业。土改中不情愿地交出土地换取水泥、造纸、农林和工矿等大公司股票的地主们没有想到，随着后来的经济腾飞，股票不断增值，他们成了工商巨贾，成了土改最大受益者。当年反对土改政策，骂陈诚“贼仔诚”的地主们体会到，陈诚在土改时摆酒劝说的在理，政府的土改政策兑现了关照地主经济利益的承诺，对陈诚由怨恨转为感谢，亲切地称陈“陈诚伯”、“阿公”。陈诚主持的三步走土地改是成功解决土地问题，达到地主、农民、政府和经济多赢局面的成功改革范例。土改成功后，他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翻译成英，法，德，阿拉伯等多种文字，成为各国制定土改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献。1965年，陈诚去世。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公祭，六七十万受惠土改的地主和佃农扶老携幼到灵堂吊唁，有些农民全家老小带着挽联和祭文多次前来祭拜。不少受益土改的佃农、地主坚持多年为陈诚扫墓。[17]

蒋介石，陈诚拒绝苏俄杀人夺财暴力土地革命，推行保护私有产权的和平土改，赢得了农民的拥护，缓和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本地人对大陆来台国民党人的怨恨，一举奠定了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民众基础。这一成功证明：阶级利益可以通过妥协调和解决，实现阶级合作和双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正道。与国民党在台湾的和平有偿土改相对照，共产党在大陆推行暴力杀人夺财的土改，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两岸土改后，大陆的农民陷入空前的饥荒，台湾农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经济快速腾飞。这一反差让人想起了世纪之初康、梁与革命党之间的改良与革命论战。当时，革命党人多势众，压制了和平改良的声音。五十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和平、有偿土改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康、梁当年和平改良主张的正确，证明杀人夺财不是改革，不是进步，而是灾难。

土改后的三十年间，社会主义是大陆民众听得最多的词之一。但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毛泽东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剥夺的私人钱财和垄断的国家资源尽量用于发动战争，发展军工，输出共产革命，而不用于民生的作法是暴政，而非社会主义，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居者有其屋”，颁布《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实行地利为社会共享，以行政权力剥夺部分地主利益用于改善社会福利，发展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等等才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社会主义。

第 41 章 整肃运动

批《武训传》与批陶行知

武训，山东堂邑县的穷孩子，无名，因行七得名武七。他羡慕富家子弟可以读书，立志兴办义学让穷苦孩子读书，在五十岁时以三十年行乞的积攒开办了专收穷苦孩子的义学。知县郭春煦视察为武精神所感，赠银十两，把事迹报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山东省巡抚张曜邀亦受感动，捐银义学两百两，赠劝募缘簿，下令免征义学学田钱粮和徭役，并为武七取名武训，意在“可为天下后世训”。武训事迹报到朝廷，光绪皇帝赐“义学正”名号和“乐善好施”匾，赏黄马褂。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病逝于义塾。《清史稿》记载：“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紼送殡，万余乡民参加，师生哭声震天。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陵、建祠、立碑，山东民众开始称武训为“武圣人”。民国时，大总统徐世昌赠武训祠“热心公益”匾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为武训立了汉白玉雕像，再建“武公纪念堂”及两“武公纪念厅”，国民政府以武训名命名了七省三十多所学校，在小学课本中增加了《武训兴学》篇。其中写道：“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似山东堂邑姓武人”。

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推崇武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他称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将武训的事迹介绍到了海外。1944年夏，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请孙将武训事迹拍成

电影。1951年2月，孙瑜自编自导的电影《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受到周恩来等百余中共高层的赞扬。随后，影片在京、津、沪公映受到普遍好评。国内各大报纷纷刊出不少赞扬《武训传》的影评和介绍文章，重庆育才学校的陶门弟子们称电影完成了老师的一桩心愿。

然而，电影《武训传》遭遇了武训的山东乡亲江青的指责。江青观后向毛泽东状告影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江青与电影《武训传》过不去的原因之一是借题发挥以打破中共中央内部规定对她的参政禁锢，原因之二是对陶行知的私怨。当年，江的前夫唐纳为她寻死，陶行知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歌发表于《生活日报》，引起江的不满。毛泽东调看电影《武训传》后指示展开批判，派江青（化名李进）率《人民日报》、文化部、中共山东宣传部共同组成的调查组到山东堂邑县调查武训的身世。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艺报》组织了刊出了《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批判文章，在批武的同时还将矛头指向了推崇武的陶行知。文中批判说：“影片是失败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把阶级压迫而是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的时代，他身边还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周大，为什么这个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着积极作用呢？”，“武训的行乞兴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伟大的时代运动。办义学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而是依靠地主阶级。这说明武训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4月，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转载了上述批判文章，并亲撰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其中称：“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由此，毛泽东借批判电影《武训传》发起了一场整肃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

央组织部派教育部党委书记钱俊瑞接管了教育家成仿吾和叶圣陶主持的《人民教育》杂志。钱接手后立即按照延安整风运动模式在教育系统内发动整肃运动，召开了教育部批判电影《武训传》工作会议，要求全国以武训命名的学校一律更名，部署发表了题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人民教育》杂志社论，要求教育界每个人都以《武训传》为镜子“照照自己”。

6月，毛泽东指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思想》一文，在其中对已故教育家陶行知展开了批判。跟随《人民日报》的调子，陶救国会时期的战友钱俊瑞撰文批陶说：“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几年前与陶行知一起发起纪念武训大会的郭沫若反戈一击说：“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当年陶行知的朋友、学生们被迫对陶口诛笔伐，《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赞扬者马叙伦、端木蕻良、《武训画传》编者李士钊、歌剧《武训》作者安娥、陶行知好友田汉等人，《大众电影》等刊物被迫发表检讨文章称受了陶行知误导、迷惑；最早赞扬电影《武训传》的周恩来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作检讨，中共电影界领导人夏衍为曾经推介《武训传》在报上发表检讨文章，几年前敢于抨击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文艺家、教育家们纷纷追随，为曾经赞扬武训向中共检讨，以批判武训、陶行知来向中共表达接受改造。赵丹因与江青的恩怨检讨不获接受，被长期禁拍电影。7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推出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按语中将武训骂

为“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称“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随后，教育部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重庆育才学校，主持了批判武训和陶行知弟子的运动，众多在教育界担任领导职务的陶门子弟被批判，撤职。

在毛泽东夫妇主持下，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的运动持续了两年。在镇反运动的恐怖中，国人被迫加入批判教育家，批判他们无缘观看的电影。江青发起批判武训、陶行知是出于私怨，而毛泽东发动运动是表达他对教育家的仇恨。青年时有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感觉让他产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报复心理。在延安发动运动了对知识分子残酷精神整肃。从苏区肃反以来，他习惯战争加整肃运动的生活方式。建国后，他光有朝鲜战争还不习惯，于是借电影《武训传》展开了另一波整肃运动。国民政府时代慷慨激昂敢于上街示威的教育家，教授和各界名流们，两年前拒绝国民政府安排离开的院士们，这时都没有了说不的勇气，纷纷抛弃尊师重教道理，以加入批判教育家运动来向中共表达驯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运动不再感兴趣，运动不了了之。人民出版社从批判文章中选择部分，编成了《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一书出版，以向毛、江交差。

批判《武训传》运动是文艺界、教育界和思想界的一场浩劫。运动中，《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一批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被封杀，中共党办电影厂也因无所适从而停产，电影界在两年间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运动后，私营影业因丧失生存空间而消亡。这一批判运动和同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起，将中国的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彻底赤化、党化。从此，只有歌颂共产党，抹黑晚清、民国的党文艺作品才能存在，独立于中共领导的文艺家和独立于中共方针的文艺作品丧失生存空间，电影制片厂、文艺舞台全部成为了中共歌颂自己的工具。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前夕，中共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写入了《共同纲领》。共产党的改造要求让知识分子们感到惶恐。冯友兰教授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复信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 二人对话显示，清末以来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者的环境不再。知识分子们识时务，开始遵照中共的改造要求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朱光潜发表了《自我检讨》，[2] 费孝通发表了《我这一年》、《解放以来》，[3] 冯友兰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4] 剧作家曹禺自我否定写道：“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 X 光线中照一照，暴露出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揭示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5]

随着解放军占领全国，中共在各大区先后开办了革命大学（军政大学，革大）。其中包括西南革大、西北革大、东北革大、中南革大，华东革大等等。毛泽东阐述办革命大学的用意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6] 这时，各行各业为中共掌控，上层建筑的就业者须经中共批准才能获准继续工作。中共规定，知识分子、旧政府职员、投降（起义）人员须先进革大接受思想改造后才可获得工作资格。革命大学由中共干部担任校长、班主任，由在延安整风中已经洗过脑的红色知识

分子担任讲者，教材是中共指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等，所讲内容以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学员中包括潘光旦、冯友兰等一大批著名教授。

进入革大的知识分子、旧职员们被要求“自新”，交待历史，挖“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写“表白书”和“思想改造汇报”，树立一切服从中共的观念，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行”。一位革大学员回忆说：“讨论会也好，生活检讨会，思想总结，民主鉴定也罢，总之，一切脱离不了一个基本原则——斗争。共产党人对人，对党内党外，无一不是斗争。开学后，革大首先宣布学员的入学动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然后要求学员们自己去检讨思想中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成分，要求学员们进行自我批判，自己交待思想中的污秽，作到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信条，使自己信奉革命的学说，即无产阶级思想。虽然很多学员并不能真正达到心服，但迫于环境压力，他们必须做到口服。”压力之下，每个学员都必须写自污的思想改造报告，批判自己。下列革命学员自我批判文章的标题反映学员被洗脑时遭受的精神恐怖：

畏子：《和潜伏的个人主义搏斗》

王英：《想不开的问题想开了》

李子寿：《把想到的毛病挖出来》

郭廷俊：《反省我的经验主义》

北扬：《我的改造》

史国珍：《下定决心和思想敌人作斗争》

张同信：《我可找到共产党啦！》

郑福：《有阶级胜利才有个人胜利》

王育珊：《没有共产党我就不会有今天》

齐东坡：《痛心检讨我的忘本思想》

李郁芹：《绝不再做剥削阶级的儿子》

董慧：《把一切都交给人民》

运慧敏：《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想头》

闻国杰：《批判我的个人英雄主义》

李耕：《决心消灭两大敌人》

曹雁行：《我认识了组织力量的伟大》

董兴源：《再不想“向上爬”了》

宋荣然：《批判我“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

刘世雄：《批判我的“科学救国论”》

邵平：《忠实于革命才是孝顺女儿》

秦荣芬：《怎样改变了我“爱人第一”思想》

李金香：《纠正我的贤妻良母主义》

郭民朴：《我背叛了“天主”》

陈善浩：《我再不信上帝了》

张希同：《我鬼混了半辈子》

李聘伟：《改变我的流氓习气》

火东：《坚决背叛地主阶级》

李忠：《检讨我的地主思想》

张庆涵：《我放弃了地主阶级立场》

东方剑：《清算了我的地主思想之后》

刘国楹：《我是可耻的逃兵》

郝文泉：《一个脱队者的反省》

张家秀：《我怎样造谣骗人》

杨伯鲁：《我认清了革命和反革命》

高诚：《我杀害了革命干部》

黄永贵：《悔恨当了敌伪小爪牙》

李秉谌：《我要立功赎罪》

王强：《在真理面前照见了自己》

张让峰：《向真理低头》

何淑兰：《批判我的超阶级观点》

关涛：《弄清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邵桂林：《扫清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沈岭梅：《做个劳动人民的女儿》

吴锡藩：《共产党救了我》

周可路：《我明白了共产党》

张电航：《我的农民意识》

王文贵：《我的落后意识》

崔脏货：《为什么怕远调》

李金铎：《为啥我要回家》

高德胜：《放下功臣包袱克服个人英雄主义》

高峻岳：《放下老资格》

刘国材：《背叛原来的地主阶级立场》

宋惠凌：《清算我的地主阶级思想》

李世光：《我是一个奴隶主》

何瑞源：《和反动的父亲分清思想界限》

关庸元：《我要立功赎罪》

王柏龄：《揭露我的真面目》

陈静仪：《去掉奴化享乐思想 建立为人民服务思想》

申葆清：《根除享乐思想和奴化思想》

陈克昌：《批判我崇拜美国的奴化思想》

严仁赓：《肃清我的改良主义思想，做好新中国的教育工作》

宋天章：《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

华粹深：《清除我在旧教育界的“清高”和“超政治”思想》

张华群：《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

马大英：《从我的教书、研究工作中批判我为蒋匪集团作帮凶的反动思想》

王大鲁：《批判我参加农工民主党以来的各种错误思想》

谢光华：《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

陈晓南：《批判我打着艺术幌子给反动派做帮凶的反动行为》

朱湘芸：《清算我崇日的奴化思想和汉奸思想》

何思源：《批判我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向人民低头认罪》 [7]

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象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作家沈从文在革大改造思想时坦白，他在中共占领大陆时曾一再企图自杀，他哭得小组会为之停顿。”[8] 达到中共改造要求的学员被派去参加中共的剿匪、土改、镇反等阶级斗争运动，或者获分配工作。与苏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整肃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一样，被揭发后交待不清历史者，抗拒“思想改造”者会悄悄从革大失踪。

革命大学内外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全都在向新政权作接受思想改造的表态，批判自己的过去。他们没有想到，发表自我批判文章并不能过关。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9] 听了周的报告，新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率汤用彤等十二位教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

周总理、朱总司令、董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代表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再向京津高校的三千多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0]由此，中共将延安整风首创，各地革大已在进行精神迫害运动引入了全国高校。

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全国学校停课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都被要求交待自己的历史，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配合抗美援朝运动，要求“清算美帝的文化侵略”。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开设了专栏供知识界知名人士发表检讨文章。学者和艺术家们在压力下纷纷发表检讨文章，表态听共产党的话、和“旧我”划清界线、接受思想改造。报刊检讨专栏中涌现出来文章包括：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唐弢的《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吴宓的《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熊佛西的《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郑君里的《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蔡楚生的《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欧阳山的《我的检讨》、李广田的《必须坚决改造我们的文艺教学》、于伶的《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叶以群的《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丰子恺的《检查我的思想》等等。

上述检讨文章对没有检讨的教授、艺术家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家知道，不发表检讨会被指为“抗拒改造”。于是，报刊上的检讨文章越来越多，

自我批判越来越狠，从检讨走向了自污。例如，朱光潜教授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否定自己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而这在无形中也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曾经鼓吹中间路线是与反动政治同流合污”；梁思成教授在《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中检讨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周培源教授在《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文中为他在美国从事研究的经历检讨说：“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是为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教授在《我的检讨》中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等一大堆帽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自我检讨》中说：“过去二十三年中，我一直以不问政治的态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弟子，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11] 知识分子们将检讨升级为自我批判，再升级为自贬、自污是党报编辑部推动的结果。毛泽东亲自操控着思想改造运动，通过中共宣传部门指挥着各大报刊

的编辑部，甚至亲自以评论员的名义撰文在报刊上向知识分子们点名施压。例如，茅以升教授发表给自己扣十三顶帽子的检讨文章后，《光明日报》评论员点评说，茅仍没有挖出自己的思想根源，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面目。茅教授知道检讨不获高层通过，只好再发表《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一文，骂自己根本不配说什么主义，自己三十年如一日地一心追逐个人名誉，除了修一座桥外没做好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等等。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高校以北大为样板，开展“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并下达整肃百分比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给予过关，2%左右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迫害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是毛泽东发明的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有国统区经历者的整肃运动。毛青年时在北大感到受了知识分子的气，从此对知识分子怀有敌意，在延安发动了专门整肃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指“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要求从苏联归来的红色知识分子“接受改造”，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下水洗澡”。按毛泽东的要求，中共对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同样整肃，要求他们交待历史，接受审查，自我批判，向党交心，表白忠诚老实，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洗澡运动”沿用延安套路，由学校的中共党委、学习委员会给全体教师“排队”，评估每个人的“肮脏程度”、“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他们是“洗小盆”（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洗中盆”（在系里作检讨，由全系师生决定通过与否）或是“洗大盆”（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由全校师生和校党委决定通过与否）。“排队”之后，学校党委召开“控诉酝酿会”，在师生中收集“洗澡”者的“材料”，然后将“材料”向洗澡人转达，要求据以写出检

讨书。多数“洗澡”者的检讨不获通过，须重新检讨，通不过者被“澡盆”升级（检讨会的规模层次升级），一些教师被认为“有抵触情绪”、“顽固不化”被反复批斗，直到认罪为止。如此“洗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极为残酷。例如，朱光潜教授在师生大会上作检讨不获通过，遭到“揭发批判”，被迫再检讨，再批判，被迫升级为“大盆”的全校大会上反复检讨，直到学校师生都不想再听，马寅初校长才作总结发言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算是放朱过了关。周炳琳教授一再检讨不获通过后拒绝再作检讨。马校长带人到他家里开“帮助会”，周无力对抗，被迫在全校大会上再作检讨；[12] 金岳霖、潘光旦被迫检讨达十二次之多；冯友兰三次检讨不获通过，金岳霖前来看望，两位名教授竟为检讨抱头痛哭；沈从文后来承认他在“洗澡”运动中又曾想自杀；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多次检查过不了关，买了绳子准备悬梁自尽，幸亏太太开导才未寻短见；北大物理教授饶毓泰受得意门生揭发打击精神失常。[13] 文艺家经受的精神迫害同样残酷，例如巴金在文代会检讨到痛哭流涕。

“忠诚老实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折磨同样残酷。知识分子们被要求详细交代历史，反复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这样的要求是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明的整人办法。其要点是要求被审查者重复地写交待材料，填写表格，找出其中不同之处作为“不忠诚、不老实”的证据，然后实施整肃。中共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照搬此法，仅在北大就查出了 3000 多有“反动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问题者。[14] 知识分子们在运动中填写的交代材料和所谓组织鉴定、结论都被放进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中。

让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想不到的是，检讨、自我否定之后仍不能过关，运动的最后一步是要求他们批判别人、揭发别人，有此行动才算达到思想改造要求。为求过关，知识分子、文艺家们被迫互相批判，互相揭发，背地告密，甚至诬陷。运动到了这一步也就完整地复制了延安整风运动过程。当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自杀事件众多，各机关的驻地夜晚恐怖如同鬼城，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高校同样恐怖，仅在北京大学 1952 年 3 月到 5 月就有七位知识分子因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杀身亡。[15]

在教会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仇美”、“反帝”运动合流，要求知识分子们在检讨中表白“反美”、“反帝”。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含泪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四小时仍不获通过，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忠实执行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16] 燕京大学工作组带领学生查抄校长办公室和档案室以“搜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特务活动罪证”。该校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所受迫害具有代表性。他早年官派留学日本，回国后活跃于学界、报界，将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到了中国。国民政府时代，他敢对国民党说不，曾在上海光华大学校务会上公开反对“颂读总理遗嘱”，在“读总理遗嘱”时离席抗议。抗战胜利之时，他与张君勱组建了国家社会党，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主张。然而，在共产党治下，他无力抗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系里作检讨。检讨不获通过，“澡盆”升级，张被迫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再检讨。大会检讨再不获通过，“澡盆”再升级，张被迫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再作检讨，接受批斗。对张的迫害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操控。建国前夕，张应中共之邀率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访问西柏坡。费等看清大势，积极投靠，张则明确反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向毛泽东建议“走和平民主道路”，“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建议被毛泽东拒绝后，张凭个人声望与美国方面联络，希望中美建立关系。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没有投票给毛泽东。毛因少了张的一票而未获全票，对张怀恨，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发话将张与美方联络之举定为叛国案。根据毛的定罪，中共撤销了张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大学教授等一切职务。张以死抗争，一是拒绝叛国罪名，二是以死抗争思想改造运动迫害。担心逼死名教授引起国际关注，毛泽东批示对张不审判不逮捕。从此，四十年来在中国学界，政界发挥重要影响的张东荪赋闲在家。

伴随思想改造运动，中共照搬苏联的高教统一的模式改组全国的大学，以“院系调整”之名取缔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组了 65 所私立高校、取缔 24 所教会津贴的高校。新中国成立时，教会大学数量多，起点高，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它们直接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模式，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引领者，在体制、机构、课程、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起着示范作用。“院系调整”后，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燕京、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华西协和、华中、金陵、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岭南、协和等教会大学走入历史，它们对中国教育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后被官方刻意埋没。例如，民国时培育出不少法学教授和国际法官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法学学者及所谓“旧法人员”被清洗出大学和机关，少数人得留在大学改教外语，数人离开大学完全改行，其中一部分人被发配边远地区。院系调整对中国教育最深远影响是中共将政工制度全面引入高校，将教育全面党化，将所有大学无一例外地纳入中共党委的领导之下，在高校设立政治辅导处负责控制师生的思想，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取消不符党化目标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

建国前夕，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去留选择，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等二十四位选择赴台或赴美，多数知识精英选择留下来迎接新政权。不久，留下的院士们在报上刊登检讨，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的学术成果，批判自己的思想，用“腐败”、“反动”、“丑陋”等字眼自贬、自污，随后在“洗澡运动”中反复检讨以求过关，交待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向中共表达“忠诚老实”，最后还要经历是否揭发、诬陷别人痛苦抉择。几年前的内战中，朱光潜与毛子水等学者联名发表了《中国的出路》一文，在其中表达民主诉求和对中共将建立极权制度的忧虑说：“我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现在全世

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人们想不到，几年后朱教授在报刊发表的是反复的检讨。时隔两三年，留在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的变化之大让人难以相信。在海外的胡适读到同仁金岳霖发表的自我检讨和批判杜威、罗素和胡适的文章后沉痛地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17] 对于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蒋介石谴责说：“在共党政权之下生活了两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不仅丧失了以前的幻想，且已遭受过各式各样的虐待。”[18]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寅恪是拒绝作检讨的一个例外。建国之初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时，他坚持几十年来独立于政府和任何政党的立场，拒绝进京。在知识分子登报检讨潮流中，他保持沉默，拒绝作检讨，拒绝接受思想改造，并在日记中表示后悔没有选择去台湾。运动过后，中共请他出任中古研究所所长。他提出条件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搞政治学习。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并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他对前来劝说赴任的弟子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有如此要求，他当然不可能去北京赴任。

陈寅恪的学问博大精深，但他最值称道的不是学问，而人格与精神。他早年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

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着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和少数拒绝低头弯腰，以死抗争知识分子捍卫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或许不知，他能超然于政治运动而未受整肃要感谢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当年湖南农民协会杀了湖南大学者叶德辉使讨赤阵营的号召力大增，知道中共在内战土改中杀害了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著名绅士，他不希望中共建国后再杀名流败坏名声，于是向访苏的毛泽东突然问起陈寅恪。^[17] 毛泽东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回国后向周恩来问起陈的情况，周赶紧嘱咐广东大员陶铸好好照顾陈。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自己写好挽联准备赴死的陈教授未受迫害。若非斯大林暗示，恐怕以死抗争陈寅恪、张东荪和当面论争的梁漱溟早就消失了。

办学独立是新学堂诞生以来就确立的传统。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想送四子袁克瑞和五子袁克权到南开学校读书，并愿意向学校捐巨款，条件是儿子带护卫。校长张伯苓担心影响校风，拒绝了袁的要求。袁世凯尊重办学独立，送儿子到其它学校读书。1913年，民国政府在《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确立了推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方向。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五四运动中，他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当时，大学校长与民国政府有这样的共识：政府不能因提供国立大学经费而随意干涉大学事务。1923年，蒋梦麟校长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将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抗战之初，胡适在庐山谈话会强调：“教育应该独

立，其涵义有三：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的学校；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可见，大学的学术独立与学人的思想自由是民国大学校长们自觉维护的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虽然独裁与党治，将一党之私的“纪念周”推行到学校，但它未敢公开否定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思想自由。整个国民政府时代，校长们敢于拒绝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与干涉，敢于拒绝党派活动进入大学，维护着大学和教育的独立地位，也维护着校长、大学教授们与政府平等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全面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舆论也不允许政府干涉大学，控制大学，更不能容忍政府强迫教师检讨、自污和洗脑。

苏俄将党国体制引入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曾对国民党党化大学进行过抗争。1925年，广东大学的三十八位教授以集体辞职方式抗议国民党以党权破坏教育独立，赤化大学。这次抗争虽未取得胜利，但至少教授们有抗争的勇气和辞职的自由。因为，全国的大学不为一党垄断，离开国民党控制的大学不愁找不到教职。广东大学教授辞职抗争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化教育”集体抗争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新中国，中共控制了所有学校，知识分子不再有抗争的勇气。新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不但不敢提大学对政府的平等地位，反而揣摩圣意，主动申请将思想改造运动引入学府，亲自主持对教授们的整肃、迫害。在新中国，全国大学的校长、教授们不敢再提“教育独立”，更不敢反对“党化教育”，甚至连独立、自由、党化等字眼也不敢再提，大家争相检讨、自污以让当局满意，集体向共产党表达“忠诚老实”，表示接受改造思想。经一次次检讨，知识分子们的头越来越低，腰越来越弯。当最终痛哭流涕，揭发别人而过关时，他们已经跪倒在地，半个世纪的大学独立、思想自由传统随之沦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教育成了党的工具，学校成了洗脑场所。几年后，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写诗颂

扬毛泽东道：“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20] 这样肉麻的诗句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残酷精神折磨的产物，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写照。

将教育全面党化后，中共长期秘密实施“不宜录取政策”的迫害，随意剥夺一大批青年的升学权利。这种迫害作法是，在高考前对学生逐一政治审查，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将学生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将其认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的子女，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秘密归类为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类。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然而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共在新中国却随意剥夺学生凭成绩升学的机会。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学不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不再产生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那样的教育家和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师，而且成了执政党实施迫害的工具。

批判《红楼梦研究》与批判胡适

1954年9月，青年教师李希凡和蓝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存在政治问题。江青对李、蓝从政治角度挑错的作法非常赞赏，将文章推荐给了毛泽东。毛阅后传话《人民日报》转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不知是毛的意思，拒绝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种将政治批判与学术争论混为一谈的文章，指示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主编冯雪峰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批俞文章和冯雪峰指李、蓝文“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微词不满，于10月16日写了一封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多达二十八人阅的信，在其中写道：“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中宣部、作协领导人见毛泽东的信后急忙召开会议，决定开展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并成立了周扬挂帅，有邓拓、茅盾、胡绳、老舍等人参加的批判领导委员会，开创了为学术争论而成立专门整肃委员会的恶例。委员会决定，要求所有报刊都必须刊登批判文章，以向毛泽东表示遵命。由此，毛泽东在文艺领域发动了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的另一场整肃运动。

随后，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等将文艺争论说成是“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的文章。毛泽东在审稿时不点名地批判冯雪峰说：“《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冯雪峰清楚，袁水拍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没有论争和申辩的余地，只好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向毛泽东认错。毛泽东不接受冯的检讨，指示将冯撤职。

冯雪峰是唯一参加红军长征的中共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此时与冯过不去是在发泄二十年前“两个口号”之争时对冯的不满。1935年，斯大林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要求服从国民政府推动对日开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解散了以反政府为宗旨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为中共的文艺家制定了“国防政府”、“国防文学”、“国难文学”、“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毛泽东拒绝放弃反国民政府宗旨，派冯雪峰到上海支持

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反政府口号。莫斯科与延安的口号不同，中共文艺大员周扬与鲁迅之间展开了“两个口号”之争。奉命推销“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就“两个口号”之争向延安讨说法。毛泽东不敢明确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共文艺界的指示，不置可否地回复周扬说“真理越争越明嘛”。冯雪峰感到毛泽东的口风前后不一，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毛对冯撂挑子极为气愤，但一来他不能摆明反对莫斯科的口号，二来他还没有确立独裁地位，只好暂时隐忍。此时，毛泽东借冯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几句微词清算怨恨，将冯撤职（毛泽东在三年后继续对冯清算，写了《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的《人民日报》论，[21] 将冯雪峰打成了右派）。

撤冯后，毛泽东将批判运动矛头引向了俞平伯的老师，远在美国的胡适，授意《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推出了《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和《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两文，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判胡适运动从高校推向了全国。与撤冯一样，毛泽东批胡适也是在发泄旧怨。他曾在延安对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对名教授胡适非常仰慕，曾旁听胡适的课。根据胡适讲演中办自修大学的设想，毛泽东拟成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登门请胡审定。胡答应尽力给予支持，不久后在《每周评论》的《新书评介》栏目中对毛创办的《湘江评论》给予肯定说：“《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22] 抗战走向胜利时，中共采取统战策略，行动之一是争取胡适的支持。1945年4月，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奉

毛泽东之命面请胡适支持中共。胡适规劝中共参加国大选举。7月，国民参政会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以学生身份请傅向胡适转达问候。8月，在纽约的胡适电劝毛泽东放弃武力说：“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毛泽东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对胡适的电报极为不满。建国前夕，毛泽东派中共地下党面劝胡适留下来拥戴新政权，并在“对胡适之先生广播”中承诺让胡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于中共与北大同仁的劝留，胡适说：“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劝同仁“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胡适表态后，毛泽东将胡适列为战犯名单上国民党帮凶之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将胡适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虽然如此，毛泽东没有彻底放弃争取胡适回大陆的努力，一是因为胡回归意味中共统战的重大胜利，二是出于自尊心考虑，希望享受与他青年时的偶像、导师俯首称臣的快感。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人民日报》在建国前夕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这封陈垣署名的公开信写道：“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在美国的胡适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驳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在文中写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

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23] 胡适说对了。陈公开信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意思。毛希望民国知识界领袖胡适也参加高呼万岁。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毛泽东将中国长期以来的独立思想代表胡适列为首要批判对象。经过一轮对胡适的批判，毛泽东感到没有达到彻底否定胡适在文化和学术领域中的地位的目标，没有发泄完被胡适几次拒绝效忠的愤怒，于是在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运动中发起了对胡适的另一轮批判。或许，毛泽东发动批判俞平伯运动的本意就不在俞，而在胡。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精神恐怖中，胡适的同事、朋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按毛的要求撰文“批判胡适思想”。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俞平伯被迫发表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24] 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将别人对他的批判一一承认。在国民党政府治下敢于拒绝党权干涉，敢于对国民党政府拍案谴责的知识精英们纷纷以批判和谩骂胡适来向中共表达效忠。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批判胡适运动持续了一年，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1955年，作为批胡运动的总结，三联书店出版了八辑三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章选辑。其中少部分内容是扣政治帽子政治谩骂，如称胡适为“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文化汉奸”、“最无耻的卖国贼”等等，而大部分内容是低级下流的谩骂文字，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流氓兼奴才”，“妖怪”，等等。选辑中有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一文。彭写道：“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阴谋家”。[25] 发表这篇批判文章后不久，彭柏山被以“胡风反革

命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捕。同案的还有发表《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文章的王元化。因二人突然获罪，1955年4月出版的《胡适批判选辑》的第三辑、第四辑将二人的文章抽出，又来不及重新排页，致页码不连续，[26] 显示当时知识分子命运之叵测。

胡适在海外读着来自熟悉的名字的谩骂文字唯有叹息。唐德刚后来回忆说，胡适在海外“未写只字反驳，但也未放过一字不看”，还写了眉批。唐问：“几百万字选辑中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27]

1956年，中共通过周鲠生、陈源等人捎信给胡适，再劝他回大陆。陈源在信中说：“‘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之句下划线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在他看来，陈垣、陈源代表的大陆知识分子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已经丧失了自我和真我。他指出：“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8] 毛泽东惧怕胡适的思想是因为，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具有瓦解专制制度的作用，正如胡适自己指出的，“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不能相容。”[29] 毛泽东要让人民对他膜拜，就不能容忍胡适思想，这是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适运动的重要原因。

批判胡适运动将胡适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推入了苦海。胡适决定离开大陆之时，次子胡思杜憧憬“建设新中国”，决定不随父母离开大陆，谓“我是

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胡适夫妇再三劝儿同行未果，只好尊重儿子的选择。胡夫人江冬秀感到此一别或难再见，留下金银细软嘱思杜将来结婚用。1950年，胡思杜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作为“战犯”之子，他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为获新政权认可，他表示脱离父子关系，将父母留给他结婚用的金银细软交给了单位领导，写了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改造思想报告交中共领导，在其中斥父亲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他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中共将思杜的思想改造汇报文字发表于《大公报》[30]以打击胡适。胡适读到儿子的文章受到沉重打击，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说儿子写这样文章是迫不得已的。随后，胡适《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上撰文写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在台湾，台大校长的傅斯年致函《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不久，第二轮批胡适运动让胡思杜感到绝望，感到自己不管如何接受改造都背着永远的罪孽。几年后，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绝望自杀。

高饶事件

1926年，苏俄扶持冯玉祥，在西安建立了“北方黄埔”——中山军政学校，高岗与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成为“北方黄埔”的学员。蒋介石、冯玉祥联手清共后，苏俄在西北发动了渭华暴动，建立了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1932年12月，共产国际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任高岗为政委。1935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与陕北红军有了山头之争。陕北红军首领刘志丹死后，毛泽东重用高岗安抚陕北红军山头，成立了与刘少奇领导的华中局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并列的西北局，任高岗为书记。毛赞扬高说：

“高岗就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看得远”，“应当记住，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31] 延安整风运动中，高岗积极参与整人，关押了在肃反中整肃他的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成员和大批来自白区的党员干部。毛泽东赞赏高整人行动，提拔高为政治局委员。东北内战中，毛泽东以林彪取代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的彭真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任高岗为东北局副局长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与林彪搭档主持东北军政后，高岗领导了东北暴力土改，安排东北决战的后勤保障，为中共立下了功劳。四野入关后，高岗成了“东北王”，大建苏军烈士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园，得到苏联驻东北总顾问科瓦廖夫的高度评价。高岗在东北不仅下令在城市悬挂斯大林肖像，更推动对自己的崇拜。在他的推动下，“高主席万岁”的口号流行东北，许多没入过关的东北人只知有“高主席”，不知有“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高岗极为不满。在中共中央讨论东北“肖像问题”的政治局会上，刘少奇指责高与苏联方面过于亲密是背叛中国，提出撤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毛泽东清楚斯大林中意高，不敢整肃，且提名高为国家副主席。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途中在沈阳发现，主要建筑物上挂有斯大林画像而没有他的像，怒而拒带高岗和林彪为他准备的一车皮寿礼。

在莫斯科，毛泽东主动承诺出兵朝鲜，斯大林极为满意，将高岗通过柯瓦廖夫向苏联密报“中共领导人反苏言论”的案卷交毛泽东作人情。[32] 斯大林这样作是因为感到高岗的价值已经不如从1930年代就开始向他递送秘密材料的刘少奇，出卖了高岗有利于重要线人刘少奇在中共内获得更高的地位。[33] 毛泽东知道，虽然斯大林出卖高作人情，但对高动手还是可能冒犯斯大林，于是收取高岗密报案卷后不动声色，继续让高岗主政东北，用高之才备战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中，高岗的干才获高层公认，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称赞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是高麻子和洪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毛泽东继续重用高岗的另一原因是牵制刘少奇。毛不满刘在 1946 年提出的避免内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在 1947 年提出的和平土改主张和在建国前夕发表的保护资本家的言论。建国后，毛与刘少奇、周恩来就要不要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意见分歧。为获得斯大林那样的军事实力与领袖地位，毛要求立即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将所有民财纳入中共的控制，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刘主张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三十年内不搞社会主义，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以利恢复经济。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的支持。高岗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反对刘、周的主张，要求土改后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开除雇工致富的党员。刘少奇批评高岗说：“东北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患了急性病”，“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指示不要发表高岗的有关谈话。高、刘的分歧让毛泽东感到可以利用高来牵制刘、周。1952 年，毛泽东削藩，将主政五大局的首脑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调京，任高岗为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将政务院最重要的八个工业部都交给高岗的计委主管，使高岗取代周恩来成为经济总管。同时，毛泽东将高岗在东北推行的暴力剥夺私人资本的经济政策、“三反”运动推向了全国。为进一步以高牵制刘、周，毛向高大讲不满刘、周的“私房话”，诸如刘进城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刘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经验、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等等。受毛言论影响，高开始散布党内存在军队党与白区党的冲突，提出从“白区党”人手中夺回党政大权，矛头直指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白区干部。他的挑战言论得到了西北帮和林彪为首的军队将领们的支持。

1952 年底，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下，薄一波主持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了取消优待公营经济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毛泽东指责新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毛泽东不让刘少奇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发唁电，率团吊唁，而提名高岗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葬礼（后改由周恩来赴苏），传达出抬高贬刘信息。5月，毛泽东在中共高层发出了针对刘少奇的通报：“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不断批评刘少奇的同时，毛泽东赞扬高岗及其“东北经验”，提出“向高岗同志学习”。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方针，指责刘少奇“右倾”。然而这时，刘的方针政策在党内高层有着广泛的支持，毛泽东不得不暂时让步，强调团结。会后，他交给高岗绝密任务：命高调查刘少奇在中东铁路战争期间被捕后的表现，暗示刘少奇可能有叛变问题。奉毛密令，高岗通过东北局副局长张秀山查东北旧政府档案，报给毛泽东一份证明刘少奇曾叛变的密报。[34] 在毛泽东的强烈暗示下，高岗向党内第二把交椅发起了冲击，在各种场合散布“刘少奇不成熟，不适合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在毛泽东离京期间担任代理主席”，“中共七大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等言论，同时拟出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向东北的老搭档陈云透露了倒刘及重组领导层的计划。陈云表示“支持高岗出来挑头”。[35] 随后，高岗对中南、华东、西南地区负责人林彪、饶漱石、邓小平等人进行重新组阁的私下游说。同样不满刘少奇的林彪、彭德怀和饶漱石等人表示支持，但邓小平不置可否（邓将高的活动及其组阁计划密报了毛泽东）。[36]

就在高岗冲击第二把交椅，刘少奇感到下台危机之时，毛泽东突然转向，开始实施早已预定的清算高岗行动。原来，毛泽东两年来抬高岗打压刘少奇是让刘驯服的手段。他仍然需要刘少奇作副手。而对西北山头的代表高岗，毛早在在陕北时就有心清算，只是担心西北山头反弹才忍手暂用。在听到“高主席万岁”口号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去高的决心，只是有斯大林在不能动手。斯大林去世让毛感到清算高岗的时机成熟。一来他不再需要高岗独当一面，而需要更驯服的刘少奇、周恩来；二来高岗出头倒刘、周已在党内树敌众多，清算高不会再有反弹。毛泽东决定自己退入幕后，让刘少奇、周恩来出面主持清算。因为，他对高说了不少怂恿倒刘，调查刘历史的“私房话”，

不能给高当面澄清的机会。12月，毛泽东赴杭州度假，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清算高岗。毛离京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高岗停职检讨严重错误。高岗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见面。刘将信转杭州交毛。毛批示给刘：“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同时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避免高岗来见。[37]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整肃高岗的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安排情报元老陈赓带枪坐在高岗身后。[38]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党内有人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随后，周恩来、邓小平发言，将高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相提并论。曾支持高岗“出来挑头”的陈云反戈一击，揭发高岗曾对他封官许愿说“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试图申辩，周恩来制止说：“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曾经领导整风运动，逮捕关押同志的高岗感到了申辩无门的痛苦。他明白“分裂党”罪名的严重，于是放弃申辩，按党内规则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反对刘少奇的错误。

高岗之外，会议的另一整肃对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饶之被整有镇反不积极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被毛派到新四军军部监视项英，了解毛置项英于死地的过程，随后还了解了毛通过潘汉年与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谈判达成联合对付国军协议的机密。毛泽东知道饶漱石长期反对刘少奇，曾多次向中央组织部长康生提出怀疑刘少奇叛变及刘生活腐化等问题，于是决定将饶一同整肃，一方面封住饶的嘴，另一方面安抚刘少奇。会上，饶漱石也循党内规则作了检讨。高、饶检讨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高岗、饶漱石被软禁在家中写检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召集东北和华东两大区的在京干部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求揭发高、饶“结党营私，图谋不轨”。高、饶的老同事，老部下们循党内规则，不留情面地揭发、批判老领导。高岗忍受不了突然沦为囚徒，被老搭档出卖，被老下属揭发的痛苦，拔警卫枪自杀未遂。[39]这成了高岗的新罪行。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罪行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包括散布军党论、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造谣挑拨、破坏党内团结、私生活腐化等等。

在全国开展的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运动中，被软禁的高岗一再要求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当面澄清事实。在请求一再被拒后，高岗写了给毛泽东的检讨书，希望毛看在鞍前马后多年的份上出手相救。在递上检讨书百日不见回音后，高岗这才明白，对他的整肃不是刘少奇的决定，而是毛泽东的决定，他被毛泽东利用了，戏耍了。于是他不再申诉，不再检讨。不久，中共通知苏共：“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赫鲁晓夫晚年评论高岗之死说：“毛先在高层孤立高岗，然后软禁高。后听说高岗服毒自杀。我怀疑高自杀之说，他很可能的是被勒杀或毒杀，正如斯大林一样。”[40]

1955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素无关系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称为反党联盟是毛泽东的主意。负责操办的邓小平在报告中指高、饶“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宣布将二人开除出党。随后，饶漱石被以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的罪名逮捕并长期关押（中共在十年后才宣布将已患精神分裂症的饶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高饶被清洗后，他们的位置被事件的受益者们瓜分。毛泽东提拔邓小平接任了高的政治局委员职，进入最高权力核心，饶漱石的中组部长职被政敌刘少奇安排亲信安子文接任，先支持高岗的竞选计划，后又反戈一击的陈云不久后担任了中共副主席。通过对刘少奇的先打后抬，对高岗的先抬后打，毛泽东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成功地让刘少奇、周恩来认错检讨，执行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实行军事工业化的政策，同时完成了十几年来清洗西北帮的预定计划。

1956 年底，为表达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不满，毛泽东给高岗追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罪名。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41] 应当说，毛泽东加给高岗的这一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因为，中共系苏共建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苏”与生俱来，中共从陈独秀以来的历任领袖的主要工作是向莫斯科递交情报，预算，都是以苏俄为祖国的俄党，毛泽东长期掌握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是“通苏”的首脑，中共党内有不少人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例如毛的俄文翻译师哲直接为苏联的安全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都给斯大林报送过秘密报告和重要情报，[42] 众高层都没有资格指责高岗通苏。作为东北的最高领导人，高岗“通苏”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谈不上“里通外国”。

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谈高岗之死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43] 这里，毛泽东所言系谎言。他不仅没有“约谈话”，更拒绝与高岗见面，对高的上书百日不复，在得知高岗自杀未遂后说：“随他去”。[44] 1964 年，毛泽东在布署整肃刘少奇时又说：“原想把高岗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

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45] 多年后，高岗夫人李力群披露毛泽东对高岗利用后抛弃的情况说：“高岗干的很多反对刘少奇的事情，如查 1929 年的敌伪档案以调查刘少奇自首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许多事情，比如财经会议高岗的发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毛主席对他说刘少奇七大当了二把手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另外，说‘六十一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叛变自首出来。以后就讲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资本家的女儿了，在天津讲话了，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 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46] 对于高饶事件，中共前领袖王明评论道：“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第一，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总书记，而象以前一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不得不同意毛泽东信赖的邓小平代替他任总书记。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入罗荣桓之手。.....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一九四零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 [47]

整个高饶事件其实并非路线斗争。中共已在 1980 年代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澄清高饶反党问题并不存在。高岗向地方大员游说可说是拉帮结派，也可说是竞选。在崇尚暴力的革命党内，尝试竞选引致杀身之祸早有先例。

高岗事件其实是中共党内的山头之争。高岗是陕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反客为主，山头之争在所难免。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红军领袖不明不白之死因为山头之争，中共中央命名志丹县、子长县是为安抚手段山头。高岗曾对手下说：“想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陕北时，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衣不蔽体，破破烂烂，简直和叫化子一样……当年要不是我高岗收容他们，早就冻死，饿死了，早就没有毛泽东了，还有什么毛主席”。[48] 毛泽东听到此言作清算部署容易理解。在西北，毛不能对西北山头赶尽杀绝，需要重用高岗以获西北帮的拥护。坐稳天下后，他需要清算异己山头。高岗倒台后，陕北红军派系的干部被大规模清洗，原陕北红军系的干部很多人受到牵连。几年后，毛泽东再以小说《刘志丹》为借口，对陕北红军派系的残余势力再进行了大清洗，整肃了上万人，扫除了西北山头的残余势力，算是为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山头斗争作了了结。毛泽东这样整肃虽然残酷，但还是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因为，他需要整肃下去一大批人以腾出官位安排追随着作官。

出面主持整肃高饶会议的刘少奇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被中共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所依据仍是高岗在东北搜集的资料。1980年代，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彭德怀、刘少奇案相继得到了平反，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被荒唐地宣布“不存在”但不予平反。当时主持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案胡耀邦在西北听取了众多老干部请求平反高岗反党案的呼声后决意推动平反高案。胡的平反动议被邓小平否决。如今，官方仍将描写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照片和绘画中的高岗当时所站的位置处理为空白，东北的一些纪念碑上当年高岗主席的题词也被铲为空白。

潘扬事件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发动肃反运动，要求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联系的干部主动向中央交代。出席会议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1943年与汪精卫政府联系时临时被拉去

会见汪精卫的情况报告。他向党汇报这一长期隐瞒的情况是因为，参与与南京汪精卫政府联络的胡均鹤被捕，其交待可能涉及他见汪的情况。毛泽东阅潘的报告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下令逮捕了潘汉年，按照拼凑出集团的习惯，将潘与受饶漱石案牵连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定为了“潘扬反革命集团”。随后，中共在潘、扬任职的上海市掀起了声讨和揭发潘、扬的运动，逮捕、整肃数千人，其中包括 1936 年到延安为国共秘密谈判穿针引线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潘汉年被捕后，以李克农为首的潘汉年案项目组向政治局和书记处提出了审查报告，其中提出反证说，潘打入日、汪组织、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进行情报工作系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行动，直到上海解放，中共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毛泽东不接受李的反证，将潘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将潘案长期搁置。

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之大，毛泽东比谁都清楚。1931 年中，中共第二号特务首脑顾顺章变节，导致中共上海地下党网络被摧毁。经博古推荐，潘汉年临危受命，离开上海文艺界，中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出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成为中共情报主管周恩来的助手。1933 年，左翼文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汉年因身分可能暴露而转移中央苏区。到苏区后，他奉毛泽东之命与驻闽十九路军密谋反蒋政变，代表中共中央与福建方面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然后出席了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行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仪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派潘汉年赴莫斯科争取对会议结果的认可，潘汉年与陈云在长征半路离队，分头取道云南、四川到上海与宋庆龄接头，由宋安排赴苏。1935 年 9 月，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结果，王明命潘汉年留莫斯科学“新编密电码”。在潘汉年学得密电码准备回国时，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王明开始了代表两党的秘密接触。奉王明之命，潘与邓展开了谈判，约定向两党高层报告情况后在南京举行正式谈判。1936 年 6 月，潘汉年回国，按照约定先到南京见陈果夫。陈得知潘尚未回到陕北，要求潘须先到陕北取得毛泽东、周恩来的授权后才开始谈

判。8月初，潘汉年到达陕北。出国一年半，潘汉年不知道张闻天只是个挂名领袖，按照程序向最高领袖张闻天汇报在莫斯科的情况而没有，先向毛泽东汇报，招致毛的强烈不满。在听取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潘汉年报告了与国民党谈判接触的情况，汇报了王明交代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王明派他学习密电码，王明派他与国民党代表会谈等等。毛泽东本来就对潘汉年滞留莫斯科一年多不满，再听潘一口一个王明更加反感，认定潘是王明的人，于是在高层会上反对派潘汉年继续国共谈判。但这时毛泽东尚未取得独裁地位，政治局多数同意博古的建议，决定派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10月，潘汉年怀揣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亲笔信来到上海策划了“七君子事件”，为毛泽东、张学良、杨虎城策动兵变作了必要铺垫。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组建了华南情报局，率刘人寿、董慧等情报人员接管了刘少文、刘晓等人建立的上海情报小组，设立电台与延安、重庆、香港联系，恢复了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袁殊的联系，通过袁介绍与“岩井机关”首脑岩井英会谈约定共、日停战，交换关于国军动向的情报，联手打击国军。通过情报交换，潘向延安传去了大量战略情报，包括日本政府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放弃北攻苏联，准备南进对英美开战的情报，帮助毛泽东在抗战中料事如神。1943年，潘汉年与汪精卫政府情报负责人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被李拉去会见了汪精卫，然后再会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军最关心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与新四军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会见后，潘向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通报，称只要新四军不骚扰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就不会为难新四军根据地。饶依潘通报行事，同时向延安密报潘汉年通敌。毛泽东以刘少奇、康生的名义电饶，澄清潘的行动得延安批准。[49] 1944年，潘汉年根据延安发出的

搜集日蒋勾结证据的指示，亲自为汪、蒋牵线搭桥，请国民党元老任庵游说故交周佛海与重庆联系以制造“蒋汪勾结”的证据。周接受了游说，开始暗中为重庆效劳。于是延安不断得到“蒋汪勾结”的密报。潘汉年的行动虽未达到摧毁蒋介石抗战领袖声望的目的，却促成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成了重庆的卧底。延安将蒋介石对周佛海的委任曝光，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伪勾结”，背后还是潘汉年的效力。1945年，毛泽东指定潘汉年为七大代表，在延安设酒为潘洗尘。在随后几年的国共战争中，潘汉年代表中共与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联络，策动国民党内的倒蒋运动，出面说服北平守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从1936年10月怀揣毛泽东亲笔信离开延安到上海，潘汉年红色情报生涯的每一步均依毛泽东指示行事，成为延安在抗日烽火中享受长期安宁的幕后功臣。没有毛、潘的通敌，中共不可能毫无顾虑地集中高层在延安整风三年。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抵得上千军万马。毛泽东拒绝李克农提出的反证一定要长期关押潘汉年并非因潘通敌，而因几项不能明言的理由。其一，他始终视潘为王明、博古的人；其二，他亲自领导了向东北军、西北军安插红色代理人，深知两面间谍的巨大威胁，怀疑红色间谍都是两面的，对红色间谍采取“用后清洗”的策略；其三，他在饶漱石告状，被迫出面释疑，暴露延安通敌的难堪中深感潘、饶都知道得太多了，要让他们在建国后为党的利益消失；其四，他早年间岳父好友章士钊举荐任汪的秘书，获汪提拔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奉汪为恩师，忌讳属下私会汪精卫，怀疑属下听汪谈到他微时之事；其五，他需要在建国后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

毛泽东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的想法不是始于整肃潘汉年。建国前，中共对“国统区”地下党曾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指示”，随着解放军占领全国各大城市，毛泽东开始考虑官位问题。自古以来，农民造反无非以升官发财相号召。怀着皇帝梦投身革

命的毛泽东清楚各级将领都像自己一样有出人头地的心思。革命胜利了不给他们官位就无法让军队效忠。随着占领城市增加，各城市的地下党市委接管本市领导权的想法与军队将领们的当官想法冲突。“渡江战役”后，军代表要求在南京地下党中展开整党，称地下党“组织不纯”混入了反革命，称许多新党员“入党动机不良，成分复杂”，处分了百余地下党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拒绝这样的指责与处分，与南下大员发生了激烈争论。二野领导人邓小平在召集地下党会议上作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严厉批评地下党对解放军有不服气情绪，强调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称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邓的这篇报告后来未被没收入《邓小平文选》）南京地下党与南下大员发生争论的情况被汇报给了中共中央，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毛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的这一批示传达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南下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而对地下党们完全保密。毛泽东的这“新十六字方针”不只针对南京，而是针对全国地下党。他知道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没有整出什么反革命，但他需要这样的整肃。对于潘汉年，毛泽东清楚他对党的贡献，但要求他像其他白区干部一样，为党的利益牺牲。自从投身中共，潘汉年同时效力于中共和共产国际。1932年，他参与共产国际营救驻中国重员牛兰夫妇的行动。与高岗一样，潘汉年也是斯大林欣赏的人。只要斯大林在，毛泽东不会对他们动手。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动手收拾高饶，同时也动手收拾潘汉年。由潘汉年、扬帆案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大抓“反革命”的全国肃反运动，将中共地下党精英几乎一网打尽，腾出了众多官位安排军队干部。这种“卸磨杀驴”的作法对白区干部是有些残酷，但赢得了军队将领们的一致拥护，有助毛泽东巩固权力地位。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

得杀。”毛泽东此番讲话成了对潘汉年的非正式判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63年1月补判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刑事判决书》列举三项罪名为：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中统特务。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将已经假释出狱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大特务潘汉年在监狱中饱尝革命苦难时，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却获释出狱，获政协委员衔和良好待遇，得出版著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当年特科的战友，同船赴莫斯科的陈云为潘汉年发起了迟来的鸣冤。根据陈云、廖承志、刘晓、夏衍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胡耀邦主持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及对扬帆平反的通知。该平反通知所依据的仍是1955年李克农提出的五项反证。

潘汉年的命运凄凉，他通日战线的属下关露同样遭遇悲惨。1939年，潘派关打入汪政府特务机关“76号”。关接受了任务，断绝了与左翼文化界的来往，帮助潘汉年与李士群、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任务完成后，关露提出到延安去或去加入新四军，潘下达新任务，进入日本海军报导部任《女声》杂志编辑为党搜集日军情报。日本投降后，关露成为国民政府惩办汉奸运动的对象。为免暴露与日方的秘密关系，中共将关露转移到根据地让她隐姓埋名。在解放区，关要求发表诗作，得到答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建国后，关被以通敌罪名长期关押。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这时的平反对关已无意义，她以自杀结束了奉献共产党的一生。[50]

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

1933年，留日学生胡风因参加日共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加入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胡在鲁迅与周扬等人的“两个口号”论争中高调支持鲁迅，赢得了“鲁迅传人”的名声。1941年，胡风发表了《论民族形式问题》长文，在其中点名批评周扬、郭沫若、胡绳、何其芳、

陈伯达、艾思奇等中共文艺界要人，为自己在重庆文坛赢得“中国的别林斯基”名声。延安整风后，中共要求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作为政治学习文件。自认为是独立文艺批评家的胡风发表文章，提出不应“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文艺批评独立，间接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为教条。胡因此举受到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中共文艺家的围攻。毛泽东得知胡风挑战他的讲话极为不满，但在大谈民主之时暂对这位“鲁迅传人”隐忍。

建国时，胡风写下了热情歌颂毛泽东和中共的组诗《时间开始了》。长诗的第一乐章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感动了无数青年。发表长诗的同时，胡风保持其国民党政府时的文艺批评锋芒，主张以鲁迅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实际反对“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说。^[51]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再容忍有不同声音，对胡风言论表示出不满。《人民日报》得知毛对胡不满，立即停止刊登胡风的组诗，使组诗的后五乐章没了下文，让翘首以待的青年们感到奇怪。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文艺家们都按中共要求发表了检讨文章。胡风不改一贯作风，拒绝就建国前的文艺批评作检讨。胡乔木、周恩来先后约见胡风，要求他改变文艺批评作风，中国文联安排了多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组织文艺家批评胡风，迫胡风承认文艺思想错误。胡风坚持文艺批评自由原则，拒绝检讨，认为周扬组织《文艺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批判文章是在报复 1930 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旧怨。1954 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适运动中，文联和作协召开大会批判胡风的立场。胡风反对将文艺与政治立场扯在一起，反对中共要求文艺家必须服从领导，向文联提交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在报告中，胡风坦言反对共产党世界观、同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发扬民族形式、写革命题材等五条“文

艺创作原则”，反对以“政治标准”为文艺批评第一原则，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艺术家成为党权奴仆，坚持创作自由和文艺批评自由，点名抨击以周扬为首的十几位文艺负责人。收到胡的三十万言书，陆定一、周扬在文艺界组织对该意见书的批判，称胡向共产党政权进攻，要夺共产党对文艺界的领导权。胡风拒绝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罗织的罪名，联合受压制的阿垅、路翎等作家撰文批判周扬。对付胡风不屈服的态度，周扬将胡风的申辩言论上报给了中共中央。胡风也不示弱，通过习仲勋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上了他的三十万言书。

得周扬的报告后，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文，在亲撰的编者按中称文艺界当局与胡风之间的争论“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52] 并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全国报刊纷纷刊出批胡文章，其中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发表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53] 成为批胡文章的模板。批判胡风升级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让陆定一、周扬感到不安。他们几次组织批判胡风只是想让胡风作检讨，改变口无遮拦作风，并没有想置胡于死地。见全国报刊一起围攻胡风，他们认为对胡风整肃过头了，主张将批判限制在文艺领域，只要胡风认个错就可以结束批判运动了。然而这时，毛泽东亲自掌控《人民日报》整肃胡风，运动已经由不得陆、周了。

在政治高压下，胡风的友人，作家舒芜交出了与胡风的私人书信。文艺家本来不会出卖告密，但作了革命文艺家后就会这么作。在政治恐怖环境中，党文艺家们充当告密者，互相陷害，受害者胡风也是陷害的参与者。1945年，胡风将舒的《论主观》发表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中共文艺家的批判。胡风指导舒芜写文章与中共文艺家展开了论战。

然而当周恩来向胡风问起《论主观》一文时，胡称发表舒文是为了批判，并将这番话对舒隐瞒。[54] 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发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舒芜为“叛党分子”，称“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胡风指舒芜：“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55] 此时舒芜在政治高压下出卖胡风，算是还了一报。令舒芜想不到的是，他上交的讨论文艺界现状，表达对中共管制文艺不满情绪的作家私人书信到了毛泽东手中，被毛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刊出。[56] 毛还亲撰编者按，在中写道：“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象，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名勒令胡风友人路翎将所有与胡风的通信交出来，威胁说“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艺术家们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代表着最高层，只好交出与胡风有关的私人信件、文件。

1955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批判胡风专版加上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并在编者按中写道：“像胡风和胡风分子这样一种人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

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应当对他们提高警惕，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假冒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危害却很大。”“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毛泽东将文艺家之间的争论定罪为“反革命案件”，下令将胡风逮捕，同时指示不要提胡风与鲁迅的关系，以维护他为鲁迅营造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主将”形象。[57] 根据毛的指示，公安部门逮捕了胡风夫妇，抄走了胡风住所的全部信件、日记；中宣部成立了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从胡风的私人日记、书信中找出“反党”证据；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宣传、组织、监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了“清查胡风反党集团”“五人领导小组”；刚刚成立的人大奉中共之命宣布将人大代表胡风开除出人大。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对处理胡风集团的指示》，宣称“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实际上老早就蒋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要求“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被关押的胡风拒绝认错，拒绝“反革命集团首脑”罪名。毛泽东要求“坚决加以处理”，新成立的“五人小组”和“专门小组”赶紧行动，派人搜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中宣部“专门小组”断章取义地剪裁胡风友人交出私人信件、文件，拼凑出了罪证材料上报中共中央。

5月24日，毛泽东将“专门小组”报来材料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题目刊载，并在编者按中称：“他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为骨干组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文艺界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来头，连夜安排行动作出响应。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批判胡风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向大会宣布胡风罪行。主持大会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发言定调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

的敌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缜、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翰笙、田汉、洪深、陈其通等文化家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以声讨、诬陷胡风来向中共表态效忠。教育家叶圣陶在发言中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胡风的二十多年老朋友夏衍发言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作协副主席冯雪峰在发言中诬陷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周扬、夏衍等人的关系，建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开除出去（他的建议不仅用在了胡风身上，后来也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在发言中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58]

6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推出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按语中写道：“当本报公布了第一批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胡风和胡风集团中许多骨干分子很早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根据毛泽东的号令，中共展开了大

规模的秘密逮捕，凑出了一个七十八人的“胡风反党集团”，将三千多人受到牵连者开除工职，送劳改或劳教。当时，最轻的开除公职送农村劳改已使人丧失安身立命的基础，陷入长期的苦难。中共将报刊发表的批判胡风的文章迅速辑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小册子，印刷了七百多万册派发全国。中共在该小册子序言中要求：“第一、二篇材料题目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按中共语汇，从反党集团改称反革命集团的意思是罪名加重。

在小册子的指引下，批判，谩骂胡风的文章、书籍铺天盖地而来，各地、各界仿照《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语调，不仅行文不讲道理地谩骂，连标题也充满语言暴力。例如：《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它》（王若望著，新文艺出版社）、《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作协上海分会）、《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资料索引》（山东图书馆）、《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茅以升）、《看穿了胡风的心》（老舍）、《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巴金）、《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曹禺）、《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焦菊隐）、《胡风——阴谋家》（田间）、《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侯外庐）、《缴下胡风的剑》（高玉宝）、《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程砚秋）、《我们绝对不能容忍》（陈垣）、《敌人在哪里？》（丁玲）、《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丰子恺）、《我的愤怒已达极点》（赵丹）、《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林巧稚）、《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翦伯赞）、《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冯友兰）、《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钱伟长）、《胡风——蛀墙脚的白蚁》（马思聪）、《坚决镇压胡风》（常香玉）、《敌

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于伶）、《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王光英）。文艺家们争相以最恶毒的语言声讨胡风。例如，郭沫若在《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中写道：“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发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老舍在《看透了胡风的心》一文中写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丁玲在《敌人在哪里》一文中写道：“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冰心在《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一文中写道：“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巴金在《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一文中写道：“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

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曹禹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一文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59] 报端连篇累牍的批判胡风文字中充斥“阴险”、“卑鄙”、“毒蛇”、“毒瘤”、“狼心狗肺”、“狐群狗党”、“喽啰”、“流氓”、“匪帮”、“豺狼”、“猛兽”、“耗子”、“白蚁”等污言秽语，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恶毒，那些时人的恶毒，读来令人作呕，令人无法相信是出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翻译家，胡风老朋友们的笔。知识分子们知道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但他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政权逼迫下一步步学会了自污、谩骂、诬陷，他们知道当局喜欢听这种话语。心怀恐惧的知识分子们为了生存通过谩骂胡风来向新政权表达效忠。他们知道，非如此恶毒谩骂不能过关。

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是一场反文明的运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操刀，带头诬陷，将私人书信、私下谈论、私人日记中的牢骚话断章取义作为罪证，在党报上匿名罗织罪名，自始至终不给胡风和其他当事人以申辩的机会，逼迫文艺家们互相揭发，互相陷害。毛泽东迫害胡风，除了政治上借题发挥以达到抓“反革命”，镇压农民请愿的目的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他有迫害文人的嗜好。出于这种变态的嗜好，毛泽东在建国后不停顿地发动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迫害张东荪，批判已故的陶行知，批判俞平伯，批判冯雪峰，批判远在海外的胡适。出于这种嗜好，毛泽东长期以《人民日报》评论名义，撰写社论、编者按，恶毒整肃不相干的文人。从古至今，文人辩论，武将开打都讲究通名报姓，而蔑

视规矩的毛泽东喜欢匿名在报上点名对文人实施精神迫害，以享受整肃文人的乐趣。在海外的胡适评论胡风事件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60]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只是毛泽东发动肃反运动计划的一部分。肃反是苏俄引入中国的灾难。1930年，斯大林指示中共效仿苏共开展肃反。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共各苏区均开展了肃反运动，将大批红军将领、中共干部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处决。毛泽东在苏区尝到了借肃反巩固权力地位的甜头，在延安整风时领导了以“反特”、“除奸”为名的另一波肃反。此时，毛泽东在和平环境中再次发动肃反运动，要以肃反革命的名义武力镇压城乡抗议剥夺私人财产的请愿者，清洗异己和各地的中共地下党。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小册子序言中，毛泽东写道：“高饶集团、潘扬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毛泽东此言透露出，高饶、潘扬、胡风三事件都是他为了发动肃反运动有意策划的。7月1日，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一指示），将肃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7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遍布财政经济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党派、各团体，他们不一定能像胡风分子们那样背诵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不一定会做诗会写文章，但他们也是在表现上‘顺着’革命，称赞革命，阿谀革命，甚至在钻进了革命组织以后装得勤劳刻苦，以图骗取信任，却是同胡风分子相似的。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目的，都在找我们的弱点，钻空子，偷窃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向帝国主义和国民

党供给有关我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情报；或者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制造纠纷；或者直接进行纵火、爆破、暗杀、暴动之类的破坏活动。”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编者按，毛泽东制造出到处藏着反革命，磨刀霍霍，新政权处于险境之中的恐怖气氛，然后要求通过肃反运动，镇压反抗“统购统销”、“合作化”、“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请愿浪潮和退社风潮。根据七一指示，中共中央将领导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五人领导小组”升级为以中宣部长陆定一、公安部长罗瑞卿为首的“十人小组”，作为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机构，各省市层层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以湖南省为例，中共湖南省委成立的批胡风和肃反运动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秘书组、项目组、项目指挥组、甄别定案组、清理敌伪档案组、材料组等等。全国肃反运动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与镇反运动初期一样，多数地方大员奉中央之命成立了肃反领导机构，但并未积极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经过建国后几年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一年一度的整风，所谓敌人抓了一批又一批，再肃反是无中生有。这时，陶铸、赵紫阳主持的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搞大运动”以解决“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建议。^[61] 这种无中生有地制造整人借口的建议正合毛泽东的心思。毛对广东省委报告作出批示：“此件甚好”，“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在赞扬广东的同时，毛泽东指责不积极开展肃反运动的其它省领导人“右倾”。8月，毛泽东再主持下达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仿照延安整风运动作法，按5%的比例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官员学习广东省委，制定“打虎预算”（打虎指标），选定所谓“历史复杂”的一批人为“老虎”，将他们隔离审查，实施刑讯，逼迫他们重复地写检查，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派人“外调”。这样的肃反立即制造出了另一波自杀潮。肃反运动中，人大和刚刚颁布的宪法连人大代表胡风也不能保护，当然不可能保护几百万旧政府相关人员的生命财产。

肃反运动的主要迫害对象是旧政权的雇用人员。经过镇反运动，原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区镇乡保甲长、国民党军官等人员等杀得所剩无几。这就是多数地方大员一开始对肃反不积极的原因。然而，毛泽东整人欲望没有止境，一再下达肃反指示，要求“参照广东经验”，无中生有地抓出反革命。逼迫之下，各地按中央要求，扩大范围“肃反革命”，将旧政府中更加低层的差役，旧政府聘请的师爷，账房先生，文书，杂役，国民党军士兵和雇用的民夫等所有与旧政府，旧军队沾边者都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加以整肃。如此，中共将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雇佣人员杀害，逮捕关押，逼得他们自杀，或给他们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长期管制迫害，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谋生出路，让他们大批死于非命，创下了有史以来对旧朝人员迫害最残酷的记录。

由于毛泽东亲自定罪在先，又查不出罪证，胡风像潘汉年、饶漱石一样，被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不少青年人站出来谴责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例如，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在学校饭厅贴出了“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的大字报（当时传言胡风已死在狱中），谴责当局以胡风和友人的通信为依据随意定罪写道：“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罪。四九年建国时，是胡风第一个写长诗‘开始了’来热烈歌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首诗我至今还能背到，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演讲中指出：无论胡风是否有罪，毛泽东在举证和审判之前就著文钦定胡风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

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作出的定罪不容挑战，一大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鸣冤的青年受到了同样残酷的迫害。刘奇弟在“反右”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十五年，送兴凯湖农场劳改，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因拒绝认罪，刘奇弟被进宽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站不起又躺不直，在不久后的饥荒中冻饿而死。[62]

肃反运动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三大改造”、“反右”等新的整肃运动，于是，肃反领导机构成了常设机构，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8 年，一些地方将大跃进运动与肃反运动结合而为“肃反大跃进”，将反对大跃进者作为肃反运动的新对象。很多地方在 1959 年的饥荒中仍在开展“肃反补课”运动。作为对鸣放意见的回应，官方披露有 130 多万人被肃为反革命立案审查，[63] 而将肃反运动害死、关押的人数向国人隐瞒。

被不经审判秘密关押十多年后，胡风才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四川劳改，胡案的另外几位受害者，阿垄、贾植芳、庄涌等人也被补判了十几年徒刑。1978 年，中共撤销了对胡风的判决，安排胡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胡风对受迫害二十多年提出申诉。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中共拒绝为其平反。胡风坚持上诉，直至病危。1980 年，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 1980 年第 76 号文件），在批复中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198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宣布为胡风等人平反。这样的通知其实不能称为平反。因为第一，没有追究诬陷罪恶；第二，当年诬陷是《人民日报》头版连续刊登，而平反是秘密通知。应当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们的命运不是最惨的。肃反运动的主要整肃对象，旧政府雇用人员

的遭遇多数也比胡风案牵连者更悲惨。他们或被镇压，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在几年后的大饥荒中大批饿死，或此后的历次整肃运动中反复受到迫害，戴着“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含冤离世，不为人知，也没有获得复查，连胡风集团成员那样名义上的平反也没有。

巴金在晚年《随想录》、《真话集》、《怀念胡风》等文中拷问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他对自己为了过关而写下了批判胡风文章痛悔，说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遗憾的是，像巴金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当年参与围剿胡风的知识分子、文艺家没有忏悔。曾对胡风落井下石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是在恐怖不得已而参与迫害，而制造冤案的中共只会不公开地宣布“错案错判”，而不会对迫害有赔偿、道歉，不会追究诬陷、迫害罪责。

第 42 章 农业合作化

统购统销

发动朝鲜战争后，中共通过搜刮农民维持战争。中共的搜刮办法是以低于市价 20%到 30%的价钱从农民手中强买粮食，以 1952 年为例，粮食零售价格每吨平均 198 元，而政府收购价是每吨 138 元。朝鲜战争的三年中，中共低价强买粮食的数量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长。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要还军火债，要发展军事工业，对粮食的索求无限增长。当时，工业一片废墟，没有产品可以出口换汇，中共又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关上了与西方世界的贸易之门，还苏联军火债、买军事技术只能靠向苏联出口粮食。1953 年，中共推出了比前一度再增长 50%的粮食收购计划。

新政府连年低价强买粮食使农民苦不堪言。在 9 月的政协会议上，长期致力乡村建设，关心农民生活的政协委员梁漱溟为农民诉苦说：“农民苦，农民想进城，被轰回去。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地，农民的生活在九天，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梁漱溟是民国时的著名学者和名流。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提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他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主张以儒家精神为指导，和平改良、建设乡村，通过自下而上地复兴中华文化以救中国。抗战中，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两夜的平等争论。毛强调中国必须要开展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梁以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相赠，表示反对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希望毛能接受和平改良的主张。二人各说各话，没有共同语言。在新中国的政协会上，梁像在国民政府时代一样行事，君临天下的毛不再容忍梁为农民请命，斥梁

说：“由于战争（抗美援朝），去年前年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但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周恩来接着帮腔斥梁“解放前为了做官、一贯反动”。梁漱溟不接受这种指责，发言申辩，说自己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的看法不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他的申辩被其他政协委员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漱溟抗议压制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毛泽东答：“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下一届我还可以提名你当政协委员。”梁漱溟说：“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政协代表们心里都明白，梁漱溟所说的农民苦是事实，而毛泽东“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打仗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的说法一是不讲道理，二是以势压人。在教育界、文化界还在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在被迫写检讨，镇压反革命运动仍在继续的形势下，政协委员们不敢支持梁漱溟的主张，不敢抨击中共低价搜刮农民的政策。他们看清了利害，以围攻梁漱溟来向中共表达效忠，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何香凝等政协代表竞相斥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在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斥梁漱溟“思想反动、反共反人民、用笔杆子杀人、与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的关系须交代、冒充农民代表、尾巴是藏不住的、所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1] 这时，毛可以滔滔不绝地批

判梁漱溟，而几十年来活跃于学术政治舞台的梁丧失发言权和申辩权，被毛一言定为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反面教员”，从此回家赋闲。

中共可以不断增加低价强征粮食的计划指标，但土改中分得土地的自耕农民也可以拒绝低价卖粮。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中共内部称遇到了“粮食危机”。在 10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向毛泽东提出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赏，命陈云、邓小平起草文件。会后，陈、邓起草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获毛泽东批准。根据该决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宣布从 12 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命令规定：农民不得私自买卖粮食，所产粮食必须按规定低价卖给政府（即中共所谓的计划收购，又称统购）；农民需要粮食再向政府买（即中共所谓的计划供应，又称统销）。中共在命令中威胁：“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这一命令意味农民买卖自产粮食、存粮备荒成了罪行，政府有权剥夺农民亘古享有的对自产粮食的支配权，以低价抢劫农民。统购统销字眼是中共的首创，但共产党要求农民交出所有粮食不是中共首创。1918 年，苏维埃政府曾发布《粮食专卖法令》，宣布不将余粮运到苏维埃收粮站者即为人民的敌人，然后以反革命罪名屠杀了大批保留余粮的农民。十几年后，中华苏维埃同样作法，成立了苏俄模式的粮食人民部，同样以武力强征农民余粮，以反革命罪名镇压保留余粮的农民，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以借谷之名，抢走农民全部余粮。此次建国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是苏维埃抢粮作法的延续。

在统购统销制度开始实施时，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淹没农田 5000 万亩，受灾民众 2000 万人。与千百年来朝廷在大灾中要开仓放赈，减免田赋的传统相反，中共在大灾中发布命令，要压低价格强征粮食，要求当年粮食出口量比上年再增加一半，规定农民只能以人均 300 多斤“不饥不饱”的标准留口粮，其余粮食一律按政府制定的超低价交公

粮。如此暴政使全国几亿农民都成了吃不饱的饥民，甚至成了饥荒中的灾民。1955年，农民吃树皮、草根、卖儿卖女、饿死人的情况在各地普遍发生，例如广西平乐、荔蒲、横县三县饿死人数以千计。[2] 农民对这样的统购统销暴政当然抵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写道：“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1954年底，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夜间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诉。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3] 对于农民的抵制与反抗，中共各地当局以“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名实施镇压。安徽凤阳县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总结》披露：“在7、8月间粮食收购中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受理案件68起，逮捕了38人”；在浙江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及统购统销中自杀了109人，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4] 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捆绑批斗拒绝低价卖粮的农民；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统购统销被逼自杀者111人。[5]

毛泽东不顾各地饥荒，继续要求加大力度征粮。执行毛的指示，陈云主持实行粮食定产、订购、定销（三定），扩大统购统销范围，将小杂粮和薯类（薯类折粮计产）也纳入了统购统销范围。他向各省传达毛的指示说：要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农民的反反对翻不了天，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6] 毛泽东、陈云说得没错，分散的农民有反抗之心，但无反抗之力，虽有“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之言，[7] 但在军队面前不堪一击，确实“翻不了天”。随后的情况是，政府将征粮指标越定越高，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

统购统销制度实施后，挨饿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谋生，低价强买粮食仍计划难以完成，于是中共出台了粮票制度，让农民无法进城生存。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一办法的要点是：只给城市居民发放粮票，不给农民粮票，市民买粮，饭馆吃饭必须凭粮票，私自买卖粮票为“投机倒把”罪行，轻者行政拘留、重者判刑。如此，没有粮票的农民进城没饭吃，农民进城谋生之路被堵死。毛泽东赞赏统购统销加粮票的管制农民制度，指示将统购统销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长期化。于是，为搜刮粮食偿还军火债的统购统销和粮票制度的权宜之计成了束缚农民的长期制度。这一制度将人民划分为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和吃“农业粮”的农民两个等级，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剥夺了农民进城谋生的自由，将农民绑定在本乡本土挨饿。三十年间，进城吃商品粮成为农村青年的梦想，没有粮票的农民无法在城里吃上饭的苦处让后辈青年难以想象。

合作化运动

建国前夕，毛泽东设想立即推行合作化，将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合作化的名义纳入共产党掌控之下，建立苏区、延安那样的军事化社会。斯大林不同意毛的设想，要求召开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缓行合作化。毛泽东不情愿地制定了《共同纲领》，同意了各界要求写入《共同纲领》的保留私有产权、私营经济等条款。虽然在政协上也举了手，但毛泽东并没有把纲领中的承诺当回事，仍想着迅速推行合作化。按他的要求，中共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这时，毛泽东遇到了党内不同意见。刘少奇主张遵守《共同纲领》，认为立即推行合作化有违《共同纲领》中关于保留私有制的规定，批评山西等地立即推行合作化运动的政策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不能明说《共同纲领》无效，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抛弃《共同纲领》，只好作出妥协。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其内容一方面体现毛泽东的合作化计划，要求在全国农村建立互助组，另一方面体现刘少奇遵守

《共同纲领》条款的意见，宣布合作化将十五年内完成，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入社农民可将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入股，各家保留土地私有权，土地协作经营、集体种植，按劳动贡献和投入土地数量分配，农民有退社的自由。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共在会后立即在全国农村推行成立互助组。经过土改，农村基层为中共完全控制，农民无力抗拒农村基层领导的要求，至 1952 年底，全国超过半数的农户被纳入了互助组。

1953 年秋，毛泽东召开了讨论应对“粮食危机”的中央会议，决定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看到，光有统购统销政策还不能达到完全控制农民和粮食的目的，在会上提出收不上粮食是因为个体农民不受控制，称“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毛泽东不再担心计划被否决，决定立即消灭自耕农，在会后主导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令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

农民不愿意丧失财产权，但在土改、镇反运动的威慑下无力对抗政府，只能加入合作社。入社后，农民的大牲畜等私有生产资料被低价充公，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农民将存款也交入合作社，称“刨私有根”。有些合作社向农民强借财产，归还期限由合作社决定，实际是无偿剥夺。农民被迫突击砍树、屠杀牲畜以减少损失。由于管理不善，合作社的大牲口大批死亡。1954 年 9 月，一届人大通过了与《共同纲领》内容相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而就在宪法出台的同时，侵犯私有财产权的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大牲畜减少了两百多万头。

1955 年 4 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会议。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各地合作化作法说：“连续三天三夜开会、强迫农民签字画押、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

实际不还”。他要求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规定的入社自愿原则，解散强迫成立的合作社。然而邓说了不算。毛泽东在 7 月的省市书记会议上指责邓子恢“砍掉一大批合作社的作法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看不到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来到，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不讲社会主义，满脑子资本主义”。[8] 被批后，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说，自愿，有偿，渐进的合作化原则是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委婉地指出毛在不久前曾举手同意上述原则。毛泽东从来不把举手通过的文件放在眼里，自认有权推翻任何决议，不仅否决邓解散合作社的指示，更要求农业合作社数量一年翻番。

10 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继续指责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声言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在地球上绝种”。中共党内高层表达不同意见通常不直说，而是借批评低层表达。八年前，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消灭富农的主张但不敢直说，借批评高岗表达反对意见，三年前，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立即合作化还是不直说，借批评山西领导人表达不同意见。此时，毛泽东反复批邓子恢，放狠话是同样套路，目的是让刘少奇收起反对意见。刘少奇靠拥护毛泽东上位，当然不敢正面坚持反对意见。于是，刘少奇不再提遵守《共同纲领》和宪法条文的意见。刘少奇以下的众高层更无人敢于提不同意见。会上，大家争相以批邓子恢右倾来向毛泽东表态效忠，248 篇发言中的 247 篇内容都是高调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资产阶级思想”、“投降主义”，而那内容不同的一篇发言是邓子恢的检讨，内容是“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痛责“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全党意见一致后，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这两文件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的“完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表从十五年缩短为三年，要求立即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会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子恢的农村部长职，下令各地快速合作化，实际是要求强迫合作化。经过土改，中共干部完全控制了农村和农民，中共中央决议下达后，

全国八成以上的农户在短短几个月内被迫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6月，全国人大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宣布合作化运动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

对于被迫入合作社的农民而言，初级社变身高级合作社意味私有的土地、果园、林木，耕畜、农具等私有财产都象征折价地被充公成了合作社的财产，自己实际变得一无所有，只能通过劳动参加分配。由于分配之权掌握在基层掌权者之手，政府承诺的分红被取消，入社时的私有财产折价失去了意义。农民不满被无偿剥夺，纷纷要求退社。1956年夏收时，各地农民纷纷以自收小麦、牵回自己的牲畜、集体请愿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时，政府不承认动员农民入社时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诺，拒绝农民退社，导致请愿农民殴打骗他们入社的基层干部泄愤。当年秋收后，农民要求退社的请愿浪潮遍及全国农村，其中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的请愿规模最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报告中承认：广东省已经退社的约7万余户，已有102个合作社垮了台；浙江仙居参加闹事的群众有两万多人，持续了两个月，百余干部被殴打，430户合作社干部被请愿农民抄家，个别地方的农民携带土枪、土炮上山，扬言要攻打乡政府。但是，分散农民不是政府的对手，中共以肃反运动的名义武力镇压请愿，将带头请愿的农民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甚至杀害。1956年底，中共宣布完成了全国农村的合作化，全国农户全部成了合作社社员。

农民在丧失土地和财产支配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当年，全国粮、棉、油产量和牲畜存栏大幅减少。作家赵树理在给中共长治区委写信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1957年春，全国农村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请愿要求退社的浪潮。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

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将全国反抗“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请愿活动一起称为反革命事件，称它们与城市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风潮都与匈牙利事件相联系，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要求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二次镇反）。根据指示，各地当局对农民请愿展开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请愿规模最大，遭受镇压也最惨烈。请愿的带头人被处决后，农民认识到，与政府的对抗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接受被剥夺的现实，服从政府。在 1958 年中共再推行人民公社化时，农民不再请愿，听任政府摆布，接受政府拆房、拆灶，听从政府编成军营，上山炼钢，成了“捆着挨打怎么都得受”奴隶。

合作化导致饥荒、暴动和武力镇压的脉络在青海、西藏表现得最为清楚。统购统销后，藏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搜刮，合作化运动给藏民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饥荒。在兴海县，1957 年粮食征购比例高达六成，油脂高达九成。[9] 在 1956 至 1958 年的饥荒中，西藏、青海多次发生数万藏民参加的武装反抗，暴动被军队镇压。[10] 其中，青海循化藏民的武装暴动规模最大，当局派出解放军两个团的军队镇压，打死暴动民众数百，逮捕数千，此即中共所称的“循化反革命事件”。中共青海省委在《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文件中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区六个自治州都先后发生了叛乱。”[11] 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2] 1958 年底，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自 1955 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解放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三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毛泽东在 1959 年 2 月 18 日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批示说：“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行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我们军事方面不

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平息叛乱”。半个月后，藏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暴动，中共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称镇压为武装平叛。其实，1959年藏人暴动的首要原因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合作化及其造成的饥荒。

合作化运动揭示出共产革命的骗局性质。共产党以剥夺富人财产分给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相号召，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在国共战争中的土改运动中，中共的代表性宣传动员是“解放后农民翻身，当家作主”。其实，中共从未打算让农民作自耕农，根据剥夺私有财产的基本宗旨，在土改运动前就决定好要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不是是否剥夺农民私产，而是何时剥夺，刘的主张不过是忍手十年、八年再剥夺。建国几年后，刘顺从了毛，中共发动了合作化运动，实施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剥夺，将全国几亿农民的私产剥夺充作了党产。

合作化还展示中共骗术之恶劣。鼓动农民加入互助组时，中共承诺土地入股，自愿互利，退股退社自由；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中共再次申明自愿原则和退社自由；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再三承诺：“社员退社时可以带走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全国人大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再四申明退社自由。入社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牲畜大批死亡，农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农民真的要求退社作回自耕农时，中共从中央高层到基层领导，在内部报告中一律回避退社自由的承诺，统一口径称农民要求退社为“闹事”、“闹社”，拒绝与农民对话，更拒绝退还农民私产。被禁止退社后，农民感到受骗，理所当然地找政府请愿，找当初欺骗他们入社的基层干部理论，结果中共称农民是要推翻共产党，是反革命，派军队武力镇压。从承诺财产权不变，退社自由的互助组阶段，到承诺财产权不变，退社自由的初级社阶段，再到财产权、分配权被剥夺，不准退社的高级社阶段，党和政府通过几步连环套，将农民原本的私有土地，分得的土

地，连同农具，牲畜等私产无偿剥夺。欺骗古来就有，但从未有过再三、再四承诺，然后拒绝对话，动武逞凶的骗局先例。

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显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空前专制。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朝代剥夺农民自耕和存粮备荒的权利。历朝历代，新统治者按例都会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而中共建国伊始不顾长期战争到处废墟，派兵到国外开战，以低价强买搜刮农民粮食以充战费，然后推出统购统销制度，剥夺农民存粮，卖粮的权利。毛泽东在建国前声言允许私有制存在几十年，在建国之初改称允许十五年，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动手偿剥夺农民私产，三年就消灭了自耕农。这就是中共宣传的“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多年后解密的档案显示，合作化运动中，中共内部往来文件中充斥申请与批准镇压反革命，捕人、枪决的内容。人们这才知道，那几年中出现的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无关，无非是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暴政的抗争者，其中主要是因为挨饿而抢粮，要求退社而取回私产的农民。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中剥夺的人民私产成了用之不竭的党产，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农民的私有土地。几十年后，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农民当年入社的土地成了政府手中的金山。当年被剥夺的地主和农民已经离世，他们的后代也追索无门，在后来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价值百倍上涨，土地增值成了政府的大金库。为了维护党产合法性，中共也不可能否定毛泽东。

合作化运动不仅带给农民灾难，还留下了土地与环境的灾难。由于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承租权和使用权是暂时的，人们争相对土地掠夺式经营，破坏环境。欧美国家草场、森林、果园得以保持富饶美丽，主要原因不在自然，而在产权私有。中国在合作化运动后的五十年间全国耕地大量减少，环境迅速恶化，主要原因也不在自然，而在人民失去了私有土地产权，在于政府作恶。

第 43 章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运动

加入朝鲜战争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一多半的军费负担将全国拖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供应志愿军军需，高岗在东北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运动的要点不是开源节流，增产节约，而是复制当年苏维埃国通过“打土豪”，“查田”运动搜刮民财以充军费的作法，将连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归咎于有人贪污、破坏，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抓贪污分子，挖出钱财以充军费。国共东北开战时，毛泽东对高岗领导的东北暴力土改极为赞赏，将东北土改经验推行各解放区。在全国财政危机中，毛泽东对高岗的三反运动同样赞赏，指示部署反贪污运动。根据毛的要求，政务院在 1951 年 12 月的第 114 次会议上提出了反贪污要求。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报告中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中贪污者占 28%，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 40%，共贪污 53 亿（旧币），平均每人 106 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伪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总理周恩来在讲话要求：“发动群众互相检讨，然后再上下检讨，把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开展起来”。

[1] 年底，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将东北局搞的三反运动推行全国。他亲自部署“打老虎”写道：“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打虎要有一套

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队，向大小老虎突击。"[2] 他要求各级干部在三反运动中“人人下水洗澡（接受审查）”。

与发动镇反运动的情况一样，毛泽东对各地未能立即掀起三反运动高潮不满，于 1952 年 1 月再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限各地在十天内开展运动。在毛泽东推动下，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各级组织照搬延安整风的套路，命各单位停止日常工作，集中开会到半夜，甚至通宵，召开群众大会，安排积极分子在会上检举，动员被检举的人员上台坦白及揭发别人，根据揭发检举抓贪污犯（打老虎），将所有与理财沾边者和留用旧职员列为“老虎”嫌犯，隔离（关押）审查，采取各种办法迫“老虎”嫌疑者承认贪污，揭发他人以自保。经过怀疑——坦白——揭发的整人程序，“老虎”越打越多。毛泽东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升温：发指示说：“……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3] 提出了“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打老虎指标）”的“三反运动八字方针”；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打虎百分比指标”，要求各地将“打虎”数字要汇总上报。在中央指标压力下，各地层层实行“自报公议”，规定“打虎”指标（打老虎预算），各单位负责人亲自主持“打虎”，按限期上报“打虎”成果。

按照毛泽东“不论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老虎”的说法，所有单位必须要“打出老虎”才能交差。对具体单位来说，中央的压力实际是要求没有“老虎”也要无中生有。科学院原本是清水衙门，并不经手多少钱财。在中国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上，院长郭沫若号召：“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物理学家严济慈抗战中因帮助美军解决技术难题拿到了一笔酬金，抗战胜利后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套房子，在运动中被揭发贪污，成了打虎对象。大家都知道运动要挖出些钱财的道理，结果严将那套房子缴公得免处分。[4] 清水衙门尚且打到人心惶惶，经手钱财多的单位和经办人可就惨了。

三反运动打出的最大“老虎”是前后两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是真“老虎”，在进城后一年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 172 亿元(旧币)，吃喝嫖赌兼抽鸦片。二人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挥霍是因为他们掌管着中共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机关生产”始于延安。二战中，苏联减少了对延安的财政支持，陕甘宁边区只好以种贩鸦片、走私日货、贩伪钞等办法供养军队和庞大的中共机关。[5] 中共将这些以非法手段赚钱的活动称为“机关生产”。在陕甘宁种贩鸦片的同时，中共东北、华北、华中的等地的地下党、情报系统和军队也各显神通，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为党筹集经费的经营性“党产”公司，其能量和背景远远超过民间私营公司。由于这类经营活动涉及资金日益庞大，为了保密又不设明账，中共指派最信任的干部负责“党产”经营。例如，曾山奉命创办了华中贸易公司、利丰棉业公司、华中羽毛猪鬃公司、鸿济外贸公司、大成贸易公司等“机关生产”公司。抗战胜利后，中共机关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先后在大城市开办了上海贸易公司、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关东实业公司、大连建新公司等党产公司。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的“机关生产”却得到大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机关均热衷于“机关生产”，截留财政的收入，设立小金库，安排机关的福利，小金库规模动辄百亿、千亿计（旧币），如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腐败在中共“机关生产”掌管人中是普遍的现象。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决定枪毙河北抓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以扼制“机关生产”和“小金库”，中共颁布了《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港、澳以外的所有“机关生产”，要求各级“机关生产”交出小金库，帮助中央财政填窟窿。在随后几十年中，中共宣传毛泽东批示杀刘、张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以证明中共廉洁。实际上，毛泽东杀刘、张只具宣传意义，与扼制腐败、特权无关，更与廉洁无关。因为明摆着，毛泽东自己坚持要住皇庭，是最大的腐败，杀刘、张是要制止“机关生产”的小金库，以保他自己的大金库。不仅毛泽东一人腐败，高层都在腐败。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城工部部长刘仁就在忙于为

进城的中共高层选定王府、豪宅。进城后，中共论功行赏，瓜分王府豪宅。与高层们相比，刘、张那点小金库钱也不算什么。

经过半年的运动，各级政府的《打虎计划报告》，《打虎预算报告》，《打虎新预算报告》，《打虎成绩报告》被层层汇总，上报中共中央。虽然各地基层已经搞到逼出大量自杀事件，毛泽东对汇总的打虎数字仍很失望。他意识到，从享受供给制的干部、财务经办人员中打出再多“老虎”也搞不出多少钱财，机关中的三反运动对填补财政亏空帮助不大。他决定，结束以中共干部为斗争对象的“三反运动”，主推向工商业者开刀的“五反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年底宣布“三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由于整个运动无中生有，定案也就谈不上法规，只是随意处置，留下大量冤案。

五反运动

毛泽东喜欢战争不断，运动不断，在发动镇反运动、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的同时，他于 1952 年 2 月初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动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五项罪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宣传中称为“五毒”。针对工商业主的五反运动自然以上海为中心。执行中央指示，上海当局采取了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副市长潘汉年作了“五反”动员报告，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大公报》根据运动要求刊登了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向抗美援朝前线提供劣药，贿赂国家机关干部抵充合格商品的诬陷报导，宣传“上海不法资本家犯下罪恶”；[6] 陈毅市长作了题为《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彻底胜利而斗争》的广播讲话，要求资本家在抗拒政府和坦白宽大之间作出选择。

王康年案是最能说明五反运动本质的案例。“大康药房”只做零售，所有药品都是从药厂进货而来，自身并不可能制假。然而，上海当局为推动运动，

在没有查出制假药厂，没有受害志愿军作证的情况下将 29 岁的小业主王康年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了。枪决背后的真相是：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要求“捐飞机大炮”，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拒绝了干部的要求。随后，解放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赊购三亿多元（旧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王康年恳求说，军方已两次赊购药品，所欠五亿多元（旧币）药款未付，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军官训斥王，强令发货。王拒绝勒索，被当局认定为是抗拒政府的典型。五反运动开始后，中共党组织安排工会人员揭发王偷漏税收，私套外汇。国民政府时代，上海工商业者做生意，换外汇进货是必须的。至于税收制度，旧政府和改朝换代时都处于混乱中，偷漏税收指控让任何商人都洗刷不清。王康年对天发誓，百口莫辩，以自杀讨清白。自杀未遂，他被潘汉年副市长在五反运动动员讲话中指为是“资本家不法”的典型，《解放日报》跟进诬陷说：“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他骗取志愿军某部的定货款三亿多元，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遭细菌感染身亡。”运动中，没有人会要求当局提供指控证据，当局之词就是罪证，王被逮捕入狱。连续刑讯折磨下，王康年招认所有被控罪名以求速死，随后被大张旗鼓地公审后枪毙，王妻追随服毒自尽，“大康药房”被政府没收。 [7]

图片小业主王康年被逮捕枪毙

图片上海资本家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与土改运动、三反运动一样，五反运动的背后是当局的谋财计划，其步骤如下：

派工作队：

这一步骤照搬自暴力土改运动。很多地方直接将土改工作队原班人马改称三反运动中的打虎队，再改称五反工作队。工作队进驻工商企业后，沿用

土改运动“扎根串连”的套路，找最穷的工人作为基本群众，将他们培养为斗争骨干；

诉苦揭发：

煽动工人仇恨业主，展开“谁养活谁”，“工人要当家作主”的宣传，动员工人、店员诉苦，鼓动工人，店员揭发检举厂主，店主有“五毒”行为，鼓动工人、店员诬陷老板，对于不愿揭发老板者施以政治压力。上海当局宣布：“鉴于过去某些不法资本家为了便于达到自己行贿、暴利、盗窃、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于店员、职员、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额外津贴、多分红利等），或曾利用店员、职员、工人之手去进行非法行动，故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政府保证不追究这些店员、职员、工人”。为自保，工人、店员们纷纷按照指引揭发、陷害、栽赃老板。运动中，当局控制报纸大量刊登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工厂经理、商店经理、商店老板、行商掮客的“五毒罪行”，以及资本家被逮捕的报导，[8] 公然煽动工人、店员迫害工商业主。在当局和报刊煽动下，批斗工商业者的浪潮席卷主要城市。在上海，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在批斗大会上被逼低头长跪；大可颜料厂副经理盛稼在工人长时间的批斗中昏死过去，醒后继续斗；[9] 一些商店密集街道，店员们建立起宣传站，每天以话筒广播训斥店主们；[10] 在当局鼓动下，工人、店员向厂主、店主“算几十年的剥削账”，提出不断加码的工资待遇要求，要求资方吐出“多年的剥削所得”；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拍着桌子命令老板说：“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刘念义上前调解，被数百工人批斗，险些丧命。[11]

经历长期接战乱，大多数厂商处于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借贷无门。在建国时的经济危机中，绝大多数工商业主在勉强维持。五反运动中，业主们承受不了工人、店员漫天要价地“算剥削账”打击，纷纷决定停产、停业。业主关门造成包伙制员工失业没饭吃。于是上海市军管当局下令，禁止企业

在运动中停工、停业、停薪，工商局在运动中不得受理企业的停业申请。新中国当局欺压百姓之恶前无古人，在乡下不允许农民存粮备荒，在城里发动运动搞到工商业者维持不下去，还不许停业，停产、停业，违者获罪。老板们不敢对抗军管令，只得贴钱维持企业。例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开支最低要 170 万元，老板只得一面向菜贩赊小菜，一面天天跑到工商局去申请停业；[12] 大中机器厂老板开不出工资，董事长胡厥文被工人围困无法脱身；[13] 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了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围困在楼上，董事会被迫连续开会两天之久。[14]

查“五毒”：

中共所谓的五毒都是随意罪名，任何生意场上经营活动均可被指为“五毒”。例如，关于偷税漏税，政府要求由开业日算起，补交税款。对众多企业来说，如此要求意味补税须从民初甚至清末算起。当局并非不知道，中国从无严谨的税收制度，在长期兵荒马乱，政局动荡中生存下来工商业者们不可能提供齐全的完税证明。关于行贿，抗战胜利后，购买日伪企业过程中，行贿是免不了的。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坦言，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情况在业内是百分之百，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存在着三百多种不法行为。可以说，当局所谓的“五毒”，每一条都是“口袋罪”。运动主持者向商家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政策，要求揭发客户或往来商家的经济、政治问题。高压之下，为自保，商家只好揭发检举往来商家交差。经过互相揭发，工作队掌握了几乎所有商家的所谓五毒证据；

要求坦白：

掌握“证据”后，工作队上门要求工商业主交代问题，召开批斗会。没经历过残酷斗争工商业主们通常惊慌失措，在批斗会上说话结巴、浑身发抖，

甚至小便失禁。工作队警告工商业主们说，凭已掌握的证据，已可判你徒刑甚至死刑，现给你自己坦白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工商业者们无法证明自己没有五毒，无从了解工作队掌握的底牌，不敢担保自己没有五毒，知道坚称没有五毒是死路一条，只好承认自己有五毒。承认之后，他们成了罪犯，被长时间隔离交待问题，疲劳审问，恐吓，“坦白交待”被工作队一再驳回，被斥说话不老实。工商业主们被迫将行贿、偷税、漏税的金额不断加码，很多人最后精神崩溃到你说多少我都承认，自己将“五毒”金额加码到倾家荡产。

罚款、补税：

五反运动最后的步骤是运动的目的——收取工商业主缴纳的罚款和补税。很多工商业主挺过以上步骤，在这最后关口却承受不住被勒索到破产的打击。

私营工商业主们承受不了批斗屈辱，承受不了多年相处的工人、店员的诬陷，纷纷自杀。一代船王卢作孚是工商业主自杀的典型一例。卢在抗战中指挥了宜昌大撤退，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率船队从香港驶回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内地不久，他最信任的一批公司要员在镇反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枪决，他的公司被指有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五六十个之多。

[15] 镇反运动的打击还没结束，五反运动又来了。在“五反”动员大会上，跟随多年的亲信员工在工作组的动员下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卢承受不了接连的打击，在会后自尽。

被敲诈破产比店员诬陷更难承受。对于商人来说，商号是他们的生命，是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经营不善致生意破产还不至于让人想不开，但因自己一时恐惧，几句话就将商号葬送的劫难让他们无法承受。于是，工商业主们纷纷选择自杀以求解脱。一位亲历者记录五反动运动写道：“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

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派干部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有一天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队长到我房间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

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16]

随着五反运动在各地展开，工商业者自杀潮席卷全国。在运动的重点城市上海，商人被迫缴的款项最多，受害最烈，自杀者也最多。一时，跳楼、跳江、触电、服毒、上吊的事件遍及大街小巷，安眠药片和棺材断货，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竟出现三五人同时悬死的情况。大多数自杀商人选择跳楼。因为他们知道，跳江、蹈海不见尸体，属于失踪，会被当局怀疑为外逃，亲属会成为通敌家属受到长期牵连。例如，老字号冠生园创办人被诬“五毒”，不堪侮辱逼供，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当时，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不让家属再受牵连而痛责自己，歌颂政府、歌颂共产党。[17] 由于跳楼自杀者众多，行人不敢走高楼之下，担心被跳楼人砸死。上海军管会轻松地将每天上演的跳楼自杀事件称为“空降部队”，陈毅市长居然每天询问当天“空降部队”数字。应对自杀潮，上海当局派兵巡逻，不准行人在公园及僻静处逗留，在黄浦江岸偏僻之处，筑竹笆，在各马路高楼顶上设岗，在三层以上楼窗装木栏或铁丝网。上海的自杀潮如此，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等地情况相当，城市中工商业主自杀潮与农村土改中地主自杀潮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自杀潮。亲身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自杀者约有三十万人。

五反运动造成过半工厂商号关门歇业，全国市场一片萧条，城市失业严重。在上海，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形势比 1950 年初国民党飞机轰炸时更加恶化。由于运动使全国供销社系统瘫痪，各地农村的生产也陷入瘫痪，全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各地党政大员及各界的诉苦、告急报告，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五反运动勒索的钱财不足以弥补摧残经济造成的损失，三反五反运动未能填补财政亏空，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决定停止三反五反运动。当初他严令限期发动五反运动，在全面危机中，他转而严令限期结束运动。195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宣告“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抓出“老虎”十多人，判刑万余人。虽然这时毛泽东下达的“打虎”指标和搜刮指标还远未达到，但政府搜刮到手的罚款、补税款额已经极其巨大。

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共在城市展开的“打土豪”运动，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通过五反运动，中共将清末新政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私营工商业基本被摧毁，将私营金融业彻底消灭。翻开运动期间的报纸，资本家五毒俱全的文章充斥，但残酷迫害工商业者，逼得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百万私营工商企业破产倒闭的灾难却不见报导。五反运动几年后，中共推出了描写民国工商业者遭遇的话剧《茶馆》和电影《林家铺子》。《茶馆》的作者老舍很清楚，即使在长期战乱中，工商业仍能生存、发展，个别业主破产自杀是有，但从未发生自杀潮；官府敲诈商家有，但从未有政府同时敲诈全国商家的事。在他创作《茶馆》时，数十万工商业主被逼得自杀，百万商家被逼得倒闭。但他不能描写正在发生的苦难，而只能按中共的要求，谴责“旧社会”，歌颂“新社会”，写“旧世道逼死王利发”的故事。1930 年代描写了工商业者遭遇的茅盾在数十万工商业者被逼死时也沉默了。不仅老舍、茅盾在 1950 年代不能描写五反灾难，五反运动六十年后，仍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描写工商业者们在“捐飞机大炮”和五反运动中被敲诈勒索的苦难，运动的死难者仍未得到纪念。

公私合营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刘少奇在天津发表了一系列安抚资本家的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新政协会议上，中共主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在其中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国家资本与私人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于《共同纲领》中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定，少数工商界代表坦言，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的存在不应取决于中共的政策，纲领应当表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夺私有财产，当然不会同意工商界代表的要求。代表们反复询问中共，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期到底多长，是否几年后随着中共政策的改变，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会被剥夺。对此，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吧。”然而，仅过了半年，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改口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这时，刘少奇继续鼓吹保护私人资本，宣称《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只要“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但主持东北的高岗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

1950年12月，政务院根据《共同纲领》和刘少奇的主张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在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后，私方股东所得不少于盈利的60%。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主张和政务院的条例极为不满，以抬高岗的办法打压刘少奇。1952年9月，毛泽东在“五反”运动中提出“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根据

毛泽东的要求，政务院又推出了“四马分肥”条例，规定所得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三马”要占企业总利润的四分之三，私营股东这“一马”最多只可享有利润的四分之一。如此，中共在建国仅三年后就推翻了《共同纲领》中保私人资本的规定，要求强权剥夺私营业主一多半的权益，政务院以“四马分肥”条例实际上废弃了自己刚刚颁布一年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正当毛泽东打算立即实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发动的五反运动造成一半工商业停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党内高层一片反对五反运动声音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宣布结束五反运动。为恢复经济和解决城市中出现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安抚工商业者，声称中共将遵守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剥夺资本家”的承诺，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为应付经济危机，毛泽东暂时默认刘、周的政策，暂时搁置全国剥夺私营工商业的计划。刘、周保护私营企业的政策见效，私营工商业在五反运动结束后出现复苏，经济危机得到缓解。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有了作世界共运领袖的打算，要求迅速掌握苏联那样的军事力量。为此目标，他要求立即剥夺私有财产，控制所有人财物，实施他所谓的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控制全国所有资源服务其快速军事工业化的目标。1954年，毛泽东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政策，指责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当年，通过先“抬高打刘”，再“抬刘去高”驯服了刘少奇，迫使刘少奇、周恩来抛弃提保护私营经济主张，表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得刘、周表态支持后，毛泽东着手发动对私营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内两次邀请在海外有影响的大资本家到中南海座谈。“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挥勒索迫害工商业者的同时，吩咐保留一些有影响的大资本家不予为难以作“统战”橱窗。这种安排与镇反中将旧政府、军队基层人员规模屠杀但保留一切有海外影响的高层不予为难以作统战橱窗是同样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于1952年3月公布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

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上海当局得令，将荣毅仁等几十位大资本家指定为了基本守法户。毛泽东对上海当局的决定不满意，指示将荣等定为完全守法户。此时，毛泽东邀请来座谈的正是安排特别保护那些大资本家。座谈中，毛泽东首先要求资本家们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威胁说“对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要展开批判斗争”。座谈后，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向成员传达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决定。经过“五反运动”和肃反运动，工商业主们已经感到买卖没法做了，明白了须在新政权治下低头的道理，一致表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随后，中共宣布废弃五反运动中颁布的“四马分肥”条例，规定以“定息”方式赎买资本家的私股，规定赎买分“自报公议”与“定息赎买”两步进行。这里，“赎买”只是政府无偿霸占私产的好听说法。因为，政府，即时称的“公方”，不出一分钱，只是强权宣布企业的多数股权为“公股”，以“公股”应得的企业利润去“赎买”私营业主的股权，从私营企业的利润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定额利息（定息）支付私营业主，几年后即赎买完毕，私人企业即被充公。中共规定的自报公议作法为：先由政府组织人对私营企业的资产按国务院1956年2月8日公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点，然后让私有业主自估、“自报”其股份价值，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决定，即“公议”。

评估私股价值的过程完全由政府操控，在肃反运动的威慑之下，所谓自报不过是让工商业者在要钱还是要命之间选择。私营业主们知道与政府讲价可能被视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知道王康年拒绝勒索送命的前车之鉴，纷纷选择破财免灾，少报私股价值以表示接受改造。参加评估的公方代表既是买家，又是评估主持人，手中握有将卖家定为“抗拒改造”的权力，工人代表为公方代表指派的运动“积极分子”，私股评估完全由公股代表，即政府说了算。经过如此的“自报公议”，全国企业私股估值总额仅二十四亿元，不及公正价

值的十分之一，私营企业九成多的权益就这样成了政府所有。资产评估后，政府将私有企业剥夺，承诺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支付一笔固定的利息（定息）来赎买私有业主的股权。政府规定赎买定息率为年息 5%，支付期定为二十年。私有业主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申诉仲裁无门。如此，政府作为“买家”，自己对企业估值，定价，自己决定定息支付的息率，用私营企业的利润买私营企业的企业股权，自始至终不花一分钱地霸占了私营企业，约 86 万私营业主成了定息领取者（十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政府背弃承诺，停止了定息支付）。

按中共的说法，政府将私有企业剥夺后即实现了“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批准 35 个工业行业的 3990 户工厂和 42 个商业行业的 13973 户店商公私合营。1 月 15 日，中共召集一万多工商业主和二十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同仁堂老板，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乐松生代表北京市药店 327 户私营业主向毛泽东、刘少奇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市长彭真宣布：“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上海，全市各行业 2500 工商界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集会，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等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陈毅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递上公私合营申请书，经陈毅签字盖章批准，全市工商业行业的十万户企业宣布公私合营，上海市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其它城市跟随京、沪也进行了“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政府都组织大规模游行，庆祝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工商业主们“白天敲锣打鼓”向政府报喜，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晚上抱头痛哭”，哀号几代人的积累被一朝剥夺。代表北京私营药业献上喜报的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的苦处是私营业主们的代表。他带头把家族企业和祖传秘方献给了中共（在次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以积极批判右派方式成功自保。但在十年后的文革中，他及妻子、老母一起被中共害死）。1956 年中，中共宣布全国的私营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至此，中国 800 万私营企业被政府无偿霸占。无数在建国前本打算转移资

本外逃，但听信了中共“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将保护私人资本二、三十年”的保证留下来发展的私营工商业者丧失了私有企业，甚至丧失了私有房产，沦为了城市贫民。

1957年1月，上海工商业主，上海人大代表李康年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政府按照官方公布的评估总额减除1956、1957年两年定息发行22亿元分18年兑现的存单，用存单赎买私营企业。这一提案的意思是政府“以资本家的钱来赎买资本家的股权”不合理，应发债借钱来买资本家的股权。李康年这一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要求在当时的人大会上遭到了围攻。中央政府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带头批判李康年，其理由竟然是李的提案会增加国家负担，称“李康年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让今天的国人难以想象的是，“买东西要花钱”、勤劳致富等的千年公理在新中国之初即被颠覆，中共任命的人大代表们对李康年要求花钱买东西的提案展开围攻，为政府无偿霸占张目。在几个月后“大鸣大放”中，李康年撰文写道：“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共同纲领订立于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18]李实际在质问，作为临时大法的共同纲领怎么可以形同虚设，政府怎么可以随意颁布条例践踏大法。几个月后，李康年因其提案和发表反驳文章被划为了右派分子。

王康年、李康年，两位康年代表了工商业者的苦难，代表着那个年代道德、良知和正义的抗争。而一些带头将企业献给政府的工商业者代表着中共的剥夺部署。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将荣树立为守法户典范，工商业改造运动中，荣的带头提出将企业交给政府，高调支持改造运动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9]中共再将

荣的这番话广为宣传，作为工商业者自愿交出私产的指引。五十年后，当中共在悼词中称荣为“共产主义战士”时人们才知道，荣老板早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造成此后三十年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二十多年后，在经济崩溃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请回私营经济、市场经济，打开“社会主义改造”加给国民经济的枷锁。这就是 1980 年代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中共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搞活了经济，造福了国家、人民，而不提“社会主义改造”祸害了国家和人民二十多年，给中国带来长期的贫困落后。其实，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系铃解铃，还原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有经济。有了私营企业、私营经济才有了经济的活力和腾飞。在请回私营经济的同时，中共坚持当年剥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要和正确，其理由很简单：今天由中共支配的“国有资产”，也即党产，主要部分是建国之初以“三大改造”名义无偿剥夺来的私产，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改造非法，不仅带来退赔私产的头疼问题，还会暴露党产的原罪。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苏俄赤化中国带来的灾难。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官府剥夺工商业者，霸占民财的灾难在满清时没有，在北洋政府时代没有，在日据的台湾、满洲没有，只有作为赤化产物的广州国民政府和中共新中国治下才有。国民党对苏俄决裂的重要原因是反对暴力剥夺私产的赤色革命。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蒋介石在台湾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营商业，保护私人资本正常营商的环境，带来了经济腾飞，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尊敬。

第 44 章 反右运动

“引蛇出洞”

在中共实施无偿剥夺私产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要求退出合作社、城市市民请愿抗议失业的浪潮遍及全国。毛泽东拒绝改变政策，称农村中反对合作化运动的“闹社”，城市中反对公私合营请愿和胡风批评共产党言论互相呼应，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他决定运用他在延安整风中用过的“引蛇出洞”办法，号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对共产党政策不满者发表批评意见，然后实施整肃。1956年5月，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开始引诱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开放，还有几种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根据毛的讲话，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文联的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国几年来，中共的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红楼梦》、“抓小胡风”、肃反等整肃运动没有断过，知识分子们充分领教了中共整肃运动的恐怖，没有人相信“百花齐放”鼓动。

这时，东欧民众掀起了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浪潮，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请愿，匈牙利举行了华沙人民起义。华沙起义者推倒了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像，焚烧马列书籍，占领广播电台，播放反苏声明，向西方世界求援，改革派领袖，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上台重组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呼吁联合国支持匈牙利人民的选择。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积极地要求镇压匈

牙利人民起义，指示秘密访苏的刘少奇、邓小平促请苏共出兵匈牙利武力镇压，帮助赫鲁晓夫作出了武力镇压的决定。[1] 在苏军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后，毛泽东再派周恩来到布达佩斯，向匈共表达中共支持镇压立场。[2] 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消息鼓舞了中国城乡反抗“三大改造”的勇气，请愿者们喊出了“来一个匈牙利”的口号。年底，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应对，访苏归来的刘少奇在《目前时局的报告》中提出调整政策缓和民众不满。毛泽东拒绝改变暴力剥夺民众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同时继续实施“引蛇出洞”策略，在讲话中称：“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高层们对各地的抗议、请愿浪潮忧心忡忡，对毛泽东鼓吹允许罢工，鼓动向共产党提意见感到不解。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向党内高层透露“引蛇出洞”计划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国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3]

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完全另一套说法，再次号召各界“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根据毛泽东的

策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大鸣大放”的举措：《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号召提意见，声言“目前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4] 周恩来在题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中号召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各界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用民主方法处理“党群矛盾”；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邀请民盟领袖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到中南海开座谈会，动员“大鸣大放”，保证中共“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绝不秋后算帐。在布署大鸣大放的同时，毛泽东运用延安整风套路，成立了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第二次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任命邓小平、彭真任正副组长，以运动名义架空了政治局，迫使刘少奇、周恩来向邓小平的领导小组汇报工作。

中共中央“大鸣大放”鼓动还是没有获各界的积极响应。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们清楚胡风因言获罪，被打成了反革命，知道批评共产党可能被加上反党、反革命罪名，除少数人试探提些意见外绝大多数人沉默。针对各界不敢提意见的情况，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内部指示，要求整风领导小组加大力度鼓动各界“大鸣大放”，放胆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要求组织报刊刊登引所提意见以造“大鸣大放”的声势。根据指示，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指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九大城市召开了上百次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工商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卫生界的知名人士出席，动员“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执笔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呼吁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的整风。

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经不住中共一再的鼓动，开始在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批评言论被各大报迅速刊登出来，吸引了更多人发表批评意见。各界的

批评意见主要围绕反对剥夺私有财产权，质疑“胡风反革命集团”罪名，要求追究中共几年来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责任等等。通过在全国各地数百次座谈会，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收集了近四十万条批评意见，将意见汇编为《情况汇报》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冈山？”同时，他在《走向反面》一文中写道：“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6] 当毛泽东准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走向反面》一文作为“收网令”时，邓小平建议说，“大鸣大放”正在兴头上，收网为时尚早，建议将文章改名，不在《人民日报》发表，而在最高层中秘密传阅，逐级扩大传阅范围，慢慢作“收网”准备。毛采纳了邓的建议。

5月15日，邓小平将《走向反面》一文改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和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传阅。同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指示中部署准备整肃的比例说：“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 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 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 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 10%”。随后几天，邓小平一面将毛泽东的“收网令”文章逐步扩大传阅范围，先扩大至中央委员、再十级以上高干、再十七级以上干部，一面指示全国整风领导机构加紧收集“反右斗争”的定罪证据。邓小平指示各地领导说：“现在的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晚了就收集不到了”。[7] 时任《文艺学习》杂志负责人的黄

秋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18日，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串门，邵接一电话后脸色苍白地说：‘周扬来的电话，转了！’随即匆匆出门开会。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8] 运动实际情况的确如黄秋耘所言，数十万知识分子在中共秘密传阅“收网令”时加入了“大鸣大放”，成为毛泽东所谓的“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出洞的蛇”、“出洞的蚂蚁”。

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五一九社论）继续推动“大鸣大放”。几个月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曾到北大动员向共产党提意见，向师生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要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共产党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除三害）”。陆的讲话没有在北大掀起“大鸣大放”高潮。然而，在《人民日报》五一九社论发表的当天，北大学生掀起了民主运动（五一九运动）。几天内，学生们贴出了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包括：质问北大团委，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要求取消大学中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实行大学校长独立负责制；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要求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要求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批判中共中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等等。学生王书瑶在题为《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中指出：“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学生谭天荣、张元勋等人发起成立了“百花社”，并立即油印刊物《广场》寄往各地。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学生辩论会上演讲说：“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毛主

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

与北大的民主运动同时，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在演说中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她准确地预言了政府将农民存粮全部统购走将导致大饥荒。对于“高饶事件”，她指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在中共高层秘密传阅毛泽东的“收网”文章期间，“民主党派”们真正开始了“大鸣大放”。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构想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他以各党派都有权设计中国的政治道路和政策，有权“轮流坐庄”的提议婉转地要求打破一党独裁；罗隆基针对中共在建国后短短几年中大规模屠杀地主，国民党军政人员，逼死大批工商业者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暗示应追究中共背弃《约法八章》、《共同纲领》和宪法的屠杀、剥夺的责任。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委员会，接受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受害者的冤屈申诉，并明确要求平反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主持机构分开。[9] 罗的平反机构须与整肃运动主持机关分开的主张富有远见，揭示出执政党不可能追究自己的道理。二十多年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条款体现的正是罗的道理，只不过在一党专制下回避只能局限于刑事；储安平抨击“党天下”说：“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毛主席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10] 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联即国家’是不容许的。……搞得不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11] 座谈会中的其它意见包括：中共党委应退出学校、农民生活困苦、苏联对中国不友好、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等等。

收网

5月下旬“大鸣大放”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将葛佩琦在大鸣大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删改编造，断章取义，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将葛的“载舟覆舟”老生常谈发言宣传为了“杀共产党人”论。葛读报后抗议报社篡改原话，要求更正。邓小平主持整风领导小组，拒绝葛的更正要求，将编造出来的“杀共产党人”论用作在全国镇压右派的借口。结果，葛佩琦成为最早落入陷阱者，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代表人物，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无期徒刑。逮捕葛后，中共在全国报刊上掀起声讨“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运动，开始了预定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行动。

6月6日，邓小平向中共各级机关秘密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匿名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在社论中将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举行的“大鸣大放”座谈会定性为“右派分子策划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活动”，称民盟“利令智昏”，“企图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通过6.6内部指示和6.8社论，毛泽东、邓小平正式下达“收网令”，将运动从“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阶段转为“聚而歼之”的“反右”阶段。已经传阅“收网”指示的中共各级组织闻风而动，对“大鸣大放”者展开了清算。

6月10日，毛泽东发出党内通报，在其中说：“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6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再发表匿名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社论中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

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布署全国反右运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一面要求北方各地开展“反右”，一面要求南方当局、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继续收集“右派言论”，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

对中共出尔反尔，设局陷害的行径，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骨干们展开了抗争。学生谭天荣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一文中直指“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学生陈奉孝在大字报《如此伎俩》中谴责：“反右运动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学生的抗争遭到当局镇压，北大“五一九运动”中贴出大字报、小字报、组织“百花社”的师生中有1500多人被逮捕，北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创办的《广场》杂志随着主要创办人被逮捕在创办仅一个月后即夭折。这唯一的一期《广场》反映出了当时青年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民主党派”中的整风与反右

被毛泽东点名抨击后，民盟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组织盟员揭发、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民盟高层明知章、罗二人素来不和，不可能结盟而只管胡乱开展“批判章罗联盟运动”以向中共表态效忠。6月25日，民盟中央再发《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宣布成立由沈钧儒和胡愈之领导的整风领导小组，要求根据中共宣布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批判和揭发盟内右派言论。盟友们和章、罗原来的支持者们纷纷与章、罗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揭发二人以洗清自己。被毛泽东的《不平常的春天》社论批判的民盟常委费孝通发表了题为《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为在“鸣放”中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谢罪，表示“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对罗、章反戈一击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

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章罗反党联盟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其它几个“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也赶紧以反右行动争取中共宽恕他们的“大鸣大放”言论。顿时，各大报刊上“大鸣大放”的文章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参加者们的认罪检讨文章和对“右派”的谩骂文章。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检讨文章有：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讨》、陈铭枢的《自我检讨》等等。长期反蒋不低头的龙云、陈铭枢等将领在中共统治下成了检讨者，这是几年前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想不到事。

报刊大量刊出谩骂文章是新中国一大特色。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喜欢此道。毛捧鲁迅的原因之一是鲁以谩骂见长。建国后，毛泽东将《人民日报》办成了谩骂园地，以评论员、编者名义对文艺，思想、教育界名家展开精神迫害，使谩骂成了报纸主流风格。知识分子们、艺术家们、民主党派们逐渐领悟，不谩骂就不能让当局满意，纷纷以骂自己和骂别人来表态效忠。于是，反右运动中出现了谩骂文字的竞赛。例如，《人民日报》刊出的有：《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设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等等。知识分子、中共宣传干部们争相以恶毒谩骂让运动主持者满意。

“民主党派”反右的共同特点是互相陷害。反右开始时，章伯钧在检讨中说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12]，以积极批判储安平自保[13]；史良向周恩来揭发章伯钧的私下牢骚话；剧作家田汉积极揭发剧作家吴祖光有右派言论；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许德珩、何香凝

（侨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长）、胡子婴（商业部副部长）、胡愈之、朱蕴山、高崇民、邓初民等“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反右讲话、指示和文章比中共反右更极端、更激烈。[14]“民主党派”的积极反右未能让中共对他们手软，长期公开或暗中为中共效力的“民主党派”人士、“民主人士”们在“大鸣大放”后惨遭整肃。其中，民盟中央成员的三分之一被划右派分子。

“民主党派”反右中受害者中包括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暴动领导人谢雪红。国民党镇压台共暴动后，谢雪红奉中共之命到香港组建了自任主席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致力于迎接中共“解放台湾”。1949年，中共安排台盟代表团出席了政协会议，认定台盟为合法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并安排谢出席开国大典，站在毛泽东近旁以表达“解放台湾”的决心。然而不久，中共开始清洗地下党，谢在肃反运动中遭受迫害。反右运动中，她在“民主党派”反右运动中遭盟内同志陷害，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共产党叛徒”、“二二八逃兵”等罪名批斗，然后被定为右派，开除出人大。

农村中的反右

6月，“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后，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要求在机关、高校开展“反右”，同时在工厂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继续收集“右派言论”，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在会后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组织农民就合作社、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大鸣大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利用报刊管制、消息封锁，居然能够一面在城市整肃落入“大鸣大放”陷阱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主党派”，一面在农村再设一次“大鸣大放”之局。

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不知道城市知识分子、学生、机关干部和“民主党派”已经上了“大鸣大放”的当，纷纷发表反映农民困苦，反对统购统销和合

作化的意见。其中的代表性的言论有：“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现在的农民不如过去，生活很苦”；“过去给地主做长工不悉没饭吃，现在社会主义弄得人没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吃不饱饭”；[15]“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二石六斗’，可是现在是 490 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16]“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17]“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18]“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19]“把口粮全部搜去，逼死了好多人”。[20]

中共的“统购统销”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是制造饥荒的政策。为了证明统购统销的优越性，中共命农民基层干部证明农民家里有余粮。于是干部就到抱怨统购统销政策的农民家“翻粮食”，找出有余粮当场没收。例如，江苏省宝应县射阳区桥楼乡四个农业社“从九月四日夜起、至七日下午翻查了九百九十五户，占四个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从中农毛洪才家（八口人）翻出五百八十斤陈稻，一百九十四斤麦子，全部用印子盖起来，不准该户食用。中农葛锦老俩口子带一个孙子，从他家里翻出六百十七斤陈稻，一百九十五斤麦子，老奶奶哭着说：‘这个粮食是我出去帮寒工省下来。’葛庄社韩学周家夹板墙里翻出一千九百四十七斤陈稻，全部装上船要运走，当时周妻睡在船上，并说，‘你们把船撑走，我就跳河。’”[21] 当局“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围绕“统购统销”政策展开。名为辩论，实际强迫农民称颂统购统销政策，对任何说出统购统销政策害农民、造成饥荒的者展开残酷斗争，逼

到讲真话者自杀，仅 1957 年 9 月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八省农村大辩论中农民自杀的统计数字，其中湖南 400 多人，四川 217 人，山东 93 人，河南 77 人，河北 58 人，贵州 181 人，广西 276 人，青海 11 人。

[22]

1957 年底，中共将在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大鸣大放”转为“收网”、反右，将两百多万在“大鸣大放”中诉苦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打成“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将反右之前要求退社单干，反对合作化的请愿骨干以“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罪名再逮捕、判刑了一大批。

工人中的反右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企业大批停业，工人大批失业。生活困苦的工人、店员对中共的政策强烈不满，在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时纷纷请愿。在上海，仅 1957 年 5 月就有数十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抗议失业和贫困。在高校、机关开始反右运动时，中共仍在工厂中鼓动“大辩论”，要求工人、店员向共产党提意见，控制《人民日报》以工人名义发表《工人说话了》等社论，称“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工人阶级说话了，工人不答应”。参加“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见到这样的社论感到四面楚歌，被迫检讨、认罪、互相揭发，而工人们还蒙在鼓里，仍在“大鸣大放”。

1957 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在企业中进行整风的指示》，将工厂中的“大辩论”转为反右运动，将数十万参加请愿的工人，在“大辩论”中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工人、工厂干部和工会干部定为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

中共党内的反右

在 1957 年 5 月的“大鸣大放”阶段，毛泽东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有内应”，“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党内知识分子约占 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 20%以上”[23] 按中共八大时党员 1800 万计，他准备在党内抓出 90 至 180 万的右派。在 7 月的青岛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威胁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有几重目的。其一，他要整肃知识分子。苏共揭露斯大林罪行和匈牙利人民起义极大地震动了中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让毛泽东恐惧。他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高干，搞过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干部最有可能接触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中国发动“匈牙利事件”的潜在力量，比党外的右派更危险。其二，他要借反右运动继续清洗那些原白区地下党、游击队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其三，他要整肃一大批有自治倾向的地方干部，以及有民族自治倾向的少数民族干部。为这些目的，他把形势说得非常严重，要求错反右在党内来一次清党。

反右运动进行半年后，毛泽东发动了针对党内干部的“反右补课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党内的反右采取“关门打狗”方式进行秘密批斗，整肃清洗。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内务部印发的《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党内反右、反倾整肃了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上千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划出了数十个反党集团、右派集团及大批右派分子，不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中右分子”。其中，毛泽东亲自定案的反党集团有：以浙江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祿）“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

副主席、区党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河北省党委常委刘洪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等。原白区地下党成员，知识分子党员，各地的原地方干部是党内反右的主要整肃对象，例如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与丈夫，浙江省长沙文汉被指为“沙陈”反党集团首领，被划为“极右分子”，他们领导下的数百南京地下党员被开除出党或受到整肃；“一二九”运动领导者袁永熙等人在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反党分子；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因赞成美国国会两院制言论被部长陈毅称为“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被定为不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因抵制反右运动结果他自己被划为了“内控右派”。党内反右的重点之一是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例如在广东、云南，数以万计的本地干部被以“地方主义”罪名整肃，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反党集团。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内整肃以反民族主义形式进行，重点整肃要求履行建国之初民族自治承诺的干部。

9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反右。会上，邓小平在作了《关于整风运动报告》，宣布反右运动分为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和整改（反右补课）阶段，显示所谓大鸣大放是毛、邓反右计划的“引蛇出洞”、“引蚂蚁出洞”、“放长线”部分。会议决定，将此前局限大城市、民主党派和高校、机关的反右运动推向全国，在全国工厂农村也开展反右。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宣布划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准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划极右分子的标准为：“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者，一贯反共反人民者”。右派本来是政治派

别，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一种划分。毛泽东在它后面加了“分子”二字，把它变成了罪名。中共的通知通篇践踏宪法。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中共《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每一项罪名都是无从界定的欲加之罪。在镇反、肃反的恐怖中，中共以一党文件制造出了“右派分子”罪名，以违反宪法的随意罪名对数百万提意见者治罪，将响应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高校师生，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分子重则逮捕判刑，轻者开除学籍、开除公职、流放到边远贫困地区。

反右运动中，中共召开了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开除了一批被中共定为右派的人大代表。1958年2月，中共再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宣布罢免罗隆基等三十八位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的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人大不仅未能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自身倒成了侵犯人民权利的工具，会议成了右派人大代表的批斗场。由于人大代表非由民选，而由中共任命，人大根据中共决定罢免代表也就不足为奇。

不仅人大权力被废，经过反右运动，司法部、监察部、法制局等也被撤销，仅有的法制装饰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象征性部门也被废除。建国之初，李济深、黄炎培、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名枢、李书城等“民主党派”人士还曾婉转地批评中共的镇反，肃反运动。但到了反右运动时，他们自身不保，须向中共“交心”，微弱的批评声音就此绝迹。

交心运动

对于中共突然将“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曾经中共老搭档分别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反右运动不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已无利用价值，对他们的信不予理睬。随着反右运动持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领袖开始后悔写信置疑反右运动。

十年八年前，他们感觉自己的党派有相当地位，要求与中共平等对话。随着建国后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领教了中共的利害，认识到唯一的生路是表示驯服。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民主党派”们闻毛之言发起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争相贴出“交心”大字报，自我批判、相互揭发“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错误言行和思想”，在其中捕风捉影，互揭隐私，扣帽子，打棍子，“上纲批判”，党机关则为“交”出问题者“排队”、“梳辫子”，组织大辩论和各式各样的“交心竞赛”，甚至相互攀比“交心”大字报的数量。一些地方的“民主党派”更提出“苦战几昼夜，交心多少多少条”、“交黑心，换红心”等口号。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高校和机关都掀起了“向中共交心”运动，知识分子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是左派，不是右派，展开了“引火烧身、（批判自己），放火烧别人，大家互相烧，互相揭发”的互相整肃运动，造成了互相监控，互相出卖，谁也不敢写读书笔记、日记，生怕像胡风一样成为反革命的精神恐怖环境。“右派学生”被要求制订加紧改造规划，争取早日摘掉帽子。非右派学生制定“争做左派”计划。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感叹恐怖，而在反右运动中他们才知道恐怖还会升级。

在反右恐怖中，他们感到光是表现驯服是不够的必须献媚才能自保。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向毛泽东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交心”誓师大会。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准誓师大会申请说：“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申请获准后，“民主党派”联合知识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上万人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年迈的民盟主席沈钧儒代表众人致词说：“我们万众一心，在首都天安门前，向毛泽东主席、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最大的决心。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跟随讲话，向中共保证说：“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

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24] 大会推出了内容为“改造政治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向工人、农民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自我改造公约》和致毛泽东的效忠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天安门誓师后，沈钧儒、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高举贴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木牌沿着长安街向西走；民建主席黄炎培、民革主席李济深率另一支队伍高举“把心交给党”的巨大红布心造型牌向东走。

轰轰烈烈的“交心”誓师表演背后是恐怖。“民主党派”领袖高调誓师作给毛泽东看，以期免除可能的右派帽子。带头誓师之外，李济深激烈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的“右派言论”；黄炎培致信统战部表态与右派儿子划清界线说：“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章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25] 通过积极表态和带头誓师交心，李济深、黄炎培成功获毛泽东发话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反蒋派们在新中国几年就沦落到摇尾乞怜的地步，两位所谓党派领袖成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的领袖，众“民主党派”作表态效忠的环京城游行，这在几年前的国民政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不禁让人想起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1945年，黄与章伯钧、傅斯年等七参政员前往延安说服中共同意国、共、民盟三方共同执政。回重庆后，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其中盛赞延安与中共，记述他与毛泽东“窑洞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

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篇《延安归来》影响了国统区的无数青年投奔中共。建国时，黄炎培在政协开幕时带头喊了“毛主席万岁”。然而不久，他见证了中共不向政协打招呼就出兵朝鲜，发动暴力剥夺私产的土改运动和屠杀旧政权人员的镇反运动，以及拖延制宪。他不敢质疑，只能参与一次次整肃运动。他不会想到，自己“窑洞谈话”十几年后非但没有成为民主的参与者，倒成了“交心誓师”游行带头人。黄的蜕变早在傅斯年的预料之中。傅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交谈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他离开延安后指出中共“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指毛是“宋江一流”，并抨击民盟成员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26]

八百万人遭迫害

1958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同时对外隐瞒了整肃右派的人数。作为中共机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下列数字：定性右派集团 22071 个，右倾集团 17433 个，反党集团 4127 个，右派分子 318 万人，中右分子 144 万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 4117 人。[27] 上述整肃数字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被中共以其它罪名迫害，如数目庞大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这些其它罪名的受害者的遭遇比戴帽右派更惨。加上在 1957 年至 1959 年的反右补课运动被戴“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帽子的 340 万工农右派，20 多万中共“关门”整肃的“内控”干部右派，[28] 以及“右倾分子”，中共以反右运动名义迫害了 800 万人。

右派分子遭受的迫害包括：判处徒刑、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军籍、公职，遣送农村，遣送边疆贫困地区，没收私房、查抄财物，和开除公职，长期接受监督改造等等。此外，反右运动受迫害者家属子女也长期在生活、工作、升学等方面受到几十年的迫害。在当时，政府垄断了公职，城市人除了公职已经没有了其它谋生出路，被开除公职意味着无法生存，仅此一项迫害已经难以承受。

“夹边沟”右派劳改营是右派遭遇的一个缩影。位于甘肃戈壁之中的夹边沟自然条件恶劣。建国后，中共在夹边沟开办了劳改农场。反右运动中，当局将三千多右派分子押送到这里。在随后三年的饥荒中，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被饿到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到1960年冬，三千多右派分子被饿死到只剩下三百多人。饿死者有三位从美国归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留美农学博士沈大文。三人为报效祖国回来，不久被动员“大鸣大放”，然后被定为右派分子，遣送到了夹边沟。董坚毅妻子来到夹边沟，见到丈夫遗体已经被割食得仅剩头颅骨架。随着夹边沟农场在1961年被撤销，那批右派的惨剧湮没在荒漠中。甘肃兵团知青杨显惠听说夹边沟右派苦难后，查阅官方档案无所获，花了三年走访河西走廊的百余位的夹边沟右派幸存者和见证者。接受他采访的每一位幸存右派老人都是在哭泣中讲述死里逃生的故事。多年后，杨的《夹边沟纪事》一书出版，让人们了解了夹边沟右派，以及他们代表的全国数百万右派的苦难。书中写道：“1960年春播的时候，死亡开始了。每天死人。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一位夹边沟右派死难者的儿子读到自

己父亲的苦难篇章边跪读边痛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住在甘肃临洮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说，他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关于夹边沟右派的文章。因为他一读就禁不住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反右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手段卑鄙。毛泽东、邓小平利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天真，以“大鸣大放”号召设局，“引蛇出洞”，“引蚂蚁出洞”，“放线钓鱼”，然后实施“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右派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层传阅“收网令”期间加入“大鸣大放”的；工农“坏分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在城市知识分子被“聚而歼之”时才加入“大鸣大放”的，善良的人们想象不到当局会卑鄙到如此程度。

有人奇怪，毛泽东设如此毒辣的陷害之局怎么下得了手。如果了解了毛泽东一生最钟爱的书是《水浒传》，将《水浒传》从小读到老就不会奇怪了。《水浒传》表达的游民思想与行为准则，其是非善恶与主流社会准则完全颠倒，将罪恶称为义举，将法律，游戏规则、道义、诚信视为愚蠢可笑。在梁山好汉看来，为赚人上山杀他一家老小很正常。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准则与梁山游民完全一致。在他看来，设局达到“聚而歼之”目的很平常，很有效，不值得大惊小怪，你上当说明你愚蠢。他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为设局陷害辩护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

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他在武汉会议上又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毛泽东、邓小平大规模逮捕、关押所谓右派分子的代表性理由是“杀共产党”论。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一论调是毛、邓为镇压需要联手编造出来的。当时，《人民日报》是毛泽东亲自控制的，毛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名义撰文，看中要发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删是经常性的，反右运动中的《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只有毛泽东有权修改定稿，报社编辑、社长，甚至陆定一、陈伯达等人都无权篡改座谈会发言。经过《人大周报》改过的葛佩琦发言大体符合毛泽东的找镇压借口的需要，毛再作些些重要的增删，篡改了葛的原意，“杀共产党”论就是这样出笼的。“杀共产党”论见报后，葛佩琦致信《人民日报》指出所刊“葛佩琦发言”不是他的原话，要求更正。《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葛的要求不予理睬，但将葛佩琦的来信与原稿一起归档妥善保存。显然，编辑部无权决定，有难言之隐，因此立此存照。作为中共中央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在运动中掌控着舆论，也有头版的修改之权。毛、邓二人共同设局，共同“引蛇出洞”，共同把握从“大鸣大放”转为镇压的时机，也共同制造了镇压的主要理由——“杀共产党”论。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后仍以“杀共产党人”论作为反右运动不能平反的理由。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披露：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庆典时与赫的交谈中说遍了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中共高层的坏话，唯独对邓小平赞赏有加。[29]满意邓主持1954至1955年的整肃高岗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从此视邓为最可信赖的亲信。

反右运动不仅是毛泽东、邓小平联手策划实施的运动，还是中共高层一致支持的运动。“大鸣大放”中，毛泽东写出“收网令”文章，邓小平献计暗中传阅以多抓右派，全体高层在报纸大力鼓动批评共产党时暗中传阅着“部署

收网”文章，除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收网令”文章上写“已阅”，流露出一丝保留之外，众高层全体支持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没有一个人对出尔反尔，设局陷害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拒绝平反，坚持反右运动正确时众高层都服从决定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罪责。

反右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目的反动。毛泽东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独立的思想，民众的思想整齐划一，行动军事化，所有的财产由共产党控制，由他一人支配，所有的人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为建立这样的社会，他要消灭独立思想、批评的声音和批评的勇气。在政治多元的清末、民国时代，一个党要求全国、全民服从自己意志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党要逮捕、镇压所有批评者必然遭到举国反对，是更加不可想象。而在新中国，中共作到了。通过反右运动，中共逼迫人们指鹿为马，逼迫全体国人服从毛泽东一人的臆想，将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当局者一网打尽，消灭了所有反对声音。这样的运动反文明、反进步，其后果是紧接着发生的全民吹牛撒谎和大饥荒灾难。长期以来的中国自由思想领袖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反右运动说：“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30]“我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钦敬”。“在今天中国大陆，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31] 胡适所言是事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是因思想后言论被陷害获罪，其中不少思想先驱因在反右运动后继续抗争而被杀害。例如，北大西语系学生顾文选，在当局高层秘密下达“收网令”之后的 1957 年 5 月

25 日，响应中共“大鸣大放”、“帮助整风”号召，抨击当局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三害”，结果被当局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在文革中以“反革命”罪杀害；北大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因加入“大鸣大放”，被北大开除回乡，目睹饥荒惨状后秘密组党准备武装反抗，被当局杀害。被杀害的右派学生还包括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1958 年被枪毙）、刘文辉（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右派，1967 年被枪毙）、林昭（1968 年被枪毙）、冯元春（1970 年被在斗争大会上打死）、张春元（兰州大学历史系调干生，1970 年被处决于兰州）、沈元（北大历史系学生，1970 年被枪毙）、任大熊（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1970 年被处死）、张锡锬（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 年被处死）、吴思慧（北大物理系学生，1970 年被处死）、黄宗奇（北大哲学系学生，1957 被处死）。他们中的刘文辉刑前带着手铐写下了“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32] 可以说，这一绝命辞是那个抗争群体的集体遗言。

第 45 章 从冒进到饥荒

“冒进”与八大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感到多年媳妇熬成婆，不再满足于仅作中共领袖，而要作斯大林那样的共产阵营领袖。他知道，要当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须有苏联那样的军事实力，而要快速实现军事工业化唯有从苏联进口军事装备与技术。为了迅速达到与赫鲁晓夫争雄的实力，他要求多出口粮食以换取军事技术，下令每年征购和出口的粮食都比前一年增长五成或翻番，要求“一切事业都要加快”，[1] 并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四字方针）。毛泽东这“四字方针”与民生无关，都围绕他快速军事工业化的目标，其中核心是一个快字。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要求粮棉总产量在十二年间增长三倍以上（这样的产量指标在四十年后都没能达到）指示将众多军事工业项目同时上马，将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将其中的基本建设投资调高到比上年大增七成。毛泽东的“同时上马”命令立即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危机。在城市，财政超支，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全面短缺；在农村，基层领导人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两三年内办完成十二年规划”为口号，强迫合作社开工了大批力所不及的基本建设项目，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务实派清楚，钢铁、水泥、木材等资源不能支持那么多的军工项目同时上马，如按毛泽东所订《纲要》征粮，已经吃不饱饭的农民就得大批饿死。但是，他们不敢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只是以“不要急于求成”、“注意综合平衡”、“不要冒进”等说法提出温和劝告。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作了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秘密报告。消息传到中国，中共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动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事件。毛泽东清楚，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提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七三开，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维护斯大林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2]称斯大林的错误在共产党国家不可避免，根源是思想方法问题，不是个人崇拜问题，更不是制度问题。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他紧握权柄不再放手，总是以拖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避免领袖换届。新一届苏共中央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明确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要求中共实行集体领导。苏共的立场动摇了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地位，鼓舞了中共高层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中共高层提出了召开八大的要求，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否决了一大批建设项目，从提交八大审议的“二五”计划草稿中删掉了一大堆“多、快、好、省”的字眼，调低了经济计划指标以应对经济危机，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压缩基建规模，让部分军工项目下马，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苏共反个人独裁的风头之下，毛泽东一时无力否决政治局多数的意见，被迫同意召开中共八大，被迫默认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举措。

1956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以反对领袖个人独裁为基调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跟随苏共的立场，中共八大会场有所改变，没有像七大那样在会场悬挂巨幅毛像，刘、邓删去了新党章修改稿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员义务”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等条文，加入了设副主席的条文。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八大在党章中规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每

年召开一次会议。党代会常任制的要点是尝试将民主监督机制引入党内，简化代表选举步骤，以年会制的办法从制度方面解决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更替和组织保障的问题，使常任代表类似代议制的议员一样，对全体党员负责，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监督职责，以避免形成领袖独裁。

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八大路线”，通过了强调量力而行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间接否定了毛泽东让军工项目一齐上马的政策。会议选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副主席，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书记处设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准备废除党领袖终身制，安排毛泽东退居二线。在苏共支持中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风头之下，毛泽东被迫默认八大的各项决议。

然而，八大会后，中共立即迎来了两方面尝试的失败。在限制独裁、引入民主机制方面，中共在八大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遇挫。会上，林伯渠、罗荣桓、彭真等人根据苏共二十大废除领袖终身制之议提出了党主席只得连任一届的议案。对此，毛泽东早有防范，在八大会下寻求到了林彪的支持，要求以枪杆子维护权力。在政治局会上，毛、林一起对限制连任提案投了弃权票。建党以来，中共的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操控，开会只是举手走过场，没有民主表决的经验。从延安整风开始，会议由毛泽东操控，开会还是举手走过场。八大引入民主机制后，中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按说，毛、林弃权，无人反对，提案应当通过。然而，众高层知道，革命党内是军权决定一切。对两大军头以弃权表示反对的表决结果算不算数，众高层一时没了主张。尴尬之中，周恩来出面说服政治局委员们放弃提案，大家接受劝说，议案自动取消，[3] 民主尝试失败，使众高层更加坚信“枪杆子”说了算。几天后，毛泽东在国庆节天安门观礼时否定八大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不敢问毛泽东怎么能刚刚在八大上举手同意，会后没过几天就反对，也不敢强调八大决议的效力，只是问毛决议已

经公布，怎么办。毛泽东避而不答。[4]（十年后，毛泽东在整肃刘少奇时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5]）在建立纠错机制方面，中共也立即受挫。八大上，刘少奇、周恩来联手反冒进，主导八大通过了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八大路线”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然而，毛泽东在八大举手后没有几天即否定八大路线，刘少奇、周恩来和众高层都不敢质疑毛泽东违反党的决议，也没有人敢问一句“八大路线还算不算数”。

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毛泽东感到巨大压力，感到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阵营领袖位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于是立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要求按军工发展目标从农村征更多的粮食出口。必须应对物资供应危机的周恩来、陈云等经济主管官员根据刚刚开始实施八大决议继续反对冒进，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方针，实际要阻止众多军工项目一齐上马。毛泽东抨击周、陈的“反冒进”方针说：“计划经济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要促进，不要促退。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們头上泼冷水”。一时，会议出现僵局，毛泽东在苏共反对个人独裁气氛中不敢立即推翻八大路线，众高层也不敢激怒毛泽东，不敢坚持八大路线继续“反冒进”。会议作出妥协决定，由陈云主持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强调“注意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和量力而行”，反对军工项目立即一齐上马，但同意大规模出口粮食以加速发展军工。然而，众高层的迁就没有让毛泽东满意。毛对不让军工项目一齐上马极为不满，在会上宣布要在1957年发动另一次整风运动。他的真实用意是通过发动整肃运动来摆脱在党内的被动地位，扫除党内反对独裁的声音。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议。中共中央在会上决定多征粮食出口以保证军工发展。高层都清楚所谓“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实际意思是让农民一年挨几个月饿，但为了在党内生存一致举手通过了这样的暴政决定。从东北土改开始，中共一直在不断加大力度搜刮农民手中的粮食。在对国民党军开战的几年中，中共要出口粮食偿还苏联的军火债以及暴增的军费；建国后，中共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偿还苏联的军火债以及因“抗美援朝”而再度暴增的军费。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欲壑难填，为了拥有与苏共叫板的实力，还是要搜刮更多的粮食出口，换一个快速军事工业化。中共务实派的“反冒进”昙花一现，刘少奇在会后几天就不敢坚持八大路线和“反冒进”，众高层在八大后两个月就一致举手通过了“多征粮食出口以保证军工发展”的暴政。八大二中全会后，农民挨饿的情况蔓延，卖儿卖女和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多。

1957年春，毛泽东以整风运动的名义成立了亲信组成的运动领导小组，将政治局架空，推翻了中共八大的人事安排，加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这时，城乡反抗政府剥夺私产、搜刮粮食的请愿遍及全国。中共先是引诱“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在年中突然发动了镇压反对声音的所谓反右运动。正当毛泽东通过整肃运动恢复独裁的时候，苏联发射火箭成功的消息传来，给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梦蒙上阴影。毛泽东立即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清算“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是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提出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达到 2000 万吨（翻两番）的口号。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党内无人再敢提八大路线、“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在党内不同意见消失的局面下，毛泽东主持通过了服务他世界领袖梦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纲要的用意不是让农民富裕，而是要求按更高的粮食产量指标征粮出口。会后，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等一系列社论，批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说：“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要求“农

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矛头直指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方针。

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经济将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即席宣布，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6] 回国后，毛泽东推出了一系列《人民日报》社论，鼓吹“大跃进”，给反冒进戴上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中共高层们都知道农民在统购统销后一直在挨饿，但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谁也不敢再提八大的“反冒进”的决议，全体改口批判右倾保守，鼓吹“大跃进”，由此拉开了大饥荒的序幕。

南宁会议

1958年1月，中共在南宁召开了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继续清算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称：“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远，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口号了。”按说，周、陈可以申辩说1957年的经济计划是依据毛泽东举手同意的中共八大路线制定的，但二人深知党内规则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军权，于是不作申辩，只管检讨，承认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不依不饶，在大会上拿着柯庆施的吹捧文章《乘风破浪》质问周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7] 毛的质问让所有高层不敢再提八大路线。大家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一致唱起了冒进高调。会议通过了将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8] 要求完成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超高指标向农民征粮。

南宁会议上留下的一大灾难是毛泽东推出的“两本账”制度。他在指导大跃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

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帐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按此法，从中央到基层，层层两本账，上一级的期成帐成了下一级的必成帐，将中央制定的超高指标向省、地、市、县、公社层层加码施压，逼迫基层吹嘘出不可能的粮食产量、完成不可能的粮食征购指标。按此假账制度，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势比登天，更何况毛泽东提出的中央指标已经是异想天开了。”“两本账”制度逼迫基层干部在讲实话丢乌纱帽与和吹牛浮夸迎合上级之间作出选择。在反右运动后的精神恐怖中，绝大多数干部选择后者，向农民夺粮。在大饥荒灾难后，“两本帐”制度并未废除，此后成了中国统计部门造假的基本模式，即对内对外两套数据，以假数据糊弄老百姓和外界，更高级的官员才可以看到更真实的统计数据。

成都会议

南宁会后，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然后主导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高的 1958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然而，人大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对自己推出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又不满了。因为他感到苏联也在跃进，中国的跃进还是不够快。3 月，毛泽东在成都再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重复南宁会议的调子，鼓吹大跃进，批判反冒进，指责周恩来的“反冒进”给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口实，称“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周恩来再作一番检讨。毛不接受周的检讨，指责过去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都是“教条主义”的，要求将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刚刚通过的 1958 国民经济计划推翻，将其中的工农业增长指标再调高一倍。

毛泽东在会上的另一话题是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他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在反右运动中被架空的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对他不满，并且知道毛泽

东的不满主要是对他主持制定的八大各项决议。于是，他主动抛弃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带头响应毛泽东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9] 众高层心领神会，掀起了颂扬毛泽东的竞赛。周恩来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说：“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个个不甘落，发言吹捧毛泽东。柯庆施喊出了最令毛泽东满意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0]（两个月后，柯获毛泽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驯服众高层后，毛泽东主导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里毛泽东只是让大家举手走个过场，他早在建国前就已决定要剥夺农民私有财产，要求所有农民必须听从他指挥，所有粮食必须由政府支配，将全体农民纳入军事化管理。在此次会议之前已经指示河南办“大社”。所谓大社与名义上自愿参加性质上的互助合作社的区别是退社自由被取消。会议期间，他树立的“大社”样板河南碛砭山“卫星社”挂了牌，名义上退社自由的高级合作社被合并成不再允许退出的“大社”，将区域内的所有农民无一例外纳入了军事化管理单位。成都会议后，中共在全国推行“小社并大社”，开启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大跃进启动

在跃进狂想中，毛泽东马不停蹄地接连召开会议。从成都回京后，他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按照八大决定的代表常任制，召开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初，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制造恐怖气氛，声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随后再点名批判周恩来“反冒进”是右倾。从成都回京后，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西花厅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他清楚毛泽东的“冒进”造成了1956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而自己主持的“反冒进”缓和了经济危机，他更清楚，不可以跟毛泽东讲什么道理，只能给自己扣帽子让毛泽东满意。写了一夜，直到天亮他才在秘书的帮助下拟出一篇检讨。[11]会上，他不作申辩，拣毛泽东爱听话说：“1956年夏的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12]在这被迫的检讨中，周恩来创造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最合毛泽东心思的大跃进口号。即使如此，毛泽东仍不表态让周恩来越过，指示将周的长篇检讨书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以维持对周和众高层的精神压力。

周恩来检讨后，陈云等其他“反冒进”官员与周同样应对，跟着作检讨，不作任何争辩，只管给自己扣帽子。众高层都检讨后，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在等他作检讨，意识到光带头对毛泽东吹捧一番还过不了关。他比谁都清楚，毛泽东刚刚在八大上举手，散会立即否定八大路线之无理，可他在延安就曾表态拥毛为皇帝，靠吹捧毛泽东获毛提拔到二号位，在苏共推动中共形成反对个人崇拜的热潮时他都没有勇气坚持八大路线，在反右运动后当然更无勇

气对毛说不。跟随众人，他也作起了检讨，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承认“反冒进是严重政治错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最后亲自否定“八大路线”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务实派全体投降后，党内达成了“反冒进是严重政治错误”的共识。毛泽东见好就收，宣布“反冒进”问题解决了，强调全党应当团结。

与成都会议上一样，众高层在所在会议组展开了颂扬毛泽东竞赛。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颂扬之言都会被记录下来交毛泽东阅。周恩来带头颂毛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13] 广东大员陶铸跟进说：“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今后干部应要求必读毛著。”[14]

在十八天的会议中，毛泽东六次长篇讲话，号召全党以他本人为榜样，“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15] 点名指责质疑高指标，反对浮夸的十位省部大员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即席宣布将反对浮夸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撤职，以吹牛造假的吴芝圃接掌河南。主持中央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紧密配合，代表中央向吴芝圃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指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反右倾不能含糊”。随后，毛泽东将自己半

年前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过英国的口号提速，改成“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16] 将自己两年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十二年粮食产量指标”提速改为“要求三年，争取一年”达到。在众高层的吹捧热潮中，没有人敢质疑这种随意将指标翻番的妄想，众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的臆想，举手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宣布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取代八大“改善民生”为主的总路线，将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全部推翻，将钢产量计划指标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将煤产量计划指标从 2 亿吨提高到 4 亿吨，将粮食计划指标从 5000 亿斤提高到 7000 亿斤。随着各项经济计划指标被飞速提高，中共启动了“大跃进”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过程与结果再次显示，共产党不可能限制领袖专权，也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更不可能向民主制过渡。中共八大推出代表常任制的本意是限制领袖专权，是尝试建立党内民主监督机制。这种将西方代议制民主机制引入共产党的尝试早有失败先例。列宁去世后，苏共曾试图推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定期制，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然而，斯大林在巩固权力后立即采取非常手段清除异己，废除了一年一度召开代表会的定期会议制，在专权后控制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真正的决定完全不在会议中作出，使中央全会越来越少，即使召开也沦为一致举手的走过场。此次，中共的尝试同样迅速失败。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介绍党代会的常任制说：“把党内民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但经过反右恐怖和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崇毛热潮，党内形成了指鹿为马的局面，为“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而设计的代表常任制会议成了表态效忠和诋毁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事项的场合，成了为遵守八大路线而作检讨的场合，成了批斗遵守八大路线干部的斗争大会，成了毛泽东独断推翻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路线方针，宣布相反的“大跃进”政策的大会。会议结果让众高层们认识

到，引入民主机制对共产党不可行，谁也不再提代表常任制了。于是，这第一次代表常任制会议成了中共党史上的最后一次。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接着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了配合“大跃进”的人事决定：增选林彪为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王任重等为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版半月党刊《红旗》杂志，任陈伯达为总编辑。上述人事任免实际警告众告高层：紧跟毛泽东、积极推动崇毛者高升，质疑毛的高指标者丢乌纱。

会后，毛泽东率中央委员们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人民日报》将毛泽东铲土的照片广泛报导，为“大跃进”造势。劳动归来，因反冒进而被毛泽东痛批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请辞任国务院总理。毛仍需要面面俱到的周作管家，制造“罢相风波”与四年前“抬高打刘”一样，只为了让周更驯服，因此授意邓小平出面挽留。在讨论周辞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出面说“总理还应由周恩来担任”，众高层明白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一致表态支持，然后毛泽东作民主姿态，表示同意集体意见。经过反复检讨和“罢相风波”，周恩来让毛泽东教育到家了，明白了在毛泽东之下为相不可明确职权，不可按决议行事，只能揣摩圣意行事。在此后的总理任上，他请示不厌其详，甚至宴会座次，菜单都报毛泽东画圈，成了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和传达指示的秘书头。而这正是毛泽东制造“罢相风波”所要达到的结果。

八大二次会后不久，毛泽东再跃进，将超英赶美时间表再提速一倍，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7]表现出明显的妄想症状。在反右运动后的恐怖中，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指标跃进”违反常理，各地大员只管按照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布署，展开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将直言指标不可能完成的干部整肃撤职，代之以吹牛撒谎的干部。例如，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会后回省制造了“潘杨王事件”，清洗了上万务实干部；甘肃省委根据邓

小平的指示制造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案，清洗了数万务实干部。类似的省级干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遍及全国，被“拔白旗”（撤职整肃）的干部包括浙江省长沙文汉、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河北副省长胡开明以及广东、内蒙古、新疆、青海、辽中等省的一大批领导人。

军内整风

1957年，苏共内发生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间的权力斗争。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调动军机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开中央全会，帮助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等人的挑战。赫鲁晓夫被朱可夫调动军队左右政局的能量所震动，在巩固了地位后以“破坏了党的原则”和贪污罪名将朱可夫解职。“朱可夫事件”朱可夫调动军队左右政局的能量同样震动了毛泽东，让毛有清洗一批他不信任的将领的打算。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彭德怀几次申请，主持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开展整风，反军事教条主义。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任林彪为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准备以林掌军，为他的“大跃进”保驾。

彭德怀申请召开军委会议是要讨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议题，没想到毛泽东批准召开会议时规定会议的内容是整风。彭德怀在延安曾反对整风，认为没有理由在抗战烽火中召集全体高层开长会，搞什么整风。经过在整风运动中持续地挨整他明白了，毛泽东所谓的整风就是整人。对于这次军队整风，他相信整肃对象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将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他在八届五中全会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效仿延安整风和反右的作法，开始了以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的军内整风运动。军队将领们对于整风一头雾水，没有人能说清楚整什么，怎样整，教条主义何指，会议冷场。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军队整风进程，对于没有出现整肃高潮不满，下令将扩大会议再扩大规模。按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下令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

班外全来北京开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来北京开会，全军师以上单位全派两名正职将领来开会，中央同时派出十八架飞机将各地军头接到北京。8月22日，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千余军队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开会时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重要手段。他喜欢开会，喜欢开人多的会，并且喜欢开长会。除了长征途中不允许外，他在延安使会议时间越拉越长，参加人数越加越多。从延安到北京，他召集的会议都是扩大会议和长会。长会中的主要内容是漫无目的的闲聊，即务虚。但是大家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将领开如此漫长的军事会议。会议开了二十多天后，毛泽东下令再扩大会议规模，让将领们更加奇怪。彭德怀习惯了受毛泽东遥控，不问有何必要，只管增加人数，急召各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一大批大校、上校级军官来加入军委会议，将会议升级成了1400多将领参加的巨型军事长会。规模扩大后，毛泽东到会讲话，点名刘伯承、萧克，指出了整肃方向。按毛泽东的要求，会议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手段展开了对刘伯承元帅、总参谋长粟裕，负责训练总监部的萧克、军委训练总监部处长蔡铁根大校等人的整肃。会场内外贴满的大字报中，刘、萧的罪名是“教条主义”，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和“告洋状”（通苏）。会议和大字报的批判内容还包括了众多高级将领搞女人问题。沿用延安整风的办法，军委会整肃也是大会整肃和小会整肃同时进行。毛泽东派邓小平召集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等党军高层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对刘、萧展开了不留情面的小批斗会。[18] 刘、萧、粟、蔡等人遵循党内斗争规则，在小会和千人大会上反复作检讨，他们信任的一大批中级将领也跟着成了整肃对象。

毛泽东整肃刘伯承、萧克是在借“朱可夫事件”和整风之名清算历史恩怨旧账。刘伯承是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剥夺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军权的主要推动者；萧克是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使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失去红四军军权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对被夺军权记恨终生，此时逐一清算。对于已经脱离了权力中心的刘伯承，毛泽东感到出了气后接受检讨，让刘过了

关。萧克、粟裕、蔡铁根的检讨不获通过。作为三野的实际最高指挥员，粟裕在三野声望崇高，批粟遇到三野将领们的抵制。彭德怀组织人找三野将领们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表态批粟。三野名义上最高领导人陈毅作出了积极批粟的表率。在几年前的高饶事件中，陈毅不留情面地带头痛批老搭档饶漱石。在这次会上，他再带头痛批老搭档粟裕。彭德怀当场表扬陈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19] 在彭、陈带头表率的压力下，三野将领除叶飞、王必成、陶勇成等几位消极抵制外都加入了对老首长的批斗。萧克被连续批斗到吐血，刘、萧、粟以下的中级将领经受的批斗更加残酷。萧克、蔡铁根等人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大家争相恶毒语言相向以表示与党中央一致立场。蔡在批斗中被扯下领章，关押了起来。这样的千余高级将领的批斗整人大会一开就是五十多天，会议结果是，刘、萧、粟等一大批将领被免职、开除军籍，林彪接掌了彭德怀手中的大部分军权。彭知道到不获毛泽东信任，在会后主动提请辞国防部长。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显示出共产党内斗争之残酷。当年刘邓大军的邓不讲情面地批刘，陈粟大军的陈不讲情面地批粟，大家都是在一次次运动中不讲情面地批判老战友，老搭档，甚至举手同意杀害战友的经历中一路走来。革命就是这样残酷，只有不讲情面地参与批斗者战友者才能继续革命。在这样的生存法则之下，大家在批斗战友时都不会于心不忍。彭德怀动员粟裕的部下批斗老首长，以“里通外国”罪名整肃粟裕，冀以此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他没想到，他和另一位这次批斗会的积极参与者黄克诚在一年后受到同样待遇，被老部下指着鼻子批斗，也被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中共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将一批爱将扩大进来以便控制会议。年初，他通过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将1957年提出的1958年粮食总产量目标大幅增加至4000亿斤，此次会上，他将4000亿斤的目标再加倍。经过一年来的反右运动、批判“反冒进”、“反

右倾”、“拔白旗、插红旗”，毛泽东造成了全国无人敢批评共产党，中共党内无人敢批评他，全党全国服从个人意志的局面。在 1958 年仅余四个月时间的情况下，会议全体通过了钢、粮产量当年翻番的决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会议公报声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已出现农产品的产量成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的飞跃发展形势。”

决定钢、粮产量当年翻番之外，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声称：将全国的合作社都合并成人民公社，“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声言：“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按照他的要求，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炼钢目标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达成与否置于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中央书记处再次的电话会上，邓小平下令，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针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要达到日产钢 6 万吨、铁 10 万吨。中共中央在各省电话会议传令，1070 万吨的年度钢产量指标一定要完成。

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江西苏区和延安边区那样的极权社会。在那里，中共领导的各种组织形成一张无所不包的“网”，控制整个社会的所有人财物，儿童有儿童团管，少年有少先队管，青壮年有赤卫军管，土地有土地委员会管，妇女有妇联管，没有人独立于这张“网”之外，所有人必须听党指挥，所有农民必须向党纳粮。建国后，毛泽东要求全国都变成这样的苏区社会。1955 年，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社越大，优

越性越大”，“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956年，他主持推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在其中要求在全国“办大社”。这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的行动动摇了毛泽东的独裁地位。在苏共反对毛泽东独裁立场的鼓舞下，刘少奇在八大上要求提出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允许私有制长期存在。毛泽东一时无力独裁，只好搁置农业四十条草案及“办大社”计划。

1957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巩固了独裁地位，继续推行他的“办大社”计划，在视察河南时指示省委书记吴芝圃成立“大社”，对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三化）的管理，随后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要求通过《农业四十条》草案。在右派帽子威胁下，众高层中不敢再提《共同纲领》承诺和八大路线，一致举手同意了《农业四十条》的“办大社”计划。在反右运动中被架空的刘少奇感到了毛泽东的不满，主动抛弃八大路线，与毛泽东一起鼓吹“办大社”和“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在经过河南时向吴芝圃下达了一番“办大社”、“进行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

遵照毛、刘的指示，吴芝圃下令将河南的农业合作社全部合并成大社。按吴的指示，中共遂平县委将嵯峨山地区的二十个合作社合并成了一个三万多人口的大社，起了个苏式名子——“卫星集体农庄”。嵯峨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大社的消息见报后，各地官员闻风而动，跟随推行合并大社，名称有的模仿苏联称集体农庄，有的称共产主义大院，有的称人民公社。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的批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据此，各地大社都更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阅《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后亲自定稿写道：“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

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视察各地大社后，毛泽东到北戴河避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推销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20]在全党崇拜潮流中，毛泽东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全国农民纳入人民公社，指示将《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刊出，作为各地制定人民公社章程的范本。这两简章的要点是：将农民财产充公，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

经过中共武力镇压“退社风潮”，农民明白了，在共产党治下抗争、请愿死路一条，只好逆来顺受，接受政府摆布。北戴河会议后三个月内，中共将全国74万多个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了两万多个数千甚至至数万户规模人民公社，将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强制合并，实行共产，无偿剥夺合作社农民的土地、家具，家畜、果树，甚至房屋，将全体农民完全置于了政府的管制之下，使全国农民成了没有私产，不准退社的人民公社社员。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后，农民不仅失去了财产，还失去了自由，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奴工。在中共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上亿农民被中共像调动军队一样调去“大炼钢铁”、修水利，住集体军营。以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例，全村的房屋没收成为公社的军营，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逼得青年夫妻们只好夜深人静时外出野合。

毛泽东树立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另一典型。主持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毛泽东向各级大员施压，要求达到纲要规定的各项指标，包括水利建设指标。在层层逼迫下，中共徐水县委决定开建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徐水是个三十万人口的贫穷小县，并无能力建设这么多大工程。为向上级交差，徐水县委强行开工，集中全县劳力“大兵团作战”，划分“战区”，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强迫农民在工地搭棚宿营，在工地吃住，不准回家。1958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保定听取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赞徐水的农田水利建设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中批示，将徐水经验推广全国，命张国忠到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将徐水树立为了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张国忠回到县里立即下令全县农村食堂化，禁止农民起火做饭。8月初，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张国忠下令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等待毛泽东检阅。毛问张徐水粮食产量，张知道反右运动后不能讲真话，知道毛要听大数，吹牛说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指示：粮食多了吃不完，可让社员一天吃五顿。而实际情况是，徐水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才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徐水农民与全国农民一样，自从粮食统购统销后一直在挨饿。

毛泽东走后，徐水县委宣布将全县248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共产主义大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农民全体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工资制。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派人来到徐水，帮助拟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等目标。根据中央制定的目标，徐水县委命令各乡保证当年粮食亩产必须超过2000斤。

8月下旬，《人民日报》连载了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赞美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实行供给制、全体农民吃公共食堂的经验。9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毛泽东树立徐水为共产主义试点后，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中央大员及一大批省部官员先后到徐水视察为毛泽东捧场。众高层都看出了徐水试点漏洞百出及造假，但为向毛泽东表态效忠，谁也不说破真相，齐心协力维护这一拙劣的谎言。一位参观者问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这么喊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21]此言显示，毛泽东的“大跃进”高指标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基层干部除了跟着说疯话已经没有活路了。

9月，徐水县委公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宣布成立全县物资和劳力“大平调”的“县人民总公社”，将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拆除农民的房屋，承诺由县政府为社员建新村，宣布取消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承诺全县人民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享受生老病死、吃穿用，包括洗澡、理发、看戏等等“十五包”。县政府宣布的共产主义宏图还包括建30个工厂、千余企业、11所大学，众多医院等等。在讲真话没活路的恐怖中，基层干部谁也不敢讲县里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全县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为农民建房子、提供供给制“十五包”的资金根本没有。

根据毛泽东“放开肚皮吃饭”，“一天吃五顿”的号召，徐水和全国各地农村的食堂纷纷放出了“吃饭卫星”，开展大吃大喝竞赛，每餐四个菜，每周会餐，社员随到随吃，吹嘘饭菜“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等等。根据毛泽东在安徽舒城县发表的“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

要钱”[22] 的谈话，“放开肚皮吃饭”还被扩大成了招待过路人吃喝。这样的胡闹只持续了半个月，公共食堂就断粮了。年底，饥荒降临徐水，也降临全国农村。被拆了房子的农民没有饭吃，无处栖身。在毛泽东吟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时，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蔓延十数省。

在西藏，从统购统销到人民公社，藏人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十世班禅在亲眼目睹藏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悲惨生活。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七万言书》中指出：“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藏民只剩下衣服、被褥、碗筷三样私有物品。很多人吃不饱，只能吃牛马饲料食，最后连树叶、树皮、草根、草籽都拿来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时，很多藏民拦着他长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国声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3]

人民公社化灾难是太平天国灾难的重演。洪秀全造反时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天朝田亩制度》宣称，男女一样可以均分土地。然而，洪秀全登基后骄奢淫逸，给统治区内的人民带来空前的奴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制奴隶性与太平天国奴隶制在各方面都极其相似，被毛泽东称为“宝贝”的《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与《天朝田亩制度》大同小异，人民公社实行的男女分营的作法是太平天国男女隔离制度的翻版，一些人民公社对农民实行“组织化”编号管理，也是洪秀全编号管理妃嫔办法的翻版。[24]

人民公社灾难还是苏俄革命后灾难的重演。列宁和托洛斯基在革命时计划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府强迫人民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将数十万富农剥夺财产，枪杀或流放到边远地区，造成人民大批死亡。其中，圣彼得堡人民在革命后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三分之一。消灭了富农也就摧毁

农业生产的中坚，致苏联一直到解体也未能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因此，重写的俄罗斯二十世纪史将 1920—1930 年代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25] 作为中国的赤祸，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的农奴法和奴隶制。在此后人民公社制度存在的三十年间，全国农民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合作化之前，更低于连年灾害、战乱频仍的 1930 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后，它带给农民的灾难没有结束。因为，农民主要财产——私有土地成了党产，再也拿不回来了。

放高产卫星

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是抓枪杆子，也是向百姓搜刮粮食的历程。苏维埃国时代，中共的首要任务是扩红与搜刮粮食，抗战中，中共的首要任务扩充军队与根据地，背后还是扩军与征收钱粮，国共战争中，中共欠下苏俄巨额军火债，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与农民，动因还是要加大力度搜刮粮食。建国后，按说中共可以向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遣散军队，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了。而情况骇人听闻，毛泽东立即到国外开战，扩军与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朝鲜战争结束，按说农民可以喘息了。然而不是，毛泽东的领袖欲望无止境，又有了掌握核武器的要求。为此，他要求粮食出口量每年翻番。1956 年，他主持起草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要求粮棉总产量在十二年内增长三倍以上。这一纲要草案在苏共反对他个人独裁的背景下被中共八大搁置。1957 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巩固了独裁地位，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主持中央全会通过了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然后立即各省大员施压，要求多征粮食出口换外汇，换核技术。

省委书记们知道，此时最大的政绩就是搞出粮食高产典型。广东大员陶铸、赵紫阳行动最快，在 1957 年秋后将基层报来的虚假报告上报中央，称潮汕地区出现了“亩产千斤县”。毛泽东得报后赞扬说：“我国将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规定的 12 年内不同地区粮食亩产达到的指标：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达到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 800 斤）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赞扬广东后，其它大员不甘落后，四川的李井泉推出了新昌“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推出了孝感“千斤县”典型。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十二年目标被各省立即达到，毛泽东雄心万丈，年底在莫斯科即席吹牛，宣布将“十五年超过英国”。回国后，他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鼓吹“大跃进”，批评“右倾保守”的社论。1958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将“二五”计划的主要产量指标大幅调高，将反对吹牛造假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撤职，以积极吹牛造假的吴芝圃接掌河南，警告不鼓吹大跃进，不放出高产指标同样下场。

八大二次会后，吴芝圃回到河南发动了反右倾运动，逼迫基层干部报出高产指标。在地委，县委的层层高压之下，基层干部们被迫报出了不可能达到的产量指标。夏收时，基层干部被迫造假。全国第一个“大社”——嵯岈山卫星社把十亩地的麦子放在一起，称是一亩所产。社长钟清德吩咐：“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三天之内不得走亲串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干部们连夜组织人割了十几亩地麦了堆在一起，说是一亩地的。农民都知道是造假，但谁也不敢说破。 [26]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卫星社坐上了卫星——小麦亩产 2105 斤》，6 月 1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再报导：《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亩产 3537 斤。随后，《人民日报》接连放出刷新指标“高产卫星”：6 月 23 日报导，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 4689 斤的高产卫星；7 月 31 日报导，湖北省应城县春光社早稻平均亩产 10597 斤；9 月 1 日刊出“放卫星”热潮中的代表作——《徐水人民公社颂》，其中报导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 12 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 120 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 500 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皮棉亩产达到 5000 斤，全县粮食平均亩产 2000 斤。在《人民日报》的指

引下，各地展开了“放高产卫星”的竞赛。广东大员陶铸带头吹牛，撰文称广东粮食亩产可达万斤，省委书记赵紫阳跟进，撰文高调支持陶铸。[27] 二人一面高产卫星吹牛，一面对质疑“千斤县”假典型的广东干部展开整肃。炮制高产典型的干部们清楚，让稻谷粒大出数倍不容易造假，但说水稻植株多出数倍则容易蒙人。根据基层的造假，赵紫阳将密植作为先进经验向毛泽东报喜。毛泽东再赞广东。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紧跟，为广东的“高产卫星”作证，称他在广东番禺亲眼看到了亩产 100 万斤番薯、60 万斤甘蔗、5 万斤水稻。[28]

“千斤县”吹出去后，各省大员纷纷建立自己的试验田样板，通过试验田再放“高产卫星”。各地放出“高产卫星”后一般要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卫星田”造假应付检查的套路一般为：在试验田多播种，有的地多到每亩播种 200 斤；多施肥，一些地方为造假将全村肥料都施在了“卫星田”；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将其它田的农作物移栽到“卫星田”中等等。根据毛泽东要求推广的深耕经验，各地的试验田越翻越深，深到八尺一丈。10 月 1 日，《天津日报》报导了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 12 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毛泽东将新立村树立为全国先进典型，众高层纷纷来此参观以为毛泽东捧场。来此参观的中央高层和专家们发现，试验田的稻子一棵挨着一棵，实为大稻子垛。大家对造假心知肚明，谁也不说穿。一位公社干部在布置造假时说得直截了当：“现在的大好形势，谁都知道是吹出来的，现在到了如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这次我们要豁出去了，为县社领导争光，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如何干的问题。”[29] 由于毛泽东亲自鼓励造假，基层造假者不会受到损害。例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因放高产卫星而受毛泽东重用，但没有因为造假被拆穿而被降职。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时为自己辩护说，1958 年放卫星时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他只是随大流。[30]

“放卫星”热潮是毛泽东推动的。从 1957 年底在莫斯科吹牛后，他在 1958 年周游全国视察，推动吹牛造假，亲自控制《人民日报》“放高产卫星”，同时要求“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鼓励各级干部继续吹牛造假。在他授意下，《人民日报》1958 年的数百篇关于农业，农村报导全部吹牛、造假，其中的《徐水人民公社颂》、《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富》、[31]《事在人为，地在人种》、[32]《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33] 是了当年吹牛造假的范文。《徐水人民公社颂》发表后，作者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被篡改，向报社查询。报社回复说他写的数字太低，以徐水基层提供的数字见报。

“放高产卫星”运动不光发生在农业领域。在反右运动制造的精神恐怖中，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逼迫下，科学家、知识分子们或为形势所迫，或出于投机心理，也纷纷加入吹牛撒谎也造假。其表现之一是为农村放出“粮食高产卫星”作科学担保。例如，科学家钱学森撰文称：“从科学理论上讲，如果能科学的利用土地的话，稻麦亩产可达 4 万斤，蔬菜亩产量可以达到 160 万斤，”“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动力，我们就可让农作物产量无限增长”。[34] 他很清楚毛泽东爱听这种话。科学家、知识分子吹牛造假的表现之二是“放科研卫星”。“放卫星”热潮中，北京的研究单位报出研究成果 1000 余项，声称其中 100 多项超过国际水平”；[35] 北京大学声称，在半个月完成了 680 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 100 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 50 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6]

推动吹牛造假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政治局常委们、政治局成员们全都效仿毛泽东，到高产典型公社视察，发表支持讲话，为“放高产卫星”，为吹牛撒谎站台。众高层当然看得出堆成垛的试验田之假，他们更清楚质疑高产典型的政治风险。李井泉在视察时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是群众的积极性

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非要查个究竟，居心不良！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37] 他的这番话代表了众高层推动吹牛造假时的心态。他们根本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但为了党的需要和个人的乌纱，大家积极迎合毛泽东的妄想，同时对下级施压。华东的柯庆施、河南的吴芝圃、西南局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等一众大员都是一面揣摸圣意邀功，一面残酷打击讲实话下级干部。大员以下的各级领导人层层仿效，以撤职罢官相逼迫下一级。这样的层层逼迫到了基层就极为恐怖了。例如，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把质疑造假的几位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斗争，拳打脚踢，然后送去劳改，将其中一人迫害致死。在“放高产卫星”、树立共产主义典型期间，徐水县有近五千干部、农民因反对吹牛撒谎而被逮捕、迫害。在甘肃，由于合作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饥荒在 1958 年春天就开始了，省委书记张仲良隐瞒饥荒，向中央报称甘肃是“余粮省”，推行“高指标、高征购”，对有反对意见的干部农民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在上海市奉贤，中共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实施捆绑吊打、乱罚乱关。[38] 山东鄞城县县长鲁成六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揭发菏泽地区上报的“亩产双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 300 斤，结果信件被退回中共菏泽地委，鲁被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逮捕入狱，许多为鲁鸣冤的学生、干部遭开除、撤职、批斗。无数农村基层干部因报不出领导要求的产量而被批斗和镇压。“高产卫星”全是在被这样的恐怖逼迫出来的。

这场吹牛造假的“放高产卫星”运动规模之大，内容之荒谬空前绝后。“放高产卫星”热潮中，毛泽东的妄想继续膨胀，在武汉视察时说，“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39]人们不会想到是，策划“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他披露用意说：“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

有真卫星。”[40] 在“放高产卫星”热潮中，无人清楚毛泽东所说的“极大好处”何意。后来人们才理解，他鼓励吹牛“放卫星”是另一“阳谋”，他要求按照“放卫星”的高产指标搜刮粮食。

大炼钢铁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1957年底，他在莫斯科即席宣布，中国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当时英国钢产量2000万吨，中国500万吨）。回国后，他要求冶金部长王鹤寿将1958年钢产大幅提高。王不敢违抗，按毛之意制定了产量指标。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000万吨钢，5亿吨煤，4000万千瓦电。”3月，王鹤寿向毛提出报告说，不用十五年，钢产量十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二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赞王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的批语中引用了王的报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将1958年的钢产量大幅调高到800万吨。然而会后，他对800万吨的钢产量又不满意了，要求当年的钢产量翻番，召集主管经济的陈云、薄一波和冶金官员开会讨论钢产量翻番的办法。陈、薄等知道，若不按毛泽东的指示下达计划乌纱不保，下达计划的完不成还是乌纱不保。于是，他们想出了让毛泽东在数字上实现妄想的办法——搞“土炉子”。他们非常清楚“土炉子”炼不出钢，但相信没有人敢质疑“土炉子”炼出的不是钢，相信这样可以凑出毛泽东要求的钢产量。于是，陈、薄半路修改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将钢产量高调，陈云出面向毛泽东呈上了以“土法炼钢”为主要内容的“八条意见”。毛泽东赞赏“土法炼钢”办法，决定推行。7月底，毛向来访的赫鲁晓透露了钢产量当年翻番的计划。赫鲁晓夫凭常识断定毛的计划是无稽之谈，一笑置之。而赫的顾问阿尔希波夫则向薄一波明确表示钢铁半

年翻番计划实现不了。薄不便如实相告，只糊弄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不接受这样的糊弄说法，直言“土法炼的钢不能用”。[41]

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导政治局通过了“大跃进”决议，要求1958年粮食、棉花、钢铁的总产量比1957年翻番。会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向国人吹牛说，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可使当年钢产量翻番。会后，负责完成炼钢指标的陈云、薄一波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逼迫下级在数字上完成翻番，陈作指引说：“完成钢产量指标，土炉子是关键”，薄传毛泽东的话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42] 在1958年的后四个月，各省委书记亲自挂帅，指挥上亿国人建土炉子炼钢。土炉子热潮中，中南海里也建了土炉子给毛泽东看。为完成吹牛指标，毛泽东下令收废钢铁投入土炉子凑数，指示将宁波、胶东等铁路线拆除炼钢。据毛此令，基层官员们采取逼迫手段，提出“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口号，强迫老百姓将家里的菜刀、炒菜锅、铁荷叶、铁门把，甚至妇女的铁发夹交出来扔进土炉子。各级官员为保乌纱各出奇谋：湖北大员王任重下令在铁路两旁修起小高炉炼钢，组织男女老少作炼钢表演糊弄来视察的毛泽东；安徽大员曾希圣拿正规钢厂出产的一块钢给毛泽东看，称是土炉子炼出来的；广东大员陶铸放出了日炼生铁达到了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的“炼钢卫星”。[43] 整个“大炼钢铁”运动中，从毛泽东到基层干部，无人不吹，无人不骗。

各地的土炉子大都是在地上挖个坑，盘起个大炉灶，通上风箱，放入煤炭或木柴，上堆废铁。炉火化不开废铁，土炉子一烧就塌，人们才知道有耐火材料一说。湘西某村以巨大山谷作为炼钢炉，全村老少齐动员，把废钢铁运至谷中，砍尽山上的林木抛入“炼钢炉”中，让大火持续燃烧半月。安徽大员曾希圣亲自推动，创造了“炼钢炉”之最：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

死，砍尽山上林木与铁矿石、收来的铁器一起推下山沟，放火烧上几天。各地的土法炼钢无非是将铁器熔成一砣，然后将一砣砣铁碴与煤碴的混合物系上红带子，敲锣打鼓地送给上级报喜，声称炼成了多少吨钢。在从上到下互相糊弄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各地全民上山砍树，挖煤，建“土炉子”，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山林环境的狂潮。

毛泽东虽然对工业无知，但并非完全相信大员们的糊弄。他要求地方官员用各种办法凑足吹牛数字以帮他维护面子。他在视察中禁止质疑“土法炼钢”说：“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他亲自控制报刊、广播发布虚假的钢产量消息。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全国日产钢铁6万吨，此后各大报每日报喜，有说全国日产钢超过10万吨的，有说日产钢20万吨、生铁30多万吨的。11月2日，河南新乡放出了日产生铁102万吨的“炼钢卫星”。12月，当听到手下报告1958年钢产量翻番将胜利实现后，毛泽东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立即亲自放钢产量“卫星”，要求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命冶金部将原定到1962年达到20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指标提高到9000万吨。

全民炼钢并非由于民众颠狂，而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千百年来，统治者不可能垄断民众生活的全部，农民自耕存粮，不受官府控制，民众有择业，迁移的自由。在一个地方受到压迫可以选择迁移。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服从中共指挥是唯一活路。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农民的房子、锅灶被拆了，没有外逃之路，除了服从基层干部的调动没有别的活路。于是，九千多万农民放着成熟的庄稼不收割而上山炼钢。对农民来说，这时去收割庄稼与去炼钢没有区别。因为，人民公社将一切归公，收获粮食政府要拿走，收与不收都一样。“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私产充公，将自耕农变成了农奴，使农民不仅丧失了播种的积极性，甚至丧失了收获的积极性。1958年是个

大丰年，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没人收割烂在地里。被迫上山炼钢的农民极其悲惨，成为不许下山，“生活军事化”，丧失人身自由，在冬天降临的饥荒中大批饿死、冻死。

年底，新华社发布消息说，1958年钢铁总产量为1108万吨，在数字上算是为中共在北戴河会议公报中的吹牛圆了场。但实际上，1958年的实际钢产量没有增长，还是正规钢厂生产的500多万吨，另外的500多万吨是各地虚报和《人民日报》吹的来的假数字，其实物是全国土炉子旁边堆积成山的废渣砑子。全国四个月的“大炼钢铁”胡闹只为了满足毛泽东一人的妄想。这就是毛要达到的全民听从他一人指挥理想社会，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抒情诗”。

造假的钢产量数字公布后，大炼钢铁灾难并未结束，1959年，在饥荒蔓延全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上天”。[44]于是，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仍有数千万人饿着肚子在土法炼钢，数百万农民饿死在了土炉子旁。

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数百亿元的损失。这一损失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额。大炼钢铁运动还是一场全民砍树毁林，破坏环境、破坏古建筑的灾难。运动中，各级政府为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计后果地下令砍树为柴，广东增城的荔枝树被砍伐为柴，浙江兰溪珍贵的乌桕几乎被砍绝。基层领导们还下令拆古建筑，拆砖块拿去建土炉子，拆珍贵木料拿去作柴烧。经过大炼钢铁后，大片青山绿水国土被糟蹋成了荒山秃岭。今天的国土荒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肆虐沙尘暴的原因之一就是1958年大炼钢铁。

从清末到民国，历届执政者的权力和行为都受到制约，没有哪一位执政者完全控制所有报刊，消灭一切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历届执政者认为在舆论批评中执政很正常。如果清政府强迫全民“大炼钢铁”，早会有众多“庚子五大臣”那样有识之士出来死谏；如果民国政府如此胡作非为，反对派势力和舆论也早已出来制止。而共产革命带来了空前的专制，中共取缔了一切独立报刊、电台，反右运动消灭了一切反对声音，毛泽东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中共高层全体附和毛的妄想，没有人敢提出半句批评。于是，中国发生了“大炼钢铁”这样全世界最黑暗的暴政。

“大炼钢铁”灾难不可能发生在清末、民国还有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前朝统治者爱民。没有哪一位统治者以祸害百姓为乐。而毛泽东不同。他完全不关心百姓死活，心中只有他的中国皇帝梦，世界领袖梦。并且，不顾百姓死活的不只毛泽东一人。中共高层中关心百姓死活，为民请命，敢讲真话者早就成了“反党分子”、“右倾分子”，被踢出了官场，其他人都不顾百姓死活，助毛为虐，因此得以在官位上生存下来，而这些事实是遍布全国的革命纪念馆都不会告诉后人的。

修水利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水利。根据毛泽东的“三化指示”，徐水县不顾地方财力条件和老百姓死活开建大型水利工程，将农民编成团、营、连，“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中共将这样的“徐水模式”推广全国，将数千万农民编制成军营，送去水利工地作奴工。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安全保护和伤病饥饿，修水利的民工大量死亡。当时广泛宣传的“平陆事件”（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毒事件）是修水利民工苦难的缩影。

“大跃进”运动中，三百多平陆农民被编成军营，在饥饿中服苦役，没有人身自由，连过年都不得休息。排长张德才因说了句“死了人是因为吃不饱”的实话而被撤职、批斗。他决定对主持批斗的副连长投毒报复。行动前，他

想了个心愿，给女儿买一双花鞋。但他穷到没有钱买一双鞋。他遍向同营的民工借钱而不得。大家不借钱不仅因为他是批斗对象，还因为人人都与他一样穷。无法了心愿，张德才决定报复社会，将毒投到了食堂大锅里，民工集体中毒。山西卫生部门紧急向北京求援，北京有关部门安排空运注射剂到山西，中毒民工获救。事件发生后，党报按照“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不予报导，但《北京晚报》的一篇题为《千里急救》的报导使事件传遍全国。随后，《中国青年报》的发表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文，在其中写道：“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平常事足以体现我们时代最美好的思想、最高尚的风格”。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新闻界、文艺界掀起了以“平陆事件”为题材歌颂大跃进的热潮。其实，中毒的六十一位民工中有不少人是被送到民工营劳改地主富农子弟和所谓反革命家属，是当局所谓的阶级敌人。他们暂时被宣传成了阶级弟兄，宣传热潮过后，他们继续遭受迫害。[45] 将数亿农民沦为农奴，饿死累死的苦难完全掩盖，将农民穷到买不起一双鞋的苦难宣传成“最美好思想、最高尚风格”的故事，这样的事很难让后辈青年相信。

甘肃省的“引洮上山”是大跃进水利工程的代表作。它计划以 1400 公里长、翻山越岭的水渠引洮河水到黄土高原，调十七万民工修了三年，造成两千多民工死亡，结果完全无用。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是这样的“血淋淋”的浪费，许多工程半途停工，建成的工程多半是病库险坝，在随后二十年中大量崩溃。例如在 1975 年的特大暴雨中，河南板桥、石漫滩等六十座水库崩溃，致遂平、西平、汝南、平舆、新蔡、漯河、临泉等七县一片汪洋，造成二十四万人死亡，是世界历史上因人为技术原因死人最多的灾难。如此多的水库一起溃坝不能全归因于天灾，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修水利不讲科学，粗制滥造的人祸。

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大跃进”水利工程的另一代表。1952 年，毛泽东在河南考察期间听取了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毛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建议在黄河流域三门峡等处分别建设四十多座大坝

以控制黄河洪水。毛泽东听罢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决心建大坝的水电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这句没有具体意义的话作为建坝的批准证书广为宣传，邀请苏联专家组来华勘查设计三门峡工程，向苏联专家提供了虚假的黄河泥沙量数据。根据虚假资料，苏联专家同意了水电部门提出的高坝全部拦沙，清水下泄的方案。王化云将此“黄河变清”的计划直接报毛泽东，毛表示赞赏后，一个大型水利项目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决定了。毛泽东决定建三门峡大坝，除了因为爱听“圣人出，黄河清”的颂扬之外，还因为水电部门吹嘘的大坝将使全国的发电能力翻番的说法，期望大坝能带来巨大发电能力，支持他的军工、核武器计划。当时，陕西省强烈反对这一规划，因为他们凭常识知道，三门峡大坝一建，下游可以免除洪水了，但抬高水位将淹没陕西大片良田，增加陕西的水患。但人大以鼓掌方式通过了建三门峡大坝议案，陕西代表的反对声音被淹没在掌声中。

对于人大没有经过专业论证就通过建三门峡水库的议案，留学归来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指出“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两个月后，周恩来召集七十位专家举行“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与会专家们知道毛泽东和人大已以批准，工程已经开工，不再发表反对意见。黄万里不考虑政治风险和个人得失发表反对意见说：“建坝拦沙让黄河清的设计思想基础错误，违反自然规律，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建坝方案没有提供解决泥沙淤积有效办法。按方案建坝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大坝还将把下游的洪水搬到上游。”对黄万里的反对意见，周恩来也说了不算。当年，纪录片《1957年国庆节》中的《祖国颂》歌曲将“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句唱遍全国，三门峡工程成了社会主义象征，不能再批评。提出批评的黄万里被毛泽东亲自划为右派分子，然后被报复性地安排到三门峡大坝工地劳改。在大饥荒中，耗资巨大的三门峡工程理应停工，以救灾为要。但周恩来

揣摩圣意为政，决定特别优先保证该工程投资。这一工程是水电部门的“钓鱼工程”，即先将投资少报，获准开工后再迫使财政追加投资。开前上报的十三亿元预算在大饥荒中被追加到四十多亿元。这笔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投资在大饥荒中可买 800 亿斤粮食，救全国饥民于不死。

1960 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黄万里警告的灾难立即出现，泥沙淤积严重，致高坝低用，设计能力报废。然而，灾难才刚刚开始。泥沙迅速淤积上游潼关、渭河，使渭河成为悬河，黄河回水倒灌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淹没两岸农田数十万亩，迫使一些县城搬迁，导致富饶的关中平原碱化、沼泽化，粮食年年减产。实际情况恰如黄万里所警告，三门峡大坝把河南小灾难搬到陕西变成大灾难。在 1962 年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请国务院从速采取措施救陕西的淤积灾难。水电部为避免被追究责任，要求劳改中的黄万里支招。黄万里赶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和方法》报告。周恩来决定对三门峡工程改建。在改建工地，黄万里面对被炸得千疮百孔的大坝落泪了。他清楚，倾国财力建成的三门峡工程不仅成了废物，更成了祸害。经过改建，大坝原设计发电量的 120 万千瓦仅剩了零头 20 万千瓦；耗资巨大的改建并未解决上游淤积问题。毛泽东得知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发电能力只剩下零头，怒言要把大坝炸掉，从此再不提黄河之事了。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门峡水库成了巨大遗害，存废两难。若存，上游洪水威胁，陕西“小水大灾”无尽头；若废，下游生态、社会问和百万移民问题无法解决。当年在论证会上支持三门峡水库方案的原水电部长钱正英和专家张光斗承认：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庐山会议

中共的大炼钢铁、大修水利暴政造成 1958 年秋粮无人收割，一半烂在了田里。秋收时，中共中央下令按吹嘘到几倍、十几倍的“放卫星”高产指标征粮食，各地基层将秋粮全部收走仍不能完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只好组织人挨家挨户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年底，各地公共食堂断粮，农民开始大

批饿死。各地大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会议，叫停大跃进和高指标征粮。毛泽东手上有各地的饥荒报告，和请求停止高指标征粮的报告，但他相信农民翻不了天，要求加大力度征粮出口，以为快速军事工业化换外汇。在反右倾运动的高压之下，高层们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批评，更不敢向他挑战。1959年3月底，中共中央于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导下作出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提高到40%。这时，饥荒已经蔓延十五省，告急报告越来越多。毛泽东感高层中对提高粮食征购比率的不满，决定召集众高层到庐山避暑，声称“开一个远离喧嚣，开怀畅谈的神仙会，让大家发发牢骚”。6月，毛泽东由韶山乘船到九江，然后上了庐山。期间，他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等诗句，显示他对十几省的饥荒全不在意。

1959年7月2日，中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在庐山上开幕。毛泽东将亲信扩大进会议，将会议分成大组漫谈，任命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大跃进”骨干为大组组长，指定秘书组负责记录及编制会议简报，以确保对会议进程控制。他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回避正在扩大的灾难，拒绝接受各地请求降低粮食征购指标和增加粮食返销的要求，坚持按“放卫星”的指标多征粮食。与会者都清楚“大跃进”造成灾难之严重，但他们又清楚，发言记录将报到毛泽东手上，于是谁都不提饥荒。刘少奇带头以“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46]的说法绕圈子，会议真成了避暑“神仙会”。

被分在西北小组的彭德怀对会议在各地饥荒情况下闲扯不满。年初，他到了家乡湖南和甘肃等地，了解到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年中，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听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高层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受到震动。他决心回国后说服毛泽东改变大跃进政策。在庐山小组会上，他打破沉默说：“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

危险的。”会下，他想找毛泽东当面谈被卫士挡驾。回到住处，他给毛泽东写信。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是毛泽东鼓动的结果。半年前，毛泽东在长沙观赏了湘剧《生死牌》，然后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海会议）上发号召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响应毛“大胆批评”的号召，彭动笔写信表达批评意见。他这封后被称为“万言书”的信其实只有 3700 言，分两部份。第一部份是毛泽东爱听的话，赞扬大跃进成绩主要，缺点次要；第二部分指出大跃进给农民带来困苦，希望结束大跃进政策。7 月 14 日，彭德怀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阅后没有召彭谈话，也没有复信。他不是考虑彭的批评意见，而是在想怎么整肃彭德怀。

两天后，毛泽东重施“引蛇出洞”伎俩，将彭的私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印发会议代表讨论，引诱反对大跃进者发表批评意见，同时宣布延长会期，一边分组讨论彭的意见书，一边增加几天休息，称让代表们在庐山上逍遥。在小组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清楚犯毛泽东忌讳的后果，在讨论中不谈问题，只唱高调。只有彭德怀、张闻天等几人有些温和的批评。彭德怀批评毛泽东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 万吨（钢产量）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7 月 21 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在第二组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当天早晨，胡乔木还打来电话予以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大炼钢铁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张闻天感到大跃进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拒绝沉默，批判大跃进的问题。第二组组长是柯庆施指挥数人不断打断张闻天的发言，提出质疑。张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纲，滔滔不绝说：有人说，多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就会使人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但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才有利于改

正缺点。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泽东经常提及。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他直指大跃进中比例失调，指标过高，求成过急，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 2,000 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等等恶果。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暗示为这是毛泽东的忌讳。张闻天继续说道：“全民炼钢不单赔了 50 个亿，最大问题还在 9,000 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他说：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彭德怀的意见书主要篇幅是颂扬大跃进，讲成绩，讲优点，只有一小部分揭问题。而张闻天的发言滔滔不绝讲三个小时，万余言，基本都是揭露问题。最后，张闻天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批评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受彭德怀、张闻天发言鼓舞，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务实官员在会上发言表示赞同彭的意见，发言批评了“大跃进”。最了解“大跃进”的灾难情况的周恩来在会上沉默，但在会下向彭德怀发“大跃进”的牢骚说，粮食产量数字有弄虚作假问题，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等等。彭德怀质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说：“讲这些困难会被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直指：“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47]

在会议目的一时达不到延长会议，在会下暗中布署是毛泽东遇到挑战时法宝。在遵义会议、洛川会议中计划受阻时他都曾提议休会，在会下活动，然后在复会时达到了目的。在庐山会议休息的几天中，毛泽东采取了一连串行动：急召林彪、彭真上山，让林出面对付彭德怀；以宣布彭真代周恩来主

持会议的方式敲打周；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一起游泳，请王向刘转达特别的关心与问候；邀王任重等各地大员游泳、共进午餐，要求他们就整肃彭德怀作出表态。得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陷入抉择的痛苦。他清楚毛泽东问候是让他就整肃彭德怀表态，清楚如果站出来支持彭德怀有可能一举扭转大跃进的政策，但更清楚挑战毛泽东的后果。从延安到北京，他追随和吹捧毛泽东而升迁。八大上，他挑战了毛的独裁，制定了反冒进、反个人独裁的八大路线。会后，毛泽东立即反对八大结果，他不敢说毛也应服全党的决定。八大后不久，他被毛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架空。为赢回毛泽东的信任，他主动抛弃八大路线，在南宁、成都，北戴河等系列会议上加入了歌颂了毛泽东热潮，支持了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放卫星”、“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作为“大跃进”的第二决策者，他也不能言错，言错意味要负第二位责任。在抉择面前，他“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48] 经过几天考虑，刘少奇决定趋利避害，继续追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高层没有刘那样的抉择痛苦。他们知道支持彭德怀意味潘复生那样下场，毫不犹豫地表态追随毛泽东。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复会。他发表讲话说：忍了多少天，现要反击右倾份子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对大跃进的攻击。他号召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蔑，称大跃进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声言“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灭亡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杀气腾腾的言论震慑了全体高层。柯庆施等大跃进骨干立即跟随发言攻击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众高层表态支持“大跃进”和“反右倾”，加入了批彭，会议从原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纠错议题转为了“反右倾”。

当天会后，彭德怀找毛泽东面谈被拒。随后，他去与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诉说，被负责监视的罗瑞卿和参与彭等聊天的李锐分别密报告给了毛泽东。戚本禹在晚年回忆录披露：“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

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中央的‘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49]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会议转为以批判彭德、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小集团”为主题，要求人人表态。顿时，神仙会成了批斗会，四人在各自大组接受老战友、老部下们指着鼻子批斗。毛泽东整肃彭、黄、张，周不只是因为四位批评了“大跃进”，还因为与整肃刘伯承、萧克一样，要清算与四位的历史恩怨。对彭德怀，毛泽东有不少旧怨：长征路上林彪等人举荐彭德怀出掌军权被毛认为是彭的主意；彭在抗战中违反了避战纪律打了“百团大战”；彭在延安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彭在建国后反对在北戴河圈占风景区和别墅群，直指北戴河避暑办公制度是劳民伤财，搞特殊化、以从不到北戴河休假，不要北戴河别墅的行动拒绝特权；彭是唯一反对从各大军区选女兵到中南海陪舞者，还是高层中唯一反对各地大员为毛建行宫者；彭曾骂萧华、罗瑞卿、叶子龙等人“选妃子”、“不干好事”，迫使中南海文工

团解散，让毛泽东抱怨“作了和尚”等等。[50] 毛泽东对敢于批评自己的彭德怀掌军不放心，担心彭像朱可夫元帅那样调动军队左右政局，因此在发动“大跃进”时安排林彪接掌了彭的大部分军权，此次庐山整彭是剥夺其军权的后续行动。对张闻天，毛泽东也有不少旧怨。长征路上，毛策划夺权时只能推张为总书记以应付莫斯科。重掌中央红军军权后，毛泽东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会上以提出辞职来否决多数意见，新任的张闻天不接受要挟，主持举手表决批准了毛的辞职，使毛一时不了台，幸亏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撤职决定。张下令，早晨吹号后，所有人都要起床。而毛习惯早上不起，抱怨说，这类事张本来可以不管。张讲究程序规则，要求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逐项讨论，作出决定。毛反对按议程开会，喜欢东拉西扯开长会，指张知识分子气太重。一次会上，毛泽东交议一份文件。张拒绝说此议这次会不谈。毛怒将文件扔到了地上。[51] 到了延安，毛在权力地位稳固后对张越来越不耐烦，称张为“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对中国“一事不懂”，特别对张闻天带头反对他与江青结合怀恨。张难以忍受毛的多疑、记恨，满口粗话、独裁、开长会东拉西扯，感到难与共事，承认自己不擅权斗，主动请辞总书记淡出权力中心，以到农村搞调查为名自我放逐。张虽退出权力争斗，但毛认定张是国际派，计划整肃。两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张闻天阅毛泽东的“收网令”文章后以不写“已阅”的方式表达了保留意见，让毛又添新怨。对黄克诚，毛也早有不满。建国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一年前，黄向毛泽东对金门炮战提出意见说：“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何必呢”。这让毛再添记恨。周小舟虽然每次接驾周到备至，但毛将他与主动建行宫的湖北王任重、四川李井泉、华东柯庆施相比，仍不满意。“大跃进”运动中，周对放高产卫星、“土炉子炼钢”消极应付，坦言湖南建起的五万多座土炉子中有两万多个没点过火，是交差充数的，引致毛记恨。在庐山会上，周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言更是刺痛了毛。[52] 当时的国人常看到毛泽东灯下办

公的照片，其中包括在庐山办公的照片。国人不知，毛办公不是在考虑国计民生，而通常是在阅高层们的会议发言记录，在盘算着整肃批评者。

8月1日，被毛泽东急召上山的林彪到会发表讲话。他不谈饿死人的灾难，不提彭德怀的意见书，专注对彭展开攻击，斥彭“个人英雄主义”，称“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53] 林彪讲话后，全体高层无人敢言“大跃进”有错，更不敢提饿死人。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会议转为扩大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样的会议进程呈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丑恶。古来，皇帝、朝廷都自认有救灾的责任，发生饥荒是要讨论应对的，皇帝或要颁罪己诏，大臣要提出救灾措施。而中共此时是非善恶完全颠倒，独裁者要在饥荒中向百姓搜刮更多粮食，众高层不敢提及饥荒，更不敢提救灾，开会内容是整肃对暴政稍有微词者。至于开会议程也是政治史鲜见的荒唐。毛泽东召集众高层上庐山只说开神仙会，既没有说是政治局会，也没有说要召开中央全会。结果，他半路休会，随意召人上山，随意宣布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随意宣布为中央全会，众高层完全是任凭毛泽东摆布的木偶，其局面既不如封建皇朝上朝来得规矩，也没有现代政党的平等讨论的话语空间。

8月2日，毛泽东宣布八届八中扩大全会开始。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斥张闻天道：“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会议内容是分组将彭、黄、张，周四人等围在会场中间继续批斗。通过会议记录，毛泽东盯着每个人要求表态。多数人不温不火的批判两句以作交差，彭的朝鲜战场搭档洪学智以沉默拒作表态，黄永胜、苏振华、肖华、宋任穷等少数人上前指着鼻子骂，从个人野心骂到“百团大战错误”，骂到里通外国、伪君子，诬陷私生活不检点等等。[54] 众高层们知道彭是高层中私生活最

检点者，但他们需要通过骂彭来作政治表态，没什么别的骂就骂生活不检点交差。在讨论彭的“万言书”时沉默的周恩来此时不再沉默，斥彭以毛泽东表态效忠说：“彭的骨头是犯上”，“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55]

当晚，毛泽东写了一封《给张闻天的信》，继续训斥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建议你一读枚乘《七发》，可以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忽然汗出，霍然病已。……”毛泽东下令将这封通篇不讲道理，只是胡乱骂人的信印发全会，作为批斗指引。彭、黄、张、周没有像“庚子五大臣”那样冒死为国，为我饥民请命，也没有坚持讲真话，而是遵循党内规则作检讨，然后是自污，在批斗会上不断往自己头上戴大帽子，扣屎盆子，把重高层批判自己的尖酸刻薄语言不断重复，甚至添油加醋，把自己骂得更加丑恶，以期毛泽东看到自污记录后高抬贵手。张闻天检讨说：“我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我片面地夸大了某些缺点，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首先是我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他表示愿意收回在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然后吹捧毛泽东并揭发彭德怀说：“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

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军事俱乐部去了”。彭、黄、张、周等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敢谏之士。从延安整风时起，彭德怀就是中共党内唯一敢于批评毛泽东的人，黄克诚也在多年后被中共纪念为“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连他们都检讨自污，然后互相揭发了，可知革命家中并不存在“一辈子讲真话”者。

毛泽东不因四人检讨而留情，下令将四人隔离反省，主导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宣布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接着召开关于人事变动的中央工作会议，宣布十二项人事决定，其中主要是将彭、黄、张、周四人撤职，任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此前没有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免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个人决定，程序上既违反宪法，也违反中共党章。上述人事任免之后，刘少奇发表讲话向毛泽东表达效忠说：“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56]

中共中央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向国人披露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而隐瞒了此前庐山上近一个月的“神仙会”，隐瞒了彭德怀写给毛泽东意见书（万言书）和彭等四人对“大跃进”的批评发言。全会公报说：“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

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公报将最重要的全会的结果——关于清算彭德怀等四人的几个决议向国人隐瞒（这些内容在八年后的文革斗彭德怀时被中央文革披露）。由于上述隐瞒，国人不知道中共在全国饥荒时在庐山上避暑闲扯，不知道彭德怀发言、上书为民请命，不知道众高层在山上开批斗会，不知道中共将四位发表言论者罢免。

10月6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伟大的十年》，在其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

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将此文与周在庐山对彭德怀的私下言论对照，其蓄意助纣为虐的嘴脸暴露无遗。庐山开会的中共高层全体与周一律，明知饥荒蔓延全国而鼓吹“特大丰收”。

庐山会议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议。中共拒绝了彭德怀结束大跃进灾难的动议，决定继续按吹牛指标征购粮食，其结果是将几百万人饿死的灾难扩大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庐山会议又是一次丑恶的会议。上庐山之前，众高层都阅知了饿死人的饥荒报告。在庐山上闲扯半个月中，他们完全回避遍及十五省的饥荒，除仅有的几位发出些许避重就轻的批评声音外，全体高层没有一个人提及严重的饥荒。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们都清楚在饥荒中继续高指标征粮食的后果，但为保住自己的官位，大家一起颠倒黑白，助毛为虐，批斗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举手同意继续横征暴敛。由于会议内容太见不得人，中共将庐山会议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销毁了会议记录，庐山会议的亲历者们绝大多数至晚年都不愿披露会议的实情。因为大家都想掩盖自己参与制造大饥荒的真相。

会上的不同表现决定了高层们的日后命运。不积极批彭者受到了整肃，洪学智被赶出了军队，邓华被指“假批判真保护”，后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其余对批彭有保留者多被逐出了军队。指着鼻子骂彭德怀的苏振华、李井泉等人在会后获毛提升。其中李的提升成了西南数省饥荒极度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最积极的李井泉回四川后效法毛泽东“引蛇出洞”伎俩，先把彭德怀的“万言书”在省内干部中印发，让干部发表意见，待收集到一批支持彭德怀的意后亮出中共中央反右倾的指示，将支持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者一网打尽。

军委批彭

抱着解救饥荒愿望上山的彭德怀没想到被罢官押送下山，在下山时要求警卫员开枪打死自己。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召集千余高级将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及其支持者，召集外交系统高层举行批判张闻天及其支持者的大会。参加了庐山会议的高级将领在庐山已经批彭表示了效忠。再次的军委会议内容实际是要求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军队高层人人表态。

8月21日，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扩大会议。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将领们知道，批彭对个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批则后果严重，于是争相落井下石。留守北京没上庐山的陈毅狠批彭德怀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57] 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不留情面地狠批老上级彭德怀；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指着彭德怀的鼻子说“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再一拳将彭打倒；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则把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帅头上；萧华等其他野战军将领也积极批彭表态。8月24日，周恩来到会作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以元老资格为毛泽东的彭在历史上与他不合作的说法作证，历数“彭德怀三十年来反对毛主席”。

少数不认同批彭的高级将领立即受到整肃，其中万毅中将被监禁，钟伟少将当场高呼“批彭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批斗会后，毛泽东将中央军委改组，正式以林彪主持军委，提升了庐山会议上批彭积极的贺龙、谭政、罗瑞卿等人。

反右倾运动与反瞒产私分运动

1958年秋收时，毛泽东下令按“放高产卫星”吹出来的指标征购粮食。这样的征购指标比实际粮食产量高出很多倍，不可能完成。完不成征粮任务，

各地大员需要给毛泽东个说法。大家都清楚按“高产卫星”指标征粮之暴虐，但没有人敢说破。率先吹出“千斤县”的广东大员陶铸、赵紫阳又率先推出了“瞒产”说法向毛泽东交差。1959年1月，赵紫阳在《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在报告上的批示：“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反瞒产”。[58] 与广东的大员一样，湖北的王任重也将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归咎于是农民藏粮，在2月的讲话中说：“今年闹粮食问题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没有粮食。……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一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付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付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讲实话。”[59] 毛泽东早就收到了各地关于饿死人的报告。他将饥荒归咎于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阅赵紫阳的报告后，毛在3月初的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上以赵、陶的报告为证据说：“除少数灾区外，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60]

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否认农民缺粮，拒绝降低征粮指标，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要求以“反右倾”与“反瞒产”的办法完成征粮任务。会后，中共中央连续下达文件，要求基层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瞒产私分运动”，秋收时“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再安排生活”，把农民私藏的粮食挖出来，严令各地必须完成粮食调出计划，不能推迟。1959年的全国粮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400多亿斤。各地干部在“反右倾”运动逼迫下虚报的粮食产量为5400亿斤。毛泽东要求按虚报的高产数字多征几百亿斤粮食，并发话秋收时征粮要“先下手为强”。按此要求，各地实行“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以防农民藏粮。以河南省唐河县为例，中共将1958年已经高达30%

的粮食征购比例再提高，达到 54%。[61] 经过如此“就地征购”，除基层干部掌握少量粮食开小灶外，农村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被搜刮殆尽。房子被拆，锅被砸了炼钢的农民陷入了绝境。

由于虚报的粮食产量过高，各地在“就地征购”后仍完不成上级规定的粮食调出任务。从毛泽东、各地大员到基层干部都将完不成高指标征粮的原因归因于农民隐瞒了产量，私分、藏匿了粮食，干部中的“右倾分子”征粮不力。于是，中共指挥各地基层组织起反瞒产工作队，挨家挨户搜刮粮食，将干部、农民集中看管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捆打逼供藏粮地点，找到粮食才放人。工作队再顺藤摸瓜，抓更多的人逼迫他们告密，以宣布揭发者可分享挖出粮食的一半等办法挑动农民间互相陷害。反瞒产工作队不仅自己殴打农民逼交粮食，还逼迫农民互相殴打。在河南信阳，征粮队在“反瞒产”中施用酷刑有百种之多，打死逼死八万余人。[62] 在嵯峨山，人民公社基层干部营造出了“不打人就右倾”的环境，以是否动手打人为衡量“反瞒产”工作队员是否右倾的标准。在甘肃通渭，征粮队把藏了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63] 在广东，华南局书记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反瞒产大会，规定主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不坦白者不准回家。在他领导下，广东各县遍设查粮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将农民家中粮食，黄豆、花生、芝麻、菜种搜刮一空。一向余粮的广东在邻近的香港接受了大量的饥民的情况下仍饿死百余万农民，证明了广东“反瞒产”之暴虐。在山西寿阳，中共县委将一亿多斤的粮食产量虚报成两亿多斤，按照一亿斤征粮，给全县农民仅留下包括籽种、饲料在内的两千多万斤口粮，人均口粮仅留下百余斤。执行中共中央的反瞒产私分指示，中共寿阳县委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为由向全县农民集资 400 多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 46 元，而集资任务每人 50 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 80 万元，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中共寿阳县委挖粮集资的手段包括，派搜索队强搜，翻箱倒柜，挖地刨墙，私设公堂，施用刑罚二十多种拷打逼要等等。在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1 月的“挖粮集资”运动，中共寿阳县委抄家万余户，掠夺财产两万多户，残酷

斗争三千多人，害死数百人，是为骇人听闻的寿阳事件。在中共中央必须完成征粮任务的逼迫下，各地“反瞒产私分运动”发展成了干部率民兵的武装搜粮。不言而喻，武装搜粮意味着枪杀饥民。武装征粮之外，各地还实行了武装护粮。饥荒之初，绝粮饥民还有力气冒死偷粮抢粮。各地政府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下令对偷粮抢粮者格杀勿论。不过，各地枪杀偷粮饥民的数字不大。因为，饥荒之初，饥民中少有冒死抢粮者。随着饥荒持续，饥民们有胆无力，站都站不起来，无力再抢粮。

“反右倾”运动的祸害不光在农村，“5.9 大同矿难”是“反右倾”造成工矿灾难的典型事件。按照毛泽东“两本账”的要求，中共向工矿企业下达了异想天开的生产任务指标。敢于讲实话，敢于坚持规章制度的基层领导人被以右倾罪名清洗，新的基层领导在上级层层下压的高指标面前，抛弃规章制度，不顾工人死活地要求各矿打高产战役，搞井下“大比武”，导致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 682 人死亡的煤尘大爆炸事故，是为世界采矿史上死人最多的矿难。事故后，当局将这一大矿难隐瞒（大同矿难三十八年后被披露为世人知晓），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拍着桌子怒斥大同矿务局领导“没良心”，将责任推到了基层领导头上。挨了骂的大同矿务局领导再骂下级，各级领导层层效法，逼迫基层开展“抓阶级敌人”运动，结果事故期间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安全的工程师，负责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甚至事故后回乡的矿工被内定为“破坏嫌疑分子”，受到批斗，撤职等迫害，使矿难后受“反右倾”运动受害的人数超过了事故遇难人数。

最丑陋的人大会议与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各地饥荒中，中共控制所有报刊媒体，将饿死人的消息严密封锁，继续鼓吹大跃进。在毛泽东亲自控制下，《人民日报》1960 年的元旦社论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1 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 1960 年将是又一个“大跃进”年，提出“持续大跃进”，“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等口号。

3月底，中共召开了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继续鼓吹大跃进。会上，人大代表们无人敢提饿死人的情况，无人呼吁救灾，全部发言都是报告各自地区形势大好。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宣布进一步推进“大跃进”。

《人民日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和《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两篇社论。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古今中外最丑恶的一次国会会议，中共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大代表对当年两千万人饿死负有罪责。面对如此黑暗的人大会议，国人不能不怀念清末资政院、咨议局，民国参议院、参政会、国民大会上代表为民请命，抨击时弊的政治气象。

人大代表们在大饥荒中歌功颂德，文艺界更是如此。中科院长郭沫若在大饥荒中写诗道：“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64]周谷城的《献衷心·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诗、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望星空》诗，郭小川的《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等诗、杨朔的《荔枝蜜》、《海市》、《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傅抱石的《韶山全景图》、《江山如此多娇》、《韶山组画》诗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文、李可染的《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画作、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社员都是向阳花》、《众手浇开幸福花》等等广为人知，其中不少作品还编入了小学教材。歌词“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千朵花啊万朵花，比不上公社的幸福花，毛主席栽花咱们来浇水，众手浇开幸福花”。杨朔在其颂歌散文《荔枝蜜》中写道：“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甘甜呢。……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来飞去，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

么新生活呢？……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在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中，党艺术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件《三吏》、《三别》、《卖炭翁》、《流民图》那样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相反，他们在遍地饿殍的几年中创作出了众多优美的歌词、散文、诗歌、画作，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艺术家一旦成为党权附庸就没有了良知。这种情况是苏俄输入革命的结果。苏联宣传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就是这样，接受斯大林的豢养，享受别墅和数十侍从，为斯大林歌功颂德。[65] 在党权专制之下，独立的艺术家没有生存空间，中国的艺术家们与高尔基一样，为了生存，必须为中共唱颂歌。

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提出“持续跃进”主要内容有二，其一是继续按“高产卫星”的指标搜刮粮食；其二是在城市里也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全国是一个大人民公社，城市的人财物也不能独立于共产党调动之外。1960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再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顾农村公共食堂断炊，农民饿死的现实，要求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按毛泽东的调子，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经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下达了刘起草的指示，在全国城市掀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公社化运动没有遇到农民反抗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没有遇到市民的反抗。原因之一是，经过剿匪战、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民众知道无力与专政机关对抗。原因之二是，城市居民不像农民还有土地、牲畜、林木、农具等私产，市民们在解放后全体依附中共领导的“单位”生存，已经是依附中共生存的仆从，除了被褥衣物外几乎没有私产，居住、就业、吃饭全在单位，入不入人民公社都一样。当然，城市中还是有一些稍为富有的人。这些人感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剥夺私产的恐慌，纷纷提取存款抢购钻戒、手表、收音机等物品，造成商店贵重物品一时脱销。

7月，中共宣布在全国近两百城市中建立了千余个城市人民公社。各地城市人民公社如同两年前的徐水共产主义试验一样，也推出了众多类似徐水“十五包”的建新城，建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图书馆，办企业等“共产主义宏图”，层层上报到毛泽东手中以交差。与“大炼钢铁”中一半土炉子没有点火炼钢一样，多数城市人民公社只是挂个牌糊弄上级，向中央交差。基层领导人们非常清楚，饥荒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别说建新城，“十五包”等“共产主义宏图”，就连城市人民公社化的主要内容——城市公共食堂也根本没有粮食开饭。由于饥荒，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放开肚皮吃饭”一样，只是满足毛泽东个人臆想的短暂闹剧。1961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八字方针”大批关闭工业企业，将几千万市民赶往农村，毛泽东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胡闹在发动后几个月后就不了了之。

信阳事件

1954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因病休养，第二书记吴芝圃主政。吴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算是毛泽东的门生。毛指示吴在河南率先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根据毛的指示，吴在河南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引发了各地农民牵回自己的牲畜，集体要求退社的反抗合作化事件。与各地大员一样，吴拒绝承认合作化之初向农民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诺，指农民要求退社为“闹社”和破坏，对请愿者武力镇压，将带头要求退社者逮捕判刑。按他的要求，商丘地区官员将千余反抗合作化的农民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将其中九人迫害致死。毛泽东对吴芝圃武力镇压退社农潮的行动极为赞赏，将河南一年内强迫推行合作化的实践编入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当时的国人不知道，毛泽东这一动听书名背后是暴力剥夺，捆绑吊打，武力镇压的农民苦难。

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潘复生恢复工作。根据农民的投诉，他与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分头展开调查，了解到农民自统购统销以来

挨饿，吃“观音土”，合作化强迫农民入社，无偿剥夺农民财产和自留地，全省入社牲畜非正常死亡 177 万头。根据调查结果，潘复生采取了一系列纠错行动：下令查处在合作化中殴打、迫害农民的干部；释放因要求退社而被捕的农民；宣布允许社员自养牲畜；对留给社员的 5%自留地不征粮；允许自由市场；统购征粮的留粮标准不得低于 380 斤等等。吴芝圃对潘的纠错不满，将潘的举措报给了毛泽东。

1957 年 9 月，毛泽东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到郑州视察，让吴芝圃报河南 1958 年的粮食产量。吴知道毛想让河南粮食产量带头“跃进”，于是信口开河地报出了 1958 至 1960 年河南粮食产量分别可达 500 亿斤、600 亿斤和 800 亿斤。毛表示赞赏，指示吴将合作社合并成“大社”，开展“反右倾”运动。1958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潘复生组织批斗，将潘撤职，提拔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奉毛之命，吴芝圃在河南大搞“一平二调”，剥夺了农民数亿元的私人财产，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劳动军事化、组织化，“连轴转”修水利，以“建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大规模拆除农村房屋，将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没收，将农民净身出户地赶进劳动营，不准农民起火做饭，命令所有农民去公共食堂吃饭，同时发动“反右倾”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宣布潘复生及其支持者为反党集团，组织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为首的一大批对合作化纠错的干部进行批斗，在河南展开抓“小潘复生”，在反右运动已划数万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又划出十多万“右倾分子”，实施残酷整肃。

夏收时，吴芝圃在省委会议上要求属下表决河南 1958 年粮食亩产是 300 亿斤、400 亿斤，还是 500 亿斤，将不同意 500 亿斤者划为右倾。逼迫之下，第一个大社，嵯峨山公社率先放出了小麦亩产 3200 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毛泽东控制《人民日报》，高调报导了这一吹出来的“高产卫星”，将嵯峨山公社所在的信阳专区树立为“反右倾”运动的榜样，在全国掀起了“放高产卫星”热潮。8 月，毛再到河南，将河南树立为全国先进省。为

向毛泽东表态，中共高层都来河南视察、赞扬。月底，吴芝圃宣布，河南全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将在四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人民公社化的实情是，农民苦不堪言，不能起火做饭，须到几个村才办一个的大食堂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再排长队，更要被基层干部以各种理由“扣饭”，全体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奴隶和集体食堂的乞丐。

被毛泽东树立成反右倾榜样是信阳的灾难。在“反右倾运动”的高压下，无数余农民、干部因质疑“高产卫星”惨遭残酷批斗，专区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的总数高达 350 亿斤。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说服各县实事求是，将上报产量降至 72 亿斤，结果被停职接受批判。[66] 秋收时，吴芝圃在河南的粮食征购会议上强调，所放“卫星”已向中央报了喜，现在征购指标下达，再困难也要完成，阻碍征粮言行都是右倾，必须坚决打击。会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召开地区征购的会议，要求各县委书记自报征粮指标，并规定计算征粮的产量不得低于亩产 500 斤。高压之下，县委书记们只得报高指标，回到县里采取同样高压手段逼迫公社干部。当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只有 30 亿斤，而河南省委已按 72 亿斤总产量给各公社下达了粮食征购任务。多数公社推翻放高产卫星时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坦白说当时是不得已胡乱吹出来的。但从河南省到信阳地区行署坚持按吹出来的指标征粮。结果，中共信阳地委组织人连征带抢地收了 17 亿斤粮食上交，将余下的口粮全部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秋收后，信阳农村除了干部和民兵在“小灶”有饭吃，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农民房子被拆，无居无食，纷纷外出逃荒。遵照中共中央禁止逃荒的通知，中共信阳地委派武装民兵封锁农民的逃生之路，把逃荒农民以“阶级敌人”和“流窜犯”罪名抓回，拦截收容了上百万饥民。信阳少得可怜的口粮只够基层干部活命，被逮捕、收容者没有饭吃，收容所成了饿死场。逃荒之路也被封锁，绝粮的信阳农民在储满本地粮食的官仓旁整户、整村地饿死。

和张树藩一起被打成“右倾分子”的秘书余德鸿写道：“进入 1959 年，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 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 月，我在遂平县（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我在 1959 年 12 月回家奔丧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四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像在流血。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亲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悲惨事例太多了。”[67] “1959 年底 1960 年初，中间有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几天才开一次火，因为能吃的东西非常少了，吃的东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肿、脸色蜡黄。当时去食堂打饭是按家的，一般家里负责打饭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饭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盆里的稠的东西吃光了，到家时盆里只剩下汤，其他人只好不吃。有的人家饿死人瞒着不报，因为如果瞒着的话，那个死去的人在打饭的时候还占着一个名额。大队队部一直都起伙，所以当时大队干部没有饿死的，他们的家属也很少有饿死的。当时整个村死了一百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人吃人的事。一个邻居，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当时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着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68] 老干部郑大军回忆说：“公共食堂先是一日三餐清水野菜，撒米糠搅匀充饥已算奢侈，之后更完全断炊，饥民满山疯转。树枝、树叶、草根、地菌、蚯蚓、地蚕全吃光，中毒

吐沫者众。之后就吃一种白色粘土，俗称观音土，一撮泥一口水，肚皮由饿转痛，伏地打滚，最后饿死、胀死、或泻死。1959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做饭，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都没人干活，那时的人饿得都走不动路，更没法干活了。不光是信阳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大批农民被累死、饿死、被打死。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的灾难是毁灭性。”

在人相食的情况下，有饭吃的信阳干部们按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指示继续搜刮粮食，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当局以“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罪名实施大规模迫害，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小彭德怀”干部，有反对大跃进、反对高征购、反对人民公社言论者、偷吃牲口料者、藏粮农民以及所谓“五类分子”实施迫害，白天强制劳动，夜里轮流批斗，捆绑吊打逼迫交待揭发。这时的信阳，到处有人饿死，到处有人被整死：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反瞒产”大会，到会6000多农民中40%浮肿，在大会上就饿死了一个人，而县委领导吩咐抬走尸体继续开会“反瞒产”。会后，又有人饿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率人批斗被打为“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将张活活整死；县委书记刘文彩在槐店公社“反瞒产”中连续拷打40位农民，打死4人。在“反右倾”的高压之下，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只好亲自动手打人或主持打人以表现不右倾。斛山公社的党委领导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当时百姓流传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69]

大饥荒中，河南省委、信阳地委下令：对上不准提饿死人的事，统一称是因浮肿病、瘟疫病而死，[70] 责令邮局将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将告状信、求救信退回所在村的干部手中，干部再以告状信、求救信作为整肃依据，将反映饥荒情况者残酷批斗或干脆被灭口。虽然河南当局禁止传播关

于饥荒消息，信阳灾难还是通过农民捎信给城里亲戚的方式传到了北京。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两位处长到信阳作了三个月调查，然后向中央报告：信阳饿死人数超过百万。由于毛泽东拒绝承认灾难，中共中央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河南当局的暴行。196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会议，毛泽东被迫同意让刘少奇出面收拾局面。会后，刘少奇派副总理李先念率三万军队和数千机关干部进驻信阳地区。当军队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时，无数灾民虚弱地爬着去领粮，其中很多人死在了爬领救命粮的来回途中。随后，陶铸、王任重率工作组到河南，改组中共信阳地委领导层。王任重谈所见情况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饥荒后，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根据“反瞒产”运动基层执行者交待整理出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其中列举的“反瞒产”酷刑和杀人手段包括：剁手指头、火剪夹耳、铁丝穿耳、脸上刻字、缝嘴、割嘴唇、烧刑、烙刑、烙肛门、捅肛门、捅阴道、火灰灌肠、烟薰、活埋、将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石头压、吊打、跪磁瓦砾、攒摔、灌大粪、逼吃屎、雪冻、水淹等等。[71] 不仅商城县如此，信阳各县都这么残暴。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投入监狱中，克扣监狱口粮 9000 斤，蓄意饿死数百人。固始县当局在三个水利工程中扣饭 6822 人，开除饭籍 859 人，“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风地里罚站）1686 人，殴打 2316 人，吊打 4643 人，罚挑双挑子 17220 人，强迫生病者劳动 4972 人。对农民“扣饭”、“开除饭籍”的同时，专供基层干部享用的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级：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72] 中共干部迫害、鱼肉百姓的情况与革命前正派乡绅领导乡村，在灾荒时开粥棚赈济灾民的情况形成恶与善两极对照，证明了共产革命之恶，代表着中国乡村从好人领导到坏人领导的沦落。

经过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祸害，800 万人口的“豫南粮仓”信阳地区饿死了 240 多万农民，死绝 5 万多户，毁灭村庄 1 万多个”，[73] 其中，息县死绝 639 个村子，[74] 固始县死绝 400 多村，商城县死绝 453 村。[75] 这就是中共内部所称的信阳事件。由信阳看河南，由河南看全国，信阳事件说明了毛泽东制造全国大饥荒的来龙去脉，说明了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的道理。毛泽东在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上批示，称饥荒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国民党残余造成的，指示发动了名为“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的整肃运动。结果，中共以抓国民党人的“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再逼死、整死了超过十万执行中央指示的信阳基层干部。

信阳事件还是毛泽东造成了全国森林资源大破坏的一个证明。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属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原本林茂粮丰。经过合作化农民突击砍树，“大炼钢铁”和大饥荒，信阳的森林资源被破坏了八成，从绿水青山的鱼米之乡变成了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在破坏森林方面没有停手，信阳残存的两成森林在几年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彻底毁灭。信阳森林的毁灭是全国森林浩劫的缩影。事实上，中国的森林的一多半毁于了毛泽东统治时代的人祸。

建行宫热潮

从井冈山时代开始，毛泽东养成了随时变更日程和住所的习惯。建国后，他不安居中南海，不断云游各地。为此，他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各省召开，实际是要求高层服从他的行程，随时听从召唤到他的住地开会。各地大员知道接驾对升迁的重要，纷纷在省城最好的地方为毛泽东安排行宫，派专人向中南海的生活总管打听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们的特别喜好，为在本省召开中央会议作行宫准备。大饥荒中，为毛泽东等“七大领袖”修建的行宫别墅在全国建了数十处，几乎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数处，一市数处，连不太可能召开中央会议的边远城市也加入了修建行宫热潮。从以下的毛泽东行宫可以看出中共在大饥荒中建行宫的规模与奢华。

武汉梅岭行宫：1953年2月，毛泽东在李先念、王任重等陪同下游览东湖，对梅岭的美景名称大加赞赏。王任重立即将这里圈为禁区，开工为毛泽东兴建梅岭一号别墅。大饥荒中，梅岭一号、二号、三号行宫相继竣工。梅岭行宫包括起居室，会议室、办公室及卧室，庭院内古木蔽日，曲径通幽。卧室有为毛泽东特制的一边高一边低大木床。此后，毛来东湖住了四十多次，称梅岭行宫为“白云黄鹤的地方”，东湖有了“湖北中南海”之名。

长沙蓉园：1952年，罗瑞卿捎口信命湖南大员在长沙给毛泽东建造一幢专用房子。湖南大员周小舟得令，为毛泽东在长沙建了“蓉园九所”别墅。“大跃进”运动中，周在蓉园别墅旁为毛泽东再建了蓉园一号行宫。行宫刚建好，毛泽东罢周了的官，对周主持建的行宫不感兴趣，没来住过。但后来几任湖南领导人又相继为毛修建了蓉园二、三、四、八号行宫，等待毛泽东携中共高层来入住。

松山一号：建蓉园行宫的同时，周小舟在毛泽东韶山故居旁的松山为毛泽东修建了“松山一号”行宫。1959年6月，毛泽东在松山一号住了两天，其间向周提出在吊须洞（今滴水洞）建个“草棚子”。周知道毛对松山一号不满意，赶紧布署在滴水洞另建行宫，松山一号从此闲置。

韶山滴水洞：1960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每天大批饿死人的时候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提“建草棚子”。张在大饥荒中拨出巨款开建代号 203 的韶山滴水洞行宫工程（对外称国防工程），将周围五平方公里圈为禁区，将区内农户强制迁走。滴水洞行宫建筑设计仿毛的中南海住所，1、2、3号楼主体建筑和韶山至滴水洞柏油马路耗资一亿多。1962年底，滴水洞行宫竣工，由一个连的军队守卫，等待毛泽东入住。1966年，毛泽东来到韶山秘密入住滴水洞行宫，十一天后突然离开，令湖南省公安厅和长沙到武汉的铁路沿线乱作一团。[76] 虽然毛泽东此后再也没来过韶山，但湖南大员在文革中继续在这里投入巨资，为毛泽东加建了防原子弹地下行宫。

郑州三所：被毛泽东提拔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吴芝圃在大饥荒中开始为毛泽东兴建豪华园林型别墅群（郑州三所，对外称 5901 国防工程，今黄河迎宾馆）。这座被称为河南“钓鱼台”的豪华花园占地 1200 亩，为调节小气候，工程挖了人工湖，堆人工山，使别墅群周围森林环抱，其中有全国最好的法国梧桐，周边辟有警卫部队驻守的隔离区。九幢豪华楼房编号为一号至九号楼，其中一至八号楼为别墅专供接待政治局七位常委，九号中央委员楼按当时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的人数建造，合每位一个套间。吴芝圃还为毛泽东修建了直通专用楼的铁路专线及直升机停机坪。别墅群建成后，吴下台，别墅闲置。

芦林一号：大饥荒中为毛泽东兴建，座落庐山五老峰下，芦林湖畔，别墅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占地面积 2 万余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 3700 平方米，内有毛泽东的卧室、江青卧室、书房、会客室、会议室、小厨房、餐厅及卫士、医护人员休息室，别墅旁的芦林湖被辟为毛泽东专用的游泳处。别墅建成后，毛泽东仅于 1961 年和 1970 年住过两次（1961 年那次在大饥荒中为江青庐山仙人洞照题诗，1970 年那次策划清算林彪）。

北京行宫：按说，毛泽东住中南海，北京无需再有行宫。但毛泽东有随时变更住处的习惯，因此，中共在北京也为毛泽东安排了五六处行宫。其中包括钓鱼台国宾馆 12 号楼，京西新六所，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等等。

上海西郊宾馆：建国后，上海当局在许多宾馆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安排了专用楼。毛来上海一般都住位于闹市中哈同宾馆，毛因在宾馆招待女友的消息不胫而走感到不快，一度到上海住在专列上。上海大员柯庆施对毛不下车感到恐慌，请建行宫获毛泽东批准。大饥荒中，柯庆施开工兴建代号为“414 国防工程”的西郊宾馆。“414 工程”规模宏大，连同园林、花木，占地千余亩，位于被称为上海之肺的一片江南罕见的密林之中。经工程兵部队昼夜施工，行宫在全国农村饿殍遍地背景下建成。行宫从外面看并不起眼，内部极为讲究，材料大都由香港购来，窗户用双层防弹玻璃，从里面可以看到

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行宫警卫森严，整片林区被列为禁区，拉了电网，隐蔽了许多暗哨。1961年，毛泽东就来到了上海。柯庆施小心的陪毛参观行宫，期望能得赞赏。不料毛不置可否，只冷冷的说了一句：“种这大片草有什么用？……”柯紧张万分，找园林规划专家来商量怎么办，考虑到改种粮食见效太慢，于是柯决定铲除草坪，连夜移栽蔬菜，并整夜守在移栽现场。次日毛才醒来发现大片草坪变成了蔬菜，给了句赞赏，柯这才安心。

广西行宫：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动对自己的崇拜运动。会后，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在南宁为毛修建了江东明园和江西西园两座别墅。韦国清没有等到赞赏，因为毛泽东再也没来广西。

北戴河行宫：建国后，北戴河的七百多座别墅成了中共党产。毛泽东认为现成的别墅不安全，于是中共为毛开工另建。因毛泽东夏天在北戴河避暑，中央中央建立了夏季北戴河休假办公制度，在北戴河为中央委员以上的几百高层每人配了一幢别墅。毛泽东之后，北戴河避暑办公制度被继任者们遵行，因此中共有无数重要文件、决议与北戴河相关。

南京行宫：东郊宾馆一号楼行宫位于中山陵风景区内的紫霞洞旁，背靠紫金山，东边是中山陵，西边是明孝陵，外观不太显眼，掩映于绿树丛中，内部极为考究，布置是毛泽东中南海居所的翻版。

浙江行宫：建国后，中共华东局将汪园连同夕照山，苏家山（部分）以及夕照寺、白云庵等沿湖一带共二十多万平米的风景区圈为禁区，投巨资为毛泽东等“七大领袖”建了专用别墅，每人一楼。建行宫热潮中，华东当局在毛泽东西湖行宫之外再开工兴建了汪庄别墅（对外称5801工程）和刘庄别墅（对外称5901工程）。汪庄为西湖名园，位于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山麓，与“苏堤”、“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等著名风景隔湖相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刘庄别墅雅称水竹居，北倚康山，东南西三面环湖，有“西湖第一名园”的美誉。毛泽东四十多次来杭州多住于这两庄别墅，邓小平、

陈云等也常来这里小住，使西湖有了“第二中南海”之名。杭州之外，浙江当局还为毛泽东建了配有 601 号铁路专线的金华 601 别墅。

广州东山行宫：1956 年，陶铸为方便毛泽东在珠江游泳，为毛建了广州东山小岛 1 号楼、3 号楼专用别墅。

大连棒槌岛行宫：在大跃进建行宫热潮中，不大可能召开中央会议省市也不甘落后。辽宁大员黄火青在大连最美的棒槌岛为中共“七大领袖”建了行宫，其中 1、2 号楼为毛泽东行宫。别墅建成后闲置，没有等来毛入住。

西安丈八沟：建行宫热潮中，陕西大员不甘落后，在名胜地丈八沟为“七大领袖”建了“陕西的钓鱼台”行宫 1 至 7 号楼。行宫建成后长期闲置，没有等来毛入住。

成都金牛行宫：在建行宫方面，四川大员李井泉早在前列。1956 年，他主导中共四川省委作出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行宫的决定，圈占了民国时闻名的金牛坝风景别墅区和周边一公里范围，派人到中南海考查毛泽东的喜好，率先建成了“领袖别墅”。建筑群占地四百亩，有青松、银杏、古楠等林木环抱，房内楠木门窗地板。李还模仿中南海游泳池的规格，修建了烧煤加热的恒温游泳池，特聘曾经在中南海工作、熟悉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员担任所长。1958 年 3 月，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期间入住了李准备的金牛坝行宫，李在会后获得提升，与建行宫的优异表现不无关系。不过，毛泽东此后再也没去四川，金牛坝行宫和那个精心设计的恒温游泳池一直闲置。

各地大员邀宠方式不光是建行宫。例如，李井泉安排在四川德阳两百年老号什邡烟厂成立专为中央领导人研制特供雪茄烟的“132 技术攻关组”，搞出数十个配方，将样品送北京供“七大领袖”试用，其中包括为毛泽东特制的“2 号烟”，为李先念特制的“12 号烟”，贺龙的“33 号烟”，邓小平的“熊猫烟”，获领袖们认可后高度保密地生产特供烟。湖南大员张平化上任后提议烧贡瓷

为毛祝寿，在大饥荒中将醴陵群力瓷厂办在了“红色官窑”，不计工本地专为毛泽东烧制薄胎釉五彩花卉餐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具等珍宝瓷器。

大饥荒中的建行宫热潮是毛泽东是和各地大员联手推动的。毛对大饥荒无动于衷，与军队文工团少女们照样淫乐。地方大员一样铁石心肠者。李井泉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干将，也是建行宫热潮的代表人物。他与毛泽东一样，对饥荒无动于衷，在庐山会议上积极反右倾而获毛泽东提升，在主政的四川积极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造成了一个省饿死一千多万人的灾难，且在大饥荒中照样打麻将、玩桥牌、跳舞、看戏，看内部电影，且出门必带私人护士同行。饥荒后，李井泉得邓小平数次帮助开脱得保乌纱。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李遭毛抛弃，受到冲击和关押，儿子被打死，妻子在狱中自杀，川人称是报应。文革后，李再得邓关照，升任李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行宫热潮中，各地大员都在省会或风景名胜地为中共领袖们安排了行宫，个别省在多个城市建立行宫，甚至同一城市设有数处秘密行宫。这些行宫建设的共同点是，圈占最优美的风景区、山林、湖岸、海岸为军事禁区，对外谎称国防工程，建造不计成本，极尽奢华。根据毛泽东狡兔三窟，留逃跑密道的习惯，多数建行宫的大员为毛在建有秘密逃跑通道。毛泽东怕飞机汽车不安全，喜欢乘专列出行，一些大员投其所好，建造了连接行宫的专用铁路线，使建造费用倍增。

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各地行宫照样开工。没人知道全国各地这类行宫别墅总共花费了多少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钱足以救那几年的几千万饥民于不死。对于建行宫热潮，中共高层中除了彭德怀有过微词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像清末、北洋、民国时代的议员那样敢于针砭时弊，为民请命。彭德怀也没有直接批评过。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是谁让搞的。彭德怀之外，邓小平也有拐弯抹角的批评，不过不是在行宫热潮中，而

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主政时。邓批评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这话听起来好象他与彭德怀一样反对建行宫。其实那些行宫不光是给毛泽东盖房子，而是给七大领袖都盖了房子，各地行宫一至七号楼中都有邓小平一座。邓在当时没有反对过，而且喜欢住杭州的行宫。

行宫的建造费用巨大，维护费用同样巨大。每一处行宫均有警卫部队，管理人员，医疗、食品检验、厨师，服务员等百人团队长年值守，每年管理维修费百万计。每当“领袖团”前来入住，行宫便会热闹一阵，因为“中央首长”的家属随员，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虽然各地行宫最多只有一处在用，但各地每年都向中央报来巨额的行宫财政补贴申请。由于行宫依山傍水，隐藏林木之中又长年空置，大都墙壁门窗家具发霉损坏。1969年，毛泽东要来南京，南京大员许世友赶紧率工作人员赶到中山陵五号准备，打开通风，用电炉来烤、电风扇吹。这是毛泽东突然入住行宫的普遍情况。而更多的行宫自建成后就闲在那里发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1980年代，半数行宫行为旅游景点，而另一半因为保密等原因成了革命的废墟。

《星火》抗争与林昭殉道

大饥荒中，一群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奋起抗争，成立组织，制定反抗暴政计划，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在《星火》首期中，张春元在《论人民公社》一文中写道：“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何之明在《论政治挂帅》一文中写道：“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向承鉴写道：“反右运动是中共质变的起点，……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油印了三十

多份。第二期未及印出，所有组织成员被逮捕。中共将《星火》期刊事件列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将参与的右派学生们押去各处巡回批斗。在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中共将《星火》案的骨干张春元、中共武山县委书记，“右倾分子”杜映华处决，将参与《星火》期刊的胡晓愚、顾雁、苗庆久、向承鉴、何之明、谭蝉雪等数十人判处重刑。多年后，张春元恋人谭蝉雪出狱后历经十二年到各地搜集资料，终于为《星火》、为兰大学生右派写出了《求索》一书。钱理群教授评论《求索》说：“面对农民的饥饿，绝大多数各级干部以‘维护党的大局’说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 [77]

《星火》的代表人物林昭是北大学生。建国前夕，中学生林昭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与基督徒父亲决裂，狂热信仰共产主义。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与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她在信和日记中称斯大林、毛泽东为父亲，她主持的《常州民报》副刊《斯大林的故事》专栏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4 年，她考入北大新闻系，担任了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她在《红楼》诗刊 1957 年 3 月的《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西。”

在北大学生响应“大鸣大放”号召掀起的民主运动中，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 5 月 22 日的学生辩论会上，她登上饭桌发表了演讲。有人喊道：“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林昭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

昭！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将“大鸣大放”运动突然转为反右运动。林昭再发表演讲，谴责中共出尔反尔，整肃提意见者。不久，她被定为成了右派。她拒绝认罪，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基督教，开始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与被肃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彻底和解。庐山会议后，林昭著文为彭德怀鸣冤。大饥荒中，她拒绝沉默，应张春元等人之约，在《星火》首期发表了诗歌《海鸥之歌》和《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与《星火》青年们一起给领导人写信，试图阻止饥荒蔓延。她写道：“正因为 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星火》第一期印出后，她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林父彭国彦在爱女被捕后自杀抗议。

狱中，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老校长蔡元培营救受迫害的学生，并写下三十万言的《狱中回忆录》。在保外就医期间，林昭与同被打为“右派分子”的黄政、朱泓等人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纲领和章程，请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因此再被以反革命罪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判处二十年重刑。再次入狱后，林昭在《绝食书》中明志：“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她在《判决后的申明》中宣告：“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她在给《人民日报》的血字申诉信中写道：“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善良，单纯，煽动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比的迫害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同时，她心系国家前途，前瞻地指出人民公社不合国情，应及早解散，停止“割资本主义尾巴”，主张允许私人开业经营，允

许私人办厂，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提出了引进外资，实行地方自治等设想。

在纸笔被狱方收缴的情况下，她用竹签、发卡、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刺血，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出了二十多万言的血文、血诗。因为不屈，她受到残酷折磨。狱方将她双手背铐长达半年，连吃饭、大小便、妇女例假时也不给松铐。上海提篮桥监狱在《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记载：“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她在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有人劝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拒绝认错。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你”。林昭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1966年，北大“五一九”运动骨干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与林母许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林昭头顶一方白布，上血书“冤”字。据狱卒回忆，林昭见到张时露出了入狱以来唯一的一丝微笑。晤中，林取下头上“冤”字顶巾，拨开白发，示数处头发被揪掉的光秃头皮，并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对张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临别，她赠张一只纸折的小船及诗一首，嘱张将其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托张关照其母及弟、妹，语未毕痛哭失声。据管教干部后来回忆：他们从未见过林昭如此痛哭。[78]

1968年，当她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一位医生悄悄对她说：“你又何苦呢？”她回答：“宁为玉碎”。

在1957年以后的十一年苦难中，她拒绝苟且、屈从，坚持“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声明自己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她在明志诗中写道：“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在《海鸥——不自由毋宁死》诗中写道：“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在《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血诗中写道：“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在血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写道：“……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共口塞阻止呼喊的塞子，秘密枪决。

林昭代表着黑暗中的光明，邪恶中的正义，奴役中的自由。她的血书、血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抗争，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她留下的绝命辞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在二十一世纪，她不仅被历史宣告无罪，更在国人心中复活。“作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林昭超越同时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超拔，不仅仅是与极权专制拼死斗争的勇气，不仅仅是对于罪恶洞察的深刻，而是对于苦难的态度。在长期拒绝上帝，充满仇恨的中国，这实在是个奇迹。林昭用这个奇迹建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壮丽、最高贵的精神丰碑。”[79]

饥荒中的核试验

二战中，美国动员几国科学家五十万人力，花费几十亿美元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负责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格罗夫斯将军预言，苏联要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二十年。然而，苏联通过窃取技术，调动举国资源，强迫苦役犯去进行死亡操作等办法，在 1949 年就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当年底，毛泽东以承诺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承诺帮助发展军事工业。这时，毛泽东的目标是也要拥有原子弹。

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提出要核技术。赫劝毛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碰软钉子后，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挑起了台海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危机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兵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中率团访华，寻求毛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对其领袖地位的支持。会谈中，赫要求毛在台湾海峡止步，毛向赫提出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为结束危机，赫答应了毛的要求。随后，毛下令停止炮击，结束了持续近八个月的台海危机。回国后，赫鲁晓夫遇到军方对输出核技术的反对。经过讨价还价，赫鲁晓夫与军方达成了逐步提供核技术的妥协。1955 年 4 月，中苏签署了核技术培训条约，中共开始起步发展核武器。毛泽东对苏联逐步提供核技术的作法不满，感到按此进度总是无法与赫鲁晓夫争雄，无奈非仰仗苏联提供技术不可，且只有靠向苏联出口粮食换取技术，也只好接受现实。

1957 年，苏共元老派策动了罢免赫鲁晓夫政变，赫在军方和克格勃支持下挫败政变，将元老及其支持者们以反党集团罪名开除出了领导层。这时，他需要中共带头作拥护他清洗元老的表态，毛泽东作出不理解苏共高层的变动的姿态以向赫提条件。担心中共的质疑影响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赫急派米高扬来华与毛泽东面谈寻求支持。毛泽东在汪庄别墅会向米高扬高调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胜利，同时大谈核战争、核武器。听米汇报后，赫明白毛还是要核技术，于是不顾苏联军方反对，决定加快向中共提供核技术的步

伐。经赫批准，苏共与中共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开始派专家来华传授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向中共提供核反应堆、核工业基础设施及核试验数据资料。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成立核武器局（九局，九院），在青海和甘肃建立了核基地。

1958年夏，各地放出了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感到将有无限的粮食换取军事技术，要求立即掌握核武器，决定将制造台海危机、迫赫鲁晓夫答应要求的游戏再玩一次。8月23日，他在北戴河会议期间突然下令炮击金门，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危机震惊了莫斯科，刚刚从北京归来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毛泽东在炮击前要求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是要让美国理解危机是二人在北京共同策划的。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赫收到毛的信函。毛在信中要求苏联提供导弹支援，声言“为了最后胜利，中国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赫拒绝毛利用同盟关系把苏共玩弄于股掌之上，拒绝毛以发动战争相讹诈，复函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同时派葛罗米柯飞到北京，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周恩来向葛罗米柯重申毛泽东的意思说：中国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核打击。赫不得不代表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虚张声势，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美国军队从台湾及邻近地区撤出。艾决定接受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不理睬苏、中两共的警告，命令美国海军为国民党军队向金门送补给的船队护航。在美国强硬、苏联拒绝卷入的形势下，毛泽东只好止步台海。他感到发动炮战后这样灰头土脸地收兵下不来台，决定以无限期延长炮击的办法维护面子。10月5日，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声称为了人道主义暂停止炮击七天。七天期后，他再宣布延长停火两周，两周后再宣布“单打双停”。

赫鲁晓夫对人类必须避免核战争有清醒的认识，上台后奉行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政策，推动与美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毛泽东反复要求之下，他同意了提供核技术。然而他没有想到，在《国防新技术协定》刚签订，毛泽

东就在莫斯科共产党峰会上发表了“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80]的疯狂言论。赫鲁晓夫意识到，向毛泽东提供核技术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考虑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术。毛泽东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讹诈帮助赫鲁晓夫下了决心，正式决定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术。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共，中止核技术协议，撤回核专家。毛泽东不顾饥荒已经蔓延十数省，决定倾全国之力新建核基地，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共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数万科学家、工程师、防化兵和工人，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国所在地——新疆罗布泊开始兴建第二个核试验基地，包括指挥中心、控制中心、配套公路、铁路、机场以及多个试验场。

1961年夏，在人类历史空前惨烈的饥荒中，中共高层在北戴河避暑办公，召开了讨论是否继续出口粮食资助核武器研制的所谓国防会议。与会的高层们都清楚，核计划靠出口粮食支持，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但高层们更清楚，提出让核计划下马意味冒犯毛泽东，而举手支持发展核武器对个人安全稳妥。会上，外交部长陈毅顺着毛泽东的心思说：“就是脱裤子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两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对陈毅的讲话，毛泽东立即表示欣赏。众高层都知道“脱裤子当”只是便宜话。早在延安时，中共建立了按等级享受，高干享受小灶和营养品的一套待遇标准。建国后，中共将官本位的特供制度进一步发展，为高层们安排王公府第、别墅，在京郊玉泉山建立了一个专为中共高层生产奶、蛋、蔬的“香山农场”，聘请苏联专家策划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等方面，指定名厂家特供高层各种用品。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所产鸡鸭鱼肉蔬菜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蔬菜可比，并开始为毛泽东等高层生产反季节特供蔬菜瓜果。就在中央高层开会讨论研制原子弹，陈毅声称“脱裤子当”时，中共设立了专门服务高层的“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对外保密称三十四号供应部）三十四号供应部供应的名优特新产品应有尽有，有百姓见不到茅台、五粮液，鸡鸭鱼肉，有从国外进口的名牌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

法国产的鹅肝酱等等。三十四号供应部在北京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四楼设立了专门供应高级官员和家属的“特需部”，其中呢绒绸缎、名酒好烟、高级食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买东西不用票证，价格低廉，且可赊购。特供标准分为一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等，最高层没有限制，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四副双高首长）有特供标准限制。[81]特供之外，高层按级别享受不同档次的住房、专车、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服务等待遇。特供制度和级别待遇是官本位的，保住官职就安享特供和待遇。毛泽东一句话可以撤大员的职，特供和待遇随之而去，这是高层们不敢批评毛泽东半句的重要原因。高层之外，中共对个别“民主党派”领袖，“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也实行了“特需供应”，这也是他们带头推动“向党交心”运动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共垄断了社会资源，高层们不作官，“民主党派”们不作陪衬就没有了生计，民国时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辞职绝迹了。

唯一明确反对特供、特权的彭德怀已被罢官，其他人在饥荒中享受着肉，蛋、糖、奶等特殊供应，谁也不敢说毛泽东不爱听的话。会上，没有人提饥荒、救灾，没有人提议暂停核武器计划。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年头，众人附和陈毅的高调，会议通过了国防科委向中央要钱、要物资的《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决定继续高指标征粮食出口，换外汇发展核武器。会后，中共以“一切为核工程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为宗旨，成立了周恩来为主任，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的十五人核武工程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执行研制核武器计划。由于国家财政资源的分配完全由最高层秘密决定，国人对核武计划及其资源投入完全不知情。

经过数万科学家，军人的数年努力，原子弹在 1964 年 10 月爆炸成功。核爆成功的背后是农民的累累白骨。核计划开支由毛泽东、周恩来暗箱操作，

没有人只知道核计划花了多少钱。人们只知道，研制核武器是饿死几千万农民，国人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对于加大力度出口粮食换外汇发展军工、核武器，中共高层的意见颇为一致。周恩来说：我宁可不吃，也还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谭震林说：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82] 事实是，众高层们谁也不会“不吃”，谁也不会“少吃一口”，更用不着“脱裤子当”，“七大领袖”照样享受着住行宫，参加北戴河国防会议所有高层们都照样享受着根据级别的特供待遇。大家都举手拥护毛泽东的核计划，没有人在意农民在饥荒中大批饿死，在饥荒后穷得女人都没裤子穿。[83]

原子弹试验过程中，科学家、军人和工人在爱国口号的鼓动下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核基地，隐姓埋名，过着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受着核幅射、核污染的威胁，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核计划。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怀着中国强大的理想，献身核事业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但是，在各国致力和平，缓和，国内大饥荒的情况下，中国的核试验既非正义，也谈不上国防与爱国。事实上，二战后的主要战争和危机都是中苏两共挑起的，赫鲁晓夫上台后致力于和平与缓和。在唯毛泽东好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共的所谓国防会议、国防工程、国防经费等等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对老百姓的祸害。赫鲁晓夫担心毛泽东掌握原子弹会摧毁世界和平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前否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时就有了打核战争构想，准备着多死多生。他掌握核武器后没能发动核战争是因为没有陆基、海基平台无法形成洲际核打击能力（这一点被几年后林立果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所间接证实）。若掌握了洲际核打击能力，世界上唯一呼唤核战争，准备上中国人民承受核打击的狂人毛泽东完全可能引爆核战争。

与中共至今对核武器研制赞不绝口相反，外国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爆炸后就开始了反思与忏悔。1939年，格拉德、费米、拉德和特勒等科学家担心德国制造出核武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美国政府官员认

为科学家们的想法是天方夜谭。于是，几位科学家寻求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核武器。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导致约三十万人死亡。巨大伤亡使大多数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心情十分沉重。爱因斯坦表达痛苦与后悔说：“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主导研制原子弹的另一名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对广岛和长崎人民的巨大灾难也深感内疚，对杜鲁门总统说自己手上粘满了鲜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投身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运动。当美国宣布研制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氢弹时，参与向日本投原子弹的侦察机机长克劳德·伊塞利少校以自杀表示抗议。亲手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克米特·比汉上尉临终前表达心愿说：“但愿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投下原子弹的人！”而中共官媒至今将研制原子弹宣传为爱国壮举，完全不提原子弹对人类和环境摧残，显示出共产党人对生命，对人民苦难的漠视。

八届九中全会与八字方针

进入1960年，农村饿殍遍野，全国人民困苦到了极点，政府财政收入由1958年的600亿元减少近半，财政赤字超过百亿。国际上，中苏交恶、中印边界局势紧张、蒋介石展开反攻大陆宣传，中共政权陷入了内外交困。古来君王在大灾难中会颁“罪己诏”，向上天和国人作检讨，请求原谅。毛泽东对大饥荒全不在意，更无罪己意识。1960年6月，他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持续跃进”，号召“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要求继续“反-610;产”“搜刮粮食”。会后，他照例率众高层到北戴河去避暑。

毛泽东离京后，中南海北门外发生了湖南青年女工刘桂阳高举写有“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的纸牌冒死请愿事件。被捕后，刘回答值班警卫讯问说：“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了。

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的，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讯问笔录被急件报送到了在北戴河避暑办公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阅后批示：“请少奇同志阅。”刘少奇批示：“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指示对刘桂阳从轻发落。[84] 有亲信将简报及刘桂阳的口供记录密报给了毛泽东。在这份已经印发给全体高层传阅的请愿记录面前，在高层全体都过目了的打倒口号面前，毛泽东感到了天怒人怨，决定让刘少奇代理主席，收拾局面。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应各地官员的强烈呼吁，召开了讨论应付饥荒局面的八届九中全会。众高层都清楚“大跃进”灾难的严重性，但更清楚如果毛泽东不下台，批评“大跃进”将乌纱不保。在无人敢于抨击“大跃进”的沉默中，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正确，称大饥荒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提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要求在农村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意思是要将灾难责任推到所谓国民党头上。

毛泽东嫁祸国民党的说法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也是为高层全体开脱。刘少奇非常清楚“大跃进”灾难与国民党无关，同时也清楚，因为自己支持清洗彭德怀，支持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支持高指标征粮才有了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所以他不能拆穿毛泽东的开脱之词，不能追究大跃进灾难。刘少奇不说“大跃进”错，其他人更不会说。大会在“大跃进正确”的前提下绕圈子。在毛泽东不敢犯众怒，众人也不敢批评毛的僵局中，周恩来提出了让毛泽东和众人都能接受的办法。会前，他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关于“纠错”、“整顿”等字眼全部删去，改为“调整”，再加上几个赘词，凑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八字方针）。按此八字，造成大饥

荒的“大跃进”政策没有错，不存在纠错问题，只是不够巩固，不够充实，不够高度，需要作些调整。这样的“八字方针”合乎毛泽东需要，让毛可以在不认错的前提下体面地接受政策调整，默认结束“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于是，会议走出了僵局，毛泽东接受了“八字方针”和“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口号，表示同意让刘少奇出面收拾灾难局面。

会后，刘少奇实施了一系列的救灾举措：派李先念率军队进驻灾情已经瞒不住的信阳地区，将几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撤职，将信阳等地残害农民的基层官员逮捕；决定接受国际粮食援助；宣布解散公社食堂（公共食堂早已因绝粮而解体，解散食堂的实际意思是宣布允许农民自己做饭吃）；“关、停、并、转”43000个“大跃进”中上马的军工企业，将半数无力继续的军工建设项目正式停工；将3000万城市赶到农村去以防止城市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撤销毛泽东吹牛的2000万吨、3000万吨钢铁产量指标，承认几百万吨的实际钢产量；减少粮食征购量；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5%；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禁止“一平二调”（共产），财政发行期票对“一平二调”中农民被共产损失作部分退赔；下令将大社退回到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八届九中全会是一次丑恶的会议。会议虽然有一些务实结果，如决定刘少奇出面主持救灾，但会议在饿死几千万人背景下无人敢提饿死人的灾难，无人敢于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无人敢触及“反右倾”、“反瞒产”暴政，无人敢提降低征粮指标，会议文件中连个“错”字都不提。八届九中会议是另一次灾难性的会议。因为全体高层继续追随毛泽东，毛泽东继续大权在握，继续推行高指标征粮，继续紧握国库存粮的动用之权拒绝开仓放赈，多数地区大员继续追随毛泽东作恶，继续搜刮农村粮食，基层的搜粮队继续横行乡里，因此，救灾效果很少，继续作恶的灾难很大，会议当年也成了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有超过两千万的中国农民在那一年饿死在继续推行的大跃进暴政之下。

七千人大会

1961年秋收时，毛泽东要求继续按“高产卫星”的指标征粮食。各地区的负责人深知，绝粮才会饿死那么多人，继续高指标征粮将使饥荒进一步扩大。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纷纷呼吁按党章规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二大严厉抨击“大跃进”造成灾难，中共高层一致拥护刘少奇救灾的局面下，召开九大的呼吁让毛泽东感到了独裁地位不稳。11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召全国地委书记来北京讨论粮食征购计划，毛泽东顺势决定将县委书记，全国重点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都召集到北京，开个五级干部参加的非正式全国党代会，既算是向呼吁召开九大的地方干部有个交待，又可以回避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换届。为避免代表们互相交流，毛泽东要求大会保密，禁止与会者给家里写信、打电话，禁止《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会议作任何报导。

1962年1月，世界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秘密召开，有多达七千位中共各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仍沿用老办法控制会议：分组开会、不准记录，禁止代表交流打听，指定秘书记录，各组记录先报他，经他圈阅删改后才印发全体代表。毛泽东这样的控制会议办法很有效，能将任何批评他政策的发言封锁在极小范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所有代表说了些什么。三年前，他用这一控制会议的办法阻止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呼百应。此次会议，他更进一步，连全体代表共聚一堂的开幕式都取消，派发每位代表们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然后立即分组。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采用庐山会议时的老调子，先说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然后说几句存在缺点和错误的空泛话，但不说是什么错误，有多严重，是如何造成的，由谁负责等等。

由于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没有人敢批评大跃进，没有人敢要求停止高指标征粮，毛泽东依然坚持继续高指标征粮以服务口粮食换汇发展军备和核武器计划，要求继续推行“大跃进”的各项政策，称“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收不起

来，开完会，大家下去收粮食。”[85] 在毛泽东安插的记录秘书监听网络之下，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有要求中央停止“大跃进”的各项政策，停止高指标征粮之心，但没有为民请命之胆，即使在分组会上也不敢讲话。于是，会议再次成了大饥荒中的闲扯。两年半前，高层们在几百万人饿死的形势下在庐山上闲扯，如今，代表们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形势下继续闲扯。来自地方的基层干部们没有那么大的乌纱帽，没有享受那么多的特殊供应，也没有开过那么多的丑恶会议，顾虑较少，开始报怨这样的讨论是在浪费时间。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开这样的会本来就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要的就是代表在分组闲扯中把时间消耗掉，不开全体大会。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代表没有形成共鸣和一起发难的机会。毛泽东没有理由连一次全体大会都不开，于是决定全体大会安排在闭幕式当天，打算短暂聚一下立即散会。

刘少奇清楚毛泽东如此安排的用意。他不能容忍大会就这样结束。半年前，他回到阔别的家乡，村民们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灾，每个村都饿死很多人，不是因天灾，是人祸，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送进了炼钢炉，使农民挖了野菜都没锅煮。他的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他看了一路的苦难，听了一路饿死人的述说，还看到村里饥饿的少年写下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毛泽东授意起草的闭幕式《书面报告》为大跃进、大饥荒找借口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清楚这些说法的荒唐，清楚饥荒的根源政府将农民口粮都搜刮干净出口换军事技术，更清楚重要原因是他两年半前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开展“反右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改变政策，亡羊补牢，结束饥荒。然而，眼看会议要结束，没有解决

任何问题，没有政策改变。他知道，毛泽东要求散会后继续按高指标征粮食出口意味着再饿死几千万人。他决定不再附和毛泽东，出手制止灾难继续。

1月27日，在闭幕日的全体大会上，刘少奇抛开毛泽东为他拟好的报告稿，即席讲话说：“形势不好，人民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够，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经过几年的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他借家乡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称“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批评顿时扭转了会议不敢讲话的局面，代表们纷纷跟随发言，反对大跃进政策，指中央的路线有问题，甚至有代表重提领袖换届问题。彭真点名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党留下恶劣的影响”。在众多代表反对大跃进、支持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一时无法控制会议，也不敢与刘少奇当场摊牌，只好宣布临时休会。

对会议进程一时无法时暂时休会，在会下暗中活动，寻求支持，然后在复会时扭转会议方向，这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中的法宝。他在遵义会议、洛川会议和庐山会议中都是这么干的。庐山会议休会时他的主要举措是召林彪上山，代表军队发表支持他的讲话，其次是寻求最有影响力者表态支持。此时，毛泽东故伎重施，再次急召林彪到会讲话，代表军队出面支持他。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发难，毛泽东寻求刘少奇的支持。此时，刘少奇发难，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表态支持，帮他扭转会议局面。庐山会议时，刘少奇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作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此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没有痛苦的思想斗争。周恩来是权力斗争老手，在力量对比判断上不比毛泽东差。从延安到北京，他多次在重要关头判断出毛泽东将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在毛泽东陷入困境时出面为毛找台阶，打圆场，帮毛泽东走出困境。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看到虽然毛泽东一时陷入困境，但有林彪代表军队的支持，

非刘少奇及支持者所能扳倒，于是像在庐山会议时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追随毛泽东。

1月29日，林彪在复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离开会议主题，大力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随后，他推出“付学费”论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因为没有经验而付了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最后，他要求“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周围”。[86] 林彪以“付学费”论将毛泽东害死数千万人的罪责一笔勾销，借大骂彭德怀“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来威胁众高层。林彪讲话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与林一唱一和。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称赞“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代表们以沉默回应林彪在大灾难中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会议一时冷场。这时，周出面救驾，巧妙为毛泽东解围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随后，他只谈困难形势和需要调整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代表国务院检讨，表示自己工作没做好，反复强调党内团结。最后他说：“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87]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献词扭转了会议局面，为大会定下毛泽东最希望的调子：不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各级干部都出面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只谈具体问题和善后工作。

有林、周一同救驾，众高层立即看清了形势，赶紧押宝在毛、林、周一边，跟随周恩来作自我检讨。在各级领导检讨后，从不认错的毛泽东作象征性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不说清楚犯了多大的错，负什么责，将大跃进灾难以一句“盲目性”带过。毛泽东对力量对比有着卓越的判断力。虽然党权、军权在握，但他清楚绝大多数高层此时对他不满，支持刘少奇，要求结束“大跃进”，虽有林彪、周恩来支持，但众怒难犯，他不能像庐山会议那样的突然转向，整肃刘少奇，否则自己可能立即下台，他除了接受刘少奇的报告别无选择。于是，他被迫默认刘少奇的报告，同意暂退二线搞调查研究，让刘少奇主持局面。

大家都作象征性检讨后，会议达到了毛泽东希望的结果：不否定大跃进，不提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和稀泥”方式宣布闭幕。来自基层的代表们颇为不满。他们突然被召集进京开秘密会议，大过年时又突然被迫留京参加延长的会议，还不准通知家人，让家人误以为被关押整肃。他们最知道大饥荒灾难的严重性，对大会就这样没有明确结果地结束强烈不满。一些敢讲话的代表询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高层们都知道基层代表这一问题是在委婉要求领袖换人。革命党在权力交接方面有着无法解决的制度和程序缺陷。西方民主政治通过执政党轮换，领袖变更可以顺利达到追究责任，改变政策的目的。而革命党一党独裁，拒绝政党轮换，自己无法追究自己执政的责任，为维护统治合法性也无法追究领袖的责任，因而难以改变政策。由于独裁领袖拒绝轮换，革命党除了暗杀政变没有领袖更替的正当程序。中共八大在苏共反个人独裁的鼓舞下提出了解决领袖更替问题的“退居二线”说法。大家都知道这一说法之荒唐，谁也无法回答基层代表这一问。

大会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基层呼吁的毛泽东辞任党主席问题。得周恩来帮助控制局面，毛泽东干脆率林彪不参加会议，放心南游。会上，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表态同意毛泽东辞任领袖，其他人观望。大家记得，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曾民主投票表决，结果经周恩来出面相劝，大家同意表决不算数，民主失败。此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林彪拒绝出席的政治局会议结果算不算数。冷场之中，周恩来再度出面说服大家：“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88] 毛泽东的亲信大员们闻言立即附和，形成了多数。会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袖。这一结果使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过大跃进和毛泽东者，和在此次会议上表态同意毛泽东辞任领袖者立即后悔失言，纷纷想办法补救。因为有周恩来和亲信在政治局内照顾局面，毛泽东才敢于拒绝参加政治局会议，放心地离京出游。同时，他对会上谁说了什么如指掌。这次会后林、周分别在不同领域发动了崇拜毛泽东运动。一年后，毛、林、周一同发表了号召学雷锋的题词，使党内局面彻底改观，迫使刘少奇也加入题词。这一年党内形势转变让人相信，林彪、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分别提出“出现困难局面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意见造成”的说法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是在奉毛密令行事，毛泽东在休会期间布署的一部分。

“七千人大会”是另一次灾难性的会议。虽然刘少奇不点明的批评了大跃进，迫使毛泽东象征性地作了检讨，在会后得以“调整”之名废除了不少大跃进政策，降低了征粮指标，进口粮食，在 1962 年内结束了大部分地区的饥荒，但会议结果宣告，制造饿死几千万人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会议有这样的结果不奇怪。大饥荒灾难是全体高层一致举手造成的，要追究谁也跑不掉，所以全体高层谁也不会说追究二字。因此，中共创造出一堆推卸罪责的说法，诸如林彪提出的“付学费”说，林彪、周恩来一起提出的“出现困难局面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意见造成”说，周恩来提出的“急于求成”说，毛泽东提出的“盲目性”说等等，这些说法，加上毛泽东在延安发明的“扩大化”等等说法都在后来被中共反复使用作为推卸罪责的借口。

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指出的：在民主制度下，领导危机会由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专制制度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89] “七千人大会”的进程与结果证明，一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问责与追究。大会的结果让毛泽东看清，即使闯下天大的祸，其权力和地位也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林彪代表的军队是支持他的，周恩来代表的多数党的干部是支持他的，除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彭真的“认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的象征性批评外，党内没有问责。于是，他将发难的刘少奇，支持刘少奇接任领袖的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列入了整肃名单，在会后立即开始盘算新一轮整肃运动。几年后，江青在“文革”中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此言清楚地透露出毛在“七千人大会”对刘恨之入骨，开始盘算逐一整肃“七千人大会”发难者和表态同意让他“退居二线”者的脉络。

大饥荒——人类灾难之最

历史上，饥荒、人相食都伴随战乱、自然灾害或异族入侵。然而在没有战乱，没有外敌入侵，且风调雨顺的 1958 年至 1961 年，中国农村普遍饥荒。一位亲历者写道：“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生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埋的死人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1961 年 4 月，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中说：自 1959 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 1289 起。”[90] 在甘肃通渭县，1959 年到 1961 年间，三分之一农民饿死，其中死绝了 2168 户，人吃人的惨剧遍地发生。[91] 为隐-610;饥荒的严重性，防止信阳事件那样的政治影响，中共中央禁止在行文中出现称饥荒字眼，甚至禁止不能有事件字眼，

而要求在内部文件中将饥荒，饿死人称为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内部文件大量出现“通渭问题”，甘肃省委还禁提“饿死”二字，要求将饿死称为病死。例如，中共通渭县委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并且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明说是掩埋死人。”在四川紫经，饥荒 1958 年就开始了。当时饿死了人还有人埋。到了 1960 年，因死人太多，活人站立都难，无人去埋，从各公社到县城街上，一路死尸，尸臭弥漫。县里只好搞万人坑，将死尸都扔到一个大坑埋，再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山沟里扔，往县城外的河里扔。1958 年紫经总人口是 64 万，三年饿死了一多半人。

[92] 饥荒中，农村基层干部掌握着农村仅有的粮食，自己开小灶，同时豢养民兵对付老百姓，民兵们为有饭吃奉命挨家挨户搜刮粮食，迫害农民，镇压抢粮饥民，边境省开枪打死外逃边民。饥民很快饿得丧失抗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大饥荒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的原因。

从饥荒初起到数千万人饿死，中共始终隐瞒饥荒的发生。其办法之一控制报刊、封锁消息，禁止谈论饥荒的情况。办法之二是将饥荒控制在农村，以农民的救命粮来保证城市不饿死人。1959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庐山会议后，饥荒蔓延全国农村，中共高层秘密决定：牺牲农村以保证城市供应。1960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三番五次要求四川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为“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这时，中共中央对四川饥荒的情况非常清楚，调粮是要将饥荒隐瞒在农村，任由农民饿死。四川饿死一千多万农民后，周恩来在内部会上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一句话将蓄意饿死农民的安排带过，毛泽东则在“七千人大会”赞扬西南大员李井泉“只有大公，没有小我。”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饿死了数千万，城市人却不知道饥荒的发生。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三是编造“三年自然灾害”说法。这一说法出台过程为：1960年，中共内部文件和报纸上开始偶尔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开脱之词。据此，中共推出了“自然灾害”说，先是在《人民日报》的1960年国庆社论中一改歌颂大好形势的调子，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接着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上将“自然灾害”说升级为官方解释饥荒的正式版本。“三年自然灾害”说法纯属谎言。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1958至1962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1950年代最大的自然灾害是1954年的洪水灾害。这时的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还可以存粮备荒，没有发生饥荒。不仅“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谎言，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谎言。三年间，并未发生“三分天灾”。就全国而言，1958至1961年不仅风调雨顺，更是天公作美的历史最好年景。[93]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四是“苏联逼债造成饥荒”说。这一说法出现于饥荒过后的中苏论战中。这时，中共将大饥荒嫁祸苏共，在官方文件中称：“三年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严重的局面是由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的背信弃义逼债，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导致中国无法进口粮食”。此后几十年中，中共在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中共控制的独家新闻媒体持续不断重复宣传“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法以掩盖制造饥荒的罪责。1990年代解密的苏共档案证明，苏联在大饥荒中非但没有逼债，反而多次提出援助中国提供粮食、食糖等等的建议。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五是销毁饿死人数的统计证据。1961年，陈国栋（财政部副部长）、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将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报告报给周恩来，周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奉命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再电话确认了销毁情况。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公安

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字为“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阅。如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94]

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学者们才得以研究大饥荒灾难。在中国三年大饥荒是人类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这一点上，中外学者没有分歧。关于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同估计。胡适通过信件了解大陆的情况后叹道：“大陆上人民饿死了约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95] 上海大学学者金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结果为三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4,040 万至 4,319 万之间”；[96] 多次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中共高层官员的《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披露赵紫阳估计的死难人数为 4,300 万至 4,600 万人之间；[97] 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JASPER BECKER）查看多省地方志及通过私人关系查阅中共关文件后指出：“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 20——30%；该省信阳地区 1958 年有人口 800 万，饿死了 240 万人。有中国学者告诉我说，你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饿死人数高达 6000 万”；[98] 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博士在其《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一书中指出：“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根据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和地方志得出了 3000 万至 3200 万的饥荒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 50%。因此，3000 万加 50% 就是 4500 万。4500 万非正常死亡中有大约 300 万人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当局打死或自杀。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 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

吃饭造成的。从档案中看到，共产党将农民编号，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公社社员看作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我的书中，九成五是来自这些档案，公开的资料利用不多。他们公开的资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应该说，中国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准确数字，我们只能接近真实，除非中国政府内部下令不掩盖地作调查，可能比较准一些。”

贝克、冯克关于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根据官方统计资料的说法得到大量基层数据的支持。救灾时，粮款按人头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而将死人报成了活人，使饥荒死亡统计数被缩小。1961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去湖南调查时发现，基层在饥荒死亡数字统计出来后要经过“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以山东为例，曹树基教授根据地方志统计出的山东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80 多万，而亲历大跃进的记者张广友记载，山东省主要领导人在当时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上说：“山东过去(1957年)人口为 5500 万，不到 3 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 5000 万，减少了 500 万”；[99]按曹博士的统计，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90 多万，而贝克调查后推算河南饿死人数为 400 万至 780 万之间。贝克的调查结论得到信阳基层情况的支持。中央工作队处理“信阳事件”时发现，各县的饿死人比例普遍在三成左右，其中，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 120 人的吴围子小队在 1959 年饿死 72 人，比例高达六成；[100]曹博士根据地方志统计，四川在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40 多万，而据当时冒险赴京反映饥荒情况的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估计，四川饿死人数在 1100 万至 1250 万间。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说：“安徽省在大饥荒中饿死 400 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人相食并不奇怪。凤阳县 1961 年人口比 1958 年减少了 39%。全县死绝的户有 2404 户，消失村庄 27 个。”[101]

贝克、冯克关于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根据官方统计资料的说法还得到人口统计的支持。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披露：“今年（2012 年）5 月 10 日，我的同事、公安部离休的局级干部、1964 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任公

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统计处副处长的赵文奇同志告诉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关注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考虑到各地上报饿死人情况都不准确，上报时都要经过党委一把手点头批准才允许上报。他要求公安部对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视，一定要将非正常死亡数字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弄清楚，要我们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将全国实有人口计算统计准确，死亡人口搞准确，特别是对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搞准确的指示精神。为此，成立了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杨尚昆亲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我们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全力投入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处长白建华、我（副处长），工作人员王维志、沈一（益）民参加。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我们按杨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组织指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重点省还派出工作组去具体指导、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都报来了人口数据。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人口73000多万。随后于当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自治区没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我们都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再次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赵文奇同志告诉我这一数字之后，我感到十分惊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字？我开始怀疑，是否虚假。5月11日和14日我两次碰到赵文奇同志，问他此数据是否可靠？他说，绝对可靠，是各省、市、区报来的统计数，又经过各地同志的再次核算和推算，这个数据是应该信得过的。他说，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档案馆，有案可查。同时，赵文奇同志还说，1964年9月初，于桑副部长要我们（有白建华、我、沈一民）同他共四个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进行了汇报。杨主任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

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作了肯定，认为就此数据作为依据（以上两段内容经赵文奇同志审核——笔者注）”。

大饥荒中，各地劳改营中的劳改犯死亡比例和死亡总人数巨大。当时任劳改队文书的杨崇道说，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写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多人；辽宁省锦西煤矿 1,200 名右派的劳改队在大饥荒中饿死了 1000 人；[102] 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 300 人的右派劳改中队饿死了 227 人；流放北大荒的右派在三年饥荒中饿死约三分之一；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的 3,000 多右派分子到 1961 年死得只剩下 200 来人；[103] 甘肃正宁县子午岭龙池劳改农场的 3000 劳改犯在 1960 年就死了 600 多人。[104]

以下事实说明，这场亘古未闻的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中共蓄意制造的人祸。

事实一，政府横征暴敛，将农民口粮搜刮殆尽。建国伊始，中共发动了朝鲜战争，向农民征粮数量以每年增 50% 的速度递增，而且以低于市价 30% 以上的低价强买。农民拒绝低价强买，中共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禁止农民存粮。千百年来，农民自己储粮备荒，一般天灾不会饿死人。自从中共出台统购统销，存粮备荒成了“破坏统购统销罪”，农民被剥夺存粮权利，政府将农民口粮之外的全部粮食收走，农民挨饿，卖儿卖女，吃草根、树叶、观音土饥荒由此开始。冯克博士指出：“苏联专家撤退后，毛要求加快还债，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困难，说不急于结帐，还要提供粮食给中国。毛拒绝，一心要早日不清军火和军事技术债务，加大征购，从农民那里逼交粮食，棉布、猪肉、糖等等。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个党内会议上说，要增加粮食收购三分之一，农民不会造反，饿死一半人不要紧，还有一半人有饭吃”。

最积极推行“大跃进”搜刮政策的省也是饿死人最多的省。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贵州的周林，甘肃的张仲良等人推行反右倾，反瞒产，搜刮粮食最积极，造成了这几个省最高的饿死人比例。其中四川的情形最为典型。蜀守李冰建成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国赋根本，断无哀鸿声起”。抗战中，四川承担大后方政府和数百万国军将士的粮食供应而未发生饥荒。1959至1961年，四川全省风调雨顺，但因李井泉推行“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暴政，粮仓四川成了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批斗彭德怀表现积极，会后被毛泽东提拔为掌管云、贵、川三省的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使三省饥荒迅速扩大。饥荒中，没有积极推行毛泽东暴政的省饿死人较少。例如，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没有积极推行暴政，饿死人不，陕西成为甘肃灾民逃亡的目的地。可见，大饥荒百分之百是中共横征暴敛造成的人祸；

事实二，中共强制实施人民公社化，使农民成了农奴。逼迫近亿农民在1958年收获季节上山“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致1958年特好年景的庄稼因无人收割一半烂在了地里；

事实三，毛泽东不准放赈救灾，坚持要求大量出口粮食。大饥荒前后的全国粮食数据如下：（单位：万吨）[104]

图片

大饥荒中，中国不仅大量出口粮食，还大量出口油、蛋、肉、果等食品，其数据见下表。

图片

上述肉蛋的食品是怎么搜刮来的呢？饥荒中的农村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在1959年4月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向全国发出加强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购的指示时说：“猪出口得很不好，出的不

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谈到蛋，他要求“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所谓“突击收购运动”和“断然措施”意味基层的暴行。例如，四川璧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 1960 年 4 月收购鸡和蛋时，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强行按人头派指标，拿不出鸡蛋就不让到食堂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饭。[106]

按说，政府禁止民间存粮就应负备荒、赈灾之责。若中共循前朝旧制，在饥荒中开仓放赈，救济灾民，不会饿死人。国库的存粮谁也无权动用，存粮动用之权只在毛泽东一人之手。毛泽东在 1957 年讲话中就表示过，大跃进准备死一半人，他从一开始就了解饥荒情况。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他听任饥荒蔓延，数千万人饿死，禁止动用库存粮食救灾。在饥荒蔓延全国的 1959 年，中共为换取军事技术和无偿援助给外国共产党政府的粮食净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 416 万吨。

1960 年春，荣经凤仪公社发生了武装部长李文中武装抢粮库救灾的义举。李到凤仪公社为饿死的叔叔一家收尸，背着轻飘飘，加起来没有一百斤的三具尸体，看着一路的死尸，想着附近的国家粮库中囤满了粮食，他决心冒死为活着的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率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饥民来到公社粮库，强行开仓放粮，救济了灾民，随后被以“反革命、五类分子武装暴动”主犯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多年后他说，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是社员中最惨的一群，早就饿死了。能抢到些粮食，让一些乡亲死前吃一顿饱饭，对得起做人的良心，决不后悔。[107] 荣经武装放粮事件说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在大饥荒中，国家的粮库里囤积着大量粮食。在河南信阳，饥荒中饿死两百多万人，而信阳地区的国库存粮存有数十亿斤粮食。[108] 作家张戎指出：“大饥荒根源是毛泽东坚持出口粮食到苏联东欧，以便买军事设备。毛的工业化完全是军事工业化，他一心想的是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事工业，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

就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买苏联的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完全靠出口粮食。我们在俄国档案馆看到中国对苏出口粮食的记录后明白，如果不出口这么多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109]，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回忆：“1960年，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一直买到1970年。”[110] 周恩来指示在大饥荒中买黄金的背后是毛泽东集中外汇发展军事工业计划和研制核武器计划。为此计划，周恩来操办在1959、1960年净出口了数百万吨粮食。

事实四，不准逃荒。千百年来，农民自由进城谋生，灾年自由讨饭、逃荒。而在新中国，中共为从农村搜刮粮食，建国伊始就不断出台针对农民的控制条例。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和介绍，不得在农村招收工人，明令禁止农民进城就业；1954年，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配合合作化暴政，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全国推行户口登记以禁止农民迁移；195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和《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收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要求组建以民政部门牵头，有铁路、交通、商业、粮食、监察等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负责制止农民流入城市，要求在铁路、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设卡阻止农民流入城市，要求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禁止农民乞讨。1958年，人大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条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正式剥夺了全体人民的居住、迁徙自由。这一条例与粮票制度相配合，完成了对人民财产和人身的全面管制，将农民捆绑在本乡本土以搜刮粮食。

1959年春，在饥荒蔓延，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出台了收容遣送制度。饥荒中出台的收容遣返制度堵死了农民逃生之路，使农民只能饿死在本村。根据上述收容遣返令，各地当局派出民兵把守道路，将没有通行证的逃荒农民如同逃犯一样抓捕，押送回原籍。饥荒中，粮食只够基层干部和民兵活命，收容所通常不给逃荒农民饭吃，多数灾民被饿死在收容遣返过程中。历朝历代，饥荒均是区域性的，灾民逃出灾区都能讨饭活下来。而在新中国，饥荒是全国性的，灾民无处可逃。逃荒之路和消息传播之路被封锁后，农民整户，整村地饿死，不为人知。

饥荒过后，毛泽东发动了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运动。其实，焦在兰考任上总共一年多，谈不上对兰考有什么贡献。兰考农民感谢焦裕禄主要因为他上任后放生饥民，允许饥民外出讨饭。农民逃荒的主要原因并非是风沙、盐碱，而是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逼得农民没有活路。毛泽东树立焦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其原因除了因为焦学写出不少学“毛选”笔记，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之外，主要因为焦有兰考农民感谢的口碑，他要借焦让农民感谢他本人。这样学焦裕禄运动显示出当时中国是何等黑暗。

事实五，大饥荒中照样对外援助。下表显示，毛泽东、周恩来在大饥荒中依然维持着巨额的对外援助。

图片

1949年底，毛泽东答应出兵朝鲜后，斯大林答应将亚洲各国共产党交毛泽东领导，指示胡志明等亚洲共产党领袖开始向毛泽东汇报。斯大林给毛泽东领导权的同时也将向这些共产党提供援助的包袱交给了毛泽东。此后，亚洲共产党领袖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要钱。1950年，中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就收到了蒙古总理乔巴山“要求帮

助”的清单。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档案材料记载，越共要求说：“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这不是越共第一次要求援助粮食。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灾，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毛泽东得知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后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于是，中共捐去15亿元。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共援越的项目和货物包括：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电炉、轮船、电话机等等。[111] 1956年苏彝士运河危机中，毛泽东欲扮演指导者的角色，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并主动提出派给埃及25万志愿军。派志愿军赴埃及的建议被纳赛尔总统拒绝后，毛再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或者过了一百年后再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赠给埃及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故意吃亏，向输送利益。[112]

1960年1月，在农村人相食之时，中共成立了对外无偿援助的主管机构——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将外援助规模大幅增加，无偿对外援助中包括大米，小麦。一份封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字样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署名的《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报告》显示，从1950年起至1960年，中共在国人生活极端困苦中向越南、北韩、蒙古、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利、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阿富汗等数十个国家提供了40多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和贷款，并且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偿援助。[113] 在数千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中，中共不开仓放粮救灾，而是巨额对外援助了19亿元，巨量出口粮食。例如，在1960年援助几内亚和刚果各1万吨大米，无偿向阿尔巴尼亚运送了180万吨粮食。[114]

无偿对外援助是共产政权的特有暴政。苏俄建立政权后在内战和饥荒中输出革命，以抢银行，没收教会财产、剥夺富农和工商业者得来的金钱在全世界建立共产党，在中国发动五四运动，建立中共。毛泽东继承了列宁、斯大林抛洒钱财对外输出革命的作法，从建国开始与周恩来黑箱作业，指挥对外援助机构秘密向 100 多个国家赠送了千亿民财。在不顾国内人民困苦，建立政权后立即以巨额金钱输出革命方面，中共与苏俄没有区别。

事实六，拒绝国际援助。大饥荒中，美国总统肯尼迪根据中央情报局的饥荒情报，决定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下令制定援助方案，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渠道提出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立即援助 500 万吨小麦，及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千万吨小麦给中国的建议。建议被毛泽东拒绝。直到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才作主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救灾。而毛泽东、周恩来下令几艘满载加拿大援助粮食的中国货轮改驶向阿尔巴尼亚，作为对阿共的无偿援助。[115] 大饥荒中，赫鲁晓夫已多次提出向中国灾民提供人道援助，毛泽东一再拒绝。刘少奇主持救灾后决定接受苏联的粮食援助，苏联立即向中国东北提供了二十万吨粮食。[116] 这成为大饥荒中东北饿死人较少的原因之一，也证明了拒绝国际援助是饥荒扩大的原因之一。

事实七，中共见死不救——举“茅台大跃进”为例。国民政府时代，贵州省政府颁布了《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规定，在天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制米浆刮布，“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 2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 4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金”。前仁怀县政协副主席周梦生回忆说：“1949 年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然而在 1959 至 1961 年的大饥荒期间，贵州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一面是饿殍遍野，每天饿死近百人，全县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农

民，一面是茅台酒高产达两千多吨，消耗粮食两千多万斤。仁怀县粮油保管统计资料显示，1959至1961三年间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竟然比饥荒后二十年间的库存量还高。1959至1961年饥荒中，中共不仅从贵州各地调粮食保证茅台酒生产，还四川调来粮食，从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仁怀县委书记庞耀行为首的各级干部在每天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下只管完成中央下达的产酒指标，下令全省调粮保证茅台产量，实现了茅台酒产量年年创新高（三年间的产量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人们难以理解，何以在饥民大批死亡时搞茅台酒生产大跃进。答案在几十年后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中可以找到。周林曾回忆说：“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他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根据毛的要求，周在1959年饥荒开始时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117]茅台酒大增产是个普通消息，要是说明其背景是贵州饿死两百万人，调来粮食的四川饿死一千二百万人，全国饿死数千万人，该是何等的骇人听闻。

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救灾制度。周有“大荒，舍用赈穷，开廩同食”的规定。其后，历代遵循、发展荒政制度。宋朝粮食储备养官、养兵外的主要用途是赈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河北东路失业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赵顼批示：‘比来流民往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朝廷遂‘赐五万石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赈济流民’；给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皇佑初，范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间浙东大旱，颗粒无收。为了救济失业者的生活，安稳地方，范仲淹采取了高价购粮平糶的办法，“每斗一百八十钱”，比市价高了五成，使逃荒的百姓回流安居乐业。[118]宋代朝廷不仅救灾，还救助、安置因受灾、土地被兼并、破产而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流浪百姓，让失业者有基本生活保障，住处有着落，回家有路费，以至于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来世愿做中国(宋)人”。南宋时，政府对从淮北而来的流民失业给田种植，并蠲免赋税。《元史》记载：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两淮属郡饥，于盐茶课钞内折粟，遣官赈之。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元武宗元年，中书省臣言：“江浙行省管内饥，赈米五十三万五千石、钞十五万四千锭、面四万斤。又，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九万七千锭。”到了满清，荒政制度已经完备，对备灾、报灾、赈灾和灾后救济都有详细规定。其要点为：朝廷负有备灾之责，须设立粮仓应付饥荒；须制定救灾预案，灾荒一旦发生，预案启动实施；地方官员负有向上级奏报灾情、申请朝廷赈灾的责任，对隐瞒灾情不报、延误报告或任意增减灾难等级的官员予以惩处；地方官有责任组成勘灾小组，或亲赴受灾地视察灾情；朝廷得到灾荒报告后要派人勘察，核实后要实施救灾程序；灾荒来临时，从皇帝到县令，各级官员均负有不可推卸的救灾责任；救灾措施包括：赈济、蠲免、调粟平糶、转移灾民、抚恤安置、劝奖社会助赈等。顺治至道光近两百年间，清政府赈济合银 4.5 亿两，而蠲免的钱粮大约有 1.5 亿至 2 亿两。光绪年间华北发生了大旱灾面。曾国荃在大灾期间在山西巡抚任上的救灾举措代表了满清荒政的水平。他刚到任就向朝廷汇报灾情，提出从应解京的五十万两银中拨出二十万两赈灾。清廷立即准奏。救灾中，曾国荃参吉州知州段鼎耀“于省局拨解赈银胆敢扣留不发，实属玩视民瘼，忍心害理”；参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借罚捐赈为名，借端侵渔”，“请旨一并革职，归案审讯，按律定拟，以重赈务而儆官邪”。灾荒中，他严厉处分了两个修理衙门的知县。[119] 自有荒政以来，历代朝廷均将落实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120] 虽然两千年的灾荒中有以身试法的官员，也有昏聩皇帝，但历代统治者基本都“厚下恤民，施行仁政”。中共将历代王朝，历届民国政府都宣传为“反动统治”，将自己政权宣布为人民政府。而事实是，新政府废除了两千年形成的完善荒政，官仓不为备荒，完全成了服务毛泽东世界领袖梦的私仓。大饥荒中，中共听任灾情蔓延，拒绝开仓救灾，禁止灾民逃荒，封锁饥荒消息，对抢粮、偷粮的饥民下格杀令，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以掩盖饥荒。对比前朝，唯有天壤一叹。

新中国前的两千年中发生过 200 多次重大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为 3000 万人，[122] 而中共建立新中国后立即制造饥荒，几年就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人为造成死亡人数比两千年重大自然灾害的死亡总数还多。

第 46 章 继续祸国殃民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1960 年底，河南信阳饿死百万人的消息在中央高层中传开。毛泽东在“信阳事件”的报告上批示：“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对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县、社、队的整风整社，应该学习信阳的经验……凡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方，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1961 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四号文件）。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写道：“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毛泽东所谓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是称有国民党人、地主在破坏，其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是要求开展镇反、肃反那样的整肃运动，抓出暗藏的国民党人和地主，让他们为饥荒负责。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默认结束大跃进政策，同时再次要求开展“民主革命的补课”运动，称大饥荒的原因是大跃进中“出了乱子”，是因为阶级斗争搞得不够，有阶级敌人在大跃进中搞破坏，要求将土改斗地主富农的阶级斗争再搞一次。会后，他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双整）运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清五风），夺回党权、政权、军权、财权、

饭权（夺五权），抓阶级敌人”（拔钉子）。事实上，所谓“五风”并不是基层干部的创造，而正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等运动中逼迫基层执行的政策。在造成灾难后，他将这些政策的罪责都推到了各地农村的基层领导头上，要求从基层干部中抓出一批“阶级敌人”，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再拉出来斗争一次，要求从中农中再划出一批“漏网的地主富农”作为其阶级斗争的对象。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主持救灾的刘少奇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整风整社工作组”分赴信阳和全国主要灾区，开展整肃农村基层领导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对于信阳，刘少奇称那里的党政部门完全是坏人当道，派出军队去接管整个地区的党政权力。开赴信阳的军队将县、公社、大队几级基层干部，包括不脱产的队干部、公共食堂会计、司务长、炊事员等十几万人逮捕，关进四周布岗，架机关枪的“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者）和“集训班”（关押低级基层干部）。刘少奇从中央、各省抽调了近四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赴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从关押中的十几万信阳干部中查找“暗藏的国民党人”、“暗藏的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查关押干部之外，工作队按照土改运动套路，先是扎根串连，了解情况，然后动员穷苦农民控诉作恶的基层干部，根据控诉将基层政权认定为坏人当权，土改不彻底，将作恶的基层干部关押用刑，逼迫交待问题。运动的另一内容是“土改补课”（二次土改），将大饥荒灾难嫁祸土改中幸存地主富农，将“摘帽地富反坏”重新“戴帽”，同时按当年苏区“查田运动”的套路，查中农和基层干部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设法将土改时划定一大批中农和“大跃进”中作恶的基层干部“查”成“土改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将他们“补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

基层干部们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搜刮粮食，打骂群众、逼死人命，作恶多端不假，但他们的作恶恰恰是因为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他们“放高产卫星”，按“卫星”指标征粮，迫害讲实话的干

部，组织征粮队挨家挨户搜粮食等暴行全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命令逼迫，不干不行。他们中的一位县委书记坦言：“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一百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按省委指示干的。”工作队不听申诉，只管按中央要求整肃作恶的信阳基层干部。结果，数十几万信阳干部遭受整肃之残酷与他们在土改运动、“反右倾”、“反瞒产”运动迫害百姓同样惨烈，被逼得大批自杀。

在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主持发布了《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要求在饿死人多的省开展同样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根据指示，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模式被推广到了所有饥荒严重的省，各地对基层干部整肃与信阳一样惨烈。在河南南阳地区，工作组称唐河、淅川、邓县、方城、新野等五县委“烂掉了”，将五县的大部分基层干部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残酷批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在 1958 年底农民断粮时曾为民请命，向地南阳地委请求拨粮救灾，被地委斥为“反瞒产”不积极和右倾。他只好执行“反瞒产”政策，组织征粮队搜查农民的粮食。“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毕可旦自知民愤极大，率全家一起自杀。在四川大邑，整风整社工作组从 120 户人家的安仁公社金光大队补划出地主 15 户、富农 8 户，按照土改运动中的作法，将他们“扫地出门”（不留生路地赶走）。[1]

在全国的“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数十万执行中共中央大跃进政策“放高产卫星”、吹牛撒谎，在饥荒中执行“反右倾”、“反瞒产”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被逮捕，关押，刑讯，打死，被逼自杀或判刑。运动造成的农村基层干部自杀潮规模直追土改时的地主、富农自杀潮，是为大饥荒灾难后的另一场灾难。经过一年多的“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运动，中央工作组没有从信阳和其它主要灾区的百万基层干部中查出国民党人，中共自己

证明了大饥荒中作恶者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毛泽东各项指示的忠实执行者。

在基层干部被整肃时，中共高层们都在玩推卸饥荒罪责的游戏。刘少奇在主持救灾之初声言“严肃查处饥荒大省和最严重地区领导人”。河南大员吴芝圃闻讯，赶紧动手在信阳基层领导中展开清洗，下令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及多数地委常委停职检查，向中央建议将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和十个县委书记以“阶级敌人”罪名枪毙。正当刘少奇准备将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等“大跃进”骨干大员逮捕惩办时，毛泽东传话说“要与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刘少奇只好住手，将吴芝圃官降半级调任中南局书记，保留中央委员。省级大员不受追究，对信阳地区大员的严惩也难以实施。于是，刘少奇指示杀一批县级干部平民愤，要求在信阳地区大县杀 800 人，小县杀 400 人，每个大队杀 3—5 人。当刘少奇准备批准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等一批县级官员处决时，毛泽东再传话说不得杀县委书记。于是，刘少奇下令杀了一大批县一把手以下的基层干部及个别边远地区的县委书记，例如一大批信阳公社一级的基层干部，贵州湄潭县、金沙的县委书记、县长等等。

其实，刘少奇并没有资格主持整肃大跃进运动中作恶的基层干部。因为，他自己是“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运动的推动者，基层干部作恶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也是执行他的指示，没有他从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的支持，毛泽东发动不起“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运动，也不会有信阳事件和大饥荒。刘少奇要追究各地大员，但不会罪己。率工作队进驻信阳，整肃基层干部的陶铸、王任重等大员其实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他们没有罪己，反而到信阳整肃基层干部，接受农民控诉扮演“青天”，难怪受整肃的信阳基层干部都说“死不瞑目”。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声称自己“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不过他这番话不是河南说的，而是在平调中南局，确认不受追究后才在检讨报告中说这番便宜话的。

“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中共高层找基层干部替罪的运动，是饥荒灾难后的另一灾难。毛泽东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用意就是让基层干部承担饥荒灾难的责任，运动的作法是将农民对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的仇恨引到作恶的基层干部身上。其实，作恶的不止是基层干部。华东的柯庆施、河南的吴芝圃、西南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安徽的曾希圣，贵州的周林等一众大员都一面揣摸圣意邀功，一面残酷打击讲实话下级干部，逼迫基层干部作恶，而大员们作恶都是奉了中央的行事的。毛泽东不准追究大员，甚至不准追究县委书记，因为这些高层干部手中有许多中央指示。于是，那些在大跃进中根据口头通知行事的基层干部，那些在新一轮整风运动中自杀或被枪毙的基层作恶干部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由“整风整社”运动可见，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不光是整人运动，还是将人逼到自杀的运动。

批判包产到户

合作化后，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支配权的农民希望作回自耕农，希望回到合作化之前的勤劳致富环境，于是私下实行包产到户。中共视农民这种恢复自耕权利之举为“破坏集体经济”罪行，对私下承包的农民进行整肃。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丧失了包产的可能，同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

大饥荒中，兼管山东、安徽两省的曾希圣被数百万人农民饿死的惨景震撼。他在调查中听闻，安徽宿县农民刘庆兰父子在饥荒中悄悄开荒种粮渡过饥荒，还向生产队交了余粮。在 1961 年 3 月的中共中央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建议在安徽推行包产。这时的毛泽东正担心被追究饥荒责任，感到制止饥荒有利缓解被追究的威胁，表态同意试行包产。回到安徽，曾希圣指示推行“包产到组”，随后再推行“包产到户”。为免政治风险，安徽当局将包产称为“责任田制”。“包产到户”唤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瓦解了人民公社对农民的控制。7 月，毛泽东路过安徽，在专列上听取了曾希圣关于责任田的汇报。在党内高层和各地大员呼吁召开九大背景下，毛泽东再次

表态同意包产。得到毛的两次表态支持，曾希圣放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制。包产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使安徽当年秋粮丰收，率先走出了饥荒。摆脱饥荒的安徽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

与曾希圣同时，刘少奇在湖南也推动“包产到户”。广州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回到湖南家乡作调查研究，亲眼见到大饥荒惨状。基层干部向他直言，要想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可以包产，也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根据刘的表态，宁乡县立即解散了公共食堂，推行包产到户，使生产很快恢复。湖南其它县闻讯立即效仿宁乡，其它省闻讯立即效仿安徽、湖南。1961年秋收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农村，很多地方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重现。在城镇，小型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自发地推行了包工包产，自负盈亏经营。与农村一样，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权和分配权后，生产积极性随之恢复，经济生机重现。经过半年多的包产包工，全国农村走出了饥荒，城市工商业恢复了活力。

包产到户不仅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得到多数中共高层的支持，邓小平提出要使包产到户法化，原本反对包产到户的田家英到农村考察后转而赞成。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一大批高层支持刘少奇的消息让毛泽东难以忍受。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说：“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指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请求毛说，农民刚刚尝到包产的甜头，能不能让再试一段时间。毛知道自己几个月前两次表态支持，现在突然变卦解释不通，对曾的请求暂时不置可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抨击安徽推行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知道以“包产到户”、“责任田制”的理由整肃曾希圣等于是反对救灾，将犯众怒，于是以安徽、山东两省饿死数百万人为由对曾希圣展开整肃。毛这一招让所有的大员都有口难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曾希圣像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潘复生一样，立即失去了会场中的座位，须自搬凳子坐在会场中央接受批斗。毛泽东要整肃谁时，上去批斗与否成了效忠毛泽东与否的测试。

众高层明知“包产到户”对国家与百姓的好处，只管落井下石对曾展开批斗。最能代表中共高层心态的是刘少奇。他清楚“包产到户”的好处，更清楚党内的生存法则，在会上不争辩“包产到户”的好处，不为曾希圣说情，高调提出严惩包括曾希圣在内的几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曾希圣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整肃的基层干部一样感到冤枉，认为自己负责的省饿死这么多人应受惩处，但我执行的政策全是你们第一、二把手强令推行的，要惩办也应先惩办你们，如今你们不负责任，拿我们执行者开刀是无天理。不过，他知道这话不能明言，说出来可能命就没了，于是遵循党内规则，不作申辩，只管检讨，承认对省内饿死人负有责任，但拒绝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制”作检讨。会后，毛泽东将曾撤职，任李葆华为安徽省委负责人，下令取消“责任田”，禁止农民包产以维护人民公社制度。

对于取缔责任田政策，各地基层干部纷纷上书中央，力陈责任田制对促进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好处，请求中央允许继续实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写信给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恳请中央派人前来调查。邓派人到当涂、宿县调查后携调查资料向毛泽东转达基层干部的呼吁，面陈责任田制的好处。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被剥夺军权后到闽西闲养，患上虐疾，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对毛多方关照，找医生医治，派人买牛奶、白糖，炖肉汤、鸡汤，帮助毛走出了困境。邓相信，凭自己曾帮助毛泽东于患难之中，毛泽东能够改变收回责任田的政策。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责任田对农民的好处，他不能对邓明言取消责任田制是为了权力斗争目的，听邓陈述后不置可否。

1962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半年前“七千人大会”的结果展开清算，离开会议原定的农业、粮食议题，大讲阶级斗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指责“七千人大会”怀疑“三面红旗”，指责“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回潮”，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修正主义”等罪名打击支持包产到户的大员。会上，邓子恢、田家英

根据手上有调查结果的争辩“包产到户”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农业及有利于农民。毛泽东严斥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斥邓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斥秘书田家英为“右倾分子”。一年前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圆滑转向，跟随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结果，北戴河工作会议原定的农业、财政等经济议题被搁置。会后，广受农民欢迎，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包产到户被禁止。

八届十中全会与“大讲阶级斗争”

1962年9月，毛泽东再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先营造了危机与肃杀气氛，称敌我斗争严峻，有阶级敌人在暗中威胁，然后继续大讲阶级斗争，接着转入预定题目，对纠正大跃进政策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展开清算，将批评大跃进的言论斥为右倾，是刮“黑暗风”，斥支持包产到户是刮“单干风”，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瓦解人民公社。他将彭德怀写给他的申辩长信（八万言书）公布，作为“右倾分子”搞翻案的证据，要求继续开展“反右倾”运动，并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准备再借运动整人。

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提出给几年来在反右倾运动被错划为右倾分子者平反，并表达平反彭德怀意向说：“彭的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然而，在此次会上毛泽东清算“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不敢坚持意见，再次转向，以打击彭讨好毛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2] 这种不讲道理的随时转变立场，随时抛弃主张不刘少奇特有的处事方式，而是暴力革命党内众人的普遍生存方式。暴力革命党诉诸暴力，党人间只讲武力，没有讲道理的空间。进入高层者都是不讲道理地整肃别人地一路走来，最不讲规矩，最不择手段者才能作领袖，像彭德怀那样直来直去，为民请命，像曾希圣、邓子恢、田家英那样拿查结果说事者必然被淘汰出局。

中共建国后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像延安时那么讲究议程。初到延安时，毛泽东没有独裁地位，受制于“国际派”。知识分子张闻天开会讲究议程，不容毛泽东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随着毛泽东独裁地位确立，中共开会越来越没有议程。建国后，中共的全会完全不讲议程，毛泽东随时，随地召集高层开会，是工作会还是政治局扩大会全由毛泽东说了算，会议内容根据毛泽东的发挥随时改变，会议越开越长，手下拟定的讨论内容多被毛泽东搁置而完全不议。八届十中全会也是如此。会议原定要讨论恢复经济问题，结果被毛泽东随口改成了“大讲阶级斗争”。毛泽东不是扯远了忘记回到正题，而是故意将恢复经济的议题搁置。他心目中只有个人的领袖梦和权力斗争，对恢复经济、救灾等等不感兴趣，并要求对以恢复经济、救灾为中心内容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展开清算。在他阶级斗争论调的威胁下，为赢回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放弃原先主张，支持毛泽东取缔“包产到户”，支持开展阶级斗争和整肃运动。会议决定，取缔“包产到户”（责任田制）；成立以贺龙为主任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继续审查彭德怀的历史问题和“里通外国”问题；成立另一个专案委员会负责审查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问题。

全会的另一内容也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他离开原定议题，发动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将支持这部小说写作的原陕北红军领袖习仲勋等人打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及亲信杨琪、杨森等人相继神秘死亡。刘志丹死后，毛泽东题写了“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的颂词，周恩来写诗颂扬：“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并

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歌颂了刘志丹和及其领导的陕北红军的贡献。这些追颂功夫与孙中山杀陶成章、程璧光后送匾、塑像的套路如出一辙，让人相信刘志丹是死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间的山头之争。高岗倒台后，毛泽东已经对陕北红军干部清洗了一轮。此次会上，毛泽东称小说《刘志丹》是“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指责陕北派系“利用小说反党”，借小说继续对陕北红军山头的残余势力清洗。十年前，毛泽东曾经利用电影整人，此次他再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罪名，利用小说扫除异己山头。毛泽东发明的这一罪名令艺术家、作家们不知所措。例如，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作家老舍闻此罪名放弃了这一创作。

全会后，毛泽东感到取缔“包产到户”还没解气，撤了邓子恢的副总理职，并将邓原先负责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一起撤销。彭德怀得知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落井下石之言后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分别写信，申明自己决无通外国和组织小集团的活动，要求中共查自己的历史。[3] 毛泽东指示：“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德怀是搞颠覆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知道，平反彭德怀会带来追究他制造大饥荒灾难的问题，相信在庐山会议上一起举手参与整彭的众高层不会支持平反彭德怀。不久，贺龙主持专案审查委员会提出结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 and 篡党篡军的头子”。

中共八届十中会是另一次灾难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大饥荒灾难后又制造出了“阶级斗争”灾难。毛泽东扭转被动局面的惯用办法有二，一是发动整肃运动，二是发动战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将这两招同时运用，在全会公报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大讲斗争是要借此对刘少奇展开清算，强化被刘的纠错，恢复经济、救灾等举措削弱的独裁地位。从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中共长期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建国后，中共妖魔化地主、乡绅、资本家、工商业主的宣传没有停止过，经过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等历次整肃运动和大饥荒，被中共划为阶级

敌人的乡绅、工商业主阶层被基本害死光了，幸存者已经成了城市、农村最贫困的群体。毛泽东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半点怜悯之心，继续推动阶级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推出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是煽动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之作。大型泥塑《收租院》是煽动仇恨和斗争的一件代表性宣传品。刘文彩是乡绅阶层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捐资办公益事业不遗余力，个人出资兴办了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建学校过程中，刘每天到工地监督，检查质量。学校建好后，刘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起，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抗战时期，他捐资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发电厂和水电厂。在刘家当过长工的谷能山说：我在他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有荤菜），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唐姓农户佃了刘文彩十几亩田，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交不起租子，收租的管事把父亲带到安仁镇见刘文彩，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还送了一头牛给该佃户。佃户李福清说：去交租子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吃饭，管饱，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也带来了。当地百姓称他为“刘大善人”。[4] 土改运动中，中共要求农民控诉大地主刘文彩。压力之下，农民冷月英胡乱编造，称被因欠租被刘家关进水牢七天七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共大邑县委根据冷月英的“诉苦”编造，在刘文彩庄园中假造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对外展览，在解说词中编造说刘在水牢完工后将参与建造的工人全部被杀害，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1958年，大邑县当局在假造的水牢中再假造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用于阶级斗争展览，派冷月英为专职解说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四川省当局不顾灾民仍然遍地，按照中央的大讲阶级斗争要求拨出巨款将刘文彩的庄园重新装修为宣传地主欺压农民的展览馆，组织人创作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其中将刘文彩宣传为恶霸，编造了许多地主压榨农民的场景。中共安排此作品全国巡展，轰动一时。几十年后，刘文彩庄园展览馆馆长吴宏远承认：真实的刘文彩所雇长工住房条件很好，为证明刘文彩欺压农民而被故意打烂、改建，降低了房屋的高度，

故意布置得凄惨。四川当局为证明刘文彩奢华，重金装修了刘文彩很平常的两间房子，将原本青砖铺地加铺了木地板，谎称是刘的逍遥宫，找了几个本地木匠，雕匠用一年多时间打造了一张龙床，谎称是刘文彩的，以煽动阶级仇恨。

中共的阶级斗争煽动给国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将国家变成了斗争之地，仇恨之乡。以泥塑《收租院》，电影《青松岭》、《千万不要忘记》为代表的铺天盖地的阶级斗争宣传作品向青年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将一代青年教唆成了没有同情心，内心残忍的斗争狂、迫害狂。几年后，这些青年在文革中成了新一代纳粹，对人民实施了空前残酷的迫害。

中印边界战争

中印边界全长约 1700 公里，中隔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自然条件恶劣，多为无人区。1914 年，西藏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签署了关于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麦克马洪线）的协定，将传统边界线与麦克马洪线之间的藏南 9.2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到了印度一方。被划归印度的藏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位于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喜马拉雅山南坡，海拔高度为在 2000 米以下，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其肥沃，植物茂盛，自然景观奇异，矿产、物产极为丰富，拥有西藏 80% 的森林资源，是西藏最美，最富饶的地区。雅鲁藏布江在这里的“大拐弯”落差达 2230 米，水利资源极为丰富。虽然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印度依据换文开始向九万平方公里地区移民。

1950 年，独立后的印度趁中共出兵朝鲜之机，出兵占领了藏南富庶城市达 6106; (TAWANG)，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实际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在国际上不获承认的孤立中，新中国政府为拉拢印度作为反帝盟友，多次向印度方面表示愿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5]

中共抛弃民国以来有关主权领土事宜经国会批准的传统，毛泽东、周恩来秘密决定有关领土主权事宜，配合严格新闻管制，将秘密操作对国人隐瞒。

1959年，藏人在史无前例的饥荒中举行了反抗合作化、要求独立的暴动，印度向逃亡的达赖喇嘛提供了政治庇护，中印关系转向对立。赫鲁晓夫指责中共将达赖喇嘛驱逐到印度让印度共产党为难，破坏了国际反帝运动的格局，损害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指责怀恨，决定武力教训印度兼向赫示威，同时制造临战局面以压制刘少奇在党内日益上升的影响力。1962年10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对印度开战。根据毛的命令，中共数万大军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度占领区发起了进攻，迅速占领了传统边界与麦线间的九万平方公里地区。

战争爆发后，印度呼吁国际调停，苏共警告中共止步，各国共产党跟随苏共抨击中共发动战争，国际社会一致支持不结盟运动领袖国印度。在苏共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只好服软，下令停火撤军。记者马克斯韦尔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6] 中共对国人宣称：“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由于中共将这场儿戏战争的真相长期隐瞒，国人和这位记者不知道，毛泽东命令的不仅是撤军，还命令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和全部战俘交还印方，命令从“麦克马洪线”全线再后撤二十公里，实际是向印度赠送上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如今，国人在中国地图上看到的中国境内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广大富饶地区已是印度数百万移民几代定居的家园了，而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的“阿鲁纳恰尔邦”与藏南地区并不完全重合，中国再无可能收复这一地区。

藏南领土不是毛泽东出卖中国领土的全部。中共为避免中印边境战争后西部邻国与印度结盟对付中国而拉拢巴基斯坦，在边界谈判中主动退让，通过签订《中巴边界问题协议》（1963年3月）使中国再丧失了2000平方公里（750平方英里）的领土。此外，毛泽东还向朝鲜赠送了领土。1963年9月，金日成以“建立朝鲜革命圣地”为由，要求毛泽东将长白山划给朝鲜。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与朝共签定密约，将长白山一半划归朝鲜，使长白山、天池（图们江、鸭绿江源头）由中国领土变成了中朝界山（朝鲜将获赠部分改称白头山）、界湖。

四清运动

毛泽东的生活中不能缺少整肃运动与战争。在“反右倾”运动还没有宣结束时，他又发动了“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运动，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仍在进行时，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又发动了以抓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各地领导人都在忙于救灾和恢复生产，对不间断的整肃运动不那么积极，并且谁也说不清各种名目的整肃运动有何不同，特别是说不清“整风整社”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区别何在。

八届十中会后，毛泽东南下周游，批评各省领导人只顾救灾，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要求以阶级斗争和社教运动为工作中心。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二月会议）上宣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再次要求开展“社教运动”。刘少奇清楚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灾荒扩大招毛不满，以为积极支持整肃运动即可赢回毛泽东的信任，在会上顺着毛泽东的意思发挥说“超过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的社教运动，在农村追查基层干部在大饥荒中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又称小四清），在城市开展新一轮“五反运动”（新五反运动），反

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会后，毛泽东再南下周游，督促各省开展整肃运动。

5月，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在杭州举行工作会议（五月会议），推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作为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在这一文件中，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称“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结论是要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刘少奇附和毛泽东，主动出面担任全国社教运动总负责人。根据会议决定，中共各级机关组织干部进行开展四清运动前的集训。集训内容主要是灌输“阶级斗争”思想，训练整肃不手软等等。其中，广东省委抽调千余省直机关干部组成了省委书记赵紫阳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先安排在揭阳县城闭门学习一个月，要求“人人过社会主义关”，阶级斗争中不能手软等等。各地集训后，刘少奇复制“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作法，派出百万各级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进驻各地农村及城市，开始了全国“社教”（四清）运动和“新五反运动”。

向全国派工作队的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领一支四清工作组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蹲点”，以便“抓点带面”。进驻桃园后，王光美将大队党支部定性为是“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桃园大队干部“洗澡”（接受批斗），互相“搓澡”（互相揭发批斗）。工作组将党支部书记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帽子，宣布查出五户“漏划地主”和两户“漏划富农”。经过一轮延安整风和土改运动模式的迫害整肃，王光美为首的工作队总结出了一套“桃园经验”。其内容与土改运动经验大同小异，主要为：组成工作队，先绕开原基层领导秘密进村，秘密“扎根串连”，找村里最穷的人作为重建中共基层组织的积极分子，鼓动他们控诉及斗争现任基层领导，然后开展“对敌斗争”的“大兵团作战”，造成高压态势，对原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查到“四不清”干部时要求他们交待指使作恶的上级，向上“挖根子”；运用“逼、供、信”等等。

1964年夏，刘少奇成立了自任总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带着夫人王光美全国巡回演讲介绍“桃园经验”，并主持下达了另一“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刘少奇的“后十条”要求扩大整肃规模，将毛泽东已经危言耸听严峻形势估计进一步升级，称基层政权基本上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成了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向全国农村增派工作队，推行中央——省委——地委——四清工作队的运动模式，暗示县级以下的农村领导层“已经烂掉了”，需要全体整肃。人民公社化后，农村财产的大权操于政府之手，小权操于基层干部之手。大饥荒中，全国农村饿死的数千万人，但基层干部依靠手中控制的仅有粮食没有挨饿。在“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敢于为老百姓讲话的农村干部被以“右倾分子”罪名整下去，甚至整死，留在任上的基层干部都是“反右倾”、“反瞒产”政策忠实执行者，是大饥荒中搜粮、扒房，打死人，逼地人，私设公堂，实施酷刑的主持者。此时，中央要查基层干部在饥荒中的罪恶，号召农民控诉他们，顿使这些人陷入人人喊打的绝境。工作队要求农村基层干部自己坦白交待，互相揭发。经四清工作队动员，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愤怒爆发，纷纷要求枪毙这些饥荒中的恶霸。然后，工作队将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干部关押，实施与土改运动、“反右倾”、“反瞒产”中同样的残酷整肃，无数在大跃进中执行上级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受工作队的酷刑。运动造成了与土改运动自杀潮、“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自杀潮之后另一波农村自杀潮。

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回忆四清运动情况说：新庄大队有七个生产队近两千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五百多人，有六户人家死绝。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四清”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另组新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根本退赔不出

来)。可支部书记马某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工作组仲组长亲自迫马交代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布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鼻子流血不止，再叫民兵把马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五小时。……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书记，拳打脚踢。当晚，马书记上吊身亡。愤怒的群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并不因为马书记自杀而善罢甘休。仲组长决定开会斗尸，派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书记的尸体拖出来扶起站立。批斗发言中，扶尸体者人摔倒压在人身上，群众四散，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马书记是新庄大队土改中最早被发展入党的土改积极分子，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执行了中共从合作化到反瞒产的全部农村政策。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老百姓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8]

事实正如马书记和尹厅长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下达了高指标向农民征粮，下令对完不成征粮指标的基层干部展开反右倾批斗，下令在农村展开反瞒产私分运动，组织征粮队挨家挨户搜刮农民粮食，将农村粮食搜刮一空造成了大饥荒。饥荒后，中共中央派“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随意整肃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基层干部。马书记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对饿死乡亲的愧疚之外，还有一肚子委屈，且在运动中投诉无门。被关押，批斗的基层干部承认他们有“多吃多占”的行为，但他们都强调，残害农民的都是上级强令之下干的，如果说有罪，罪不在己，而在上级。这就是他们不认罪的道理和自杀的冤情。

在城市，“四清”和“新五反”运动工作组接管所到之处的基层领导权，将几年前的肃反运动再来一次，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开展查“小台湾”，查“反革命两面政权”，将划阶级成分再来一次，对镇反、肃反运动后幸存旧政府人员以“阶级异己份子”的罪名再迫害一次，将延安整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洗澡”整人运动再来一次，将一大批干部“请上楼”（宣布有问题），逼迫他们自污、交待“历史问题”，组织对他们批斗（小盆洗澡），宣布其中一部分人检讨或交待不获通过，对他们组织升级规模的大会批斗（大盆洗澡），再宣布其中部分人交待不获通过（不予下楼），性质转变为“敌我矛盾”，将他们隔离审查，投入私设监狱。其中，李井泉甚至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名义展开了针对中学中的整肃运动。工作组将中学生作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成千上万的中学生遭到批斗、侮辱，甚至导致学生自杀，将数千中学生送去劳教或押回农村劳改，[9] 留下了政府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黑暗记录。

“四清”（社教）运动的迫害手段与延安整风、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倾、反瞒产等迫害运动大致一样，都是造成不交待出问题过不了关的局面，使被整者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怖。这些迫害手段包括：大会斗争，强迫弯腰、低头、游街、挂牌子、戴高帽、燕飞（喷气式）、跟踪、盯梢、以集训为名

关押、捆绑，罚跪、各种体罚、殴打、刑讯、假枪毙、吊人、冻刑等等。运动中，“专政”隔离室、拘留所遍布全国农村公社、大队，城市机关、企业。在刘少奇、王光美的试点河北抚宁县，中共的“四清”运动就整肃了两千党员、干部，害死了两千多人；斗争管制及新“划”出了一千多户地主、富农。[7]由抚宁看全国，四清运动的受害人数极其庞大，造成的自杀潮比“民主革命补课”中的自杀潮规模更大，甚至造成学校学生自杀，甚至小学生自杀。[10]人们都知道后来文革中的迫害残酷，其实，“四清”（社教）运动已经残酷之极，打死、逼死人无数。整肃基层干部之外，四清社教运动还将镇反、肃反、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中斗争过的对所谓黑五类人员（地富反坏右）拉出来再斗争一次，施了“二次迫害”。与土改经验一样，四清运动、“桃园经验”也是为所欲为、任意迫害人的教科书，所推出的跟踪、盯梢、大会斗争，强迫弯腰，低头，罚站，游街、挂牌子、戴高帽、燕飞（喷气式）迫害手段成为不久后文革运动中整人的示范。可以说，领导四清迫害运动的刘少奇夫妇在不久后受到同样迫害并不冤枉。

刘少奇积极推动社教四清运动的一个动因是在探亲中了解到基层干部在饥荒中“吃小灶”，酒肉不断，决心整肃“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饥荒中农村基层干部靠多吃多占生存下来不假，但与高层相比，基层的“多吃多占”是九牛一毛。大饥荒中，中共“七大领袖”在各地的行宫照样开工，建成，高层们照样到北戴河避暑。中共早在延安时就建立的高层吃“小灶”的制度，规定了毛泽东等高层享受每天吃鸡的待遇。大饥荒中，中共高层们都享受着特供的鸡鸭鱼肉，高档烟酒。在饿死人最多的 1960 年，中共中央出台了高级干部和指定的“民主人士”享受“特供”的一套规定（饥荒过后，中共将“特供”扩大至 17 级以上干部），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后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增加为两次，有从文工团选出女演员为毛伴舞、侍寝。[11] 毛的情人陈惠敏（陈露文）多年后披露：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外个个都玩女人，周、邓、朱、叶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她坦言，去中南海跳舞是为了吃一顿外面是吃不到的丰盛晚餐，富强

面和美味的炒菜，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12]

刘少奇在《人民日报》推动放“高产卫星”时没有提出批评，在视察中也没有拆穿各地明显的造假，在饥荒中与众高层一样享受着特供，避暑。他对大饥荒中的茅台生产大跃进，对从饥荒省调粮食去酿茅台酒不置一词，却痛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13] 他很清楚，“放高产卫星”是毛泽东推动的，报社总编只是奉行事。从“放卫星”到“反右倾”、“反瞒产”，他不敢批评毛泽东，不自责对饥荒的第二位责任。在饿死数千万人后，他向基层干部大兴问罪之师，同时没有为自己在饥荒中享乐忏悔过。

毛泽东、刘少奇比谁都清楚，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恶行与国民党、地主、富农无关，是中央政策造成的。他们联手发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有着各自的打算，都在想整肃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通过主持“四清社教”运动，刘少奇整肃了一大批“大跃进”中作恶的干部，杀了一大批民愤极大的基层官员，声望日增。随着肖像开始与毛像并列悬挂悬挂，他在 1964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插话。按中共高层的规则，上级可以在下级讲话时插话，下级不得插上级的话，插话至少是平级才算冒犯。在毛泽东看来，他可以在任何人讲话时随意插话，而任何人在他讲话时插话都属于冒犯。毛泽东对各地干部“贯彻刘主席指示”的说法难以忍受，对刘少奇插话感到愤怒。联想起邓小平在会前劝他不必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毛泽东认为刘、邓代表的中央“一线”要对他夺权。散会后，他发火说：“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结果，回到各省的大员们被召回接着开会，毛泽

东讲话说：“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有人搞独立王国”。[14] 大家都在猜毛泽东所言谁指，并感到恐怖。

1965 年初，毛泽东主持推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王力，许立群、邓力群等执笔）作为新的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宣布城乡四清运动从“小四清”进入“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阶段。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提出：“全党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他期望通过“四清”运动清算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但是因刘少奇主持着“四清”运动而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对“四清”运动不再感兴趣，转而布署另一场更大的整肃运动。

这场“社教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灾难将责任推卸给基层领导，让基层领导作替罪羊的整肃运动，是一场高层整肃小吏以掩盖自己罪责的运动，是饥荒中住行宫、享特供的中共领袖们整肃基层干部“开小灶”，吃馒头的运动。以“社教”、“四清”名义，中共在全国城乡大饥荒后整肃了城乡五、六百万基层干部和平民，整死了近十万人。这样的运动是了解革命和革命家的钥匙。革命家们就是这样生存过来的。大饥荒中，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说，发动“四清社教”运动时，他声称有 20%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随后，他将形势越说越严峻，说有 30%，再说有 40%的政权不在共产党之手。事实上，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代发生全国大饥荒，正是因为百分之百政权在共产党手中的结果。毛泽东将大饥荒罪责嫁祸国民党，而同期国民党在台湾领导着经济起飞，台湾的农民享受着和平、有偿土改的实惠，台湾当局在饥荒中在向大陆沿海地区空投物资救灾。十几年后，中共宣布“四清”（社教）运动中“挖出”的所谓反党联盟、“漏网地主”、“漏网富农”、“敌我矛

盾”等等全部是冤假错案，自己证明了“四清运动”的灾难性质。从肃反运动到“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到“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到“四清社教”运动，中共以阶级斗争名义的整肃运动害死人数极其巨大。由于中共将有关档案保密，或销毁，真实受害人数无从知晓。

从“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到文革，整肃运动接着整肃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祸害人民的运动没有间断，灾难没有间断。毛泽东时代的多数整肃运动不是正式结束，而是在新运动中不了了之。例如，肃反没有正式结束，在反右中不了了之，“反右倾”运动没有正式结束，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中不了了之，“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没有正式结束，在“四清社教”运动中不了了之，“四清社教”运动也没有正式结束，随后的文革运动中不了了之。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二十世纪的中国强人都抓枪杆子，都整肃对手。但他们都愿意看到民众安居乐业，愿意兴办教育，改善民生。而毛泽东对改善民生没有兴趣，享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求永远有整肃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

禁止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丧失，农业生产衰退，集市贸易消失，在“包产到户”热潮中刚有好转的国家财政状况再现恶化。随着农民摆脱苦难的希望破灭，边境地区出现民众冒死逃亡潮。例如，广东宝安，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边民逃得十室九空。

1964年2月，新华社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华北洪灾后重建房屋和梯田的事迹总结为“三不要”“三不少”（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质不要；卖给国家的粮食不能少，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毛泽东感到大寨事迹可以作为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证明，决定将大寨树立为先进典型，让全国农民都像大寨人那样“三不要”、“三不少”。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精神，

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这时，“四清”工作队查出大寨大队的粮食实际产量少于村支书陈永贵报告的数字。按照“四清”的作法，要顺势追查，将陈永贵关押。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要树立大寨典型，亲自出面干预，责令山西的“四清”工作队不得为难大寨。8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号召，要求农民不向政府要救济，多向政府交粮食。随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共向全国推广的“大寨经验”其实是毛泽东制造“大跃进”灾难的一套作法。其一是“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抓阶级敌人，将“四清”运动的政治高压与精神恐怖扩大。奉毛泽东的指示，陈永贵在大寨和昔阳县大搞“阶级斗争”，要求人们互相监视，查“思想动向”，打击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思想，甚至指使孩子监视他们的富农父亲，将接受指使的孩子表扬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时，大寨本身一片阶级斗争恐怖，昔阳全县开展的“抓阶级斗争”、“实行全面专政”，犯下了累累罪行，迫害致死 141 人，致伤不计其数。被害死者中，有百余人是因为不堪忍受酷刑折磨而上吊、投水、跳崖自杀。[15] 其二是“穷过渡”，收回农民自留地，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穷队“共”富队的产。运动的结果是，全国农村再次实行“一平二调”，使贫富不均的生产队再共产一次。其三是根据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开展“向荒山要田，要粮”，的开荒运动，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各地照搬“大寨经验”，“向荒山要田”，“向草原要田”，“向湖区要田”，毁林开荒，毁草原开荒，围湖、填湖造田。例如，湖北在“农业学大寨”中填湖数百，毁了“千湖之乡”；浙江、上海市郊填池塘十几万亩造田；内蒙大规模毁掉草原造田；南方的基层领导们为了政绩，下令在本地毁掉山林，大建大寨式的梯田，结果是劳民伤财，将南方的绿水青山变成了荒山秃岭，使大片蓄洪区、湿地消失。如此学大寨运动的结果是全国快速沙漠化，是为中国有史以来对草原、山林最大规模的破坏。其四是另一次“大跃进”式的兴修水利运动。其特点是不讲科学，胡乱开工，粗制滥造，破

坏环境，劳命伤财，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给农民带来连年徭役，和大规模的伤病死亡。

在树立大寨典型的过程中，中共运用了造假手段，向全国宣传大寨人不向政府要一分钱，全靠自力更生，实际政府无偿向大寨向每个农户平均提供了万余元的资助，为大寨无偿建设了水利设施，空中运输索道，喷灌滴灌工程及农业机械等，帮助大寨村一举脱贫。各地农民对于学大寨运动的祸害很清楚，农民总结的实话是：“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16]

第 47 章 中苏分裂

1954 年，赫鲁晓夫率团来华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这时，他需要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带头支持他的新领袖地位，因此愿意改变苏联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和斯大林长期也来对中共的家长态度，换取中共的支持。在与毛泽东会谈中，赫主动向中国示好，表示苏共愿意放弃《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议》中斯大林规定的大部分在华特权，愿意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将四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准备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援建中国 156 项工程，赠送中国农机设备和在中国展览的机器设备等等。

毛泽东感到长期受斯大林的气，如今熬出了头。他从前就不关心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现在也不为苏联放弃在华特权而高兴，而更关心的是与赫鲁晓夫争共产阵营领袖之位。赫鲁晓夫的平等态度更助长了毛泽东争当共产主义阵营老大的雄心。不过，毛泽东知道坐共产阵营领袖位须有苏联那样的军事实力。自从苏共有了原子弹，毛泽东确定了掌握原子弹的目标。为此，他主动提出出兵朝鲜，讨斯大林满意以便从苏联获取军工援助和核技术。在与赫鲁晓夫会谈中，毛泽东提出要核技术，赫以提供核保护伞的说法拒绝。会谈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其中宣布苏联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要核技术被拒绝后，毛泽东将炮击金门的台海危机升级，利用结盟关系让赫鲁晓夫面对被卷入与美国全面对抗的难题，同时再要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答应了毛的要求，批准逐步向中共提供核技术。毛泽东苏联提供核技术的进度不满，感到按这样的进度总无法达到作世界领袖的目标。

1958年8月，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毛泽东以在中南海的游泳池里与赫会谈的安排表达轻蔑。会谈中，毛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因为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更多的师。我们同你们拥有的师比美国人多，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打一下，不立即解决世界革命的问题呢？”赫：“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什么革命，这是战争！现在已经不能按师、而是按原子弹来计算了。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毁掉整整一个城市。”毛：“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两百个，一千个都行。”赫鲁晓夫怒言：“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我们不会同意，也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样做！”[1] 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刚刚回国，毛泽东再次下令炮击金门，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拉苏联下水的方式要挟赫鲁晓夫。赫认为毛完全不通报开战的作法是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意识到向毛提供核技术极其危险，决定停止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政策展开严厉批判，抨击中共放“高产卫星”、抨击宣布在四个月内实现钢产量翻番是胡闹，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农村经济，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中共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抨击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暴动，并警告“剥夺农民财产将造成饥荒”。[2] 不久，赫鲁晓夫的警告应验，并且饥荒灾难比赫所预言的更加严重。

毛泽东咽不下被赫鲁晓夫多次公开批评这口气，指示理论班子对苏共展开论战。他知道，不能就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批评与苏共论战，因为大跃进导致饿死数千万人的真相只能对国内老百姓封锁消息，在国际上根本瞒不住，赫鲁晓夫批评之言已被事实证明正确，于是毛泽东指示理论班子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提出苏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按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总书记邓小平为首，康生、吴冷西、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许立群、乔冠华、王力等人为成员的

写作班子，开始起草“反修正主义”文章。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共连续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向苏共挑战，批判苏共奉行和平共处政策是背离了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的马列信条，成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在6月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回应中共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只有疯子和狂人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带来灾难，使人民没有裤子穿。”会上，除了毛泽东以无偿援助收买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支持中共外，其它数十共产党均支持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谴责中共鼓吹战争。苏共在会议中向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递交了一封逐一驳斥中共三篇文章观点的信函，在会后即停止了对中共一百多个项目的援助，撤走了技术专家，同时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至此，中苏两共的蜜月关系结束，共产主义阵营走向分裂。

苏联停止援建对中国老百姓是好事。因为，按毛泽东的要求，援建项目基本都是军工项目，且苏联的援助不是无偿的，需要中国以粮食偿还。中共为这些军工项目拨出配套资金也数额巨大。这些军工项目是中国连年财政亏空和发生大饥荒重要原因。为还军工债，为了军事工业化和核武器研制，毛泽东不断增加搜刮粮食的指标，在农村大饥荒中继续要求按高指标征购粮食，发动了武装搜粮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造成了大饥荒。

为向苏联示威，毛泽东在国内千万人饿死的形势下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承诺补足苏联停止援助的部分，其中包括能够立即在中国救活灾民的粮食，甚至命令货轮直接将西方国家人道主义救灾粮运去阿尔巴尼亚。[3] 1961年初，在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赫鲁晓夫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帮助中国缓解饥荒建议，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50万吨糖，主动提出中国对苏十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分五年偿还且不计利息。毛泽东不在乎百姓死活，为与赫斗气拒绝苏共的人道援助建议。

1961年10月，苏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了列宁反对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遗嘱，宣布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火化，宣布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两全）为国策，批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号召阿共党员起来推翻霍查的领导，以此方式间接批判中共坚持斯大林主义、鼓吹战争的立场。以周恩来、彭真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表示反对火化斯大林遗体。赫鲁晓夫回应：“你们要斯大林，可以把尸体搬到北京去”。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率团向斯大林墓献花圈后提前离会回国，毛泽东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高调到机场迎接以示对苏共决裂。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缓和与苏共关系，接受和平共处，对外援助量力而行，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等务实建议。中共高层们都清楚在大饥荒中坚持对外无偿援助意味着更多饥民被饿死，知道王的建议虽然没有直接要求废除搜刮民粮对外援助的暴政，但符合救灾需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纷纷表示赞同王的建议。毛泽东拒绝与苏共息争，但在下台危机中暂时默认。半年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七千人大会大会展开清算，斥“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恢复经济的作法为“右倾机会主义”，声称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要求在国内和国际同时“反修”，斥王稼祥的几项建议为“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刘、周、邓一同转向，改口支持毛泽东，王被迫向毛作检讨，在会后被迫搬家离开了中南海。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发动了中印边界战争。苏共发表了形同通牒强硬声明，表态支持印度，警告中共止步。毛泽东服软，不仅下令撤军，还命令从战前分界线全线再退二十公里，以赠送领土的方式结束了在中印边界的战争。大概由于长期处于群臣指鹿为马的环境，这时的毛泽东思想行为荒诞，失常，既反“美帝国主义”，又反“苏共修正主义”，要求同时与全世界主要国家为敌，整天鼓吹战争。被苏共强硬声明教训后，毛泽东窝火愤怒，决心报

复，指示对苏共展开论战。按毛要求，中共中央于 1962 年底开始连续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系列“反修”文章，借批判意共总书记反对战争的讲话抨击苏共“三和两全”政策为“修正主义”。苏共不想让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毛泽东拒绝息争，发布内部指示说：“赫鲁晓夫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打笔墨官司，天塌不下来，西山的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在水里游。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4] 按说，对毛这样又说要回骂又说赞成休战的指示应当有人敢于问个明白，但这时的中共内没人敢与毛泽东正常对话，大家都习惯接受这种不知所云的指示。1963 年 3 月，苏共再致信中共建议息争，但要求以中共改变错误政策为条件。毛泽东拒绝认错，指示邓小平起草针锋相对的复信，并寻求亚洲小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党崇尚暴力，不懂妥协，但各国共产党人在核对抗的时代也知道核战争没有赢家的道理，不想家园再变废墟，一致拥护苏共的和平共处立场，反对中共鼓吹世界大战。鼓吹战争的中共在共产阵营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共产党还有往来。赫鲁晓夫为坐稳共运领袖之位不得不拉拢中共。毛泽东想坐共运领袖位，也必须争取一些小共产党的支持，其拉拢办法唯有以提供无偿援助收买。他在对苏决裂前已花大本钱收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论战中，他采取一系列秘密拉拢办法争取到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北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支持中共对苏复信稿的立场。这些支持的背后都是规模巨大的秘密交易。例如越共的支持背后是，正在布署挑起越战毛泽东派邓小平带着“反修”文章草稿和提供 200 亿元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赴越南，所得到的不过是越共表态支持中共的“反修”文章。[5] 在国民生活极为困苦的 1963 年，这 200 亿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 60%。相比巨额援助所得，小共产党们当然觉得表态支持无所谓正确的论战

一方是值得的交换。得到小共党们的支持表态后，中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共展开了另一轮论战。苏共只好接受挑战，组织了数百篇文章批判中共的主张。

7 月，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会谈。会谈期间，苏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平过渡和建设共产主义等问题逐条批驳中共的政策、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了“九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 1963 年秋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由于中苏两党论争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无从界义的概念，论战无所谓道理，只是互相攻击而已。中共在文章中指责苏共“复辟资本主义”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两共均未经历资本主义时代。

从双方论战文章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为：赫批判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毛坚持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赫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缓和关系，避免战争，特别强调避免核战；毛反对缓和，坚持暴力摧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世界大战；赫淡化阶级斗争，毛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上述分歧之外，二人间还存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之争。中苏两共论战期间，苏联与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条约，承诺防止核武器扩散，不支持中国发展核武器，推动世界在和平共处方面取得进步。在核对抗时代，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无疑代表着理智。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违

反了列宁主义，主张发动世界大战摧毁西方世界，背后是发动核战争的打算。应当说，论战中中共的主张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否定生命权、财产权、否定和平改良，否定妥协与共处，主张你死我活，崇尚血腥、暴力与毁灭。毛泽东坚持这些信条，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但因应核对抗形势放弃以战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教条，主张和平与妥协。他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抨击毛泽东挑起核战争的疯狂言论，顺应了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教旨。当人们了解到两共论战中的上述分歧后就会明白，毛泽东在论战期间写的“梅花欢喜漫天雪”诗句是在呼唤战争，呼唤世界大战，呼唤核战争，“冻死苍蝇未足奇”诗句表达的是反对和平共处，否定人民的生命权的心态。

中共中央在全国反复广播，要求老百姓收听的“九评”文章，在今天读来让国人感到羞愧。因为这些根据毛泽东“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指示撰写的文章通篇不讲道理，乱扣帽子，充斥“嬉皮笑脸”、“泼妇骂街”、“信口雌黄”、“大肆谩骂”、“大肆咆哮”、“耍赖”、“狡辩”、“陈词滥调”等贬辱谩骂，成为全世界的笑料。将“九评”文章与清廷对世界各国的宣战诏书比较，看不出六十多年的革命带来任何进步，看到的是更加强词夺理。这种被西方世界称为“新华社体”的“九评”文章毒害了一代青年。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教育成长青年们在几年后的文革大批判中继承了“九评”文章的谩骂风格，在标语口号和文章中大量使用辱骂、暴力，血腥的字眼，是为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色。

第 48 章 崇毛运动

在延安，毛泽东营造了效忠他、吹捧他才能获提拔的环境。彭真是最早的受益者。他在所掌管的中央党校率先推出“毛主席万岁”口号，随后在整风运动中获毛提拔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总学委。整风运动中，不赞成崇拜毛泽东，不造成喊毛万岁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地位跌落，[1] 积极推动崇毛的刘少奇、彭真等人地位窜升，《解放日报》开始刊登“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大标题和“毛主席万岁”口号，中央党校在大礼堂开始摆放毛泽东浮雕头像，党校开始给学员发毛像章，中共中央开始向边区老百姓派发毛的肖像要求悬挂，边区开始唱《东方红》。

整风运动后，中共宣传部门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毛泽东派刘少奇负责编辑、审定《毛泽东选集》。他接手后发现，所选文稿基本都是中共高层成员和秘书的手笔，毛泽东只是挂名发表、照本宣读，最多对其中作些象征性修改。刘向毛提出在著作后加注释说明执笔者的建议，毛不满地说：“算不算我的著作，你们看着办，我从来不是在代表我个人干革命的。”刘决定不加注释，将理论班子的文章，包括他本人起草的一些文稿都归到了毛泽东名下。建国后，康生奉毛之命接手《毛泽东选集》编辑事宜，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大批由秘书班子撰写的文章手稿销毁，大量删除不利毛泽东形象的文字，例如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关于“痞子最革命”的论断，在抗战爆发时关于“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等内容，帮助毛泽东去了心病。[2]

与《毛泽东选集》一样，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诗词》也多有抄袭或根本是他人之作。抗战中，受益毛泽东坚持避战方针，中共众高层在延安颇得闲

暇，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组织了“怀安诗社”，秘书们投毛所好，争相请毛帮助修改诗词。于是，众多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诗词》在“切磋”中诞生，在建国后被倒填日期发表。例如，《菩萨蛮·黄鹤楼》被倒填日期为 1927 年，当时“沉沉一线穿南北”的粤汉铁路尚未建成。“万木霜天红烂漫……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填词背景是，红军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旅长王捷俊等人以铁丝穿手反口，实施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点天灯，割下张等头颅放在一块木板上顺河漂到白区，以表达对国民党清共的仇恨，[3]“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填词背景是红军在占领吉安的四十五天中每天贴出布告杀“反革命”，在如此血腥恐怖中填写词章让人难以相信，说是胡乔木等人在延安的宁静中发挥想象，切磋成词倒是可信。关于《沁园春·长沙》，不少词家认为该词与《毛主席诗词》中其它词作功力与风格迥异，不可能与“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不须放屁”等句出自同一作者。将该词的建国后发表版本与 1930 年代萧三在陕北所得版本有所不同，两处关键改动为：将“肃立”改为“独立”；将“欢歌”改为“偕来”。据此推测，该词应是 1920 至 1921 年间毛泽东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橘子洲时的联句之作，经功力高深的老师修改而成。[4] 《沁园春·雪》一词显然是文臣颂扬君王之作。其创作日期为 1936 年 2 月。当时有率领大军的张国焘竞争，有张闻天任名义最高领袖，毛泽东尚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多数词家相信，该词是文臣胡乔木在延安整风后的进献之作（据说胡临终前曾要求恢复此词与“老三篇”的著作权）。

1959 年，毛泽东将反对个人崇拜和大跃进的彭德怀的罢官，让亲信林彪掌军，嘱林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1960 年，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而声望低落之时推出了经康生主持修改，自己审阅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按毛的要求，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了效忠毛泽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根据总政的要求，解放军各军区开始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其中沈阳军区所树典型最得要领。

按照总政要求，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选中新战士雷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包装对象，制定了一个“报大典型”计划，经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后开始实施，安排了一位市委常委负责培养雷锋，指定团副政委刘家乐、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负责“雷锋典型”事宜，派政治部宣传处干事于长清任雷锋的理论辅导教员，成立了包括工程兵第十团宣传股长、组织股长领衔的写作班子，代笔写雷锋学习心得、讲稿、《雷锋日记》和雷锋苦难家史，派摄影人员张峻、季增等人组成了雷锋摄影组。1960年底，沈阳军区《前进报》相继发表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和《雷锋日记摘抄》，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等报纷纷转载。

这时，毛泽东正在困境之中。在全国大饥荒中，各地官员在人相食的情况下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表达了领袖换人的要求。在下台危机中，毛泽东见到《解放军报》刊出的《雷锋日记摘抄》，对其中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句高度赞赏。于是，林彪决定将雷锋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大典型”计划一举成功。在此后的一年中，新战士雷锋基本脱离连队，巡回在各地部队作报告，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沈阳军区政治部安排了一套人马为他写讲稿，编做好事的故事，安排宣传干事为他设计场景、安排“群众演员”，摆拍“雷锋事迹”照片，安排摄影组随行，拍摄了“雷锋出差行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系列照片。

1962年初，毛泽东在被迫同意退居二线的被动中决定，将军内的学雷锋运动推向全国，以对自己崇拜运动压制刘少奇上升的声望。这时，雷锋在一年多的巡回演讲中所作苦难家史报告、做好事报告已经破绽百出，不久，雷锋蹊跷牺牲。随后，沈阳军区政治部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对《雷锋日记》进行了再加工，加入了“把毛主席的话当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对待同志要向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名句。

1963年春，毛泽东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亲自将军队的“学雷锋运动”推向了全国。他没有说明向雷锋学什么。林彪跟随题词作了回答，照搬《雷锋日记》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周恩来跟随题词强调阶级斗争，已经淡出核心的朱德加入了题词热潮，题了学雷锋运动的效忠要点：“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敢落后，跟随题词。众高层的联袂题词形成了中共中央决议的效力。紧接着，毛泽东批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工作与政治工作，经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有了很大的起色……”，以此表扬林彪推动的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毛泽东发动“学雷锋运动”有几重目的：一是推动崇拜自己的运动摆脱独裁地位危机，二是如周恩来题词所表达的，在全国鼓动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三是要求国人像《雷锋日记》所表达的，作“革命的螺丝钉”，扫除独立思想，主动洗脑，成为“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工具。通过携高层一起题词，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后仅一年就通过在军队中开展“学雷锋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再将运动推向全国，营造出了全国崇拜自己的局面。

众高层的“学雷锋”题词发表后，中共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崇拜毛泽东的运动，举行积极分子先进事迹报告会，表彰会，经验交流会，批量推出了崇毛先进典型、标兵人物，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天在报头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要求军区培养各自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各军区政治部纷纷推出自己的典型，军内涌现出廖初江、丰福生、黄祖世等一大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军队和各行各业推出的标兵事迹大同小异，都是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多遍，写下了长篇的学习笔记，其包装推出过程与沈阳军区包装雷锋相似。一时，《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来自集体创作的《雷锋日记》）等歌曲唱遍全国，强烈地影响了一代青年，《雷锋日记》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对待同志要象

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的警句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青年们不知道毛泽东刚刚制造了大饥荒灾难，效仿雷锋榜样，狂热学习《毛泽东选集》，狂热崇拜毛泽东，争相效仿雷锋，充满阶级仇恨，作“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工具。

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走捷径、背警句”的指示，在军队中推出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林彪在为“小红书”撰写的前言中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再次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将解放军不光要效忠一党，更要效忠领袖个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林彪的推动下，军队中推行的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语录》的作法被推向了全国。在各地、各行业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毛泽东再发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典型。报刊宣传的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都围绕着一个要点——崇拜毛泽东，“学习毛主席著作”。随着崇拜毛泽东热潮升温，中共八大后形成的“七领袖”说法被效忠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取代，各地办公室、会议室悬挂的中共“七常委”并列肖像，毛、刘并列肖像逐步被取下，代之以毛泽东一人的肖像。

崇毛运动是毛泽东自己推动的，而为毛贡献最大的林彪和周恩来。周恩来在文艺宣传领域推动崇毛之积极不在林彪之下。为了推动崇拜毛泽东，他把自己入党时间从1920年底（在法国由员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入党）改为1922年，以宣传毛泽东缔造中共。他淡化自己参与领导的“南昌暴动”，突出“秋收暴动”，下令取消军装样式中的“八一”图案，亲自策划了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序曲中首创了“毛泽东时代”说法，为毛泽东献上了“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的颂词，在史诗中为演出人员作党史报告说：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才走

向胜利，[5] “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6] “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7] 周恩来特地安排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将这台节目演给毛泽东观看，安排毛接见三千演员，并当场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指挥全场山呼“毛主席万岁”，让毛泽东感受到了退居二线后最开心时刻。与林彪推出“最高指示”说法同时，周恩来将《东方红》中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推向了全国。

推出舞台史诗《东方红》后，周恩来决定把《东方红》拍成电影，[8] 指示“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9] 指示外贸部进口最好的胶片，[10] 还策划推出了以输出革命为主题，专为给其它共产党领袖看的《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等剧目。[11] 他计划，再推出以歌颂毛泽东为世界革命领袖为主题的《东方红》第二部。由于各国共产党追随莫斯科，不支持中共，计划中的《东方红》第二部没有市场，只好搁置。周恩来推动崇拜毛泽东的另一杰作是亲自将歌曲《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词、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崇毛运动中，周、林二人还联手推出了以歌颂毛泽东为主旨《长征组歌》，让这部组唱遍了全国，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林彪、周恩来推动崇拜毛泽东的竞赛对刘少奇形成了压力。刘少奇也加入了竞赛，要求四清运动工作组也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崇拜毛泽东的运动。经林、周、刘的合力推动，中共在大饥荒后迅速将制造灾难的毛泽东捧上了更高的神坛。

1965 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运用包装雷锋的同样手法，再推出了英雄王杰。《王杰日记》与《雷锋日记》的加工手法大同小异，内容也是记录自己做好事不留名，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文章，以及推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与推动学雷锋运动一样，毛泽东再率众

高层题词。这次更多高层加入题词，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罗瑞卿等人。毛泽东的题词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周恩来的题词是照抄宣传部门创作的王杰诗：“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施工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高层题词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开展学习王杰的运动。

文革运动开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批量推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英雄，先后推出了“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蔡永祥、“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献出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为抢救落水红卫兵而溺水牺牲的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在意外爆炸事故中牺牲的军队干部门合等等。总政推出的英雄都有日记中与雷锋大同小异的口号，要点都是崇毛。其中，李文忠口号带有林彪语录的特色：“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的口号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如果说解放军政治部推出的雷锋事迹是精品的话，随后接连推出的英雄则越来越粗制滥造。随着林彪集团势力膨胀，毛泽东对解放军总政治部推出的英雄不再感兴趣，众高层相携题词的景象不再。

政治部、宣传部推出假英雄，从真实的新闻中过滤掉不合党利益的部分，加入党需要的情节等等不是中共独有，而是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普遍现象。苏军、朝鲜人民军的政治部造出了更多的英雄。在造英雄，联手题词的背后是革命家们在勾心斗角。毛泽东在“黑话信”中谴责林彪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的。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山的，看了不同意他不行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林彪明里积极推动崇毛，背地在散记批注中指毛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

招。”[12] 周恩来则遵循共产国际特工培训的纪律，绝不白纸黑字地记录真实想法。

中共高层联手推动的毛泽东崇拜运动具有反文明、反进步的特点。毛泽东要求国人像雷锋那样，没有独立思想，成为他的工具和螺丝钉，成为供他役使的奴隶。他要求国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反映出完全不关心他人疾苦，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反人类的内心世界。当年，他躺在担架上长征，不介意抬他的士兵死一路；他策划了长春围城战，为达到克城目的不介意饿死数十万百姓；他发动朝鲜战争，决定不要空中掩护，在 frontline 报告战士冻死饿死，要求停战休整时不准休整，造成数十万战士民工冻饿而死；他准备要打核战争，声言准备死三亿人；他发动“大跃进”，声言准备死五千万人。在他治下，党文艺将他的这种思想宣传歌颂，创作出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洒尽鲜血尽欢畅”、“活着干，死了算”等革命口号。与对民众的死亡与苦难无动于衷相对照，毛泽东为自己安排了众多防核地洞，为了安全随时变更住所与行程，不敢乘飞机，生活上腐败荒淫。事实上，他在统治期间带给人民就是苦与死二字。

第 49 章 越战与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南下周游，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应对经济危机的“西楼会议”，决定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项目，以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将原定于 1963 年开始的“三五”计划推迟到 1966 年再执行。会后，刘少奇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决定。毛泽东当面默认了刘少奇的汇报，实际在策划越南战争。他知道，战争一起，主导权自然回到手中，“先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的政策自然不算数。

毛泽东向越南输出革命在建国时就开始了。二战结束时，斯大林扶植胡志明在越南北方建立越共（印度支那共产党）政权，法国则扶植保大皇帝在南方的立国。越南北、南两政权在背后苏、法的支持下展开了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的越法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9 年底，斯大林与毛泽东敲定发动朝鲜战争后，同意让毛来领导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命胡志明去听取毛泽东的指示。越共服从中共领导是有条件的，中共必须向越共提供金钱武器。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为输出革命不在乎国内的财政危机和饥荒，在国外朝鲜战争，国内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背景下开始向越共提供秘密援助。

1952 年，毛泽东效仿当年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作法，向北越派出了以驻北越大使罗贵波兼团长的中共顾问团，其中包括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乔晓光为首的土改顾问团，以及一大批政治、军事、公安、组织、宣传等顾问。到越后，顾问团成立了由越共党总书记长征为主任，党中央执委黄国越、黎文良为副主任的中央土改委员会（下设各土改团，团下设土改

队），复制中国的暴力土改运动，将数以万计地主、富农处决、关押，将土改运动扩展到了南越。

暴力土改运动引发了农民的反抗。越共与中共联手镇压了农民暴动，其中包括胡志明家乡义安省琼琉的农民暴动。与苏共、中共建国时一样，越共的土改也带来饥荒，饥荒还蔓延到了南越。土改运动之外，中共顾问团分别在越共、越共军队中发动了“整训”运动和“整军”运动，以右倾罪名整肃反对暴力土改的越共党、军领导人。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不顾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立即出兵入越，与越共联手对法军开战，于 1954 年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将法国势力赶出了越南。根据日内瓦国际会议达成的协议，越南北南双方沿北纬 17 度线分治，北部由越共统治，南部由保大皇帝统治。1955 年，胡志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越推行了农业合作化，强迫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将农民的土地充公。在南方，吴廷艳发动政变，在越南南部建立了自由民主的越南共和国。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确定了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政策，在会后派米高扬到河内向越共传达苏共新政策。受苏共批判斯大林鼓舞，胡志明决定停止推行中共的暴力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迫土改委员会负责人长征、黄国越、黎文良等人辞职。毛泽东得知越共政策转变极为愤怒，认为苏共直接向越共发布指示违约，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越共继续推行暴力土改。为继续获取援助，胡志明只好妥协，让长征等人复职继续执行中共的合作化政策。从这时起，越共陷入在中共、苏共不同政策、不同指示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

日内瓦国际会议达成北南双方分治协议后，毛泽东一直谋求让越南再度开战。他喜欢战争。国共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发动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刚结束，他挥兵入越开战。日内瓦协议后，他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要求快速发展军工，研制原子弹，在国内外太平环境中盘算着发动战争。为了军事工业化和核武器目标，他下令搜刮尽农村的粮食出口，结果造成了史无前例

的大饥荒。饥荒中，他对人民饿死无动于衷，仍然盘算着在越南开战。在国内饿死两千万人的 1960 年，他扶植越共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准备武力统一越南。这时的南越政权如同朝鲜战争前的南韩政权一样，军事上无力自卫，处于共产主义阵营推翻的威胁之下。美国总统肯尼迪拒绝印度支那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支持南越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派特种部队进驻南越，支持吴廷艳政府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2 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饥荒继续，迫使毛“退居二线”。毛不能容忍两领袖并列局面，采取制造危机和对外开战夺回主导权的办法，在发动中印边界战争的同时向来汇报工作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承诺支持越共武力统一越南。

1963 年，毛泽东派总参谋长罗瑞卿率军事代表团访越，与越共签署了《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拉开越战序幕，也使刚刚从饥荒中复苏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备战轨道。他知道，刘少奇汇报的恢复经济和解决民生的“西楼会议”方针与自己的越战计划完全冲突，于是干脆派刘少奇率团访越，以便让刘自己否定自己的方针。在毛泽东反复“大讲阶级斗争”，声称内部有阶级敌人的危言耸听威胁之下，在林彪、周恩来大力推动崇毛的形势下，没有军权的刘少奇感到了地位不稳，决定按照以往经验，以追随毛为生存之道，决定抛弃刚刚制定的“西楼会议”方针。在越南，他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传毛泽东的话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驯服刘后，毛泽东再派国防部长林彪率军事代表团访越，与越共签订了军事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中共派军队赴越助越共人民军对南方开战，禁止越共“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即禁止越共听命苏共，只听命于中共。签约后，中共向越共运去了国内紧缺的粮食、物资，以及大批军事装备，在云南蒙自修建了服务越共的空军基地，增调一支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到南宁、昆明、思茅等地以服务越战。从 1963 年到 1964 年，中越两共领导人往来穿梭，高

层频繁接触数十次，中共大规模向越共运送军火、装备、食品和其它战略物资，越共频繁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进度，战争进入倒计时。

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东京湾事件）。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说明自己是从美国和越南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表白苏共与越共挑衅行动无关。这里，赫鲁晓夫说的是实话。苏共以和平共处为基本政策，没有挑起越南战争的计划，在北部湾事件前与越两共很少接触。8月，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武力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海军基地报复，同时增派美军赴越南，至此越战爆发。同月，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代表团来华要钱要物，要求中共承担越战的全部开销，保证供应。毛泽东对越共领袖来汇报工作感到极大的满足，认为是与赫鲁晓夫较量的重大胜利，爽快承诺负担越战的一切开销，但要求越共脱离苏共指挥。10月，赫鲁晓夫在政变中下台。苏共新领导层抛弃和平共处与缓和政策，转而积极支持越战。苏联政策转变，越共跟随转变，抛弃只听命于毛泽东的承诺，周旋于中苏两共之间。11月，越共领导人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获苏共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承诺。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共签订了援助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与苏共敲定了一亿美元军事装备援助计划。至此，毛泽东要求越共作自己独家属下的计划破产。

毛泽东不甘丧失对越共的独家指挥权，向来长沙汇报的胡志明主动提出派志愿军入越。随后，胡派黎笋和武元甲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与中共商讨中国秘密出兵越南事宜。在会见黎笋时，刘少奇高调承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周恩来同样高调，表示援越是头等任务。这时的中共众高层都清楚国民的困苦，但更清楚高调支持越战是最好的向毛泽东表达效忠的方式。在高层的一致支持之下，中共与黎笋代表团签订了关于出兵支援越共的协议。随后，毛泽东再派出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与越南相邻各省大员，包括广东省长陈郁，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

第一书记阎红彦，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等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越，磋商“要什么给什么”承诺的具体安排。6月，中共解放军部队着越共军服，工兵穿蓝色民工服，秘密开赴越南。

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年决定派兵入朝参战是为讨好斯大林的话，此时毛泽东挑起越战则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他在大饥荒中部署挑起越战没有讨好赫鲁晓夫的意思，相反，是在与赫斗气，与赫争夺对越共指挥权。随着赫鲁晓夫在越战爆发时下台，毛泽东以巨额援助夺得的对越共指挥权的胜利喜悦不再，还添了越共转向苏共的烦恼。苏共也向越共提供援助后，毛泽东不服，以加大援越规模的方式与苏共争夺指示权，向援越操办人发指示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根据他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物资清单中增加了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中共军队承担了越战中北越的防守，防空，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物资运输、公路、铁路修建和无数其它军事工程任务。为向南越共游击队输送军火和军需品，中共以巨额外汇收买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使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运送援越物资，开辟了自北越，绕道老挝重山峻岭和柬埔寨丛林的运输线，将原来人行的“胡志明小道”建成了公路，在云南和广西建立了越战的后勤基地，向越南源源不断地运送军需物资，其中包括国人极为紧缺的大米、服装。在中共解放军驻军北越的支持下，越共将主力军队调往南越作战，越战升级。

四十年前，苏俄大规模向中国输送军火，给中国带来的是战火和废墟。此时，中苏两共大规模援越，同样带给越南战火和废墟。经过几年战争，越南饱受蹂躏，满目疮痍。越共领导人开始明白从中苏得到的不是好处，而是灾难。1969年，胡志明去世。新一代越共领导人拒绝以战火蹂躏自己国土的代价去满足毛泽东的战争嗜好，开始与美国和谈。苏共领导层在积极支持越战也感到持续战争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支持越共和谈结束战争。这时的越

战与当年的韩战一样，停战的阻碍来自毛泽东。韩战中，金日成都不想再打了，但毛泽东拒绝停战。这一幕在二十年后重演，越共领导人不想再打了，但毛泽东不允许停战，要求越共“抗美援朝”，以减少援助施压，迫越共停止和谈，并一再承诺战争物资“要多少给多少”。越共不理睬毛的威胁，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继续和谈。这一方面是因为痛感长期战争对越南的损害，另一方面是因为权衡利弊选择苏共，决定接受苏共的经济合作承诺。越共追随苏共，使毛泽东失去了孜孜以求的指挥外国共产党的快感。报复越共倒向苏共，毛泽东大力扶植柬埔寨共产党，以柬共作为打击越共的工具，制造了“红色高棉”灾难。1976年1月，作为毛泽东发动越战的结果，越共推翻了自由民主的南越共和国，宣布建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将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毛泽东在北越推行的暴力土改和合作化已经给越南带来巨大灾难，越南全境赤化将灾难规模扩大。按照中共的要求，越共对南越前政权军政人员展开了中共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的大屠杀，造成了两百多万南越人冒死外逃的难民潮。

越战是毛泽东制造的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为满足世界领袖欲望和战争爱好，他在饥荒中残酷搜刮中国民财，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持续二十多年地秘密地输送越南。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五百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毛的援越也带给中国深重的灾难，使国长期极度困苦。越战中，共产主义阵营向北越提供了约 240 万吨物资，苏共只提供了 50 万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朝鲜、古巴等其它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总共提供了 30 万吨，另外三分之二是中国人的血汗钱。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 200 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 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 亿多米布匹；3 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 多万吨粮食；200 多万吨汽油；3000 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2] 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 30 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中国防空部队击落了千余架美机，但由于是秘密参战，每次有击落美机后均电贺越南人民抗美打胜仗。中共向北越派遣了工程兵和防空兵帮助北越抢修美军轰炸的设施。中国在与北越接壤的广西建立了越南战场的后勤基地，那里的野战医院日夜不停地救护中国和北越的伤兵。为了把武器装备运送给越南南方解放军，中共拨出巨款开辟到达越南南方的运输线，建设秘密港口，向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提供了巨额美元活动经费。[1] 到 1978 年，中共对越南的无偿援助不是 1963 年邓小平向越共传话承诺的 200 亿元人民币，而是 200 多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共的全部军费开支，远远高于同期中国的教育经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场倾尽国力在国外打的越战是毛泽东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策划的。

“三线建设”

挑起越战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国内制造了另一大灾难——“三线建设”。在越战爆发的同月，他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先制造紧张形势说，在北面中苏关系紧张，在西南面，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工业中心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然后提出将经济政策中心转向“三线建设”和备战。“三线”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战争臆想创造出来的说法。它称沿海、边疆为一线，即前线，称陕、甘、宁、青，西南的云、贵、川为“大三线”，即大后方，称一、三线之间各省为二线，称二线中靠近三线的地区为“小三线”。在崇拜毛泽东热潮中，中共高层中无人敢对毛泽东的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了“三线建设”决策，否定了刘少奇主持所定以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作为首要目标的“西楼会议”决策，也否定了国家计委根据“西楼会议”政策提出的 1966~1970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决定将军工建设项目和人力、物力、财力从一线，转向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三线。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刘少奇抛弃自己制定的民生政策后，根据“西楼会议”决定制定五年计划的计委负责人李富春也只好向毛泽东写检讨，然后推出以“以重新掀起军工建设热潮”为主要内容的“计划工作革命化十条意见”。毛泽东记恨李在反右运动中阅他的“收网令”文章后不注“已阅”表达保留意见，不接受李的检讨，指责称：“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李、邓之被斥其实冤枉。“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意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收拾局面。为救灾，刘少奇召开了“西楼会议”，当然提出民生优先的政策。分别主持计委和书记处的李、邓当然要执行刘少奇停止大跃进的各项经济政策，结果，李、邓、刘三人都得罪了毛泽东。毛泽东指责李、邓“两个独立王国”，实际是在发泄对刘少奇停止大跃进，下马军工项目的不满。他觉得李富春没有真心拥护他的越战和三线建设政策，以余秋里取代李富春掌国家计委，命余重新制定“三五”计划。1965年6月，周恩来携余秋里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重新制定的“三五”计划提纲。新计划将42%的国家财力用于“三线”军工建设，这才获毛认可。

根据“三线建设”决策，中共在随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花费2000多亿元巨资，在中西部建了1100个所谓国防项目，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相鼓动，调集数百万建设大军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大漠，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一大批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有改变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的作用，但与它带来的灾难相比，其正面作用微不足道。“三线建设”的灾难性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三线建设”将三个“五年计划”的巨额投资的绝大部分服务毛泽东战争臆想，造成巨额浪费规模与“大跃进”、越战相当，耗尽了中国的民脂民膏，是全国百姓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其次，“三线建设”以备战考虑为准则，违反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和产业布局，项目选址以“靠山，分散，隐蔽，钻洞”为原则，众多工厂被规划得尽量分散，违背工艺流程，多数项目建成后因生产成本高昂，没有社会依托，缺乏产供销环境和外部协作条件，缺水缺电，或交通不便等原因成为废物，

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三，三线建设项目普遍不作可行性研究，仓促上马，忽视地质勘探等前期工作，选址不当，设计随意简化，工程质量低劣，很多项目完工时即不合格的废物；第四，“三线建设”是西部自然环境的一场浩劫。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许多军工厂都建造在山体的坑道中，掏空山体，造成无数滑坡、岩崩。对于中国森林与生态环境而言，“三线建设”是大炼钢铁之后的又一次环境浩劫；第五，“三线建设”一声令下，无数建设者打起包袱就出发，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先生产、后生活”原则，建设中普遍忽视后勤和社会服务，建设大军长期生活艰苦。国家对“三线建设大军”及其家属后代生活方面的欠账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遗祸；第六，中共以“三线建设”为由，以行政命令方式无偿占据了巨大面积的山林，基本没有给原村民林木补偿，更谈不上土地补偿。对当地农民而言，“三线建设”是人民公社化后的另一场灾难。

西南核基地是“三线建设”的一个代表作。因毛泽东认为由苏联帮助兴建的青海核基地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西南的深山中另建了第三个核基地。这个“三线”核基建成后因过于偏僻，离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太远等原因成了废物。仅此一项浪费国人血汗钱已难以计数。湖南临湘的 6501 工程是“三线建设”的另一代表作。这一称为“天下第一人工洞”、“中国地下长城”的备战工程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密令和中央军委 1965 年第一号文件开工建设，将整座花岗岩山体挖空，用钢筋水泥做成了上下三层，建有 17 公里长的人工山洞，25 座大厅，17 座 80 米高的竖井，18 个圆形的水泥坪和大油罐。修建 6501 的工程兵是乘坐闷罐车到附近一家矿区小站集结，夜间乘车进入现场。工程兵们在这里施工八年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在修建什么。中共作到了建造巨大工程不为当地人所知，甚至不为建设者知。“九一三事件”后，这一巨大工程被废弃。至今，全国建造了多少类似的废物工程，耗费了多少资金等等仍是中共的机密。

备战建设的灾难不光发生在“三线”，也发生在二线。毛时代开建大工程的出发点都不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而首先是服务毛的战争计划，南京长江大桥是代表性的一例。工程的初衷是为了向越南输送物资。在反右，反右倾运动中，没有人敢冒风险提出东西航运的问题。于是，大桥设计中只考虑南北铁路、公路交通，不顾长江航运，通航净空高仅留 24 米，使到武汉的黄金水道对万吨轮基本作废。

越战与“三线建设”最能说明中共国防之词的欺骗性质。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形势是，美、苏均要求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缓和，限制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毛泽东。朝鲜战争刚结束，他接连制造了越南内战和两次台海危机，企图挑起世界核大战。大饥荒中，他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大饥荒刚过，他又挑起了越战。若无他不断挑起战争，中国的四面边境太平无事。毛泽东很清楚，蒋介石反攻大陆口号只是宣传，《台湾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禁止国民党对大陆动武。他在备战会议上制造四面边境紧张局势是为了废除刘少奇的民生政策。他担心刘少奇主持恢复经济声望进一步上升危及他的独裁地位。中共以国防名义与越共签约，由北向南运送所谓国防物资，开工建设所谓三线国防项目，建设三个核基地等等其实都与国防无关，只是在满足毛泽东的战争爱好。越战灾难、“三线建设”灾难与大饥荒灾难一样，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中共高层全体联手造成的。饥荒未结束，中共高层轮番会见越共高层，争相通过积极推动越战讨毛欢心，心态与各地大员争相为毛建行宫一样。刘少奇恢复经济举措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暂停超出经济负担能力的军工建设项目。而毛泽东的“备战和三线建设”政策实际上是恢复“冒进”和“大跃进”政策，重新将众多军工发展项目一齐上马。毛泽东没有将饿死几千万人当回事。他以备战需要为借口，否决了李富春制定的，优先满足民生需要的“三五”计划。中共高层同样没有将饿死几千万人当回事。周恩来、余秋里重新制定的五年计划将近半国家财力用于备战。他们深知这样的计划让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困苦不堪，但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五年计划才能让毛泽东满意。毛心目中只有他的世界领袖梦和战争狂想，饿死数

千万人都不在意，当然更不理睬民生。中共高层心中只有头上乌纱，只想着如何讨毛欢心。从韩战到越战，无数灾难都是众革命家联手制造的。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大量破产，政府不得不出台关、停、并、转、迁、换等六种解决办法应对“三线建设”遗留的灾难。至今，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难题远未解决，毛泽东的“三线建设”仍在遗害中国。

提起“三线建设”，人们都会想到彭德怀。决策“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到西南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并率众常委为彭饯行。毛对彭说：“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一边。”刘少奇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邓小平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3] 临行，毛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4] 温馨场面背后是革命领袖精神世界的龌龊。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抱怨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送《海瑞传》给彭德怀，让彭提出批评。受毛鼓舞，彭德怀在庐山致毛泽东私人信件，指出“大跃进”带来灾难。这时毛泽东不见彭德怀，不与他讨论看法，将私人信件印发会议，要求众高层表态整肃彭。众高层知道遍地饥荒，知道彭上书是救民于水火之举，但为了自保，大家联手整肃了彭，共同将饿死百万人的饥荒扩大成了饿死几千万人饥荒之最。灾难过后，毛泽东拒绝为彭平反，只说是“看法上有分歧”，众高层不为自己落井下石道歉，也不敢为彭说句公道话，而是促彭“想通”、“振作”、“丢掉包袱”。这一场景让人们看到，革命家之间无是非善恶可谈。鼓励彭德怀“想通”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这时毛泽东正在布署整肃他们。

毛泽东要求将起用彭德怀对全党、国人保密，以免让人想起彭为国为民上书之举。彭德怀以为他的党还是信任他的，打算为党再干一番。然而一年后，他被红卫兵抓回北京批斗殴打至遍体鳞伤，然后再被长期关押，不准写

字，不准听广播，不时被拉出去接受批斗，遭受毒打。他想起毛泽东一年前在颐年堂为他送行时当着众常委说的“有什么事情，可以打个电话，写个纸条”，于是在 1967 年元旦写字条向毛泽东求救道：“12 月 22 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 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 27 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5] 他天真地以为毛泽东对他的处境不知情。他错了。文革中高层受保护或受折磨都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高层受迫害的细节都定期报到毛泽东手上。

第 50 章 初期文革

《二月提纲》与杭州会议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开始盘算整肃刘少奇，发动了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的整肃运动，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主动出面主持了社教四清运动，通过救灾和整肃大跃进中作恶干部赢得了崇高声望。一时，全国到处两主席像并列悬挂。毛泽东对此忍无可忍，对未能达到整肃刘少奇目的的社教四清运动不再感兴趣，开始谋划发动新的运动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

1964 年夏，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全国巡回演讲介绍“桃园经验”，在报告中宣传了王光美。江青得知后力促毛泽东消除两领袖并列局面。毛泽东感到江青可以在整肃刘少奇的计划中起重大作用，决定解除中共中央在延安决议对江的禁锢。江青立即向毛提议批判正在各地上演的京剧《海瑞罢官》。该剧其实是毛泽东号召的产物。1958 年底，毛泽东在长沙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几个月后，他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学习海瑞。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闻言动笔，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和京剧历史剧本《海瑞罢官》。剧本由名伶马连良主演推出后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江青观看后向毛泽东提出，剧中罢官影射了罢彭德怀。毛泽东指使江青、柯庆施由批判《海瑞罢官》剧入手，在上海发动“文化革命运动”。得毛指示，柯庆施立即命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和《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负责撰写批判文章。

1965 年初，姚文元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随后的半年中，这篇政治批判文章十度密呈毛泽东审阅，九易其稿。当时没有

知道毛泽东如此较真地改这篇批判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7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五人小组）。彭真等人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要搞什么。11月1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称《海瑞罢官》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影射了“包产到户”和彭德怀被罢官，将剧本批判为“大毒草”。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知道吴晗与彭德怀并无关系，不同意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扯在一起，决定北京各报刊不转载这篇政治批判文章。见北京各报和《解放军报》不转载，毛泽东电召周恩来到上海，表示他赞赏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命周出面要求全国各大报转载姚文，同时指示江青、陈伯达秘密起草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指导文件，派江青到苏州去“请尊神”，[1] 请林彪再次出面为发动整肃运动保驾。

对毛泽东的保驾要求，林彪提出以整肃罗瑞卿为条件。罗原是林彪红一军团的部将，因长征路上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为毛泽东安排保卫，到延安后获毛提拔为红军大学校长。从此，罗以毛泽东亲信自居，开始不买林的账。建国后，罗主管公安和安全系统，为毛泽东安排起居行止、各地行宫及秘密通道等事宜，获毛称赞说：“有罗长子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罢彭德怀官后，毛泽东任林彪掌军保驾，同时提拔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以牵制林彪。罗上任后反对林彪在军队中搞“政治思想第一”的一套，要求解放军“大练兵”，“大比武”，准备与美国开战，并且要求林彪安心养病，放手让他领导军队。1965年9月，林彪发表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二十周年的文章。罗瑞卿也表达了纪念文章，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让林彪感到军权被夺。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备战臆想。当初他反对出兵朝鲜，现在他对出兵越南也不以为然。他清楚越战是毛泽东所挑起，清楚美国空军不轰炸中越边境地区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开战，清楚毛泽东鼓吹备战是为了权力斗争。另外，他对毛泽东派“监军”牵制不满，对罗瑞卿摆出平起平坐架式更加不满，认为罗瑞卿搞“大比武”是要借口向他夺取军

权。最让林彪不能容忍的是，罗瑞卿竟直言“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不要碍手碍脚”。[3] 在毛泽东有求之时，林彪向毛泽东递交了“罗瑞卿罪状”，要求将罗撤职查办。毛泽东虽然信任罗瑞卿，但认为罗无法代替林彪掌军，决定舍弃爱将罗瑞卿换取林彪支持他清算刘少奇。

11月3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人民日报》强行发表了姚文，彭真意识到文章大有来头，这才明白毛泽东为何要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2月，彭真召开了“文革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文章提出的政治斗争问题。会议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应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借学术问题开展政治斗争，拟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这一提纲先迎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称：“学术领域里要开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然后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婉转拒绝了姚文的政治批判。会后，彭真携二月提纲及证明吴晗与彭德怀并无关系的调查材料向刘少奇汇报，获刘认可小组意见后再携提纲及调查材料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彭汇报后对《二月提纲》不置可否。彭建议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彭以为毛接受了提纲，将《二月提纲》印发全党，然后赴外地视察。彭走后，毛泽东对身边人评论《二月提纲》说：“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3]

在彭真召集“文革小组”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是她在被中共中央“不得干政”决议关了二十多年政治禁闭后首次公开登上政治舞台。会议的主题其实不是文艺，而是发动政治运动。会后，江青推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其中否定《二月提纲》，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称中国文化界存在“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十六年（1949至1965年）尖锐阶级斗争”，文化界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在文化界展开大规模阶级斗争。江青召集会议的背后是毛泽东的指使。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三月杭州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阶级斗争号召，要求同时在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领域开展阶级斗争，指责中宣部在学术批判中压制了左派，宣布组成以叶剑英为首的“罗瑞卿专案组”（七人小组）负责调查林彪提出的指控。罗瑞卿听到被调查的消息后接受不了突然打击，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得知，对爱将毫无同情，骂罗“没出息”。[4]

会后，刘少奇按计划出国访问，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整肃计划。“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出手制止毛泽东将饥荒进一步扩大，迫使毛泽东同意“退居二线”，彭真点名要求毛泽东对饥荒承担一份责任。毛泽东对二人怀恨，在会后立即开始盘算整肃二人。他知道刘少奇与彭真互相支持的影响力强大，必须分而治之，先整肃彭真，使刘失去最重要的支持。对于位高权重的彭真，毛泽东不能像邓子恢、王稼祥那样随意撤职，况且又没有摆得上台面的理由，于是采取了一连串行动：将江青整理出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后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以废除彭真和刘少奇共同推出的《二月提纲》，将文化界的斗争运动升级；先向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亲信透露整肃彭真、陆定一意向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一批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文章；派康生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整肃彭真和发动文革的意向。[5]

得到康生传话，周恩来明白这是毛泽东要求就整肃彭真表态。自从在延安整风中被敲打，他确立了顺从毛泽东意志的生存之道。八大前后，他为应付经济危机采取“反冒昧”举措，结果被毛逼迫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

二次会上反复作检讨。为赢回毛的信任，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林彪联手助毛渡过难关，在会后积极推动崇拜毛泽东的运动。此时，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他毫不犹豫，立即写报告表态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应推翻重写，并按毛主席的方针另起草一个中央通知。”[6]

周恩来表态后，毛泽东电召正在西北视察的邓小平返京，派康生同样传话。与周恩来一样，邓小平立即表态效忠，并开始操办整肃彭真，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要求众高层人人就整彭表态。众高层同样立即表态支持整肃彭真，并立即展开了对彭真的批判。彭真这时才明白，他先前拒绝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对抗了毛泽东。他不作辩解，不理论是非曲直，遵循党内斗争的规则只管检讨，承认犯了错误，并反戈一击，以批判吴晗和邓拓来争取毛泽东宽恕。

书记处成员们无论怎样表态也无权将常务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撤职。4月中，毛泽东将刚刚开过会离开杭州的众高层再召回杭州开会（四月杭州会议）。众高层都奇怪为什么三月刚刚开完会又回来开会，但是没有人敢问一句。谁都知道，何时何地开什么会完全毛泽东个人临时决定，对此询问也属于冒犯，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会上，毛泽东指责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陆定一封杀批《海瑞罢官》文章是压制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指责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宣布整肃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宣布将罗瑞卿撤职查办，由亲信杨成武接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由康生接手罗负责的公安部系统。常委中，周恩来、邓小平已经表态，其他扩大进来的高层都是毛泽东的亲信，会议实为大家举手同意毛泽东决定的一个过场。其实岂止这次会议，中共的所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等等都是听从毛泽东训话的走过场。毛泽东决定好了开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决议等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全会从来也没有按实际有资格成员人数召开过，毛泽东总是随意扩大，将没有资格的亲信扩大进来，与会者不敢表达真实想法，形同木偶。例如，刘少奇在京主持常委会听取彭真汇报，结果完全不算数，会议决定须派专人专机赴毛的行宫请求批准，毛泽东不置可否等于会议无效。

杭州会议上被整肃的四人，除罗瑞卿是林彪要整肃外，其余三人都是毛泽东早就要整的人。彭真在东北内战之初支持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政策，主张避免内战，与毛唱了反调，八大后参与了提出“主席只可连任一届”议案，“七千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因此早就被毛列为了整肃对象；陆定一获罪是因为明确表示“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阻碍了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杨尚昆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主持中央办公厅时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录音，因此获罪。其实专列录音不是杨首创，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从 1958 年开始为毛录音以记录谈话指示，毛泽东最初认可了录音作法，杨萧规曹随，结果被毛怀疑不怀好意，[7] 成了整肃对象。

4 月 21 日，刘少奇出访归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发现毛泽东趁他不在发动了党内政变，清洗自己的重要支持者彭真，将“三月杭州会议”上刚刚通过的《二月提纲》批判为了“毒草”，代之以杀气腾腾的中共中央文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按说，刘少奇应当有理由谴责阴谋作法。但是，刘也是一路在阴谋作法中获得毛泽东提拔的。他明白，毛泽东早已精心布局，常委会中周恩来、邓小平已经表态支持对彭等的整肃，并且彭真已经作了检讨，自己在常委中已是孤家寡人。与彭真一样，刘少奇也清楚权力斗争中无道理可讲，于是不再理论，遵循党内权力斗争规则，举手拥护毛泽东的决定，并反戈一击，斥爱将彭真一贯反对毛泽东、一贯反对自己。这样的反戈一击在中共党内是生存的正道，即中共所谓的大是大非前站稳立场。高层们无一不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刘少奇也表态支持整肃彭真后，毛泽东将彭

真召来杭州开会，实际是召彭来听宣布撤职决定的。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面谈申辩。与当年的高岗一样，他的单独面谈要求遭到毛泽东拒绝。刘少奇、彭真被分而治之驯服后，会议宣布毛泽东的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另起炉灶，成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主要成员的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废除《二月提纲》，由新的中央文革负责起草中共指导文化革命的文件。众高层不知道，新的文革小组早已背着众高层秘密成立，并在旧文革小组起草《二月提纲》的同时制定出了一批发动文革的文件。会后，中共中央派李雪峰、宋任穷陪送，实是押送，彭真回京。[8] 几天后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彭真等四人不再出现。

《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煽动造反

经过“四月杭州会议”的准备，毛泽东决定在北京召开发动文革的政治局扩大会。他再次不按规矩行事，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发动文革的会议，安排康生随时传递会议情况，自己不出席会议，避在外地幕后遥控。毛泽东这样安排不用给出理由，也没有人敢问。召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运用的权力斗争法宝。他利用对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的时间、地点、规模、参加者的决定权，将亲信“扩大”进会议，赋予他们表决权，操纵会议通过自己的决定。不过，这次会议扩大到喧宾夺主，将十几人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会扩大到七十六人之多，其中包括毛泽东指定的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历史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就坐主席台。会议召开当天，《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使会议笼罩肃杀气氛。此时，没有了彭真支持的刘少奇由出访前声望崇高的并列主席沦为了听从毛泽东发落的傀儡。毛泽东为会议预定了议题，其一是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宣布为“反党集团”，其二是将反对在文艺领域开展阶级斗争的《二月提纲》定性为“反革命文件”，其三是通过陈伯达撰写，毛泽东八次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刘少奇宣布要发布发动文

革的通知时，多数与会者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其实并无决定权，只是宣布几天座谈会，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康生传达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经过几天座谈，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们得知通知是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定稿的，知道不容异议。郭沫若等人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陈伯达、康生宣布《通知》稿不能改。众高层全体举手拥护。

5月16日，中共向全党发布了发动文化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时，刘少奇应当知道毛泽东的“中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法和《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说法是指自己，但他没有勇气抗争，心存侥幸地期望像延安整风时一样，通过积极参加整肃运动赢得毛泽东的信任。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五一八讲话），吹捧毛泽东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

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番语无伦次，杀气腾腾的讲话面前，高层们无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与会者们不知道，林彪白天为毛泽东保驾，晚间在《工作札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按此言，林彪很清楚毛泽东的阴谋手段，但他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继续充当毛泽东的工具。

周恩来不甘落后，于 5 月 21 日也发表吹捧毛泽东的讲话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的心思都用在了揣摩圣意。他感到，戚本禹批判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会上大谈“保持晚节”，以攻击死去的战友来向毛泽东表示效忠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5 月 23 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要求高层成员对整肃“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表态。元老朱德对整肃四人提出了保留意见。于是，会议转为了对朱德的批判会。朱德被迫检讨，众高层争相插话批斗。当朱讲到在红军第四军“七大”上犯有错误（指曾反对毛泽东）时，当年上井冈山的搭档陈毅插话质问：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

你野心非常大。林彪插话斗朱说：你说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也不是你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乌兰夫批朱说：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薄一波批朱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周恩来批朱：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9]

批朱后，邓小平宣布了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毛泽东虽然一言九鼎，但提名自己的秘书和老婆掌控文革运动需要人帮忙。周恩来能心领神会，出面提议人选，[10] 毛泽东再批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为：陈伯达（组长），江青（第一副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刘志坚（副组长）、张春桥（副组长）、康生（顾问）、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了将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

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议，宣布了毛泽东任命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任中宣部长；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接掌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掌首都 8341 卫戍部队的决定。

发动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好地展现了革命党内的权力斗争规则和革命家们的生存法则。如果说高层成员们对毛泽东的整肃目标一无所知，那是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清楚知道林彪的“政变经”讲话的矛头所指，清楚毛泽东的整肃目标是刘少奇。[11] 大家明白，毛泽东要通过批朱德让所有高层表态，人人过关。这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老战友、老部下们在批斗朱德的会上抢着插话，抢着恶语批朱，因为他们知道，会议记录将被送到毛泽东手上，不讲情面地批斗朱德才能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到整肃高饶，到整肃彭德怀，到整肃彭、罗、陆、杨，大家都是遵循这种斗争规则生存下来的。特别是延安整风下，高层们确立了紧跟毛泽东的生存之道。于是，毛泽东想整谁，大家立即与他划清界线，对他展开不留情面的斗争。彭真比谁都清楚借文艺批判搞阶级斗争之害，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不作任何争辩，只管检讨，在杭州会议上不提武汉汇报时毛泽东曾默许《二月提纲》，对整肃不作抗争，以批判吴晗、邓拓来求毛泽东宽恕。刘少奇也是如此。他不对出国期间的政变作任何抗争，不仅接受政变现实，还反戈一击批判支持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不会完全不知毛泽东清算彭、罗、陆、杨、批朱德外还有目标。不过，他们相信从延安整风以来每逢运动紧跟毛泽东最安全的经验，心存侥幸，以邻为壑。众高层都清楚，毛泽东指使文人抛出批判文章，自己隐藏幕后，陷害了彭真，利用刘少奇出国之机发动了党内政变，整个过程完全是阴谋诡计。但是，没有人敢于讲是非曲直、规则程序。在发动文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作了争辩，不是争辩道理，而是争辩说是自己最先在延安喊“毛主席万岁”的，冀以此获得毛泽东宽恕；刘少奇不是出手制止毛泽东的整肃运动，而是出面主持发动文革的会议，主持批斗朱德，批判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共党内的赫鲁

晓夫”。在众高层争相颂扬的热潮中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毛泽东得以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想整谁整谁，众高层都会跟随，越整肃越恐怖，越恐怖，越效忠毛泽东，颂扬毛泽东进一步升级，不管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多么祸国殃民，众高层只管举手拥护，毛再发动更多的整肃运动。整场政治局会议不啻于一场厚黑竞赛。

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共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基层组织发出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运动正式开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如此要求整肃基层领导，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纲领显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统治和文革运动的反社会、反文明性质，显示毛泽东要求天下大乱，要求摧残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祸害全体人民。

按《五一六通知》字面意思，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只是负责指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共高层成员们对毛泽东这一安排并不陌生。1942年，毛泽东通过设立领导整风的临时机构——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达到政变目的；1957年，毛泽东通过成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再次架空了八大后的政治局，迫使刘少奇、周恩来放弃了刚刚通过的八大路线。此时，毛泽东又一次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将政治局架空，完成了另一次党内政变。中央文革名义上陈伯达负责，实际是毛泽东通过夫人江青指挥文革运动的最高权力中心。后来的情况是，毛泽东在清洗刘少奇的目标达到后才决定召开中共九大，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中央文革亲信全部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因此，江青称中央文革是“过渡班子”一点不假。

高层们相信拥护毛泽东最安全，习惯了追随毛泽东的生存之道。然而，他们二十年来的生存法则这一次不灵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的整肃规模，结果大家由整人者变成了被整者。应当说，毛泽东和众高层都遵循了暴力革命党的规则。如果讲道理、守规则，尊重决议和程序，限制权力，那就不必暴力革命，直接民主、宪政最合规矩。而暴力革命根本反民主，反规则，不讲道理，枪杆子说了算。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发动反右倾运动和文革时三次请林彪代表枪杆子支持，高层全体追随，这就是革命党的规则。文革后，受到冲击的高层们一致声讨文革，痛陈十年文革迫害了多少人，造成巨大损失等等，将文革罪责推给了“四人帮”，仿佛自己完全是受害者。而事实是，决定发动文革的历史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全票通过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被《通知》定为“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彭真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都举手参与了发动文革。这样的举手以前有过多次。在发动反右运动的会议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上，在扩大饥荒的庐山会议上，大家都与毛泽东没有分歧，所有制造灾难的决议都是全体通过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专案组这种专门的迫害机关是苏俄引入中国的祸害。苏俄建立红色政权后建立了专门负责肃反的“契卡”。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后，苏共将肃反机关引入了中国，在各个苏区设立了保卫局，负责监视，迫害革命党中被怀疑者。在延安，毛泽东在发动整风运动时设立了康生负责的社会部，执行“契卡”一样职能。革命党的性质决定，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离不开类似“契卡”、“盖世太保”、“社会部”一样的对付同志的机关。从苏区肃反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肃反机关迫害异己。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习仲勋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宣布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专案组，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的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这时的刘少奇已无决定权，只是在宣布毛泽东的决定。他没想到，最大的专案组是随后成立的他自己的专案组。贺龙（彭德怀

专案组负责人）、邓小平、陈伯达、陶铸等很多其他高层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如后来也被设立了专案组，惨遭迫害。

在后来的文革中，由于案子不断增加，中共中央专案组规模不断扩张，分设“一办”、“二办”。以汪东兴为主任的“一办”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掌管有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六十一人”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等；以杨成武为主任（杨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的“二办”负责对军队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12] 中央设立专案组后，各地跟随设立专案组，全国各地的专案组后来多如牛毛。专案组的办案过程与延安审干、肃反、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中办案一样，均是随意编造罪名捕人，再交专案组搜集证据，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帽子，办案手法均是车轮战审讯，严刑逼供，指供诱供、逼取假证，拟好供词、证词，强迫被审查者或证人抄写、签字，或强迫按手印，把私人日记、文稿断章取义拼凑出罪证等等，其迫害比“契卡”和“盖世太保”更加残酷，受迫害者难以计数。“契卡”、“盖世太保”和“专案组”分别代表了列宁时代、希特勒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残酷迫害。中央专案组一直存在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与“契卡”、保卫局，社会部一样，中共对权力无限，规模庞大的中央专案组从来不作官方信息披露。将迫害和迫害机关严格保密，这是苏共、中共、苏区及所有共产国家的通例，是革命党的必然。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成为文革最早的牺牲品。邓拓最早鼓吹“毛泽东思想”，在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建国前夕，中共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了《人民日报》总编。作为总编，他成了高层意见分歧的出气筒，在 1957 年因刊登了宣传八大路线，反对冒进的文章被毛泽东点名斥为“书生办报，死

人办报”，被迫辞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支持邓务实，宽容的办报风格，调邓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并负责《北京日报》与《前线》杂志。大饥荒过后，邓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了大量提倡民主、务实、活跃思想的文章。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三家村”被指为反党集团。邓拓接受不了被党指为叛徒，被自己曾掌管的党报宣布为反党分子，接受不了没有争辩权利的处境和家庭中的阶级斗争，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服毒自杀。

紧接着，田家英也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死于中南海。田在抗战中投奔延安，因文史功底出众而被毛泽东选中为秘书。庐山会议前期，田曾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七千人大会”后，田在调查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包产到户”受到农民拥护，有利生产恢复调查的结果，建议放松对农民管制，然后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田的建议遭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从此失去毛的信任。1965年，田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表示了反对意见，对毛泽东夫妇借一部艺术作品展开政治斗争的作法不以为然，结果获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专案组审查后，田家英死于禁区中南海内，死因外界不得而知。邓拓、田家英之死显示，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党内，在毛泽东时代难以生存。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造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其中谩骂中共北大党委说：“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螳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张矛

头指向中共基层权力机关的大字报是毛泽东通过康生和进驻北大蹲点的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划出笼的，是毛泽东煽动起青年学生去打烂各级领导机构的策划。毛泽东立即对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他指示康生：“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13]

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关锋的《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鼓动青年起来造反。在报纸电台的强烈煽动下，全国大中学校学生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将学校领导，校长，教授拉出来批斗，全国的机关学校陷入了混乱与恐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成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语文和历史课本中充斥鼓动斗争与仇恨的党化内容。长期的阶级斗争教唆使学生们形成了强烈的迫害欲望。在《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毛泽东称赞“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煽动下，学生们的迫害欲望爆发，按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指引，模仿当年的农会去斗争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其迫害手段之残酷超过了苏俄教唆出来的农会骨干和法西斯纳粹。例如，北京大学在6月18日发生了残酷迫害老师的“618事件”，学生们在校园里搭起了“斗鬼台”，把六十多位教师、干部和他们认为的“反动学生”押到台上殴打批斗，给被斗者“戴高帽子”，逼迫下跪，撕破衣服，把厕所污物、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汁，揪扯头发、拳脚棍棒相加，对女教师和女干部实施侮辱和性侵犯。

刘、邓主持初期文革

学生们开始造反后，在北京主持局面的刘少奇多次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毛泽东拒绝回京，对请示也不予答复，刘只好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请示应对。毛泽东仍不作答复，让刘、邓相机处理。回京后，刘少奇召开了中央会议，称“这次运动可能和 1957 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决定沿用土改和“四清”运动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办法。然而，刘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作法无法结束学校的乱局，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号召学生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工作组根据中共中央文件也是煽动学生斗争教师与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抓“小吴晗、小邓拓”、“右派学生”，而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全都是随意罪名，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鼓动二次反右都是一样的随意迫害，学校焉能不乱。

北京大学发生“618 事件”后，北大工作组以未经允许为由制止残酷批斗，学生们则援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造反，展开了驱逐工作组行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各大学支持学生继续造反，学生的驱逐工作组行动迅速从北大蔓延到了北京各高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宣布“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支持学生驱逐工作组的行动。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大学生将 618 的残酷批斗升级，对更多的教师、干部和他们认定的“反动学生”展开批斗，实施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皮带抽打等迫害，将 500 多位教授、讲师以“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批斗关押。一时，北大燕园成了每天有人跳楼、上吊的恐怖世界。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北大、清华的残酷批斗从迅速蔓延全国。主持局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能违背《五一六通知》去阻止学生造反，当然无法维持秩序。

在既要制止混乱局面蔓延，又要执行《五一六通知》支持学生造反的困境中，刘少奇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 1966——310 号文件，将《北京大学文

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文件中说：“中共中央不反对批斗行动，但反对乱斗”。这种荒唐的文件显示刘少奇的穷途末路。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斗”与“乱斗”的区别。作为文革的发动者之一，他也参与了鼓动学生造反，他无法说清学生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造反是不是“乱斗”。毛泽东躲在外地鼓动造反，让他在京主持局面，陷他于怎么作都错的困境，他抱着侥幸心理，希望通过积极主持运动赢回毛泽东的信任。按照过去整人运动的经验，他要求再来一次反右运动，抓出 1%“右派学生”，整肃了一批中央和方的领导人和大学校长，批发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将乌兰夫定为另一个省级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批准整肃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人。

按照四清运动的经验，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准备再搞出一套整人经验推广全国。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王光美按照“四清”运动的套路实施整肃，宣布全部干部、教师“靠边站”（停职）、“上楼”（接受审查），将校长蒋南翔、几位副校长和一大批干部、教师成“黑帮”编入劳改队，对他们组织批斗，将对中共和工作组有批评言论者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例如，响应号召造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遭受关押、批斗，被逼险些自杀。在实施迫害方面，工作组与造反学生同样残酷，使清华大学呈现“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使清华园变成了与北大燕园一样的每天有人跳楼、上吊的恐怖世界。

八届十一中全会与刘邓下台

1965 年 11 月离开北京后，毛泽东在杭州、武汉等地往来，在外地遥控发动文革运动。四月杭州会议后，他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文革，通过康生、江青煽动北京的造反升级，自己在南方行踪高度保密，除周恩来、江青等少数人外无人知晓。在全国高校学生造反的恐怖局面中，毛泽东秘密来到韶山，首次入住湖南大员给他建的滴水洞行宫。公安将

滴水洞周边严密封锁，确保韶山人不进入毛泽东的视野。[14] 这时，江青来信，表达对如何搞“文化大革命”如何进行的困惑。毛泽东有必要将发动文革的部署告诉第一帮手江青。可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见不得人，无法堂堂正正地表达，连夫人也不能如实相告，只能以黑话写出，让夫人去猜。他在黑话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封黑话信显示出毛思维混乱，存在精神异常。他有严重的睡眠障碍症状，按精神医生的说法这属于精神病范畴。几年后，中共中央将这封黑话信作为中央文件传达全国，以证明毛泽东早已预感林彪要政变。全国百姓听宣读黑话信时如堕雾中，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表达什么。尽管老百姓不知道信中的“他们”、左派、右派等等谁指，但大概读懂清楚毛泽东表达的是要不断地发动运动，不断制造斗争，永远斗下去，能够感到毛泽东不愿见到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共产革命家伯恩斯坦曾说：“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毛泽东黑话信表达了意思相近，即最终目的无所谓，他享受斗争。7月初，毛泽东感到收拾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打道回京。途中，他高调在武汉下长江游泳，以展示体魄和驾驭时局的能力。《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江上挥手的照片，配以“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口号，将全国的毛泽东崇拜推向更高潮。据说，海军派有潜水员提前潜到指定水域，在水下簇拥着毛泽东畅游了长江。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派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到清华大学看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造反学生领袖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随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在会上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高校是“镇压学生运动”，“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下令工作组撤出高校和机关。这时，刘少奇其实可以提出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最高决策机关，不应与中央文革会议搞在一起。但是，他在当年延安整风时就是通过被任命为“总学委”成员而进入了最高层。从这一点说，他又没有资格指责毛泽东多次成立运动领导机构架空中央政治局，没有资格质疑中央文革掌

最高权力。面对在毛泽东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刘少奇不提毛泽东滞留外地不归，三番五次请示不置可否及命“相机行事”，不辩论是非，遵循党内规则只管服从毛作检讨。应当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在毛泽东阴谋陷害面前不作理论是有道理的。因为，革命党内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右倾之类指责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运动、造反、《五一六通知》、工作组等等都是革命党随意迫害的手段，无法理可言，谁更得势，谁更有军权谁就是道理。服软的一方一旦检讨就是犯了严重错误，须不断重复检讨。刘、邓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联席会上议检讨后被迫不断检讨。刘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再就派出工作组检讨，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不清楚；邓小平再作检讨称“老革命碰到新问题”。随着工作组撤出高校，五十多天的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时期结束。

8月1日，毛泽东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中，毛泽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五十多天的初期文革称为“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这里，毛泽东隐瞒了他煽动造反后让刘少奇主持局面，多次拒绝刘请他回京主持的要求，对刘少奇的多次请示不置可否等情节，暗示中共中央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鼓动红卫兵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同时透露出他发动文革运动是对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饥荒施报复。会上，毛泽东宣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提拔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提拔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政治局常委，以不再提及的方式罢免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共副主席职。经过多次整肃运动震慑和崇毛热潮熏陶，中共高层们已经养成了一致举手拥护毛泽东的习惯，没有人敢于在毛泽东面前表达任何不同意见，毛泽东可以不提供理由的不出席任何会议，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召开任何会议，

也可以随意重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时中共的高层会议其实已经没有召开的必要了。这次全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众人举手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与“五一六通知”一样，毛的十六条也是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性质的文件。它号召青年学生“敢字当头”，放手实施暴行，以“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等随意罪名为尽量多的人定罪，鼓励污辱、殴打、杀害他人，煽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全会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着绿军装，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林彪继续推动崇毛，在接见时的讲话中为毛泽东献上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词。面对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山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毛泽东满意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名义上保留为政治局常委，实际已被赶下台刘少奇、邓小平尴尬跟随，在参加接见后邓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红卫兵批斗的对象。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履行了下台前的最后步骤，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392号），宣布撤销6月下达的《关于制止未经授权乱批乱斗》的310号文件，毛泽东开始出面领导文革，指示将他的“大字报”和《十六条》在全国广播张贴，向全国青年发出冲击各级权力机关的造反动员令。当年国庆节，毛泽东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接见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合并进行。红卫兵们按照中央文革的授意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

红卫兵运动与自杀潮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公布后，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致信毛泽东，在大字报附件中引述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之言，宣言

“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泽东复信学生，在信中四次重复“热烈支持”，强烈地煽动学生们实施暴行。同时，他命令公安部门“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8月5日，在高层子女集中的红色贵族学校北师大女附中，狂热的女学生写下了中国教育史最耻辱的一页，用皮带抽、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将她们的老师兼校长卞仲耘折磨致死。打死校长后，学生们不知所措，于当晚到北京饭店向高层请示怎么办。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学生造反。在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效仿清华大学附中学生，成立起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以造反的名义殴打，污辱，杀害教师，冲击文化科学部门，对学者们施以残酷的批斗迫害，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游街、羞辱和殴打各级官员，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学生“红卫兵”，并特别提意见了率先贴大字报造反的聂元梓。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北京出现了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随后，毛泽东继续推动红卫兵运动升温，指示公安部门支持红卫兵造反运动。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内部指令，禁止警察干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推动红卫兵犯罪活动升级。[15] 8月23日，毛泽东继续煽动红卫兵造反说：“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16] 在毛泽东强烈煽动和公安、军队纵容鼓励下，暴行狂潮席卷全国。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以打人、杀人为荣，为乐，类似“卞仲耘事件”的惨案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发生。8月下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抄家，殴打和屠杀。其手段之残忍，迫害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仅北京一地，红卫兵就杀人数千。

残酷的迫害导致了新一轮自杀潮。作家老舍的自杀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沉浮的有代表性一例。建国前夕，老舍在重庆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建国之初，他遵循中共的文艺宗旨创作出歌颂新政权的剧本《龙须沟》。在 1951 年的整人运动中，他为批判会上动手打人叫好写道：“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17] 他的表现让共产党非常满意，在当年获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家们被迫按照中共的要求修改自己的作品，叶圣陶删去了《倪焕之》中几章，曹禺改写《雷雨》、《日出》，老舍将《骆驼祥子》结尾描写祥子堕落的段落删去，连续发表了《美国人的苦闷》、《由三藩市到天津》等检讨文章以作思想改造表态。在中共诬陷美国的细菌战运动中，老舍迎合抗美援朝运动的要求，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作为紧跟中共作家的代表，他获得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一大堆头衔。在百万工商业主被中共以“三反五反”运动名义敲诈勒索，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的背景下，他不写正在发生的罪恶，创作出了话剧《茶馆》，以主人公王利发上吊，秦二爷破产的结局宣传旧中国将工商业者逼得走投无路，以主人公那句“都怨这个世道”的经典台词迎合了中共对文艺提出的“丑化旧社会，歌颂新中国和共产党”的要求。

反右运动中，老舍痛斥朋友丁玲和陈企霞“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18] 痛斥画家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批判挚友吴祖光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19] 他向共产党表态效忠说：“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20] 他这种表现令人不齿。有人给他匿名信说：“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成万的所谓右派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吗？”老舍将信交给了共产党领导。结果，匿名信被发表在了《人民日报》，[21] 写信者地下场可想而知。因为参与整人积极，老舍成为 1950 年代中共在文艺领域中的一面旗帜。大饥荒中，了解饥荒的情况的老舍知道不能这些苦难，开始创作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然而不久，毛泽东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出了“利用小说反党”罪名。老舍明白，他的《正红旗下》不合中共的需要，不能再写了。四清运动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在诗中吟唱：“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22] 这些成了他的颂辞绝唱。

8 月 23 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将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昆剧演员白芸生，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等三十多位文化名人围在院中批斗。根据毛泽东的指引，红卫兵称这些艺术家为牛鬼蛇神，给他们脖子上挂上黑牌子，当场将他们剃成“阴阳头（剃光半边使之外形恐怖），再墨汁淋头，逼跪在火堆旁灼烤，用铜头皮带将他们抽打头破血流。老舍浑身是血地回到家。他没有从家人那里得到关怀，而感到了“划清界线”的冷酷。他离家出走，来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呆坐了一夜。可以想象，他在那一夜里感到了服务中共十几年的幻灭，感叹他歌颂了十几年的共产党、新社会迫害人之残酷。但没有人知道，那一夜

里老舍是否曾为他建国之初为批判会，为打人叫好的发言忏悔，是否曾为他在反右运动中残酷打击别人忏悔。凌晨，他投湖自尽。

在红卫兵运动中自杀的名人还包括桂系代表人物黄绍竑，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翻译家傅雷夫妇，著名文艺评论家陈笑雨，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慧深，赫哲族作家白辛（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红岩》作者罗广斌。在北京大学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和上吊，教学楼由于死人太多，夜晚如同鬼域，充满恐怖，在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就有五位自杀。文革初期的几个月“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者数以十万计，自杀潮规模超过了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中等三次自杀潮。巴金回忆文革初期自杀潮写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在“红卫兵运动”中，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被红卫兵打死（一说投河自杀）。他的死让人想起他在建国前与胡适的一段分歧。那时，储和他创办的《观察》是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对国民党作战的一员大将。储一直邀胡适为其杂志撰稿而未如愿。胡肯定国民政府制宪，结束“训政”，召开“国大”，走向宪政的进步，认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问题是长期抗战摧毁经济后国人必须承担的痛苦，同时还是共产党在苏俄支持下挑起战争所致。胡适储的《观察》为代表的激进报刊抹煞国民党政府外争国权和内搞建设的成就，全盘肯定学潮，煽动推翻国民政府。建国后，储安平悟出了胡适不同意《观察》的道理，深感他在国民政府治下办杂志抨击政府自由的可贵。但他不会想到，自己不仅失去了办报自由，不仅获右派罪名，最后被学生打死，尸骨无存。

抄家与破四旧

响应中共中央的阶级斗争号召，各地红卫兵掀起了抄家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支持红卫兵造反，协助红卫兵抄家，向红卫兵提供抄家地址，甚至主动向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同时，“民主党派”们自己积极向红卫兵提供自己成员的名单、地址。在北京，红卫兵抄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的家，强迫宋庆龄剃发。国家主席、副主席如此，底层民众，被抄家的惨状可想而知。

红卫兵从北京宣武区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抄得的财宝最多，所抄文物古董、金银财宝、古籍、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装了数十辆卡车。这条胡同因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李鸿藻等众多达官贵人而得名，在八国联军和日军占领时都未遭劫掠，胡同中有显族六百年不衰。但在红卫兵抄家运动中，胡同中的显族全遭灭顶之灾。在北大、人大校园，红卫兵从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名家家中抄得大量珍贵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在文联机关，红卫兵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云生家中抄出了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梁漱溟回忆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上海，资本家们在三反五反运动被政府勒索逼得大批自杀，幸存者在随后的公私合营运动中被剥夺了产业，得当局承诺二十年领取定息和保留私有房产。然而在抄家运动中，幸存者们被停止支付定息，除极少数代表人物得到保护外以作橱窗外，绝大多数前工商业主被抄没家产和私宅，其中一部分人再被全家强迫迁往边远农村。很多挺过三反五反和工商改造运动没有自杀的资本家在红卫兵抄家运动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他们感到，共产党的摧残没有尽头，一波比一波残酷。

抄家运动是打着政治运动旗号的抢劫运动。被抄没的财物除少量被红卫兵和及背后的领导侵吞私分，绝大部分被上交指定部门保管，然后再被层层上交到中央保管部门，首先供中央文革成员及家属挑选、占有，然后再供各级文革的当权者挑选。其中，一些最珍贵的珍贵的古旧书籍，千年孤本，经紫外线照射消毒后摆进了毛泽东的书房。国人从报上看到毛泽东在摆满珍贵古籍的会客室中会见外宾，不知道毛泽东“满墙古籍，半榻旧书”（李锐语）的背后是藏书家血泪。世代相传的孤本古籍一朝尽失，其锥心刺骨之痛可想而知，为此自杀者大有人在。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文革后揭发，林彪、叶群、陈伯达、江青、康生均大量占有抄来的文物、古董。文物鉴赏家康生从抄家上交的文物中占有了最多的稀世珍品，珍品更是按图索骥，特别指派红卫兵去抄来的。康生与毛泽东一样喜爱古书，利用红卫兵对一些知名人士抄家，占有了大量珍贵图书、字画，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名人的私藏书画。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傅惜华是著名的藏书家，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指使红卫兵将傅害死，霸占了傅的藏书。文革过后，人们从康生搜刮文物内部展览知道，他将上千件国宝据为己有，其中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唐代陶龟砚，宋拓汉石经，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书籍，汉代陈宫、董永等的历代名人铜、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 400 多方。康生通过抄家掠夺的文物、图书，用他自己话说“有任何一件都可成为百万富翁”。当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可见他占有财宝数额之巨大。

1967 年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在北京展览馆共同举办了“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览会分四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其中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展充满珠宝珍玩、古

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等奇珍异宝。展品中有不少无价之宝已被中共高层霸占，在展后即被取回。[18] 其它城市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各地的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随处可见堆集如山的抄得的财宝、文物。几个月的抄家运动中，中共害死人十万计，以“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罪名迫害人百万计，操纵红卫兵抄家百万户计，抄得现金、存款和公债券价以百亿元计，黄金百万两计，白银、银元千万元两（块）计，外汇亿元计，古董以千万件计，抄得的文物、民间珍藏价值无法计算。

抄家运动中，红卫兵随意抄家、打人、监禁、杀人，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被抄家庭的私人珍藏、财物和隐私被肆意掠夺、摧毁，无数私人珍藏的手稿，通信，文件，照片，文物从此下落不明。对被抄家者而言，个人笔记，影集，手稿、书信、纪念品被掠的损害可能超过文物古董、金银财宝。劫掠、破坏之外，红卫兵们还将私人笔记，书信，手稿作为治罪依据，或将个人隐私笔记、照片公之于众取乐。人们因害怕红卫兵来抄家而狠心将珍藏的书籍、笔记本、手稿、相册付之一炬，把心爱的书藉、文物、古董拉到废品站当破烂卖。很多人一时舍不得烧或卖，试图将珍品藏来藏去，最后在无休止地运动中还是丢失或毁掉。后辈青年想象不到，当时人们确实找不到可以安全保存私人珍贵物品的地方。

在发动抄家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在连续接见红卫兵，继续煽动青年造反，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及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六·一社论），一再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煽动青年学生去“砸烂四旧”。在中共一再煽动下，一场“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破四旧”，随意将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为所谓革命名称，例如将北京长安街改为了“东方红大路”，将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将“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将越南驻华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将“协和医院”改为

“反帝医院”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等一系列煽动性社论，推动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升级，号召“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来个大扫除”；《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19] 在中共的一再煽动下，各地红卫兵大规模地毁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冲击寺院、庙宇、教堂，批斗和尚、修女、教士。仅北京一地，有数千处文物古迹被破坏。当年被列强各国的探险家们掠夺走的中国文物在各国博物馆中得妥善保管，但没有被掠夺的文物古迹却在“破四旧”运动中惨遭破坏，涂毁，打烂。11月，北京红卫兵领袖谭厚兰率领数百人来到曲阜孔林，动用雷管、炸药毁坟掘墓，砍伐苍松古柏，摧毁三孔书籍、石碑，对孔氏后人墓也肆意摧毁，将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及妻妾，孔祥珂及夫人开棺暴尸，对尚未腐败的尸体肆意蹂躏。暴行之后，红卫兵召开了十万人的“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致敬电”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1937年，日军在占领山东之前派出一支先遣部队进驻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在孟子庙前贴出告示：“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注意事项：一、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国人最尊崇的伟人，也是我们日本人精神文化领域的大恩人。二、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也要像参拜日本的神社、佛寺一样，遵守注意事项谨慎行动……”占领山东后，日军派出警备部队驻扎三孔保护文物古迹直到1945年投降。然而，受到日军保护的三孔文物古迹却在新中国被最高领导人指挥摧毁。仅谭厚兰率领的一支北京红卫兵的一次行动就毁坏文物数千件，烧毁珍版古书数千册，砸毁历代石碑千余座，全国红卫兵摧毁寺院、文物古迹的破坏规模可想而知。在中央文革指挥下，“破四旧”运动与抄家运动同时从北京蔓延全国，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

“破四旧”运动中的内容之一是刨坟掘墓。这波毁墓潮是周恩来发动的。他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指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叛徒，说瞿临死时写下《多余的话》是叛变，要把瞿秋白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搬出去。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是共产党人中少有的有忏悔之心者。“八七会议”后，书生瞿秋白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中共领袖。瞿奉共产国际之命发出了不少指挥烧杀抢掠的指示信。临刑前，他有所忏悔，在《多余的话》中坦言共产主义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在文革运动中，周恩来要借诋毁前战友，鼓动学生刨坟毁墓来向毛泽东表态效忠。根据他这番讲话指引，全国红卫兵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刨坟毁墓狂潮，无数历经千年沧桑和战火而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陵墓在“破四旧运动”和刨坟掘墓狂潮中被摧毁。其中包括：炎帝陵、舜帝陵、孔子墓及孔庙、孔林、孔令贻墓、霍去病陵、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包拯墓、岳飞墓、成吉思汗陵、明孝陵石碑及石人石马、海瑞墓、张居正墓、蒲松龄墓、袁崇焕墓、于谦墓及祠、康有为墓、张之洞墓、张佩纶墓、武训墓、蒋介石生母墓、张自忠祠、衣冠冢及纪念亭、郝梦龄墓、赵登禹墓、王铭章墓、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等。红卫兵不仅摧毁陵墓，更犯下了极尽侮辱的罪恶。他们从定陵掘出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曝尸，对张之洞夫妇掘墓暴尸，对义丐武训掘墓暴尸，对海瑞掘墓扬灰，对徐志摩毁墓扬灰，对康有为，红卫兵不仅掘墓暴尸，更车推头颅骨游街示众。

中共的破四旧运动是太平天国摧残文化、文物浩劫的再现。洪秀全造反前去孔子牌位，起兵后在所过州县大肆摧毁庙宇、文物，过湖南永州时毁柳子庙，过武汉毁归元寺、宝通寺，占南京摧毁明故宫、大报恩寺塔、朝天宫、夫子庙、鸡鸣寺、灵谷寺等等，重创了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杭州、金华、嘉兴等地的文物古迹。剿灭太平军匪徒后，清廷重建或修复了几省文物。人们想不到，太平天国破坏文物古迹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中共的破四旧运动在规模，地域、破坏性、残暴性，恶毒性方面都超越了发匪。中共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运动还是纳粹浩劫的再现。红卫兵打砸抄家是冲

锋队“水晶之夜”的再现，红卫兵烧旧书是纳粹烧书运动的再现，两者的“不破不立”、“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之类的说法相似；纳粹迫害犹太人、共产党人、自由知识分子，中共迫害“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纳粹和中共都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把恶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在中共建立新中国前夕，蒋介石曾指出：“中共将摧毁人民自由，将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傅斯年曾指出：“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土匪流寇并无区别，一旦执政必然剥夺人民的自由会，摧残文化”。他们的论断不幸言中。在大陆最黑暗的时期，蒋介石在双十节《告全国同胞书》中谴责红卫兵暴行和“破四旧”运动说：“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成立了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以及《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成立了推动发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等等。两岸，两党对待人民生命财产，对待中国文化、文物的巨大反差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证明。

抄家与破四旧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全民参与的犯罪活动，是国人人性中丑恶一面的大爆发，是中共以阶级斗争教唆青少年犯罪所写下的人类历史上最耻辱、最黑暗一页。这一全民参与的犯罪活动至今未被清算，甚至未被反省。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多年后，该校红卫兵组织领袖宋彬彬

以“荣誉校友”身分回校，虽对当年杀校长事件道歉，但称事件系他人所为。卞校长丈夫致信女附中抗议说：“死者长眠，而凶手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可以衣锦还乡、还校，用道歉之名来开脱自己的罪责。这样的道歉里只有无耻”。是的，文革罪行不是道歉的问题，而应当是追究罪行制造者的问题。不过，只要共产政权存在，不可能有对罪恶的追究，不可能有谢罪，不可能有赔偿，甚至不可能有道歉。在土改运动中，中共杀人夺地。1980年代，中共以“改革开放”否定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但却没有归还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剥夺农民的土地。抄家运动也一样。文革后，中共否定了文革，但抄家运动中抄走巨额财物、霸占的房产之绝大部分没有归还，成了党产。几十年后，参与发布《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革命家们和当年的红卫兵罪犯们几乎没有人为抄家和“破四旧”暴行忏悔。

大串联

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毛泽东要求北京与各地红卫兵“串联”，将北京的造反运动推向全国。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于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接待红卫兵到北京，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通知发出后，上千万各地学生涌向北京串联，进京火车李架上、座位下面、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学生，全国铁路系统严重超负荷，北京市区人口骤然翻番。经过文革前长期的崇毛宣传，学生们虔诚地要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红卫兵，鼓动他们造反。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文革组织大批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革命风，点革命火”。有了中央文革的授意，北京红卫兵们到外地后如同钦差一样随意宣布当地的党政当局为“黑帮”、“牛鬼蛇神”，组织各地红卫兵揪斗当地党政领导人，在各地复制抄家、“破四旧”运动，帮助毛泽东实现了颠覆全国秩序的目标。

周恩来日夜安排招待全国红卫兵来北京的免费吃、住、行，无奈北京的设施无法承受人口突然翻番的压力。于是，他想出让红卫兵步行串连的办法，

以缓解红卫兵串联对铁路运输的压力。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根据要求,学生们打着“红卫兵长征宣传队”的旗帜展开步行串联,通常先奔向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朝圣。步行串联中,红卫兵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惊闻几年前发生了人相食的大饥荒,随后见到了造反派的血腥武斗。步行中的见闻使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开始由狂热转向冷静。随着大串联引发的全国混乱及各地各派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7年3月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通知,要求停止串联活动。至此,持续半年的“大串联”走入历史,成了历史上的珍闻。

解散“民主党派”

造反运动中,不仅曾抨击国共两党的储安平被打死,长期效力中共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们也倍受欺凌。学生们从小接受共产党教育,认为共产党外不应再有其它党派存在。1966年8月25日,北京红卫兵向民盟发出了限期解散的通牒。长期为中共鞍前马后的“民主党派”们建国后成了中共反复整肃的对象。经过反右运动,它们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明白了不能批评中共的生存之道。但它们没想到恭顺还不行。文革开始后,盟员们惨遭迫害。面对迫害,民盟领袖们没有了当年主动走进国民党监狱的勇气。他们清楚,国民党政府受到舆论监督与党外党内反对派制约,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而共产党、红卫兵不受制约,随意杀人,自己只能知趣。当年敢于对国民党政府叫板的民盟中央带头,在接到通牒后立即贴出公告宣布解散。解散也不能安生。除民盟高层领导人被中共作为“统战”门面保护外,大批盟员惨遭迫害、被揪斗、批判,隔离审查,关押,刑讯,甚至被整死。其实,解散“民主党派”的主意不是来自红卫兵,而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准备取缔一切其它党派,只是由于斯大林否决才不得不保留几个“民主党派”作为橱窗、花瓶。建国后,“民主党派”已无独立党派活动,但毛泽东连象征

性的制约和监督都不能容忍。发动文革时，他决定取缔“民主党派”，将他自己加封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当作“牛鬼蛇神”收拾。

中共认定的“民主人士”中，宋庆龄是对共产革命贡献最大者。她的经历是苏俄强力影响中国走向的一个证明。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其中之一是将宋庆龄发展成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国民党“清共”后，斯大林将宋庆龄接到了苏联，随后安排到德国居住以淡化宋的苏俄工具色彩。1931年，斯大林派宋回国执行营救共产国际在华特务首领牛兰夫妇的重要任务，在宋回国前亲自接见，交待有关资助和通讯联络等问题。回上海后，宋庆龄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联系，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打着民权旗号营救苏俄特务，服务苏俄。1934年，她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救亡组织，执行莫斯科为瓦解日本攻苏威胁而发出的促中日全面开战的指令。1936年，宋与延安代表潘汉年合作，召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帮助中共铺垫了西安事变的条件。同时，她执行共产国际宣传中共与延安指示，安排《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美国左派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协助推出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西行漫记》等文章、书籍，成功宣传了延安，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安事变”期间，她利用共产国际中国组设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电台，担当斯大林与毛泽东联系的中间人的重要角色。[20] 抗战爆发后，她成功将牛兰夫妇送返苏联，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下达的任务。1938年6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在香港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接受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为延安购置物资，安排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服务八路军。整个抗战期间，她配合中共打击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歼灭国军保持沉默，对国民党反击中共的皖南事变通电声讨，为中共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在国共内战中，她出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国民党内各反蒋拥共派的领袖。

1949年，宋庆龄北上进京参加新政协，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任宋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3月，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申请加入中共。毛泽东回复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周恩来则赞她为“一个人抵得上两百万共产党员”。[21] 朝鲜战争期间，她担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仍然担任了重要角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充当了反美和诬陷美国发动细菌战运动的带头人，作用确实抵上了“两百万共产党员”。

斯大林逝世后，宋庆龄的地位一落千丈。1955年，她致信毛泽东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不再复信，只是批示道：“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22] 此后，她只好配合中共的整肃运动。反右运动中，她发表攻击文章其它“民主党派”人士称“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23] “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24] 在妇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她颂扬中共的反右运动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企图把不久之前才摆脱掉的、带了几千年的枷锁重新加在妇女们的身上。我们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25] 她不情愿地配合中共整肃运动的同时内心受到煎熬。反右运动后，人大处于

被废除的状态，她开始称病拒绝参加会议。红卫兵运动中，她被抄家，被逼剪发，被红卫兵捣毁双亲墓地，表妹被逼自杀。她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反对，并开始后悔自己人生的选择。晚年，她以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回归父母旁边的最后决定表达对献身共产革命的悔恨。她的心路历程是一代“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一月风暴”与“二月逆流”

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在上海操纵成立了以潘国平、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夺取政权的要求。夺权要求被上海市委拒绝后，工总司在安亭火车站组织集体卧轨阻断京沪铁路，声称赴京寻求中央承认自己造反的合法性，是为“安亭事件”。事件发生后，华东局负责人向中央请示应对。接替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局面的陶铸正在致力扭转工业生产瘫痪局面，不容工上海的工业被造反派摧残，表态不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要求工总司服从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陶不知道，“工总司”的背后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工总司”拒绝华东局的劝阻，坚持上京请愿。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工总司”向上海当局造反，表面让“工总司”放弃上京请愿，平息了“安亭事件”，而实际是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了冲击当局管制的动员令。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表态，工总司与红卫兵配合行动占领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和《解放日报》社。各地的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表态，迅速成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效仿上海工总司，阻断铁路运输，冲击政府机关。毛泽东就是要借造反派组织摧毁秩序，下令整肃阻止工人造反派夺权的陶铸，并让与陶一起商量维护工业生产秩序的周恩来主持会议整陶。周赶紧与陶划清界限，下手整肃。

随着造反派组织涌现，各地迅速形成了两大造反派组织对立的局面。年底，毛泽东在寿宴上祝酒说：“为展开全面内战干杯！”^[26] 他希望全国陷入混战，以彻底摧毁刘少奇在各地的支持势力。根据毛的指示，《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在 1967 年的元旦社论中号召在全国展开夺权。造反派之间武斗在上海首先爆发，上海“工总司”以保卫中央文革的名义，武力打垮了另一派工人造反组织“赤卫队”，制造了“康平路武装流血事件”，接管了中共上海市委、市府的党政大权和各大报刊，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等领导人及一大批厅局级干部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1 月 8 日，中央文革向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出贺电，号召全国效法上海造反夺权，并派张春桥、姚文元接掌上海大权。1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在《编者按》中称赞上海的“一月夺权”行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经中央文革和《人民日报》的煽动，各地造反派都展开了夺取政权的行动。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赞扬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一月风暴”，是“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 月 5 日，上海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随后改称为“革命委员会”。各地造反派效仿上海，也成立了由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为主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夺权浪潮中，各地党委、公安等权力机关本丧失了管制权，工矿企业半停产或完全停产，造反派武斗升级，公路、铁路交通、军工厂、重要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国陷入混乱状态，各地当局纷纷向中共中央报急。

夺权风暴中，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对军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夺取武器，建立工人武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成立了造反组织，组织批斗高级将领，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等将领实施了“喷气式”批斗，将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批斗迫害致死。在 2 月的政治局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元老对文革混乱局面表示强烈不满，斥中央文革在军队中鼓动造反搞乱了军队。中央文革不示弱，向毛泽东状告军队元老反对文革。毛泽东得报后斥责几位元老说：你们在发动文革的十一中全会上都举了手，现在何以反对。元老们无言以对，只好作检讨。毛

泽东不依不饶，责令他们停职检查，下令停止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以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为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武斗

在鼓动造反派夺权、冲击军队的同时，毛泽东批准下达了造成军队与造反派组织互杀的系列指示：其一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二是中央军委向各军区下达的制止造反派冲击军队和揪斗军队将领的《军委八条命令》，其中要求坚决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其三是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由于各地对立的造反派组织都打“向资产阶级当权派造反”旗号，都自称左派、造反派，而“左派”、“右派”、“造反派”无从区分界定，三项指示实际是一面鼓励造反派冲击军队机关，军事重地，揪斗军队将领，一面批准军队武力镇压冲击军队机关的造反派。结果，各地军队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认定造反派中的一派为“左派”，另一派为“右派”向“左派”发放武器弹药，支持“左派”镇压“右派”，或是直接命令军队屠杀造反派组织，造成大规模内战和伤亡。其中著名的内战（武斗）事件包括：“四川宜宾事件”、“重庆一二四血案”、“成都一一二五血案”、“泸州惨案”、上海的“六二九”武斗、上柴厂“七一八”武斗、“八·四”大武斗、上海“青浦大武斗”、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河北的“农大武斗”、福建的“福州武斗事件”、军队残酷镇压河南最大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事件、军队镇压新疆造反派的“石河子血案”等等。在四川，武斗在军队的支持下动用了大炮，土坦克、军舰、当时最先进的双管高射炮（平射），摧毁房屋、击沉江轮，造成死伤人数以十万计。[27] 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根据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下令开枪镇压冲击省军区的造反派组织“青海八一八”，枪杀造反派成员数百人，致伤无数，是为“二二三惨案”。事件后，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将执行他的另一指示的赵永夫关押，为被镇压的“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平反，鼓励他们继续冲击军队机关。

作家秦牧记录武斗不算最激烈的广州街头所见写道：“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1967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提出“武装左派”。江青据此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励造反派建立武装。根据江青的指示，上海的造反组织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中央文革命令军队“支左”，发枪支弹药给造反组织建立了“第二武装”。当月，王洪文指挥上海造反派十万人武装攻击对立组织的总部，造成重大死伤。张春桥、姚文元安排将上海武斗场面拍成了专供毛泽东一人观看的电影纪录片。毛泽东观后对指挥武斗的王洪文赞赏有加，在不久后将王提拔到了中央。

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传达全国后，各军区、军分区向自行认定的“左派”提供军火，获得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立即扩大武装，对另一派展开更大规模的屠杀，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斩尽杀绝的作法；不获军区承认为左派的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武器库，各地武斗规模越来越大，军队造反派互相屠杀愈演愈烈。毛泽东对武装局面感到满意，赞扬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有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28] 江青赞扬武装说：“你们（四川造反派）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29]

广西军队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是“支左”三项指示造成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广西军区根据支左指示，介入了广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与“四二二”（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的内战，认定“联指”为左派予以支持。“四二二”不甘被镇压，于1968年1月武装拦

劫了援越军车，夺取了武器和物资展开武装自卫。毛泽东将援越视为头等大事，得报后下令武力镇压。广西军区奉命调军队对“四二二”造反派组织展开了围剿，将数十万“四二二”造反派歼灭，将其中十多万人屠杀。“四二二”残部数千成员与支持者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军队和“联指”采取了恶毒招数，开左江水电站闸门造成邕江水位暴涨至历史最高记录，以邕江水淹没“四二二”藏身的地下人防工事，将坚守其中的数千造反派及家属溺死，同时淹没数千间民房，是为惨绝人寰的“邕江集体屠杀事件”。无数“四二二”造反派成员的尸体随洪水顺江而下。更多造反派的尸体没有漂上来，腐烂在了南宁地下人防工程中，造成南宁市区此后数年尸臭弥漫。正规军歼灭“四二二”后，有更多的人受到牵连，被逮捕判刑或受到整肃。[30]

遍地造反派武斗将国家搞得千疮百孔，各地紧急报告飞向中央。毛泽东意识到内战扩大将威胁统治基础，于是在 1968 年底话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中共文革将毛的上述谈话作为“最新指示”在全国宣传，要求造反派“大联合”。从“为全面内战干杯”，到“没有理由分裂成为两大派组织”，毛泽东在国内外和平环境中制造了全国性的两年武斗，造成红卫兵、造反派死伤两百万，另有百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受到整肃、判刑，其中四川逮捕了十万造反派，湖北逮捕了二十万。

遣送农村与大屠杀

红卫兵运动中，公安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授意，向各地公安局发出了支持红卫兵打击“四类分子”，“消灭剥削分子”的指示。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北京大兴县“文革领导小组”于 8 月底至 9 月初在十三个公社实施了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大屠杀，在几天内屠杀了三百多人，将几十户人家灭门，被杀者包括老人和婴儿。其中，大辛庄公社的“黑五类”基本被杀绝，“黑五类”妇女还遭到强奸，当时的说法叫给她们“换成分”。[31] 各队的屠杀方法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组织“积极分子”动

手，以棒打、绳勒、刀铡等方式杀害，直到杀光为止。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32] 可见，大兴的屠杀是最高层指挥的结果。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在其中要求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职业办道人员、敌伪军人员、旧政府人员、旧警察、旧宪兵、特务分子、刑满释放犯、解除劳动教养但未改造好者、投机倒把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等“二十一种人”。[33] 公安部长谢富治明确要求公安机关要支持红卫兵，造反派，须向红卫兵提供“二十一种人”的名单。这里，谢富治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旨意，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的字面背后其实是指引红卫兵、造反派殴打、屠杀所谓阶级敌人。

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全市张贴布告（三一八布告），宣布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等“十一种人”及其家属遣送农村，注销他们及其家属的城市户口，随后行动将十多万“十一种人”如同当年土改中一样“扫地出门”，让这些人陷入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粮食供应、财物散失的“黑人黑户”绝境。其它城市当局效仿北京，相继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将“十一种人”赶出城市，流放到边远农村。

《公安六条》和《三一八布告》中的“未改造好”、“投机倒把”、“坏分子”、“黑帮分子”、“表现不好”、“坚持反动立场”等说法与反革命分子、坏分

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等一样，都是随意迫害罪名。文件中所说的“二十一种人”、“十一种人”早已在以往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运动中反复遭受打击，中共中央在文革运动要求对这类人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再实施打击，不给生路。在全国各大城市实施过程中，实际被遣送的不只是“十一种人”，也不只是《公安六条》规定的“二十一种人”，[34] 而是鼓励基层扩大范围，随意遣送，实际打击面超乎想象。政府趁乱驱逐市民的原因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将国家资源尽量用于对外援助和发动战争，完全没有民生建设，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城市公用设施无法应付人口增长压力。当局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不是建民宅、建基础设施，而是不断以政治运动的名义，将指定人群赶出城市，以及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跃进之初，北京市长彭真就提出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大规模地遣送人口到边远农村。[35] 大饥荒中，中共实施“八字方针”，其中的主要举措还是将上千万工人赶出城市，“下放农村”。即使如此，政府仍无法解决城市住房的拥挤和民生设施不足的问题。文革运动开始后，周恩来与谢富治联手操办，指挥红卫兵在抄家运动的同时大规模地抄没私宅，然后再出台遣送布告，将百万被抄家庭赶往农村和边远地区，将他们的住房，其中相当部分是私有房产，霸占作为机关宿舍。

抄家和当局遣送暴行中，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拥挤了被流放的受难者。他们中不少人是举家被逐离城市，成了只有简单行李的难民，其中还有很多人还被剃成阴阳头，挂着各种罪名的牌子，或戴着高帽子被人押送，遭受沿途游斗，受尽侮辱。被遣送者通常没有亲友送行。有亲人送行者很多也是车站一别成了永别。与当年苏联流放富农一样，“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在遣送中也大批死亡。与苏共一样，中共流放迫害也不留记录，害死人数都无从确知。

《公安六条》传达全国带来的不仅是遣送、打击，还有大规模屠杀。在湖南道县，两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红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革联）立即以屠杀“二十一种人”为清算对方的手段。在持续数月的大屠杀期间，流经道县的潇水河中漂浮着男女老少的尸体，有的赤裸，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肢体残缺。喝惯了潇河水的道县人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开在河边豆腐店也不敢取用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一位干部回乡后，看到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腐烂尸体就有上千具，于是冒死吁请中央出面制止大屠杀。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南零陵地区十县被杀害的所谓“二十一种人”近两万人。[36] 在邵阳，对“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的屠杀一样惨烈。资江河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男女老少尸体顺流漂下。[37]

在广西，广西军区军队和造反派组织“联指”在对“四二二”造反派武装围剿的同时，展开了对“二十一种人”的大屠杀。1968年7至8月，《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官方的推动下，对“二十一种人”的灭门惨案遍及广西全省。在宾阳县、融安县，每个公社、大队都成批杀人，被指为“阶级敌人”而杀害者近4000人，176户被灭门；在玉林地区有5000人被杀害，河池地区约8000人被杀害；钦州地区万余人被杀害，整个广西在和平的1968年有20多万平民被当局或当局指使的造反派组织杀害。[38] 屠杀中，杀人凶手获得种种嘉奖。一时，为立功而杀人成了潮流。广西文革中入党的中共党员中有2万人参与了杀人，有1万人是杀人后加入了共产党的。”[39] 广西的大屠杀中还出现吃人狂潮。先是有人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回家吃，随后出现杀人即吃，村民共食。在武宣，合山，崇左，柳江等县，批斗会每斗必杀，每死必吃。在武宣中学校园，更出现了学生杀老师、校长后分割煮食的惨剧。作家郑义赴广西调查统计，广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吃。[40] 文革后，由于当局不可能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响应毛泽东号召的基层杀人罪行也无从清算。多年后，当被问及为什

么连无辜婴儿都杀时，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的韩玉春夫妇说：“从四清起就大讲阶级斗争，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文革开始后，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文革结束后，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幸存的女儿 1800 块钱，算是补偿还。韩夫人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被害人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中共制造的遣送屠杀显示共产革命带来的祸害规模空前，残忍程度空前。经过历次运动，地主、富农已经成了农村中最穷的人，资本家成了城市中的贫民。可是，中共对这些人剥夺财产后还要反复地，长期地斗争、迫害，在文革中对幸存者再遣送，屠杀，用红卫兵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灌输，国人的残忍在文革中爆发，留下了灭门、吃人等世界历史上最恶毒的记录。应当指出，中共布告要打击、遣送、屠杀的“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中的大部分人其实是志士、义士，中共所谓的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大多是当年的抗日志士，中共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基本都是对土改、镇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运动暴政的抗争者。由于《公安六条》和《三一八布告》实在见不得人，当局在文革后下令将文件销毁这两项迫害了百万人的重要文件，因此，如今在档案馆里都不见了这两项重要文件的踪影。

“720 事件”与“王关戚事件”

造反运动中，武汉地区形成了“工人造反总部”（工总）和“百万雄师”两大造反派组织。中央军委下达“支左”三项指示后，武汉军区认定两派中较为保守的“百万雄师”为“左派”，下令将激烈冲击军队机关的“工总”解散。喜欢住武汉的毛泽东直接插手武汉局势，认定造反更激进的“工总”为“左派”。按

毛的意思，中央文革要求武汉军区改变“左派”认定。武汉军区不知道中央文革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按照中央军委禁止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八条命令》行事，不理睬中央文革对武汉的插手。

在武汉局势混乱之时，毛泽东又要到武汉住。1967年7月上旬，周恩来来到武汉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打前站，感到了武汉的混乱，为了保密下令更换了东湖宾馆的全部服务员。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秘密到达武汉。由于对武汉军区不信任，毛泽东率谢富治、王力秘密住进东湖宾馆，将行踪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保密，对外只说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18日，谢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到“工总”总部宣布“工总”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要求武汉军区改变“支左”的认定。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不服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发号施令，于7月20日派兵冲进武汉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批斗、殴打，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抗议中央文革对武汉“左派”的认定，是为“720事件”。

事件中，秘密住在东湖的毛泽东被冲进宾馆的军队吓坏了，召周恩来前来救驾。周火速安排专列、专机、长江舰艇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亲率三架飞机从北京飞到武汉，安排毛趁夜从东湖宾馆后门逃离。自从1956年一次乘机受到惊吓后，毛泽东再不乘飞机，出行一律兴师动众地调动专列，每次突然出行都造成铁路系统大混乱和十几万旅客滞留。此时，为尽快逃离武汉险境，他只好同意乘飞机。当机长问飞往何处时，他只说先起飞，待飞机起飞后才说飞上海。到上海后，毛泽东下令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撤职，由武汉空军将领刘丰接掌武汉军区。江青进言称“720事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的反革命事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建议让造反派建立武装。毛接受江的建议，发出了“武装左派”的指示，并批准在北京给王力开欢迎会，以示支持造反派向军队造反夺权。7月22日，周恩来等文革派安排数万群众在机场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谢富治、王力到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拥抱，谢、王，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

边挽着王力走出机场，制造了英雄凯旋场面。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百万军民声讨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集会，林彪出席发表讲话，高调支持造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接掌武汉军区的刘丰以叛军罪名将独立师撤销番号，武力歼灭了二十多万“百万雄师”武装和武汉军区部队，并在湖北全省展开了对“百万雄师”的大搜捕，将大批武汉军区官兵送去劳改。7月底，陈再道被押到北京接受批斗，在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上被一群高级军官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低头弯腰六、七小时。

8月1日，《红旗》杂志刊发了王力、关锋撰写的，鼓动继续向军队造反的社论（《八一社论》）。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反“带枪的刘邓路线”，明确煽动造反派夺取军权。在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下，地方造反派与军队中造反派组织以“揪当地陈再道”为口号，联手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队的武器、物资以扩大武装，与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各军区纷纷电请中央军委批准镇压造反派，一些将领喊出了“打倒中央文革成员”的口号。军队将领们的愤怒口号让毛泽东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大多数军队将领对造反派冲击军队强烈不满，“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意味军队对他本人不满。他清楚，各军区的将领都与陈再道一样对中央文革不满，如果向对陈那样将更多将领撤职查办，兵变随时发生。另外，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之说使毛泽东感到林彪经营军队多年后已经坐大，自己面临军权被架空的危险。权衡利害后，毛泽东决定立即转向，停止鼓动向军队造反，安抚不满的军队将领。8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从轻发落陈再道，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两篇《红旗》杂志社论斥为“大毒草”，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骂为“毁我长城”的“小爬虫”，下令追究他们发表“乱军”社论的责任。毛泽东的突然转向令中央文革成员们慌了手脚。这一转向等于宣布，此前中央文革根据《五一六通知》煽动在军队中造反错了。江青和康生赶紧将责任推给签发社论的陈伯达，虽然大家都知道《红旗》的所有社论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推出的。8月下旬，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毁我钢铁长城”、“还我长城”等批语传达全国。这一批语

成了另一道镇压令。对造反派忍无可忍的各地军队将领据此对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的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对军队中的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清洗。武汉 720 事件（百万雄师事件）是毛泽东亲自插手制造地方内战和混乱的代表案例。他先是鼓动造反，鼓动冲击军队，“为内战干杯”，随后又号召“大联合”、禁止冲击军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数百万响应号召的红卫兵、造反派成了他的牺牲品。

在制造灾难后找人作替罪羊是毛泽东惯用套路。在延安，他发动整风运动整肃了一大批干部，随后他指责整肃扩大化了，将责任推到了运动执行者头上；建国后，他发动镇反运动，在指挥屠杀了两百万人后指责基层执行者过火了，犯了错误；在制造大饥荒后，他将责任推给各省基层干部和国民党，声称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发动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整风整社”、“社教”（四清）运动，整肃了执行他政策的百万基层干部。这一次，他找替罪羊的脉络更加清晰：文革是他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他审定的，其中要整肃“军队中的走资派”是他提出来的，各地造反派向军队造反、揪斗军队将领、冲击军队机关是他煽动的。在军头们一致反对向军队造反，统治基础受到威胁情况下，他制造出了“乱军”、“毁我长城”等罪名，抛出爱将王、关、戚和全国一大批造反派领袖作替罪羊以安抚将领，挽回军队效忠。

为权力斗争需要抛出爱将，也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不久前，他为拉林彪保驾而抛弃爱将罗瑞卿，这一次抛出的王、关、戚。被毛骂为“小爬虫”的三位都是因写政治批判文章而被毛泽东提拔进入高层的。三位的文章构成了中共中央几年来最重要的文献。王力主笔、起草或审定的文章有《九评》、由林彪署名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等等。王力下台后，他的冤枉继续，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毛泽东的理论。关锋因编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而获毛任命为《红旗》杂志编

委，随后因发表一系列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再获提拔。这些文章包括，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系列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五一六通知》（合作起草）等等。此次，他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起草了《八一社论》，想再立一功，不料获罪。戚本禹窜升始于发表攻击翦伯赞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毛泽东赞赏该文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本禹闻言，再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的文章，给翦伯赞扣上了“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随后获毛泽东任命为秘书以取代田家英。不久，戚本禹写出了让刘少奇读后气得吐血的代表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发表。王、关、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煽动在军内造反，结果被毛泽东以“乱军”罪名关进监狱。三位入狱后，中央文革开展了对他们的批判运动，给他们罗织了“反党、反毛主席”等罪名。三人因写不讲道理的整人文章走红，然后因写文章而获罪，文革后再成为元老们发泄怨气的打击对象，被判处数十年的徒刑并被开除出党。戚本禹在晚年回忆录中披露受迫害的情况写道：“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一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着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一连昏睡了好几天，虽然还有点知觉，但脑子里却什么意识都没有了。那人看我几天都没吃东西，就说我装死，是想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很大的铁钳硬把我的牙齿撬开，也不知他往我的嘴里灌了点什么东西进去。过了好几天我才渐渐苏醒过来。……在 1980 年的时候，把我和关锋两个人都关进了秦城监狱的“死牢”里。那是秦城监狱里面条件最恶劣的单人牢房。这种牢房除了牢门，四周都是封闭的。很小的一个房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个洞，供大小便之用。关锋疯了的时候，就用手往这洞里抠屎吃。……在秦监狱，绝

大多数的牢房都没有装纱窗，蚊子、苍蝇是到处自由飞的。何况那蚊子也不是他饲养着的，怎么就听他指挥呢？其实，只要坐过牢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要是不习惯被蚊子咬，那你在监狱里根本就别想睡觉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习惯了。那时我每天醒来，身体下面被压死的蚊子少说也有好几个。我都觉得，我身上大概已经有了某种抗体，蚊子再怎么咬也都已经不在乎了。监狱的伙食也是没法提的，按规定，我每月的伙食费是 38 元，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给我们吃的东西里面经常有死老鼠、苍蝇、蟑螂。我看过好几次，管理员从锅里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一天吃不下饭。我想起了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号召全民除鼠害实在是太英明了。”戚在回忆录扉页题词：“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他为残酷迫害人的毛泽东和文革欢呼，就应为在秦城狱中受到殴打和虐待感到高兴。

军宣队、工宣队与五七干校

经过两年的造反运动，全国一片混乱。军队将领普遍反对造反运动，喊出“打倒中央文革”口号。毛泽东意识到军队的不满将危及统治基础，于是转向，发出“大联合”的号召，要求停止武装，恢复秩序，镇压造反派。这时，他遇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时既要维护秩序，又不能否定造反的困境。他不能正式否定自己一系列鼓动造反的文件口号，又不能恢复各地原党政机关，因为那样将证明他的一系列造反号召是胡闹，况且已经掌权的造反派和支左军队也可能抗拒被“打倒”的原党政机关回来掌权。无奈中，毛泽东只得重新实行建国之初以军事管制的办法。中共中央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了军管。由于基层权力机关都被摧毁，军管范围只能不断扩大，最后军管范围竟然扩大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各军事院校、军队机关，出现了军队机关被另一支军队“军管”的情况。这时的学校极度混乱，上千万在校学生无所事事，胡作非为。毛泽东派军队进驻学校，对学校也实行实行军管。中共中央传达他的“最新指示”说：“派军队干部训

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据此，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以军管、军训的办法结束学校的混乱状态。

毛泽东的“支左”已被证明是制造灾难，在全国实施军管也是灾难。“军管”下的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一样具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性质：党政军一体化；军队由领袖控制；国家没有反对党；政府控制舆论，没有独立媒体；强调思想统一；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权利；整个政府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操控民众。“军管”之下的中国还具有奴隶社会的性质，民众的财产权、人身自由被剥夺，生命权也不保。在全国实行军管的荒唐作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全国如同一个大军营，所有的人听从他的旨意。

伴随军管，各地的新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为军队把持，国家向辛亥革命中各地军头称霸，不听中央政令的军政府状态倒退。毛泽东对林彪集团为首的军头势力膨胀局面感到不安，想结束军管局面。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成员们都想到了一个传统办法，那就是沿袭土改运动、“四清”的作法，派工作组去接管权力。文革之初刘少奇就是采取了这一作法试图恢复秩序。毛泽东以斥工作组“镇压群众”，支持学生和造反派驱逐工作组的策略将刘少奇赶下台，同时也给工作组戴上了“白色恐怖”帽子。因此，派工作组接管权力的话毛泽东说不出口了。中央文革了解毛泽东的困境，献计将工作组改名，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感到一举两得。

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开进了北京高校，开始制止武斗。红卫兵们坚信毛泽东支持造反，认为“工宣队”、“军宣队”是改头换面的工作组，拒绝停止造反。7月27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武力抗拒工宣队接管学校，酿成重大伤亡。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指责红卫兵错了，声明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

学校是他的决定，周恩来跟进找蒯等彻夜谈话。红卫兵领袖们难以理解毛的翻云覆雨，但也只好就范。随后，“工宣队”、“军宣队”开进北京各大专院校，解散造反组织，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接管学校的领导权。

8月，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与林彪一起接见“工宣队代表以为工宣队造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宣布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学校机关，恢复秩序。9月，军宣队、工宣队开进了全国学校和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机关，开始举办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整肃班，对红卫兵和造反派骨干进行整肃。至此，持续两年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沦为了整肃对象，被大批逮捕关押。

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机关本来是结束冲突和混乱局面的无奈之举。按说，混乱局面结束后应当恢复学校、机关原来的领导当局。但是，毛泽东一来要维护自己煽动造反的颜面，二来仇视正规的大学当局，认为大学应由工人、农民管理三来认为学校应继续以搞政治运动为主，于是像制造台海危机后下不了台，长期维持开炮战那样，不再恢复原来的学校、机关主管当局，让“工宣队”、“军宣队”长期管理高校、科研、文化机关，对这些上层建筑实行人民公社那样的军事化管理，延续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统治时期。

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同时，中共在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源于大饥荒中的军队生产基地。大饥荒中，农村遍地饿死人，军队也断粮，军粮多是发霉的地瓜干。[41] 解放军总后勤部请示中央军委自己动手搞生产，毛泽东立即批准。其实，农民更能够生产自救，毛泽东明知农民长期饥荒而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他不担心农民反抗，但不敢让军队挨饿，害怕军队饿急了会兵变。从1961年开始，军队大办农副业，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饥荒过后，毛泽东紧接着挑起了越战和“三线建设”，人民和军队都困苦，军队的生产基地没有取消，反而发展。

1966年，林彪报给毛泽东一份题为《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其中介绍军委总后勤部关于牛田洋生产基地的事迹。毛泽东于5月7日批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42] 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五七指示）和总后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文革开始后，各地大批干部被批斗后关进“牛棚”（这一说法源于苏区肃反），没有关“牛棚”者被安排打扫卫生及勤杂工作。随着被打倒者越来越多，各地新成立的革委会负责人纷纷向中央请示如何处理如何处置这一大批干部。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再发表指示（七二一指示）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他暗示文科大学不用办了，理工科大学也少办，缩短，动员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在校生都到农村去劳动兼“改造思想”。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请示中央不见答复后决定：办一个农场，把“牛鬼蛇神”干部、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人员及富余人员集中安排到那里劳动改造，选定在庆安县的柳河办劳改农场。他们想起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决定将劳改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正当毛泽东考虑如何安排各地“牛鬼蛇神”干部的问题时，柳河“五七”干校成立的消息让他兴奋。他感到，这正是他理想的大学模式，同时也为安排“牛鬼蛇神”干部找到了出路。他在《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写道：“广大

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据此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机关、各省、市、地、县在几个月内开办了各自的“五七干校”，将数十万受文革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送到边远贫困农村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中共将这种老弱病残，拖家带口的流放劳改宣传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其中，文化部门送去五七干校劳改的数千人其中包括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谢冰心、沈从文、严文井、臧克家、萧乾、郭小川、巴金老、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著名文艺家。被整肃为“牛鬼蛇神”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听从安排成了“作五七战士”。他们中的多数已在苦难之中，被“关牛棚”，或受“群众专政”迫害，认为去干校作学员好过被关押、批斗。来到“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开始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劳动之余还要写交代，作检讨。干部、知识分子们到了五七干校并没有逃脱整肃运动。很多体弱者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对于流放干校的生活，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精神、肉体的屈辱记忆和苦难的文字，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季羨林的《牛棚杂记》、杨静远的《我在干校一千天》等等。

以“军宣队”、“工宣队”、“五七干校”为代表的毛泽东式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古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尊重知识，要求“宰相须用读书人”，开创了一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代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朝廷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官府负担食宿的学生就有十多万人。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书院兴盛，其中最知名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南宋时，很多州，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地，都建有书院。在政府财政破产的清末民国时代，历届政府秉承了重视教育的传统，拨出尽量多的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的高收入。大多

数民国军政要人热心教育。袁世凯是积极办教育的代表人物，督直时推动直隶教育突飞猛进，与张之洞联手推动了留学热潮；黎元洪捐建武汉大学体育馆；唐继尧办云南大学；曹锟每到大学总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表示感谢；张勋捐款建立北京江西会馆，南昌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为邵式平（江西省第一任省长）、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一大批江西学生发助学金、奖学金，个人包了奉新籍大学生的生活费；陈炯明在漳州搞地方建设时提出教育支出“占岁出额之强半”，在主持制定的省宪中规定：“每年军事预算不能超过财政预算十分之三，而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十分之二”；张作霖要求将财政支出的四成用于教育，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重要标准；冯玉祥办了“武训小学”；齐燮元出资办希望小学；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办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回民教育促进会所属学校；韩复榘在山东省政府主席任上拨巨资办教育，支持何思源、梁漱溟办乡村教育，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推动初小人数从 1929 年的 50 余万增至 1933 年的 100 余万；阎锡山治晋三十八年间大力推动教育，山西的教育进步领先全国，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其中山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超过 80%，领先世界；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陈立夫在抗战中个人举债办教育，这成为他晚年贫困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在天灾战乱频仍的年代推动教育进步。1927 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 600 元—400 元，副教授 400 元—260 元，讲师 260 元—160 元，助教 160 元—100 元，教授月薪与国民政府部长的待遇相当。在 1930 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 220 元、120 元、30 元，同期上海工人的月薪仅 15 元，可见国民政府之尊师重教。提高老师待遇之外，民国政府不干涉教材编纂，放手让由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一流教育家主持编纂教科书。在抗战最艰难，国家财政破产，靠增发钞票维持运转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坚持免费义务教育，培养了“十万战区流亡学生”。国民政府在 1946 年制定的《教育宪法》中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

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并在教育经费上严格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 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 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 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在被推翻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举措之一是“抢救学人”，抢救学术国宝。

与上述热心教育的民国政要相反，在学生时代受惠于赵恒惕在湖南大办教育的毛泽东鄙视正规教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时，他感到受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气，由此形成了敌视大学、正规教育制度和知识份子思想。1925 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划分中国社会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五大阶级，称革命的敌人是“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称“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等。他称“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为“中产阶级”。他把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他称“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称“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包括知识分子。[43]（中共在 1951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毛上述敌视知识分子的一半内容删去）受毛此文影响，苏俄顾问在为国民党北伐军制定口号时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口号。这样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恐慌，成为各界支持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对苏决裂的一个影响因素。在延安，毛泽东对莫斯科归来的红色知识分子和

投奔延安的小知识分子也不能容忍，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残酷整肃知识分子。

建国后，中国教育惨遭蹂躏。毛泽东虽批准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知识分子反革命的内容，但对视知识分子的敌视心态有增无减。他不仅将资源用于对外发动战争，不发展教育，而且将知识分子列为整肃对象，多次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下令砍掉大学中的人文社会学科，他列举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没上过大学的名人证明正规教育没有必要存在。中共宣传毛泽东有教育革命的思想。其实，他所谓的教育革命核心就是取消正规大学。出于取消大学的思想，他发动文革从高校开始，煽动学生造反，有意让全国学校停课。他在中共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提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阶级的，连延安的那些红色知识分子也不是，也是整肃对象。因此他所言的“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其实是要求摧毁正规的教育系统，学校不能由知识分子领导。在他的煽动下，全国的学生掀起了迫害教师，打教师、杀害教师的狂潮，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学就是人民公社，是全民纳入其中的“革命大学校”，要求把大学搬到工厂、农村，让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劳动改造。他没有资助教育的概念，将可怜的财政资源尽量用于了发动战争、对外援助和输出革命，不仅希望军队生产自足，也希望教授学生们自己养学校，不用政府拨钱。他指示办干校，要求学生、教授、文艺家们都去边远地区去劳改，以便将中国的教育经费全部取消，将资源全部用于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在他看来，大学可有可无，大学校长谁都可以当。红卫兵造反之初，他曾想任命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为清华大学校长。派“工宣队”、“军宣队”掌管学校时，他指派自己的机要员谢静宜和科长迟群去掌管最高学府清华与北大，将中国的最高学府办成了以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整肃运动为业的迫害场所，办成了在全国开展政治整肃运动示范中心。按照毛泽东授意，迟、

谢在清华、北大将知识份子贬为“臭老九”，营造出教授们在军宣队、工宣队面前诚惶诚恐的精神恐怖环境。毛泽东生命不息，祸害教育不止。直到他去世，“军宣队”、“工宣队”、“五七干校”和军管将领主持“革命委员会”等等灾难才走入历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建国后，中共背弃《共同纲领》中的承诺，开始剥夺、消灭私营经济。“五反”运动后，城市私营工商业大批倒闭，手工业，轻工业凋敝。与此同时，农村中的私营经济在合作化运动被扼杀。私营经济代表着经济的活力，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消灭私营经济带来了政府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毛泽东要求发展的军工业不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政府无计解决失业问题，于是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青赶往农村。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写道：“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随后，他再发批语：“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将超出农业、轻工业资源许可的军工建设项目大幅压缩。这一避免经济危机的紧缩措施使本已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应对失业问题，中共中央出台一系列举措，鼓动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动员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垦荒，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由此，中共开启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57年，刘少奇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44]一文中推动上山下乡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

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根据中共中央政策，文艺界推出了一大批宣传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是 1958 年推出的豫剧《朝阳沟》。受《朝阳沟》宣传和各级政府鼓动去农村的知识青年没有“大有作为”，而是在大饥荒中大批饿死。应对饥荒，中共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关闭大批大跃进中开工的军工项目，将上千万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去。1962 年 5 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从 1955 年到 1962 年，中共宣传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遗余力，但收效不大，全国只有 20 万知识青年去了农村。这 20 万人中自愿者极少，绝大多数是因中共秘密实施的“政审分类，对政治上不信任的青年升学不予录取”政策而失去升学和城市就业出路而被迫去了农村。鼓动知识青年去农村不成功，城市的就业，住房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中共没有别的办法，唯有加大力度推动知识青年去农村。1963 年，中共成立了周恩来为总管，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1965—1980 年下放 1200 万知青到农村的长期计划。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计划在十八年内动员 3500 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务农，随后主持国务院发布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草案推出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倡议“插队”说：“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 100 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 200 元。插场每人则要 1000 元，如果 100 万人插场的话，需要 10 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45] 在 1964 年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其内容是，改变将城市知识青年安排

向国营农、林、牧、渔场的作法，号召城市知识青年直接到农村去插队作农民。

邓小平“新思路”之新在于，《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规定政府对去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补贴，安排他们到国营农、林、牧、渔场，享受一定的生活保障，还不像农民那样完全受穷。而“新思路”讲明政府不再花钱补贴了，让下乡知识青年完全与农民一样受穷。周恩来赞扬“新思路”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推动“插队”的邓小平、周恩来等高层都非常清楚，国家财政亏空的原因是毛泽东挑起的越战。邓小平代表毛泽东赴越南，向越共承诺无偿援助，一开口就是 200 亿元的。高层们都很清楚，相比越战的巨额开支，对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补贴只是九牛一毛。因此说，“新思路”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省下对知青的补贴不过意味多送给越南几车皮“援越物资”而已。

配合《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共树立起了邢燕子、董嘉耕、侯隽、薛喜梅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鼓动青年们效仿，文艺部门推出了鼓舞一代青年的歌词：“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1964 年底，毛泽东邀邢燕子参加寿宴，报纸高调报导，期望全国知识青年效仿她主动去农村落户。到 1966 年文革开始时，中共以各种办法迫使约 130 万青年去了农村。这些去当农民的知青几乎全部是因“家庭出身”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和就业机会，没有出路，在各种压力下而被迫上山下乡的。政府用强迫办法可以暂时、部分地把失业包袱甩到农村去，但无助解决失业问题。在中共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间，失业问题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证明了政治强迫无助解决经济问题。

文革开始后，全国混乱，经济瘫痪，学校停课，高校停止招生，一千多万应届毕业生没有就业和升学的出路。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明，大批中学毕业生已过毕业期，应当分配出去，否则新的学生就进不来。应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除了驱赶更多知识青年去农村全无其它办法。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时，高层都清楚，十多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经验证明，邢燕子，侯隽只是当局刻意树立的极少数的个案，绝大多数知识青年不愿去农村，政府在文革前十年动员加强迫只达到了一百多万人上山下乡的目标，如今全国1966、1967、1968年初高中应届毕业生（老三届）有一千多万，自愿的办法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中共采取强制手段，向各级“革委会”下达了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强制性任务。各级“革委会”要完成强制指标，只能各显其能，采取各种强迫手段，包括宣布“下乡光荣，不去不行”，派人到家里动员，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强行注销城市户口等等。然而，这样强制性动员还是不能奏效。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同时刊出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中没有明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动员转变为了强制。接下来是当局的一系列强迫办法，包括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街道驱逐，让千万知青在城市里呆不下去。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几届毕业生及家人无力抗拒，只好听从政府指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每批知青下乡时，“革委会”都要组织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政府控制报纸和新闻纪录片只报导情绪高昂，红旗招展，知青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等等，而隐瞒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车站哭声一片的凄惨场面。当时，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完的伤心事，知识青年及

家人都不知道此一去能否回来，车站送别时，人们的伤心情绪互相影响，同时爆发，形成万众痛哭的场面。

到农村后，知识青年们感到了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遇到了生活，感情，出路等方面的问题，感到失落、苦闷，甚至绝望。他们被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和几年前大饥荒的述说强烈振憾，从狂热转为冷静，从盲从转向思考。他们感到，贫下中农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对地主充满仇恨，对新社会充满热爱，感到并不能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再教育”。

从 1968 年开始的几年中，全国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在 1968 年底发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了关于知青问题的指示。1972 年 12 月，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儿子下乡后遇到的生活困难。毛复信说：“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的复信被中共广泛宣传，作为对各地知青的安抚。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既没有提出解决知青们面临问题的办法，也没有澄清知识青年到农村是短期的，还是终身的，使知青们对前途更加迷茫。各地知青受迫害，女知青被奸污，以及知青自杀事件大量发生。

中共将知识青年引向农村边疆的另一途径是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中共从建国之初就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的农场以解决战后军队出路问题。到文革的十几年间，政府安排了大批知识青年到兵团和农场工作。1968 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中共组建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将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五个师（后扩大到六个师）。1969 年，中共再建立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安排数十万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屯垦戍边”。去兵团与插队的最大区别正是邓小平“新思路”指出的，前者享受一定政府补贴，需要政府花钱。

两千多万知识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事，是革命带来的灾难。毛泽东所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没有错，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锻炼也不是坏事，但是几千万知识青年没有出路，被政府强权驱赶到农村去却是毛泽东时代独有的暴政。在新中国之前，历朝历代政府没有，也没有必要发动这样的运动。因为第一，从古至今，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没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之分，农民与市民之间没有界线，农民农忙务农，农闲进城务工，城里人赚了钱在乡下置产作地主，乡下人进城谋生成功就成了城里人，人民自由迁徙、择业，是真正自愿的“哪里需要哪里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从古至今，知识青年务农都是自愿的。领导乡村的乡绅阶层几乎都是知识青年，他们不是政府动员或强迫到农村落户的，而是自愿在农村置业，作地主乡绅，领导乡村进步；第三，旧中国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自由发展，为知识青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就业出路，自然达到劳动力供求平衡，根本不需要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第四，共产革命前的中国农村私营经济活跃，劳动者在农村不愁找不到长短工机会，农村也有大量的手工业就业机会，城里人到农村谋生不需要政府强迫。而在新中国，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了经济活力，扼杀了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使知识青年丧失了就业出路。在中共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城市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光扼杀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扼杀了农村的就业机会。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只有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中磨洋工受穷。知识青年到这样的农村不仅无所作为，更是与农民抢饭吃，使农民更穷。

中共在文革前就提出了到农村插队扎根的号召。这一号召的实质是，政府将原先吸引知青插场的生活补贴也省了，动员百万知识青年由插场改为插队就可以省下十亿元的补贴款。文革中，政府强迫两千万知青插队，省下了更多的补贴款。政府省钱不一定是暴政，但在毛泽东发动越战，输出革命，无偿援助外国共产党，以巨额金钱发动外国革命的情况下，省下对上山下乡

青年的补贴，将青年们赶去边远农村受穷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暴政。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是消灭私营经济带来的灾难。不恢复私营经济，失业是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文革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说，驱逐青年到农村的运动是共产革命特有的灾难。1980年代后，中共不再需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主要原因是恢复了私营经济，恢复了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因此说，改革开放的善政其实无它，废除暴政而已。

样板戏独占舞台

196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匿名发起了一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运动。12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江青不满足于发动一场批判运动，开始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培植宣扬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新戏，希望通过她熟悉的文艺领域走向政治舞台。

1964年6月，毛泽东在“社教四清”运动中再对文艺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在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将夏衍、田汉等文艺负责人撤职，并实施整肃。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江青与毛泽东配合，不断在《人民日报》上匿名发表批判文章，先后批判《红楼梦研究》、电影《红旗谱》、电影《朝阳沟》、京剧《谢瑶环》、昆剧《李慧娘》、京剧《海瑞罢官》，给文艺作品扣上“歪曲革命历史”、“歪曲阶级斗争”、“歌颂错

误路线”和“大毒草”等帽子。在政治整肃威胁下，戏剧纷纷停演，全国剧团大批解散，戏剧领域，连带文艺领域，一片萧条。

对文艺戏剧作品展开政治批判的同时，江青与康生配合，策划排演了几部新戏：沪剧《芦荡火种》移植的京剧《沙家浜》，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根据同名沪剧移植的《红灯记》、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的京剧《海港》等。1967年5月，江青选定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北京舞台同时推出了《智取威虎山》等八个现代革命剧目，引起轰动。配合新戏推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剧本，并发表了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46] 《文艺革命》期刊同时发表了《江青同志对京剧红灯记的指示》，其中提出“样板戏”“三突出”原则。江青的“三原则”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以及样板戏的“三陪衬”补充为：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英雄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随着文章发表，江青栽培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被正式命名为“革命样板戏”。

按说，样板是相对众多非样板作品而言。但江青、毛泽东长期对文艺作品实施政治整肃，封杀了文艺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别的作品无法存在，于是，江青的板戏成了文革中唯一能上演的戏剧，独占了国人的视听，造成了全国人人会唱，甚至段段传唱的黑暗状况。党化文艺局面下的所谓红色经典必然是掩盖真相的宣传品。作为党化文艺的代表作，样板戏不可避免地是歪曲历史，善恶颠倒宣传品。但就艺术而言，“样板戏”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剧本创作、音乐创作、舞美设计、导演、表演等方面“推陈出新”，创造了现代戏的新高峰，塑造出的李玉和、杨子荣等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形象、台词和唱段都感动了文革的国人。在音乐配器上，“样板戏”引入了西洋

乐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舞台美术上，“样板戏”采用了大量的实景，突破了传统戏曲舞美“一桌两椅”的重虚轻实模式，给人以真实之感，成为戏曲舞美虚实结合的真正样板。1970年代初，江青推动将八个样板戏陆续搬上了电影银幕，组织推出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另一批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之外，曾经还有一个由江青亲自抓的“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作为党文艺的代表作，小说《红岩》也是歪曲颠倒事实之作，将抗日机关中美合作所污蔑为酷刑折磨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红岩》出版生逢其时，适应了毛泽东“反帝反修”，“大讲阶级斗争”的需要，被中共宣传部门改编成了众多其它艺术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连环画《红岩》等等。在各剧种、各地方剧团争相改编的热潮中，江青指定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京剧《沙家浜》的编剧之一汪曾祺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现代京剧，指定扮演阿庆嫂的名角赵燕侠扮演京剧《红岩》的女主角江姐。[47] 根据江青的指示，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及演员被关进渣滓洞集中营一个星期“体验生活”，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只给窝头和白菜汤，不准说话，带上手铐，大家排演高唱《国际歌》，[48] 排演被审讯，排演拖出去枪毙，排演放枪时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等。《红岩》戏的造假过程在党文艺作品中具有普遍性，所有党文艺作品出台过程大致相同，都是按中共宣传目标的造假过程。在江青推动排演京剧《红岩》时，中共对四川地下党组织成员的整肃没有停止，地下党们被戴上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帽子。江青知道毛泽东最记恨王明，于是决定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文革开始后，编剧汪曾祺、女主角赵燕侠被批斗，小说《红岩》被批判，罗广斌被逼自杀（罗在国民党监狱中一年多无恙，在共产党监狱中十几天就活不下去了），江青又怕“王明路线”沾边，只好放弃《红岩》“样板戏”。

几部样板戏长期独占舞台的局面是革命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历史上最专制的统治者也不曾封杀民间的戏剧。民间戏剧可以唱“地也，你，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而不受朝廷干涉。共产革命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党独占舞台，封杀所有不歌颂自己的戏剧，从未有过统治者强迫所有戏剧、文艺歌颂自己的情况。中共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文艺方针。这一讲话精神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文艺革命是一回事，都要求扼杀一切非共产党的文艺作品，使舞台只为歌颂共产党而存在，取缔人民的精神享受，使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成为洗脑工具。建国后，独立于共产党的文艺被禁止，文艺作品只为服务共产党一党之私而存在。在这样全面党化的局面下，真正的文艺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出台的可能，人们能够看到、听到的全部是党的宣传品。文革中，毛泽东、江青达到了他们的文艺革命目标，舞台上只剩下了二人认可的几部戏。国人不知道，毛、江夫妇自己在小影院、小剧场享受着他们所谓的“封、资、修”作品。

随着文革结束，在样板戏逐渐淡出人们视听之时，国人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曲。人们无法忘记最初听到邓丽君歌曲时的那种感觉。因为人们被党文艺宣传品窒息得太久了，创伤得太深了，忽然听到了非党的天籁之音，如同在窒息中吸到了新鲜空气，在沙漠中得到了甘泉，那种心灵的抚慰是文革国人无法忘怀的。

第 51 章 中期文革

中共九大

中共党章有定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毛泽东总是以回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维护独裁地位，总是在清洗权力斗争对手后才召开大会。延安时期，他一再推迟中共七大召开以回避王明的挑战，使中共七大与六大相隔了十七年。大饥荒中，他以扩大高层开大会规模的办法无限期推迟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已经被实际摧毁，这时毛泽东才决定召开中共九大。

没有了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旧心病，毛泽东又添了新的心病，那就是崛起的林彪集团。建国后，林彪病痛缠身，淡泊权力地位，长期养病，无奈被毛泽东一次次拉他出来掌军保驾。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半路召林上山，依靠林彪代表军队的支持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以林彪接掌军同时，毛泽东派亲信罗瑞卿为总参谋长以牵制林彪。发动文革时，毛泽东再请林彪保驾。林彪提出以“去罗”为条件。毛泽东抛弃了罗瑞卿，但派另一爱将杨成武为总参谋长，继续牵制林彪的军权。在随后的文革巡视中，毛泽东命杨成武随侍左右，负责向军队传达指示。林彪对毛泽东总是安排“监军”牵制不满，再要求“去杨”。在全国混乱中，毛泽东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再抛弃杨成武。1968年3月，林彪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罪名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撤职关押，以亲信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改组了军委办事组，任黄为组长，任吴法宪为副组长，以自己班底的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成员，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停止向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等几位军委原领导人送有关文件，以自己的军委办

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这时，林彪还没有意识到，随着刘少奇下台，他与毛泽东之间互相利用的游戏已经结束，盟友成了对手。毛泽东与史上众多君王一样，长期生活在失去大位的恐惧中，总是在盘算收拾第二把手。

在筹备召开九大之时，林彪与毛泽东就是否应当结束文革运动发生了分歧。林彪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文革，国家政治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清洗刘少奇目的达到后应当结束文革，恢复秩序和经济。陈伯达支持林彪的意见。二人商量后，陈拟出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在其中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反对结束文革，要求继续“斗争”和整肃，对陈伯达的大纲极为不满，授意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另行起草政治报告。张、姚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拟出了题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报告稿。林彪对毛泽东抛开陈起草的政治报告而另起炉灶不满，反对张、姚报告中没完没了革命的主张。但他没有勇气挑战毛泽东，默认毛泽东决定的报告讲稿。

决定召开中共九大的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中苏边境打一仗，为九大冲喜。文革中，中共既“反帝”又“反修”，指使红卫兵冲击苏联使馆，造成中苏边界关系紧张。1968年末，两国边防军在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频繁发生摩擦。1969年3月2日，中国特种部队奉命在珍宝岛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苏军数十人。两周后，苏军大规模报复，导弹射入中国境内二十公里，造成中国边防军近千伤亡。得知北京在苏军导弹的威胁之下，毛泽东极为恐惧，想躲到南方去。但在北京召开九大的决定已经传达全党难以更改，于是他下令将“九大”改为秘密召开。根据决定，各省代表秘密集结，不准外出与对外联络，到京后圈禁在几个宾馆内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所有代表分批乘坐大车在北京市内转圈后才开到人民大会堂侧门（正门不准出入）。[1]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授意会场悬挂自己的巨幅画像，展示独尊地位。八大时，在苏

共反对个人崇拜的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会场不挂画像。九大虽在苏军导弹威胁下秘密举行，毛还是安排会场悬挂回自己的画像，而且比七大的更加巨幅。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是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无奈地宣读了他根本不同意的报告。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加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清末以来，中国政党林立，没有一个政党在章程中规定领袖。革命带来了倒退。国民党在党章中规定领袖，拒绝更替，实行改头换面的帝制。中共党章不仅规定领袖，且再倒退一步，规定了副领袖，加入了“亲密战友”这样的荒唐字眼。

大会第三项议程是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这项议程只是走过场。暴力革命党中暴力决定一切，党内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建党之初，党的大会都是举手通过共产国际拟好的名单，议案。延安整风后，党的大会都是举手通过毛泽东拟好的名单和决议。这一次的选举没有例外的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由毛泽东个人决定，但独特之处是，毛决定的名单中只有约五分之一是上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另外八成上届委员出局，不是因为选举，而是因为八届中央委员会被半路政变推翻，大部分委员遭到批斗迫害，甚至已经被害死。毛泽东极不情愿地批准在“三支两军”中掌权的大批军队将领进入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发动文革时请林彪保驾，文革中安排军管，只能接受林彪势力扩张的现实。

接下来的一项是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这次例外采取无记名投票，其程序是发给每位大会代表一份毛泽东决定的名单，请代表在名单后划圈。代表们多数是中共从基层选派来“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名单的人名并不熟悉，在崇拜热潮中不敢有不划圈的举动。划圈后的程序是由毛泽东带头，林、周等预定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按排名顺序，依次将划圈名单投入票箱。这样的无记名投票一无辩论，二无差额，三是场面完全再现了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的场面，整个会场长久地全体高呼

“毛主席万岁”，代表们一手拿名单，一手捧《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投票后再走近毛泽东高喊万岁。紧接着，大会迅速公布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名单，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退场，当选中央委员留下开始九届一中全会，按例选举政治局委员。这一程序也是举手通过毛泽东拟好名单。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和林彪集团的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人进入政治局，康生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权力分配后，中央文革被撤消，林彪集团在政治局中形成了半壁江山。

九大闭幕后，中共才对外宣布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公告称九大是“团结胜利的大会”。而实际上，九大是毛泽东、林彪走向决裂的大会。陈伯达后来披露毛、林在九大期间的分歧写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2]

“大疏散”与“深挖洞”

在秘密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声言准备与“美帝”、“苏修”的大规模战争。对林彪而言，在九大上发表的准备对“美帝”、“苏修”大规模战争的声音只是在重复毛泽东的决策而完全不是自己的主张。他从建

国开始一贯反对挑起战争，反对出兵朝鲜对美国开战。虽然他也参与了挑起越战，率军事代表团赴越，但那是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他自己对毛泽东挑起朝鲜战争，挑起越战，决策“三线建设”、开展“大比武”、号召“准备打仗”等等从来不以为然。作为中共的头号军事家，林彪认为对美苏挑战无异玩火。

九大闭幕后，中共一改四十多年的俄党立场，抛弃喊了多年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好像忽然有了民族立场，展开了俄国侵华历史、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沙俄在东北的屠杀的宣传，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大规模的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的示威游行。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命军队和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开通所有的地面导引站，在布署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出台了比上年增长三分之一的军费预算。

这时，全国人民被毛泽东拖入了核战威胁之中。苏联军方强硬派主张对中国的重要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美方意见。尼克松总统反对苏联动用核武器，决定通报中国。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

（WASHINGTON STAR）报导：“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实施核打击。”消息震动了全世界。[3] 苏联领导层中的缓和派主张，苏联的战略对手是美国，与中国开战只能使美国获益。在缓和派的推动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向吊唁胡志明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会谈。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机场会谈”，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四点临时协议”。然而，苏共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坚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9月16日，苏联记者、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维克多·路易斯在英国《星期六邮报》撰文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

地进行空中袭击”，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回应试探，尼克松总统表态：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参战。[4]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下，苏联放弃对中国核打击的计划，开始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

10月17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称“苏修要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在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要求军队进入备战状态，令会场气氛紧张。林彪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暂时没有爆发战争的迹象。毛泽东当场发怒说，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最后经举手表决，决定备战。[5] 根据会议决定，林彪在会后发布了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备战命令（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然后将命令报告毛泽东。毛对林发出命令后才报告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林谋求坐上最高领袖位的试探行动，要求将命令文件烧掉。林彪无奈，只好命黄永胜下令撤销一号命令。[6]

根据毛泽东的备战决定，中共中央发出“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其他同志作相应的疏散”。毛泽东喜欢战争，多次放言不怕核战争，准备中国死一半人，同时注意自己绝对还冒半点人身安全风险。挑起朝鲜战争，挑起中苏分裂，将国人拖入核战威胁的同时，他注意离开在苏联导弹威胁之下的北京，长期住在武汉、杭州。当年咸丰帝在英法军逼近京城时才躲去热河，让弟弟留京打理，可毛泽东刚刚作出备战决定后立即南下武汉，比咸丰动作更快。林彪是中共层中最不好战者，虽然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发布备战令，但不想在京主持，因此以南下安排备战为由也离开了北京。

主持疏散意味很多具体事项处理，周恩来责无旁贷。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将在京的大批“被打倒”和“靠边站”的领导人流放到外地，其中，没有被

“打倒”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被“疏散”到广州，陈云、王震到南昌，陈毅到石家庄，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邯郸，刘伯承到武汉，叶剑英、曾山到长沙，邓子恢到南宁，谭震林到桂林，被“打倒”的刘少奇、陶铸、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被专案组人员分别押送至秘密地点。陶铸被押送前对妻子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刘少奇更惨，被绑在担架上抬着上路。几十天后，刘少奇、陶铸分别死在了疏散囚禁地开封、合肥。

所有高层的疏散、遣送都是周恩来操办的，但处置决定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对准备将来起用的爱将，如邓小平、杨成武有明确的保护指示。根据指示，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后有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接机，以同志相称，谓“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然后被安排住在“将军楼”，在一公里外的一工厂象征性“劳改”。[7]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的起用之心，到流放地后定期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思想，争取宽恕。

中央领导人疏散的同时，北方各大城市均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关、高校向中小城市或偏僻农村的疏散。其中，北京大学被拆散，师生分别被疏散到北京西郊、陕西汉中和江西鄱阳湖畔，中国科技大学被迁到合肥，中央广播学院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到陕西甘泉。从 9 月至 12 月，中共以疏散名义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放发配，将众多机关强制迁到外地或农村，造成全国城市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兵荒马乱，一片狼藉。一时，旧家具再贱都没人要，无数家庭在备战、疏散中成了难民，两个包袱就是全副身家，各大城市火车站挤满疏散难民，大家都不知道此一去何日是归期，疏散路上看不到笑脸。历史上有无数次难民迁徙，但那都是外族入侵，战争，灾害使然，而 1969 年的“大疏散”纯粹毛泽东好战所造成。二战后，美国自拆战争机器，无意战争众所周知，苏联也长期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中苏间的战争危机是毛泽东不断挑衅的结果。

毛泽东挑起的核战危机被美国化解，但他制造的备战灾难在中国长期延续。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口号，强迫亿万国人展开挖防空洞的运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无数是缺少钢筋、混凝土，无备战实用价值的简易地洞。挖地洞备战的巨大工程在全国持续了几年。1972年11月，国务院报给毛泽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请示在战争危机和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是否减少挖防空洞的投入。毛泽东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8] 拒绝少建防空洞的申请，要求将挖防空洞的工程扩大规模和标准。据此，周恩来操办继续投巨资建设所谓人防工程，要求地方政府和集体企业自筹资金挖防空洞。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人防工程向永久性发展，大量使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这样的挖洞灾难一直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全国挖洞的土石方总量超过了历代建长城的总和。仅在北京就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这些洞质量低劣，后来都成了“耗子洞”、“水帘洞”。建防空洞运动造成的浪费相当于将“三线建设”灾难再来了一次。

在为自己准备防空洞方面，毛泽东早在建国之初就动手了，早早为自己修建了连接中南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305医院、西山军事中心等地的绝密通道，在北戴河修建了防核行宫。挑起中苏边境冲突后，他下令在中南海为自己紧急修建造了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核战危机和林彪集团的崛起使毛泽东陷入恐惧，感到在各地的数十行宫都不安全，对美景不再感兴趣。根据毛的心态，各地大员掀起了行宫改建热潮，加建防空洞设施，或干脆另建能够防空、防震、防毒、防原子弹的防空洞。例如，金华“601别墅”，主体为钢筋水泥框架结构，配有地下坑道，连接地下防空洞与指挥所，入口处设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主房正北面建有一座小型铁路站台，以便毛泽东乘火车可直达行宫后门；南昌“八二八”宾馆一号楼，活动室周围的玻璃有三层，每层都是一尺多厚的防弹、隔音玻璃，其中有长春一汽为毛泽东特别制造的防弹、防水、防毒气的“三面红旗”专用轿车；伊村饭店（省委61工程），

有专用铁路连接南京火车站。设计者别出心裁，让专列可以一直开到人工挖凿的山洞里隐蔽起来，让毛泽东下专列即可进入伊村行宫。1971 毛泽东南巡“打招呼”经过南京，因担心遇刺而在专列上过夜，致南京军区大员专门为他建造的伊村防空行宫从未启用。

建人防工程热潮中，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一起勘察，选定在白云山东北的一块片可比西湖的青山绿水之地建行宫。经过万余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和数千工人的施工，包括南湖和松园两行宫在内的“705 工程”于 1972 年建成。南湖与松园的湖光山色之美，设计之精妙，工艺之严格，陈设之考究比其它行宫更胜一筹。此外，它们还有特别之处，即建筑极其高大、坚固，主房面积 400 多平方米，房间高 8 米，可抗炮弹直接命中，据说在大地震中房子翻转也不会散架。广州行宫还配有数百米防护坑道和大型隐蔽部 3 个，地下电站 1 个，各种电缆 196 公里，道路 25 公里。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 3 万吨，总开支以亿计。行宫建好后，毛泽东已无心无力周游，再也没去广州。

湖北咸宁“131 工程”是备战、“深挖洞”另一代表作。在考虑对苏开战时，毛泽东命汪东兴修建防核指挥部。汪与总参谋长黄永胜商议决定选址在黄的老家乡咸宁。1969 年 1 月 31 日，黄签署了兴建命令，圈澄水洞为军事禁区，拨出了数亿军费，调动解放军工程部队，开建防核弹、防毒气、防水淹标准的地下指挥部。工程对外高度保密，进山施工部队乘坐车窗封闭的车辆，由不同司机分段驾驶，施工部队无人知道工程方位。经过两年施工，工程部分完工。地上部分有毛泽东和林彪的专用别墅，院内树木参天，看不出庞大地下工程痕迹，地下部分有面积近 5000 平方米巨大山洞、可以跑汽车的大隧道、大型发电机组、自备水源、大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湿度温度调节系统、通信中心、可供几百人在内吃住一两年的粮库，8 个装有重达数吨厚的铅门的出入口，每个出入口两侧有洞中洞，便于哨兵隐蔽。山洞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一层为毛泽东居所和林彪居所。毛泽东居所的布置与他中南海居所

一样，卧室有电梯直通山头以供逃生。工程建设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外界无人知晓，两年施工挖出来的土石不见踪影，应当是不计耗费地运到遥远处。行宫设计原本还包括飞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附属工程。工程尚未完工，林彪事件发生，黄永胜被捕，“131”工程被废弃。没有人知道这一工程的花费，也没有人知道，类似湖北咸宁 131、湖南临湘 6501 这样的所谓国防工程还有多少。

整个毛泽东时代，西方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共产主义的东欧各国也满足于和平安宁。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侵略中国。二十多年间，对世界和平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威胁来自毛泽东。他挑起了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中印边界战争，两次越南战争，印尼武装暴动，珍宝岛战事。他长期鼓吹早打、大打、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核战争，一次次将奉行缓和政策的美、苏拖入战争危机，将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拖入战乱。他下令为自己建防核行宫，各地大员争相改建防空洞邀宠，建防核行宫的开支与 1950 年代建行宫热潮的耗费同样巨大。只要自己安全，他不介意中国和世界“死一半人”。他制造的“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三线建设”、“深挖洞”等灾难每一个都是天文数字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浩劫。在下达备战、挖洞指示时，他还有心思玩辞弄句，套用学士朱升献计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句，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可见他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是何等漠然。

刘少奇逝世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实际下台。当年国庆节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即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了批斗对象。他要求向毛泽东当面认错。1967 年 1 月 13 日，毛、刘在人大大会堂最后一次面谈。刘提两点要求说：“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毛不置可否，嘱

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9] 几天后，红卫兵闯入中南海批斗了刘少奇，拆除电话，切断了刘与外界的联系。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江青提示红卫兵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穿旗袍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红卫兵在北京的春寒中逼王光美穿上丝绸旗袍，脖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进行羞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记录红卫兵与王光美的对话如下：“王（拒绝穿旗袍）：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红卫兵：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红卫兵：冻死苍蝇未足奇”。对话显示革命党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王光美在主持四清运动时，在制定“桃园经验”时没有考虑过被整者的人身自由，强调阶级斗争要狠，轮到自己受害时才想到人身自由。7月，红卫兵再斗刘少奇夫妇并抄家。中共中央安排将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过程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影片不是为了公映或作为历史资料，而是供毛泽东观看。毛要观看刘少奇挨斗的场面以解对刘在八大上反个人崇拜，在“七千人大会”上制止大跃进的心头之恨。

批斗之外，刘少奇还遭受了革命党独有的精神迫害。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刘的女儿刘涛先后贴出了《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坚决支持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等大字报。王光美见大字报后气得发抖，抱着继女痛哭。刘涛不为所动，再写大字报表示：“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如此残酷的精神折磨不只发生在刘少奇身上，无数各级中共领导遭受了同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他们不应有怨。因为，在苏区肃反以来的历次整肃运动中，他们都参与实施了同样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一次次举手拥护阶级斗争和整肃运动，参与了迫害地主、富农、旧政府人员，工商业者，响应号召提意见的青年，如今文革把这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扩大到他们头上，他们不应该觉得冤枉。

9月，中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将王逮捕，将刘少奇的子女逐出中南海住所，将刘单独长期软禁在中南海家中，对刘停医断药。刘再次向毛检讨，承认犯了错误，希望毛手下留情。毛对请求置之不理。逐渐，刘少奇病重卧床不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身上长满褥疮，手臂颤抖，穿一件衣服要一两个小时，往食堂吃饭的三十米要走一小时，手抖得难以送饭入口，吃饭弄得满脸满身。这时，没有人敢去扶刘少奇一把，更没有人敢去照顾他。得知刘少奇在走向死亡，毛泽东决定实施抢救为刘续命。医疗组接到抢救通知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10]

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署了《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报毛泽东、林彪。材料中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传阅件中写道：“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11]

10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独裁党内没有规矩和道理可讲的一个证明。因为，中共八大选出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数被以叛徒、“走资派”等随意罪名“打倒”、批斗、关押，甚至逼死，只有四成的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号称的中央全会，其他参加者都是毛泽东随意决定的亲信。没有党员敢于质疑这样的迫害运动，没有中央委员敢于指出这样的全会不合章程。应当说，毛泽东随意“打倒”多数中央委员，指定另一些人填补，召开全会有其道理。因为，上届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全体党员选出来的，而是毛决定的，此时毛重新决定并不值得奇怪。况且，毛泽

东从来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开过会，总是将一大批亲信扩大进来以控制会议。这一次不过是扩大进来的人更多些而已。

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装睡没有举手外，众高层全体举手，共同陷害了刘少奇。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认错说：“我们大家都举了手，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12] 作为中共高层中最勇于认错者，胡耀邦也有必要帮助党回避罪责。岂止是“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以来每次制造灾难的中共中央决议都是众高层全体举手通过的。彭德怀、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在被罢官、清洗之前也都举手拥护了整肃其他人的各项决议，也都参与了制造灾难，没有人反对过，连没有举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陈少敏也没有提反对意见。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汪东兴代表中央交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中共中央特地选在刘少奇七十大寿时在全国各大报刊出《中共中央关于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为让刘少奇在七十大寿时收听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他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指示医生为刘续命，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决定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广播全会公的。历史上，王朝、帮会、派系权争最多是杀掉对手，像中共这样选在领袖寿辰日开会、广播，实施精神折磨者史无前例。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刘少奇收到党的生日礼物，收听被党永远开除的公报后浑身颤抖、呕吐不止，血压陡升，病情急剧恶化，此后再也没有说过话。或许，他是以沉默抗议迫害，或许他已丧失了说话能力。从 1968 年夏被单独监禁开始，他没有换洗过衣服，生活不能自理后没有人照顾，瘫痪在床，满身褥疮、尿尿和脓水。由于疼痛时会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不放，他的手中被塞了一个塑料瓶子。他生命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大疏散”中，他被绑在担架中押送到开封一秘密地点。几十天后的 1969 年 11 月 12 日，

刘少奇病逝开封，去世时白发蓬乱二尺长，嘴和鼻子都变了形，手中仍紧握着那个塑料瓶子。

文革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后者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领导的整人兼造神运动。刘因整人和神化毛泽东而坐上了党内第二把交椅。国共战争中，刘少奇领导了解放区土改运动，暴力剥夺地主，发指示将地主全家不给出路地“扫地出门”，主持了大规模屠杀地主。建国后，他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了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瞒产，民主革命补课等一系列迫害运动，害死人千万计。大饥荒后，毛泽东立即掀起了另一波神化自己的运动，号召国人像雷锋那样效忠自己。刘少奇抛弃自己主持推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决议加入了神化毛泽东运动，题词号召学雷锋，支持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并挂帅主持了四清运动，运用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整人套路，逼供，围攻，关押，搜集杜撰黑材料，动员家属施压，人格污辱，精神折磨，造成了另一波自杀潮。他与毛泽东共同推动的造神运动和阶级斗争宣传为文革运动准备了条件。毛泽东以政变手段发动文革时，最有可能阻止文革灾难的刘少奇选择了追随和参与，出面主持了发动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出面领导初期文革的五十多天中，他沿用过去整人的套路，要求再抓出一大批右派。他没有想到，多年来追随毛泽东的生存法则在文革中不灵了，自己成了整肃对象。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时，他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册子，想借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结果当然无效。建国时，中共废除了旧法，在颁布《共同纲领》、宪法的同时践踏这些大法。在党一次次的血腥屠杀和残酷整肃运动中，刘少奇没有想到维护宪法尊严，没有想到维护他人的生命权，一次次支持并领导了迫害运动，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当自己惨遭迫害时，他想到了宪法。他应当知道，当宪法不能保护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时，也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发明腰斩刑的秦相李斯在自己被腰斩前承认这一刑罚太过残酷。共产党人自认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与生命。当他们自己惨遭迫害时，不知会否承认，自己的党制造阶级斗争，发动迫害运动太过残酷。

崇毛颠狂

文革中，崇毛运动愈演愈烈，在中共召开九大时登峰造极，出现了全民配戴毛泽东像章，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效忠仪式。“忠字舞”表演形式为随《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崇毛乐曲起舞，模仿周恩来导演的《东方红》舞蹈史诗中和“文革”初期“造反舞”中的动作，以仰望，手捧红书，拍胸口等运作表示崇毛，以跺脚，狠踩、刺杀等动作表示阶级斗争与仇恨。“早请示晚汇报”的意思是每天早上向毛请示，每晚向毛汇报，仪式通常为，单位全体面向毛像，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颂歌，唱完颂歌再宣读一段毛泽东语录，有领读者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为门行崇毛仪式的“忠字室”。崇毛高潮中，一些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多至每天四次，甚至在食堂饭前还来，有狂热者还举行家庭内的“早请示，晚汇报”。

在“五七干校”，学员们在“晚汇报”的仪式后还要写当天总结。亲历者回忆写道：“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毛主席语录。”[13]

这时的学生不正经读书，上学不背书包，只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灌输忠于毛泽东、共产党，以及革命、斗争、批判的一套党化观念为主。中共的灌输从小学生作起。翻开当时针对小学生的《红小兵》期刊，内容也“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敢于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拿起笔做刀枪，狠狠批判”等等，外加扼杀童真、善良，教唆犯罪的图片。

崇毛活动还泛滥到了外交场合。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时碰上了“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举手挥动“小红书”配合，天津外办的军代表要求大使也向毛像三鞠躬，大使不情愿，翻译解释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军代表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14]

“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事件”是崇毛颠狂中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后，两千多名华南各大学的毕业生和干部来到潮汕沿海的牛田洋农场作“五七战士”。牛田洋的宗旨为是将农场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农场通过各种歌颂会、忆比会、讲用会、田头“斗私批修”会以及各种学习班大力推动崇毛运动，设立了“忠字台”（安放毛泽东的石膏像及“红宝书”），领先全国推行“早敬”（早请示）、“晚敬”（晚汇报）仪式，要求“五七战士”们早晚集体在前排队致敬，诵读念“毛主席语录”，每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称“天天读”，其情景比当年国民党的纪念周更为狂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和思想灌输下，年轻战士和学生崇毛到了走火入魔程度。

1969年7月28日，台风登陆汕头，巨浪涌入海堤。在不可抗拒的台风面前，牛田洋农场当局不是组织官兵和学生避险，而是以“人在大堤在”的口号鼓动组织人墙保护海堤和稻田。青年们手捧毛像，高呼“毛主席万岁”跳入海中挡海浪。结果，除少数被海浪冲到山上的幸运者外全部葬身大海。台风过后，农场召开了庆功大会，将事件吹嘘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总结中特别说明有学生为抢救“毛主席像”牺牲。当局控制报纸按照报喜不报忧的规则，掩盖了青年们死伤无数的惨剧，报导事件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宣传“北有珍宝岛，南有牛田洋”，称青年们在台风中放出了“精神原子弹”。[15]

崇毛颠狂中，绝大多数人明知荒诞而被迫随大流，以避免成为整肃对象。当时，不慎打碎“毛主席石膏像”可能成为反革命事件，书写笔误可能成为“反动标语”事件。不少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恐怖经历：每家必摆的“毛主席石膏像”不慎被打碎，一家人为如何处理犯难，怕碎片丢进垃圾堆或藏在家里被人发现引来灾祸，只得半夜三更偷偷埋到偏僻处，很多人因此被举报挨整，甚至获罪。当时的国人不知道，崇毛运动是毛在延安自己推动起来的。1950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拟订的五一节口号中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口号。[16] 大饥荒中，他授意林彪、周恩来分别在军政两方面推动崇拜自己的运动。饥荒刚过，他发动了学雷锋运动，要求国人向雷锋那样崇拜、效忠自己。文革中，他在警卫部队介绍北京市针织总厂推出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崇拜仪式的报告上批示：“看过，很好”，指示转发，[17] 亲自推广了“早请示，晚汇报”效忠仪式。

崇毛运动还是当局草芥人民的借口。1970年1月5日1时，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中共中央于7日给灾区当局发出慰问电说：“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帮助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测知地震的一些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提供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文革与备战中，传媒按照“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将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情况封锁。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新华社消息。这篇不足百字的报导隐瞒地震的具体地点，谎报震级，不提灾情，不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同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根据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18] 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公粮照样上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全国各

地对云南地震大灾的所谓援助不是灾民最需要的食品、药品，而竟然是十几万册的《毛泽东语录》小红书、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由于当局见死不救，无数灾民在无药无粮无水无衣的寒冬中死去。当局的所谓救灾行动主要是出动军队、军车将遇难者尸体运到附近的山沟掩埋。在地震后的《云南日报》上，在 1 月 9 日发了简讯后就再也没有了关于灾情和救灾的报导，在边角位置与震灾相关报导也不提灾情和灾民，而报导称：“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要求受灾民众“用毛泽东思想”抗灾的同时，中共禁止新闻记者进入灾区，将一场大地震灾难掩盖，并且成功掩盖了三十年。

有独裁就有崇拜运动，最恐怖的独裁造就最颠狂的崇拜。文革中国的崇毛颠狂是苏俄崇斯大林颠狂的再现。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中写道：“请看当时常见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和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疼了，手臂已经麻木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之愚蠢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会场里有内务部人员在鼓掌时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

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主席台上的人明知道这个局面之虚假，明知道大家在走向绝境而继续鼓掌！九分钟！十分钟！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面面相觑，同时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继续鼓掌。……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掌声停止了，大家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当夜，造纸厂厂长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当他在侦查笔录上签名后，侦查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19]

苏共崇拜斯大林运动的背后是恐怖，中共崇拜毛泽东运动的背后同样是恐怖。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王容芬感到天安门广场上举着“红宝书”欢呼的狂热场面是当年纳粹向希特勒行举手礼场面的再现，决定冒死讲出真话。她寄出了致毛泽东的“退团信”，在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声明“退出共青团”，随后服毒自杀。获救后，她被当局关进监狱十三年。不仅反对个人崇拜者受到迫害，积极推动崇拜运动者也难逃迫害。崇毛运动中，颂扬毛泽东的歌曲唱遍全国，然而红歌作者们却大都惨遭迫害。谱写了《浏阳河》，颂扬“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的唐璧光成了右派，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出来又继续管制；国歌词作者田汉被关押秦城监狱，被逼喝尿，冤死狱中；《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遭到批斗；创作《游击队员之歌》、改编《东方红》的贺绿汀被逼学狗爬，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我们走在大路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作者李劫夫，被迫害惨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文革之初获毛接见，几个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才出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作者瞿希贤文革中长期坐牢。劫后余生的瞿希贤有所反思，表示希望人们不要于唱她的红歌作品。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建国以来，毛泽东不停地制造阶级斗争，先后发动了土改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制造出无数的阶级敌人，无数的整肃与屠杀。四清运动没有结束，他又发动了文革，制造了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武斗中，他继续制造阶级斗争，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0] 这里，他所称的“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包括了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

1968年中，毛泽东在全国实行军管的同时，发动了另一场整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运动、清阶运动），要求在各地“军管会”抓出暗藏的国民党、阶级敌人。在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在主持发布的中共中央全会公报中号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发动运动号召的同时，毛泽东想制定出一套运动样板，派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清华、北大，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指示8341“军管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理出抓“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的经验。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是“六厂二校”“清队”运动的代表。以下几例冤案反映了该厂“清队”的真相。铸工车间工人康长解放前曾替国民党员刘某

通知人开会，“清队”中，被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嫌疑“办学习班”审查，在逼供压力下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被全家遣送农村。康长找军宣队申诉被拒之不见，愤而与军代表动起拳脚，被以“阶级报复”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其他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王敬贤是日本特务”的口供，认定厂内王敬贤就是易县的王敬贤，将王隔离“办学习班”，并派人向王的家人施压“政策攻心”。王在厂里家里的双重压力下自杀；军代表风闻二七厂曾有过“国民党戡乱救国潜伏小组”，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为突破口，对和林采取车轮战审讯，三班轮流“熬鹰”不让睡觉。和被迫承认是特务，并检举了一百多特务。“军宣队”采取同样手段，外加用刑，诬陷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清队”运动仅在二七厂就造成 20 人自杀，整出 100 多“反革命”（在 1978 年经铁道部工作组调查证实全是冤案）。[21]

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革委会将“清队”运动升级，大抓所谓漏网地富反坏、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同时残酷迫害响应号召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地方提出了“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等极端口号，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纷纷建立起了名为“群众专政”的“私设公堂”和名为“牛棚”的私设监狱。按照中共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的套路，各地都采取了隔离（关牛棚），攻心，疲劳轰炸，捕风捉影，屈打成招等手段。一篇纪实文章披露“群众专政”情况道：“1968 年 7 月，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在街区抓走了两百多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喝，遭受毒打，一位老人当场倒毙。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其他人则押送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我父亲是我和弟弟背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说：‘过去说地狱有十八层，我这回经历了十九层，有的人还在我下面！’从 1968 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总有人被五花大绑、

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示划清界线。”[22]

一张当时判决书的照片显示了“清队”运动大量死刑、有期徒刑判决之随意：

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宁波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68 军管刑字第 91 号

案由：反革命

罪犯：孙礼桐，又名仲慎、陀罗，男，59 岁，浙江省奉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捕前系市人民银行东门办事处办事员，家住本市志兰巷 14 号。

本案业经审理完结，查明：

罪犯孙礼桐系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解放后仍不接受改造，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孙犯不甘心死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公开跳了出来，自 1966 年以来，孙犯不仅记载了大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吹捧美帝等反动日记，并公开咒骂我无产阶级造反派。今年 2 月 18 日中央关于冻结 10 种坏人储蓄存款通知下达后，孙犯不但拒绝登记存款 1600 余元，而且向资产阶级分子陈渭滨等通风报讯，出谋划策，不要登记不记名的存款金额，进行蓄意的破坏活动，更严重的竟多次恶毒的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并用去头除尾手段，篡改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实行其反革命复辟。

综上所述，罪犯孙礼桐系右派分子，公开的疯狂地攻击和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之精神，特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孙礼桐有期徒刑 10 年，刑期自 1968 年 6 月 6 日至 1978 年 6 月 5 日止。

1968 年 11 月 20 日 公章

内蒙的“清队”运动以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为主要内容。1925 年 10 月，蒙人在张家口成立了以实现蒙古人自治为宗旨的内人党。该党后因党员骨干被共产国际拉去加入中共而解散。1967 年，毛泽东调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到内蒙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指示在内蒙开展阶级斗争。滕到任后发动了肃内人党运动，指挥各地遍设牢房和刑讯室，实施的酷刑包括：站凳子作“喷气式”、连轴转审问、钉竹签、揪头发、火炉烤（有人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老虎凳、灌废机油、吊打、电击、割耳朵、砍臂、断腿、逼迫受审人乱伦等几十种，运动迫害人数达 80 万人，害死蒙人超过 5 万，致伤残无数，[23] 其中在 120 多户人家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就整死了 14 人，拷打致残 16 人。[24]

江西的“清队”运动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运动”为主要内容。运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鼓励基层不经立案，不要证据，不经审批地放手杀人。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声言：“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1968 年 9 月 22 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要求以“三查”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后，律阳公社立即杀了七人。在从省到县各级政府的鼓励下，公社、大队干部以“现行反革命”、“四类分子”等随意罪名放手杀人，兴国县杀了 270 多人，瑞金县杀死了 300 多人，于都县杀了 500 多人。[25]

云南的“清队”运动中，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声言“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当局在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人的布告，打死

了人补上告示就了事，刑讯、逼供、监禁迫害了 30 多万人，害死了 37000 多人。[26]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指示，“清队”运动以“抓国民党”为主要内容。在邱县，“革命委员会”和造反组织“三代会”（工人、农民、学生代表会）成立了 8 个专政组，30 个审讯室。“三代会”从县志上关于“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局委员”的记载入手，对七十多岁的刘雷酷刑折磨，迫刘承认和前县委书记儿子都是国民党后还是将刘打死，将刘的尸体被浸泡防腐液中，将刘的手指割下来用来按手印造假证据。随后，“三代会”再抓了八位县干部酷刑逼供，将县委副书记史明奎打死，其他几位屈打成招，咬出了两百多国民党员，接着再抓再刑再招，如此持续一年，迫害了几万人，抓出近四千所谓国民党员，将其中七百多人酷刑折磨死，一千三百多人折磨致伤残，另外抄家五百多户，将邱县祸害成了“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的人间地狱。邯郸地区其它县的“清队”和“抓国民党”运动情况与邱县类似。磁全县革委会制造冤案 932 起，迫害万人，害死 288 人；[27] 曲周县革委会迫害 3 万多人，害死 360 人，害残 559 人，抄家 1447 户；[28] 馆陶县革委会在“清队”运动中害死 625 人，致残 990 人，抄家 1192 户，揪斗毒打 5500 余人；[29] 大名县革委会在“清队”中害死 197 人。[30] 河北“清队运动”中的酷刑有老虎凳、冻晒刑、点天灯、电刑、剪手指脚趾、屎尿刑（强迫吃屎、喝尿、吃蛆）、割肉剔骨、性虐刑（逼男女受害人表演性交、互相蹂躏、同寝同厕）等四百多种。[31]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给河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年运动制造的冤案，平反进行了二十多年。六十年前，袁世凯督直，河北乡村到处兴学，举办自治讲习所，选拔正人君子培养乡村自治和农业发展骨干；民国时，乡绅领导乡村，注重道德规范，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从推动乡村中的文化建设入手探索改良的道路；日军占领时期，河北傀儡政府成立新民会，开展新民运动，其主要内容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

的使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巡回图书馆等等公益活动。而在文革中，河北成了人间地狱，发生了如此令人发指的惨案和如此残酷、下流的刑罚。河北的“清队”运动如此，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例如，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运动中服安眠药自杀后，军管会头目带领造反派来到严家，不是送院抢救，而对口吐白沫的严凤英现场批斗会直到严死去，再当众将严的遗体扒光开膛，以查“国民党特务工具”为名满足兽欲。从土改运动、“反瞒产”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清”，到“清队”运动，中共创造出了登峰造极的下流手段。这些运动说明，暴力革命带来灾难，共产革命带来空前的灾难。

“清队”运动是一场“翻烙饼”式的整肃运动。文革初期残酷迫害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们在“清队”运动中被大批整肃。“清队”运动还是一场镇压志士的运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工程师巫炳源、王永增因在街头张贴《向北方》传单而被革命委员会以“向苏修的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在清队运动中被处死刑。宣判时，巫炳源大喊：“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就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中直到刑场枪毙再也没有睁开眼睛。[32] 记者李振盛出于道义责任冒险用镜头记录了《向北方》案从公审到枪毙的全过程，成为那场运动难得的影像记录。巫炳源紧闭双眼赴死的照片可称二十世纪中国最震撼人的照片之一。这位就义者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对“清队”运动和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在“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验”基础上，8341 部队整理出了一套以“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为要点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经验”。8341 部队将这套根据怀疑、揭发定罪的“清队”经验汇报给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援引 8341 部队的“清队”经验，声称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称“工厂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33] 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多元，组党结社自由。按理，

党派斗争不过是政党间不同理念、主张之争。清末、民国，党派之争已经是议院中的投票之争。随着革命被引入中国，议院的党派之争变成了黑道暗杀和战场屠杀。国民政府时代，党派之争到战败投降，通电下野为止。而在新中国，在没有人公开申明是对立党的情况下，中共发动“清队”运动，捕风捉影、严刑逼供地挖对立的党人，将人整到致死致残。在共产革命引入中国之前，人们处于哪一阶层，参加过哪一党派、在哪一届政府中任过职就象穿过什么衣服一样无人追究。而在新中国，曾经参加对立党派，曾在旧政府任职，曾受旧政府雇佣都成了不赦之罪，毛泽东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求无中生有地挖出国民党、内人党，残酷迫害与这些党派有牵连者。他没有说的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人，他自己该当何罪。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反人类思想和毛时代的写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文革造反运动是出于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权力斗争目的的话，在刘下台后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不再出于权力斗争目的，而毛泽东为满足整人嗜好而制造出来的大型游戏。古代君王中有怪僻者不少，有好粉墨登场演戏者，有好舍身佛门者，而毛泽东以整人为乐，要求国人不停地互相迫害、互相残杀。他不能容忍和平与安宁。在挑起全国武斗，害死几百万人之后，他发动“清队”运动，再迫害人 3000 万，害死人 50 万。[32]

文革后，一位死难者遗孀控诉道：在 1978 年对清队运动平反中，我丈夫单位通知我去领取 300 元抚恤金，但不作任何解释。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我拒绝去领。我所在单位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应该感谢党，把你丈夫的问题搞清楚了”。[34] 犯下罪行后不作谢罪，要求死难者家属感谢，这就是革命党。不仅文革时的领导如此，此后的历届中共新领导层都拒绝为前任罪行谢罪，仿佛罪恶没有发生过。

“一打三反运动”

“大疏散”时，毛泽东、林彪都南下躲避，在京主持疏散和挖洞的周恩来一展身手，发动了一场杀政治犯运动。撤离时杀掉不信任者和潜在敌对者，这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传统。1920年，青年周恩来刚到法国就被共产国际选中为培养对象，成为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职业革命家，被安排到英国、德国和苏俄接受系统的特工、情报培训。培训内容中包括对变节者或变节嫌疑者采取极端手段处置。1931年，周遵行了培训指引，率特科红队将变节领袖顾顺章一家二十口灭门，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1934年，他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主持了对肃反关押者的屠杀。“大疏散”中，周恩来再次按照当年共产国际的培训行事，决定将关押中的一大批政治犯杀掉。1970年初，他亲自批准杀害了遇罗克、王佩英等二十位所谓反革命分子，然后起草了在全国开展杀反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对杀人从来不嫌多，立即批准了周的杀人请示。1月底，周恩来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 三号文件，一三一指示）。该指示称：“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随后，周恩来再发出了两个作为陪衬的文件：《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共中央 1970 第五号、第六号文件）。周在后两联袂文件中声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通过上述三文件，周恩来、毛泽东联手发动了以备战和疏散名义大杀“反革命”的新一轮镇反运动。

与建国之初毛泽东起草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一样，“一打三反”文件也鼓励处决，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按照“一打三反”文件要求，各地当局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每次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随意罪名处决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被处决者中的大多数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是文革中为正义献身的代表人物。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为发表了反对以“出身”、“成分”迫害人的《出身论》等文章而获罪。建国后，中共划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子女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划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子女为“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其中，所谓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加入中共为标准，投降中共的军人都不能算革命军人。中共将这种出身歧视日益强化，以档案制度相配合，对指定的阶级及其子女实施长期迫害。在长期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的教唆下，红卫兵在文革中成了迫害狂，残酷地迫害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和他们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辱骂所谓“出身不好”者为“狗崽子”。北京大兴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宾阳大屠杀兼吃人等事件是这种迫害的其极端案例。上述屠杀中，“黑五类”、“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甚至被不分男女老幼地灭门。在反人类的红卫兵运动中，遇罗克发出了维护人权的呐喊，撰文谴责出身歧视制度。他在《出身论》一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在《谈鸿沟》一文中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 1964 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

以结束全国性灾难”。同时，她以要求退党的行动谴责中共制造大饥荒灾难。这些要求在五十年后的中国都会让人身败名裂，何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1965年7月，王佩英被关进了北京安定精神病院。被关押三年后，她在文革中被“揪回”原单位批斗。在批斗会上，她多次呼喊“打倒毛泽东”口号。在狱中，犯人被要求每天早晚两次跪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罪晚认罪”。王佩英拒绝下跪请罪，为此反复遭受毒打。在残酷批斗中，当局在她嘴里塞进石头以阻止她呼喊，造成她下颌脱臼。劳改中，她继续散发呼吁正义的纸条，因此再遭毒打。有人劝她别写了。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决心殉道，宁死不跪，宁死不屈。在与遇罗克一起被押赴刑场途中，刽子手们为防王佩英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途中。[35] 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文件，审判记录，剥夺了他们上诉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留遗言的权利。应当说，这是周恩来按照共产国际培训的作法。共产党有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列宁、斯大林时代都曾这样作。

与遇罗克、王佩英一起为正义献身的“思想犯”还有北大学生顾文选、黄立众和沈元。肃反运动中，正在杭州公安局工作的顾文选见证了大批无辜者受到牵连迫害，替人鸣不平，结果也被整肃，受到拷打，在随后纠“肃反扩大化”，顾获释，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1957年，他响应中共“大鸣大放”、“帮助整风”号召，在控诉会上朗诵诗句“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讲述个人遭遇，抨击当局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三害”。发言被北大“百花学社”以《一个人的遭遇》之名刊出，他因此次发言获罪，被当局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改。文革中，右派劳改犯受到残酷打击。在被打死生命危险中，他冒死外逃，到了苏联，遭苏联当局装入麻袋，遣返回来。“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当局以“反革命”罪杀害。[36]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因加入“大鸣大放”，讲述农民生活困苦，黄被北大开除团籍。1960年，黄因坚持

观点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安徽无为县家乡。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因道路被封锁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杀害。[37] 沈元，1955年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6年2月在学校阅览室里读到美国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1956年2月16、17日）上全文刊载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其中关于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七十万人的内容大为吃惊，于是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他质疑，为何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他认为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但没有指出制度问题。1957年春，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鼓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沈元加入鸣放，贴出墙报《准风月谈》，批评党支部压制鸣放。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19岁的大三学生沈元被因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改。文革中，沈元遭到批斗，化妆成黑人进入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事败被捕。“一打三反”运动中，沈元被中共以“投敌叛国反革命罪”枪决。

如同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一样，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也是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地处秦岭的宁陕县人口不足四万，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已拉网式整肃地、富、反、坏、右分子，关的关，开除的开除。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县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宣布破获联系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他们是一批宁东林业局的森林工人和当地农民，年龄都在二十多岁。其中的张学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自制一部矿石半导体收音机，与其它几个人一起收听广播，被以收听境外广播，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被捕。大会宣布这几个人思想反动，执行死刑。宣判完毕，人犯立即被拉到宁陕中学后面河滩边，一阵乱枪打死。我当时被学校组织到现场观看。一个月后，县军管会

又宣布破获了一起历史反革命案，在宁陕中学礼堂召开了公判大会。我与其它几个同学透过礼堂窗户看到，十几个犯人全是农民，个个穿着破衣烂衫，反手五花大绑，在冷风之中浑身颤抖，缩在墙角。公判大会开后，九人被枪毙。文革中有个习惯，被打死枪毙的犯人，不允许家属当场收尸，要展示一天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随后就地草率掩埋。一般犯人家属收尸时都是在几星期后深夜悄悄挖出来运回老家去。一个多月后，县军管会再枪毙了第三批六个反革命分子。在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杀、关、管 356 人，枪决几十人。因抓捕的犯人过多，县里唯一一个监狱人满为患，只好抓了人快判刑，送往安康地区监狱。据我的记忆，在抓捕及枪决的人中没有县机关、学校及所属各部门的人员，被枪毙、判刑者全是没有文化的农民。1970 年是宁陕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杀人最多，关押人最多的一年，也是当地老百姓经历最恐怖，最血腥的一年。” [38]

与镇反运动中一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各县军管会也必须杀人以向上级交差，完成指标。如上述篇纪实文字透露，很多地方抓不到思想言论犯，当局就抓一些农民处决向上级交差。运动中，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39] 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处决反革命犯的场面通常是：死刑犯们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的大牌子，宣判完毕，被推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沿途，反革命死刑犯们惨不忍睹，通常嘴中被塞了木头、竹片之物以防止喊冤，在围观的人群面前示众，在最后关头有口无声。死刑的执行，通常不是齐射，而是一个一个的排号射杀，刑事犯们被先处决，因思想言论获罪的反革命犯被排在刑事犯之后，而“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安排到最后，让他们承受更多的心理折磨。

与“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一样，“一打三反”运动也导致了自杀潮。例如，青海贵德县，14 人自杀，宝山县 41 自杀，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被批斗的 180 人中 4 人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 238 起，死亡 188 人，河池地区

169 人自杀，山东沂水县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被批斗的 173 人中 3 人自杀。[40]

“一打三反”运动中，成千上万遇罗克、王佩英、顾文选、黄立众、沈元那样的思想先驱被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他们的故事那个时代最英勇的故事。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犯绝大多数是暴政中的抗争者，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主要是谴责新中国以来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这些抗争者之外，还有大批的无辜被害者是当局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的凑数冤魂。

“清查五一六运动”

利用造反派达到砸烂政府权力机构后，毛泽东派军队接管学校机关，制止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激进的红卫兵记得毛泽东三番五次鼓动他们造反，认为是主持局面的周恩来不让他们造反。1967 年 5 月 16 日，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之日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组织，贴出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宣言，声言要继续红卫兵运动。随后，“五一六”秘密组织扩展到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在北京散发了《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传单。公安机关迅速抓捕了“五一六”秘密组织成员，摧毁了这一小组织。

1970 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决定开展杀反对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决定以清查“五一六”秘密组织为借口，对继续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展开整肃。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等人为成员的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发动了整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宣布的“五一六分子”认定标准为“反党乱军”，即：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和军队。这一罪名正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号召的内容。红卫兵“五一六组织”的诉求只是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继续造反而已。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同反右运动中先鼓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以反党罪名整肃右派一样，在文革中先鼓动红卫兵、造反派们去向各级党委、政府里、军队里当权派的造反，然后再以“反党乱军”罪名将他们整肃。《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还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这实际是要求各地以随意罪名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扩大整肃规模。

主持各地“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军队干部中，不少人在文革初期遭到红卫兵、造反派批斗，然后以“三结合”名义重新掌权。“清查五一六运动”给他们送来了报复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机会。“清查五一六运动”专案组组长吴德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整肃理由代表了老干部们的想法：“其一，通过清查五一六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把造反起家的革委会成员清洗出去，首先要把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打下去；其二，他们迫害在先，现在就要有个名义反击，清理五一六正是借口；其三，认定反对革委会者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通过运动整肃他们”。[40] 在江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利用“清查五一六”的机会，“对造反派赶尽杀绝，乘机排除军队中的异己，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主任”。[41] 在他领导下，江苏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从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宣布结束，历时四年多。全市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迫害致死者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

被关进监狱，5 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1979 年，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42] “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 40%以上。”[43] “如此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杠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 27 人。”[44]

南京“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显示出全国的整肃规模。运动中，超过 1000 万人受到迫害，超过 300 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数以十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及无辜者被迫害致死致残，逼死逼疯。各地、各单位的两派组织也乘机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所有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均难逃“五一六”分子罪名，多数造反派领袖被以“五·一六分子”逮捕、关押、刑讯、“关牛棚”，受到残酷整肃，被毛泽东抛出安抚军队将领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林彪整肃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人也被以“五一六分子”的新罪名遭到整肃。

“清查五一六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发动领导文革中的三大迫害运动，是当年延安“抢救运动”、“镇反运动”、“四清运动”的延续。三运动手段同样残酷，定罪同样无中生有，严刑逼供，从立案到处置完全随意，迫害无案卷可查。三运动共迫害无辜数千万，害死人数百万。其中，“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中共“翻烙饼式”整肃的典型。一些运动初期的主持者，专案人员在运动扩大后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例如，身为中共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组长的陈伯达后来被定为了“五·一六”分子。九

一三事件后，林彪被称为“五一六”分子的后台，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又被指为是“五一六”的后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撤销了五·一六’专案组，所有专案材料移交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接管。[45] 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文革冤假错案过程中，文革中受冲击老干部基本都得到平反，但“清查五一六运动”迫害红卫兵、造反派的案件基本没有得到平反。其背后的原因是，文革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们对曾经迫害他们的红卫兵、造反派普遍怀有报复心理，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是迫害者，受迫害罪有应得。这些元老们不愿承认，青年们是响应他们参与发布的《五一六通知》起来造反的，他们实际陷害了这些青年。

“清查五一六运动”反映了革命中你迫害我，我迫害你的轮回。在这种轮回迫害中没有正义，也无所谓冤案。文革之初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迫害红卫兵、造反派是两代革命者。两代革命者都自认有权迫害别人，剥夺别人，甚至杀害别人。革命生涯就是迫害别人的生涯，难道不是吗？打土豪，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红卫兵、造反派迫害“走资派”，“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走资派”迫害红卫兵、造反派等等，无非革命迫害的轮回。所以，革命者们遭受迫害“不应有恨”。

九届二中全会

建国之初，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因习惯白天睡觉，起居无常，喜欢随时出行，隐居各地而无力履行国家主席的行政外交职责，只好同意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职。大饥荒后，刘少奇主持救灾声望上升，党内干部开始流行说“遵照刘主席指示”。毛泽东不能容忍两主席并列，开始盘算整肃刘少奇。刘少奇惨死后，毛泽东、周恩来封锁了刘的死讯。

国家主席在任上消失，毛泽东不得不同意重开人大向国人交待国家主席的问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小组。要向国人交待国家主席之事，就绕不开接任的

问题。按理，由新党章规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副主席林彪接替刘少奇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但是，在刘少奇死后，毛泽东立即将二号人物林彪当作了假想敌，开始盘算整肃林彪，决心不让两主席并列局面重演。自己不当，又不想让别人当，毛泽东想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主意。

197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讨论筹备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由于理由摆不上台面，他完全不说明对国家体制作如此重大的变更理由何在。林彪私下对毛泽东此议表示不满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求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议保留宪法第二章关于“国家主席”的第二节。于是，围绕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林斗起了法。

在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提议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以此方式拒绝取消国家主席职位。林彪的提议获得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内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会后，毛泽东在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他以否决政治局会议的多数意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方式拒绝林彪出任国家主席。在随后的“五一”节观礼台上，林、毛互不理睬，使摄影师无法按惯例拍摄二人交谈的照片，《人民日报》只好假造了一张两亲密战友交谈的照片刊出。

中共高层无人敢于询问毛泽东变更国体理由何在，但当年因所谓顶撞事件而长期被剥夺教书权利的梁漱溟仍然敢言，在重开的政协会上提出两条意见：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林彪为接班人写入宪法不妥；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应通过宪法程序来选。梁氏的意见在政协会上语惊四座，但这些话放在清末、民国却是任何议员都会说的常识，只是由于长期党国体制和整肃运动使人们丧失了说出常识的勇气。

8月，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庐山前，林彪向毛泽东打招呼，要在会上批评张春桥。林彪批张不仅要发泄自己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被弃用的不满，更因为他反对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调，反对毛泽东继续文革。毛泽东知道林对报告稿被弃用有怨气，默认了林的要求，让林寻张出气。在开幕式大会上，林彪，陈伯达联手吹捧毛泽东为“超天才”，高调拥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然后抨击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分组小会讨论林彪讲话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对张春桥展开了围攻。多数代表们支持设国家主席，并拥护林彪任国家主席，认为由党章中写明的接班人林彪接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连毛泽东长期以来的亲信康生也明确表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应由林彪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见到各组的会议记录后极为不满，认为林彪让他兼任国家主席是与他过不去，林彪批张是要否定文革，于是再度使用他的权力斗争法宝，下令休会。

复会时，毛泽东下令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回有陈伯达发言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文中将陈支持设国家主席的讲话指为“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动之势”，将陈、林的讲话获多数代表支持称为“欺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并指陈为“不懂马列的政治骗子”。小组发言简报发出去再被收回显示出独裁体制下的会议之无聊。毛泽东有一整套操纵会议的办法，包括：分组开会，指派亲信任分组会的组长，禁止会者记录，指定秘书记录，会议记录保密，只有他有权看全部记录，他有权以删改会议记录，与会者见到的简报不是会议的真实进程，而是毛泽东允许大家知道的进程。这样的会议本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此次在庐山，毛泽东再有发明，自己审定修改的会议简报发给各组后又下令收回，撤销他不喜欢的会议发言。这样的会议其实不如直接印发他的决定。

林彪抨击张春桥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在天下大乱了四年后再鼓吹“继续革命”是居心不良。而毛泽东打击陈伯达则完全无理，于情于理都不通。从在延安任毛泽东秘书开始，陈伯达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整风中参与围攻王实味，在大跃进运动之初发表一系列文章歌颂“三面红旗”，成为毛的爱将，在文革之初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进入核心领导层，为毛起草了发动文革的决议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造反文章。三十年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多出自陈伯达的手笔。只因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经济，支持“设国家主席”之议，陈被毛泽东用作了打击林彪的靶子。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动”之言就不通，指责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则更加不通。经常鼓吹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相反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而陈伯达从留苏开始主要在研究马列理论，可以说，除毛泽东之外，中共高层和理论家中没有人敢说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陈不仅懂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作者，单独撰写、参与撰写和修改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不少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46]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毛泽东整肃亲信时从不因多年鞍前马后而手下留情，对陈伯达也是如此。庐山会后，他下令将陈伯达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指定周恩来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指定叶剑英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将陈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在全国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宣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或者说没有很好的合作过”。毛对陈伯达没有像对杨成武、邓小平等人那样，关一段时间放出来起用，而是致死不放陈出狱。吴法宪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於陈伯达，四清中的《廿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

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与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既然是这样，那为什麼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将陈关进监狱，将陈说成“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让同样追随三十年的康生寒了心。康生在会上也明确支持了林彪设国家主席之议，感到陈伯达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下庐山后就称病不再参加开会，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换了别人，甩手不干就是反党，也会被关进监狱，或神秘消失。可是康生有本钱甩手不干。从延安整风到这次庐山会议，他为毛泽东操办的机密太多了。他了解刘志丹之死、项英之死、高岗之死，他将乡亲江青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撮合了毛江结合，他主持推出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帮助毛泽东销毁了众多见不得光的文件证据，因此被年长五岁的毛泽东称为“康老”。毛泽东知道斯大林之死与贝利亚有关的传闻，知道这位“中国的贝利亚”的厉害，感到康在自己身边可能作了安排，因此默认康生甩手不干，在中共十大时仍给康挂名副主席。追随毛泽东三十年的康生在陈伯达入狱时果断淡出政坛无疑是明智决定。或许，他在用退出的行动表明他也主张结束文革。

批陈整风运动

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派周恩来主持“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4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在会上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五位林彪亲信“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将运

动矛头直指林彪。压力之下，林彪的五亲信都循党内权斗规则，写书面检讨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毛泽东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 1931 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47] 显然，毛泽东是在将自己煽动“反党乱军，挑动武斗”嫁祸于陈。谁都知道，一介文人陈伯达与姚文元一样，只是起草文章的笔杆子，并无可能“乱军”，“乱军”的动员令来自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最能说明“批陈整风”运动之黑暗的是，毛泽东下令批判陈伯达，又不敢将陈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公之于众。毛很清楚，文革已经天怒人怨，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有几百万人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整肃、关押、枪毙或被逼自杀，再提造反不可能有人响应了，而林彪和陈伯达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会是人心所向，因此他既要批判陈伯达，又将陈起草的报告稿高度保密。被迫参加批判陈伯达的民众中有不少人猜到，陈伯达反对“继续革命”的报告中可能提出了结束文革的要求。

国人虽能猜到几分陈的主张，但不可能知道，林彪和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中提出的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主张所依据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说法。当时林彪问毛泽东文革搞多久，毛答打算搞三年。在 1968 年 10 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文革声称估计到 1969 年结束。谁知道到了 1969 年毛泽东不认账了，要求“继续革命”。林彪知道毛发动文革是要整肃刘少奇，认为刘死了总该结束文革了。他和国人都没想到，毛发动文革不光为整刘，还为了精神需求。在发动文革时的“黑话信”中，毛泽东清楚表明不想让天下太平，要求不停地斗。整死刘少奇后，毛的斗争欲望无止境，又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莫名其妙地要求挖出国民党人，以满足斗争嗜好。

随着林彪集团成员检讨，毛泽东、周恩来联手整肃林彪的形势明朗化。林彪以拒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消极抵制“批陈整风”运动，一如既往地拒作检讨。同时，他与高岗、彭德怀、彭真、刘少奇等人一样，抱侥幸心理，相信毛泽东会念多年追随手下留情。与高岗、刘少奇、彭真等人一样，林彪也几次寻求与毛泽东面谈，希望达成和解。被毛泽东整肃的高层们都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都知道毛泽东整肃别人时从不半途和解，但都相信毛会对自己手下留情。林彪同样判断失误。毛泽东不念林彪在历次整肃运动中的保驾之功，几次拒而不见，拒绝和解。在与林彪较量中，毛泽东军权在握，得周恩来支持，让林彪不知道行踪，同时对林彪集团成员的动向了如指掌，完全控制了局势。林彪这时才后悔自己掌军多年，一直推动军队效忠毛泽东，结果帮助毛泽东巩固了军权，自己却调动不了军队。

南巡打招呼

林彪之子林立果不相信会出现握手言欢的结局，拒绝束手待毙，准备采取行动推翻毛泽东的统治。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时，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虽得林彪支持，得吴法宪授以空军指挥权，但调动不了军队。毛泽东视军权为根本，抓住军队调动之权不放手，连林彪、吴法宪都无法调动空军，林立果所能调动的不过几架飞机而已。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秘密团队举行了“联合舰队”会议，制定出了以“武装起义”谐音为名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清楚林彪淡泊权力地位，但他担心林彪的虎子林立果，早就通过周恩来布下了眼线，对林立果的行动一清二楚。

1971年8月，毛泽东为布署清算林彪兼避险秘密南下。沿途，他召见各地军政大员，发表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

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等等。毛泽东不召开会议，不发中央文件，而以“打招呼”的方式要求大员们表态效忠是因为，如果召开党的会议，他难以向全党交待为何要打倒他自己树立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并且他对林彪“急于想当主席”，“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等等诬陷，不能在会上说，更不能当着林彪说。事实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中让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和要批评张春桥等内容事先均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不存在“突然袭击”。尽管毛泽东整肃林彪没有能摆上台面的理由，各地大员都是毛泽东所任命，经过了历次整肃运动，非常清楚权力斗争无所谓是非的道理，均对谁能胜出就支持谁的生存之道驾轻就熟，他们清楚毛泽东军权在握，全部表态效忠毛泽东，使林彪陷入绝境。

九一三事件

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后，林彪明白了与毛和解无望，后悔掌军以来净忙着为毛泽东树立权威而没有抓自己的军权。在毛泽东的清算面前，林彪这个副统帅无计可施，只好作被整死的准备，对部下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48] 1971年9月13日，民航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两小时后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九人，包括四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是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跑了”，向全军发布一级战备命令，下令将早已被严密监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逮捕监禁。随后，中共中央宣布林彪、叶群、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等一行“仓惶出逃”，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苏联“叛党叛国”。

九一三事件后，蒙古外交部抗议中国飞机侵犯领空，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答复“不可能”，故意拖延，实际是让驻蒙外交官放弃第一时间赶去失事现场收集资料、了解失事原因。直到苏联人、蒙古方面搜索、清理事故现场后，中共中央才于9月15日允许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等人去飞机失事

现场。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中国驻蒙外交机构只得对蒙方提出的侵犯领空抗议支吾搪塞，半个多月不给蒙古方面正式答复。按例，中国外交官应首先要求领回死难者遗体 and 遗物。但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外交官“保密”、“把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件”，向中方调查人员和蒙古方面隐瞒坠机死难者名单，实际不允许提出对尸骨、黑匣子和遗物等的要求，将真相对国人隐瞒。

邱会作后在回忆录中披露事件经过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49] 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 256 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50] 李德生回忆披露，毛泽东称林彪出逃摔死是最理想的结果。据军队作家舒云调查，当时的广州军区，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一无所知。

由于中国没有反对党监督，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报导、调查，当局公布的“九一三事件”所有情节都值得怀疑。关于林彪之死，民间流传有西山杀害说、[51] 坠机前机杀害说、[52] 导弹击落座机说、驾驶员潘景寅自杀殉职说 [53] 等等。有人说，最能证明林彪从出逃到坠机真相的是飞机的黑匣子，听听林彪在最后时刻说了什么就真相大白了。1992 年 11 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 1983 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 007 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了卢泰愚总统，使韩国民航机失事事件真相大白。对揭开“九一三事件”真相至关重要的 256 号飞机的黑匣子，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下令不要，毛、周之后的历届中共领导人也不要。中共不想

面对“九一三事件”真相或林彪最后的话。还有人猜测，周恩来可能对 256 号飞机的黑匣子作了预先处置。凡暴力革命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外是更心狠手辣者胜出，因此都需要隐瞒真相。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谜案都是革命党所为，“九一三事件”是革命党需要隐瞒真相的另一证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事件的脉络基本清楚：毛泽东决定置林彪于死地，与周恩来策划了事件，周恩来全程操办，在 256 号机升空后下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逼该机飞往国外，安排了坠毁。

在毛泽东的整肃面前，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彭真、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无一不是放弃论争，低头检讨，给自己扣帽子，而且绝大多数是写书面检讨，求毛泽东原谅。林彪是中共高层中的一个例外。他拒作检讨，拒绝屈服，留话“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林彪的最后主张是结束文革，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是有利国家人民的。但是，相比在建国后带给国家和人民灾难，林彪之善微不足道。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在饥荒已经蔓延十几省背景下，林彪不顾人民死活，为毛泽东的“反右倾”保驾，使饥荒扩大至饿死几千万人的规模；在大饥荒中，他在军队中推动崇毛运动，使毛泽东有恃无恐，继续横征暴敛并声明不怕农民造反；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提出“交学费”说，将毛泽东制造大饥荒罪责一笔勾销；在大饥荒后，他保证了军队效忠毛泽东，帮助毛泽东制造了越战、“三级建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灾难；1966 年，他代表军队高调支持发动文革，酿成了更大的灾难。在帮助毛泽东整死刘少奇的同时，林彪为自己掘了墓。在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争斗中，没有正义可言。虽然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揭露了诸多社会问题，但从林彪长期助毛为虐，不管百姓死活，为儿子全国选妃，在各地建行宫，林立果的所有活动都建立于特权之上等事实看，林彪父子政变成功也不会改变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也非百姓之福。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54]在全国展开了对林彪余党的大清洗。清洗中，被捕的政治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再次作检讨，与林彪撇清干系，以揭发林彪自保。当年国庆节，中共取消了天安门庆祝活动。12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声称陈伯达与林彪结盟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曾准备“篡党夺权”。在随后的一年中，千余名高级将领受到林彪事件牵连被清洗，连同株连者和家属，上万人被整肃。几年前奉毛泽东之命“支左”，主持各地革委会、主持“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的一大批军队将领从残酷迫害造反派的整人者沦为了被整者，受到残酷迫害。例如，黄永胜在狱中患金森症，行动不便，上厕所没人帮助，只能自己爬着去。邱会作的经历是共产党内“翻烙饼”式来回整肃的典型一例。当年，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从中央保卫局枪下死里逃生。文革初期，他被军内造反派连续批斗了四十多天，被斗到不省人事。造反派对他施行了八种刑罚，其中三种是：“向毛主席请罪”（弯腰低头，脖子上挂二十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向造反派下跪请罪”（脖子上挂大铁牌子）、“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同被批斗的赵尔陆被迫害致死时，邱会作写了小纸条设法传给了毛泽东、林彪。得林相救获释时，邱会作遍体鳞伤，剃着阴阳头。重掌总后勤部后，邱对军内造反派展开报复，实施同样残酷的迫害，提出了“狠斗、狠审、狠专”的三狠方针，主持对造反派实施了五十多种刑罚。其中包括：车轮战、低头弯腰罚站、坐高低凳、“打反骨”（棒打）、“吃元宵”（围殴）、摔劈柴、脖子上挂椅子、“捏羊蹄”（手指曲后猛砸，致使受审者痛得在地上打滚）、吊天棚、逼吃带粪馒头、逼自己打自己、逼喝脏水等等。在他领导下，解放军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残酷迫害了近五百人，将其中八人迫害致死。“九一三事件”后，邱会作再次沦为被迫害者，在秦城监狱遭受冻饿，衣不蔽体，被逼扒在地上写交待材料，受连累的老母亲被取消护理，活活饿死。[55]

林彪死后，帮毛泽东送林彪上不归路的周恩来的罪恶感和成为二号人物被毛泽东整肃的恐惧一齐涌上心头，铁石心肠的他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当

众痛哭失声。[57] 毛泽东也难逃内心煎熬，对林彪支持者大清洗没有让他增加安全感，反而更让他陷入军人政变恐惧中不能自拔，如同被冤魂缠住，常在睡梦中呼喊“林副主席”、“副统帅”惊醒。[56] 他拉新亲信整旧亲信的游戏玩到头了，他把党政军高层都得罪光了，没有人再愿意响应他的号召，甚至没有人愿意作他的亲信了，他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能走出林彪事件的阴影。作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常胜者，毛、周二人都无计逃脱内心惩罚，同时健康崩溃。

每一次以阴谋手段清洗对手，毛泽东都面临向全党和国人交待的难题，都需要编造出一些罪名再诬陷对手一次。“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宣称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失败，在叛逃苏联途中“自我爆炸”，称林彪曾发出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刺毛和武装政变的手令，同时还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部分内容和影印件，作为上述指控的证据。按中共中央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于林立果曾开会的建筑内的一个笔记本上。然而，直至文革后对林彪集团审判时，当局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对林彪“另立中央”、“搞政变”、“图谋刺杀毛泽东”等指控，也没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林彪、林立果有关。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事件后，“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不能再喊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崇毛仪式也为国人唾弃。当局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人的心声。其中抨击毛泽东的统治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

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他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他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他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上述抨击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疯狂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年走出毛泽东神话，开始怀疑文革和共产主义信仰。可以说，《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崇毛运动划上了句号，是文革中的启蒙书，是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第 52 章 文革外交与输出革命

“毛主义”输出革命

策划朝鲜战争时，毛泽东以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批准他为亚洲共产党领袖。从此，毛泽东不顾国力，大洒金钱扶植亚洲各国的共产党，要求他们实行暴力土改，武装暴动，“农村包围城市”。如同毛泽东服从斯大林只为苏联的金钱军火扶植一样，亚洲各国共产党也并不会真心效忠毛泽东，而是在苏共、中共之间两面讨好，以请示、汇报之类活动向毛泽东索取金钱与军火。

毛泽东在亚洲输出革命的代表作之一是扶植越共，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越战。毛泽东在亚洲输出革命的另一代表作是扶植印尼共产党武装暴动。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开始向印尼共产党提供金钱资助，指示他们抛弃“议会道路”，武装夺取政权。中苏论战中，由于中共提供的援助更多，印尼共产党表态支持中共，高层频繁来华讨要金钱。毛泽东不顾国人困苦，对印尼共产党有求必应。在中共金钱资助下，印尼共产党发展迅速，党员暴增到 300 万，党羽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甚至占据了苏加诺总统身边的重要位置。苏加诺总统实行亲共政策，纵容印尼共产党扩张势力，但印尼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决心抵抗中共赤化印尼的计划。1965 年 9 月，印尼共产党发动了武装政变。苏哈托将军领导军队镇压了政变，将政变首领翁东中校（LETKOL UNTUNG）和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SOBRON AIDIT）处决，取代苏加诺上台执政，随即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印尼共产党接受外国金钱扶植，充当外国势力颠覆政府工具真相公之于众，大批处决印尼共产党员，一举扫荡了遍布印尼党政军和各界的共产党势力。当局公布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段内部讲话。周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我们有能力

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变颜色。这种说法激怒印尼可想而知。镇压共产党人政变后，印尼政府实行了排华政策，严禁华人参政、办学、办报，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对华人实施歧视性税收，愤怒的印尼民众掀起了排华浪潮，很多印尼华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被逐离印尼。选择回国的印尼华侨逃避了印尼的排华灾难，却回国陷入了文革灾难。他们中的不少人被以“敌特”罪名长期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

策动印尼共产党政变失败后，毛泽东填词“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表达卷土重来的决心，并在其后更变本加厉地输出革命。根据他的决定，中共驻金边使馆向柬埔寨各界散发宣传“毛主义”的小册子，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造反活动，向反政府柬埔寨共产党提供秘密资金。在香港，中共模仿当年苏共政治局提供秘密资金策动“省港大罢工”的作法，以巨额秘密资金资助香港工会罢工，将 1967 年 5 月的普通劳资纠纷转变成了全港骚乱。骚乱中，《人民日报》刊出《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社论，鼓动香港骚乱升级。8 月 20 日，外交部以港英当局迫害香港传媒人为由，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 48 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释放被逮捕的数十位煽动骚乱的传媒人员。8 月 22 日晚，北京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以港英当局未在 48 小时内答复外交部 8 月 20 日照会为由，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打、砸、放火焚烧，关押英国记者，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是为臭名昭著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与北京红卫兵相呼应，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指挥左派发动了反英暴动，投掷土炸弹，袭击警察。暴动带来严重政治经济恐慌和楼灾、股灾，使中共在港的资金也蒙受了重大损失。暴动中，香港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左派暴动，呼吁港府镇压骚乱。面对中国再次的义和团暴民运动，英国派航空母舰来港应对，香港的警察面对袭击忠于职守，没有加入骚乱者的行列。

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前后，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暴力袭击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撕烂外国国旗，包围苏联驻华使馆进行“反修正主义”示威；上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闯入英驻沪领事馆造反。这些暴行是继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之后，二十世纪中国的另一次愚昧展示，再次使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两次愚昧表演的主要不同之处是，清廷和义和团是在洋人闹到自己家门口时宣战的，而毛泽东是在世界各国致力和平、缓和时煽动各国搞武装斗争；清廷在发布对各国宣战诏书后不久就发布罪己诏承认了错误，向各国赔罪，而毛泽东全无罪己意识，长期坚持在世界各地搞颠覆，与世界主要国家为敌。

朝鲜是毛泽东在亚洲输出革命的主要目标。朝鲜战争没有让毛泽东感到当亚洲共产党领袖的满足，因为金日成仍向莫斯科汇报，没有对他完全臣服。朝鲜战争后，毛泽东命志愿军长期驻军朝鲜，利用军事力量支持朝共中的“延安派”密谋推翻以苏共为上级的金日成。金日成向苏共状告中共策动政变，搬苏共出面干预，迫中共从朝鲜撤军。此后，毛泽东为与赫鲁晓夫竞争共产阵营领袖的需要，在对朝鲜撒钱方面与苏共展开竞争，对金日成有求必应，在大饥荒中增加对朝鲜共产党的援助。1966年，金日成访华参观秘密建设中的北京地铁时，要求中共秘密出资金、出技术、出人力，在平壤无偿也建一条，要求达到莫斯科地铁的豪华程度。当时中国的经济无力同时建两条地铁。毛泽东决定优先且无偿为朝鲜建地铁。执行毛的决定，周恩来将北京地铁停工，按金的要求派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在平壤开工建地铁，安排运去车辆设备、建筑材料，控制系统和机电设备，包括在上海专门研发的机车，在长春客车厂制造的车厢。出于战备防空考虑，平壤地铁被设计成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极大地加大了建造成本和施工难度。中共花巨资建成后，朝鲜领导人宣布：朝鲜人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建成了平壤地铁。

在拉美，毛泽东的输出革命战略遭到在印尼一样的惨败。中苏论战中，中、苏两共展开了向古巴共产党提供援助的竞赛。苏共率东欧共产党国家包下了古巴的燃料、面粉供应和大部分蔗糖出口，毛泽东共则不顾饥荒民众的困苦，赠送给古巴 6000 万美元和国内人民吃不到的大米，从古巴大量进口蔗糖。随着中苏全面决裂，卡斯特罗倒向经济军事更强大的苏共，向古巴提供大米援助的中共成了冤大头。中共一面减少对古巴的援助，一面通过驻哈瓦那使馆向古巴的党政军干部和平民大量邮寄宣传反苏和鼓吹武装暴动的“毛主义”小册子，煽动推翻卡斯特罗。对于中共的颠覆宣传，古巴共产党在哈瓦那组织了集会和阅兵，展示苏联提供的坦克、飞机示威，在党报上组织文章指责中共“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行径压迫古巴”，抗议中共使馆在古巴从事颠覆活动。卡斯特罗在演讲中将中共称为“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者”，称中共减少大米供应没什么了不起，古巴人可以吃小麦，那样对健康更好。他嘲笑中国盛行的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个人崇拜，指毛泽东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并发誓说今后古巴领导人的年龄决不超过六十岁（他在此次演说后又在此在位四十多年）。

在非洲，中共效仿苏共当年在中国的作法，将驻各国的大使馆办成了煽动“武装夺取政权”的颠覆中心，导致布隆迪、中非、达荷美（贝宁）、加纳等国政府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没有与中国建交的象牙海岸、尼日尔也谴责中国搞颠覆。文革中，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以红卫兵运动的方式将“毛主义外交”推向颠峰，《人民日报》上充斥《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疯狂论调。肯尼亚政府抗议中国大使馆在肯大量寄送《毛泽东选集》、毛语录和毛像章是粗暴干涉肯尼亚内政，颁布了禁止毛语录等中国宣传品入境的法令。而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将国内的文革粗暴搬上国际舞台，向肯尼亚外交部递交了抗议照会，在其中竟然指责肯尼亚政府“害怕肯尼亚人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害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说穿了，你们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你们的阻挠和反对只能进一步把你们自己置于

人民的对立面。除此之外，是不会有什好下场的。”照会最后警告肯尼亚政府：“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停止反华。如果你们硬要一意孤行，蛮干下去，那就只能彻底暴露你们的反动面目，最终将在肯尼亚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1] 在文革发动后的一年中，中国在国际上耍蛮横，四处碰壁，与几乎所有邦交国家发生外交纠纷，亚非国家纷纷中止了对华外交关系，使中国本来就不多的驻外领事馆大部分关闭。在国际上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不断刊出亚非拉客人簇拥着毛泽东的照片，配以“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颂词，以让每天看该报的毛泽东满足。

在美国，毛主义也产生着重大影响。1967年7月，因白人警察逮捕黑人引发了“底特律骚乱”。受到毛主义武装斗争宣传和中国文革的影响，底特律黑人手持中国出版的英文《毛语录》也搞起了武装斗争，捣毁白人住宅、商店，砸烂警察局，与军警武装对抗，造成二千幢楼房被毁和大片市区被夷为平地，全城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三大汽车厂停产。美国政府被迫出动军队和国民兵平暴。当暴乱逐渐平息时，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遇刺，种族骚乱蔓延全美百余城市。骚乱中，毛泽东在北京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在天安门接见了美国黑人暴力派领袖，号召“黑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推翻美国资产阶级罪恶统治”。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汽车之都底特律持续繁荣，是无产阶级晋升中产阶级的福地。然而在毛主义的武装斗争和黑人种族主义斗争的祸害下，底特律人口下降，产业萎缩，失业率、犯罪率上升，走向破产。底特律的衰败主因不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而是因为受毛主义熏陶的左派工会势力过大。

文革在国外最长久的影响在日本。1960年代初，日本一些左派学生团体要求革命。在日本政府镇压和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打击之下，日本的左派阵营分裂。以大学生为主力的新左派反对“议会道路”，主张激进革命。1962年，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代表团，并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

疑义的”。毛的题词受极大鼓舞了日本新左派。中国文革中，日本新左派大量派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主席语录》及中国文革文献，鼓动在日本开展红卫兵运动，左派青年们模仿中国红卫兵，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等城市掀起了造反运动，高呼反美口号和“毛泽东思想万岁”与“造反有理”等文革口号，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占领大学，同警察展开搏斗。1969年，日共中的毛主义派组成了“人民解放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向美军基地、警察设施和驻日外国的大使馆、公使馆和兵工厂等美军、自卫队、警察设施投炸弹，放冷枪。以盐见孝也、田宫高磨、重信房子、山田孝等人为首的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的400多激进学生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恐怖组织，致力发动对“美帝国主义的环太平洋革命战争”。被当局破获基地后，以田宫高磨为首领的“赤军派”残余坚持“毛主义”，主张“不能只在日本国内进行革命，应该改造社会主义各国，作为日本和世界革命的基地，先在和帝国主义有敌对关系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后，再重新登陆日本”，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绑架欧洲日本留学生到朝鲜生儿育女，培养赤军派的“革命接班人”。1970年，这支“赤军派”劫持了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再被破获后，残部再组成了“联合赤军”，流亡到了中东，投奔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精神领袖的“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2] 提出“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的革命口号，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包括在特拉维夫利达机场劫持两架日本飞机屠杀了24名乘客、袭击了法国驻海牙大使馆、袭击美国劳军俱乐部等等。这一组织的恐怖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

在输出革命战略连遭惨败，众多亚非国家与中国断交之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无偿援建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以维护虚荣心。根据他的决定，中共花费近百亿人民币，在非洲施工十年，建了一条铁路。工程接近尾声时，坦赞两国发生冲突，分别炸毁了接壤铁轨，两国均指责中国建铁路动机不良。将铁路建成后，中共对两国的无偿援助还要继续。因为中国须不断注入资金维持该铁路的运营才能维护毛泽东的颜面。多年后，这条被中国官方宣传为

中坦赞人民友谊象征的铁路，同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等一批中国援建的其它企业一样，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贪污等原因倒闭告终。

尼克松访华

中苏决裂后，毛泽东以金钱收买了一些亚非小国的外交支持，但没能改变在国际上极端孤立的局面。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双方在边界陈兵百万，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苏军的强大军事压力迫使毛泽东放弃“反帝”口号，谋求联美制苏。毛泽东的期望与美国联中制苏构想不谋而合。1970年10月，尼克松总统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了期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尼克松的口信为文革乱局中无法收场的毛泽东带来了惊喜。在中美都想共同对付苏联的情况下，两国不愁没有打开僵局的契机。

1971年4月，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开始了友好交流。周恩来、毛泽东抓住机会开通中美交流通道，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美国新闻记者，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尼克松立即作出回应，宣布了一系列对华解禁措施，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至此，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人员交往隔绝。紧接着，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了访华邀请。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同时作出了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决定断绝与台湾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接纳中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为联合国会员。从此，中国结束了文革闭关锁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

1972年2月下旬，尼克松夫妇、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来华访问，一支72人的庞大记者团随行采访。抵达北京的当天，

尼克松会见了毛泽东。中方不允许美国记者见证两位元首的会谈，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原本谈话就如写“黑话信”一样，思维不连贯，无法围绕主题，若不经秘书整理润色会让人感到前言不搭后语，在林彪事件后更加精神不济，谈吐不清。会见中，毛泽东说只谈哲学问题，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与尼克松漫无边际的闲聊。毛为刚发生不久的林彪事件打圆场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对毛此言，吴法宪后在回忆录中驳斥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他的话。早在 1950 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事实确如吴所言。建国之初，林彪不仅反对出兵朝鲜，更反对向苏联“一边倒”，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是毛反对与美国谈判，坚持与美国开战，关上了中美外交的大门。

会见后，中国官方报导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中美两国政府都没有披露毛泽东、尼克松二人会谈的内容。毛泽东每次外交会见都是漫谈闲扯。当年他见斯大林的时候非常谦恭，不能随意闲扯，结果，二人同乘一车时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说话。[3] 文革中的国人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会见照片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在会谈中向基辛格提议输出妇女说：“你们要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这么一来，她们会让你们的国家充满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小孩，而我们的小孩已经太多了。”总理周恩来以大笑为毛泽东助兴。在场的女性王海容提醒毛说，这些对话如果公开，可能会引起群众反感，毛泽东说：“我什么都不怕，上帝已经在呼唤我了”。[4]

毛泽东、尼克松会见后，周恩来与美方展开了关于联合公报内容的会谈。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后采取在公报中各自表述观点的办法，发表了谈不拢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双方主要分歧为：

在越南问题上，美国支持实现印度支那人民自决；中国支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支持南韩；中国支持北韩；

在日本问题上，美国珍视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暂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明确从台湾撤军的时间。

尼克松到访前，周恩来下令重新布置尼克松下榻宾馆房间，取下文革以来商场、酒店房间中遍布的毛泽东画像和语录，换上了国画。同时，他安排了美国客人的参观路线，下令严控沿途区内人民的举动。根据周的指示，各接待单位精心安排了应付美国人参观的假场景，召集会议传达指示说，美国人要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要“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问题，对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等“别有用心”的问题“不予理睬。今天的国人难以想象，尼克松访问期间，政府下令北京所有机关、学校未经特殊批准不得在天黑前下班、放学，让大街上没有人。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空空荡荡。”

这时的国家被毛泽东不断的运动和无偿对外援助搞得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为让美国人看到中国市场繁荣，政府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摆满了指定让美国人参观商场的货架。为防止抢购，这些地方被戒严，

普通百姓被赶到指定区域之外，等美国人到来之前，商场安排指定人员冒充顾客。随着尼克松一行参观离开，商场货架上的商品也不见了。尼克松在天坛公园参观时，中国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学生跳橡皮筋的场面。这些少先队员认真表演，在外宾面前失去了天真和自然。法新社记者在报导中写道，那几个跳皮筋的女孩“红红的脸蛋显然是擦了胭脂”。

周恩来安排尼克松在离京前一天游览八达岭长城。不巧，前一天北京突降大雪。尼克松见下大雪，提出取消次日游览。这可急坏了周恩来。他知道，尼克松不去看长城会让毛泽东不高兴。于是让翻译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说给尼克松听。尼克松决定客随主便。此时，到八达岭的公路已被冰雪覆盖。周恩来下令调动十万军民连夜清除积雪。第二天，尼克松的车队到达了八达岭后吃惊地发现，长城上没有雪。尼克松不知道，他从宾馆出发一路上的雪都被清扫了，北京市为尼克松一行出游实施了交通管制，他想像不到中国当局会安排十万人连夜扫雪。美国客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长城上打扑克。这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假扮游客作为景点陪衬。不过，这让记者们感到了虚假。当记者走上前去观看时，几位打扑克者认真表演，对美国客人全不理睬。后来，这些扮演者被批评不礼貌。他们感到委屈，因为他们只能按排练作，不敢改变情节。

对于尼克松一行的七天访问，中共在报刊上称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内部资料中则有“美帝前来朝拜世界革命领袖”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有一定道理。尼克松在访华期间没有对文革中国的专制独裁提出任何批评，实际帮助毛泽东渡过九一三事件后的统治危机，二人会见场面给中国人的印象的确有点儿像朝拜。

中日建交

尼克松总统访华刺激了日本政府。1972年7月，日本新首相田中角荣宣布：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内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

邦交正常化列为首要任务，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日台条约须废除）。毛泽东、周恩来正需要外交成果转移人民视线，对日本的政策转变立即作出了积极回应。

为了摸清中共对建立中日邦交的立场，日本方面派在野的公明党干事长竹入义胜先秘密来华向周恩来摸底。周向竹入提出了建交谈判草案。其中写道：“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竹入对草案大为吃惊。他后来回忆说：“听到这一条时已感到头昏脑胀了。没想到周恩来接着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

9月25日，田中首相率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由官员、安全保卫、卫星技术人员、记者组成的两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华访问。到京后，田中首相立即提出会见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健康极差，对周恩来请示是否见日本贵宾不置可否。周恩来只好安排田中角荣一行先游览长城，到外地观光，最后回到北京，举行告别宴会。当天下午，周恩来最后一次请示毛泽东，告知他日本首相明日回国，能否会见，毛仍不置可否。田中首相对此感到难堪。

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外道路打通，两国间二十七年的赔偿悬案被毛泽东、周恩来私下决定放弃索偿划上了句号。联合声明这一条表述的原文有“侵略战争”一语，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人员将“侵略”两字删去，称“外交就是要替对方着想”。[5]

在田中一行回国当天的凌晨，毛泽东突然告诉张玉凤说立刻见田中角荣。为适应毛泽东昼夜不分，突然召见的习惯，周恩来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小组二十四小时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卧室、轿车里，都装有与张玉凤的直通电话。接张玉凤电话后，周恩来立即起身驱车赶到钓鱼台国宾馆请田中角荣赴见。

会见中，田中首相就日本侵华向毛泽东道歉，令他意外的是，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是你们有功啊，因为有你们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才得以强大，得以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因此我们感谢你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6] 毛此言是真心话。七七事变后，他为中共制定了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的方针，利用日军的入侵获得了大发展，使中共军队从全面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 130 万正规军队，200 万民兵及上亿人口的根据地，成为中日战争的赢家。出于感激之情，他在建国后决定钓鱼岛主权归日本，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谈话。他曾对访华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曾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7]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北京地图出版社 1958 年版的地图上将钓鱼岛易名为日本名尖阁诸岛。中日建交谈判中，毛、周完全没有提到钓鱼岛。决定在与日本谈建交时放弃对日索偿，不提领土争议。多年，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日益高涨，认为日本没有为侵华作出赔偿、道歉和反省，对日本人憋了一肚子气。而日本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谈建交时主动提出不要赔偿，不用道歉，反而感谢日本，承认钓鱼岛为日本领土，双方的历史旧账已谈妥了结。

中阿决裂

1954 年开始，毛泽东每年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提供巨额援助，换取了阿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高调支持中共。1956 年，苏共揭露斯大林的罪恶，阿共支持中共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在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大会上，阿共成为中共反对和平共处、鼓吹世界大战立场的唯一支持者，受到各国共产党的一致批判。会后，苏共削减对阿共的援助。毛泽东承诺将苏共减少的经济援助补足，给阿尔巴尼亚的贷款条件比莫斯科更优惠，推动阿共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随后在中国农村大饥荒中向阿尔巴尼亚运去了成船的小麦，甚至下令几艘满载加拿大援助粮食的中国货轮改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8]

文革中，中共宣传阿尔巴尼亚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对阿共有求必应，继续无偿援助。中共援阿的军事装备、钢材水泥远远超出了阿国的需要。于是，阿共建造数万座碉堡和烈士纪念碑将中国援助的浪费掉，将中国运来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堆放在露天，常年风吹雨打，将超过需要的化肥随意抛弃。当中国专家提醒阿方不要浪费援助物资时，阿国人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9] 中共援建的棉纺厂因无足够棉花而闲置。为使棉纺厂开工，中共动用宝贵的进口棉花运阿。阿国纺织品无出口市场，中共再进口阿的纺织品。在中国农村全无电视的情况下，中共援阿电视台，帮助阿远远领先于中国达到了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文革中的国人只知道常有阿国贵宾来访，周恩来总理常陪他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和全国各地参观，但不知道两共领导人每次会谈内容都围绕向阿共提供巨额援助。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阿共中央致信毛泽东表达对中共联美的强烈不满。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阿共猛烈抨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是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同时反对中共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改善关系，反对中共邀请铁托访华。阿共一面抨击中共放弃“反帝”，一面照样向中共索要金钱。这时，毛泽东整天昏睡，

不想再调整援阿政策。没有毛泽东发话，外经部只好继续执行既定的援阿计划，向阿赠送金钱，物资。这时的阿共代表团来访已成为赤裸裸地要钱之旅，双方迎送场面日益冷清。[10]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普通家庭的资产不足千元，很多农民的家庭资产不足百元，千万少儿因交不起两、三元书费、学杂费而辍学。毛泽东、周恩来秘密操作，在国人家庭平均存款不足百元的困苦情况下，持续二十多年无偿赠送了阿共 100 多亿元，平均阿国每人数千元。在多年后的东欧巨变浪潮中，阿国民众砸毁了市中心的恩维尔·霍查雕像。随后，阿国通过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新的宪法。这时，毛泽东、周恩来运去的亚当氏毒气、芥子气、路易氏毒气等大量化学武器仍堆积在地拉那郊外，继续危害着欧洲和平。

红色高棉灾难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大举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策划了驱逐法国势力的越战。这时，柬埔寨尚无共产党，只有一个依附越共的“高棉解放运动”组织。1955 年，毛泽东命越共选派越、柬两共人员到中国接受武装暴动培训，“高棉解放运动”成员波尔布特（沙洛特绍，POL POT）被选送来华受训。1965 年，毛泽东挑起了第二次越战。西哈努克国王宣布中立，希望利用越战局面获得更多美国，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中共为柬埔寨援建了轮胎厂，水泥厂，造纸厂，三合板厂等一系列工业项目，换取了西哈努克背弃中立声明，为中共经柬埔寨运送援越物资提供通道。

同年，波尔布特再次来华，被安排在解放军中受训。在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他也写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笔记，参加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得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有柬埔寨人，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曾多次说，他像小媳妇那样受了斯大林几十年的气，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时心里很不痛快。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目标是像斯大林那样向各国共党发布指示。与苏共决裂后，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极为孤立，

在欧洲只有一个花钱收买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假装听他的指示，在亚洲，越共假装听他的指示，但同时又听取苏共指示，接受苏共援助，让毛没有满足感。在向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输出革命均不成功的失落中，外国人波尔布特的崇拜让他感到满足。他召波尔布特到中南海，面授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决定以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导人，扶植建立柬共军队，让柬共去牵制脚踏两只船的越共。随后，他派陈伯达、张春桥向波尔布特详细解释“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等毛泽东思想，派康生向波传授了肃反经验，命柬共摆脱对越共的从属关系，直接听命于他。

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暗杀了劳动党领袖杜斯木，将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在中共军火，装备和巨额金钱扶植下组建了柬共军队。柬埔寨政府不容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柬共军队发展，对柬共军展开围剿，但屡遭挫败。西哈努克知道不是中共的对手，决定进一步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以每月收取中共三十万美元的条件将柬埔寨东北部与越南接壤的那达拉基里省提供给越共作为军事基地，希望换取毛泽东停止扶植柬共反政府。有了柬埔寨境内“鸚鵡嘴”等地的军事基地，越共军队沿“胡志明小道”南下，潜入越柬边境的那达拉基里省，突袭南越政府军和美军。南越美军不断受到藏身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军袭击，不得不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基地。中共与柬埔寨再借此在国际上大力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

1969年，越战出现转折。胡志明之后的新一代越共领导层决定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与朝鲜战争时一样，毛泽东拒绝停战，要求越共“抗美到底”，以减少对越援助施压迫使越共停止和谈。越共不顾毛的阻挠继续与美国和谈。毛对多年援助的越共拒绝听命忍无可忍，加大力度扶植柬共，通过张春桥、姚文元向到北京汇报工作的波尔布特发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指示。根据指示，柬共军队向西哈努克政权发起了全面进攻。

1970年3月，柬埔寨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朗诺（LON NOL）将军乘西哈努克亲王出访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西哈努克飞赴莫斯科求助遭拒，被苏共送到了北京。毛泽东派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指示仍按国家元首规格接待，要什么给什么。同时，中共以柬共、西哈努克作筹码与朗诺政府展开了谈判，要求继续使用西哈努克港转运援越物资作为与柬新政府建立关系的条件。朗诺政府拒绝了中共的要求。于是，毛泽东将西哈努克与柬共拼凑一起，在北京扶植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接受毛泽东豢养的西哈努克无奈地接受毛泽东的安排，与自己围剿多年的柬共合组流亡政府，充当毛的傀儡。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操办将漂亮宽敞的原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送作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官邸。5月20日，毛泽东率中共高层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亮相，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520声明），声言同时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在城楼上，西哈努克感谢毛提供官邸，称以后会偿还。毛泽东强调所有提供全部无偿，称：“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负担你的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准备支援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得毛慷慨承诺，西哈努克决定长期居住北京。

与柬埔寨朗诺政府断交后，中共加大力度向柬共提供军火，仅在1970年就援助了三万军队的武器装备，[11] 还在云南为柬共设立了专用广播电台，向柬越地区播放西哈努克号召柬人支持红色高棉的讲话录音。在毛泽东提供金钱、军火和军事顾问的扶植下，柬共军队迅速发展出装备精良十万大军，将朗诺政府军围困在金边等几个大城市中。总理周恩来亲自操办，为西安排了专列和两架专机。在随后的几年中，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到处游览的报导成为文革中枯燥新闻中的亮点，让国人见识了富丽堂皇。然而，几十年后，中共为西哈努克安排的奢华才披露出来。1973年，西哈努

克亲王来到上海，提出要在豫园内吃一顿饭。中共把款待西哈努克亲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因为此前，西在南京夫子庙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上海当局下令要让西哈努克吃十四道点心，调集豫园内的各路精英，策划出了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十四道。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当局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蛋直径、色泽、形状“三同”。压力之下，厨师们三下南翔，杀了 108 只鸡才找到“三同”蛋。不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厨师们只好第二天再杀 108 只鸡。然而这天亲王去打网球，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再倒掉。第三天亲王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城隍庙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在中国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农民人均年收入仅几十元的背景下，中共就是这样超级奢华地供养着元首级的食客，以满足毛泽东的世界领袖虚荣心。中共宣传日夜操劳好总理其实就在这样奢华地陪同超级食客。

1975 年 3 月，美军从越南撤退。失去美国的支持，朗诺政府无力维持。4 月中，柬共军队占领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根据毛泽东“疏散到农村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指示，中共军事顾问指挥红色高棉武装部队，中共驻金边大使馆指挥数千柬埔寨党、政、军各部门“援柬专家”，开始实施“大疏散”计划，向柬民众喊话，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由，要求全体居民立即离开城市，许诺躲避三日后可以返回家园，不准居民携带任何财产，不给收拾行装的时间，将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驱赶出城，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前政府人员，拒绝离开或离家迟缓者屠杀，将市民武装押送到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去建立共产主义部落，使金边、马德望等柬埔寨的主要城市变成了遍地尸体，荒无人烟的鬼城。

实施“大疏散”后，波尔布特和农谢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华，向毛泽东报告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权城市”，消灭了“三大差别”和私有制，“将所有人逐离城市，完成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获毛赞扬，随后与中共中央代

表邓小平展开了三次会谈。回到金边，波尔布特与中共顾问团继续推行毛式共产主义，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取消城市，取消货币，实行配给制，建立毛式的人民公社，将男人、女人分别编入军事化管理的共产主义集中营，吃公共食堂，致使人民在集中营中因劳累、饥饿、酷暑、疟疾和水土不服成批死去。推行毛式共产主义的同时，红色高棉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派军队侵入越南富国岛(PHU' QUÔ'C)、寿初岛(THỒ CHU)、巴竹(BA CHU'C)等地，大举屠杀越南民众。

197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访问了柬埔寨，代表毛泽东向红色高棉领导人介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按照毛的理论，柬共在中共军事顾问和中国大使馆的指导下展开了中共模式的镇反、肃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对旧政权员、商人、知识分子，来不及撤走的越侨、华侨展开大规模屠杀，将从越南回国的原越南人民党党员、柬共原高层领导人和两万越侨几乎杀光，将在柬的 60 万华侨杀了 20 多万。当年，中国的毛泽东、彭湃、张国焘、夏曦等知识精英经苏俄培训成了杀人魔王，红色高棉大屠杀的领导者大都是留学法国的精英。柬埔寨政府送这批精英出洋，希望他们回国推动柬埔寨的现代化建设。然而这批精英接受了共产革命思想后同样成了杀人魔王，将崇尚佛教的祖国变成了杀人场。红色高棉在金边建立了 TUOL SLENG 监狱 S21 杀人场，将犯人铐在仅一平米，只可蹲或斜躺的“水泥棺材”中，对被关押者实施鞭刑、烙刑、电刑、辣椒水、掀头皮、剥指甲、剪乳头、剁手指、抽筋扒皮、剜眼割舌，然后斧砍、锄砍颈部成批屠杀。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被频繁地撤换，然后就地灭口。[12] 红色高棉大屠杀中，毛泽东、朱德、华国锋以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名义致电乔森潘、波尔布特、农谢，“最热烈地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13]

越共知道红色高棉的屠杀行动受中共幕后操纵，对政治局委员，前驻北京大使黄文欢 (HOANG VAN HOAN)为首的亲中共派展开清洗，将百万华侨逐离越南，并采取联苏制中的对策，中央总书记黎笋亲自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发表了针对中共的《越苏宣言》。1978 年底，越共在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随后后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出兵柬埔寨。入柬越军受到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对红色高棉的进攻势如破竹。1979 年 1 月 7 日，越军在柬埔寨人民的支持下攻占了金边，推翻了中共金钱武器扶持的红色高棉政权，制止了柬共每天进行的屠杀。柬埔寨人民感谢越军帮助他们脱离苦海。2 月，邓小平发动了侵越战争，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是为红色高棉灾难之后的另一大灾难。

输出共产革命就是制造灾难，斯大林以金钱武器扶植中共，指定毛泽东为领袖，带给中国十分之一人口死难；毛泽东以金钱武器扶植起了红色高棉，指定波尔布特为柬共领袖，带给柬埔寨四分之一人口死难，将美丽富饶的柬埔寨佛国变成了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赤化柬埔寨灾难是赤化中国灾难的续篇。红色高棉被推翻后，毛泽东带给柬埔寨的灾难继续。当年毛泽东开展游击战，造成苏区周边几十里的无人地带。毛的学生波尔布特开展游击战，广埋地雷，造成此后几十年内柬埔寨平民大量伤亡。直到 2013 年，柬埔寨政府还在考虑引进大型非洲老鼠帮助排雷，可见红色高棉遗害之长久。

第 53 章 毛泽东时代终结

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后，三分之一中共政治局委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不得不再召开全国党代会重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都须先开准备会议，将所有事项定好，然后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举手通过。毛泽东循发动文革的政治局会议之例，自己不出席准备会议，让周恩来出面主持会议及宣布自己的决定。

1973 年 5 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和《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宣布了毛泽东下列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王洪文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宣布《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宣布“解放”（恢复官职）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一批老干部。会后，《人民日报》刊出了周恩来拟定，毛泽东批准的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其排列类似梁山好汉的天王、天罡、地煞如下：

毛泽东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张春桥（大会秘书长）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华国锋、吴德.....

8月24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林彪事件后毛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时衰弱得站立都要人扶。开幕式上，会场起立奏乐，毛泽东站立不住，只好坐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周解释林彪、陈伯达去职的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周恩来报告后，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其中坚持说中共九大是团结胜利之会，但“九大”党章中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他宣读毛泽东的“反潮流”论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大会闭幕时出现了独裁体制下特有的一幕。全体与会者起立长时间地鼓掌，等候毛泽东走向离场。毛泽东衰弱得站不起来。毛起身谁也不能走。会场与当年斯大林时代的大会一样，谁也不先停止鼓掌。在狂热与恐怖并存的独裁体制下，大会先停止鼓掌者会后可能被带走。于是，全体代表鼓掌持续。周恩来意识到这样持续不是办法，赶紧问计毛的护士长然后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中共十大是毛泽东统治时代末期极度黑暗的一个写照。首先，这时的中国不仅是病夫治国，而且是行将就木之人治国。其次，毛泽东、周恩来指控林、陈的报告，又将这份构成林、陈罪行的报告保密（至今不予披露）。若党内稍有一点民主气象，也会有人提出了解这份罪证文件。可是，高层们全体沉默，没有人敢于提出如此基本的要求。其三，毛泽东将林彪夫妇的日记定为“反动笔记”，公之于众作为整肃依据。虽然大量使用暗语，林彪坚持写日记说明他是中共高层中相对磊落者。毛泽东、周恩来是不可能写日记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根本不能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的。全党高层没有一个人敢于

质疑这种以日记作为整肃依据的作法；第四，《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与林彪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为代表资格条件极为荒唐。因为，几年来的文革路线是毛、林为正副“统帅”的路线，中共党人都在这一路线的领导之下，林彪更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典范，他要求结束文革也是照毛泽东文革搞三年的说法行事，并不存在林彪路线；第五，政治局向主席请示修改党章说明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都形同虚设，真正的决定出自毛泽东一人，各种会议只是举手的走场。第六，周恩来在报告中指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属于中伤。因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当时高层的集体写照，并非林彪一人，周恩来自己及众高层都是这样生存过来的，其中周恩来推动崇毛之积极不在林彪之下；至于“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大家都清楚林彪若真能如此也不至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第五，大会报告鼓吹谁也说不清确切意思的“反潮流”，在文革天怒人怨的背景下继续颂扬文革，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第六，大会宣称中共党内发生了十次路线斗争，每一次都是毛泽东正确，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向全体党员和国人隐瞒。

整死林彪后，毛泽东立即开始盘算再次整肃二号人物。中共党史上，八大是毛泽东盘算整肃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动手整肃二号人物林彪的开始；十大则是毛泽东动手整肃二号人物周恩来的开始。虽然这时毛泽东在中央拉新亲信整肃二号人物的游戏已经玩到头了，但毛泽东早有奇兵备用。十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了牵制周恩来的两项布署：提拔亲信华国锋进入政治局、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副总理、公安部长；重新起用邓小平任中央委员。毛泽东提拔华国锋始于十多年前。建国之初，毛泽东得知湖南湘潭县委书记华国锋对自己故居精心保护，颇有好感。1955年，毛泽东到长沙时召见了华，指示华推动合作化运动。华迅速写出《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

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文报毛。毛赞赏华的文，将华提拔进入湖南省委，指定华出席七届六中全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华调集十万民工，亲任总指挥，不惜成本地修建了韶山灌区，将毛家乡营造成了湖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此后，华成了湖南的“通天”官员，每年到京几次向毛直接汇报工作。在林彪事件后众叛亲离的局面中，毛泽东将华提拔进领导核心作为自己臂膀。重新起用邓小平是毛泽东在整邓时预定的计划。当年在苏区，邓被以毛派罪名挨整，从此被毛视为亲信，而非“国际派”。共同主持反右运动后，毛对邓的信任倍增。四清运动后，邓小平与刘少奇走得近，结果进了毛的整肃名单。不过，毛泽东整肃邓与整刘少奇有完全不同的打算：对敢于发难的刘要置于死地，对邓则要通过敲打达到驯服，以备后用。召开十大时，毛开始盘算对付二号人物周恩来，决定起用邓以制周。

“工农兵上大学”

在党国体制之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可避免地成为服务中共利益的工具。建国后，中共秘密实行“调干生制度”，由党决定上大学的人选。新中国的大学招生不再是通过高考选拔的竞争，而由中共依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秘密“政审”决定。中共将最符合培养条件者推荐为留苏生、保送生，将其余分为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四类。“不宜录取”者主要是出身地主、富农、旧政府人员、旧军队人员、右派、有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者，本人有过政治牢骚言论者，表达独立思想观点者。高校当局在招生时执行中共的录取政策，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被中共列为“不宜录取”者考试分数再高也不能录取。调干生制度之外，中共实行推荐招生制度，绕过考试程序，完全由权力者“政审”决定。所谓推荐程序是，先查“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剥夺建国以来历次整肃运动受害者及其子女的上大学权利，选送基层中共组织认为“政治上可靠”，“听党的话”者上大学，大学招生完全由中共操纵。“调干生制度”和“推荐制度”是魏晋时凭门第荐官的“九品中正制”的翻版。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教育制度和选官

制度的重大进步，使贫寒学子有了勤奋出头的机会。然而，毛泽东的所谓教育革命以改头换面的门第推荐制度取代公平竞争的考试入学制度，剥夺了学子通过勤奋出头的机会。

发动文革后，中共下令大学无限期停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

大学停办后，中学生升学的要求无法回避。政府无法将所有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农村去，教育部不断向中共中央请求恢复大学招生。高层中没有人敢于质疑毛泽东关于废除高考的“教育革命”批示，中共中央作出照顾毛泽东面子的妥协决定：废除招生文化考试，采取举荐制度，由各地的基层革委会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说：“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两至三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报告宣布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办法（十六字办法）。随后，中共中央将大学招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军队各军区，再层层向下分配。与大饥荒后出台的“八字方针”中只有“调整”两字有意义一样，大学招生的“十六字办法”中只有“领导批准”四字有意义。因为，千万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都想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没有录取决定权，“群众推荐”不具操作性，“自愿报名”、“学校复审”、“群众推荐”都是空话，农村、工厂和军队中实际不存在“群众推荐”，上大学名额完全是领导内定，是权力和家庭背景的竞争，推荐制实际是“领导批准制”。

1971年，全国大学招收了四万多名中共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配合推荐招生，中共推出了一部歌颂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片中的一个情节是以手上老茧多作为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其实，工农兵学员中超过七成是中共各级干部子女，能获得推荐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和政治立场。1972年8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当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坚持毛泽东否定正规教育的“两个估计”，要求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改），“使大学成为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中国古来有尊师重教传统，文武强人推动办学，但不干涉办学，都认为由大学者办学天经地义，都在先生面前保持恭敬。这一传统在新中国被颠倒过来，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和正规教育制度，要求“工农兵学员”们管大学，管教授。

“工农兵学员”们上大学前都经过在农村、工厂、部队的锻炼，珍惜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普遍学习努力。但由于被文革中断学业，没有通过文化考核，文化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混乱。为迁就低水准的学生，大学被迫从小学内容教起。最影响教学质量的是毛泽东提倡的“学工、学农、学军”和“开门办学”。学生们往往被安排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劳动或接受军训，去“体验生活，改造思想”。所谓“开门办学”是要求学生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去听工农兵讲课，或请工人、农民、军人到大学来讲课。如此办学虽然新颖，但算不上是教学。

1977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回归尊师重教传统，恢复考试录取的教育制度，持续了五届的“工农兵上大学”“教育革命”走入历史。多年后，没能上大学的一代青年多抱有不论多大

代价也要让孩子上大学的想法。他们希望以此弥补因“教育革命”、“推荐制度”而被剥夺上大学机会的终身遗憾。

批周测邓

“九一三事件”后，流放中的邓小平看到了复出的机会，托江青转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写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2]

1972年初，陈毅元帅病逝。众多文革中被整肃的老干部通过要求参加追悼会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一消息让毛泽东感到震动。文革之初，他得林彪代表军队强力支持，可以将几位反对文革的老帅同时整肃，迫他们写检讨。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元老和军队对文革的不满日益强烈。毛泽东感到，若再不安抚元老、军队和一大批受到文革冲击的老干部，他的统治随时垮台。陈毅追悼会当天，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赶紧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提高追悼会规格，决定亲致悼词，帮助毛泽东稳定了林彪事件后的危局。毛泽东此举确实起到的安抚老干部的作用。在文革中被罢官发配的老干部们看到了复出希望，奔走相告，弹冠相庆。8月，邓小平再致信毛泽东检讨说：“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3]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感到满意。“九大”后，毛联手周恩来对付林彪，成功置林彪于死地。现在，他要起用邓小平以牵制周恩来。他清楚，连年文革造成经济危机和人民不满，需要有人出来收拾动乱局，而这非江青等文革派所能，能干的邓小平能帮他收拾烂摊子。1973年，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回北京，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中共十大上任邓小平为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在让邓复出的同时，毛泽东对邓的“永不翻案”保证不放心，担心邓将来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他自己，担心邓像当年支持刘少奇一样与周联手，于是决定对邓作进一步测试。

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晚宴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来不及向毛请示，连夜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基辛格走后，毛泽东指责周恩来未经批准与美国人单独会谈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让周恩来自己来主持批判自己的共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定邓小平和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会议批周。毛泽东的右倾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是找借口整肃周恩来，同时测验邓和周恩来的老部下们能否撕破脸批周。邓和周的老部下们都清楚党内斗争没理可讲的道理，清楚毛泽东关注着会议的情况，于是对周恩来展开了围攻，不讲情面地扣帽子、揭老底。曾对高、饶、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多年战友落井下石的周恩来最清楚党内斗争的规则，对部下们的围攻不觉得意外，不作辩解，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还给自己扣更多的帽子以让毛泽东满意。邓小平清楚毛泽东的测试用意，在会上激烈批周，“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4]

邓的批周表现让毛泽东满意。毛清楚，周恩来在党内军中根基深厚，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整周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危及统治。在周恩来给自己扣帽子外加写检讨后，毛泽东感到敲周测试邓的目的达到，指示批周收兵。半个月后，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命邓出面收拾局面，同时刻意抬邓压周，任命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出席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出席联大会议归来后，邓小平获毛泽东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取代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不负毛泽东的期望，立即主持实施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帮助毛泽东清除林彪集团在军中影响。

“反潮流”

在十大政治报告中，中共提出了“反潮流”号召。这一让国人莫名其妙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创造，意思还是造反。早在发动文革时，毛泽东就在“黑话信”中提出“天下大乱”、“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在文革进行了七、八年后，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被关押整肃，甚至枪毙，毛泽东知道造反的蛊惑说不出口了，但又不想结束文革，不想恢复秩序，于是想出了个“反潮流”口号，换个说法还是蛊惑造反，要求“继续革命”。根据他的要求，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积极物色“反潮流”典范。

1973年4月，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召生在推荐之外增加文化考试。江青认为这一意见违反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准备借此发难。在6月的招生文化考试中，辽宁知青张铁生答不出理化考题，将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求情信抄录在试卷背面，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根据辽宁省领导人毛远新授意，《辽宁日报》将张铁生的信删改后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

省。毛泽东最为痛恨正规的高等教育制度，其中还最痛恨考试制度，认为考试获高分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部分，认为“脚上有牛屎”，考试交白卷的农民代表教育革命，表态支持《辽宁日报》的编者按。江青乘机行动，将交白卷的张铁生称赞为“反潮流英雄”，指示《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了“白卷事件”报导，并下令将张铁生破格录取为农学院大学生。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没有背景获推荐，正在努力自学，希望通过考试上大学的全国知青。

1973年12月，江青再组织《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将与班主任闹矛盾的小学生黄帅树立为反“师道尊严”的反潮流典型，称“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经此煽动，各地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反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各地纷纷树立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学生。受中共中央挑唆，中小学生们重新开始造反，旷课、斗殴，砸烂教室玻璃窗，破坏课桌椅，使学校回到了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

“反潮流”运动的另一标志举措是“考教授”。经毛泽东批准，江青授意掌管清华、北大的谢静宜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出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组织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教授。北京“八大学院”的613位教授、副教授参加了考试，仅53位及格，有200位交了白卷。随后，江青部署了组织座谈会、发简报、发文章、公布众多教授考试不及格等一系列行动，以此否定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举措。应当说，以考试办法羞辱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的意思。毛的心思与当年洪秀全一样。洪秀全屡试不第而对考试心怀仇恨，兴兵后迫不及待地开科举，要通过作考官考别人来发泄怨气。毛泽东一样，自认在北大受了知识分子的气，从延安以来后反复以各种方式整肃知识分子来发泄怨恨，考教授是他的另类发泄。

“反潮流”运动是毛泽东对教育事业再一次摧残。读过师范，作过教师，到过岳麓书院的毛泽东反对学生规矩地听老师讲课，不断地煽动学生造反，下令停办大学，在不得不同意恢复大学招生时下令取消考试，在不得不同意恢复考试时鼓励交白卷，授意考教授，以公布教授教课文不及格方式羞辱知识分子。他曾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5] 这难免让人怀疑他的师范是怎么读出来的，曾经的教师是怎么当的。中共长期宣传毛泽东有一套教育革命的思想。但毛泽东的言行证明，他的教育思想就是仇视教育，仇视学校，他的教育革命实践就是摧残、摧毁教育。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反潮流”运动，他摧残教育不遗余力，反复整肃、羞辱知识分子，否定教育制度，否定正规大学，仇视学者，仇视考试，要求关闭，停办大学，减少大学学科，将大学迁往农村，减少直至教育经费，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他的统治时代结束后人们才明白，他的“反潮流”就是让国家，让学校继续混乱下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批林批孔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化名梁效）奉命到毛家湾林宅寻找批林材料，将找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孟的零碎材料报告了江青、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谈话中称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倒退的，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尊孔反法”等等。据此，江青、张春桥授意梁效等理论班子组织文章批判孔子和儒家。1973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9月，“梁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党刊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同月，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

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不仅赞成秦始皇，还赞成“焚书坑儒”，曾写诗贬孔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史上曾有李贽、陈独秀等学者批判过孔子，但孔圣人贬为“秕糠”者毛泽东是第一人。

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模一样的《元旦献词》，在其中称“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一号文件，将“梁效”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由此，中共将孔子和林彪扯在一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中央文件，“梁效”、“罗思鼎”为首的写作班子发表了大量尊法批儒批孔文章。其中引领运动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与批判电影《武训传》、“九评”、批《海瑞罢官》等整人文章一样，均是强词夺理，扣“阶级斗争”帽子，以谩骂为能文章。如果说其中有新意的话，那就是借吹捧吕后、武则天吹捧江青。

“批林批孔运动”中，杨荣国教授红极一时。他在文革前因发表扣政治帽子的《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出名。文革初期，他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批斗，抄家、隔离审查、送干校劳改等迫害。在中共中央策划批孔时，他将政治批判引入学术的《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专著受到“梁效”欣赏，他指孔子为“反动派代表人物”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更受到毛泽东赞赏，获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从此，杨时来运转，获授广东省

要职，连续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桑弘羊的哲学思想》、《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等鼓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批判文章，出版了党化文章的样板——《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评法批儒”。如果说杨荣国文革前的文章还算得上是学术一家之言，则他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著作、文章完全沦为服务整肃运动的“党工具”，其中充斥诸如“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此可见孔子并不那么正派”等逢迎统治者的随意编造。他在政治整肃运动中不由自主地火了起来，又随着整肃运动不由自主地跌落，在几年后被戴上了“四人帮走卒”帽子。

闻名的尊孔学者梁漱溟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杨荣国教授形成了对照。在政协委员们须人人表态拥护运动的环境中，梁漱溟保持沉默，被认定是抗拒运动。批孔会上，有人发言说：“某教授五四运动时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回应：“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梁的观点不见容于运动，被反复逼迫要求表态。最后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高层在激烈内斗。江青等人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此前，中共官方称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已出现过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一贯正确，先后与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斗争并获胜。“第十一次错误路线”之说让人猜测其“错误或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周恩来。病中的周恩来也感到惶恐，以积极推动“批

林批孔运动”向毛泽东表态效忠，与叶剑英分别主持了地方和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自从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升任二号人物，毛泽东就开始盘算对周的整肃。周恩来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医疗专家组传达指示：第一保密；第二不检查；第三不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他要利用癌症来消除周对他地位的威胁。在 1972 年 6 月的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命周恩来讲“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江青传话要求周“联系个人实际，讲个人的历史事实”。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要求他作检讨，于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检讨，承认追随王明犯了严重错误。随后，毛泽东又指周在外交上犯了右倾错误，安排邓小平等人对他展开围攻。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影射周为“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这种有话不直说，控制舆论工具指桑骂槐，与国人打哑谜的办法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多年来，毛泽东每每以“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党内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有人搞独立王国”、“这样的人就坐在台上”等等打哑谜言论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样的恐怖中，国人被迫跟着毛泽东批武训、批胡适、批海瑞、批陈伯达、批林彪、批孔子，不间断地开展莫名其妙的批判运动。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的确应当批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评论孔子思想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论语》小册子中的谈话只是一种常识道德，毫无出色之处。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孔子论述中没有思辨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東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也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

那倒是更好的事。”[6]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承认：“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物质文明。”[7] 梁氏此言道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共和理念根本冲突。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思想成了现代科学和当今普世价值的源头，而孔子和儒家思想与这一源头对立。它们强调等级地位，强调对统治者驯服，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探索精神，拒绝平等、自由、宽容、妥协和反省，是国人的精神枷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许久以来，中国一直处停滞、静止的状态。”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确如西方思想家们所指，主导中国人思想的孔子和儒家学说是中国两千年停滞不前，对世界文明进步，特别是对科学，缺乏贡献的主要原因。

孔子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不断吹捧拔高，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越来越专制，发展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以礼杀人地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越来越专制。唐朝的大臣与皇帝坐而论事，宋朝大臣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跪着还不许眼睛上抬，还发展出了“奴才”的自称。由于中国受儒家专制思想影响太深，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历史上鲜有批孔者。清末民初，中国在思想和言论方面空前自由，批孔的思潮兴起。但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批孔者们大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专制。“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孔教的同时不容反对意见，鲁迅对旧礼教旧道德极端地否定，但他自己的思想与儒家一样专制，不容忍不同意见，一遇争论便恶毒谩骂，声言“绝不宽恕”。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没有形成制约统治者权力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成为在制约统治者制造灾难方面最无能的群体。

批孔运动成了文革青年突击补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学习运动。因为，各单位都举办“批孔讲座”和“儒法斗争史”讲座，迫使青年们学习中国历史。不过，由于非党化的书籍被禁止，人们能够读到的历史书籍全是杨荣国文章一样的党化之言，所学都是中共党化的历史观和谩骂攻击的伎俩。如果说李贽、陈独秀等学者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批判有进步意义的话，则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则全无进步意义。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完全剥夺思想言论自由，推崇比儒家更加专制、暴虐的法家，因而没有资格批判孔子。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以谩骂为主要特征。谩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欣赏鲁迅的谩骂，在自己的讲话中、著作中，诗词中多有谩骂。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开始，批胡适，批红楼梦，批《海瑞罢官》，批《清宫秘史》等等文章都以谩骂、扣帽子和整肃威胁为能。在毛泽东统治下，红卫兵，文革“大批判组”、各级中共宣传部门写作班子的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中充斥谩骂。“批林批孔”运动更加如此，运动以漫画、大字报、儿歌的形式谩骂孔圣人，谩骂林彪。这种谩骂运动不配称批判，只是打着批判旗号的暴民运动、痞子运动，留给一代青年的主要记忆是“孔老二是丧家之犬”、“林秃子”等等辱骂之词。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晚期极度黑暗的写照。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时，毛泽东无事生非，发动“批孔”以满足自己的斗争嗜好，不是批判孔子、儒家思想的专制，而是借推崇法家将专制更加升级，发动批林彪，借批判林彪尊崇的“克己复礼”来反对恢复秩序，鼓吹“二次文革”，希望天下保持大乱，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对国人严格保密。批林最批林批孔运动显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逆来顺受，接受统治者的任何荒唐指令，在制约统治者干坏事方面比孔子时代更加无能。在毛泽东发动批了孔运动时，蒋介石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成立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中国文化大学”致力保护和研究传统文化。两岸这一对比足以证明当年讨赤战争的正义性。

四届人大

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检察院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听取和审议这些报告，国家财政预、决算须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然而，这些条款从未被遵行。实际的情况是，人大在所有上述事项方面完全服从毛泽东的个人决定。1957年，中共发动了违反宪法的反右运动，将很多人大代表打成了“右派”，提前6个月于1958年2月召开了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胁迫众代表举手通过开除右派代表的决定后将人大废弃。刘少奇被整死后，毛泽东面临换国家主席须经人大向国人交待的难题。1970年3月，毛泽东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变更国体、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反对“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林决裂，召开四届人大之议被搁置。1974年，毛泽东在统治危机中改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同时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以营造安定局面。新政协以来，政协、全国人大完全是中共的橱窗装饰，其开会时间、地点、人物、讨论事项，决议事项完全由毛泽东说了算。此次也不例外，周恩来拟出了2864位代表的名单，经毛泽东画圈，这些人就成了人大代表。1975年1月，全国人大在被废弃十年后重开。会上，周恩来抱病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代表们发言表态拥护“批林批孔”运动，举手通过中共拟好的各项决议和新宪法（七五宪法）。

七五宪法总共才三十条的简单条文主要由中共政治运动术语而非大法律语构成。例如，“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等等，整部宪法基本都是党化内容。七五宪法抛弃“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宪政原则，在序言和总纲中规定中

共的领导地位，在条款中规定了中共中央拥有军事领导权和统率权（第十五条），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权（第十六条），总理提名权（第十七条）等诸多权力，但又没有规定中共行使这些权力时应当遵循的程序，实际规定中共的权力不受制约。七五宪法中虽删除了“七零宪草”中关于林彪的所有文字，但仍多处提及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等人名，与北朝鲜宪法并列为世界上仅有的两部鼓吹个人崇拜的宪法。

由于宪法携带过多的一党之私和领袖的一己之私，中共制定的宪法不可避免地随着领袖更替，政策变动而改来改去。三年后，随着中共领导层变动，中共第三次修改宪法（七八宪法）。修改后的宪法仍像是中共内部文件，充斥“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中共政策表述。唐朝时，中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各主要宗教均在中国自由传播。唐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从未规定国民必须信仰某一宗教。进入二十世纪，历届民国政府积极推动制宪，走向立宪共和，维护信仰，组党结社自由。然而外国输入的革命使中国人信仰越来越不自由，国民党主政后强迫国民信奉三民主义，共产党建国后更加倒退，规定不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拥护中共的领导即犯法，强调执政党的权力不受制约，实际宣布中共有权发动镇反、反右之类的整肃运动，有权杀害它认定的“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几位青年以李一哲之名在广州街头贴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一时观者如潮，道路堵塞。大字报作者们不知道林彪与毛泽东分歧的根源所在，

在毛泽东与共产党正确，林彪集团反动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不可能讲明白什么道理。但是，其中呼唤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之言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届人大对呈给它们的大字报意见书不予理睬。这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中共中央批准，人大代表们无权对民间意见书作任何表示。主政广东的赵紫阳没有按江青所言，将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也只能按照中共传统作法，将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将三位作者分别被拉到各厂矿、机关接受批判。由于赵紫阳指示可以让作者讲话，批判会成了“大鸣大放”以来久违的政治观点辩论会。不久，韦国清主政广东，将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判刑。文革结束后，接替韦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将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以及一大批受牵被捕判刑者释放。他在平反时说：“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样的话听起来开明，但不可当真。习仲勋敢于平反“李一哲事件”是因为那张大字报通篇没有批评共产党，是“献给毛主席”的。如果大字报批评了共产党，他是不会给平反的。事实上，他对于广东当局在历次整肃运动中的迫害、屠杀都采取了回避，并没有说“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批判安东尼奥尼

1970年11月，中国与意大利建交。1971年，周恩来邀请意大利著名左派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以向西方世界宣传文革中国。这时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无知，政府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严加防范，除事先审批的区域、路线外一律划为禁区。1972年春，安东尼奥尼率摄制组一行四人从深圳罗湖桥入关，前来拍摄文革中国。他原准备在中国随意拍摄半年，但中国政府要秘密安排人到拍摄地点打前站，召集会议，制作布景，指导群众排练，暗布岗哨便衣等等，工程浩大，周恩来亲自对安东尼奥尼一行的拍摄作了安排，要求在22天内拍摄天安门广场、王府井、上海的工厂、

南京长江大桥、苏州园林美景和农业样板河南林县的红旗渠等指定景点。安东尼奥尼无奈地接受了快速拍摄指定景点的安排。

拍摄中，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严格指定拍摄内容，十多位官员全程陪同感到沮丧，对明显造假的场景不感兴趣。例如，他们发现，前一天约好要拍农民石头房子，第二天整个村庄的石头房子被粉刷一新，失去了韵味。作为纪录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不想拍摄当局指定的场景，不想使自己的纪录片成为虚假的宣传片，认为影片的中心不是建筑，而应是人，要求拍摄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于是，他将当局指定要拍摄的天安门、长城、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等建筑作为背景，尽量以偷拍、改变路线等方式拍摄非指定的场景和画面，尽量拍摄当地人的面孔、衣着、言谈举止。1973年，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罗马首映。影片展示的文革中国景象引起了轰动。美国广播公司以25万美元买下了影片在美国的电视公映权。影片在美国播出后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被评为1973年的“十佳纪录片”。不久前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两次观看了影片。

出乎安东尼奥尼的意料，影片引起了中国当局的不满。对电影极为关注的江青首先发难，指责影片“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给文革抹黑”，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江青召集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电影《中国》展开了调查，随后提出调查报告，称电影《中国》是外交工作“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物。毛泽东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影片后决定，禁止影片在中国上映，对其展开批判运动。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批判道：“安东尼奥尼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比如上海黄浦江边有万吨油轮，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大货轮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南京长江大桥雄伟壮观，摄影师却从桥下往上拍，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得到庄严肃穆的表现，拍

摄了大量广场上的人群，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侮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文章指责安东尼奥尼“像间谍一样”偷拍，称影片解说词“诬蔑工人讨论会是被事先安排，发言重复而单调”，“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人民日报》批判文章发表后，其它报纸奉命跟进，形成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共将各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辑成了一本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集。运动中还出现了如抗美援朝运动中一样的政治儿歌，其中一首是：“红小兵，志气高，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奉命参加批判安东尼奥尼集会的国人更对影片充满好奇。大家虽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都清楚，文革中国的真实的生活其实比“安东尼奥尼污蔑”的更糟。远在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得知中国的报刊的批判运动感到莫名其妙。他记得影片在意大利上映时，几位中国官员观后曾对他说：“您带着非常深情的视角看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谢您。”他不能接受中国官方的批判，对《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个人攻击和谩骂感到愤怒。

三十年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纪录片《中国》首次在中国小范围公映。安东尼奥尼请友人代致贺辞说：“当我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个等待很长。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使我感到彻底的安心。”当少数国人补看三十年前参与批判的电影《中国》时发现，其中的开会发言，边走边喊口号，学生舞蹈等场景明显是预先排练的结果。人们这时才明白，安东尼奥尼执意捕捉真实生活的场景是为了捍卫纪录片的尊严，因此触怒了中国当局。不过，安东尼奥尼的抓拍没有能捍卫纪录片的尊严。国人观后还是感到它是虚假的宣传片。在党国体制之下，在中宣部操控审查之下，新闻就是宣传，新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注定是宣传片，外国导演拍摄的也不可能例外。

张志新就义

1968年，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张志新因发表反对文革运动的言论遭到残酷批斗。省委专案组整理出的“张志新反动言论”主要为：“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个人不能凌驾于党之上，谁都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林副主席是毛主席左倾路线的主要成员，是使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1969年，张志新写下遗书和给丈夫孩子的诀别信，准备自杀，被发现后罪加一等，被捕入狱，受牵连的丈夫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

狱中，张志新拒绝认罪，继续批评毛泽东和文革运动，被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狱方对张实施了非人的迫害，恶毒手段包括：关“小号”：将她关在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中；单独长期关押；毒打；连续审讯不准上厕所，逼到她尿裤子；不提供女犯月经用纸，致她裤子上沾满经血；借口怕她隐藏反革命材料，逼着她当着男狱卒的面换衣服；唆使刑事犯人轮奸她；强迫她签署离婚同意书；长期带脚镣和手铐等等。残酷的迫害使张志新闻歇性精神失常，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对张的精神失常之举，狱警在上报时称她“装疯卖傻”。[8]

1975年，中共辽宁最高领导人毛远新下令处决张志新。刑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9] “张志新痛苦得咬断了自己的舌头”，[10] 其惨状令一女管教员昏倒在地。4月4日，张志新被人架上了沈阳第四监狱的公判大会台上，宣判

后被押到沈阳大洼刑场枪决，随后尸体“被剖腹挖心，取出内脏后才被火化”。
[11] 在被关押的六年中，张志新与家人音讯断绝，美丽的长发几乎被拔光，到死也没能再见到丈夫和十几岁的女儿、几岁的儿子。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后来披露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说：“1975年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沈阳法院来的人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阶级斗争的，另一段是讲镇压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已同张志新离了婚。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只听人说妈妈是反革命。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去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我在写好的东西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不敢出声，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我和弟弟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扑进爸爸的怀里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12]

文革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推动为张志新平反，追认张为烈士。经过加工，张志新被宣传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采访了张志新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了张住过的“小号”，被割断喉管的监狱刑讯室，翻阅了张志新的案卷，含泪写下出了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但这篇通讯因所披露的事实过于悲惨被禁止见报。胡耀邦再亲自过问，批准该通讯发表，但要求只提张志新“反对四人帮”，隐去张获罪的真正原因——批评毛泽东，以及刑前被割喉管以防喊冤的情节。《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在《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发表后，报社收到全国各地几大麻袋的读者来信。国人愤怒要求彻查张志新案，严惩凶手。胡耀邦清楚，张案的凶手并非个人，批示终止对张案的进一步调查以维护中共形象。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酷刑折磨共产党人。小说《红岩》是中共推出的具代表性的宣传品。其中江姐遭受酷刑的描写是虚构的。小说的作者们在被捕期间并未受国民党当局的酷刑折磨。为了服务党宣传目的，他们在作品中编造了中美合作所酷刑折磨共产党人的故事。尽管编造，作品中江姐的监狱中绣红旗、抗议狱警不人道、抗议饭菜质量不好，临刑从容化妆打扮，换上漂亮旗袍等情节也说明了国民党监狱的宽容与人道。坐过国民党监狱的《红岩》作者忍受不了共产党的折磨，在文革中自杀。幸存的党文艺家们不会想像到，天下会有关押张志新那样“小号”，会有割喉、轮奸这样恶毒的迫害。

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健康每况愈下。中共中央不断翻新花样侍候毛，于1974年命中央电视台开通专门服务毛的第五频道。国人不知道，这一电视频道是根据毛的喜好安排节目的。一次，电视台根据毛泽东要求将刚播出的节目重播一次，不明就里的观众（也多半是高层）向电视台投诉，电视台只好谎称安排失误。由于毛泽东经常要求重播节目，中共中央无法对外解释，于是决定专门制作一套有线电视节目供毛一人观看。[13] 毛的视力日益衰

弱，这时已经无法看书。1975年初，他吩咐物色一位“讲史”人给他读书听。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送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四位教师的档案资料，毛选中了女教师芦荻。芦应秘书电召，半夜骑自行车到中南海来给毛泽东读书听。听书中，毛泽东不时与芦荻谈论《水浒传》。毛毕生喜爱《水浒传》，在书房和卧室里摆放了十二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百读不厌。他曾对斯诺说《水浒传》是对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芦荻顺着毛泽东的兴趣，请毛指教怎样读《水浒传》，毛高兴地发表见解，芦将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再念给毛听，请毛认可。姚文元见此记录后建议印发政治局成员，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发表，建议获毛批准。江青读此记录稿后发话：“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她要求，发动一场像十年前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的政治批判运动，通过评《水浒》、批宋江制止邓小平否定文革的整顿。

1975年8月，《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推出了一批评《水浒》、批宋江的文章。其中，经姚文元修改的《评〈水浒〉》长文称：“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上海《文汇报》跟进，在社论中说：“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跟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各报刊上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多达千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堆满了书店。

生活穷困，精神愁苦的国人对中共一年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就感到莫名其妙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中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百姓纷纷猜测宋江所指是何人，晁盖暗示何人、招安、投降派何所指。在9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突然以批《水浒》的话题打断邓小平关于农业和整顿的讲话。江青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评《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江青的“架空”、“投降派”之言让人感到，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所指是周恩来或主持政府的邓小平。邓小平感到“批宋江”运动是针对他主持的整顿，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在大会场合大批党内投降派不妥。毛泽东斥江青说：“放屁！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其实，江青所言才是毛泽东的真实意思。毛泽东确实担心被架空，于是发动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运动，借以打击周恩来，警告邓小平不得否定文革。与“批林批孔”运动一样，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末期极度黑暗的证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理国计民生正事，白天昏睡，半夜听读古书，发动让国人猜谜的批判运动，先是批孔、评法反儒、再来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比帝王多怪癖的明朝更加黑暗。

《水浒传》是说书人经历四百年添枝加叶编成故事。据胡适先生考证，《宋史》《本纪》记载：“徽宗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降之”，最初《宋史》、《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了元代添加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加到了百零八人，声势变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几百里”的水泊梁山，宋元的一伙强盗到了明代成了仁义英雄，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民生的忠义堂了。《水浒传》是游民思想的代表作。游民群体无业、无产，无责任

心，无是非准则，无道德底线，无同情心，敌视一切规则、秩序，是非善恶准则与主流社会颠倒，希望天下大乱，崇尚血腥、暴力和阴谋诡计，只求实现自己的野心。在游民眼中，任何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勾当都可以是义举，为达目的，杀人一家老小也会很坦然。元人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中李逵所言“俺山中快乐，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体现了游民崇尚暴力血腥。说唱本《花关索出身传》开篇表达了同样的杀人坦然：“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我家老小，我杀哥哥老小。’按照约定，张飞跑到蒲州解县，杀了关家老小十八口（因不忍，而带走了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妻胡金定，后来胡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则将张飞家小斩尽杀绝。办完后，弟兄三个登程，替天行道作将军去了。”“游民说书人编出的这个残忍、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儒家礼教和主流社会的家庭观念。沉沦社会底层的游民期望天下大乱，愿铤而走险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有杀掉全家去干大事业的独特想法。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13]

《水浒传》所表达的游民思想、行为准则在历代造反领袖身上都有体现，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从思想到行为都属于游民群体，都反对秩序，崇尚暴力与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都有关、张杀人一家老小的那份坦然。黄巢落弟后的“我花开后百花杀”，毛泽东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等诗句表达了希望天下大乱、杀人如碾死蚂蚁的思想。中共长期歌颂的太平天国暴乱是游民知识分子为实现个人野心制造灾难的典型事件之一。几个心怀野心的游民知识分子策划了“金田举事”，拜上帝教教众不知他们“立江山”的计划，“因食相随”。[14]“贼自金田出发，……纵火焚大黄墟，悉掳其众”，[15]“足迹所至，都掳掠烧杀，……叛党剧增”，[16]“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

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17] 太平天国维持战斗力的主要手段焚屋掳掠，逼迫被焚屋掳掠者再去焚屋掳掠他人，使暴乱军如滚雪球般壮大。后来的会党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都是如此，参加革命者或为出人头地，或“因食相随”，或被裹挟没了退路。中共所称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心怀不逞”的游民心态其实是一回事。社会改良需要依靠正经的士农工商，暴力革命则需要依靠希望天下大乱的游民。日本人策划辛亥革命依靠游民（会党），苏俄策划中国共产革命依靠的也是游民。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本质上都是游民革命，或称痞子革命。在同盟会内，更具主流社会思想的章太炎、宋教仁必然让位于更具游民特点的孙中山；在中共党内，受正规教育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张国焘必然让位于《水浒传》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国难当头时提出避免对日作战，专注壮大的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而张国焘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怎么能说一套作一套玩弄骗术呢。他不明白，暴力革命党是游民党，革命党内权力斗争中都是更具游民思想，更不择手段，更残忍者胜出。

毛泽东全面传承了《水浒传》中体现的游民思想，反对秩序，崇尚暴力与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希望趁天下大乱一步登天。他的上述思想特点正合苏俄输入暴力革命的要求。湖南农民运动时，他撰文为农运中的杀人放火叫好。从井冈山到北京，他不断指示放手杀人。与游民社会一样，毛泽东是非善恶准则与主流社会颠倒。他身边的侍女孟锦云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在发动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期间，毛泽东与侍女们一起观看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的《云中落绣鞋》。故事梗概为：员外千金不慎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两位青年响应，商量好一个下井救人，一个在井口拉绳接应，救出小姐后由小姐决定嫁给谁。井上青年待小姐上来后堵死了井口，娶了小姐。井下青年好人有好报，得神仙救出。小姐夜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想起下井救她的青年。于是员外赶走了狠心赌井口的青年。看完电影，毛泽东对孟锦云、张玉凤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侍女惊愕，毛解释道：“那个井上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缺乏周密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有侍女道：“井上青年不老实。”毛：“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能得到她吗？”[19] 基于颠倒的是非善恶观，毛泽东以“大鸣大放”号召设局，布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陷害百万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他看来，青年们上当是他们自己无用。毛泽东“死三亿还剩三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等等想法都是《水浒传》中的游民思想的再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李维汉建议毛泽东删掉关于痞子最革命的论断。[20] 毛泽东虽然接受了建议，但坚持痞子最革命的观点。历史上游民革命领袖们都怀有一个皇帝梦。毛泽东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他还怀有一个世界革命领袖梦。从建国开始，支配毛泽东思想、政策的就是他的“世界领袖梦”。他不仅发动国内的战争，还发动外国的战争，为了听外国党领袖前来汇报工作，他不在乎抛洒巨额金钱。他的一大堆血腥屠杀指示，一连串阴谋诡计，发动连绵的战争与整肃运动，一大堆怪异语录、怪异作法，都可以在《水浒》中找到思想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他将一部《水浒传》从小读到老。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月，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及第一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这时，文革的混乱使工业生产大幅下滑，铁路呈半瘫痪状态。毛泽东对工业生产下降和民生困苦漠不关心，将向越共、柬共运送物资看的比什么都重要。文革中，他指示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大规模镇压造反派就是因为造反派堵了铁路，抢了援越军火物资。此时，他决定起用邓小平实施整顿，要求整顿铁路，不容铁路瘫痪影响输出革命和对外援助计划。

上任后，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首先整顿铁路运输，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发出整顿铁路的九号文件。万里受命，铁腕撤了一批文革造起家的领

领导人，使铁路运输迅速恢复了畅通。随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政治经济秩序，扭转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派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整顿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推动教育界展开了关于科学文化知识的讨论，解禁了《创业》、《海霞》等一批被批为“毒草”的电影，主持下达了一系列调整经济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文件，刮起了一股整治文革乱局的旋风。

整顿各经济部门的同时，邓小平推动将对外援助大幅减少，从 1973 年的占财政总支出 7% 以上削减至 5% 以下。减少无偿对外援助立即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证明了无偿对外援助是国家财长期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相比微乎其微的教育，科研和人民福利开支比例，5% 财政支出的对外援助仍是极大的数字。无偿对外援助的减少原因不仅因为邓小平推动削减，而是因为越共倒向了苏联，不再服从中共指示，毛泽东决定减少对越共的援助，转而大力援助柬共，使对外援助总额大幅减少。

与刘少奇在大饥荒后的救灾举措一样，邓小平的整顿举措必然改变毛泽东的灾难政策，同样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担心邓将来否定文革，对他清算，命邓主持作一个中共中央决议，对文革作“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邓小平重申“永不翻案”，但推托评价文革，说自己在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成了脱离文革运动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不适合出面主持作出评价文革的决议。毛泽东闻言认定邓有否定文革之心，决定批邓。奉毛指示，迟群、谢静宜于 1975 年 11 月在北大、清华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贴出大字报，将邓小平主持的各项整顿措施批判为复辟，将邓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文件批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1976 年 1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正式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称：“《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

可见，毛泽东几个月称江青“不懂事”不是真话，将批《水浒》引向批邓的主意来自毛泽东。

《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发表后，邓小平整顿旋风迅速夭折，各地重新开展起层层揪斗“走资派”得各级政府机构再被冲击、改组，大批刚刚复职的领导干部再被批斗，许多恢复失序的文件、章程、制度再被废除，刚刚有点恢复的经济再陷衰退，铁路运输再陷半瘫痪状态。“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说明，只要毛泽东在位，他是不会让人民过安生日子的。

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各地的民众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成千上万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苦难中的老百姓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宣布现代化目标的周恩来当作了反对文革，引领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一时，举国悲痛，到处可见普通百姓为总理逝世痛哭的场面。当时国人不知道，周恩来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毛泽东制造连绵灾难的主要帮手。

1940年，周恩来在电报中开始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21]率先推动领袖独裁；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回延安欢迎会上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2] 他称自己在抗战之初的对日作战主张为“迷失”，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对日避战政策；延安整风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成为中共党内崇拜

毛泽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在讲话中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三个中国革命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并率先将“毛泽东同志万岁”[23] 口号搬到了党代会上；中共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上，他出面说服彭真等人收回了限制领袖权力的“党主席只得连任一届”提案，维护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大饥荒中，他下令将财政部副部长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联名上报的显示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统计汇总报告“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指示公安部将各省人口统计数字列为“绝密”资料禁止查阅，[24] 在“七千人大会”上出面为毛泽东开脱，帮助毛泽东稳固了独裁地位；饥荒刚过，他积极推动了崇毛运动，催生了几年后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他帮助毛泽东趁刘少奇出访发动了党内政变，整肃了彭真、陆定一，然后亲赴大连说服称病不肯进京的林彪进京保驾，协助康生等人起草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出面提名江青掌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25] 帮助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帮助江青摆脱了不得干政的限制，进入最高层；红卫兵运动中，他两次去清华大学，在万人大会上演讲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他常常在红卫兵打死名人后匆匆而来，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名人的抓捕或者处死指令是周所签署；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力荐林彪为副主席和接班人，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26] 他提出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带领十万人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7] 中共九大前，他吹捧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我们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八一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28] 他提名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叶群进入了政治局。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以音乐、舞蹈、歌曲等形式向毛泽东表达效忠，是崇毛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推手。有红卫兵回忆说：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29] 他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30] 在出访归来的飞机上，他提议唱《东方红》，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31]

周恩来表面慈善内心冷酷。1954年，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获悉周恩来将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策划在代表团将乘的班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周事先得到了暗杀计划情报，临时改乘其它飞机，但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让八名中国代表团成人员作替死鬼以使自己更安全。[32]文革中，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专案组及地方各级专案组，整肃了两百多万干部，签署了几乎全部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导全国文革的文件，作出了无数迫害批示。文革迫害面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自己成立专案组实施迫害。[33] 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他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决定的。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34]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周恩来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诬陷性质。他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知之甚详，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他。

[35] 他明知大量供词和证据系严刑逼供得来而据以整人。他在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6]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评论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

[37] 以同样的整肃方式，周恩来主持将上千党政军高层官员逮捕、定罪。在他而言，材料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办事。例如，他签署了贺龙逮捕令，并“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8] 称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同时称许光达为“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39] “九一三事件”后，他又主持了中共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40] 再以同样方式逮捕、清洗了上千高层成员。周恩来操办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迫害，批示“同意”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判处死刑，批准逮捕他的养女孙维世，批准杀害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下令逮捕跟随他几十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文革后，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发现，中央一级文革冤案的逮捕令基本都是周恩来签署的。

从延安整风到去世，周恩来始终对毛泽东诚惶诚恐，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恩来都不敢做主，要送呈“请主席批示”，待毛泽东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41]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42]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

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43] 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44] 周恩来伺候江青也如同奴才。黄永胜披露：“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后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著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45] 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周恩来提名江青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虽未同意，但也心领了周恩来的美意。

图片

中共长期宣传周恩来勤政爱民，生活节俭，而隐瞒了周恩来的真实一面。在国难民困，前线将士饥寒交迫的 1938 年，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与南开中学同窗周恩来在汉口相遇。吴在家宴请周恩来，花费十六元。周恩来回请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席，另上好酒。同席的南开校友，外交部秘书段观海不禁问周：如此破费，你的薪金是多少？当周答五元薪水时，在场人都惊奇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段指周恩来身穿的缎子狐皮袍问：“难道这

也是组织供给你的？”周答：“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段大笑说：“这样我也要作共产党员了。”[46] 在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周恩来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一杯接一杯，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从饥荒到文革，周恩来批示消费的茅台酒以吨计。在国民经济崩溃，人民极度困苦的 1970 年，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在白云山为毛泽东、周恩来开建行宫（705 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 3 万吨，总开支以亿计。据经办广州行宫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回忆，周入住行宫后很高兴。中共当局在 1970 年还为周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只不过这些事情在中共不允许人们提起，所以不为人所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披露，一次他半夜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周当时还拥有漂亮的专列。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说，当年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时曾对陈毅抱怨，说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时，经常到吃中午饭了才起床。那些每天排队等周批文件的分工秘书对周的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曾有秘书跟张闻天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指周恩来）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要求宴请要简单，这就同周恩来有矛盾。周恩来要讲气派，吃得好，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47]

个人吃喝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文革中的国人不知道，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与毛泽东黑箱作业，将千亿民脂民膏赠送给了亚非拉数百国家、政党和野心家个人，他主持对外援助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959 年，在各地饥荒扩大之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决定主持颁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禁止农民逃荒，实际是要求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在各地农村饿殍遍地的大饥荒中，他多次下令加紧征购粮食以出口换黄金，继续大规模无偿外援助，继续向非洲国家运送数以万吨计的大米、小麦；1961 年底，当时的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搞了各地饥荒情况调查，

将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周看过报告后下令马上销毁，并在几天内亲自追问是否已经销毁了这一报告。他主持的中国政府几十年不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不建民宅，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将国人的血汗钱抛洒国外，用于策动暴动，挑起战争，输出军火包括毒气，仅援助越共的 200 亿美元，援助柬共的几十亿元已经使印度支那血流成河了。到他病重时，中国对外无偿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 7%。当他在任上去世时，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很多地方的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北洋政府和民国历届政府和地方统治者几乎全体热心教育，关心民生。而中共宣传的“人民的好总理”帮助毛泽东制造了不间断地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灾难，尽量压低教育经费，尽量不建民用设施，长期坚持将国人血汗钱赠送给外国人，古今中外，这样的总理找不到第二位。

弥留之际，周恩来让人读毛泽东的诗，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48]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应不会对毛真心崇拜。如果说，从延安整风到病重周恩来有必要作崇毛表演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遗嘱不留骨灰后已没有必要再作表演了。人们无法理解，周何以在弥留之际还作崇毛表演。也许，因为厚黑功夫深入骨髓，他已经欲罢不能了。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病入膏肓不假，但没有出席周的追悼会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因为他在几天之前还接见了尼克松女儿夫妇。在老百姓自发地展开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毛泽东指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在三星期后的除夕夜，中南海游泳池院子中传出了鞭炮声，弄得中南海警卫人员极为紧张。京城的居民听到了鞭炮声，人们流传：毛泽东破例放了鞭炮是在庆祝周恩来先走了一步。几个月后，身体健康的朱德突然去世，被怀疑也与毛泽东让对手“先走一步”的心思有关。革命家之间就是如此。冷酷是革命家、革命领袖的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年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人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献花圈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统治的不满。广场上出现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等人诗词，其中著名的诗句有：“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另有人贴出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标语。4月4日夜，当局派出警察把花圈收走，愤怒的民众烧毁了汽车和房屋。当局调工人民兵清场，拘捕了数百不肯离去的民众。毛泽东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邓小平为事件的幕后黑手，在两天后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立即上书毛泽东，表示对决定“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最后的心灵对话。毛泽东知道老百姓对文革不满随时爆发，文革和他的统治已走到了尽头。虽然他曾说“我什么都不怕，上帝已经在呼唤我了”，表示对身后的任何灾难都无所谓，但还是为防止身后被清算作了精心安排，以保留邓的党籍的方式为邓安排了东山再起之路。毛的考虑是，如果江青为首的文革亲信及几位顾命大臣不能成功接掌大局时由邓出来掌权。他依然视邓小平为亲信，相信邓不会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最后判断正确。

唐山大地震

7月28日3时42分，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整个唐山市被夷为平地。关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官方公布为24万，民间说法是五六十万。不管哪一数字，唐山地震创下了世界震灾伤亡人数的最高记录。就地震的强度、裂度、震源深度而言，唐山地震不列百年十大强震。从震区人口密度上讲，日本的关西、关东地区都比唐山地区人口更稠密，但“关西大地震”的伤亡人数却比唐山地震少得多。在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发生的8.8级特强地震，是历史记录中的第五强震，死亡仅711人。唐山大地震是天灾，但巨大的死亡人数背后是人祸。

首先，这时中国的民房主要为旧房危房，民房遇震全部倒塌是唐山地震伤亡人数巨大的主要原因。建筑物质量差为地震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专家的共识。整个毛泽东时代，世界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民房建设如火如荼。但在中国，毛泽东将民财尽量用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向亚非拉各国输出革命、“三线建设”，陷中国人民于长期贫困。由于国家垄断民生资源，百姓不可能建住房，除国家机关，大型国企有一些新建筑外，国人都清末民国留下的砖瓦房、土坯房、旧窑洞、茅草屋内，与同期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为民生大力投入资金建安工程形成天渊之别。

其次，政府在灾害发生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毛时代的政府一贯在灾难后喊“自力更生”口号，见死不救。几年前云南通海大地震后，政府就以“自力更生”口号为借口见死不救，使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中大批死亡，政府的所谓救灾举措不过是派军队埋死人。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中，洪水淹死十万人，而洪水后因政府见死不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死亡的灾民人数高达十四万人。唐山震灾后的情况一样。地震发生后，各国先于中国报导了地震的新闻，纷纷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K. J. WALDHEIM）表示联合国将动员成员国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英国愿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日本外相宫泽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指示孝川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已准备就绪。忙于权力斗争的中共政治局决定拒绝国际援助，宣称：“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有一套应急系统，备有灾后最需要的药物，衣物，帐篷等物资，但被中国拒绝。建国以来，中共发动连绵不断的整肃运动，不关心民生，推卸备灾、救灾责任，不设救灾应急系统，不制定救灾预案。因此，政治局派军队救灾的决定只具象征意义。少量军队赤手空拳来到灾区，只作些用手扒的象征性救援姿态。唐山离天津大沽港只有几十公里，但救援的重

型机械在十天之后才运到达灾区，救灾最需要的药物，衣物，帐篷等物资基本没有。在地震后最关键的数日中，灾民没有得到救援。当重型机械到达灾区时，被困废墟中灾民因受伤、饥渴、高温差不多死光了。由于三伏盛夏，大量尸体无人清理，瘟疫来袭，造成更多的死亡。

人祸不仅表现在见死不救方面，还表现在封锁消息方面。建国以来，媒体被彻底党化，所有新闻须经中共宣传部门批准才能播发。早在 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导的指示”中就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导，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导灾情”，此后，中共控制的新闻传媒形成了“灾难不是新闻，宣传党领导战胜灾害才是新闻”、只报喜不报忧，封锁灾情，特别将死伤人数保密的传统。

1970 年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 1975 年的“七五八洪水”的灾难后，当局都是封锁消息，掩盖灾难，见死不救。唐山地震灾难后，当局仍是按照传统先是向国内外封锁消息。然而，地震瞒不住，各国主动申请救援的电报让中共中央明白，封锁地震消息已无意义，于是批准新华社向世界宣布发生了地震。中国的第一篇报导是人民日报的《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一文。这篇报导从标题到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共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文中用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将灾情一笔带过，将震灾的具体情况，人民死伤情况向国内外隐瞒，完全没有救灾举措和援助呼吁。直到三年之后，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才批准报导灾情，是为新闻学中“迟到新闻”的典型。而领导人批准的报道还不是全部事实。因为，党化传媒的报导须经宣传部审查，审查意味删除部分真相，所以报导永远值得怀疑。

唐山地震还暴露出文革国人的道德沦丧。地震后，幸存者为了生存开始在废墟中捡拾维持生命的物品。随着越来越多物资被发现，捡拾迅速发展成了趁灾抢劫的狂潮。众多的幸存者不是去救被困者，而是到商店、仓库的废

墟挖掘财物，从死尸手上摘走手表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灾区周边的村民闻讯赶着马车，带着工具奔向唐山灾区，不是来救援，而是来哄抢物资，直到公安部门奉命开枪才被制止。唐山灾后抢劫潮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国人被长期阶级斗争教育得残忍而自私。清末民国时，中国北方两次发生“大鼠疫”，整个灾难过程中社会秩序井然。可以说，“唐山大地震”若发生在袁世凯督直时代，趁灾抢劫事件断然不会发生。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永久供奉毛泽东遗体，致电有保存胡志明遗体经验的越共专家来京协助遗体保存。11日，华国锋护送毛泽东遗体到305医院作防腐处理。12日，政治局作出在天安门广场修建纪念堂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18日，中共在北京为毛泽东举行了追悼大会。当时中共中央的三位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由谁致悼词等于是宣布谁是权力继承人。经叶剑英提议，政治局决定由王洪文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与孙中山去世时的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华国锋以推动崇拜运动来证明自己的传人地位，背弃毛泽东1956年率151位中央领导人签署身后火化、不建坟墓承诺书，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下令成立了以吴阶平、林钧才等医学专家为首的防腐处理小组。这时，列宁遗体腐烂，躯干被火化，以人造躯干和蜡制鼻子、耳朵填充等情况已经不是秘密。华决定使毛泽东的遗体面临列宁遗体一样的腐烂，肢解，替换，逐步真假参半，最后以假乱真的过程。根据华国锋的供奉毛遗体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考虑的陵墓方案有：中南海、北海、昆明湖的“水上日出”方案，瀛台岛方案，香山、景山、玉泉山的“山顶红星”等方案。[57]中共从中选定了最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供奉毛泽东遗体。9月20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护送毛泽东遗体到毛家湾，专家们在地下手术室开始对毛泽东遗体进行保存处理。10月，华主持作出中

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在天安门广场供奉毛遗体。中共在皇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建陵墓的决定大悖于中国的传统，破坏了皇城的布局与都城的风水，使中国进入了极少数干尸崇拜的专制落后国家之列，为日后处理皇城中心的陵墓留下了难题。为一党之私、一己之私，华国锋以强迫人民继续崇拜暴君的方式报答毛泽东的提拔之恩。在操办供奉遗体 and 建纪念堂过程中，他下令选用昂贵的氦气和江苏东海县“甲天下”的水晶，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切为此让路”。1976 年底，华国锋主持在天安门广场开工建陵。中共中央发出号召，不是号召援助寒冬中无居的唐山地震灾民，而是要求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优先向毛泽东纪念堂工程提供人财物。这种置无助灾民于不顾，将建纪念堂作为第一要务的行径与大饥荒中的毛泽东与中共大员们置灾民于不顾建行宫的行径一脉相承。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其实党的利益凌驾一切，而中共党的利益总是害民的。不是吗？建国之初，毛泽东拒绝了保留北京旧城另建新都的建议，就是因为要住皇庭。从建国到去世，毛泽东作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祸国殃民的，而全体高层都全体拥护了毛的决定。新一届中共领导层作出最损害国家人民的决定并不奇怪，专制体制必然延续毛泽东统治的作法。

毛泽东的一生祸国殃民。他发动连绵的整肃运动，迫害人民，摧残教育，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传统，破坏文物古迹和自然环境，对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他是造反领袖和一代帝王。了解了历史上造反领袖和帝王才能了解毛泽东。造反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嗜杀。唐太宗李世民残暴异常，灭门杀害亲兄弟，经他追求霸业的隋唐之战，全国人口从隋时的 4000 多万，减至贞观初年的不到 1000 万；[49] 黄巢率军围困陈州时大军断粮，下令以吃人来解决军粮；[50] 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杀得全国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其中四川被张杀得百里无人，清廷后来只好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洪秀全在广东老家教书时曾作《百正歌》，在歌中指黄巢、李闯为邪恶，劝人去恶从善。然而他的太平军与黄巢、闯、献一样残暴，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入伙，他的太平天国造

成中国人口减少了四成。毛泽东比历史上的造反领袖更加嗜杀。从土地革命到井冈山，他为杀人叫好，亲自指挥杀人，仅几年就使井冈山地区人口大幅减少。苏区肃反中，他指挥杀人数万。国共战争中，他实施了围城战术，仅在长春就饿死了数十万平民。建国后，他的批示、讲话中充斥杀人令，他发动的历次运动杀人百万计。

帝王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在永远的霸业梦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武帝晚年生活在被夺权的猜疑中，杀太子、害皇孙、逼皇后，自灭三族，将长安城变成了恐怖世界；朱元璋登基后陷入恐惧，不断制造大规模屠杀，把跟随的造反“淮西帮”功臣几乎杀光；[51] 明成祖朱棣同样因恐惧而嗜杀，发明了“灭十族”杀法，并且与其父一样下令将所恨的人碎尸喂狗；[52] 明洪秀全登基后始终生活在丢失宝座的恐惧之中，血洗了天京。与历史上的帝王一样，毛泽东也生活在霸业梦想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为了霸业梦，他不停地发动战争。为维护权力地位，他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他以战争和整肃运动为生活方式，以此驱逐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我多年前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53]

毛泽东还是共产革命领袖。了解其他共产革命领袖才能了解毛泽东。马克思在毕业论文中六次用了“毁灭”一词，以至于同学给他起了“毁灭”的外号。他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他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在伯父病重时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54] 夺取政权之前，列宁以筹措党经费为名，领导布尔什维克抢劫银行，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的同志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使他自己得以大肆挥霍这些赃款。沙皇秘密警察派遣线人渗入各革命组织，两名沙皇特工人员是阿齐夫及马连诺斯基依靠贿赂列宁而被接纳为同志。列宁

在革命成功之后将马连诺斯基灭口。[55]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实施了俄国空前的大屠杀和私人财产剥夺，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斯大林在屠杀方面超越列宁，将列宁时代政治局成员和 1930 年代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将领几乎杀光。他的女儿（SVETLANA ALLILUYEVA）在回忆录写道：“可怕的魔鬼已经占有了父亲的身体，使他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斯大林的妻舅兼亲密同志 KAGANOVITCH 在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性。他告诉我：‘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象此人四肢着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你猜我会怎么做？我会想象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发自内心地处理掉此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在其《新阶级》一书中写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嗜杀。他曾写道：“仇恨是斗争的要素——毫无怜悯的恨，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一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在古巴共产党的镇反运动中，他主持实施了大量抽取“反革命分子”的血液用于出口，将不少人抽血致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我真的喜欢杀戮。” [56]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相似，格瓦拉获得毛泽东巨额外汇赔款作不断革命的经费。毛泽东的学生波尔布特喜欢欣赏临刑者濒死的恐怖表情。在统治柬埔寨的三年中，他领导柬共害死了全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民，他下令处决前留下死刑犯照片，选最为恐怖照片造册供其欣赏（罪恶馆解说员说：“应该感谢他的恶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罪证）。为了补脑，波尔布特向某国（据说是中国）定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滋补。红色高棉将被处决者绑在椅子上，用高速旋转的钻头从其后脑缓缓钻入，留下了受害者极度恐惧的照片供波尔布特欣赏。波魔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怀抱婴儿女教师，

在即将被取脑浆时表情平静，但脸颊上流下的大颗泪珠）。红色高棉国歌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诺贝尔文学奖及普希金奖得主伊凡·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ВИЧ БУ́НИН）评价列宁说：“一个野人，从一出生时就是道德上的白痴，这就是列宁。他带给世界恐惧，摧残伟大的国家，屠杀了数百万人民。”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革命领袖群体。从秦始皇、闯、猷到毛泽东，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帝王和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尚暴力，血腥，夺人财产与生命，没有道德底线，心中只有自己霸业梦，只有自己权力地位，而没有爱。由于过于执着地追求永远的权力地位，他们会陷入妄想和被害恐惧，多数精神异常。

2010年7月，俄罗斯议员弗拉吉米尔·梅金斯基在杜马表示：“我们往往会认为在红场列宁墓内看到的就是列宁的全部尸体，请不要被错觉欺骗，那里只存放着10%的列宁尸体。继续保存列宁的尸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从预算支出的观点来看，存放这种人工制造的艺术品是不道德的，对列宁的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俄罗斯政府必需尽快埋葬列宁的尸体。”将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最强烈的反对声音仍然来自北京。当年，中共强烈反对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赫鲁晓夫回应说可以把斯大林的遗体送到北京。如今，不少俄罗斯人再建议将列宁遗体送到北京去。2012年，俄罗斯的一些政治派别成立了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列宁遗体将迁出红场。在中国，毛泽东遗体经过三十多年的陈列也被局部替换，日益丧失尊严，迁出天安门广场也只是时间问题。

华国锋推动继续崇毛的另一举措是改国歌。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国歌时发生了争议。有代表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不宜用作国歌，建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文革开始后，国歌词作者田汉获罪，国歌歌词被非正式废止。华国锋上台后，决定改国歌，主导中共十

一届二中全会通过新国歌词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随后，华再主导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他的新国歌。

从清末以来的国歌变迁，可以看出革命带来的倒退。宣统三年，傅侗、严复执笔的国歌为：“巩金瓯，承天畴，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国歌为：“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时，革命党尚未站稳脚跟，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一党私货，孙中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从“驱除鞑虏”悄悄转变为“五色荣光”；1915年，袁世凯政府宣布国歌为：“中华雄踞天地间，廊八埏，华胄从来昆化巔。江湖浩荡山锦连，勋华捐开尧天，亿万年”。清末民国的国歌歌词堂堂正正，没有党化内容。比较而言，袁世凯制定的《中华雄踞天地间》国歌最能体现民族精神。1937年，国民党决议以党歌作为国歌，开篇即贩卖三民主义，倒退到以党代国，完全不给非国民党人士与思想留下空间，强迫全民接受其党义。国民党的国歌虽体现一党之私、一党独裁，但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个人崇拜。然而华国锋主持制定的国歌不仅党化，更将国歌与毛泽东的名字绑定，强迫国人唱国歌的同时颂扬毛泽东。由于新国歌歌词过于荒唐，经历文革灾难的国人对此一致反感，无人会主动歌唱。随着华国锋不久后失势，这首“华记国歌”被中共官方与民间一致抛弃。在二十一世纪，国人回顾中国国歌变迁时不免为“华记国歌”感到难为情。

文革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间展开了“毛泽东临终嘱托”之争，也即继承人之争。毛泽东没有正式指定继承人，也未留下正式遗嘱。华国锋提出的继位依据是写着“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

事，我放心”的三张字条，而江青、张春桥称毛泽东临终给他们留下了“按既定方针办”口头嘱托，双方各执一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控制着政治局和宣传工具，发表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两报一刊”社论，声称毛泽东曾有一个临终遗嘱给了他们，暗示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应当说，双方说法均无道理可言。因为字条也好，口头嘱托也好，一无证明人，二无签名、三无录音和现场照片，四内容不明确，“过去方针”、“既定方针”均不知所云。

江青等人控制政治局多数和宣传工具不具决定意义，革命党从来以枪来决定权力归属。早在一年前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将领就开始商量兵变，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直接推翻毛泽东不利于中共的统治，决定等毛泽东撒手而去后再下手整肃后党和顾命大臣。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立即与代表军队和元老的叶剑英、汪东兴秘密策划政变。10月6日，三人召集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高层成员举行了密谋会议，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会后，汪东兴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成员。10月7日，华国锋召集余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四人帮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阴谋篡党夺权”，已被逮捕。剩余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作出了拥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政治局决议，使华国锋成为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位于一身的最高领袖。随后，新一届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粉碎四人帮”消息。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举行庆祝活动，当局在北京组织了百万人的“粉碎四人帮”庆祝游行。

由于没有民主选举，革命党权力交接的过程通常是政变的过程。国民党、苏共、中共党内都曾围绕领袖遗嘱展开争斗，权力交接迷雾重重。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联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控制了苏共中央，决

定不公开列宁遗嘱，他在《悼列宁》讲话中说：“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光荣地执行你的遗嘱”，暗示他是列宁的遗嘱执行人和接班人。三十多年后，苏共中央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时披露说，列宁遗嘱中要求党大会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另任他人。而俄罗斯史学家尤·阿·布拉诺夫在其《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一书中指出：“列宁病入膏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互相隐瞒列宁最后的文件。斯大林以篡改列宁遗嘱的手段赢得了在这场斗争的胜利。斯大林篡改的手法高明，托洛茨基始终未能完全了解列宁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不仅如此，列宁当初到底口授了什么内容，至今仍然是个谜。……1964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邀请所有健在的十三大代表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请求他们回忆列宁遗嘱以及在党代会上宣读遗嘱的情形。这次会议的记录表明，健在的代表们全都不讲真话，要么称记不清楚了，要么是按照官方在《苏共历史》中所讲的那样来陈述当时的事件。”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内曾发生遗嘱真伪的风波。虽然国民党以全会决议的方式压制了反对派的质疑，但反对派所指责的苏俄顾问控制一切的局面确是事实。国民党缺乏领袖接替的正规程序，继任人产生不透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的明争暗斗多年，他们竞争领袖地位一靠武力，二是展开吹捧、神化孙中山的竞赛。

政变成功后，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从9月初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没有留遗言，只写给他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江青在后来受审时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多年后，姚文元在他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说：“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三个人三种说法，情况与孙中山、列宁遗嘱一样迷雾重重。既然中共承认毛泽东不是皇帝，毛应无权决定继位者，因此临终嘱托之争既无所谓是非、法理。在权力斗争中，中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变动基本都是政变结果。毛泽东清除刘少奇

出党是政变手段，召开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时都排除一批人，加入一批自己亲信，作出清洗决议；整肃林彪时，毛泽东再次将政治局推倒重来，还是政变。毛泽东之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将政治局推倒重来，仍是政变。反复的政变说明，暴力革命党的权力交接只能是暴力争斗。

1977年7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8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称颂毛泽东英明伟大，宣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被中共称为“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作家秦牧写道：“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宣布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将十年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和造成的国民财产损失数字保密。不过，从一些高层的内部讲话中可以估计出文革祸害的规模。李先念在1977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造成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叶剑英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

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打着革命的旗号，向每个人不断重复革命一词。文革运动并未歪曲革命的意义。暴力革命本来就是残酷迫害，共产革命是所有暴力革命中破坏最惨烈者。毛泽东是共产革命领袖中迫害欲望最强者，文革又是他祸害中国的代表作。它是有史以来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最大劫难。毛泽东固然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但全民参与的性质说明了中国暴民土壤，

党化毒素之深厚。创造出千刀万剐酷刑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再加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教唆，国人的爱心、同情心泯灭，迫害欲望在文革中大爆发，留下了互相迫害最残酷、最恶毒的记录。

共产革命者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迫害人和被迫害的轮回、报应。革命者们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刻骨铭心，但对迫害别人则感到理所当然。文革过去五十年后，人们从受迫害的老干部、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回忆文章中基本看不到对参与迫害他人的忏悔，证明革命党人不会罪己、拒绝忏悔的品质传染了全民。世纪之初，清廷多次降诏罪己，承认错误，承认罪责，反省革新。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从统治者到全民都丧失“罪己”意识，回避灾难与罪责，是为革命带来倒退的又一证明。

随着文革结束，毛泽东时代走入了历史。这一时代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太多的苦难，不堪回首。在这一时代，中共害死人数超乎想象。毛的统治是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不妨从苏俄说起。从 1876 年到 1905 年，沙皇政府在三十年间共处死了 486 人，从 1905 年到 1908 年，由于革命，沙皇与革命者在四年间互杀 2200 人。列夫·托尔斯泰闻此死难数字后感到难以接受，伤心落泪。然而后来的革命死难非托翁能够想象。在列宁统治时代，苏共害死人近千万，在斯大林时代，苏共害死民众近 5 000 万。然而，革命会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中共在毛泽东统治时代害死民众超过了 8000 万。[57]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了战争机器。在世界各国崇尚和平，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毛泽东先后挑起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两次）、中印战、越南战争。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话不是随便说说，他真的准备让中国承受核打击。在他统治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围绕着他的世界大战、核战争的臆想运行，数千亿资金被用于输出革命、挑起战争、研制核武器、备战、“三线建设”、军工项目战略迁移，“深挖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长久的遗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空前专制。历史上，国人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耕种自由，收获自由，存粮备荒自由，进城务工营商自由，购置田产自由，艺术家创作自由，演出自由。清末以来，国人的自由空前扩大，享有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办报自由，宣传思想自由。而到了毛泽东时代，国人的上述自由，连同财产生命权一起丧失。在这一时代，中国没有真正传媒，只有党的宣传工具，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按国内政治需要取舍发通稿，再由各报转载，统一口径，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断绝普通民众对国内外新闻的知情权，只允许高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了解国内外实情。在这一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基本达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最严密程度，是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社会。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政权网络监视、管制到每一个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仅管制每一个人的行止，还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汇报，控制着全体国人的思想，通过个人秘密档案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一时代，中共不间断地发动整肃运动，实施了空前残酷的精神折磨。在这一时代，统治者逼迫人们检讨，自污，交出私人信件，逼迫人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陷害，营造了亲友，父母子女间互相陷害的恐怖环境，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杀潮。在这一时代，全民不敢表达真实的思想，毛泽东自己写信用黑话，林彪在日记中也大量使用暗语，众多思想先驱因在私信、日记中表达想法而被中共杀害。中共在这一时代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意陷害：号召“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暗中布置“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响应号召者；鼓励吹牛，“放高产卫星”，然后吹出来的倍增产量数字搜刮粮食，造成饥荒；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要求基层搜出农民藏匿的粮食，造成饥荒后，中央高层以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为替罪羊，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光运动”，实施整肃，迫害人百万计，造成自杀潮；号召党政军当权派造反，然后以“反党乱军”、“打砸抢分子”、“五一六分子”、“四人帮爪牙”、“三种人”罪名整肃迫害了数百万造反派；同时下达“向军队当权派造反”、“军队支左”、“坚决禁止冲击

军队”等互相矛盾的指示，使数十万造反派成了军队镇压的牺牲品；先鼓动造反派武斗，再号召“大联合”，使百万造反派成了全国武斗牺牲品。在不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上千万人落入陷阱。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是对国人残酷迫害，实施阶级镇压，留下了空前残暴血腥的记录：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旧政府时代军政人员、反抗土改的农民百万计；发动“土改运动”，剥夺地主土地，杀害地主乡绅百万计；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迫害旧政府军政人员，反抗暴政者百万计；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剥夺了工商业者天文数字的财产，逼得数十万工商业者自杀；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将全体农民变成了农奴，将农村的粮食搜刮殆尽用于出口发展军备，造成空前规模的饥荒，造成4500万农民饿死；在饥荒后发动发动了“四清”、文革运动，害死国人千万计。在这一时代，中共制造了庞大的贱民群体，以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打入另册，对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实施迫害数十年，造成其中数以百万受害者含冤离世。在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中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记录，最恶毒的精神和肉体刑罚。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空前黑暗。在制造上述灾难的一次次会议上，中共高层一次次全票通过灾难性的决议。除了彭德怀写过一封一半吹捧，一半批评的私信之外，中共高层全体助纣为虐。在“引蛇出洞”设计陷害，“土炉子炼钢”、“高产卫星”等谎言面前，中共全体高层，各界精英共同维护“皇帝的新衣”，全体道德沦丧，全国丑恶横行。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制造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没有敢于提出批评，没有人敢于问责。在饥荒刚刚结束，部分地区仍在饿死的背景下，中共全党掀起了新一轮崇拜毛泽东的热潮，使毛泽东能够立即制造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三线建设”、“大讲阶级斗争”、“四清运动”等新灾难，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添砖加瓦。在这一时代，

中共在国人极度困苦中长期无偿对外抛洒金钱。没有人敢于质疑“对外援助”，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完全沦为花瓶，毛泽东得以为所欲为，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将千亿计的国人钱财赠送给外国的政府、政党或野心家个人。在大饥荒中，他禁止开仓放赈救灾，同时增加对外援助，下令到非洲建铁路，为朝鲜建地铁，为阿尔巴尼亚建电视台，下令批判电影，戏剧，批判孔子，宋江，国人则追随毛泽东任何荒唐指令，全无抗争。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空前困苦。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日本、台湾的经济总量增长、国民收增长在 7——10 倍之时，中国基本没有住宅建设，没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时代结束时，农村破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贵州省安顺地区，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万里上任安徽时发现，很多地方农民穷到门、窗、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一个 20 多户人家的生产队，4 户没有门，3 户没水缸，5 户没有桌子，队长一家 10 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 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枝、秸秆；[60] 武安县的乡民靠卖血度日；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年人均口粮都不足一百斤，家产在 30 元以下的有 188 户；在 15 元以下的 41 户，农户除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61]

毛泽东时代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共在学校搞“反右倾运动”，逼得小学生自杀事件，鼓动学生批斗老师，打老师，杀害老师，捣毁教室，停办大学，取消考试，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逼知识分子检讨，登报自污，请罪，将学生、教师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人民互相斗争，将一部分人排除出人民之外，鼓动阶级仇恨。文艺作品，学生教材中充满仇恨，迫害，仇杀的教唆，培养出了一代迫害狂，人们的良知，独立思想，同情心与爱心泯灭，家庭内的互相迫害大量发生，发生了地震、洪水灾难中的见死不救和趁灾抢劫狂潮，发生了母亲唆使儿子杀害被斗丈夫的事件。[62]

在毛泽东时代，恶毒、暴力的语言大行其道，“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阶级敌人”、“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毛式污辱语言，红卫兵战歌中“滚他妈的蛋”等骂人语言，“作一颗螺丝钉”、“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剥夺人权的语言，“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等强词夺理的语言等等，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恐怖。毛时代的语言与强调效忠领袖、热爱祖国，“犹太害虫”为代表的纳粹语言和强调“举国一致”、“万众一心”、“誓死捍卫天皇陛下”的日本法西斯语言高度相似，三者都否定独立思想，否定自由，使用极端语式。而相比德、日法西斯的语言，毛时代的语言更加粗鄙野蛮，更加残暴。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集权体制会导致最坏者当政。……独裁者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63]正如哈耶克所指出，集权体制，共产革命党导致了毛泽东这样的最坏者当政，把革命灾难扩大到了极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指出：“中国要建立起全社会真正的自由，连接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架构，必须首先打破暴君毛泽东的魔咒。这将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出毛时代，他的画像仍然挂在那儿。我想中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毛是一个魔鬼，人类史上最坏的人之一。”[64]

第 54 章 拒绝道歉的“改正”

恢复高考

“粉碎四人帮”后，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迅速作出反映，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副总理陈永贵敏锐感到邓必然夺取最高领导权，向华国锋进言“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华没有采纳建议，批准邓小平复职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职务，任邓分管科学、教育领域。

毛泽东百般摧残教育，从高校发动文革，煽动学生造反，下令大学停止招生，在几年后不得不重启招生时废除高校入学考试制度（高考），实行推荐招生制度，使大学招生变成了家庭背景的竞争，堵死了学子通过勤奋进身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教育部希望恢复正规的高考制度，但是，恢复高考意味废除“推荐招生”制度和否定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举措。在党国体制之下，教育部对教育无权作主，不敢触及政治禁区。1977年6月，教育部召开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座谈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在维持“推荐制”的同时小比例（1%—5%）地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建议。

8月，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在听取学界建议后表态要恢复正规教育制度，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得知当年即恢复高考还来得及，他决定立即废除“推荐制”，指示教育部召开研究立即恢复高考和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邓的指示与中共中央鼓吹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相冲突，教育部无所适从，招生会议开了四十多天无法议决实施意见。这时，邓小平表现出了魄力，指示教育部：不要顾虑毛泽东画了圈的办法，要大胆

改革招生制度。有邓此言，教育部拟出了当年招生和恢复高考的办法。其中规定：考生年龄须在 25 周岁以下，未婚。这一规定实际剥夺了大部分“老三届”知青上大学的权利。对此，邓小平再发指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较高水平者要研究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1] 根据邓的指示，教育部修改了招生办法，规定“从 1977 年开始，恢复文革前实行的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并规定，“大龄青年，工龄达到一定年限者可以带工资上学”。对于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邓小平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要求简化为两条：本人表现好和择优录取。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亲自修改的《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会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恢复高考的文件。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10 月 12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青年欢欣雀跃，因停止高考十一年而被剥夺上大学机会的十二届中学毕业生报名参加高考。当年 12 月，全国高考恢复举行。经过文革的祸害的国家竟无足够纸张来印考卷。邓小平得知纸张被华国锋决定优先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指示调纸张先印考卷。570 万考生中很多已为人父母，考生之间年令相差了一代人之多。经历了多年做工，务农，当兵的青年们重新坐在课桌前恍如隔世。多数在文革中荒废学业的青年面对文化知识考题倍感无奈。经过考试，三十万青年被录取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

报名参加高考的千万青年和他们的家人感谢邓小平果断恢复高考，其中的大龄知青更是感谢邓小平放宽年龄限制帮他们圆了大学梦。知青们的感谢

之心合情，但不合理。国人没有理由就恢复高考感谢中共，而应是中共向国人就取消高考谢罪。一个党剥夺教育当局主管教育的权力，随意废除高考，是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才有的灾难。清末以来，教育家办教育，教育部管教育，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录取天经地义，历届政府都以资助教育，推动办学为己任，没有哪一届政府干涉教育家办教育。只是到了共产中国，大学成了一党的属下和工具，教育独立被摧毁，校长、教授们成了整肃对象，毛泽东一番荒唐话就可以废除高考十年之久，中共剥夺了无数学子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毛泽东去世之后，教育部仍无权决定恢复高考，只能战战兢兢地一次次建议、修改，恢复高考须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须中共文件说了算，显示教育仍被一个党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育部仍是党权的奴仆。邓小平简化政审程序的指示虽有进步意义，但他所谓的表现好与不好，青年优与不优还是共产党说了算。他并没有触及一党掌控教育和学子上学权利的暴政。在宣布恢复高考，部分废除暴政时，中共没有就十年取消高考，就鼓动学生造反，砸烂学校，就鼓动学生批斗甚至杀害老师，将千万学生赶到农村荒废他们学业谢罪，连个道歉也没有，而是为自己摆好，称是“党中央英明决策”。

高考制度恢复后，在文革十年中管理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撤出学校。毛泽东创造出来管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毛的荒诞“教育革命”却没有终结，教育党化，成为一党工具的情况没有变，中共机关控制大学，控制学人的思想的情况没有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不见容于大学，中共宣传的“拨乱反正”空有其名。

“揭批查运动”

新一届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的同时继续毛泽东的各项暴政，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抓阶级斗争”，批斗、迫害、关押、杀害仍在继续。十一大后，新一届中共中央发动了“清算四人帮及其爪牙、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的“揭批查”运动（清查运动），成立了各级“揭批查运动”、“清查运动”领导机构主持整肃运动。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样，

“揭批查”运动也是随意罪名的迫害运动。由于“四人帮”是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文革领导者，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的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都逃不脱“四人帮爪牙”罪名，造反行动都难逃脱“打砸抢”罪名。复出的老干部在“揭批查运动”中对造反派实施报复，发泄对文革的怨气。然而正是这些老干部全体参与了发动文革运动，全体参与了号召造反。因此，老干部们主持的“揭批查”运动实际是对响应号召造反的青年们的另一次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的陷害运动。

如同当年的“支左”军队一样，“揭批查运动”主持者支持文革两派中的一派对另一派清算。基层称“揭批查运动”为“一派升天、另一派坐监”，有些地方甚至喊出对造反派中一派“除恶务尽”、“一个不留”的口号。“揭批查”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参与文革运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被以“四人帮爪牙”、“篡党夺权”、“反革命”、“反革命集团”等罪名迫害。例如在河南，在“揭批查”运动持续到 1983 年，整肃了一百多万人，逼得大批造反派自杀。[2] 在浙江金华，“揭批查运动”害死两百多人。[3] 在迫害人数规模，迫害手段残酷，定罪随意等方面，“揭批查”都是毛时代“民主革命补课”、“四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迫害运动的延续。“揭批查运动”处决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三个案例是毛时代在延续的证明。

1966 年，女中学生李九莲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革，率红卫兵造反。在 1968 年江西当局的“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李九莲认识到文革的灾难性质，在日记中质疑“红海洋”、“三忠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给恋人的信中表达“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她因在日记表达思想而被捕。1977 年，李九莲在劳改农场批评华国锋独揽党政军大权，经鄱阳县法院、中共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中共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中共江西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中共江西省常委会层层批准，被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罪处决。在赣州市声援李九莲的数万人中，有一位与李九莲素不相识女教师钟海源。她为李九莲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刻印了《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声援李九莲，因此被捕。揭批查运动中，她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标语，同样被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罪名杀害。 [4]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申酉因也是日记获罪。大饥荒中，王在日记中写了“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文革中，他在日记中抨击黑暗写道：“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5] 他因写日记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被不经审判地关押了两年。1976年，王申酉在给女友的信中全面抨击建国以来的一系列灾难，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前瞻的改革主张。他因在情书中阐述思想再度被捕入狱。“揭批查”运动中，他被中共当局以攻击领袖和文革罪名杀害。王申酉没有结社，没有上街请愿，没有散发传单。他的全部所谓罪行仅仅是在日记、书信中表达了独立、前瞻的思想。古诗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王申酉只是日记、情书中表达思想，还没有鸣就丢了性命，“默而不得生”。

平反与“摘帽”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平反冤案。他形容面对情况“积案如山，步履艰难”。实际上，平反艰难是因为中共不能追究自己罪责。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副主席汪东兴拒绝将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大权移交给中组部，复出后的高层成员们对平反也不积极。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中共历次整肃运动，是历年冤案的共同定案者。他们不愿意平反冤案，就像当年参加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的160多位中共高层成员不愿意说出庐山会

议的真相一样。胡耀邦也在庐山举手参与了整肃彭德怀，他也不能将庐山会议的真相全部披露。党的秘密也是众高层们的秘密。胡耀邦是中共高层中最勇于承认错误者。他承认：“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起义人员，对侨属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将刘少奇打成叛徒、特务、工贼我们大家都举了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犯了错误”。他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声称甘冒被扣“替阶级敌人翻案”帽子的风险。他不顾中共中央专案组的阻挠，指示中组部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单独进行调查，以开“疑难案例座谈会”的办法绕过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召开大会平反冤案的规定，准备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胡耀邦打算先从平反右派分子开始。二十年前，邓小平领导中共中央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反复召开座谈会，鼓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在内部称“引蛇出洞”），在人们真的提出批评意见后，内部传达“收网”的部署，随后将响应号召提意见者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去劳改。而中央机关院校划出的五十五万右派只是反右运动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在划定的右派分子之外还有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分子、工农中的右派、以“坏分子”名义迫害的工农右派、反党集团、反革命分子等等，实际受害人多达数百万人。在反右运动后，中共对这数百万右派、“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实施了长期的政治迫害，精神折磨，生活折磨，将他们中一部分人杀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子女在升学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甚至迫害。文革中，右派所受迫害升级，普遍遭受抄家、批斗，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个人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迫害运动，主张否定反右运动，平反全体右派分子。1978年春，他推动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会议。

复出掌权的邓小平否决了胡耀邦平反右派的动议，坚持称反右运动必要和正确。1978年5月，胡耀邦批准《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推动平反。但是，作为党的人，胡耀邦必须维护中共的形象与利益，也必须帮助党掩盖罪行。在批准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长篇通讯的同时，他下令删掉张批评毛泽东和行刑前被割喉管等情节，将张志新宣传成了“反四人帮”英雄。对于反右运动，他也必须服从党的利益，按照邓小平“对右派不平反，只摘帽”的决定，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55号文件）和中共中央87号文件，配以题为《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华社消息。中共在实施方案中推出了一些“对右派分子摘帽，安置、使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的安抚规定，但在87号文件声称：反右运动正确、必要，但“扩大化”了，现在为右派们“改正”。中共的“改正”措施包括：恢复反右前的原工资（不补发右派们22年的工资），允许右派们回原单位或给重新安排工作，允许一部分右派回原籍自谋职业或当农民。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其中说：对章伯均、罗隆基等人（另有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近百人）维持原案，其余予以改正，但在组织上不存在“章罗同盟”。邓小平坚持留下少数右派样板不予改正，一是为坚持反右运动正确，二是因为，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代表着一种中共不能接受的主张。罗隆基在1930年代曾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向常轨。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6] 储安平在抗战后中共大打民主牌时指出：“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

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而决非‘民主’。"[7] 中共不能容忍罗、储代表的那种挑战一党专制的声音。

平反右派的同时，胡耀邦打算为数百万“四类分子”平反。建国前后，中共发动了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富农的财产，杀害了两百万地主，给其余人带上了“地主份子”、“富农份子”的帽子，将他们列为专政和打击的对象。土改运动之初，中共曾宣称土改运动三年后农村就不再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大家从此都是一样的农民，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但三年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中共背弃变更成份的承诺，使“地主份子”、“富农份子”成了终身和世袭的劣等种姓。1960年，刘少奇在大饥荒中主持救灾，曾实施“对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给予改变成份、摘帽”的政策。但没多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据此，中共废除了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开展阶级斗争的宣传，称“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一心想恢复剥削制度，他们中很多人仍藏有变天账”，将对地富分子的迫害升级。结果，从土改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地主、富农戴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被中共长期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

如果说，地主、富农的认定还多少有财产标准的话，“四类分子”中的“反革命”、“坏分子”的划定完全随意。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等一系列剥夺、迫害运动，造成城乡人民困苦不堪。民众中涌现出大批反对暴政，要求退社，报怨吃不饱，反对“放高产卫星”，反对政府搜刮口粮，藏口粮，种自留地、向上级政府告状、揭露基层领导罪恶等等抗争者。中共将这些抗争者以“破坏社会主义”、“破坏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等罪名逮捕、关押，释放后给他们戴上“坏分子”帽子，给曾服务旧政府者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将他们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称为“四类分子”，对他们实施长期迫害。

中共创造了迫害“四类分子”的“群众专政”的办法，将他们交由群众监管，要求“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定期向派出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四类分子”们平时会因微小过失而被批斗，有突发事件或过年过节时会被专政机关或基层当权者召集开会，进行“敲打”威胁，在政治运动中再成打击对象，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在农村，地富分子的工分总是被压得很低，连走乡串户的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还总是被派以繁重的无偿劳役。有些地方，“四类分子”还成为世袭制，老的地主富农死后，地富的儿子仍为地、富分子。地富子女被视为敌对阶级，往往被剥夺升学、招工的机会，无数地富之子因所谓“出身”不好娶不着媳妇。由于中共以迫害整肃“四类分子”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城乡基层干部和民众被迫以下狠手打击四类分子来表现对中共效忠。在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杀害。文革初期，各地发生了不少对“四类分子”的大规模屠杀、灭门的事件。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青年很难想象“四类分子”遭受的迫害。

胡耀邦知道，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划定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除了个别刑事犯外都是冤案，有心为“四类分子”彻底平反。但是，中共高层不允许平反。因为大家知道，迫害太多了，彻底平反将没完没了，大家必须维护“党领导的正确性”，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摘帽”。作为党的人，胡耀邦必须执行党的决定，于是主持出台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在其中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三十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落实政策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给四类分子摘帽子，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人民公社社员或工人待遇。到1983年，全国幸存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基本都获“摘帽”。

除三十年间屈死的半数，被摘帽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仍有六、七百万，连同他们的子女，受迫害人数超过了两千万，显示新中国造孽之深重。在所谓“拨乱反正”中，中共创造出了几种逃避罪责的说法。其一，“摘帽”：意思是说，当初给地主、富农、反抗合作化的农民、发表不满言论者、响应“大鸣大放”号召发表批评言论者“戴帽”迫害没有错，没有给他们定罪，只是给他们戴了一顶帽子，如今摘掉就完了，不存在平反、道歉、赔偿问题。这种说法暗示中共有权给上千万人戴上帽子加以迫害。其二，“扩大化”。这一说法不是邓小平的创造，而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创造。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制造罪名，残酷整肃，秘密处决，逼死、逼疯了一大批干部，然后以一句“扩大化”将罪责推卸给执行者。“扩大化”说法的意思是：党没有错，政策也没有错，只是执行者出现了偏差，不是错误。如果说有错，只是思想方法的错误，有点过左了。按中共的意思，“扩大化”也可以这样表述：没有殴打你，只是碰了你，你的伤亡是因为碰的力度和范围“扩大化”了。延安整风之后，“扩大化”说作成了“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了中共历次整肃运动的结束语。其三，“改正”。这一说法是邓小平的创造，意思是说，原先整肃没错，只是“扩大化”有点错。对“扩大化”不存在平反问题，宣布“改正”就完事了。其四，“感谢党”。中共在“改正”和“摘帽”时要求受害者感谢共产党给的好政策。后人难以想象的是，受害者们在听到宣布“摘帽”、“改正”时往往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显示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恐怖深入人们骨髓，人们的心灵被完全扭曲，受害者们在长期“低头认罪”后不再相信自己无辜，而真的相信自己有罪。

其五，“杀气腾腾”说。这一说法是邓小平所炮制。他在拒绝平反右派时说：“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1957年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1957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8] 李锐在多年后披露“杀气腾腾”说出台过程说：“邓小平在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杀气腾腾”这句话邓小平说过多次，来源出自《人民日报》刊登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葛佩琦言论。但是葛佩琦并没有这样说，他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当然没有更正。……除了葛佩琦之外，报纸上从未披露过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人的话，可见并不能把“杀气腾腾”的罪名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右派分子头上。可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共产党在给自己发动的这一场斗争作最后结论的时候，还要拿党的喉舌编造出的这四个字作为“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根据！值得回顾的是，1993年葛佩琦病逝以后，新华社发的报导公布了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蒙受了冤屈！邓小平在那次谈话中还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他当然只能这样主张。否则较起真儿来，落实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此人是不是当真说了这样的话，邓小平整个立论的根据就不存在了。”[9] 其实，1957年《人民日报》等大报刊出的“杀共产党”诬陷之词不是报社编辑部可以决定刊出的，须经毛泽东、邓小平过目才能刊出。毛泽东长期垄断《人民日报》，可以随意修改任何内容，而“大鸣大放”时的邓小平也有这样的权力。那诬陷之词出于谁手，只有毛泽东、

邓小平这两位反右运动正副总指挥知道。应当说，“杀气腾腾”说法是毛、邓二人为了制造镇压借口合作炮制出来的。二十年后，邓小平为了维护反右运动正确坚持把当年党报的诬陷之言作为拒绝平反的依据。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主张否定文革，但作为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他对自己设局陷害百万知识分子毫无忏悔。然而，他毕竟心虚，在坚称反右运动正确、必要的同时批准属下将他 1957 年部署“引蛇出洞”的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及他主持发出的一系列反右运动指导文件从他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删除，以掩盖罪责。可见，谢罪、道歉四字不仅在毛的字典中没有，在邓的字典中也没有。

右派代表人物罗隆基早就阐述了一个道理：独裁党不可能对自己追究责任。肃反运动后，毛泽东曾说要对肃反工作作一次全面检查。在“大鸣大放”中，罗针对中共大规模屠杀地主和国民党军政人员，逼死几十万工商业者的罪行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他要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委员会，接受“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受害者的冤屈申诉，并明确要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10] 罗隆基的要求很含蓄。如果明确说，那就是，镇反、肃反运动的滥杀者不可能真正复查，不可能追究自己。所谓人不能自己掐死自己，在一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纠错和平反，追究罪责只能在开放党禁，多党制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开明如胡耀邦所主持的平反也只能是走过场，触及中共权力地位时，声言“两个不管”（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胡耀邦也只能维护党的利益，将罪行称为“失误”、“错误”，在复查改正时仍用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作为“改正”标准，对“大鸣大放”言论触及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者不予改正。这样的平反更证明了罗隆基当年主张之正确。

在对“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实施漫长而残酷的迫害后，中共宣布的“摘帽”、“改正”没有多少意义。对于被杀害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对于已在劳改、折磨、饥饿中冤死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摘帽”没有意义；对于受害者家属和受株连者，“摘帽”也没有意义。因为，受害者没有讨回公道，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谢罪。中共宣布“摘帽”后不久，台湾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平反，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向受害者和全体民众鞠躬道歉，请民间组织对受害人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设立基金高额赔偿，为受害者建立了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对比之下，人们才知道什么叫平反。

在为右派“摘帽”大会上，胡耀邦向右派们三鞠躬表达歉意。应当说，胡的鞠躬之举颇为误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向“二二八”受害者家属鞠躬代表国民党，而胡的鞠躬让人误以为是代表中共。但实际上，中共坚持反右正确，并无歉意，胡耀邦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过，不管代表谁，他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如今，每年都有无数人去共青城胡耀邦陵园纪念馆去凭吊这位中共最具认错精神和人情味的领导人，其中不少人是当年获“摘帽”者或他们的后人。

知青回城

文革十年间，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去贫困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这期间，知青离开农村回城的主要途径是当兵、招工、提干及获推荐上大学，没有权力关系者难以回城。文革后期，老干部们复出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在农村的子女、亲属回城。知青中的高干子女们随着父母官复原职回城后，没有家庭背景的知青更加绝望。许多女知青在争取回城过程中惨遭蹂躏。

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胡耀邦则明确提出，应当废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中共中央清楚继续将知识青年赶往农村不是办法，但又无计安排知青在城市

就业。1977年，中共十一大决定继续实施毛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在两年内再送2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这时，各地农村的千万知青已经开始了要求回城的请愿行动。

1978年10月，数百西双版纳知青向国务院寄出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信中反映知青生活困苦，要求返城。联名信寄出后不见回复，云南知青们于12月初再发出第二封万人联名信，并成立了要求回城的请愿指挥部。恰此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一位上海女知青因难产和农场卫生条件简陋母子双亡。愤怒的数千知青抬尸举行了抗议游行。12月8日，知青们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召开了“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发布了《罢工宣言》和《北上宣言》，决定派代表进京请愿。云南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堵截。12月28日，百余请愿知青在昆明火车站附近集体卧轨示威，阻断了铁路。与此同时，罢工知青再采取行动，将农场领导扣为人质，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将以牙还牙。中共中央得报后派出调查组到云南调查。调查中，知青跪呼“要回家”，更有知青当众割腕自杀。中央调查组被打动，如实向北京报告实际情况。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

1979年1月，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赴京的云南知青代表。他没有安抚知青代表，而是训斥知青“丢掉了军垦光荣传统，闹事对不起国家”，拒绝就知青的要求展开对话。知青代表们见当局没有对话诚意，决定返滇采取进一步行动。知青们的决定被迅速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清楚，以流放知青的方式解决城市失业、住房等问题只可奏效一时，这一办法在运用二十多年后现在到了还账的时候了，十万云南知青或可压制，但全国千万知青都如此要求，不可能压制。他果断决定接受知青回城的要求，停止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据此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知青回城的“六条办法”，其中宣布知青不愿留在农村、建设兵团者都可以回城。随后，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召开了关于知青回城的工作会议。

全国各地的千万知青奔走相告，慌乱收拾简单行李，告别边疆、农村，返回原籍城市。千万知青中，约八十万人因结婚等各种原因选择了留在“广阔天地”。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千万知青对这段独特经历怀有复杂的心情。多数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葬送了他们的青春和机遇，是他们的一段苦难经历，不堪回首。少数人，特别是走后门先离开农村的，有背景的知青们，对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往情深，为那段经历自豪。回城后，多数知青因为青春荒废，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处于被淘汰的地位，而那些走后门离开农村的知青们什么都没耽误，占得了升学，就业的先机，多数成了随后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共的一大暴政。在中共建国之前，从来没有多数知识青年没有出路的情况，因为没有哪个朝代消灭私营工商业，没有哪届政府不允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自由择业。广大知识青年没有就业机会是中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结果。中共煽动学生造反，造成停课，下令大学停止招生，将上千万十几岁的知青流放到边远农村，给他们及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邓小平说国家为上山下乡花了大笔资金不是事实。真相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钱都用在了发动战争，对外援助，发展军工，教育经费少之又少。相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期的发动越南战争的钱，补贴下乡知青的钱只是聊胜于无。就国家的财政开支而言，政府没有为上山下乡花大笔资金，相反是省下大笔教育经费去援助越南了。邓小平决定赶在云南知青再次大规模请愿前决定停止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他正在布署对越开战，不想云南出现请愿，不想在这个时候请愿蔓延。相比他准备对越开战的经费，政府十年的上山下乡补贴开支也是微不足道。当时的青年没有问责与索赔意识。被赶到农村多年的青年其实有理由要求国家赔偿。在知青抗争和农民抵制之下中共被迫结束了这一流放运动，却没有道歉，没有赔偿。

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了了之

1975 年底，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陈永贵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在全国搞一场“造耕地的人民战争”。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按大寨模式推行“穷过渡”，刮“平调”风。不久，毛泽东去世，主政的华国锋继续奉行“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政策，于 1976 年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推广大寨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搞阶级斗争和反对包产到户。1977 年底，华国锋在北京再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继续推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时的中国农村空前破败，农民空前贫苦，绝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持续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农村社队的家底掏空，使富队变穷，穷队更穷。农业学大寨会议关于再刮“过渡风”的消息传出，对 1958 年的共产风之后的大饥荒记忆犹新的各地农民再次突击砍树，杀牲畜以避免再遭“共产”。

1979 年春，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揭露了大寨造假，指出了大寨实行“一切砍光”政策，将林木覆盖的虎头山糟蹋成光山秃岭的恶果，力陈全国学大寨运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民推入穷困、把农业引入歧途的错误。杨的发言成了五届政协会议的重大事件。中共农业部党组得知杨的发言后要求杨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承认错误。这时，“洋跃进”运动的灾难后果浮现。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宝钢等二十二个进口大型项目造成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为保邓小平的“洋跃进”大项目，中共中央要求一大批中小项目下马，使全国陷入萧条。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邓小平迫切希望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以帮助应付经济危机，批准万里在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有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不学大寨那一套。与此同时，胡耀邦主持在《光明日报》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

章，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矛头直指华国锋继续奉行毛泽东的灾难政策。胡比万里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大搞阶级斗争”，“平调”农民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停止”，并支持揭露出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严重问题。

“西水东调”是陈永贵挥霍国家资财为昔阳县造水浇地的工程。这一工程占用了山西省水利经费的一成，向省内农民摊派徭役，无偿调用干部、工人、教师、解放军工程兵数百万人工搞了四、五年，要截入黄河的潇河水，经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引入昔阳县，帮助昔阳县实现水浇地。这项花费国家上亿资金工程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劳民伤财兼造假的代表性工程。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停建“西水东调”工程。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报导和题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的社论，揭露大寨经验中造假和劳民伤财说：“多少年来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这种蠢事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近十几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有搞得好的，但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例。……‘西水东调’所以能说干就干，一搞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再抨击学大寨运动，直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修建人造平原是“劳民伤财”。为了应付经济危机，邓小平批准了胡耀邦、万里停止学大寨运动的动议，主导四中全会作出决定：停止推行向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穷过渡”和“平调”风，停止在农村中推行大寨“大搞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经验，允许恢复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停止“学大寨”和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

会后，中共剥夺了陈永贵主管农业的大权，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制造冤案的盖子被逐步揭开，山西省开始释放“学大寨阶级斗争运动”中被关押判

刑的老百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采访，写出了一批揭露大寨真相的“内参”文章，其中包括《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胡耀邦推动结束“学大寨”运动非常坚决。但他和《人民日报》只能避重就轻，欲言又止。原因是，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并非陈永贵，而是毛泽东，为了党的利益，大家必须维护毛泽东，不能明说“学大寨运动”的祸国殃民性质，对陈永贵也不能点名批评，只批“某些领导”，让国人猜。中共只在内部文章和内部文件中提到“农业学大寨”运动给农民带来连年徭役，残酷剥夺和人身迫害等情况，但叫停“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遮遮掩掩，将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停建“西水东调”工程等决定对国人隐瞒，命《人民日报》报导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决定“逐步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报导谎称缓建“西水东调”工程，不得点陈永贵的名。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11] 一面承认，大寨、昔阳制造“阶级斗争”，乱批乱斗，将众多的干部群众迫害致死、致残，一面又坚持“学大寨运动”正确，只承认“搞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哄而起，形式主义”。谁都知道，十六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剥夺农民财产无数，将农民变成了农奴，制造阶级斗争，害死农民无数，迫害农民手段令人发指，将农民拖入赤贫，岂止是“瞎指挥”，完全就是罪恶。革命党不会道歉，更不可能承认罪恶。为维护统治，中共必须维护毛泽东，也就必须维护陈永贵，就不能公开否定“农业学大寨”运动。

与 1958 年“大炼钢铁”一样，全国农业学寨运动使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破坏。毛泽东发动的这两个运动使全国林木一多半被砍掉，使全国湖泊减少近半，使国土大面积沙化，荒漠化，使广阔草原变成了沙漠，给中国乡土文化遗产和国土生态环境造成了无法估量、无可挽回的灾难。今日中国北方严重的沙尘暴是“农业学大寨”造成的环境灾难的证明。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终结，陈永贵淡出了政坛，被先后免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职。1986 年，陈永贵在北京逝世。按他的遗愿，大寨乡亲将老支书的骨灰撒在了他生前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虎头山顶。学大寨运动中，陈永贵每次回大寨时前呼后拥，各级干部争相拜望、汇报，场面壮观。而他归葬大寨时，没有一个县级以上的干部到场。这不仅是政坛的世态炎凉，更因为永贵书记代表着“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运动不堪回首，没有人愿意这一祸国殃民的运动重演。

人民公社制度终结

1977 年 6 月，万里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到任后的巡视中，他被农村苦难情景震惊。在金寨，他见到一农户的老人和两个姑娘在严寒中蹲在灶旁取暖，只应答不起身，原来该农户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两个大姑娘没有裤子，不能出门。[12] 视察归来，万里不顾当时中共中央继续奉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政策和人民公社制度，主持制定了给农民松绑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安徽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自留地收获的粮食在完成上缴国家任务后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责任制。万里的作法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分别刊登了《安徽省委六条》[13]。

中共安徽省委的松绑政策鼓舞了农民求生的勇气。1978 年秋收后，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户农民举行了秘密会议，决定私下退回到自耕农时代。此

举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意味着身家性命危险。因为此前以这种方式求生的农民被以“反革命”、“坏分子”罪名受到“专政”。农民们决心铤而走险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二十年前，中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逼着农民“放高产卫星”，然后按“卫星”产量搜刮粮食，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使小岗村家家饿死人。饥荒后，安徽当局推行了救灾的“包产到户”，令生产和生活有所改善。当时分给农民的少量责任田成了农民的“救命田”。但是毛泽东很快取缔了“包产到户”政策，下令收回责任田。随后近二十年间，农民在饿死边缘的挣扎。短暂包产到户经历让农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人民公社大锅饭是饿死农民的制度。在没有活路的绝境中，二十户村民决心冒死争回自主经营权。他们对天发誓，立下盟约：第一，将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分到了各家各户，包产到户；第二，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第三，今后如果队长因为同意包产到户坐牢，全队人包下他家的农活，将他的孩子养到十八岁。二十户农民在盟约上按下手印，连夜抓阉分了牲畜、农具和土地。

1979年，私下包干的小岗村农户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十三万斤，是上年的四倍，使这个合作化以来以讨饭闻名的村子首次上交了公粮。小岗人不用再讨饭的消息传到了公社和县里，公社领导怕上级追究，责令小岗队从“包干到户”退回到“包干到组”，同时将小岗村民私下包产到户的情况上报省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口号，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的鼓舞下，万里表态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消息传出，凤阳全县效仿小岗，安徽全省效仿凤阳县，其它省效仿安徽，新一波“包产到户”迅速推广开来。基层干部对当年省委书记曾希圣因推行“包产到户”丢官记忆犹新，知道须回避“包产到户”之名，想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名。正为“洋跃进”带来的经济危机头疼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农村“包产到户”，粮食增产是帮助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表态支持万里在安徽推行的新政策。但是，高层们都清楚，禁止“包产到户”是毛泽东的政策，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新政策不

能再用“包产到户”之名。万里报上了基层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法，邓小平感到满意，立即批准推广全国农村。

小岗村二十户农民的冒死抗争之举敲响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丧钟。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终结，“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制）推广，人民公社制度名存实亡。1980年4月，四川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消息传出，各地农民争相效仿，在中共中央的默认之下，人民公社制度被全国农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为维护形象，中共中央在沉默两年后才在1982年的一号文件中以肯定“包干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性的方式默认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

自古以来，地是农民的，种什么是农民的事。农民自主耕种，自主收获，自主存粮备荒，朝廷只管收税，不会干涉农民自主耕种经营，没有管农民的部门，不存在管农业的所谓政策，更不存在什么“包产到户”政策。只是在共产革命后，农民被剥夺土地，被强迫加入人民公社，政府创造出了“自留地”概念，规定房前屋后种自留地也须取决于中共政策，规定不准农民搞家庭副业，把农民当成罪犯来管。中共在全国农村推行“大寨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户“摸鸡笼子、斩鸡头、挖生姜、拔烟苗”害得农民活不下去。即使是好官万里主持制定的新政策也体现着暴政。例如，代表“给农民松绑”政策的《省委六条》中，“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仍是暴政。农民连在房前屋后种菜养鸡贴补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农民家庭副业须由政府认定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须由中共开会讨论“允许”或“不允许”，这本身就是古来闻所未闻的暴政。凤阳农民有六百年的讨饭史，但穷到没裤子穿却是毛泽东时代所独有。农民贫困，靠讨饭为生，依赖救济粮糊口并非因为农民懒惰，而是因为中共禁止农民自主经营，给农民套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枷锁。大饥荒后，曾希圣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制”，当年丰收。1978年，小岗村民冒死包产，又是丰收。农民自主耕种不会有饥荒。然而在新中田，农民包干到户，自主经营须冒坐牢杀头的风险，须全体对天盟誓，

全体按手印，托付家小，如同赴刑场一般，世上应找不到比这更罪恶的制度，更恐怖的时代。

大饥荒后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制”，小岗村民冒死实行的“包干到户”、“包干责任制”，以及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一回事。同样事情搞出那么多名称完全是因为暴政压迫，是因为中共要绕开被毛泽东禁止的“包产到户”之名，要避免承认人民公社制度的罪恶。在中共推行合作社、人民公社制度近三十年间，农民自主耕种的权利被剥夺，变成赤贫的农奴。到人民公社终结时，全国有几百个“贫困县”依赖救济粮糊口，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仅十几元，农村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平均不到一万元。推行如此暴政的中共却将小岗村民冒死包产到户，万里支持，邓小平批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举宣传成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造福农民。邓小平、陈云是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农民三十年不得温饱的主要责任人。以他们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成员们都参与了推行人民公社，都参与了给农民套上枷锁。在二十年后解除枷锁时，他们完全没有谢罪意识，没有道歉意识，反而要求农民感谢共产党。此后三十年间，中共宣传部门将歌颂中共允许农民自主经营使农民致富，歌颂“党的富民政策”作为主要宣传题材，推出了无数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只看到“党的富民政策让农民生活改善”的歌功颂德，而看不到中共通过合作化运动剥夺农民财产，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将自耕农变成农奴，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数千万农民饿死，农民穷得没裤子穿等等苦难。

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收回了经营权，合作化时被剥夺的土地有去无回。中共经过这一合一废，完成了对全国私有地权的剥夺，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中国革命党的最大宗收益，也是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宗罪恶。1982年，中共修改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这时，人民公社已不存在，集体已是不复存在的概念，宪法中土地集体所有制真实含义是政府所有制，官有制，即中共拥有。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党和政府”的规模爆炸性扩张，供养财源主要来自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全国农民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变迁说明了共产革命的真实含义，那就是，革命党打革命旗号抢劫民众私产。

十一届三中全会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两次致信华国锋，表示效忠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接信后，华国锋批准了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其中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华的决定并非因为邓小平表态效忠，而是因为军队将领支持邓小平复出。

复出后，邓小平在所分管的科教育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了要求尊重知识分子、尊重教师、尊重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讲话，推动制定了《1978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

（草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口号，推动了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下令取缔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解禁一大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禁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邓小平的改革举措给文革中长期瘫痪的教育、科学、文艺领域带来了复苏气象，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1978年，邓小平在军头们拥戴下掌握了最高权力。他清楚，华国锋的权力地位来自毛泽东，立即逐华下台会助长要求清算毛泽东的呼声。这不仅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基础，也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决定让华国锋作一段时间的名义主席以作过渡。这时，他发动的“洋跃进”运动将国家拖入了财政，外汇储备和物资供应的全面危机。他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应对。按照惯例，在召开全会之要先召开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会上通过的一切事项，以免在全会上临时出现不同意见局面失控。邓小平定调：三中全会议题局限于经济政策的调整，不讨论文革和平反，“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他留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自己出访东南亚。

11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中央工作会议体现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社会上的民主”，号召畅所欲言，突破文革禁区。响应叶的号召，胡耀邦、陈云、谭震林等人提出改变毛泽东的文革政策。胡耀邦等人的发言引起热烈响应，会议的主题转向批判汪东兴等几位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凡是派”，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案平反。对于涉及自己的批评，华国锋表现出了党内少有的宽容，鼓励批评意见说：“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敞开思想讨论问题很好”。受华的宽容姿态鼓舞，会议突破禁区，就文革，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华国锋当场决定为“六十一人案”、彭德怀案、陶铸案平反，审查文革干将康生和谢富治。

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出访归来。得知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打破了他与华国锋约定的范围，邓小平意识到他事先命胡乔木起草的，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讲稿已不合时宜，命胡耀邦组织人另拟讲稿。胡立即起草了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政策，平反文革冤案的新讲稿。邓小平清楚，否定毛泽东和容忍民主墙运动的政治诉求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删掉了胡稿中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政策，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等关键内容，申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涉及文革、毛泽东和政治制度，只讨论发展经济和应付经济危机的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宣读了胡耀邦等人撰写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拥护，标志邓小平主政时代的开始。

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延续工作会议的进程，继续展开对汪东兴等人的批判。邓小平在讲话中顺应工作会议的转变，用“四个现代化”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口号。在众高层和军队拥邓小平掌权的形势下，华国锋被迫作检讨，承认“两个凡是”错误。全会决定，抛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之“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1976年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恢复市场经济。关于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整举措，会议决定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禁止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允许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不许“征过头粮”，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价格，但继续奉行毛泽东关于禁止“包产到户”的政策。

中共中央剥夺华国锋最高权力理由之一是华曾主张“两个凡是”。华上台后确实继承了“两个凡是”方针，经汪东兴提议，政治局决议，在“两报一刊”上刊文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4] 但是，“凡是”方针并非始于华国锋，而是中共从延安整风以来长期奉行的方针。中共七大讲话中，刘少奇、周恩来有“凡是”表述。邓小平在 1947 年晋冀鲁豫干部会上作同样表述说：“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5] 中共高层中崇拜毛泽东热潮在延安整风后持续了三十年。三十中，高层全体都是“凡是”派。在华国锋提“两个凡是”时，等待复出的邓小平曾多次表示拥护。华国锋倒是最先为“凡是论”作检讨者。而邓小平为首的众高层不承认自己的“凡是派”历史，认定只有华国锋是“凡是”派。

全会最重要的结果是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陈云升任副主席。在此后近二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宣传成了邓小平主持的以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大会。而实际情况是，从三中全会前的准备会到三中全会，会议自始至终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华国锋约定的全会主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非改革开放，只是由于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推动，会议脱离了邓、华的主题，邓小平跟着转变。转变后的会议主题也非改革开放，而是只讨论经济改革，不讨论治改革，对于涉及反对毛泽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共领导，对于民间结社、呼吁民主的冤案不予平反。这一会议基调之后成为邓小平主政时代的基本政策。

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不断作检讨。会后，他在公开场合继续扮演“英明领袖”，在党内接受批判，被罗列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复出”、“推动洋跃进”等一大堆罪名。邓小平给华国锋定罪与毛泽东给刘少奇定罪一样，什么名目并不重要。说到改革开放，华国锋与邓小平一样有曾提出这样的口号。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前曾针对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时提出的把宝安（现深圳）和珠海建成对外加工基地的建议表示：“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

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这是中共高层最早的建立“经济特区”的表态。华还曾在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时提出吸引外资。多年后，一些中共高层在回忆录中说华国锋的宽容、民主作风、不揽权、不恋栈是邓小平成功夺取最高权力的重要原因。例如，于光远回忆三中全会说：“华国锋一直采取接受大家意见的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实际上，华国锋主持三中全会，宽容对待批评，主动作检讨，承担“两个凡是”责任，并不是因为他有民主作风或勇于认错，而只是因循党内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失势者不能再申辩，必须作检讨。暴力革命党中不可能存在民主，举手表决从来都是走过场，真正的决定只能“枪杆子”说了算。要说讲道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八大路线”、“反冒进”、“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每一次都能讲赢毛泽东。但毛泽东军权在握，放言“一个指头就可以打倒彭真”、“一个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华国锋因没有真正掌握军权而处于软弱地位，只能接受元老们的当面批评、指责，也只能表现得宽容，表态欢迎批评，作民主姿态，作检讨。如果华国锋军权在握也不会宽容与民主，不会作检讨；如果他不下台，大概也会被宣传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

平反刘少奇与“七三开”

1980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为五中全会作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对汪东兴等“凡是派”展开批判。当会议讨论《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时，汪东兴表示反对说：“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邓小平道：“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正因为你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16] 汪东兴所言“刘少奇案并非江青所定，推到

江青头上不合适”是事实，他有一大堆道理。邓小平斥责汪唱反调，并未以道理驳汪。胡耀邦斥汪停留左的路线也不通。因为，所谓左的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会议的基调是维护毛泽东，斥汪等人犯了左的错误不通。不过，暴力革命党内从来是掌握军权者作决定，会议不是讲道理的场所。在权力斗争格局明朗的形势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毛泽东晚年宠臣除了请辞别无选择。

1980年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中共的全会的各项决定从来都是在会前的准备会上已经作出，准备会的决定在会前由最高领袖作出，全会只是举手通过领袖决定的过场，如果有人即席提出准备会没有议的事项，或发表不同意见，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搞突然袭击”。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了意外，会议临时突破了邓、华私下约定的讨论范围，但这次全会没有出意外，全体代表举手通过了准备会议前邓小平作出的各项决定：接受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人的辞呈；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华国锋交权，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由赵紫阳接任；恢复文革开始时被取消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周恩来主持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的“将叛徒、内、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通过《中共党章（草案）》和党内《准则》；审判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

在决议“永远开除出党”，然后再决议撤销开除决议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没有区别。当年国民党就反复出现“永远开除出党”，然后恢复党籍大家握手言欢的事。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通常到败者通电出洋或下野即止。而毛泽东整刘少奇、彭德怀则留一点余地，连刘提出回乡务农的要求都不答应。在刘少奇挨斗后，毛召保健医生李志绥乘专机飞到杭州报告斗刘情况。[17]毛对刘少奇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对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中曾提到刘患有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四种病。在刘家周围筑起高墙，将刘单

独监禁，切断电话，停止医药，对刘夫妇揪斗，将王光美关进监狱，将刘少奇转移开封等等一切迫害步骤均是毛泽东在操控。不仅残酷迫害，还要观看刘、彭等受迫害过程的纪录电影以解恨。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署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上，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的同意批注。

在决议平反刘少奇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隐瞒了毛泽东以阴谋手段整肃刘少奇，将刘残酷折磨致死的真相。邓小平否决了胡耀邦组织《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等人写出的《还历史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的社论稿，代之以胡乔木组织人写出的《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社论稿，[18] 完全回避毛泽东的罪责，将迫害刘少奇说成是“四人帮”所为。对于这后一篇社论稿，胡绩伟等人质疑：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不就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宣告的要打倒刘少奇吗？胡绩伟的质疑在理。埃德加·斯诺应毛之请登天安门城楼时曾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确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两篇社论稿的背后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分歧。邓小平何尝不知道以“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为题的平反社论之不通。他清楚要维护中共的统治就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在筹备刘少奇追悼会时，出狱不久的王光美拒绝悼词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提法，坚持不删去这一提法就不参加追悼会。最终，王与党妥协，党同意删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刘少奇”提法，王作为党员服从组织决定，同意将《人民日报》平反文章中关于刘少奇在隔离囚禁中被绑在床上半年直到死亡等悲惨细节删去，以维护党的形象。

5月，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会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了国葬，由海军军舰护送，由家人将其骨灰洒入大海，将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出

版发行，在刘的家乡为刘建了铜像。王光美与邓小平一样清楚维护毛泽东形象对中共的积极性，决定为了党的利益不再计较毛的迫害。1990年代后，她带子女参加毛泽东的纪念活动，与毛家后人“一笑泯恩仇”，并对新风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鄙视地评论：“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19]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邓小平命胡乔木为六中全会起草决议案，并为决议案定下了评价毛泽东“七三开”的调子，要求维护毛泽东形象，维护反右运动的正确性。1980年10月，胡将理论班子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报了政治局。中共中央将这一决议草案发给四千高级干部讨论以“统一思想”。在为期一个月的高层讨论（四千人大讨论）中，多数高层成员认为草案是在为毛泽东的形象涂脂抹粉。铁道部副部长李颀伯说：“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文革前我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要‘钓鱼’（阳谋）和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

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王光美发言说：“高饶事件中，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周恩来）。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20]

根据“大讨论”中要求追究毛泽东责任的意见，陆定一，胡耀邦主张要像苏共揭露斯大林那样公开批毛。邓小平否决了批毛动议，要求高层们“顾全中共大局”。他说：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21] 邓小平坚持维护毛泽东有多重考虑。第一，他深知否定毛泽东必然危及中共的统治；第二，与华国锋一样，他的权力地位也来自毛泽东的提拔。因毛的提拔，军事外行的他得以国共战争中成为统帅二野、三野，锋头超过林彪的总前委书记，因为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权力太大，他获任政务院副总理，因毛对刘少奇照顾民生的八大路线不满，他被毛安排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第三，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以抬他为副统帅的方式否定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第四，邓与毛共同领导了反右运动，维护毛泽东就是维护自己。出于上述原因，邓决定对毛泽东作“七三开”的评价，即七分功绩，三分错误。他知道这样的评价能为华国锋代表的中共党内毛派势力所接受，有利于华顺

利下台。众多中共高层成员，包括《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不同意对毛泽东“七三开”评价，认为回避了毛泽东造成灾难的严重性。邓小平坚持“七三开”，要求“对错误宜粗不宜细”，禁止提及具体错误。他一连十几次发指示，召见起草小组，最后摊牌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决议》宁可不做。”与邓激烈争论后，胡乔木被迫交权养病，邓小平任命邓力群接任起草小组组长，起草了掩盖了毛泽东罪恶的“七三开”全会《决议》草案，将文革罪责推给了“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1981年6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主导全会“七三开”评价毛泽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革是给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中共掩盖罪恶，拒绝谢罪、拒绝道歉是对世界进步潮流的反动。1970年12月8日，在波兰犹太人街区发生历史性的一幕：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向犹太殉难者纪念碑献花圈后突然跪了下来，广场上一片寂静。他后来解释说，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更是对本国人民的，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压在心中罪恶感，承认我们过去的罪责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德国人与犹太人、波兰人生活在一起。勃兰特以下跪树立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榜样，并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之后，西德历届总理都传承了他的良好开端，对政府过去的罪责真诚谢罪，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德国侵略受害者赎罪。德国最高领导人为推进德国反思更是不遗余力。1995年，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德国人在每年5月8日二战纪念日都会举行集会游行，为当年国家的罪行忏悔。在2013年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责任。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重蹈覆辙。”忏悔之外，德国对在二战中受害国家和受害者采取了巨额赔偿行动。“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德国表示，多年来共调查了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守卫，其中30人应该被起诉。有人质疑纳米罪犯的追捕是否还有意义，因为那些被起诉者都已走到生命尽头。追捕负责人回应，年龄并不能成为他们逃脱罪责的挡箭牌。德国反省、谢罪、寻求和解的态度为其它国家和政党效仿。台湾国民党政府为“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死难者建成了纪念碑。

与上述进步相反，中共口口声声拨乱反正，但坚决拒绝谢罪，拒绝道歉，创造出“摘帽”、“改正”等说法以逃避罪责，拒绝真正的平反。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共收到了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团体、党外人士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函件，上千件要求改建、撤销毛泽东纪念堂的提案，也收到了万里、宋平、李德生、彭冲、谷牧等中共第二代元老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信息，对这些呼吁和要求一概拒绝。

大审判

中共十一大宣布，“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列举“四人帮”的罪状为：分裂党、篡党夺权、架空毛主席、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打击和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阴谋推翻党中央等等。决议中的“分裂党”、“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丧心病狂”等罪名是典型的随意罪名。应当说，“四人帮”说法是新一届中共中央为掩盖毛泽东文革罪责的一大创造。其实，整个文革期间，江青等四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的主张和行动，四人均听命于毛，不存在“四人结帮架空毛泽东”

的情况，更不存在“迫害毛主席”、“阴谋推翻党中央”的情况。所谓“四人帮罪责”其实只有一项，就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各项政策、指示。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共成立了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1980年11月，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列举了林彪、江青两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等48条“反革命集团罪”。判决书指控：四人帮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林彪搞政变夺权、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等等。特别法庭依据一份手写文件指控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林彪指示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等等。特别法庭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上述指控。法庭出示了林彪写给林立果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但没有提出手令字条是林彪所写的证据。由于在不同文件中存在这一手令的横写和竖写两个版本，手令的真伪成疑。[22] 姚文元在出狱后，后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23] 邱会作之子多年后指出：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参加了对林彪集团的揭发，却没有一个人揭发出政变的事。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对林彪的家，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反复清查，也没有查出政变的证据。[24] 大概是由于上述指控多不能构成罪行及缺乏证据支持，故起诉书把林彪、江青两集团扯在一起。

在特别法庭上，江青高喊口号，不承认法庭，质问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张春桥从头至尾一

言不发，不答提问，拒绝签字，实际行使了西方司法中才有的沉默权。姚文元承认犯了错误，但不承认犯罪。王洪文有问必答，承认所有指控。人们不知道，专案组对王用了酷刑。与王洪文一起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他初见王洪文就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为了减少痛苦，王洪文什么都承认，于是有了法庭上的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经过两个月的审理，特别法庭判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成员犯有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宣布判处江青、张春桥死缓，姚文元 20 年，王洪文无期，陈伯达 18 年，林彪集团成员 18 至 16 年有期徒刑。

法庭认定的十六名“反革命集团主犯”中有十三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包括五名常委和三名副主席），实际是审判了文革中共中央。自己审自己算不上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只能说是中共公审大会宣判办法的延续，与镇反、土改、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喊口号判决无本质区别。特别法庭所起诉的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均是无从界定的随意罪名。新颁布的刑法中有如此之多的无从界定的随意罪名说明，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法律。

与“四人帮”一样，林彪集团也是新一届中共中央创造出来的说法。吴法宪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5] 对此，江青秘书阎长贵指出：“文革的‘伟

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坏事，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实际上是毛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抵制；毛泽东又出新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是让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长。.....当年林彪本来是请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程序换接班人，他需要林彪的一票，来换下刘少奇。”[26] 如吴、阎所言，文革中，“两集团”成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和保健医生蒋大夫分别证实林彪有精神异，林彪的服务员王淑媛、张云生分别证实林彪有自杀倾向。命都不想要的人不会有权力野心。被毛泽东三番五次请出来后，林彪唯毛泽东之命是从，没有独立主张。林唯一的独立主张是九大后主张结束文革。“四人帮”之四人则完全没有独立于毛泽东的主张。事实上，审判中所指控的罪行都是毛泽东指挥所为。可以说，新一届中共中央创造出了林彪和“四人帮”说法，让两集团替毛泽东、周恩来，同时也替他们自己，承担发动文革的罪责。特别法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它不是独立的，只是宣布中共领袖决定的机关，“定什么性，诉什么罪，判什么刑，谁该重判，谁过去有功可以轻点都是他们（邓小平、彭真）说了算”。[27] 特别法庭在正式开庭前经过多次预审和彩排，证人经过培训等。中共中央为辩护小组定下了“不能动定性，事实不能变”的“基本原则”，决定要“一审终审”。[28] 在这样的审判中，证据无关紧要。

大审判中，最应公开的是毛泽东文件柜中的党国核心机密文件。那里面有很多高层写给毛泽东打的小报告，检举信，检讨书。毛泽东用这种办法驯服高层，高层们谁也不想曝光这些材料。众高层一致决定，销毁那些整人的专案材料以及毛、周的一些重要文件，为维护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也为维护大家的形象。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多年后披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大约在 1983 年至 1984 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人们不知道的是，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比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更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经邓颖超多次催促胡耀邦，中共中央决定烧掉一大批中央专案组的档案材料。[29] 按说，审理政治局委员们的特别法庭应该有权，也有必要接触中央专案组的专案材料和毛泽东、周恩来文件柜中的核心机密文件。但他们没有接触到这些党国机密。那些材料的去向或许已是永远的谜。革命党必然有很多东西需要隐瞒，不可能对秘密档案到期解密。

审判“四人帮”后，新一届中共中央继续清算文革派，于 1982 年底发出了《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下令清算“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将躲过了“清

查五一六”运动、“揭批查”运动的文革运动骨干和造反派领袖逮捕判刑。其中，已被长期关押的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判 18 年，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被判 17 年，北京的“四大红卫兵领袖（谭厚兰因癌症免于起诉）分别被判 15 至 17 年重刑，前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被判 18 年。邓小平决定，对“四人帮”余党的清算不得涉及毛泽东。据此，文革中与迟群一起被毛泽东点为钦差的谢静宜获免于追究，迟、谢二人命运两重天。审判北京红卫兵领袖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要求追究各地高校红卫兵领袖。1984 年 7 月，中共中央再发出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继续追究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在文革中的罪责。

“清查三种人”运动与“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一样，是中共“翻烙饼”式整肃运动的延续。所谓三种人就是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起来造反，抄家，“破四旧”，迫害当权派，推翻各级中共党委的政府机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假，但他们追随的并非“四人帮”、“林彪集团”，而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到 1983 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共整肃、迫害了数百万响应他们号召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华国锋下台

从 1978 年中被邓小平夺去最高权力开始，华国锋陷入在公开场合扮演领袖，在高层内部不断作检讨，接受批斗，孤立无援，辩解无门的难堪境地。中共将华国锋的傀儡实情对国人和外界隐-610;了两年多。两年间，中共政治局向高层成员打招呼说华国锋犯了错误，要求高级干部们“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邓小平让华国锋装扮最高领袖欺骗党众和外界是为了减少华国锋支持者对自己夺权的反弹。

1980 年底，邓小平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正式罢免最高领袖华国锋，连续召开九次政治局会议部署去华行动。会上，陈云发言提出“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胡耀邦发言说：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叶剑英的发言说：“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在众元老联手的形势下，华国锋表示接受发落。系列政治局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华国锋辞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但对外暂不宣布，等中共召开六中全会后再正式宣布胡、邓的接任实情，在此期间华国锋仍须以最高领袖名义接见外宾。华国锋受够了长期装扮领袖的难堪，在 1981 年元旦拒绝再按照元老们的要求“率领”众高层出席茶话会。

邓小平在其主导制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华国锋的错误为：“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 1978 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既然权力斗争的结果已明朗，华国锋以什么罪名下台不再重要。十一届六中全会会上，华国锋举手同意了全会的罢免决议，并对文革后四年的主政作了检讨。全会公报宣布：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上述改选和增选早已为在预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好，六中全会的无记名投票只是走个过场。

六中全会后，华国锋平静地离开中共领导层。中共中央按照维护毛泽东的方针，保留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委员职，让他继续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中共官方对华评价说：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邓小平等老干部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须对“洋跃进”负责。邓小平给华国锋定的四项罪名只是权力斗争手段，无公正可谈。事实上，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更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宣布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在会后派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到玉泉山去看望邓，请邓出山。随后，华率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到玉泉山，向邓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再按中共惯例亲自批准了邓小平的手术方案。1976年底，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享受最高层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特权。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宣布邓小平复出工作。在此之后，华国锋没有再提“两个凡是”。请邓复出之外，华国锋还亲自登门请胡耀邦出山，请张爱萍复出主持领导原子能机构，请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在平反问题上与汪东兴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发生了冲突时，华国锋支持了胡耀邦，使胡的平反冤假错案举措得以继续。被平反者及家属对胡耀邦感恩戴德，他们不知道，没有华国锋的支持，胡是不可能大规模平反的。”[30]

1989年，邓小平推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称有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除“两个凡是”外没有独立的东西，不能算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说法，《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指出：“华国锋任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央组织部长，批准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启用和任命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任命赵紫阳、万里、杨尚昆、习仲勋、任仲夷、项南、周惠等担任省、自治区负责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局面。1979年冬，华国锋批准了广东省委提出的在广东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特区的建议，批准建立了广东蛇口工业加工区和深圳特区。华国锋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宽容，最不恋栈，不揽权，最尊重宪法、党章的规定程序者，是少有的能激流退者。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功绩全部遗忘了，把全部颂词献给了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中共宣传部门只强调邓核心、邓理论、第二代，把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功劳都说成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的，这种违背事实真相的造新神运动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很不公正的概括和总结。”[31]

下台后，华国锋深居简出，唯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日和忌日必携家眷和随从去毛泽东纪念堂祭拜。中央警卫部队战士回忆，华国锋在贵为“英明领袖”时仍保持着平民本色，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2001年9月，华国锋率领他的办公室主任、警卫员、机要秘书、专职司机等人组成的党支部提出集体退党，以表达共产党腐败的不满。[32] 11月6日，日本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答：“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

第 55 章 洋跃进

另一轮“大跃进”

1975 年，邓小平在复出主持国务院，提出了以资源换设备构想，要求计委拿出一个十年规划方案。他阐述构想说：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1] 按他的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了以资源换外汇，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先进设备的《1976 至 1985 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一草案出被称为“洋跃进”计划。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与毛泽东的“大跃进”主导思想一致，特点都是好大喜功，自以为可以随意决定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钢铁产量当年翻番，邓小平的“洋跃进”要求石油、煤炭产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于毛泽东在当年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没能成为正式纲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邓小平去职后继续执行了这一计划，要求石油、煤炭行业产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采取杀鸡取卵方法开采。石油生产的常识要求通过控制生产压差达到稳产高产，自喷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随意放大油嘴，产量可以暂时提高，但会使油田迅速衰竭。[2] 江青抨击掠夺性开采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燃料我们自己也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3]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职，重提十年规划。1977年，邓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主导政治局批准了计委提出的八年引进65亿美元设备和项目的计划。1957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归来雄心万丈，带头跃进，要求将刚刚制定的激进纲要推倒重来。二十年后，这一幕再现，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将刚刚推出的65亿美元引进计划推倒重来，指示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搞几百个项目”，要求将两年前制定的《十年规划》各项指标大幅调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放出了新一轮的“高产卫星”，声言在1985年以前，全国钢产量从3000多万吨翻番到6000吨，石油产量从1亿吨增至2.5亿吨，建成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二十年前，毛泽东要求各项产量指标迅速翻番，以搜刮农民粮食出口换外汇换取快速军事工业化。此时，邓小平再搞“大跃进”，如江青批判那样，卖资源买设备，要求“一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以滚滚石油换得滚滚外汇，“购买一个现代化”。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国家计委推出的八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总和。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一切求快，“只争朝夕”，背后是真正用意是与苏共争雄；邓小平“洋跃进”也是一切求快，背后的用意也是与苏共叫板，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扶植红色高棉，“教训”越共。

1977年12月，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批准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将草案交人大通过。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邓的纲要，“洋跃进”正式启动。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对人大刚刚批准的指标又不满，要求不断加码一样，邓小平也在人大批准后立即对十年纲要不满，指示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负责人研究扩大引进规模，推动追加引进项目。在邓的压力之下，计委只好跃进，将引进设备总额从65亿美元增至了180亿美元。计委没想到，邓对跃进速度仍不满意。4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时表示不满说：“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

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4]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团兵分几路，副总理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团的赴日谈钢铁项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员们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在中国文革十年间高速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达年均7%——10%的情况多少有耳闻，但出国后还是被国外的飞速进步震撼。他们了解到，西德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同样的生产能力用16万工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同样容量的电站在国内要数百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产钢230万吨的武钢用7万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每小时起落飞机60架，北京首都机场每小时起落不到两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平均两户有一辆汽车，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仅有2万种。代表团成员们感叹，中国宣称支援世界革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出国门才知道我们最落后。

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林乎加、段云等人的考察汇报。华强调谨慎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这不是优柔寡断。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邓对华的谨慎要求不以为然，鼓吹跃进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经济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总理：同国外

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 150 亿，搞它 500 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5] 二十年前，毛泽东即席吹“十五年赶上英国”，然后在几个月内改为十年、五年、三年、两年赶上英国。邓小平吹牛，将自己提出的 65 亿美元引进计划迅速改为了 180 亿，然后在三个月后又改为了 500 亿。

7 月至 9 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十年引进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这时，邓小平得军队支持，一言九鼎，失去最高权力的华国锋像当年刘少奇转变立场，追随毛泽东鼓吹“大跃进”一样，也跟随邓的调子鼓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二十年前，没人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高层附和毛泽东；此时荒唐重演，没有人敢对邓小平的“洋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邓小平。二十多年前，陈云在曾提出“反冒进”，警告要注意“综合平衡”，在反右运动后抛弃“反冒进”主张，向毛泽东提出了“土炉子炼钢”的建议，此时陈云同样套路，抛弃“洋跃进”之初警告的“引进资金要考虑国内配套资金问题”，转变立场，附和邓的洋跃高调。李先念如同当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系列“大跃进”荒唐指示一样，在务虚会总结报告中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发出号召，提出“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将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 4000 亿元增加到 5000 亿元。[6]

在众高层附和之下，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将各项指标一改再改，在一年间将引进规模从 65 亿美元“跃进”到了 500 亿美元，再到 800 亿美元，再现“大跃进”“放高产卫星”的一幕。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要求“两本账”，说是钢产量一年翻番，实际要求半年翻番。“洋跃进”中，邓小平同样作法，说是“十年引进 800 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实际要求立即引进 800 亿美元的项目和设备。在 1978 年的最后几个月内，他突击签约引进了总金额高达 78 亿美元的 22 个大型成套项目。邓小平还表现出

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毛只下命令，从不具体操办。而邓喜欢亲自操刀，亲自拍板签约了大庆、齐鲁、上海、江苏等四套 30 万吨乙烯和宝钢等项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进大型钢铁项目，拍板将钢铁项目落户上海宝山，还拍板引进了石化、汽车项目，决定将这些重工项目都落户上海。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不堪重负，优势在于科研和技术，本应学习日本和“四小龙”，进行产业布局调整，扬长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轻工业、服务业方向发展。然而邓小平不向专家请教，不走论证程序就作出上述决定，使上海的产业结构无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业重型化轨道。

邓小平在几个月内花出去的 78 亿美元外汇规模超过了 1950—1977 年引进项目外汇花费的总和。他曾在十几年前操办中苏论战时带着 200 亿元的援助礼单赴越南寻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认为 78 亿美元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对年收入仅 874 亿元人民币，外汇收入仅 76 亿美元的全国财政而言，邓小平一个人在几个月内的大手笔花销已让全国财政面临破产。更糟的是，这 78 亿美元只是支出总额的冰山一角，开销的大头是陈云警告的为引入项目配套的国内资金支出，这配套支出总额将远超 78 亿美元。

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购买现代化的邓小平不清楚还贷的压力，不明白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内翻番的道理。毛泽东命令钢产量每年翻番，邓小平宣称的将在短期内不断发现、建成新油田，“一个大庆变十个大庆”等等，二人同样思维，同样缺乏经济知识。陈云、李先念、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主管经济官员具有更多的常识知识，清楚石油和煤的产量、出口量和外汇收入是不可随便吹牛的，明白投资须有更大金额的配套资金的道理。但他们都是从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中生存过来的，深知与独裁领袖唱反调、犯颜直谏的政治风险。与当年“放高产卫星”时一样，高层们谁也不说破“皇帝新衣”，只管趋利避害，只管附和邓小平。

随着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危机。邓小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 1979 年初对几位副总理的谈话中改变口风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7] 邓小平不至于不懂大型项目一旦上马难以改变的道理，说这番话无非是为推卸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官员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乌纱为重，没有人接着追问减哪些钢厂，减哪些大项目，更没有人敢提宝钢下马的建议。

1979 年 3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应对严重的财政、外汇和物资供应危机。受命后，陈云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精明陈云很清楚若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的务虚会上严正提出比例失调的问题，明确反对跃进计划是有可能避免危机的，但那样会触怒邓小平，此时他可以说这番话了，但这番话已可有可无。邓小平知道自己闯了祸，在当月的“务虚会”上表示同意进行调整。有了邓同意调整的表态，中共中央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承认 1978 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决定修改 1979 年的经济计划，进行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无法收场，只好默认刘少奇出面收拾烂摊子，以“调整”之名停止“大跃进”胡闹。刘少奇出面领导救灾，不敢批评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一半责任，要求杀一批饿死人大省的大员，大骂《人民日报》负责人不讲真话。此时上述情节再现，邓小平造成灾难后无法收场，只好默认调整，让陈云出面收拾烂摊子。陈以“调整”为名停止“洋跃进”胡闹，不敢指出邓小平的责任，也不承认自己的一半责任，狠批冶金部主管。众高层其实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宝钢是邓小平亲自谈的项目，大家都曾举手同意，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骂冶金部长是最好的台阶。毛泽东当年拒绝认错，又被迫默认纠错。邓小平完全一样，回避自己的责任，以表态支持陈云进行调整为自己打圆场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

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8]

4月，中共再次召开了讨论应对危机的中央工作会议。当年大饥荒中，中共提出了“八字方针”，在毛泽东和大家都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大跃进”，进行“关停并转”的调整，将胡乱上马的项目大批下马。“洋跃进”危机中，这一幕重演，新一届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在邓小平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了“洋跃进”。中共两次八字方针中，除了“调整”二字有意义外，其它全是文字游戏，而“调整”说法的妙处在于回避认错，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采取纠错行动。其实，新一届中共领导层不必搞什么“新八字方针”，旧“八字方针”可以照用。两次“八字方针”的具体办法一样，都是让一大批胡乱上马的项目下马，将城市人口大批赶到农村以解决城市失业和物资供应危机等等。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承认两年来“急于求成”，要求“进行坚决调整”，宣布将《十年纲要》提出的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的吹牛指标降为4000万吨，关停并转一批企业，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1000个以下；宣布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大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两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上述应对经济危机的系列会议继承了大饥荒后以“急于求成”、“交学费”等说法推脱责任的传统。高层中没有人提出追究责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举了手，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将一大批已经开工的建设项目停、缓、并、转、缩。中共制定高指标、乱上重工业项目可以重复，但想以一纸命令再强迫城市人口去农村不可重复了。不仅中共不能再动员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相反还在全国知青请

愿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 1000 多万知识青年返城。在“洋跃进”带来的经济危机中，中越边境战争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致 1979 年的财政赤字突破了 200 亿元，赤字率比 1958 至 1962 年大跃进期间还高出一半，此外还有 22 个大型项目合同造成的巨额外汇收支逆差。这时的经济危机如陈云所言，比大饥荒时还严重。当局应付经济危机没有别的办法，一是滥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二是再次采取“关停并转”等紧缩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 1980 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4000 万知识青年失业、民怨沸腾，城市犯罪激增，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监狱爆满，以及随之而来的“严打”运动灾难。

大饥荒后，中共不得不在农村采取“三自一包”政策，给农民一些经营自由，帮助经济走出困境。“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后，中共同样办法，放松对农民的管制，允许“包产到户”。不过，为维护毛泽东形象，中共不再用“三自一包”、“包产到户”之名，将“包产到户”政策改称为“联产承包”制，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允许集市贸易，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上述对农民“松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极大帮助了政府缓解财政危机，同时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结果，邓小平应对“洋跃进”灾难的被动之举歪打正着，成了让农民致富的政绩。

“洋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灾难相当。两次灾难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滥用，政府高层拍板的投资决策十有八九是胡来。“洋跃进”引进的一大批项目同一般的官办项目一样，多是不经专家论证而由高层拍板，破坏产业布局，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外淘汰项目，多因配套设施，能源等限制和经济调整等原因长期闲置，造成惊人的浪费。例如，三十万吨乙烯项目有一套长期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闲置，每年还要花费数百万元的维护费。

“洋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长久和巨大的遗害，持续直到以到二十一世纪。因为“洋跃进”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国家财政无钱足额应付军队、医疗、教育等开支，邓小平再作出几项灾难性的决定：其一是让军队经商，号称“以

军养军”，开启了军队开始全面腐败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解放军中，贪污腐败规模惊人，“大老虎”动辄贪腐百亿计。军队全面腐败带给国民的损失相当于另一次的大跃进或“洋跃进”损失；其二是医疗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医院自己去赚钱，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其三是教育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学校自己去赚钱，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教育体系。

1980年，在将华国锋逐出领导层时，邓小平列举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将“洋跃进”的责任推到了华国锋的头上。对邓此举，胡耀邦直言，当时大家一起犯下的“头脑发热”的错误，把责任都算在华国锋头上并不公平。胡的说法很客气。其实是邓小平头脑发热，逼迫众高层跟随，以陈云为首的一大批官员明知邓的大跃进荒唐而不敢说实话，一致举手支持荒唐决策，众人合力织造了“洋跃进”这一皇帝新衣。

宝钢灾难

了解“洋跃进”来龙去脉的最好案例是宝钢。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立即搬出他1975年提出的以石油换设备的《十年规划纲要》，声称要“建十个鞍钢、十个大庆”。9月，率团访日归来的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从日本引进钢铁工业技术设备。本来，邓小平即使同意也应当让冶金部门的专家去操办。但他认为自己内行，在11月亲自向来访的日本新日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提出向新日铁购买大型钢铁企业。这时日本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削减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比重，正希望出售钢铁工业技术设备。稻山立即表示同意出售。于是，邓小平不经论证，不咨询专家意见地决定了引进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并且决定了将此项目落户上海宝山。1978年2月，中日政府根据邓小平会见稻山的谈话签订了“资源换设备、技术”《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其中规定，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执行此协议，宝钢一期85亿美元的总投资除了很少的建筑工人工资部分以外基本上都付给

了日本新日铁公司。年底，宝钢建设项目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下正式开工。这时，一大堆问题暴露出来。首先，华东落后的公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根本不能支持宝钢这样的对基础设施要求极高的巨型项目；其次，上海地质条件不适合重工业项目，光打地基就要花费巨额的冤枉钱；其三，宝钢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上马后立即对全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宝钢只是邓小平同时引进的 22 个大型项目中的一个。宝钢等项目开工后，全国财政、外汇收支、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全面危机。

1979 年春，中共中央被迫召开一连串会议，讨论应对高达 200 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外汇收支逆差。会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时，主管经济的官员和众高层全都清楚，危机的根源是宝钢等巨型项目，最有效的调整举措是让巨型项目中最大的宝钢工程下马。因为，国家显然无法同时执行 22 个大型项目合同，违约赔偿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预算投资总额高达 200 多亿元的宝钢下马是“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最有效的举措。况且，宝钢刚刚开工，立即下马是损失最小的调整举措。但是，众高层谁也不说宝钢下马这句话。因为大家知道，宝钢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工程，关乎邓小平的颜面，说让宝钢下马的话会冒犯邓小平。大家都等着邓自己说这句话。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从不认错，他向毛泽东写检讨也并非真正认错，而是要求复职的策略。他声言宝钢不下马，要干到底，要勇往直前。按说，不提宝钢，提 22 个大项目中的其它几个下马也应当有人出声了。但众高层清楚，不仅宝钢是邓小平的面子工程，22 个大型项目都是邓拍板决定上马的。于是，众人谁也不提那造成严重经济危机的 22 个大型引进项目。二十年前在庐山开会时，十五省饥荒，很多省饿死人，中共高层中除彭德怀私下写信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任由灾难扩大。这一幕在 1979 年重演。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邓小平，任由灾难扩大。会议决定，让上千合理上马，投资额不大，更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型项目、轻工和民生项目下马，以保邓小平的 22 个面子项目。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造成大饥荒后的应对一样，中共再次以丑恶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实施所谓“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在 6 月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承认宝钢决策荒唐说：“宝钢放在上海是为了解决调铁的问题。开始并不想搞这样大的规模，由于高炉很大，上海现有钢厂吃不了这么多铁，发生了‘大茶壶小茶碗’的问题，于是增加了炼钢、轧钢设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钢厂。”[9] 李先念此言透露出宝钢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先决定了再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月，中共中央派陈云到上海去处理宝钢问题。与“大跃进”中刘少奇一味迎合毛泽东，不敢明确批评一样，陈云在一番调研后顺着邓小平的意思表态说“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这样的调研结论是邓小平愿意听的。7 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发表谈话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随后他主持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调动全国各条战线支持宝钢”，实际是将宝钢灾难摊到全国各行各业加以掩盖。在 9 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宣称：“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然而国人不知道，邓小平对决策的灾难性比谁都清楚，他在与稻山的谈话中间接承认失误说：“宝钢由于调整会拖延一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欠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10] 老百姓不知道，邓小平声言“保证干好（宝钢）”的代价是全国无数合理的小项目停工下马，政府调全国的资源 and 外汇收入来保这个巨无霸的面子工程。古代帝王通常都具有认错品质，会在灾难后罪己，对不是朝廷造成，但给给臣民巨大痛苦的天灾也会痛责自己。革命党与封建帝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革命家们不会认错，没有罪己意识，漠视灾难带给百姓的痛苦。在二十年前的饥荒中，邓小平了解家乡省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情况，但多次催逼西南大员李井泉从四川向京城调粮食，在饥荒后积极为李井泉开脱。此时，他深知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但以一句“我们不后悔”坚称决策正确，没有自责。这种漠视人民痛苦，坚决拒绝自责的品质不是毛泽东、邓小平专有，而是全体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众高层在

二十年前附和毛泽东造成饥荒，此时照样附和邓小平，联手造成严重经济危机。

高层们怕冒犯邓小平不敢批评宝钢，但专家们从专业角度间接提出了批评说：“宝钢不应建在这个地方。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是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力配置规律的，从当前中国实际经济情况看，也是不急需的，应当停建，转移到其它地方。”[11] 连日本的经济专家都对宝钢项目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决定兴建这么大的工程本身就不一定合适，按日本一般做法，宝山工程的地点选择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初，宝钢基础桩由于地质原因出现位移。在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代表批评“洋跃进”是“新冒进”，“造成了近2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质问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出现桩基位移的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没有保证等等。甚至有代表发言说：“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12] 人大代表们敢于如此激烈批评是因为他们以为宝钢的决策人是上海市委负责经办宝钢事宜的陈锦华。陈后来叫屈说：“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我只是具体执行人，怎么当得了罪魁祸首呢？”[13] 虽然人大只是清谈机构，并不能形成对高层权力的制约，但人大代表们的质疑多少对高层形成压力。此外，宝钢项目暴露出的问题太多，建设无法继续。11月，中共中央决定，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厂退货”。众高层们都清楚，由于宝钢等项目没有在1979年初刚刚动工时下马，现在这些大项目带来的灾难规模已经大到难以收拾。但是，党内不可能出现人大会议那样的质问。高层们都是多年来在举手拥护领袖决策中生存过来的，只要不危及官位，没有人会宝钢二期合同规定的巨额赔偿和已进口设备的闲置真正着急。因为一，这些是邓小平的项目；第二，大家都相信国家有的是石油、煤炭，多出口就是了。人大会议也不可能对荒唐决策，造成巨额赔偿、设备闲置、无数合理的小项目下马等等的问责，因为第一，代表们对“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第二，人大代表们也是官员，也遵循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

在宝钢项目必须缓建，部分停建，部分退货的情况下，高层们都知道需要有个让邓小平下台的台阶。这时大家都想到了专家，最好是借专家之口找个台阶。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家论证宝钢一期工程是否继续。独裁体制下，工程开建后才论证是必然现象，建国以来的重大工程都是不经专家论证，由领袖荒唐决策的。建国之初，毛泽东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三门峡建坝工程就决定了。毛泽东时代大型工程基本都是先开工，后论证，或只管开工完全不论证。这荒唐一幕在邓小平时代重演。1981年1月，国家计委、建委召集十七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及一大批专家、教授共200多人举行了宝钢一期工程论证会。论证会摆出了三种意见：一、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它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103亿元的工程救活。高层们和专家们都清楚，论证会议提出的三种意见都意味灾难。这时专家们也清楚了宝钢与邓小平的关系，不再质问。于是，论证会沦为清谈馆，所谈意见只是将灾难情况上报中共中央。由于邓小平已经宣布宝钢决策正确，声言“不后悔”，中共中央于1981年2月决定宝钢一期继续建。

1984年2月，邓小平再次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花费128亿元人民币的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国人不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的石油，煤炭工业都在服务一个目标——出口资源换宝钢。七、八年间，中国出口日本百亿美元的石油、煤炭，只换回了一个宝钢，买回来的是日本淘汰的冶炼设备和技术，连同基础建设用工程机械都一起买了回来。按宝钢的合同，配套港口和道路的建设也由日商承包，以石油支付。为建宝钢，政府不得不在1979年后每年超发货币，总共超发了数百亿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几年间，宝钢带给国家的巨大损失被摊派到了全国各行各业去“消化”，全国人民都被迫为宝钢，为了邓小平的荒唐决策节衣缩食，为邓小平的面子工程买单。十几年间，宝钢项目耗尽了全国的外汇储备和石油、煤炭出口的收入，使全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劣化，扩大了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全国百姓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不知道自己是宝钢灾难的受害者。

一期工程建成后，宝钢的问题继续浮现。日本的技术设备只能冶炼巴西的富铁矿石，宝钢不能冶炼中国丰富蕴藏和产量巨大的贫铁矿石。换句话说，宝钢长期需要巨额外汇供养，进口巴西或澳大利亚的富铁矿石炼钢，宝钢是当时国家宝贵外汇的无底洞。在整个 1980 年代，中国外汇奇缺。国人不知道，当时出现的外汇券是深圳为了保护自己出口所赚外汇不被宝钢吞噬而发行的。另外，从巴西或澳大利亚来的大吨位运输船无法驶入长江口。为让宝钢投产，远隔重洋运来的富铁矿石还要卸在宁波北仑港，再装上小轮船运到宝钢。一个荒唐决策带来了永远地折腾与浪费。

一期工程建成二十多年后，宝钢领导人继续以“宝钢挣回了当年的投资，又赚了一个宝钢”的说法欺骗着国人。他们没有算上宝钢项目造成经济危机带给全国的损失，没有算上大批中小在建项目为了宝钢而下马的损失，没有算上中央以行政命令向全国各行各业的摊派，没有算上无数企业因宝钢占用外汇而被迫停止的技术改造的损失，没有算上宝钢占用外汇带给科研和教育项目的损失。此外，宝钢等重型项目的落户使上海永久地为“洋跃进”吞噬环境问题等苦果，其灾难无法计算。

邓小平吹嘘“一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而事实是，他的洋跃进没有实现十个大庆，倒将连仅有的一个大庆掠夺到衰竭。江青对资源换现代化计划的批评说对了。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贫油，离开进口石油一个月就全面崩溃。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洋跃进”计划，邓小平下令掠夺性开采，造成大港、大庆等油田迅速衰竭。这时，由于油价、矿石价的上涨，炼钢产能过剩，宝钢的设备根本不如所占地皮值钱。这时的中国政府是多想出现一个邓小平式的买家，以石油、煤炭资源来换项目，把宝钢等二十多个项目一揽子买走，把配套建设之权也一起买走。当年，日本等国遇到了邓小平，成功将淘汰产能脱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还收取了巨额违约赔偿。

如今中国政府可找不到这样的买家了。因为，私人资本不会买，亲自决定买大项目的国家领导人找不到了。

财政包干

“洋跃进”中，政府的财政亏空比大饥荒后更加严重，中央政府无法应付各地方政府的拨款要求，中央对地方统收统支，全部包揽的财政体制难以为继。1980年，赵紫阳临危受命接任总理，推出了财政包干办法，即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承诺节余归地方以调动地方帮助中央应付财政危机的积极性。财政包干的主要内容包括：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地方财政包干基数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地方财政收入在用于财政支出后的余额上缴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予以补助；地方上缴比例、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和定额补助数核定后，五年不变，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涉及全国性的财政收支管理权集中在中央。

财政包干办法后来被宣传成了改革开放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它其实是中共制造灾难的产物。毛泽东心目中只有“大一统”的秦制，拒绝地方分权自治。对应秦制，中共实行中央对地方大包大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地方的收入全归中央，地方用钱全由中央下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胡乱上马了一大堆军工项目，造成大饥荒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使中央包揽地方开支的体制难以为继。1960年代初，刘少奇为应付经济危机曾经实施地方财政包干。洋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赵紫阳拾起刘少奇的财政包干办法正式推行，让地方各显神通，帮助中央财政渡难关。因此，中共财政包干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革命带来灾难的写照。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地方分权的进步潮流已经发端。192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道路。当时各界的共识是，大一统的秦制不适合中国各地差别巨大的现实，地方自治，粤人治粤，湘人治湘，晋人治晋是最佳的选择。中国的这一正确选择被外国输入的革命所扼杀。大

饥荒中和改革开放中的财政包干办法与地方自治不是一回事，因为新中国的地方官员不是地方选出，而是中央任命。因此，它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央与地方间权限与利益的分配难题，不可能制定出各地一致认可的公平方案，中央和地方就包干基数的讨价还价无法公开透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无法稳定，难以达成双方均认为合理的办法。

财政包干制将税收增长大部分留给地方政府，在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扩张政府规模为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动。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包干成了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挪用资金，透支财政收入，乱收费、乱摊派，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动因。然而，尽管有上述缺陷，财政包干相比中央统收统支制还是有进步意义。它使地方财政利益与经济发展挂勾，更能调动地方积极性，从经济上打破了中央垄断一切的模式，使地方有了一种抵制中央暴政的武器，使经济改革走上难以逆转的轨道。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大炼钢铁”那样的暴政可能就不易推行全国了。

严打运动

建国后，中共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中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共无计解决失业问题，只好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识青年赶去农村，禁止农民进城谋生。随着毛泽东时代结束，人民公社的解体，千万农民进城谋生和千万知青回城，中共多年来以驱赶、流放解决失业问题的欠账到了偿还的时候。

在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迫切需要发展民生工业，提供就业机会之时，邓小平发动“洋跃进”，将国民经济拖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应对危机，中共推出了“新八字方针”，压缩基本建设。这时，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是下马造成危机的保宝钢等大项目。但邓小平拒绝认错，中共高层全体迎合邓小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付出代价来保他的宝钢等巨型项目，下令将成千上万

的中小企业和在建轻工项目下马，为邓小平的二十几个巨型项目让路。千百万中小企业下马立即造成百业萧条，使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邓小平的巨型项目用钱虽然耗资、用汇巨大却不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结果，全国城市失业人口数千万，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犯罪率飙升，治安恶化。

198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主持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委会会议居然推翻刚开始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推出了要求加大力度打击犯罪活动的《京、津、沪、穗、汉治安座谈会纪要》。6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该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纪要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死刑复核权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法院。除了下放死刑核准权，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也被扩展。1981年和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前者加重了处罚，后者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罚修改为死刑。然而，数千万青年没有出路，没有工作，重刑、死刑没有解决治安恶化的问题。治安形式持续恶化，先后发生了东北王氏兄弟抢枪、抢劫、杀人出逃，流窜数省死打伤数十人的“二王大案”、“卓长仁等劫机案”、“呼伦贝尔团伙抢、奸、杀二十多人系列案件”（616案件）、“唐山菜刀队杀人”案等震动全国的大案。

1983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发出了严厉打击刑事案件，从重从快惩处的指示，强调“稳稳当当地解决不了问题，严就能治住，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二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14] 随后，中共出台了一系列“严打”文件和所谓人大法规，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共中央(1983)31号文件，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发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由此发动了“严打运动”。

中共中央 31 号文件推出了流氓罪名，要求“对流氓团伙分子要一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 1 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 110 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 2 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 131 条规定的 10 日改为 3 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3 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中共的系列文件法规强调“严打”、“速判”、“快杀”，下放死刑核准权，实际要求像“镇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中那样滥杀。延续毛泽东的惯用作法，中共内部下达了 5%的“严打”指标，要求按此例判重刑、死刑。

为完成镇压指标，基层公安机关将许多服刑中犯人拉出来重新重判，将原判五六年的犯人重新重判十年以上，将原判十多年者重新改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充数。执行邓小平的“从重、从快、严打”指示，基层从抓人到杀人几就办完。如同“反革命”罪是随意整肃、杀人的“口袋罪”一样，严打运动中的“流氓罪”、“投机倒把罪”也是同样的“口袋罪”。“严打”运动中，当局将穿着暴露，拍裸照，私人集会，随地大小便，在厕所写脏话，抢个电影票，男女朋友一起跳舞，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者随意逮住，将拥有淫秽书画录像，青年男女婚外性行为，偷窥、举办家庭舞者以流氓罪、“非法聚众”，“流氓

活动”，“流氓团伙”等罪名判处重刑，指挥城市居委会举报嫌疑者，将居委会办成了镇压工具，使居委会有了“小脚侦缉队”之名。当时，青年中开始出现穿花衬衫、喇叭裤，留着长头发、大鬓角，戴着墨镜等时尚。这对长期以来国人留短发，穿灰色中山装或绿军装的传统产生了冲击。严打运动中，无数新潮青年经“侦缉队”举报，被以流氓罪逮捕，判刑。以下几案反映出“严打运动”冤狱之泛滥：西安市女青年马燕秦喜欢跳舞，有三百多男舞伴，与其中部分人有性关系。数百舞友被以流氓集团罪名逮捕，马等三人被枪决，数十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王姓女大学生因与十多名男子有性关系，被以流氓罪处决。刑前她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在二十年后将不算什么；四川泸州一王姓青年与同伴打赌，在街上强吻了过路少女，被以流氓罪枪毙；北京的十多名小贩在火车站哄抢了农民的西瓜，被“顶格”判处了死刑、重刑。其中一位小贩只抢了一个西瓜的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河南一对青年恋爱同居，女方家长反对，报案称强奸，男青年被以流氓罪判处了死刑；一偷自行车贼被便衣警察抓住，以螺丝刀划破便衣警察胳膊，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安徽蚌埠李姓青年嫖妓后不给钱，被控强奸，一审被五年有期徒刑，在“严打运动”被改判十五年徒刑，青年不服上诉，在第二波“严打”中被处决；以周大维为首的几个学生加入了一农户的赌局，输钱付不起逃跑，被抓时以水果刀刺穿农民手掌，在“严打”被判了死刑。[15]

“严打”运动沿袭镇反运动传统，实施大逮捕行动，然后将犯人手插木牌押到会场，宣判后游街，很多犯人被绳勒脖子以防喊冤，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运动中，各大城市当局不断组织大逮捕，在体育场馆连续举行万人、十万人公审大会，一次枪毙几十人属于平常，其恐怖场面是镇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的再现。遵循中共高层“可杀可不杀的杀”的指示，各地当局将婚外同居、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者也屠杀凑数。运动中，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杀人场。这样的恐怖局面历朝历代没有，只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才有。如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思想、言论定罪，屠杀反抗暴政者一样，“严打”

运动不只针对刑事犯罪，同时以思想、言论定罪大规模逮捕，判重刑或杀害反抗暴政者。运动在全国持续了三年半，按照中共中央“严打”、“从重”、“从快”、“顶格”等指示判处的两百多万起案件绝大多数是冤案。严打运动后来与“清污”运动会合，各地在严打中纷纷举办了“清污”和“严打”的案例展览。如今回首，那些展览完全可称是国家罪恶展。

1984 年，全国治安在屠杀恐怖中好转，刑事案件大幅下降。当局只宣传民众因治安好转而支持“严打”运动的一面之词，而封杀对滥杀的谴责声音。如果在民国时代，独立媒体定会指出：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判刑轻，死刑少，而在于青年们没有就业机会和出路。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传人，他的“洋跃进”是毛泽东“大跃进”的传承，他的“严打”运动是毛泽东镇反运动的传承。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时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发动“严打”运动同样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 1980 年代内部讲话围绕从重、从严，传承着毛泽东嗜杀的特点。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信奉杀人立威。“严打”运动期间，他下令将数十万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建立了武警部队，以加大“严打”力度。

“严打”运动显示出全国人大的傀儡性质。运动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抛弃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推出一系列鼓励“从重从快”，快杀、多杀的所谓法规，成了镇压工具。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严打运动”中被冤杀。中共历次镇压运动害死人数绝对不止官方披露的数字，“严打”运动中被杀人数和冤杀人数也不止官方数字。可以肯定的是，当局永远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真相。邓小平发动“洋跃进”运动，让无数中小企业下马，又发动“严打运动”，要以多杀来解决失业和治安问题，无疑应对“严打”运动的无数冤案负责。

实行死刑的国家的治安并不比废除死刑的国家好，滥杀的“严打”运动只能收效于一时。在经济情况好转之前，严打运动一结束治安状况立即恶化。在第一次“严打”结束后的 1988 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 1987 年的 57 万

件上升到 83 万多件，说明靠滥杀来维持治安不是办法。政府滥杀无辜必然埋下了仇恨。基层人员知道作恶报应的道理。“严打”过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其用意是帮助严打的打手们逃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报复。“严打”结束后不久的六四运动中，袭击警察、军队的所谓暴徒中不少人是对政府的严打暴行冤冤相报。

1997 年，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继承传统，发动了第二次“严打”。2001 年，中共再发动了第三次“严打”。“严打”运动的受害者比右派还惨。右派在二十多年后获“摘帽”，而“严打”运动中的冤案三十年后也未获平反，更谈不上赔偿了。那位“严打”运动因婚外性行为而被杀害的女大学生说对了，她的所谓流氓罪在二十年后是平常的私生活。2006 年底，中共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邓小平主持推出的死刑核准权下放，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变相承认了几次“严打”滥杀非法。

第 56 章 中越边境战争

1964 年，毛泽东挑起了越战。战争持续几年后，越共感到武力战胜美国无望，与美国展开了停战谈判。毛泽东不准越共和谈，要求继续战争，中共报刊大量刊文，指责越共和谈是“跟随苏联修正主义向美国妥协投降”，要求越共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越共不想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毛泽东的战争游戏场，拒绝毛的指示，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四方谈判。毛泽东不愿见到越美双方走向和谈，以断绝援助施压迫越共继续战争。中苏珍宝岛战斗后，毛泽东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改变长期的反美立场，联美制苏，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越共对中共要求越南对美无限期开战自己却联美谈建交强烈不满，认为中共是在出卖越南。1972 年 3 月，越共人民军对美军发动的“复活节攻势”，结果在美军轰炸之下遭受了十万军队的损失。越共感到，相比继续战争的巨大损失，从中共获得的援助物资不再那么重要，决定不理睬中共的阻挠，和谈结束战争。1973 年 1 月，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方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越战。

以越共上级自居的毛泽东对越共自主决定结束战争忍无可忍，决定从两方面“教训”越共：一是打一场西沙海战向越共示威；二是扶植柬共打击越共。1974 年 1 月，中共中央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总负责，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为成员的“西沙对越作战六人领导小组”，于 19 日发动了西沙海战，击沉了南越“怒涛”号军舰，从南越占领下夺回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南越无法同时应付越共和中共，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介入西沙群岛争端。中国运用否决权否决了南越的提案。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拒绝了南越寻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海战期间，中共在国内展开了维

护领土主权的宣传高潮，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实，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民族主义立场和领土主权观念，曾支持苏俄分离蒙古，支持苏联吞并中东铁路区域，在中苏战争中宣言“武装保卫苏联”。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苏、中印、中缅、中巴、中朝、中越边境都曾秘密赠送领土。所以说，毛泽东发动西沙海战与领土主权无关，其动机一是要向越共示威，暗示要收回越战中秘密赠送越共的小岛；二是在越战结束后制造另一战争，以满足自己的战争的精神需求。

在扶植红色高棉方面毛泽东早就着手了。1955年，他指示越共选派越共和柬共人员到中国受训。随后直接插手原本依附越共的柬埔寨劳动党（柬共）。1965年，毛泽东任命在华受训中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袖，开始向柬共提供军火金钱援助。在毛泽东的扶植下，柬共于1968年1月正式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越共结束越战后，毛泽东加大扶植柬共的力度，以柬共为牵制、打击越共的工具。美军撤出后，印度支那各国的民主政府无力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1975年，越共对南越政权发动了春禄战役和胡志明战役，攻占了南越首都西贡，推翻了南越政权，武力统一了越南，柬共军队攻占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柬共在攻占金边十几天后，即侵入越南的富国岛(Phu Quôc)与寿初岛(Thổ Chu)、巴竹(Ba Chúc)等地屠杀越南民众。越南方面知道红色高棉受中共操纵，决定联苏制中，与苏共发表了《越苏宣言》，同时大规模驱逐华侨。

毛泽东去世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继续奉行扶植柬共对付越共的政策。1977年9月，波尔布特应中共邀请率红色高棉党政代表团访华。中共为波尔布特安排了与金日成一样的最高规格接待。《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报导称：“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

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1] 随后，中共中央安排波尔布特到山西参观了大寨公社，然后派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回访了柬埔寨。

1978 年初，中共中央再派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回访柬埔寨。邓在柬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要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2] 波尔布特回应说：“我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在邓颖超访柬当月，邓小平在出访新、马、泰三国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抨击苏联和越南为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共不要在柬埔寨玩火。在与李光耀会谈中，邓小平威胁越共说：“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在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 1977 年至 1978 年间再数次入侵越南安江省、知尊县屠杀越南平民，其中将百春（BA CHUC）镇的三千多居民几乎杀光。

对于中共的威胁，越共决定联苏对抗中共。1978 年中，越共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支持前红色高棉师长韩桑林率柬埔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1 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五条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针对中国的用意明显。通过该条约，苏联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越南则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后，越共在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下，于 12 月出兵攻入柬埔寨。柬共的残暴统治早已天怒人怨，痛恨红色高棉政权的柬埔寨百姓道欢迎越军来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或以竹、纸等材料制成五

角星悬挂于家门口，以示欢迎越军前来解救他们出苦海。在柬人支持下，越军势如破竹，中共百亿金钱武器扶持建立的红色高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波尔布特和中共驻柬大使孙刚率红色高棉残部逃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按毛泽东传授坚持游击战争，在柬埔寨的稻田、公路和丛林中大量埋设地雷，以屠杀平民的方式“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驻红色高棉的使馆人员后来披露，他们与红色高棉一起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在雨中睡觉，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四十七天”，[3] 间接透露出中共大使馆在幕后操纵红色高棉的事实。

越共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让中共忍无可忍。掌握了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战争以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寻求美国支持他对越开战。他在美国发表谈话说，“小孩不听话，要打几下他的屁股”，“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随后，他在东京向田中角荣透露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对于邓小平连续的威胁言论，越共回应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4]

2月16日，中共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的方式非正式地对越共宣战。2月17日清晨，当黎笋、范文同等人在金边等候签订越柬友好合作条约之时，中共九个兵团（另有十多个兵团后备）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分两路侵入越南：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一路从云南入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另一路从广西入越。中国发动战争后，国际

社会一致谴责中国侵略越南。中共沿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舆论控制和欺骗宣传手段，将国际社会谴责的消息对国人封锁，对国人宣传越南要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中国是为保卫领土主权而进行“自卫反击战”。

这时，越军的十八万主力在柬埔寨，五万在老挝，只有六个步兵团在中越边境线防守。中共军虽以数十万大军突然进攻，但由于指挥员年迈，对现代战争无知，结果被久经沙场的越南地方部队重创。中共军发现，越军使用中国援助的武器，用中国援助的成袋大米作掩体对中国军队作战。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超乎邓小平的预料，中共军队沿用落后的人海战术，依仗人数优势冲击越南阵地，付出惨重代价，原来预计一周内攻下的谅山等五个越南省会城市直到开战三周后才攻下。

谅山到河内为平川，无险可守。从军事上讲，攻占谅山没有理由止步，而应一鼓作气攻占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历史上越南曾多次反抗中国，都在中国军队攻陷谅山后宣布臣服。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越共与苏共签定了军事同盟意义的互助协定，不惧中共的军事压力，要求苏联履行协定义务。苏联不容中国将越南纳入其势力范围，作出了强烈反映，在中苏边境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2月19日，苏联的军事顾问团飞抵河内，苏联《真理报》猛烈抨击中国侵略说：“中国把战火和死亡猛烈地倾泻到越南城乡，找了一条不伦不类的借口，难道越南帮助柬埔寨人民推翻波尔布特可恶政权，有什么不对吗？北京有什么权利惩罚这个、宽容那个？”紧接着，苏联军舰进入了中国南海示威，苏 TU-95 侦察机在越南沿海和南沙群岛海域上空飞行和监察中国海军的行动，同时向越南提供从卫星收集的中方军事情报。

邓小平见到美国向中共提供的苏军调动的卫星图片后感到后果严重。尽管中共向苏共申明对越作战只是边界反击战，绝无占领越南之意，苏共还是以不惜一战的态度警告中共不许再向越南纵深推进。此时的邓小平与向下令印度进攻，向珍宝岛进攻，想教训苏联的毛泽东一样，被苏军导弹所教训。其实，邓小平早就知道苏军厉害，下令只出动步兵而不出动空军，以向苏联

表示无意图河内，并准备打一打就跑。恐惧之中，邓小平赶紧通过中国驻苏使馆向苏联传达示弱信息说中国只进行一场惩罚战争而已，暗示将见好就收。苏共在军事上教训中共轻而易举，但知道美国不允许他对中国动武，于是决定成全邓小平的儿戏战争，由外长葛罗米科向邓传话：在越南不要走得太远，命在越苏军顾问保持克制，决定也不动用空军介入中越之战。

中共入侵后，越共相信，有越苏间的军事同盟条约，料中共不敢进军河内，只以边境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抵抗中共军，以精锐部队布防守于谅山至河内一线不参战，同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声称将越南人民军兵力从 65 万至扩充 100 多万。越共的动员令并非真正扩军，只佯作决定姿态。因为苏共已向越共交底，中共军打一打自己就会跑。这时的中共军着实不是善战越军的对手，仅仅越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已经让中共军伤亡巨大。3 月 5 日，在攻占谅山的两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军。根据苏共的交底，越军放弃反攻追杀，“教训”战争儿戏般地结束。

撤军过程中，中共军根据邓小平“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一草一木”的指示，从作战部队变成了爆破工兵，对所到之处的建筑物，基础设施，桥梁，实施了毁灭性破坏，放水淹没煤矿，特别将中国援建的矿业加工厂、拖拉机厂、汽车修理厂、陶瓷器厂、小型炼钢厂、行政办公楼，包括学校、医院和民宅建筑等等彻底摧毁。越战中，美国与中共开战禁止美空军机对中越边境地区轰炸。得免于越战战火的中越边境地区此次被中共夷为了平地，破坏之惨烈远远超过了美军对南越的多年狂轰。黎笋视察时被中共破坏的惨烈程度震惊得说不出话。中共撤军后，中越双方均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双方交换了战俘。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传统，双方都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中共从来视军队和民工的伤亡数字为机密，将在朝鲜战争中巨大的伤亡数字长期保密，此次也不例外。外界估计，中国军队伤亡为十多万人。

战争结束后，邓小平下令将民主墙运动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判以重刑。当局公布魏的主要罪名为向外国人提供了关于中越战争的军事情报。这让国人

想到了宪法中规定的宣战决定权问题。世纪之初，清廷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承认宣战、媾和须经国会批准或追认。中华民国历次宪草、宪法，包括《共同纲领》和中共的宪法均规定宣战由参议院、国会、全国人大决定。但是，中共发动战争、加入战争从未经过代行最高权力的政协或人大批准，在毛泽东时代由毛个人随意决定，在毛去世后，又由邓小平个人随意决定。

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学生和亲信，二人发动的“教训”战争极为相似：1962年，毛泽东发动“教训”印度的战争，结果被苏联教训，赔了士兵生命、国家金钱之外，还奉送了西藏最富饶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毛泽东发动“教训”苏共的珍宝岛战斗，结果被苏联教训，恐惧得连召开九大都高度保密，开完会立即南下避险；邓小平发动“教训”越共的战争，也被苏共教训。二人都是在国家灾难中，在老百姓极为困苦，财政极为困难之时发动战争，同样是在军事胜利之时突然下令撤军，同样是放弃战果后再奉送领土，同样枉赔士兵性命与国家巨额金钱。二人发动战争与列宁、斯大林一样，都当权后迫不及待地输出革命，且二人发动“教训”战争都有权力斗争的考虑：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发动越战，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夺回主导权；邓小平发动越战，同样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全面接管军权。在发动教训战争的荒唐程度上，邓的教训越南战争超过了毛的教训印度战争。印度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未与苏、美结盟，毛泽东发动战争或许是没有想到苏共会作出强硬反应。而越南与苏联结了盟，“教训”越南必须准备与苏联导弹摊牌。如果说邓准备好与苏联导弹摊牌而下令开战，则他是在蓄意挑起核战。他战前访美是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对他教训越南开战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美国没有打算发动核战，没有支持他侵略越南，更不会支持中国吞并越南。美国的支持不过是在开战后向他提供一些卫星图片，以及向苏联表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动武。如果邓没有准备与苏联摊牌，则他与毛泽东一样，是在拿士兵生命，国家的安全，国家的金钱，以及国人的身家性命在开玩笑。当年毛泽东发动越战时，是邓小平到越南向越共传达了两百亿元无偿援助的口信。邓应当很清楚，这两百亿战争经费，意味着数百万军民生命和国人紧缺的口粮。那时他不介意百万死难，现

在也不会介意。他应当清楚，教训二字背后是多少生命的代价。他教训结盟越共的战争决策与清廷对各国宣战，与毛泽东下令珍宝岛动武“冲喜”一样荒唐。如果有人大批准开战的程序，人大代表势必会问邓小平准备打到哪里，不知邓小平如何回答。他肯定不能说要打到河内，那无异是说准备对苏开战，准备核战；他也不能说打过边境就往回跑。人大代表虽是中共任命，但可能有胆大者会问，打这样的仗又何苦呢。古今中外，挑起战争无非是要攻城掠地，征服藩属，获得对方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像这样打了就跑，再赔些领土的所谓教训战争好像只有只有毛邓师生发动过。二人的几次“教训”战争不仅是拿士兵生命，人民财产开玩笑，更是玩危险的核战游戏，让全国百姓冒核战风险。

中共的《人民日报》非正式对越战争宣战的社论中宣称，开战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军队侵入越南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驱逐、迫害华侨，制造流血事件”，新华社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对越开战的理由是自卫和报复越南迫害华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保护华侨而在本土之外发动战争的记录，中共更没有为保护华侨开战的动机。中国抗日战争中，斯大林把远东的三十多万华侨、华商、华工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害死华人至少十万，[5] 中共不仅沉默，更在建国后禁止谈论这些事实。指使红色高棉大屠杀时，中共将华侨向中国政府求救的信件扣压在驻金边大使馆，或干脆提供给柬共，听任求救的华侨被杀害。这些行径说明中共出兵与保护华侨与领土无关。事实上，中共每次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都是欺骗国人说法。从越南撤军后，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解释战争目的说：“中国完成了战争目标。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时间和规模上一场有限制的惩罚战，只为教训一下疯狂的‘东方古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这透露出了中共不能说出兵理由，那就是挽救残暴的红色高棉政权，是要迫使越军从柬埔寨撤出，让红色高棉政权复辟，重新统治柬埔寨。

就一党之私而言，中共发动这场侵越战争有其理由。因为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几十年，落得越共背弃中共，还推翻中共扶植的红色高棉，所以中共要教训越南。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完全不义，祸国殃民。因为，援越几十年、扶植红色高棉是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嗜好，是他背着国人的秘密行动，是祸国殃民之举。中国人民并未同意援越、援柬，当然也不会同意对越开战。中越边境战争如同 1950 年代的朝鲜战争一样，是国人生命财产的浩劫，是无谓的牺牲，是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发动越战，已经带给越南数百万的战争死难，邓小平发动另一次侵越战争，带给中国和越南另一场灾难，带来数以十万计的死难。

中共撤军后，中越战事并未结束。发动“八二三”台海炮战后，毛泽东下不了台，以长期炮击维护颜面。邓小平不愧是毛的学生，匆忙撤军后下不了台，以在边境维持长期小规模战争维护颜面。这样的小战争苏联懒得理，不会再被教训，算是邓小平继续“教训”了越共。1981 年 5、6 月间，中共在法卡山再对越开战，占领了法卡山。1984 年 4 月，中越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再次打了一场著名的“老山收复战”。此后，中越边境战如同台湾炮击一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中国军队的实战练兵场。十年间，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维持对越南边境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持续对金门、马祖炮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笑料，邓小平在中越边境持续十年小打小闹是另一笑料。1989 年，越南在东欧发生巨变的国际形势下从柬埔寨撤军。与十年前中国军队实施大破坏撤军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柬埔寨人民自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活动，感谢越军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柬埔寨人欢迎、欢送越军的盛大场面证明了人心的向背，证明了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和发动入侵越南战争的不义，也证明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说法的欺骗性。

苏联解体后，越共失去靠山。在 1991 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决议放弃与中共对抗。在共产主义政权屈指可数形势下，中、越两共需要抱团取暖，决定握手言和，恢复正常关系。于是，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

两共恢复互称同志，领导人会见恢复了拥抱，中越边界恢复了和平，两共相约忘记旧怨，在文献、历史书、教科书中不提那场持续了多年的边境战争，要求本国人民淡忘那场战争。中共友谊关城楼展览馆中重新布置宣传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文字与图片，完全不提 1979 年及其后多年的边境战争，也不提在那场边境战争中献身的十几万将士。在凭祥，曾经埋葬无数阵亡将士的万人山已经被推平成了开发区。埋着无数中越将士遗骨的老山及麻栗坡一带已成为旅游和边境贸易点，昔日的军事设施，大多成为游览景观。相比中共，越共要求人民淡忘那场战争难度更大。因为，越南人民对中共军队对越南北方的大破坏刻骨铭心，仇恨难消。

边境战争期间，一首《血染的风采》唱遍了全国。歌词是：“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今天，这场中越两国都刻意不提的战争在很多人心中是血染的悲哀。多次到中越战争前线采访的刘亚洲说：“老山、者阴山作战的时候，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袋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不少烈士遗书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

中印战争后，毛泽东、周恩来在确定边界时秘密向印度赠送了领土。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同样作法。1999 年，中越两国签订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中共将千万士兵献身夺得的老山、法卡山等广大占领区悉数划归了越南。由于越南迅速进军柬埔寨，红色高棉来不及销毁罪证，越共掌握了大量中共在柬人员指挥大屠杀的证据。中共以在边界谈判中向赠送领土的方式，

以换取越共帮助隐瞒真相。例如，坐落于北部湾中心的白龙尾岛（夜莺岛，浮水洲岛），原属广东省，越战中被中共借给越共作为后勤基地。边界谈判时，中共不提该岛的归还，实际将岛送给了越南。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共对越开战时宣传的维护领土主权之说是谎言。而且，中共从未为了领土主权对外开战过。苏共召集成立中共时就申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宣布共产党人没有祖国。因此，中共打民族主义牌时只是利用民意而已。

中共侵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红色高棉政权。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应，中共的挽救计划失败。红色高棉被推翻后，红色高棉灾难在继续。波尔布特率残部逃入山区，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坚持游击战，将柬埔寨变成世界上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1980 至 1990 年代，柬埔寨平民被红色高棉的地雷大量杀伤。时至今日，尽管有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排雷，每个月仍有数十人受到红色高棉地雷的伤害，迄今已有四万多柬埔寨平民因为地雷而丧失或截肢。

今天，在柬埔寨各地的红色高棉屠杀纪念馆中，在各地佛塔下、仓库中，那些大堆的头颅骨、那些钻头颅活取人脑的机器诉说着革命的罪恶。在“波尔布特罪恶馆”，导游介绍，在这个前中学的操场下挖出了九千具尸体，现在下面仍有一万多具尸体尚未开挖。2008 年，联合国支持成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相英萨利（**IENG SARY**）及其妻子前社会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和金边 21 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DUCH**、杜赫），开始了迟到三十年的审判，起诉“红色高棉”犯下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红色高棉领导人们无一例外地否认有罪。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关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在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中写道：“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英萨利对记者说：“我

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革命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推行暴政者没有亲手杀人，亲手杀人者是执行命令，谁也不用对滔天罪行负责。这样的辩解道出了共产革命的一个定律：革命家们永远不会认罪，革命使他们丧失了忏悔的本能。

对前红色高棉的审判因中共的暗中阻挠不断被拖延。中共希望被告们自然死亡，审判流产。因为，除了那个残暴的监狱长外，受审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国纪录片中的贵宾。柬埔寨首相洪森指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证明是失败的”。[6] 洪森等柬埔寨领导人不公开抨击中共带给柬埔寨灾难另有原因。中共通过外交与金钱两手，换取了柬埔寨当局同意帮助掩盖中共幕后指挥红色高棉“大疏散”、大屠杀的真相，换取柬埔寨关闭大屠杀纪念馆——“罪恶馆”。

2009年1月7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在金边举行了主题为《战胜大屠杀》的数万人集会，纪念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结束红高棉统治三十周年。柬埔寨将1月7日定为大屠杀终结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和全国法定假日，以哀悼两百多万被红色高棉杀害的同胞。柬埔寨首相洪森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谢辛(CHEA SIM)致词说：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结束。柬埔寨人民感谢越南把他们屠杀中解救出来，感谢越南志愿军为推翻红棉政权所作出了重大牺牲。[7] 2009年2月17日，柬埔寨特别法庭选择在中共发动入侵越南战争三十周年的日子公审了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这一日期安排实际揭示出从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到越柬战争，再到中越边境战争的来龙去脉。

第 57 章 坚持专制的“改革”

经济特区

从 1951 年深港边界被封锁后，广东民众因中共的暴政多次掀起大规模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1957 年，中共背弃退社自由的承诺，武力镇压要求退社的农民，造成了第一次逃港潮。1962 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为缓解饥荒下令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三十万饥民逃港。港英当局出动军警抓捕遣送，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慷慨施舍，组织救济送衣送粮。1972 年，文革中生活极为困苦的广东农民掀起了第三次逃港潮。1979 年 5 月，广东民众中风传香港要大赦滞港难民给予永久居民身份，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的百万农民、渔民涌向深港边境，冒死囚海逃港，形成了第四次“百万人逃港潮”。

三十年来，广东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人民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和偷渡出境（三偷）。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逃港采取严惩政策，穷苦村民不顾当局派公安、民兵沿岸昼夜巡逻，或泅海偷渡，或趁大雨、台风陆路逃港。广东人用象棋术语称水路偷渡为“督卒”，意为“有去无回”。当时宝安流传的民谣说：“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宝安县公安局《1971 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由于青壮劳力大批逃港，大片农田抛荒。”中共当局视逃港为“叛国投敌”，命边防军屠杀逃港者。四次“逃港潮”的百多万逃亡者中，成功逃到香港者是少数，更多的偷渡者人被枪杀在了海滩、山间，或葬身大海。在逃港潮时期，深圳活跃着数百“拉尸佬”。1970 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

一具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 15 元。一位“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葬了 50 具尸体，领到了 750 元。[1]

1970 年代，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多元，不到香港新界村民的百分之一。巨大生活水平差距让广东农民宁愿冒死一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文革后，汕头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还穷”。[2] 此言反映出了毛泽东祸害人民之深重。广东人民被活不下去了，只好冒险逃亡。文革过后，广东干部与香港知名人士及媒体接触日益增多。根据港商的建议，吴南生向中共广东省委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划出一个地方，开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搞个自由港，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他向省委书记习仲勋表示决心说：“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3] 习支持吴的建议，决定请中央授权广东在汕头、深圳、珠海进行试验，将想法先报告给了粤籍元老叶剑英。叶与吴一样了解粤港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和港商北上投资的愿望，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改革中先走一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实行“三来一补”，吸引港商北上办厂。正在应付经济危机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广东当局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建议有助于应付经济危机。在叶剑英陪同下，他来深圳视察，发指示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41 号文件），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在区内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财政和外汇收入定额包干，享受中央政府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实行物资、商业的市场化，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8 月，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开启了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1981 年 11 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广东省、

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给予了特区享经济立法权。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也被称为是邓小平时代最成功的决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率先富裕起来，邓小平视察时所说的“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成为现实，众多当年成功逃港者回乡投资、定居了。应当指出，中共改革开放的善政不过是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暴政部分废除而已。在革命之前，人民一直享有经营自由。经营自由是清末推动、民国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这一自由，扼杀了经济的生机。特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中，中共中央对特区并未给予物质援助，只是给了特区一些特殊的“政策待遇”，就带来广东、福建的快速经济发展，使人均经济实力迅速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特殊政策并非是中共善政，而是共产革命前私营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暴政扼杀了这一活力，使国人陷入长达三十年的饥荒、贫困。改革开放将枷锁部分解除，贫困的广东、福建立即焕发了生机，迅猛发展。这一事实说明，若无苏俄输入的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陈炯明、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建设继续，粤、闽早就经济腾飞了，不会有毛泽东时代的负增长和绝对贫困化，也不会有四次“大逃港潮”。广东官员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准备被“杀头”，可见暴政之恐怖。

在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没有就当年大规模屠杀逃港者谢罪。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施工中，一次就挖出了 400 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可以想象葬身大海偷渡者的数理多极为巨大。中共广东当局高调特区成立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完全不提，更未纪念数以百万计的逃港死难者。2011 年 8 月 13 日，德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柏林墙”修建五十周年的活动。德国联邦议会大厦降半旗，柏林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地铁停止运行一分钟，德国总统伍

尔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柏林市长沃维莱特与民众共同向当年的试图翻越“柏林墙”的死难者致哀。德国国家电视台直播了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人们宣读了一些“柏林墙”死难者的生平事迹。德国总统伍尔夫在仪式上指出，当年 1900 万前东德居民被一个专制制度隔绝在这座“耻辱墙”的后面，千千万万的人无法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1989 年柏林墙倒塌是历史的必然，证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任何墙都不能长久抵挡人民的自由愿望。德国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广东当局、深圳当局树立了榜样。相信有一天，深圳也会为百万逃港死难者举行同样的纪念仪式，相信将来在死难最多的边界区会有他们的纪念碑。

民主墙运动

文革结束后，全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国人的不满情绪强烈。1978 年春，北京西单十字路口的矮墙上开始出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民主的大字报，引起青年的广泛关注。来此看大字报、小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抨击专制制度，要求民主和言论、出版自由为主题的民间论坛，“西单民主墙”的名字传遍了全国，成了民主运动的象征。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正在向华国锋夺取中共最高权力，不仅需要军队的拥戴，也需要民意的支持。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等外宾时，他多次对“民主墙运动”予以肯定，强调要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受到邓小平支持言论的鼓舞，民主墙骨干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民主讨论会”和游行，在民主墙前张贴、散发自己印刷的刊物，文革受迫害者们纷纷贴大字报申诉冤情，有人在大字报中直指邓小平须就“反右运动”认错，有人开始在“民主墙”旁发表抨击时政的演说。

不久，一批民间团体和民办刊物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京生创办的《探索》，王军涛、陈子明创办的《北京之春》，徐文立、刘青等人创办的《四五论坛》，贵州青年黄翔等人创办的《启蒙》，周眉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任畹町创办的《中国人权同盟》，胡平、姜洪创

办的《沃土》，王希哲主持的《责任》。外地影响较大的刊物有：青岛的《海浪花》，上海的《海燕》、《民主之声》，武汉的《钟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等等。在民间团体和刊物明确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诉求后，已经取得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转而否定“民主墙运动”。1979年初，他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称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四项基本原则”，暗示这些原则不容反对，将以暴力镇压反对者。针对邓的讲话，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抨击“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普世价值，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提出要警惕新独裁者，抨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是专制和一党独裁。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付月华、张温和、刘清等“民主墙运动”的骨干。为营造依法行事的新形象，他指示人大加快推出刑法，要求依新法审判魏京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宣布废除清末以来的一切旧法，经历民国时代的国人普遍呼吁制定新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因应呼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大纲推出的同时，中共发动了镇反运动，土改运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展开了随意的大规模屠杀。《刑法大纲》与要求滥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无法兼容，屠杀的恐怖中法治委员会主动搁置了《刑法大纲》。1952年，中共颁布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两条例与《惩治反革命条例》一样，都强调中共可以不经法律审判剥夺人民财产生命，与刑法大纲完全冲突，致刑法草拟无法继续，已拟的刑法草案被搁置。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意在宪法出台时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是，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肃清反革命”的指示，推出刑法不仅没有可能，还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帽子。于是，刑法草案征集意见步骤停止。肃反运动还没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反右运动，全国人大被实际废除，刑法草案征集意见及进入立法程序无从谈起。随后，中共的迫害运动一个接一个，一切

新法均无法出台，法律空白时代持续了三十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人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三十年间三十三易其稿的《刑法》。表面上，《刑法》结束了除一部婚姻法外无法的时代，实际新颁布的刑法仍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因为其中保留了无从界定，完全随意的“反革命”罪，仍然宣布中共有权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镇压反对派和反对声音，革命党随意镇压和杀人的时代仍未结束。

在讨论《刑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对逮捕民主墙运动领袖表示反对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烈士。”10月1日，民主墙运动骨干组织了大游行，抗议当局逮捕民主运动人士。当局镇压了游行，逮捕了更多的民主墙运动骨干。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拒绝了人民的民主呼声，通过了邓小平决定的“取缔西单墙”，禁止民间刊物的决议。根据决议，《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民间刊物被取缔，争取民主人权，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夭折。

随后，法院根据新出台的《刑法》审理了魏京生案，以诽谤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和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等罪名判魏京生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审理的第一案，魏京生案是全国人大和中国司法耻辱的一页。该案从抓捕，审判到量刑完全由邓小平决定，所定三项罪名均是随意罪名，是为了一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一个证明。

反对取缔西单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的胡耀邦在十年后的临终谈话回顾民主墙运动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后自己上台。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4]

竞选人民代表热潮

民选在中国早在世纪之初就已蔚然成风。1905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开始推动民选。1906年，天津官、绅、商、学界成立了自治促成会，仿照日本自治法规，推出了中国首部地方自治法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1907年，天津举行了中国首次议员投票选举。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的进程。1909年，各省选出咨议局议员，1910年，中央资政院开议。此后，外强引入的革命不断摧残中国走向民选、民主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全面推行党国体制，从根本上摧毁了民选的条件。

1979年7月，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议将各级革命委员会改回各级政府，通过了各级人大和政府的《组织法》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法》规定，县级政权实行直接选举，“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选举法的公布激发了全国大学生参选、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情。富于社会经验的七七届、七八届大学生在“民主墙”运动的鼓舞下发起了摆脱中共党组织控制，自荐竞选人民代表的运动，涌现出了上海师院学生徐政宇，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徐邦泰，湖南师院学生梁恒、陶森，北京大学学生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夏申，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等一批独立竞选者。竞选者在竞选政纲中和各大学举行公开答辩中不约而同地抨击一党集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竞选人徐邦泰通过《大学生》杂志向大学生发出了5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竞选中，他在校刊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及

《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呼吁新闻自由。1980年5月，徐邦泰在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竞选成功，当选为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选人民代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徐的当选。独立竞选成功的消息进一步推动了学生竞选热潮。各地高校的竞选人开始联系，相互声援，形成了全国性的竞选运动。

各大城市高校竞选活动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局面失控，有高层领导人出面表态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各地中共党委纷纷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1980年10月，湖南师院校方运用行政权力以指定候选人取代了公开声称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竞选人梁恒，引发了学生的抗议行动。数千学生游行、示威、请愿、罢课，部分学生还展开了绝食抗议。请愿要求被校方拒绝后，学生们组成了赴京请愿团，要求罢免学校选举领导小组组长。湖南学潮中，徐邦泰与另一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对徐邦泰的举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以“自由化分子”罪名开除了徐的党籍，并成立专案组对徐展开审查。

11月，北京的人大代表选举开始，北大被单独划分为独立选区。竞选答辩会、演讲会、谈话会在北大每日可见，有竞选人还发起成立组织。由于参选人数太多，竞选者们自发举行了候选人预选。以陈子明为首的几位“西单民主墙运动”骨干贴出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竞选宣言》大字报，少数共产党员学生不顾内部禁令参加了竞选。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选民半数以上选票才能当选，这种规定是依据当局内定候选人，所有人遵从中共决定参加投票的设计制定的。根据这样的《选举法》，没有当局的认可，独立竞选者实际上没有当选的可能。几个月前上海的徐邦泰当选只是竞选运动初期当局没有反对情况下的偶然个案。

在竞选学生与当局对立的危机中，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中央办公厅抽调十名干部到北京大学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否定了教育部指

责学生竞选活动的报告，指示禁止各级党政当局打击学生竞选。胡的宽容政策使学生的竞选活动迅速升级成了反对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民主墙运动”。邓小平不容一党独裁受到挑战，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人民代表竞选运动，同时也否定胡耀邦的宽容政策。邓小平的强硬表态后，各高校当局强硬压制学生竞选活动。随着“民主墙运动”骨干被大批逮捕，竞选的学生们认识到，在独裁体制下没有竞选空间，纷纷抛弃竞选，独立竞选人民代表运动夭折。不久，中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竞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被以“自由化”、“向党夺权”的罪名受到整肃、“内部控制”及在毕业分配时被“穿小鞋”。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删去了1979年《选举法》中“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条文，恢复了中共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局面，实际禁止了独立人士竞选。选举法还规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八倍。这一选举权不平等的规定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大代表全是中共组织部门任命的。人大代表既不代表村民，也不代表市民，只是中共的干部。曾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评价《选举法》修正案说：“现在新的选举法仍然是个恶法，全文只有七千多字，语义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六千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十三万字。……另外，新选举法没有如何救济选举权的条款。当选民的权利被侵害时，没有法律保护。法学上有个常识：没有救济的权利就是没有权利。中国的选举法缺少救济的条款，所以它是恶法。在法律上，清末、民国的选举比现时中国先进，可行；那时有选举法庭，可以进行选举诉讼。国民党政府的选举法有明明白白的关于救济的规定，规定了选民有二十一项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选举法中没有一项得到保障。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

2004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另一《选举法》修正案。该案允许在农村基层以协商酝酿方式产生人大代表候选人。然而，在党国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民选没有空间，选举法没有意义，允许直接选举只是对党国体制影响不大的村委会主任一级，对镇政府一级都不允许直接选举。即使在村一级，没有中共的认可，独立人士参选、竞选也只能与1980年那次竞选同样结果。

八二宪法

新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民选产生，而是中共任命的。人大通过的一切都是中共预先决定好的，八二宪法即是中共决定的产物。1981年7月，邓小平让彭真主持宪法修改时就确定了四点：第一，要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第二，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规定民主集中制；第四，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彭真执笔起草了序言。[5] 修改宪法期间，学者曹思源写信给全国人大，建议中国成立宪法委员会，彭真委员长决定不予采纳。中共有一套控制人大的办法。具体包括：人大开会前，先召人大中的中共党员开会“统一思想”，由中央政治局派人作报告，部署人大会议基调，将重大议程和事项在党内会议先议决；各地的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退下来的中共书记转任人大主任、副主任；在人大会议期间，在各人大代表团设临时党委，指示代表的言行以控制人大；全国人大办公厅强调：“鉴于我们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罢免或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时，要同党委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对中央确定的人事安排‘大格局’，党员代表或委员应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投赞成票”；[6]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工作人员住到各省市代表团的住地，全程参加代表们的所有活动，每晚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关于当日人大代表公开或私下言行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夜将这些报告汇总编印，在次日晨报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实际受到严密的监控，提出未经中共允许的批评、反对意见将遭谴责直至被取消人大代表的资格。这种处分早有先例，如马寅初因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提出应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案而被罢免了人大常委和代表的资格。在如此的严密控制之下，人大开会成为举手走过场。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这次修改都是邓小平的决定，删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一些鼓吹个人崇拜的条文，加入了“四项基本原则”。修改后宪法仍然充斥不适合写入大法的党化语汇，例如“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等条文，“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修改后的大法中有外国人的名字，更像是中共的党文件而不像是国家大法。

八二宪法中存在众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它一方面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另一方面又规定共产党党权高于一切，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示中共有权以“反党”，“反革命”，“右派”等罪名镇压反对派，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条文失去意义。再如，他一方面规定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另一方面保留了“反革命”罪，使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体现着一党专制与宪政之间的根本冲突。

“八二宪法”对中国人的最大影响是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从法律上完成了中共对人民土地财产权的无偿剥夺。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当局无偿剥夺人民私有财产的历史。中共在建国之初曾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或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证》，紧接着就以土改名义无偿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房产；1954年，中共在第一部宪法宣布保护国民合法私有房产和土地，然而同时又以合作化名义剥夺了全体农民的土地产权。1956年，中共以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名义剥夺了工商业主的工商业产权，1958年，中共在“大跃进”运动中剥夺了大多数业主的私有房产产权，以政府强权迫使房主、地主们迫交出了权证。这种霸占虽然得逞，但在法律上没有完成。经过多次整肃运动，多数1950年代被暴力剥夺土地和房产的业主在文革后已经离世。文革后，幸存的城市房产、地产的业主们因心存恐惧，担心文革迫害重演而不敢向政府提出归还私有财产或补偿的要求。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的集体不复存在，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拒绝将土地产权归还给农民的霸王条款。通过修改宪法，中共宣布全国土地无偿国有，从而不用办理任何过户手续地完成了对私有土地的霸占。中共任命的五届人大代表们不敢为失去私产的业主们作主，举手通过了八二宪法关于城市土地的条款。他们中的多数记得，张春桥在文革中年起草的宪法还曾规定城镇居民自有房地产归私人所有。随着当年城乡业主的离世，业主的后代们再也难以讨回他们私产。此后三十年，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所挥霍的财源主要是霸占得来的城乡地产。中共“土地财政”的背后是城乡土地所有者的浩劫。帮助剥夺私有地产的宪法条文揭示出革命的实质——霸占他人财产。

对于经历四次修改的八二宪法，中外宪法学者批评它内容多是空洞的政治教条，而不是内容明确、语言规范法律条文。例如，它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公理，是个富于争议的说法。宪法没有给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中共也不可能给出“社会主义”的定义。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要求消灭一切私营经济，剥夺一切私有财产，由他个人控制全社会

的一切财产资源，发展军备与核武器，服务他的世界领袖梦；刘少奇在建国之初主张的社会主义要求遵守建国之初与各党派、各界的约定，允许私有制和私营经济存在几十年，要求照顾民生，发展军备量力而行，随后刘又放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转而支持完全不同的毛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毛、刘又不一样，要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政治上社会主义，即共产党党权至上，不受监督制约，要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国有资产，国民财富私有化。三位领袖的社会主义都不一样。中共在宪法中规定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说清楚要捍卫哪一种社会主义。

八二宪法中的专政说与宪政根本冲突。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中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两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宪法。中共史家称，八二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邓小平取缔“民主墙运动”时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者之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前者中之一条是“人民民主专政”。史家的这种说法是在玩弄词句，不是在讲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党化语言，并无明确含义，听凭中共解释。按照中共说法，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八二宪法出台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结构，财产所有制度和财富分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高层家族成了最富有的阶层，成了中共长期以来号召剥夺的“老财”、“土豪”、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中共仍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可见，党化语言只是服务一党利益的随意表述。宪法规定捍卫一个变来变去，无法定义的制度，难怪学者们对它多有批评，国人也很少人把它当回事。法律学者们呼吁按照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原则从根本上修宪，但是，独裁体制不改这一要求不可能实现。

中共史家说，八二宪法是一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宪法。的确，八二宪法代表着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改革相似。两场改革都强调开放，都由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两场改革运动都是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政治权力垄断。洋

务运动中，慈禧强调：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共的独裁地位不能变。两场改革运动中，企业均以官办官营为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严重。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成就超越了洋务运动，但在制度革新方面，邓小平的改革远不如洋务运动。后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也成就巨大，催生了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的教育，政府承认私人的土地产权，允许民间结社，而前者坚持党化传媒，党化教育，以国有名义剥夺私人土地产权为国有，坚持党国体制，以国库作为党库等等。两者间的差异证明了百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马克思理论与宪政、宪法根本冲突。共产党要求永远执政、领导一切，所推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宪法根本反宪政，无宪法之实。八二宪法公布的三十年后，中共仍拒绝宪政，称其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不适合中国。了解宪政、宪法的真谛才能了解中共何以不能与宪政兼容。宪政的真谛是以宪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等等权利，约束政府和执政党不得做坏事。中共拒绝制约，当然不容宪政口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不仅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有保障公民上述自由的具体条款，以防止宪法中的公民自由条款落空。而中共制定的宪法相反，否定司法独立，没有保障公民自由的具体条款。在万里接任人大委员长后，宪政学者曹思源再提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建议。万里回复说，如果宪法委员会发现中宣部违宪就没法办，难以采纳你的建议。可见，有党国体制下不可能就有真正的宪法。在八二宪法颁布的次年，邓小平发动了违背宪法的“严打运动”，人大和宪法沦为附庸。

2012年12月，中共举行了纪念八二宪法施行三十年大会，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言没有意义。因为，八二宪法申明“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共领

导一切，有法律特权，间接规定了中共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超越宪法的问题。

红色梯队

随着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复出，要求坐回原来级别的官位，中共中央只得以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官多位少问题，例如将国务院的副总理增至十三人之多。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批评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要求老干部们“对党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让出官位，支持机构改革。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让复出老干部主动退体的要求难以实施，中共元老们都认为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死在任上才是正常的，拒绝退休让位。元老们恋栈不仅因为“打江山、坐江山”思想，还因为待遇和利益，在中共待遇与官位挂钩的官本位制度之下，退休意味着特权和待遇的重大损失。另外，邓小平提“干部年轻化”要求也其他元老不服。因为邓自己也是元老，也不年轻，也是要求复出拒绝退休，也拒绝交出权力，他无法说服拥他上台的众元老们退休。同样情况与想法的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他向邓献计：“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每家至少提拔一个子女。”经过一系列密谋，元老们达成了“权力赎买”的共识，即以利益交换元老们让出官位，答应安排元老子女们政商要职，为避免引起抗议，决定每家提拔一位子女作所谓接班人，即提拔为高干，安排其他元老子女任职重要商界职位，即下海经商。根据这一共识，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机构，其一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让退休的元老们在这一安置机构中保留权力、待遇与地位，称“这样让老同志们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个地方比较容易说服”。中共在随后出台的新党章中规定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顾委安排还有一个未

明言的潜规则，那就是中顾委名义上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任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握有最后决定权，对新一届中央垂帘听政；其二是负责安排元老子女的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宣布，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军委主席执掌最高军权。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主持修改了党章，将其中“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为自己执掌军权和实际最高权力作好了安排。

中共十二大对外只宣布了机构改革，干部年轻化、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项安排，而将最重要的决定——权力赎买，安排元老子女上位的利益交换密谋对国人和党员们严格保密。遵从元老们的决定，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操办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以安置退休元老们，保留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同时领导青年干部局操办安排元老的子女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准备上位接班。胡耀邦引用孔子“祁黄羊推荐人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之语，在内部宣布元老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女或亲属优先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中央级元老的子女可优先提升至部、省级。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宋任穷为组长的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以承诺安排元老子女进入“梯队”换取元老们同意退休。中组部确定的“第二梯队”成员以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补习班成长，曾被送到苏联培养的的红二代为主。从1983年开始，中组部将元老们批准的“第二梯队”成员逐步提拔到了中央；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操办，将元老子女登记造册，

再提出了 1068 位重点提拔的“第三梯队”名单，报中顾委元老们批准。中顾委当然会立即“批准”子女群体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在“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说法掩护下，中共中央将安排女子的自谋利益之举对国人保密。中组部先安排“第三梯队”们去基层体验数月，然后快速提拔他们进入中央和省部级，时称火箭式、直升飞机式提升。

中共十二大后不久，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事实证明，中共是通过安排高层子女让红色权贵先富起来。中组部为元老子女们安排的另一出路是作官商。这时的官商利用政治权力攫取国民财富是公开的秘密。中共的“利益赎买”换取元老退休的运作颇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众将“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放任腐败换取众将交出兵权。在十二大后的几年中，中共成立了众多部级和副部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由中组部操办，安排大批元老子女去主持官商公司。官商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信、康华、保利等公司等部级、副部级公司。官商拥有特权，被民间称为“官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意味金钱，特权意味巨额财富，“梯队”成员们率先进入了以权力垄断，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产业、房地产行业，通过权力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获得物资调配权、进出口指标、铁路车皮计划、地皮，迅速暴富。原本，中共中央提拔子女限于中央元老。但执行中，各级“党和政府”层层效仿，实际是当权者子女全部提拔，形成了中央梯队之外的庞大地方梯队。

红色梯队”政策影响深远，标志中共从暴力革命党向利益集团转变。通过“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中共元老们家族迅速成为有人作官，有人经商，同时享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豪门，中共由此奠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利益格局。在二十一世纪，“红色梯队”们成了政商两界的主宰。在政界，“红色梯队”们掌控了各级党政军要职；在商界，“红色家族”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私有化了巨额的国有资产。红色家族致富

的共同路径是，在中共十二大后因获得体制内执掌官办企业的机会而崛起，然后通过改制及私有化，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拥有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声称，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不会扩大，更不会出现资本家。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的保证是谎言。他所谓的改革造成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红色家族基本转变为了大资产阶级，不到 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 60%以上”，[7] 中共“红色家族”后代们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的权益集团。[8] “先富起来”的红色家族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将民间私有财产剥夺为党产；其次要感谢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使他们得以不受制约地利用特权攫取国民财富。另外，他们还要感谢胡耀邦、李锐等人操办“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他们上位。

虽然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比起水深火热的毛泽东时代有极大改善，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意味少数权力者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公平的私有制须辅以议会制，新闻自由，选举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以约束权力滥用、权力寻租。而邓小平请回的私有制，同时拒绝相应的约束权力的制度，实行半计划，半市场的“双轨制”，经济市场化，政治一党专制，新闻审查制，人事一党任命制，为以权谋私，将国民财富据为私有大开方便之门。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意思是财产公有将带来掠夺，权力私有将带来专权和党天下。邓氏的改革开放是财产公有而权力私有，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转移成了家族私有财产，“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邓小平颂歌歌词）。邓小平一面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面拒绝对权力的制约的设计实质是自谋，是让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不仅推动经济改革，也锐意推动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层意见的分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太阳与人》。影片

描写一对为躲避战祸侨居海外的画家夫妇在中共建国时满怀激情回国效力，但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胡乔木抨击《苦恋》，以及整个文艺界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表态拒绝胡耀邦推动的思想领域中的变革。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称“《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文革中批判运动一样的批判白桦和《苦恋》运动。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电影《苦恋》。年底，邓小平发话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许挑战表态封杀了政治思想领域变革。按照中共批判运动的规矩，对《苦恋》的批判浪潮以《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出白桦的检讨信宣告结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推动改革的报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在随后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联席会议上，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责胡违背了中共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邓力群在文艺和理论界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污）。中宣部长邓力群与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分别主持了中央党校和文化领域的“清污”运动。在文艺界，中共将《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歌曲《乡恋》等一批作品被批判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当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乡恋》，而改革派

坚持对歌曲不应有文革式的管制。结果，改革派借全国观众一致点唱而推动《乡恋》成功播出。其实，这首歌曲是当时是难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为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没有歌颂共产党，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文艺必须歌颂共产党的原则。不歌颂共产党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须中共高层批准，显示中国仍未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黑暗。

3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座谈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在其中呼吁“思想解放”。报告再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胡发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文，批判周的报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陈云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报》。邓小平支持了胡乔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肃《人民日报》高层。结果，《人民日报》总编秦川被警告，副总编王若水被撤职。随后，中共将“清污”运动被推向了全国，将批判范围扩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当年义和团的仇洋一样，当局将众多外来的事物指为污染，批判、禁演一大批歌曲、电影、电视片，西方风格的服饰批评为“奇装异服”，干涉人们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北京共青团甚至组织青年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的亲密举动，禁止所谓“勾肩搭背”，干涉养花、养鸟，甚至砸碎人体雕塑。运动中，有些工厂门口站岗，阻止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者入内。保守派将“清污”运动扩大到农村，打击农村改革，批判农民谋求发家致富、搞长途贩运，抨击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等“资本主义泛滥”，指责经济特区为“租界”。与右派，反革命，反党等罪名一样，精神污染也是无从界定的随意整人罪名。人们担心反右运动、文革运动重演，全国一时回到了红卫兵运动时的黑暗与恐怖。

11月，胡耀邦访日归来，联手赵紫阳、万里向邓小平举报“清污运动出现扩大化”，影响到了经济改革。邓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需要推进经济改革帮助应付经济危机，于是表态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扩大

化”。有了邓的表态，胡耀邦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批评各地“清污运动搞得走了样，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抬头”。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一文，反对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发出指示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运动不了了之。

“清污”运动显示中共统治之专制与革命之倒退，显示“反自由化”和“清污运动”中的中国与非革命样板戏不准唱的文革中国一样黑暗。一个党甚至要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虽然暂时压制了清污运动，但不久还是被保守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扳倒。

十二届三中全会与经济改革

中共允许在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农业开始复苏。中共十二大后，中共在城市的经济改革起步。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举措的推出，全国经济在特区经济起飞的带动下开始走出“洋跃进”后的经济危机。当时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邓小平发动“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的情况，学生们在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中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显示出了国人对经济改革的赞同。

国庆后，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推进城市经济改革。会后，中共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城市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一切，因此中共无法清楚回答是厂长、经理领导党委书记还是相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让一些内行、年轻的厂长经理上台。但是，企业国有，干部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

年轻内行的厂长、经理们并不能真正负责，还是要接受党委书记的领导。况且，厂长、经理们与党委书记一样，首先要对上级负责，其次才考虑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说明，国营企业中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不可能真正实施。

利改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将大中型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企业利润的 55% 向国家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按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向国家纳税。中共试图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利改税创造一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不清楚，市场和价格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在所谓公有制之下，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失灵，成本、收益等难以核算，无法判定效率与盈利。在企业产品并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定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盈利差别不能说明经营效率，企业利润水平只能说是政府决定的结果。在这样的局面下，利改税并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使国营企业的税赋增加，利润水平连年下降。

恢复股市：中共建国后即取缔了股市。经过几十年的禁锢，人们对股票极为陌生，股票发行备受冷遇。十二届三中全会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发行股票。首先发行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结果，深圳当局采取行政手段命干部带头买股票。某局分到 1 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 1,000 股，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后来被迫买股票的党政干部因此发了财）。1985 年，上海股市在被取缔三十多年后重开。具有商业眼光的上海市民忘却二十年前上海工商业者的惨痛经历，排队买股票。刚刚恢复的股市规模狭小，成交低迷。1986-1989 年，上海股市四年成交额不足亿元，深圳股市 1988 年的交易额不足千万元。

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决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后，中共中央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

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这些开放城市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及海南岛一起，推动了中国迅速对外开放。

与农村允许承包等改革举措一样，中共放宽城市经济管制的改革举措不值得老百姓感恩戴德。因为，共产革命前，企业本来就是经理负责，企业本来就是纳税经营，本来就没有国营企业垄断局面，没有上缴利润体制，股市本来就正常运转，城市港口本来就对外开放，是共产革命给经济活动套上了枷锁，取缔了大部分的经营自由，才有了党委在企业中专权，才有了一个党有权取缔或决定重开股市的灾难，也有了所有经营活动均须经中共批准，服务中共利益的灾难，才使市民与农民一样陷入长期贫困。在放松管制时，中共没有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企业、股市，剥夺业主私产向国人道歉，反而将大力宣传自己造福民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瞩目，但是经济改革的背后是政治体制相关的种种禁锢没有根本的改变。2013年，新总理李克强力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营。与此前高调宣传相反，自贸区挂牌仪式格外低调。李克强不但未出席挂牌仪式，在次日的国庆招待会致辞时也只字不提上海自贸区。如此低调是因为，中共内部为自贸区设立了重重限制。例如，《人民日报》称政府不允许开设“政治租界”，官方发布了近两百项对外资经营活动限制的清单，列出了金融、房地产、娱乐及媒体等诸多行业的外资参与限制，以及新闻机构、新闻网站、图书、报纸、期刊出版、网络视听节目、网吧、网游运营服务、博彩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外商禁入行业，这使自贸区失去意义。应当指出，不开放垄断行业的背后是红色家族不允许触动他们的利益。四个经济特区也好，十四个开放城市也好，三十年的发展证明，一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不可能有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

村民组织法试行

1980年，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政社合一组织不复存在。农民包田到户，各干各的，多数农村的党政基层组织瘫痪，中共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力衰落，乡村的公益、公共服务衰落，乱摊派和乱收费的泛滥，治安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求回复民国时已在乡村试行的乡约治村。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农民率先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来维护治安，调节纠纷，管理公共设施。不久，村民委员会在各地农村迅速普及，遍布乡村。至1985年初，全国农村出现了约百万个村委会。在中共领导一切的体制下，村委会成员不可能由村民选举，而只能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这样的村民委员会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初衷，成为拿村民的钱，对上一级中共党委负责的干部，不同的是不可能再像人民公社时代那样管制农民了。

1988年6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组织法》）开始试行。令农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试就试行了十多年，正式组织法迟迟出不了台。十年间，少数村干部包办村委会成员提名，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上级乡镇政府内定村委会成员，操控选举，随意否定村民的选举结果，甚至根本不经选举，延续上级任命的旧制。政府对村委会的操控必然引起村民的不满。很多地方村民以不承认上级任命村委的方式抗争。在政府指定人选未能主导村委会的情况下，中共支持村党支部，形成村委会之外的另一领导中心。村民选出的村委会权势不敌上级撑腰的村党支部，于是，很多地方出现动员村民选村中共支部书记为村委会主任，或全村村民选举中共村支书，选出后再由党员会认可村民选出的支书的怪事。

正式《村民组织法》无法出台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与“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根本冲突。虽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写入了1982年宪法，但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也赫然在宪法之中，中共不容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有所能变，村民自治就没有生存空间。这一冲突不是

始于人民公社解体，而是始于 1920 年代。历史上，中国虽无乡村自治的说法，但政府规模很小，县级以下无官府，广大农村由乡绅领导，形成原始的自治。清末新政中，清廷推动地方自治，要求省自治有县自治的基础，县自治有乡村自治的基础，要求村民选出有文化、有产业、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的乡绅领导乡村。1920 年代初，中国联省自治运动成为全国各地、各界的共识。中国由村民自治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选择被苏俄武装的国民党、共产党所扼杀，代之以党国体制。自从有了党国体制，民治不再可能，宪法中的村民自治无从实施。

2011 年，广东海陆丰乌坎村村民的抗争出人意外。村民们驱逐了该村共产党支部，自行选出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组织，在一个村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一事件虽然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但它让人们相信，村民自治会在二十一世纪取代党治。

第 58 章 三峡建坝

“两把梯子”

建国伊始，刚刚成立的水利部门开始鼓吹在三峡建坝。这时，国家经历长期战乱，政府又派军入朝鲜参战，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三峡建坝之议显然痴人说梦，在高层中得不到支持。于是，水利部门转而鼓吹先建三峡大坝的准备工程。1953 年 2 月，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陪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在船上向毛进言说：修三峡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应先在丹江口、葛洲坝搞两把梯子。毛泽东随口说了一声好。有了这一好字，水利部门迅速提出了丹江口查勘报告，不是提交给专家机构论证，而是直报外行的毛泽东。毛看不明白，又不懂得重大工程方案应先交专家论证的道理，随口再说了声好。有了毛的两声好，三峡建坝的第一把“梯子”——丹江口水利工程就算决定了。

1954 年，长江特大洪水威胁到武汉等长江中游城市，林一山加紧向毛泽东游说三峡建坝，声称建一个蓄水位达海拔 235 米（意味淹没整个重庆），防洪库容超过 1000 亿立方米的超级大水库，将千年一遇的长江洪水量统统装进去以一举根除长江水患。这一方案在国力、技术，成本效益、泥沙淤积等方面堪称可笑，但却代表了水电部门的主流思想。水电部门要求多建水库，建大水库，要把洪水堵住，用成千上万个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而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湖区分洪等低投入、高效益的日常工作兴趣却不大，背后是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思想和部门利益考虑。因为建大水库可以掌握花不完的钱。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反对三峡建坝。他指出：“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洼地，是千百年来防止水患的蓄洪区域。但是这些符合自然规律的湖泊

被大面积围垦，使原有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通江湖泊减少了一半，蓄洪能力减半，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还湖，不仅可以改农为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其泄洪作用，是适于自然条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两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利用一米深水蓄洪，即有 200 亿立方米的容积，即相当于三峡工程 170 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库容”。李的几句话道明了长江水患的由来。自古以来，长江因有中下游的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湖泊调蓄，不存在水患。湖泊、蓄洪区接纳汛期的江河水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自从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占了云梦泽，长江开始有了水患，只因有洞庭湖调蓄，水患并不严重。清代，人向江河争地加剧，侵占分洪低地湖区，长江水患加剧。

超级大水库装千亿方汛期洪水的计划虽然幼稚可笑，但合毛泽东的口味。毛相信“人定胜天”，认可了该计划，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督办。周下令封杀李锐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文章，批准水电部立即邀请苏联水利专家参与，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1958 年，中共中央在南宁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水电部门提交的三峡建坝报告，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提出国力不足，反对三峡建坝。会后，周恩来带队考察了三峡。随后的成都会议上，张爱萍从国防角度提出反对三峡建坝意见说：“头上顶着一盆水，打翻了不得了”。接受军方的意见，毛泽东决定搁置三峡建坝。李锐后来回忆说：“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惟独关于三峡的这个搁置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

1959 年，丹江口大坝工程在全国饥荒中启动。工程先开工，再设计，投资款在工程开工不久就用完了。水电部门要求国务院追加投资。周恩来问完成后续工程或工程下马分别需要多少投资，林答所需投资一样多。周恩来无法承担已经投入资金完全损失的责任，只好东拼西凑追加工程投资。不久，追加投资款又用完了，已经投入的资金翻倍。周再向林同样的问题，林同样

答复。周再同样应对，动用本可救济千万灾民的巨额金钱再追加投资。**1966**年，在大坝工程开工七年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确定初期规模为：坝顶高程**162**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

1970年，中共中央根据备战需要，决定从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生产坦克用特殊钢板。该设备电量及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水电部趁机以解决武钢一米七轧机的用电需求为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葛洲坝，声称为三峡建坝准备“第二把梯子”。水电部门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实际是服务三峡水库的反调节配套工程。外行人不知建这“两把梯子”的奥妙，只有水电部清楚，先建它们是要造成三峡大坝非建不可，否则谁也无法承担“两把梯子”巨大浪费责任的局面。在水电部报出来声称“三年就可建成，为造坦克发电”的《葛洲坝工程说明书》上，毛泽东批示：“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水电部门将毛泽东这句荒唐话当开工许可证到处悬挂，以“圣旨”压制反对声音。如此，一个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耗资数十亿的大工程在没有规划设计文件，没有比较方案，没有经济效益分析，未经任何论证的情况，被水电部以几页《工程说明书》糊弄毛泽东、周恩来获得“圣旨”的办法上马了。水电部精心地选择在**1970**年的毛泽东生辰日举行了葛洲坝工程的开工典礼。与十一年前丹江口工程一样，葛洲坝工程也是先开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随时修改，质量事故不断。工程摊子已经铺开，事故再多、再大也只能继续。负责打理“两把梯子”的周恩来亲自去葛洲坝工地视察后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973**年，丹江口初期工程勉强完工，花费了毛、周最初同意投资额的四倍，建设了一个比当初上报能力小很多的病库险坝，留下了一大堆没有解决的移民安置和补偿问题。这时，周恩来与水电部门联手，将工程吹嘘为除害兴利，“五利俱全”的枢纽工程（十年后大坝上游的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淹死民众数以万计）。**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这时，毛、周都已来日无多，无力也无心再理

会“梯子”之事了。与丹江口工程被“钓鱼”一样，政府在葛洲坝工程进程中也
被水电部牵着鼻子走，被迫一再追加投资。

先上马后论证

重新掌权后，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众多大项目一齐上马。水电部和湖北省乘机向邓重提三峡建坝，报上了 1958 年制定的正常蓄水位海拔 200 米，195 米和 190 米等三个方案。水电部门积极推动建三峡大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已经成了“建坝部”，养了几十万专门建坝的工程队伍，必须在葛洲坝完工后让工程队伍有坝建。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好大喜功。毛不喜欢讨论具体事宜，更懒得操刀办事，凡事只画圈同意，作个批示，然后交周恩来去打理，邓则不同，热衷于上马巨型项目，且喜欢亲自谈项目。在亲自拍板引进了二十二个巨型项目后，邓决定对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作一番亲自考察。

1980 年 7 月，邓小平回乡省亲，回程时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当时四川省坚决反对三峡建坝工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乘船考察三峡。船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的汇报。魏廷铮只向邓小平介绍了建坝的好处，避谈大坝加重上游洪水灾害、泥沙淤积等负面问题，声称泥沙淤积可以解决，强调已经建了准备工程葛洲坝。与毛泽东一样，外行的邓小平立即表态说：“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中来。”船到武汉之后，邓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高层召到东湖宾馆一起听取了水电部门关于三峡建坝的汇报。水电部介绍方案说，正常蓄水位将为海拔 150 米，需要移民 50 万，投资几百亿等等。听完汇报，邓小平拍板决定，在三峡建大坝。当年，毛泽东被水电部几句话，几项纸糊弄就作了荒唐指示建了“两把梯子”。如今，邓小平同样，乘船调查了一趟，然后就将一个影响深远，专家们长期争论的巨大工程拍板了。

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重申建坝决定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急于上大项目的水电部门再以“圣旨”为开工许可证，开始了三峡建坝的各项准备工程与采购。这时，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巨型高坝水库对社会对环境的长远危害而放弃建坝，水利发电设备和技术已经成了不值钱的淘汰物资。邓小平不了解这些情况，了解情况的水电部门将这些实情隐瞒，引进了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等大批国外淘汰的水电技术与设备。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建坝报告，成立了由李鹏为组长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三峡建坝工程正式启动。1985年初，邓小平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上听取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汇报三峡工程情况后再次就专业问题乱表态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针对李鹏提出的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手段解决移民安置的计划，邓小平表态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2] 独裁体制下，领袖既无相关专业知识，又不愿意听取批评意见，自以为可以决定一切，藐视自然规律，手下人投其所好，谎言蛊惑，关系国计民生百年大计的巨型工程在蛊惑中被荒唐决定。当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来访时当面向邓小平介绍了西方放弃建坝的情况，劝邓放弃三峡建坝计划。邓答：“已经定了，不能改了。”

得知三峡工程已经开工，政协委员们发出了反对声音。经历毛泽东时代的长期废弃，人大、政协在邓小平主政后得以复会。政协委员们清楚自己不能行使监督职能，也不能就政策提出批评，但又不甘完全处于摆设地位，不甘成为中共营造大治局面的花瓶。三峡工程为他们送上了出声的机会。他们知道，就一项工程发出反对声音不至于背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罪名。以周培源、李锐为首的一批政协委员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激烈抨击三峡工程不经可行性论证和人大批准程序即悄然开工，要求停止工程，启动论证。长期没有真实新闻可报新闻媒体人也不甘只作党喉舌，将政协发出反对声音

的题材报导为“大闹政协事件”。部分政协委员们不满足于在会上质疑，还在会后采取行动制止一个关系国家前途的巨型工程草率上马。前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孙越崎率团考察三峡后上书中共中央，陈述三峡工程的七大问题，要求推迟三峡建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上书中共中央谓由不诚实的人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我们不放心；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抨击三峡工程是“钓鱼工程”，所公布的预算只是投资规模的四分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从全国生产力布局出发置疑三峡工程的效益；侯学煜教授指三峡工程将带来生态灾难；水利部工程师陆钦侃指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反对三峡建坝的声音不只来自政协。在民主墙运动后，社会各界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诉求持续。一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作家、退居二线中共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和一般的市民也纷纷抨击独裁的三峡建坝决策。

政协委员们的反对声音虽不能阻止水电部建三峡大坝施工的步伐，但中共中央也不能对政协的反对声音置之不理。1986年，赵紫阳视察三峡后向邓小平汇报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视反对声音为反对共产党，也从来不接受反对意见。他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他不想一人承担三峡建坝决策的责任，指示找一批专家进行论证。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第15号文件，宣布对三峡建坝进行可行性论证。

当年三门峡建坝，毛泽东拍板在先，周恩来召集一批专家论证在后。在肃反恐怖中，谁都知道反对毛泽东拍板的事意味什么。除了不计个人得失的黄万里和一位技术员反对外，全体专家附和高层已然的决定。此时，在邓小

平已拍板，建坝大军已在施工的背景下，从水电部到政协，大家都清楚可行性论证只是应付反对声音的走过场，论证必须背书中共中央的决定。水电部采取了一系列操控论证的办法：邀请支持三峡建坝的 412 位专家参加论证，象征性地包括了几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但将李锐、黄万里等反对三峡建坝的代表人物排除在外；由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主持论证领导小组，指定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担任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由论证小组专家兼任国务院论证审查委员会专家，例如，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同时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审查可行性报告（陆后来又兼任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导致他在后来三峡工程出现问题时不敢指出问题，尽量掩盖问题，用“三峡工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话来搪塞）[3]；不提供备选方案，只论证水电部所提方案；不容许公开辩论，只允许公布肯定方案的论证意见；只允许专题小组论证各自专业题目，不允许就三峡工程整体发表意见，使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问题没有机会公开讨论；要求专家签字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等等。通过上述安排，水电部掩盖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三峡建坝在清淤、防洪、发电的几项目标之间无法兼顾。例如，泥沙组要求汛期开闸放水，冲走淤积泥沙；而防洪组要求汛期蓄水防洪，两组意见冲突。

关于三峡工程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的论证，魏廷铮当初向邓小平汇报说，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 5000 万吨。论证中，专家们发现最大的单向通过能力仅为每年 3500 万吨。为使论证结果达到已报邓小平的 5000 万吨指标，论证专家编造了“航运以万吨船队为主”的谎言。实际上，长江每年有多半时间是不可能通行万吨船队的。在生态环境论证中，以马世骏院士为组长，方子云为副组长，侯学煜院士为顾问的生态环境组得出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弊大于利”的结论。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既定三峡上马的决定相冲突，生态环境组在“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加上“许多弊病是可以

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后缀。侯学煜教授不同意这一似是而非的表述，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1988年，葛洲坝勉强宣布初步建成。这时，无人问责水电部当初承诺的三年建成，为一米七轧机提供电力的承诺。当然，在党国体制下根本不存在问责。况且，所谓备战本来就是服务毛泽东臆想的说法，并无哪个国家要侵略中国，备战只是浪费百姓活命钱，生产不出坦克钢板等只会减少浪费。但是，参加三峡论证的专家们心里清楚，葛洲坝水利工程问题成堆：它违背了河流开发的“先上游，后下游”的一般规则，所宣传的航运、防洪、发电三大利不可兼得，顾此必然失彼；作为径流式水电站，葛洲坝安装 19 台 12.5 万千瓦和 2 台 17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272 万千瓦。然而，为保航运必须限制发电。结果，这一号称最大的水电站实际发电量仅 77 万千瓦，只是装机容量的零头；葛洲坝船闸常因淤沙而发生事故，致长江航运经常停航；就经济效益而言，葛洲坝的单位千瓦发电量投资数倍于长江支流上的小水电站，而这个得不偿失的大型水电站工程挤占了其它水电站的建设资金等等。论证专家们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建葛洲坝决策的荒唐，但没有人敢于在论证中明言。因为，论证会是水电部门的地盘，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在中国专家论证三峡建坝之时，各国同行已经形成建大坝会造成巨大生态灾难的一致看法。中国政府封锁国际水利界的定论，主导论证组去得出相反结论。虽然多数专家知道知道各国同行的共识，了解各国大坝靠政府补贴生存的事实，了解各国都在放弃建巨坝计划的事实，但他们选择了顺从政府意志。在水电部主导下，三峡工程论证组得出结论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人大批准

1989年7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选定三峡作为上任后首次视察之地，在视察中高调表态支持三峡建坝。江支持建坝是因为，他需要以支持峡建坝决策换取邓小平的信任和总理李鹏的支持。回京后，江泽民探病李

鹏，再向李当面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作为回报，李表态支持“江核心”。1992年1月，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批准了三峡工程。2月，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三峡建坝决定。3月，国务院将三峡建坝计划交人大通过。将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复杂的提案交数千全国人大代表表决的作法受到广泛质疑。质疑的要点是：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让这些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的众多代表们来表决并不合适；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等等。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审议三峡方案的人大代表们不了解专家在论证中提出的反对意见。外界质疑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是事实。为避免出现人大背离中共中央意图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江泽民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说，党中央和他本人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党员代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人大召开后，总理李鹏再作了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并主持了人大审批三峡工程的会议。（两人的重要报告始终未被公开，也未被收入在十多年后编辑出版的各自选集）两位最高层领导人为一个工程的决策到人大作动员报告，说明了人大会议确实在中共操纵之下。

4月7日，人大对三峡工程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机器，争论了半个世纪的三峡建坝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表决中，赞成的比例恰为人大中中共党员代表的比例。其实，国务院、水电部组织论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江泽民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作决定、国务院向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步骤全是走过场，邓小平在1980年视察后就已经拍板，工程早在1982前已经启动，水电部门早已巨资进口了外国已淘汰的技术、设备。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开工几年后是不可逆转的。开工后的专家论证、报国务院批准、报人大审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只是为了应付反对声音虚假程序。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峡工程开工十多年后主持了专为应付外界的三峡开工典礼，宣称建坝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举行了大江截流仪式，江泽民、李鹏出席率众高层出席。

遗祸无穷

2006年5月20日，180米高的三峡大坝封顶，没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中央电视台也没进行转播。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与前领导人的决策划清界线。因为这时，建坝的灾难后果开始浮现。这些灾难包括：

1、淤积问题无法解决

游说三峡建坝时，水电部官员告诉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放水冲刷的办法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二十年前论证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教授就指出水库会因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而被淤废。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的警告应验，三门峡水库被淤废。在三峡建坝论证时，被排除在专家论证组外的黄教授再次指出，在黄河、长江这样泥沙量的江河上建坝，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三峡建坝将复制三门峡水库的灾难，且灾难规模更大到难以想象。黄教授的意见并非创见，而是国际专业领域中的定论。这也是各国放弃建坝的原因之一。三峡论证中，专家们没有拿出有效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水电部门无法解释三门峡水库为什么淤废，只得重复“排浑蓄清”谎言，声称随着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将缓慢下降以骗取人大批准。但水库蓄水后，黄万里警告的泥沙淤积问题立即应验，而且比警告的更严重，随着大量的移民，附近植被和生态会被加速破坏，长江的泥沙量上升，每年有数亿立方米的泥沙淤在水库中无法排出，朝天门及江北嘴一带的长江北岸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沙坝，由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流处直伸入朝天门一带的江心。至2010年，滥泥湾的淤积高度已超过50米，长江上游最大码头寸滩港开始被淤，[4]照此速度，三峡水库淤废将不是很遥远的事。

水电部门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但有办法掩盖问题。办法是在上游金沙江和嘉陵江上再建多座大坝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将淤积的问题引向

上游，引向将来。水电部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以掩盖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又可以不停地建坝，一直建到长江源头，反正泥沙淤到长江源头是遥远的事，与现任政府和水电部门无关。2007年，水电部门为掩盖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微小，淤积问题解决不了等致命失误而在三峡上游“虎跳峡”开工的高坝在云南地方当局的抵制之下停工，已经投入的巨额前期投资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黄万里教授早就预计到水电部门会采取遗害子孙的办法。他指出，建坝泥沙淤积问题的显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届领导人或可忽略，但将来问题会非常严重，那时的三峡大坝的难题会比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严重百倍。

2、水库没有防洪作用

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 1600 亿立方米。林一山当年提出的 1000 亿立方米库容的方案虽不切实际，但确是根据长江洪水量计算出来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 175 米，海拔 145 米的限制水位与海拔 175 米之间的防洪库容为 221.5 亿立方米，不及当初林一山忽悠毛泽东防洪库容的四分之一。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道出三峡水库库容真相说：水库的总库容由活动库容和死库容组成，而活动库容又由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组成。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三峡水库的活动库容 221.5 亿立方米，死库容 171.5 亿立方米。死库容的作用是抬高水位以利于发电，以及作为泥沙淤积的场所。按照兴利库与防洪库容不重复计算的国际标准，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仅为 56.5 亿立方米。水电部门按不同时间段计算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同样一立方米库容，汛期是防洪库容，到枯水期时则成了兴利库容，经过重复计算，将全部的 221.5 亿立方米活动库容算作了防洪库容，属严重误导。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 102 亿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消失。这样一来，三峡水库实际没有防洪作用。

另外，三峡工程设计中还有更致命的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按照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三峡水库从大坝到 600 多公里外库尾的水位落差估计仅为 0.4

米，即 600 公里间几乎没有落差。水库建成蓄水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大坝到库尾间的水位落差是 35 米。这意味着，汛期水库蓄水至海拔 175 米时，上游重庆将会被淹没，如果要保重庆只能降低蓄水高度，水库汛期不能按设计能力蓄水，防洪能力报废。2002 年初，当局在三峡库区最初划定的水库淹没线以上盖了新房，以“就地安置”巴东县官渡口、沿渡河等镇的移民。但因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新建的移民城镇在淹没线以下，新房不能住，移民被迫再次迁移。2009 年 8 月 6 日，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海拔 148 米，而重庆水位超过海拔 183 米，两地水位差 38 米。当天，重庆晚报刊登了题为《长江水已淹没朝天门码头》和《江水漫进渝中区储奇门滨江公园》的两张照片。这还不算高，2009 年 8 月初汛期，三峡坝前水位海拔 147 米，而重庆江面水位为海拔 188 米，水位差高达 41 米，朝天门、磁器口被淹，岸边高数米的景观灯灯杆已被淹没。三峡工程设计中的水位估计错误是世界水利史、科技史上最大的丑闻。对此丑闻，官场上的应对是互相推诿。三峡工程的首席专家、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总负责人张光斗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披露设计错误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 135 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有关文件呈送主管副总理吴邦国，吴往上推，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将文件转给了总理李鹏及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重大设计事故就此没了下文。2005 年，在三峡大坝即将完工时，张光斗院士再次致信郭树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 135 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到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张院士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对外宣称的要低，防洪与发电无法兼顾，发电也达不到吹嘘的能力，要保发电就要

影响长江航运。他书面向国务院报告的用意是“立此存照”，强调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不想一个人背黑锅。他提醒，由于错误过于严重，“千万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郭树言将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报告转给了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当然不能责怪张光斗教授，因为，国务院自己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推动者，是所有失误的责任人。国务院清楚，错误严重到必须隐瞒，如果让全国百姓知道他们在电费中多年交钱，建成的大坝在汛期不能按设计蓄水，大坝顶端号称起防洪蓄洪作用三十米大坝是废物，那将引发政治震荡。于是，国务院将致命失误作为国家机密封锁。专家王维洛评论中国政府的应对道：一个大坝工程最基本数据出错，工程的所有论证，包括工程的防洪效益、发电效益的计算结果必然全错。一个对国民生计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出现如此严重的技术错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阻止工程继续。但在中国，因是最高权力者拍板决策，政府必须掩盖错误。

3、防洪、发电、航运目标均达不到

常识告诉人们，水库发电须枯水季节蓄水，汛期放水；水库防洪须汛前放水，汛期蓄水。由于洪峰何时到来，洪峰水量有多大非人类所能预知，水库的防洪效益与发电效益互相冲突，无法兼顾。当年论证中，著名的“长江通”陆钦侃就曾指出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被夸大，因此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三峡大坝封顶后，新华社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6年6月1日）；一年后，新华社改口称“三峡大坝今年可以满足千年一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标准”（新华社2007年5月7日宜昌电）；2010年汛期，中央电视台在7月20日的专题节目中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长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剧下降，今年抗洪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当年长江洪峰到来时，三峡水库没有蓄水至正常水位，重庆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超过海拔188米，重庆一些市区的水位更是超过海拔190米，若三峡水库按防洪库容蓄水，

重庆将全部被淹没。如果不想让重庆被淹，三峡水库在汛期水位须限制在海拔 145 米以下，即汛期不能蓄洪。于是，水电部门汛期反而大量泄洪，使下游武汉受到洪水重威胁。民众谴责，三峡大坝防洪功能的夸大宣传让全国许多天然泄洪区、蓄洪区都被各地政府用于了房地产开发，现在在十年一遇洪峰面前就紧急泄洪，使长江两岸百姓比没有三峡大坝时更危险，谴责三峡工程是骗民工程。

关于发电效益，1950 年代，推动三门峡建坝的水电官员们声称，三门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但大坝建成后不久，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废，既不能发电、又不能防洪。1980 年代，推动三峡建坝的水利官员们声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三峡水水电站装机容量仅为全国总装机容量的 2%，且这一装机容量也不代表它的真正发电能力。因为上述水力坡度的致命错误，三峡水库不能在汛期蓄水至正常水位，而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这就造成下游枯水、停航的严重问题。2010 年 10 月，三峡水库在枯水季节首次蓄水至 175 米设计蓄水位以证明其能达到设计蓄水位，结果造成了洞庭湖、鄱阳湖、赣江水位剧降，赣江水位逼近历史最低水位，湘江株洲站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长沙市陷入水荒，长江航运陷入瘫痪。此后，长江流域干旱问题日渐严峻，中游地区与长江相连的两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另一大湖泊洪河年年干旱见底。这说明，三峡水库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发电，其发电效益须以下游干旱和长江航运瘫痪为代价。张光斗教授在内部文件中提出额外兴建火力发电厂，以弥补三峡水库在夏天发电减少，实际是要求以火电来掩盖三峡发电效益谎言。与三门峡水库一样，三峡水库只能以上游洪涝，下游干旱的大代价换取发电的小效益。三门峡水库经过多年淤积才进入无利而大害阶段，其微小发电量的最大作用只是延缓大坝被炸掉。三峡水库也将如此。一旦三峡水库进入无利大害阶段，其害比三门峡不知要大多少倍，将是全国，全民族的灾难。

航运是三峡建坝时宣传的三大效益之一。水电部门报批时宣称大坝高水位后万吨船队两、三个小时过闸，从上海直达重庆，年单向通过 5000 万吨。工程宣布建成后，升船机根本没有建成，江轮过船闸等须几天，货船只好卸货从陆地用车“翻坝”再装船。全国人大代表王鸿举在人大会上投诉说：“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重庆市的交通运输高度依赖长江黄金水道，三峡大坝建设时预计到 2030 年通闸量达到 1 亿吨，但是 2011 年通闸量就达到 1.1 亿吨，再加上每年蓄水、放水和维修，不少货物不得不翻坝通过。建坝以前货物不需要翻坝，修了大坝货物翻坝费理应由建设单位承担。而实际建设单位却反过来向航运企业收费，而且收费奇贵。翻坝公路是三峡总公司修的，收费比高速路贵得多，五公里的路程各种费用就要好几百元，对航运企业是个巨大的负担。管理闸坝的是交通部下属的一个单位，谁先过谁后过、谁过闸谁翻坝过他们说了算，滋生腐败，已经抓了 8 个人了。”船闸碍航，大坝造成下游低水位更加碍航。三峡水库蓄水使长江下游的荆州、宜昌河段水位过低，船只搁浅，建坝时宣称的航运之利实际没有。

关于三峡建坝的航运目标，有一个案例让人哭笑不得。三峡大坝开工的同时，当时跨径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万州长江大桥也开工了，三年后建成。设，造价 3 亿的万州长江大桥建成。由于万州长江公路大桥的设计依据三峡工程设计者提供的错误水力坡度数据，致大桥在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海拔 175 米蓄水时净空高不足，大船无法通过。理论上，为保长江航运就需要拆除投资 3 亿建成的万州长江大桥。可是，三峡水库蓄水至 175 米只能瞬间达到以应付验收摆摆样子，实际不能蓄水到那一高度，另外三峡船闸达不到设计能力，万吨轮不可能直达重庆，于是理论上应当拆除的万州长江大桥不用拆了，可以照用不误。

4、移民总数超十倍

在三峡建坝之前，全世界建坝工程移民的最高记录是 15 万。在论证三峡工程时，侯学煜博士就指出，对全国水库考察的结果证明，没有一个水库

妥善解决了移民问题，大多数水库的移民在二、三十年后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小型水库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大型的水库的问题当然更大。水电部门知道，如果不隐瞒移民数，三峡工程是无法获得人大批准的，于是先压低移民人数，等到三峡工程建成、三峡水库蓄水后，再让真实的移民人数逐步浮出水面。这时，再多的移民数政府也要买单。水电部门游说邓小平批准建坝时称移民 50 万，到报人大批准时，三峡工程确定移民数为 113 万，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湖北、四川两省上报国务院的移民数已达 150 万人。为安置三峡移民，国务院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包括了万州、涪陵和黔江等地区，目的是让大重庆市帮助解决移民问题。大重庆解决不了移民问题，国务院动用行政手段，强令全国的二十一省市支援三峡库区，将三峡建坝的移民成本分摊到全国，掩盖真实的移民成本。三峡大坝建成时，实际移民数超过了 180 万人。但这只是移民灾难的开始。移民安置的后续费用是个无底洞。当初采取“就地后靠”方式的百万移民带来成堆的问题。其一，移民上山开垦，严重破坏三峡脆弱的生态环境，破坏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环保灾难，加剧了水库的淤积；其二，“就地后靠”安置的移民区难以形成经济圈，无以为生。于是，重庆市规划再向库区外移民 400 万。按当地一位领导估算，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 30 万元人民币，按此，再移 400 万，移民费用将超过万亿元。财政总收入预计只有 500 多亿元的重庆市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移民费用。中央的办法是将三峡后续的移民费用分摊到全国人民头上，让全国人民补贴三峡大坝工程。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建议，从保护水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未来 10 年内必须再移民 500 万。 [5] 两难的情况是，若不移民，三峡地区环境不堪重负，而大量移民会因天文数字的移民经费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三峡库区已陷入了“就地后靠——开垦加剧滑坡——财政支付搬迁——再就地后靠”的恶性循环，政府面临对三峡库区输血式的生态建设资金投入的无底洞。

三峡工程移民数是当初水利部“忽悠”邓小平数字的十几倍至数十倍。水电部门当初低估移民数是推动工程上马的手段。三峡建坝工程造价的将近一

半是移民费用。为了获得人大批准，水电部门压低工程预算最有效办法是压低移民数字。如此看来，推动三峡建坝的水电部门将坝前和库尾间水位差估计接近为零完全可能是故意为之。

5、工程造价超支数十倍

三峡建坝工程是典型的“钓鱼工程”与投资“黑洞工程”。所谓“钓鱼工程”就是，论证时低估投资，等论证通过，工程开工呈不可逆转之势时再要求追加投资，且追加额不再经原批准论证机构审批。水利部门鼓动的丹江口工程是“钓鱼工程”实际投资是鼓动时的四、五倍。三峡工程是更大的“钓鱼工程”。水电部门报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静态投资总额为 570 亿元。然而，三峡工程的投资额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众多费用不计入工程造价。比如国务院提倡的对口支援，一个省支援一个县，全国各省市的无偿对口支援承担了三峡工程造价，无数大企业，如云南玉溪烟厂，浙江的娃哈哈集团为支援某县承担了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重庆市没有洪水问题，不建任何防洪设施。三峡工程开工后，重庆市政府须投巨资采取防洪措施；三峡工程淹没 400 多所学校，涉及学生近 25 万、教职工近 2 万，学校的搬迁重建不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承担，而由地方财政另作教育投入；三峡水库淹没约 1400 家企业，造成 20 多万职工失去工作，国家为这些下岗职工发放的“低保生活费”不计入三峡工程成本；中央和重庆等地方财政支出约 600 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库区水污染；这些投入远远不够，三峡水质恶化加剧，库区已停止以三峡水库为饮用水源，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 3000 亿元人民币，国家还须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因三峡工程导致的地质灾害专项治理；三峡建坝的后续欠账不仅在重庆和库区，还有“清水下洩”，冲刷下游堤坝，造成荆江大堤崩岸和下游地方政府的巨额支出等等。

三峡工程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向全国征收的特别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随电费向全国老百姓摊派。三峡工程以这一建设基金筹资与银行贷

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用支付利息，也不用三峡工程总公司偿还。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电价也持续上涨，实际是三峡工程总公司无偿从全国百姓手中收钱，不设限额，任由追加，敞口花钱，没有真正的成本核算。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完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截止，全国百姓在为三峡工程缴费近十七年后没有等到承诺的“电费下降”，三峡工程公司没有偿还建设资金，没有偿还老百姓所缴纳的三峡基金，国务院换了个名目，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在电费中收费，让全国老百姓继续掏钱填补三峡工程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和全部发电利润被私有化，归了各级水电官员持股的一个股份公司。水电官员和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人员享受着股份公司的分红，全国人民则须继续为后三峡工程买单。长江水电集团在解释时发电量下降原因时承认，三峡工程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暗示三、四十年后中国老百姓还得再投资重建三峡工程发电机组。2013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发现，三峡集团公司用人腐败、工程建设招标专案暗箱操作，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分包；领导层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等诸多腐败问题。政府项目必有腐败，没有制约的“党和政府”权力都是牟利机器，三峡建坝工程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为应付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灾难，政府需要投入的各项后续资金实际是个巨大的无底洞。例如，政府计划投入数百亿元用于治理库区的水污染，但库水污染问题绝非区区几百亿元可以解决。重庆市政府和人大代表提出的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缺口就高达5000亿元，若包括全国的各种支援总额，治理滑坡、水质污染等后续费用，三峡工程的开支将超过两万亿元。而且，两万亿不是顶，政府必须为三峡工程没完没了地支付后续资金。三峡后续问题和资金投入无底洞将是中华民族未来几百年的痛。

6、生态、环保、地质灾害黑洞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灾难性的。三峡工程向论证将地表坡度 30 度以下视为可以垦殖的耕地，违反了《水土保持法》第 14 条“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规定，实际是在破坏三峡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长久以来，长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污渠，三峡上游两岸城镇有大量的污水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在三峡水库蓄水前，这些污染被激流带走。大坝建成蓄水后，库区将成最大的污水池，漂浮水面的垃圾动辄数万平米，迫使水库周边的城镇另辟水源。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3 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承认，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1968 年至 1977 年的 10 年间，长江鲟鱼年平均产量为 49 万公斤。如今，苏东坡、何景明、郑板桥、谢塘等诗人赞美的“水中西施”、“南国绝色佳人”长江鲟鱼已基本灭绝。原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指出，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除受水域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无序的水电开发。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鱼类灭绝的开始，三峡工程是长江鱼类的灭顶之灾。鱼类的灾难在继续，中国水利部门正在长江上游和上游主要支流不断建坝，在金沙江、岷江、雅砻江、乌江、嘉陵江规划、开建了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将长江上游变成了层层“梯田”的水库群。不仅鲟鱼，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扬子鳄、江豚、胭脂鱼、淞江鲈，以及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在走向灭绝。

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在三峡论证时众多环境保护专家警告的可怕后果几乎全部应验。坝区出现地裂，滑坡加剧，上游的重庆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地震、大旱、高温、水灾。三峡集团不能告诉国人的是，三峡水库的设计蓄水高度海拔 145 米至 175 米只能瞬间达到。因为，当水库蓄水高度超过 150 米时，水库周边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明显增加，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倍增。2003 年以来，重庆市奉节县发生地震 14 次，最大震级 2.9 级。至 2010 年为了治理这些灾害已花费 120 亿元人民币。不过，

地质灾难并非花钱就可以消除的。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三峡水库蓄水后，齐岳山东北已经断裂，出现一条宽几十米，深千余米的超级大峡谷，超级强震的危险已经远超过三峡上马论证时的“6.5级地震”。

综上所述，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其真正的效益只有发电这一块，每年 200 多亿元的发电收入完全抵不上蓄水带来下游干旱和碍航的经济损失。上述六项灾难后果足以证明，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灾难。这一灾难是三门峡建坝悲剧的重演。1950 年代开始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导致上游洪水频发，给陕西、给 40 万移民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如今已成为一场带来无穷尽环境和社会的灾难。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指出：“这个大坝是个愚蠢的错误，它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一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专家们早就警告三门峡建坝的灾难将会在三峡工程后重演，其泥沙淤积、污染、洪水及地质等灾难的程度更将大到难以想象。黄万里教授指出，人为破坏江河规律的原因造成的洪水灾害是不能用建坝来解决的。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只有转移洪水灾害的功能。水库把自然的江河变成一节一节的死水，河流的自然属性消失，最后变成了人工河，使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他警告，三峡建坝后，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嘉陵江口将会再现三门峡水库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最终三峡水库也将像三门峡水库一样被淤废而难逃被炸毁的命运。

在三峡灾难浮现时，国人怀念坚持科学良心的黄万里教授。1957 年，黄万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孤身反对黄河三门峡建坝，痛陈不可在“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筑坝；建坝只会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搬到上游，并造成移民灾难。他为此痛陈付出了二十二年右派劳改的代价。长期蒙冤没有让他学会随波逐流。1984 年，他向中共中央陈述三峡不可建坝，抨击高层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决策建坝。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应

付政协对三峡建坝的反对声音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水电部邀请因积极支持三门峡建坝而获毛泽东提拔的张光斗为特别顾问，将黄万里教授排除在专家论证组之外。在国务院将三峡工程议案报人大批准，三峡建坝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黄万里以“共和国公民、由国家培养的、从事了六十年的水利工作者”的名义分别致信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陈述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理由，警告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蓄水后卵石将淤塞重庆，加剧四川水患，酿成移民灾难。上书不获理睬，他再致信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的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中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举报三峡论证组负责人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并继续致信中共中央，呼吁绝不能兴建三峡大坝这样祸国殃民的工程，否则大坝难逃被炸掉的命运。在三门峡、三峡论证时根据政治风向举手、签名者都得到了名利。在三峡可行论书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后来都成了院士，其中张光斗等人更成了双院士，拒绝签字的陆钦侃、陈昌笃等专家都没有成为院士。临终，黄万里嘱咐家人：“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他遗嘱家人将投书中央的信件副本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最后遗言是“三峡，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

作家郑义指出：长江原本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后，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农民懂得“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

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基层官员们其实都懂“治水必先治山”。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3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10~11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的投资外，国家投资不过30~33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投资仅为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八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然而，水电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7] 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前董事长大卫·哈里森指出：“三峡水库对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这在事先环境评估时完全预料了。政府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完全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却孤注一掷，选择了上马。”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国际探索(PROBE INTERNATIONAL)总干事亚当斯 (PATRICIA ADAMS)女士说：三峡水库代价过高，根本算不上发展模式，连过去的模式都算不上，因为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项目从来都在经济上站不住脚，执意修建是因为受益的人不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人不受益。中国推广不经济、代价大于福祉的电站项目，让中国人民和水坝附近的民众付出代价，这是中国的不良记录。鼓动兴建电站者宣传水电是绿色能源，而实际上，水库发电的生态代价使它不是绿色能源。

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水电部门建坝成瘾在国外也不少见。当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自身既得利益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

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公款，留下后患。三峡大坝同样给贪污腐败提供一个天堂。移民费用 700 亿，按人头算每人 4 万多，但是你要去问移民，他们一般每人只得到五千到八千元，三峡工程移民的资金到哪去了，这将永远是个秘密。关于三峡大坝，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三峡工程至今也没有公布水位库容图，而水位库容图是每个水库大坝工程的最基本技术图。为什么三峡工程不敢公布水位库容图呢？如果公布这张图上述一系列致命的错误露馅了。长江三峡河段原来处于泥沙冲淤平衡的状态。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累积淤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特别是重庆的水位会越来越高。只有重庆水位的抬高，才能使三峡水库从目前的淤积状态向未来的冲淤平衡转变。这个转变的代价是，更多的淹没，更多居民的迁移。这个过程不是十年就会结束的，起码是一百年。在三峡水库到达泥沙冲淤平衡之前，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会不停地增长，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也就无法收尾。随着三峡水库上游水位的抬高，地质灾害问题将更加严重。三峡库区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土地更少，人地矛盾会更加严重。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增加，波浪对库岸侵蚀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示出来，库岸的垮塌将越发严重。同样，水库水污染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三峡工程移民收尾工作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三峡工程或成为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当年对于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曾说“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工程面临立斩或凌迟抉择。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 19 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黄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建坝、三峡建坝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补充说：“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

轮船了。王维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点拆的话，已经形成的问题将更严重，比如重庆港淤掉了再拆也没用了。”

历史上，长江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带给两岸农田肥沃的土壤。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一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一个蓄水量为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新中国带给全国森林三次（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土地承包）大砍伐，长江流域的森林近千万亩的消失，泥石流遍地发生。《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三峡工程公然践踏上述法律，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

新中国的水利史是水电部门毫无节制地建水库的历史。水电部门狂建了8.5万座水库，数量越过了其它国家水库的总和，其背后是利益冲动。历朝历代，朝廷建大工程，都是近半工程款落入私囊。皇家内务府永远希望皇上大兴土木，有大工程就有油水，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与内务府一样，水电部是新中国政府部门中最早、最大的利益集团，它对维护堤防，维护分洪区，水土保持等治本举措不感兴趣，只想以“钓鱼”手法游说领导人拍板上大型工程，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一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一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生计。事实上，其下属的施工队伍从丹江口建到葛洲坝，再到三峡，一辈子不愁没活干。水利部名为水利，实际对全国的“病、险”水库，对众多垮坝崩

堤灾害，对 1970 年代全国每年水库崩塌几百座造成的水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0 年船游考察到瞿塘峡时，邓小平曾指着两岸重山峻岭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选在下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琮解释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窄，因此要选在下游宽处。这里，水电部门在蒙骗外行的邓小平。对于这一问题，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工程违反了应在峡谷处建坝，应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坝，应在淹没和移民少处建坝等基本原则。如果一定要建坝也应在长江上游建坝。那样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在这些地方的勘查设计。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象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黄教授没有明言的是，建坝选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小项目没有油水。建越大的大坝，涉及移民越多才越有油水。在论证时，不少专家建议以建设几个小水坝代替三峡超级大坝，以求投资少，移民少，风险小，比如在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峡谷建坝。水电部门对这些道理比谁都清楚。肉食动物捕猎后会先吃好吃肉，大肉，肥肉，在有吃肉时不会去啃骨头。水电部也一样，选在宽处建超级大坝是大肉，有大肉就不屑吃偏僻处建小水电站的碎肉，更不想去啃维护堤防的骨头。

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还是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荒唐题词、指示、拍板，造孽国家人民的历史。外行不是错，但他外行又偏要拍板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巨型工程就是罪过了。当三峡建坝一系列灾难后果浮现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邓小平船游一趟就拍板建超级巨坝造孽之深重。历史将证明，这一罪过对国家和民族的损害超过他的“洋跃进”和毛泽东的“大跃进”。中共领导人不会认错，不会道歉，但会逃避罪责。邓小平自 1980 年以来大量的推动三峡工程

上马的重要讲话被排除出了邓文选；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在视察三峡时高调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和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时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被排除出了江文选；李鹏在全国人大期间所作的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也被排除出了李文选。李鹏在日记中称三峡决策是江泽民所主导。他写道：“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6] 中共领导人们的上述举动显示，他们非常清楚三峡建坝后果之严重。

第 59 章 从学潮到六四

八六学潮与胡耀邦下台

复出之后，邓小平大力鼓吹体制改革，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方案。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受他的报告鼓舞，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就政治体制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报刊跟进刊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文章和学术研讨发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征求各界政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一被外界被称为“庚申改革方案”的改革建议要点为：“党和国家民主化”；修改宪法、保障人大权威，人大分成两院；贯彻民族自治政策，保障民族自治权；加强民主和法制，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真正受法律保护；司法独立，中共党委不得干涉司法，法院作出判决无需送中共政法委审查；党政分开，共产党不得干涉政府日常事务，不得包办代替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舆论机构的事务；允许独立的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独立的新闻报导和评论；改革企、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度；基层政权及基层社会生活实现直接民主，使每个公民都能实际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取消中共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下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同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中共的权力受宪法和法律制约，共产党违犯宪法、法律，人民有权反对等等。政改方案的核心是打破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限制党权，抛弃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庚申

改革方案“拟就不久，邓小平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禁止对共产党独裁权力有任何触动，不仅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还制定改革方案本身也成了反党活动，面临被镇压的风险。1982年，胡耀邦就任中共总书记。他要求逐步放弃一党独裁，走向民主和法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不同意邓小平这样在改革问题上出尔反尔，不同意邓掩盖毛泽东的罪责、在平反冤案、“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与邓多有冲突。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着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灾难后果显现。改革开放前，物资的调拨和价格全部由政府掌控，不存在物资市场，也不存在计划外、体制外的交易。国务院宣布引入市场机制以促进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企业可以对自销部分的工业生产资料自由定价，价格“双轨制”形成。在双轨制下，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计划外是市场价。两种价格间的巨大价差成为权力寻租的空间。拥有权力的官员通过关系人倒买倒卖获取价差，拥有权力背景的各种贸易公司纷纷涌现。这些被称为“官倒”的权力背景公司从最初倒卖电器、钢材、煤炭、石油、铝锭、粮食等物资发展到批文、指标、利差（市场贷款均衡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倒汇差（市场均衡汇率与官方汇率之差）。由于权力不受制约，经济改革成了特权阶层鲸吞国民财富的盛宴。

“官倒”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任董事长的中国康华有限公司（小康华公司）。该公司获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获经贸部予出口经营权，获税务总局予免税待遇，依靠特权、政治背景和政府特批的优惠从事进出口贸易，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巨额财富。随后，康华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部级公司（大康华）。大康华成立后凭借国务院给予的特权，各级官员和退休官僚的业务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倒卖外汇和重要生产资料，利用价格双轨制赚取全民的财富，

迅速发展成为拥有 58 个子公司，113 个三级子公司的庞大“官倒”集团。有了康华的榜样，中央及各地党政军机关成立了数十万个官倒公司，类似康华一样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有着官方背景，利用利用价格双轨制和特批的进出口权发财的官倒公司遍布全国。

老百姓对高层子女的利用权力“官倒”行径无比痛恨，民间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呼声，邓小平上继续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说法封杀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暗中支持“红色梯队”和“官倒”们“先富起来”。胡耀邦看到，只有开放搞活的经济改革而没有限制权力滥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是为权力者利用权力鲸吞国民财富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中共党内最清廉，最痛恨贪污腐败者，他直指拒绝体制变革的“改革开放”导致腐败丛生、贫富悬殊、以权谋私，声言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为平息腐败带来的民怨，他要求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并举，限制以权力谋利。当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涉嫌经济犯罪，侦破工作因无法进入首长驻地取证受阻时，胡耀邦批示：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据此批示，中央办公厅趁胡乔木外出开会安排公安人员入宅搜查，搜出装满两麻袋的巨额人民币现金和美元。这在当时是普通百姓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1] 胡的坚决反腐不仅将胡石英送进了监狱。

1985 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内部讲话中指出，改革和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为什么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中共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胡耀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鼓舞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热情，同时让保守派元老们忍无可忍。1986 年春，胡耀邦推动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千干部反腐大会，他的反腐涉及胡立教之子、胡乔木

之子、叶飞之女。当反腐进行到这一步时，胡声言的“坚持到底”、“不能怕得罪人”坚持不下去了。一方面，反腐越反越多，涉及特权阶层子女反之不尽，另一方面，腐败的后台越来越硬，他无力继续。这时，胡为难，中共众高层也为难。李先念警告子女说，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高层元老们都胡耀邦对限制特权，堵塞子女财路强烈不满，纷纷向邓小平状告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

应对元老们抵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胡耀邦决心打破元老们垂帘听政，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废除高层的终身制，要求元老们退休，并几次婉转地要求邓小平履行承诺，带头退休。倡议废除最高领导层终身制邓小平树立体制改革形象的一大卖点。对于胡耀邦委婉的要求，邓小平不情愿地作出姿态，在 1985 年 8 月北戴河作寿时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邓小平表态后，胡耀邦在 9 月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推动新老交替，正式提出“已经过八十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元老们对胡耀邦一再敦促交权让位强烈不满，开始暗中串联，密谋“倒胡”。

1986 年 5 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商量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退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2] 胡听后当了真。6 月，邓小平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党政分开”。受邓讲话鼓舞，胡耀邦主持成立了亲自挂帅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等人为成员，下设“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等七个专题小

组，开始设计政改方案。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老同志退休，让三十五到五十岁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暗示七十岁以上者全部退出政治局。胡耀邦劝元老们说：“我们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对胡的要求，万里、习仲勋、杨得志、聂荣臻、倪志福、乌兰夫等人表示支持，胡乔木、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等元老以“党和国家需要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来领导”的说法拒绝胡的要求。会议在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中陷入僵局。众人都在等待邓小平一锤定音。令胡耀邦吃惊的是，邓小平变卦，以沉默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表态，也否定了胡的提议。“默否”是毛泽东惯用的办法。在真实意思不便摆上台面时，毛泽东总是以沉默，不作答复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提议。邓小平的沉默让密谋“倒胡”的元老们顿时有了底气。胡耀邦这时才清楚，原来邓小平一再表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言论只是针别人，实际完全没有退休交权的打算，更不容忍别人敦促他退休。会议不欢而散后，“倒胡”的主要推动者王震对支持胡耀邦的万里等人发难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回复：“王老啊，你不要激动。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想纠正一下，我们要树立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的最高权威。”邓小平说：“耀邦偏要我下，要树自己”。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王震则促邓小平去胡说：“谁让你下台，你就让他下台。”邓小平与王震同样心思，宣布行动计划说：“那些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3]会后，邓小平开始布署党内政变，指派薄一波撇开胡耀邦另起炉灶，组成七人班子负责拟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暗中在高层成员中征询对撤胡耀邦总书记职的意见，实际是要求高层们对罢免胡耀邦表态。如同 1959 年庐

山会议时毛泽东要求高层人人表态时一样，高层成员们非常清楚手握军权的邓将扳倒空有最高领袖之名的胡，纷纷表态支持“倒胡”。征询意见的同时，薄一波搜集了一堆胡的“自由化”言论，为向胡发难作准备。

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胡耀邦与保守派发生了冲突。胡要求删除这两个体现一党专制并违反宪法的提法，陆定一、万里等人支持胡的主张，彭真、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邓力群等人针锋相对，坚持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写入决议。名义领袖胡耀邦没有决断权，双方须再次听候邓小平拍板决断。邓小平决定，删去“清除精神污染”，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表态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党内高层们见胡耀邦的主张屡被否决，知道他的地位不保，纷纷转向，不再支持胡。因为，胡耀邦反对以权谋利，要求七十岁以上的高层退休，仅这两条已经将高层的人得罪光了。10月3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秘密谈话。陈云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如此急迫为邓找烟，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密谈的内容是决定罢免名义党领袖胡耀邦。

中共元老们在酝酿“倒胡”时，青年学生们在酝酿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青年们对独裁体制，对权力阶层大肆侵吞国民财富的不满日益强烈。1986年春，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赶下了台。菲

律宾人民的行动鼓舞了东亚各国人民反对专制与腐败的勇气，各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9月，台湾民众决心结束一党专制，挑战国民党的党禁专制，成立了反对党。蒋经国顺应进步潮流，主动结束一党专制，解除了党禁。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民众组党、办报和大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内，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正在这时，中国科技大学不经民选程序指定了选区三个人民代表候选人，学生的不满爆发。1986年12月，科大学生走上合肥街头请愿，喊出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立即响应，掀起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请愿运动，学潮迅速蔓延全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认为学潮是胡耀邦几年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12月27日，邓小平召集政治老人们在家中密谋，决定罢免胡耀邦。12月30日，胡耀邦准备召开应对学潮的政治局常委会。当通知邓小平开会时，邓命胡耀邦不得召开常委会，到他指定的地方听指示。胡耀邦只得率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及教育部长何东昌等人去听训话。邓小平斥责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称“学生闹事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你难道没有责任？”胡答：“我保留意见。”邓训斥：“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仅要讲，而且必要时使用。”[4] 邓不仅要求用专政手段，而且声言制止学生闹事要不怕流血。[5] 斥胡之外，邓小平还点名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这些人早就应该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6] 邓此言已经明确传达了罢胡的意思。追随邓小平，元老们对胡耀邦展开了围攻。薄一波说：“你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

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7] 会后，赵紫阳劝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接受赵的劝说，胡耀邦来到了邓小平家认错。邓小平罢胡之意已决，不听认错，大讲胡耀邦上任后的成绩。当胡谈到分歧时，邓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胡明白，邓不接受认错，于是向邓口头提出辞职。邓答复说：“我打算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这时，胡耀邦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为了共产党的江山，自己已经宣布在不久后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已经与世无争，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不知道，元老们已经商量好要罢免他了。

邓小平怒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是因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个当年的“右派分子”联署，向全国四十位著名的“右派分子”发出邀请信，倡议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时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斐、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人热情回信，响应倡议，费孝通和钱伟长两人收到邀请信后没有回应。二人在多年的右派经历中悟出只有紧跟共产党才有出路，不敢再有招惹共产党的举动。费孝通以不回复倡议表达他与平反反右诉求划清界线，钱伟长则把邀请信通过民盟中央密送给了中共中央，并附言说：“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邓小平见到邀请信大怒。作为当年的主持人，他视反右运动为政治生命，绝对不容否定反右运动，要把写邀请信的三人开除出党。在召见胡耀邦等人训话时，他错把写信的许良英记为了王若望，下令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位开除出党，同时表扬钱、费两位，同时决定重用二人。

作为共产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必然产物，鼓励告密的作法来自苏俄。苏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国的同时，将通过鼓励告密维护极权社会的作法引入了中国。在苏区肃反中，无数红军、干部死于了告密。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迫害手段之一就是鼓动互相揭发，告密。革命家们，革命文艺家们，“民主党派”们的革命经历中或多或少都曾经互相告密。反右运动开始，告密与出卖成了潮流。多年后揭发出来的例子有：翻译家冯亦代奉命搜集章伯的言论向当局级密报；[8] 画家黄苗子在文革中告密，使文艺家聂绀弩进了监狱。[9] 这只是揭露出来的几例，更多的告密隐藏在档案中，或随着档案销毁永远不为人知。钱伟长之告密与当年舒芜、冯亦代不同。他的处境没有那么凶险。他可能只此一次，但他一下就告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反右运动中冯亦代告密，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只是后来比别人早摘了右派帽子，而钱伟长、一告即获封全国政协副主席，表态与其他右派划清界线的费孝通则获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二人一步跃入国家领导人之列。钱、费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荣辱两重天显示，一党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的荣辱完全取决于是否跟随权力者，人大、政协官位完全是权力者的囊中物，邓小平一句话可予可夺。

1987 年元旦，北京的大学生举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公安部门根据邓小平谈话中“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的说法，在天安门广场逮捕了一批的学生。当晚，邓小平打电话给彭真说：“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的。通过近一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你讲话的关键时刻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一下。”当夜，邓小平、陈云将两个月前陈云家中密谋的罢胡决定向其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其他元老通报，众元老形成了一致意见——罢免胡耀邦。[10] 元老们知道，这样的罢免不合程序，也难以向全党交待，决定用几年前迫使华国锋自己辞职的办法，迫使胡自己辞职。在元老们秘密聚会时，北京的学生冒大雪连夜再到天安门广场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已准备辞职的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指示，命公

安部门放人。当晚，公安部门根据胡的指示释放了被捕学生，使事态和平解决。

1月2日，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题为《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请辞总书记职。1月4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等人再次密谋，指定薄一波、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由薄一波负责，以召开“生活会”的方式解决胡耀邦问题。这里，邓小平照搬了毛泽东整肃高岗时的手法。当年，毛泽东部署好整肃高岗后自己退居幕后，让刘少奇出面主持整肃高岗的会议，不给高岗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欺骗言论、出尔反尔被高当面拆穿。此时，邓小平同样套路，部署好罢胡后自己和最初密谋的陈云、李先念退居幕后，让薄一波主持会议整肃胡耀邦，不给胡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和欺骗言论被胡当面拆穿。离开邓家后，薄主持发出了措辞含糊的开会通知，通知胡耀邦到中南海参加老人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但不提会议的规格、议题，同时布署了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余秋里、黄火青等人在生活会上作倒胡发言。

1月10日，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名为“民主生活会”，实为延安整风式和文革式的批斗会，由预先安排好的人对胡“扣帽子、打棍子、揭老底”。余秋里开头炮，批胡半小时；邓力群讲了整整半天，给胡耀邦列举了六大罪状；姚依林从经济角度批胡“不懂经济，又不好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批胡“搞高指标、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压力，造成经济混乱”；王震直接威胁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了”；宋任穷：“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11]众高层将胡耀邦约束特权举措指为的主要“罪状”，抨击胡“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薄一波批胡长达半日，要求胡耀邦检讨严重错误。几年前，薄一波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向胡求助，胡耀邦冒着政治风险主持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帮助薄等复出。但此时，

薄看清邓小平的罢胡意图后对胡批斗毫不留情。更让胡伤心还有多年老友王鹤寿的反戈一击。王与胡耀邦、陶铸在延安时关系亲密，人称“桃园三结义”。此时，王也看清了形势，表态忠于元老，接受元老们的特殊任务，在第一天会后到胡耀邦家里“摸态度”。在第二天“生活会”上，王鹤寿将胡私下诉说委屈的“心里话”在会议上揭发出来，批胡“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说了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陈云说了要处理福建假药案，胡耀邦都顶着不办。我去看他时，他还说没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伤心。这说明胡耀邦态度不端正。”

薄一波、王鹤寿等众高层的批斗、揭发虽不尽人情，但符合革命党的规则与传统。革命党内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与倒台者划清界线，落井下石。众高层都在苏区肃反中参与整肃战友，在延安整风中参与整肃同志，都曾参与整肃高饶，整肃彭、黄、张、周，都曾在文革发动时参与整肃彭、罗、陆、杨，整肃朱德，都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参与整肃刘少奇，在九一三事件后参与整肃林彪，后来参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邓小平，大家都是在不讲情面地整肃同志中生存过来的。那些拒绝参与整肃者，仗义执言者，辩论是非曲直者，揭露阴谋诡计者早就从高层中消失了。大家早已习惯了唯领袖意旨是从。以赵紫阳、万里为首的原胡耀邦支持者以加入批胡的行动向元老们表态效忠。赵紫阳尖锐批胡说：“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到那时我只有辞职了”。[12] 赵以这番表态发言赢得了邓、陈等元老的信任。

在众人表态加入批胡后，薄一波、彭真按照元老们的事先部署发难，要求胡耀邦辞职，王震跟进表示支持说：“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唯一反对声音来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习接到通知来开会，对会议规模，议题一无所知。在批斗胡的会上沉默。在众人逼迫胡耀邦下台时，习仲勋打破沉默，开口质问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逼宫吗？这样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党的生活会不能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胡耀邦打住习的发言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1月15日，胡耀邦在生活会上宣读了题为《我的表态》的检讨书。随后，会议作出决议：接受胡的辞职，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走出会场时，胡耀邦支持不住，坐在过道台阶上痛哭失声。没有人前来安慰，众高层们须划清界线，以行动表态站在党的立场上。

1月16日，薄一波宣布“民主生活会”结束，在幕后指挥倒胡的邓小平来到前台，出面主持会议，宣布会议转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这一幕是当年毛泽东将庐山将“神仙会”变成批斗会，在幕后指挥整肃彭德怀的毛泽东在整彭后宣布会议转为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再现。邓小平宣布退休元老恢复表决权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整肃胡耀邦的过程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操纵会议的作法，将大批不具资格的亲信扩大进会议。例如，他指定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的薄一波主持“生活会”，宣布不是政治局成员的顾问委员有表决权。对于元老们这另一次的党内政变安排，没有人提出质疑。这不光是因为军权在握的邓小平、王震多次声言必要时准备流血，让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还因为众高层对这种非程序的安排已经习以为常。毛泽东召集开会从来都是非程序的，从来没有召开过合乎党章规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总是随意塞入不具资格的亲信或剔除应当与会的成员。毛泽东甚至多次发动党内政变，干脆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推倒重来。众高层在毛泽东时代没有提出过异议，对邓小平的非程序作法也自然适应。

会上，陈云代表元老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胡耀邦工作没做好，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二十二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的主要问题，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选拔干部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等等，要求解除胡的总书记职。然后，全体与会者，包括已退出政治局的中顾委元老们，举手通过了元老们的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了3号文件，列举解除胡耀邦职务的理由为：（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文件强调元老将继续“垂帘听政”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提供指导。

政治局会后，中央电视台奉命向全国播发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公报》。紧接着，在美国的千名留学生和学者联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信》，指出：“胡耀邦为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开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宽松气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们认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我们强烈期望党和政府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民主法治，反对以言治罪。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我们认为不能不向中央和国务院表达我们的心声。”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4号文件），宣布将在党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宣布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将提倡自由、民主的方励之、和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副校长方励之撤职。同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向中共高层成员“打招呼会”说：“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13]

中共中央改革办公室智囊的吴稼祥记录当时代表性的时政议论写道：“胡耀邦下台后，出现了‘太子党的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薄一波、陈云立即打电话，要求给他们的子女、秘书和警卫分房子，提级升官，也许这种后果正是老人们要搞倒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之一，胡耀邦是太子党发迹的障碍；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让中顾委副主任做报告，他只是列席者，为什么让十七个顾委的老人参加，是不是顾委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了；有学生说，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什么？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公有制吗？可我们看到的是全民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苏联不如美国，大陆不如台湾，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党这三十多年干了些什么，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干部几乎无官不贪。”[15]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JOHN GARNAUT）写道：“中共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他的子女告诉我，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是他 1987 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16]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写道：“1986 年学潮的严重性被夸大。学潮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反映的是社会情绪，当权者只要表现出解决的意愿并着手解决，一般学潮就可以平息，但邓小平却看作是要造反”。

经历“生活会”批斗和罢免的打击，胡耀邦的健康在去职后迅速崩溃。他向来探望杨尚昆等人表示后悔对曾经帮助邓小平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14] 并向夫人交待死后不进八宝山，葬“共青城”，以此表示与中共高层决裂，但仍忠于共产党。他去世后，参与罢免他的众高层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披露那次“生活会”的真相。虽然其中不少人去了胡耀邦墓地致敬，但为维护党的形象、邓小平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众高层都避谈举手罢免胡耀邦的旧事。习仲勋为他没与党保持一致付出了代价，在“生活会”后被打入冷宫，据说搞到精神失常。

赵、邓分歧

根据邓小平关于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提议，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指示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收集政改意见。奉赵之命，政改办召集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请党政军、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省市各方面领导人与专家发表政改意见。座谈会的意见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后各界的政改意见大同小异。有少数人像 1957 年“大鸣大放”时一样，响应号召真提出中共权力过大，呼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有人提天赋人权，质疑共产党独裁，质疑中共的经费来源，提出中共的财政应与国家财政分开，裁撤军队中的政治部门和各级党委，有人提出改变“以党代政”的办法是中共受宪法、法律约束，打破权力垄断。多数人清楚，在“四项基本原则”之剑高悬之下，限制共产党权力之议随时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帽子，于是只提些牢骚意见，如“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要请示中央政治局”、“1957 年前中央部级以上官员有两成是非中共人士，现在全国只有 18 位非中共的副省市干部”等等。对于收集到的政改意见，赵紫阳指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他强调不能搞党办企业、公司。但是，他也不能就限制党权表态，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领导下，政改办屏蔽掉大部分触及党权的政改意见，拟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

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些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等。虽然政改办尽量在政改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玩平衡，只提出象征性的政改设，但元老对象征性的政改也不能容忍，指责改革是拿党来开刀。邓小平将赵叫到家中，申明“不可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不准搞西方式的民主”，“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这时，邓小平一手举“四项基本原则”之剑，一手举政治体制改革之旗。邓不叫停政改的原因是，赵紫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实施他几年来的号召，他不想自我否定。

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赵紫阳继续推动政改说：党政分开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这里，赵紫阳虽然讲得坚决，声言非搞不可，但他所言的已经不再是政改，而是在谈改变“党政不分”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样的提法邓小平能够接受。邓小平不容触动党权，但容许谈工作方法。如此，中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这里，“四项基本原则”与政改之间的根本冲突被暂时以“原则同意”的辞令隐藏起来。共产党人推动政改必然失败。社会各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有道理，但共产党人提政改就没有道理了。因为，共产党的宗旨，统治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一党专制的体制，不可能放弃暴力剥夺的信条，不可能接受对党权的限制。由于共产党的性质与体制改革格格不入，共产党所谓政改是只可说，不可作的事，一作立即违反基本原则。因此，胡耀邦、赵紫阳推动政改注定失败。

1987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在其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

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回应社会各界要求政改的强烈呼声，赵紫阳在报告重提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企图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下作些维护共产党政权的渐进改革，企图逐步向法治、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其中包括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以及逐步实行党的财政和国家财政分开。这时的赵紫阳与十二大时的胡耀邦一样，误以为邓小平真愿意实行治体制改革。其实，邓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等工作方法问题，而绝对不容触动“中共领导一切”的独裁局面。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号召与他当年的“大鸣大放”号召一样，带有放线钓鱼，引蛇出洞的意思。正如他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一样，可以说，但不可当真实行。胡耀邦真的要求他退休立即遭到罢免。邓小平同时举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两面旗帜，任何政改均难逃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罪名，让前台的总书记怎么做都错。赵紫阳推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中共十三大上获得“原则”通过后并不能实施，只能束之高阁。共产制度必须靠暴力维持，反对党和反对声音存在可能瓦解党的统治。邓小平非常清楚，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动摇共产制度的根基，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只能将党权垄断到底。

胡耀邦、赵紫阳希望通过限制滥用特权，平息民怨，以维护中共统治的安稳，而邓小平拒绝约束权力，致高层子女们利用特权掠夺国民财富愈演愈烈。1987 年 9 月，深圳特区率先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拍卖出第一块土地。由于存在土地使用权批地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巨大地价差，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最赚钱的倒卖对象，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万，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特权官商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物资价差，银行利差，汇率差，纷纷转向攫炒地，土地批文几乎全部落入了官商特权者之手。据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的胡和立计算，1987年，全国商品双轨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三项价差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价差约3600亿元。通过以权力谋取上述三价差，以及利用进口许可证、土地批文谋取价差，利用特权谋取免税、免地租等，特权阶层将万亿国民财富，近半的国民收入私有化。对于红色家族利用“双轨制”“先富起来”的事实，邓小平不愿承认。这从他对方励之的指控可以看出。方多年后回忆道：“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1988年8月我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我诽谤。”[17] 方励之所言的国外账户、存款是事实。众多高层子女在没有政治改革制约的特权经济改革中成亿万富豪，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家族成员。这些特权者存款往往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数额。

邓小平推动经济市场化，但又拒绝接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多党政治制约执政党，拒绝新闻自由监督腐败，拒绝司法独立遏制腐败，帮助红色家族子女利用特权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官倒们“先富起来”的同时，物价飞涨，财政收支严重恶化。1988年，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五间最著名官倒公司的特权经营内幕被曝光，引发了全国反官倒的声浪。赵紫阳不得不宣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以平息民怨。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批评中华文明缺陷的系列政论片《河殇》。该片的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它从反思中华传统文明，批判以“长城”、“龙”代表的“黄土文明”和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内河文明之专制、封闭、落后，赞颂西方的“蓝色海洋

文明”和民主制度，呼吁进行体制变改革。《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并非首创，基本是复述了百余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们“脱亚入欧”的思想。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受到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唤起了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引发了关于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的热烈讨论。青年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共政权违反宪法，扼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以言治罪的不满，呼吁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元老们对《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强烈不满，指示宣部驳回了电视台根据观众要求重播的申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肯定了《河殇》，支持上海等地方电视台冲破中宣部的禁令重播了该片，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王震等元老大骂赵紫阳，促邓小平“罢赵”。邓小平对赵紫阳推进改革忍无可忍，又开始与李先念等人密谋“罢赵”。[18]

随着不久后赵紫阳下台，中共将《河殇》批判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禁止传播。围绕这一电视片之争其实是顺应还是拒绝世界进步潮流之争。西方文明之进步和东方文明之专制、停滞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若无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的停滞完全可能再延续两千年，精英之士们仍可能集中精力于八股科举，中国仍可能停留在大刀长矛和油灯时代。日本人虚心地接受了伤自尊的“脱亚入欧”思想，选择走蓝色之路，迅速进步富强。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也选择了蓝色之路，但由于外强干预，中国走上了红色之路。二十一世纪，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另一系列政论片《大国崛起》。它与《河殇》一样，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进程的推崇，只是得出不同结论，不是追求自由民主，而是声称选择与本国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这种表述是当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实际都拒绝蓝色之路，坚持东方专制之路。所不同的是，张坚持儒家思想的“黄色”专制，而《大国崛起》坚持共产主义的红色专制。

“价格闯关”

建国以来，中共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通过“剪刀差”搜刮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进入 1980 年代，政府为应付“洋跃进”滥发货

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随着物价上涨，政府维持低物价的补贴负担日益沉重。中共高层对是否应当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分歧，以当年制定“统购统销”政策的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张继续以政府财政补贴维持农产品低价、低工资、高就业的计划经济体系，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政府将很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用于物价补贴既违反经济规律，也难以为继，应尽快取消物价补贴，同时以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进行价格、工资改革。

1988年初，赵紫阳决定尽快放开物价管制，指示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5月，声称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向外宾披露放开物价说：中国有条件冒全面改革物价工资的风险，已决定要“闯价格关”、争取三、五年内理顺价格。邓小平的“闯价格关”谈话经报刊报导，使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物价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涨幅接近20%。物价大幅度上涨带来了社会动荡和人民强烈不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的提前披露谈话搞得极为被动，不得不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闯关”，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决定放开对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消息传出，全国城市居民恐慌抢购商品，不管需求地抢购火柴、肥皂、毛巾、金饰、皮夹克、羊毛毯、电风扇、缝纫机、洗衣机、录音机、成捆卫生纸等任何商品，至不少商店商品被全部买光。不少人家抢购了多少年都消费不了的毛巾、洗衣皂，甚至上百斤的食盐。抢购物资之外，民众纷纷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应对失控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于9月放弃“价格闯关”，宣布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党内保守派趁机指责赵紫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将改革逆转，重返计划经济轨道。

民主运动

中共宣布放弃“价格闯关”没能立即结束恐慌和物价上涨。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猖獗的“官倒”使人民的不满爆发，民间要求惩治“官倒”，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89年1月，方励之、苏绍智、王若水、包

尊信等百余知名学者在北京发起了“新启蒙沙龙”，介绍东欧改革情况，呼吁政治体制改政。方励之致函邓小平，呼吁“值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北岛、吴祖光、冰心、胡绩伟等百余位北京各界知名人士分别致函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全国文化科教学术各界知识人士群起响应，以不同形式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呼吁制止腐败和“官倒”。

2月，方励之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在人权的标准上存在双重标准吗》一文，抨击中共对苏联和东欧的人权事件表示关注，而回避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他多年后解释说：我当时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四十周年。19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一宣言。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危险的。在1980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

4月15日，胡耀邦心肌梗塞逝世。消息传出，北京的大学生立即贴出了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要求体制改革的大字报，北京各高校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17日，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提出了公正评价胡耀邦，否定

“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运动中蒙冤者平反，公布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状况，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取消北京人大限制游行的法规，以及党政机关报报导此次悼念活动等项要求。紧接着，全国各地学生普遍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请愿诉求。4月19日，北大学生在三角地举行了“民主沙龙”会议，宣布废除官方任命成员的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公布了十一条基本纲领，提出了“释放魏京生”等项要求，散发了《告北京高校书》，倡议由各高校成立真正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出代表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4月20日，谢选骏、远志明等北京学者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声援学生运动，促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

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和杨尚昆关于学潮情况的汇报，指学生运动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声称运动背后有后台，声言制止学潮“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19] 次日，《人民日报》按照邓小平说法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四二六社论），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这篇社论与1987年1月6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一样，所传达都是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计划。邓所言的“快刀斩乱麻”不只是虚张声势，而真的开始了军队调动。[20]

广播、电视播出四二六社论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普遍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的武力镇压威胁，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惩办腐败和“官倒”。4月28日，北京高校学生成立了大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决定各高校不单独与政府对话，由“高自联”代表学生与政府对话，预定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再举行大规模示威，准备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一行

动。5月1日，“北京高自联”在北大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反腐败，惩处官倒，查处康华公司，解除报禁，要求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等项要求，并开始筹备全国高校总罢课。

在上海，最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举办了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并将座谈会内容整理成长篇报导发表。半官方的《世界经济导报》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宗旨，从最初的单纯报导世界经济，扩大为兼顾中国改革热点问题，大胆批评一党极权，坚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中共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学生请愿运动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取缔了上海知识界人士举行的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请愿行动。导报被取缔后，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成为各地请愿的一项重要诉求，其中北京的记者代表向全国记者协会递交了有千余名记者编辑签名的抗议《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的请愿书。

在全国学生游行请愿浪潮中，赵紫阳出访朝鲜归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反对强硬压制学生示威，批评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对学潮火上加油。他要求改变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尽可能回应学生的民主化要求，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出政治改革举措等应对举措。李鹏代表元老们的意见，反对赵的主张，认为学生示威运动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部分学生公开反对邓小平等领导人非法。会议形成了僵局。在上海受到邓小平等元老派支持的江泽民召开了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拒绝了赵紫阳的指示，继续整肃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江的强硬整肃之举赢得了元老们进一步的信任。

5月3日，赵紫阳在演讲中作出了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同的表态，肯定学生要求改革之举为爱国行动，表明推动改革的决心。赵的表态得到全国示威学生的拥护。5月4日，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演讲中指

出学生批评政府缺点并等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示相信示威不会成为动乱。同日，北京学生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随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响应北京大学生的号召，成立本省市的“高自联”，并开始罢课。

5月13日，北京学生“高自联”在各高校贴出了《绝食宣言》。其中说：学生绝食请愿目的是反对腐败，反对政府拖延和学生对话，要求政府为学生运动正名，要求与即将来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话。各高校参加绝食的学生队伍头扎白布条聚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请愿。政治学者严家其、苏绍智、包尊信等人在北大贴出了《我们不再沉默》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大游行声援绝食的学生。5月15日，绝食学生成立了由北大女生柴玲任总指挥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领导绝食请愿，三万多名首都知识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全国各个省会城市的高校学生开始绝食声援北京学生。5月16日，包遵信、季羨林、巴金、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千余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声言“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民主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呼吁“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在学生绝食运动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由于天安门广场被绝食学生占据，中共中央只得改在机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广播讲话说：“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会晤成功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对此，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爱国行动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个巧合，但我们欢迎他这个改革家。如果他上我们这里来，我们就要求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劝劝中国政府，不要让学生做出更大的牺牲”。

调兵与罢赵

中共元老们对赵紫阳上台以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河殤》播映，支持《世界经济导报》鼓吹政改等等决策策早已不满。赵紫阳发表讲话否定邓小平关于学运运动是反党动乱的定性后，邓小平、陈云、彭真、邓颖超等元老再度密谋罢免赵紫阳。邓小平重申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观点说：“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众元老表态拥护罢赵及调兵镇压后，邓小平发出中央军委主席调兵命令。他担心朱可夫帮助赫鲁晓夫反夺权的情况重演，担心政治局、中央全会和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局面失控，决定调二十万大军进京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使会议“开得更更有把握。”5月8日至12日，邓小平在武汉召见了各军区、集团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要求军队高级将就采取镇压行动表态。众军头表态效忠党。13日，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元老通报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时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5月15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锡联等四十多位元老或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向邓小平表态支持镇压行动。邓小平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获悉军队正在开赴北京，赵紫阳对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而对军队调动一无所知不满，对未经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军队调动更不同意。5月16日，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反对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提出因应绝食学生的要求，改变“动乱”的定性。李鹏等多数常委拥护元老意见，主导

会议否决了赵的提议，决定武力制止“动乱”。当晚，赵紫阳在特意要求电视直播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说：邓小平虽然已经退，但是根据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由他作决定。[21] 他通过电视告诉国人和全世界自己对处理危机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上。赵紫阳披露机密是出于无奈。因为，邓小平既要拥有最后决定权，又不想暴露这一安排，要求总书记赵紫阳承担拒绝与学生对话和调兵对付学生的责任。赵所披露中共高层机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人和世界都知道中共老人垂帘听政的架构，知道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只是名义领袖，军委主席都是才是中共的老大。5月17日，严家祺、包遵信等人发表《宣言》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的学生们打出了“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的横幅，北京各界百万人自发走上街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

当天，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中顾委“八老”（彭真、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一波、邓颖超）开会，认定学生示威为动乱，宣布决定调军队进京实施戒严。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赵紫阳于当晚按元老要求在中南海召开了有“八老”代表杨尚昆与薄一波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会上，赵紫阳表示情势没有严重到除戒严之外别无选择，指出戒严不利于解决问题，反会使问题恶化。李鹏、姚依林表示坚持支持邓小平已经作出的实施戒严决定，会议没有必要再讨论是否应该实施戒严，而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实施戒严。赵紫阳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申明大部份示威者都是爱国而且支持共产党。胡启立明确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乔石称对于实施戒严很难表达赞同或反对。常委中两人反对戒严，两人支持，一人不作表态，会议决定将表决结果报请邓小平定夺。不过乔石在多年后对“5·17 常委会投票”说法澄清说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常委会。调兵戒严的事是邓小平召集元老们在家里开会定下来后通知政治局常委们，常委们连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无形中已被

夺权。这时，摆在赵紫阳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元老们的决定；二是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分发表电视讲话，将与元老们的分歧公之于众，让国人和军队作出选择，争取改变历史的进程。他没有像当年赫鲁晓夫那样选择改变历史，而是选择了接受党的发落。常委结束时，他提出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当天结束，要求辞职。会后，他嘱秘书鲍彤拟了辞职信。

5月18日，元老们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杨尚昆传达了邓小平调军队镇压请愿的决定，赵紫阳表示对邓小平的决定难以理解，胡启立提议以政治局名义请邓小平到会作指示，暗示不赞同邓的决定，芮杏文、阎明复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其余与会者支持邓的决定。会议中，赵紫阳捎信给邓小平说：学生绝食的关键要求是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邓拒绝了赵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到会，在讲话中称学生请愿是“一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机会主义，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援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建议暂停赵的党职，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随后，赵紫阳步胡耀邦的后尘，自己提出了辞呈，接受元老们的罢免。当晚，在赵紫阳缺席情况下，四位政治局常委联同“八老”一起，作出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决议，邓小平下达中央军委主席令，调动野战军配合坦克实施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请愿运动。晚十时，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19日凌晨，赵紫阳不顾李鹏反对，率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以减少伤亡。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含泪说：“同学们，我们来迟了。你们还年轻，要好好地活着。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间接透露自己将下台。绝食学生们为他的讲话鼓掌，争相与他握手。接受赵紫阳的劝告，学生绝食指挥部于当晚决定停止绝食，开始说服学生们离场。当天，赵紫阳求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答复拒

绝会见，“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赵紫阳看望绝食学生的那一晚成为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此后，他在软禁中渡过了余生。

关于邓小平罢免赵紫阳，二十多年后出版的《李鹏日记》披露，元老们以江代赵的密谋不是始于 1989 年，而是始于赵 1987 年上台后不久。由于赵上台后步胡耀邦后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怒元老，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元老连续几年在上海过年，讨论接替赵紫阳的人选问题，陈、李多次向邓小平推荐江泽民。邓小平决定罢赵，但对接替人选没有下“最后决心”。在江泽民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后，邓小平作出了以江代赵的决定。关于对赵紫阳的处置，《李鹏日记》披露：“5 月 31 日，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一致同意，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6 月 18 日，李先念和薄一波提出对赵要一抹到底。”

戒严与镇压

5 月 19 日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北京地区从 5 月 20 日零时起实施戒严（戒严至 1990 年 1 月 10 日才解除）。其实，邓小平在戒严令前早已调北京军区的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军、四十军，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六十七军等数十万大军开来北京地区。戒严命令发布后，张爱萍等八位上将联名向《人民日报》送交了反对戒严的声明，其中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实施镇压、不能对人民开炮引起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军队绝不可进军北京”。邓小平命令《人民日报》“绝对不准发表”八上将声明。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进京戒严的军令，被立即免职交军事法庭论处，后被关进了监狱。

5月20日，北京军区第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先遣部队装甲车开进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绝食团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如果军队进城，我们首都工人将同全市人民一道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绝食八天的几千名学生。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墙”。支持绝食学生的数十万北京市民在通往城区的路口上设置路障，拦截军车进城，使军队进城受阻。这期间，有军车被烧毁，军人被打死，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出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还我紫阳！”的标语。奉命进城的军队中有百余名将校反对戒严，1400余士兵弃械逃亡（这千余官兵在事件后被军法严处）。[22]

同日，邓小平家中再召集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密谋。会上，王震大骂赵紫阳为反革命，李先念称赵是第二个司令部，邓小平拍板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称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这一决定。元老们讨论了出访加拿大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两天前发表的同情学生的谈话。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元老们感到，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不受控制，于是决定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职，但在接任前须用行动再作一次表态。商讨后，邓小平电令万里紧急中断访问，飞返上海听候处理，召江泽民到京布置任务。5月21日，陈云主持了“八老”参加的中顾委常委会议，宣布撤消赵紫阳总书记职务，责承江泽民采取措施务使归来的万里表态支持中央的戒严和罢赵决定，暗示万不表态服从则软禁上海。这时，请愿者们都期望万里回国能改变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强硬立场，希望人大常委会能讨论和重新审定国务院决定首都部份地区戒严令。北京的学生还准备于万里返国时举行欢迎活动。5月23日，数十万北京市民、学生举行了戒严令后最大规模示威游行，三名湖南青年（浏阳教师余志坚，编辑喻东岳和司机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可

以休矣”的大标语，然后用颜料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三青年后被逮捕判了重刑）。

5月25日，万里抵达上海，江泽民到机场迎接，向万宣读了邓的指令（一说向万递交了邓的亲笔信），要求万对元老们的决定表态，随后将万里软禁在上海。与赵紫阳一样，万里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作“动乱”定性，不同意派军队镇压请愿，但没有选择改变历史，考虑一番后表态服从党的决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三位党国名义最高领袖在重大关头不约而同地选择服从党，显示党性对革命党人的巨大魔力。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设法让人民和军队作出选择，其原因一是由于元老手中军权的震慑；二是他们不能不替自己的儿女们着想；三是作为党的人，党性已经根深蒂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有可能对朝廷说不，改变历史，但儒家教育让他万难承受叛臣之名。同样，胡、赵、万有可能对垂帘听政的老人说不，改变历史，但党性教育让他们万难承受反党、叛党之名。

元老们对万里的表态和江泽民执行重要任务的表现感到满意。5月26日，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顾委联合会议，宣布了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决定。5月27日，杨尚昆向政治局传达了元老们罢免赵紫阳、胡启立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日，万里支持戒严和罢免赵紫阳的声明见报。声明让学生们明白了抗争的失败。学生领袖继续说服学生撤出广场，部分学生反对妥协，坚持在天安门广场抗争。5月28日，中纪委通知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党开除一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将他押送到秦城监狱关押。逮捕鲍是邓小平的决定。多年后发表的李鹏日记披露：“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人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

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5月30日，示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并发表了《民主女神宣言》，其中说“民主女神，一切专制压迫下的渴望。民主女神，已是广场大学生和亿万人民民主的象征。”从5月19至6月3日，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遍地帐篷的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戒严部队受阻于北京百万民众的拦截，难于进城实施戒严。为镇压学生运动，中共调兵规模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调动了七大军区的十几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军，炮兵师，坦克师，解放军的三大总部一齐参与，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处于待命状态。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军委委员刘华清任总指挥，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的戒严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路大军。为了加强保密，参加戒严部队一律用临时代号（这导致许多官兵在途中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戒严指挥部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成立设立了前进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设立了清场指挥部。

6月3日晚，邓小平向戒严军队下达了武力攻入市中心，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4日凌晨，在当局警告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离开后，军队以坦克开路强行入城，沿途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扫射，造成平民、学生的重大死伤。请愿学生、民众在军队开枪镇压之下屈服四散，为时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在军队武力镇压之下夭折。6月4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6月5日，在解放军坦克列队入城途中，示威者王维林只身阻挡行进中的坦克，不屈不挠。这一段电视转播震撼了全世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影像之一。

为时两天的军队镇压过后，北京医院里到处是市民和学生的尸体。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的蒋永彦医生后来披露，他诊治的一名男子枪眼

很小，却打碎了心脏，中弹者中有的肝脏被打碎，有肠道内留有碎弹片，证明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的开花弹。[23] 关于镇压造成死伤，中国官方说数百，学生绝食指挥部负责人柴玲在后来的英文声明中披露大约 3000，香港《壹周刊》报导估计 40,000 人，其中 10,454 人死难。

开枪镇压过程中，部分将士抗命，拒绝镇压民众。6月4日，第二十八军戒严指挥部命令开进北京。官兵们被开枪镇压后西长安街上的血腥场景震惊。老百姓将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要求军队保护人民。许多士兵气愤扯下领章、帽徽，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听任民众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不予制止，致上百军车、装甲车和通讯电台车被烧毁。戒严部队指挥部派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军喊话，谓“军委首长有令，受阻坚决反击”。第二十八军没有执行实际的开枪命令，成为唯一建制没有抵达军委指定位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该军受到大规模的整肃。由于何燕然等集团军领导层集体承担责任，无人推卸，中央军委决定低调整肃。不想背镇压人民恶名的不仅是二十八军。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者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二十七军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人民，二十七军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民众开一枪。二十七军此举将了同省的三十八军一军。三十八军向中央军委投诉二十七军的作法。没想到，中央军委并不包揽责任，回复说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那些在进京时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风光一时，很快“平暴”事迹变成了精神负担。许多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事迹”，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亚佐夫元帅授勋，表彰他在1991年“八一九”政变中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相信何燕然等人也会在将来获得表彰。

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在讲话中称：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的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6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举手通过中顾委元老们的几项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对赵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撤销胡启立、閻明复、芮杏文等几位高层的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据说，江泽民没有在陈云主持的中顾委常委会宣布任命后就职。他以胡耀邦、赵紫阳上台不久即被罢免为前车之鉴，坚持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选举后才就职。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看望绝食学生的温家宝因向元老们递交了长篇揭发赵紫阳的材料而获留用。

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公报重申邓小平的意见说：“两个月来的学潮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四”开枪镇压后，中共在全国展开了抓捕和清洗，学生、工人、知识分子请愿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抓捕、判刑或通缉，中共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解散，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刊。至此，邓小平首倡，胡耀邦、赵紫阳推动，国人追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血腥镇压和大搜捕中划上了句号。有人评论“六四”镇压说：“枪声一响，变偷为抢，天安门的坦克为贪腐开了路，权贵掠夺国民财富再无制约。”三十多年

前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部署“引蛇出洞”计划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在《走向反面》一文中提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邓小平在《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中要求在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三十年后，邓小平倡议体制改革于前，下令武力镇压于后，实施了另一次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从清末到民国，没有一位统治者想过以武力镇压学生请愿，更没有一位统治者调军队镇压学生请愿。清末是空前绝后的宽松自由时期。绅商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组织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不仅上京到中央各部门递交请愿书，更直往摄政王府请愿，不理睬王府警卫劝归，日夜守候，非要向摄政王当面递交请愿书。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后，清廷不杀，不刑，派亲王到狱中探视，好言相劝放弃革命与恐怖，为国家效力。袁世凯为首的历届北洋政府均视学生请愿，报纸抨击为平常之事。袁世凯爱国爱民，积极推动立宪共和，治下除爱国运动请愿外没有出现过对暴政的请愿。段祺瑞政府卫兵遇袭后与暴徒枪战造成学生死伤，段闻讯赶到现场，长跪谢罪，发誓从此食素，并信守了誓言。翻开清末、民国以来的报纸，其中骂朝廷，骂皇帝，骂政府，骂袁世凯、骂蒋介石的文字俯拾皆是，没有哪一位统治者动不动就扬言要让学生流血。1945年，中共发动“第二条战线作战”，在昆明组织学生请愿，刻意挑战政府管治底线，制造了炸死学生事件，国民政府将云南军政大员撤职回复学生请愿。在大陆学生民主运动之前，台湾的反对派策划了“美丽岛事件”，以暴力挑战国民党政府的管治，蒋经国下令克制，拒绝以暴易暴，决心走向民主。然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邓小平杀气腾腾，完全拒绝与请愿者对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声言要用专政手段，要不怕流血（后来，中共出版《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原中办文件中“不怕流血”之句），调动几十万大军镇压请愿学生，邓所言的流血无非是要让学生流血。如此对待学生的统治者，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六四运动中，美国方面对中国当局暗中支持。“西方世界要求联合制裁中国时，美国总统布什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致密函给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同意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总统接到回信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有了布什总统的支持暗示，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对陪同的总理李鹏和外长钱其琛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七国制裁我们，七十国也没有用。”[24]

当时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称，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影响力的方励之教授被指为六四运动的后台面临被捕。他没有选择在国内抗争，而是走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当年11月，基辛格访华时与邓小平谈交换条件，中方提出了停止对华经济制裁和美国邀请江泽民访美两要求。对第一个条件，美方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由日本出面提出恢复对华贷款。中美达成了妥协后，北京宣布驱逐方励之，华盛顿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在方励之夫妇离开北京后，七大工业国在日本召开会议，决议恢复对中国的贷款。[25]

港人拒绝专制

中共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香港民主派领袖司徒华、李柱铭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司徒华同时宣布组建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港支联）。从此，司、李等香港民主派人士被中共当局拒发“回乡证”，长期禁入大陆。港支联以筹得的巨款展开了营救被全国通缉的学生民主运动领袖和民主人士的“黄雀行动”，在各界（包括黑社会）的帮助下成功营救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李录，民运领袖陈一咨等等七、八百位民运人士经香港送去了西方国家。司徒华在

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披露说：黄雀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内地和香港人都对民运同情和支持，另外对内地的贪官则有钱能使鬼推磨，例如支联会为救吾尔开希花费六十万现金。

令国人没有想到的是，香港人“平反六四”运动持续二十多年。司徒华坚持每年 6 月 4 日在维多利亚广场率港人燃烛呼吁“平反六四”，直到 2011 年逝世。他没能看到“平反六四”，但港人没有放弃诉求，依然坚持每年 6 月 4 日在维园举行要求平反六四的烛光晚会。

第 60 章 相反的选择

台湾民主化

土地改革完成后，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进入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65 年，台湾设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区，贸易首次出超，经济增长率高达 9%。从这一年开始，美国停止了对台经济援助。“尽管 1965 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微不足道。”[1]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经济发展是因为有美国援助和国民党运到台湾大量黄金。其实，美国援助与运台黄金对台湾经济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保护私有产权和私营经济，使经济内在的活力得以发挥而已。蒋介石无悬念地当选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有国民党独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领导台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年年大幅增加，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1972 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开启了“经国之治”时代。他在第一次施政报告中指出：“国家建设是永无止境的奋斗历程，在往上看、向前走，以求获得更大发展的同时，又需扎得深、站得稳，才能无畏任何冲突与考验”，“把国家建设的基础奠立在磐石之上，使这基础更为稳固，各级行政首长今后不要多在电视上报纸上出现，而要深入民间，深入问题，在问题上求得彻底的个别的解决”。[2] 沿续赣南时廉政作风，他主持修订了“贪污治罪条例”，要求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的兼职，专心政务，以身作则杜绝贪污受贿。他改变蒋介石的反攻复国方针，减少军费开支，转以发展台湾经济建设为基本政策，主持制定了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桃园国际机场）、高雄造船厂（中国造船

公司）、高雄钢铁厂（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厂、金山核能发电厂等“十大建设计划”。务实的蒋经国特意将“十大建设计划”改称“十项建设计划”。这一字的改动与毛泽东、邓小平好大喜功，推动吹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1977 年，政府再推出总投资近 3000 亿台币的“十二项建设计划”，其中包括：环岛铁路网、3 条东西横贯公路、延长高速公路至屏东、中钢二期工程、核电两厂、国民住宅长期计划（平均每年 2.5 万户）、改善农田排水系统、西岸海堤工程、每县市的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1970 年代末，十项基础建设项目相继完成，其中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南北运输从八小时减为四小时；西部铁路电气化改造后使台北至高雄的行车时间减半，线路容量增加三成，运输能力倍增。台湾舆论普遍认为，如此庞大的投资项目和众多的工程发包中没有出现重大的贪污舞弊，蒋经国的廉政奏效。十项建设和十二项建设对降低失业率，带动经济发展和周边工业明显。其中效果最好的是石化工业，带动了轻油裂解厂、化学纤维业、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但两个港口没有达到经济效益目标，连年亏损。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台湾民众的民主诉求日益高涨。1977 年底，在台湾地方选举中，桃园县中坜镇独立候选人许信良向一党独裁发起了挑战。他曾在 1972 年获得国民党竞选省议员提名，后因反对国民党的政策，点名批评议员而被国民党省党部给予党纪处分及取消议员提名。许反对国民党操纵选举，宣布以无党籍身份竞选议员，以公开抨击国民党造势，赢得了青年选民的支持。国民党当局发动各级选举机关压制许信良，非国民党人士则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许的支持者抗议国民党籍监选主任舞弊，与国民党的竞选队伍发生冲突，在投票日放火焚烧了中坜镇警察局，酿成了中坜事件。随后地方选举的结果为，国民党外人士在 24 个县市长中占了 4 个，77 席省议员中占了 21 席。独立竞选人许信良以 77 万最高票当选省议员，随后宣布退出国民党，成功挑战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作家江南评论说：“中

坊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在许信良挑战独裁之时，蒋经国放弃蒋介石将反对派人士投入监狱或放逐岛外的作法，鼓励青年人问政议政，推动召开国是座谈会，让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准备结束独裁。

1979年，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解除杂志登记禁令。与大陆民主墙运动同时，台湾国民党外的精英人士以发行《美丽岛》杂志为掩护开始组党。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两万人集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组织民众冲击军警管制线，造成近200人受伤的流血冲突，是为“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冲突中，政府方面受伤183人，其中重伤47人，示威者方面受伤40余人，显示示威组织者有意暴力挑战当局党禁。事件中，蒋经国命令警察保持克制，在冲突后的对峙中再命令军警主动撤退，指示“依法办事，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开放对审判采访，给予被告充分的答辩时间。公开大审中，党外人士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律师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陈文茜（律师团助理）通过为《美丽岛》辩护走上了政治舞台。蒋经国指示按“法律事件”处理，缩小制裁范围的政策，不将审判引向戡乱和颠覆罪名。经过审判，军事法庭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数十组织暴力袭击的骨干判刑（几年后，蒋经国批准将他们特赦）将《美丽岛》杂志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查封。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向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挑战。反对派的挑战行动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通过在日本创办“独立台湾会”的史明资助了反对派，通过《美丽岛》社长许信良在美国洛杉矶办事处资助了美丽岛周刊25万美元。[3] 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的同时，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拒绝国民党内强硬派以暴制暴的建议。他说，“权柄，很

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他不仅要防止流血事件升级和恐怖主义抬头，更决心放弃一党独裁。因为，他在苏联了解斯大林时代的极权、残酷与血腥，深知独裁体制必将被人民抛弃。他对秘书马英九说：“解禁应该越来越宽，不能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在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中共在谋求两岸统一。中共在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抛弃了“解放台湾”口号，在 1979 年元旦结束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对大、小金门的炮击，同时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实现“三通”，开放探亲旅游，实现台湾回归。国民党方面通过行政院长孙运璿发表声明回应中共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台湾回归祖国须在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之时。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1979 年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对中共“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他指出：“共产主义已彻底失败”，“四个现代化是中共的谎言与妄想，中共的和谈是统战阴谋，我们绝不与共党谈判，绝不与共党妥协，任何情况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4]

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叶九条），内容要点为：“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与各界代表人士可“参与国家管理”；两岸“互通讯、亲人团聚，增进了解”；欢迎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5]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向

国民党喊话说：“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璿先生、蒋彥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中共向蒋经国声称，不仅一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将奉化莹墓修复一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同时隐瞒了发动文革破坏、焚烧了蒋母之墓，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墓及墓庐——慈庵、蒋父及蒋弟之墓，屠杀了迫害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人员及家属的罪恶。1982年1月，邓小平把中共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其要点为：一个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两制并存；台湾高度自治；统一后为特别行政区，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有一定的外事权；有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和平谈判：以和平谈判方式实现国家统一。7月，中共发表了以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廖承志名义致蒋经国的信，引用以当年张治中致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之句和鲁迅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要求“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6] 8月，宋美龄代表国民党以复信廖承志回复中共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二十九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十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殃及6亿人。……《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

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由于宋美龄的信中谴责了暴政，中共将这封公开复信向国人隐瞒。

1984年，俞国华就任行政院长，提出了顺应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国际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的“经济革新”“三化方针”。在大陆经济改革之时，台湾经济改革的步伐更大。“三化方针”的主旨是解除管制，推动经济全面自由化。其中“国际化”要求将台湾经济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放宽外国公司在台投资限制，解除进口管制，大幅降低关税、允许设立境外金融中心，推动新台币国际化，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运输、金融、信息的中心；“自由化”要求尊重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使市场调节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取消银行利率的管制、大幅放宽外汇管制、开放民间设立银行，以及推动公益事业民营化，推动对外贸易、金融、产业经营更加自由；“制度化”要求完善法律和规章，以保障经济的开放、自由和有序运行。

在国民党实行放松对经济管制的“经济革新”过程中，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暴露出政治体制问题。江南（刘宜良）是蒋经国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多次采访蒋经国的政敌吴国桢，搜集大量资料，写出了题为《蒋经国》的博士论文，后来再改写成《蒋经国传》。由于该书揭露了一些蒋氏父子的劣迹，国民党政府要求江南改稿。江南拒绝改稿，打算出版《吴国桢传》和《龙云传》，并与中共关系密切，经常出入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接受了中共对《蒋经国传》一书预订五万本的资助。台湾情报特工部门不能容忍，通过“竹联邦”派出杀手，在旧金山将江南暗杀。“江南命案”震动了海内外，岛内各界强烈要求查明真相，美国政界与媒体对台湾特务与黑道联手在美行刺表示愤怒。虽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承认自己策划了刺案，与蒋经国、蒋孝武无关，但很多人相信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与这桩命案有牵连。在海内外的压力下，蒋经国下令法办汪希苓，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实际放弃了传子计划。江南事件之后，台湾又发生了“十信事

件”。“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是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拥有十信的蔡氏家族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聘请退休军警政界高官进入家族企业任职，依靠政商关系发展家族企业。“十信”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当选立法委员后控制了“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以 20% 的高利率从民间大量吸收资金，利用资金大举收购兼并亏损企业，高利贷越滚越大，终于无力支付高息，只好利用职权挪用“十信”的资金，导致“十信”周转不灵。1984 年底，“十信”舞弊消息传出，存户挤提请愿，蔡氏家族的国泰塑胶集团瓦解，留下 150 亿的巨额债务，事件引发工厂企业的倒闭潮，导致全岛经济萧条。

“江南命案”与“十信弊案”两事件使岛内外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岛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升级。舆论指出，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和黑幕与制度有关，要解决腐败与黑幕问题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后推出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采取“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使台湾走出“白色恐怖”时代。“十信案件”暴露了台湾官、商勾结的黑幕，使蒋经国痛感反腐失败。对于岛内外的民主诉求和舆论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他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7] 改革政治体制必然触动国民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引起保守派的反对。蒋经国警告党内保守派说，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党员都会流失，人民会抛弃党”。他以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的方式表达了主动结束蒋家王朝，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决心。1986 年 2 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极受震撼。身体日见衰弱的蒋经国决定，加速推行政治革新，在有生之年亲手结束专制制度。3 月底，他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提出“向历史交代”口号，提出“本土化”政策以打破大陆籍人士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推动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开放大陆探亲等一系列实现民主宪政的长期目标。会后，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人组成

“革新小组”，部署实施上述革新政策。蒋经国革新运动在国民党内遇到强大阻力。不少国民党大老反对放弃独裁，以集体跑到慈湖哭老蒋的方式反对革新。

在国民党外，本土精英则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独裁，开放党禁。5月19日，台籍精英为首的党外势力组织了大规模“反戒严，争人权”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立实行民主宪政。不过，党外势力也在顺应进步潮流，放弃“高雄事件”中那样的暴力行动，将示威命名为“绿色行动”，将游行称为“自由散步”，组织示威者戴白口罩以示“骂不还口”。蒋经国命令警方对示威保持克制。由于朝野双方理智妥协，示威和平进行，未引发冲突。9月28日，国民党外的精英们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决定，不再坐等国民党允许，立即成立民主进步党。对于民进党的“抢滩”成立，国民党内的强硬派拟出名单，要求蒋经国批准逮捕反对派领袖。蒋经国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决断：顺应潮流，立即开放党禁，接受反对党的诞生，加速制定解除戒严法。“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0月15日，国民党宣布废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代之以国家安全法。新安全法允许拥有党章和党纲、支持宪法和国家统一的新政党登记注册，承认新党通过选举合法竞争政治权力。“解严”标志台湾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进入了政治多元的时代。民主化闸门打开后，台湾立即出现了办报和成立政党的热潮，涌现出数十政党和数百刊物。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长期积怨，新党纷纷将抨击矛头指向国民党，令长期习惯于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官员们愤怒与恐慌。蒋经国微笑面对街头示威民众当面打出的“老贼下台”标语，告诫国民党人说，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合民意，就需要“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在结束一党独裁的同时，蒋经国大力推动结束大陆籍官员垄断台湾

政治权力的局面，加速推行官员本土化政策。1987年，台籍人士出任了五院中两院的院长，行政院八部中五部的部长；新《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正式解除，居民赴大陆探亲开放；民进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党章党纲草案，在12月的国大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票、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22%的选票。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蒋经国超越个人、家族和一党的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民主化，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真正的革命，实践了“向历史交代”的承诺，同时也赢得了反对党的尊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台湾鲜花销售一空，民众自发街头列队致哀。在蒋经国致丧期间，民进党停止一切抗议活动以向这位结束一党独裁的伟大政治家致敬。中外舆论一致赞誉蒋经国领导台湾由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使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是亚洲自由国家的杰出领袖，台湾舆论盛赞其两大政绩为：恢弘民主宪政和创造经济奇迹。出任行政院长后，蒋经国推行减免田赋、保障收作价格等等措施，因此受到台湾农民的爱戴。由于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托派教育，他的施政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主持建立了台湾的医院、养老院、就业辅导、就学优惠等社会福利系统，其中，照顾退役的老兵的“荣民”体系成为日后广受赞扬的台湾全民健保系统的雏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陷入停滞膨胀之际，他宣布了“十大建设”计划，领导台湾领先全球经济复苏。在蒋介石主政时代，台湾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136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364美元。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领导台湾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变：先是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向重化工业为主，后是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产业发展。在他主政的十六年间，台湾经济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三倍于为同期工业国家年均增长率，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均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人均收从364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7518美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失业率控制在2%左右的低水平，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

蒋经国关注民生，致力改善民生不遗余力。蒋经国每天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知道他从 1950 年代初带领退伍士兵筑路起，足迹踏遍全台湾 320 个乡镇。他走访民间之前他的司机和随从都不知道他打算去哪里视察，自然也就无从事先通报基层准备。走访中，他与民众合影，到当地的普通小馆吃午饭或买盒饭吃，他因此在民间交了不少朋友。有时他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和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他对吃喝穿住不讲究，永远愿意与民众握手，与民同乐，低调、朴素。1980 年永安矿难时，他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蒋经国清廉与忘我。他离任赣县县长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他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这在当时的官场被抨击为不近人情。他改变了用人唯亲的传统，也改变了蒋介石时代以党领政的作法，大力任用专业官僚掌管财政，主管工程，任用台湾本省籍精英，为日后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就任总统后，他禁止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树碑建像。由于蒋经国的清廉无私，他主政时的台湾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这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蒋经国宽容。在 1970 年访美期间，他要求与刺杀未遂的刺客见面，建议美国释放刺客。1986 年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抓人名单，蒋经国否决了抓捕计划，并告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民主要求妥协与宽容。蒋经国是中国政治家中最能容忍异见者之一。因此，他能领导台湾结束专制制度，和平、理性地过渡到民主制度。作家江南曾评论说：“经国掌舵，经济上可打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其他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然而，江南没能看到，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历史交待”，实施了政治革新，主动结束国民党独裁。他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也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在他看来，当官为民，民众自然会拥护。不得民众拥护，下台理所当然，并不需要痛心疾

首。他廉洁，不怕下台后被人民清算，他领导国民党主动向多党政治过渡，不介意作在野党，因而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华盛顿邮报评论蒋经国领导实施的政治革新说：中华民国“过去一年政治改革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四十年的成就。”《蒋经国传》作者漆高儒评价蒋经国说：“他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逝世后，国民党继续推动民主化，于 1988 年抛弃以一党垄断政治权力为主旨的“国父思想”和“五权体制”，推出了《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辞职条例》，终结了大多数资深代表卧病的“万年国代”；于 1991 年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 1992 年湾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于 1994 年举行了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于 1996 年举行了总统直选；于 1997 年修宪终止实行了几十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于 1998 年公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成立了《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白色恐怖”中死难者、交付感化（训）教育者和财产被没收者家属发放了补偿金。至此，台湾完成了从一党独裁向多党民主制度的转型，蒋经国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国民党通过真诚平反行动实现了社会和解，台湾完成了舆论称赞的“宁静革命”。

蒋经国逝世后的二十多年间，台湾每年有百万民众前往大溪凭吊，表达对这位政治家的怀念。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显示，蒋经国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马英九写道：“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

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8]”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9] 国民党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无疑是重要原因。在二十一世纪蒋经国成为海峡两岸为民众公认的历史伟人，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共产各国改弦易辙

1989年，几个重要事件对共产体制下的东欧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一，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不再武力干涉东欧人民的选择；其二，波兰的团结工会顶住了苏共的压力，在政治舞台上走向胜利；其三，中国的民主运动。东欧各国原本有自由民主传统，共产主义制度是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谋划分欧洲的结果，是斯大林武力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以武力建立的统治必须靠武力维持，戈尔巴乔夫不再出兵干预东欧的承诺使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支撑，三大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东欧各国人民恢复自由民主制度的勇气。在波兰，天主教徒和反共人士组成团结工会非暴力反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持续多年，并在人民的支持下走向胜利，迫使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在共产阵营中率先宣布结束一党专制。1989年春，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教会、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团结工会在华沙举行政治协商的圆桌会议，决定建立三权分立的两院议会民主制，宣布“波兰独立团结工会”合法化。6月4日，波兰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会民主选举。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赢得了胜利，在参议院100个自由选举席位中赢得92个，而执政的波共在参议院连一席也未赢得。选举后，波兰抛弃共产制度，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年，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在匈牙利，以卡达尔为首的共党改革派顺应人民变革的要求，率先东欧

各国的共产党开始了政治革新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1989年，匈共为1956年人民起义领袖纳吉平反，为纳吉等人举行了数十万民众参加的隆重重新安葬仪式，为苏军在镇压中杀害的民众建立了纪念碑，与反对党开始和平协商，共同举行了政治妥协的“三方圆桌会议”，讨论应付经济与社会危机，起草了民主制的新宪法，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允许人民投奔西方国家。随后，匈共更名为社会党，与人民一起抛弃了共产主义。11月26日，匈牙利全民公决投票决定，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改行总统制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新政府宣布，将共产党组织清除出政府机构，清查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解散匈共的“工人卫队”，宣布从此禁止政府机构中存在任何政党组织。1990年春，经过两轮国会民主选举，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近半国会席位并组阁，匈牙利和平地告别了独裁体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也于1989年9月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11月，十几万民众在首都布拉格持续举行了非暴力游行请愿，要求结束共产制度。捷共顺应民意，与各党派举行了民主选举。“公民论坛”赢得了选举胜利，领导七七宪章运动公民论坛领袖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总统，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专制时代结束。国际社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体制变革称为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东德，各大城市民众在1989年10月同时举行了要求民主化的教堂和平守夜活动。守夜活动迅速发展成示威浪潮。担任德共领袖近二十年的昂纳克在全国各地的请愿浪潮中宣布辞职，克伦茨接任德共领袖。11月9日，德共效仿匈共、捷共，宣布取消进入西柏林的边界管制。被围墙隔绝了几十年的东德民众捣毁柏林墙，登上勃兰登堡大门，潮水般地涌入了西柏林。柏林墙的轰然倒塌标志四十多年铁幕和欧洲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随后，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宣布集体辞职，西德总理科尔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提出了两德统一“十点计划”。12月，东德国人民议院修改了宪法，十六个党派的圆桌会议决定举行大选。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院民主选举，主张德国统一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了

压倒性的胜利，标志东德人民抛弃共产主义制度。8月，东西德签署了统一协定，10月，德国重新统一。在保加利亚，保共在人民请愿和东欧其它国家巨变的压力下于1989年11月宣布放弃一党专制、大赦政治犯、实行自由选举，掌握最高权力四十多年的保共领袖日夫科夫宣布辞职，保共与反对党举行了圆桌会议。1990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全国大选，终结了共产党独裁的时代。在南斯拉夫，各民族趁东欧剧变谋求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各共和国走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导致了随后的巴尔干地区的流血、骚乱、内战和种族灭绝。

在罗马尼亚，1965年以来一直垄断最高权力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坚持独裁，强硬镇压民主运动。在中共军队镇压六四运动时，齐奥塞斯库发表了中共极为需要的支持声明，让中共元老们感到了共产主义阵营撑下去的希望。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欧洲民主化浪潮中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共相濡以沫，派政治局常委乔石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声言坚持共产党独裁，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乔石，收到了乔转达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李先念的问候及“祝愿罗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并取得更大成就”的口信。大会闭幕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致电齐奥塞斯库，“热烈祝贺他再次当选罗共总书记。”几天后，罗共仿效中共，下令开枪镇压蒂米什瓦拉市的抗议民众，激起了罗全国的示威请愿浪潮。这时，中共一面在国内控制传媒，封锁东欧共产国家巨变和罗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联大对罗马尼亚当局镇压示威的谴责议案。面对罗共抗拒变革，拒绝对话，坚持武力镇压政策，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西方国家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几乎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声明支持和西方国家物资援助下，于推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圣诞夜，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救国阵线迅速组成的军事法庭以“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处决并没收全部财产。齐氏夫妇被执行枪决的镜头，以及其生前的豪华宫殿和财富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中共众高层一同收

看了处决纪录片，大家一片沉寂。有人说：“不镇压反动分子，我们就会落得这个下场。”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改革，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下场也会这样的。”[10] 罗马尼亚临时政府成立后，西方国家和巨变中的东欧各国迅速承认了罗马尼亚临时政府，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声明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就连被中共称为“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迅速承认了新政府，表示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意愿。中共控制传媒继续封锁东欧和罗马尼亚巨变的消息，《人民日报》成为世界上最迟报导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消息的报纸。1991年12月，罗马尼亚举行全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罗马尼亚转型为民主制度。

在共产革命发源地苏联，深刻的社会变革早已开始。进入1980年代，垂死的苏共最高领袖接二连三死在任上，苏共内外一致感到了变革的迫切。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制度危机中接任苏共总书记。他在儿时就领教了共产政权的残暴，父辈在1933年大饥荒中饿死，祖父在“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外祖父被判长期监禁。他清楚共产政权带来的专制暴力、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新闻宣传谎话连篇。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次”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针，要求在思想上多元化，在政治上放弃专制，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承认私有制，要求军队非党化、国家化。根据“公开化”方针，苏共废除了长达七十年的媒体审查制度。舆论自由化后，一大批揭露斯大林罪恶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解禁，众多苏共长期隐瞒的历史事实被披露。例如，苏共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中国人、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屠杀和迁移，摧残其它民族语言文化；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的“大清洗”屠杀；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策划瓜分波兰，共同挑起了二战、在二战期间制造了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

分比协定；苏联长期采取军国主义政策，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官方宣称的 16%，而高达是 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 6%，而是 20%。250 亿科研经费中有近 200 亿用于了军事研制等等。[11] 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可比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在推动“法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政治犯，为百万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其中包括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对派领袖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批准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公开发表，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恢复国籍，解除了对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流放。在推动“民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要求遵循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主原则。

1988 年底，苏共宣布于次年春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以往，人民代表的选举全由苏共事先决定候选人。在开始推行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提拔人才，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一书记叶利钦提拔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上任烧了“三把火”，一是主张取消苏共的特权；二是揭露官场腐败；三是冲击官僚体制，大批撤换老干部。叶氏这三把火轰动了全国，让民众拍手称快，官员胆战心惊，为自己树立起了改革斗士形象。1987 年 10 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抨击戈尔巴乔夫须对改革滞后负责。他的发言不仅挑战了党领袖的权威，也挑战了党的规则，引来中央委员的围攻。在主张被拒后，叶利钦提出辞去党职。他挑战苏共操控选举的规则，宣布以个人名义竞选人民代表。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部长没有权利当选人民代表。叶利钦毅然辞去部长职专注竞选，与选民见面，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出席电视辩论会，抨击苏共制度，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展示自己廉洁为民的一面。1989 年春，苏联电视和无线电直播了首次举行的部分人民代表差额直选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众多非共产党人士当选人民代表，而苏共一些领导人落选。叶利钦击败苏共内定的候选人，以 90% 的高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宣布，苏联将实行多党制。1990年1月，叶利钦推动形成了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从而废除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原本试图通过体制改革挽救苏共的统治。但是，随着公开化和军队非党化政策推进，共产主义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石——暴力、谎言和隐瞒迅速瓦解，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瓦解了共产制度的基础，共产体制走向崩溃。在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代表“民主纲领派”提出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目标，改苏共为社会党，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等深刻变革的主张。在主张被大会拒绝后，叶利钦当场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在随后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演说中，叶利钦申明反共立场，要求苏共交出权力，让企业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要求在农村废除公有制。经过三轮角逐，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当选后，他开始在莫斯科剥夺共产党的权力，提出解散苏联的主张。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随后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取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活动。戈尔巴乔夫顺应变革，主动放弃特权，同意参加叶倡议召开的“圆桌会议”。

苏共党内的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强烈不满，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命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力图挽救苏共和苏联的旧体制。这时，人心所向决定了历史走向。政变集团在发动政变前派去逮捕或就地处决叶利钦及“民主派”的十几位主要成员的克格勃精锐“阿尔法”分队拒绝执行逮捕令及关闭机场，切断莫斯科对

外通讯等命令。叶利钦得知政变，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行动：准备了致俄罗斯公民的呼吁书，驱车前往议会大厦（白宫），爬上了一辆包围白宫的坦克，宣读呼吁书；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举行总罢工；组织支持者劝说包围白宫的军人倒戈；电话与西方各国领导人联系，寻求支持。军队将领不支持政变，被调入莫斯科的军队在民众的说服之下倒戈，调转了坦克炮口。随着政变失败，苏联共产制度也走到尽头，民众对苏共统治的不满爆发，人们高喊“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要求“取缔苏共”的发言得到全场掌声支持。民众推倒了矗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情形与德国民众拆除柏林墙一样。8月下旬，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非法。随后，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全苏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热潮。11月，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将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联邦所有，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剥夺了苏共的财政来源，限令约八十个联邦中央部委解散，禁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活动，取缔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以及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机构，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共产党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罗斯所有，[12] 解除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扯下楼顶上的苏共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碑。

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应人民强烈的反共要求，同时发表了历史性声明。叶的声明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多年的试验，马列主义被证明是一套荒谬绝伦、祸害人类的邪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前苏共暴君斯大林为奴化全人类，自己做共皇，以饿死俄罗斯人民的血汗钱召集世界各国的流氓、恶棍、文痞、政客组织共产党，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极大的罪恶和灾难。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遍地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

血流成河。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国家赔礼道歉。我现在郑重宣布：

- （一）俄罗斯境内的共产党非法并要受到法律制裁；
- （二）一切参与政变暴乱的共产党徒须到指定机关自首登记等候处理；
- （三）没收苏联共产党全部财产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说，苏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政变中未能站出来谴责和抵制政变，应自动解散，他本人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接着，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以 283 票赞成、29 票反对和 52 票弃权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的机构被关闭，所占建筑物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12 月 21 日，苏联 11 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解体。圣诞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克里姆林宫旗杆上的镰刀锤子旗降下，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升起，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走入了历史，苏联共产党的统治结束。

受到东欧人民推翻共产政权的震动，蒙古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开始了放弃独裁，顺应进步潮流的进程。蒙古的独立和共产政权是苏共操纵的产物。苏俄操纵蒙古宣布独立，建立了苏俄模式的一党独裁政府。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方针鼓舞了蒙共内的改革派。1988 年 12 月，蒙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选举改革派领袖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新领袖巴特蒙赫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错误着手，召开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解除了在位长达三十年的前领导人泽登巴尔的职务，谴责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追随苏联的政策，谴责他们压制、

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异己，带给蒙古饥荒和恐怖。会后，蒙共改革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蒙古人民革命党实行政治改革和放松管制政策后，反对党立即涌现出来。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主要反对党一致要求改行西方民主制度。1989 年底，在东欧巨变影响下，蒙古的反对派结成联盟，掀起了民主运动。1990 年初，蒙古反对派联盟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运动，要求废除共产制度。顺应进步潮流，巴特蒙赫在蒙共十九届八中全会上宣布辞去国家元首职务，建议蒙共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建议蒙共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主动放弃权力垄断。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辩论决定，接受反对派联盟的全部要求。4 月，蒙共再召开了十九届九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与其他党派平等竞选。

为在选举中获胜，蒙共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组，更换了 80% 的中央委员，为几十年间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的亲信进行审查，将其中一部分人开除出党，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撤掉了中央八个部和一个处，精简了国家机关十一个部委局，宣布提高职工工资和退休金以及改善日用品供应的一系列举措。蒙共的真改革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在 1990 年 7 月的国会选举中战胜了成立时间不长，缺乏执政经验的反对派联盟，赢得了大人民呼拉尔中 85% 的席位和小呼拉尔 62% 的席位。大选获胜后，蒙共与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然而，蒙古人民不愿再接受共产制度，反对派组织要求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真正迈向民主化。不久，蒙古举行了总统直选，反对派代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总统。1996 年蒙古反对党上台执政，蒙古平稳过渡到了多党民主政治体制。

越南是受共产革命祸害最深的国家之一。苏共和中共以越南为演兵场几十年，使整个越南长期遭受战火蹂躏。越共被中越边境战争长期拖累，被迫在边境地区长期布署二十万大军以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无法在 1980 年代

初像中国一样推行改革开放。1986年，越南政治强人黎笋去世，越共改革派主导开始了“革新”。越共提出的改革与中共的改革完全不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拒绝任何的体制改革，拒绝对执政党权力的约束。越共拒绝邓小平式制造腐败的假改革，决定顺应世界潮流，同时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革新，接受宪法约束，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做国会代表，抛弃共产党指定国会代表的橱窗作法。中共的改革否定司法独立，设立了政法委、中纪委等凌驾法律之上，破坏法制的机关，创造出了不走司法途径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剥夺公民沉默权和自聘律师权的“双规”办法，黑箱办案，越共的革新则申明恢复司法独立，宣布共党组织不能干预司法。

在东欧巨变后，越南向着民主制度快速变革。1992年4月，越南八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越南的第四部宪法。其中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制度。与中国由中共组织部门任命人大代表的情况不同，越南从1993年起开始举行国会代表全国差额直选，要求候选人须提前六十天在新闻媒体上公示简历及财产情况，须安排至少一周时间与选民直接对话，申明民众可检举不合格的候选人。经过三轮无记名投票，越南选出了反映民意的国会代表。在九届五中全会上，越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集体提出质询。2000年，越共实行了土地改革。胡志明时代，越共追随中共，打着改革旗号霸占私有土地，杀害地主。在新世纪，越共推行了逐步恢复土地私有的新土改，抛弃集体所有制，明确“农户二十年使用权”，期间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即出让土地，与政府分享土地出让收益。2002年开始，越南国会享有了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2006年，越共中央公开了包含放弃一党专政内容的政治报告草案，请媒体和人民自由提意见。同年，反对党出现，越南民主党宣布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反对一党独裁促还政于民等项宗旨。2007年，越南五千万登记选民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出500位国会代表，越南开始从“共产党大于法”向民主社会转型，司法

独立逐步确立。2010年，越南制定了“阳光法”，规定官员必须财产公布。对于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步，中共控制新闻媒体不予报导。2013年，越南决定修改“九二宪法”，删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文，增加保障人权、公民权、生命权、隐私权、私有权、福利权、民族权等宪政条款，决定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彻底抛弃共产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开放党禁、报禁，恢复曾经在南越实行了二十年民主制度。曾经接受中共领导的越共走出了与中共完全不同的真改革之路。有人总结越共改革成功的原因：越共中没有邓小平那样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强人。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伊万·亚历山大维奇·伊林早在1930年代就曾指出：共产主义反人性，鼓吹仇恨、互相斗争，互相残害，互相揭发；共产主义反社会，强制剥夺勤勉人的财产，让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窃取享用；共产主义不会带来公平，共产主义理论鼓吹的平均和公平只是蛊惑口号。所有的人从出生时就不是均等的，是有区别的，以暴力去追求平均反而破坏平均和公平；共产主义不会解放人类，只是带来强迫、剥夺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共产主义是荒诞的，恐怖的。[13]在共产主义肆虐百年后，欧洲人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罪恶及其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认识到了在独裁、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封锁媒体、进行全民洗脑等方面，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不会有例外。结束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家都做了几件事：清算共产党罪恶，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清算共产党暴力夺来的党产，和重写二十世纪历史。

在捷克，民选新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共产极权受害者纪念活动，揭露共产主义罪恶，追究原捷共最高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当年支持苏军入侵的罪恶。1991年，捷克议会通过了《除垢法》，决定对前共产党迫害者，包括共产党的线民，进行法律追究。捷克《今日新闻》刊出的《二十世纪的故事》文章写道：建立政权后，捷克共产党施行了土地改革法，宣布另一项法律成立合作社。人们知道苏联集体化的可怕后果。农民不想入合作社。于是，捷共

推行了恐怖的反富农运动，宣布富农有罪，没收了他们的庄园和财产，然后富农家庭扫地出门。1989年以后，虽然许多家庭收回了自己的庄园，但是集体农庄已经弄得破烂不堪，变成了屋顶坍塌的废墟。非营利性组织 **Post Bellum** 以追究共产党的刑事责任为宗旨，致力于搜集整理“见证人回忆录”。捷克专制制度研究所把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的复印件都放在互联网上公开，供人查阅。每年 11 月 18 日，捷克民众自发都举行纪念活动，庆祝终结共产制度。2007 年 5 月 1 日，数千人参加了在布拉格莱特纳公园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专制”集会。捷克总理米瑞克·托普兰内科在集会上说：必须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的暴行，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在未来不再重蹈共产悲剧而让民主常在。2009 年 3 月，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听证会”。会上，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致辞中表示，必需反思共产主义罪行，并将这些罪行告知下一代。2010 年，经捷克最高宪法法院裁决，捷克政府通过对共产极权下反共受害者国家赔偿和表彰的提案成为法律。

在格鲁吉亚，议会全票通过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宪章》成为法律。《自由宪章》将共产党等同纳粹，禁止在格鲁吉亚公开传播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禁止前共产党官员、共青团员、前共产党秘密警察担任政府部长、司局长、法官、高等院校的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等一系列公共职务，限制这些人在军队和警察部门中工作。它这项法律谴责共产主义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进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迫害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表达及其他自由的，规定必须清除公共场合的镰刀锤子、红星等共产党标志，必须全部更改带有共产党特色的地名、街道名称。法律的起草人、“强大的格鲁吉亚”党领袖托尔特拉泽说：“《自由宪章》法根本不会限制公民自由，也不会给民众带来不便。正相反，这项法律可更好地保护格鲁吉亚的独立和公民的安全，能更好保证格鲁吉亚走民主道路。只有担心过去的罪恶被揭露出来的人

才会反对这项法律。“议会中的“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委员会”领导人托尔恰什维利指出：“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及曾经为苏联安全部门服务过的人士必须主动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或是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开他们的历史，以让公众知道他们过去的身份。”格鲁吉亚总统、以及议会中各个党派将分别派出代表参加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委员会，参与监督《自由宪章》法的实施。

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不顺利，围绕是否推倒列宁像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2008年，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决，共产主义者使用的饰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违法，禁止在正式场合出现。乌克兰全国各地同时举行了纪念1000多万大饥荒死难者的活动。但是，乌克兰各地主要广场上仍然矗立着列宁像。乌克兰共产党人在列宁像下搭设帐篷过夜巡逻，誓言要保卫列宁雕像。乌克兰2013年底，乌克兰民众举行了反政府“百万大游行”，推倒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一名基辅市民说：“我真是太高兴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等了太长的时间。”乌克兰自由党声明说，列宁像象征着苏联占领和对乌克兰的殖民奴役。乌克兰不可能带着这样的标志拥抱欧洲文明。推倒列宁塑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性举动，它意味着乌克兰告别共产党极权专制，告别过去苏联遗产。”随后乌克兰人民自发推倒城市和乡村遗留的列宁雕像。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科卢茨克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的塑像竖立在那里，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看着这些刽子手。”自由党的一名国会议员说：“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经历了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过程，乌克兰也应该走这条道路，不推倒列宁像，不解放心中的枷锁，乌克兰就不会成为一个文明法制国家。列宁的支持者们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和民族灭绝。他们制造的政治迫害给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他期望伴随着列宁像的推倒，苏联遗留下的思想也会从乌克兰人的头脑中被清除掉。乌克兰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表示，从1917年至1991年统治乌克兰的共产党极权专制政权，将被认为是犯罪制度。这个政权在统治期间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灾难。”2014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解散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决议，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发第2558号法案法案，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主

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任何与之有关的标识，包括国歌、国徽、旗帜、纪念品，还有城市、农村、街道名称等，禁止引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违法者将面临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法案在总统波罗申科签署后将正式生效。法案起草者之一利亚申科说：“我认为这是国会的历史性决定，早在乌克兰独立时就应该做这样的决定。”法案另一位起草者卢森科表示：“那些以列宁、斯大林、蔡特金命名的街道都要重新更名，不允许对集权统治头目进行宣传。”

在匈牙利，紧临布达佩斯 **Andrassy** 大街的匈牙利苏式政治安全局总部旧址现在被改为“恐怖屋博物馆”。在博物馆大楼顶层上突出的边沿两侧，有两个漏空的倒写大字悬挂在上，如有折射的阳光，就可在墙上清晰地看出 **TERROR**(恐怖)的字样。字中央有两个标记(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征给匈牙利人带来恐怖的匈牙利纳粹分子和共产党。走进恐怖屋，两块并排的玻璃纪念碑上刻着象征法西斯和共产党箭十字和五角星，分别用匈牙利文写道“纪念箭十字和共产党的死难者”，碑前摆列着花圈和点亮的蜡烛。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流亡摄政皇霍尔蒂在回忆录“匈牙利的一生”中提到，获悉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消息他深感痛惜，留下遗嘱希望叶落归根，但必须等到最后一个苏联士兵离开匈牙利的国土。1993 年匈牙利重获自由，霍尔蒂的遗体被运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乡，**Kenderes**。美国驻布达佩斯外交官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匈牙利的一生”序言中写道：“霍尔蒂以极大真诚严峻地预测，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对匈牙利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历史证明了霍尔蒂忧虑的合理性，希特勒曾给匈牙利带来一场灾难，但 1945 年后苏联的共产统治却摧毁了匈牙利民族的灵魂。”霍尔蒂的担忧在东方同样应验，日本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灾难，然而共产统治同样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恐怖屋”博物馆的第一层陈列一辆苏联坦克，一侧的墙壁上贴满了被共产党无辜夺取了生命的受难者。整个场面相当昏暗，仅有微弱的灯光照明似乎是象征着地狱般的那个时代。博物馆的主题有三个：纳粹和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当时百姓的反抗和苦难。恐怖屋底层

直通三层的一堵墙上贴满了死于共产党政权的死难者的照片，让这些亡灵感到欣慰，后人没有忘却他们。在不远之处的墙上却挂满了另一类有名有姓的“标准像”，他们是一批曾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国安部官员。一楼的展厅之一：一群沾满人民鲜血的秘密警察。在底层的尽头有一部电梯可进入阴森森的地下审讯室，即地牢。参观者大都在一个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脚步，背景还传来事先的录音，是一位当时的清洁工描述行刑时的情景。二楼的一个展览厅主题是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建营地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地毯上绘制着一张大型地图，其中标记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营地。四周的图片和屏幕展示了惨烈情景，厅中央的锥形橱窗陈列着受害者的遗物等。恐怖屋的一个展厅展示了许多洗脑宣传画以及电影等素材，把共产党头目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智慧的领袖”，全国上下，家家户户挂满党魁的照片，形容老百姓“安居乐业和欣欣向荣的生活”，还有些巨幅宣传画，其中独裁者科拉西亲密地与热爱他的民众在一起。

在俄罗斯，独立后的新政府决定把 1974 年莫尔多维亚和彼尔姆劳改营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并点燃蜡烛悼念遇难者的 10 月 30 日定为苏联政治迫害遇难者日。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政治迫害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在索洛维茨石头旁集会、献花，纪念共产革命的死难者。俄罗斯政府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了国立古拉格博物馆，莫斯科市长特令将市中心的两层楼房提供给博物馆使用。博物馆副馆长罗曼诺夫说，博物馆的任务就是揭露共产主义罪恶，向民众介绍斯大林大清洗和政治迫害，讲述古拉格劳改营的黑暗历史。俄罗斯政府还推出了揭露苏共迫害的旅游线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古拉格集中营、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总部。克格勃总部大楼地下室曾是秘密监狱。仅在 1937 年就有 2500 多人被关押在这里，活着出来的只有 24 个人。而且这里的牢房编号不连续，为的是不让被关押者猜到自己在这楼中的所在位置。“大清洗”时，莫斯科市最高军事法庭大楼里流水作业，每十几分钟就宣判一个人死刑。已知在被这里被判死的人数超过了 4 万。

另据秘密警察档案，仅在 1937 年到 1938 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对 681,692 人的处决。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市，政府将原人民委员会和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总部大楼改建而成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以揭露了共产主义的血腥与残暴。博物馆入口处的牌匾。上面写着：永恒纪念 1917 年之后在托木斯克土地上几十年反人民恐怖中的受害者。十月革命后，这里关押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遭到共产党政权流放的人士。在“大清洗”中，院落被当作刑场，许多人被处决后就地掩埋。被捕人士被临时关押在这里等待提审，他们的命运在当时仅有两种，或是被处决，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负责人的哈涅维奇说：斯大林时代，有 50 万人被驱逐到托木斯克，其中一半的人因为疾病、严寒和饥饿而死去。莫斯科中央当时还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这里，但当地政府已无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罢。博物馆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过的脚镣和手铐，手枪子弹等。博物馆分成好几个展厅。一个展厅专门介绍了当年的牢房。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狭窄没有通风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时曾一度关押过 20 人到 40 人，人们几乎没有坐的地方。另一个展厅分成三面展墙。一面墙介绍了当年被处决人士的简历、照片。这些人中有红军将领，也有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学者、教授，同时也有沙皇时代的贵族。通常是丈夫被处决，妻子和小孩随后变成人民的敌人被关入集中营。博物馆工作人员玛丽娜说：“在那个年代，党为你选择你要读的书，党为你指定你想唱的歌，党甚至为你寻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实没有任何私生活可言。展品中还有一批 1930 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莫斯科总部下达的在苏联每个地区应处决和投入劳改营的人数。各地秘密警察必须完成指标，否则会被处罚。各地区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指标，甚至展开了杀人竞赛。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请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处决人数的门槛。一份斯大林签字的复印件内容是命令把处决人数提高到 6600 人。苏共政权当年还专门组织了消灭富农的运动，把富农当作一个阶级从整体上消灭掉。因此把富农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的人被处决，把他们称作是反革命。第二个等级的人把他们流放到远离家乡的古拉格集中营。第三个

等级的人是把他们发配到所在地区的其他城市或是农村。当年颁布的一些命令更要求人们之间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间必须相互监视，并报告对方的反革命行为，否则将面临 5 到 10 年的集中营生活。”博物馆建立以来，这里相继树立起了当年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等民族受害者的纪念碑。如今，纪念共产革命死难者的纪念馆遍布俄罗斯各地。在列宁下令组建集中营，大举屠杀俄罗斯人的事实被揭秘后，长期被谎言蒙蔽的俄罗斯人将苏共广为宣传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语录改“杀人，杀人，再杀人”。俄罗斯史学界教授联合组建了电子图书馆，提供苏维埃恐怖真相的图片、文件供人们查阅。人们这才知道，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在几十年前就已批判列宁。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作家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撰文披露：“列宁曾经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建议逮捕三十到四十个教授，以恢复秩序。列宁无情的指示枪毙隐藏种子粮的农民。他丝毫没有想，没有种子将来农民怎么生存。由于列宁下达的命令，在伏尔加河一带引起大饥荒，没有出路的农民，只好互相吞噬……”[14]

在波兰，议会在宪法条文规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波兰都是非法组织，议会还颁布了一项要求清算波兰共产党的法案。议会颁布的“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规定，议员、政府人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讲师、记者、经济界领导人必须公开他们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关系，交代清楚他们或曾作过秘密警察、特工、线人等不光彩的历史。，议会通过法案大幅度削减前秘密警察，以及当年参预镇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共产党官员退休金，还立法下令地方当局必须把所有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广场等建筑和地名改名。

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方面，德国的工作具有代表性。1950 年，德共效法苏共建立了以本国人民为敌人的国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至 1989 年，该部已是九万人的庞大机关。柏林墙被推倒后，国家安全部开始

销毁四十年来迫害人民秘密档案。1989年12月初，一位女医生发现国安部办公楼冒出黑烟，意识到该部正在销毁档案，于是叫上四个女友冲进了秘密警察办公楼要求接管档案。被国安部拒绝后，她们叫来检察人员、警察和上千民众共同制止国安部销毁档案。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来到国安部大楼帮助抢救残存秘密档案及碎片。1990年10月，德国成立了受内政部领导的特别托管处，负责接收、保管抢救出来16000袋档案碎片，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巨量的文件。1991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全部档案法》，详细规定了对这批档案的处理办法，规定民众有权利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1995年，德国启动了对该批档案的修复计划，雇人根据纸张颜色、笔迹、墨水进行分类整理，拼接碎片，经过数年努力修复了90万页文件。如此巨大的工程只修复了东德国安部全部秘密档案量的3%。2000年底，德国议会决议启用计算机辅助档案修复，德国政府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开发高速扫描技术。至2003年，该研究院宣布将在五年内把六亿张档案碎片拼接在一起。迄今，170万德国人，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提交了查看档案的申请。很多人曾经担心，受害者们查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了告密者，可能会对那些参与迫害的线人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发新的流血事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面对真相的态度比政治家所担心的理性得多。不少年轻人通过查看档案了解了历史及前辈的经历。国安部遗留下来的文件档案规模浩大。仅存放文字窃听记录的档案柜排列起来就有11公里长。对所有档案的登记整理工作在德国统一后二十多年后都没有完成。学者、记者和私人在自己的调查过程中不断会发掘出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例如在去年，有人在查阅中发现，国安部关押的犯人曾为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充当强制劳工，还有的犯人被秘密用于药物试验。[15] 国安部档案管理局专员罗兰特·扬（Roland Jahn）介绍说，国安部的监控网络范围不局限于东德国，国安人员在西德也从事监视活动，他本人在被取消国籍离开东德后还曾受到国安机关的监视。年轻一代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率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与他们

同流合污？为什么顺从这个体制？为什么这个独裁制度能维持那么长时间？”作为曾经的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受害者，他希望自己负责的工作不局限于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他想知道，无数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非正式工作人员”（IM，不公开的线人）“为什么会自愿为国安部效力？”

利用互相告密制造精神恐怖不是某个共产国家特有的情况，而是共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最早的共产国家营造了最早的告密社会。1930年代初，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农民拒绝交出粮食，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一面派征粮队搜农民藏匿的粮食，一面鼓励人民互相告密，还树立了一人少年密英雄——十二岁的小学生帕夫利克·莫洛佐夫。为鼓励告密，苏联组织作家、诗人和画家为这位少年树碑立传，写诗作画，将少年的画像印上邮票、明信片、甚至火柴盒上，以少年的名字命名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苏联解体后，帕夫利克事迹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他的父亲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亲想用惩罚手段吓唬父亲回心转意，叫帕夫利克去告发。少年向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特罗菲姆是“人民的敌人”，结果，苏维埃不仅杀害了这位父亲，还杀了少年的祖父、祖母和舅舅。为把告密的少年宣传成英雄，苏维埃将帕夫里克和他的弟弟也一起杀害。[16] 前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写道：“在克格勃里，虚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蔚然成风。一些同事就被人构陷为勾结英美势力的叛徒，同事们不敢为被陷害者说话，撇清和自己的关系，甚至还落井下石。一位副部长虚构了有人颠覆苏共的密谋。根据他的告密，二十多人被关押。经审讯，这二十多人居然都供认不讳。结果，告密的副部长被这二十多人公指认为同伙，同样被处决。在共产体制下，说你反动，那就别指望洗脱。面对大量的民族问题，苏共就希望克格勃虚拟出反动事件，反动的组织，以便有借实施镇压。为了满足党魁的喜好，克格勃会制造出反动组织，鼓励互相告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人们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下被迫保持沉默、隐蔽真实的想法，甚至主动去告密。在互相陷害的恐怖中，精神病患暴增。，劳改营管理总局增加了五所精神病院。患者可能是真的精

神病人，也可能是被戴上了精神病患者帽子的正常人。1988年，苏共创造的‘政治精神病学’走到了尽头。内务部把十六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约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7]

捷克公布的前共产政权秘密警察线民名单中包括知名政治人物，作家诗人，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异议人士。根据分批公布的名单，数万前共产党线民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的高级职位被撤换，其中一万多人被判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很多告密者提出上诉，强调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他们的上诉多被驳回。因为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三分之一的线民候选者坚守道德底线，拒绝充当告密者。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记录的告密有：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密报学生思想动态；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异议人士开损害神经的药物；一些民运名人，例如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是效力共产党的特工。推倒柏林墙的领导人之一维拉·沃伦伯格在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当选国会议员，推动国会通过了公开原东德共产党秘密档案的法案。她发现自己的案卷中包括多达60个线民的黑报告。一份提供她私生活细节的报告让她明白，那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丈夫还是承认了告密行为。结果，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搬到乡下隐居。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民运领袖曾充当告密者，连东德的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这些人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业。波共秘密警察档案也曝光出很多民运名人曾是共产党的线民，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czyk**）、“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纳科德（**Z. Nakder**）、“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华沙大主教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等三十多位神父。当报纸披露大主教与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长达二十年时，维尔格斯拒不承认。直到媒体披露他与秘密警察主管会见五十多次，接受秘密

警察训练，签署的告密的文件等细节他才在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在俄国，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大量告密行的暴光为让东欧各国人民难以接受。人们发现，自己当年私下的牢骚话、与亲友的谈话被告了密，很多告密是亲近的同事、朋友、亲人所为。很多人因无法面对这样卑鄙的事实而自杀。这样的告密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并有这类电影获了奖。例如，波兰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和梅勒斯卡是同窗好友。梅勒斯卡身兼密探，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皮雅斯怀疑梅勒斯卡是告密者。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有价值的密探，暗杀了皮雅斯。告密和基于告密的迫害是共产制度特有的罪恶。1991年，俄罗斯拆除了树立在莫斯科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的铜像。这一举动标志，政府鼓励告密时代结束。不过，前特工出身的普京掌权后，俄国停止了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联手，停止公开克格勃档案的进程。显然，告密在专制的现政权之下在继续，专制政权仍然需要线民。

清理共产政权暴力夺得的党产方面，德国的工作同样具有代表性。柏林围墙倒塌后，东德议会通过法案，成立“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Unabhängigen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 UKPV**）负责处理德共暴力剥夺人民取得的党产。两德统一后，该委员会与托管局(Treuhandanstalt)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将德共党财产，包括东德所有的党国企业，数万家企业、工厂、餐厅、药局、旅馆、戏院，电力、水利、交通系统，房地产以及现金等百亿马克的资产清理整顿后私有化，将所得的款项交给国库，还财富与民。“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不仅追踪德国境内的党产，也追踪到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瑞士等国的德共党产。

告别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共产制度需要谎言，必然篡改历史，将历史书变成宣传品。在清除史书谎言方面，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一书具有代表性。告别共产制度后，俄国各界一致认为现有的历史教科书不再适合呼吁更换新教材。2009年，普京总统办公室策划，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四十多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引起了轰动，一年内再版数次。祖波夫介绍说，参与编写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段历史极具悲剧性，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告诉人们下列事实：列宁是德国代理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十月革命”是德国资助的“政变”。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详细叙述俄国十月的来龙去脉：德皇威廉从俄国内部找到列宁为代理人，利用资助列宁组成别动队从俄国内部推翻沙皇；列宁在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资助下开展革命活动，在瑞士提出政变计划，随后被德国特种兵护送回到彼得格勒实施政变；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斩尽杀绝；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全俄各地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在1918年至1922年间杀害了200多万人（由于官方文件多经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该书告诉人们下列历史事实：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人们都讲不要向他人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鼓励抢掠；人们普遍认为

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维护社会和谐的信条，鼓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在革命后立即展开血腥屠杀；1920-1930年代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苏共对两百万富农或以反革命罪名枪决，或流放至边远地区。苏共中央1930年1月30日的记录显示，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二十万富农被剥夺财产，六十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十五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苏共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其农民家产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被充公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直到苏联解体，苏俄的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反抗集体化的事件不断发生，苏共镇压的规模也不断升级。国家安全部门在1930年内就逮捕了十八万人，枪决了两万人；共产革命不断制造饥荒，列宁在1920年代初制造了大饥荒，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带来更大规模的大饥荒；饥荒中，西方世界人道援助的粮食被当局享用，完全没有发给饥民，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发展军工；苏共将俄国精英大规模驱逐出境或杀戮，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使民众与外部世界隔绝；苏共以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山峰等等；苏共实行恐怖统治，造成人人自危局面，迫使人们拥护党的统治。苏共培植了一批效忠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贯彻意图。高尔基就是这样恐怖之下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苏共在1930年代推出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革命经典作品”了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该书作者之一潘佐夫指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事实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他一是要通过战争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二是要通过战争向欧洲输出共产革命。出于上述需要，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挑起大战的条约。苏德条约说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该书主编祖波夫指出：“那些在1937

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基于这样的看法，该书摒弃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说法，改用“苏联——纳粹战争”说法。

世纪之交，戈尔巴乔夫在安卡拉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人民都感谢推倒柏林墙的主要贡献者里根和戈尔巴乔夫。2011年3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在戈尔巴乔夫八十岁生日时向他颁发了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担任前苏联领袖时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发起了“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感谢他结束了苏联共产制度。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但苏联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剥夺言论自由，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他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时接受英国《卫报》独家访谈时表示，他最遗憾的是没有早点离开共产党。

2014年，俄罗斯颁行了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教材告诉学生们：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对俄国也采用了收买叛徒、间谍等非军事的战争手段，扶植列宁推翻俄国合法政府。列宁在德国豢养之下发动政变，窃取政权后与德国签订布雷斯特合约，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六十亿马克以回报德国的扶植。随后，他几年的统治时期将俄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罗马尼亚，新政府展开了对共产政权迫害数十万人罪责的追究。2015年，罗马尼亚以反人类罪判处89岁的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指挥官Alexandru Visinescu二十年徒刑。一位受害者的儿女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仍然应该受到惩罚。” [18]与绝大多数共产革命者一样，Alexandru Visinescu没有悔意，声称自己只

是奉命行事。在拉脱维亚，纪录片《苏维埃故事》是清算革命罪恶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作品展示了这样的事实：苏共将乌克兰大多数农民被划为富农，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地，在饥荒中疯狂搜刮粮食出口德国（在饥荒中的1932年创下了出口粮食到欧洲的历史记录），在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制造饥荒，蓄意实施种族灭绝，造成七百万人饿死；苏联与纳粹德国勾结，共同发动了二战。影片不仅列举苏联所犯下的罪行，还将其思想根源与纳粹思想进行了对比，揭露了它们的共同点：将人类划分等级，认为指定等级不应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上。只不过纳粹注重的是种族，他们将雅利安民族作为优良种族，将犹太等民族视为应清除的劣等民族，而苏联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以暴力从肉体上消灭苏共指定的阶级。影片还将纳粹与苏联很多行为，宣传画、阅兵式、屠杀等等对比，证明它们从宣传口号到行事方式如出一辙。

2014年11月，东欧各国领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仪式，庆祝终结共产政权二十五周年。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我们在获得自由了。那场‘天鹅绒革命’告诉人们，自由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11月17日在提醒着我们，人民追求的自由、真理、希望、尊严、公正和正义价值多么有力量。”纪念仪式上播放了“天鹅绒革命”和1988年的“蜡烛示威”的纪录片，随后，各国首脑们共同点燃了蜡烛，把它们摆放到纪念碑前，进行烛光悼念。[19]

邓小平指定两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邓小平领导武力镇压请愿学生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作出一系列承诺以向国人的反对贪污腐败和一党专制内作出回应姿态。该决定声称：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一九八九年九月

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三、取消对领导同志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照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容；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一律为工作餐；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10月，邓小平在东欧巨变的浪潮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指定由江泽民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指定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指定杨尚昆和刘华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维持元老控制军权，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邓小平选接班人的条件是笃信马列，坚持一党专制，敢于武力镇压反对派。江泽民以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通过了测试，团派领袖胡锦涛通过镇压拉萨暴动中的表现赢得了邓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率团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贫困、落后所震撼，向藏人承认，中共的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表示要改变中共对西藏的强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怀柔政策，提出了“免税、放开、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农牧税、放开经济管制、逐步调走进藏的汉族干部。胡耀邦对西藏的怀柔政策受到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欢迎，也使藏人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长期以来，藏人不满意中共长期以来消灭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政策，不满西藏千座寺庙拆的只剩下几座，不满喇嘛被批斗，强迫还俗，连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喇嘛都被关了多年监狱。当中共放弃高压政策时，藏人喊出了要求汉人离开西藏的口号。中共高层内，一些元老指责胡耀邦的怀柔民族政策损害了中央集权和汉族利益，助长了分裂活动，搞乱了西藏和新疆。随着胡耀邦下台，怀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来。重新实行的高压政策使藏人心中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爆发。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独立的请愿不断，最终发展成了暴动。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国务院总理李

鹏签署的拉萨戒严令，宣布自 1989 年 3 月 8 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西藏有史以来的首次戒严。随后，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胡锦涛指挥了镇压。他头戴钢盔到拉萨街头视察的镜头让邓小平感到满意。

胡锦涛之外，邓小平还曾考虑以王兆国为接班人选。1980 年，邓小平在湖北二汽听汇报时，得知二汽车箱分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王兆国在 1976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曾抵制批邓后召见了王兆国，随后提拔王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王兆国根据邓小平的“纠正不正之风”的系列言论，履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职责，采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领导特权和高干女子以权经商的举措，提出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尝试刚刚开始立即引起元老们的不满。因应元老们的呼声，邓小平将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虑名单，贬去了福建任副书记。邓选接班人的标准显示，中共坚决拒绝体制改革。

邓小平代表着最后一代相信共产主义信条的共产党人。他看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覆灭，但拒绝承认共产主义的罪恶，拒绝顺应世界进步潮流，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的退休标志二十世纪中国暴力革命时代的结束。他的退休布局达到了预期。他指定的两代接班人拒绝体制变革，守护一党独裁体制，成功地为共产主义续命二十多年。由于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党独裁，中共在六四开枪后作出的一系列清理整顿官商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制止高干配偶、子女经商、取消对特权阶层特供、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等等承诺完全成为对国人的欺骗之词，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攫取国民财富的规模成百倍地增长。坚持专制独裁的“党的基本路线”带给中共权贵惊人的利益，同时带给中国和世界空前的灾难。中共党史专家尹振环评价说：“邓小平是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是与毛泽东一样的皇权主义者。邓小平曾在 1979 年 6 月 16 日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核心说’也是他专制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从未触及集权的政治体制，他一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了倒退。经改政不改的危机早已潜伏，目前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资源耗竭等即是危机的体现。党史专家何方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是一代暴君；邓小平是第二代。他又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后半生推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他还是一代暴君，还局限于中共的皇权专制中。他禀承了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21]

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进”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一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进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一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

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一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韩国三星、现代、LG 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进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一党独裁，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进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台，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台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一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进运动”，造成整个 1980 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 70% 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 年 5 月；1989 年 3 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黄赌毒，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一名上尉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 120 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了 1.6 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 15 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

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 1998 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 450 人，打伤 2200 多人。1998 年 7 月 26 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一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 23 亿元，军队走私每年 5000 至 8000 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 12 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 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 80% 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 50% 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 年军费加超支共 1311 亿，50% 是 655.5 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 1863.5 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 1998 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 940 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 1998 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一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 2000 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

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 72 人，打死军官 12 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 260 万元展开枪战，伤亡 90 余人，打死官兵 52 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 70 多个小时，沈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沈阳警备区、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 1.2 亿元利润开火，死伤 40 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 63 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 81 架，军人伤亡 90 名，直接军事损失 11 亿。1999 年 2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一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一本糊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里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一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污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一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里、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赞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里宣布在农民中搞的一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

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占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一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企腐败的冰山一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一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着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一块军产地就能收受一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一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一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

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 200 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进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着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一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一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一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 12 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 238 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 2000 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 公斤黄金，68 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 4 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一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

国外典型“裸官”，在 2008 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 100 多名贪污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你们的穿戴，看看你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一年抽烟不得几十万，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好哇，既然这样说，你先公布财产吧，带头。行不？”“都腐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必讲你；你讲死我，我讲死你。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覆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着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着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着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科院共同完成的《全国

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主动放弃权力垄断，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在他去世时，台湾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 61 章 共产革命遗害

“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

中共的党员队伍与中国的官员队伍大致重合，规模都在向亿级迈进（中共十六大时党员有 6 000 多万党员，其中 4 000 多万是各级官员）。供养如此规模的“党和政府”，国民收入被吃光花净仍远远不够。“党各政府”吞噬国民财富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党和政府”爆炸性扩张

生物学家达尔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以致于如不毁灭它们，一对生物的后代就会很快地充满地球。.....在同一地方势必进行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互相抑制的关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种互相制约之上。没有肉食动物的制约，草食动物会迅速繁殖，将草吃光，将草原变成沙漠。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古代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接受虚拟的天或神意的制约，现代社会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约和宪法制约。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一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内外的敬畏与中国历代天意、民间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约。制约是宪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谓宪政、共和、民主，说到底是制约所有政党、个人不得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学说鼓吹斗争、摧毁，包括摧毁道德体系。共产党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不接受任何制约。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所畏惧等思想都代表着共产党不受制约的观念。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党和政府”如同没有肉食动物制约的草食动物一样，疯狂扩张，吞噬一切资源，迅速占满每个角落。

革命前后的官民比例变化揭示出了革命党扩张之疯狂。中国历代官府规模很小，官吏维持在一至三万人，[2] 政府最基层是县级，县衙之下无官府，一个县的官员编制数人而已，广大乡村由乡绅自治。1908 年末，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清政府颁布了《调整户口章程》，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1910 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结果为全国人口 3.2 亿，全国行政官员 2 万多人。[3] 而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从中央到每一个县，每一街道都有了共产党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政协纪检委等所谓五套班子，外加政府办公室、改革委、经委、民族宗教事务局、司法局、人事局、劳动局、规划局、建设局、粮食局、计生委、县审计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法制办公室、信访局、政府研究室、老龄委、行政服务中心、招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保密局、党校、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干部局、贸促会、文联、爱委会、工商联、对外友协、政府招待办、投资促进局、拆迁办，民委等数不清的党属机构。官方宣称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只是狭义的概念。财政供养的人还包括所谓事业单位中的准公务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中公务员性质的官员、中共认定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全国 60 多万个村委会、8 万多个居委会等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也由财政供养。[4] 从中央到乡镇，全国正式和临时机构中吃财政饭的人数极为惊人，一个县的“吃皇粮”官员人数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国在编官员人数。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没有编制，人员总数以千万计，虽不获财政拨款，但靠政府赋予收费权和执法权利用收费罚款自肥，吃变相的财政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已经如此之庞大，地方政府还要大量的聘请“临时工”。例如，广东的治安巡防员或辅警就数以万计，天津爆炸事件的伤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属于消防系统的“编外消防队”。一份给朱镕基《给总理的上书》说“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前总理朱镕基承认：“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基本都是想办法“创收”来供养官员的“吃饭财政”。前中组部长张全景承认：“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

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上指出：“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的财政供养的官员数在 2005 年超过了 7000 万人，[5] 按国家统计局《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就业人口 7.67 亿人计算，中国十位纳税人要供养一位官员，供养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出许多。

革命前的满清和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没有党的机关，因此规模很小。国民政府时政府规模大扩张，因为苏俄输入的党国体制，有了政治部、宣传部等党机关混在政府中吃官饭。但这时在有在野党监督，参政会、国民代表大会都明确提出政党不得在政府中设立机关，军队须国家化，政党须退出军队和政府机关。新中国政府规模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共产党机关混在政府中享受纳税人供养，政府、军队中一半的机构和费用开支是服务一党私利的秘密开支。例如，各级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强制国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传，为国人洗脑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组，人大、政协党组、纪检组，数千所党员带高薪就读，实际是腐败温床的党校、党史研究机关，马列主义研究机关、编译机关，专门服务特权阶层的“特供”机关和“离退老干”机关等等都与服务社会无关，而是中共控制社会的机关，全是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军队中的中共机关更多，政治部、宣传部，遍布军中的文工团、歌舞团都是纯粹服务一党。这些吞噬国民财富的党机关是寄生性质的一个注脚。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不允许在军中宣传一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机构。只要有党在野，反对党定然不会容许用纳税人的钱供养某一党的机关，更不可能允许财政供养如此众多，如此庞大的一党机关。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精兵减政”口号。建国后，所有高层都有过精减机构的指示。经过中共六、七十年的精减，官员从几十万“减”到了七、八千万。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说：“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李的这些话没有新意。从延安到北京，历届领导人，历届总理都说过类似的话。七十年的情况证明，在没有反对党制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扩张步伐，只能如同没有天敌制约的动物、植物一样，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高层政治日趋寡头化，县乡级政治日趋家族化、黑社会化，痞子化。[6] 不废止一党独裁，不确立多党民主政治，政府规模和开支只能继续泛滥。

二、财政收入主要供养“党和政府”

中国官员享受着众多隐性福利和养老体制双轨制的好处：个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够轻易以权力谋取福利。因为官员收入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青年们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创新高，几千人争夺一个职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税收和各种行政收费构成，而五百多项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几项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费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计是，这些钱被政府挥霍掉了，或者说被用于养官了。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二十多年过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难产。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员们的秘密收入和拥有财产的规模大到惊人地步，披露出来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3年“两会”上，有代表抨击全国的职务消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成，挤占了其它费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费用其实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及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给百姓的公共服务。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养官已

经把财政收入花光，没有钱提供公共服务，可怜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对少数“体制内”人员，广大民众需要费高价去购买公共服务，有关“事业单位”再垄断这些公共服务，乘机宰割的民众。在没有一党独裁的国家，社会的平衡调整机制有效，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例如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各界呼吁国家公务员削减薪酬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因应各界呼吁，日本政府在 2012 年 8 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从 2013 年开始削减国家公务员近 15% 的退休金，以缩小“官民收入差”，缓和社会矛盾。[7] 但在一党独裁的中国，没有一种对“党和政府”的约束机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线。事实可能比蓝皮书承认的更严重。1980 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 0.28，如今高至 0.7，达到了动乱级别。

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指出，中国人收入的一半用来缴税供养政府。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则表示，政府不会明目张胆的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会以电费、水费、清理费、去污费等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 GDP 低于 785 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 13%；人均 GDP786 至 3125 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 19%；人均 GDP3126 至 9655 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 22%；人均 GDP 超过 9656 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 29%。中国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企业税负却高达 42%。[8] 以燃油为例，政府垄断经营，油价的一半是政府强收的税，且油价中包含的税相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2013 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 13 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是世界第一重税国，且税收每年增速近 10%，超过 GDP 和国民收入增长。中国政府不光收税，还收取几乎与税收相当的各种费。收费与税收构成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如果算上企业负担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实际税负接近 50%。

19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随着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这一比例越来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军备竞赛时前苏联的居民消费率还低。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担税费繁多，工薪收入要交个人所得税，买东西要交增值税、消费税，买进口商品要交关税、车辆购置税，买奢侈品要交消费税、烟草税，买要交房产税，契税、印花税等等。中国汽车，IPAD，化妆品等商品的价格是美国1.5至3倍，商品价差原因是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负全球最高，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欧盟各国的2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其它17个税种的征税依据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的条例或暂行条例，且大多为“隐形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国内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即税负与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0%的所得税。在香港，大部分税收来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以2008至2009年度为例，该年度香港纳税人数只有130万，还不到全港700万人口的1/3。年收入50万以上的约28万人缴纳了薪俸税总额的87%。就税收结构而言，中国普通民众承担着世界上最重的税负。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其特点是税负转嫁性，税收的最终负担者是每一个消费者，工薪阶层的消费多，承担的间接税就多，即穷人承担着主要税负。2009年12月，《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务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国民的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对此报告，中国官方以欧美一些国家税率更高为依据称报告错误。中国官方说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

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一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例如在美国，工资税一律进入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进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一种严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是一种转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不是一种负担性的税收。因此，比较各国税负轻重时须把社保收支撇开。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全国政府总收入为29807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18607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缴费（个人、公司）高达7503亿美元。如果社保缴费剔除，美国全国税收与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这恰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次，民主国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国有资产经营收入，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权益利得不列为政府的收入。如果将中国垄断国企的利润考虑进去，政府的财力占GDP的比例将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税负高低要看税收的钱怎么用。在民主国家，与高税负相应的是国民高福利。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挪威为71%，瑞典为69%，丹麦为72%，芬兰为68%，法国为71%，意大利为62%，荷兰为62%。在这些国家，民众交税多受益也多。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税31%，经理们要交60-70%，但人们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學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在丹麦，公立学校免学费，学生享受政府补助，上网免费，打印学费，书本、铅笔，饮料免费。

在新西兰，政府在 1898 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工薪族无须缴纳任何款项，年满 65 岁即可领取养老金，还可享受各种补贴和免费教育。在印度，全体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国家建有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当然，看病不花钱导致医院财政紧张，好药缺货，医院脏乱差，迫使有钱人到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 1300 多家私立医院就医。在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第二轻税负行政区香港，政府向来奉行简单低税制，中低收入居民纳税很少，薪俸税（个税）标准税率为 15%，免征额为一年 10.8 万港元，同时还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通常，缴纳薪俸税的港人不仅享有子女免税额和父母免税额，个人进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费用等也可获得减免税待遇。2008 年经济危机以后，香港也普遍为中产家庭大幅减税；有的中产家庭甚至完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民众不能因交税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没有可能获得任何退税，失业者既不能获得退税，也不能获取实质性的失业救济，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向富人倾斜，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无缘享受。对企业和个人来说，交税只是负担。经济学家王福重指出：“中国的税负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税收痛苦指数第二。财政部、税务总局说这是错的，计算不准确。我说也是错的，中国肯定是第一。把中国税负算起来，加上国企、央企和银行赚的钱，那就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计达到 50%，甚至更多，因为还有多如牛毛的收费。收费也是税，你也不能抗拒，中国政府部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不收费的。中国的流转税非常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有 18 种，税太多了，特别是商品税多。”^[9] 的确，增值税、消费税等大多数税收的“隐蔽性”，降低了纳税人消费时的痛感。如果没有隐蔽，中国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实际更高。而在中国，民众“高税负”“低福利”甚至“无福利”，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了供养共产党和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报告，中国政府的行

政管理费 1985 年为 170 亿，占财政支出 9%，2000 年为 2768 亿，占比 17%，2003 年 4691 亿，占 19%，行政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税用于养官尚且不够，哪里有钱用于民生支出。百姓交税当然没有回报，当然痛苦。

与美国比较，最能看清中国“党和政府”的自利性质。美国的县政府机构主要是法律和服务机构。通常有：郡委会（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办事员（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办公室、郡律师办公室、郡税务长办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区发展办（Community Development）、综合服务办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养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设施部（Public Works）、娱乐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出纳部（Treasurer）、选举登记处（Voter Registrar）等等，一个县政府通常只一座小楼而已。美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包括了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其总数只有几百万人。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半，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很低，政府 3 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中医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一。

而在中国，“党和政府”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保证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享受特殊的教育、医疗、文体育、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而用于全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的开支少得可怜，且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以教育经费为例，中共有钱发动战争，有钱对外援助，但对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泽

东统治时代是祸害摧残教育的时代。这一时代结束时，国民经济崩溃，教育经费聊胜于无。邓小平统治时代，一个“洋跃进”运动搞到整个 1980 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样刻薄教育。1989 年，中国政府开始搞高等教育收费。1999 年，当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此后十几年间，中国大学学费涨了两百多倍。其中，中央戏剧学院学费每年近 14 万。英国的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 8930 英镑，约合 11 万人民币的总额高居榜首。新西兰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大学人均年教育总支出超过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计，中国学费世界最贵，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共教育投入过低，致使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纯收入，农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纯收入。“教育产业化”让大批农村高中生被迫放弃考大学，考生录取后农民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 2003 年，陕西省榆林县 53 岁的农民景统仕因支付不起女儿每年万元的大学学杂费自杀；2004 年，福建农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辽阳农民孙守军由于交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单亲母亲刘淑杰因交不起女儿学费自杀。志愿到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咸虹学校爱心支教的李学仲老师披露落后地区学校的惨状写道：“我不能说有多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啊。四、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五点钟多就起来到几十里路以外去上课，没有公路，学生上学途中摔伤是常事。学校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门窗应该都是坏的，晚上无老师居住，没有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坏了，学校无法打印或复印一份文件，老师同时兼职炊事员、门卫、卫生员等。学校许多应有的活动几乎没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想送电取暖器，但电费付不起。由于工资低，没津贴，教师难以养家糊口，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生流失严重。老校长身患癌症不能进食，不能说话……一个女教师一只耳朵听不见了，没有时间治疗……她马上退休了还一个人包教一年级各科。百姓极度贫困。对深夜家访的教师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两个红薯致谢，教师不接纳还不行，否则他们会泪水涟

涟，认为教师嫌弃礼轻。对深夜在沱江边上挨家挨户家访教师来说回校途中只能疲惫不堪地领着一袋红薯、玉米棒一步一停走在泥水路上。近来本地财政短缺，每个老师都被扣了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农村教育的惨状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最好注脚。

再以医药为例，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建议各国对基本药物少征或不征税，收增值税。多数国家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 年公布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对药品实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对药品不减免征税，按照 17% 全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 5%—8% 的关税。官僚和体制内人员享受公费医疗，药价虚高对他们没有影响，而贫困人群则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的情况普遍。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仅为 3%，世界垫底。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鼓励公立医院开高价药来“以药养医”。

自 1994 年中共分税制改革，即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 18%。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主体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即隐藏在商品、服务价格里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例如在中国购买进口化妆品会包括 50% 的关税、30% 的消费税及 17% 的增值税。世界各国一般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药品统一按照税率最高档征收 17% 的增值税，进口药品还要加收 3-6% 的关税。这种通过隐藏在价格里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法，使消费者不知道承担着比工资税高出数十倍的税收负担。税收之外，中共还征收各种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达 1.4 万亿。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建议中国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减税建议没有意义。全球第一规模的“党各政府”需要天文数字的民财供养，每年10%速度递增的税收尚且不够，谈何减税。由于政治原因，世界银行不能建议中国党政分离，缩减政府规模。谁都知道，如果不能缩减“党和政府”的规模，不能限制“党和政府”的花费，降低税收只能是空话。

三、国民收入不够“党和政府”挥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党和政府”吞噬财富的大头是腐败和挥霍。权力带来腐败，不受监管的权力带来难以置信的腐败。中国没有对中共党权的制约机制，各级官员的腐败贪污，吞噬国民财富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近年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的灰色收入在扩大，最高的阶层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达6万多亿元，约占GDP的12%。调查结论是，灰色收入扩大与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如果2013年一季度消费的回落是因为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个数字将十分惊人：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个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接近全部教育经费的一半。”上述那万亿只是冰山一角。各级政府食堂如犹如五星级酒店是公开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

丰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象征性收责任吃，很多机关实行一元就餐制，一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计一百二十种，其中“莲籽红枣银耳汤”等甜点只需一元钱。特权阶层手中一元钱可以放大成一百元的价值，“公仆”百姓生活两重天。小官腐败在“党和政府”的腐败中只是小意思。据香港《动向》杂志露：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千亿元，江泽民、李鹏等 11 位最高级离休干部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等，每年耗费公款十亿元，平均每人近亿元。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包括中共豢养“八个民主党派”领袖，每年花费千万元计。

政府主导的国企是腐败的温床，其腐败规模同样惊人。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 2010 年对山西金业实施的百亿并购案高价收购劣质资产，致使百亿国资流失。举报者披露，被举报人曾出价 2000 万封口费。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垄断下，国人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在民主国家，国有企业利润计入政府财政收入，在党国体制下，国有名不符实，国企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去向成谜，黑幕重重。2013 年，新一届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团，被查官员数百，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千亿计。

新一届领导层声言查处国企腐败。但是，“党和政府”的腐败。自己查处自己不会真的下手。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官员财务公开，财产申报，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新中国无法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秦汉时已有监察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历代监察官职名称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但都有责任就朝政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对所奏风闻真实性不负责任。而在新中国，中共不设言官，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制度性的建言途径堵塞，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中共权贵的资产规模让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随着众多事

实披露与档案解密，“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四大家族”巨额贪污的宣传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敌国是真的。江、曾、胡、温、徐、周、戴等等，随便一个家财都百亿计，涉足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垄断企业。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红色家族和新兴权贵家族数不胜数。如果在两党制之下，百分之一上述规模的以权谋财已经足以导致执政党的更替了。但在一党专制下，没有真正的问责与追究，贪腐规模只能越来越大。

腐败之外，政府的败家与浪费规模惊人。正常的经济体系中，私人的，民间的经济活动为主，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很小比重。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左派政党壮大，政府活动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规模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即使如此，美国 GDP 中投资只占 15%，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 70%。[10]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取缔私营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体系。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大跃进”、“三线建设”、长期备战，对外援助，将国民财富糟蹋个精光，经济全面危机。在邓小平时代，“洋跃进”造成浪费就与“大跃进”相当，留下了持续整个 1980 年代的经济危机。在邓小平之后，新一届“党和政府”追求 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同样惊人。改革开放后，中共请回了私营经济，使经济局面比毛泽东时代有所好转。但在党国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必然主导经济，GDP 中私人消费只占 35%，政府主导的投资占了 40%以上。“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实际上是吞噬国民财富的灾难。领导人拍板胡乱，浪费、挥霍国民财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政府扶植国企，主导的投资造成乱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亏损和贪污腐败严重。政府主导的全国 24 个工业行业中有 22 个行业产能过剩，留下了 GDP1.5 倍规模的巨额烂账。以建钢铁厂为例，各地重复建设了钢铁厂上千家。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行业整体亏损。以建机场为例，政府新建成的机场 90% 亏损。以建水库为例，水电部建大水库，超级大坝上瘾，忽悠邓小平拍板三峡建坝，向全国百姓摊派筹款承诺

三峡工程将在完工发电后全部偿还建设资金。大坝建成后，三峡集团赖账，不仅不向百姓还钱，换个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继续征收“电捐”，同时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筹资，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将三峡集团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一大部分被利益集团成员吞噬，留下了数千亿元后续资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铁路为例，铁道部以解决春运难为由，胡乱上马高铁项目，声称要把国内民航的旅客拉进火车。与建坝成瘾的水电部一样，铁道部也热衷于上大项目，以便捞“油水”。结果，“高铁大跃进”留下数万亿的烂账还不上，政府再被“钓鱼”，面对大批高铁项目陷入两难：若不追加后续投资，谁也无法承担铁路工程烂尾的责任；继续追加投资，建成亏损和维护成本将与三峡大坝一样，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以举办盛会为例，北京奥运会是“低收入国家”举办最昂贵运动会的典范，耗资三千多亿人民币，约 420 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多，是悉尼奥运会的五倍多，投资规模超过了百年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深圳大运会，亏损 128 亿。运动会后，建成的场馆多成废墟，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被政府挥霍。古今中外，官办买卖一定伴随贪污、浪费、中饱私囊。各地城市争着申办国际盛会，如同前朝大臣争相主持皇家工程。由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约，世界无数花费巨额金钱的国际盛会都办到了中国。这些举办决策和花销数额没有经过国会批准预算、决算的程序，没有征得百姓同意，决策与执行过程没有监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预经济，主导投资必然留下巨额烂账。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受命帮助国企解困，结果近半贷款成为坏账，实际将银行少得可怜的资本金都亏光了。1999 年，政府组建了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将工、农、中、建四大行 1.4 万亿不良资产分别“剥离”给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大管理公司注资，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央行获得再贷款。政府将“四大行”为首的大批银行粉饰财务状况后上市圈钱，补充资本金，利用股民的钱掩盖自己主导投资的巨额烂账，帮助银行脱困。2008 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

刺激计划，银行根据国家发改委批文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额贷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一大批不能产生还存贷回报的“僵尸企业”，为了“维稳”，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许淘汰过剩产能，将本该破产企业的无价值资产抵押给银行，命银行贷款给这些企业发工资。结果，政府刺激经济举措给银行带来了近十万亿元的烂账。为不让贷款正式成为坏账，银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借新账还旧账，大家协力隐瞒“有毒资产”。AMC 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实是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 手中的烂账数额更大了。企业核销坏账靠利润，财政核销无非靠财政收入加通货膨胀。不受制约政府必将不停地制造烂账，不停地玩剥离银行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数字游戏，让四大银行延期债券偿还期，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中央财政继续给 AMC 制造的政策性亏损做担保，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将政府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了民众头上，让民众来填补银行亏空，合全民每人为银行坏账负担近千元。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之外，政府还在筹划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圈钱，各地政府也在筹组本地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要用股民的钱掩盖烂账，为再举新债铺路。例如，江苏无锡，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筹组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复制中央剥离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套路。将银行的巨额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隐藏坏账的游戏。中央和地方都将这种游戏越玩越大，政府欠债和银行隐性坏账越玩越多。

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 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 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 7.6%的 GDP 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地方官员往往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谋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不允许有预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过融资平台得到贷款。”两位专家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

即中国目前没有制约政府违法运作的机制。在目前的制度下，“党和政府”造成巨大损失不受追究，不受惩罚，损失由全国老百姓承担。

腐败、乱投资之外，“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的另一黑洞是共产党的秘密开支。党国体制下，国库就是党库，国有资产就是党产，中共用钱不受制约，数额保密。毛泽东曾为输出革命和争共运领袖将国库挥霍一空。邓小平时代，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的开支虽然减少，但花费数额仍然巨大，一场儿戏的对越战争的花费已是天文数字。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共从国库拿钱的秘密开支没有减少，项目多如牛毛。例如，长期无偿援助朝鲜，援助柬埔寨换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红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联盟种族冲突，以中国驻南使馆为南联盟军的信号中转站，操控新型雷达系统击落美国“夜鹰”隐形战机（北约多次警告无果后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作为报复），[11] 秘密提供武器给塔利班，[12] 数千亿的“维稳”费用，数百亿的网络封锁（金盾工程）费用，为打压台湾而收买有意与台湾建交的南美国家，向非洲提供着最庞大的奖学金计划，资助宣传党功绩的文艺节目，遍地兴建宣传党的纪念堂，纪念碑，革命家墓园（其中，中共为前领袖华国锋兴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顷，耗资上亿元），遍地的党文工团，遍地的党史研究机构，马列研究机关，党校等等。中国的国防费用中有很大大比例是中共的党开支，例如总政治部的开支完全是党开支。对于党的秘密开支，中国的百姓没有机会质询，人大、政协也无胆询问。可以肯定，若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存在，这样的开支必受制约，若有执政党轮替，这样的开支将被禁止并彻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鲜劳动党等极少党国保持着以国库为党库，任党挥霍而人民不得过问的制度。至今，全国各级中共党务系统每年花费数额仍是中共的“国家秘密”，谁想查询就可能去坐牢。

四、服务特权阶层的医疗体系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确立了主要服务高层的医疗“特供”制度，将延安稀缺的医药资源集中于服务中共高层。建国后，中共将医疗特供制度高度完

善，实行官本位的按级别“供给”，共实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1952 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公职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80 年代初，在“洋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灶吃饭”后同时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削减。卫生部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让医院自己去赚钱。1985 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启动了“医疗制度改革”，其内容是政府推卸医疗保障责任，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医院去“搞活”、“创收”。政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疗改革动因原是“洋跃进”后的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缓解后，政府没有加大医疗开支的比重，没有叫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改”政策，反而继续推卸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声称让医疗体系“产业化”。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医疗保障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丧失，成为赚病人钱的谋利机构。

中国菲薄的医疗福利开支 80%花在了 850 万高级党政干部群体身上，十几亿普通民众只共享 20%的医疗资源。据 2005 年前的统计数据，党政干部的医疗开支每年超过 500 亿元。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 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 40 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医疗条件最好的是专门服务高层的号码医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医院中均设有专门服务高干的 VIP 病房，其费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数量庞大的党政干部、特权阶层享受着豪华病房、过度治疗和各种各样的休假式治疗。在“体制内”，“无病住院、小病大治、一人公费全家医疗”等浪费医疗资源的情况普遍。而高层更是浪费医疗资源的大户。一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们的讣闻多在九十岁以上，百岁寿星比例也极大高于百姓。这个群体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权医疗，其中一些人靠换血延长着寿命。《解放军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老干部”的新闻报道，称北京军区总医院改进离退休干

部医疗保健服务，派出调查组深入到驻京干休所，征询老干部对保健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专题研究改进老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改老干部上门就诊为主动送医上门，为老干部开设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备专用车辆和药品器械，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在家“住院”，挑选业务技术精的医护人员上门查房和治疗，为每个老干部家安装了急救报警系统。 [13] 2006 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中不再出现“公费医疗”项目，党政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无从知晓。不过人们知道，

与高层浪费医疗资源相对照的是，“体制外”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一个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贫。城市普通民众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少，广大农村则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的医疗条件就只能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改革开放中，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迅速崩溃，农民丧失基本医疗保障，因病致贫、无钱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中国 23%的老人(424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城镇老年人口贫困率约 10%，农村老人贫困率约 30%。与此相关，全世界每年百万自杀事件中的三成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事件 80%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者中九成是贫困老人，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是他们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众多农村老人悄悄准备了自杀的农药，因为他们不想因自己的病让全家陷入绝境。200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调查 11 个省份的 40 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来，医院由国家财政拨款，服务对象是纳税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利用半垄断地位，自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工资水平，收取回扣、收红包，将医药价抬到畸高。官办的各种“人民”名义的医院一面享受政府拨款，一面以医赚钱，日进斗金。

非盈利机构商业化的背后黑幕重重。例如，2010 年有 1180 万人无偿献血 3935 吨。但患者用血不是无偿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红十字会年收入 40 亿，血站员工年薪 25 万被曝光后，人们不愿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强令部队士兵捐血。对于医院“以药养医”谋利自肥的状况，专家钟南山指出，只要不解决国家对医药卫生的投入问题，很难实现医药分家。应该让这些基层医院能够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层医生也能像乡村教师一样，工资由政府来给。不触及体制的专家建议没有意义。疯狂扩张的政府养自己尚且不够钱，不可能恢复医院的公益性质，只能让医院继续逐利。

与中国向特权阶层倾斜的医疗体系相对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公平服务全民。在中国周边，台湾、香港、印度的医疗保障公平、透明，覆盖全民，政府对医疗保障高投入。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 191 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结果，中国排名倒数第四，被列为政府卫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2012 年，政府税收高达 10 万多亿，医保只有区区 2000 多亿，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仅为 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华人生活网》报道，华人移民老人在美国享受着良好福利，让很多华人老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天堂般”。报道称，刘奶奶来美国已经 10 几年了，当初只是来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没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来养老，住在新泽西中部的老人公寓。一室一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资助。电费通过申请也可获得补贴，每个月还有 200 来美元的食品券。她说：“我现在还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话每个月还有 700 至 800 美元的生活费呢。”很多从没在美国工作和交过税的中国老人，却能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刘奶奶这样因为子女而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意外的幸运。因为在美国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成为公民的中国老人在美国又没有收入，他们开始享受了赤贫老人的福利。来自东北的张先生用政府 Medicaid 在纽约的医院做了两次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决心留在美国养老。一位在美多年和

刘奶奶住在同一个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说，“以前只听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产阶级的战场，老人的地狱根本不对，这里是老人的天堂。”

五、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

社保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的《疾病保险法》标志社保制度的诞生。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在疾病保险之外增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战后，首次大选获胜的英国工党提出建设福利国家，也推出了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社会主义风靡全球之时，民主国家纷纷效仿美英，推出类似计划，向穷人承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拉选票的主要卖点。到二十世纪末，社保体系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暴露。由于左派政党向穷人承诺了没有资金来源的高福利，各国社保体系纷纷走向破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指出，社保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后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资人（下家）的钱来向老投资者（上家）支付短期回报。在能够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况下，系统能维持运行，并营造投资赚钱的假象。当没有更多下家加入时，系统崩溃。社保养老基金的运行情况证明了弗氏的论断。美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21年将收不抵支，到2033年将用光所有余额；韩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33年将收不抵支，到2046年将用光所有余额。[14]在各国社保体系崩溃之前，它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正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1997年，在世界各国社保体系走向崩溃之时，中国政府出于帮助国有企业减负脱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全国城镇职工社保养老金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社保体系一样，中国的社保养老金也具有庞氏骗局性质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社保劫富济贫，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劫贫济富。

中国社保体系特点之一：劫体制外之贫，济体制内之富。中国社保体系将民众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群体区别对待。“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干部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却要与缴费有积累的体制外群体一样，来发放养老金，造成养老基金巨大缺口没有人来买单。而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缴费群体。据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估算，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维持在**92%-107%**水平。而“体制外”的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计入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这种设计的要点是不缴费的“体制内”群体享受高额养老金待遇；缴费的“体制外”人群基本自存养老金；政府财政基本不作资金投入，只是挪用缴费者账户中的钱供养不缴费的富裕阶层，造成两亿多穷困缴费者的个人账户成了没有钱的“空账户”，对民众欠下了数千亿的巨额债务。据估算，一个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超过**100**万元。[15] 这让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钱养老”。如果有一款保险产品，要缴保费三十年，保费年年上涨，身故不退保费，不给保额，不能退保，不能贷款，不给合同，这样保险产品不会有人买。但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保险产品，以政府半强制的手段推销给了国人。

社保体系设置很多门槛，迫使需要流动，需要异地转保者的农民工、工商户放弃权益，以便将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没收。面对这样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农民工、工商户只好无奈地退保、断缴费，不参保来抵制不公平体系，同时使自己面对老无所养的凄凉晚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率低，近七亿的城镇人口中参保人数仅有两亿多，农村新农保的覆盖面更低，仅一亿多农民参保。农民不积极参保有其道理。因为针对农民的所谓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养老金标准甚至低至**55**元，连心理安慰性质都谈不上。

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交钱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却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保体系比其它国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溃，中国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额”两个时点已经来临，危机将比其它国家严重得多。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14 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额为 3.18 万亿，而全国个人账户的“空账”额超过 3.5 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累的所有资金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仍然会有较大空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解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这就好比说一个口袋里 10 元钱，可他还有一张 11 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里。”这就是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破产，现在正在交养老保险的职工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无钱可领。

根据 1997 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应近百万亿元。[16] 对历史的欠账，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改革方面想办法，而是打缴费群体的主意，将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迫使缴费者不断增加缴费额，同时准备推迟退休年龄。必须缴纳各项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涨价”，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后，工资缩水了四分之一。记者在北京市某企业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单上看到，2012 年下半年，企业按该员工月缴费为工资额 1869 元的 20%，月缴费 373.9 元，经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从原有的 373.9 元/月攀升至 963.2 元/月。社保缴费高费率使缴费员工收入缩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超过 50% 以上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17] 我国企业与员工养老保险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到 30%，是美国 12.4%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 2.4 倍。然而，高费率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养老待遇。声称以“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为准则的社保制度其实是“多缴少得，不缴多得”。公务员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资增长 15%~20% 之间，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数倍于缴费群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缴费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

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 60%，如果你收入低于 60%，你的缴费率就高于法定缴费率”。

中国社保的另一特点二：劫底层之贫，济高层之富，越是高层，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任国家领导人离休后基本敞口花销，没有限额，开支惊人，人均年开支数千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遗孀）级人均年开销近千万元，待遇包括：购房补贴，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一年数次带家属国内休养（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火车软卧，配轿车旅游，机场需配合起飞时间，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医疗特供全免费等等；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开销百万元计，待遇包括：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配专职工作人员，配医护人员，一年数次带家属国内旅游休养（飞机头等或商务舱，火车软卧，辆轿车或小型旅游车，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实报实销）。这数百高层领导人离休后的开支金额是中共的机密，估计每年数百亿。他们享受的待遇延及他们的子孙。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级稍低，但人数庞大，开支同样惊人。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高层人数数千，副省部级数万，他们中相当部分长期住在风景名胜区，退休官员总开支每年数以亿计。中共中央曾有计划减少退离休官员福利待遇，遭到退离休官员群体激烈反对而无法推行。上述公开福利之外，离退休官员们还有看不见的福利就更惊人。在北京，西郊巨山农场是中办国办官员的蔬果供应基地，蔬果种植时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个步骤，都有严谨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领导人饮用水都是由专车从玉泉山取来的山泉，水源地不仅有严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经过层层过滤、化验，并添加有益身体的各种矿物质。官员享受特权医疗，有家庭医生，定期进行医疗检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请技术最好的医生、服用最好的药物。退休省级以上官员住院花费数百万比比皆是。高官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娱乐设施周全。以视察、调研为名的公费旅游耗资巨大，出书、出回忆录公费销售

是一大变相腐败。仅中共离休干部的巨大公费开支一项已经能够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传了。

政府打算以推迟退休的办法应对社保危机是世界各国应对社保崩溃的必然之举。既然社保骗局不可持续，那么让缴费者多缴几年费，少领几年养老金的推迟退休办法无疑最能推迟崩溃。其它国家社保劫富济贫，推迟退休可说是丧失诚信的违约之举，中国社保劫贫济富，推迟退休就不仅是违约，更带有抢劫性质。难怪有缴费者抨击，理论上，政府可以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推迟到八、九十岁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办法将窟窿补上，可那要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越来越多的工薪者无奈地选择断缴社保。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断缴社保者已达数千万，已经有两三成的工薪者选择断缴社保费。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县，超过 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 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 70 元的基础养老金只能勉强不至于饿死。国家虽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额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发放率很低，多为村干部送人情。（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8 月版）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 1.25 美元，合人民币每月 300 元，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7000 美元，号称小康，公务员养老金动辄万元，但贫困农村老人每天养老金不足 1 美元。他们大都有在城里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榨干血汗后老无所养。可以说，农村老人大规模自杀了断，其生存权不仅是自己剥夺的，也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党和政府”剥夺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运行，其资源还在不断流失。根据审计署的数据，从 2010 年到 2013 年，社保基金损失 175 亿元，主要来自三部分：利率损失、自营指数化投资损失与信托等损失。据《华夏时报》报道，2011 年 3 月底，社保基金与 4 家银行达成固定利率存款协议，在央行加息

后社保基金存款协议仍维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 15 个使用信托贷款的项目，就有 6 个项目的用款单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资金，涉及金额 14.20 亿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监管者，就必须采用委托投资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监督投资者，由审计署监督社保基金，董事会、监事会、投资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篮子里的菜，全国社保基金逐渐舍弃了全球选秀、由有能力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自营投资越来越多。社保基金坚持自营也即直接投资，而非被市场证明有效的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人员下场充当运动员，公私不分，自营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15》显示，全国只有八个省份当年社保基金结余为正数，其它省份都出现了亏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于弥补财政亏空、购建固定资产、弥补经费等等。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约挪用了 800 亿养老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了居民收入，政府应以国企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对于工资远低于公务员的普通民众是劫贫济富”，建议社保“双轨制并轨”，让公务员也参加缴费，一来实现公平、公正，二来帮助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还有专家建议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及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划拨社保体系。上述建议第一难以实施，第二不能挽救养老多体系的崩溃。财政部内部人士直言，从国有资本经济的收益来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红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一定彻底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制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太多动力和机会将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学者们关于社保的建议与世界银行关于税收的建议一样，没有意义。财政问题、社保基金缺口问题，根源是政府疯狂扩张规模。事实上，“党和政

府”及利益集团吞噬了国民财富，将财政收入，包括国民养老的钱花光了。回避这一问题的社保探讨没有意义。税收，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够供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有余额补贴社保呢。在“党和政府”的规模和花费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养老金的欠账只能越积越大，成为未来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穷，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消费率在 60%以上。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钱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收入还不够，还要靠卖地生存，推高地价、房价，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大幅降低到了 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秩序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公认，政府征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运用民众的钱向民众提供免费道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现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穷人优先”为基本原则，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税，甚至不用交连电话费，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三分之一，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看一次医生只须交 1 欧元的挂号费，其余费用由社保机构划拨医保账户，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数百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学生可获每个学期数十至数千欧元的助学金，一些城市的低收入者还享受免费公交服务，个别城市全民享受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五分之一，失业者享受失业金、救济金，国民享受免费大学前的教育，政府设立了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医院医疗卡片上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有什么种族，也无论你有没有钱，更无论你有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在这里得到治疗”。在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约为 GDP 的四分之一，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前的教育，90%的大学生

享受政府津贴。在德国，社会福利开支约占 GDP 的三成，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穷人靠社会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住院流浪汉的隔壁病房可能是一位部长。在日本，社会福利开支约占 GDP 的五分之一，医疗保险覆盖全民，医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在拉美，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在俄罗斯，医疗、教育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预算约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更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接近 GDP 四成。

而在中国，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供养政府自己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党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少之又少，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让医院、学校自己去赚钱，造成医院发病人财为生，学校发学生财，卖文凭为生，学校普遍负债累累，重收费不重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面向全民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国人在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高昂房价重压之下没有保障感，毛时代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如今，“党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它们蔑视法律，不断加强对舆论和司法的影响，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 年收入最低的 5%的家庭户均收入只有 1000 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最高的 5%家庭的收入占有家庭总收入的 23.4%，是收入最低 5%家庭的 234 倍。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中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容忍线。

“土地财政”

建国之初，中共通过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却没能收回土地所有权。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中共宣布二十年不变，随后又宣布三十年不变，出台政策规定土地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口变动

不再重分，新的集体成员不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样的政策规定似乎是说土地一次性归家庭私人占有。但农民清楚，承包期无论怎么延长，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能出台新政策，如同当年允许包产到户后很快又禁止一样，取消承包。于是，农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夺性经营，不计环境破坏恶果，如同当年合作化时疯狂毁林砍树一样。

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时集体不存在，宪法规定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含义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过农村基层干部控制的党产。通过推行合作化再废除合作化，中共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革命收获。虽然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土地出让的权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垄断农地，低补偿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买给开发商。1989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凡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出让收入必须上交财政，中央财政收取40%，地方财政收取60%。以公有制为名的土地出让制度实际是中共对土地的“统购统销”政策，即政府垄断的强买强卖。虽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没有规定集体不可以卖地，但当局利用强权规定农民集体不得自行出卖土地，土地只能卖给政府，由政府独家征地，再挂牌出让。这样的“土地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怨声载道。

1993年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宪法关于土地方面的规定造成了农民短期行为和政府控制土地获利等诸多社会弊端，建议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他的建议遭到“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指责，被政治局否决。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把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土地出让金比例为，中央财政收取5%，地方财政收取95%。此后二十年间，全国数十万亩农用地转为了城乡建设用地（农转非）。政府征地带有强

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买家，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为自身利益尽量压低补偿标准，转手高价卖出。专家估计，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红利中，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仅占 5%~10%，村官们以集体名义分享到了 25%~30%，“党和政府”霸占了大头，攫取了 60%~70%土地增值红利。因此这样的土地公有制不仅实质是“土地官有制”，更被一些学者抨击为“官员抢劫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政府规模疯狂扩张，官员收入暴增，财政收入供养政府远远不够，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规模、最昂贵的“党和政府”，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腐败。各地政府为应付暴增的开支疯狂地赚取土地开发收入，推高地价，房价，快速吞噬土地资源。2003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对九省(市)“土地财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 60%以上，显示“土地第二财政”超过正常财政，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财源。如今，房地产绑架着中国经济四十多个产业，如果房价不涨，房子卖不动，各级政府的地就卖不动，银行贷款还不了，同时房产商也资金链会断裂，还不上银行贷款，债务危机和金融风暴就会降临。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政府财政立即爆发危机。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齐心，出政策让地价、房价一直涨。官员们都知道地卖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够几十亿人住了，泡沫爆破是迟早，但大家只关心自己任内的政绩，只管继续推高房价，走一步说一步，不管将来后果。

地方政府不光赚取土地出让金，还赚取开发税费，向房地产买卖双方收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 2009 年向人大、政协会议提交的报告显示，从开发商拿地到商品房销售，各级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让金、拆迁管理费，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七大类共 37 项税费。这些税费构成了商品房销售额的 50%至 70%。地产商会轮值主席任志强表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这份报告中，对房价构成的分析，并没有将政府收取的各种税费

完全计算在内，如规费、证费、市政基础设施费等。同时，也未计算上下游产业中的税费，如施工单位上缴的各种税费、建筑材料生产与购买环节的税费、设备生产与交易中的税费等等。若将这些政府的所得考虑在内，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超过七成。37 项税费之外，房地产企业还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向 20 至 30 个政府部门公关，缴纳 20 多种收费。这些开支构成了政府的腐败收入。北京的一位房地产经理人抱怨说，他曾经为一个项目前后跑了 40 多个政府机构，盖 40 多个公章，每个环节都要花钱公关。老百姓的买房钱，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2012 年，全部 2469 家 A 股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 19544 亿元，与上年相比整体净利润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 2223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7 至 2013 几年中，139 家房企缴税额高达 6430 亿元，而同期的净利润仅为 6265 亿。总体而言，企业的税负增速大于利润增速，经济发展的好处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承认：“房地产的钱都收给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国务院曾要求将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国土部门收钱后交财政部门纳入地方国库，设立专账（即登记簿）核算土地出让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账本不能对外公开。因此，财政部收支预算中，只有土地出让金总数而没有详细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监管，“土地财政”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 3 万亿元级，完全黑箱运作，民众和各界没有知情权，更无监督权。

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虚假表述，土地实际由政府所有，通过村干部控制。随着城市化进程，土地市场价值暴增，政府通过村官控制土地，不断攫取着土地利益，村官则中饱私囊。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纵村官选举，通过村官办差，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农民对剥夺自己权益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满日益强烈，抗争事件不断发生。以下三个案例最能说明“土地官员所有制”的腐败。案例一，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十名村官

瓜分了 316 套安置房贪污了 18 亿；[18] 案例二，2011 年 9 月，广东汕尾陆丰有 1.2 万人的乌坎村爆发了村民维护土地利益，驱逐村官，打出“打倒贪官”、“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等标语游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将村官赶走后组织自治，再为反抗当局军警镇压组织起了自卫队，在村庄四周设置路障、挖断村道，以石碾砖头、木棍铁通等阻击警车入村，多次爆发警民流血冲突，五名领头村民被捕，其中一名被殴致死；案例三，2013 年，深圳龙岗区南联村前村委会主任被曝多年非法变卖村集体土地，违法承接商业开发光拥有数十座豪宅、厂房以及大厦等，总资产超过 20 亿元。三个案例都代表着官民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其实也是“三农问题”、“征地冲突”、“小产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问题都是中共剥夺私有土地，宣布所谓土地集体公有造成了革命灾难。

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指出了拥有恒产是维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剥夺了国人的恒产，也就摧毁了国人的恒心，使国人道德沦丧，只顾眼前利益，作一锤子买卖，不管环境影响，不管子孙后代，竭泽而渔。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基本条件。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产权界定权利。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是价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与利润的前提。共产党宣传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实际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万恶之源。这印证了孟子所言失去私产会使社会丧失秩序，人们丧失善良的道理。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19]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证明，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

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由此可知，国有资产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国有企业必然是官有企业，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质上是官有制，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公地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化。

乌坎村民抗争持续三个月后，广东当局在村民顽强抗争及海内外舆论压力下妥协，以处理腐败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乌坎村实行民主自治，一人一票选出新的村委会。但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无法治村，原因还在于土地利益。一旦土地由全体村民共有，则由此产生的转让，交易、定价，出卖等矛盾复杂到无法解决，越是民主越难以达成共识，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解决不了。农民维权的目的虽未完全达到，但维权行动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同时也导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胁到了“土地财政”的存续。

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都没有必要的创业资本，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一，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1950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革命之前，中国本来就有合理的，符合国情、民情的土地私有的制度，革命党废除了合理制度，带来了暴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只废除了革命暴政中的一小部分，而保留了革命暴政的绝大部分。中共宣称土地公有，而拒绝权力公有，坚持权力一党私有，实际将全国土地充作了党产。政府的“土地

财政”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骗局性质的最好证明，也是公有制是罪恶之源的最好说明。

债务危机

正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GDP 增长与全社会的消费，即内需同步增长。但在专制体制下，“党和政府”主导投资达到疯狂程度。各级政府官员不满足于收取土地出让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来土地收益和税收作担保疯狂举债，胡乱投资以获得任期政绩和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将来的债务归还和项目的后果。开建的新城区和基础设施项目通常不能产生还贷回报，政府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有银行须为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结果导致不问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开建大项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例如内蒙古政府计划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一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巴彦淖尔”，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二连浩特”；河南政府开工的“郑东新区”、“鹤壁新城”、“信阳新区”；江苏政府的“常州名市”、“镇江丹徒代化城”；辽宁政府的营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云南政府的呈贡新城等等。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大都成了几乎无人居住，夜晚漆黑一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区的东、西两面大规模造城，削平山头，“向山要地”6 万多亩，造了“东部新城”40 平方公里，“向山要地”9 万亩造“西部新城”46 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约为每亩 22 万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 万亩的土地整理成本就达到 300 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迁安置、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堰市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按十堰市的年财政总收入几十亿元计，市政府预支了未来十几的财政收入。在陕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发展战略，计划“削山、填沟、造地、建城”，十年再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预支了更长年限的未来财政收入。在鄂尔多斯，地方政府疯狂投资，欠下债务千亿计。

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为发工资，不断向辖区内的的万正投资集团、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伊泰集团伸手借款亿元，十亿，甚至数十亿款，逼得企业纷纷准备搬迁。地方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政府规模的扩张。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级职位 300，实际科级干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导的投资数千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和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区内是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这两项无效益投资的每日千万元利息将唐山市政府拖向破产。[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 48 家融资平台公司，以未来卖地收入担保，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数千亿元建地铁，建了呈贡新区，透支了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投资的新区等项目不能产生回报，昆明政府技术破产。在严重依赖煤炭行业的资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资源大部分控制在国企、央企手中，市财政可动用的资源很少。市政府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开工了建新城、古城复兴、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化广场、高铁站、客运站等一大批项目，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结果连借款利息都还不上，拖欠无数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为还债，市政府计划将国有资产变现或抵押融资，准备抵押的国有资产包括 100 多家国有企业，3 万多亩的储备土地、一些融资平台公司持有的物业资产以及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但是，准备变卖的国有企业并不值账面的资产值，准备用于抵押的名胜古迹也不能顺利出手，市政府同样陷入破产。在武汉，市政府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伟目标，推出了投资总额 8000 亿元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然后再不断加码，开工建设的工地上万个，创造了 5000 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的世界奇观，也赢得了“满城挖”称号。政府投资颠狂中的建设项目多是在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开工的。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武汉债务余额为两千多亿元，每年须还本付息三百多亿元，每天需偿债一亿元，政府并没有可持续的财源偿还债务，同样技术破产。在天津，政府同样利用融资平台疯狂借贷，

投资 2000 亿人民币兴建“中国新曼哈顿”，声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区”。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楼、宾馆同样如同鬼城，政府负债累累，收入下降。政府无力偿债务并未影响主导政府投资的市委书记张高丽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大量信贷资源被无效企业占用。“土地财政”造成地产市场疯狂和银行放贷爆增。为追求政绩，地方领导人不停地折腾，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为了获得 GDP 政绩和油水，官方们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只管铺大摊子。政府的负债造城的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官商勾结的富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以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此后，通过大量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了中国常态。过度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减弱，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压制了居民的消费，使经济逆向调整，结构更趋畸型。

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目前中国需求、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国进民退，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 1996 年的 12% 上升到了 2011 年的 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他建议进行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减税以避免企业停工、倒闭；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制；不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还须在一次分配上实施改革。[22] 经济学家茅于軾在 2012 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依法纳税，而是计划纳税。从分配来看，从 1998 年到 2011 年 13 年中，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从 69% 降到 57%，降了 12 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鬼城”源于政府饮鸩止渴，以巨额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特别是 2008 年“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后果。他建议改变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把做经济的职责完全交给企业、

民众，而政府则转为服务型，走民富路线，拉动内需，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局限于经济说不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一党专制。在废除一党专制之前，“市场化行业重组以消除过剩产能，减税，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等均无从实施，政府疯狂投资、举债，“财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国家审计署 2013 年 6 月公布的《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 个省会和直辖市，有 17 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比例高达 95%，而 2012 年 6000 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只能借新债偿还旧债。2012 年，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占到 GDP 近半，超出均衡水平 10—20 个百分点。2013 年，发改委声还要投资四十万亿拉动城镇化建设。政府没有说明怎样筹措这四十万亿，估计政府只能靠滥发钞票来维持投资。里昂证券的报告指出，2012 年中国新增债务比 2011 年增长了一倍，债务增速为 GDP 增速的三倍。中国 GDP 增长靠债务支撑，GDP 高速增长预支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民收入。国际公认债务占 GDP 比例超过 60%为危机警戒线，而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对 GDP 比例已高达 300%，远远超过了破产希腊的 170% 比例。“在人均收入 6400 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23] 应对债务危机，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救命稻草”。国土部门公务员变身土地推销员，被分派指标去找买家，政府想尽办法提高土地出让起拍价。[24]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政府赖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趋向枯竭。当城镇和县政府都在发债集资时，债务危机已经临近。中国债市发行者基本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国际资本感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不断抛售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一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坏账没有暴露是因为政府增发货币在掩盖着。

中国的金融业垄断经营，国有银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国营企业，而使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融资无门。于是，正式银行系统外提供信贷的“影子银行”兴起，提供着近一半的信贷，助长着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惠誉评级机构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发放贷款维持着投资热潮，影子银行系统在迅速膨胀。公司和地方政府都从不受监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贷。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影子银行”的总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同样巨大，也在 20 万亿元以上。“影子银行”以没有担保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从储户吸收的存款，贷给以土地作押的各级地方政府，帮助政府借新账还旧账。金融业事实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来越多的银行储户的资金通过理财产品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多没有效益，大建“鬼城”，无力还债，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都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如何偿还。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债务人，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他建议尽快改变财税体制。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高院长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政府成为不考虑还债借债人主要不是因为财政体制，而是因为政治制度。独裁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约、问责与追究，官员们自然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在野党监督，没有执政党更替，财税体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政府的胡作非为只能越来越疯狂。

伴随疯狂投资、举债，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失控。中国 1990 年的货币总量为 1.53 万亿，截至 2015 年底为 137 万亿元，增长了 90 倍，同期美国货币量只增加了一倍。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在形成的一个方法是看债务对 GDP 的比例是否在增长。如果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超过一元钱的产值，债务对 GDP 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低于一元钱的产值，金融机构把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债务对 GDP 比例上升，债务危机风险加大。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 GDP 的 70%。2008 年中国 GDP 为 31 万亿元，年底贷款余额为 32 万亿，债务对 GDP 之比 102%。在应对债务方面，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采

取严厉措施限制银行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不采取措施，放任银行信贷膨胀可以延缓危机，但使风险会累积得更大。由于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员全为中央任命，各城市发生的问题一律由中央担保。这一方面使中国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债也不会出现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但另一方面也使整体风险将累积到恐怖地步。如今，这一比例逼近 300%，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全民。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 1.5%，但国外金融分析师一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数倍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为政治原因的贷款债务挂在账上，不作坏账处理，以保持账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银行为破产国国企贷款发工资，银行都挂在账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后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企业拿土地做抵押，而企业也以大肆购地作为扩张前提。从 1970 年代开始，日本的土地投机开始疯狂，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弥漫着投资土地必涨的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购置更多土地。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资产的担保增加放贷。在“地价升值——担保品升值——贷款增加”的循环中，信贷规模迅速扩张。1990 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土地、证券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贷款。大量不良债权长期得不到处理，使日本陷入长期通缩。[25] 野村公布的数据表明，19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的信贷资金总额占 GDP 比率约为 40%，中国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信贷资金总额占 GDP 比率已经接近 300%。据审计署的抽查，36 个地方政府中，截至 2012 年末，有 9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债率超过 100%，最高达 189%，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 220%。

发达民主各国的债务 GDP 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国的在野党都在制约执政党举债。例如美国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疯狂举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而中国没有反对党，“党和政府”不受制约，政府举债疯狂世界之最，累积的债务风险也世界之最。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办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比方把地方投资平台、一些城建公司都关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贷，严格的要求他们按章办事，借钱还款。但这样很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中国连政府破产的法律都没有，这个债权里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银行、地下银行、国有银行，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利益体系都在其中，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地方银行破产，老百姓会去挤兑，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或是雪崩。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再印钞票的话也是自杀行为，不印钞票让它破产也是自杀行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一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值得怀疑。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他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地方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做，中国危机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过几万亿的投入刺激经济，导致产的过剩，通货膨胀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而从中赚到钱的人是中共的权贵阶层，而他们这些人把赚到的钱，有很多已经转成美元、欧元、日元，转到海外了，换句话说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被这些权贵给拿走了。”经济评论员巩胜利指出，党政运行成本比所有的国家高出了二分之一；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垄断性企业超过一百二十家，等于把国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国经济的成本没有办法降下来；党政机关的盘剥、国企的垄断使得一般企业和老百姓连生存都困难，怎么可能实现以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成长？政府收费超过税收的百分之四十，税和费加

在一起，企业基本上就难以生存。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没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国家和百姓的钱卷往国外。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数据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1 年间，中国有约 4 万亿美元的资金外逃。这一数额超过了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 ICIJ）2014 年 1 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前任、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们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的离岸公司藏有巨额离岸资产。中共领导人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要求各网站，微博、微信对有“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的网民立即封号。[26]

环境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于人们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只有限期的使用权，于是大家都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环境。由于政府主导经济，中国资源极大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5.7 亿吨标准煤，2012 年为 36 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5 倍多。目前，我国的单位 GDP 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为美国的 2.9 倍、为日本的 4.5 倍，我国单位 GDP 的水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中国用掉了世界上 35% 的化肥和 20% 的农药；六十多年的共产统治给中国的自然环境破坏后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后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盖率从 1950 年的近 30% 下降到 10% 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兰 67%，日 66%，韩 64%，挪威 60%，瑞典 54%，加 44%，德 30%，美 33%，法 20%，印度 23%）。毁灭天然森林的同时，中国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一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一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贻害无穷；

水土流失与沙漠化：1949 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116 万方公里，如今超过 400 万平方公里，国土总面积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国每年流失 100 亿吨沃土，相当 1 千万亩耕地 30 厘米耕作层土壤（自然形成 1 厘米耕作层土壤需 1—400 年，形成可耕作层规模需 3000—12000 年）。1949 年全国沙漠、沙化土地 66.7 万方公里，如今超过 300 万平方公里。卫星地图可以证明，中国大地是地球翠绿陆地中的一大片黄土裸露的区域。占国土面积四成的草原 90% 出现退化，且以每年 2000 多万亩的速度在扩大。也就是说，国土的三成多已经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从 1985 年起，黄河几乎年年断流，流域干旱日渐严重，流域年入河泥沙 16 亿吨，其中含有氮、磷、钾 3 种元素总量约 4000 万吨，超出了 2003 年全国化肥需求量 3990 万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超过 40 亿吨，中下游支流水质常年为劣五类，近 2 亿人受害。长江正在步黄河的后尘，走向断流与干涸。“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辛元红说：“1969 年时，黄河源还有冰川（固体水库），但 2000 年时，整个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黄河源区固体水库消失的生态灾难正在长江源区重演，并已达到怵目惊心的地步。”与黄河一样，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年数百亿吨，水系生态正在迅速崩溃。全国七大水系中，五类和劣五类水质超过三分之一，七大河中有一半的水资源已不能用。1949 年以来，全国湖泊减少了 1000 多个，湖泊蓄水量减少 500 多亿方，其中淡水量减少了 400 亿方。渤海已成死海，严重污染的海水倒灌；

环境污染：全国约 10% 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砷污染比例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 40%。据《现代和谐论》一书介绍，国土的三分之一被酸雨覆盖，70% 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 流经城市的河流严重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大陆的癌症发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癌症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数据，中国“癌症村”多达 459 个；

水资源告急：全国水资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资源减少到世界人均水源的四分之一；全国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沉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资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干涸，中国河流已消失了近三万条，近200个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为例，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和大规模地面沉降，最大沉降达700至800毫米，并且全市浅层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为饮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张作辰指出，我国地面沉降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华北平原区地面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范围，达到6.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华北地区近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唯GDP至上，三十年后，古老而美丽的华北平原将消失。乾隆年间，北京地区遍布沼泽、湖泊，如今北京湿地面积仅占3%。小麦是华北平原的主要农产品，但是现在连灌溉小麦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麦子就没法活下去。但是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几年呢？越采越深，采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华北平原就将慢慢沙化，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干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华北，全国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着左邻右舍的GDP数字，你追我赶，造成钢铁过剩，水利过剩，造船过剩，太阳能过剩，风电过剩，几乎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很多工业开发区都会因为产能过剩而关掉。”他建议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级政府靠卖地发工资、还债还不够的情况下，杨主任的建议当然不可能实施。过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一样的反人类罪恶。

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最近报道的中国癌症人口的增长很惊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症村其实是人祸造成的。中国每天癌症病人增长8000人，一年三百万人。癌症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业的分布的是一致的。其次就是农业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灭虫剂的使用等等。中国的水污染是人为的，是人祸。中国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无论是地表水还是

地下水，超过 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有穷的国家，有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环境污染债务无法偿还。治理中国水污染，三十万亿还不够。打个比方说，胡锦涛家乡的城河治理改造，原来是五类水，大概现在是达到四类水、三类水，花了将近四亿人民币。如果把环境方面欠的债用数据体现出来，中国也许就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湿地消亡：1950 年全国湿地面积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如今 60%萎缩、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来湿地消失了 90%，陕西关中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全国红树林由 25 万公顷减少到 15 万公顷。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间的生存空间减少至五分之一，已退无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人群中近 60%考虑投资移民。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国公民估计有 800 万人。上述事实显示，有能力者都在想办法离开环境日益恶化的中国。然而，离开中国未必能逃避环境灾难。2005 年，世界各国经长期努力终于共同签署了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然而不久，中国宣布新建 562 座电厂，其造成温室气体将是《京都议定书》所减少排放目标量的五倍。中国的计划实际宣布各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废。专制中国无视“产能过剩”的环境灾难后果一意孤行，建造了足够全世界新增人口总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国的“鬼城”，排放着比美国加欧盟总和还多的二氧化碳量，成为全球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背后的最大的灾难因素。生态灾难虽有人类扩张摧残环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证明，中国的环境灾难主要是专制与公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祸害。

道德沦丧

二十世纪的革命带给中国的一大灾难是道德沦丧。首先是中共道德沦丧。东欧巨变后，共产阵营灭亡，共产革命时代结束，绝大多数共产党自行消亡，中共成了共产党、共产制度和共产学说的最后代表。这时的中共已是富人党，以中共元老子女为代表的“红色家族”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财富总值千亿美元计，在西方国家为子女和私产安排了后路，大多数成员拥有外国居留权、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公民身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约三分之二私营企业家有党政背景，约五分之一的企业家曾是党政领导，多数企业家获中共任命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方办各种协会会员。[28] 商人为了生意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获得官商勾结的好处。学生们加入共产党也与信仰无关，因为共产党控制垄断着公务员职位，很多职位以共产党员身分为录取、升迁的条件之一，大学生为了职位，待遇，为了分享现行政治体制的好处而入党，于是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数量不断膨胀。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评论说：“中国从大学生到富翁都为了自己，或为了赚钱而要求加入共产党。奇怪的是，他们还保留‘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等理想主义的空话。”

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党员们不相信党的宗旨是必然的，而且这不是坏事。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诉求是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富人的财产与生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所谓改革开放，中共党员们成为富有阶层，党政军高层已经变身为中共宣传语汇中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变身为共产革命宣传中的革命对象。作为最富有的阶层，“消灭私有制”、剥夺富人的话他们说不出口了。新一代中共领导层对世界潮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将子女安排到了西方世界，“暴力摧毁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学说信条他们也说不出口了。这时的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已经成了富人俱乐部。中共为了私产安全，推出了《物权法》，宣布私产不容侵犯。如果继续喊消灭、剥夺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口

号，那革命的对象应该是共产党自己了。新一代中共领袖们自己也经历了毛时代的残酷阶级斗争，有些人还是整肃运动的受害者。苏维埃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他们清楚共产革命的血腥和灾难性，清楚共产学说的空想和荒谬性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口号他们都喊不出口了。共产党员们一面获取利益，一面称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一面攫取着财富，一面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一面安排家人子女移民西方，为自己准备好外国护照，一面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013 年，访华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与中国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有中国大陆网民问俄罗斯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俄总理介绍说，俄罗斯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公务员公开申报财产法律，要求公务员申报他的开支，收入和开支要平衡，如果不相符就有问题。公务员没有权利在外国拥有资产，包括股份，而且他要关闭在外国银行的账户，因为这些官员要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所以一定要跟自己的经济一起分担风险。作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布了个人的财产。然而，外界期望的中共新领导层通过强制官员公示财产制度迟迟不能推出。原因很简单：中共高层、人大、政协委员们大都拥有难以公布的惊人财富。花费和财富惊人的共产党人在精神上必然道德沦丧。据《南华早报》报导，一位中纪委官员约谈一批广东省官员后披露，他所约谈的每个官员都拥有惊人财产。这位纪委官员发出党内警告称，披露官员财产会引发民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根据维基解密透露，中国政府官员在瑞士银行 UBS 有 5000 多个个人账户，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其中持双重国籍者逾 800 万。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显示，4000 多名贪官外逃，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 100 亿美元。

知道错了改弦易辙，放弃错误的宗旨，对犯下罪恶认罪，道歉，谢罪，是一个人、一个党的基本道德。新一代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党的罪恶，但他们

不能谢罪，甚至不能道歉。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党是从罪恶中一路走来的。如果讲谢罪，那杀人夺财的“打土豪、分田地”应当谢罪、镇压反革命应当谢罪、就剥夺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谢罪，反右运动应当谢罪，制大饥荒谢罪应当谢罪，大搞“阶级斗争”应当谢罪，文革应当谢罪，那谢罪就没个完，统治面临垮台。作为新一代“土豪”、新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群体，共产党人不能谢罪，也不能放弃共产革命宗旨，只能自欺欺人地坚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称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口号。他们明明知道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称自己的资本主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花费着出卖全国土地的钱财，却坚称土地是公有的。他们声称要依法行事，鼓吹社会和谐，却拒绝放弃暴力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的共产信条，在开大会时继续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在反文明、反进步和反人类的共产信条已被全世界唾弃的时代，中共致力于“维稳”、守成，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维护毛泽东留给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党员不相信党的宗旨，把入党、在党当作找个好职位的敲门砖，当作升官发财跳板，全体党员说一套作一套的情况显示，共产党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最虚伪和道德最为沦丧的群体。

在认错与改正错误方面，国民党比中共强了许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光复会也曾诉诸暴力，拒绝改良，国民党也曾一党独裁。但国民党人有反省的素质，会道歉，会悔过，会放弃被证明是错误和灾难性的信条，会追随进步潮流，能够主动融入进步潮流。国民党不需要改党名。宋教仁缔造国民党时取“服务国民”之意，名称本来就没有暴力、剥夺之意。国民党人对下野不那么恐惧。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国民党人都曾下野。国民政府在成立后就公布了实现宪政的时间表，一直有作在野党的准备。谁都知道，靠收党费与“党员月捐”根本养不了庞大的党机关。党众大都是为了利益来投。自广州国民政府时代起，国民党开始在政府财政中开支党务经费。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这一作法，规定国民党代行国民大

会职权，享受政府财政拨款，实行“以国养党”。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作出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承诺，开始筹划“以党养党、党费自筹”。为下台作准备，国民党早早建立了党库。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以前党费自给失败的经验，决定创办党营事业、党营企业以养党，通过了由陈果夫主导的《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其中规定：运用党费基金创办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以期党费自给。从此，国民党开始办党营企业赚钱养党。在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之下，党营企业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例如，恒大公司1948年收益高达8000亿元。[29] 19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规定垄断性行业的公司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官股，国民党党营事业携手水泥业的辜振甫、信托业的辜濂松、纺织业的徐有庠、塑料业的王永庆等民间财团，投资石化、水泥等行业实现了党产迅速增值。1971年6月，国民党成立了第一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资公司，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与设立石化中游工厂。在“十项建设”中，国民党党营事业通过投资石化等建设项目进一步扩张，[30] 使台湾在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与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存在着既非国营，也非私营的庞大国民党党营企业。在一党专制体制下，国民党党营事业不可避免地存在“无偿占用”、“廉价租用”、“低价买进”、“政府预算补贴党营事业”、“党政合资办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的企业”、侵占国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等劣迹。尽管如此，国民党通过早早停止从国库拿钱，切实地为放弃一党专制，向多党制过渡作着准备。在伟人蒋经国带领下，国民党放弃独裁，融入宪政，随时准备作在野党。随着反对党的出现，国库拿钱养党不再可能。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要求永远当权，声言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代表富人的共产党不可能再号召暴力剥夺富人了，但却坚持意味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共产党之名。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利益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员人数正向亿级迈进。庞大共产党不受制约，不断扩张规模，寄生于国库，吞噬国民财富，要求永远执政，不容反对党出现，决心将一党独裁坚持到永远。共产革命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扫除剥削压迫，造福

穷人。在二十一世纪谁都清楚，革命并未扫除剥削压迫，也未造福穷人，只是换了共产党人当富人，国人的贫富差距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如果说穷人的日子比革命前好了，那不是因为革命，而是拜了科技进步之赐。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生活的改善更大。中共建国前三十年打社会主义改造旗号将百姓私产充公，变成所谓全民公产，后三十年又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把全民公产化为私有，让红色家族变身巨富，这就是共产革命。

革命还导致全民精神堕落。中共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间实施愚民洗脑，以及各种血腥政治运动摧毁绝国人的传统道德根基，将国人变成仇恨狂，斗争狂，摧毁了国人的道德心，同情心，爱心。改革开放三十间，中共为维护统治需要，推动极端自利和享乐主义。如今，官场功利，学校功利，医院功利，甚至清静的寺庙也不能幸免。在官场，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升迁，不关心政府债务，不关心环境代价。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裸官”，家人财产早已转移国外，获取了外国居留权，准备捞完最后一把移民，哪怕离开后洪水滔天。在学校，教授、学生急功近利，以权力金钱衡量成功与否。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大学以为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标志大学成功。知名大学通过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自己跻身世界百强。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忙着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中科院腐败堕落，社科院腐败堕落，北大清华腐败堕落，知识精英们钻入钱眼，名校热办“总裁班”、“精英班”、“领导干部班”，收天价学费贩卖“硕士”、“博士”、“MBA”、“EMBA”头衔，教授变身老板，忙于要项目、接受赞助，男生不堪压榨自杀者有之，女生陪睡拿学位者有之。在医院，医生挖取病人钱财，以度医疗赚钱是公开的秘密。此外，黑心食品，黑心产品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布的“世界奉献指

数”（World Giving Index）排名榜上，中国人长期名列最后（台湾名列第35名），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无善心的群体。经过六十年的共产统治，中国人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只崇拜权力、金钱，与革命前相比，人民丧失了太多的善良、淳朴、信仰，和人情礼仪。

结语

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显示，最富有的 1%家庭占有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底层 25%的家庭仅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 1%，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极为严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20%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 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 10.7。这一比值在美国是 8.4，在印度是 4.9，在俄罗斯是 4.5，在日本是 3.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暴力剥夺富人，将富人的财富共产。上述报告说明，经过八十多年的革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成了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和最不公平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社会容忍警戒线。中共在夺取政权前以“打倒土豪劣绅”，“让穷人翻身”等口号及谴责“四大家族”相号召。然而革命带来的是什么呢？不是公平，不是进步，而是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集中的盛筵。空前的不公平显示，共产革命与两千年来打江山，坐天下，富荫子孙的游民造反并无区别，革命历程不过是革命党杀害富人，剥夺富人，然后自己做富人的历程，“为人民谋幸福”，“代表无产阶级”等等动员口号其实是掩盖暴力抢劫他人财产的幌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受惠于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与成本红利。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快速进入人口倒金字塔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随着“廉价用工”的时代走入历史，依赖“血汗工厂”的成本红利也逐渐消失。在几项红利消失的同时，中共拒绝体制变革，“党和政府”滥用权力，疯狂扩张规模，滥发货币，疯狂借债，恶意透支未来财富，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下没有可能作到二次分配调节贫富，没有可能保障社会公平。没有执政党轮换、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腐败无从制约，

没有公平竞争的真正市场经济，没有民选机制，没有民选议会，“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等等问题无从解决，贪官外逃，富豪移民海外只能愈演愈烈，看来制度问题只能以危机爆发、社会动荡的方式解决了。

1930年代，胡适提出应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执政党。他指出：“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办法”，[31]“民主政治与清廉政治是有密切关联的。”[32] 1950年代，他继续呼吁建立反对党说：“今天大家觉得一党当政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制裁的力量，流弊甚多，应该有一个别的党派出来。我在多年前曾公开说过，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学土耳其凯末尔的榜样，党内分化为两个党，[33]“期望在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34]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等人身体力行，筹组反对党，结果被逮捕入狱。如今，雷震纪念馆和雷震研究中心在台湾政治大学落成，马英九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向雷震家属及所有曾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士鞠躬，表达歉意与敬意，并宣布中华民国政府面对历史没有任何的禁区，对于过往白色恐怖的历史会诚实面对、诚实认错、诚实道歉、诚实改错。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有句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中国在清末已经接近了驯服统治者的目标，清廷准备好放弃皇权，在《钦定宪法大纲》序言中明白表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军机大臣奕劻明言：“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不幸的是，外强输入了革命，清廷的立宪时间表作废，中国离驯服统治者的目标越来越远，人民在驯服统治者方面越来越无能。所幸，在今日台湾，民众驯服了统治者，权力者被关进了笼子，在野党和民众的强力制约下，执政党再也不能为所欲为，

再也不能以国库为党库来供养党众和党机关，而且还必须准备下台。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驯服统治者的目标在大陆也将实现，用民主先驱殷海光的话说是“大江东流挡不住”。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在考察欧美后指出：“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他提出：暴力革命不能给中国带来自由，不利于国家进步，中国应走渐进改良的立宪之路。他的主张被革命党人斥为反动。然而他警告的“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那样的灾难不幸在二十世纪中国上演，中国同样“大乱八十年”，不过不是“流血数百万”，而是流血亿万。世纪之交，将中国带上共产革命之路的俄国为中国树立了忏悔革命罪恶的榜样。1998年7月17日，俄罗斯政府在圣彼得堡为末代沙皇一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八十周年的这一天，苏俄秘密警察奉列宁之命在叶卡捷林堡将沙皇一家满门抄斩，然后斧剁锯拉，毁容碎尸[35]，抛入废弃矿井。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宣读了对世纪革命的忏悔书。他说：“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此极端残酷的罪行，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是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罪恶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我们再不能为这样的罪恶辩护，再不能因政治目的为暴行开脱，再不能自我欺骗。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到了今天。安葬叶卡捷林堡牺牲者的遗骸是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我们需要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对俄罗斯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了和谐。在二十一世纪前夜，我们必须为后代着想，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同样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中国失去了和谐。2008年5月19日，全国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同时鸣响以纪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数万同胞。这样的举国纪念可以说是尊重生命的进步，也可以说不是。因为，被二十世纪革命害死的亿万同胞从未被纪念过。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名称、寓意、碑文，到周围浮雕内容都是一党之私，正如人民共和国是党国，人民军队是党军一样，人民英雄是指中共认定的英雄，实际是指革命党自己。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遍布全国的革命纪念馆、纪念碑都不纪念革命暴政下抗争的死难者，都不纪念革命灾难的死难者，建立的目的是革命党人颂扬自己。但愿有一天，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名，全国的汽笛同时为亿万革命死难者鸣响，忏悔二十世纪革命罪恶的播音也在中国响彻。